

启微
『民主』与『爱国』
战后日本的民族主义与公共性
下册
〔日〕小熊英二 著
黄大慧 李丰 王娟 彭程 译
黄大慧 审校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启微
『民主』与『爱国』
战后日本的民族主义与公共性
上册
〔日〕小熊英二 著
黄大慧 李丰 王娟 彭程 译
黄大慧 审校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启微
『民主』与『爱国』
战后日本的民族主义与公共性 上册
〔日〕小熊英二 著
获奖
日本社会学会奖
每日出版文化奖
大佛次郎论坛奖
黄大慧 李丰 王娟 彭程 译
黄大慧 审校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日〕
小熊英二
著
『民主』与『爱国』
战后日本的民族主义与公共性
上册
获奖
日本社会学会奖
每日出版文化奖
大佛次郎论坛奖
黄大慧
李丰
王娟
彭程
译
黄大慧
审校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民主』与『爱国』
战后日本的民族主义与公共性
下册
〔日〕
小熊英二
著
黄大慧
李丰
王娟
彭程
译
黄大慧
审校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This edition is an authorized translation from the Japanese language edition edited by 新曜社. All rights reserved.

阅读日本书系编辑委员会名单

委员长 谢寿光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长

委员 常绍民 三联书店（北京）副总编辑

张凤珠 北京大学出版社副总编辑

谢刚 香港和平图书有限公司总裁

马汝军 新星出版社社长

章少红 世界知识出版社总编辑

金鑫荣 南京大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

李芳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社长

事务局组成人员

杨群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梁艳玲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祝得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梁力匀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中文版自序

究竟是哪类读者会对这部书感兴趣呢？我想，应该是那些关注日本战后史的学者及学生，抑或是那些想要了解日本这个国家的外交、贸易、文化交流对象的人吧。

本书所要讲述的，是一个国家建立的故事。这个国家，又恰巧叫作“日本”。然而我认为，书中所写的内容，对于所有国家都是共通的。

本书的研究对象，是在日本被称为“战后”时代的思想，即“战后思想”。我在书中努力想要论述的，并非某些特定的知识分子或群体，而是日本人整体共有的思想的历史。

为了方便大家理解，这里我想就日本的“战后”做一下说明。

在其他国家，人们通常认为日本的“战后”是指日本战败投降后的十年时间。同样，在日本，“如今已不再是‘战后’”这句话开始流行，也是在日本战败投降十余年后的1956年。然而即使在如今的日本，类似“战后×年”的说法仍在使用。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这里请允许我陈述一下自己一贯的观点，所谓“战后×年”，就是“日本‘建国’后的第×年”的代名词。

世界各国中，以二战后建国者居多。中华人民共和国、印度共和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意大利共和国等国家，皆为二战后“建国”。这

些国家纪念“建国×周年”，都是从国家体制变革开始算起的。

日本同样如此。曾经发动战争的“大日本帝国”在二战后灰飞烟灭，取而代之的是“日本国”。至少从体制变革的程度上看，可以谓之为“建国”。当然，发生变化的不仅是国家体制，还有人们的是非观念。被“日本国”奉为理念的和平主义及民主主义，在战前及战时是不被允许的。

然而，日本政府并未将这种国家体制变革后的某一年称为“‘日本国’建立×年”。这或许是由于日本政府自身并非十分欢迎新的制度。结果就是，虽然有相当于“建国”的体制变革，却没有任何用于表示这一时代的词语。

而这就自然会导致日本人开始在无意识中使用“战后×年”一词来代替“建国×年”。因此，无论战争已过去多久，只要“日本国”仍然存在，都会被称作“战后”。这就是我的看法。

战后日本，存在所谓“保守”与“革新”的对立。可以说，这是一种围绕是否应当承认新生的“日本国”的对立。

政党方面，“保守”以自民党为代表，而“革新”则以社会党及共产党为代表。这种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立，被认为是存在于日本国内的冷战。

然而，这种对立并不只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立。在组织和资金方面，“革新”远不及“保守”，却曾经占据了国会议席的三分之一以上。这是由于社会党和共产党当时被选民们视为“和平之党”。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一般群众支持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人们在战争中失去了许多亲友，自己也陷入了极度的贫困之中，因此对发动战争的保守势力感到十分厌恶。即使不支持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也会将选票投给社会党或共产党。

当然，大多数人对自民党在政治运作能力上占优势这一点是清楚的。并且，许多人还要依靠作为地方实力派的自民党政治家。同时，大部分人也不希望日本出现共产党或社会党政权。

不过，日本人民并不认为保守势力否定了作为“日本国”建国理念的和平主义及民主主义。在日本人中，重视“生活”的人约占三分之二，认为“理念”重要的人约占三分之一，这一点也充分体现在“保守”与“革新”在国会中的议席比例上。

在本书所探讨的思想中，围绕是否承认“日本国”的对立，表现为如何定义人民所应热爱的“国家”这一问题上。其中，一方是热爱战前的“大日本帝国”而否定战后改革，另一方则是热爱“日本国”而坚决维护和平主义及民主主义。在后者中，有人同情共产主义，也有人并非如此，但二者在维护和平主义及民主主义这一点上是一致的。

与是否支持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相比，对立的分歧点更集中在如何评价战争上。而这种评价，又取决于每位思想家在战时的经历。本书之所以从战争对于日本人是一种怎样的经历写起，除了考证思想外，也是由于笔者认为他们的战争经历十分重要。

如前所述，很多国家的建立与二战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既然如此，那么对于这些国家而言，如何记述建国的历史和战争的历史，就关乎国家的正当性。正因如此，即使在二战结束后70余年的今天，战争的历史仍然是无法忽视的问题。

不过本书中所列举的思想家对战争的评价，不仅涉及国家的正当性，也涉及他们如何回顾看待自身经历的问题。他们中的很多人不愿直接谈及自身的战时经历，并且战争原本就是一种难以言表的经历，因此谈论起来自然很困难。

于是，他们选择通过讨论关于民主主义、和平主义、国家建设方面的思想，间接地讲述了自己的战争经历。本书将通过分析他们的思想，探讨日本人如何经历战争、如何面对自身的经历。

本书2002年在日本国内出版时，读者的反应可谓各种各样。有人将本书评价为以战后著名知识分子的思想为对象的创新性研究，但似乎更多的人将本书作为一部描写人们如何经历战争时期，如何面对自己的经历和记忆，在此基础上产生了怎样的思想和政治，进而创建日本这个国家的著作而给予高度评价。

即使是对过去的思想和政治不太关心的人们，似乎也会对人类由自身经历产生思想的过程十分感兴趣。这是由于人们可以在阅读的同时设想“如果是自己当时会如何做”。这也是本书在日本颇受欢迎的原因之一。

希望中文版的读者在阅读时能够比照自己国家建立的历史，设想“如果自己生于那个时代将会如何做”，“自己的国家成为怎样的国家才会被自己所热爱”。这样便可以在阅读的同时，进行许多思考。

此外，本书所论及的时代，是从二战结束到越南战争结束，即二战后约三十年间的历史。在这期间，拥有丰富经历的人与未曾经历的人之间，产生了对立或差异。因此，在阅读本书时，也不妨思考一下如今的人们是如何回顾和面对自己国家在三四十年或五十年前所发生之事，又是如何从中产生思想及政治的。

最后我想强调的是，建设国家、社会的行为并不仅限于建国时代，今日的诸位仍然无时无刻不在参与着国家及社会的建设。这也将决定你们的子孙未来会生活在怎样的国家和社会中。我们之所以回顾父母及祖父母的时代，就是为了去面对这一摆在自己面前的课题。没有根茎的花朵，无论表面如何美丽，也终将会枯萎。

如果读者能从本书中有所收获，那么本人将会感到十分荣幸。

2017年8月

译者的话

一

小熊英二是日本知名社会学学者。1962年生于东京，曾就读名古屋大学理学部，后转到东京大学农学部，1987年毕业后进入岩波书店工作，1998年东京大学大学院综合文化研究科毕业，获学术博士学位。1997年成为庆应义塾大学综合政策学部专任讲师，2000年升任副教授，2007年升任教授，主要从事历史社会学及相关社会科学研究。

小熊英二是一位高产的学者，其个人专著有《单一民族神话的起源："日本人"自画像谱系》（新曜社，1995）、《"日本人"的边界——冲绳、阿伊努、台湾和韩国：从殖民统治到回归运动》（新曜社，1998）、《"民主"与"爱国"：战后日本的民族主义与公共性》（新曜社，2002）、《清水几太郎——一位战后知识分子的轨迹》（御茶水书房，2003）、《市民与武装：美利坚合众国的战争与枪支管制》（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2004）、《日本这个国家》（理论社，2006）、《1968：年轻人的叛乱与背景》（新曜社，2009）、《改变社会》（讲谈社，2012）、《活着回来的男人：一个日本兵的战争与战后》（岩波新书，2015）、《谁在论述什么：现代日本的思想与状况》（新曜社，2017）等17部之多。

此外，他还有《语言帝国主义》（藤原书店，2000）、《近代日本的他者像与自画像》（柏书房，2001）、《"抚慰"民族主义：草根保守

运动实证研究》（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2003）、《战争留下来的东西》（新曜社，2004）等合著多部。

小熊英二的著作不仅数量颇丰，含金量也很高，出版后均受到好评，引起广泛关注。当然，其中更是不乏获奖之作。比如《单一民族神话的起源："日本人"自画像谱系》获得三得利学艺奖，《活着回来的男人：一个日本兵的战争与战后》获得新潮社小林秀雄奖，《改变社会》获得中央公论社新书大奖，《1968：年轻人的叛乱与背景》获得角川财团奖。

然而，在小熊英二的众多作品当中，无论从学术价值还是社会反响来看，要说最具代表性的，毫无疑问应推《"民主"与"爱国"：战后日本的民族主义与公共性》（以下简称《"民主"与"爱国"》）。该书堪称"杰作中的杰作"。

二

《"民主"与"爱国"》2002年甫一出版，即引发广泛关注，且好评如潮。据粗略统计，在不到一年时间里，日本各大主流报纸和学术期刊发表的相关书评就不下30篇。尤其难能可贵的是，无论在《朝日新闻》等自由派媒体上，还是《读卖新闻》、《文艺春秋》等保守派媒体上，该书都得到了充分肯定和好评。归纳起来，主要有如下几种代表性的观点。

该书是"作为思想的战后民主主义的历史"。日本明治学院大学教授、社会伦理学者稻叶振一郎说："与我同时代的小熊英二所著的这本书，将最近评价不高的'战后民主主义'的意义作为'历史'进行测量，是一种多层面还原战后全貌的伟大尝试。"（《SIGHT》2003年冬季号）

该书是"令人刮目相看的战后思想史"。《读卖新闻》特别编委桥本

五郎指出：“限定战败以后日本人的‘战后思想’究竟是怎样的东西呢？这部作品缜密、体系化地对‘战后思想’的本质进行了深入且发人深省的探究，是一部近年来在思想史领域最令人刮目相看的作品，是一部在战后思想语境下无法回避的重要文献。”（《读卖新闻》2002年12月8日）

该书是“对公共性思想的再发现”。日本东京工业大学名誉教授、社会学家桥爪大三郎说：“作者纵览了战后思想之后，试图在原理论中去发现言语无法表达的信条。作者假设既然国家解体了，那么在自我原封不动的条件下，存在着自我和他者共存的公共性，这种公共性被称为‘民族’和‘国民’。该书在‘民主’‘爱国’的关键词里，重新发现了战后一直探寻的公共性思想。”（《日本经济新闻）2003年12月22日）

该书“以思想话语的方法再次思考战后”。日本纪实文学作家与那原惠说，该书尽管用很多篇幅验证了从战败到大约1973年期间不同言论的本质，但还是让人想反复体味，真是一部非常刺激的作品。该书照射出我们深知却又不以为然的概念的暧昧性。我们所使用的语言是在历史中产生并演变而来的，其中包含了“市民”、“民族”、“国家”、“近代”等有关民族主义和谈论“公共”的词语。该书对“战后”的再次探讨，也是对这些词语的使用方法经历了何种变迁的再次探讨（《朝日新闻》2003年1月12日）。

由此可见，该书出版后得到了学者、媒体的高度评价和赞扬。该书先后获得了2003年度日本社会学会奖、第57届每日出版文化奖和第3届大佛次郎论坛奖。日本社会学会奖为学术性奖项，旨在表彰日本社会学会会员的杰出研究成就；每日出版文化奖由每日新闻社主办，主要奖励文学和文化领域的优秀出版物；大佛次郎论坛奖由朝日新闻社主办，目的是振兴日本的论坛活动。

该书刚刚出版，就获得如此多的荣誉，被多个领域所认可和肯定，足见其所具有的价值。诚如每日出版文化奖评委今村仁司所盛赞

的：“作品中有许多‘高级的’言论，作者的目的是发掘出渗透于这些思想中的‘情感’。在理论性叙述中所表现出的‘情感涌动’的历史，正是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日本人的‘心的历史’。在处理引人入胜的争论时，作者能够保持平衡的距离而不会厚此薄彼。该书无论主题的选择，还是叙述方法的创意都完全是崭新的。该书堪称近年来的杰作。”

该书不只是刚出版后获得了很高的评价，更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成为一个时代的杰作。2019年3月7日，《“民主”与“爱国”》一书入选《朝日新闻》“好书好日”平成年间（1989—2019）30本好书排行榜。评审委员间宫阳介指出：“该书通过战后日本具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论述了民族主义与公共性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出色的文学性也是该书一大特征，尤其是关于江藤淳的论述更加精彩。”其他进入该排行榜的好书还有村上春树的《1Q84》和《奇鸟行状录》、石黑一雄的*Never Let Me Go* 、宫部美雪的《火车》、贾雷德·戴蒙德的《枪炮、病菌与钢铁》等。

三

《“民主”与“爱国”》出版近二十年来，之所以深受学者的好评及广大读者的青睐，除了其具有的重要学术价值外，还与小熊英二独具匠心的研究方法和写作方式有关。

该书基于庞大的文献资料，采用社会学中的建构主义方法，论证了以民族主义和民主为重点的日本战后思想史。该书的写作是基于这样一个前提：同时代著名知识分子的言论，与同时代集体性心情相一致才称得上“著名”。在此前提下，该书采用了这样的路径：将著名知识分子的言论与社会背景概述交叉，并在验证著名知识分子言论的同时，描绘出所谓“战后日本社会”的集体性心情，以及可能成为约束“战后”的“战争”集体记忆。

阅读该书会发现，作者特别关注每位思想家的个人生平。对此，作者在书中解释道："这样做的目的不是弄清该思想家的个性，而是为了考察这个思想家归属于哪个阶层或哪个年代，经历过怎样的社会事件，特别是战争时期有怎样的经历。""不能将著名思想家仅作为一个人，而是应当将其作为具有社会性特征的人来进行个案研究，因此必须对其人生经历加以重视。重视某位思想家个人生平的研究方法，将与各种论调视作集体性心情表现的研究方法在这里并不矛盾。"该书主要是验证"战后"日本民族主义与"公共性"的相关言论的变迁过程。为了进行这种验证，作者在书中采用了比较独特的言论分析方法。当然，这不仅是该书也是小熊英二独特的写作方式。

小熊英二特别重视"一般读者"。他在书中说："本书与笔者历来的论著相同，都是采用与一般研究类著作略显不同的叙述方式。整理学术论文成书的著作通常会在各章开头对先行研究进行论述，但本书不会采取这种形式。此外，为了照顾缺乏预备知识的读者，本书尽量不使用社会学等学科的专业术语，对于在历史学家看来属于'常识性'问题的基础史实也会时常加以说明。……像本书这样涉及多个领域的研究，如果使用只有每个领域的学者才能读懂的表述方式，恐怕便没有人可以全篇通读本书了。"

正是基于以上的考虑，小熊英二在该书中优先使用了一般读者容易理解的方式进行表述，先行研究等方面的内容全部通过注释加以说明。

不能不说，正是该书独具特色的研究方法和写作方式，使其具有了更强的可读性，从而赢得更多的读者，尤其是广大的"一般读者"。这一点，从以下两位小说家的评论中也可得到很好的印证。

日本小说家、剧作家井上厦说："该书最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引领战后思想发展的丸山真男、竹内好、吉本隆明、江藤淳、鹤见俊辅、小田实等人的小型传记分布在全书各处，仅阅读这些人物的传记就足以读

有所值。更了不起的是，描述这些引领时代人物的传记，实际上也是同时代几百万人的故事。”（《读卖新闻》2002年11月24日）

日本小说家、法政大学教授岛田雅彦认为，该书“彻底验证了比小说还要奇特的事实”。他说：“（作者）不仅要从生活在战时与战后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那里，还要从士兵和市民的心情出发来刻画历史。作者彻底验证了战时与战后人们的所思所语，为今后想要以战争史为素材创作小说的人们提供了详细缜密的材料，这无疑使他们欢欣鼓舞。在这部作品里蕴藏着无数比小说还要奇特的事实。”（《东京新闻》2003年1月5日）

四

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大作，固然是作者经年累月耕耘的结果，也是其所处时代的产物。换句话说，作者撰写该书的直接动机，源自冷战后日本“历史修正主义”抬头的背景。

1990年代的日本，随着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战争责任和历史问题、宪法和海外派兵问题等成为人们经常议论的话题。所谓“新教科书编纂会”的活动，气焰嚣张。该编纂会是一个典型的右翼组织，其成员几乎包罗所有右翼学者。他们赞美战争、国粹主义，蔑视女性和歪曲历史事实。他们编纂的《新历史教科书》严重歪曲历史，引发轩然大波。与此同时，围绕小林善纪的《战争论》和加藤典洋的《战败后论》的争论也异常激烈。这些读物都涉及“战争责任”的问题，也就是如何认识和定位日本过去发动的那场战争。小熊英二认为，编纂会和小林等人的战争认识、战后认识都是错误的，因而有必要好好地认识战后的真实情况。为了抵制“历史修正主义”和“战后批判理论”，小熊英二决心撰写一部能够正视历史、正视战后认识并充满正能量的著作。

实际上，《“民主”与“爱国”》正是从上述问题意识出发，验证了围

绕“战后”的民族主义和公共性的讨论变迁的过程。

接下来，我们简要介绍一下《“民主”与“爱国”》一书的主要内容。

在该书中，作者把“战后”分成了三个部分，即1945年战败到1954年的“第一战后”、1955年到1990年前后的“第二战后”、1990年代以后的“第三战后”。其中，战后思想原型形成的“第二战后”的1970年前后是该书的直接研究对象，因为作者认为1955年以后出现的“第二战后”的“语言体系”到1970年初期已经完成。而且，正是在此阶段，被称为“战后民主主义者”的“第一战后”的知识分子，开始失去影响力并在思想上发生转变。

基于这样的“战后”阶段划分，该书也相应地分成三个部分展开论述。

第一部分首先概述作为日本战后思想背景的战争时期的社会状况，继而在此基础上分析战败后不久的战后思想及日本人的心情，并通过“重读”战时思想来验证“第一战后”中“语言体系”形成的过程。作者强调，战后思想是作为“民主”与“爱国”的综合而出发的。

第二部分主要涉及从1950年代到1960年安保斗争为止的时期。在这部分中，作者对战后思想在这一时期的多样性发展和不断摸索，及其在作为“第二战后”的1955年以后的形式化过程进行了论述。

第三部分主要就形式化以后的战后思想所受到的批判，及其在“第二战后”中的变化过程进行分析。“市民”、“民族”、“爱国”、“近代”等词语，虽然是在历史过程中产生和变迁的，但随着战争体验的淡化，“民主”与“爱国”的共存状态却逐渐分崩离析。作者强调，今天“战后思想”的意思，实际上是在这个时期得以确定的，其被冠以“战后民主主义”的总称也是在这个时期之后。

概而言之，该书围绕“民主”与“爱国”的主题，主要追踪了二战战败的日本人，从被占领时期到1970年代初期的思想动态。也就是说，从战争经验和死难者的记忆出发，生动描绘了日本人对“民主”、“和平”、“民族”、“国家”等概念的思考和行动方式发生曲折变化的过程。为了考察“民族主义”和“公共性”的言论变迁过程，该书几乎网罗了日本战后的代表性知识分子及其事件。丸山真男、大塚久雄、吉本隆明、江藤淳、竹内好、鹤见俊辅等思想家自不必说，就连日本共产党、日本教职员工会的论调以及历史学家、文学家等的争论也得到了验证。对围绕宪法、旧金山媾和、战后史学、战后教育等问题的讨论也尽可能地进行了追踪。而且，对战争和经济高速增长等因素对战后思想带来了怎样的影响给予了关注。

作者在该书中重新探讨了日本的“战后是什么”、“战争记忆是什么”的问题，并希望读者能从日本“从哪里来”、“向何处去”的角度阅读这本书。

1960年代以来，随着日本在战败中重新崛起，日本国内外关于“日本人论”的著作层出不穷，《“民主”与“爱国”》当属其中最优秀的。有日本学者指出，阅读该书无疑会有种超越了道尔《拥抱战败》的感受。本人也有同感，愿将该书推荐给各位中国读者。

五

最后，作为该书的译者和审校者，再讲几句感谢的话。

本人长期关注日本民族主义问题，早在1989年的硕士毕业论文便是《战后日本新国家主义思潮研究》。自此之后，一直跟踪相关领域的研究。当然，也很早就关注小熊英二的相关著述。《“民主”与“爱国”》出版时，本人正在日本做访问学者，遂很快购得阅读，并萌生了将其译介到中国的念头。后来，本人将该书推荐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为了能

够尽快完成翻译工作，本人邀请毕业于日本神户大学的三位博士组成翻译团队。他们是本人在该校讲学时结识的，日语水平较高，也有相关专业知识。然而真正动手翻译起来，面临的挑战却不少。一是该书近千页；二是该书涉及历史、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方向；三是因为该书使用了海量资料，旁征博引，仅注释就达1700多个。此外，译者翻译风格的差异也给审校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由于该书是“杰作中的杰作”，尽管审校过程中深感耗时费力又损视力，但还是不敢有所疏忽大意，尽量做到精益求精。在此要特别感谢李丰博士！他不仅出色地完成了自己承担的翻译任务，还协助本人做了大量的审校工作。可以说，没有他的无私奉献，该书将很难现在就呈现在各位读者面前。另外，感谢申涛林、王晓健、张源、王童瑶、赵天鹏、李爽、黄天凝等在译校和资料查对过程中提供的帮助！感谢作者在翻译过程中答疑解难，并撰写中文版序言！感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领导和编辑的理解和支持！

最后，对于译文中存在的错漏和词不达意之处，恳请学界同人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黄大慧

2020年7月19日于世纪城寓所

目录

- “民主”与“爱国”：战后日本的民族主义与公共性 上册
  - 序章
  - 第 I 部
    - 第一章 道德的焦土
    - 第二章 总体战与民主主义
    - 第三章 忠诚与叛逆
    - 第四章 宪法爱国主义
    - 第五章 左翼的“民族”，保守的“个人”
    - 第六章 “民族”与“市民”
  - 第 II 部
    - 第七章 贫困与“单一民族”
    - 第八章 国民历史学运动
    - 第九章 战后教育与“民族”
    - 第十章 “血色民族主义”的记忆
- “民主”与“爱国”：战后日本的民族主义与公共性 下册
  - 第 II 部
    - 第十一章 “自主独立”与“非武装中立”
    - 第十二章 1960年的安保斗争
  - 第III部
    - 第十三章 大众社会与民族主义
    - 第十四章 “公”的解体
    - 第十五章 对“尸臭”的憧憬
    - 第十六章 死者的越境
    - 结语
  - 后记

启微

〔日〕小熊英二 著

『民主』与『爱国』

战后日本的民族主义与公共性 上册

本のナショナリズムと公共

获奖
日本社会学会奖
每日出版文化奖
大佛次郎论坛奖

黄大慧
李　丰
王　娟
彭　程 译

黄大慧 审校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小熊英二

庆应义塾大学综合政策学部教授，著有《単一民族神話の起源：「日本人」の自画像の系譜》、《「日本人」の境界——沖縄・アイヌ・台湾・朝鮮：植民地支配から復帰運動まで》、《1968——若者たちの叛乱とその背景》、《社会を変えるには》、《生きて帰ってきた男——ある日本兵の戦争と戦後》等。

启微

『民主』与『爱国』

战后日本的民族主义与公共性

上册

[日]小熊英二 著

黄大慧 李丰 王娟 彭程 译

黄大慧 审校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序章

“在战败后的日本，整个社会都失去了人类应有的面貌。”

“资源贫乏、人口过剩、没有军备的日本在今后的世界中究竟具有怎样的存在价值？这是一个多数日本国民至今仍然无法回答的问题。”

加藤周一与丸山真男在1956年和1951年发表的上述言论中，提出了一个时至今日仍然被反复谈论的话题。[1] 很显然，这个问题就是战败后的“日本”及“日本人”形成了一种怎样的价值体系及民族认同。

本书的主题便是验证“战后”日本关于民族主义与“公”的言论，并阐明其变迁过程。

两个“战后”

“战后日本富裕了”，这句话在当代经常被人们提起。然而，所谓“战后”究竟是指哪个时期呢？

首先，战败后的日本历经十载，才于1955年将战争中大幅下降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恢复至战前水平。如果将1954年及其以前的时期定义为“战后”的话，恐怕不得不承认“战后日本贫穷了”。其次，“奠定战后日本政治基础的五五年体制”也经常被人们谈论。很明显，“五五年体制”确立于1955年，那么“战后”自然也就不包括1954年及其以前的时期。在1956年的日本经济白皮书中，出现了“如今已不再是‘战后’”这一成为当时流行语的内容。也就是说，将1955年作为“战后”的终结是当时人们的普遍认识。在这个“战后”终结的同时，以“五五年体制”及“高速经济增长”为象征的另一个“战后”开始了。

如果暂且将这两个“战后”称为“第一战后”与“第二战后”的话，那

么“战后日本富裕了”中的“战后”很显然是指后者。“第一战后”与“第二战后”在诸多方面存在差异。正如本书第七章将要论述的，1948年日本的平均个人所得不过100美元，而美国则高达1269美元，斯里兰卡也有91美元。因此，应将日本归为亚洲“落后国家”的看法在当时成为主流。

这里可以提出一个假说，即从“第一战后”到“第二战后”，有关日本民族认同的讨论发生过某种质的变化。

首先可以想到的，是“第一战后”的日本被视为亚洲的“落后国家”，而“第二战后”的日本则被看作与西方诸国并驾齐驱的“发达国家”。其次，也容易想象“近代化”一词在“第一战后”曾被视为努力追求的梦想，而在“第二战后”则成了不愿言及的既存秩序。

除此之外，“第一战后”与“第二战后”还有一个不同点，那就是秩序的稳定性。“第一战后”的时代特征，是源自战后的贫困和以黑市为代表的无政府状态。极度严重的通货膨胀、众多企业的相继倒闭、政治家与财界人士不断被整肃、人们社会地位的巨变，这一切都使未来变得难以预料。作家小田实在1965年回想战后初期的情景时说：

> 被戏称为东大毕业生“老巢”的政府机关已成明日黄花，同样是东大毕业生云集的大型企业在经营上也是举步维艰。与此相反，黑市却人满为患。没有学历且一无是处的“白手起家派”大把地点着钞票，而东大毕业生和上班族却已经到了食不果腹的境地……
>
> 那时，一位在公司工作的“东大出身”的熟人告诉我，曾经有个年轻人到公司来，就是否应该上大学的问题征求他的意见。而他立刻回答道：“现在上大学又有什么用呢？不如尽早走向社会参加工作。”之后他又半劝诫半自嘲地补充道：“今后的时代，是一个实力重于学历的时代。在民主的社会中人人平等，（此后又略微压低了声音说）我自己不也是东大毕业嘛。”
>
> 实际上，当时供职于一家大公司的他同样在为是否应当辞去现在的工作，然后与朋友另起炉灶而犹豫不决。当然，对于如今已经成为某大公司领导的他而言，自己当时的情况也许只不过是一时“糊涂”罢了。[2]

以上事例可以这样理解：在贫困与改革时代的“第一战后”，人们对于“民主主义”及“平等”的印象有时与“平均主义”有很大区别。但在社会秩序稳定后的“第二战后”，以“民主主义”为代表的“第一战后”的词语失去了曾经的反响，人们在战后初期的那种想法往往被看作一时“糊涂”。

在“第一战后”，社会秩序还处于不断变化的阶段，未来的一切都还是未知数。关于1950年代的回忆，柄谷行人在1999年的一次对话中谈道：“‘现实可以被改变’这一观念切实地深入人心”，然而“当日本进入高速经济增长时期，尤其是东京奥运会召开之后，社会环境本身发生了改变，而舆论批评却越来越难以跟上这种变化”。[3]

在“第一战后”与“第二战后”，同样的词语却带来了不同的反响，这与本书的主题也有一定的关系。也就是说由此可以提出以下问题，即人们对“国家”与“民族”这类词语的理解在“第一战后”与“第二战后”是否也存在差异呢？

所谓“第一战后”，即社会秩序还未稳定，“现实可以被改变”的观念切实深入人心的时代。那么在这个时代，作为秩序的一种体现形式，“国家”一词给人以何种印象呢？除了作为以压制个人为前提的体制外，在某种程度上是否还被视作可以改变的“现实”的一部分呢？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爱国”一词又是如何发挥其影响的？它与腐朽变质前的“民主”又有怎样的关系？如今人们常常会评价“战后的民主主义否定了爱国心”，那么“民主”与“爱国”之间的关系果真如此吗？

对战后民族主义的相关观点及言论进行考察，同时也是探索这些问题答案的过程。这当然也可以被看作对战后的“国家”与“个人”之间，或者“公”与“私”之间关系的相关言论进行再思考的过程。

“战后民主主义”的“词语”

在1997年成立的保守团体“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中负责公民教科书撰稿工作的佐伯启思曾主张：“所谓战后的民主主义就是否定国家，一切从个人出发”，并于2000年发表了诸如“战后日本的民主化，是在美式观点言论、美式思维方式、美式框架中完成的”、“战后的知识分子几乎都是‘西方的崇拜主义者’，从党派性质上看又是左翼进步主义者，他们组织市民运动等”、“左翼以近代主义及进步主义为前提，因此左翼知识分子期望通过西欧实现自身的特权化”等言论。[4]

此外，曾担任“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会长的西尾干二也在1999年出版的《国民历史》中，批评战后日本的知识分子被“共产主义是和平势力的信念”所迷惑而无法认清现实，“战后民主主义”是由大正时期的“教养主义更改而来，是新的政治无知的重演”。[5]

通过以上言论，可以对“战后民主主义”进行如下描述：“战后民主主义”是否定“国家”而重视个人的世界市民思想，是受了美国影响的“近代主义”及“西方主义”，抱有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是“大正教养主义”的延续。

然而，这些描述中存在一些矛盾之处。比如受美国影响又信奉共产主义，这怎么可能呢？

后文将会提到，战后日本共产党奉行“反美爱国”的民族主义路线，一度猛烈抨击“近代主义”及“市民”。日本共产党不仅从冷战理论出发与美国激烈对立，还将“近代市民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等同视之，并主张应当超越这一阶段。

后文还会提到，如今被统称为“战后民主主义者”的战后知识分子，实际上大多与共产党保持了一定距离。并且，他们总体来讲都对“明治时期”持肯定态度，而对“大正时期”持否定态度。与大正时期民主主义一脉相承的政党政治，在1930年代因腐败而最终土崩瓦解，此后日本便

迅速转入战争体制。目睹了这一切的“战后民主主义者”，自然不想将自己的思想主张与“大正时期”扯上关系。

此外，在1997年出版的《战败后论》中，评论家加藤典洋在讨论1946年《日本国宪法》审议问题时举出了“明治时代”美浓部达吉曾反对该宪法的例子。加藤依据这个例子，描绘出了对美国占领下实施的民主化中的矛盾有清醒认识的“明治派”，与通过自我欺骗来掩盖这种矛盾的“大正派”及“昭和派”间的对立。[6]

然而，如第四章所述，当时的议会中日本共产党也是反对《日本国宪法》的。此外，作为“战后民主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以主张全面媾和论而闻名的贵族院议员南原繁也对《日本国宪法》持反对态度。但这些事实加藤均没有提及，也就是说，加藤在归纳“革新派”这一概念时忽略了日本共产党及南原繁等势力。

显然，佐伯、西尾以及加藤的思想倾向是不同的。然而，他们都是在1955年以后长大的，在思想上又都未经历过“第一战后”。他们的个人思想形成于“第二战后”，看待“战后民主主义”的角度也具有那个时代的特点。

实际上，“战后民主主义”这一说法也是1960年前后才出现的。而生活在“第一战后”的人们，当时却未对存在于这一时代的各种运动及思想有一个概括性称呼。所谓“战后民主主义”，是“第二战后”的人为了表述“第一战后”而创造出来的，但这种表述有时过于简单，并经常与事实相左。

这种现象的发生，并不只是由于佐伯、加藤等人对丸山真男及大塚久雄等思想家的著作没有全面透彻理解。因为在“第一战后”与“第二战后”，人们对同一词语会产生不同的理解。就像本书所要论述的那样，“市民”、“近代”及“民族”等词在“第一战后”的意思常常与“第二战

后”有所不同。如果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那么即使阅读同一篇文章，其理解也可能与当时的人们截然不同。

即便在战后思想的研究者中，也有许多人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思想史学家都筑勉1995年出版的《战后日本的知识分子》便是一个例子。在该书中，都筑使用“市民社会青年”一词，将丸山真男、大塚久雄、竹内好、清水几太郎等二战结束时正值而立之年的战后知识分子进行归类。[7]

然而正如本书将要论述的那样，在战时及战后有关马克思主义的言论中，“市民”一词与“资产阶级”曾被等同视之。因此，在马克思主义极具影响力的1955年以前，即便是所谓的进步派也不会将“市民”一词作为具有积极意义的词语使用。该词真正被作为具有积极意义的词语使用，是1950年代后半期，或者说是1960年安保斗争之后的事了。也就是说，都筑曾试图用1960年之后的词语解释1955年之前的思想家。因此，对于战后知识分子讨论“市民社会”的文章，都筑著作中的评价常有不够充分之处。[8]

那么所谓“市民”到底该如何定义呢？在1997年的一次座谈会上，评论家竹田青嗣、漫画家小林善范、社会学家桥爪大三郎等人指出了一个事实，即对“市民”一词的理解因人而异。[9] 其中，桥爪认为“‘市民’是指遵守法律的人”，竹田认为“市民是不受阶层、宗教、人种、民族、信仰影响的在一定规则下的对等关系”，而小林的秘书金森由利子则表示“市民是一个让人‘厌倦’了的存在”。此外，关于对“市民”一词的理解，此次座谈会中还出现了诸如“一贯主张反体制的人”、“与社会变革运动毫不相关，只是安于稳定的市民生活的人”、“国家做什么我都反对，这样做我就是市民”等相互矛盾的看法。

针对同一词语的理解人们各持己见，在这种情况下对话和讨论很难得出结果。因此，竹田在座谈会进行到中途时讲道：“原来大家对‘市

民'一词的理解各有不同啊。"并试图稳定会场秩序，但讨论还是在"市民"一词的概念悬而未定的情况下进行到了最后。此外，桥爪以战后新宪法的实施为例，提出"反对国家的人"这一对"市民"的解释已经极为普遍。至于这种前提是否正确，通过本书的考察应该可以得出答案。

我们所使用的语言，是在历史中产生并发展变迁的，其中也包括"市民"、"民族"、"国家"、"近代"等谈及民族主义及"公"时所必需的基本词语。本书对"战后"的重新思考，也是对这些词语在使用方法上经历了怎样变迁的重新探讨。同时，如今我们需要重新审视限制着我们的语言体系，为以新的视角与方式论述问题打下基础。

关于"言论"与"心情"

对研究方法没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跳过本节以下部分。

如前所述，本书主要验证"战后"日本民族主义与"公"的相关言论的变迁。但此处所说的"言论"并非单指书面文字记录，还代表在某一社会的特定年代中处于支配地位的语言体系或结构。例如关于战后思想方面，研究"民族"、"市民"、"国民"等词在特定时期的语言结构中处于何种地位以及这种结构的变化过程，即是对"言论"的探讨。

在本书的叙述中，这种结构被称作"言论"，而结构内部的各种发声则叫作"论调"。但需要注意的是，日语中的"言论"一般意义上讲并不具有这种意思。因此，本书中除"言论"之外，还会多次使用"言论结构"及"语言体系"等说法，三者意思相同。[10] 而在强调同一时代言论（语言体系）中所规定的事物时，则称其为"说法"。

本书以1945年至1970年代初的战后思想为探讨对象。其中不仅包括所谓的"进步知识分子"，还包括保守派及革新派的政治家、日本共产党、以日本教职员工会为首的各团体的言论，以及以批判"进步知识分

子”闻名的吉本隆明与江藤淳等人的言论。

探讨的时段之所以截至1970年代初，是因为1955年以后出现的“第二战后”的语言体系到这一时期已经完成。

许多人认为，在全共斗运动开始抬头的1968年前后，被统称为“战后民主主义者”的“第一战后”的知识分子开始丧失影响力并在思想上发生了变化。

反言之，言论上从“第一战后”向“第二战后”的过渡，自1955年起经历了十余年的时间才得以完成。从政治方面看，“五五年体制”的确立与同年第六届全国协议会后日本共产党稳健化的实现，标志着“第一战后”的终结。然而在经济与生活方式方面，虽然1950年代后期日本进入了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但真正意义上完成“第一战后”向“第二战后”的过渡则是在1960年代。与此相比，言论上的变化则更晚一些，直至1960年代后期才得以完成。

社会学家山本明1986年提出：“当今日本的社会风俗源自1950年代后半期，即昭和30年代。而在意识形态上达到完善，则是在昭和40年代。”[11] 这种看法即便不是基于对战后思想的实证研究，至少也可以说提出了一个颇具新意的观点。

这里所谓的新观点，是指在某一社会中的社会构成单位，即人的生活方式及其语言用词所发生的变化，往往要比这个社会的政治及经济方面的变化晚一些。这是因为，即使社会的政治、经济情况发生了变化，人们也很难轻易摆脱过去一直处于支配地位的语言体系，说得通俗一点就是“无法改变思维”。

这种理论并非只存在于“第一战后”向“第二战后”的转变过程中，同样适用于战争时期向“第一战后”转变的过程中。正像本书中所论述的，

许多战后思想都包含了对战时语言体系的承袭，而并不是在与战时思想完全隔绝的情况下形成的。

这种言论结构的变化，多数情况下并不是创造出了新的词语，而是通过反复研读既存的词语并改变其含义完成的。这是因为生活在某种言论结构中的人，唯有在特定的语言体系内才能发表其言论，对于那些不属于这个语言体系的词则无法使用，即使创造出新词也无法为人们所理解。

因此，通过既存的语言体系难以说明本就不易表达的心情时，人们便常常赋予既存词语新的含义。在这种情况下，“市民”及“民族”等词的含义便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生了改变。

在本书中，姑且将上述通过既存语言体系难以表达的残余部分称为“心情”。然而残余毕竟只是残余，它不是通过词语本身，而是通过上下文的连贯性或者“字里行间”来体现的。在既存语言体系中，这种残余的部分被当作表达某一词语的手段并被赋予新的解释，最终成为使言论结构发生改变的重要原因。

虽然个人也会具有这种“心情”，但本书重视的是集体共有的心情。当属于某种语言体系的大多数个体集体性地经历“无法用语言表达”时（例如战争时期），就会发生言论的变化。这是因为，“无法用语言表达”的经历会产生通过既存语言体系难以表达的心情。如果一个集体同时拥有了这种经历，那么它会试图探索可以表达心情的词语，言论结构就会发生变化。

社会变动使集体的“心性”发生改变，进而发展到语言的变化，这种事例已经在近年来的历史学研究中得到证实。例如在家庭史及女性史的研究中，现代化改变了人们对家庭及两性问题的“心性”，而“子女”及“处女”等概念或词语的含义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本书的研究，便是在战后日本民族主义的相关言论的范畴内，对同样的问题进行论述。不过，历史学用语中的“心性”常常是由横跨几个世纪、超越表面性政治事件的长期社会变动造成的，而本书中所使用的“心性”，大部分是在战争时期及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等短期性共同经历的基础上形成的。因此，本书使用“心情”而非“心性”。

这里所说的“心情”既是促使语言体系发生变化的因素，也是受既存的语言体系束缚的对象。上文所说的“无法转变观念”的现象，就是由于人们既不能通过既存语言体系来表达自己的某种心情，也无法从既存语言体系的束缚中解脱出来。

因此在语言体系变迁的过渡期，虽然表面上的说法发生了改变，但“语法”及“实践”仍旧处于从前的状态（例如，战后高喊“打倒美帝”口号、高举红旗游行的行为，实际上与战争时期“鬼畜美英”的说法在某些地方存在相似之处）。本书也会对这种语言体系的束缚及变迁的交错加以关注。

此外，本书还涉及丸山真男、竹内好等思想家并对他们的思想加以论述，但最终目的则是对他们所代表的集体性心情加以论述。虽然都是文学家或思想家，但他或她的作品只有在能够体现当时社会的集体性心情，并且被众人视为自我心情的“代言”时才能流行。

反之，著名的思想家并非指倡导独特思想的人。拥有同时代的人所无法接受的思想的人，即便为后人发现并得到重视，在当时却很难成为著名思想家。从这种意义上讲，所谓著名思想家，更多的是能够将自己与同时代的人共同拥有的心情以更加巧妙的方式进行表达的人，而不是具有“独创性”思想的思想家。

以上也是本书对知识分子的思想加以重视的原因。在本书中，所谓知识分子的思想，不是那些与同时代集体共有心情没有任何联系的思

想。对言论结构的变化具有影响的知识分子或者可以说是词语运用的专家，其作用在于创造可以表达集体性心情的词语。本书会对战后知识分子的言论、政界及一般大众的声音分别进行考察，但二者往往会在同一时代的共同基础上产生。

本书还会对每个思想家的个人生平加以关注。这样做的目的不是弄清该思想家的个性，而是为了考察这个思想家归属于哪个阶层或哪个年代，经历过怎样的社会事件，特别是战争时期有怎样的经历。

社会的变化，不一定总会给每个人带来同样的经历。即便是战争这个共同的经历也会由于阶层或出生年代、出生地，或者一些偶然情况——如同为被征召入伍的人也会有派遣地为南方战场、中国战场或其他战场不同——而存在对其经历认识的微妙不同。

如前所述，作为言论变化原动力的心情，源自战争等社会成员的共同经历。然而，当具体分析某个个案时，这种由共同经历所产生的心情也会因其所处的阶层、出生年代而不同。即使在对既存语言体系存在不满这一点上具有共同性，其不满的具体内容也是各种各样的，最终会在对言论转变方向的期待上产生差异。

反之，将几个不同阶层或时代的人的心情综合起来，就可以重新组成该时代的共同经历。也就是说，只要考察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的言论主张并厘清其相互关系，便可以探明共同经历所产生的集体性心情和言论变化的真实情况。

不能将著名思想家仅作为一个人，而是应当将其作为具有社会性特征的人来进行个案研究，因此必须对其人生经历加以重视。重视某位思想家个人生平的研究方法，与将各种论调视作集体性心情表现的研究方法在这里并不矛盾。

言论的变化，还可能是由于时代更替而发生的。比如以战争时期集体性心情为背景而出现的思想与词语，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一代人往往很容易认为它们不适合表达自己的心情。这样，随着时代的更替，对新词语的摸索便开始了。对于1960年代出现的言论变化，除了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外，战后出生的一代人逐渐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也是一个重要的背景。

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看出，本书所使用的“心情”，其变化绝非像“心性”一样需要以数百年为周期，而是至多数十年就会发生一次。至于这里所说的“心情”与既存的理论性概念之间的关系，本书将不做深入讨论。[12] 设定这个暂定性的表述概念，主要是考虑到研究对象的明确性以及表述的方便性。

暂定这种表述概念，其好处在于可以使对言论变化的论述更加容易。正如前文所述，本书主要对“市民”、“民族”等词在各个时期及场合的含义进行论述。而如今的“市民”或“爱国”等词，已经无法用来准确表达以往某一时期中的“市民”、“民族”、“民主”以及“爱国”等的含义。利用“心情”这一语言表现的残余设定的这个概念，便是为了考察这种已经超越了词语字面意义且难以用语言来叙述的对象。

对这种“心情”加以重视，是超越语言表面结构对思想进行评价的一种手段。例如，前文中“战后的知识分子大多为‘西方的崇拜主义者’”这一佐伯启思的评价，如果单从战后的知识分子经常引用西方思想中的词语这一点来看无疑是正确的。一些史学家也持有相同的意见，如约翰·道尔（John W.Dower）在其著作《拥抱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Embracing Defeat*：*Japan in the Wake of World War* Ⅱ）中，将战后知识分子的思想定性为“带有世界主义性质的激进主义”。[13]

然而，对西方思想中的词语进行引用，其理由并非一定源自“世界主义性质”的心情。关于这一点，只要看看明治时期以来日本近代化进

程中的“文明开化”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就会明白。在许多情况下，对西方思想的“引进”是表达民族主义心情的一种方式，因此，如果对超出语言字面意义的部分不加重视就很难做出正确的评价。实际上正如本书中将要介绍的那样，很多战后的知识分子在介绍西方思想的同时也对“世界主义”进行了批判。

关于如何理解这种对西方思想词语的引用，可以参考“领有”这一概念。[14] 对于一种文化或一部作品，人们的理解并非千篇一律。近年来，历史学界经常有人指出，对于同一部作品如莎士比亚的戏剧等，上流社会与底层社会的理解基本是不同的，有时甚至会出现偏离作者意图的理解。至于由西方“引进”而来的文化在当地如何发生变化，如何通过适应当地社会而得到广泛应用，则是人类学各领域所要探讨的问题。

此外，如第十一章所述，在战后的日本，作为“领有”对象并在原作者意图之外被理解的作品，《日本国宪法》是最大的典型。这部按照美国意志制定的宪法，此后成为对抗美国冷战战略、表达日本民族主义的媒介。

然而，战后日本所发生的并不只有这种有意识的“领有”。例如第二章中将要提及的大塚久雄，他虽然认为自己对西方思想的理解符合原作者意图，但事实上其解释中混入了许多迎合当时日本社会的内容。[15] 虽然对“领有”概念的规定因论者不同而存在差异，但很多情况下都是有意识地改变原词意思来使用，所以本书的表述中将不会使用这个词而只是作为参考。

不过需要提前说明的是，这种通过“解释”或“语言”来分析战后思想的方法，并不一定就是在近年来的理论基础上进行的新式分析。正如本书所要提到的，战后的知识分子对于语言问题十分敏感。吉本隆明、鹤见俊辅及江藤淳的研究都是从语言问题开始的。

这是因为在战时到战后这一语言体系剧烈变化的时期，人们对语言的通俗性产生了怀疑，于是不得不开始思考语言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就像本书结语部分所引用的那样，对近年来有关“话语”的研究产生巨大影响的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也曾表示，在自己的理论思考中起核心作用的是自己的战争经历。由此可见，日本与“战败国”法国（指法国被纳粹德国击败后遭到占领）的战后思想，在对语言系统的怀疑与对其变迁的关注上是相同的。

因此，在战争经历者所进行的一部分关于日本思想史的研究中，存在对语言问题的关注。例如，生于1923年的政治思想史学家石田雄，以近代日本社会中“自由”与“国体”二词含义的变迁过程为论述对象，于1983年撰写了《近代日本的政治文化与语言象征》一书。[16] 此外，丸山真男也曾于1960年发表《忠诚与叛逆》一文，就明治时期的自由民权运动及内村鉴三等人使用“忠诚”这一“‘传统范畴’并将其内容以另一种方式解读”，进而形成自己的思想的事例进行论述。[17]

很显然，当时的石田与丸山并没有受到近年来语言分析及文化研究相关理论的影响。但他们通过自己在战时的内心体会以及美军占领下“殖民地”的情况，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视角。从这个意义来讲，本书所使用的言论分析方法，是存在于战后思想内部的方法。

本书的结构如下：

首先，在第Ⅰ部第一章中对战后思想的背景，即战时的社会状况进行概述。从第二章开始，主要对日本在战后初期的思想及其心情进行分析，并通过对战时思想进行重新思考来验证“第一战后”的语言体系的形成过程。

在第Ⅱ部中，主要对1950年代至1960年安保斗争结束这一时期的战后思想的多样性发展与摸索，及其在1955年以后的形式化过程进行论

述。在第Ⅲ部中，主要就形式化以后的战后思想所受到的批判及“第二战后”中言论的出现过程进行考察。最终对本书的主题，即战后日本民族主义与“公”的相关言论进行验证。

本书主要以日本本土的主流言论为研究对象。关于战后冲绳的思想情况，参见笔者此前的论著《“日本人”的边界》的第四部分。此外，战后还存在以谷川雁等为首的“边境”思想以及在日韩国人、朝鲜人的思想，但本书对以上两种思想不做过多涉及。不过，对于战后思想中如何论述冲绳与“在日外国人”，及其对当时的论调所产生的影响，本书还是会加以关注。[18]

但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本书与笔者历来的论著相同，都是采用与一般研究类著作略显不同的叙述方式。整理学术论文成书的著作通常会在各章开头对先行研究进行论述，但本书不会采取这种形式。此外，为了照顾缺乏预备知识的读者，本书尽量不使用社会学等学科的专业术语，对于在历史学家看来属于“常识性”问题的基础史实也会时常加以说明。

关于“缺乏预备知识的读者”，在研究领域细分化的今天，即便在某一领域已经成为专家的人，在其他领域也很可能只是“外行”。就算是研究宪法制定过程的学者，也不一定精通丸山真男的思想，对于言论分析及文化研究方面的用语也并非一定十分熟悉。因此，像本书这样涉及多个领域的研究，如果使用只有每个领域的学者才能读懂的表述方式，恐怕便没有人可以全篇通读本书了。

基于以上考虑，笔者将优先使用一般读者（前文已经说过，即便在本书某一章所涉及的领域中是专家，在其他章所涉及的领域中也可能只相当于“一般读者”）容易理解的方式进行表述，有关先行研究等方面的内容全部通过注释来进行说明。依笔者之见，与学术杂志刊载的论文不同，单行本出版物面向的是成千上万的读者，而并非专业领域内的几个

或几十个人。

本书所说的“战后思想”，产生于拥有战争经历的“战后知识分子”之中。正如本书将要论证的那样，所谓“战后思想”可以说是将战时及战败后的内心体会文字化、思想化的行为。也就是说，本书中所讨论的“战后知识分子”及“战后思想”，不包括那些没有经历过战争的知识分子的思想。因此，战后出生的一代所进行的全共斗运动并不是本书的主要研究对象。

这里需要重申前文，即所谓“战后思想”是战争体会的思想化。尽管如此，在目前为止的大多数战后思想研究中，关于知识分子战时及战后的内心体会，以及这种内心体会对战后思想所产生的影响方面的研究还远远不够。这也是本书各章要着重讨论的问题，具体来说就是从思想这个角度思考“当时的‘日本人’如何看待战争”、“关于战争的记忆到底对人们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等问题。

本书的目的是再现这种“战后思想”，评价其值得传承之处并克服其局限性。因此，在本书中笔者将首先分析当时这种思想所要表达的心情，并努力再现其中最深层的部分，而不是急于以现在的词语为标准对其进行批判。克服一种思想的局限，不能只对其最表层的部分进行批判，而是应该不断再现其最深层的部分，才能从它的局限中解脱出来。

此外，本书中会将一些现在看来不够贴切的词原封不动地进行引用，还望理解。

---

[1] 加藤周一「松山の印象」『雑種文化』講談社、1974、初版1956、185—186頁；丸山眞男「日本におけるナショナリズム」『丸山眞男集』第5巻、岩波書店、1995—1997、72—73頁。

[2] 小田実「『道義国家』から『痩せたソクラテス』まで」『小田実全仕事』第8巻、河出書房新社、1970—1978、145頁。

[3] 柄谷行人·福田和也「江藤淳と死の欲動」『文学界』1999年11月号、16頁。

[4] 小林よしのり·福田和也·佐伯啓思·西部邁編著『国家と戦争』飛鳥新社、1999、28頁；佐伯啓思「戦後民主主義とは何だったのか」実践社編集部編『現代日本論』実践社、2001、39、51頁。

[5] 西尾幹二『国民の歴史』扶桑社、1999、682、680頁。

[6] 加藤典洋『戦敗後論』講談社、1997、29、35頁。

[7] 都築勉『戦後日本の知識人』世織書房、1995。这里使用的“市民社会青年”一词，是1959年内田善彦在其题为「知識青年の諸類型」（『内田義彦著作集』第5巻、岩波書店、1988）的文章中所主张的内容。在近代日本“知识青年”的分类上，内田主张按照人格形成时期划分为四种类型，即明治初年开始的自由民权运动中的“政治青年”、甲午战争前后的“文学青年”、大正中期后的动乱时期的“社会青年”、昭和时期“政治窒息时代”的“市民社会青年”。内田也将“政治青年”称为“明治青年”，将“市民社会青年”称为“昭和青年”。都筑的讨论应该是基于这种分类方法，但正如本书第五章等将会谈到的，这种年代类型论自战败后就十分普遍。很显然，在人们出于对战败后“老一辈自由主义者”的反感而发明的模式中，强加进了明治思想。然而，这种模式对此后的明治思想史研究也产生了影响，即使在木村直惠的『「青年」の誕生』（新曜社、1998）等近年的研究中，也同样可以看到这种模式的残影。总之，“市民社会青年”一词始现于1959年以后，而并非1955年以前就存在。

[8] 例如，都築勉『戦後日本の知識人』第87页引用了清水几太郎1951年的『市民社会』（創元文庫）“作者解题”中关于“市民社会”的定义。在该书中，清水十分明显地将“市民社会”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同义词使用。清水虽然承认“市民社会”较之封建社会或绝对王权的进步性，但对其评价并不高。然而，为将清水这样的人也归入“市民社会青年”的范畴，都筑在论述其“市民社会”观时只做了十分含糊的评价。当然，关于清水几太郎的思想本书也未能进行十分详细的论述，这一点将会在今后的论著中加以注意。

[9] 以下参见竹田青嗣·小林よしのり·橋爪大三郎編著『正義·戦争·国家論』（経書房、1997），第218—219、112、110页。另外，在该书第223页中，针对吉本隆明将小林善范在1990年代后期发生的“药害艾滋事件”中的举动形容为“市民主义者的道德主义的丑闻主义”，竹田青嗣认为“吉本隆明使用的‘市民主义’，是指反体制的

人”。然而，通过本书第十四章的论证，笔者认为吉本这里所说的“市民主义者”，是指那些因道德上的负罪感而对弱者采取行动的人。

[10] 本书中之所以使用这种强调“结构”和“体系”的说法，是由于笔者在此前的论著中使用“言论”一词曾使读者产生了不少误解。笔者在目前为止的论著中一直将超越各种单一论调的“言论”作为研究对象，其中的一些论著曾被误解为单纯的文献史料研究。笔者基本上对概念用词不太在意，但这次会在一定程度上进行明确的梳理。

[11] 山本明『戦後風俗史』大阪書籍、1986、175頁。

[12] 本书在对各种论调加以考证时，经常使用“表达某种心情”这句话。心情本来就是通过语言难以表达的残余部分，因此用文字说明“某种心情”本身就是矛盾的。相对正确的表述应该是“某种语言表达会产生表达不充分的心情，而这又会使人们对可以表达心情的语言进行探索”。本文中将这种探索的过程省略为“表达某种心情”。此外，还有一种情况是，在进行某种语言表达时，还会表达出存在于“余白”或“字里行间”的心情。而这种“心情”是笔者通过重新考察前部论著『「日本人」の境界』（新曜社、1998）中使用的“愿望”而得出的概念。

[13] 如果一定要弄清二者关系，参见色川大吉在『明治精神史』（講談社、1976、初版1964）中提出的“精神史”视角。可以说，该书的研究对象与本书中的“心情”十分相似（当然并非完全相同）。不过，在色川的观点中，“高高在上的知识分子”与一般民众在思想上处于完全分离的状态，而本书则不采用这种观点。色川提出这种观点的根据，是“高高在上的知识分子”受到西方思想“影响”而逐渐孤立于民众，但不能由此得出他们的论调也因此与同时代人的心情孤立开来这一结论。

[14] ジョン·ダワー（John Dower）著、三浦陽一·高杉忠明·田代泰子訳『敗北を抱きしめて』上巻、岩波書店、2001、314—315頁。

[15] 关于这种“领有”（appropriation），参见罗杰·夏蒂埃（Roger Chartier）著，長谷川輝夫訳『書物の秩序』（原书名*Bibliotheque des histoires*）ちくま学芸文庫，1996，初版1993。要给这种现象命名的话，仿照鹤见俊辅所说的“误解的权力”，可能“误读”这个词比较合适。关于鹤见的思想，参见本书第十六章。

[16] 石田雄『近代日本の政治文化と言語象徴』東京大学出版会、1983。参见石田雄『日本の政治と言葉』東京大学出版会，1989。

[17] 丸山眞男『丸山眞男集』第8巻、235頁。

[18] 一些由女性提出的论调与本书中论证的论调十分相似，之所以没有选择这些女性提出的论调并非出于某种意图，而只是将最具代表性的论调作为论证对象的结果。本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战后日本的民族主义与“公”的相关言论。也就是说是关于“天下国家”的言论，通俗点说就是关于“大丈夫处世之道”的言论。女性论调较少的原因，应该也与这样的题目设定有关。在读者中，可能有人对本书所论证的论调中频繁出现“武士道”、“男子气概”、“邦邦女郎”这样的词感到反感。然而在战后，这些男性知识分子所构筑的语言体系，限制了包括女性在内的一切论述“天下国家”的语言使用。而将这种限制解释清楚，正是本书的目的之一。

此外，正如本书中将要论证的那样，“武士道”及“男子气概”等词，实际上反映了因战争及战败受到创伤的男性知识分子的心情。因此，从某些方面讲，可能本书也是一本论证战后日本男性知识分子言论及心情的男性学作品。与其为了不受抨击而增加对女性论调的论证，不如彻底对男性知识分子的论调进行论证，这样做也能更加诚实地因应女性学所提出的问题意识。

第Ⅰ部

第一章 道德的焦土

很多人死了。

家人、邻居、朋友、恋人、同事，一个接一个死去。无数男人、女人、青年、孩子都死在战场上或空袭中。他们中大多数不是死于肆意的杀戮，就是死于饥饿或疾病。

不深入了解这种战时经历，便无法理解日本的战后思想。其中，战时的道德问题对战后思想形成的影响尤为深刻，本章将对此进行概述。[1]

宗派主义与不负责任

无论军部还是政府，都是在毫无胜算的情况下发动了太平洋战争。虽然陆军强烈主张开战，但明治时期以来其假想的战场只限于大陆方面，根本没有在太平洋作战的构想。大本营海军部的一名参谋回忆道："令人惊讶的是，直到开战之后才发现，陆军基本上既没有对美军作战的方案，也没有具体的作战准备。只能感叹陆军的不负责任。"[2]

陆军的"不负责任"是个问题，但更大的问题是"直到开战后才被发现"的陆海军之间的宗派主义，这直接导致了毫无战备的问题。大本营被分为陆军部与海军部，由陆军部与海军部分别制定作战计划。大本营陆军部的情报参谋回忆道："陆军与海军双方根本不事先联络就擅自公开战绩，因此陆军只能盲信海军的报告。"即便是关于1942年6月导致日军航母被全歼的中途岛海战，陆军情报部也只是"通过各种情报，尤其是国外的新闻等""大致了解"。[3]

同时，陆海军内部的宗派主义也十分明显。一名原大本营陆军部参谋说，在他任职期间，情报部和作战课从来没有一起在作战室内讨论过作战计划。虽然情报部将收集到的情报作为资料加以整理、总结并进行了战况说明，但作战课根本无视情报部的判断而独自制定作战计划。[4]

究其原因，主要是军内人事系统存在问题。官僚型人事系统早已扎根于陆海军内部。陆海军根据陆军大学、海军大学毕业生的军龄和成绩来决定人员的晋升。进入陆军作战课是青云直上的捷径，因此作战课课员瞧不起其他部门的同僚。也正因如此，“大本营参谋中，只有一小撮人才被允许自由出入作战课作战室”。[5]

这种人事系统的弊病在海军中显露无遗。日美开战初期，指挥航母编队的司令官是一位除了完全遵照下属参谋的建议以外毫无判断力的人，这在部队里尽人皆知。可是，他却因资历被任命为司令官。于是，在前面提到的中途岛海战中，在该司令官的指挥下，航母编队全军覆没。[6]

在这样的状况下，决策就流于形式。在形势已经开始恶化的1943年9月，为决定战争方针，陆海军在天皇面前共同召开了御前会议[7]。然而，御前会议像排练过似的只宣读了由骨干军官起草的文件。当时大本营海军部的某参谋这样回忆整个过程：

> （前略）事务局一分为二，一组负责起草局势判断，一组负责起草政策事项。按说，政策应依据局势来制定。可是因为两者同时进行，于是在局势还没有完全掌握的情况下政策已经被制定出来了。不，应该是“必须做这样的决定，所以要召开御前会议；而召开御前会议，必须提交局势判断”。结论在先，判断在后。[8]

就这样，为配合已经决定好的政策，不得不更改局势分析报告，而让局势看起来比较乐观。然而，敌人并不会按照报告采取行动。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央的作战决定和命令经常会无视现状并且下达得不及时。军部中枢为协调各方意见召开无数次会议，而就在他们召开会议时，常常坐失良机，葬送无数无辜的性命。

对美开战后，日本保持了半年的优势，而后一年半双方在南太平洋形成相持局面。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1943年底。在此期间，属于大后方的马里亚纳群岛、菲律宾却毫无防备。僵化的军队组织只能应对迫在眉睫的战事。

陆海军高层原本认为在中央供职才是成功之道，都不愿奔赴前线。因此，中央高层了解前线实际战况的人少之又少。大本营海军部的参谋认识到战况并不乐观，准备向高层进言时被同事阻止了。“如果你说了这些，你明天就有可能被派到新几内亚或所罗门的最前线。战死虽然伟大，却死无葬身之地。”[9]

1944年，南太平洋的相持状态被打破，日军防线全线崩溃。毫无防备的后方防线瞬间土崩瓦解，1944年7月塞班岛陷落，日本航母编队全军覆没。即便在此时，海军也没有将太平洋上空战的真相告诉陆军，而陆军却在太平洋战线崩溃时尝试在中国和缅甸发动军事进攻。毫无意义的作战葬送了无数士兵和普通平民的性命。

其实，1944年底军部高层已预料到战争没有胜算。之后的战争实际上是一种战略手段，是假借战略之名进行的战争，[10] 只是为了在局部战场取得胜利，改善投降条件。在战争后期，常规战术已经无法给美军致命打击，于是日军开始广泛采用“特攻”战术。1944年10月，海军航空队开始采用此种战术。当时，特攻战术被宣传为是由当地航空部队司令提议，并经飞行员的志愿而产生的战术。而事实上，海军高层事前经过协商，决定该特攻战术以当地提案的形式提出，中央不下达任何命令。[11]

飞机特攻战在“一机拼一舰”的口号下得以实施。但众所周知，载有炸弹飞机的冲撞，无论是速度还是穿透力都无法与投掷的炸弹相比，并且破坏效果甚微。特攻飞机躲开美军战斗机和防空炮弹干扰的可能性也很小。

海军司令部在冲绳战役时就预料到：8—10架飞机如果不同时以最佳条件命中的话，无法击沉航母或战列舰；出动的特攻飞机中只有一成能抵达敌军的位置。[12] 也正因如此，根本没有一艘大型战舰被特攻飞机击沉。

当地军部所报告的特攻战绩往往被夸大。菲律宾战场报告说24架特攻机击沉了37艘战舰。[13] 同时，也有专门让由于飞机故障等而活着回来的飞行员去送死而实施的特攻。关于这一点，曾在菲律宾战场的某陆军飞行员在其回忆录里写道：

> 当时的高级参谋们为了迎合上级下达的命令使出了浑身解数。也就是说，由派出特攻队来制造虚无的战绩。
>
> 因此，派出去的特攻队员如果有人生还，对他们来说就非常不利。因为这样不仅会把他们好不容易编织出的虚假战绩戳破，甚至申请的特殊晋升也化为乌有。所以，如若不让特攻队员牺牲的话，他们就没面子。[14]

在菲律宾战场，送出许多特攻队员的空军司令富永恭次陆军中将，在美军登陆后驾驶飞机强行出逃台湾。但是，曾是陆军次官的他，只受到编入预备役这一很轻的处分。

特攻飞行员的人选表面上是主动申请，事实上，很多飞行员被强制加入特攻队。以曾在菲律宾战场战斗的海军航空队为例，深夜飞行员们被召集在一起，长官命令他们，“不想加入特攻的队员往前出列一步”。就这样，全部队员被认定为自愿参加，最后由上级甄选。[15]

航空队的干部、毕业于海军学校的将校、资深飞行员等都是部队的

支柱，所以很少被选为特攻队员。因此，很多特攻队员是从战争后期被动员的学生预备军官或预科出身的少年航空兵中选拔。在装备方面，特攻所用的飞机都是即便损毁也不足惜的旧式机或教练机。当时的一位资深飞行员回忆道："事实上，被选为特攻队员的都是C级飞行员。"[16]

对这种特攻作战抱有疑问的某海军航空队的一位机长少佐对司令大佐做了如下申辩后，特攻作战计划立刻被取消了："如果去的话，先由我带领队长、分队长、海军学校出身的军官去，一定击沉敌军的航母。最后司令也去吧。预备军官和预科的年轻人绝对不能派去。"[17] 然而，很多特攻作战在与这句话相反的情况下进行。

即便在这样的状态下，大家都知道如果逃走的话，会被枪杀，而且会被故乡的亲人鄙视。很多人对于抛弃和自己处在相同境遇的战友而逃跑这一行为有深深的罪恶感。因此，很多特攻队员抱着保家卫国的理念，为自己和战友的牺牲赋予了意义。但是，据说也有一部分特攻机在基地上空冲向司令官办公室之后再去攻击敌人。[18]

不仅是航空队采用这种特攻战术，1945年4月，战列舰"大和号"和护卫舰对冲绳实施了"水上特攻"，但没有取得任何战果就被美军击沉。其实，海军中央早就知道此次出击毫无胜算，甚至在出击前几天根本不存在此次计划。[19]

原海军参谋的日记写道，决定"大和号"出击的契机是，海军军令部总长将对冲绳的所谓特攻作战计划报告给了天皇。当时，天皇问道："这是航空部队的总攻吗？"总长即刻答道："会使用全部兵力。"[20]

于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匆忙下达出动命令的战舰，单方面受到空袭而沉没，使近四千名战士阵亡。但是，下达该命令的司令官、参谋并没有被追究战败的责任。

这种状况使士气非常低落。某海军航空队飞行员战后所撰的回忆录中写道："这种战术（特攻）传到全军之后，我军的士气日见衰退。人非神明，有生还的机会，士兵的士气才会高涨。大家表面上都装作很有士气，实际上都在背地里哭泣"，"只能说这是知道毫无胜算的高层自暴自弃的最后挣扎"。[21]

特攻队员的遗书、士兵的信件都要通过军部的检阅，所以只能写些格式化的内容。广为人知的特级飞行员坂井三郎战后接受采访时谈道："当时的报纸、海军内部宣传资料都说因为敷岛队（最早被承认的特攻队）队员壮烈的攻击，海军航空队才士气高涨。这简直是天大的谎言。士气其实很低落。""队员都死了士气怎么会高涨呢？……毫无疑问士气低落了，可是大本营和上层的家伙都宣称士气高涨了。简直就是大骗子。"[22]

笔者在此描述这些战争情景并无他意，只因这些情景是构成战后思想，尤其是"战争责任"、"公"思想的大背景。

军需工厂的情况

军需生产的场所也是一片混乱。最大的问题就是统制经济的弊端和总体战体制的瘫痪。

1941年底成立了主管各产业部门生产和材料分配的统制会。该组织直属商工省和军需省，领导者由企业代表和官员出任。同时，由于民用产业和中小企业被整顿兼并，很多人被迫转向军需产业和"勤劳动员"。

然而，即便是在军需生产的现场，陆海军的派系斗争也非常明显。以某德制引擎的生产许可为例，陆军和海军分别同德国谈判，为生产同样的引擎而支付了双重许可费，并分别给这一引擎取了名字。武器开发计划也因为陆海军各部处于割据状态真正实现的少之又少。这样制造出

来的武器种类繁多又妨碍了生产扩大。即便是同样的武器枪炮和零部件等也因为陆军和海军制定的规格不同而无法通用。[23]

战争后期，美军的潜水艇攻击使得原料的海上运输变得困难，燃料及材料陷入严重不足的境地。陆海军互相争夺不足的材料，分别向工厂派遣监督员，强行要求优先生产各自计划的武器。

在战争后期的1943年11月，政府设立军需省，尝试对军需产业进行统一管理。但是，陆海军都没有将作战计划告诉军需省，所以军需省也无法根据战争变化来制定生产计划。[24]

军需省给各个航空公司分配指标，鼓励扩大生产。结果是，虽然飞机生产在1944年达到顶峰，但只是形式上数量增多，产品多数是次品。以1944年2月为例，制造的飞机中，只有三分之一能在前线使用。[25]

其原因之一就是提供零部件的转包工厂力量不足。转包工厂多是小企业，无法按照设计的精度生产零部件，所以只有不到一半的产品能通过质量检查。另外，接近300万的工人被动员入伍，能保证质量的熟练工也很少。

第二个原因就是统制经济。在民间不足的各种材料被优先分配给军需工厂。这就意味着存在军需工厂的干部侵吞物资卖给黑市的巨大利益空间。侵吞生产物资不仅使原料不足更加严重，还使不良零部件通过黑市进入工厂。即便如此，军需省还将产品规格标准下调，以达成形式上的生产目标。

这样的生产场所给被动员的学生和女性心理上带来了巨大影响。

1943年8月，日本政府开始禁止男子从事事务辅助员、乘务员等17种职业，从而加大了对年轻女性的劳动征用。文部省提出“行学一致”口号，以工厂就是社会教育场所为由，缩短学校教育时间并加入动员学生

的队伍。

至1945年初，大约动员了300万初中以上的学生和47万女子“勤劳挺身队”队员，这些学生和妇女同从民用产业被强行转行的征用劳动者一起被分配到工厂或农村。当时八大造船所正式工仅占20%，征用工和学生占55%，朝鲜人、中国人、俘虏、囚犯等共占21%。他们的平均劳动时间为每天11.4小时，甚至被强行要求加班到深夜并削减休息时间。[26]

强制的长时间劳动和粮食不足使得生产效率和劳动积极性下降，这导致了次品的增加和旷工。政府为应对此种局面，向工厂派遣宪兵进行巡视，导入仿照军队组织的职阶制和不合理的精神、主义。以中岛飞机尾岛工厂为例，1944年6月开始了每天三次，每次30分钟的“冲锋时间”。每到这时，由喇叭播放冲锋号令，命令大家以“冲锋精神”工作。但是，因为无法冷静工作，这反而导致次品的增加。

响应国家提出的口号而被动员到工厂的学生面对这种真相无不失望至极，尤其让他们悲叹的是生产现场的“虚伪”。当时的女学生武田清子被动员到“H制造所”，她如此回忆当时的情景：

> 回想当时的生活，全都贯穿着“谎言”二字。即便每天的报纸都在报道日本战胜消息，但在工厂工作的人们私底下都说“像这样都能打胜仗简直是太厉害了”。制造日本飞机起落架的是我们的铸模工厂。所以，无论工厂怎样报告生产量，现场工作的人们最清楚在那些产品中有数不清的次品。另外，他们也最清楚，产生那些次品并不是因为当时日本的贫穷，而是上级领导侵吞材料以及各种虚假行为盛行而致。同时，他们自己也在职阶允许的范围内侵吞材料，这在当时被认为理所当然。甚至每天领导们脸上写满必胜的决心召开早会训示，员工们表面上认真聆听然后走向工作现场。这种生活日复一日。[27]

工厂分配到手的粮食少得可怜。这不仅因为法定的配额本身很少，还因为由职阶制导致的粮食侵吞。武田说：“那些工人就不用说了，就连那些将工厂作为行学一体的教学场所而踊跃到来的中学生也想出以伪

造餐券或一次吃2人份、3人份等方法来填饱肚子，他们对此没有一丝的愧疚。”虚伪产生虚伪，侵吞产生侵吞。“因为虚伪的对策是应对虚伪的明哲保身之法。”

与侵吞相伴的是勾结。以军需产业为主，当所有的产业都需要政府机关的统制和许可时，必然加速企业与官员的相互勾结。通过招待官员得到分配的物资，然后侵吞物资获得利益。当时的庆应义塾大学校长小泉信三指出，利用公费招待官员的习惯从战时就已经蔓延开来。[28]

在物资明显不足的战争后期，大藏大臣贺屋兴宣将杉并区内的木炭囤积于家中，在因失火而被烧掉的荒木贞夫陆军大将家里发现了大量隐藏的粮食，这些消息广泛流传。[29] 这些人表面上都在宣传艰苦朴素的生活、“灭私奉公”。后来，在吉田茂内阁出任文相的伦理学家天野贞祐如此回忆战争时期：“颇具讽刺意味的是，那些本不该关注自我的全体主义者事实上是最追求私欲、最自我的人。”[30]

在这样的环境下，大家都对阳奉阴违习以为常。武田将这样的人称为戴着“贝壳”的“贝壳人”。“工头、课长、部长、厂长、工厂监督官，所有人都在金字塔式等级制度中拥有自己的位置，在自己的位置上无论是朝上还是朝下，都戴着贝壳从事社会公共活动。然而，自己实际的样子却背叛了这一点。”她从战争中学到的是，“灭私奉公”等“国家指导理念导致了贝壳人行为的矛盾与虚伪”。[31]

组织生活与统制经济

如此横行的“虚伪”在日常生活中也随处可见。

1930年代前半期，多数民众期待战争能帮助日本摆脱经济萧条。其实，那只是与表面上的口号毫无关联的现实利益的算计。九一八事变后，农本主义右翼分子橘孝三郎在火车上听到一群“淳朴的农村老人”的

谈话，并将其记录下来：

> “干脆早点开始日美战争得了。”
>
> “就是。那样的话说不定经济会好转。话又说回来，你们觉得怎么样？该不会觉得这样下去日本能打赢吧？毕竟美国很强大呀。”
>
> “那就不知道了。不过日本的军队也很强大。”
>
> “那当然，日本军队是世界第一。但是，尽管军队是世界第一，可军费跟不上呀。”
>
> “嗯……”
>
> “虽说不是千本樱[32]，饿着肚子可打不了仗。”
>
> “嗯，那是当然。不过，即便输了也没关系。反正仗会一直打下去。如果胜利那当然好，可以随便捞钱。如果输了，美国不会做得很过分，成为美国的属国反而说不定会活得更舒服。”[33]

但随着战争的激化，他们的预想落空了。日中战争[34]和太平洋战争后期的大规模动员，直接打击了农民和工人的家庭经济。津田道夫回忆道：“邻居家的孩子被征兵时，我们在家里会说那家‘没有了帮手真可怜’，或者说‘真可怕’等。可是出了家门却对那家说‘恭喜恭喜’。同时，儿子被征兵的家庭也是在家里说‘这可怎么办呀’，一旦出了家门却得说‘我家儿子这次也可以光荣地为国家效劳了’。”[35]

军事动员引发的农村劳动力不足以及肥料、原料缺乏等问题，导致1942—1945年全日本的大米产量减少了四成以上。虽然对粮食和衣服都实行配给制，可是1944年3月的东京，配给的副食品为每人每三天三根葱、每五天一片鱼。

随着战争的进展，一般国民也被编入军队式组织，隶属于“邻组”[36]、町内会或各职场的报国会。只有这些政府认可的组织才能实行粮食配

给，如果不加入这些组织就无法活下去。

这种组织成为政府向国民彻底灌输意志并动员他们的场所，同时也滋生出国民之间的相互监视和告密。于是，邻组长、町内会会长这些地方实力派因为告密和掌管粮食配给，拥有对地方居民生杀予夺的大权。

更有甚者，公定配给的不足，导致掌权者“克扣”粮食，或因为亲友关系而暗中交易粮食。人们为了生活不得不努力讨好管理粮食的军人、官员、地方实力派。历史学家远山茂树如此描述这种情形：

> 随着物资不足的加剧，黑市交易或物物交换愈加风行。军部、军需工厂的相关人员，统制机构的干部，从上级到下级，都拿为战争服务当借口，在自己职权范围内公然谋私。“这世道，陆军、海军、黑市、有关系日子好过，只有傻瓜去排队。”[37]“有关系”指作为配给生活必需品的基层组织邻组的邻组长、町内会和部落会的会长、地主，甚至包括成为配给所职员的卖粮食的人。他们因为同官僚统制组织产生联系而滋生出官员意识，从而忘却自己本是民众一员的事实。谋私虽在表面上被禁止，但所有的谋私都借助公用的名义在进行。没有比军人、官员更被百姓憎恨的了。但是，也没有比军人、官员更被百姓羡慕、更乐意攀亲沾故的了。就这样，统制越加强，秘密主义、宗派主义、形式主义、无效率等官僚组织所固有的弊病开始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从而使战争体制瘫痪。[38]

丸山真男曾于1946年在其《超国家主义的逻辑和心理》一文中将这种“所有私事都假借公名”的现象描述为“个人利害无限制地侵入国家内部”。[39]

这一情形导致了公共道德的急速滑坡和对国家政治的不信任。当时监控民情的特高警察[40]的文件记录道：“最近，希望同警察结婚的适龄女子增多了，其原因是很容易以低廉价格得到生活必需品”；“厌战、向往和平的言行陡增，反对军部的情绪开始表面化”。[41]

由于粮食和物资不足，治安恶化，盗窃案件增加。1944年2月，只

有上流家庭子女才上得起的青山女子学院停用火炉加热便当，原因是便当经常被偷走。[42]

1944年开始的学童疏散[43]使儿童也得面临这种窘况。粮食不足背景下的集体生活，使人性中的各种丑态显露无遗。

当初“相信是为了国家，宛如军队上前线般参加集体疏散”的柴田道子如此回忆当时的情景：“疏散时最痛苦的是什么？孩子们的答案应该不是饿肚子、想回家，而是被伙伴排斥吧。”[44]

集体疏散的儿童在住处编班，由高年级学生担任班长。这就意味着同一般社会里的邻组一样，班长手中握有对所在班成员生杀予夺的权力。柴田回忆道：“6年级班长的权限比老师还厉害，他们作威作福、蛮不讲理。”她接着回忆道：

> 我们的宿舍是学生宿舍中的模范寝室。遵守纪律、不吵闹，也从不给老师添麻烦，还努力学习，老师十分欣慰。然而，在老师看不见的地方发生了很多恐怖的事。……（班长）A 只要自己不高兴，以及被老师训斥时，就会迁怒于他人。经常以学生B被某某老师过于袒护，或学生C家里信件来得过于频繁等无聊理由为借口，进行残酷的惩罚，比如命令班上的孩子殴打学生B、不许所有人同学生C讲话等。排斥就像按序轮到每个人似的。被迁怒的孩子渴望从这种排斥中解放出来，因此选择默默忍受，直到班长原谅。其他人一旦反抗或同情朋友的话，被排斥的马上就会轮到自己。……
>
> 慢慢地，孩子们学会了讨好班长而不让班长生气的方法，比如将从东京寄来的点心多送一些给班长。……如果想家了，只能在洗手间里哭泣，或者晚上躲在被窝里低声啜泣。

在24小时的集体生活中，疏散处于“被班长从早到晚甚至睡觉的时候也监视着”的状态。柴田是个老实本分的学生，曾参加县里的作文比赛并入选，所以被班长斥为“呆头呆脑”，成为集体排斥的对象。“在大伙面前，被强行脱光衣服，接受每个人的批评。其他孩子虽不是心甘情

愿，但也不得不服从命令。”

这些孩子的状况是成人社会的一个缩影。受到教师压迫的班长，将郁积的压迫发泄到班上其他孩子的身上，这种现象在整个社会被改编为军队型组织的日本非常普遍。该现象被丸山真男描述为自上而下的“压迫转移”。

除了这种状态外，还有粮食不足和营养失调以及无偿劳动的肉体上的负担。卫生状况恶化使得传染病和寄生虫在疏散儿童间蔓延开来，出现了因营养不良而死亡的儿童，俗称“疏散病”的精神病也时有发生。

教师与学生的关系也很糟糕。关于这一点，柴田举出了特别分配给疏散学童吃的螃蟹罐头丢失一事。宿舍长和教师搜查犯人，都认为曾偷过米的某男孩是犯人。可是，柴田偶然在就寝时间后的职员办公室发现年轻的老师正在偷吃螃蟹罐头。

但是，战争时期告发这种事情是不可能的。就连儿童与父母之间的信件都经常被打开接受检查。柴田回忆道：“那时，擅长漫画的孩子画了一幅画，画上老师的盖浇饭盛得满满的，学生们的盖饭只有一丁点儿，还把瘦骨嶙峋的孩子也画上一并寄给家里。这引起了轩然大波。”

当然，其中也有为学生尽心尽力的教师。柴田目睹过某教师一边说“老师肚子不舒服”，一边将粮食让给低年级学生的情形。她回忆道：“我正因为知道理由，所以听着就想哭。”但是，在整体粮食不足的背景下，这样的老师为数之少可以想象。

中国文学评论家竹内好在战后采访、收集原疏散儿童的体验时，发现“家里寄来的东西被老师克扣；倒卖配给的油；下榻的旅馆给教师和一般的客人提供白米饭，却给学生提供红薯或掺了杂粮的黑米饭”这类事例占据大半。这些真实情况当然没有被官方记录。曾是战争时期“少

国民”[45] 的山中恒说：“一部分教师对高年级女孩子做过无耻的事情，这些事情虽在体验者之间流传，却不会公之于众。”[46]

关于粮食的分配，疏散者同当地人也有过争吵，而且是手中握有粮食的当地农民占有优势。当时贫富差距较大，都市中产阶级原本极容易成为贫农忌妒和憎恶的对象。而疏散儿童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进入村里。

1946年1月，复员到静冈县农村的渡边清目睹了疏散儿童们高呼“吝啬的农民、愚笨的农民、鬼一样的农民”离村回家的样子。他在当时的日记中记录道：

> 刚开始，我觉得他们只是在闹着玩儿。但是，当我看见孩子们因愤怒而僵硬的脸后惊呆了。孩子们对着田里的农民将手扩在嘴边认真地喊叫起来。……
>
> ……村子负责人也对疏散来的人很冷淡。不仅是大人，就连村里的小孩子，一旦发生什么就将疏散来的人作为“外人”，故意同他们打架，农作物被盗也大都归罪于疏散来的人。对孩子来说，在村子里的这一年，充满着饥饿、屈辱、忍耐。“鬼一样的农民”这句话就好像是从郁积起来的怨恨深处迸发出来的一样。[47]

这种对农民的反感并不局限于疏散儿童之间。从战时到战后，带着仅有的一点家产和衣服到农村来买粮食的城里人，也对那些狠狠杀价、便宜买进自己家产的农民十分反感。战后不久，据报纸报道，“采购的人都极度痛恨官员和农民，大家都异口同声地说要么饿死在大臣的门口，要么饿死在农民的屋檐下”。同时，渡边的日记也记下了农民们的话：“这次一定要让城里人知道农民的重要”；“这种时候要再让城里人窘迫一点”。[48]

这些实情，在战时都被政府制造出的美辞丽句所掩盖。但在言论统制被解除的战后，这些经历和感情，以战后思想的形式迸发出来。

知识分子

日美开战时，很多知识分子赞美过战争。原先一直为自卑于西方人而烦恼的知识分子，为战争的胜利而鼓掌喝彩。评论家奥野健男说："因对华开战感到茫然、内疚的大众，甚至明确批判侵略战争的知识分子，在看待对英美开战时态度都发生巨变。"奥野接着写道：

> ……在日本人眼中，优先攫取并独占财富的欧美先进国家，欲妨害作为新兴势力的日本。……这其中隐含着亚洲民族近百年来饱受白人侵略和残暴民族主义的愤怒与怨恨。……随着战果一个接一个被报道，紧张感转化为解放感，恐怖感转化为优越感、喜悦感、自豪感。人们从有色人种和落后国国民面对白人和发达国家的自卑感中一举解放出来。陷入泥潭的对华战争的愧疚感与郁闷感，也因得到同英美开战的大义名分，心情竟像拨云见日般舒展。[49]

日美开战时，美化战争的知识分子们大多放弃了原有的政治立场。河上彻太郎说："混沌暗淡的和平，比起战争的纯粹，是何等浑浊、何等不痛快的事情啊！"青野季吉也写道："美国、英国突然变得很渺小。我国国民则因为有绝对值得信赖的皇军而十分幸福。"坂口安吾、德田秋声也写了关于克服对英美的自卑感、向往开战的文章。[50]

同时，也有很多人从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这一角度提倡对战争做贡献。作家石川达三在日美开战时写道："生活在这个伟大的历史中，自己的作品没有直接与时代接轨的话，还不如暂时停止文学创作。"因脱离左翼作家而出名的岛木健作也写道："从没有像现在这样感到笔杆子的责任重大。那也是作为文学家的自豪感。"[51]

希腊哲学研究者、东京帝国大学教授出隆于1943年写道：

> 在这举国家之力歼灭美英之决战的金秋，我坚信研究或讲授远古希腊哲学，也是建设大东亚新秩序不可或缺的一环。但对现阶段只能起到间接作用总心怀歉意。所以，当上邻组组长后，做配给粮食的工作或指挥防

空，尤其是戴上钢盔、套上袖章、用喇叭指挥女消防员，这样为邻组工作时才觉得好不容易找到一份有意义的工作，甚至因为是在为国效力而觉得脸上特别有光彩。[52]

讽刺的是，对这种贡献社会愿望十分强烈的是从马克思主义转变过来的知识分子。这是因为，原本在马克思主义文学运动中，无视对社会变革做出贡献的“个人主义”、“艺术至上主义”一直受到批判。

相反，高唱统制经济的军人们的主张也显示出与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微妙的亲和性。在1944年《美术》杂志举办的座谈会上，陆军宣传部的军官说，“我认为画画的人大多不关心政治”；“大家想想那些十六七岁就到缫丝厂或别的工厂做工的女孩子”，“虽然每天挥汗如雨地工作，却没有一张画”；“就因为想成为一流画家、一流雕塑家，结果和有钱人勾结，成为有钱人的奴隶。所以，一流画家画的画只能去博物馆才能看到”；“只作为艺术家拥有价值是不行的。一般国民、国家不认可，只有自己沾沾自喜是不允许的”。[53]

共产主义运动在1930年代后期遭到彻底镇压，许多共产主义者声明放弃原有的信仰后被释放。他们之中的一些人要么支持消灭资本主义的统制经济，要么赞美同象征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美英之间的战争。将在第十四章中论述的吉本隆明指出，无产阶级文学家先是无法忍受被国民孤立而发生思想转向，然后在马克思主义的延伸线上协助战争，并将其命名为“两阶段的转向”。

尽管如此，以上只是事实的一个侧面。战争期间公开发表的文章照字面理解的话，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好像是从心里美化战争、欢迎战争似的。但那只是表面。他们面对的现实与公开发表的文字有所不同。

对于当时的时代背景，首先要说的是强大的言论统制。1940年左右，别说批判战争的文章，就连不积极美化战争的文章或作品都难以发表。印刷纸张、颜料都是统制对象，稍稍违反当局的意图配给将被立即

停止。当然这也意味着，对作家和画家来说，不美化战争就等于失业。

如此，知识分子、作家只能被迫做出选择，要么写协助战争的文章，要么放弃创作到军需相关工厂里工作。除去拥有个人资产的永井荷风、清泽洌等，大多数都选择了写作迎合时局的文章，在文中避开审查穿插一些批判，以慰藉自己的良心。

如前所述，事实上，由共产主义运动转变而来的知识分子中，写作美化战争文章的比较多。但是，那不仅源于马克思主义同总体战体制的亲和性。1941年3月，治安维持法被修改，引入预防拘禁制。于是，已经释放的共产主义者一旦被认为有再犯的可能性，将会再次入狱。所以，表示思想革新而被释放的马克思主义者生活在警察的监视下，如果不积极摆出协助战争姿态的话，他们何时入狱都不足为奇。

监禁的恐怖同拷问、囚死的恐怖连在一起。1933年因警察拷问致死的无产阶级作家小林多喜二的尸体被这样描述："可以看到大量的内出血，大腿的皮肤就像钵纹开裂似的肿胀。大腿是一般大腿的两倍粗。并且，黑红的内出血从阴茎波及睾丸，使得阴茎和睾丸异常肿大。"[54] 即将战败时入狱的三木清，由于在监狱中的非人待遇以及恶劣的卫生条件，皮肤病同营养不良并发，于1945年9月死于狱中。

马克思主义教育学家宗像诚也就自己撰写协助战争的文章的理由这样写道：

> 直接的原因是恐惧，被关进监狱的恐惧。……我尤其是肉体上的胆小鬼……这种恐惧很强烈。被关进监狱的恐惧，随着朋友们接连被带走越来越强。教育科学研究会的同事被带走，我慢慢陷入孤立。……孤立，被人盯着的感觉让人很不安。因为想着父母、妻子、孩子，被关进监狱的恐惧从而加倍。年迈的父母该多么伤心啊。妻子和孩子该生活困难吧。[55]

镇压的恐惧使知识分子们的孤立感和多疑滋生。当自由表达思想的

机会被剥夺时，对方持有什么思想便不得而知。这也就意味着在他人面前批判时局的话，有被告密的危险。

作家、知识分子之间对权势的争夺使得彼此疑心更重。1942年5月，日本文学报国会成立。同年12月，大日本言论报国会成立。不加入这些组织的话，就没有被约稿的可能性。于是就像邻组、町内会一样，这类组织的成立意味着干部握有对会员生杀予夺的权力。

在这样的背景下，知识分子间的暗斗开始了。这一时期，如果将一直以来同自己相对立的人告密，说他有“唯物论”或“自由主义”的过去，就很容易使他从社会上“蒸发”。与此相反，只要掌握国策团体的主导权，或与军部、政府勾结，就有可能掌握支配言论界的权力。

这是知识分子的战争经历中最丑陋的部分。1946年3月，新日本文学会东京支部创立大会通过了《追问文学上的战争责任》声明。当时，被追究的不只是写了美化战争文章的文学家，也包括“批判自己的人在特高警察或宪兵或其他力量的压迫下陷入沉默时，觉得机不可失而四处钻营的人；或者是将自己文学上的敌人称为‘红色’或‘自由主义者’而告发给特高警察的文学家”。[56]

就这样，很多知识分子一边生活在恐惧的阴影下，一边竞相“协助战争”。英国文学评论家本多显彰在战争期间为自己曾于战前进行过反战讲义而感到担忧。他回忆道：“我每天都沉溺于空想中，想着要怎样做才能给特高警察和宪兵队留下自己并不是那么危险的人物，自己并没有在教室里对学生说那么反战的话的印象。”并且，当被邀请到大政翼赞会外国文学部会干事会时，还要说“非常高兴能来参加”，今后“每次都要到会，打算好好表现”。[57]

当本多知道自己上了出版文化协会的黑名单后，他给当时在文坛上颇有势力的评论家林达夫去信，希望其帮助自己找些协助战争的工作。

信的大意是："全国人民都在劳动，只有我游手好闲，如果有什么工作希望能让我出一份力。"当找工作碰壁后，"觉得即便这样还不放弃奉承军部的自己可耻之极，陷入深深的自我厌恶"。[58]

战争初期，令作家们最为恐惧的是被选派到有生命危险的前线当从军作家。当时，传闻《文学界》杂志的林房雄等被委以筛选从军作家人选的大任，于是岛木健作、森山启纷纷加入《文学界》而逃脱了征召。[59] 无论是岛木还是本多，发表的都是讴歌作家的社会使命和国民的团结、美化战争的文章。

被征召到前线的作家，也竞相发表美化战争的文章。这是由被军队赏识的话可以尽早回国的动机与文坛内的竞争意识造成的。被征召到缅甸前线的社会学家清水几太郎遇到了同样被征召的作家高见顺。高见看到从日本订购的杂志上都是竞争对手的文章，于是心生妒忌，"'在这种地方磨磨蹭蹭的话，会被毁灭'之类的话成了他的口头禅"。[60] 高见顺后来发表了赞美缅甸战役的"力作"。

如此协助战争，不仅能逃离镇压的恐惧，还能享受军部和政府给予的优厚待遇。创作了鼓舞斗志曲子的作曲家山田耕筰，为自己享受少将待遇而自豪。[61] 这些享受将校待遇的知识分子，因军部派遣勤务兵作为自己的用人而获得了周围的尊敬。

但是，光美化战争并不能说没有危险。由于军部和政府的派系斗争，即便被某个部门赏识，也有可能被其他部门攻击。

在此仅举一例。京都学派的哲学家因与海军关系密切，被与陆军勾结的右翼分子敌视，以美化战争的方法是依据西欧思想的名目遭到攻击。[62] 相反，痛斥欧美思想的日本浪漫派保田与重郎，最后却惹恼军部，被惩罚性征兵。

文坛、言论界如果有人讨厌自己的话，即便自己同政府或军部的特定部门有关系，也很难预测到将在何时何地被告发。战后，协助战争的知识分子都说自己有被镇压的经历，这并不是谎言，而是有这样的缘由。

在疑神疑鬼和忌妒横行的世道，对别人的友情和同情常常意味着自身的危险。三木清被监禁致死，据说是因为给无藏身之处的思想犯高仓辉提供了一晚住宿。当时已经到了无论是谁都不得不拼命保护自己的状态。

这种状态使知识分子开始厌恶自己且不信任他人。到了战后，将在第六章论及的《近代文学》杂志的创办人荒正人，就很多马克思主义文学家争先恐后协助战争的情形写道："曾经人民的朋友是如何堕落为仆人、堕落为幸福的居民——无数事实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那是假面滑落后丑恶的真实面貌，是一具隐藏在人道主义面纱下自我主义的肉体。""曾经无论在哪里都能听到'他是个好人'，现在正好相反，那个人也不行，这个人也不行，造谣、中伤、不诚实……这是同志般友爱的悲惨下场。"[63] 战后欲恢复社会变革的"民主主义文学"与拆穿人道主义虚假的"肉体文学"即在这种战争经历的土壤里抬头。

因协助军部而获益的知识分子也为自我厌恶和屈辱而感到烦恼。军人对艺术与文学是无知的。在前述《美术》杂志的座谈会上，陆军将校强调"就像医院的疯子画的圆、三角一样，谁看都不懂"，要写"拥有新型国家观念的人成为恋爱的胜利者"之类的小说。[64]

这些知识分子即便表面上迎合军部，但当自己的工作被军人审查，作品被要求改写时，无不感到屈辱。日美战争中，被强行要求写下雄壮歌词的词作家大木惇夫在一次座谈会上酩酊大醉地嚷道："作为一个人，比我低下的军人让我向他们敬礼。又说敬礼的姿势不好而大声斥责。但是，走着瞧吧。等到了我们的时代，我会让他们照我的姿势向我

敬礼。” [65]

除了利用时局乘机获益的部分知识分子之外，对多数知识分子来说，战争简直就是一场噩梦。表面上赞美崇高的理念，暗地里恐惧与明哲保身、怀疑与背叛、幻灭与虚伪相互交织在一起。对他人的信赖、自身的自豪感严重受到挫伤，对这种经历的回忆常常伴随着屈辱感和自我厌恶，同时作为再也不想触碰的伤痕被永久性封存。然而，正是这些悔恨的记忆成为战后思想重要的潜流。

学生兵的经历

从1943年10月开始，政府取消文科大学生的暂缓应征，引入“学生从军”制度。战争后期参军基本上意味着死亡。

“解放大东亚”也罢，“奠定和平的基础”也罢，学生兵努力为自己的死寻求意义。京都学派哲学家所著美化战争的《世界史的哲学》受到学生兵们的热烈欢迎，与其说是因为强烈支持战争，倒不如说是因为他们渴望为自己的死赋予有价值的理念。

但学生兵入伍后所面对的是与理念、理想等毫无关系的极不合理的生活。军队的内务班如同疏散儿童的班级生活一样，属于前辈的“老兵”支配的空间。下级军官、老兵将从上级军官那受到的压抑以对新入伍的学生兵实施私刑的形式表现出来。

战后，担任“日本战殁学生纪念会”事务局次长的原学生兵安田武回忆道，“在被褥里做梦的时候，在厕所里大便的时候”，“被欺负，被推搡，被‘陛下’铁砧殴打，被强行吃马粪，被军靴踢倒，流血，牙齿被打断，耳朵被弄聋”。 [66] 学生兵们的遗稿集《听，海神的声音》里，对军队充满期待而入伍的人，最终写道“军队不是学校而是监狱”。 [67]

与此同时，令学生兵们感到疑惑的是军队组织与训练的非合理性。日本军部不仅对现代战争欠缺准备，急速的兵力扩张也使得教官与军官人才不足。训练基本上根据明治时期的战法进行，背诵军人敕谕与《作战要务令》，即所谓的精神主义横行。遗稿集《听，海神的声音》里充斥着诸如“仅仅是为了演习的演习，愚蠢至极”、“教官什么都不知道”、“与小学的修身课有区别吗”的声音。[68]

更让学生兵们惊讶的是军内的腐败。一般社会上短缺的粮食、物资都优先分配给军部。战败时，据下级军官小林直树的回忆，军队的采购部门以每升2日元50钱配给的酒在黑市的价格为500—800日元，也正因如此，侵吞物资司空见惯。[69]

人事上的后门也很多。从菲律宾战场生还的藤冈明义，以确定参加野战人选时上级军官的亲戚都被安排到安全的后方上班为例写道：“以光明正大为口号的军队，其实是私情的熔炉。”《听，海神的声音》里，也有学生兵们受到“目不忍睹的败坏军纪”的打击，“军人的本分只是形式上的，并且很低级”的事例。[70]

上级军官的绝对权力经常以粮食配给不公的形式表现出来。后来成为读卖新闻社社长的渡边恒雄，战争后期被征召入伍成为二等兵。他的饭只是“麦子、稗子或粟。那也只有半碗”。相反，“小队长的碗里堆得像一座小山”。在很多士兵饿死的新几内亚战场，某陆军少将侵吞粮食，并让警卫保护侵吞来的粮食，一般士兵怨声载道。[71]

原海军航空队飞行员坂井三郎在战后的采访中描述称：“在战场上，下士官的宿舍同士官的宿舍严重的时候相隔四五公里”；“我们在拉包尔时，自己的下属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吃着什么食物战斗，没有一个士官来视察过”；“偶尔有事去四公里以外的士官宿舍时，含有防腐剂的啤酒都不会发到我们那里，可是那些乳臭未干的、两三天前刚刚结束延长教育的一伙人，因为是中尉，却喝着（在战地缴获的）尊尼获加黑方

威士忌”。[72] 俗称“海军士官的潇洒”就是在这种阶级差距的背景下产生的。

这样形成的士兵的忧愤与败坏的军纪相结合，以给占领地居民施加残暴行为的方式爆发出来。以副教授的身份被征召为二等兵、被送往驻朝鲜步兵队的丸山真男，在其1946年的文章《超国家主义的逻辑和心理》中写道：“在中国或菲律宾的日军残暴行为，先不说其责任所在，我们不能忽略直接的凶手是一般士兵这一沉痛的事实。即便在国内是‘卑微’的人民，在部队里是二等兵，一旦奔赴外地，就具有皇军的价值，拥有无比优越的地位。无论在市民生活里，还是在军队生活里，那些无转移压抑场所的大众，一旦拥有优越地位时，自己担负的全部重压一下子要被解放出来，发生爆炸式的冲动就不足为奇。他们的蛮横行为难道不是这种狂舞的悲哀的纪念碑吗？”[73]

军队生活中给学生兵带来的影响，有两点构成本书重要脉络。借用其中一人的话就是：“对大众本能的厌恶与对国家军队非科学性组织的不满。”[74] 这两个要素原封不动地与战后思想的特性连在一起。

首先“对非科学性组织的不满”与非合理的精神主义，源于对长官不负责任的质疑。那被认为是为了合理完成战争而进行的必要批判。某学生兵回忆道：“仅有抗战到底、努力到底的精神不行。用科学使承担精神的组织、生产的相关部门更加合理难道不是必要的吗？”[75]

这一意识使他们痛感学习旨在研究经济体制、人类心理的社会科学的必要性。如第二章以后提及的那样，以创造出“不负责任的体系”与“转移压抑”等关键词的丸山真男为首，战后多数社会科学家都是在自己被军队征召的经历基础上开始研究的。丸山的文章之所以能引起同代人的共鸣，就是因为他们与丸山有着相同的经历。

其次，“对大众本能的厌恶”其实是丸山等战后思想家的思想之源。

关于这一点需要稍作解释。

前提是当时日本社会的贫穷以及城市与农村、上层与下层的知识鸿沟。城里的大学生精通德国哲学与法国文学，相反，农村出身的士兵大多连几行字的信件都不会写。据文部省与美国占领军于1950年的抽样调查，能完全读懂报纸的人只有4.4%。[76] 所以，大学生属于极少数的社会精英。

如前所述，“疏散”这一所谓的人口移动使得城市与农村的对立表面化。“学生从军”也带来同样的效果。多数学生兵出身于城市中产阶级，对日本农民、下层民众的生活状况毫不知情。另外，在军队、大学里学到的知识派不上丝毫用场，而肉体健康、世俗“精明”的程度则是一个人的全部。这样，学生兵相较于教育程度低的下层出身者在军队的生活中要处于劣势。

就像农民同疏散儿童的关系一样，下层出身的下士官、老兵通过经常欺负学生兵而爆发对都市中产阶级的憎恨。哲学家梅原猛这样回忆学生兵时代：“我学到了一点，就是工人、自耕农对我们这些象征特权阶级出身的学生是何等反感。”[77]

结果是——借用《听，海神的声音》里的话：“我陷入了超乎意料的对大众的厌恶。不想把他们当作人来对待”。前面提及的原学生兵安田武在战后的回忆中，形容农民出身的士兵“只剩下卑劣，不知道屈辱为何物，敷衍的老手，盗窃的高手，在能赢的争吵中表现出彻底的傲慢，而在可能会输的争吵中又变成彻头彻尾卑劣的人”。[78]

军队生活不仅让学生兵陷入了对大众的厌恶，也让他们陷入了自我厌恶与屈辱。这是因为为了逃避欺辱、填饱肚子，收买下士官与老兵、背叛朋友才是捷径。

梅原猛说，学生兵时代学到的是“人在被逼迫时，无论对方怎样卑劣，也要面不改色”。战后1952年，作家野间宏根据自己的从军经历写成小说《真空地带》，勾勒出一名胆小自私、只知道保护自己的学生兵安西，引起了巨大反响。同样是学生兵的法国文学评论家多田道太郎在对该小说的书评中写道：“读这本书就会脸红。我，也是像安西一样度过了军队生活。”[79]

在战场，也有很多使人们不信任对方的经历。很多部队有这样的流言：为了报平时的一箭之仇，有些士兵在战斗中从后方射击老兵。被认为既勇敢又体贴部下的将校，在饥饿与逃跑的漩涡中扔下部队后退的事例也不少。平民百姓出身的士兵，在前线的兴奋状态下虐杀当地居民的行为也屡见不鲜。

写下《真空地带》的野间宏，根据自己的从军经历于1947年发表了小说《脸上的红月亮》。该小说描写了在战场争夺饮用水、抛弃濒死战友而自己得以生还的复员兵，因战场上的痛苦记忆而无法适应战后社会的情形。在小说的末尾，主人公这样说道：“如果处在与当年相同的境遇，我仍然会见死不救。”[80]

这种心情潜存于战后的大众文化之中。在1949年上映的黑泽明导演的电影《野良犬》中，三船敏郎扮演的一名复员兵年轻警察，在给杀人犯定罪之时犹豫不决，他说道：“在战争期间，我看到很多人，因为很简单的理由变成了野兽。”[81]

但战后的知识分子、作家即便完全没有协助战争的污点，关于自己思想出发点的战争经历，写回忆录的少之又少。因为那样做，就相当于将自己屈辱的伤口公之于众。

丸山真男也没有记录自己的从军经历，只在座谈会上说看长官脸色的军队生活过得就像“女内侍”一般。社会上也只是传闻其被老兵的军靴

踢过而已。如第二章所述，丸山一方面宣扬民主主义的理想，一方面在文章中使用“生活在黑暗社会底层的百姓”。[82]

但与此同时，在学生兵中，也出现了努力理解社会底层出身士兵境遇的立场。曾因从事共产主义运动而被举报，在缅甸战场病死的某学生兵，在表达对社会底层出身士兵的愤怒的同时，形容“士兵的心情”为“可悲的现状”，“人应该更加快乐地工作、生活”。[83]

根据部队的经历而改变了对社会底层出身士兵看法的学生兵也大有人在。体力羸弱的学生兵在终极状况下总会倾向于将自己的行为正当化。与此相反，把朴素的义理人情作为行动原理的社会底层出身的士兵，更多采取伦理性的行动。同样是学生兵出身的判泽弘，对前述安田武对农民士兵的评价予以反驳，他以自己的经历强调：“逃跑时，有因生病或负伤而落伍的士兵，而为了照顾这些士兵而一同落伍的大多是这样的农民士兵。”判泽又说：“而我却丢弃了他们。”[84]

这些经历使得对民众的厌恶与尊敬这种矛盾的心情植根于知识分子心中。同时，也有人主张超越单纯的蔑视与赞美，直面民众的现实。多田道太郎说：“我在军队一直被欺负，又因为被欺负而接触到日本的民众。”[85]

与“民众”或“大众”相遇的同时，又与作为第一要素的“科学”取向相结合。因为学生兵感到，有必要分析促使社会底层出身士兵厌恶他们、欺辱他们的日本社会阶级差距以及民众的意识结构。这就是以丸山真男和大塚久雄为首，分析日本的社会结构与意识结构相关性的思想在战后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背景。

与此同时，让学生兵们有切肤之痛的是，即便精通西方哲学和思想，也对日本社会的状况一无所知。他们切身体会到，在大学讨论的黑格尔、康德的哲学，缺乏分析日常经验的应用训练。这一经验让他们认

识到，西欧的理论不能只作为单纯的知识来学习，更重要的是要将其发展为分析日本社会现状并使其进行变革的社会科学。

但是，这种变革取向并没有以对日本国家进行批判的形式表现出来。相反，学生兵大多主张“现在这种状态持续下去，不得不担心祖国的将来”。同时，他们还批判“军人的腐败”，认为“还能指望现在的政治家们什么？现在是学者站在第一线的时候了”。[86]

在这种背景下，批判政府的情绪以政府教给他们的“爱国”一词表现出来。也就是说，与政府高唱的“爱国”不同，还有另外一种“真正的爱国”存在。冲绳特攻中战死的学生兵这样写道：

> 二二六事件[87]以来，日本选错了应该前进的道路。急转直下、无视自由的运动（虽然最终是利己主义，但表面上看是那样）兴起，与此对抗的真正的爱国者，倒在冰冷的剑锋下。权力主义者为自己的胜利所驱使，将日本引入无法得到救赎的道路。他们不是真正的爱国，只是利欲熏心……通过战争来确保自己的地位。……
>
> 他们不惜以牺牲我们深爱的祖国来加强自己的力量，但是，现在开始失败了，我们真正热爱的祖国以及善良的国民将成为引路人。[88]

反对战争才是“真正的爱国”，这不仅是该学生兵的主张。战死于莱特岛的某学生兵写道：“历史将会裁定到底有多少人是真正的爱国者。”在中国大陆战死的某学生兵也记述道：“我忠诚的方式大概就是冒犯现在军部首脑的基本方针。”[89]这种表述在上层的腐败与毫不负责之下，在大日本帝国行将崩溃的战争后期，自然发生并广为流传。

同时，学生兵们的这种经历，也并非他们独有。战争期间，知识分子被投入社会的形态不只有征兵。既有像丸山真男或竹内好这样被军队召集的，也有像鹤见俊辅那样作为军人以外的文职人员在东南亚工作的。吉本隆明通过在工厂“勤劳动员”、大塚久雄通过疏散到农村等方式，都或多或少拥有类似学生兵们的经历。

学生兵们的经历是知识分子战争经历的一个缩影。它既是使知识分子拥有对大众矛盾感情的屈辱经历，也是让他们痛感有必要用思想和社会科学变革日本社会的经历。这些经历，与战争时期形成的“真正的爱国”的表现一起，深深地影响了战后思想。

“战后”的开始

战争的最后阶段，只有牺牲在不断扩大。战争带来的后果是，日本的死亡人数达到大约310万人。这个数字相当于当时本国人口的4%。此外，有1500万人失去家园，300万人因为企业倒闭而失去工作。

当时的一名大本营海军参谋说，战争最后的一年“对我方来说是战败处理，对盟军来说是扫荡残敌”。即使这样也要继续战争，这是因为对执政者和军部上层来说，“比起收拾战争残局，继续战争更为容易”。[90]

推迟终结战争的主要理由是投降条件。在军队上层，妄图以某一处的局部战斗取得胜利，来改善投降条件的意见占大多数。所谓改善投降条件，首先是保留天皇制，其次是由日方进行战犯审判。作家小田实后来写道：“捍卫天皇制就意味着挽救天皇的生命。而挽救战争最高指挥者天皇的生命，也就意味着挽救其他二号、三号指挥者的生命。”[91]

1945年2月，近卫文麿向天皇奏请投降交涉。但天皇以“如果不再赢得一场战争就交涉的话会很困难”为由拒绝了。[92] 那之后的半年，冲绳战役和大量的特攻战、各地的空袭和原子弹的投掷、苏联参战和朝鲜半岛的分隔以及南方战场导致了大量战死和饿死的士兵。日本的多数战死者，尤其是大多数的民间牺牲者都集中在这半年里死去。

一个人的战死，会给家人和亲属带来莫大的伤害。作家梦野久作的长子杉山龙丸回忆战后从事复员事务时写道：“我们做着十分痛苦的工

作，每天对来访的军属传达着，您的儿子、您的丈夫死了，死了，死了的讯息。……多数军属都瘦骨嶙峋，衣不蔽体。”[93] 杉山某日接待了一位代替因粮食不足而病倒的祖父母来打听父亲消息的小学二年级少女。

我翻看账簿，找到名字，上面写着战死于菲律宾岛。

“你的父亲……”

我边说边打量着少女的脸蛋。黑黑瘦瘦的脸，娃娃头下细长而清秀的眼睛，努力睁大着盯着我的嘴唇。

我必须回答少女。努力控制住身体的战栗，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言语回答。

“你的父亲，战死了。”

说完后声音戛然而止。一瞬间，少女努力睁大的眼睛瞪得更大，然后，哇……好像要哭似的。……但是，少女说：“爷爷嘱咐我了，说如果爸爸战死了的话，就请主管的叔叔写下爸爸战死的地方，战死的情况，对，情况。”

我沉默了，点了点头……终于，写完后，装进信封递给小女孩。小女孩用她的小手小心翼翼地装进口袋，用手臂压住，垂下了头。

没有一滴眼泪，没有出声。

我用手拍着她的肩膀，想说点什么安慰的话，一看她的脸，小女孩儿紧紧咬着下唇，就好像要咬出血似的，突然睁开眼睛呼了一口气。我强忍着不出声，稍稍稳定一下自己后问道：“一个人，能回家吗？”

小女孩凝视着我的脸：“爷爷叮嘱过我，不能哭。爷爷奶奶给了我乘电车的钱，告诉了我电车的路线。还问了好多遍，可以去吗，可以去吗？”就好像说给自己听一样，又向我点了点头。

我的体内就好像有股热流涌过。在回家的路上，她对我说：“我有两个妹妹哦。妈妈也死了。所以，我必须坚强。我不能哭。”握着她的小手，我脑海中反复回响着她的话。

会变成什么样呢，我到底是什么，到底能做点什么呢？

使很多当地居民死去的吕宋岛碧瑶战役，发生在天皇拒绝近卫投降提案期间。

对8月15日日本战败的反应，因阶层、居住地区或年龄而异。据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团战后进行的面对面调查，遭受空袭的城市比农村、深谙世事的老人比年轻人预测战败的比例更高。[94] 对于战败印象的差异将于第十四章和结语中再次加以分析，无论如何，战时的价值观和权威都崩塌了。

话虽如此，价值观的崩塌和道德的滑坡不是8月15日这一天才突然降临，而在战争时期已经开始了。很多人已经感到政府高唱的理念充满了虚伪。所谓战败只是决定性的一击。伦理学家天野贞祐1946年对从战场上生存下来重返大学校园的学生发表演讲时说道：

> 从战前到战时，无理、虚伪、伪善一直支配着我们的社会。最没有道义的人最热衷于宣讲道义。最丰衣足食之辈是艰苦朴素最有力的宣传者。“没有道义就没有胜利”这一信条的真理性在他们自身的历史上得以证实。这次惨败的真正原因也就是道义的丧失，不在于百姓，而在于统治阶级，这已经是明了的事实。[95]

巨额军费以及毫无计划地发行国债，使战后恶性通货膨胀在整个社会蔓延。与1937年相比，1946年1月的价格指数就已经创下东京14.8倍、大阪约22倍的纪录，之后仍在不断攀升。空袭导致城市的住宅基本被烧毁，衣服和粮食严重不足。

物资不足加上战败的混乱，激化了军需物资的倒卖和侵吞。身居高位的官员不断倒卖和侵吞军用物资，给那些苦于战败后恶性通货膨胀与粮食不足的人加深了军人道德低下的印象。据渡边清的回忆，移居到他所在村庄的原海军中佐，将航空队的建材扁柏和粮食用卡车运回，新建

了房屋还储存了好几年的粮食。[96]

加剧这种不信任的是战败后军队上层的行为。高喊彻底抵抗和“一亿玉碎”，命令下属特攻的高级军官中，战败时自杀者却寥寥无几。下达过“绝不活着忍受俘虏的屈辱”这一战场训示的东条英机陆军大将，自杀未遂被美军逮捕的消息激起了很多人的蔑视与愤慨。

在新加坡的战犯审判中被判处死刑的学生兵这样写道：

> 全是花言巧语且毫无内容，他们所谓的“精神性”语言，其实是除了物欲、名誉欲、虚荣心以外什么都没有的军人……在监狱里曾遇到某某中将、某某大佐等人，并一起生活过。他们脱下军装后赤裸裸的言行，实在让人无法忍受。我不禁想到，让这样的将军指挥，即便日本再有科学和物资，也无法取得战争的胜利。[97]

进一步降低军人和当政者权威的是东京审判。这次审判给舆论带来了两方面的冲击。一是在“解放亚洲”名义下进行的战争中日军实施了很多残忍行为。二是日本的当政者都否认自己的战争责任。

丸山真男在其1949年分析东京审判记录的文章《军国支配者的精神形态》中指出，将日本当政者的“矮小性最露骨地展示给世界的是战犯们异口同声地否认战争责任”。[98] 被告们强调自己只是遵从上级命令，是受到周围氛围的影响，并没有将日本引向战争的意识和权力。

英国文学专家中野好夫1952年引用了发布特攻命令的将军给年轻飞行员们的训词，并写道：

> “日本正在面临危机。能够挽救这个危机的，不是大臣，不是大将，也不是军令部总长。当然也不是我自己这样的长官。而是你们这些纯真的充满朝气的年轻人。（下略）”
>
> 在这段话中，大臣、大将、军令部总长等可以替换为首相、外相、政党总裁、国会议员、领导者——甚至可以换成其他任何人。问题是，在将

> 日本引向太平洋战争的过程中，这些“年轻人”并没有被允许讲话。军部、政治家、领导者拍着他们的大肚皮异口同声地说：“你们的思想尚未成熟，一切交给我们！”但是，当他们引导的祖国面临危机之际，令人惊讶的却是他们自己主动坦白毫无力量。这若非煽动时的欺瞒，就是可怕的不负责任。[99]

但是，这种“不负责任”在战后的民主化中也显露出来。作家真继伸彦战败时还是小学生，他看到害怕被解除公职的教师“用卑屈的语调说‘哎，老师没有教大家这些东西吧’，试图掩盖战时的言论来求得学生的庇护”。[100] 跟随美军视察战后日本的新闻记者马克·盖恩描写了曾经的特高警察、大政翼赞会干部在各地热烈欢迎他们的情形。

盖恩于1945年冬访问酒田市，他记下了与某中学校长谈话时的逸闻：

> 他承认他们学校的25名教师都是经日本军部同意任命的。但是，当问及是否有意向开除他们公职时，他很吃惊地说：“为什么？他们什么都没做。”
>
> 于是，我问道这些由军部挑选的人有能力将民主主义的观念教给日本青年吗，他很确信地回答道：“当然，只要东京下达命令……”[101]

盖恩听到这个回应后写道：“为什么日本会走向战争——然后战败？我似乎明白了其中的理由。”

丸山真男在1951年的文章中指出，战前的教育并不是培养植根于个人责任意识的爱国心，只不过大量生产了“忠实却卑屈的仆从”而已。评论家小田切秀雄于1946年评论从谩骂“鬼畜美英”到礼赞“民主主义”的这些人时写道：“这些家伙按道理不可能‘改变立场’”，“只是迎合的主人变了而已”。[102]

批判旧道德欺瞒的“肉体文学”就在这种状况下兴起。作家坂口安吾于1946年的《堕落论》中说，“混乱吧。流着血，沾满毒液！必须先越

过地狱大门才能登上天国”，“我们必须经过‘健全的道义’的堕落才能复归为真正的人类”。该言论引起了极大反响。[103]

那些面对死亡与丑恶、陷入饥饿与贫困的人们，十分悔恨自己曾经支持战争。1946年6月，东宝电影公司举行战后第一届新人甄选会，三船敏郎和久我美子入选。当时的台词就是“我曾经很傻，真的太傻了，太傻了……”[104]

另一方面，追究战争责任使得新的丑恶呈现出来。作为文官被征用到南方战场的福田定良于1947年记述的事件就象征着这种状况。

福田说在南方时，比最低级的军人还要地位低下的后勤人员——基地建设工人，经常受到军人的虐待。战败后，在回日本的船上，那些工人又对曾经虐待自己的军人用集体虐待的方式进行了报复。

作为工人领导的福田制止了虐待，他在甲板上召开了集会，提出让军人以谢罪的方式代替虐待。在集会上，福田对军人们说：“我们没有资格追究你们的罪过。我们也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无愧于天地。”“但是，你们当中，难道就没有人曾利用天皇的权威为满足自己的私欲而让我们受苦吗？”“我们只想听到你们作为人的反省。”[105]

对于那之后的情形，福田写道：

> 对此，首先是卫生兵M走到我们面前。但是，他完全没有一丝军人的信念，只是一味地诉说自己的不道德。
>
> 但是，正当M鞠躬准备退回去时，突然，一个年轻的工人大声嚷道。
>
> ——什么呀，那种道歉的方法。跪下，跪下，道歉！
>
> ……我看到一个接一个站起来然后跪着退下的军人，突然意识到他们凄惨的样子其实就是我们曾经的样子，于是我感到很气愤。他们的谢罪，就是我们受到欺辱后说“报告下士官，我错了”一样。……曾经他们做的一

切都是对的。那是因为他们拥有权力。但是，现在他们无一例外地说自己错了。那是因为他们已经失去了权力。因为这样一个平凡的事实——也就是亲眼见到他们的伦理精神不是由于个人的自觉，而是由外部权威左右的这个事实，我不得不这样认为。

——这是军队的伦理精神。但是，这仅仅是军队中的问题吗？关于伦理，所有的国民难道不是同我们一样吗？但即便这样，这种悲惨的精神也如同此次航海一样，必须是最后一次。

虚伪与明哲保身，不负责任与堕落，阳奉阴违背后利己主义的蔓延……日本不仅仅是物理上的败北，同样也有精神上的崩溃。战后成为《世界》杂志主编的吉野源三郎回忆战时与战后初期时写道：

没有比战争更需要人们同心协力了，但战争却使日本人的团结意识分崩离析。指导战争的军人、政治家高喊“灭私奉公”的口号，要求国民为了公家舍弃个人的得失，但是，无视个人得失的政策越被强行实施，国民就越不得不守护自己私生活的得失。……空袭终于开始后，数百万的城市居民为了守住仅有的家产和衣物慌忙疏散，甚至都无法估计战争的走向。不能不说，对个人利益的考虑吞没了对公家的关心。

战争要求万众一心的合作，相反却将人与人之间的团结意识切断，结果使国民陷入战败后的极度贫穷之中。……这就是战后我们所处的环境。日本不仅在政治上、经济上崩溃了，甚至精神上也崩溃了。[106]

滋生虚伪与不负责任，造成大量死亡与破坏，这就是“皇国日本”与“臣民”的关系。取而代之的“公”与“私”的关系，应该是怎么样的呢？分崩离析的“人与人之间的团结”应该在怎样的新原理下重构呢？某战死的学生兵遗稿中的这句“从废墟中创造新的日本”，是直面战败的许多人的共同心声。[107]

被称为“战后”的时代便从这里开始。

第二章 总体战与民主主义

政治学家丸山真男与经济学家大塚久雄是战后日本知识分子的代表。本章将着重考察二人在战争期间及战后初期的著作。[108]

从结果来说，他们的思想是目睹总体战体制瘫痪后构思出的新民族主义。通过考证他们的思想，可以再次考察战后思想背景的特性。

“爱国”的“民主主义”

与法国、韩国不同，战败后流亡海外的日本人回到日本后没能组建新政权。大多数战后当政者与知识分子曾在战前及战争期间十分活跃，因而（对他们来说）思想意识的转换绝非易事。

因此，战后思想的摸索，在从国外引进新的语言体系之前，就已经从重新解读战时语言体系并为其赋予新意义开始。此时，成为战后民主主义基础的就是总体战思想。

例如，在1945年9月5日战败后首次召集的众议院会议上，后来担任首相的芦田均提交了题为《追究将大东亚战争引向不利终结的原因与责任》的长篇质询书。[109] 芦田当时指出战败的原因是“官僚统制的失败”。也就是说“官僚的独善其身与腐败招致官僚与民众背离”，又因言论统制“封闭了由心忧天下而产生的政策批评”，使得“民众对所有公事都漠不关心”，“大多数民众陷入阳奉阴违”的状态。

同时需要注意的是，芦田在质询书中提出：“近代总体战要想取得胜利，就必须使每一位国民感受到战争的责任。如果国民认为战争仅仅是军部及政府的战争，那近代的战争首先在这一点上就已经失败了。”他同时主张撤销统制，使言论自由化。也就是说芦田在总体战思想的延伸线上提出了民主化。

持有这一论调的不只是芦田一人。陆军中将石原莞尔在1945年8月

28日刊登的报纸访谈中说道："眼前的首要任务就是打倒官僚专制，如果说这就是'民主主义'的话，日本应该是世界上最好的'民主主义'国家。"他还提倡废止特高警察，让政党活动自由化。他指出，"军阀与官僚束缚并抹杀了言论及结社自由"，因而"在国民潜力还没有得到发挥的情况下战争就结束了"。[110]

这种论调在当时并不鲜见。例如，1945年8月20日，妇女运动家市川房枝向报社投稿，她认为，"在大东亚战争下组成的妇女会，都被置于军人、官僚的指导下，妇女的自主行动完全被封杀"，"因而阻碍了其总体力量的发挥"。京都学派的哲学家高山岩男也认为，战时体制"阻碍了人民的自主性与创造性，反而阻碍了总体战的完成"。作家吉川英治也在1945年8月23日的报纸上提出，"我们日本人没有完全发挥出潜力"；"报纸言论的方向也应该让国民知道该知道的东西，让国民议论该议论的东西，就好像让地下水喷涌一样，应该发挥日本人所拥有的真正强大力量"。[111]

事实上，即便是当时的首相、昭和天皇的叔父东久迩稔彦也抱有同样的看法。东久迩稔彦内阁虽然成立于1945年8月17日，但除了解除军队武装外没有着手任何改革。同年10月，占领军命令他们释放政治犯并开除警察干部，内阁收到该命令后深受打击而集体辞职，毫无建树。但是，这位皇族首相也在1945年8月28日的记者招待会上说，"国民完全被束缚，什么都不能做是战败的一个相当大的原因"，进而提出了"将来应该让言论更加活跃，并发展健全的结社"这一方针。[112]

这些论调在1945年8月下旬至9月初，也就是占领军发布指示以前就已经出现。也就是说，"战后民主主义"在从美国"引进"之前，就出现在总体战思想的延伸线上。

进一步说，这种思想不是战败后突然出现的。例如，1944年7月作家石川达三向《每日新闻》所投《活跃言论，允许公开批判，民意方可

高涨》一文中强调，“压制批判就无法鼓舞斗志”，“不信赖国民何谈总体战”。

当然就当时的状况来看，这种主张属于建设性批评，是对政府及军部最大限度的抵抗。评论家清泽洌在日记中引用石川的文章，评价“这是现在能够说的最大限度的表达”。[113]

但是，这种论调既是对战时体制的批判，也是对合理进行总体战的一种表达。正如竹内好晚年所说，“抵抗与屈服”其实是“一层窗户纸”的关系。[114]

同时，如前所述战后初期的论调，无论哪种都强调“国民的潜力”还没有完全发挥战争就结束了。这些论调是直面战败打击的人们所采取的一种心理防卫机制。可以说，对民主化的渴望与这种民族主义是一体两面。

此外，这种民族主义也与重建因战争而瓦解的“国民道义”这一主张相辅相成。东久迩、石原、高山等都列举战时黑市经济与“官员的不负责任”，主张“战败的原因是道义的败坏”，从而提倡“一亿总忏悔是重建我国的第一步”。[115]

“一亿总忏悔”因东久迩首相在前述记者招待会上提出而闻名于世。当然，这句话并不意味着他们是就日本的侵略向联合国及亚洲国家谢罪。他们只是用此来表达战败的屈辱感，从“道义的败坏”中寻找战败原因。

事实上，“没有道义就没有胜利”其实也是战时日本政府高喊“解放大东亚”的标语之一。高喊“道义”的战争以战败结束时，人们在战时语言的延伸线上，又高呼“战败的原因是道义的败坏”。

但是，尽管所用语言是战时的延伸，但所表现出的心情并不是想回

归战前或战时。相反，它与批判战争呈现出的旧“道义”、摸索新“道义”这一主张有内在的一致性。

例如，作家坂口安吾于1946年12月发表的《堕落论续》一文中，提出要从充满“‘健全道义’的天皇制、武士道、艰苦朴素精神这些所谓的封建遗留结构中解脱出来，赤身裸体地降落到真理的大地上”。而这就像他主张的“堕落本身毫无意义，是不好的”、“我虽然呼吁日本堕落，事实上意思完全相反”一样，并不是否定“道义”本身，而是在摸索新的“道义”。[116]

重建的“道义”不能采取“灭私奉公”的形式，而必须建立在个人的自觉与责任意识之上。伦理学家天野贞祐在1946年的演讲中强调，“个人责任感不强的人容易陷入自私主义”。[117] 因为他们认为战争的教训是：“灭私奉公”使自私自利与不作为蔓延开来。

就这样，“战后民主主义”在总体战思想的延伸线上，始于摸索新道义与新民族主义，而这种思潮的代表性人物就是丸山真男。

对“近代”的重新评价

论述丸山等人的战后思想必须从分析他们的战时思想开始。

首先必须确认的是，丸山对“近代”的评价在战争前后发生了变化。丸山战后提倡近代化，1936年却写过批判“近代”的文章。当时丸山还只是一名22岁的大学生，在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学生团体“绿会”举办的有奖征文活动中，他的《政治学里的国家概念》一文认为“近代思维”很“无力”。在这篇文章里，他如此描述国家：

> 我们所追求的，既不是建立在个人或国家的这种选择上的个人主义国家观，也不是个人埋没于集体的中世纪团体主义，更不是将两者进行折中的法西斯国家观。[118]

这里丸山所批判的“个人主义国家观”是指“个人”与“国家”相互对立的自由主义国家观，他称之为“市民的国家观”。对于当时的丸山来说，这是应该被批判的“近代思维”。

然而，该主张并不是由丸山独创，而只是当时很流行的思想。因为当时的知识分子对黑格尔、马克思的“近代”批判耳熟能详。

根据黑格尔的理论，历史的进展，从人们生活于村落或行会等共同体的中世纪开始，向“个人”取得自由的近代社会发展。该近代市民社会汇集追求个人利益的“市民”。这样，国家就被看作压制个人的东西，于是产生批判国家干涉的自由主义思想。丸山所谓的“个人主义国家观”或“市民的国家观”的“近代思维”也是这类思想。

但在近代市民社会中，人类四分五裂，相互间斗争不断。于是，贫富差距逐渐拉大，况且，不说在斗争中失败的弱者，就连在斗争中胜利的强者也没有被赋予伦理基础。黑格尔的基本观点就是，近代市民社会终将被国家这一更高阶段扬弃。

秉承这种历史观的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也认为，人类从生活于共同体的中世纪社会进入到个人四分五裂的近代市民社会。但是，马克思主义将近代市民社会看作以资产阶级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只是形式上的自由，不是实际上的自由。并且，他认为共产主义社会是比近代市民社会还要高的阶段。

也就是说，无论是黑格尔思想还是马克思主义，都对“近代”与“市民社会”持批判态度。尤其是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大家都认为自由主义经济已经穷途末路。同时，当时流行的帝国主义论认为，资本主义在末期，分为两大阵营。其一是基于古典自由主义的近代市民社会崩溃，与法西斯结合的垄断资本；其二即是基于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阵营。

丸山在1936年所批判的“近代思维”与“市民的国家观”便是基于这种思想潮流。丸山的父亲是一名新闻记者，于是他对1930年代的农业危机抱有浓厚兴趣，1934年升入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后曾积极阅读当时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们撰写的《日本资本主义发达史讲座》。同时，1933年他因出席唯物论研究会创立纪念演讲会而被检举，之后也被特高警察与宪兵监视。

丸山后来回忆，学生时代的他曾就1936年的文章“傲慢地说：‘如果有用的话，就可以保存在研究室。这是关于国家学的一种人民战线。’”。[119] 也因时局紧张，文章中虽然没有露骨地使用马克思主义用语，但只要读过就会明白丸山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尽管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教授南原繁自己对马克思主义持批判态度，但他知道丸山的思想倾向之后仍然聘他为助手，并且之后在法学部内保护丸山。也正因如此，丸山对南原一直很尊敬。

但1946年1月从军队复员后，丸山发表了题为《近代思维》的文章。在文中，其观点突然一变，提倡将“近代思维”扎根于日本。

不用说，让丸山发生转变的一个原因，就是他痛感战时日本近代化根基浅薄。他在这篇文章里强调：“在我国，近代思维不仅没有‘超克’，甚至没有真正获得过。”[120]

而另一个原因是他对战时言论的反感。这里所用到的“超克”一词是对战时知识分子流行语“近代的超克”的一种讽刺。1930年代流行的批判“近代”，最终被用来赞美战争，日美开战后以“近代的超克”或“世界史的哲学”的名义召开了座谈会。其内容当然是批判“自由主义”、“个人主义”、“西方近代”，将统制经济与“大东亚共荣圈”赞美为超越自由主义经济或近代合理主义的东西。

《近代思维》强烈批判了这种知识分子的论调。丸山写道：

> ……近代性精神之类的东西臭名昭著，宛如现代诸恶之根源……只有“超克”才是问题，这些论调在我所尊敬的学者、文学家、评论家之间占统治地位的这几年，与我们从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元帅那里受到的近代文明启蒙相比，就不由得发出交织着悲惨与滑稽的感慨。我们这些缺乏夏目漱石所谓“内发性”文化的知识分子，心中总是怀有一种从时间上来说后来登场的人比之前出现的人都具有进步性这类庸俗历史主义的幻想，于是在法西斯主义的“世界史”意义前低眉垂首。因此，尤其是现在在理应被超克了的民主主义理念的“世界史”胜利面前感到彷徨。终于，哲学家们开始对“历史的必然”高声聒噪。然而，这种“历史哲学”从来没有推动历史前进。[121]

这些文字可以看作批判“近代”的“世界史哲学”及马克思主义等与“历史哲学”的诀别宣言。同时，也是丸山对曾追随1930年代的流行批判“近代”的自己的一种自我批判。丸山在晚年回想自己因战前被灌输“近代”批判，战后却礼赞“无产阶级民主主义”，感到实在是“太过羞臊”。尽管如此，他依旧基于自己的战争体验，认为“近代的超克”等只不过是对日本社会现实一无所知的观念上的抢先而已。

战后丸山重新评价“近代”，与日本共产党及马克思主义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过，他欢迎恢复日本共产党，反对镇压日本共产党。他也有过被特高警察监视的体验，因而将言论的自由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1976年，丸山评价1936年的“近代”批判是“幼稚的学生论文”，同1946年的《近代思维》一起收录到单行本。他将理由归结为：“我想明白地告诉别人自己是以什么样的思考也就是‘前提’而开始研究生活的。”[122]

在第六章及第Ⅲ部中将要提及，丸山在战败后声名鹊起的同时，也被战后初期的日本共产党及60年代的新左翼批判为赞美西方近代的“近代主义者”。或许，他就是为了表明自己不是单纯的“近代主义者”，才将作为自己思想履历的学生时代的论文公之于众。1970年以后，尽管法国现代思想的近代批判论已经被介绍到日本，丸山对此却显得漠不关心。

丸山虽然重新评价了“近代”，却没有返回到“个人主义国家观”。他的思想主张从战时开始就一直在“个人还是国家”的选择之间徘徊。

“国民主义”的思想

1943年10月，日本对文科大学生开始实施学生从军制度。庆应义塾大学的《三田新闻》为此编写了福泽谕吉的特辑。当时29岁的丸山已成为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的副教授，他特意为《三田新闻》撰写了《福泽的秩序与人》一文。

丸山从当时各界对福泽的不同评价写起。当时对福泽的一种评价是批评他是受西方思想影响的“个人主义者”。而另一种则赞扬他是提倡重返亚洲的“民族主义者”。

而丸山认为，“福泽既不是单纯的个人主义者，也不是单纯的民族主义者”，更不是个人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折中，而是“地道的个人主义者恰恰是民族主义者”。[123]

丸山认为，对以主张“一国之独立基于一身之独立”的福泽来说，“如果没有个人的自主性，就不可能有国家的独立”。每个国民拥有责任意识，“如果不将国家看作自己的，并切身体会，不将国家的动向看作自己命运的话，怎能在残酷的国际环境中保持独立性呢”。[124]

要想形成这种责任意识，必须“让那些到现在为止对政治秩序只是单纯被动服从的国民大众，认识到自己作为国家一员的主体能动性”。丸山接着说道：

> 对于那些将秩序看作外界所给予的东西而接受的人，要想将其转换为主动参与秩序的人，必须以个人的主体自由为契机。……福泽认为我国的传统国民意识里，最欠缺的就是自主的人格精神。他指出我国的社会弊病——例如，道德法律经常作为外部的权威而被强行实施，一边是严格的教

> 法，一边是没有羞耻的意识。若批判精神的积极意义不被认可的话，一方的权利越来越缩小，而另一方批判的声音也越来越小乃至逐渐消失，最后使自己成为完全的旁观者。也就是所谓的官尊民卑，官僚内部的权力向下“膨胀”，向上“收缩”。……这些现象无一例外都昭示着自主人格精神的欠缺。[125]

我想大家都明白这一观点诞生于什么样的时代背景。这一时期，过度统制已经使得“自主人格”萎缩，总体战体制进入瘫痪状态。丸山在这一背景下，开始重新评价“个人”。在此他提倡的，不是个人与国家对立的“个人主义国家观”，而是拥有“主体”责任意识的人能够主动参与到国家政治中，也就是“地道的个人主义者恰恰是民族主义者”。

但当时，这种主张也被禁止。丸山通过论述福泽对封建时代的批判来批判当时的状况。揣测到丸山意图的年轻人中，有人写下这样的感想：“读完那篇文章后流泪了”，“丸山是拼了自己的性命写出来的”。[126]

丸山的主张不仅是对政府和军部的反抗，也是如芦田均在议会上所说“由心忧天下而产生的政策批判”。如前所述，对当时的知识分子来说，“抵抗”与“屈服”，或者借用丸山晚年的话“忠诚”与“叛逆”，原本就是一体两面。

同时，丸山的观点与芦田所说“近代总体战中要想取得优势，就必须让每一个国民感到对战争的责任”意思相同。也就是说丸山的思想并不特殊，只是表达了当时人们所共有的心情。

丸山的这种思想在写于1944年7月的文章《国民主义理论的形成》中再次展开。这篇文章的写作正值丸山被征召，他以此文作为遗书于入伍当天早上写成。

1944年7月塞班岛失守，此时被征召入伍就意味着死亡。丸山参军后驻屯在朝鲜步兵连队里，之后他因病退伍，而他所属的连队在菲律宾

战场全部战死。身体痊愈后被重新征召的丸山被送往广岛陆军船舶司令部，之后经历原子弹爆炸活着回来了。因此，形容这篇文章是作为遗书而写并不夸张。

这篇文章的开头为：

> 都说所谓的国民是想当国民的人。属于一个国家共同体，拥有共同的政治制度这一客观事实，还不足以成为近代意义上的“国民”。充其量是人民或国家从属人员，而不是“国民”（nation）。……承担近代国民国家的恰恰是在这个意义上的国民意识。[127]

近代的“国民”（nation）或“国民国家”不是建立在语言与文化的相似性上，而是以“主动”参与国家政治的“国民意识”为基础。丸山的任务就是把由“国民主义”支撑的“近代国民国家的形成”传入日本。[128]

丸山在这篇文章中，为与“民族主义”区分，而采用了“国民主义”一词。他认为，“民族主义”一词“经常被作为个人主义的反义词使用，这样不妥”。[129] 当然，“民族主义”就如他评价福泽一样，“地道的个人主义者恰恰是民族主义者”。

这篇《国民主义理论的形成》同前述的福泽论一样，借批判江户时代来批判战时日本社会。丸山对幕府后期的状况做了如下描写。

江户的封建体制下，政治是武士的专业，“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世界被明确划分”。被统治者也就是农民与商人的社会义务，就只是向统治者即武士缴纳租税而已，“他们没有必要承担对国家社会的关心与责任”。[130]

因此，农民与商人永远停留在“对政治不关心和无责任的安逸世界”，尤其是商人，“完全没有公共义务的意识，一味追求蝇头小利”。这些商人对政治毫不关心，“逃避到官能享乐世界，在这些‘花街柳巷’的

黑暗角落，呼吸着短暂的个人自由，或者对现实政治的支配关系投去扭曲的嘲笑”。[131]

丸山写这篇文章时，在黑市交易中发战争财的商人不在少数。应该批判这种现象的知识分子因为被禁止建设性的批判，也只能对时局投去“扭曲的嘲笑”。

那么，统治者武士又怎么样呢？丸山在这篇文章中认为“国民主义”在武士阶层也没有得以确立。

在封建体制内，人们被“士农工商”的身份与所谓的“藩”这种地域所隔开。即便有“萨摩的武士”或“水户的农民”这种意识，也没有超越身份与地方的“国民”意识。武士的忠诚对象不是“日本”，而是藩主，大家只考虑各个藩的利害。

结果就是，“纵向的身份隔离与横向的区域隔离纠缠在一起，酿造出特有的本位主义”。在武士的主从关系中，“其责任意识主要是以直接的主人为对象”，“他们所谓奉公的‘公’也只是由俸禄而缔结的个人关系而已”。也就是说，对于武士的“公”，也只是藩的利益与对上级的忠诚而已。丸山的这些描述是以怎样的战时状况为背景的恐怕不需要过多说明了。

但丸山认为，这种封建体制也有可取之处，那就是统治的稳定。丸山认为，江户幕府的军事力量并不大，但庶民对政治不关心反过来意味着他们都是顺从的民众。农民也好，商人也罢，只要不向他们开征过重的税金，他们就不会反抗幕府。

再者，在封建体制中，丸山命名为“间接支配”、“分割支配”的统治手段也起了作用。江户幕府对个人不实施直接统治，只要让各地的藩主或村里的乡绅配合，“间接支配”就得以成立。并且，让藩与村互相牵制

的话，大规模的反政府活动无法进行，这样就发挥了“分割支配”的效果。[132]

这样，幕府便在“压抑国民自发政治意向的同时，巧妙利用封建割据滋生的猜疑使其相互监视与牵制”。另外，“如此一来，国民规模的监察组织便取得漂亮的成绩”，“有可能成长为政治反对派的恐怖社会思想动向也被扼杀在摇篮里”。[133] 当然，这同街道居民会与邻组这种军队化组织的战时社会状况很相似。

这种政治体制确实使秩序稳定。但是，“因为服从了这种支配方式，国民精神遭受了怎样的腐蚀呢？”“如此蔓延开的是国民之间的相互不信任，好汉不吃眼前亏的明哲保身，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自私自利。”这样，“封建掌权者喝下自己酿造的苦酒的时候到了”。[134] 那就是“黑船”的到来。

“黑船”[135] 到来时，封建体制根本不适合总体战。幕府慌忙下令备战，但“无法掩盖国内的生产力及技术低下”，长期实施的锁国政策使得“幕府依旧坚持不让国民盲目学习外国的事物”，“以我们的‘神国技能’长枪剑便可抗拒他们的战舰枪炮”——类似的攘夷论泛滥。甚至“为了防止最不幸的事情发生，鉴于国内相互不信任和猜忌已经十分严重”，幕府惧怕体制动摇而发生叛乱，在思想上镇压表达对外政策意见的知识分子。[136]

首先，由“上层对国民的不信任及下层对政治的不关心”而产生的“国民责任意识”的缺失，是进行战争的巨大障碍。幕府不告诉庶民真实信息，庶民认为政治是武士的事情而毫不关心。长州藩的炮台被欧美四国联合舰队占领时，长州的百姓不仅没有对战争显示出任何关心，甚至被欧美人雇用帮忙进行拆除炮台的工作，丸山形容此为“封建统治关系招致的可怜现实”。[137]

丸山1952年将这篇文章收入单行本时写道：“我对克罗齐的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所包含的本质性真理给予肯定，但另一方面，对历史的实证考察会直接因具体的政治主张而被歪曲的危险性具有神经质反应，尤其是当时在历史叙述的美名下奇怪的国体史观泛滥，因而强烈反对这种观点。但通过写这篇论文，我不得不重新意识到历史意识与危机意识之间存在深刻的内在联系。”[138] 由此可见，丸山充分认识到自己文章的特点。

丸山在文章中提出了幕府末期的两大任务，即克服“封建社会的多元分裂”与“将国民从以往对国家秩序毫无责任的被动依赖状态中解脱出来，对其进行政治动员”。作为史学论文，明治维新是否解决了这两大任务是问题的关键，但丸山在这篇文章中并没有过多提及明治之后。虽说是因为入伍而没有时间写，但在当时的状况下，即便执笔，发表直接批判近代日本的文章应该很困难。

丸山1946年10月的演讲《明治国家的思想》中涉及该问题。在他的演讲中，明治初期自由民权运动[139] 也好，政府也罢，都认识到“民权”与“国权”密不可分。但从明治中期开始，政府倾向于“由上而下的官僚民族主义”，以甲午战争为契机，帝国主义思想开始风靡；另一方面，出现了“与近代个人主义不同的，逃避非政治个人主义、逃避政治或国家的个人主义”。[140]

同时，在1951年的论文《日本的民族主义》中，丸山立足于社会结构问题论述了同一问题。该文认为，明治维新是由以下级武士为首的封建体制统治阶层完成的，因此改革并没有完全瓦解他们自身的利益基础，实施得并不彻底。这种历史观，与他在学生时代熟读的《日本资本主义发达史讲座》的作者——通称“讲座派”——的明治维新观有相通之处。

因此，明治维新后的日本，针对地方实力派的改革，也就是推进农

村、小企业的现代化并不容易开展。政府不仅没有注意到这些“前期”状态的改革，还拉拢这些中间共同体的实力派，构建出江户时代“间接支配”变相延长的体制。拥有从军经历的丸山，将这些农村与小企业的实力派称为社会的“下士官”。[141]

因此，明治以后，中间团体的本位主义没有得到清除，导致近代“国民主义”无法形成。战前的爱国主义教育只不过大量生产了“万事交给‘上面’，将选择方向全部交给权威去决断的忠实卑屈的仆从，来代替承担政治责任的近代公民”。[142]

这种体制所能支撑的极限是总体战。作为支配基础的“下士官”，比起国家整体命运，更关心自己所支配的中间集团的利益。丸山在《日本的民族主义》一文里写道：

> 由日本民族主义“前期性”特征而导致的负面影响——像最近这样战争进入到总体战阶段，使得国民生活的全面组织化成为必须——同高呼的口号成反比而暴露出来。人们只要想起强制疏散计划的实施与劳动力的征用配置、工业生产力的扩充是如何受到由家族主义、“农本”思想、“热爱故乡”所产生的根深蒂固的心理抵抗就足够了。……这些都是日本帝国的支配阶层怠慢了民族主义的合理化，反而热衷于利用其非合理的起源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他们在国家总动员的阶段第一次意识到代价过高时，为时已晚。[143]

总体战体制与天皇制相互矛盾，双方陷入瓦解模式的过程后来被丸山的弟子藤田省三勾勒出来。[144]

丸山1952年回忆当初写作江户时代论时写道：“不论怎样坚如磐石的体制，其自身内部都有崩溃的必然性……实证这一必然性……夸张地说其实是灵魂的救赎。”[145] 在一切反体制运动被扼杀的当时，总体战体制自身拥有瓦解超国家主义的“内在必然性”这一设想，对丸山来说是一种“救赎”。

另外，这一设想，让人对通过发展经济使既有社会体制成为枷锁的马克思主义的主张，以及“战争转化为革命”这一列宁主义思想怀有亲近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与俄国产生了总体战转化为革命这一现象。

如在之后的章节里将要描述的，许多知识分子期待这种情况也能发生在日本。将在第十六章论及的鹤见俊辅等人预测，空袭与饥饿造成的混乱一旦扩大，被吸收进翼赞体制的社会主义者将变成领导，并以邻组为单位发生革命。[146]

但是，为使总体战能合理进行，批判乡土意识与家族制度的论调，在战争期间也很盛行。例如，1945年4月11日刊登在《朝日新闻》的文章批判了反对统制经济的“囤积居奇、大量购买”，形容“大东亚战争暴露了‘小家’的缺点”。这一时期写下很多赞美战争文章的高群逸枝也站在同样的立场上批判“小家”。[147]

战时不少人期待现行体制瓦解的“叛逆”心情，与为实行总体战进行建设性批评的“忠诚”心情，以一体两面的形式同时存在。因此，与其说丸山是一位特别的思想家，不如说他是将这种相反的心情用社会科学的语言巧妙表现出来的人物。

丸山在表达这种心情时，作为媒介而使用的“近代国民国家”、“国民主义”概念，并不是他所独创，而只是运用了欧洲政治思想的常识性知识。

在欧洲政治思想中，近代国民国家的原理据说是因法国革命而成立。超越身份、地方的“国民”意识，只有通过否定建立在身份制度与藩阀制度上的封建体制，将“近代个人”从村落、行会等封建共同体中解放出来才能成立。这样，独立的近代个人将超越对藩主、君主的忠诚，成为爱国心的旗手。以这种状态为目标的，就是打倒处于身份制度顶端的

国王的法国革命。

专攻政治思想史的丸山，当然对这些思想了如指掌。他在《日本的民族主义》一文中，论述了作为“法国革命之子”的“近代民族主义”，引用法国知识分子厄内斯特·勒南的名言“民族的存在就在于每日的公民投票”。另外，1946年，在英国、美国提倡“从国家而来的自由”这一思想流行之时，丸山认为：“在德国与法国，民族主义是自由主义的双胞胎这一认识已成为国民常识，并且被法国革命与解放战争的历史事实所清晰印证。”[148]

但应该注意的是，即便国民国家的理念是欧洲政治思想的常识，将其作为表现心情的手段也是丸山有意识的选择。

丸山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关注国民国家的理念。1936年在批判近代的文章中，丸山只是将“个人主义的国家观”与“法西斯国家观”列举为近代以后的国家观。虽然1938年丸山撰写了探讨“民主的国民主义”的欧洲政治学研究著作的书评，但其叙述非常简单，并没有特别予以重视。[149]

丸山也曾对福泽谕吉及江户思想漠不关心。丸山最初希望研究欧洲政治思想史，对日本思想毫不关心。但当国粹主义高涨之时，文部省指示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开设日本思想课程，本科优等生丸山作为负责人被聘为助手，由此他才开始研究日本思想。

之后的丸山渐渐投入对于福泽谕吉与江户思想的研究，但到日美开战之前，还没有将“国民主义”引入日本思想史的倾向。他从1941年春开始，将以江户思想为主题的论文《近世日本政治思想的“自然”与“作为”》连载于《国家学会杂志》，当初的主要课题放在从江户思想中也能看出欧洲政治思想中的“虚构秩序的人类”的诞生，并没有关注“国民主义”。

但日美开战后，1942年8月发表的该论文连载的最后一篇，在论述幕府末期时，丸山认为，“国民对自己构成之秩序没有主体的自觉，只是在给予的秩序里‘听天由命’的话，无法期待其牢固地防御外敌”。[150]在战况急迫、时代危机高涨的战争后期，丸山又撰写了以“国民主义”理念为中心的论文。[151]

另外，必须指出的是，战时流行的思想中也包含对近代国家的批判。在广受学生兵喜爱的《世界史的立场与日本》中，与“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人类中心主义”一起，“近代国家”与“民族主义”也是京都学派哲学家批判的对象。

《世界史的立场与日本》认为，“近代欧洲最大的病根”在于“以似乎成熟的人格或者民族为前提出发的”“个体主义的思想”。与近代市民社会重视“个人”相同，近代国家或近代民族主义也将各个民族或国家看作一个“个体”。从这种思想中产生出重视个人自由的市民社会与以民族自决为原则的国际联盟。然而，那只是导致在市民社会中资本家的胜利，在国际社会中英国的殖民地支配。因此，挑战西方“近代”的日本，承担着扬弃这种近代市民社会与近代国家的世界史作用。于国内，应建设超越个人的统制经济；于国际，应建设超越近代国家的“大东亚共荣圈”。[152]

也就是说近代国民国家的理念，就如丸山于1946年《近代思维》一文中提到的那样，被战时的言论界认为是“一切丑恶的根源”。丸山自己即便早已知晓该理念，事实上也一直无视它。但在战争这一危机下，他无视言论界的流行思想，特意对其进行重新评价。

当然，该理念并不是丸山所独创，也不是当时的最新思想，而只是欧洲思想史的常识而已。但丸山1947年发表的《福泽谕吉的哲学》一文中写道：

> 对福泽的印象，长期以来的见解是将其视为欧洲文明的介绍者，他的思想只是将欧美学者的著述翻译过来，因而否定他的独创性。……如果说独创性是不受任何前人思想的彻底影响而构建自己思想体系的话，福泽终究不能算作独创性的思想家。但是，到底有几个思想家或哲学家可以在这个意义上称得上独创性呢？是一个独立的思想家，还是一个只是介绍他人学说的单纯介绍者或者解说者，并不是根据他的思想或学说的影响大小而定，相反倒不如说是根据他多大程度将这个影响主动引入自己的思想中而定。从这个意义上说，福泽的思想和哲学毫无疑问是他自身的。[153]

在这一基础上，丸山的"国民主义"也是"丸山自己的"。1930年代之前的丸山，只是追随当时流行批判近代的聪明的优等生而已。战时，当不得不关注"国民主义"这一问题时，作为战后知识分子的丸山才得以诞生。

"超国家主义"与"国民主义"

战败后从广岛复员归来的丸山，在1946年5月号的《世界》杂志上发表了《超国家主义的逻辑和心理》。"超国家主义"一词，是丸山为将他所提倡之"国民主义"与战时支配日本的思想区分开而创造出来的。

以该论文为开端所展开的丸山对"超国家主义"的分析，是其战时思想的延伸。也就是说在日本社会里，拥有"自由主体意识"的个人并不存在，因此也没有自然发生的责任意识。在日本社会中，当政者也只不过是受"无责任体系"支配，是一群缺乏责任意识的"陛下的仆役"或"下属的机器人"。与此同时，各地都发生过将上级施加的压力发泄到下属身上的"压抑转移"。投射到国际关系中便是，将来自欧美帝国主义的压迫，通过侵略亚洲来进行发泄。

再者，日本社会中由于没有确立近代的"私"，"私"与"公"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由此产生的是借助"公"的名义介入私生活，借助"公"的名义追逐私利。另外，近代的政教分离没有确立，最高权力者天皇同时

也是伦理中心，“与天皇的距离”既是政治地位，也是伦理评价的基准。

这种分析与当时日本流行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性质不同，源自丸山自己的战争体验。因此，像第六章将要提到的那样，即便被日本共产党周围批判为“近代主义”，丸山也认为“引起这样广泛的反响自己都很吃惊”。[154]

由于战时极度的言论统制与纸张不足，普通出版物消失以后，人们对自由言论非常渴求。并且刚刚经历战败的人们，都在寻求一种能表达给自己带来了苦痛与屈辱的战争体验的文字。战败时还是中学一年级学生的小田实回忆道：“无论是谁，老人也好，年轻人也罢，都愿意读艰深的书。”[155] 1947年7月，岩波书店出售《西田几多郎全集》第1卷时，大约1500人三天前就在书店门前排成长队，睡在路边等待购买。

一方面，当时粮食极度缺乏，城市基础设施大部分都遭到破坏。因为到农村购买粮食，交通极度拥挤，邮件时有丢失。评论家本多秋五回忆刚战败时的情形描述道：“黑市、通货膨胀、剥笋生活[156]，汽车、电车拥挤得要命，电话不通，包裹不知所踪，每晚都停电。另一方面，当时确实是‘高级文化’的时代，但是所谓的‘高级文化’也是因为社会生活的基础被彻底破坏掉了而已。不管愿不愿意，生活与文化的意义都从根本上被重新审视、重新考虑了。”[157]

1948年3月7日《朝日新闻》所载《大学教授在挨饿》一文这样写道：“我是某国立大学的学生，最近教授们面有菜色，精神萎靡，问明情况后我很吃惊。几乎所有教授都营养不良，某副教授已经离世……即便是校长，税后到手的也只有三千日元，购买配给品应该也不够吧。……经历了两次战乱的某教授虽然身无分文，身着从友人处借来的不太合身的衣服，但洋洋得意地站在讲台上。感觉那些面色苍白、热情演讲的教授就好像是修行者。”[158] 当然也有例外，不过同其他大多数人一样，大学教授的生活也很艰难。丸山战败后一段时间与四户人家居住在

一个屋里，出门穿的是复员时的军装。

在这种状况下，不依赖既有的马克思主义模式，彻底分析日本社会现状的丸山论文《超国家主义的逻辑和心理》尤其受到前学生兵的喜爱。读者们都说："就像擦亮了眼睛似的，感受到冲击与战栗"，"感到大日本帝国的精神已在轰然崩塌"。刊载该文的《世界》杂志立刻售罄，年轻人争相传阅。晚年成为政治评论家的藤原弘达从中国复员后，从朋友处借得一晚《世界》，将丸山的论文彻夜誊写到笔记本上，"反复阅读"。[159]

就这样，一举受到言论界注目的丸山，提倡确立"个人"、"主体性"的同时，也倡导建设"国民主义"。其模型便是明治初期的福泽谕吉与陆羯南，以及自由民权运动。他在1946年的演讲中，认为"与之后的大正、昭和时代相比，明治国家确实拥有不太相同的东西，即便在中途偏离了本来的方向，也没有失去健康的进步精神"。1947年他写道："我们现在重新站在完成明治维新时应该履行而没有成功的民主主义革命这一任务面前。"[160]

并且，他在1947年的《陆羯南——人与思想》一文中写道：

> 羯南的日本主义是……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的结合。不管那是如何的不彻底，也是对日本近代化方向本质性的正确预测。……不幸的是，日本过去失败于这个结合。从福泽谕吉到陆羯南的国民主义，其最初的孱弱动向最终被吸收进由上而下的国家主义的强有力支配中。因此，由下而上的运动不得不带有国家主义抑或世界市民色彩。正是脱离了狭隘民族主义长期支配的现在，才必须将正确的民族主义、正确的国民主义运动与民主主义革命结合起来。[161]

当然，这里所说的"国民"并不是法国大革命时确立的"国民"。丸山在这篇论述陆羯南的文章中认为，"如果这一国民观念包含君主、贵族、僧侣的话，这个称呼简直荒谬至极"，批评陆羯南将"国民"作为"单

纯的军民的综合名称”。[162]

同时，上述引文中既包含对“正确国民主义”的褒奖，也包含对“世界市民”的批判。丸山1946年的论述中也批判了“世界市民的离心倾向——这一来自国家的自由”。[163]

另外，这种“世界市民观”为当时的知识分子所共有。在黑格尔的历史观中，古希腊城邦作为融个人与国家于一体的理想共同体，常常被赞赏。当古希腊城邦灭亡后，在古希腊文明与罗马帝国时代，从国家政治中逃避的“世界市民”得以诞生。这种“世界市民”的典型被认为是受帝王保护的同时超越国境追求利益的商人。

如前所述，马克思主义批判了“近代”与“市民社会”。因此如第五章将要论及的那样，战后初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将“市民”看作资产阶级的代名词，将“世界市民”看作穿越国境追求利益的跨国企业的资本家。在第Ⅱ部将要提及，进步知识分子将“市民”一词作为肯定意义使用始于1960年安保斗争前后。[164]

1947年，丸山以“世界市民”一词作为对政治毫不关心或利己主义的同义词来使用，这也是遵循当时的言论结构。丸山与马克思主义保持一定距离，虽然他是由自己的战争体验而重新评价“近代”的特有思想，却不得不说当时的他尚在同时代的言论体系之内。而丸山1944年论述江户时代时，指责那些不顾幕府末期的“国难”，“与舶来的外国船只积极进行秘密交易”的商人，认为他们有“为了利益不择手段的贱民习性”。[165]

根据丸山1951年的定位，明治时期的“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结合”失败后，日本的民族主义已经变成“由上而下的国家主义”。因此，“认真探讨这一国家的‘民主主义’运动，或劳动运动中诸如‘民族意识’或‘爱国心’的问题长期被忽视，相反，将民族主义逼到挑战世界主义的地步。也因此产生了民族主义的象征被统治阶层或反动分子独占的恶性循

环”。[166]

拥有这种思想的丸山，当然不会无条件地赞美西方。如前所述，1946年1月，他提出“在我国，近代思维不仅没有‘超克’，甚至没有真正获得过”，接着叙述道：

> 但另一方面，过去的日本完全没有近代思想的自然成长这一见解也未必妥当。对与这种“超克”论相反也就是所谓的“无缘”来说，现在被打垮的惨淡境遇是绝佳的温床，但那会使国民丧失自主思想力量的自信，其结果包含着回归到一切近代思想即西欧思想这种简单等式化的危险。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要阐明日本思想近代化的话，明治时代理应更加关注德川时代的思想史。[167]

卑躬屈膝与骄傲自大是一体两面，盲目追随西欧与盲目赞美日本也是一体两面。1947年，丸山说道：“我们的学界不是从自身的地盘与环境中寻求问题，而是热衷于追赶欧洲学界一时的主题或方法，这种倾向也造成了学术观念的偏离。”[168] 就这样，丸山一边批判战前战时的超国家主义，一边为寻求日本自然产生近代化的萌芽而研究江户思想。当然，这属于他自己的民族主义表现。

如前引用，丸山在1946年的《近代思维》中，批判了“夏目漱石所谓没有‘内发性’文化的知识分子”。他无论是在《超国家主义的逻辑和心理》一文中，还是在《明治国家的思想》一文中，论述“明治”时经常引用夏目漱石的文章。对夏目漱石的评价，既是对“明治”的赞赏，也是战后民族主义的一个标准，这一点将在第六章以后加以阐述。

本章开篇已经提到，由“我们日本人并没有完全发挥出潜力”这句话来提倡民主主义，同时主张民主化这一行为，在战后初期的日本颇为流行。这与从战争后期扩大的“真正的爱国”这一思想结合在一起。

在这一意义上，丸山的“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的结合”主张，正好将

当时人们所共有的心情用政治学语言表达出来。为自己心情代言的丸山著作受到欢迎也就十分自然了。

另外，用经济学语言发挥与丸山相同作用的是大塚久雄。

“近代人类型”的创造

与丸山因提出“超国家主义”或“无责任体系”等词一举成名一样，大塚久雄因提出“近代人类型”与“民族精神”等词而广为人知。大塚的思想经常被概括为：将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思想应用于日本，主张将西方式“近代人类型”扎根于日本。

但是，大塚的思想其实也源自总体战。从结论来讲，与丸山重视参与政治的自发性相比，大塚更重视经济生产的自发性。

大塚从德国社会政策派的经济学研究出发，1938年左右开始致力于研究韦伯。在韦伯的思想中尤其重视“经济伦理”（民族精神）的问题。[169]

大塚于黑市经济渐渐使总体战体制瘫痪的1943年发表了《经济伦理与生产力》一文。在该文中，他强调“应该被称作‘经济伦理’的东西在当下具有何等的意义”。[170] 但是，他所谓“经济伦理”的特征，并不是黑市交易等消费与流通上的问题，而是其作为“生产力”的问题。

在第一章中已经述及，当时的生产领域，由于过度统制与“超现实的精神主义”，劳动意愿下降。1944年7月，大塚发表《发扬最高度的“自发性”》一文，阐述了为提高生产力必须将劳动者的“‘自发性’与‘目的合理性’”内在化。[171]

为重整因过度统制与毫无意义的精神主义而瘫痪的总体战体制，需要劳动者的自发性与目的合理性。

这种对于自发性的重视，必然与重新评价“近代的个人”联系在一起。但这并不意味着赞赏单纯的个人主义与利己主义。如果是单纯利己心的话，当时就已经存在很多黑市经济或“额外收入”的方式。

另外，重新评价“近代的个人”有必要与当时的“近代的超克论”对照来看。当时许多经济学家认为，通过计划统制经济来超越以利己活动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才能扩大生产。大塚为对抗这些论调，重新评价“近代的个人”，就有必要阐明“近代的个人”不是无秩序的利己主义。

也就是说，大塚与丸山面临同样的课题。与丸山为克服“个人主义”与“灭私奉公”的对立而构想出“国民主义”一样，大塚为超越“利己的营利心”与“灭私奉公”的对立而寻求“经济伦理”。

针对这样的课题，大塚在1944年的文章中展开了两个讨论。

首先，大塚指出也有因利己的“营利心”使生产力提高的情况。例如英国资本主义在初期存在“‘营利心’的发挥与‘生产力’的提高成正比，相互促进的局面”。也就是说，“世界史的现阶段因批判近代西欧而将其逐渐超越，但不是说将其全部遗产毫无差别地舍弃”，为提高生产力而运用“资本主义精神”十分重要。[172]

但大塚同时强调，“‘资本主义精神’不能与单纯的个人利己主义的‘无责任’等同视之”。必要的是，我们应该从“近代西欧”经验中，“彻底抹杀‘营利’特征……并于高深的历史现实中，发展性地摄取其‘生产力’”。

正因如此，劳动者的“自发性”固然重要，但其“自发性”也必须包含某种“禁欲”。1944年7月，大塚在以“写于塞班岛激战报道声中”为结尾的《发挥最高度“自发性”》一文中强调：

> 另外，最后就以上提及的“自发性”想再补充一句。这里所说的“自发

性”绝不是人类感情上的欲望从所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并自由发挥的状态，即并不是指所谓的自由自在。……

真正的“自发性”正好相反，它与禁欲相结合，通过不断陶冶才能获得。根据必要的磨炼而锻炼出来。这种真正的“自发性”与“禁欲”相结合应该不需要过多解释吧。就好像“现在轮到我们”所描述的，最高度的“自发性”实际上与不间断的“禁欲”磨炼是一体两面的事实，众所周知。[173]

大塚的这种思想，到底是伪装的时局批判，还是倡导合理地实施总体战？后世对其评价并无定论。但与丸山一样，当时这两者可能无法泾渭分明地被划分开来。

大塚就这样试图勾勒出“自发性”与“禁欲”相糅合的“经济伦理”。并且作为一种表达方式，最适合的莫过于韦伯的思想。为什么呢？因为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阐述新教的禁欲伦理才是克服怠工或消费的诱惑，使推进劳动与生产的近代“资本主义精神”得以成立的学说。

同时，大塚的思想在当时并不特殊。比大塚论文发表早三个月的1944年4月，黑泽明导演的鼓舞斗志的电影《最美》上映。在美化被动员到光学兵工厂的女子挺身队员的这部电影中，志村乔扮演的所长向队员训话道：“没有人格的提高，就没有生产的提高！”女工们讨论“所长所说的责任感”，主动禁欲，自发努力提高生产。[174]

大塚战后的主张与战时相比并没有太大变化，唯一一点变化便是对“近代”的不同评价，这与丸山相同。

如前所述，在1944年7月的论文中，大塚说“世界史现在处于一边批判一边超越近代西欧的阶段”。但在1946年4月的论文《近代人类型的创出》中，他断言“我国民众”的类型是“近代‘以前’的”，认为“或许大多数知识分子在这两三年间，已经领教得腻烦了”。大塚的这种观点与他战争后期疏散在相模附近农村的经历息息相关，他认为那里的农民就是所

谓“近代‘以前’的”类型。

关于民族主义，战后大塚与丸山意见一致，认为不能将民族主义引向“黑暗的‘国家主义’方向，而该引向明亮的‘国民主义’方向，将国民的民族主义意识与内心的自由以及民主主义结合在一起”。[175]

另外，大塚在战时和战后都主张通过提高近代“经济伦理”来提高生产力，但必须是发展以“国民”为单位的“国民经济”，而不是追求个人的利益。[176] 他在1946年撰写的论文中，将“八十年战争”期间与西班牙军队通商的荷兰商人作为谋私利的象征加以批判。[177]

在大塚撰写批判荷兰商人的这篇论文时，有不少黑市商人通过与占领军勾结获得暴利。大塚批判这些商人“只考虑部分特权阶级与富裕阶层的利益，是无视‘国民福利’与‘民众富裕’的‘赤裸裸的自私’”。[178]

另外，大塚认为战后的民主化，只解除制度上的束缚还不够。因为，如果不培养“通过维持主动积极的社会秩序来促进公共福利”的人类精神，即便解除了制度上的束缚，也只会陷入毫无秩序的“自私自利的自由”里。[179]

大塚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他认为，作为“近代人类型”起源的清教徒，是“有纪律的士兵、诚实的商人、勤劳的工人”。而“近代人类型”的特征是“自发性、合理性、对社会连带性的自觉，以及贯穿其中的重视经济生活的现实态度”。[180] 大塚认为鲁滨逊·克鲁索及本杰明·富兰克林是“近代人类型”的典型。

第六章将要论述到，大塚的这些主张与丸山相同，都被日本共产党痛批为“近代主义”，刚战败时却受到一般读者的热烈欢迎。当时，混乱的价值观与恶化的治安成为社会问题，感叹“道德”滑坡的论调不胜枚举，但大部分只停留在指出道德滑坡依然如故。大塚却提出，精神的近

代化不仅能恢复道德，而且可以同时达成经济复兴与政治民主化。两者相比较，我们不难想象大塚的论调更有逻辑，并且更有魅力。

此外，大塚在提出这些观点时，一边引用韦伯的著作，一边用社会科学的方法从精神层面解释欧洲近代化的秘密。对厌倦了战时非合理的精神主义、渴求社会科学语言的同时代读者来说，大塚的观点更有吸引力。韦伯这一在美国与法国并没有受到多大欢迎的社会学家，在战后日本成为与马克思齐名的人物，这不得不说有大塚的功劳。

当然，大塚对韦伯的解释是否正确是另一回事。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韦伯确实论述了禁欲的伦理对资本主义形成的作用，但并没有论述“资本主义精神”产生出与社会的联结。

相反，韦伯更强调要求生产以外的所有行为都禁欲的“资本主义精神”与冷静而透彻的目的合理性相互作用，从而破坏社会团结，将近代人逼到彻底的孤独与“铁笼”里。但是，大塚并没有继承韦伯这些悲观的近代观点。也就是说大塚按照自己的需要重新解读了韦伯的著作。

不过，韦伯之于大塚，就像近代国民国家理念之于丸山一样，是表达寻求民族主义与道德重建的同时代心情的一种手段。由此产生的误读与改编正好说明他们主动利用了西欧思想。

对“大众”的厌恶

丸山与大塚的思想不只包含他们的战争体验，还有其他要素，即对“大众”的厌恶。

在第一章中已提及，多数学生兵对“大众”抱有厌恶感。因此，丸山在其《日本的民族主义》一文中，用“在黑暗的淤塞的社会底层喘息的平民百姓”来形容“甚至让福泽将‘向全国民众脑海中灌输国家思想’作为

其终生课题，与‘国家观念’无缘的大众”。[181]

如前所述，丸山批判由“下士官”统治的村落共同体与家族，由于大众对政治毫无关心，总体战体制无法正常发挥。但是，在他的著作中完全看不到对被战争动员的大众的同情，对家族与村落共同体的反抗评价也很低。丸山在《日本的民族主义》一文中，将抗拒征兵的家族形容为“家族性的自私自利”，将与谢野晶子的《你不要死去》——她弟弟参加日俄战争时，为祈祷弟弟能活着回来而写的诗——也形容为“与其说是反战诗，倒不如说是留恋第一集团的朴素表现”。[182]

在论述历史时，丸山对以福泽谕吉为首的具有“统治者”意识的知识分子予以很高评价，相反却对农民与商人评价颇低。他于1944年就江户时代的农民起义论述道：“他们服从外部施加给他们政治秩序，是因为‘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而并不是因为内心对秩序的自觉。因此，他们任何时候都想靠‘起义’来拒绝施加在他们身上的秩序。”[183]

再看看大塚，即便“近代人类型”里包含对“大众的爱与尊敬”，实际上对大众的感情也相当复杂。他在《近代文学》杂志1946年举办的座谈会上说道：“脑海里有理想的大众形象，并不喜欢现实社会里的大众”，“由于战时的经验，我有时有点憎恨大众”。[184] 另外，在1946—1947年的论文中，大塚将日本农民的精神状态形容为被非合理的迷信所迷惑的“亚洲性”，将之比喻为“非洲的土著人”。[185]

另外，大塚与丸山虽然主张政治上的解放，却对性解放与感性解放持反对意见。1946年，丸山在《明治国家的思想》一文里，将明治后期出现的“非政治的个人主义”描述为“出于本能赞美生活的本能主义”、“将‘堕落’藏在心中的个人主义”、“源于儒教规范解放人类的现实性结果”，并举出与谢野晶子的《乱发》与田山花袋的小说。[186] 如前所述，大塚强烈批判“自私自利的自由”，丸山也于1951年指责战败后的大众“追求死气沉沉的娼妓秉性和赤裸裸的自私自利”。[187]

这种“蔑视大众”、“蔑视亚洲”的观点后来被吉本隆明与新左翼派学者所批判。也正因为这些观点，丸山与大塚才被定位为以近代西欧为理想的特权知识分子。

不过“蔑视大众”的观点在当时为多数人所共有。例如，与大塚同样疏散在相模湖附近农村的法学家川岛武宜，于1948年出版的《日本社会的家族构成》一书中强烈批判了揭示“日本封建的亚洲性质”的地方家族制度。与丸山处于两个极端的“无赖派”作家坂口安吾同样在1946年的《堕落论续》一文中谴责农民称：

> 文化的本质在于进步，农村中毫无这种进步的影子，所拥有的只是排他精神、对他人的不信任、多疑的灵魂、拘泥于个人利益得失。……
>
> 大化改新以来，所谓农村精神已经变成研究逃税的不屈不挠精神，伪装流浪人逃税、隐瞒户籍逃税……他们经常是被动的。自己不说想这样做，也说不来。相反，他们用自身特有的狡猾来处理遭受的一切。[188]

这种农民形象与大塚、丸山的大众观基本一致。“无赖派”的坂口批判“逃税”看起来有点奇怪，但其实这同赞赏“有纪律的士兵、诚实的商人、勤劳的工人”的大塚并无不同。

不用说，这些论调的背景是当时城市与农村的对立以及黑市经济的泛滥。从战时到战后，农民厌恶由政府出面供给食物，而更倾向于将农产品以更高价格卖出去的黑市交易。这使城市居民的生活更加艰苦，也让坂口谴责他们“逃税”。

例如第一章中引用的渡边清于1945年12月对同村农民说道：“城里现在没有吃的，每天都有人饿死，一定要准时上缴摊派的米呀。”但农民们只是说：“城里那些家伙变成什么样子，我才不管呢”；“这时就该让那些家伙生活得再窘迫些”。[189]

也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大塚与丸山批判农民，说他们是不

顾“国民福利”的“赤裸裸的自私自利”。生活秩序稳定之后，也有知识分子开始赞扬这些农民与黑市商人为“坚强的大众”，或赞扬“大众的反政府意识”。

如第一章所述，当时的报纸报道，“买东西的人都极度憎恨官员与农民，大家异口同声地说，要么饿死在大臣的门口，要么饿死在农家的屋檐下”。就此可以看出，当时对官员的批判与对农民的蔑视不可分割。在这一背景下诞生的丸山与大塚的思想，就如同“忠诚”与“叛逆”混杂在一起一样，批判政府与蔑视大众也是一体两面。

屈辱的记忆

丸山与大塚蔑视大众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即战争带来的屈辱创伤以及对“卑屈”的厌恶。

如上所述，丸山与大塚都执着于批判“利己主义”，呼吁社会团结，厌恶对权威的阳奉阴违。但如第一章所述，战时普遍存在为逃离暴力、获取食品、不得不迎合有权阶级而背叛他人的状态。

我们阅读丸山与大塚的著作时会发现，他们所谓的“近代”人物形象强调了不屈服权威的“主动性”。例如，大塚将“近代人类型”的特征说成“勇气”、“自觉性”、“独立”、“自由”、“团结”，以及“不知卑屈”。而与此相对，应该克服的“亚洲”人类型的特征则是，缺乏自觉性与团结，对“丑陋利己的感性要求”，以及对权威的盲目追随。[190]

同时，丸山在1949年撰写的分析东京审判记录的论文《军国统治者的精神形态》中，将那些自始至终都在为自己辩护、祈求逃脱责任的当政者的态度骂成“不知羞耻的狡猾”、“卑鄙的明哲保身术”、“脆弱的精神”。他将这种日本当政者的“脆弱精神”与纽伦堡审判做比较，将纳粹指导者描述为“强大的精神”，“在战犯审判时，土屋脸色苍白、古岛恸

哭，而戈林大笑”。[191]

然而在军队里，“脸色苍白”、“恸哭”，不得不染指“卑鄙的明哲保身术”的是那些曾经的学生兵，抑或丸山本人。如第一章所述，丸山将在兵营里的心理状况形容为向上级暗送秋波的“德川时代的女内侍”。于是，他强烈批判江户时代对权威阳奉阴违的农民与商人的“卑屈”态度。

这种对“卑屈”的厌恶实际上为很多人所共有。在1945年9月的议会会议上，众议院议员东乡实批评镇压言论阻碍了总体战，主张确立由民主化发觉“自己责任”的“国民政治”。他主张重建日本应该“摒弃自以为是、顽固、守旧，拒绝卑屈、阿谀、屈服，树立充满自我革新、创造、解放的正确世界观”。[192]

东乡曾任台湾总督府的高级官员，晚年成为负责自民党总务的保守政治家，政治倾向与丸山不同。但在充满“自以为是、顽固、守旧”的战时体制中，“卑屈、阿谀、屈服”是当时人们所共有的精神状态。这种相同的战争体验，促使保守派议员也提倡改革。

晚年，丸山与大塚的思想被没有经历战争的一代所批判，认为他们以西欧近代为理想，蔑视大众。如前所述的“土屋脸色苍白、古岛恸哭，而戈林大笑”这一表述，经常被认为是丸山美化西欧的证据。[193] 而丸山因何会说“戈林大笑”，学生兵等读者又为何感到有说服力，如果不立足于他们的战争体验，便无法理解。

也就是说，丸山与大塚表述的“近代”并不是西欧所谓的近代。他们试图借用西欧思想的语言来表述由悲惨的战争体验的反作用所幻想出的理想人物形象。兼备“个体”确立与社会连带，坚守面对权威的自我信念这一精神，被他们命名为“主体性”。这种拥有“主体性”的人物形象，丸山称为“近代国民”，大塚则称之为“近代人类型”。

被称为战后思想关键词的“主体性”，是大家为能从战争与战败的屈辱中重新站立起来所需要的词语。后文将论述，“主体性”在国内表现为对抗权威的“自我树立”，在国际上则表现为对苏联、美国的“自主独立”或“中立”的民族主义。丸山之所以钟爱福泽谕吉“一国之独立基于一身之独立”这句话，就是源于此种心情。因此，丸山与大塚的思想受到拥有相同战争体验的同时代人的绝对支持。

探讨这种理想人物形象，被不了解战争的后世批判为乐观的人道主义。但是，大塚在1946年的论文中，一面论述“对尊贵人格的尊敬与信仰”，一面写道：“我们这几年与此完全相反，生活在对人的善意极端悲观，不，应该说对人的恶意都不确信的精神氛围中。”[194] 也就是说，他们的人道主义主张也是战争体验的衍生物。

这种倾向也是当时思想文化的一般特征。电影评论家佐藤忠男谈道：“当时，即便大多数日本人忍饥挨饿，日本电影却出奇的热闹，呈现一片乐观气氛。”很多电影只能看作“热闹无聊的喜剧或流行歌曲式电影”，或是充斥着“今后是明朗的民主主义时代”这种乐观观点。[195] 同时，大塚与丸山的思想也于1960年以后被不了解战争的一代认为是“今后是明朗的民主主义时代的乐观观点”。

由上所述，丸山与大塚的思想诞生于一面批判旧有的“灭私奉公”，一面寻求新民族主义与道德这一“真正的爱国”的立场上。但是，在第八章与第十一章将要论述到，由于丸山他们缺乏对亚洲的战争责任意识，对朝鲜、台湾的观照也很冷淡。他们的观点中，欠缺一种论述视角，即如果总体战体制果真按照他们的主张实施的话，将会给亚洲民众造成怎样的影响。

然而，论及这一问题之后就不得不阐述另一问题。那就是丸山与大塚在战况恶化的战争后期，都曾呼吁重建总体战体制。

理由是在败象毕露的状况下，对战争采取旁观态度让他们感到“卑怯”。丸山回忆战争后期时说道：“炸弹并不会避开反战者而落下，作为日本人不管愿不愿意都要背负共同的命运。真的觉得是命运共同体。”[196]

这种心情为大多数战后知识分子们所共有。例如法国文学评论家桑原武夫回忆道：“虽然没有那种强迫转败为胜的干劲，但在大家都很艰苦的时候总觉得偷懒不太好。因此，‘在战败那天抱着女人’这种矫揉造作的小说家的话，之于我，与其说伦理上，不如说在美学上觉得万分不愉快。”[197]

在总体战体制下成为妇女委员、战后被开除公职的市川房枝叙述道：“（我在）某种程度上协助战争是事实，我也觉得有责任。但是，对此并不觉得不光彩。比如，我的一个朋友在战争开始后就到山里去，在山里偷偷地吃着上好的饭菜。战争结束后回来说自己没有协助战争。但是我觉得，在那个时代那种状态下，只要作为一个国民，虽然不能说理所当然的羞耻，但也应该是错误的。”[198] 这种声音当然也是在表达他们的民族主义。然而，他们又与丸山相同，战后在确立自我的基础上提倡重建日本，以自己的战争体验为基础拥护和平主义。

太宰治于1946年3月的随笔《回信》中表达了这种心情：

> 即便我们在程度上有所差别，在这次的战争中，我们也都拥护了日本。即便是愚蠢的双亲，浑身是血地与人打架，现在败象毕露眼看就要死了，儿子却在一旁袖手旁观，这才令人感到奇怪。“看不下去了”是我的体会。
>
> ……我想其他人大概也是以那种心情为日本尽力。
>
> 痛痛快快地说出来不好吗。说我们在这场大战中拥护了日本，我们热爱日本。
>
> 就这样，日本咽下了大溃败的苦果。其实，在那种情况下日本胜利了

的话，日本不是神国而是魔国。那样也能胜利的话，我想自己不会像现在这样热爱日本。

我现在热爱这个失败了的日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爱。早点实现《波茨坦宣言》的全部约定，使日本成为小巧美丽和平的独立国家，啊，我会抛弃生命以及其他一切如此祈祷。[199]

这篇文章包含些许哀伤，很好地表现了战后初期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心情。由这种心情产生了“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的综合”思想，“民主”与“爱国”的并立，诞生于战争体验这一土壤。

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战后民主主义”的背景，开始不被年青一代所理解。他们将“战后民主主义”批判为乐观的人道主义，是将西欧作为理想的“近代主义”；或指责其为高唱国家总动员的支持战争者的思想，断定其为主张“确立自我”而否定民族主义的个人主义。

丸山在1947年所写的《陆羯南——人与思想》中叙述道，明治初期的“日本主义”在之后的五十年内，“向右翼的反动、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三个方向发展”。[200] 与此类似，从丸山的学问传承开始，战后五十年拥有不同思想的人才辈出。不光是自称为“战后民主主义”的继承者，标榜“对国家政治负责”的现实主义者、厌恶“大众”的大众社会论者，甚至包括标榜“国民骄傲”的历史修正主义者，都自认为是丸山的读者。而其中任何一个，都只是继承了丸山思想的一部分，并没有继承丸山的全部思想。

丸山与大塚的思想，是在通过战争体验诞生出的“真正的爱国”这一心情的基础上，被多种相互矛盾的理念所捆绑的潘多拉盒子。而战后思想之后的趋势，是在对战争记忆慢慢淡忘中，其所包含的各种思想潮流渐渐分裂，“民主”与“爱国”由并立渐渐走向崩溃。

第三章 忠诚与叛逆

战后思想主张确立“主体性”和废除“天皇制”。[201] 同时，还要求追究战争责任。

事实上，这三种主张是一体的。因为如第二章所述，所谓“主体性”是指拥有责任意识且不附庸权威的精神，而“天皇制”便是权威的代名词，战争责任问题也意味着唤起责任意识。不用说，这三个问题意识的交叉点便是天皇的战争责任问题。

因此，战后初期对天皇战争责任的追究并不是否定日本的民族主义，而是在摸索以天皇为中心的战前民族主义的替代，即新民族主义。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对“日本”的“忠诚”导致对天皇的“叛逆”这一复杂现象。

对“战争责任”的追究

在论述天皇之前，首先梳理一下当时有关战争责任问题的一般性论调。

如第二章所述，在1945年9月5日战后首次召开的议会上，芦田均提交了一份题为《将大东亚战争导向不利终结的原因及其责任》的意见书。另外，在同年12月的众议院上，鸠山一郎等人提交了《关于议员战争责任的决议案》，一宫房治郎等人也提交了《关于战争责任的决议案》。这些决议案所追究的是“军阀”、“官僚”、历代总理大臣，以及“追随、阿谀、迎合”这些势力的议员、知识分子、商界人士等。[202]

然而，“迎合”过军部的人实在太多。在1945年12月召开的议会上，蜡山政道等11名众议院议员表示因“自责的心情”而辞职，但这只是议员中的少部分。对主动辞职以外的议员追究责任，容易变成互相揭短的闹剧，因此议会上的战争责任争论最终沦为抽象的决议。

再者，这些决议案在提及对亚洲各国的加害责任问题时，只将违反国际法的“战争犯罪”视为问题。关于战败责任，也只集中追究“军阀”与“官僚”，而将一般国民与天皇排除在外。

其中，战败后不久上任的首相东久迩稔彦就一般国民的战争责任曾提出“一亿总忏悔论”。如第二章所述，在1945年8月28日的记者招待会上，东久迩认为战败的原因之一就是以黑市经济为代表的“国民道德的下降”，提出“一亿总忏悔是重建国家的第一步”。

但这个“一亿总忏悔论”遭到人们的强烈反对。例如，《每日新闻》1945年9月8日的读者来信中写道：

> “一个不漏地反省”、“一个不漏地忏悔”，这到底是对哪个国民所说的？……结束战争的圣断发表之前，我一直在坚持。难道不是这些官吏导致的配给不公、缓急误判、渠道堵塞等问题使战斗力持续滑坡么？你们这些官员到底是用哪张嘴对谁说“反省吧”、“忏悔吧”？我泪流满面地想知道答案。特攻队以及其他战死者的遗属、工厂战死的遗属也要和罪恶深重的官员们一起忏悔、一起反省吗？[203]

这封来信引发了读者的强烈反响，《每日新闻》还刊登了声援该来信的文章。前述议会上关于战争责任决议的意见书中也认为战争责任不能波及“默默顺从政府的一般国民”，批判了“一亿总忏悔论”。[204]

原本在决定投降时，“一亿总忏悔论”是政府的正式方针。早在1945年8月11日，内务省警保局给警察部长的密码电报中写道：“关于战争责任者的争论，离间军官和民众的言论今后将会越来越多，为了不使之破坏国内稳定，必须特别努力压制，招致此次事态的责任应该由‘军民共同承担’，如果不团结全体国民的话，事态会越来越恶化，甚至有可能危及皇国前途。”[205]

之后，“一亿总忏悔”一词渐渐成为当政者掩盖责任的代名词。1946

年3月，新日本文学会东京分会通过《追问文学上的战争责任》宣言，特别强调“我们并不是要履行‘一亿总忏悔论’”，“那样的话就变成人人有责，从而掩盖掉部分人重大且直接的责任”。该分会还列出有战争责任者的名单，高村光太郎、火野苇平、武者小路实笃、小林秀雄、保田与重郎等人榜上有名。[206]

“一亿总忏悔论”的存在给战争责任论带来了某种制约。如第一章所述，丸山真男在1946年5月的论文《超国家主义的逻辑和心理》中，已经提出“‘残酷行为’的直接实施者是一般士兵这一事实无法掩盖”。然而，进步人士渐渐担心丸山这一观点将会与“一亿总忏悔论”趋同，所以在论述一般国民的战争责任时有所保留。

一般国民没有被追究责任还有一个重大理由。就像上面的读者来信一样，当时最盛行的论调是，将追究当政者战争责任的伦理依据诉诸认认真真为战争服务，并为战争付出巨大牺牲的一般国民。

这种伦理所依据的归根结底就是阵亡者。上述读者来信一边强调自己为战争做出了贡献，一边提出“特攻队及其他阵亡者”来追究当政者的责任。其中包含为“日本”这一国民共同体竭尽忠诚与贡献、付出巨大牺牲的人才有资格追究战争责任这一民族主义的要素。

这种论调同时与对“旁观者”的厌恶连在一起，因为战时有人利用各种手段逃避征兵或工厂动员，没有为战争出力。但1945年12月众议院的战争责任争论中，有人说道：“我国发生战争，在生死存亡之际，没有比袖手旁观的人更冷酷无情”，“有人将这种旁观态度错认为是建设新日本的资格，（我）无法原谅这一点”。针对这一观点，议员们叫嚷道“确实如此”、“同感”。[207] 如第二章所述，桑原武夫和市川房枝也批判过“旁观者”。

在这种论调下，没有对“日本”做出贡献的亚洲的战争牺牲者们很少

受到关注。尽管日军的残暴行为被曝光，引起大家的广泛关注，但是，追究日军残暴行为正因为关系到一般士兵，隐含着接近“一亿总忏悔论”的危险。事实上，在马尼拉残忍行为被曝光的1945年9月，《朝日新闻》上某年轻女性的投稿写道：“听完这个事件之后，终于明白了总忏悔的意思。”[208]

如果对亚洲的加害行为被视为问题的话，也只被视为高唱“东洋和平”、“东亚解放”的“日本人”践踏了这种“道义”而已。左翼杂志《太平》于1946年第11期上以《国民素质低下吗？》为题提到了在亚洲的残忍行为。[209] 也就是说对亚洲的残忍行为作为民族道德问题可以拿来讨论。

战败之后，众多人失去亲戚友人，失去房屋财产，首先被关注的就是“国民”损失，所以对引起这些损失的当政者的责任加以追究也是理所当然的。在这种状态下，将当政者与一般国民统一看作“日本人”，追究“日本人”给予外部的责任这一论调并不多见。1960年代以后这种论调才越来越多，一方面因为没有经历战争的一代人开始成长起来，另一方面由于经济的高速增长使大家开始淡忘战争。

但是，追究以“国民”为基础的当政者的战争责任时，天皇的位置便成了问题。也就是说，天皇应该站在被追究战争责任的当政者一边呢，还是应该站在作为受害人的“国民”一边呢？

当然，保守派的论调倾向于后者。保守派报纸《时事新报》在1947年5月的社评中，一边责备“军阀”，一边认为“皇室与国民其实是最大的受害者”。芦田均与鸠山一郎向议会提交的战争责任决议案中也提到“以辅弼责任的大义明鉴国体”，“使日本本来的君民一体的民主政治复活”。[210]

然而，也有很多人认为天皇应该是被“国民”批判的当政者。他们在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时往往提到对战死者的记忆。换句话说，对天皇竭

尽忠诚甚至牺牲生命的战死者才是他们批判天皇的最大依据。

某少年兵的天皇观

作为以对战死者记忆为依据的天皇战争责任论的事例，这里从介绍曾是海军少年兵的渡边清的日记开始。该日记是曾在战舰“武藏号”服役的渡边在1945年9月到1946年4月所写，这一时期他已复员到静冈县的农村。

渡边复员后的1945年9月，他的村里始终谈论着“天皇陛下将被处罚”的传言。投降时，水兵之间也流传着“以天皇为首的皇族、华族、重臣、战争中的各大臣，再加上陆海军少将级以上的人都将被处以绞刑”。[211]

然而，村子里的人对这些流言显得异常冷静。渡边的邻居说：“唉，虽然很恼火，但我们败得一塌糊涂，天皇陛下的脑袋搬家也没办法。”[212]

但是，对发誓向天皇效忠、甘愿受死而战斗过的渡边来说，这种谣言是“恐怖的惩罚”。但战败这一事实又足以让人相信天皇被处刑的可能性。

因此，渡边认为，天皇会在被美军带走之前，“堂堂正正地自杀，向天下展示无法侵犯的帝王尊严”。渡边一直被灌输“生不受囚虏之辱”这一战场训示，对于一直将天皇信作“大元帅”的他而言，有这样的想法也是无可厚非的。[213]

当渡边听闻陆军大将东条英机自杀未遂被美军逮捕后，这一预想更加强烈。他蔑视东条，认为他“作为一名陆军大将，处在军人的最高位置，竟然自杀未遂，被敌人抓住，这种事情简直匪夷所思”，“就好像将

日本人所有的耻辱都展示给别人”，并且他认为“破坏”战场训示的“正是东条本人”。[214]

渡边清楚地记得，战舰“武藏号”被击沉时，舰长承担“操作战舰”的责任与战舰一起沉入海底。想起这一幕，他认为战败后国土被占领，大元帅“不可能厚着脸皮活下去”。对他来说，天皇的自杀“如果说是承担战败责任的方法，目前也只有这个方法。既然是开战的责任者，那么这样做也就理所应当”。[215]

原本渡边在投降时就已认为天皇可能会自杀。1945年9月初渡边预想到，“‘8月15日’的时候天皇陛下没有自杀也许是因为自杀有可能扩大战败的混乱与不安的‘圣虑’”。如果是这样的话，或许会在“其统帅下的陆海军人都复员了，人心也安定之时；如果不是，或许会在联合国召开军事审判之前退位”。[216]

然而，1945年9月30日，刊载在报纸上的一张照片给渡边以沉重打击。那是天皇访问麦克阿瑟办公室时两人并排而立拍摄的照片。渡边被这张照片激怒，在日记中写道：

> 天皇的访问对象竟然是前几天我们赌上性命而战斗的敌人总司令。是被唱成“滚出来，尼米兹·麦克阿瑟”、令人憎恨的麦克阿瑟。对这种人，还要特意前去低头，天皇难道不知道羞耻么？尽管战败了，不，正因为战败了，态度更应该坚决才对呀……
>
> 麦克阿瑟肯定在心里耻笑低头前来拜访的天皇，肯定没把天皇放在眼里。那种感觉在两人的照片中也显露出来。……感觉天皇成了服侍傲慢高个子主人的笨拙而小心翼翼的侍从。
>
> 但天皇也是，胆敢在敌军司令官面前露面，如果那是作为一国元首、陆海军的大元帅奋不顾身地去提出决斗的话，我还能理解。……
>
> 但事实是什么呢？天皇特意拜访以后，不知是不是为了纪念，两个人居然友好地照相，宛然一幅恬不知耻的样子。在我看来，不管怎么说，天

皇扔掉自己作为元首的神圣与权威，在敌人面前像条狗一样低垂着头。[217]

忠诚之深使得叛逆也愈加激烈。看过照片的第二天，他写道："我被天皇欺骗了，被我认为是神的天皇背叛了。"当知道美国因期望天皇能协助美国的对日占领政策，不打算在远东军事审判上对天皇提起公诉时，渡边对天皇的愤怒越发强烈。1945年10月，他甚至写道"我现在就想去烧毁皇宫"。[218]

就像对抗与美国合作的天皇一般，渡边一直具有反美意识。更准确地说，与其是对美国的敌意，还不如说是以反美的形式反对与美国合作的天皇、政府。看到几个月前还在呼喊"鬼畜英美"的报纸开始宣扬与美国友好时，他批判道："这种临时的投机主义应该是败犬在献媚吧。如果说有必要友好的话，那当初就不要开战了。"[219]

然而村里人都屈从于美国的权威，他们说："即便是天皇陛下也在麦克阿瑟元帅面前抬不起头。"曾任在乡军人会副会长的人说道："干脆趁这个机会跟美国合并算了，美国的48个州再加一个日本州。那样的话比现在在这样一个弱小的贫穷国家里摇摇晃晃好。"渡边无法忍受这种"见缝插针的权势主义"，一直过着拒绝美国制造的香烟和罐头的生活。[220]

渡边将对死去战友的记忆作为伦理基础。当他看到政府发表的战死者数据时，认为"对于我不仅仅是抽象、单纯的数字。只要看到那些数字，一起战斗并战死的朋友的脸就像佛珠一样一个个地浮现在眼前"。"有人头被砸碎，有人就像玻璃碎片一样散落海里，有人临终前痛苦地打滚，最后与战舰同沉。而我，看到成千上万的战友尸沉海底，有时候见死不救。现在我自己一个人活着回来了。"[221]

因此，渡边觉得"自己一个人活着非常内疚"。"不管怎样，都不会去做让战友们认为'那个家伙真狡猾呀……'的事情。天上的战友们正看

着我。”村里所有人曾经全部出动迎接战死者的骨灰，而现在，只有少数相关人员才去迎接，渡边对这种现状异常愤怒。[222]

渡边批判天皇的依据也正是对战死者的记忆。在1945年10月的日记中，渡边说“想烧毁皇宫”之后，继续写道：“不，那样也不够。如果可以的话，将天皇带到曾经进行海战的地方，把他拖到海底，让他亲眼看看那些凄惨地永眠在海底战友们的尸体。这是因你的命令而开始战争的结果。……用各种手段拽住他那三七分的头发，撞向岩石。”[223]

1945年11月，听说天皇参拜了靖国神社，渡边写道：“这个世界上没有灵魂。”为什么呢？“因为如果真有灵魂的话，天皇将被那些灵魂咒骂而死，不可能还活着。”他认为，天皇如果“能考虑到一点点”那些士兵是因为自己的命令而战死的话，“就不会站在靖国神社的门口”。[224]

之后，渡边看到日本共产党“废除天皇制”的传单后，认为应该“毫无怨言地支持”。他受朋友的推荐，开始阅读社会主义学者河上肇、山川均的著作。虽然被河上的著作所感动，却没有因此而陷入对于社会主义的学习。那是因为他在申请加入海军的过程中，经历了很多“语言魔术”的欺骗，之后他决定“不论是多么伟大的人说的话，首先要自己好好考虑，除了自己能够信服的东西之外，绝不能当真”。[225]

天皇在1946年元旦发布诏书，即所谓的《人间宣言》，否认自己是“现世神”。期待着退位宣言或对国民、战死者谢罪的渡边，认为这是“荒唐的不思悔改之宣言”。[226]

尤其激怒渡边的是，这份诏书感叹国民“道义”低下。渡边认为，“将不承担战争责任的自己放在一边，怎么能说出这么煞有介事的话呢”，并写道：

> 最可耻的是，发生了破坏性的大战，现在也没有出现自称“谋划战争的责任者是我”的人。……反正越是伟大的人越对别人宣传道义的重要，一到

自己身上的时候，其迟钝程度简直可以与白痴相提并论。这简直太过分了。

> 但是，更恐怖的是给国民心理上的影响。我预感到，尤其是天皇的态度，会带来“连天皇作为责任者都不用承担责任，那我们不论做什么也不需要承担责任”这种道义的衰退。也就是日本处处出现“学习天皇”的情况。[227]

1946年3月，报纸刊载了新宪法草案。第一条规定天皇为“国民整体的象征”，渡边认为，“这样一个没有节操、毫无责任的天皇如何成为国民的‘象征’呢？”“这样一个从敌军总司令那里得到支持继续当天皇的人，这样一个毫不反省自己的战争责任的人，如果让他来象征日本国民，还不如让沙丁鱼的头来象征呢。”[228]

对同一时期开始的天皇地方巡幸，渡边也认为是“由于战败与麦克阿瑟的影响，不受重视的天皇为了挽回人气的策略”。也有朋友说天皇是当政者的“机器人”，留恋这种天皇是一种错误。但是渡边无法赞同这种观点，如果天皇是“机器人”的话，那些因为相信天皇而战死的战友又是什么呢？

宪法草案发表数日后，渡边从复员兵博劳处听到炫耀南京战场的谈话，内容如下：“大概砍了近二十个中国人吧。就像将白萝卜切成圆片一样”；“女人也可以随意挑选”；“让她们活下来之后会很麻烦，所以完事之后就当场用刀咔嚓咔嚓处理掉”；“只要生命没有危险，士兵就想干啥就干啥，真是有趣的职业呀。而且，上面还给赏钱”。[229]

一直参加南方海战，对中国战场毫不知情的渡边听到这番谈话后深受打击。因此，他想到政府、天皇没有向中国谢罪的同时，认为“在博劳处毫无反省的炫耀，归根结底是因为政府和天皇的不负责任态度”。[230]

同年3月，渡边偶遇“涂着红红的口红，穿着红红的洋装的日本年轻

女性”与美国兵“得意扬扬、嬉笑”着走在大街上。被美国兵踢倒的渡边与美国兵打斗起来，日本警察只把渡边带走了。渡边反驳道：“我在大路上走有什么错？”[231]

渡边从这一经历中感叹“畏首畏尾的当地日本人”的样子。打斗时，没有一个日本人帮助他，渡边就想“难道他们都忘记了美国曾经是敌人吗？”[232]

在这种情况下，渡边想起亚洲抗日运动的女性。他在日军占领下的马尼拉登陆时，“一次都没看到菲律宾女性与日本兵走在一起”。抗日战争中的女性，“在裙子里藏着枪，狙击日本兵”。渡边想起此事，“我当时非常憎恨这些女人，但是现在想起来她们志向之高远让人敬佩”。[233]

日本民族主义受到的伤害引发了其对亚洲民族主义的共鸣。复员后，对粗暴的渡边敬而远之的村里人非常多，唯独在日朝鲜人“收废品的小金”欢迎他的归来，“活着回来了，很好，很好，恭喜恭喜”。渡边想到“复员回来后从心里对我说‘恭喜’的恐怕只有小金一人”。当听到朝鲜独立，小金可以回国的消息后，他感到“自己好像也被拯救了”。[234]

但另一方面，渡边对搭便车式的日本批判抱有很深的反感。在村里，曾高唱“完成圣战”的权贵、教师，已经开始夹杂着英语单词宣扬民主主义。高呼圣战的报纸、广播开始报道战争是军阀与官僚策划的侵略时，渡边虽然承认侵略的事实，但写道：“既然如此，为什么不更早一点，至少在战争之前好好报道呢？”“两面三刀，扭曲事实，不负责任也得有个度。”[235]

当渡边感到对战争的批判包含对战死者的亵渎，以及对“美国的阿谀奉承”时，他愤怒了。渡边反对高唱与美国友好的媒体论调，“那样的话，以美国为敌而战死的战友们算什么呢？”[236]

1946年2月，报纸报道了广岛原子弹爆炸造成的伤害。渡边更加仇视大量杀戮非战斗人员的美国，认为“日本的领导人为什么要追随美国呢？”他将理由归结为“小算盘、为了金钱，以及为了得失不顾一切”。他还认为：“对轻易忘记过去，像现在这样只顾眼前私欲的领导人唯命是从的话，将来必会被美国整得很惨。”[237]

渡边对东京审判的评价并不高。不仅因为天皇没有被起诉，他还认为“反正这是胜者解恨的单方面审判”。东京审判提出的所谓“对和平与人道的犯罪”这一原理，渡边认为，“如果是被日本强行入侵的中国或东南亚国家，鉴于日军曾在其土地上竭尽残暴与掠夺之能事，那么这些国家说出这样的话我还能理解”，投下原子弹的美国“没有资格说那么冠冕堂皇的话”。[238]

虽然对东京审判没有起诉天皇心怀不满，但渡边同时也反对由美国来裁决天皇。当有关处置天皇的美军意向报道出来后，渡边写道：“日本的事情应该由日本人解决，我很想告诉美国人住嘴！”[239] 他认为，天皇的战争责任，应该以对战死者的记忆为立足点，由“日本人”自己来追究。

关于天皇承担战争责任的方法，渡边写道，首先天皇应该“迅速退位”，然后，“皇室应与天皇的退位一起废除”。“天皇退位后应该剃度入佛门，为战死者守墓。而墓地则由国家挑选合适的地方，设立纪念战死者的纪念碑或祭奠堂之类的东西。”[240]

并且，“退位后天皇一家的生活费从皇室财产中支付，如果不能支付的话，那就像寺院的住持一样，由同情天皇的人的布施来维持。反正国民的税金一分都不能出”。如果年初的诏书是“人间宣言”的话，“退位后就应该融入国民中，穿普通的衣服，吃普通的食物，住普通的房屋，跟普通人一起过普通的生活”。[241]

与此同时，渡边渐渐觉得“目前为止一直信任如此无责任的天皇，简直无法原谅这样的自己”。在“被背叛”、“被欺骗”等词语背后，隐藏着“通过肆意弹劾天皇来美化自己”的意图。于是，渡边感到，“自身无知的责任应该在自己”。[242]

渡边认为，“责备天皇，同时也是在责备深信天皇的自己”。这样思考时，“我本人也是赞美战争、主动志愿参加战争的人这一事实”，也就是“侵略军的一员”这一事实无法改变。在此基础上，他反驳了在博劳处对南京经历的炫耀之后，反省道：“但是，如果在那里的人是我的话，也不知道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243]

因此，渡边得出的结论是：“我自始至终全面协助了这场战争，协助战争的责任，只能通过今后不协助任何战争来补偿。”当时，日军刚刚被遣散，但是“五年十年后的事情谁都不知道”。不过，“即便有这种事情发生，我下次也绝对不会参加战争”。[244]

下定决心的渡边，面对民族主义的态度非常复杂。渡边反对战败后天皇和媒体的态度，他认为：“天皇是什么？日本是什么？爱国心是什么？民主主义是什么？文化国家是什么？哼，那些都是狗屁。”但另一方面，利用时局沽名钓誉的知识分子轻而易举批判战争时，他又认为“那样的话，为国殉职的人的爱国心又算什么呢？”[245]

渡边的民族主义渐渐超越了国家与民族。渡边与美国兵打斗被日本警察逮捕后写道：“不管谁说什么，我都不会屈服于美国。日本虽然投降了美国，但那是国家与国家的协定，关我屁事。”[246] 渡边就这样产生了“抵抗国家的民族主义”。

1946年4月，渡边决定离开家乡到东京工作。出发之前，他听说现在与战前不同，可以直接给天皇写信。因此，他离开家乡的时候，将自己加入海军到复员为止，分配所得粮食、衣服、工资等的总额加以计

算，将手中的钱凑在一起，汇给天皇，还附上一封信，上面写道："这样，我就不欠你任何东西了。"[247]

渡边的日记，以给天皇的这封信终了。曾多次采访战争体验者的保阪正康形容渡边的日记为"庶民感情的朴素表现"，即便不像渡边这样纯粹，"这种感情也应该是当时大多数日本人共同的心情"。[248] 事实上，当时的大多数天皇论者都有渡边式的心情。

"天皇退位论"的抬头

因对天皇的忠诚之深而转向批判的人不止渡边一个，前学生兵、从菲律宾战线生还的政治学家神岛二郎便是其中一人。神岛回想刚复员时的心情时写道：

> 多少国民的鲜血换来了战败，天皇肯定会引咎自杀。如果这样的话，我该怎么办？我肯定活不下去。我将这样的心情埋藏在心里，今后会一直守护天皇而生活下去。然而，只有地方巡幸，战犯被处刑之后也什么都没有发生。因此，第二年4月10日，嚷嚷着要处罚天皇的T君与我互殴。可是，到5月3日新宪法施行时也什么都没有发生。一直等到现在的我，如梦初醒一般，切实看到天皇的无伦理性。可以说，天皇已没有民族的良心。[249]

神岛也深怀着对死去战友的记忆。他复员后，为日军的残暴行为深受打击，写道："对于同胞所犯下的无数令人发指的暴行，我感到愤怒与耻辱。但是，我也了解那些主动参加战争而死去的年轻人。我深切地感到活下来的人的责任。"对他来说，向战死者下达命令的天皇，不明确地表明态度，简直毫无道理。

预测天皇自杀的并不只是渡边或神岛这样的年轻人。政治学家猪木正道回忆自由经济学家河合荣治郎战时的谈话称：

> 河合这样说："天皇真可怜，被军队控制了，被杉山（陆军参谋总长）

> 与东条（首相）欺骗了。我（河合）最担心的是如果这场战争输了的话，天皇会自杀。我看不下去。”我受他影响，也觉得天皇真的很可怜。但是，战败后天皇毫无自杀倾向。是从那之后，（我开始）批判天皇，说天皇是日本国民毫无责任的象征。[250]

这种心情也在民众之间蔓延。大阪一名61岁的公司职员在1948年6月给报纸的投稿中写道：“我儿子也因为天皇的命令而命丧战场。我认为他很满足地死了。但是，那个天皇说自己是爱好和平之人，并不喜欢战争。这样的话，日本的军队便是违反天皇的意志在行动。作为家长该如何理解这种自相矛盾的事情呢？”他还表明自己赞同“战争结束时，为什么天皇没有发布忏悔自己的诏书”这一质疑。[251] 另外，1946年第3期《妇人朝日》杂志刊载了某主妇的意见，写道：“一想到天皇不在国民面前承担责任，就觉得对天皇的看法发生了变化。”[252]

近卫连队[253] 的青年军官村上兵卫也认为，“如果这次战败的当事人是明治天皇睦仁的话，（他）可能就自杀了”。对于昭和天皇是政治家的“机器人”这一说法，村上强调战死的战友说道：“如果天皇是机器人的话……那些信任天皇的男人便被出卖了。”[254]

村上引明治天皇为例来批判昭和天皇，这种论调不限于村上个人。据江藤淳回忆，他祖母在战败当天收听广播时说道：“将国家弄成这样，让这么多的人牺牲，陛下有什么颜面去见明治天皇呀。”[255]

直面战败的人们，以“明治”为基准来批判“昭和”，这种例子屡见不鲜。1945年8月23日，作家吉川英治向报纸投稿写道：“现代日本人有点骄傲自大。将日本建设为与世界一等国家为伍的不是我们，全都是明治时代的遗产。”另外，作家司马辽太郎回忆自己作为陆军青年军官迎接战败的情形，“指导者们的愚蠢，连22岁的人都明白。但是，曾经的日本应该是不同的吧”，这就是他决意学习明治历史的动机。[256]

另外，如第二章所述，丸山真男也一边赞赏“明治”的福泽谕吉与自

由民权运动，一边批判昭和的超国家主义。丸山在1946年10月的演讲《明治国家的思想》中说道："我们没有亲身经历过日俄战争，听前人讲，日俄战争时国民精神百倍，与这次战争不同，那听起来是由自下喷涌出的力量进行的。"[257] 这里的"明治"，可以说在批判带来战败的"昭和"国家的同时，又成为保护民族认同的依据。

村上兵卫与渡边一样，认为如果不明确"最高指导者天皇的责任问题"，给国民造成的"负面影响将无法估量"。[258] 1946年6月，诗人三好达治发表了面对"以陛下的名义遵循军纪，高喊陛下万岁倒在军阵之间的忠良臣民"，"陛下有背信的责任"的"天皇退位论"。三好在这一论调中，强调"不追问陛下责任的话，世上的道理都将荒废"，并写道：

> ……即便覆灭祖国的主导者不是陛下自身，陛下也是名义上唯一一个可以控制主导者的实力者，陛下的疏忽，将无法在国民面前辩解。朴素的国民在陛下面前没有尝试追究任何事……事实上，不能忘记他们也有属于自己的辨别道义的基准。……
>
> 今天，任何有识之士都会指出并惋惜国民道义的败坏。……事到如今，要挽救国民道义的败坏，只有最高责任者斩钉截铁地承担责任，率先垂范以鼓舞人心。[259]

这种形式的战争责任论也指向了天皇以外的当政者。《每日新闻》1946年5月9日的报道要求战争嫌疑犯"不能将日本的羞耻暴露给世界，应该明确责任所在，那才是诸位对国家、国民最后的效劳"。[260]

这种退位论许多是出于对天皇的敬爱。1948年，夏目漱石的学生、作家森田草平加入了日本共产党，并在日本共产党机关报《前卫》上发表了《加入共产党之词》。森田就天皇的地方巡幸做了论述：

> ……我最近对天皇左右的人以及各级领导人的行为感到愤怒。不知道出于什么目的，这些人战争结束后虽然没事却还经常将天皇带出来，到各个府县巡回，天皇自己应该也感到无聊吧，还给老百姓添麻烦。如果这是为了挽回天皇的人气，加深民众对天皇一家的亲近感的话，就再也没有比

这更愚蠢的事情了。……如果真心想挽回人民敬意的话，天皇应该赶紧退位，即便是机器人，也应该承担将人民陷入水深火热的错误战争中的责任。这样的话，为天皇惋惜之情才会慢慢抬头，对天皇一家的爱意也会再次在民众间涌出。如果不这样的话，我只能认为，那是宫内省与府县的职员互相勾结，利用天皇而巩固自己地位，以维持原有的封建势力。[261]

这种战后初期对天皇战争责任的追究，并不是否定民族主义，而是摸索新的民族身份认同。以下将论述到，这种心情，也出现在有关天皇制的讨论中。

日本共产党的“爱国”

1945年10月，被释放出狱的德田球一与宫本显治等日本共产党干部发表题为《告人民》的声明，呼吁废除天皇制。12月8日，战犯追究大会上列出了各界共计超过一千名的战犯名单。志贺义雄在11月的《赤旗》复刊第2期上斥责“天皇才是最大的战犯”。[262]

然而，他们所宣扬的也不是否定民族主义，而是“真正的爱国”。1946年1月，在苏联与中国亡命16年的野坂参三回到日本，以《以民主战线解救祖国危机》为题做了演讲，说明“谁才是真正的爱国者”：

诸位！看看这荒凉的东京城市，看看这消瘦的市民。将这种苦难施加给人民的是谁！让我们民族尝试战败这一最大耻辱，让国家濒于灭亡的到底是谁！那是以爱国名义将诸位煽动到战争之中，将几百万青年送到战场进行杀戮的天皇、军阀、财阀、反动官僚、政治家、反动团体，他们才是将祖国陷入危机，使民族蒙羞的非国民、国贼。把爱国主义当成专卖权的东条英机及其追随者才是最大的国贼，是最应该被憎恨的国民的敌人。

与此相反，我们共产主义者在战时做什么了？……（我们）揭露这场战争的帝国主义、强盗主义性质；（我们）诉说这场战争违反我国利益，会将国家带入灭亡境地；（我们）反对战争。因此，自九一八事变以来，数以万计的日本共产党员及其同情者被逮捕，数百人死于警察之手。我们共产主义者的主张与行动才是真正的爱国、爱人民的主张。[263]

野坂的演说引起遭受战争惨祸人们的强烈反响。日本共产党的天皇批判也通过这种“真正的爱国”，也就是提出“国民”或“民族”来谴责天皇的形式展开。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当时左派的论调中，“民族”一词是作为“民众”、“人民”的同义词使用的。例如，1946年6月，日本历史学会的会刊《日本历史》创刊号中提到，今后的历史不是天皇与当政者的历史，而是“‘人民’的历史——日本民族的历史”。[264]

同时，1946年2月，在日本共产党机关报《前卫》的创刊号上，刊登了从狱中释放出来的宫本显治所写《关于天皇制批判》。宫本论述道：“天皇通过征服民族得以存在”，“专制君主的永久性支配是该民族的耻辱”。[265]

一方面，天皇制被认为是“民族的耻辱”，另一方面，革命与自治的历史被认为是“民族的骄傲”。1947年当选参议院议员的历史学家羽仁五郎，在1946年3月的演讲中一边强烈批判天皇制，一边以15世纪山城国起义及16世纪堺的自治为例，提出“日本人民自由独立的自治能力、共和制的政治能力，绝不比欧美人民差”。1947年3月，羽仁批判最后的国定教科书《国家的足迹》，认为该书“不将堺的自由都市写进去，我只能认为是对国民毫无自豪感的人所编写的教材”。[266]

羽仁还强调，“天皇制并不像很多人所想的那样悠久，而是很新的东西”；“天皇制是明治维新以后七十年的产物”。1946年9月，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出版了《历史学家如何看天皇制》一书，其中，近代史学家井上清也强调“天皇制是明治以后才开始出现的”。[267]

据井上所述，对封建时代的平民来说其支配者其实是藩主，“一般人民根本不知道天皇的存在”。对天皇的崇拜其实始于明治以后，利用“御真影”的天皇照片等“应用文明利器之法”来灌输给平民。[268]

另外，井上还认为“日本民族与日本国民经过明治维新才开始形成”。[269] 江户时代，“国”是指藩或故乡的词语，“国民”也只不过是指受藩主支配的人民而已。在明治以前根本不存在超越身份与地域的“日本人”这一意识。

事实上，这种民族观在当时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中是主流看法。如第二章中所述，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认为，通过藩与身份将人分类的封建体制被瓦解后，近代市民社会才得以形成。因此，超越身份与地域的“国民”或“民族”意识是近代的产物。

在第二章中，丸山真男的“国民主义”也遵循这种见解。丸山认为，语言与文化的共同性并不是“国民”的条件，而井上也强调，“这里的‘民族’应该相当于英语的nation，而不是race（人种）”。[270]

这样，“民族”是近代的产物这一认识，为战后初期的知识分子所共有。在第Ⅱ部将要论述，这种民族观在1950年代到1960年代一度消失，1990年代又以“国民国家论”之名复活。

但是，战后初期的民族论与1990年代的国民国家论大相径庭。90年代的国民国家论以明治以后的日本是被近代化的“国民国家”为前提批判“国民国家”。与此相反，战后初期的民族论则提倡以“国民国家”为目标推动近代化。

我们在第二章论述了丸山真男战前受到《日本资本主义发达史讲座》的影响。以羽仁五郎为首的该书的执笔者被称为“讲座派”，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主流学派。另外，讲座派将明治以后的天皇制定位为与法国路易王朝相同的绝对王权的一种。这种定位与1932年共产国际就日本现状所出版的《三二年纲领》中将日本定位为绝对王权阶段相呼应。

遵循这种历史观，绝对王权是近代初期的状态，虽然从中世纪封建

制脱离出来，但没有经历如法国革命般的市民革命。日本虽然有一部分近代化工业，但日本社会现在还含有诸多农村的寄生地主制或君主制的残余，也就是天皇制这种近代以前的要素。相反，与寄生地主制支配的农村提供廉价劳动力一样，日本的资本主义也是靠近代以前的要素支撑而形成。

在这种历史认识上，日本共产党提倡“两阶段革命论”，即首先以打倒天皇的市民革命为目标，然后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如第二章所述，建立超越身份与地域的近代国民国家的是推翻王朝的法国革命。如此说来，只要天皇制得以残留，日本就不是国民国家，因此首先要为建立国民国家而废除天皇制。

在这一点上，封建制的残余天皇制与近代的“国民”或“民族”对立。丸山之所以将以天皇制为中心的“超国家主义”与近代的“国民主义”进行对比，就是基于以上历史观。

井上清也基于以上的见解一边批判天皇制，一边强调“真正的‘国民’应该打破封建分裂，所有地方的日本人作为自由平等的人组织起来时才会产生国家”。当然，这里所说的“国民”与被天皇制所支配的“臣民”有所区别，指近代的“自由平等的人”。按照井上清的表述，他们所追求的不是否定民族主义与国家，而是选择“是国民的国家还是天皇的国家”。[271]

在对天皇制的抗议活动中，这一理论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1946年5月19日皇宫前广场举行的“饭米获得人民大会”（即“粮食劳动节”），共有25万人参加。当时，高举批判天皇标语牌的日本共产党党员松岛松太郎以不敬罪被起诉。为该事件辩护的律师正木宏形容天皇制是“亡国性的”，认为“真正的爱国者们站起来的时候到了”。[272]

在这里，“忠君”与“爱国”也被拿来进行对比。支持日本共产党的淡

德三郎于1949年写下《为了新的爱国主义》一文，认为“忠君是封建时代君主与家臣之间的道德，爱国是近代国民国家的国民意识的表现，两者水火不容”。[273] 另外，1951年井上清在《日本现代史》一书中写道：

> ……在我国，日本人的爱国心一直被认为是必须忠君爱国。……也就是说爱国只存在于对专制君主的绝对服从中。其实这不是真正的爱国，这一点现在有很多人都明白了吧。……
>
> ……日本人以天皇为中心保持了“民族”的国民统一，这一历史其实与事实相反，这种貌似统一的东西其实一直妨碍着真正的民族统一与民族意识的成长，现在也还在妨碍着。理解这一点对于我们必须最大限度地发挥爱国心的现在，尤为重要。[274]

与丸山相同，井上也认为明治时期的自由民权运动是“正确的爱国心”的最好例证。在1946年的《历史学家如何看天皇制》一书中，井上将自由民权运动的活动家称作“爱国者”。[275]

井上认为，明治初期，“人民虽然有进入国民国家倾向的萌芽，但还没有充分成长”，就被旧支配者武士建立起天皇制。[276] 而要求政治民主化、呼吁打倒藩阀的自由民权运动，也只是为了超越明治维新的不彻底，试图将日本建设为真正的“国民国家”。

因此，战后的民主化被认为是超越明治维新局限的“第二个明治维新”。如第二章所述，丸山真男认为，“我们现在站在完成明治维新应该实现但没有实现的民主主义革命这一任务面前”。

这种论调在战后初期被广泛认同。丸山真男如此，尾高邦雄也认为“日本人虽然忠君，与西方人相比却不爱国”。经济学家大河内一男也认为，在近代欧洲，“爱国运动经常是平民百姓的运动，换句话说就是与旧有特权对立、为保护新秩序与利益的运动”。社会学家清水几太郎在1949年的岩波新书《爱国心》中强调，在18世纪的欧洲，“保守派尽

量不说自己是爱国者，进步派不仅自称爱国者，也被保守派称作爱国者”。[277]

根据这种论调，1947年评论家荒正人将天皇制称为权威的“纵向联系”，将平等的国民团结称为“横向联系”，并将两者进行比较。尾高邦雄也认为，以前的日本“顺着纵向一线对‘上御一人’尽忠才是关键，而横向团结和横向帮助、为祖国和同胞献身都是次要的”。[278]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以民族主义来批判天皇的论调，与渡边清的“平民情感”在某种程度上有相通之处。与丸山以欧洲政治思想语言所表达的“民主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综合”类似，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或由“国民国家”一词表现出的“反抗天皇的民族主义”，都是在战争这一共同体验中产生的“真正的爱国”的心情之下才得以成立。

“主体性”与天皇制

对天皇制的批判与战后人们拥有的另一种心情结合在一起，即对以官僚制为代表的权威的批判与“主体性”的确立。例如，井上清1946年写下了如下逸事：

> 看看大众历史意识的成长吧。4月7日，在东京日比谷公园召开的由民主战线各团体主办的人民大会在首相官邸前举行游行。当代表将人民的要求向副书记官交涉时，7万工人、农民、市民聚集在首相官邸前，举行了很多演讲。当时，一位从浦贺久里滨来的20岁左右满脸紧张的女性做了如下发言：久里滨有大量军用木材。久里滨的人们平日煮饭用的燃料不够用，所以请求复员省[279]将那些木材，即便是一部分转让给我们也好。但是，复员省不予批准。可是，不久那些木材就以差不多1石20日元的价格出售给某工厂了，这几乎等于是免费呀。知道这件事后，村民们对复员省请求道：既然以那么低的价格转售给一个资本家，也请转售一些给我们当地的老百姓吧。但是，一两个人去交涉没有用，复员省不仅没有答应请求，反而以违反规则为由，威胁那些人。“我觉得这就是天皇制”，那位年轻女性批判完后，掌声一直回荡在官邸深处。[280]

战后半个世纪以后，已经没有人用“天皇制”来表述官僚的权威状况。但在当时，“天皇制”一词作为战时强迫人们成为隶属的象征而被广泛使用。

被置于“天皇制”对立面的是“主体性”、“连带”、“团结”等词。井上接着写道：“久里滨的妇女终于团结起来，四百余人赶到复员省，以大众的力量让要求得以实现。‘团结才是我们唯一的力量。’演讲结束后，再次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这种形容连带状态的词语，是与天皇制处在对立面的“国民”或“民族”。

再者，“天皇制”被认为是破坏“国民”连带，令本位主义与自私主义蔓延的东西。清水几太郎在《爱国心》中批判战时的“忠君爱国”，称“日本人的忠义本质上是‘孤忠’，是忠义的独占。同等地位的同胞是竞争者，或者不如说是敌人”；日本人“以自己对天皇的孤忠表明自己爱国”。[281]

当然这种观点也是基于破坏“国民的人性连带”的战时体验。1952年，伊藤恒夫以战时的“囤积、惜售”为例，强调战前日本的“忠君”不是“民主的同胞友爱”。[282]

当时的天皇制争论强调天皇制阻碍了伦理感、责任意识，也就是“主体性”的确立。

例如，丸山真男主张“以天皇为领袖的权威等级制度”妨碍了“自由主体”的形成，使“无责任体系”得以形成。因此，像东条英机那样的当政者也只有顺从天皇权威的“小心翼翼的臣下”意识，在现实政治中成为“下属的机器人”，而对责任毫无自知。[283]

事实上，丸山的这种天皇制观并不是战后才展开。丸山在1958年的座谈会上透露，他在广岛陆军船舶司令部服役时，担心日本投降后天皇

会受到处置的参谋要求他在8月16日讲解“民主主义”。当时，丸山回答道，民主主义“被灌输为违反君主制是错误的”，“民主化并不一定要把天皇怎么样，请放心”。当然，通晓欧洲政治思想的他，对王权与民主主义共存的英国了如指掌，因此，“那样回答并不是想拍参谋的马屁，而只是我当时的想法而已”。[284]

丸山也参加了1946年2月东京帝国大学组织的宪法研究委员会。该研究会的会长是宪法学家宫泽俊义。宫泽当时因主张在立宪君主制框架内稍加修改《大日本帝国宪法》来充当战后宪法而闻名。[285] 另外，后面将要述及，丸山敬爱的恩师南原繁也是象征天皇制的支持者，这或许是丸山远离天皇批判的又一原因。

使丸山见解发生转变的，或许是战后的政治局势。与他的预料相反，论述民主主义与天皇制共存的论调在言论界泛滥。1945年9月2日的《每日新闻》认为“并不是向美国的民主主义投降，而是建立以皇室为中心的民主主义”。1945年8月25日的《读卖新闻》也提倡发挥“国体护持”与“大和魂”的“日本民主主义”。政治学家蜡山政道在1946年1月的论文中主张“我们日本的国体进步的精神”“与世界政治公理及民主主义相通”。[286]

在这样的局势下，战时攻击“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政治家也开始打出民主主义的口号。在1945年12月的议会上，鸠山一郎宣传“君民一体的民主政治”，由战时的翼赞议员构成的保守政党也引证英国的立宪君主制来拥护天皇。[287] 甚至昭和天皇在1946年元旦的诏书（即《人间宣言》）中，也将明治天皇的《五条誓文》定位为“民主主义”的鼻祖。

这些政治家与媒体的变节招致许多人的反感。当时的年轻评论家加藤周一在1946年3月写道：“为建设日本独特的民主主义而模仿英国制度，这简直就是连反驳价值都没有的滑稽矛盾。”丸山也于1951年写

道："平日宣扬以死报国、说死轻于鸿毛的军人及右翼团体，面对屈辱时，基本上没有选择死，这已经是很讽刺的事实。甚至他们中的大多数昨天还高举法西斯的标语，今天就迅速换上'民主主义'的口号，力图保存旧有组织而再次出发。"[288]

《世界》杂志1946年第4期刊载了丸山从战前就一直尊敬的历史学家津田左右吉提出的天皇拥护论，其内容也是宣传"国民爱戴天皇，因为爱才会有真正的民主"。[289] 翌月，丸山同样在《世界》上发表了《超国家主义的逻辑和心理》一文。

但是，这篇论文即便是批判性地论述"以天皇为领袖的权威等级制度"，也没有直接提倡谴责天皇。丸山即便批判天皇制是阻碍"自由主体"形成的社会结构，对天皇个人还是怀有敬爱之心。1989年昭和天皇去世时，对战败后时隔8个月发表《超国家主义的逻辑和心理》一文的过程，丸山回忆道：

> 这篇论文是我对裕仁天皇及近代天皇制，自中学生以来的"深思"所画下的句号。在这个意义上——与该论文的客观价值毫无关系——对于我的"自我历史"而言也是划时代的大事。战败后，苦恼了半年，我终于得出结论，这个结论就是，天皇制对日本人自由人格的形成——遵循自己的良心判断和行动，对其结果能自己承担责任，归根结底就是拥有能采取跟依靠"侍宠"相反的行动模式的人类类型的形成——有致命的阻碍。当写那篇论文的草稿时，我反复对自己说："这是学术论文，所以涉及天皇及皇室的文字不需要用敬语。"在别人眼里，这篇论文的每一行或许都是我"思想"的表露，但其实对于我来说，就好像是在拼命劝说昨天的自己。我与近代天皇制的关系是那样深厚，以至于从天皇制的"魔力中解放"出来，对我来说也并不是一个容易的课题。[290]

丸山在回忆中坦陈了见到战前身着军服出行的天皇与战后新闻纪录片里播放的地方巡幸时"像傻瓜一样重复'啊，是吗'的驼背的天皇"这一差距而烦恼。"天皇为什么从那样笔挺的姿势变成了佝偻，这是一个到今天为止都无法解开的疑问。"[291] 由此可以说他对天皇个人的"深

思”一直持续到1989年。

之后的1960年，丸山撰写了《忠诚与叛逆》一文。其内容是论述江户后期到明治时期的“叛逆”思想，其实是“重新定义”“忠诚”，“将对国家的忠诚与对君主及上司的忠诚区别开来”而产生的论文。[292]

因此，“叛逆”只会发生在“忠诚”度极深的人身上，并不会发生在对君主与国家毫无关心的人身上。在此丸山引用参与暗杀恺撒大帝的布鲁图斯的话“并不是因为对恺撒爱之淡薄，而是出于对罗马爱之深切”为例。[293] 由此可以说丸山既对天皇抱有敬爱之情，又成为“叛逆”天皇之人。

丸山的批判同时也是针对那些战时宣扬“鬼畜英美”、战后又趁机高唱“民主主义”的人。1947年，教育学家宗像诚也写道：“朋友中有人说话刻薄，说连军国主义都没有彻底奉行的国民又怎能体会民主主义呢？（我要将）这句刻薄的反话送给那些临时速成的民主主义教育解说员。”[294] 如前所述，丸山也批判“平时高唱以死报国”的军人及右翼战败时都没有自杀，转而高呼“民主主义”。当然，丸山也好，宗像也罢，都不是主张对“军国主义”忠诚，但可以窥视其表达的心情。

丸山在1950年的座谈会上，讲述了战败时他所属的陆军船舶司令部里，发生了“国土防卫派与承诏必谨派的分裂”。当时，面对服从天皇命令投降的“承诏必谨派”，“国土防卫派”认为“命令投降及允许外国军队进驻的天皇已经不是我们的天皇了”。[295]

当然，丸山并没有偏袒任何一方。他自己在战败时，对军国主义体制的瓦解感到解放。但是，他或许与当时多数日本人一样，为“忠君”与“爱国”的分裂使得“结局变得模糊不清”感到遗憾。

不用说，丸山所主张的是构建独立于天皇的民族主义。1952年，在

以“日本人的道德”为题的座谈会上，丸山主张“不应该认为没有天皇制就没有民族的统一，如果不借助其他的权威，民族统一得不到保障，只有脱离这种遗憾的状态，日本民族才会得到精神上的独立”。“我相信不打倒这种状态的话，日本人的道德独立无法实现。” [296]

持有同样论调的不只是丸山一人。1949年，英国文学评论家中野好夫论述道，“我不知道还有多少人尊敬天皇”，但是“天皇制如果永久存续下去的话，日本人将无法获得真正的自己治国的政治能力，或许将永远停留在半永久的未成年阶段”。[297]

据中野所述，真实地再现这种状态的，是天皇的投降决定。当时的保守派中，不少人以天皇排除军部的反对结束了战争为由拥护天皇。但是，中野认为，决定战败的过程“不是国民自身政治能力的自豪。相反，正暴露了我们作为一个国民还处于未成年阶段的事实”。因此，“只有以废除天皇制为目标实现国民的成长”。

与丸山、中野提倡以废除天皇制来实现“精神独立”相反，保守派中也有人主张如果废除天皇制，日本将发生混乱。法学家田中耕太郎、伦理学家和辻哲郎认为如果废除天皇制，政治能力低下的日本国民及政党将陷入“无政府与独裁”的危险。[298] 不少被称为“老一代自由主义者”的保守派知识分子将这种蔑视民众观与拥护天皇论连在一起，这将在第五章论述。

然而，这种论调被羽仁五郎在1946年形容为“对日本人自治能力的重大侮辱”。[299] 加藤周一也于1946年3月发表《论天皇制》一文，谴责保守派“恬不知耻”。加藤晚年写下了这样说的理由：

> 在1945年战败成为事实时，考虑是投降还是抗战的日本统治阶层心里想的是：如果投降的话，天皇的地位怎么办？而抵抗的话，至少数十万，或许数百万的毫无关联的人会牺牲。对他们来说，一个天皇比日本所有的人民都还要重要。但是，他们投降后却说，如果废除天皇制的话，社会将

> 陷入混乱。那时，作为一个默默无闻的日本人，我针对他们写下了《论天皇制》，说他们“恬不知耻”。日本国属于日本人民。对那些将日本人民当作傻瓜、轻视他们生命的人，我感到怒不可遏，或许那就是所谓的爱国心。[300]

这里所说的“人的牺牲”，对于刚刚战败的人们来说并不抽象。战败时26岁的加藤，失去了许多同龄的朋友。据加藤说，“太平洋战争害死了很多日本青年，害死了很多我的珍贵朋友。我活了下来完全是偶然。战争不是自然灾害，是政治领导者们毫无意义的愚蠢行为。我对他们及追随他们的人感到愤怒”。于是，加藤在1946年的《论天皇制》中批判天皇制“剥夺个人自由意志，消解责任意识，使道德败坏”。[301]

“武士道”与“天皇解放”

同时颇具意味的是，丸山与加藤一边提倡确立近代“主体性”，一边频繁使用“没有选择死”或“恬不知耻”等旧式词语。

这种论调也散见于同时代的其他论者。比如民法学家戒能通孝在1948年5月的文章中，一方面批判天皇制是“首肯不负责任的制度”、“不制造‘国民’”，另一方面认为保守派“应该在新宪法颁布前切腹……以向天皇‘道歉’”。[302] 废除天皇制等“近代”取向与“切腹”的“武士道”意味的责难，在伦理上应该相互矛盾。

然而，这两者又在为自己的言行担责、不“卑躬屈膝”这一点上是共通的。当时，“天皇制”不仅意味着君主立宪的政治制度，也是与战争的屈辱记忆结合在一起的词语。与这种“天皇制”对置的“主体性”，既由“近代”一词，也由“武士道”等旧式词语所展现。

丸山也在1948年的《自由民权运动史》中认为，“初期的自由民权论者因为有武士道这一道德，所以才有对主义的节操、为了主义不惜生命的气概支撑着自由民权运动”。正因为“这种武士道精神”消失了，“运

动才会失败”。[303] 这种“武士道”的评价是否与历史事实相符姑且不论，但可以看出丸山战败后的心情由这些词语表现出来。

在1960年的《忠诚与叛逆》中，丸山将以“忠诚”为首的“武士的精神气质”与“叛逆”联系在一起，强调论述“明治”的民权运动时，“不仅是进步性的，也有‘封建的’‘制约’这一观点，同时，正因为‘封建的’才变成抵抗的能量这一侧面”的评价是必要的。[304] 或许，丸山也将自己对天皇的“深思”化作“抵抗”的源泉。

当时，“人”、“人权”等词经常被赋予“武士”色彩。1948年1月，出身于受歧视部落的社会党议员、曾是参议院副议长的松本治一郎，在国会的开幕仪式上，拒绝拜谒天皇。松本事后写下《记不拜谒天皇》一文。他认为，对天皇的拜谒“伤人自尊”，强调“不能沉默，不能哭泣，必须竭尽全力保护基本人权”。[305] 这里所谓的“人的尊严”、“基本人权”是“武士道”的同义词。

这种“人”、“人权”也与提倡“自主独立”的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松本于上述文章中论述道：“今后，日本人如果想在国际上堂堂正正地活下去，首先不能卑躬屈膝”，“如果有威胁日本人权利与幸福安全的国家，无论是哪个国家，我们都必须高举民族的基本人权旗帜，舍身保护我们的国家”。[306] 这种“民族”取向最终与抵抗逼迫日本再次武装的美国的和平主义连接在一起。关于这一点将在第Ⅱ部详细论述。

另外，“天皇制”压制“人”这一认识与对天皇个人的尊敬交错之处产生了一个新观点。将昭和天皇作为一个“人”从天皇制中解放出来，也就是“天皇从天皇制解放出来论”。这样说是因为根据战后的新宪法，天皇既没有参政权，也没有信仰及言论出版的自由。

战后初期，皇族中也有人从天皇制解放出来。昭和天皇的弟弟三笠宫回忆战后初期时写道：“我很快乐。30岁第一次尝到一个人走在街上

的快乐。”有了自己从权威变得自由，周围人也能轻松接近自己这一经历后，他说：“当看不见的栅栏被撤掉后，不仅是关在栅栏里的人变自由了，就连外面眺望的人也自由了。”[307]

三笠宫战时作为陆军军官曾在中国战场服役，他目睹过日军军纪败坏及中国共产党军队军纪严明。因此，他对支撑人类道德的宗教表示出强烈兴趣，战后在大学里重新学习和研究希伯来史。对于此动机，他写道：“对过去的所有东西都感到失望、不再信任的我，必须探求一种新的东西。”[308]

战后初期，这种自我革新的取向也在皇族中被共有。三笠宫随后在1957年，以神武天皇降临神话为依据，认为建国纪念日没有科学根据。然而，昭和天皇没有这样的自由。

高呼将昭和天皇从“天皇制中解放出来”的是日本共产党作家中野重治，他曾于1947年当选参议院议员。1946年11月中野发表的小说《五勺酒》中，借助出场人物对昭和天皇这样描写道：

> 真是太可怜了。……个人绝对成不了个人。这也就是整体主义将个人牺牲最纯粹的情况。哪里还有那种被蹂躏到必须发表“我不是神”的宣言的个人呢。……将他们作为个人解放吧。我很想知道，日本共产党对因为天皇制而窒息的天皇本人，同情到什么程度，对将天皇从天皇制解放出来有多少同情及责任。[309]

当时的中野，与谴责昭和天皇为“战犯”的日本共产党干部步调一致，在时评中批判天皇是“国民道德败坏的根源”。但另一方面，他在题为《五勺酒》的作品中说：“我对天皇个人表示同情。”“应该从耻辱、堕落的天皇制中将天皇解放出来，如果不这样的话……哪里有民族道德的重生呢？关于这一点，相对来说日本共产党最容易忘记。”[310]

其实，中野批判天皇的依据也是对战死者的回忆。他在当时的时评

中评论天皇为“国民道德败坏的根源”，是因为天皇在元旦诏书《人间宣言》中“只字不提无数的战死者”。[311]

中野曾被征召入伍，与当时的丸山一样，复员时的外出服装也是军服。中野在时评与《五勺酒》中，表达了对饥寒交迫、被长官抛弃、被强迫染指残忍行为的士兵的同情与共鸣。他在时评中写道：“那时候军队所处的位置是一般国民所处位置的象征”；“国民对军国主义的批判，与国民对‘随着命令抛弃身家性命’而战斗的士兵的同情一样”。另外，《五勺酒》中还写道：“战死者的葬礼在学校举行有什么错？町会也应该出来，学生也应该出来。在公众面前安葬这些战死者，大家才会明白他们牺牲的意义。”但另一方面，他又高唱“将天皇从天皇制中解放出来”。[312]

中野的这些主张实际上与日本共产党的正式方针一致。曾亡命中国的野坂参三，担任过劝降中国共产党所逮捕之日本兵的任务，他在此过程中感到，多数士兵虽然赞成改革日本体制，但都对天皇表示出强烈的留恋。

因此，野坂认为，天皇制的存废应由全体人民投票决定，如果赞成存续占多数的话，可以用“没有专制权的天皇”这一形式让步。[313] 事实上，当时的舆论调查显示，不少支持日本共产党的人同时也支持天皇。[314] 然而，获释出狱的德田等人极力主张废除天皇制，两者妥协的结果是，提出废除天皇制的主张，但天皇家的存废与天皇个人待遇另当别论。

于1930年代被捕，之后一直在狱中度过的德田球一与宫本显治等人不了解战时日本社会的氛围。因此，他们没有充分理解野坂直面的战时高扬的天皇崇拜与中野重治提出的对战死者的哀悼惋惜。这种情况也对战后日本共产党运动方针产生了微妙影响。关于这一点，之后再详述。

不管怎么说，中野的观点夹杂了对天皇个人的尊敬与对天皇制的批判。写下《加入共产党之辩》的森田草平也说："即便天皇要被送上断头台，我作为日本共产党党员也绝不会署名。因为我是分开考虑天皇一家与废除天皇制的。"日本共产党之外的论者，例如中野好夫等人也认为废除天皇制的主张与"对天皇个人的私人感情完全不同"。[315]

他们认为，给人们带来屈辱的社会性心理结构的"天皇制"理应废除，但并不一定要处置天皇个人。他们所主张的是重建新民族主义与道德，借中野的话来说，就是确立"民族道德"。

为了确立"民族道德"，天皇必须采取一种形式来承担战争责任。而制度上保证该问题的便是修正《皇室典范》。事实上，天皇被要求退位，而《皇室典范》里根本不存在退位这一规定。

在议会中提出该问题的是当时的东京大学校长、贵族院议员南原繁。

天皇退位与宪法

> 我们的民族即便犯过错误，我们仍为生活在该民族中感到喜悦，无限热爱该民族。因此，我们必须自己鞭挞自己的民族，在世界面前恢复其名誉。

这是1946年2月11日，战败后最初的"纪元节"，东大校长南原繁以《新日本文化的创造》为题所做演讲中的话。[316]

南原原本是研究19世纪德国哲学家费希特思想，同时兼任贵族院议员的政治家。他在战争后期，与田中耕太郎、高木八尺等六位教授一起以陆军有志之士与重臣为对象做了和平工作。

当时他们提出除了"捍卫"天皇制之外无条件投降的投降计划，但是

南原同时也建议让天皇承担道德上的责任而自动退位。[317] 战后，他为实现天皇退位而不断摸索。

南原与丸山相同，认为战败的原因是没有确立近代主体性。他在前述演讲中批判“军阀”、“官僚”的同时，强调日本“没有像西欧诸国那样拥有文艺复兴的经验”，因而“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意识确立得不充分”。[318]

同时，南原与战败后多数知识分子一样是狂热的爱国者。在这个演讲中，除了对战争的反省，他也呼吁“真正的‘国民性’、‘热爱祖国’”，当时特意在东大正门上悬挂被占领军禁止的日章旗。[319]

与丸山、大塚相同，南原所谓的“一个独立的个体”也与“利己的享乐功利主义”不同。他在当时的演讲中，将“真正的自由”与“个人自由主义”区分开来，形容民族为“创造自由精神的场所”。[320]

南原将“民族”形容为“创造自由精神的场所”是受他所研究的费希特思想的影响。如第二章所述，19世纪的德国哲学多认为在致力于追求个人利益的近代市民社会里，即便有形式上的“个人自由主义”，也并不存在“真正的自由”。黑格尔提出，国家应该是马克思可以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人类可以实现“真正自由”的社会。费希特则认为“民族”才是可以实现这些的场所。

南原认为，费希特所谓的“民族”，与马克思主义或丸山真男所提倡的“国民”或“民族”一样，由具有近代主体性的“独立人”构成。人类如果作为抽象的孤立“个人”，将不具有伦理标准，也得不到“真正的自由”。人类只有成为具体的、历史的共同体，即“民族”的一员，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才能参与民族国家的集合，即国际社会。[321]

南原于1942年11月出版的《国家与社会》中概述费希特思想的同

时，尤其强调费希特思想与纳粹相异。南原认为，纳粹所谓的“民族”，旨在抹杀人类独立与自由，大肆宣传民族之间的憎恨，而费希特所谓的“民族”，是保障人类独立与自由、通向国际社会的基础。[322]

南原战后强调对“民族”的爱、悬挂日章旗都是在模仿费希特。普鲁士被拿破仑打败后，费希特进行了题为《告德意志民族》的演讲，呼吁个人的自由与对民族的爱，并提倡在此基础上展开培养爱国心的“国民教育”。

战败后的日本，除了南原外，还有许多人对费希特思想产生了共鸣。第九章将要述及，与日教组[323]关系密切的德国史学家上原专禄也模仿费希特提倡“国民教育”。曾是南原学生的丸山真男也回忆道：“复员后站在讲坛上，首先想到的是费希特的《告德意志民族》。”[324]

如第二章所述，当时多数知识分子都推崇19世纪的德国思想。直面战败这一屈辱的知识分子们，从自己的知识文库中寻求对应这种事态的思想时，提倡爱国心与自由共存的费希特思想作为表达他们心情的媒介，魅力十足。

当然，南原与丸山也有差异。比丸山年长的南原，对天皇绝对忠诚。1946年4月天皇生日时，南原在演讲中说道：“即便天皇失去政治权限，作为日本国民象征的天皇制将永久维持下去，并且必须维持下去。”[325]

这种天皇观与南原的思想关系密切。南原认为伦理的源泉及民族共同体必须超越个人。以这种共同体的整体意见为基础确立的民主主义，也必须依据“国民的共同观念”。而日本的民族共同性，必须以天皇为象征，“并以天皇为固有的思想基础，创造出全新的共同体”。[326]

这种思想与和辻哲郎、津田左右吉等主张民主主义与象征天皇制共

存的论者有相通之处，尤其是和辻提倡在“作为民族共同体象征”的天皇身边实现民主主义。[327]

然而，南原与和辻、津田等人在追究天皇战争责任问题上意见相左。

根据南原的思想，民族共同体不能如纳粹所言建立在“鲜血与土地”上，而应该产生于“自由独立”的近代个人相结合之时。这样的话，天皇也必须是“自由独立”的个人。

对拥有这种认识的南原来说，1946年元旦天皇发表的《人间宣言》应该是新时代天皇制的基础。南原在前述1946年2月的演讲中，将《人间宣言》比作西方的文艺复兴。

也就是说，西方通过文艺复兴否定了宗教统治，“发现了人”。因此，天皇自己否定神格化的《人间宣言》，是“从日本神学及神道教义中解放天皇自身，是天皇人性的独立宣言”，完全相当于文艺复兴。[328]与此同时，日本民族也转变为拥有“自由”与“世界性”的近代民族。[329]

然而，南原也认为，正因为有《人间宣言》，才必须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因为近代的个人，有判断自己行动的自由，同时应承担其行动的责任。

日本民族一旦转变为由近代个人构成的民族，象征该民族共同体的天皇便蜕变为体现责任伦理的存在。因此，南原在1946年的演讲中，主张“天皇自身根据自由的原理，必须承担率先为国民做出典范的理想上、精神上、道德上至高无上的责任”。[330]

南原想到东京审判上被问及战争责任的高级军官始终回避自己的责任，说道：

> ……使国民陷入自建国以来最彻底的失败与悲惨的境地，我强烈认为，对祖宗、对国民，感到道德上、精神上责任最强烈的应该是陛下。在诸臣子回避责任之时，陛下担心的应该是国家至高无上的道德。由此，我国皇室到目前为止作为国民生活的中心备受尊崇，今后也将是重建祖国的精神基石。[331]

这种由对天皇的敬爱产生的战争责任论，虽说来源于费希特的民族观，但渡边清及三好达治等人也有相同的心情。也就是说，南原也与丸山、大塚等人一样，用思想及学术的语言表达了同时代人所共有的心情。

同时，作为贵族院议员的南原也将这种观点传达给了政府。1946年12月，当贵族院审议对应象征天皇制的《皇室典范》议案时，南原主张将天皇自主退位写入典范。

在审议中，南原认为元旦诏书是“天皇人性独立与解放的宣言”。[332] 他同时说道：“上对皇祖，下对国民，我认为陛下最感到责任深重。”即便如此，天皇期望“作为一个自由的人”退位，而现行的《皇室典范》里没有这一条规定。这“难道不是对作为自由人的天皇的人性否定吗？”

南原在该演说中，认为“重建祖国的精神基础在于象征国民的天皇的进退”。同时他也声称如果为保护天皇的地位，“而出现阻碍天皇自律之道德意志，颠覆陛下圣举的结果的话……那其实只是疑似忠诚，离真正的忠诚还很远”。这里的近代自由与责任的思想也通过“真正的忠诚”这一“武士道”词语表现出来。

再者，南原这种主张的背景也有对战死者的记忆。南原在1947年东京大学毕业典礼上的演讲中，称战后日本的民主化为“人间革命”，“而这种革命不一定是人们所说的‘无血革命’。在战争中牺牲了数百万同胞，其中也流着曾经与诸位一起学习的很多年轻学子的鲜血”。[333]

南原在晚年无法忘记那些“将在大学里的实验及研究的成果总结成或许成为遗物的报告留给教授后上前线的学生们”，“当时，我感觉政治无论好坏，离开了民族将无从谈起。同时，我痛感民族是命运共同体”。这些学生多数因不计后果的国策而无谓牺牲。也就是说，这些对战死者的记忆以高举“民族”旗帜的战争责任论的形式出现。

退位论的终结

然而，南原的修正意见因反对派占多数而没有通过。在《皇室典范》修正审议之前召开的宪法修正审议中，关于天皇的规定也成为争论焦点。

但是新宪法对于天皇的规定只能用模棱两可一词来形容。吉田茂首相与金森德次郎主管大臣的国会答辩概要如下：

首先，日本政府是以“护卫国体”为条件接受《波茨坦宣言》。联合国没有就这一点给予回应。吉田认为，所谓“国体”，是指“万世一系的皇室在上，君臣之间没有对立关系”的状态。因此，天皇即便失去政治实权，“国体”也不会发生任何变化。[334]

据金森所言，新宪法规定主权在“国民”，而“国民”也包含天皇。也就是说“主权在含有天皇的国民共同体之中”，“根本不存在天皇处于次于国民的地位这一思想”。[335]

依据金森的答辩，在起草新宪法时，为寻找既含有天皇又含有民众意味的词语费尽周折。因为战前的《大日本帝国宪法》明确区分了“君主”与“臣民”。在起草新宪法时，他们认为天皇并不是“民”，因此提出使用含有天皇概念的“国人”一词，但最终取消“君与民的区别，以国家构成者这一思想来概括”，采用“国民”这一词。另外，金森称天皇是“国家与民族的象征”，很明显这里所说的“国民”，不包含日本民族以外的

团体。[336]

针对政府的答辩，法学家、贵族院议员宫泽俊义问道："既然把天皇放在拥有主权的一切国民意识之中，那么又说国民中包括天皇，难道不矛盾吗？"同样是法学家的贵族院议员佐佐木惣一也认为，"不能说民众中有君主"。[337] 然而，政府方面依旧坚持上述模棱两可的答辩。

象征天皇制，一方面是民主化政策，另一方面也是为免除战争犯罪追究。美国占领军期待天皇协助占领政策的实行，因此也将天皇排除在战犯追诉的范围之外。但是，美国本土的舆论，中国、苏联、澳大利亚等都强烈要求起诉天皇。

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为免予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另一方面又不明确剥夺天皇主权，便诞生了新宪法中"国民"这一概念。金森说，关于天皇地位的规定，"为了既保有应有的权能，又远离现实的责任纠纷"，宪法中的"一言一句，像削玉磨石一样，费尽心思"。[338]

金森的答辩认为，新宪法中规定天皇是"国民以天皇为中心结合在一起的道义"象征。这样的天皇不仅在政治上没有权力，借司法大臣木村笃太郎之言，天皇甚至也"没有刑事上的责任、民事上的责任"。金森还说："起草该宪法是为了不让天皇负责任……天皇没有责任。"[339]

但政府认为，天皇是日本"道义上"的象征。既然如此，倘若"天皇没有责任"，猪木正道所言"天皇是日本国民不负责任的象征"的解释也就得以成立。

参加此次审议的南原反对如此修正宪法。他在贵族院提问道："首相说这是为了皇室的安泰，但是保留天皇制，真的就维护了皇室的名誉吗？这是国民的荣誉吗？"[340] 4个月后，南原在议会上提出《皇室典范》修正案，但他的意见没有获得通过。

新宪法施行后依然存在天皇的退位问题。1947年10月，东京审判首席检察官季南（Joseph Berry Keenan）向当时的外相芦田均说，虽然不起诉天皇，但“天皇退位后，可以由皇后摄政”。[341] 1948年芦田成为首相时，发生松本治一郎拒绝拜谒天皇事件，海外媒体风传天皇即将退位。

1948年，“天皇退位论”更是达到顶峰。5月，最高法院法官三渊忠彦与法学家佐佐木惣一谈论了天皇退位。以此为契机，5月27日，伦敦发出的路透社电文说“在东京广为流传天皇将在8月15日退位”，《朝日新闻》在5月29日转载了这一电文。[342]

另外，中国的通讯社中央新闻社也报道南原繁的谈话：“有高深教养的日本人，都认为应当通过退位来免除天皇制带来的战争责任，他们对此一致赞同。”甚至6月的《新闻周刊》中也有退位的相关报道。读了这些报道，芦田首相说：“我自己已经有决定了。”[343]

原本，在当政者之中，也潜伏着退位论。早在1945年1月，近卫文麿就认为，“不只有退位这一解决办法，也可以入住仁和寺或大觉寺，为战死士兵供奉英灵”。另外，根据池田纯久陆军中将的回忆，在决定投降的1945年8月的御前会议上，枢密院议长平沼骐一郎说：“这次战败，天皇陛下，您也有责任。您该怎么向皇祖皇宗的英灵交代呢？”[344]

退位论也在军部抬头。像渡边清这样为战争尽忠的军人更是有可能转为对天皇的叛逆。在第二复员省（旧海军省）的大臣官房临时调查部员丰田隈雄的业务笔记中，1946年11月记录道：“陆军中似乎有人劝说天皇退位。也有人说如果天皇陛下重整军备的话，已经无法得到忠诚的军队。”原内务大臣安倍源基在1947年10月7日的日记中写道，作为战犯收押在巢鸭监狱的高桥三吉海军大将说过：“我是天皇制支持者，但现在对天皇的尊崇已经消失了。”[345]

拥护天皇制的论者中，赞成退位的人占大多数。1948年日本舆论调查研究所的调查报告中，介绍了有关天皇退位论的知识分子的意见，其中包括“想保留天皇制的人最好也采取这个政策”（末松满），“有必要将天皇制带上纯正之道”（矢部贞治）。[346]

1948年8月15日，《读卖新闻》刊载了有关天皇的舆论调查。根据该调查，支持天皇制存续的占90.3%，支持天皇留任的占68.5%，让位于皇太子的占18.4%，而认为天皇应退位者中主张废除天皇制的占4.0%。

但是舆论中，阶级差别相当明显。1948年9月，日本舆论调查研究所从《日本文化人名鉴》中随意抽出的文化界人士、议员及财经界人士中，选择了一千名“领导者阶层”进行了关于退位的调查。据此，“政治、法律、社会问题相关的文化界人士”中赞成退位的占50.9%，反对的占42.9%，知识分子中退位论占优势。另外，1948年6月，大阪舆论调查研究所在大阪府实施的调查中，支持退位的占26.9%，其中高专、大学毕业生中49.7%支持退位。[347]

或许当时的人们对于“天皇制”，只是单纯地分为“赞成”或“反对”。如果“废除天皇制”意味着对天皇处刑的话，森田草平、中野好夫甚至连丸山真男都不会支持。相反，如果“天皇制”是官僚统制与“无责任体系”的代名词这一认识渗透到人们当中，赞成“废除”的人会更多。

或许，大多数舆论调查显示，多数“支持天皇制”的人，即使是丸山真男这样的知识分子，也有对昭和天皇的朴素留恋。但是，知识分子及高学历阶层，对天皇个人的爱戴与“真正的爱国”心情发生了分离。这种心情绝不孤立于民众。从渡边清的日记中可以看出，连村子里都有接受天皇处刑作为既成事实的氛围，那么社会不发生混乱而接受退位也大有可能。

然而，“支持天皇论”在政治层面上含有其他意义。1948年日本舆论

调查研究所的调查中，众议院议员赞成退位的有6.2%，参议院议员中也只有21.4%，议会中大多数反对天皇退位。[348]

议员们担心，如果赞成天皇退位，会失去那些朴素表明“支持天皇制”的人的支持。同时，如果以天皇退位挑明战争责任，政界、财经界、地方权力阶层也有可能被追究战争责任。爱媛县某非全日制高中生说道，之所以没有明确天皇的战争责任，“是因为如果天皇有责任的话，很多人也不得不承担责任”。[349]

另一方面，主张废除天皇制的日本共产党也对天皇退位论持戒备态度。已经是参议院议员的中野重治，在1948年的时评中写道：“虽然并没有明确表示反对日本共产党，但也绝不赞成日本共产党的人们，为拥护天皇制而使出最后的狡猾手段，就是提出天皇退位的问题。”[350]

最重要的是，占领军反对天皇退位。1946年1月，麦克阿瑟对陆军总参谋长艾森豪威尔说道：如果废除天皇的话，“游击战会在各地兴起，共产主义的组织活动也会产生。战胜他们，需要一百万军队及数十万行政官和战时补给体制”。1946年2月27日，枢密院大会上，三笠宫劝告昭和天皇退位，前首相东久迩向AP通信的记者说道：“天皇会在合适的时间退位。”但是，1946年3月5日，侍从次长木下的日记里写道：“天皇有退位的倾向，皇族都很赞成。这将会使好不容易坚持到现在的M（麦克阿瑟）的努力化为泡影。”[351]

1948年，退位问题备受关注，美国方面的意思也很明确。7月，纽约的UP电文评价昭和天皇的存在“对麦克阿瑟元帅来说相当于20个师团”。10月，麦克阿瑟对驻日盟军最高司令部（GHQ）顾问西博尔德说：“下次见到天皇，一定要向他忠告，退位很愚蠢。”[352] 因此，受美国战略的支持，天皇最终没有退位。

之后的天皇退位论，在《旧金山和约》生效前达到顶峰。1951年10

月，作为战犯关押在狱中的原内务大臣木户幸一传话给昭和天皇，劝其退位："如果不这样的话，皇室最后会变成不承担责任的皇室，成为永久的祸根。"在翌年1月的众议院上，国民民主党的年轻议员中曾根康弘主张，为了"更好地铭记战争牺牲者，树立天皇制的道德基础"，天皇应该在和约生效之前主动退位。但是，当时的吉田茂首相驳回了这些意见。[353]

和约生效之前，天皇身边发生了两件事。一是1952年5月2日，战后第一次由政府主办的全国战死者追悼仪式在新宿御苑公园举行，天皇出席仪式并致辞。其内容为追悼"因战乱而死在战场上的、殉职的，或死于非命的"人们，并未提及天皇自身的责任。[354]

另一件便是1951年11月12日，昭和天皇巡幸京都大学时发生的"京大事件"。当时正值朝鲜战争，学生丸木位里、俊子夫妇主办了展出"原子弹爆炸之图"的"原子弹爆炸展"，10天内共计3万人参观了该展览。为迎接天皇，后来成为导演的大岛渚等学生合唱了《守卫和平》，高举着"不能忘记喊着'天皇陛下万岁'而死去的前辈们"的标语牌，并且制作了题为《告人间天皇》的公开质问信。[355] 该质问信内容如下：

> 我们希望你退位并废除天皇制，但如果你自己不愿意的话，至少应该作为一个人，倾听在宪法上被你象征的人的呼声，对我们的质问作为一个普通人来回答。
>
> 质问
>
> 1.如果日本再次被卷入战争的话，曾经在结束战争的诏书上发誓开拓万世和平之路的你，作为个人也要向世界呼吁拒绝战争。这种准备你做好了吗？
>
> 2.如果日本被要求再军备的话，作为在宪法上发誓放弃武装的日本国的天皇，你做好了呼吁拒绝军备的准备了吗？
>
> 3.因为你的活动，京都很多地方的自由被限制，而且为了准备你的活

动，本应该给众多贫苦百姓的数百万日元被白白浪费了。你希望老百姓有这样的不自由与浪费吗？

4.你来京大最有必要的不是听教授的讲义，而是了解大学的研究现状、学生的学习生活状态。关于这一点，希望你能和学生见面，是不是不可能呢？

5.关于广岛、长崎的原子弹的惨状，你在结束战争的诏书中也强调了。关于这一点我们也很赞同。为了让世界知道这一点，我们制作了原子弹爆炸展。可是因为你要来学校，展览被迫中止。你希望这样吗？我们也希望你能看看原子弹爆炸展，你会看吗？

我们承认，现在的日本，你的影响力很大。正因为如此，我们希望你不是作为统治民众的工具，而是为了世界和平，作为一个拥有意见的个人而努力。作为一国的象征，却对民众的幸福、世界的和平没有任何主张的话，那将是日本的悲剧。我们从心里期待你能对这些问题做出回答。

当时，辩护昭和天皇不必退位的论调认为，作为立宪君主、守法意识强烈的天皇，只是遵守了没有退位规定的宪法及《皇室典范》。但如果这样的话，天皇有遵守宪法第九条的意向吗？原本《日本国宪法》第九十九条规定“天皇或摄政以及国务大臣、国会议员、法官以及其他公务员均负有尊重和拥护本宪法的义务”。学生们就这一点而提出问题。

用现在的眼光来看，战后初期有关天皇的讨论中表现出的对天皇的敬爱之情多得出乎意料。对天皇战争责任的追究，是对取代被战争破坏掉的旧有民族主义的新民族主义原理的摸索。试图让天皇制适应新时代的南原繁，与高唱废除天皇制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在这一点上达成共识。

但是，在与美国的国际战略连在一起的保守政权下，免予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使这一尝试以失败告终。其结果是大大阻碍了战后日本构建其独特的民族身份认同的进程。

面对昭和天皇，期待其有“作为人”的责任意识的论调，南原繁的退位论及京都大学同学会的质问信几乎是最后的尝试。这些尝试消失后，

批判天皇的一方及赞美天皇的一方，都开始放弃期待天皇拥有“作为人”的意识。之后，貌似超越世俗的保守派的天皇形象，与猪木正道所言“日本国民的无责任的象征”一起流传下来。

第四章 宪法爱国主义

在考虑日本国家发展方向时，宪法第九条一直是争论的核心。本章将考察制定宪法第九条时的争论与民族主义的关系。[356]

从结论来讲，宪法第九条刚制定时，其作为战后新民族主义的基础得到“欢迎”。但“欢迎”之中包含着各种算计、利害得失以及后来与之对立的萌芽。

作为民族主义的“和平”

战败后完全否定民族主义、无条件赞美欧美的论调并不多见。非要举例的话，只有政治家尾崎行雄与作家久米正雄的论著。

尾崎行雄在1947年所著《咢堂清谈》中，呼吁“青年呀，成为非国民吧”。他认为，“如日本废藩置县时一样，世界也应该废除国家”，“曾经的‘非藩民’，现在应该是‘非国民’”。他甚至主张“世界上很少有像日本料理那样不好吃还没有营养的料理”，“日本人的房屋让人生病”，呼吁衣食住西方化，并全面废除汉字。[357]

久米正雄在1950年2月的《日本美洲论》中，提倡日本应该被美国合并成为新的州。他认为，军事上、经济上失败了的日本，“应该抛弃形式上的国家自豪感与封建性爱国心”，“果断废除国境，停止政治，成为无政府的自由国，摒弃无聊的限制，成为观光乐土”。[358]

另外，作家志贺直哉主张使法语国语化已经是尽人皆知的事。这些

论调正符合战败后日本言论界弥漫的批判民族主义及贬低日本文化的先入之见，因此广为流传。

不过，这些论调在言论界只是少数。久米在新日本文学会所列战犯文学家名单上榜上有名，而尾崎又盛赞《日美安保条约》，因此两人都是左派论者批判的对象。[359]

前文已经讨论过，战后大部分知识分子，为重建因战败而荒废的日本，摸索着新的民族身份认同感。而战后首先高喊的便是“文化国家”或“和平国家”的口号。例如，1945年10月，评论家河上彻太郎说道：“在政治、军事、经济方面被拧掉手脚的日本，唯一的希望是文化。”京都学派的高坂正显于8月20日在报上呼吁“战败并不是一切都败了”，“要在文化战争上胜利”。东久迩首相也在1945年8月的记者招待会上呼吁，在“一亿总忏悔”的同时，“精神要焕然一新，将我国民族的全部智慧与能力倾注到人类文化上”。[360]

在1948年8月28日《读卖报知》的采访报道中，陆军中将石原莞尔说道：

> ……既然战败了，就应该断然废除军备，给军部一个善终的美。今后面对世界舆论，要以我国才是和平发达国家的自豪感来应对。在科学、文化、产业复兴上的热情要不输于对国家军队的热情，即便我国有如此庞大的人口，但只要在祖国重建的问题上勇往直前，不出十年，这个面积狭小的国家，也一定会成为能与世界最优秀国家匹敌的文明之国。世界将惊讶于如此小的岛国能以刚健优雅的民族精神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没有比这更美好的事业了。成就如此崇高的大事业，正是基于所谓“天业恢弘”的神意。……神灵既然给予天业[361]民族这个国家，我们就不需要别的领土。实现真正充实的道义国家才是我们的最高理想。[362]

对军事上、经济上都被打败的日本来说，“和平”与“道义”是民族身份认同的最后基础。这种主张，也与对以原子弹为象征的欧美军事力量的抵抗意识相辅相成。

例如，1945年9月2日，出身于冲绳的陆军大佐亲泊朝省自杀，留下一封题为《大东亚战争在道义上胜利了》的遗书。遗书中写道：“我们日本的战争目的，是从为世界人类幸福、世界和平做贡献这种道义精神出发的”，美国却正在为“使用了人类史上未曾有过的残暴的原子弹而洋洋得意呢”。[363]

对原子弹的谴责，8月15日昭和天皇的“玉音放送”、东久迩首相8月末的记者招待会上都异口同声指出过。石原莞尔在前述采访中也认为，“美国的原子弹轰炸，应该被刻上无视人道主义的印记，应给予顽强的抗议”。

然而，对美国的谴责也意味着日本必须高举“世界和平”的旗帜。石原根据这种理论主张非武装和平主义，声称“即便手无寸铁，也要为世界和平及人道谴责美国的态度，并要求其反省”。

同时，这种主张也有可能与对日本“非道义”的反省结合在一起。亲泊在遗书中谴责原子弹的残暴性之后，批判了日军在中国进行的“对无辜老百姓的杀戮，对中国人的蔑视、强奸、掠夺等行为”。[364] 石原也在采访中说道：“日本以欧美霸权政策的态度对东亚各国犯下罪行，必须有为它们诚恳谢罪的勇气。”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和平主义论调在1945年8月时已经存在。占领军的指令发出之前，与民主化呼声出现在总体战延伸线上一样，和平主义呼声也出现在“道义国家”这一口号的延伸线上，而宪法第九条便在这样的土壤中产生。

受欢迎的宪法第九条

1946年3月6日，《修改宪法草案纲要》以日本政府案的名义颁布。众所周知，该纲要在盟军最高司令部民政局（GS）成员仅用9天时间起

草的英文版基础上编写而成。因为对占领军来说，必须尽快决定日本的战后体制，并且最好赶在包括苏联在内的联合国远东委员会召开会议之前。

盟军最高司令部提出的宪法草案与日本政府准备的宪法草案内容上大相径庭，颇令日方惊讶。据盟军最高司令部的记录，1946年2月13日，他们的草案被转交给日方要人时，“日方表情漠然。尤其是吉田（茂）的脸，显得惊讶和忧虑”。[365]

但3月6日，该草案以政府案名义颁布时，之后转为改宪派的保守派也表现出欢迎态度。曾当选自民党总裁继而出任首相的石桥湛山，晚年虽成为再军备论者，但他1946年3月16日在《东洋经济新报》上就第九条原案说道：

> ……记者读到这一条时，无不感到痛快。近年来，外国一些思想家中有高唱建设世界国家的人。我国必须以宪法来主张建设世界国家，自己要率先垂范。……我国国民要像草案前文一样“如果誓以国家的名誉，竭尽全力以达到这一崇高的目的”的话，在那一瞬间，日本将既不是战败国，也不是四等、五等国家，而是拥有荣誉的世界一等的和平国家，成为日本曾经诉求的真实神国。没有比这更痛快的事了。[366]

这里所用的“四等国”一词，因1945年9月2日投降书签署仪式之后第九天，麦克阿瑟在记者招待会上使用过而广为流传。石桥从第九条中找到了摆脱这一状态的方法与思路。

同时，宪法第九条在1946年也受到日本政府的欢迎。1946年6月召开的议会，将《大日本帝国宪法》修改审定为《日本国宪法》。时任首相吉田茂就第九条这样说道：“第九条彰显了我国人民的崇高理想，彰显我国站在爱好和平之国的前列、走上正义大道的决心，是体现我国决意的根本法。”许多议员也认为：“领先他国制定的第九条是我们国民的骄傲”，“应该说光明始于日本”。[367]

在宪法修改审定会议上，吉田明确否定了自卫权，他说：“目前为止的战争，多数始于自卫权的名义。”另外，与吉田一起答辩的前首相币原喜重郎也认为，在核武器时代通过军备自卫保存性命的思想，“纯属小孩子做梦，不值得相信”。[368]

关于核武器时代军备毫无意义的主张，麦克阿瑟已在1946年4月5日第一次对日理事会上的演讲中有所提及。3月宪法草案公布时，第九条被批评为“乌托邦的腔调”（《纽约时报》）或“孩子似的信仰”（《纽约太阳报》）。麦克阿瑟反驳这些批判，认为在核武器时代军备可以保存性命的思想才是真正的“孩子似的信仰”，拥护在自己统治下实现的日本宪法。[369]

宪法修改审定之后，1946年11月新宪法正式颁布，1947年5月3日生效施行。政府为普及新宪法，向全国各地派遣游说队，以连环画剧等形式开展启蒙活动。币原喜重郎在各地的演说稿中阐述道：

> ……消极防止敌军入侵我国领土的不完善自卫设施反而成为引诱侵略国的诱饵，而成不了勾住侵略国的鱼钩。或许可以想象即便比较弱势的兵力……也能阻止敌军一段时间，但近代历史却表现为相反的事实。之前的世界大战中，德国用闪电战将弱小邻国瞬间降服。如果我国将要保有的兵力……可以彻底驱除一切敌军的话，联合国将不会承认我国的军备，即便承认了，我国国力也很难承担。……
>
> ……接受第三国兵力这一构想……指望第三国即便没有自身现实利害关系，也会不计牺牲来掩护日本，这本身就是无理的要求。加之兵力掩护条约的存在本身会刺激侵略国，会成为敌对行动的借口。另外，当日本受别国侵略直接或间接威胁到第三国的切身利益时，这个第三国，即便没有条约上的义务，即便日本不请求，也会为了本国利益，抑或为了维持国际秩序，采取行动抵御他国侵略日本。
>
> 以上所述是我个人的意见，结论就是我们并不是依靠他人力量谋求国家安全。将我国从他国侵略中解救出的自卫设施是彻头彻尾的正义力量。倘若我们要迈进正义大道，就要相信“不祈祷就得不到神的帮助”。[370]

对最后一句话姑且不做评论。这里应该注意的是，非武装和平主义被宣传为“独立自主”的思想。事实上，之后的进步派拥护第九条的论说内容与1946年时政府所提倡的内容基本一致。

1947年5月3日新宪法施行后，各报纸社评一致表示欢迎。例如，《日本经济新闻》评论道：“战败后，我国国民到底能信心十足地向内外宣传什么呢？新宪法为快要失去目标的国民指明了方向，是国民能毫无虚伪、毫无自卑地向世界宣示的东西。”《读卖新闻》也强调“在原子弹时代，部分军备没有任何意义”，宣扬第九条“绝不是单纯的‘战败结果’，而是积极实现世界政治理想的先驱”。《每日新闻》评价宪法称“这是今后日本的国家纲领，也是基本的国民伦理”。[371]

同时，《每日新闻》以《现在，挥舞日章旗》为题庆祝宪法施行日。当时占领军禁止悬挂日本国旗，但是这一天破例允许悬挂。麦克阿瑟向吉田首相送来贺电：“国旗意味着在日本人的生活中，基于个人自由、权威、宽容及正义的永久和平时代到来。”[372] 也就是说，第九条作为新时代民族主义的象征与日章旗共存。

以第九条为基础的民族主义因政府教育政策渗透到儿童中。宪法施行后的1948年8月，文部省刊发题为《新宪法的故事》的宣传册。在诠释非武装理念之后写道：“大家不必担心，日本只是比别的国家先做了正确的事。世界上没有比正确的事还要强大的东西。”[373]

这种“道义国家”的日本形象与战前的修身教育在某种意义上重叠了。战败时还只有10岁的大江健三郎1964年回忆道：“在新制中学里没有修身课程。我们中学生的感觉是，新宪法的学习代替了修身课程。”他还写道：

> 对于战争刚结束后的孩子们来说，“放弃战争”一词是多么具有光彩的宪法词语呀。在我的记忆中，新制中学社会科的老师，在当时的日本大国论氛围中最初的讲义是关于“放弃战争”的内容。老师说日本战败了，甚至

留下了一个封建的、非科学的自卑国家。但是，老师突然话锋一转，说日本是被选为放弃战争的国家。当时我也感到就像玩扑克游戏时将王牌留在最后一样。就这样，“放弃战争”成了我道德上最主要的支柱。[374]

这种宪法爱国主义作为重建的日本国家的理念渗透到儿童思想之中。不过，这种状况是在之后将要论述的算计与利害得失中形成的。

顺应的和平主义

当初惊讶于占领军草案的保守派政治家接受宪法的最大原因是，宪法第一条承认保留象征天皇制。废除天皇制的恐慌因这一条而消散。宪法草案发表后的3月10日，《朝日新闻》对经济界的反应加以报道：

这样下去的话不知会被激流冲到什么地方，而天皇制、资本主义存续这一点，使得大家对将来有了短暂的希望。同时，这样可以缓和日本共产党等激进势力压迫下的气氛。因此，经济界（对宪法草案）表示出放心与赞同之意。[375]

盟军最高司令部提出新宪法草案时，向踌躇的日方要人强调，如果不接受这个草案，将无法在国际舆论中保护天皇。木下侍从次长在1946年3月5日的日记中表示，如果天皇退位，“M（麦克阿瑟）的努力将会白费，因此，M司令官积极地想早日让日本宣布民主化宪法，为防止世界上反对天皇制的舆论氛围，必须迅速将宪法公布出去”。[376] 第二天，也就是3月6日，宪法草案作为政府草案得以颁布。

同时，该宪法也是因战败面临危机的保守政治家的保命符。1946年2月13日，盟军最高司令部草案转交给日方要人时，民政局局长惠特尼将军强调：“日方如果接受新宪法的各项规定，天皇便会很安全，这是很实际的问题。”麦克阿瑟将军认为，这将是被大多数人认为反动的保守派留住权力的最后机会。[377]

1946年1月4日，盟军最高司令部发出第一道开除公职令。因此，以

大战中翼赞选举[378]的推荐议员为首，进步党的274名议员中有260名，自由党的45名议员中有30名被开除。同时，势力激增的日本共产党试图与社会党结成“人民战线”。因此，面临危机的保守派政治家们，除了提出大胆的改革案之外别无选择。

实际上，自从新宪法草案以挽救保守政权危机的形式颁布后，支持该草案的社会党与提倡打倒天皇制的日本共产党陷入对立状态。而政府在草案纲要公布4天后，宣告将在4月进行总选举。走在改革趋势前面的保守政党获得支持，尤其是以吉田茂为中心的自由党在该选举中一路领先，夺得政权。因此，接受新宪法与其说是迫于美国压力，倒不如说是保守政治家们的生存策略。

漩涡中的昭和天皇“到现在也一筹莫展”，亦选择接受盟军最高司令部的草案。即便如此，天皇也希望保留对《皇室典范》修正的提议权，以及保留华族制度，日本政府认为这些不可能实现，便将其束之高阁。1946年3月6日草案纲要公布之时，一起发布的除了麦克阿瑟的声明外，还有天皇诏书。天皇在诏书中呼吁“决定主动放弃战争以修万邦之友谊”。[379]在天皇制本身处于危险的时候，天皇站在支持宪法这一边。

媒体对宪法的评价除了高呼第九条的理念之外，大多对天皇制的存续表示欢迎。例如，《每日新闻》在1947年5月3日的社评中，赞赏第九条的同时，认为新宪法的特征是“确立了天皇制”以及“排除了日本共产党的领导”这两点。其中，保守色彩浓重的《时事新报》在宪法施行日写道：

> 这将是与世界上任何国家相比都不逊色的进步民主主义的宪法，我们可以为此自豪。坚持开国以来的君主政治的同时，实行人民主权的新主义，又率先放弃战争，不再军备，在这一点上我们骄傲地说我们的宪法是优秀的宪法恐怕也不为过。[380]

当时赞赏第九条的吉田首相及币原外相强烈警惕共产主义。吉田在

1945年10月因盟军最高司令部指令废除《治安维持法》后，还主张“向GHQ交涉，将《治安维持法》作为针对日本共产党的政策保留下来”。币原在1946年11月25日的《朝日新闻》上论述道：“阶级斗争、大罢工、怠工等破坏行为是生产的敌人，是阻碍新日本建设的恶魔。”[381]

1947年5月3日，日本政府举办了宪法施行纪念日的庆祝活动。纪念日的情景甚是奇怪：仪式在皇宫前广场举行，吹奏乐团演奏了美国国歌《星条旗》；天皇在吉田首相等的“天皇陛下万岁”的呼声中出场；天皇与麦克阿瑟一起致辞并庆祝宪法的实施。两天前的劳动节，有40万群众聚集在皇宫前广场，呼吁增加粮食配给及提高工资，而5月3日的宪法纪念仪式却仅有3万人参加。[382]

宪法草案颁布时，有人指出毫无政治实权的象征天皇制其实是延续了日本旧有传统。津田左右吉与和辻哲郎于战后初期持有天皇拥护论，此二人主张象征天皇是日本的旧有传统。与上一章论述的一样，民主主义的导入也常常被强调为与明治天皇的《五条誓文》相似。昭和天皇在1977年的记者招待会上，就1946年1月的元旦诏书（所谓《人间宣言》）上强调《五条誓文》的理由说道：“就是为表明民主主义绝不是进口货。”[383]

客观上讲，改行象征天皇制只不过是适应美国施加的既成事实。而将象征天皇制称作日本旧有的历史传统，则是为缓和战败打击的一种心理防御机制。宣称被外界施加的改革是日本原本就存在的东西，主动欢迎并将其说成是世界上无与伦比的东西，是一种民族主义的防御。

各政党关于宪法草案的反应也与此类似。除了日本共产党外，多数政党都试图在明治宪法基础上稍作修改，但新宪法的草案纲要远远超出他们的想象。即便如此，草案纲要发表后，各政党无一例外都表示欢迎，认为新宪法是“与我党草案近似的进步草案”（社会党）；“与自由党公布的宪法改正案原则上完全一致”。[384]

事实上，第九条被诠释为日本国家的骄傲背后也有着另一种情形。在1946年，解除武装不管好坏都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在美国占领下的既成事实。

解除日本武装原本就与联合国的对日政策一致。1946年6月21日，美国国务卿伯恩斯提出的对日媾和条约草案非常严格，要求日本彻底解除武装，以美、英、苏、中四国为基础组成监督委员会，将花25年时间来检查。当时，防止日本再次成为侵略国是联合国成员的一致方针。

社会学家日高六郎回忆战后情况时指出，当时的宪法讨论全部集中在天皇制或国民主权的问题上，“完全没有提到第九条”。关于其理由，日高认为，刚刚经历了战争惨祸的日本，和平主义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还有一点是在被占领的非军事化政策下，无论好坏也抵抗不了”。[385]

澳大利亚驻日大使麦克马洪·鲍尔在其1948年出版的著作中，针对日本的权威人士对于“宪法第九条”的反应写道：

> 1946年5月，他们的反应羞怯、虔敬。“我们将我们的安全拜托给联合国的崇高理想。”过了几个月后，反应开始发生变化。“对，我们的确是不能拥有军队了，我们主动放弃军队来得到赞赏，我们认为那将是聪明的举措。”[386]

对当时的日本政府来说，第九条是无法拒绝的事实。1946年3—5月，在议会审定之前，枢密院曾进行宪法草案的非公开审查。5月29日的审议上吉田首相说道：“第九条是联合国方面对日本再军备担忧而制定的规定，要修正的话恐怕很困难。”但是，吉田同时指出，“现在还难以想象占领军撤退后的状态。日本独立后将采取什么形式还不明了，作为国家还是会拥有兵力吧”。[387]

宪法学家佐藤功回忆1951年时写道：

> ……饶有趣味的是，放弃战争这种理想主义式的理解方式，事实上与最现实的承认现状结合在一起。也就是说，战败后的日本现实是，事实上已经被解除了武装；事实上将来不可能拥有军备，发动战争也不可能。第九条只是将这个现状制度化而已。另外，战败国日本对战胜国表示恭顺，宣扬放弃战争和非武装难道不是上策吗？我当然不认为所有日本国民都是这么理解的。我也相信很多人是真的热爱和平，发誓不再发动战争，他们从内心支持第九条。然而……当现实主义者也在理想主义式地谈论第九条时，他们就与真正的和平主义者共存了。[388]

1946年，顺应“既成事实”的“现实主义者”与相信理想的“真正和平主义者”，都在欢迎第九条。在这种状况下，第九条一直被认为是新民族主义的道德基础。

日本共产党的反对论调

但是，也有人对新宪法持反对意见。

其中之一便是惋惜天皇失去实权的右派。最后一任枢密院议长、曾教授昭和天皇明治宪法的法学家清水澄在新宪法施行后自杀。但在昭和天皇自身协助美国这种状态下，这种自杀事例并不多见。

新宪法最大的反对势力是日本共产党。保留天皇制、拥护资本主义的新宪法对日本共产党来说简直无法容忍。[389]

原本在当时，《日本国宪法》被理想主义者们冷眼相看。作家小田实回忆道：“鼓吹‘新宪法’的那些家伙，多数在心里不是这样想的，连中学二年级的我都知道这一点。我想抱有这样想法的人不止我一个吧。”[390]

另外，小田读完新宪法后的第一印象是“事到如今说什么好呢”。基本的人权、男女平等、放弃战争等，战败后“已经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为何还在叨叨这些问题呢”。小田认为，“当时的日本，构建新日

本的理想主义的欲望走在了政治的前头”。

更让小田愤怒的是，与现实生活的贫困相比，宪法所提倡的理想太过抽象。小田曾在战败后的饥饿状态下与朋友彻夜讨论宪法。其主题是基于宪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以红薯为主食的生活究竟如何建设‘健康及文化的最低限度’的生活”。

对于小田等人来说，新宪法不仅在内容上太过稳健，实际上也缺乏保障。当时日本共产党认为，不改革贫困的根源——社会体制，单单阐述人权与平等的宪法只是空谈。

事实上，最终给宪法投了赞成票的社会党也对此有共识。社会党在宪法审定会议上，申诉国民的贫穷，指出生活保障规定的不完善。他们也试图将适当限制私有财产写入宪法，但没有实现。因此，当时的委员长片山哲在1946年11月说“从贫穷中解放出来的自由没有明确写进宪法”，议员森户辰男也于1947年9月主张“应该在适当的时间修改宪法”。[391]

日本共产党对新宪法的反对也指向了第九条。1946年的宪法修改审定会议上，众议院议员、日本共产党党员野坂参三以“放弃我国的自卫权会让民族独立产生危机”为由反对第九条。[392]

日本共产党主张的并不是放弃一切战争，而是要将为人民进行的“解放战争”与资本主义的“侵略战争”区分开来。因此在宪法审议时，主张修改为“参加民主主义的国际和平机构，不支持任何侵略战争”。[393]

这种主张与日本共产党的思想息息相关。我们在第二章论述过，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分为两大阵营，一个是资本主义末期的现代自由主义经济崩溃，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结合在一起的法西斯阵营，一个是与之对抗的社会主义阵营。在这种局势下，必须选择一个阵营，而不

可能有“中立”。另外，在资本主义的社会体制中提倡“中立”的人，被拒绝加入社会主义阵营，甚至被认为是从帝国主义支配的世界形势中获益的敌对者。

批判这种“中立”的一个例子，便是中野重治1946年2月发表的文章《作为文学家的国民的立场》。[394] 当时有人提议，日本的未来形象应以瑞士这种典型的和平文化国家为标准。中野对此持反对意见，他说：“瑞士或瑞典并没有介入战争，他们是中立的。这意味着当时他们从维护世界民主主义的事件中中立出来了。他们没有抵抗邪恶，也没有加入与邪恶抗争的一方，他们是消极地保护了自己。”

二战中，中立国瑞典曾向纳粹德国贩卖过铁矿石。中野强调，伦敦的全世界工人大会曾批判向德国提供食物与原料的“瑞典、瑞士等中立国”。这些对中野来说，是证明这些国家伪装“中立”，从帝国主义世界秩序中获得利益再好不过的例子。

中野对“中立”的批判也与日本的战争责任问题结合在一起。他延续了对瑞士的批判，写道：

>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情，不能随便从旁责备。但是，最大的重罪犯人，不去想着防止他的犯罪，不去与他的犯罪做斗争，而是将见死不救的袖手旁观者作为规范，以之作为认罪与赎罪之道的话，那将是低劣、欺瞒与背叛。那是最非人的累犯。“文化国家”论者将是诱发惯犯的诱饵。他们侮辱了日本人。[395]

中野认为，“挑起战端”的日本，光是消极地呼吁和平还不够。如果不加入国际上的社会主义阵营，积极地对世界和平做出贡献的话，其罪过不会得以解除。

第三章已经论述过，战败后鲜有论调提及日本对亚洲的加害责任，唯一提及较多的便是日本共产党。可以由外部审视“日本”的共产主义这

一思想，以及与苏联、中国、朝鲜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联系，使得日本共产党追问日本对亚洲的加害责任成为可能。

例如，1946年6月公布的日本共产党宪法草案，将天皇制定位为“对近邻殖民地、半殖民地解放的最大障碍”。日共中央委员神山茂夫在1948年指出，造成“‘南京大屠杀’、‘巴丹死亡行军’、‘马尼拉大屠杀’等”的天皇制才是对“民族的侮辱”，谴责了延续天皇制的《日本国宪法》。[396]

从共产主义的立场来看，废除战争并不是只有和平口号就能达成。战争是资本主义及其末期阶段的帝国主义必然发生的问题。因此神山说道：“世界上只要有资本主义存在，就会有战争的危险”，批判《日本国宪法》只是“画饼”。[397]

在宪法修正审议过程中，日本共产党也曾提出这些意见。野坂参三认为放弃战争“不是在宪法条文中加入这一项就能实现”，德田球一也追问“战争实际上是因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而起，放弃战争的话，那资本主义怎么办呢？”野坂还指出，不能放弃所有的战争，而应该呼吁反对侵略战争。他继而诘问道：“首相认为刚结束的战争，是侵略战争还是非侵略战争呢？在这里希望能清楚地回答出来。”[398]

对此，吉田首相认为战争不包含自卫战争，辩解道：“关于这次战争的定位，我无法同意德田君的意见，我认为是正当防卫权诱发了战争。”在这里，第九条及放弃战争，与拥护资本主义及对侵略责任的暧昧态度融为一体。[399]

“国际贡献”问题

在宪法修正审议时，与日本共产党一起反对第九条的还有贵族院议员南原繁。他所坚持的反对理由是国家自卫权的正当性及国际贡献的问

题。

南原认为，今后日本的道路“不仅仅是单纯的功利主义性、权宜主义性的所谓安全第一主义的和平主义”。日本在忏悔侵略战争这一“我们的罪过”的基础上，应该为了“确立在正义上的和平”，积极地做出国际贡献。[400]

南原就这一主张，举出加入联合国这一现实问题。1932年因承认“满洲国”问题而退出国联的日本，能否重新加入联合国是当时的外交课题。《联合国宪章》第四十三条规定加盟国必须为维持国际和平提供兵力。也就是说，如果日本全面废除军备的话，这有可能成为加入联合国的障碍。

南原在1946年8月贵族院的宪法修改审议上说道：

> 联合国的武装组织并不是特别的独立组织，加盟国有提供兵力的义务。在此我想问的是，将来日本被允许加入联合国的时候，是不是也要抛弃这样的权利及义务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日本难道不会陷入永远依靠他国的好意与信义苟延残喘的东洋式谛念主义的危险吗？相反，主动为拥护人类的自由与正义，相互流血流汗，相互提携以确立世界永久和平这一积极的理想，也失去了原有的意义。[401]

事实上，从盟军最高司令部拿到宪法草案时，政府内部也认为这是一个大问题。如前所述，1946年5月枢密院对宪法草案进行非公开审议时，讨论过“联合国的问题，或许必须修改宪法才能加入”。当时法制局局长入江俊郎说道，为了即便不提供兵力也能加入联合国，“要么让联合国修改宪章，要么不修改而得到联合国的理解”，但是到底能否实现完全是个未知数。[402]

但对于日本政府来说，盟军最高司令部提供的宪法原案的主要内容是不可能更改的。吉田首相针对南原的提问反驳道：“现在对日本来

说，首先是恢复国权，恢复独立。这以外的问题无法回答。”[403] 或许吉田只将宪法看作占领下的暂定措施。

面对这样的吉田，南原说道：

> ……一部分国民认为这是占领下的宪法，因此不得不遵守，或认为可以以后再修改。……但是，我认为这种不真实的态度是不可取的。不管有什么样的缘由，如果这是日本政府制定的，又在日本帝国议会上得到认可，其责任将由日本承担。正因为我们任何时候都要遵守日本的宪法，因此在这一点上政府今后的责任会非常之大。[404]

宪法原案由盟军最高司令部提出，这一点议员们都心知肚明。但在议会上，没有一个人从正面指出这一点。在这种情况下，南原形容在占领军的压力下，“用英文整理，再翻译为日文”的宪法是“国民的不幸，国民的耻辱”。[405]

不过，南原并没有批判新宪法参考国外这一点。因为他认为《大日本帝国宪法》也是“仿照普鲁士的”宪法。

南原并没有将宪法的“出身”视为问题，只是认为“我们的先辈为了将此变作日本的东西，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宪法需要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加以创新，将此变为“日本的东西”这一过程。他批判的与其说是宪法的内容，倒不如说是迫于占领军的权威与既成事实而轻易修宪的政治姿态。

除了南原之外，也有人对新宪法的制定方法存有异议，因为即便赞同宪法的内容，也无法苟同其粗糙的制定过程。

例如宪法草案纲要发表后的3月10日，战前就从事社会主义活动的山川均作为号召人，召集社会党与日本共产党联合发起“民主人民联盟”。3月15日，社会党的安部矶雄，日本共产党的野坂参三，自由党的石桥湛山，以及末弘严太郎、长谷川如是闲、羽仁说子等聚在一起，发

起了关于制定宪法的倡导。其内容是开展国民运动，即不将政府案作为唯一草案，而由特殊的“宪法制定议会”起草草案，之后由国民投票。[406]

但是，盟军最高司令部及内阁担心宪法制定推迟，天皇将被国际舆论追究，因此完全不顾这种风潮。面对南原的声讨，币原认为“根本不是外国强加的”，吉田首相则强调“充分导入了国民自主性及国民的要求”，“本案成立后，政府将尽力彻底宣传其精神”。[407]

在1946年追问宪法的出处，需要有与占领军对抗的决心，而政府及保守政治家们都选择了回避。中野重治的短篇小说《五勺酒》批判了政府的这种态度，因而在1946年11月发表时受到占领军审查。审查时被删除的文字如下：“那个（草案纲要）在议会上出现的早上，也或许是前一天，盟军最高司令部宣布草稿是日本人写的。外国人故意强调日本的宪法是日本人打的草稿，这已经足够表明，日本国民默认了如此可耻的本国政府。”[408]

结果在议会上宪法审议草草结束，除了日本共产党等少数的反对票之外以高票通过。第九条在呼吁国际和平的第一款，与高呼放弃保有战争力量的第二款之间，添加了“为了达到前款的目的”一句。这一修正，产生出另一种对宪法的解释，即只要不妨碍国际和平这一“目的”的话，就有可能保持战争力量。

刚战败后的宪法审议上饶有趣味的是，以南原为首，之后成为保护宪法势力的人对新宪法提出质疑，而之后成为改革宪法势力的保守政治家们却赞赏宪法。但要重申的是，相对于宪法的内容，南原所批判的，是那些轻易修改宪法的政治态度。当时因恐惧占领当局而赞赏宪法的保守政治家们，当50年代以后美国的政策开始转变时，反而开始批判宪法。

出于这些缘由，不仅是南原，后来高呼保护宪法的战后知识分子中，当初对宪法持冷淡态度的人也不在少数。比如第十章论述的竹内好回忆道，因为是外国施加的这一事实，加之修改过程如此简单，“虽然我认为这是一部不错的宪法，但总觉得有抗拒感，好像是别人的事”，“我抱着先看看吧这种旁观者的心情”。[409]

这种心情，与其说是单纯的反美意识，倒不如说是反对顺应美国权威与既成事实这一轻浮风潮。1946年，丸山真男在回忆刚战败的情形时写道：

> ……根本没有心情附和那些大街小巷高呼的民主主义万万岁。虽不是政治上保守，但总与一种保守的心情结合在一起。……因此，复员回来的第一节课马上想到的是费希特的《告德意志民族》。费希特说，到昨天为止还在普鲁士旧支配体制下得到好处，现在拿破仑要来了，于是对昔日的支配者们，就好像自己当初就反对似的，马上改变了献香烟的对象，毫不在乎地做着这种无耻事情的只有德国国民。……
>
> ……同样的人，社会改变的话，他们的昨天和今天就能简单地随之改变吗？完全是本能的反应或固执的天性，和就要溢出来的解放感奇妙地交织在一起。[410]

这里所说的“保守的心情”，就是渡边清所说的“自己考虑，如果自己不能认同的话”，就不能接受的心情，也就是“主体性”。1950年代成为护宪势力核心的便是拥有这种心情的人。就是说，他们也持有南原在议会上所说的“不管有什么缘由，如果这是日本政府制定的，又在日本帝国议会上得到认可的话，其责任将由日本承担。我们任何时候都要遵守日本的宪法”这种态度。这种护宪论调的背景，其中之一还是对战死者的记忆。第三章已经述及，南原及中野都有对战死者的回忆。在新宪法施行的1947年5月3日，《读卖新闻》的社评写道：

> 现在，施行日本国宪法之际担心两点，首先，该宪法的产生并不像欧洲各国一样靠鲜血换来，甚至没有经历像明治宪法时的自由民权斗争，的

确是在没有牺牲中产生；其次，宪法内容以近代社会及其政治思想为母体，大量采用历史上形成的英美诸国的制度。这些理由，是否能真正引起每一个日本国民的共鸣，而让他们接受宪法呢？

我们在这个宪法被制定之前，以九一八事变为始，太平洋战争为终，在很长时间内牺牲了大量的生命。而就文化制度而言，历史上无论发生在何处，只要其文化价值是优秀的，就足以在别的地方开出鲜艳的花朵，结出丰硕的果实。[411]

支撑占领军所制定的宪法并将其转换为“日本宪法”的，是战争体验与对战死者的记忆。如果不想让战死者的死变得毫无意义，就必须将由战败带来的战后改革变成有意义的事情。

但随着冷战的推进，日本政府开始暗地里将第九条的规定抛诸脑后。早在1947年9月13日，芦田均外相起草的亲手交给盟军最高司令部艾格伯格中将的文书中称：如果美苏的对立无法化解的话，希望通过美军驻留日本来进行防卫。[412] 几乎是在同一时期，美国方面从初期的解除武装政策开始转换为将日本培养成反共同盟国的方针。关于这一过程将在第十一章论述。

1946年，顺应既成事实的人与试图慢慢领会宪法理念的人，都将第九条视为新民族主义的基础，谋求战后日本的重新启航。当然，之后出现的状况使得两者的共存关系分崩离析。而且，宪法的抗争，呈现出试图防御战后出现的新民族主义的势力，与试图破坏其行动的势力对决的局面。

第五章 左翼的“民族”，保守的“个人”

讨论战后思想，不能忽略日本共产党的存在。本章将考察战后初期日本共产党与通称“老一辈自由主义者”的保守派知识分子关于“民族”与“个人”的思想。[413]

如第三章所述，当时日本共产党自称“真正爱国的党”，盛赞“民族”。但本章将要论述，他们其实只是遵循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方针而已。因此，老一辈自由主义者提出“个人”这一概念来对抗马克思主义。这种对立模式对战后日本的民族主义产生了微妙影响。

“悔恨”与日本共产党

1950年代，在日本知识分子心中，日本共产党具有强大的精神力量。这里仅举作家小田实1964年写下的小事为例。

大岛渚导演1960年拍摄了一部描画1950年代学生运动家群像的电影《日本的夜与雾》。这部电影里有被日本共产党盘问而陷入自我批判的学生运动家不堪痛苦而自杀的场景。对此，小田写道：

> 和我一起观看电影的美国朋友一直摇着头说，看不懂，看不懂。之后，我的年轻学生也说了同样的话。“被日本共产党开除又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不懂呀，又不只日本共产党是进步政党。”
>
> 但比他年长的日本人，经历了《防止破坏活动法》斗争经历的我，看懂了被逼得走投无路的胆小学生的心情。真的懂了。
>
> 也就是对他来说，日本共产党是良心的唯一见证。……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取代基督教成为精神原理的话，这将是再好不过的例子。[414]

在第Ⅲ部将要述及，在小田写这篇文章的1964年，日本共产党的权威已经弱化。然而，在1950年代中期之前，日本共产党的权威则被神化。这种状况是如何产生的呢？

第一个理由便是日本在经济高速增长以前处于绝对贫富差距的状况。城市与农村、上层与下层之间横亘着鸿沟，战败后街上到处是孤儿与战争受害者。在这种现实面前，日本共产党大放异彩在某种意义上顺理成章。

第二个理由便是在日本，日本共产党是唯一一个反对战争的政党。战前，非共产党系的无产政党及工人运动，都曾协助战争。战后，非共产党系的社会主义者联合起来组成日本社会党，但在没沾染协助战争的污点上，日本共产党具有很明显的精神优越性。

第三个理由或许是最大的理由，那便是知识分子们的“悔恨”心情。关于这一点，需要解释一下。

众所周知，丸山真男将战败后的知识分子称为“悔恨的共同体”。[415] 其所谓的“悔恨”，从大处说，便是他们对于允许发动欠考虑的战争而招致惨败感到后悔。但日美开战时，以年仅27岁的年轻副教授丸山为首，这批无法左右国策的知识分子，其实并无必要对发动战争这一决策感到“悔恨”。

相反，比起没有阻止战争这一结果来说，丸山所谓的“悔恨”更应该指向他们战时的处世方法，也就是伦理问题。

如第一章所述，面对战时的饥饿与暴力，为了保护自己，多数知识分子都有过迎合、告密、背叛等行为。即便没有积极赞美战争，所有的知识分子也都没有公开抗议战争的勇气。

这种记忆加速了追求“主体性”的战后思想的形成，同时也留下强烈的自我厌恶与悔恨。例如，法政大学教授本多显彰在回忆战时情境时写道：

> 尽管如此，我们的大学教授当时为什么如此懦弱呢？他们之中既有为战争胜利而狂喜的心地单纯的教授，也有相信神国日本的威力与正确而毫不怀疑的教授。……但是，我们的同事中，应该没有那么多讴歌战争的人，却任由军靴蹂躏我们的学校。……（军人）视察的时候，大学教授的悲惨姿态算什么呢？自己的学生被撞倒，被踢翻，也不抗议，只是一味看着、嬉笑而已。……

> ……即便从心底否定战争，在讲坛上却述说尽忠报国。那是学者的道义吗？热爱真理的人，应该，也一定走别的道路。真正想着国家，真正热爱人类，不，真正热爱身边学生的道义，应该在他处。……缺乏集中反战的智慧，缺乏呼吁反战的勇气，这是让我们不幸并终生悔恨的事情。[416]

这样坦白“悔恨”的人不止本多一人。南原繁在回忆因“学生从军”而离开大学的学生时说道：“我很难告诉他们‘即便拒绝国家命令也要依据自己的良心采取行动’，不，我是故意没有说。如果说的话，自己应该率先批判国家的战争政策。我在反省自己懦弱、缺乏勇气的同时，到今天为止，还犹豫这种态度是否妥当。”[417]

战后初期，不仅是知识分子，不少人都或多或少抱有这种悔恨的心情。1946年10月，黑泽明执导的电影《我对青春无悔》上映，吸引了众多观众。电影里，原节子扮演的主人公高呼“没有悔恨的生活”，抵抗警察的镇压与世人的白眼，坚持反战姿态。黑泽明在这一时期说道：“战败的日本要重新站起来的话，我相信必须各自专注于实现全面自私主义精神。”[418] 当然，这里所说的“自私主义”不是单纯的利己主义，而是“主体性”的代名词。

本多在前述引文之后写道：“不能重复不诚实，这一点应该自我警惕。”[419] 朝鲜战争爆发、再军备开始之后的1951年1月，日教组发起“不能再将学生送往战场”运动，引发拥有战争体验的教员们的共鸣。这不仅仅是反对战争或尊重生命的问题，更是不愿重复屈辱与体验悔恨的问题。

对于拥有这种悔恨的人来说，参加和平运动是消除屈辱记忆、证明自己勇气与良心的必要行为。鹤见俊辅说：“我们这些战后派，之前有屈辱，因此战后日本想要重新武装时，我们都想着这次一定要用行动证明自己。”丸山真男也在1960年的反对安保条约运动中说，“那个时候自己也这样做就好了”，这种战时的“记忆与后悔”加速了自己投身这一“行

动”。[420]

不管是学者还是读者，都将这种“悔恨”活用到日本的社会科学中。如本书第一章所述，东宝电影战后招募新人时，演技考题的台词是“我曾经很傻，真的太傻了，太傻了……”教育学家宗像诚也在解释自己写协助战争文章的原因时，将其归结为“屈服于镇压的恐慌及对社会历史的科学性与合理性把握不够”。丸山在1977年认为这种悔恨才是“为买哲学书籍或社会科学书籍，即便空腹也要在书店前排队”的原因。[421]

增强这种伦理感的是政治家及言论界知识分子投机取巧的态度。大多数保守政治家战时高呼“鬼畜英美”，战后高喊“民主主义”，冷战激化时又高唱“现实主义”。曾是文学报国会干部的英国文学专家中野好夫于1949年2月发表题为《一个告白》的文章。其中一段写道：

> ……这次战败很悲哀地让我明白，并不是所有知识分子的言论都出自有血有肉的思想。一些人的行为是如此多变，就好像随着时间与季节的变化，可以随便替换衣服一样。
>
> 我并不是突然要责备别人。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我自己也的确协助过战争，并且也没有想过要掩饰自己的责任。……知识分子以巧妙的辩论，在与事实完全相反的两个极端间巧妙地行走不是不可能。但说真的，我不想这样做。为此，我在这里清楚地对自己的位置提出质疑。……对于这个告白，我将用一生来承担责任。[422]

之后中野表明了两个政治立场：一是废除天皇制，二是拥护和平。

在战争记忆还很清晰的当时，“和平”一词，还没有空洞化。中野发表这篇文章的1949年，正值冷战激化、核战争危机感高涨之时。朝鲜战争开始的1950年，社会学家日高六郎对大学生进行意识调查，其中八成以上的大学生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可避免”，七成以上“感到自己生命受到了威胁”。[423]

中野在《一个告白》中还写道：

> 如果我对和平的意志偶然被对立国家之间单方面的利益关系利用的话，如果是为了和平，即便有可能被背叛，我也会坚守和平。幸与不幸，我在过去的世界变换中也没有受到过多的镇压。但事实上……这也是暴露我态度的狡猾、骑墙。如果说我将来的人生还有活下去的意义，我绝不让这种暧昧在自己身上重复。……如果不这样，我该从自己不争气的经验中得到什么教训呢？
>
> 幸运的是，今天，我们可以安全地把和平挂在嘴边，某种意义上是可以变成“好孩子”的时期。我无法断言将来还会不会再次出现谈论和平就意味着人身危机的时期，这虽然不是什么好的预想，但是我甘愿为了那个时刻而在此刻宣誓自己对和平的意志。如果那时，我在众多的压力面前内心脆弱，再次发出背叛和平的诡辩，希望人们能够记住这篇文章，鞭策我，谴责我。现在，我们必须以死来捍卫和平的时候到了。[424]

以“死”捍卫“和平”，绝不是南原繁在宪法修正审议上批判的“投机取巧的安全第一主义”。这里的“和平”也是由饱含悔恨的战争体验产生的“主体性”的代名词。中野在这之后，一直参与和平运动及冲绳问题。据说，面对媒体列举战争责任者的问卷调查，他写下了自己的名字。[425]

在讨论“悔恨”时，战后知识分子的论调中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频繁出现“告白”、“背叛”、“鞭策”这些宗教性词语。

事实上，战后初期也是关注宗教的时期。当旧有价值观崩溃时，最受追求心灵指南的年轻人欢迎的，一是马克思主义，一是以基督教为首的宗教书籍。在1947年10月的座谈会上，哲学家古在由重讲道：“在电车及公共汽车上看到很多阅读圣经的年轻人。”[426] 大塚久雄、南原繁在这一时期受到欢迎的另一个原因，也是他们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兼具伦理性主张与社会科学素养。

对宗教的关注也与对战死者的回忆有关。当时，许多人在战争中失

去了亲人、朋友，这促使他们愈加关注宗教。战死者的存在也经常与悔恨连在一起，在战场上及空袭下，没有回应求救声音的体验与抛弃别人独自存活下来的悔恨深深扎根于每个人心里。

例如第一章介绍到，判泽弘回忆在撤退时抛弃落伍的战友说道："我抛弃了他。"如本书第三章所述，渡边清与神岛二郎等人谈到"活着的人的责任"、"在天上的战友看着我们"等。本书第十四章将要论述的吉本隆明也为很多同班同学都战死，只有自己活了下来感到悔恨，因此战后一直阅读圣经及佛教方面的书籍。

女人们将亲密的男人送往战场而导致其死亡的悔恨也很多。战时"军国少女"、作家冈部伊都子写道，当时还是青年士官的未婚夫对她说，"我觉得这个战争是错误的，我不想为了这样的战争送死，不愿意为了天皇而死"，她因顾虑到周围回答道："如果是我的话，会很高兴地去死。"[427] 之后，未婚夫战死于冲绳战役。因此，冈部战后为自己的回答悔恨终生，经常访问冲绳。

当时，也有将这种"悔恨"作为一种"原罪"，构筑为"主体性"基础的意见。在1946年的座谈会上，评论家荒正人与大塚久雄进行了交谈。大塚主张近代人的类型产生于禁欲主义的伦理中，对此荒认为，"日本民族发动了残暴的侵略战争这一赎罪感"能否用基督教的"原罪"来代替呢？另外，1959年，政治思想史学家桥川文三提倡战败与战死者的记忆应该"相当于耶稣的死"。[428]

这种悔恨及罪恶感与对亚洲的加害责任的觉悟有着微妙的联系，比如荒正人将加害的认知与"民族"的赎罪感连在一起。但如冈部伊都子，很难将死去的未婚夫看作"侵略者"。在本书第十四章中将要论述，吉本隆明等断言"想着中国，感到战争责任的话，想想我们的战死者吧"。

不管怎么说，战争体验将悔恨与罪恶感这种基督教式心情扎根于人

们心里，并滋生出寻求能惩罚他们的罪恶并原谅他们的“神”的倾向。1948年，《近代文学》杂志刊载了《给托马斯·曼的信》一文，很好地阐释了这种倾向。

这篇文章是日欧文学家之间的公开往返书信，由平田次三郎写给德国小说家托马斯·曼。托马斯·曼在纳粹获得政权后，亡命美国，因发表批判纳粹的演讲而广为人知。平田读到战后翻译的托马斯·曼的演说而感到“罪的自觉与悔恨”，他著文写道：

> 不胜惭愧的心情，以及由此而引发的自我厌恶感。阁下的话一句一句在我身心上刻下悔恨的印记。……
>
> ……面对法西斯的政治性、社会性暴力，我们屈服了，退居二线以逃避暴力，并将此作为唯一的抵抗好让自己的良心得到安慰，这样的我们怎能在坚决与暴力战斗的阁下面前，不低头聆听呢！至少，我痛感自己是不能作为“正确抵抗了的人”而站在阁下面前。[429]

对这些书信，托马斯·曼回答道，德国的实际情况绝不理想，仅凭平田的书信，“我反而觉得日本才满足了基督教谦逊、忏悔的要求”。[430] 尽管如此，战败后的日本，对托马斯·曼或萨特等抵抗法西斯的欧洲知识分子的评价空前高扬。日本知识分子越是抱有悔恨与罪恶感，这些欧洲知识分子的形象越是光彩照人。

另一个因这种悔恨被神格化的是日本共产党。

平田在给托马斯·曼的书信里，在坦陈自己的罪恶感的同时，指出日本国民并非全部有罪。“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有同胞为了人民的自由而战斗，在狱中度过18年。”平田认为，他们才是“精神高贵、灵魂纯洁、没有失去对人类爱的信任”的“被选择”的人们。[431]

当然，这是指德田球一、宫本显治等1945年10月被释放的日本共产党干部。战前被逮捕的大部分马克思主义者，都因表示“转向”而被释

放，甚至因惧怕再次被逮捕而主动协助战争，而德田等人拒绝“转向”，十几年都在狱中度过。

战后初期，这些“狱中没有转向”的事实，得到现在无法想象的尊敬。为什么呢？因为大部分当政者及知识分子在战时及战后反复转向，当大多数人对战时的自己感到悔恨时，这些日本共产党干部坚持反对战争，实践了如黑泽明所言“无悔的生活”。

这种尊敬，也深深扎根于一般民众之间。某中学生在战后初期某报上写道：“曾经一直被视为邪恶的日本共产党员，为了主义被投入监狱，即便面临悲惨的遭遇，仍旧没有抛弃主义。先不说那个主义是好还是坏，我深深佩服他们面对任何迫害仍不屈服的信念与节操。”[432] 当时，很多年轻人都希望加入日本共产党，除了对共产主义的共鸣外，不能无视其背后这种朴素的敬意。

与日本共产党处于敌对方的美国，也存在这种敬意。1946年2月，马克·盖恩在描写了迎合占领军的当政者及警察干部的形象后写道，美国国务院的职员嘟哝着：“日本最好的人是曾在监狱里待过的家伙。”另外，国务院顾问乔治·凯南的报告称，麦克阿瑟1948年3月与凯南谈话时，曾称赞德田球一及野坂参三为“有能力的家伙”，“他们是共产主义者真的很遗憾”。[433]

当时，人们认为日本共产党熟知由马克思主义这一“社会科学”而产生的“历史必然性”。战后初期，人们厌倦了空虚的非合理精神主义，憧憬着“科学”。甚至许多人悔恨因自己没有对未来的“科学性”预见而支持了破坏性战争。在这种状态下，基于社会科学的分析看透战争性格并预测战争必败的日本共产党大放异彩。

狱中没有转向的超人行为也与服务民众这一伦理意识一起，被认为是受“科学”支持并冷静预测未来而产生的。前述黑泽明的电影《我对青

春无悔》是以战时被处以死刑的共产主义者尾崎秀实为原型拍摄的。饰演尾崎的藤田进对饰演妻子的原节子说道："我们的工作是十年后才会真相大白，并在那时被日本国民感谢的工作。"[434]

哪里需要十年？对未来生活毫无希望的战后初期，这种话不可能没有魅力。为了不重复悔恨的经历，年轻人争先恐后学习"科学"世界观，阅读马克思著作。就这样，被"科学"与"历史必然性"支持的日本共产党，在战争体验与悔恨的记忆基础上，逐渐定格为"无谬"神话。

因此，对共产主义持批判态度的知识分子也在1950年代前，对日本共产党投去尊敬的目光。广为人知的保守派知识分子竹山道雄在1947年4月的文章中，形容从狱中释放的日本共产党干部为"足以证明对人性的信任"的人，将他们比作为了人类宁愿被枷锁捆绑的古希腊神话里的普罗米修斯。反共主义者猪木正道在1953年的座谈会上谈道："应该高度评价以德田为首的反对战争的人。"一同出席座谈会的鹤见俊辅也附和道："对那些人我甘拜下风。"[435]

更何况，对那些屈服于镇压而转向的原马克思主义学者来说，非转向干部的权威是绝对的。就像平田对托马斯·曼所形容的一样，没有罪恶感及悔恨便无法面对的对象，是日本的勇气与良心、科学与真理的象征。所谓日本共产党是"良心的唯一见证"，"取代基督教的精神原理"，就通过这些事情体现出来。

但是，德田及宫本等人的实际形象是否真的配得上这些神格化暂且不说，如本书第三章所述，1930年左右被捕入狱，在狱中度过十几年的他们，没有体验战时社会状况的变迁。当他们突然被抬到领导的位置时，将人们的敬意理解为对自己政治力量的信赖，从而经常进行专断领导也在所难免。

战后日本共产党迅速成长，大部分入党或重新入党的人，要么是战

时的“皇国青年”，要么是曾“转向”而支持战争的知识分子或工人运动家。而后一种人，则通过向少数没有转向的干部宣誓忠诚，来为自己曾经协助战争脱罪。因加入日本共产党而被免予追究战争责任的他们，经常借助党的权威谴责天皇制与当政者，批判非共产主义者。

对这类党员的排斥，自1950年代前期就已经存在。猪木正道在前述1953年的座谈会上，表示对没有转向的干部身怀敬意，但不满“一般的共产主义者……”在场的武谷三男在对日本共产党这一政党表示尊敬的同时也认为，“某些共产党人无法令人信任”，“应该唾弃那些装作不知道‘战时自身行为’的家伙们”。[436]

然而，这种排斥在批判斯大林运动的兴起及匈牙利事件的爆发，尤其是日本共产党路线变更使得日本共产党无谬神话崩溃的1955—1956年之前一直被压制。日本共产党的权威，在战争与悔恨的伤痕还很清晰的战败后10年内被广泛共有。

日本共产党的爱国论

如本书第三章所述，日本共产党自称是“真正爱国的党”。这里将更进一步探讨对战后思想给予巨大影响的日本共产党的“爱国”论。

1945年10月10日，因占领军的指令从狱中释放出来的日本共产党干部发表了题为《告人民》的宣言。该宣言在表示欢迎“为解放世界的联合国军队进驻日本”的同时，提倡打倒天皇制与“建立人民共和国政府”。[437]

如本书第三章所述，当时日本共产党采取的策略是首先发起废除天皇制的法国革命式的“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然后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这一“两阶段革命论”。他们因占领军的指令被释放，认为美军就是“解放军”，在美军占领下通过和平手段（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进行民主革命

这一“和平革命”路线成为可能。

另外该宣言认为，“扫除军国主义与警察政治是将日本民族从濒死的状态中解放出来，以及确立世界和平的前提条件”。这里的“日本民族”，是“军国主义”、“警察政治”的受害者。

1946年1月，流亡中国多年后回到日本的野坂参三发表了题为《由民主人民战线解救祖国的危机》的演讲，宣扬共产主义者才是“真正的爱国者”。这里所谓“民主人民战线”的名称，经1948年3月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提议，改成“民主民族战线”，并呼吁“反对保守亡国政府”。[438]

事实上，强调“爱国”与“民族”是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正式路线，集合以共产党为中心的各种势力，为对抗法西斯而组成“人民战线”。这一战术在纳粹取得政权后，在1935年召开的共产国际七大上被采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一方式被处于纳粹德国占领下的国家和对日抗战的中国等国家采用。也就是说，以共产党为中心的抵抗活动，才是与侵略者战斗的“爱国”斗争。

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过程中，高呼从殖民地状态下解放“民族”。这里的“民族战线”又符合“两阶段革命论”。当时的日本，与中国一样被视为亚洲的后进国，但既然当下的目标是民主革命，就有可能联合不支持共产主义的势力，为了民主革命及民族独立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

在殖民地支配下，打倒王权与民族独立空前一致。正如英国的印度统治，宗主国经常拉拢当地政权及地主，让他们帮助进行间接统治。在这种状态下，打倒原有王朝的民主革命随即变成从殖民地状态下独立的运动。因此，中国共产党批判旧有统治阶层为协助外国的“买办势力”，并在“爱国”的名义下推进抗日运动及革命。

这种路线对日本共产党的影响，在战后初期显露无遗。1946年2月，日本共产党的党刊《前卫》创刊，朝鲜共产党为创刊号发来电文，其中写道：“朝鲜民族是单一民族”，“真正热爱朝鲜民族，作为朝鲜民族之友，为了朝鲜民族的完全解放，最忠实战斗的是朝鲜共产党”，提倡“汇集民族的全部力量”“结成民族统一战线”。[439]

1946年3月的《前卫》第2期刊载了《关于爱国主义》一文。该文译自1945年6月苏联工会中央理事会机关报《劳动报》。该文内容成为日本共产党其后倡导的爱国论的原型。[440]

文章作者巴尔迪斯基首先指出应该打倒“谴责”“共产主义者及所有左派劳动者缺乏爱国心”的保守派。作为论据，作者指出，在纳粹德国占领的国家中，保守势力在反共的名义下建立了德国的傀儡政权，与此相反，各国共产党为了“解放祖国”进行了抵抗。也就是说，高喊“爱国主义”攻击共产党的保守派，才是“祖国的背叛者”，共产主义者才是“真正的爱国者”。

该文还主张区分“真正的爱国主义”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作者认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提倡“自我民族优越性”，与“赤裸的民族偏见”、“帝国主义的欲望”连在一起。与此相反，“真正的爱国主义”就如殖民地独立运动或法国革命一样，拥有“为本民族的自由而战斗的决心”，并尊重“其他民族的平等权利”。

作者还断言，“共产主义与国际主义没有任何相同点”。共产主义虽然主张国际联合，各国共产主义者却“站在祖国的立场上”。“国际主义对于劳动者来说是毫无关系的思想”，“劳动阶级从本民族脱离，拒绝该民族是非常滑稽的事情”。作者认为，说共产主义是国际主义，是“敌人对工人阶级最无耻的诽谤”。

那么，国际主义的旗手又是谁呢？当然是“跨国资本家的代表、国

际卡特尔大资产阶级股票投机者、世界性武器贩卖商（‘杀人商贩’）及其手下”。因为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超越国界，践行拉丁文谚语中的‘有美食的地方便是祖国’。

作者声称，“国际主义”是“对祖国漠不关心的蔑视态度”。“金融国际主义”主张“自己不是政治思想的信奉者”，“我们是政治圈外的超然务实主义者”，但实际上，他们才是“被贪婪的金钱主义驱使，将自己卖给带来更多利益的帝国主义者”。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中立国瑞士与瑞典，许多资本家将军需物资卖给纳粹便是最好的体现。因此，“已经证明国际主义绝不是‘超越政治’的东西”。

这里“国际主义”已经成为假装政治中立，实际上与帝国主义者勾结，超越国界追求利益的资本家的代名词。如前所述，丸山真男曾批判“世界市民”，中野重治也谴责瑞士和瑞典等中立国。

不用说，这篇文章的主张与本书第三章介绍的野坂参三的演说酷似。曾流亡苏联和中国的野坂深受中国共产党的影响。1947年1月，从中国回来的鹿地亘发表了《何谓爱国》的文章，其内容正是通过在中国的体验，引用巴尔迪斯基的文章，宣扬“真正的爱国”。[441]

但是，提倡民族战线并没有成为日本共产党干部的目标。战后初期日本共产党经常邀请社会党组成统一战线，然而该统一战线又必须由日本共产党主导，并且日本共产党还常常谴责拥有协助战争污点的社会党干部为“战犯”。

如第三章所述，从中国回来的野坂参三，知悉多数日本兵对天皇怀有敬意，因此提议将天皇制的存废问题交给人民投票决定。若要追求民族战线集合各派势力的话，这个方针或许比较高明。但是，狱中受过压迫的德田球一等人无法接受这一建议。

如前所述，十几年与外界隔离、在狱中度过的德田缺乏对日本社会现实的认识。据当时日本共产党领导层的神山茂夫说，1930年代在狱中度过的日本共产党干部，即便熟知1935年所采用的“人民战线”一词，也没有充分理解其含义。[442]

日本共产党采用人民战线这一方针之前，遵循“社会民主主义主要打击论”，也就是为取得工人支持，不得不首先攻击社会党。共产国际吸取因德国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对立，政权被纳粹夺取的教训，于1935年放弃了这一方针。然而，德田一直坚持这一路线。

在这种情况下引入民族战线，对之后的“爱国心”争论产生了不良影响。日本共产党干部及追随他们的党员知识分子，认为加入自己领导下的民族战线才是“真正的爱国”，并谴责不合自己心意的人为“战犯”、“卖国贼”等。

即便如此，战后初期十年内，“狱中没有转向”的权威依然存在。以日本共产党为主提出的“爱国”与“民族”主张，亦在某种程度上为人们所接受。但战后初期，也有人不满日本共产党势力的壮大，这些人就是被称为“老一辈自由主义者”的保守派知识分子。

战争与“自由主义者”

战败后，右翼国粹主义者的势力在言论界大大减弱，取代他们形成保守言论的，是通称为“老一辈自由主义者”的知识分子。

“老一辈自由主义”的特征，很难用一句话来概括。具体来说，和辻哲郎、津田左右吉、小泉信三、田中美知太郎、田中耕太郎、安倍能成等人是代表人物，而他们各自的特点也不尽相同。

如果摒弃思想上的差异，可以说他们还是有些许共性。其中之一便

是他们中的多数在战败时都已年过五十，青年时代都在大正时期度过。另外他们都是讨厌共产主义、尊敬天皇的“文化人”，同时也喜欢“自由主义”。由于这些原因，他们被称为“老一辈自由主义者”。笔者认为分析他们的特点，有助于理解战前日本“自由主义”的特性。

首先，最大的前提是经济高速增长之前日本社会巨大的阶层差距。战前的知识分子基本上是住在城市的中产阶级，经济上、教育上都与一般民众隔绝。1948年的调查显示，一般民众中能完全读懂报纸的只有4.4%。如第一章所述，在军队初次接触到下层民众的学生兵，对“大众”既惊愕又蔑视。

除了教育上的差距之外，生活文化方面的差距也很大。与老一辈自由主义者关系密切的作家山本有三，1936年移居到曾是东京郊外农村的三鹰，其宅邸结合英国房屋及哥特建筑样式，客厅拥有弧形大窗户、日光浴室、壁炉台。[443] 这一时代的知识分子，喜欢手杖、卷烟，也有很多人喜欢骑马和打高尔夫球。当时，打高尔夫球是都市上层市民才能享受的社交性运动。

但是，战时及战后的通货膨胀成为缩小这种差距的开端。都市中产阶级因空袭房屋被破坏，金融商品及存款因急速的通货膨胀而损耗。战败之后，由太宰治的小说《斜阳族》而来的“斜阳族”一词成为流行语。

大多数习惯了战前优雅生活的年长的知识分子，都不满战后的社会变化。《世界》杂志的一名编辑在1948年1月的日记中记录了一则可以很好体现这种不满的逸事。该编辑在拥挤的电车上偶遇美术史学家儿岛喜久雄：

> 在代代木车站等电车时，遇见了儿岛喜久雄。……一起乘坐满员电车。
>
> 儿岛先生说：“电车的拥挤与占领军的蛮横交织在一起，力量巨大。嘴

上说得很好听，但其实美国人对日本人有难以拭去的种族歧视。即便我们是战败国国民，但不得不说我们被虐待得有点过头了。”

这些话我还能理解，但紧接着他说：“大部分日本人实际上很肮脏，那也没办法。但是我不能接受兼具文化与教养的少数人也被一视同仁。”这一点我便不能接受了。这种“贵族取向”在与安倍能成见面时我也感受过。……

他接着说道：“人与生俱来有各种天分与身份。无视这一点，主张所有人平等是错误的。现在的世界，猫和勺子也叫嚷着民主主义，连工人们也主张要拿与别人相同的工资。世界简直太恐怖了。”他继续说，而我只是默默地听着。[444]

拥有这种“贵族取向”的战前“文化人”形成了战后保守论者的第一代。

但另一方面，在这种“文化人”中，有不少是战时对右翼及军人持批判态度的“自由主义者”。并且，这种批判起因于他们讨厌自己的社会地位被动摇。

战前的大部分知识分子出身于东京帝国大学等名校，与官僚及政党政治家是同窗。1930年代后开始，随着下层阶级出身的军人得势，以吉田茂为代表的亲英美派的一部分精英官僚，作为“自由主义者”受到排斥。在总体战体制下，拥有欧式教养的都市知识分子也成为批判的对象，而军需工厂的工人与农民们却被称赞为“产业战士”。

1940年代之前的日本，西方式生活是都市中产阶级以上的特权。1946年，鹤见俊辅分析排斥战时西方文化的标语得到民众支持的理由时说道：

这些标语如果照字面意思解释的话，是排斥从国外输入的风俗习惯，推崇日本旧有风俗。但其实远不止这些，其中还包含对上流阶级生活方式的反感。享受外来风俗的只是上流阶级，一般大众只止于国粹风俗，因此废除外来风俗对一般庶民毫无影响，而排斥外来风俗也可以称赞自己现有

> 的生活态度。说得再浅显一点，就好像不修边幅的大杂院女人对身着华丽衣服走在街上的上流妇人的反感，百姓人家对沉溺于滑雪滑冰及舞蹈的纨绔子弟的不快，等等，这些感情都包含在上述标语里。[445]

于是，上层“文化人”在战时体制里成为被攻击的对象，尤其是战时劳动力不足使得体力劳动者工资上涨，滥发国债又加剧通货膨胀，动员一切劳动力使得女佣也消失。这些状况加剧了城市中产阶级的没落。

总体战使得中产阶级及贵族阶级没落的情况，欧洲诸国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经历过。在日本，不仅存在贵族阶级没落的情况，还存在所有日本国民被组织化的情况。粮食配给制使町内会、邻组等社区领袖，以及掌管粮食配给品分配的小商店主有机会取得比都市中产阶级还要高的地位。

人格形成于大正时期的知识分子对这种战争体制表现出强烈反感。评论家清泽洌所著《黑暗日记》可以说是“自由主义者”批判战争的代表作，该书也很好地表现了这类知识分子的心情。例如，清泽在1944年3月的日记中写道：

> 刚才，有人来检查避难行李，检察官是经常帮忙做工的木匠梅村。他带着我们的邻组长，举手行礼说：“做得很好”，然后离开了。夫人说：“以前就是让他从侧门出入他都很客气呀。”[446]

有教养的中产阶级听从木匠的命令。这种总体战体制的现实被清泽形容为“军国主义与地方自治主义的妥协”，使得“维持秩序的责任落到木匠、花匠、鱼铺商等人手上了”。[447]

清泽日记中随处可见对总体战体制的反感。他与朋友感叹时局时，朋友说“日本的领导都只是下士官程度”，而清泽则批判“‘军人’这一中产阶级以下的家伙”是“没有学问的领导”。另一方面，他们感叹“我们的收入越来越少，相反工人的收入却越来越高”，忧虑于“精英的没落”，并

预测“社会的底层流淌着赤化的血液”，“革命必至”。[448]

在总体战后期爆发革命的现象也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和俄国上演过。如第二章所述，进步知识分子中，有人期待这种革命也能在日本兴起。即便是对革命反感的知识分子也抱有同样的预测。

在总体战体制下，清泽举出“共产主义的征兆”，是基于政府为保障军需劳动者的生活推出“日本式薪酬模式”、他常去的高尔夫球场因粮食不足被改造成农场这些现象。1944年10月，清泽在石桥湛山主办的研究会上，与知识分子们就“战后会变成什么样”进行讨论，其中“将会失去私有财产”成为讨论的焦点。[449]

清泽认为，日本“即便有‘革命’，大概也是具有破坏性和反动性的东西，因此，这个国家不可能变好”。总体战体制里“具有一般性知识与行动主义的人”即“木匠”、“鱼铺商人”等人即使发起革命，也只会招来混乱。[450]

清泽认为，是“知识阶层”和天皇给这些无知民众以秩序。他说：“没有共同训练的国民，一旦失去皇室这一中心，会成什么样？”1944年7月东条内阁解散时，他写道：“这个独裁者之所以瓦解，是因为日本是以皇室为中心的国家。我期望这个制度不要以过激的革命手段结束。”[451]

另外，清泽认为，“在美国的战后要求中，朝鲜独立的要求绝不可能”，“因为那（韩国合并）是合法进行的”。他希望总体战在招致革命之前投降，但如果能因放弃“满洲”而与欧美等国达成妥协，以至于“不（丧失）朝鲜、台湾的话最好不过”，这就是他的战后构想。他还认为，被强制带到日本而数量陡增的朝鲜人，使得“电车里朝鲜语泛滥。这将是今后最大的社会问题”。[452]

这种思考方式，在战时的上层阶级中普遍存在。众所周知，1945年2月，近卫文麿向天皇提出和平交涉时，强调“共产革命”的危机，认为推动总体战体制的军部内隐藏着“红色”危机。清泽的战时日记中，记录了与战后成为首相的吉田茂会面的情形，吉田也是对“红色”及军部抱有反感的“自由主义者”。他们认为“红色”与军部煽动“无知”的民众，威胁到他们的社会地位。

当然，多数马克思主义学者转向之时，清泽和吉田等“自由主义者”一直对战争持批判态度是不争的事实，但他们的“自由主义”与其说是体系思想，倒不如说是一种生活感觉。思想可以转变，但生活感觉并不容易改变。如果从他们从左翼、右翼的政治势力中保护自己的生活及“自由”来说，他们确实可以说是“自由主义者”。

加藤周一评价吉田茂等人道：“我真的怀疑日本权力结构上层是否有不懂桥牌规则而反对战争的人。”[453] 桥牌属于扑克牌游戏的一种，与骑马一样是英国绅士的风俗习惯，只流行于城市上层市民之间。如前所述，清泽当时的兴趣是打高尔夫球，这也属于特权阶级的运动。

这些知识分子蔑视多出身于下层市民的陆军士兵，而对融入英式秩序的海军士官抱有好感。如第一章所述，京都学派的哲学家与海军关系密切，和辻哲郎、安倍能成等人也参加过海军主持的思想座谈会。知识分子对海军的好感使他们战后倾向于美化海军。但是，正如第一章所述，严重的阶级差距才是海军士官特权式优雅的背景。

事实上，当时大多数“自由主义者”都顺应潮流支持战争。如清泽的日记中写道，庆应义塾大学校长、曾担任内阁顾问的小泉信三，即便在1944年12月还主张彻底抗战，叫嚣“比成为美国的奴隶强”。清泽认为，他“完全变成右翼”，“变成大臣待遇或校长的话，思想就能发生如此大的变化吗？”[454]

与多数保守政治家相同，小泉也在战后转为亲美路线，赞成准许美军驻扎的安保条约。小泉与皇室关系亲密，曾负责皇太子的教育。作家堀田善卫回忆他的父亲曾是小泉的同学，在评价小泉时说，“那样的人才是卖国贼”，“什么教育皇太子呀，简直就是国贼”。[455]

即便有像清泽这样批判战争的“自由主义者”，他们的批判也并没有产生实际的政治效果。因为他们不可能组织大众运动，只能在同僚之间批判政府或在重臣集团下做幕后工作。

清泽1945年5月病逝，如果战后还活着的话，他或许会变成保守论者。战后军部被解散，重回政界和言论界的“自由主义者”们高举反对日本共产党与拥护天皇的旗帜，成为战后保守势力。

老一辈自由主义者

战后初期，言论界既出现了恢复道义、民主化的主张，也出现了文化国家论的观点。而文化国家论的旗手，则是重返言论界的战前“文化人”。曾被军部镇压的“文化人”，以重视“文化”的文化国家论为重返言论界的宣言。

重返言论界的“文化人”中，也包括因“世界史哲学”成为战时明星的京都学派哲学家。但他们因其在战时的活动失去了读者的信任。原学生兵梅原猛说道：“自己不面对死亡却向他人诠释死亡，难道不是欺诈行为吗？”他还说，复员后“简直无法忍受对我们诠释死亡的哲学家们”。[456] 而这些“文化人”最终都被开除公职。

复归的“文化人”中还有一个群体，就是战前的“自由主义者”们。战败之初，通过岩波书店老板岩波茂雄的人脉，以安倍能成、和辻哲郎、谷川彻三、志贺直哉、武者小路实笃、山本有三、田中耕太郎等人为中心，加上石桥湛山、小泉信三、铃木大拙、柳宗悦、大内兵卫等人组成

了“同心会”。作为同心会的会刊，《世界》杂志于1945年12月创刊。

当时，马克思主义派系激进杂志偏多，而《世界》被认为是稳健且有教养的杂志，被形容为“像金纽扣似的秀才型杂志”、“保守党左派杂志”。从同心会成员来看这是顺理成章的结果，但这种状态并不长久。编辑委员中不少成员是社会主义的共鸣者，而主编吉野源三郎则希望创办一个超越同心会的杂志。

然而，旧时代过来的知识分子们要想转变思想并非易事。《世界》创刊号的卷首文章由安倍能成执笔，其内容也只是诸如批判战时道德下降、提倡重建“道义”等老生常谈。不过，这篇文章被占领军删减了两处，并因文中惋惜撤除军备及丧失殖民地，编辑委员会要求安倍脱离同心会。[457]

如前所述，安倍与和辻哲郎、谷川彻三一起参加过海军主办的思想座谈会。曾任京城帝国大学教授的安倍，在1942年的座谈会上，提倡防止日本人与朝鲜人混血，认为“只要日本一步步控制住满洲的话，就可以统治夹在满洲与日本之间的朝鲜”。另外，安倍认为，“大东亚共荣圈”的教育，“没有必要用简单的人道主义来姑息当地居民”，“必须引导他们为日本的利益而做出贡献”。[458] 和辻也在该座谈会上做了相同主旨的报告。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安倍会在文章中对日本丧失殖民地表示惋惜。

使这种问题进一步表面化的，是1946年第4期《世界》上刊载的津田左右吉的文章《建国与万世一系的思想》。津田战前专注于研究《古事记》、《日本书纪》，他的著作又在二战时因违反出版法被禁止出版。因此，津田作为抵抗镇压的自由主义历史学家受到很高评价。编辑委员期待津田能提供批判皇国史观的论文，而津田却寄来拥护天皇、批判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论文。

蔑视朝鲜、拥护天皇、反共等，是这一代“自由主义者”的共同倾向。如第三章所述，和辻哲郎、田中耕太郎等指出如果废除天皇制，没有自治能力的国民将陷入混乱。清泽也一样，他们在战时对军部持批判态度，战后却显露出拥护天皇和反对日本共产党的一面。

编辑部收到津田的文章后，大多数编辑都反对刊载该文。主编吉野找羽仁五郎商量时，羽仁说：“刊登这样的文章，一旦发生革命我们都得上断头台。”[459] 不得已，吉野最终决定，将编辑部写给津田的长篇“忠告”，与他的文章一起刊登。

在这次风波之后，刊载于《世界》第5期卷首的是丸山真男的《超国家主义的逻辑和心理》一文。当时年仅32岁的丸山，虽说是东京大学副教授，但也只是毫不知名的青年，他的文章可以说是破格采用。

但是，丸山的文章所引起的反响超出预料。因物资匮乏，当时报幅减半、仅有正反两页的《朝日新闻》，却在杂志评论一栏对丸山的文章大加赞赏：“守旧的言论界终于刮来新风”，“虽然很年轻，论文却颇具价值，是一种新样式”。[460] 该文尤其引起了从军队复员的年轻读者的共鸣。同心会成员所写的文章大都是像大正教养主义似的启蒙文化论，因此可以想象丸山文章受欢迎是理所当然的。

以此为契机，《世界》的执笔者转向年轻人。从1948年起，由吉野发起组成“和平问题谈话会”（最初称“和平问题讨论会”），《世界》杂志上开始发表有关和平问题及媾和问题的声明，而津田左右吉与田中美知太郎被排除在外。“和平问题谈话会”起初推举安倍能成为会长，之后渐渐转由以丸山真男为首的年轻人管理。在这种状况下，同心会最终脱离《世界》，于1948年7月创办杂志《心》。

与此同时，一些老一辈“文化人”因是政治家及官僚的旧识，多被保守政权的内阁任命为官僚。1946年，币原内阁任命安倍能成为文部大

臣，田中耕太郎与天野贞祐也接连被吉田内阁任命为文部大臣。值得一提的是，天野于1951年委托被解除公职的京都学派哲学家们制定《国民实践要领》，宣传对天皇的敬爱与家庭和睦，被认为是《教育敕语》的战后版而广受批评。[461] 最终，京都学派的铃木成高等人也加入这些知识分子团体，成为《心》的执笔者。

与《世界》起用丸山等年轻学者相反，小泉信三、田中美知太郎等人转而为《文艺春秋》执笔。此后，《世界》与《文艺春秋》在言论界相互对立。理所当然，1950年代，《世界》是受大学生喜爱的年轻人的杂志，而《文艺春秋》以年长一代读者为中心。

就这样，与言论界的代际交替一起，曾经的“自由主义者”成为保守论者。也正因如此，他们被称为“老一辈自由主义者”。

强调“个人”的保守

1950年代形成的保守论调大多宣传“现实”、“常识”、“传统”，批判和平主义为“空论”、“不成熟”、“幼稚”，尤其是小泉信三、田中美知太郎等人赞成重新武装，将国防的义务定位为“公共心”的一环并大加赞赏。

这种观点与之后的保守论调异曲同工。但1950年代的保守论调，与经济高速增长期以后的论调相比，有几个特征。

其中之一便是有将战后民主化及工人运动与军部独裁等同视之的倾向。铃木成高于1949年给《心》的投稿中，认为“1947年的‘二·一总罢工’[462] 与1936年的‘二·二六事件’是同一性质”。小泉信三也于1950年谈道，“对军人的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批判，大都是从马克思主义借来的”。这种例子数不胜数。[463] 由这种倾向产生出的“昔日军阀，今日总评[464] ”等词后来经常被保守言论界使用。

尤其是经济学家小泉，强调马克思主义与总体战体制的相似性，并认为自由主义经济正因此而受损。这种论调与保守论者的代际交替一起暂时衰退，但到1990年代，以“1940年体制论”的方式再次出现。

另外，1950年代之前的保守论调中还有一个特征，即经济高速增长期之后的保守论者，如第III部将要分析的江藤淳等人，宣扬克服对“个体”的留恋，为“公”的国家做贡献。然而，1950年代的老一辈自由主义者竭力强调“个人自由”。

例如，铃木成高指出，“活用并贯彻个人”才是保守主义。田中美知太郎也认为，“以自己的生活为中心，光明正大地利己一些比较好”。另外，武者小路实笃、和辻哲郎、安倍能成等也在《心》举办的座谈会上，异口同声地宣称“个人为主，政治为辅”，“不想失去自己的自由”，“打算重视自己”。[465]

这种论调的背景还是他们的战争体验。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们所谓的“个人的自由”，其实只不过意味着对抗“红色”与军部，以保护“自己的自由”。

事实上，1950年代的老一辈自由主义者经常批判马克思主义为无视“个人”的集体主义思想。[466] 与此相反，当时的日本共产党批判“个人主义”，主张“政治优先”。1946年2月，起草日本共产党第五次大会上所采用的文化政策案的藏原惟人认为，“个人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467]

如前所述，当时的日本共产党都认为“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市民社会的意识形态。而在恐慌使得自由主义经济停滞不前的现代，小资产阶级面临的是加入法西斯及帝国主义阵营还是加入无产阶级阵营的选择。在这样的状况下，保持“中立”或“个人的自由”意味着逃避加入无产阶级阵营，袒护帝国主义。老一辈自由主义者主张“个人为

主，政治为辅”也是为对抗日本共产党论调而不得已提出的观点。

本章前半部分论述过，日本共产党也在这种对立之中批判“世界市民”。当时，享受西方文化是上层阶级的特权，精通西方哲学文化、提倡从“政治”中解放“个人自由”的老一辈自由主义者正符合被批判的“世界市民”形象。

这种批判对老一辈自由主义者来说，只是介入他们生活的“政治”压力。铃木成高认为，“不被一切思想束缚的精神才是保守主义”，主张“诚实地尊敬好东西，这种精神是理所应当的，我认为这与精英意识毫不相同”。[468] 但在阶层差距巨大的时代，从日本共产党的角度来看，这种态度不过是无视派生小资产阶级生活观的社会立场。

另一方面，保守论者倾向于宣传以尊敬天皇为中心的“爱国心”及“公共心”。那么在他们心里，“个人的自由”与“公共心”又如何共存呢？我们可以从《心》举办的座谈会上竹山道雄的发言窥探这一问题：

> ……如果变成集体主义的话，政治将要决定一切，这样就另当别论。如果不这样的话，除了政治，人们可以自由选择其他……可以有人只关心文化，而且必须有这样的人。……这是承担文化的人的责任。[469]

在该座谈会上，也有人主张“人应该遵照各自的天分，扮演适当的角色”。[470] 这种身份制度的心理状态支撑着他们所提倡的“个人自由”与“公共心”并存。也就是说，“肩负文化的人”，也可以像大众通过劳动贡献社会一样，通过自由享受文化，以一般民众不可能的形式贡献社会。这种秩序是“传统的”并且是“自然的”，而介入该秩序的“政治”便是“集体主义”。

再者，在这些保守论者口中，“和平”一词也被赋予了一种独特意义。小泉信三一边赞成重新武装和《日美安保条约》，一边说“与祈祷民族间的和平一样，我希望阶级之间也是和平的”。[471] 而这种“和

平”，也就是他们享受安定地位的战前的时代象征，即天皇。

1945年10月，评论家河上彻太郎撰写了评论文章《被配给的“自由”》。在该文中，他讽刺战败后回归言论界的“自由主义者”。河上认为，欧洲的“自由主义者”是与王朝或贵族制战斗的人，“然而我国的自由主义者，（1930年代）是左翼华丽的稳健中庸派，性格上保守的人居多”。他还认为这些人在日本政治失败后，以“不即不离的文化主义”抛头露面，“当然无法期待他们的积极性”。[472]

另外，老一辈自由主义者经常主张“自己的自由”，却批判他人的“自私”。而这一批判主要面向下层阶级的权利要求。在1948年的座谈会上，安倍能成认为，“我在战时便感觉到，战后工人对权利的要求会非常之大”。他还认为，罢工是爱国心欠缺的表现，知识分子的生活水平在战后降低，与此相反，工人却“拿到很多工资，受到特别待遇”，“简直被惯坏了”。[473]

对于这样的安倍，日本共产党系哲学家松村一人反驳道：“您说工人阶级很放肆，认为他们在做与身份不相符的事情，对于这一点您非常在意。可是资本家们的放肆，您却一点都不在意。”同样出席该座谈会的清水几太郎也认为工人运动与民主化运动是“新式爱国心”的表现。但是安倍只以“虽然在这个意义上的爱国心也有可能，但我还没有体会到”作为回应。[474]

“世代”的差异

然而，这种保守论者的倾向与丸山真男等年轻知识分子在某种程度上有共通之处。他们大多出身中层或上层阶级，正如前文所述，丸山等人也曾表现出对大众的蔑视与对“下士官”的厌恶。

那么，是什么横亘在丸山等人与老一辈知识分子之间呢？概而言

之，便是由世代派生出的不同的战争经历。

丸山等人的年龄问题常被人忽视，这群“战后民主主义”的代表性论者在刚战败时都很年轻。以31岁的丸山真男为首，加藤周一、日高六郎、鹤见俊辅等都才二十出头。

丸山评论战败后自己参加的知识分子团体“青年文化会议”时，认为该“会议”是“三十岁出头的，多多少少共有被害者意识与世代论想法的知识分子的团体”。[475] 这里出现的“世代”一词，与“主体性”一词相同，成为战后思想的一大特征。

战争对许多人来说都是灾难，但是所受灾难的性质却因为世代的不同而存在差异。战时掌握政策及作战决定权的人，在言论界大肆讴歌战争的人都在四十多岁到五十多岁。与此相反，被动员到军队或工厂、被投入最前线的都是年青一代。

战时成为征兵与动员对象的是十几岁到三十几岁的人。即便运气好免于战死或负伤，但是学生充军被迫中断学业，或者走上工作岗位数年而被迫放弃，对于他们的职场生涯都有负面影响。复员后，即便尝试重新开始学习或工作，因基础设施不完善及社会动荡不安，他们也很难心想事成。

因此，多数年轻人抱有自己的人生规划被“年长一代发动的战争”破坏的意识。在军队，不少人有被逃往后方的年长上官留在战场的经历。在这个背景下，便出现了丸山所说的“三十岁出头的，多多少少共有被害者意识与世代论想法的知识分子的团体”。

这些年轻的知识分子对年长的保守论者怀有强烈的反感。如鹤见俊辅批评老一辈自由主义者时说：“（他们）没有一个人在1931年至1945年处于被动员的年龄。这一点是决定性的。是不是动员年龄，根本上决

定了情感形成条件的差异。”[476]

这种“受害者意识”与“悔恨”有着微妙的关系。丸山真男在1968年的座谈会上，虽然对没有抵抗军部的统治表示悔恨，却并不认为“自己个人有战争责任”。[477] 可以说，他们切身认为，应该被追究责任的，是当政者与年长一代。

如本书第一章所述，以丸山为首的年轻知识分子们，因动员而接触到“大众”。而与“大众”的接触在让他们感到屈辱的同时，也激发了他们分析日本社会现状、变革引发战争的社会因素的热情。战败后多数年轻知识分子虽然程度上有所差异，但都对社会主义产生了某种程度的共鸣。

然而，没有经历动员的老一辈自由主义者，无法共有这种心情。战败后，即便赞成彻底解散军部，但比起变革社会结构，他们更热衷于恢复他们习惯的战前体制。松村一人于1948年“关于世代的差异”座谈会上，对安倍能成及和辻哲郎等人说道：“我感觉你们的理想便是没有军队的旧政治经济结构。”[478]

这些老一辈自由主义者认为，大正时期的日本才是正常社会，因为那时拥有知识的上层阶级操纵政治，自己享受稳定的身份与“文化”。而军人抬头后的昭和时期是突然发生的异常情况。他们认为，天皇的社会地位也在与政治密切结合的昭和时期发生异常，只要恢复到之前的状态，天皇制与民主主义便不会有矛盾。

例如，津田左右吉于1948年有如下主张：“从明治、大正时期开始在社会上活动的人，认为这次战争是一部分政客与军人的策略引发的突发性特殊事件，是不幸的事变，并不认为是正常状态。而年轻人则不同，他们不知道昭和以前的时代，所以认为这次事变是日本的常态，是日本人的本质，并由此来推断日本与日本人的一切。”[479] 津田认为，

叫嚣变革社会体制，是因为年青一代的无知所产生的谬论。

但是，年轻知识分子们并不这么认为。丸山真男批评“明治一代”的老一辈自由主义者，于1950年的座谈会上说道：

> 现代所谓明治时期出生的人，怎么也不承认日本最近的狭隘民族主义是明治以后的国家或社会体制发展中必然出现的东西。津田左右吉先生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认为过去的日本更加近代化，只是旁逸斜出粗鲁的军部及右翼而成了现在的状况。他还强调日本以前就有自由，也有批判精神。为什么明治的精英们会有这种感觉很有意思。确实，知识分子们生活的世界在观念上很近代，但这种观念的世界与一般国民生活的“思想”很遥远，国民生活本身与近代化程度之间非常不均衡。但是，生活在知识社会的人，知道那个社会氛围的人，却认为最近的超现实法西斯的出现是突发现象。因此，感觉是无药可救的粗鲁人支配了整个日本。事实上，不如说是这些人生活的知识社会是特殊社会，而一般国民生活在与其完全隔绝的环境与社会意识中。[480]

丸山那一代人，因动员而接触到下层民众，其结果是让他们痛感自己的生活观与天皇观在日本整体社会中只不过是少数。丸山认为，昭和时期超国家主义的抬头，即便对上层知识分子来说是突发事件，但并不是说不存在于明治、大正时期，只不过是下层民众之间常态的东西进入政治中枢的结果而已。这样的话，即便恢复到大正时期也无法解决问题，因此有必要分析与变革近代日本社会结构。

再者，与怀念“大正”的老一辈自由主义者相反，年青一代更加重视“明治”。他们试图通过赞赏“建国与变革”时代的明治维新和自由民权运动，对抗在“稳定与文化”时代的大正时期成长的老一辈自由主义者。

例如，鹤见俊辅在1951年《批判老一代》的一文中写道：“老人，分为维新人与明治人两种。”鹤见认为，“社会秩序可以变更”对于经历过幕府末期到明治维新变革时代的“维新人”来说，并不是单纯的理论，而是他们的切身感受。与此相反，出生在秩序稳定的明治后期的世代，

也就是老一辈自由主义者与战时当政者毫不怀疑被赋予的框架，“从根本上讲没有变革意识，只是一味顺从”。同时他认为：“战后的年轻人的思想，继承了维新人的思想。”[481]

丸山真男与竹内好也发表过同样的观点。如前所述，丸山认为“明治拥有与大正、昭和时代不同的东西”。竹内也以战败为契机，“重新审视了明治精神”，形容老一辈自由主义者是在“日本最好的时代”，“通过温室培养”完成人格塑造的人，“他们实际上难以抗拒权力，缺乏身体力行的精神，抵抗意识也十分薄弱”。竹内还认为，“对于我们这一代人，天皇制是可憎的，是应该被诅咒的，但与此同时，又是无论怎么挣扎都摆脱不掉的，像是命中注定的东西。天皇制的记忆，与所有恐怖心理连在一起。而这一点是老一辈自由主义者无法理解的”。[482]

事实上，战后初期直至1950年代，根本没有论调将大正民主化作为战后民主化榜样给予评价。[483] 从大正民主主义的遗存政党政治家及老一辈自由主义者当时处于保守派的位置来看，没有这种评价也是理所应当的。

而且，年青一代知识分子都厌恶大正时期流行的教养主义文化。加藤周一于1946年7月发表《新星堇派》一文，批判爱读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与黑塞（Hermann Hesse）的朋友，战时宣传决战与“玉碎”，战后却高唱“和平、民主主义”。加藤认为，歌咏“星星”、“堇花”、“少女”的“星堇派”浪漫诗人，既不抗议战争，也对战败后饥饿的现实无能为力，“对社会历史问题连小孩的判断力都不如”，“只享受安全的文化，顺便满足自己的自尊心”，是“幼稚病患者的艺术思想游戏而已”。[484]

丸山也于1946年10月的演讲《明治国家的思想》中批判道：“完全非政治性，也就是歌咏星星、堇花，迈向解放本能生活的个人主义。”当然，这些教养主义文化也是他们自己从年轻时候就熟悉的东

西。但是，之后他们面对战争与战败的苦境时，这些教养文化没有丝毫作用。对拥有这些体验的他们来说，如加藤所言，宣传文化与美的大正教养主义简直是“令人作呕的东西”。[485]

当时的知识分子都知道，大正民主主义没能阻止军部抬头而被瓦解。因此，他们绝对不乐意将自己的民主化取向比作大正民主主义。将“战后民主主义”比作大正民主主义的风潮出现于1960年代以后。当时，正值批判形式化、温和化的“战后民主主义”论调抬头。

以丸山为首的战后初期知识分子，在表达战败后的心情时，将“明治”定位为变革的时代。这时，“世界市民”一词意味着逃离政治，“国民”或“民族”一词意味着参与政治及“主体性”。这种论调并不是他们对民族主义的否定，而是与重现新民族主义的取向连在一起。

同时，“明治”一词，“国民”、“民族”等词，正是在战后初期的混乱时代才显得具有革新意义。当时，秩序不稳定，国家的将来也是未知数，因此“重建国家”、“参与政治”等词，与之后的时代相比拥有不同的魅力。最终，随着高速经济增长时期到来，社会开始稳定，“明治”、“民族”等词失去其作为革新派的意义渐渐被保守派吸收，关于这一点将在本书第Ⅲ部考察。

同时，高速经济增长也带来了保守派特征的变化。改革氛围高涨，参与政治就意味着加入左派的时代，反而是保守派提倡脱离政治的“个人自由”。而正因为1950年代之前的保守知识分子成长于贫富差距巨大的时代，这种“个人自由”与“公共心”、“爱国心”的主张才得以共存。

换句话说，对他们来讲，“文化人”这一国内的分工，不是有意识取得的，而是与生俱来的。在这种前提因经济高速增长而瓦解的时候，江藤淳等人形成了“提倡有意识地接近国家，取得社会地位与自我认同感”的保守论调，关于这一点将在第Ⅲ部加以分析。

以战争体验的记忆与巨大阶层差距为背景，战后初期有关民族主义的言论结构得以形成。当这种战争体验开始慢慢被淡忘，经济高速增长也开始到来时，这种言论结构也必然会发生变化。

第六章 “民族”与“市民”

如前所述，“主体性”与“世代”是战后思想的关键词。本章将考察1947年前后发生的“主体性争论”，尤其以《近代文学》杂志与日本共产党之间形成对立的“政治与文学”争论为考察对象。[486]

丸山真男等很多战后知识分子在“确立自我”的同时，也呼吁参与政治。但“确立自我”和参与政治之间也存在冲突。以文学家与日本共产党关系为主题的“政治与文学”争论，正是这一冲突的表现。

该争论以《近代文学》主张“文学”自主来对抗主张“政治优先”的日本共产党的方式进行。不过，《近代文学》并没有否定“政治”。我们可以从该争论中窥视战后初期“近代”、“民族”、“市民”这些词被赋予的意义。

“个人主义”的主张

1945年12月底，一群30岁左右的作家及评论家创办了《近代文学》杂志。作为创刊人之一，本多秋五在创刊号卷首文章《艺术·历史·人类》中发表宣言称：

> 艺术家放弃“私”绝对不行。如果没有从内心涌现的兴趣与喜悦，如果没有“个人”内部喷发的热情，艺术将会死亡。作为前车之鉴的战时文学已经逝去。艺术家们，满足“私”吧！[487]

本多还指出，“政治是外因，文学是内因”，“即便是被咒骂为反动人物的作品，只要艺术上出色，就值得肯定”，他标榜文学优于政治

的“艺术至上主义”。

之所以发表重视“个人”与“艺术至上主义”这一陈腐宣言，是出于他们与日本共产党之间矛盾冲突的时代背景。如第五章所述，当时的日本共产党批判“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主张“政治优先”。

本书已经反复论述过，当时日本共产党周围，因资本主义末期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穷途末路，小资产阶级被要求做出加入无产阶级阵营还是帝国主义阵营的选择。

基于这种认识，小资产阶级文学家们应抛弃艺术至上主义及个人主义，加入“民众”的行列，在日本共产党的庇护下继续创作。

其实，早在1927年，日本共产党系文学家与无政府主义文学家发起争论时，日本共产党系评论家藏原惟人曾形容无政府主义文学家为“否定一切‘强权’，沉湎于个人主义美梦的”“末期小资产阶级”。藏原于1945年11月发表在《东京新闻》的《向新文学出发》一文，也谴责了无政府主义文学家，认为他们“虽标榜非政治主义并且与无产阶级文学对立，然而因其本质的反动性与政治上的盲目性，成为与最低劣的政治结合在一起的艺术至上主义者，多么令人啼笑皆非”。[488]

对“艺术至上主义”的批判，也与作家武者小路实笃这一类人的动向息息相关。在战前无产阶级文学全盛时期，武者小路提出“自己”的自由加以对抗。后来，他成为贵族院议员，撰写赞美战争的文章，最终成为新日本文学会所列战犯文学家中的一员，1946年被开除公职。

如本书第五章所述，武者小路战后加入老一辈自由主义者的《心》派，提出“个人为主，政治为辅”。这类作家的存在，正好体现了日本共产党认为拒绝“政治”的小资产阶级文学家最终会加入帝国主义阵营这一观点。

然而本多认为藏原的见解太过单纯，特意标榜“艺术至上主义”与重视“个人”。同时提出“小资产阶级作家，精英作家，除了努力扮演小资产阶级作家、精英作家之外，没有与民众一起战斗的文学道路”。[489]

不过，本多等《近代文学》编者都是战前马克思主义文学运动的亲历者，在《近代文学》创刊号中，曾邀请藏原一起召开座谈会。座谈会上，本多秋五说道：“藏原惟人的名字之于我，同时之于大家，是近似神的存在。”[490]

1930年代，藏原作为年轻评论家，是马克思主义文学运动的明星。他于1932年被捕入狱，到1940年10月为止一直在狱中度过，之后因病保释出狱。整个战争时期，他一直在警察的监视下疗养度过。如第五章所述，1946年2月，他曾执笔日本共产党第五届大会通过的文化政策草案。对那些晚于藏原参与战前马克思主义文学运动的《近代文学》编者来说，藏原确实称得上令人仰慕的对象。

但是，与藏原座谈的结果并不理想。《近代文学》编者们向藏原提出，无产阶级文学也好，战争文学也罢，不正是“政治过于强大使得文学毁灭”了吗？但藏原认为，文学家一旦重视“个人”，“就会将自己的立场合理化，并安于现状”，他提倡应克服小资产阶级的自我，参与政治。但当编者们提出如果这样的话，“参与政治”书写战争文学的作家会怎样这一问题时，藏原只以“如果政治正确的话”就应该参加作为回答。[491]

如第一章所述，对“艺术至上主义”与“个人主义”的批判也是战时军部的观点。在1944年的座谈会上，陆军宣传部铃木库三少佐批判艺术家对政治不关心以及“艺术至上主义”，并谴责“多数美术家最终与资本主义勾结”。[492] 对当时的文学家来说，如何与根据这种主张逼迫而来的军部及日本共产党的“政治”保持距离是迫在眉睫的问题。

可以说，本多秋五提倡“艺术至上主义”及重视“个人”，也是对藏原的态度感到失望的结果。因此，《近代文学》的背景也含有对战前左翼运动的幻灭。

1930年左右兴盛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于1930年代中期遭到镇压而覆灭。尤其让参加运动的人感到幻灭的是“查问与转向”问题。战前特高警察向日本共产党内部派遣了大批间谍，而惯用伎俩便是将逮捕后转向的党员释放出去，让其重新加入日本共产党。这些间谍的任务，除了将党内情报报告给警察外，还包括故意采取过激行动制造镇压口实。在这些潜入间谍的策划下，发生了以筹措政党资金为名目的抢劫事件。

苦恼于间谍的日本共产党党内开始疑神疑鬼，于是肆意查问可疑人物。“查问”给不少党员以精神上的刺激，1933年甚至有人在查问中死亡。

当无产阶级文学运动覆灭后，被逮捕的党员及文学家中转向者层出不穷，而其中许多人开始撰写协助战争的文章。第一章已经提到，《近代文学》的编者之一荒正人说过，“我亲眼见过曾是人民的朋友如何堕落为仆人及幸福的居民”。

而当战后马克思主义文学运动复活时，完全没有反省战前的失败。战后日本共产党仍旧采用“人民民主战线”，虽将名称由“无产阶级文学”改为“民主主义文学”，但内容上毫无新意。

1945年12月，以战前无产阶级文学家为核心，组建了新日本文学会。但据本多秋五的回忆，“除了战时保持沉默的（正宗）白鸟、（永井）荷风、谷崎（润一郎）、志贺（直哉）等耆宿外，完全没有玷污双手的作家只有宫本百合子与中野重治”。[493]

《近代文学》编者小田切秀雄就战后作为后备的无产阶级文学家回

忆道：

> ……新日本文学会的核心成员，除去中野重治、宫本百合子等少数人外……都凭借过去的“光荣”与思考模式，即曾经制造出所谓知识财产的利息而活着。这些人同我一样，言不由衷偷偷转向，作为战时受特高警察监视的“忠良国民”，以各种生活处世态度加以忍耐，但在当时不得已的屈辱与歪曲中，他们关于自身及人性，应该有很多深切体会……他们重复没有血性的老调轻松度日。……而那不限于文学，他们这种生活方式与尽量避开对自我检讨、粉饰缺点的党内风气相辅相成，成就着千篇一律的“阶级性”的豪言壮语。[494]

1930年前后，代表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藏原惟人与中野重治等人都才二十出头，然而在战败时他们已然四十出头，步入中年。本多在前述论文中评价道：与三十岁那一代人相比，藏原等“年过四十的领导者”都已经“显示出无法掩盖的动脉硬化的征兆”。[495]

这种对“四十岁一代”的批判，就如第五章所述，含有战时被动员一代对年长一代的反感。荒正人评价“四十岁一代的旧进步人”时说道，他们没有经历战时征兵令的恐惧，因此“他们经历战争的切实感、肉体的沉重感委实不如我们三十岁一代人”。同时，荒还从战败后的杂志上引用代表年青一代的呼声，“背叛过我们的大人们，这次又厚着脸皮说着豪言壮语似乎要领导这个世界，我们难道应该用欢呼雀跃来欢迎他们吗？”[496]

针对日本共产党提出的“政治优先”，《近代文学》的编者平野谦在1946年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提出“树立‘个人主义文学’”。他还指出，“战时文学只不过是无产阶级文学的格式化翻版，只是日本共产党与日本帝国主义调换了位置而已”，“小林多喜二的血与白白牺牲的特攻队员的血完全相同”。小田切秀雄也在1945年12月的文章中，批判了“描写与自己的体会毫无关联的‘工人’、‘人民大众’”的无产阶级文学与描写“没有真实感的‘产业战士’、‘后方’、‘士兵’令人钦佩的故事”的战争文学。[497]

然而，平野谦尤为重视的是左翼运动中的女性地位问题。战前，日本共产党将女性活动家称为“女管家”，让其与男性活动家同住。平野视之为“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无情“政治”事例。因此他提出“从事文学的人即便放话说拒绝政治，也没有理由责备他”。[498] 作为文学问题，小林多喜二的小说《为党生活的人》中也认为女性被政治活动利用。

荒正人谈论自己对左翼运动的幻灭时说道：“对于三十岁一代的人来说，美好回忆要伴随些许苦笑才能复苏。”[499] 战后左翼运动的重新出发最初就存在这种幻灭。老一辈自由主义者也一样，战败后的“个人主义”主张，产生于对抗军部与日本共产党这两个“政治”之时。

战争体验与“利己主义”

《近代文学》的编者并不像老一辈自由主义者那样反对共产主义。他们都是新日本文学会会员，荒、小田切、佐佐木基一等是日本共产党党员。据本多回忆，这些成员“比‘新日本文学会’之外的一切团体的文学家更表示出对政治的强烈关心”。[500]

令对“政治”抱有幻灭的他们直视“政治”的最大原因便是战争体验。例如，荒正人在1946年的评论中写道，“我们对那些奔赴大屠杀的青年袖手旁观”，“在此，证实了我们的利己主义”，并从当时的杂志上引用二十岁左右青年谴责三十岁一代的话：“默默把我们送往战场的三十岁一代。”[501] 如第五章所述，这种悔恨正是战后知识分子参与政治的动机。

再者，荒正人、小田切、佐佐木等人，因战时举办基于马克思主义的文艺学研究会，1944年4月被捕入狱，在狱中度过8个月。在狱中，他们也饱尝了屈辱与悔恨的味道。荒正人在1946年6月的评论中回忆狱中经历时写道，在粮食极度缺乏的监狱里，“坐卧不宁的饥饿使我抢夺他人的饭菜，空袭时躲在最安全的地方，蒙上几层毛毯”。甚至某种意义

上成为监狱名人的荒正人，“利用老资格，很自然地将其制度化”。[502]

荒正人形容这种体验为“明白了地狱的利己主义”、“重新审视自己”。同时他说道，“在地狱中考验自己的事，一次就足够了”，“很想为了人道主义而战斗”。[503] 由此，荒正人将度过幻灭与绝望、重新相信理想的心情称为“第二青春”，并将其作为投给《近代文学》的第一篇作品的标题。

拥有狱中经历的荒正人，非常尊敬在狱中坚持没有转向的日本共产党干部。1945年10月，当那些日本共产党干部从狱中释放时，他赶往现场并流泪欢呼。在1946年的评论中，荒正人写道，“战败后，我读过尾崎秀实、宫本显治在狱中写的一些书信，对他们所达到的境界致以崇高敬意”，并将他们与“（战时）上窜下跳的教条主义之徒”进行对比。[504]

荒正人在告白自己的狱中屈辱经历时，还说：“永远不会忘记这个记忆……必须复仇。”荒正人听到战败消息时，嘴里哼着“骄者必败”，同时发出一种“带有愤怒的奇怪哄笑”。小田切秀雄也如前所述：“言不由衷偷偷转向，作为战时受特高警察监视的‘忠良国民’，以各种生活处世态度加以忍耐。”他坦白自己的过去，并表示“要报复让其忍耐的权力及其爪牙们”。[505] 他们即便对“四十岁一代”的“教条主义者”持批判态度，对镇压自己的战争体制也抱有更强烈的反感与憎恶。

同时，荒正人也是预料战败时会发生革命的其中一人。晚年接受采访时，荒正人说道，战争末期，“我幻想着，美军进攻东京之时，以热爱日本的国民为基础，会组成广大的‘人民战线’……在长野县一带，会出现‘日本人民共和国’”；“我也推测，激烈的内战发生时，将分裂出两类人，一类是聚集在‘日本人民共和国’的支持共产主义的人，另一类便是与美国妥协的人”。[506] 当然，这一预想没有发生，但凭借将希望寄托在这种“空想”上的心情，我们可以推想到他战时所受压抑之深。

如第五章所述，将丸山真男等战后知识分子与老一辈自由主义者隔离开的，是战争体验的性质。以荒正人为首的《近代文学》编者们，与将“军部”与“红色”同样看作“政治”的老一辈自由主义者拥有类似的观点，但他们没有将对战时自己的悔恨转为肆意逃避“政治”的态度。

以这种战争经历为契机，荒、小田切、佐佐木三人于1946年编辑以《文学时标》为题的四开版杂志，开始追究文学家的战争责任。在该杂志上，他们论述了曾协助战争的高村光太郎、火野苇平、武者小路实笃、菊池宽等人。同时，和辻哲郎、谷川彻三等老一辈自由主义者，龟井胜一郎、岛木健作等马克思主义转向者也成了他们谴责的对象。

起草新日本文学会《追问文学上的战争责任》声明的是小田切。荒正人也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良机，如果日本人现在不能彻底追究战争罪犯的责任，日本民族将永远无法从地球的垃圾堆里爬出来。”[507]不用说，这种行动源于对让他们经受屈辱的“权力及爪牙的报复心”。

但这又不止于“报复”。虽然他们没有露骨地给战争为虎作伥，但战时转向并始终沉默的悔恨也是他们自身的问题。为此，小田切起草的《追问文学上的战争责任》中写道：“文学上的战争责任，首先是我们自身的问题。”[508]

同时，这一追究也没有止于自我批判。荒正人于1946年10月的《文学时标》中论述道：“责备自己的同时也是责备他人。”小田切也指出，“我们展示自己的伤口，必须去除疮痂，弄清楚创伤的本质，并由此将我们日本精英的实质性内容提高到真正精英的高度”。[509]

也就是说，追究自己的问题，并将此与他者的问题相连，最终实现改革社会的目的。而支持这一理论的前提，便是日本国民共同拥有战争经历。本多所言“政治外因，文学内因”，也因都立足于战争经历使得两者一致成为可能。

同样，这也可以应用于他们对天皇的批判。1946年2月，《近代文学》编者举办了题为“文学家的责任与义务”的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人异口同声地提出追究战争责任以及克服“潜意识中的天皇制”。

在座谈会上，小田切指出，“太多人战后摇身一变成为民主主义者”。佐佐木基一也强调，“在没有确立自我的日本，大家都未痛切感受战争责任是自己的问题。政治家都支吾搪塞回避责任，说只不过是听从了天皇命令而已。文学家都说‘是不得已而为之’”。而荒正人虽然也认为“天皇完全没有承担责任”，却有如下观点：“文学家说我不懂政治于是对政治熟视无睹，或者加入日本共产党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以这种态度，文学家绝对无法追究战争责任。文学家若想在文学上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就必须同自己内心的扎根于‘天皇制’的半封建感觉、感情、意志战斗，只有这样，才能否定天皇制，最终才能确立近代人。”[510]

原本，对于作为监狱名人的荒正人、“言不由衷”转向的小田切而言，抵抗“潜意识的天皇制”是自身的问题。在这种战争责任论与天皇制批判问题上，“政治”与“文学”并没有分离。

这种态度与对亚洲的加害责任问题相同。在1946年4月的评论中，荒正人写道：

> ……目前，日军在中国、太平洋各地的野蛮行径相继被披露。很多人对日军野蛮行径感到愤怒，但是，我对这些人脸上的表情，不禁感到某种失望。我并不是要评论他们不应该责备对野蛮变得毫无知觉的同胞，只是对他们以旁观者的态度来议论野蛮行径的浅薄心情，厌恶得想吐口水。他们肯定会说，像自己这样的文化人、知识分子，即便受脱离条文规定的战争心理的驱使，也不会做出那样残忍的行为，那些人都是没有教养的民众……但是，我认为他们所说的，都是些没有认识到“内部”民众的胡言。日军的野蛮就好像漂浮在水面的冰块，其下面却隐藏着巨大的野蛮的根。[511]

如第五章所述，荒正人于1946年举办的《近代文学》与大塚久雄的对谈中提出，“日本民族发动了残暴的侵略战争，对于战争的赎罪感”能否用基督教的“原罪”来代替呢？拥有在狱中抢夺他人饭菜经历的荒，并不认为战场上的残暴行径事不关己。如果没有这种认识，他所强调的对亚洲的加害责任，也将同他所批判的“加入日本共产党追究天皇战争责任”的态度一样，止于责备他人、美化自己。

如第三章所述，战后初期，鲜有人论述一般士兵的加害责任。如前所述，丸山真男在1946年的《超国家主义的逻辑和心理》一文中，论述了一般士兵的残暴行径，并说：“这篇论文的每一行字，都好像是在劝说曾经的自己。”可以说，丸山与荒能在战后初期论述民众的战争责任，是因为他们认识到自己“内心的天皇制”，借用上述荒正人的话，是因为认识到“‘内部’民众”。

因此，荒于1946年2月发表的评论《谁是民众》一文中宣称：“民众就是我，除我之外没有民众。”在该文中，他评价克服小资产阶级的感性，加入“民众”中的“四十岁一代”论调，认为对“四十岁一代”而言，“民众”彻底跟自己无缘，“无知的民众”这一蔑视观与“亲爱的诸位民众”这一理想为一体两面。[512]

荒在该文中还写道，自己除了“小市民精英的生活感觉外，一切都是空虚的”。但是，这一主张与试图保持富裕生活的老一辈自由主义者的观点并不相同。因为荒所谓的“体验”，其一来源于在战争体验中被正视的“地狱式利己主义”，其二来源于“饥饿每天早晚都来粗暴地敲门”这一战后的“生活感觉”。[513]

战争不仅带给人们共同的屈辱与悔恨，也让人们共同经历苦难生活与饥饿。因此，自己的问题同时也是社会问题，如果不改革、不复兴整个社会，自己的幸福也不会到来。荒正人于1947年的评论中写道：“战后，为让一个人变得幸福，就得让所有人变得幸福……想为自己的幸福

奋斗。在奋斗中谋求民众的幸福。”[514]

荒正人将这种思想称为“放大了的利己主义的高度人道主义”。同时，他还提倡打破“政治与文学的二元见解”。[515]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对“政治”与“文学”进行折中，而是表达将自己内心的“文学”与社会整体的“政治”连在一起的意志。

其实，这与丸山真男1943年论述福泽谕吉时所言“个人主义者才是国家主义者”的表达完全相同。同时，丸山于1947年1月的文章中指出，“真正重视内心的人才是真正重视行动的人，这一命题绝不是幻想”。该文主要面向年轻学生，论述参与“政治”的方式。他对厌恶政治的“‘文化’派”与“相反的政治型青年”说，前者不能陷入“感觉性享乐派”之路，后者不能陷入“政治性食肉动物派”之路，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上述观点。[516]

与荒同世代的丸山，对荒的问题意识拥有共识。可以说，以荒正人为首的《近代文学》的观点，与丸山、大塚等人相同，都产生于“个体”和“共同责任”双方都被破坏的战争经历。

对“近代”的重新评价

《近代文学》的名称，也表明与丸山、大塚相同的重新评价“近代”的取向。其实，《近代文学》编者曾在1930年代末创办《现代文学》。单看书名，他们从战前到战后的轨迹其实就是从“现代”到“近代”的倒退。

平野谦等人于1942年9月提出：“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克服近代。”但战后，他们与大塚久雄一起开始宣扬确立“近代人”。在1953年的座谈会上，平野指出：“取名为《近代文学》时，荒君态度最为明确，但我觉得他们也想从近代确立的过程中重新出发。”[517] 可以说，

他们也因战争经历转而评价“近代”。

当然，“近代”一词，只是表达“自主性”的一种媒介。也正因如此，战争责任的追究与“近代人”的确立不可分割。

再者，战后初期，言论界不只有他们打着“近代”的旗号追究文学上的战争责任。例如，1946年11月，法国文学专家桑原武夫形容俳句只不过是“二流艺术”，引发强大反响。桑原如此评价俳句的权威人士：

> ……虽说“人生终究归于空寂”，但一旦强大势力出现时，便巧妙屈从。大风吹过之后又复归超俗生活。柔能克刚。……文学报国会成立时，申请加入俳句分会的人异常多，我知道本部强烈限制该分会的入会人数。
>
> 小说家中也有人乘机沽名钓誉迎合时局，这些作家现在都写不出好作品了。因为小说这一近代体裁不允许，这也是小说的优点。然而，俳句的世界截然不同，即便在缴纳金属运动中，立刻提供漂亮宣传语句的大师，到今天还是大师。艺术家无论对社会做什么，都不会在其作品上留下丝毫痕迹，俳句便是这种体裁。[518]

桑原认为，没有坚定的世界观、人生观，便无法写“近代小说”。但俳句只不过是歌咏缺乏思想的情趣，由俳句文坛元老所操纵的“中世纪工匠行会”，俳句的状态才是日本作家“缺乏思想性社会性认识”与“轻易创作态度的最佳典型”。

桑原的“近代小说”观容易被批判为西欧近代的理想化。但桑原批判俳句，是以战争记忆与战争责任问题为背景的，“近代”是其表达的媒介。

与丸山、大塚一样，这一时期的荒正人、平野谦，都反复强调自己所主张的“近代人”以及“个人主义”并不是单纯的利己主义。例如，荒正人于第三章提及的1947年的评论文章《横向联系》中，批判天皇制为“纵向联系”，同时认为“日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近代，也没有真正意

义上的个人主义”，“也没有法国大革命”。平野谦也指出，“露骨的利己主义”是“对个体没有开悟的封建社会”的产物，与“真正的个人主义文学”截然不同。[519]

对“四十岁一代”提出异议也是基于“真正的个人主义”的立场。荒正人认为，像日本这样的“落后国家的悲剧，在于还没有功夫确立个人主义时，不得不迎接社会主义”。真正的“近代个人主义”，在个人的确立与社会连带上并不矛盾。即便如此，日本的马克思主义者厌恶“个人主义”，这是因为日本社会近代化不足，他们无法想象单纯的利己主义之外的“个人主义”。因此社会主义运动中也能窥见“纵向联系”，“只不过是军国主义的写照”。[520]

抱有这种批判意识的荒正人加入日本共产党，其中一个原因便是，战后日本共产党提出两阶段革命论，认为后进国之日本当前必要的，是法国革命式的民主革命。荒正人于1947年4月的座谈会上赞同日高六郎所言“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本身包含某种目的”，并强调：“日本共产党的目标难道不也应该这样吗？”同时，他也批判了“四十岁一代的旧左翼人士”中抱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时间越短越好，那是不得已的手段这一想法”的人。[521]

也就是说，他们所谓的“个人主义”是想表达与以往“个人主义”不同的内容。丸山也为与以往的“国家主义”一词进行区分，采用了“国民主义”一词。但是，荒、平野等人试图给“个人主义”这一旧有词语赋予新的意义。

这一点同样可以用在“艺术至上主义”一词上。原本“三十岁一代的使命”、“艺术至上主义”是《近代文学》编者用在杂志宗旨上的词语。但据埴谷雄高回忆，“因找不到合适的词语，于是使用了艺术至上主义这一熟语，但我们无法满足于艺术至上主义一词，试图创造出新词。荒正人反复提议采用艺术主义一词，他认为，艺术主义一词不错，用这一

词说不定会产生出新的意义”。[522]

埴谷紧接着叙述道：“现在思考的话，我认为应该普及艺术主义一词。因为，对即便可以排除直接的政治色彩却无法脱离社会潮流的我们而言，这是个核心问题。”为抵抗“四十岁一代”高唱的“政治优先”，他们使用了“个人主义”、“艺术至上主义”这些马克思主义文学界的“惯用词”。但与此同时，因对这些惯用词不够满意，他们转而探寻可以表达战争经历的词。

同时，他们也努力克服“政治与文学的二元见解”，同时摸索克服“观念与肉体的分裂”。即使对战争持反对意见，也为明哲保身而转向并保持沉默的经历，是他们最大的悔恨，也是“观念与肉体分裂”的典型。如果借助荒正人的描写，“在统一观念与肉体这一点上，被死神夺去的特攻队员更为优秀”。[523] 与狱中没有转向的日本共产党干部一样，特攻队员也被看作思想与行动、“观念”与“肉体”一致的人。如果不努力克服未贯彻这种态度的悔恨，便无法重返言论界。

编者们所关注的，是战时将“观念”与“肉体”统一并且没有协助过战争的文学家前辈。而这些文学家前辈主要指宫本百合子、中野重治，以及永井荷风、正宗白鸟、谷崎润一郎等人。《近代文学》编者们认为，宫本及中野通过将政治理念这一“观念”与行动保持一致，永井、谷崎等通过忠实于对政治毫不关心与利己主义的“肉体”，都达到了观念与肉体的统一。

但是，他们既不满足于坚持利己主义的非政治主义，也不满足于服从观念的“教条主义”，试图克服这两种类型，以探求新的“政治”与“文学”的方式。为此，在批判僵化的“四十岁一代”时，也有必要批判永井荷风与正宗白鸟。

例如，小田切秀雄1946年1月的文章《为了文学精神》中，将永井

荷风定为批判对象。小田切引用了永井1919年所写短篇小说《焰火》——描写1910年，以暗杀天皇未遂的名义，大肆镇压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幸德秋水被判处死刑，给当时的文学家以重大打击这一“大逆事件”的文章。[524]

> 我（永井）既然作为文学家，就不能对这种思想问题保持沉默。小说家左拉不就是因为对德莱弗斯案件呼吁正义而流亡他国了吗？然而，我与世上的文学家一样一言未发。我油然感到一种没完没了的良心上的煎熬。我为自己是个文学家甚感羞耻。从此，我想我只有将自己的艺术品位降格到江户时代作者的水平。从那时起，我就提溜个烟荷包收集浮世绘，还弹起了三味线。江户末期的通俗小说家与浮世绘画师根本不管黑船是否来到浦贺港，也不管樱田门外大老是否被暗杀——不，说得过多反而让人忧虑，倒不如看黄书，画春宫图，我觉得与其对他们感到愕然，更多的是对他们的尊敬。

永井之后与政治绝缘，只同娼妓与舞女交往。因他所蓄颇丰，战时也不用靠写政治文章生活，从结果上来讲并没有协助战争。

但是，小田切批判永井的姿态为“政治身份低微的町人[525]的劣根性”。在1946年2月的座谈会“文学家的责任义务”上，埴谷雄高也批判道：“现在还有一部分人认为，强权压过来时，像竹林七贤一样隐居的文学家才正常。”荒正人评价永井与正宗白鸟时说道：“以对战争没有丝毫责任感的态度加入文化界，我感到非常别扭。”[526]

永井荷风、“江户”与“近代”、“明治”等词一样，都是表达他们心情的象征性语言。如第二章所述，丸山真男在战时的文章中，曾批判江户时代的“低微的町人根性”。另外，丸山还于1946年批判过“竹林七贤的自由主义”。[527]小田切与埴谷不可能读过丸山战时发表在学会杂志上的论文，因此可以说他们是依照当时的言论结构而使用了相似的语言。

而批判“身份低微的町人的劣根性”也是为了表达他们自身的悔恨。小田切批判永井时说道：“战时，深深体会到隐藏在自己内心的奴隶的

劣根性及町人的劣根性。”小田切认为，“政治”与“文学”原本并不对立，只不过因近代日本的“政治毫无人性，人民沉默，文学家深信政治与文学对立”而已。因此，他认为现在应该改革这种社会，创造描写“新人类形成”的文学。[528]

而荒与平野尝试重构独特的日本近代文学史，他们尊崇明治时期的夏目漱石、森鸥外为“真正的个人主义文学”的先驱。[529] 如第二章所述，丸山真男曾高度评价夏目漱石，因此可以说荒与平野也开始重新评价“明治”。

而他们批判的是自然主义、“私小说”以及战前的无产阶级文学。平野1946年12月发表的《老婆的文学论》（『女房的文学論』）中写道：自然主义文学产生于近代，产生于法国，以信任理性与自然科学并借助其洞察力阐明人的存在为思想基础。而近代精神并不成熟的日本所引入的自然主义，成了依靠单纯的“体会”暴露人的丑态，最终沉湎于佛教的虚无感的东西，并由此产生了以“生理上的利己主义与拒绝思想的温吞虚无感”为特征的“日本独特的自然主义人生观”。[530]

平野认为，在这种“日本独特的自然主义人生观”的延伸线上诞生的便是“私小说”与无产阶级文学。所谓“私小说”是指与社会隔离的作家描写细微的人际关系及自我主义，被“公”隔离的“私”的小说。而无产阶级文学虽然重视参与社会否定“私”，其创作手法却是“自然主义式现实主义”的延伸，只不过是用私小说方式描写参加无产阶级运动的人物形象，刻画图表式的革命画卷。平野进一步指出，这种典型便是小林多喜二。他认为小林描写为了日本共产党而牺牲的女主人公而表现出的女性观，是前近代“自然主义人生观”的一种。[531]

另外，无产阶级文学作家在无产阶级运动失败后所写的小说，一种是“私小说化”的“转向”文学，另一种是模式化的战争文学。平野认为，现在日本文学需要“彻底克服自然主义文学，大胆批判马克思主义文

学”，需要“一双能看穿小林多喜二与火野苇平是一体两面关系的成熟的文学慧眼”。[532]

荒正人认为，基于这种前近代“自然主义人生观”，也就是朴素的“体会”产生出的自我主义的典型，是将人卑微化的正宗白鸟的虚无主义人类观。1946年，荒承认“从《黑暗峡谷》中领会到白鸟式人生观，也对此感到亲近”，但他也提出应该“克服由自我主义与人道主义交织而来的自然主义人生观”。[533]

这种取向虽然使用了“个人主义”一词，但比起老一辈自由主义者的“个人的自由”，更接近丸山所表现的“国民主义”的心情。只是与丸山不同的是，他们为抵抗日本共产党“政治优先”论，故意挑衅性地使用了“个人主义”、“艺术至上主义”等马克思主义文学界的负面“惯用词”。

但是，日本共产党主流对这样的《近代文学》发起了批判。而这种批判又必然采取批判“近代”、“个人”的形式，并围绕这些词展开争论。

日本共产党对**“**近代主义**”**的批判

《近代文学》编者基于前述思想，创刊时在向中野重治及宫本百合子约稿的同时，也开始与志贺直哉、正宗白鸟联系。

然而，处于两个极端的文学家们水火不容。本多为了约稿访问中野重治时，刚刚复员回来、身穿破旧军服的中野问道：“右翼恐怖活动发生时编辑部将如何应对呢？”而本多拜访志贺直哉宅邸时的情形恰恰与此相反。本多回忆，志贺在摆放着“庄严的椅子”及“巨大陶器”的客厅接待了他，但婉言拒绝了他的约稿，说“过几天再说吧”。[534]

即便如此，《近代文学》编者依旧热心参与杂志的编辑工作。他们义务写稿，到印刷工厂与排字工人协商，背着背包四处派发杂志。这样

开始的《近代文学》与丸山的《超国家主义的逻辑和心理》一样，尤其得到年轻读者的好评。第III部将要论述的吉本隆明、小田切秀雄也是《近代文学》的忠实读者。当时还是中学生的小田实，在战后初期“老少竞相阅读高深书籍”的氛围中，“与理发店的大叔讨论过《近代文学》创刊号”。[535]

之后成为共同通信社编委的新井直之，描述旧制高中时代阅读的《近代文学》时写道：“《近代文学》打破了我们之前拘泥的以私小说为中心的‘文学’概念”，“它也不同于战前无产阶级文学理论。也就是说，它将文学从狭隘文学空间中引导到文化、思想空间”。[536] 当时，一提“政治”性文学就是无产阶级文学，如果拒绝无产阶级文学便容易趋向私小说，正因如此，《近代文学》带给大家崭新的形象。可以说，《近代文学》编者试图排除“政治”或“文学”二者择一问题，超越私小说与无产阶级文学对立的信念也传达给了年轻读者。

然而，《近代文学》并不受年长的无产阶级文学家欢迎。《近代文学》编者曾邀请藏原惟人、中野重治、宫本百合子等人召开座谈会，并向他们阐述了《近代文学》的观点。中野与宫本起初对他们的观点表示理解，然而，中野突然在 1946年第7期的《新日本文学》上发表了批判平野与荒的文章。该文谴责道：平野将火野苇平与小林多喜二视为“一体两面”，这其实与“认为天皇与二等兵付出了同样牺牲的观点相同”；“平野没有人性化思考政治的能力”，“是化妆向反革命文学势力暗送秋波而已”。[537]

面对一直敬重的中野突如其来的批判，荒与平野甚为惊讶，开始激烈反驳。该争论被命名为“政治与文学”争论，在文学史上，被认为是日本共产党政治压力与文学家之间的摩擦。但是，该争论从头到尾似乎只注重无聊的个人攻击及琐碎的论点。因此我们应该关注的，与其说是该争论本身，还不如说是引起该争论的政治动向。

1946年下半年到1947年初盛传“革命将至”，日本共产党便计划于1947年2月1日举行总罢工。然而，“二·一总罢工”被占领军明令禁止，使得日本共产党战后首次遭遇挫折。而且，罢工因占领军介入被迫中止意味着日本共产党领导层希望在美军占领下实现和平革命的方针受到挫折。之后，日本共产党对工人运动的控制减弱，面对挫折的学生及年轻工人们也开始自我反省。

而抓住这些年轻活动家心声的便是以《近代文学》为首的“主体性论”。所谓“主体性论”，是日本共产党对重视人内心精神改革思想的总称。

第二章已述及，大塚久雄认为如果不先确立“近代人的类型”，即便是制度性地进行社会改革，其效果也会不尽如人意。针对这种论调，日本共产党论者认为，人的意识由经济基础决定，如果不进行社会变革，就不会有意识变革。对日本共产党而言，没有社会变革的“主体性”主张简直太荒谬。

然而，运动的停滞使年轻党员与活动家们开始怀疑日本共产党的领导能力，沉湎于自我反省。前文已述及战后初期年轻人都热衷于马克思主义和基督教，是丸山、大塚著作的忠实读者。对日本共产党而言，这种“主体性论”是阻碍获得年轻人支持的潜在敌对思想。

因此，大塚、丸山的著作，《近代文学》的论调，以及企图将存在主义哲学导入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梅本克己的观点等，被统称为“主体性论”。这些思想即便各有千秋，但都含有重新评价“近代”的论调，因而也被称为“近代主义”。

1947年10月，宫本显治、野坂参三等日本共产党干部与文艺评论家岩上顺一、哲学家古在由重召开了以“关于近代主义”为题的座谈会。在该座谈会上，提到了战后年青一代“讨厌受到束缚，并因此讨厌军国主

义、讨厌日本共产党”的风气蔓延。座谈会还讨论了年轻活动家们“深受大塚史学的影响，对自身持怀疑态度，热衷于自我变革”的情况，以及“近代文学的影响已经波及工人阶层”的问题。[538]

值得一提的是，宫本显治认为，《近代文学》的观点只不过是单纯逃避政治的自我主义。他在座谈会上断定“《近代文学》的编者们尤其推崇白鸟的自我主义”。他还认为，“战时，艺术隶属于政治，是指隶属于军国主义，这当然是犯罪行为，但艺术如果隶属于进步政治的话，艺术将不再是奴隶，而会迎来发展的春天”。[539]

宫本如此批判《近代文学》，虽说与《近代文学》使用“个人主义”、“艺术至上主义”等负面“惯用词”有关，但还有其他原因。宫本自己就是文学家，曾是战前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核心人物。当时，小田切秀雄拜访宫本夫妇宅邸，宫本夫人百合子对《近代文学》表示出一定的理解，但宫本显治“因自己曾是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瓦解时期的地下政治领导者，完全不承认批判自己责任的文学批判运动”。[540]

不过，除了宫本批判《近代文学》外，与宫本一起出席座谈的野坂参三也认为，“他们（《近代文学》）也采取反对日本共产党的态度”，“我们必须战胜他们”。1947年12月召开的日本共产党第六次大会上，德田球一在例行报告中指出，“一部分党员受了《近代文学》的影响，美其名曰完成自我等等，其实就是利己主义。这是战时受到镇压的反动表现。因为自由行动在战时一度被限制，现在这些人成了简直连日本共产党的纪律都不服从的无政府主义者。日本共产党应该与此抗争，开除这些恶劣的家伙”。[541]

这里所说的开除党籍处分，是指1947年12月发生的日本共产党东大基层组织分裂事件。该事件发生在东京大学日本共产党基层党组织，一些学生党员因受到《近代文学》的影响进行派系活动而遭到谴责，最终导致基层党组织分裂。该事件是日本共产党战后首次进行大规模处分的

事件。对日本共产党而言，《近代文学》已经超出单纯文学杂志的高度，成为一种威胁。

中野重治等日本共产党文学家便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批判《近代文学》。1947年，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出版了《批判大塚史学》一书。1948年8月，日本共产党机关报《前卫》又推出“批判近代主义”特辑。

这些对“近代主义”的批判主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近代”批判，指出“近代”只不过是小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社会，没有变革便不会有个人的解放。甘粕石介指出，“自由主义、个人主义、自然成长论等资本主义思想是无产阶级组织内部最恐怖的破坏者”。胜部元也认为“现在打出资本主义较进步时代的口号‘确立自我’只能扮演落后于时代的反动角色”；“‘主体性’恰恰是反共，反共又是反人民的同义词”。[542]

如第二章所述，对“近代”的批判是战前知识分子们的共识。丸山、大塚及《近代文学》的编者，通过重新追问战争体验，开始重新评价“近代”。然而日本共产党并没有走这条路。因为日本共产党本身依靠狱中没有转向的神话，对领导战前运动失败的领导者责任及多数转向党员协助战争的问题置之不理，就好像并不存在战争似的，企图恢复战前运动。

再者，战时批判“近代”的京都学派也采取了行动。其中之一便是高山岩男，他1946年还高唱“近代国家、近代社会、近代家庭精神”，“近代主流的中心主义已走投无路”，并批判战后的民主化道：“日本民主主义化首先应完成近代国家化，而世界的客观趋势已经超越了近代国家及近代国际社会的阶段。”[543]

也就是说，是否重新评价“近代”，与是直面战争体验并重构思想，还是停留于战前马克思主义运动或战时的“近代的超克”这一问题直接相连。这也与是否隐藏战争体验与战争责任相关。

《近代文学》重新评价“近代”、反驳“四十岁一代”正是基于战争体验。平野谦在1953年的座谈上说道：“比如我也参加了1945年末举行的新日本文学会的成立大会，然而，我无法理解事隔十五年召开的那种集会氛围。十五年来，人们吃尽苦头，久违的人们的脸上，刻着十五年的历史痕迹。但是，我觉得成立大会的进展形式完全没有反映出这十五年的历史，对此我很不满。文学会的整体方针没有充分发挥战时的辛酸体验。”[544]

其实，这一点在“主体性”上也完全相同。这一时期，“主体性”一词虽因论者的侧重点不同而有所差异，但都是表达源于战争体验的心情。

前文已论述过，丸山、大塚所言“主体性”是作为被破坏的“公”、“私”双方的战争中的负面词语，而用来表现兼有从权威中自立、与他者相连的状态。而梅本克己所言“主体性”是为表达在马克思主义提倡的历史必然性中无法释怀的自我意识。后者的心情，又被熟读《世界史哲学》的学生兵、承认战争这一超越个人的“历史”必然性却无法满意自己死亡的人所共有。

换句话说，战后的“主体性”一词，是表达无法被以马克思主义为首的理论体系吞没的复杂心情的词语。人们被战争、战败的巨大社会变动所摆布，为寻找能让自己满意的解释，都试图相信《世界史哲学》或提倡“历史必然性”的马克思主义。而无法满足这些理论性说明的“自我”，便由“主体性”一词表达出来。

丸山晚年就《超国家主义逻辑和心理》受到关注的原因写道：“战后对日本天皇制国家结构的批判都是站在共产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立场上进行的”，“从精神结构入手的批判比较新鲜”。[545] 也就是说，这篇论文因为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等既有语言无法表现的“精神”问题，所以广受关注。

反过来说，丸山是通过“精神”问题来论述“政治”。这与《近代文学》希望克服“政治”与“文学”两极对立的心情相同。正因为经历战争的同时代人的共有心情，这种尝试才备受关注。

《近代文学》、梅本克己、大塚、丸山等被统称为“主体性论”的论者都在探寻能表达无法理解之心情的词语，而这一心情无法用当政者给予的语言体系——日本共产党僵化的马克思主义解释，以及轻易的“民主主义”合唱——来表达。他们虽然都敬重马克思主义与日本共产党，却由于战争体验，不满日本共产党的语言体系。在这个意义上，被日本共产党贴上“‘主体性’恰恰是反共，反共又是反人民的同义词”的标签，也可以说是日本共产党直觉地嗅到了“主体性论”的性质，是其敌对心理的表现。

面对日本共产党的压力，《近代文学》发生了分裂。自称是“《近代文学》编者中最左翼”的小田切秀雄退出了《近代文学》。[546]

小田切原本与中野重治私交甚笃，他于1946年2月受中野推荐而加入日本共产党，作为入党条件，他提出“不希望像战前无产阶级文学时代那样将文学家引向政治”。该条件被认可后，小田切发表了批判教条式“民主主义文学”的文章。但是，中野重治开始批判《近代文学》之后的1946年10月，《新日本文学》刊载了批判小田切的文章。作为新日本文学会核心人物之一的小田切进退两难，不得不于1947年1月退出《近代文学》。

不久，小田切被选为《新日本文学》的主编，被迫批判《近代文学》。退出《近代文学》后，小田切谴责荒、平野“煽动小市民的自我满足”、“费尽心机在文坛立足。[547] 当时日本共产党没有采纳《近代文学》提出的超越“政治”与“文学”对立的建言，而是将“政治优先”贯彻到底。

小林秀雄与福田恒存

日本共产党的压力促使“政治”与“文学”产生背离。《近代文学》周围象征这一背离的，便是小田切秀雄的退出，以及小林秀雄与福田恒存的关系。

事实上，《近代文学》的座谈会，创刊号邀请了藏原惟人，第2期邀请了小林秀雄，第3期则邀请了中野重治。而小林是激烈批判无产阶级文学观念的评论家。本多回忆，编者们“要扬弃藏原惟人与小林秀雄”。[548] 但1946年1月举行的与小林的座谈会，其不欢程度并不输于藏原。面对编者们，小林断言“我讨厌政治”，“无论政治的形式怎样变化，政治家这类人是不会变的”。[549]

小林认为，马克思主义文学只不过是认为可以通过思想创作艺术的观念性运动，没有对于超越理性和观念的美的敬畏之念。他还指出，“真正有生命的文化”并不存在于“明摆着的思想、观念之中”，而存在于农夫和木匠等“生活者”的“真实的人生”、手艺人继承传统的技术、古典文献的原文之中。

然而，“讨厌政治”的小林也发表过肯定战争的文章，他也是新日本文学会所列战犯文学家之一。但座谈会上小林突然转变态度，强调自己是为了“生活”才撰写肯定战争的文章，并且扬言“我比较愚笨，所以不会反省。聪明的家伙想反省就反省吧”。谈到文学家的战争责任时，小林提出“没有责任不责任一说，只有技术高超或低下的问题”。

那么，究竟怎样的文学才算“高超”的文学呢？小林凭自己的“直觉”判断托尔斯泰、屠格涅夫为“一流”、“二流”等。照这个逻辑，人类应该摒弃既有观念去膜拜“一流”文化，而到底什么是应该追随的文化呢？这要靠小林的“直觉”来判断。

同样是1946年，作家坂口安吾如此描述天皇制：“称自己为神，要求人民对自己绝对尊敬，但是这种绝对尊敬不可能发生。因此，他们（当政者）随意拥护天皇，对天皇顶礼膜拜，通过自己膜拜天皇要求人民尊敬天皇，从而利用人民的尊敬随意发号施令。”[550] 小林对“文化”及“生活者”的赞赏，从结果来讲与此异曲同工。

召开一系列座谈会后，《近代文学》编者们认为，无产阶级文学“因为发现了社会而忘却了个人”，与此相反，小林则认为无产阶级文学“完全沉湎于个人世界”。[551] 随后便发生了小田切退出《近代文学》，福田恒存被拒绝加入的事件。

福田恒存晚年虽然成为保守论者，而战后初期还只是一个三十出头的年轻的英国文学学者，并且他曾扬言“不祈祷将来能实现社会革命”。1947年初，他呼吁马克思主义文学家直面“自己内心的封建习性及奢求安逸生活的小资产阶级性情”，并将“文学与政治的背离”视为一大问题。[552] 在这一阶段，福田与《近代文学》编者抱有相同的问题意识。

1947年7月，《近代文学》扩大规模，花田清辉、野间宏、加藤周一、中村真一郎、大西巨人等加入编者队伍。平野谦也拜访福田，劝其加入。福田对此也颇感兴趣。然而，编者会议却否决了福田的加入。其具体原因不明，笔者认为最大的原因或许是福田对日本共产党及对战争责任问题的态度。

福田于1947年2月发表了《文学与战争责任》，3月发表了《世代的对立》。在这些文章中福田提出，战争文学与其说思想恶劣，倒不如说文学质量低下，“特意将文学家的愚笨偷换成战争责任一词”只不过是某种政治扭曲。因此，“追究战争责任的人的态度似乎脱离了文学”。[553]

他还认为，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只不过是利用近代自我还没有确立的日本社会状况，通过“政治”指导文学家，让文学家创造出低劣作品的运

动。狱中没有转向的日本共产党干部也只不过是“因原本没有自我的性格弱点”成为盲目追随共产主义思想的“自动玩偶”，却被误认为“恪守节操”而已。[554]

福田强调：“我只相信那些原本拥有刚强意志，为发挥其意志不得不树立另一个自己的适应主义者。”狱中没有转向的日本共产党干部只不过是连“树立另一个自己都不知道的顽固的非社会存在”。基于这一观点，为保护自己及家庭生活而协助战争的文学家“不应该承担战争责任，而是犯罪的受害者”。[555]

福田认为，“屈膝于强权、利令智昏不顾公义的凡夫俗子”才是民众。这些民众的“政治”才是“民主主义”。那么，“将被禁锢二十年的经历看作金鸢勋章[556]，简直就是反民主主义与法西斯的思维方式”。“面对强迫与苦难的生活，让各位赌上身家性命抵抗军国主义难道不是精神主义吗？”文学家的使命，是站在被这些精神主义的“理想之鞭”伤害的民众、“为守护生活而挣扎的蝼蚁之辈的可怜人”一边。[557]

福田将“禁锢二十年”的日本共产党干部与“金鸢勋章”的军国主义相提并论，统称为“精神主义”。如前所述，荒正人赞赏狱中没有转向日本共产党干部的同时，也形容特攻队员克服了“观念与肉体的分裂”。福田与荒相反，拥护为了“生活”丢弃理想的“蝼蚁之辈”，谴责没有转向的干部为“顽固的非社会存在”。

平野与荒也曾论述战争文学与无产阶级文学的相似性。第III部将要论述，1950年代末，吉本隆明就狱中没有转向的日本共产党党员干部的问题，发表与福田相似的观点时，多数知识分子表示欢迎。因为这一时期，民众对日本共产党的不满日益高涨，使得狱中坚贞不屈的神话趋于破灭。

然而，1947年，当福田提出上述观点时，没有人接受他的主张。因

福田战时担任过鼓吹普及日本占领区域日语教育的国策杂志《日本语》的主编，在当时文坛上还很流行谈论某某于战时做过什么的状况下，福田批判狱中没有转向的日本共产党干部，谴责追究战争责任的人，只会被认为是在为自己辩护。

本多秋五回忆，福田“是很少见的理想主义者”。福田被拒绝加入《近代文学》后写道：“现在才是我们必须排除生活与艺术、政治与文学的混淆的时候。”[558] 福田认为，文学家要么与政治绝缘，专攻文学，要么放弃文学，全面参与政治，二者只能择其一。这既是不允许暧昧姿态的“理想主义者”的态度，也可能是后悔自己协助战争的福田，想从“政治”中捍卫寄托他理想的“文学”而发出的感想。

将“政治”与“文学”隔离的福田强调称：“不让文学对社会进步与改善起任何作用”，“如果执着于这样的文学，就要接受良心的斥责”。[559] 福田之所以谴责没有转向的干部，或许是想通过辱骂挑动自己“良心斥责”的“理想之鞭”，来逃离战时的悔恨。

福田于1945年底到1946年发表了战时开始执笔的论文《近代日本文学的系谱》。其基本观点是，日本文学中值得肯定的作家除了在文学之外保住“实际生活”的夏目漱石、森鸥外，其他像自然主义文学、白桦派、无产阶级文学之类都只不过是从西欧进口的观念与“精神主义”的产物。这种文学史观由同样重视“生活”的江藤淳继承，本书将在第III部加以论述。

福田的这种取向也反映在“人”一词的用法上。福田1947年2月发表的评论《在人的名义下》中，形容马克思主义文学是“站在侮辱人性立场上的文学”。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文学家只不过是“通过牺牲无知人们的生活，将理论的纯粹化与精致化变成自己东西的”观念论者。[560] 这里所说的“人”当然是指“屈膝于强权、利令智昏不顾公义的凡夫俗子”。

《近代文学》编者曾打出“尊重人本主义”的旗帜，但荒与小田切提倡的“近代的人”是直面“屈膝于强权”的自我，并将其克服的人。1947年加入编者队伍的加藤周一等批判福田道：“将日本私小说家们描写的日常利己主义称作以人的名义所写，高唱人的现实基础，简直不合时代潮流。”[561]

当时，人们并不熟悉“人”一词。埴谷雄高在1946年2月的座谈会上说：“我们现在只知道‘国民’，不知道‘人’，对人道主义也不太明白，只有一部分精英貌似领会了。我朋友经常说，当他被说成‘非国民’的时候会很生气，但如果被说成‘非人道’，就没感觉了。”[562]

这种对“人”一词的理解差异也是他们战争体验的反映。战时，所谓个人生活的“私”，与所谓联合或自发参与政治的“公”都被破坏掉。经历这样的战争后，福田对“私”的复归，加藤对“公”的取向，都由“人”一词表现出来。

或许，战后初期期望“社会革命”的福田与加藤怀有相同心情。然而，福田比丸山、荒等人更积极地协助过战争。拥有这种经历，对自称“原本胸襟狭小”的福田而言，[563]荒所倡导的“责备自己同时也是责备他人”这种“政治”与“文学”的桥梁，是无法忍受的。因此，福田开始抱有一种二者择一的世界观，要么通过完全皈依日本共产党的“政治”来救赎自己的悔恨，要么与挑起良心斥责的“政治”绝缘，投身文学。

劝说福田加入《近代文学》的是平野谦。小田切如果是《近代文学》最左翼的人，那么平野便是最右翼的人。平野曾参与战前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但在转向之后，任战时内阁情报局嘱托。比起其他编者，他稍微年长，当时也撰写过赞美战争的文章。

原本战争期间与战争无缘的工作几乎为零，给平野介绍情报局工作的是本多秋五。然而，据说平野在情报局时，曾被命令起草东条英机首

相有关文化的演讲稿。平野晚年说道："战时我只是一个无名青年，可以说'是罪过很轻'的人，但即便这样我也不想回忆战时，战时我写过一篇如果可以就很想抹掉的文章。"[564] 因此，1970年编辑平野全集时，有几篇战时所写文章被排除在外。

比起《近代文学》其他编者，平野对"政治"的悲观主义更加明显。在"文学家的责任与义务"座谈会上，面对提倡"树立近代人"的荒正人及埴谷雄高，平野说道："文学面对现实是无力的。这是这次战争给予的一个教训，也因此出现了自我卑微的问题。……卑微的、浑身都是弱点的自己很想被文学救赎。"[565]

对此，荒正人回应道："想被救赎的愿望，归根结底，其实就像刚才埴谷所说，就是希望与社会上的善有关系。"并指出直面自己内心与同"内心的天皇制"斗争并不是毫无关系。然而，平野答道："我还无法领会。"对此荒批评道："无法领会正是平野自身战争责任观非常薄弱的证据。"[566]

战败时37岁的平野，比32岁的荒、29岁的小田切年长，对战前共产主义运动的幻灭程度更深。与同龄的本多秋五不同的是，平野没有坐牢的经历，在这一点上，没有荒、小田切等人的"复仇"心情。与荒不同，平野收到战败消息时并没有多少解放感，他回忆战后初期写的一系列文章"都是受荒正人的影响"。[567]

相反，平野在某种意义上与福田相似，倾向于批判战时抵抗政府的文学家。在上述座谈会上，平野反对将与演员冈田嘉子一起流亡苏联的杉本良吉作为"文学家的抵抗"事例。该座谈会后，平野发表了推测杉本利用冈田流亡的文章《一个反推论》，该文成为"政治与文学"争论的导火索。

据说，平野之所以执着于左翼运动中的女性问题，是因为他喜欢的

女性在战前运动中被卷入“女管家”问题。[568] 然而，了解平野战时活动的人，对平野批判杉本良吉、小林多喜二非常不满。宫本显治以平野曾供职于情报局批判《近代文学》，中野重治形容平野为“身份低贱的人”。[569]

中野虽然没有积极撰写文章赞美战争，但在1934年被捕后转向。战时文学报国会成立时，他写信反省过去、恳求入会。在警察监视下的中野，为了妻儿、为了自身安全与收入，恳请加入文学报国会。

曾是中野拥趸的平野从情报局上司处读到那封信后深受打击，将这封信偷偷拿出后自己保管着。受到中野批判后，平野将这封信以不作为争论手段为条件拿给《近代文学》编者们阅读。荒对中野的过去表示愤怒，在争论中写道：“就好像顶梁柱坍塌了似的。”[570]

原本中野为自己的转向深感懊悔，1945年10月坚贞不屈的干部出狱时，觉得“自己没有资格”去欢迎他们。之后，宫本显治等人劝他再入党时，他“不知如何答谢”而加入日本共产党。[571] 怀有这种悔恨心情的中野，无法违背宫本的意向。

在这种错综复杂的状况下，其他编者反对平野邀请福田入会。被拒绝入会的福田反驳道，“那种同仁杂志，我还不想加入呢”，并开始批判《近代文学》。[572]

福田进行的批判基本上是进行逻辑游戏。他认为，以马克思主义为首呼吁近代自我界限的思想于19世纪就已经勃兴，“现在谈论确立个人对社会的权威，简直落后于时代”。并且，“近代自我的确立如果没有制度上物质上的保证，只是空谈”。[573] 不用说，这与日本共产党批判“近代主义”的逻辑相同。

但是，福田对马克思主义文学也持批判态度。他认为，在标榜自己

是知识分子而叱责民众这点上，封建道德文学与马克思主义文学相同。[574] 福田的这一观点，既表达了他憎恶挑动“良心呵斥”、“理想之鞭”的心情，也与丸山、小田切批判“身份低微的町人的劣根性”相对立。

之后的福田，赞赏超越知识分子观念的“生活者”与“传统”，这与小林秀雄的论调相似。1950年代，福田揶揄和平运动中知识分子的观念过剩，同时主张新假名是对传统的破坏，而坚持使用旧假名。同时，当他所尊敬的D.H.劳伦斯小说《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被日本当局列为禁书时，他抗议这是政治对文学的介入。

尽管如此，当社会开始使用新假名时，福田依旧执着于旧假名，其态度正好表明他所提出的“生活者”只不过是与知识分子争论的手段这一观点。福田批判狱中没有转向的干部时，指出“近代自我”还没有确立，而当他被《近代文学》编者拒绝入会时，又道“近代自我”落后于时代。这些现象足以让人认为他是为自己辩护而活用各种逻辑。战后初期福田所写的一系列文章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读过该书的丸山真男评价其“是一本杰作”。[575]

当时，几乎所有文学家都对战时的自己感到悔恨。一贯坚持反对战争的人，与实践赞美战争的文章而“玉碎”的文学家，都少之又少。大部分文学家都懊悔于自己背叛理想，为明哲保身、沽名钓誉而协助战争。暴露对方的历史容易变成互相揭短的丑剧，因此大家都很客气，然而战争带来的互不信任与自我厌恶并没有轻易消除。黑泽明就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执导了以平安时代的杀人事件为题材，刻画一群为美化自己而做虚假证词的人物的电影《罗生门》。《近代文学》1948年第3期刊载了文学家丸山静的文章，文中就战争体验写道：

> ……让我体会最深的，是我们小市民精英的软弱。无论何时都将责任转嫁给他人……自我批判最终转为自我辩护，无法将自己置身于真正的批判中，是如此软弱，这种软弱铭刻在心……我感到有必要真正地武装自

己。[576]

然而问题是，想从这种悔恨中“真正武装自己”时，当时除了学习马克思主义加入日本共产党之外别无他法。与小林、福田通过从“政治”保护“私”的理论来逃避战争责任一样，多数日本共产党党员利用“政治”的权威消除对“私”的批判，这归根结底也是在雪藏自己的战争经历。

“市民”与“难民”

日本共产党对“近代主义”的批判还隐含一个值得关注的要素，即强调“民族”。如前所述，日本共产党战后初期打出“民族”旗帜，而该旗帜也影响了对“近代主义”的批判。

例如，中野重治在《近代文学》1946年第4期的座谈会上，指出“近代文学”只不过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产物，认为“现在，日本人有必要生产属于自己的民族文学”。古在由重也在批判《近代文学》之时，提出“没有民族独立，便没有主体性的确立”。退出《近代文学》编者队伍的小田切秀雄也于1947年2月批判“个人主义文学”，呼吁“民主主义民族文学”的确立。[577]

1947年8月，日本共产党系学生报纸批判以《近代文学》为首的主体性论为“软弱精英的自我辩护”，同时形容此为“半殖民地文化的前兆”。[578] 日本共产党正式提出“民族战线”是在1948年3月以后，不过“政治与文学”争论时，就已经显示出强调“民族”的倾向。

如第三章所述，当时日本共产党认为“民族”与“人民”是同义词，与近代个人的确立也并不矛盾。中野重治1947年5月批判《近代文学》为“背离民族重建的个人主义”时，也呼吁“通过民族的民主主义建设确立个人，通过确立个人重建日本民族”。在1948年11月的座谈会上，中野依据当时日本共产党的官方见解指出，“所谓民族，并不是说是不是

日本人的人种问题”，而是除去当政者、垄断资本家之后的“百分之九十五的人民”。[579]

尽管是官方见解，但批判“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打出“民族”口号的论调，仍然让人想起战时。为对抗这样的“民族”，荒正人提出“市民”一词。荒正人在1947年第7期《近代文学》上发表了以《作为市民》为题的文章，向中野喊话道：“想仅就市民与市民的关系进行讨论。”[580]

但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使用“市民”一词时都以“京都市民”、“横滨市民”这种行政意义来区分，将“市民”一词作为一般名词使用非常罕见。

与“个人主义”一词具有变动性相同，因战前语言结构的瓦解，战后初期也是语言结构混乱与变动的时期。当时，大塚久雄用“近代人的类型”、丸山真男用“国民”等词来表达他们理想中的“近代”人物形象。然而，他们在战后初期完全没有使用“市民”一词。

其理由有二。第一，当时日本大部分为农村人口。1945年，城市人口只占28%。1951年，教育学家宗像诚也写道：

> ……“市民”一词很难在日本普及。……因为该词意味着城市居民，对着农民说当一个好市民，总觉得很怪异，应该是一个“好村民”。然而，村民又有前近代的意味，很难成为教育目标。所谓“好村民”就是尊敬长辈、默默劳动的感觉。也就是说如果good citizenship被简单翻译为“好市民”，将令人无法领会其意。[581]

当时，也有很多人认为即便是城市，也不适合用“市民”一词。丸山真男在1947年6月的演讲中，将“日本的中间阶层或小市民阶层”区分为两种类型。其一是“小工厂的工头、土木建筑的包工头、零售商店的店主、木匠师傅、小地主、自耕农上层”等人，其二是“城市的工薪阶层，也就是文化人、新闻工作者、其他自由知识职业者（教授或律师）”。

[582]

当时，即便是城市中等阶层，也是前者占大多数。在当时的语言结构下，作为一般名词的“市民”习惯上不包括“木匠师傅”、“土木建筑的包工头”，当然更不用说在他们手下干活的散工、徒弟、小伙计等人。

丸山面向听众说“当然，大家属于第二种类型”，形容包括“工薪阶层”在内的类型为“原本的精英”。[583] 当时农民、个体户占多数，拥有稳定收入的“工薪阶层”属于高学历的精英阶层。

而第二个理由便是这种阶层差距。换句话说，在丸山所谓的“第二种类型”还是少数特权派的时代，“市民”一词被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是“资产阶级”的同义词。

如第二章、第五章所述，“市民”就是指资产阶级。当时，享受西方文化是城市中产阶级的特权，“世界市民”是资本家的代名词，“民族”也被认为是“民众”的同义词。因此，“市民”也就成了“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象征，只不过是比“工人”、“农民”还要低微的“小资产阶级”。

之后普及“市民运动”一词的小田实回忆1965年时写道：“‘市民’一词以前并不经常使用，只能从讲授法国大革命的大学教授嘴里听到，现在这个词听起来依然很奇怪、很刺耳。”并且，“‘市民’对‘左翼’的‘革命势力’而言，无论何时都与‘小资产阶级’、‘小市民’等‘歧视性’用词有关”。[584] 即便如第Ⅱ部将要述及的那样，随着经济高速增长，文化均质化，城市人口激增，“市民”一词也开始普及，然而1960年代还是小田所描述的状况。

即便如此，经济高速增长前，也有非日本共产党系知识分子以法国大革命所形成的人类形象为由承认“市民”一词的积极意义。丸山在1950年的文章《给某位自由主义者的信》中写道，在日本，不用说“苏联式民主主义”，就连“西欧式市民民主主义”都没有实现，“这个意义上的民

主主义对我们来说是还没有实现的任务，而不是现实”。[585] 当然，该观点是基于丸山的“在日本，不用说近代思维的‘超克’，甚至根本没有获得过”这一认识而来。

然而，不能说丸山无条件赞赏这种“市民民主主义”。丸山在1947年叙述道：“担当‘自由’的旗手并不是洛克之后的自由主义者们所认为的‘市民’，而应该是以工人、农民为核心的广大劳动者。”另外，该文还将“市民民主主义”称为“‘英美式’民主主义”。[586] 如第二章所述，当时丸山认为，在英美国家中，将“个人”与“国家”对立的“个人主义国家观”根深蒂固，而在“德国、法国，民族主义就像自由主义的双胞胎兄弟一样是国民的共识”。

丸山还在1951年的论文《日本的民族主义》中写道，法国革命所诞生的“citoyen”一词不能被译为“市民”，应该译为“公民”，即“承担政治责任的主体性近代公民”。[587] 或许，丸山考虑到在当时城市居民占少数的社会状况下，“市民”含有“小资产阶级”意味，因此使用了“公民”一词。

当时的丸山，既没有否定“国民”，也没有否定“民族”。在1948年12月召开的和平问题讨论会大会上，丸山指出，“真正的国际主义只有尊重各民族的文化特性时才能成为可能”。出席大会的川岛武宜也提出，“脱离文化的多样性与个性来谈论国际主义，容易陷入抽象的世界主义”。[588]

考虑到上述语言结构状况，荒正人提倡“作为市民”在当时应该是异常现象。荒正人既然是日本共产党党员，肯定熟知日本共产党对“市民”一词的诠释，那么他提倡“作为市民”就好像是说“作为小资产阶级”一样，属于思想犯的行为。

荒正人之所以承认“市民”一词的积极意义，源于他对日本社会的认

识。如前所述，荒根据日本共产党的两阶段革命论，提倡法国大革命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当时，他形容日本为“《共产党宣言》宣告市民社会没落以来二十年，终于告别了封建社会的落后国家”。[589]

与此相反，批判《近代文学》的日本共产党系言论家表示出不同的日本认识。甘粕石介认为，“日本不只是落后国家”。他批判荒正人道：“近代主义者举出很多实例来力证日本的落后，听着这些实例，我们不知不觉忘记了曾作为垄断资本主义国家的日本。”[590]

其实，丸山也与荒正人怀有相同的日本社会认识。然而，荒又与丸山不同，他于1947年将citoyen 译为“市民”。[591]

这或许与荒正人高举“小市民精英的生活感觉”以对抗日本共产党的“政治优先论”相关。也就是说，同“艺术至上主义”、“个人主义”等词一样，荒特意使用“市民”这一马克思主义文学界的负面“惯用词”来对抗日本共产党。

事实上，在争论中荒正人除了反驳中野重治“只在市民与市民的关系上讨论”之外，还强调宫本百合子是“上流中产阶级”，说宫本的“乐天、外向、积极的特点是市民的优点”。荒还认为“小林多喜二是小市民精英”，主张重新以“英雄、市民的角度审视《为党生活的人》的主人公”。[592]

换句话说，荒正人认为主张克服“小市民性”的“四十岁一代”不是劳动阶层出身，而是“市民”。即便是积极使用“市民”一词的荒正人，也不得不有所妥协地使用该词。

与丸山所用“国民”、“公民”不同，荒正人所用的“市民”与国家是对抗关系。如前所述，荒正人在1947年曾赞赏“近代市民社会”是“横向联系”，同时批判道：“国家与阶级反而主张纵向联系，厌恶横向联系。”

[593] 当然，这一观点主要是针对高举“国家”旗帜的日本帝国主义与高举“阶级”旗帜的日本共产党提出的。

同时，除了使用“市民”一词外，荒正人还使用了“人类”、“难民”等词。他认为，日本文学缺乏“人的这一近代感觉”，而这一“感觉”正是超越“与近代市民社会人道主义相结合的民族、阶级遥远的地平线”。“对于市民而言，‘人类’不是架空的名词，而是充实的实体。”在此基础上，他认为“要将难民与人类联系起来”，并于1950年代开始提倡“市民文学”。[594]

这些词也与荒正人曾在中学时代接受基督教洗礼有关。如前所述，他与大塚久雄对谈时，称侵略战争的事实为“原罪”。荒正人于1946年比喻中国共产党长征为摩西的“出埃及记”，他当然熟知基督教词语“难民”。他还指出，“原始基督教……是从民族神到人类神的发展”，“主张在神面前人人平等的新教主义，为确立市民社会的个人主义做出了贡献，这已经是定论”。[595]

而“难民”、“人类”等词也源于荒正人的战争体验。批判战争的知识分子，战争期间都孤立于民众，借用荒的形容，便是处于“国内流亡者状态”。

与1930年代前后的马克思主义运动鼎盛期不同，荒正人一代根本不可能进行有组织的运动。因此，他们的“抵抗”，只能以一人或一群人阅读禁书，自己内心保留反战意志的形式存在。荒正人于战后回忆战争期间，说自己“被外部民众、友人知己隔离，做着孤独的斗争”，并称此为“国内流亡者”。[596]

荒正人如此回忆战争时期：“要么进监狱，要么逃亡国外，这之外似乎没有确保青春纯洁的方法。所以听说杉本良吉逃往国外的时候心痒痒的。”[597] 如前所述，当《近代文学》编者在座谈会上将杉本良吉流

亡他国作为“文学家的抵抗”实例时，遭到平野谦的批判。而在第Ⅱ部将要论述到，“流亡”一词最终作为反映知识分子们战争体验的词成为战后思想的关键词之一。

换句话说，荒正人所谓的“市民”、“难民”、“人类”、“亡命者”是反映孤立于“国民”的战争体验的词，因此，这些词与“国民”相对立。虽然同样受到基督教的影响，荒的思想却与重视“国民”、“民族”的南原、大塚大相径庭。

这也正好反映了荒正人比南原、大塚、丸山等人更激烈地批判战争，从而更加孤立的战争体验。丸山在空袭下抱有“命运共同体”意识，从而形成一种作为“建设性批判”的“国民”思想。而荒在被一般民众孤立的“国内流亡者”状态下，形成了“市民”、“人类”的思想。

再者，荒正人在山口高中时代的政治运动中，隶属于朝鲜人领导的团体。荒正人回忆道：“从两位朝鲜人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与此相反，丸山与朝鲜人的接触体验非常悲惨，丸山被征召入伍送往朝鲜驻屯步兵连队时，“在平壤内务班，被朝鲜老兵用军靴殴打过”。[598] 因此，丸山到晚年也一直拥护福泽谕吉的蔑视朝鲜观。也可以说，这种与朝鲜人的接触体验，派生出的对朝鲜的观点差异也可能反映在荒正人所谓的“人类”与丸山所谓的“国民”上。

即便在文学史上，荒正人也有独特见解。他不仅评价“明治”的夏目漱石、森鸥外，也逐渐积极评价“大正”的白桦派。

事实上，荒认为白桦派是自己所提倡的“市民文学”的先驱。晚年，荒称赞白桦派高举“人类”与“人道主义”的旗帜，试图构建理想共同体。[599] 荒曾是热爱大正时期流行的现代主义文化的少年，喜欢“宇宙”、“人类”等词。

然而，白桦派文学家多数出身华族等上层阶级。因此，他们被日本共产党批判为空想乌托邦、逃避政治的小资产阶级文学家。例如，宫本百合子认为，“大逆事件”导致明治社会运动被镇压之后，白桦派“回避庸俗的社会性阶级性混乱，梦想世界人类有能力辉煌的可能”。[600]

《近代文学》编者虽然也曾向志贺直哉约稿，但他们不一定都喜欢白桦派。曾执笔有关白桦派的长篇评论的本多秋五，对白桦派“发挥个人”的口号产生共鸣的同时，也批评他们“少爷的‘自由’”、“有时有点幼儿的任性及毫无戒备，伴随的是他们不妥协的自我忠诚”。[601] 如前所述，白桦派的武者小路实笃成为贵族院议员后开始赞美战争，最后被开除公职。

虽说都是“发挥自我”，从抵抗战争中发现“自我”的荒正人，与白桦派的“少爷的‘自由’”在特点上稍显不同。然而，就像使用“市民”一词一样，荒特地善意评价了被日本共产党讨厌的白桦派。

然而，批判白桦派的不只有日本共产党论者，这种批判倾向与提倡“国民文学”的竹内好、石母田正等人相通，最终被江藤淳继承。这种对白桦派与“明治”、“大正”的评价，最终成为战后思想家们论述“个人”与“国家”关系的标志，这一点将于余下各章展开论述。

但是，日本共产党试图彻底排除《近代文学》的影响。1947年12月发生的日本共产党东京大学基层党组织分裂便是这种状况的象征性事件。

这次党组织分裂事件发生在“二·一总罢工”中止以后的运动停滞期，始于东京大学学生党员在组织内提出“利己主义争论”。该争论最终发展为受《近代文学》影响的“革新派”与支持日本共产党领导层的“官派”的内讧，其影响波及周围大学，开始有人退出日本共产党。

东大党组织分裂活动停止时，提出“利己主义争论”的学生党员打出“近代市民精神”与“新人道主义”的口号，试图恢复大正时期的学生组织“新人会”[602]。然而，日本共产党中央认定此为“分裂活动”，将这些学生党员传讯到日本共产党总部，被“官派”学生党员及宫本显治等人批判为“反人民的现代主义”。[603]

该学生党员的回忆录写道，他被曾是东大基层的同志批判为“间谍”、“背叛者”，于是他只好主动申请退党。[604]此时，东大基层的“官派”主张不接受主动退党，应以开除党籍处置，而同情该党员的其他党员反对开除党籍，受理了退党申请。该处置方法最终被日本共产党统治委员视为一大问题，进而解散了东大基层党组织，以“官派”学生党员为中心重新组织基层党组织。

日本共产党系学生所发行的《断罪书》中，形容被处分的学生党员为“背叛分子”、“肮脏的细菌”，谴责其将党的内部文件交给了大学附近的警察署。[605]然而，该学生反驳称这不是事实，他连警察署在哪儿都不知道。

该学生党员第二年发表的手记中写道，从“燃烧我的激情，被我理想化的日本共产党”处受到的毁谤，“让我尝到无法言说的幻灭的悲哀”，接着他写道：

> 离开（日本共产）党的生活两年后，留在我脑海中的，只有这让人战栗的政治的丑恶。……
>
> 政治或多或少包含目的至上主义的要素。然而，目的至上主义才是我们最憎恨的敌人。即便如此，即便追求没有政治的社会真实自由的王国，也不是说为最快达到这一目的可以采取任何手段。……应该向标榜美丽结局而姑息不正当与虚伪的团体抗议。[606]

如前所述，在1947年12月召开的日本共产党第六次大会上，日本共产党形容此次事件是“日本共产党重新出发以来最大的处分”。[607]然

而，这种处分没有就此停止。我们在第七章将要讨论，日本共产党于1950年代遭遇大规模的内部分裂，多数党员受到传讯与开除党籍处分。中野重治、小田切秀雄最终也被日本共产党开除党籍，因此，他们之后开始懊悔自己曾批判《近代文学》。

在被日本共产党开除的党员中，有人对政治感到幻灭抽身而退，有人开始反对日本共产党。1947年因“利己主义争论”被迫退党的学生党员渡边恒雄，之后就职于读卖新闻社，最终成为社长，在反共与保守的方向上继续与“政治的丑恶”纠缠。

“政治与文学”争论虽在1946—1947年备受关注，但最终不分胜负，自然停息。对文学家战争责任的追究，也在恐惧相互揭短的风气中不知不觉消失了。

对超越“政治”与“文学”分裂的尝试没有加以活用的日本共产党，最终将多数人从“政治”中排除。这是从战争体验滋生的“主体性”在政治变动中遇到挫折的最早事例，而从中形成的“民族”与“市民”对立这一模式，成为战后言论结构变迁的一大标志。

---

[1] 严格来讲，本章论述的内容并不具有研究性质。由于史料选择略显随意，同时又多使用主观印象化的手记，因此在史料批判上还存在不足之处。然而，为了描写官方资料等没有记载的战时“氛围”，不得不采取这种论述方法。本章的论述是第二章以后各章必不可少的背景铺垫。

[2] 奥宮正武『太平洋戦争、五つの誤算』朝日ソノラマ、1997、170頁。

[3] 堀栄三『大本営参謀の情報戦記』文春文庫、1996、101—102頁。

[4] 堀栄三『大本営参謀の情報戦記』、333頁。

[5] 堀栄三『大本営参謀の情報戦記』、334頁。

[6] 渊田美津雄·奥宮正武『ミッドウェー』PHP文庫、1999、376頁。

[7] 依据《大日本帝国宪法》，天皇亲自出席并决定重要国策的会议称为御前会议。——译者注

[8] 大井篤『海上護衛戦』朝日ソノラマ、1992、初版1953、130—131頁。

[9] 大井篤『海上護衛戦』、116頁。

[10] 该表述出自大岡昇平『レイテ戦記』第9巻（『大岡昇平集』第9巻及び第10巻、岩波書店、1982—1984），第264页。

[11] 大岡昇平『レイテ戦記』第9巻、264頁。

[12] 吉田俊雄『最後の決戦·沖縄』朝日ソノラマ、1985、205頁。

[13] 大岡昇平『大岡昇平集』第10巻、146頁。

[14] 宮本郷三『隼のつばさ』光人社NF文庫、2001、117頁。虽然这段描述的可靠性有待考证，但这种传言在飞行员中广泛散布，此处作为表现当时士气状况的史料加以引用。

[15] 神立尚紀『零戦·最後の証言』光人社、1999、172頁。

[16] 加藤寛一郎『零戦の秘術』講談社文庫、1995、308頁。该书是原中尉坂井三郎的采访记录。

[17] 神立尚紀『零戦·最後の証言』、43頁。发言者是志贺淑雄前少佐。

[18] 这是冲绳战役时期的传说。参见大岡昇平『大岡昇平集』第9巻，第280页。

[19] 关于“大和号”的出击经过，参见吉田俊雄『最後の決戦·沖縄』，第186—192页。

[20] 宇垣纏『戦藻録』原書房、1968、488頁。

[21] 岩本徹三『零戦撃墜王』今日の話題社、1986、265頁。

[22] 加藤寛一郎『零戦の秘術』講談社文庫、1995、304頁。

[23] 渡辺洋二『液冷戦闘機 飛燕』朝日ソノラマ、1992、36—37頁。

[24] 遠山茂樹·今井清一·藤原彰『新版 昭和史』岩波新書、1959、222頁。

[25] 碇義朗『決戦機疾風·航空技術の戦い』光人社NF文庫、1996、250頁。

[26] 遠山茂樹·今井清一·藤原彰編著『新版 昭和史』、221頁。

[27] 以下关于武田的引用，均出自武田清子「工場に見た嘘と貝殻人間像」『芽』1953年8月号，第40页。

[28] 小泉信三『小泉信三全集』第15巻、文芸春秋、1967—1972、455頁。

[29] 本多顕彰『指導者』、149頁。

[30] 天野貞祐『天野貞祐全集』第4巻、栗田出版会、1970—1972、55頁。

[31] 武田清子「工場に見た嘘と貝殻人間像」、41頁。

[32] 千本樱源自日本歌舞伎剧目《义经千本樱》。该剧讲述义经被逼出逃京都，与平家三位有名的武将知盛、维盛、教经一起走向灭亡的故事。——译者注

[33] 橘孝三郎『日本愛国革新本義』高橋正衛『現代史資料（第5巻） 国家主義運動』、みすず書房、1964、初版1932、78頁。

[34] 即抗日战争。——译者注

[35] 津田道夫『日本ナショナリズム論』盛田書店、1968、63頁。

[36]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国民总动员体制的基层组织，由近邻10户左右组成。——译者注

[37] 这是日本当时的一句流行语。战争期间，日本实行生活必需品的配给制度，优先确保军队相关人员的生活必需品，而无钱无势的正直百姓则只能前去排队领取少得可怜的配给品。——译者注

[38] 遠山茂樹·今井清一·藤原彰編著『新版 昭和史』、225、227頁。有关“公定配给料”见该书第224页。

[39] 丸山眞男『丸山眞男集』第3巻、23頁。

[40] “特别高等警察”的简称。是日本旧警察制度下的政治警察，设立于1911

年。在内务省管辖下借治安维持法的名义，镇压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于1945年废止。——译者注

[41] 松浦総三『体験と資料 戦時下の言論統制』白川書院、1975、79頁。原文为汉字片假名。

[42] 清沢洌『暗黒日記』岩波文庫、1960、1944年2月10日分。

[43] “学童疏散”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随着战况的恶化，日本政府强行将大城市的孩子们疏散到农村等地。——译者注

[44] 以下关于柴田的回忆，均出自柴田道子「戦争が生んだ子どもたち」『思想の科学』1959年8月号，第20—24页。

[45]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称身处大后方的小学生为“少国民”。当时，日本“全民皆兵”，连小学生也要接受基础性的军事训练，还要培养他们对战争和军队的亲近感。——译者注

[46] 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8卷、筑摩書房、1980—1982、220頁；山中恒『子供たちの太平洋戦争』岩波新書、1986、179頁。

[47] 渡辺清『砕かれた神』朝日選書、1983、初版1977、152頁。

[48] 内田善彦『内田善彦著作集』第10卷、岩波書店、1988—1989、22頁；渡辺清『砕かれた神』、105頁。

[49] 奥野健男「解説」『昭和戦争文学全集』第4卷、1964、494—495頁。战败那年奥野才17岁，如第十四章及结语中所述，由于对社会的复杂性缺乏了解，他们这代人很容易轻信政府的官方宣传。奥野的解说没有考虑到年长一代知识分子所面对的言论压制，只是单纯从心理层面论述当时的社会状况，因而分析不够充分。本章将其作为揭示了某一方面历史事实的资料加以引用。

[50] 转引自竹内好「近代の超克」『竹内好全集』第8卷，第26页。坂口安吾与德田秋声开战时所著文章，参见『昭和戦争文学全集』第4卷，1964。

[51] 石川達三「国富としての文學」『文芸』1942年1月号、17頁；島木健作「十二月八日」『文芸』1942年1月号、25頁。

[52] 出隆「親孝行」『改造』1943年3月号、138頁。

[53] 秋山邦雄·鈴木庫三·黑田千吉·荒城季夫·上郡卓「国防国家と美術」『美術』1944年5月号、「美術手帳」1977年9月号、101—102、109、104頁。发言人为秋山少佐和铃木少佐。

[54] 平野謙『平野謙全集』第1巻、新潮社、1974—1975、189頁。

[55] 宗像誠也『私の教育宣言』岩波新書、1958、180頁。

[56] 小田切秀雄「文学における戦争責任の追及」日高六郎編 『戦後思想の出発』『戦後日本思想大系』第1巻、筑摩書房、1968、224頁。

[57] 本多顕彰『指導者』、53—54、57頁。

[58] 本多顕彰『指導者』、79頁。

[59] 本多顕彰『指導者』、64頁。

[60] 清水幾太郎『清水幾太郎著作集』第14巻、講談社、1992—1993、48頁。

[61] 本多顕彰『指導者』、74頁。

[62] 長尾和郎『戦争屋』妙義出版、1955、58頁。

[63] 荒正人『荒正人著作集』三一書房、1983—1984、116、19頁。

[64] 秋山邦雄·鈴木庫三·黑田千吉·荒城季夫·上郡卓「国防国家と美術」、104、108頁。

[65] 本多顕彰『指導者』、74頁。

[66] 安田武「知識人の善意主義」『思想の科学』1962年4月号、90頁。

[67] 日本戦没学生記念会編『きけ わだつみのこえ 第2集』岩波文庫、1988、253頁。

[68] 日本戦没学生記念会編『きけ わだつみのこえ 第2集』、264、186頁。

[69] 飯塚浩二編『日本の軍隊』岩波書店、1991、初版1950、99頁。

[70] 藤岡明義『初陣の記』朝日新聞出版サービス、1999、38頁；日本戦没学生記念会編『きけ わだつみのこえ 第2集』、181、193頁。

[71] 伊藤隆·御厨貴·飯尾潤編『渡邊恒雄回顧録』中央公論新社、2000、42頁；木俣滋郎『陸軍航空隊全史』朝日ソノラマ、1987、200頁。

[72] 加藤寛一郎『零戦の秘術』、320—321頁。

[73] 丸山眞男『丸山眞男集』第3巻、33—34頁。

[74] 日本戦没学生記念会編『きけ わだつみのこえ 第2集』、195頁。

[75] 日本戦没学生記念会編『新版 きけ わだつみのこえ』岩波文庫、1995、208頁。

[76] 鶴見俊輔『新しい開国』『鶴見俊輔集』続1巻、筑摩書房、2000、208頁。

[77] 梅原猛「京都学派との交渉私史」『思想の科学』1959年8月号、35頁。

[78] 日本戦没学生記念会編『きけ わだつみのこえ 第2集』、178頁；安田武「知識人の善意主義」『思想の科学』1962年4月号、90頁。

[79] 梅原猛「京都学派との交渉私史」、35頁；多田道太郎『復製芸術論』講談社学芸文庫、1985、初版1961、282頁。

[80] 野間宏『野間宏集』『新日本文学全集』第27巻、1962、77頁。

[81] 黒沢明『全集黒沢明』第2巻、岩波書店、1987—1988、194頁。

[82] 飯塚浩二編『日本の軍隊』岩波書店、1991、156頁；石田雄（解説）「丸山眞男と軍隊体験」『丸山眞男戦中備忘録』日本図書センター、1997、170頁；丸山眞男『丸山眞男集』第5巻、68—69頁。

[83] 日本戦没学生記念会編『新版 きけ わだつみのこえ』、305頁。

[84] 判沢弘「歪曲された農民兵士像」『思想の科学』1962年4月号、101頁。

[85] 多田道太郎『復製芸術論』、293頁。

[86] 日本戦没学生記念会編『新版 きけ わだつみのこえ』、251頁；日本戦没学生記念会編『きけ わだつみのこえ 第2集』、222、233頁。

[87] 1936年2月26日，日本陆军皇道派青年官兵发动的未遂军事政变。政变失败使得以东条英机为首的统制派借机清理敌对的皇道派军人的政治势力，日本的军国主义得到巩固。——译者注

[88] 日本戦没学生記念会編『新版 きけ わだつみのこえ』、373—374頁。

[89] 日本戦没学生記念会編『新版 きけ わだつみのこえ』、251頁；日本戦没学生記念会編『きけ わだつみのこえ 第2集』、193頁。

[90] 奥宫正武『太平洋戦争、五つの誤算』、99頁。

[91] 小田実『「ベ平連」·回顧録でない回顧』第三書館、1995、495頁。

[92] 森武麿『アジア·太平洋戦争』『日本の歴史』第20巻、集英社、1993、289頁。

[93] 杉山龍丸「ふたつの悲しみ」『声なき声のたより』、1967年11月；高畠通敏編『日常の思想』『戦後日本思想大系』第14巻、筑摩書房、1970、263、265—266頁。引用时略有删减。

[94] 松浦総三『体験と資料·戦時下の言論統制』、66頁。

[95] 天野貞祐『天野貞祐全集』第4巻、314頁。

[96] 渡辺清『砕かれた神』、239頁。

[97] 日本戦没学生記念会編『新版 きけ わだつみのこえ』、454頁。

[98] 丸山眞男『丸山眞男集』第4巻、112頁。

[99] 中野好夫『中野好夫集』第2巻、筑摩書房、1984—1985、50—51頁。中野所引用的大西泷次郎海军中将，是战后为数不多的向特攻队员留下“深表歉意”遗书而自杀的军人之一。然而即便自杀，也无法改变作为当政者应该承担的失败责任。笔者认为，中野引用大西是为了批判当政者的“不负责任”。

[100] 真継伸彦「小田実の啓示」（解説）小田実『小田実全仕事』第1巻、415頁。

[101] マーク·ゲイン（Mark Gayn）著、井本威夫訳『ニッポン日記』ちくま学芸文庫、1998、初版1951、112頁。

[102] 丸山眞男『丸山眞男集』第5巻、69頁；小田切秀雄「転向の問題」栗原幸夫編『コメンタール 戦後50年（第1巻） 戦後の始まり』、1995、180頁。

[103] 坂口安吾『坂口安吾全集』第11巻、筑摩書房、1998—2000、274—275頁。

[104] 赤塚行雄『戦後欲望史』第1巻、講談社文庫、1984、225頁。

[105] 福田定良「敗戦と兵隊」『中央公論』1947年10月号。久野収·神島二郎編『「天皇制」論集』三一書房、1974に収録、293—294頁。

[106] 吉野源三郎「人間への信頼」鶴見俊輔編『平和の思想』『戦後日本思想大系』第4巻、筑摩書房、1968、158—159頁。

[107] 日本戦没学生記念会編『新版 きけ わだつみのこえ』、424頁。

[108] 论述丸山真男与大塚久雄，尤其是论述丸山的著作特别多，著名的例子有将在第十四章中论述的吉本隆明的“丸山论”，以及色川大吉等人从“民众史观”角度对作为“近代主义者”丸山的批判。以丸山为中心论述战后思想的代表性研究有在序章中提及的都築勉『戦後日本の知識人』。
近年来，也就是丸山去世前后，『現代思想』第22巻第1号（1994年）、『大航海』第18号（1997年）、『情況』第2期第8巻第1号（1997年）、『思想』第883号（1998年）等，都编辑了“丸山论”特辑，除了『丸山眞男集』（岩波書店、1995—1997）各卷的解说外，还有笹倉秀夫『丸山眞男論ノート』（みすず書房、1988）、米原謙「日本の『近代』への問い」（新評論、1995）、石田雄·姜尚中『丸山眞男と市民社会』（世織書房、1997）、情報出版編集編『丸山眞男を読む』（ちくま書房、1999）、今井伸英『丸山眞男と戸坂潤』（論創社、2000）、宮村治雄『丸山眞男「日本の思想」精読』（岩波現代文庫、2001）、长谷川宏『丸山眞男をどう読むか』（講談社現代新書、2001）、富田宏治『丸山眞男』（関西学院大学出版会、2001）、大隅和雄·平石直昭編『思想史家 丸山眞男論』（ぺりかん社、2002）。研究论文有米谷匡史「丸山眞男の戦後批判」（『現代思想』 22巻1号）及「丸山眞男と戦後日本」（『丸山眞男を読む』ちくま書房、1999）、葛西弘隆「丸山眞男の『日本』」［酒井直树·ブレット·ド·バリー（Brett de Bary）·伊豫谷登士翁編『ナショナリティの脱構築』柏書房、1996］及「ナショナル·デモクラシーと主体性」（『思想』第896号、1999年）、仲内英三「丸山眞男における『近代的なもの』の可能性の条件」（『早稲田政治経済学雑誌』第332号、1997年）。此外还有田口富久治的『戦後日本政治学史』（东京大学出版会、

2001），以及沟部英章、李镕哲、松冈干夫、区建英、权左武志、吉永润、野田裕久、井口吉男、金荣镐等的论文。

关于大塚久雄，有柳泽治「戦時期日本における経済倫理の問題」（『思想』第934—935号、2002年）以及中岛健二「大塚久雄の近代社会像再考」（『金沢大学経済論集』第33号、1996年）。

其中，作为讨论丸山和大塚与总体战关系的流派，受山之内靖的影响论述大塚思想的有ヴィクター·コシュマン『規律的規範としての資本主義の精神』（山之内靖、ヴィクター·コシュマン、成田龍一編『総力戦と現代化』 柏書房、1995）以及柳泽前引论文、中野敏男『大塚久雄と丸山眞男』（青土社、2001）等。山之内靖的相关著作有『日本の社会科学とウェーバー体験』（ちくま書房、1999）。

本章就大塚与丸山的思想派生于总体战体制这一点上，赞同中野敏男『大塚久雄と丸山眞男』的观点。然而，中野过度强调大塚和丸山的思想提倡合理实行总体战，从而忽视了他们的思想具有历史批判性这一点。中野以“战争时期是在全民总动员为基础的总体战体制下，依靠国民的‘最高度自觉性’的战时体制”为前提进行分析（第172—173页）。然而，战时的日本，依靠国民自觉性的总体战体制在现实中是否成立值得怀疑。因此，提倡合理实行总体战同时也是对政府及军部的批判。

此外，众多研究丸山的著作，都着眼于讨论丸山所提倡的“近代”是否与现实的西方近代一致，抑或在政治思想史上具有何等意义。然而，笔者认为，丸山和大塚所提倡的“西方近代”，只是他们借以表达自身战争体验所滋生心情的一个代名词。

关于这一点，平石直昭「理念としての近代西洋」［中村政則·天川晃·尹健次·五十嵐武士編『戦後日本 占領と戦後改革（第3巻） 戦後思想と社会意識』岩波書店、1995］在藤田省三的评论基础上，认为大塚和丸山的“西方近代”，是“作为某种要求的假定而命名的”，他们“触及了问题的实质”（第85页）。本章的观点进一步延伸了这一角度。

然而，平石强调，丸山等人重视战后改革是由美国占领军从“外”部强制进行这一点，与“自主性”的主张相关。丸山在这一脉络下提倡“自主性”是事实，本书第四章中对此也有提及。然而，丸山等人的“自主性”出现在占领军的政策以前，即在战争时期的总体战体制下诞生的，平石忽视了这一视角。

另一方面，中野的著作赞扬丸山等的思想是总体战思想，批判了平石等人（第304页）。然而笔者认为，丸山和大塚“抵抗”战时的“超国家主义”，同时也是提倡合理实行总体战的“忧国之士”（酒井直树「丸山眞男と戦後日本」『世界』1995年11月号的表述），这两点并不矛盾。

因此，本章一方面批判性地综合了中野和平石的见解，一方面试图解读丸山等人的多重意义。另外，有关丸山的朝鲜观、中国观的问题，仅在第八章略有提及，笔者拟另稿详述。

[109] 以下关于芦田均的引用均出自「第88回帝国議会衆議院本会議議事速記録（第2号）」，1945年9月6日，第6、7页。原文是汉字片假名，无标点。

[110] 石原莞爾「全国民今ぞ猛省一番」『読売報知』1945年8月28日、栗原幸夫編『戦後の始まり』、55—56頁。

[111] 市川房枝「自主的な行動を」『朝日新聞』1945年8月20日；高山岩男「文化国家建設と新国民倫理」『世界文化』1946年5月号、栗原幸夫編『戦後の始まり』、71頁；吉川英治「慙愧の念で胸裂く」『朝日新聞』1945年8月23日、日高六郎編『戦後思想の出発』、69頁。

[112] 東久邇稔彦「日本再建の指針」『毎日新聞』1945年8月30日、日高六郎編『戦後思想の出発』、54、56頁。

[113] 清沢洌『暗黒日記』、1944年7月14日。石川的投稿也转引自该书。

[114] 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8巻、218頁。

[115] 石原莞爾「全国民今ぞ猛省一番」『読売報知』、54頁；東久邇稔彦「日本再建の指針」『毎日新聞』、54頁。

[116] 坂口安吾『坂口安吾全集』第11巻、274—275頁。

[117] 天野貞祐『天野貞祐全集』第4巻、56頁。

[118] 丸山眞男『丸山眞男集』第1巻、31頁。该文第24页阐述道：“静止、合理的现代思维方式，在以现存社会的历史推移为重点的无产阶级代表之中，以及在要求非合理性美化现存社会的市民阶层发言人之中，都已无法找到中坚旗手。这必然变得‘无力’。”这无疑同资产阶级市民阶层和“现代思维”被生动的历史哲学之马克思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夹击的论调相吻合。

[119] 丸山眞男『自己内対話』みすず書房、1998、176頁。关于《近代思维》写作时的回忆，参见鶴見俊輔『語りつぐ戦後史 I』（思想の科学社、1969），第91页。

[120] 丸山眞男『丸山眞男集』第3巻、4頁。

[121] 丸山眞男『丸山眞男集』第3巻、3頁。

[122] 丸山眞男『丸山眞男集』第1巻、32頁。

[123] 丸山眞男『丸山眞男集』第2巻、219頁。

[124] 丸山眞男『丸山眞男集』第2巻、220—221頁。

[125] 丸山眞男『丸山眞男集』第2巻、220—221頁。

[126] 丸山眞男『丸山眞男集』第2巻、284頁。

[127] 丸山眞男『丸山眞男集』第2巻、227頁。

[128] 丸山眞男『丸山眞男集』第2巻、228、268頁。

[129] 丸山眞男『丸山眞男集』第2巻、230頁。丸山在文章中指出，“Nationalism虽译作‘民族主义’，但要说民族主义的话，像某国本土有少数民族，或者殖民地的民族独立，分属几个国家的民族组成一个国家等情况，可以用民族主义一词；而像日本这样，长久以来都保持着民族的纯粹性，即不存在民族问题的国家中使用是否合适”，否定了“民族主义”这一译法（第2卷，第230页）。这种古代日本观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纯属例外，或许丸山沿袭了他所接触的津田左右吉的历史观。不言而喻，这种古代史观与第八章提到的丸山与南原的朝鲜观有密切关系。关于当时的古代史观与津田的思想，参见小熊英二『単一民族神話の起源』新曜社，1995。

[130] 丸山眞男『丸山眞男集』第2巻、232頁。

[131] 丸山眞男『丸山眞男集』第2巻、232頁。

[132] 丸山眞男『丸山眞男集』第2巻、234、236頁。

[133] 丸山眞男『丸山眞男集』第2巻、236頁。

[134] 丸山眞男『丸山眞男集』第2巻、236、237頁。

[135] 黑船，在日本特指1853—1854年由美国海军准将马休·佩里率领，胁迫日本开放门户的美国船队。这些船员船体被涂成黑色，故称“黑船”。——译者注

[136] 丸山眞男『丸山眞男集』第2巻、237—239頁。

[137] 丸山眞男『丸山眞男集』第2巻、240頁。

[138] 丸山眞男『丸山眞男集』第5巻、292頁。

[139] 指明治初期发生的反对藩阀政治、争取国民自由权利的政治运动。——译者注

[140] 丸山眞男『丸山眞男集』第4巻、81、79頁。

[141] 第三章中将分析的前水兵渡边清的日记中，在丸山发表论文之前的1946年1月，就已经有“那人是兵长型，此人是下士官型”的分类（渡辺清『砕かれた神』、161頁）。也就是说，“下士官”这一分类并不是丸山独创的，而是当时有过从军经历的人所共有的分类。

[142] 丸山眞男『丸山眞男集』第5巻、69頁。

[143] 丸山眞男『丸山眞男集』第5巻、70頁。

[144] 藤田省三「天皇制とファシズム」『天皇制国家の支配原理』未来社、1966。原文发表于1957年。

[145] 丸山眞男『丸山眞男集』第5巻、290頁。

[146] 鶴見俊輔·武谷三男·猪木正道編著「知識人の場合」『芽』1953年8月号、29頁。

[147] 『朝日新闻』的投稿转引自日高六郎「『旧意識』とその原初形態」『日本資本主義講座』Ⅸ，岩波書店，1954，收录于久野収·神島二郎編『「天皇制」論集』，第174页。高群逸枝的主张参见小熊英二『単一民族神話の起源』第11章。另外，日高提及这篇文章，认为“‘家庭’或‘部落’的封闭性，至少在进入近代军国主义国家的总体战时，拥有致命的极限”，由此可以看出与丸山同时代的他也抱有同样的问题意识。

[148] 丸山眞男『丸山眞男集』第5巻、67頁；3巻、74頁。

[149] 丸山眞男『丸山眞男集』第1巻、52頁。

[150] 丸山眞男『丸山眞男集』第2巻、115頁。

[151] 丸山在1952年的『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后记中评价1944年的论文「国民主義理論の形成」时说：“与我现在的课题有直接联系的便是这一章，我对日本民族

主义的关心便始于这篇论文”（第5卷，第292页）。但丸山在「『自然』と『作為』」连载论文最终回之后，1942年发表的『福沢諭吉の儒教批判』中也论述了“国民的自觉”与“自由独立风气”的关系（第2卷，第150页）。即便如此，可以说他对“国民主义”的关心，集中体现于1944年的『国民主義理論の形成』一文中。

[152] 参见高坂正顕·西谷啓治·高山岩男·鈴木成高『世界史的立場と日本』（中央公論社、1943），第354页。有关该座谈会上对近代国家与民族主义的批判，小熊英二『「日本人」の境界』第16章也有提及。

[153] 丸山眞男『丸山眞男集』第3巻、165頁。

[154] 丸山眞男『丸山眞男集』第6巻、247頁。

[155] 小田実『小田全仕事』第1巻、409頁。

[156] “剥笋生活”指城里人一点点地将自己的财产拿到农村与农民交换粮食，就像竹笋一样一层层地剥下来。——译者注

[157] 本多秋五『物語戦後文学史』上巻、岩波書店、1992、205頁。

[158] 朝日新聞社編『声』第2巻、朝日新聞社、1984、36—37頁。

[159] 毎日新聞社編『岩波書店と文芸春秋』毎日新聞社、1996、32頁。

[160] 丸山眞男『丸山眞男集』第4巻、96頁；第3巻、161頁。

[161] 丸山眞男『丸山眞男集』第3巻、105頁。

[162] 丸山眞男『丸山眞男集』第3巻、102—103頁。

[163] 丸山眞男『丸山眞男集』第3巻、74頁。

[164] 正如第六章所述，战后初期也有人像丸山一样给“市民”一词赋予积极意义。

[165] 丸山眞男『丸山眞男集』第2巻、240頁。

[166] 丸山眞男『丸山眞男集』第5巻、66頁。

[167] 丸山眞男『丸山眞男集』第3巻、4頁。

[168] 丸山眞男『丸山眞男集』第3巻、136頁。

[169] 大塚久雄『大塚久雄著作集』第8巻、岩波書店、1969—1970、341頁。

[170] 大塚久雄『大塚久雄著作集』第8巻、317頁。

[171] 大塚久雄『大塚久雄著作集』第8巻、343頁。

[172] 大塚久雄『大塚久雄著作集』第8巻、347、351頁。

[173] 大塚久雄『大塚久雄著作集』第8巻、343頁。

[174] 黒沢明『全集黒沢明』第1巻、53、77頁。

[175] 大塚久雄『大塚久雄著作集』第6巻、316頁。

[176] 大塚1944年出版的著作『近代欧州経済史序説』将扩大国内生产、提高国民生活水平的英国与放任本国低生产、通过贸易进入国际社会的荷兰进行对比，并于1947将前者的模式定位为日本“国民经济”应该前进的方向（第6卷，第45页）。平石直昭「理念としての近代西洋』认为，大塚的国民经济论是对战前日本为解决贫困而谋求侵略亚洲的反省。另一方面，中野敏男『大塚久雄と丸山眞男』中认为，大塚战后将视线转向了国内。笔者也在『単一民族神話の起源』中论述过战后的和平主义是与封闭性一体两面的关系。关于和平主义与封闭性的双重性问题，将在第八章中论述。

[177] 大塚久雄『大塚久雄著作集』第8巻、189頁。

[178] 大塚久雄『大塚久雄著作集』第8巻、190頁。

[179] 大塚久雄『大塚久雄著作集』第8巻、172、191頁。

[180] 大塚久雄『大塚久雄著作集』第8巻、196、184頁。

[181] 丸山眞男『丸山眞男集』第5巻、69頁。

[182] 丸山眞男『丸山眞男集』第5巻、70頁。

[183] 丸山眞男『丸山眞男集』第2巻、232—233頁。

[184] 大塚久雄·瓜生忠夫·荒正人·小田切秀雄·佐佐木基一·埴谷雄高編著「近代

精神について」『近代文学』第2巻第1号、1947年1月。

[185] 大塚久雄『大塚久雄著作集』第8巻、171、224頁。

[186] 丸山眞男『丸山眞男集』第4巻、79、83頁。

[187] 丸山眞男『丸山眞男集』第5巻、67頁。

[188] 坂口安吾『坂口安吾全集』第11巻、271頁。坂口的农民批判是从反对战时赞美农村文化展开的。战争期间，农村作为勤劳、艰苦朴素的象征，抑或作为反近代主义、反个人主义、反资本主义的象征而备受赞扬。

[189] 渡辺清『砕かれた神』、105頁。

[190] 大塚久雄『大塚久雄著作集』第8巻、182、176、187頁。

[191] 丸山眞男『丸山眞男集』第4巻、115、108頁；第3巻、27頁。

[192] 「第88回帝国議会衆議院本会議議事速記録（第2号）」、14、17頁。原文是汉字片假名。关于东乡的思想，参见小熊英二『「日本人」の境界』第7章。

[193] 事实上，在纽伦堡审判上“哄笑”的只有戈林一人，其他人与东京审判的被告态度大同小异。レオ·カーン著、加藤俊平訳『ニュ-ルンベルク裁判』サンケイ新聞出版局、1974。

[194] 大塚久雄『大塚久雄著作集』第8巻、187頁。

[195] 佐藤忠男『黒沢明の世界』朝日文庫、1986、初版1969、142頁。

[196] 丸山眞男『丸山眞男集』第13巻、155頁。

[197] 桑原武夫『桑原武夫全集』第5巻、朝日新聞社、1968—1972、217—218頁。

[198] 鈴木裕子『フェミニズムと戦争』マルジュ社、1986、103頁。

[199] 太宰治『太宰治全集』第11巻、筑摩書房、1989—1992、305—306頁。

[200] 丸山眞男『丸山眞男集』第3巻、105頁。

[201] 关于战后日本天皇制讨论的研究，参见大窪愿二「戦後日本の天皇制の諸

問題』（1947年8月10日、日本太平洋問題調査会報告。山際晃·中村政則編『天皇制』『資料 日本占領』第1巻、大月書店、1990、再度収録），石田雄「戦後の天皇制」（『戦後日本の政治体制』未来社、1957），日高六郎「『旧意識』とその原初形態」、「戦後におけるイデオロギーの動向」（『現代イデオロギー』勁草書房、1958），日高六郎「戦後の倫理思想」（『転換期の倫理思想』、『講座現代倫理』第11巻、筑摩書房、1959），日高六郎「戦後思想の出発」（『戦後思想の出発』解説），赤沢史郎「象徴天皇制の形成と戦争責任論」（『歴史評論』第315号、1976年），赤沢史郎「知識人の戦争責任論」（『歴史学研究』第507号、1982年），荒敬「東京裁判·戦争責任論の源流」（『歴史評論』第408号、1984年。荒敬『日本占領史序説』柏書房、1994、再度收録），吉田裕「占領期における戦争責任論」（『一橋論叢』第105巻第2号、1991年。吉田裕『現代歴史学と戦争責任』青木書房、1997、再度収録），安田常雄「象徴天皇制と民衆意識』（『歴史学研究』1991年7月号），安田常雄「象徴天皇制と国民意識」（中村正則編『占領と戦後改革』吉川弘文館、1993），吉見義明「占領期日本の民衆意識」（『思想』第811号、1992年），川島高峰「戦後民主化における秩序意識の形成」（『ナショナリズムの現在/戦後日本の政治』岩波書店、『年報政治学』、1994），宮村治雄「戦後天皇制の諸相」［中村政則·天川晃·尹健次·五十嵐武士編『戦後日本占領と戦後改革（第3巻） 戦後思想と社会意識』］，吉田裕『日本人の戦争観』（岩波書房、1995）等众多研究成果。另外，本章所提到的诸如丸山真男、南原繁、中野重治等论者，也多次被提及。然而，目前为止的许多研究对天皇制的批判、战争责任论与民族主义的关系并未充分考察，也没有深入研究“天皇制”、“民族”两词的含义。因此，他们认为对天皇制的批判主要依据的是民族主义、战死者的记忆，甚至对天皇个人的眷恋，关于这一点评价笔者认为并不充分。尤其在近年的研究中，即使有人提及这一点，也仅提及当时天皇制批判的“局限”、“制约”。笔者认为，当时的天皇战争责任论，是依据重新解读民族主义这一“制约”而进行的。

[202] 「第89回帝国議会衆議院本会議議事速記録（第5号）」、1945年12月2日、54、56頁。原文是汉字片假名。吉田裕「占領期における戦争責任論」认为，对“一亿总忏悔论”的警惕容易接近“民族一体性”理论，因此，左派和进步知识分子们试图与“国民责任论”保持距离。笔者也赞同对前者的评论，但对后者笔者认为需要更深入的考察。因为当时的左派和进步知识分子们并不忌讳“民族”一词。

[203] 日高六郎「『旧意識』とその原初形態」、178頁。

[204] 「第89回帝国議会衆議院本会議議事速記録（第5号）」、56頁。原文为

汉字片假名。

[205] 栗屋健太郎編「戦後直後の政治と社会①」『資料·日本現代史』第2巻、大月書店、1980、5頁。原文为汉字片假名。

[206] 小田切秀雄「文学における戦争責任の追及」、224頁。他列举的文学家有菊地宽、久米正雄、中村武罗夫、横光利一、野口米次郎、西条八十、齐藤浏、齐藤茂吉、岩田丰雄（狮子文六）、河上彻太郎、亀井胜一郎、林房雄、浅野晃、中河与一、尾崎士郎、佐藤春夫、户川贞雄、吉川英治、藤田德太郎、山田孝雄。

[207] 「第89回帝国議会衆議院本会議議事速記録（第5号）」、56頁。原文是汉字片假名。

[208] ジョン·ダワー（John Dower）著、三浦陽一·高杉忠明·田代泰子訳『敗北を抱きしめて』下巻、岩波書店、2001、344頁。

[209] 吉田裕「占領期における戦争責任論」、126頁。

[210] 「憲法を守護する者」『時事新報』、1947年5月3日；「第88回帝国議会衆議院本会議議事速記録（第5号）」、5頁；「第89回帝国議会衆議院本会議議事速記録（第5号）」、54頁。

[211] 渡辺清『砕かれた神』、5頁。关于渡辺，森平太「『暗い戦中派』の戦争責任」（『歴史評論』第496号、1991年）和约翰·道尔（John Dower）『敗北を抱きしめて』等都有介绍，其主旨与本书大同小异。但本书更注重的是，战死者的记忆成为审判天皇的伦理基础，以及批判天皇的民族主义在渡边内心形成这两点。道尔也指出，无法判断渡边日记出版时是否有改动，然而，本书所注重的两点可以推断在该日记中无太大变化。

[212] 渡辺清『砕かれた神』、5頁。

[213] 渡辺清『砕かれた神』、6頁。

[214] 渡辺清『砕かれた神』、23頁。

[215] 渡辺清『砕かれた神』、137、6頁。

[216] 渡辺清『砕かれた神』、6頁。

[217] 渡辺清『砕かれた神』、32—33頁。

[218] 渡辺清『砕かれた神』、34、50頁。

[219] 渡辺清『砕かれた神』、41頁。

[220] 渡辺清『砕かれた神』、55、154頁。

[221] 渡辺清『砕かれた神』、18、180頁。

[222] 渡辺清『砕かれた神』、18、229、61頁。

[223] 渡辺清『砕かれた神』、50頁。

[224] 渡辺清『砕かれた神』、82頁。

[225] 渡辺清『砕かれた神』、94、261、102頁。

[226] 渡辺清『砕かれた神』、135頁。

[227] 渡辺清『砕かれた神』、203頁。

[228] 渡辺清『砕かれた神』、210頁。

[229] 渡辺清『砕かれた神』、214頁。

[230] 渡辺清『砕かれた神』、215頁。

[231] 渡辺清『砕かれた神』、223、224頁。

[232] 渡辺清『砕かれた神』、225、226頁。

[233] 渡辺清『砕かれた神』、226頁。

[234] 渡辺清『砕かれた神』、60、61頁。

[235] 渡辺清『砕かれた神』、40頁。

[236] 渡辺清『砕かれた神』、238、41頁。

[237] 渡辺清『砕かれた神』、172、173頁。

[238] 渡辺清『砕かれた神』、52、159頁。

[239] 渡辺清『砕かれた神』、53頁。

[240] 渡辺清『砕かれた神』、230頁。

[241] 渡辺清『砕かれた神』、230頁。

[242] 渡辺清『砕かれた神』、171、179頁。

[243] 渡辺清『砕かれた神』、179、180、215頁。

[244] 渡辺清『砕かれた神』、216頁。

[245] 渡辺清『砕かれた神』、117、206頁。

[246] 渡辺清『砕かれた神』、225頁。

[247] 渡辺清『砕かれた神』、268頁。

[248] 保阪正康『「きけ わだつみのこえ」の戦後史』文芸春秋、1999、124頁。

[249] 以下均引自神島二郎『近代日本の精神構造』（岩波書房、1961），第364页。

[250] 鶴見俊輔·武谷三男·猪木正道編著「知識人の場合」、29頁。

[251] 「天皇の御心について」『朝日新聞』1948年6月1日；朝日新聞社編『声』、60頁。

[252] 吉見義明「占領期日本の民衆意識」、93頁。

[253] 1874年成立的步兵连队，负责守护皇宫安全。——译者注

[254] 村上兵衛「天皇の戦争責任」『中央公論』1956年6月号、93頁；村上兵衛「戦中派はこう考える」『中央公論』1956年4月号、24頁。

[255] 江藤淳『一族再会』講談社文芸文庫、1988、初版1973、56頁。

[256] 吉川英治「慚愧の念で胸裂く」、69頁；堀田善衛·司馬遼太郎·宮崎駿

『時代の風音』UPU、1992、180頁。

[257] 丸山眞男『丸山眞男集』第4卷、79—80頁。这种日俄战争观与司马辽太郎的『坂の上の雲』等有共通之处，耐人寻味。

[258] 村上兵衛『天皇の戦争責任』、93頁。

[259] 三好達治「なつかしい日本」日高六郎編『戦後思想の出発』、155—156頁。三好在『三好達治全集』（第8卷、筑摩書房、1964）收录的「私の信条」中说道：“浪花节和天皇制应尽早废除。”赤沢史郎『象徴天皇制の形成と戦争責任論』中评论道，三好的退位论是以“正话反说”来批判天皇。结果或许是这样，但据笔者推测，三好并非故意“正话反说”。

[260] 日高六郎「『旧意識』とその原初形態」、178頁。

[261] 森田草平「共産党に入る弁」日高六郎編『戦後思想の出発』、396—397頁。

[262] 日高六郎編『戦後思想の出発』、25頁。

[263] 野坂参三「民主戦線によって祖国の危機を救え」日高六郎編『戦後思想の出発』、256—257頁。据笔者管见，目前还没有关于日本共产党“民族”观变迁的研究成果。荒木義修『占領期における共産主義活動』（芦書房、1993）第三章中，以从“民主人民战线”到“民主民族战线”的名称变化同反美战争开始的关系这一角度出发，认为“民族”一词广见于《赤旗》、《前卫》中始于1946年5月的“五月粮食节”。然而，正如本书所考察的，《前卫》创刊号就已经言及“民族”一词了。另外，荒木对“民族”的含义并未加以考证。

[264] 「新しい日本史学の立場」『日本歴史』第1号卷頭語、1946年。

[265] 宫本顕治「天皇制批判について」『前衛』第1卷第1号、1946年2月、4、6頁。

[266] 羽仁五郎「日本歴史の特殊性」久野収·神島二郎編『「天皇制」論集』、16頁；井上清·羽仁五郎·藤间生大·冈田章雄·大久保利谦·小池喜孝·中野重治「『くにのあゆみ』の検討」久野収·神島二郎編『「天皇制」論集』、38頁。羽仁在「日本歴史の特殊性」中盛赞与谢野晶子的诗「君死に給ふこと勿れ」为“堺市所展现的日本人民的共和制传统在现代仍然有意义”的很好例证。笔者认为，第二章中所述丸山对该诗的恶评也隐含了对这些马克思主义者主张的反驳。

[267] 羽仁五郎「天皇制の解明」、井上清「天皇制の歴史」久野収·神島二郎編『「天皇制」論集』、17、78頁。

[268] 井上清「天皇制の歴史」久野収·神島二郎編『「天皇制」論集』、79、93頁。

[269] 井上清『日本現代史』第1巻、東京大学出版会、1951、3頁。

[270] 井上清『日本現代史』第1巻、4頁。

[271] 井上清『日本現代史』第1巻、9頁；井上清「天皇制の歴史」久野収·神島二郎編『「天皇制」論集』、95頁。

[272] 正木ひろし「近きより」久野収·神島二郎編『「天皇制」論集』、51頁；正木ひろし編著『今日の愛国心』三啓社、1952、43頁。该标语就是著名的“国体被捍卫，朕酒足饭饱，人民将饿死。御名御玺”。

[273] 转引自伊藤恒夫「愛国心について」『松山商大論集』第3巻第1号，1952年3月，第85—86页。该文从当时的革新民族主义角度出发整理了战败后的民族主义论。

[274] 井上清『日本現代史』第1巻、15頁。

[275] 井上清「天皇制の歴史」久野収·神島二郎編『「天皇制」論集』、104頁。

[276] 井上清「天皇制の歴史」久野収·神島二郎編『「天皇制」論集』、81頁。

[277] 关于尾高和大河内的引用，转引自伊藤恒夫「愛国心について」，第83、110页；清水幾太郎『愛国心』岩波新書、1949、71頁。

[278] 荒正人「横のつながり」『近代文学』第2巻第7号、1947年10月。尾高的引用转引自伊藤恒夫「愛国心について」，第83页。

[279] 复员省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主管日本军队复员事务的政府机关。1945年设立第一复员省（原陆军省）及第二复员省（原海军省）。1946年二者合并为复员厅。——译者注

[280] 井上清「時評」『歴史学研究』122号、1946年6月、36頁。

[281] 清水幾太郎『愛国心』、97頁。

[282] 伊藤恒夫「愛国心について」、90頁。

[283] 「超国家主義の論理と心理」、「軍国支配者の精神形態」丸山眞男『丸山眞男集』第3卷。

[284] 『丸山眞男座談』第2冊、岩波書房、1998、206—207頁。

[285] 米谷匡史「丸山眞男と戦後日本」、131頁。

[286] 『毎日新聞』『読売新聞』及蠟山政道「我が国体と民主主義」（『中央公論』1946年1月号）的引用转自高橋徹「憲法問題とマス·メディアの態度」（『思想』1956年9月号）以及石田「戦後の天皇制」。均收录于久野収·神島二郎編『「天皇制」論集』，第198、219页。

[287] 关于当时各政党的天皇观，参见「各派政策討論会 憲法問題と天皇制」『朝日新聞』1945年12月24、25日，日高六郎編『戦後思想の出発』。

[288] 荒井作之助（加藤周一）「天皇制を論ず」『大学新聞』1946年3月21日号、『加藤周一著作集』第8卷、平凡社、1978—1979、102頁；丸山眞男『丸山眞男集』第5卷、100頁。

[289] 津田左右吉『津田左右吉全集』第3卷、岩波書房、1963—1966、473頁。关于津田的天皇观及其先行研究，参见小熊英二『単一民族神話の起源』第14、17章。

[290] 丸山眞男『丸山眞男集』第15卷、35頁。米谷匡史「丸山眞男と戦後日本」认为丸山明确转向批判天皇制的时间是进入1950年代以后。中野敏男『大塚久雄と丸山眞男』也赞成米谷的观点。正如中野指出的那样，丸山在1952年“日本人的道德”座谈会上说他认为天皇制妨碍“日本民族”的“精神自立”这一“思考方式的确立”是在“这两三年”。因此，笔者认为米谷和中野的定位也很妥当。『丸山眞男座談』第2册、254頁。
正如本书第四章将述及的，丸山在战败后表现出对“民主主义大合唱”的抵抗之意。他的“恶魔”气质和“保守性”，以及对日本共产党的态度，也与当时的打倒天皇制论有一定距离。他在1947年的《陆羯南——人与思想》中论述道：“不少民权论者嘴上叫嚣得比羯南还厉害，后来却与曾是敌人的军阀政治家握手言欢。与之相比，羯南

以抽象理论来形容的进步性就保留在他对现实问题的批判中。”（第3卷，第100页）。据此可以推测，对战前及战时马克思主义者之“转向”有所目睹的丸山，在战败后“民主主义大合唱”的时候，不会轻易地拥护“推翻天皇制”的口号。
另外，1946—1947年，丸山的恩师南原繁以及将丸山推荐给《世界》编辑部并让其撰写《超国家主义的逻辑和心理》的田中耕太郎都倡导和拥护象征天皇制的理论，因此从这些人际关系的角度，丸山也很难露骨地倡导废除天皇制。或许，“这两三年”是立足于围绕媾和问题田中和津田退出和平问题谈话会后丸山的政治立场更加坚定的发言。
即便如此，虽然在《超国家主义的逻辑和心理》中没有出现批判“天皇制”的词句，但丸山一直否定“以天皇为领袖的权威等级制度”，并没有像田中一样支持象征天皇制。丸山始终认为“天皇制”并不如日本共产党所说的社会经济一般，而是“权威等级制度”的社会心理构造。众所周知，最先使用“天皇制”一词的是日本共产党，并且该词在战后初期还未普及。笔者认为丸山使用“以天皇为领袖的权威等级制度”也是为与日本共产党所言“天皇制”一词的含义保持距离。
在这个意义上，即便丸山使用“天皇制”，并明确倡导“废除天皇制”的确始于1950年代，在发表《超国家主义的逻辑和心理》时，丸山心中也已经存在批判“天皇制”的想法。此外，需要注意的是，比起战败之初倡导“打倒天皇制”，在出现清洗赤色分子威胁的1950年前后倡导打倒天皇制是更需要勇气的行为。

[291] 丸山眞男『丸山眞男集』第15巻、31—32頁。

[292] 丸山眞男『丸山眞男集』第8巻、213頁。

[293] 丸山眞男『丸山眞男集』第8巻、213頁。

[294] 宗像誠也『教育の再建』河出書房、1947、14頁。

[295] 飯塚浩二編『日本の軍隊』、119頁。

[296] 『丸山眞男座談』第2冊、254頁。另外，在该书第253页，丸山介绍了自己1945年9月所写的笔记，说道：“像日本这样没有民主主义传统的国家，要社会阶级之间的对立斗争按照历史规律来发展很困难，因此，民族统一性容易受到破坏。”基于这一理由，丸山曾试图以“不是绝对主义的因素，而是国民‘情绪上统一的标志’”来定位天皇。这种天皇观及蔑视大众的心态与后面提到的田中耕太郎、和辻哲郎等的观念有共通之处。然而丸山在第254页中提到，“让我改变观点的契机是对道德的思考”。可以看出丸山为打破“不负责任的体系”而开始否定天皇制。另外，丸山在1945年9月的笔记中使用了“象征”一词，在新宪法草案公布之前他就已经设想好

了要运用“象征”一词这一点十分耐人寻味。

[297] 以下均引自中野好夫「一つの告白」『新潮』1949年2月号，日高六郎『戦後日本の出発』，第402、404页。部分收录于『中野好夫集』。

[298] 石田雄「戦後の天皇制」、220頁。田中耕太郎1946年的论文。关于和辻的类似意见，可见于1948年创刊的『国民統合の象徴』。参见小熊英二『単一民族神話の起源』，第344页。

[299] 羽仁五郎「日本歴史の特殊性」、16頁。

[300] 加藤周一『加藤周一著作集』第8巻、105、108頁。回忆部分于1979年补记。

[301] 加藤周一『加藤周一著作集』第8巻、86、99頁。

[302] 戒能通孝「君主制の精神構造」『潮流』1948年5月号、久野収·神島二郎編『「天皇制」論集』、43、48頁。

[303] 丸山眞男『丸山眞男集』第3巻、245頁。

[304] 丸山眞男『丸山眞男集』第8巻、275、219頁。

[305] 松本治一郎「天皇に拝謁せざるの記」『世界評論』1948年4月号、『別冊人生読本戦後体験』河出書房新社、1981、125頁。

[306] 松本治一郎「天皇に拝謁せざるの記」『世界評論』1948年4月号、『別冊人生読本戦後体験』、128頁。

[307] 鶴見俊輔「斜陽族」『日本の百年』第2巻、筑摩書房、1961、『別冊人生読本戦後体験』、74頁。

[308] 鶴見俊輔「斜陽族」『日本の百年』第2巻、『別冊人生読本戦後体験』、74頁。

[309] 中野重治『中野重治全集』第3巻、筑摩書房、1976—1980、15—16頁。渡辺一夫「『あこがれの象徴』私見」（『人間』1949年9月号）也提倡类似的“天皇解放论”。江藤淳的『昭和の文人』（新潮社、1989）仅从中野的『五勺の酒』中挑选出宪法批判论（参见第四章）和对“天皇个人”的眷念，以及对战死者的葬礼等

部分与自己的右派战后批判论联系在一起，不得不说这是极其牵强附会的论述。

[310] 中野重治『中野重治全集』第12卷、42頁；第3卷、13、20頁。

[311] 中野重治『中野重治全集』第12卷、42、44頁。

[312] 中野重治『中野重治全集』第12卷、7、12頁；第3卷、26頁。

[313] 岡野進（野坂参三）「天皇と天皇制」日高六郎編『戦後思想の出発』、114頁。冈野进1945年4月写于延安。

[314] 根据静冈县富士见郡富士町的东芝富士工厂工人意识调查（1945年12月4日），41岁以上的工人100%支持天皇制，其中14%支持日本共产党。吉見義明「占領期日本の民衆意識」『思想』第811号、1992年、89頁。

[315] 森田草平『共産党に入る弁』、396頁；中野好夫「一つの告白」『新潮』1949年2月号、402頁。

[316] 南原繁『南原繁著作集』第7卷、岩波書房、1972—1973、27頁。关于战败后的南原繁，有加藤节『南原繁』（岩波新書、1997）、『南原繁の政治哲学』（『政治と人間』岩波書房、1993），以及论述南原战时与战后思想连续性的铃木规夫『世界性の「東洋的還元と日本化」の位相』（『現代思想』第23卷第10号、1995年10月）。另外，就南原的天皇退位劝告及《皇室典范》改革论，宫村治雄『戦後天皇制論の諸相』中有所提及。笔者认为，这些研究都没有充分论证南原的“民族观”与天皇退位论的思想联系以及与同时代论调的共通性。

[317] 在《朝日新闻》1948年6月13日刊登的记事中，南原就天皇退位问题发表意见指出，战争末期的“七教授事件”发生后，“尽管天皇在政治上和法律上没有责任，但应该在道德上承担责任”是合乎民意的，因此谏言天皇自发退位。丸山照雄·菅孝行·穂坂久仁雄·天野惠一『戦後史の天皇』自由国民社、1986、60頁。

[318] 南原繁『南原繁著作集』第7卷、23頁。

[319] 南原繁『南原繁著作集』第7卷、27頁。日章旗即太阳旗，为日本国旗。——译者注

[320] 南原繁『南原繁著作集』第7卷、137、102—103、92頁。

[321] 不过，相对于丸山强调将“国民”作为中性的政治参与场所，南原更倾向于

将“民族”看作文化与伦理共同体。这一点与两人对天皇的态度差异相关，南原试图通过天皇退位将“象征天皇”构筑为伦理的基础，而丸山则以近代政教分离为模型试图切断天皇与伦理的关系。

[322] 南原繁『国家と宗教』岩波書房、1942。后于1958年修正，收录于『南原繁著作集』第10卷。铃木前引论文查证过1942年版本，本文中所述基本模式并没有大的改动。

[323] “日本教职员工会”（「日本教職員組合」）的简称，成立于1947年，是日本最大的教职员工会组织。——译者注

[324] 『丸山眞男座談』第5冊、319頁。

[325] 南原繁『南原繁著作集』第7卷、58頁。

[326] 南原繁『南原繁著作集』第7卷、58、59頁。

[327] 关于和辻的思想及研究成果，参见小熊英二『単一民族神話の起源』第15、16章。

[328] 南原繁『南原繁著作集』第7卷、24頁。

[329] 南原一边批判其他民族无法理解的“特殊民族宗教”，一边又评价日本的殖民地统治是“提高本民族独特文化的同时，将该文化强加到其他民族之上的难以救赎的自我矛盾”（第7卷，第101页）。正如笔者在《单一民族神话的起源》中论证的，这种同化政策观与和辻哲郎等人有共通之处。很明显，这一观点与第八章将要提及的“外地异种民族离开后的纯粹日本”这一战后日本认识有相似之处。

[330] 南原繁『南原繁著作集』第7卷、59頁。

[331] 南原繁『南原繁著作集』第7卷、56頁。

[332] 「第91回帝国議会貴族院議事速記録（第6号）」、1946年12月17日、86—88頁。

[333] 南原繁『南原繁著作集』第7卷、134、135頁。

[334] 清水伸編『逐条日本国憲法審議録』第1卷、有斐閣、1962、801頁。

[335] 清水伸編『逐条日本国憲法審議録』第1卷、567、503頁。

[336] 清水伸編『逐条日本国憲法審議録』第1巻、164、505頁。

[337] 清水伸編『逐条日本国憲法審議録』第1巻、186—187頁。

[338] 清水伸編『逐条日本国憲法審議録』第1巻、406頁。

[339] 清水伸編『逐条日本国憲法審議録』第1巻、410、563、404頁。

[340] 清水伸編『逐条日本国憲法審議録』第1巻、519頁。

[341] 以下关于围绕天皇退位的政治发展情况，依据高橋紘『象徵天皇』（岩波新書、1987）、渡辺治『戦後政治史の中の天皇制』（青木書房、1990）、吉田裕『昭和天皇の終戦史』（岩波新書、1992）、中村正則『戦後史と象徵天皇』（岩波書房、1992）、松尾尊兊『国際国家への出発』（『日本歴史』第21巻、集英社、1993）、吉田裕『日本人の戦争観』（岩波書房、1995）、丰下楢彦『安保条約の成立』（岩波新書、1996）等。关于季南，参见松尾尊兊『国際国家への出発』『日本歴史』第21巻，第114页。

[342] 丸山照雄·菅孝行·穂坂久仁雄·天野惠一『戦後史の天皇』、59頁。

[343] 丸山照雄·菅孝行·穂坂久仁雄·天野惠一『戦後史の天皇』、59頁；松尾尊允『国際国家への出発』、119頁。

[344] 高橋紘「象徵天皇の誕生」金原左門編『戦後史の焦点』有斐閣、1985、59頁；吉田裕『日本人の戦争観』、43頁。

[345] 吉田裕『日本人の戦争観』、43、44頁。前者原文为汉字片假名。

[346] 吉田裕『日本人の戦争観』、48頁。

[347] 吉田裕『日本人の戦争観』、46頁；吉見義明「占領期日本の民衆意識」『思想』第811号、1992年、91頁。

[348] 吉田裕『日本人の戦争観』、46頁。

[349] 吉見義明「占領期日本の民衆意識」、92頁。

[350] 中野重治『中野重治全集』第12巻、420頁。

[351] 高橋紘「象徵天皇の誕生」金原左門編『戦後史の焦点』、34頁；吉田裕

『昭和天皇の終戦史』、87、89、121頁。

[352] 丸山照雄·菅孝行·穂坂久仁雄·天野惠一『戦後史の天皇』、61頁；高橋紘「象徴天皇の誕生」、54頁。

[353] 松尾尊兊『国際国家への出発』、170—171頁。根据高橋紘「象徴天皇の誕生」（金原左門編『戦後史の焦点』）第58页，虽然天皇听到木户的口信之后有退位之意，但没有付诸行动。此外，1952年5月3日，在庆祝和约生效的庆典上宣读的“讲话”中，本想添加“就战败的责任由衷地向国民谢罪”，后因周围人的阻拦终究没有实现。

[354] 丸山照雄·菅孝行·穂坂久仁雄·天野惠一『戦後史の天皇』、86頁。

[355] 『資料 戦後学生運動』第2巻、三一書房、1969、406—408頁。公开质问信的执笔者为中岗哲郎。

[356] 令人意外的是，依笔者管见，就《日本国宪法》制定时第九条的采纳问题与爱国主义的联系这一视角，目前还未有研究成果面世。宪法制定过程的研究，大部分集中在制定宪法草案和分析制定的政治过程上。关于宪法采纳的问题，除了歴史教育者協義会編『日本国憲法を国民はどう迎えたか』（高文研、1997）之外，在谷関彰一『新憲法の誕生』（中央公論社、1989）的第Ⅹ章以及「憲法九条成立の意図とその受容」（『独協法学』第44号、1997年）中有所论述。此外，关于当时政府的宪法教育，有鈴木正文「憲法制定期における文部省の憲法教育政策」（『大東文化大学紀要 社会科学』第25巻、1987年、1—16頁）。然而以上论著都没有考虑到以宪法第九条为基础确立的爱国主义。本章所使用的史料并不是特别新颖，主要从宪法的爱国主义观点出发整理了当时的论调。

[357] 尾崎行雄『尾崎咢堂全集』第10巻、尾崎咢堂全集刊行会、1962、777、199、331頁。

[358] 久米正雄「日本米州論」『世界週報』1950年2月号、43—44頁。

[359] 对久米的批判，有中野重治「久米正雄の『日本米州論』」『中野重治全集』第12巻。

[360] 河上徹太郎「配給された『自由』」『東京新聞』1945年10月26日、27日；高坂正顕「新しき試練へ踏出せ」『毎日新聞』1945年8月20日；東久邇稔彦「日本再建の指針」『毎日新聞』1945年8月30日。以上收录于日高六郎『戦後思想

の出発』，第78、60、61、57页。

[361] 天业指天子、天皇治国之业。——译者注

[362] 石原莞爾「全国民今ぞ猛省一番」『読売報知』1945年8月28日、栗原幸夫編『戦後の始まり』、57頁。下文关于石原的采访引自该书第58—59页。

[363] 親泊朝省「草莽の文」、1945年8月20日、日高六郎『戦後思想の出発』、63、65頁。

[364] 日高六郎編『戦後思想の出発』、68頁。

[365] GS「憲法草案手交の際の会談記録」大嶽秀夫編『戦後日本防衛問題資料集』第1巻、三一書房、1991、75頁。

[366] 石橋湛山「憲法改正草案を評す」大嶽秀夫編『戦後日本防衛問題資料集』第1巻、103頁。

[367] 清水伸編『逐条日本国憲法審議録』第2巻、4頁；「第90回帝国議会衆議院本会議事速記録（第35号）」、1946年8月25日、522—523頁。后者为原文汉字片假名。

[368] 清水伸編『逐条日本国憲法審議録』第2巻、15頁、21頁。

[369] 佐藤功「平和憲法を作った力と守る力」『世界』1951年11月号、101頁。然而麦克阿瑟在1945年9月2日投降书签署仪式的演讲中说：“世界必须学会和平，否则很快就会有世界最后的战争。”约翰·道尔『敗北を抱きしめて』上巻、34頁。

[370] 幣原喜重郎「新憲法に関する演説草稿』日高六郎編『戦後思想の出発』、271—272頁。

[371] 「新しい憲法とともに」『日本経済新聞』1947年5月3日；「新憲法の実施に際して」『読売新聞』1947年5月3日；「民主憲法の実施に当たりて」『毎日新聞』1947年5月3日。

[372] 「今ぞ翻せ日章旗」『毎日新聞』1947年5月3日。

[373] 『あたらしい憲法のはなし』東京書籍、1995、初版1947、31—32頁。

[374] 大江健三郎「戦後世代と憲法」『朝日新聞』1964年7月16—18日、大江健三郎『厳粛な綱渡り』文芸春秋、1965。引文出自同书文库版（講談社文芸文庫、1991），第168、171页。

[375] 松尾尊兊『国際国家への出発』、50頁。

[376] 吉田裕『昭和天皇の終戦史』、121—122頁。

[377] GS「憲法草案手交の際の会談記録」、77頁。

[378] 指东条英机内阁于1942年举行的第21次众议院议员总选举。翼赞政治体制协议会推荐支持政府战争政策的候选人，干涉非推荐候选人参加选举，结果当选议员中80%以上是被翼赞政治体制协议会推荐的候选人。——译者注

[379] 松尾尊兊『国際国家への出発』、50頁；昭和天皇「敕語」大嶽秀夫編『戦後日本防衛問題資料集』第2巻、101頁。后者原文为汉字片假名。

[380] 「民主憲法の実施に当たりて」『毎日新聞』1947年5月3日；「憲法を守護する者」『時事新報』1947年5月3日。

[381] 伊藤悟·吉田茂·吉田裕·小田部雄次·功刀俊洋·荒川章二·荒敬編著『敗戦前後』青木書店、1995、225、229頁。

[382] マーク·ゲイン（Mark Gayn）著、井本威夫訳『ニッポン日記』、537頁。

[383] 津田与和辻的象征天皇论及其先行研究，参见小熊英二『単一民族神話の起源』第14、15、17章。天皇的发言转引自松尾尊兊『国際国家への出発』，第42页。

[384] 『朝日新聞』1946年3月8日；佐藤功「平和憲法を作った力と守る力」、97頁。

[385] 久野収·丸山眞男·吉野源三郎·石田雄·坂本義和·日高六郎·緑川亨「『平和問題談話会』について」（1968年6月16日）、『世界』1985年7月臨時増刊号、27頁。

[386] 佐藤功「平和憲法を作った力と守る力」、104頁。

[387] 「枢密院における審査（入江メモ）」大嶽秀夫編『戦後日本防衛問題資料集』第1巻、107—108頁。

[388] 佐藤功「平和憲法を作った力と守る力」、99—100頁。

[389] 日本共产党1946年6月29日发表的「日本人民共和国憲法（草案）」刊登于『前衛』8号，1946年7月（神山茂夫編『日本共産党戦後重要資料集』第1巻、三一書房、1971）。

[390] 小田実『小田実全仕事』第7巻、47—48、53頁。

[391] 西修『日本国憲法の誕生を検証する』学陽書房、1986、215—217頁。

[392] 「第90回帝国議会衆議院本会議事速記録（第35号）」、516頁。原文是汉字片假名。

[393] 清水伸編『逐条日本国憲法審議録』第2巻、41頁。「日本人民共和国憲法（草案）」的前言也包含同样主旨。

[394] 中野重治『中野重治全集』第12巻、311頁。

[395] 中野重治『中野重治全集』第12巻、168頁。

[396] 「日本人民共和国憲法（草案）」『前衛』第8号、1946年7月、136頁；神山茂夫「日本国憲法の歴史性と性格」神山茂夫編『日本共産党戦後重要資料集』第1巻、144頁。

[397] 神山茂夫「日本国憲法の歴史と性格」、144、148頁。

[398] 清水伸編『逐条日本国憲法審議録』第2巻、30、42頁。

[399] 清水伸編『逐条日本国憲法審議録』第2巻、30、42頁。

[400] 清水伸編『逐条日本国憲法審議録』第2巻、22—23頁。

[401] 清水伸編『逐条日本国憲法審議録』第2巻、20頁。

[402] 「枢密院における審査（入江メモ）」大嶽秀夫編『戦後日本防衛問題資料集』第1巻、106頁。

[403] 清水伸編『逐条日本国憲法審議録』第2巻、22頁。

[404] 清水伸編『逐条日本国憲法審議録』第1巻、64—65頁。

[405] 以下南原的引用均出自清水伸編『逐条日本国憲法審議録』第2巻，第53—54页。

[406] 松尾尊兊『国際国家への出発』、51頁。

[407] 松尾尊兊『国際国家への出発』、64、55—56頁。

[408] 中野重治『中野重治全集』第3巻、12頁。

[409] 竹内好『竹内全集』第6巻、42頁；鶴見俊輔『語りつぐ戦後史 I』、84頁。

[410] 『丸山眞男座談』第5冊、319—320頁。

[411] 「新憲法の実施に際して」『読売新聞』1947年5月3日。

[412] 古関彰一「単独講和への道」金原編『戦後史の焦点』、107頁。「アイケルバーガー宛て書簡」见大嶽秀夫編『戦後日本防衛問題資料集』第1巻，第395—396页。

[413] 据笔者管见，目前还未发现论及战后日本共产党的“民族”观与战后知识分子“悔恨”的研究。关于知识分子的“悔恨”，后述的丸山真男1977年的「近代日本の知識人」（『丸山眞男集』第10巻）一文梳理得最为精当。笔者认为，之后的思想史研究并未充分利用该篇将战后知识分子命名为“悔恨的共同体”的文章。另外，也未发现以小泉信三、田中美知太郎、安倍能成等老一辈自由主义者个人为讨论对象的思想史研究。关于老一辈自由主义者与新一代的对立，都筑勉『戦後日本の知識人』等书中有所讨论。都筑的研究给本书颇多启发，但都筑并没有论述老一辈自由主义者的社会经济背景，也没有对“自由主义”、“个人自由”的特征进行归纳。此外，都筑虽然也提及了战后知识分子的“悔恨”，但并没有指出这种“悔恨”与日本共产党的权威形成之间的关系。

[414] 小田実『日本の知識人』筑摩書房、1969、初版1964、186頁。

[415] 丸山眞男『丸山眞男集』第10巻、254頁。

[416] 本多顕彰『指導者』、40—42頁。

[417] 南原繁『南原繁著作集』第10巻、229頁。

[418] 佐藤忠男『黒沢明の世界』、130頁。

[419] 本多顕彰『指導者』、42頁。

[420] 久野収·鶴見俊輔·藤田省三『戦後日本の思想』岩波書店、1995、初版1959、134頁；丸山眞男·竹内好·開高健「擬似プログラムからの脱出」『中央公論』1960年7月号、36頁。

[421] 宗像誠也『私の教育宣言』、183頁；丸山眞男『丸山眞男集』第10巻、255頁。

[422] 中野好夫「一つの告白」『新潮』1949年2月号、401頁。

[423] 埴谷雄高等「政治と文学」『近代文学』第6巻第3号、1951年3月、15頁。

[424] 中野好夫「一つの告白」、409—410頁。

[425] 中山和子『昭和文学の陥穽』武蔵野書房、1988、20頁。

[426] 宮本顕治等「近代主義をめぐって」『季刊 思想と科学』第2号、1948年7月、128頁。

[427] 岡部伊都子『沖縄の骨』岩波書店、1997、8—9頁。

[428] 大塚久雄等「近代精神について」、18頁；橋川文三「『戦争体験』論の意味」『現代の発見』1959年12月号、『橋川文三著作集』第5巻、筑摩書房、1985—1986、247頁。

[429] 平田次三郎「トーマス·マンへの手紙」『近代文学』第3巻第4号、1948年4月、46、44頁。

[430] トーマス·マン（Paul Thomas Mann）「戦後日本の知識人へ」『近代文学』第3巻第3号、1949年3月、12頁。《近代文学》编辑同人当初策划只由日本单方面写成，经中野重治提议，该书信翻译后寄给了托马斯，后来托马斯等人对此给予了答复。

[431] 平田次三郎「トーマス·マンへの手紙」、46—47頁。

[432] 荒正人「二の青春」『荒正人著作集』第1卷、11頁。论著末尾的日期是1946年1月5日。

[433] マーク·ゲイン（Mark Gayn）著、井本威夫訳『ニッポン日記』、181頁；ケナー（Kenner）「マッカーサーとの会談記録」大嶽秀夫編『戦後日本防衛問題資料集』第1巻、1948年3月1日、209頁。

[434] 黒沢明『全集黒沢明』第2巻、30頁。

[435] 竹山道雄「樅の木と薔薇」『新潮』1947年4月号；日高六郎編『戦後思想の出発』、4頁；鶴見俊輔·武谷三男·猪木正道「知識人の場合」、31頁。

[436] 鶴見俊輔等「知識人の場合」、31頁。丸山真男在1977年将战后知识分子命名为“悔恨的共同体”，并认为“未必能说悔恨的意识一定能带来好结果”。丸山认为，“悔恨意识”成了“对日本共产党抱有卑劣感”的源泉，使得对转向心存悔恨的日本共产党党员，“再次出现无条件服从上级方针的倾向”，不仅如此，还滋生了“靠‘非转向’的功绩放松警惕的日本共产党的傲慢”。但与此同时，丸山也指出：“如果将日本共产党受到战后非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拥戴归结为知识分子对权威主义的追随——反共分子们喜欢这样归结——这种认识是错误的。”（「近代日本の知識人」『丸山眞男集』第10卷、256—257頁）丸山的论述虽然没有给出实证性依据，但从他自身的战争、战后的经历出发是无可厚非的。本章将该主张从实证层面加以丰富。但丸山忽视了这种“悔恨”的宗教特征及其与战死者记忆的关系。这一点，就如在第III部将要考察的吉本隆明的事例一样，在理解战后思想时不可或缺。中野敏男『大塚久雄と丸山眞男』（青土社、2001）中，以丸山为实施总体战而写下战时著作为前提，评价丸山所谓的“悔恨”是“在战争这一共同项目上失败的指导精英自我意识”的产物（第205—206页）。笔者认为这种归纳不恰当。

[437] 神山茂夫編『日本共産党戦後重要資料集』第1巻、59頁。

[438] 神山茂夫編『日本共産党戦後重要資料集』第1巻、322頁。

[439] ハンクン·ツラリム「朝鮮の便り」『前衛』創刊号、1946年2月、31頁。

[440] バルティスキー「愛国主義について」『前衛』第2号、1946年3月、15—18頁。

[441] 鹿地亘「愛国とは何か」『潮流』第1号、1947年1月。但是该文认

为：“战争时期，军部之辈、官僚之徒难道没有将‘反正我们是草民，政治什么的都无法相信’这种观念灌输给国民吗？”（第104页）而巴尔迪斯基的文章缺少这一视角，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鹿地也与丸山等人在“主体性”和“国民主义”的主张上拥有共识。

[442] 神山茂夫編『日本共産党戦後重要資料集』第1巻、20頁。日高六郎編『戦後思想の出発』第25页也有相同评论。

[443] 『太陽』1999年6月号、103頁。

[444] 塙作楽『岩波物語』審美社、1990、8—9頁。

[445] 鶴見俊輔『鶴見俊輔著作集』第1巻、247頁。当然当时的大众生活文化并不是完全没有受到外国的影响，重要的是，大众生活文化被认为是“国粹风俗”。

[446] 清沢洌『暗黒日記』1944年3月21日。有关清泽的研究有北岡伸一『清沢洌』（中公新書、1987）；「清沢洌におけるナショナリズムとリベラリズム」（『立教法学』第1巻、1995、1—38頁）；山本義彦的系列研究『清沢洌の政治経済思想』（御茶水書房、1996）、『清沢洌選集 解説』（日本図書中心、1998）。这一系列研究都着眼于清泽洌抵抗军部的自由主义，而欠缺清泽不满总体战下的秩序变动这一视角。虽不是研究论文，但小田実「竹内好のアジア観について」（『死者にこだわる』筑摩書房、1979）对清泽洌的这一点略有提及。

[447] 清沢洌『暗黒日記』1943年7月21日、1944年3月21日。

[448] 清沢洌『暗黒日記』1945年2月15日、1943年7月9日、1944年5月1日、1945年4月10日、1943年6月18日、1944年7月4日。

[449] 清沢洌『暗黒日記』1944年4月21日、1943年6月30日、1944年10月3日。

[450] 清沢洌『暗黒日記』1944年7月18日、3月21日。

[451] 清沢洌『暗黒日記』1943年7月6日、1944年8月5日。

[452] 清沢洌『暗黒日記』1943年6月18日、1944年12月10日、1944年5月29日。关于“创氏改名”，清泽批评道：“让朝鲜人起日本名，僭越日本人信用——总督政治之恶，实难容忍。”（1944年5月29日）当时，厚生省周围也有人为将朝鲜人从“日本人”中排除出去而反对“创氏改名”，这与后述和辻哲郎及安倍能成的朝鲜统治观相同。小熊英二『単一民族神話の起源』第13章。

[453] 加藤周一『加藤著作集』第1巻、321頁。

[454] 清沢洌『暗黒日記』1944年12月9日。

[455] 堀田善衛·司馬遼太郎·宮崎駿『時代の風音』、173頁。

[456] 梅原猛「京都学派との交渉私史」、37頁。

[457] 安倍能成「剛毅と真実と知恵とを」『世界』1946年1月号、『「世界」主要論文選』岩波書店、1995、15、21頁。编辑部的反应参见塙作楽『岩波物語』（審美社、1990），第27页。

[458] 土井章監修『昭和社会経済史料集成』第16巻、厳南堂、1991、62、265頁。1942年4月14日和5月12日的会谈及演讲记录。该书第265页的原文是汉字片假名。和辻的报告参见小熊英二『単一民族神話の起源』第15、16章。

[459] 塙作楽『岩波物語』、28頁；毎日新聞社編『岩波書店と文芸春秋』、28頁。

[460] 毎日新聞社編『岩波書店と文芸春秋』、31頁。

[461] 天野貞祐「後語」『天野貞祐全集』第4巻、415頁。天野贞祐说："委托平生最为尊敬的高坂正显、西谷启治、铃木成高三位编纂《国民实践要领》。"

[462] 1947年1月9日，日本全国总工会组成全官公厅共同斗争委员会，准备于2月1日实施总罢工，最终因占领军介入被迫中止。——译者注

[463] 鈴木成高「保守ということ」『心』1949年10月号、橋川文三編『保守の思想』『戦後日本思想大系』第7巻、筑摩書房、1968、278頁；小泉信三『小泉信三全集』第10巻、272頁。

[464] 即日本工会总评议会，日本最大工会组织，简称"总评"。——译者注

[465] 安倍能成等「『心』グループ批判を読んで」『心』1958年8月号、橋川文三編『保守の思想』、343、332、334頁；『田中美知太郎全集』第16巻、筑摩書房、增补版1988、16頁。

[466] 比如小泉信三虽然批判社会主义，却又倡导"个人的创意与责任"（『小泉信三全集』第10巻、276頁）。津田左右吉也认为受社会主义影响的战后风气不尊

重“作为个人的自己”（『津田全集』第20巻、534頁）。

[467] 『蔵原惟人芸術論集』第1巻、新日本出版、1966—1967、36頁。该引文出自1927年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争论中的《文艺论上的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

[468] 鈴木成高「保守ということ」、285頁；安倍能成等「『心』グループ批判を読んで」、340頁。

[469] 安倍能成等「『心』グループ批判を読んで」、337頁。

[470] 安倍能成等「『心』グループ批判を読んで」、333頁。发言者是谷川彻三。

[471] 小泉信三『小泉信三全集』第10巻、153頁。

[472] 河上徹太郎「配給された『自由』」『東京新聞』1945年10月26日、27日、77頁。

[473] 清水幾太郎等「世代の差違をめぐって」『世界』1948年8月号、15—16頁、21頁。

[474] 清水幾太郎等「世代の差違をめぐって」『世界』1948年8月号、24頁。

[475] 丸山眞男『丸山眞男集』第3巻、5頁。

[476] 久野収·鶴見俊輔·藤田省三『戦後日本の思想』、135頁。

[477] 久野収等「『平和問題談話会』について」、37頁。

[478] 清水幾太郎等「世代の差違をめぐって」、34頁。

[479] 津田左右吉『津田左右吉全集』第20巻、525頁。

[480] 飯塚浩二編『日本の軍隊』、129頁。

[481] 鶴見俊輔『鶴見俊輔著作集』第20巻、4—6頁。

[482] 竹内好『竹内全集』第20巻、85頁；第6巻、311—312頁。

[483] 原本丸山与鹤见等人并没有明确批判“大正”。大多数保守论者都有将“明

治”理想化而批判“昭和”的倾向。在前文引用中津田左右吉就自称是“明治大正出生的人”，鈴木大拙也撰写了「明治の精神と自由」一文（橋川文三編『保守の思想』）。也就是说，从战败后到1950年代，“明治”超越政治范畴受到大家的欢迎，而“大正”却并未被提及。换句话说，当时的保守论者和进步论者之间在争夺“明治”这一象征。因此，为了批判自称“生于明治”的年长一代，丸山批判其为“现代被称为明治时代的人”，而鹤见则将“明治人”与“维新人”加以区分。

[484] 加藤周一『加藤周一著作集』第7卷、18、22—23頁。从加藤论文便可窥探“星菫派论争”。臼井吉見編『戦後文学論争』上卷、番町書房、1972。

[485] 丸山眞男『丸山眞男集』第4卷、81頁；加藤周一『加藤周一著作集』第7卷、24頁。

[486] 关于“政治与文学”、“主体性”的争论，以及《近代文学》，除了臼井吉見編『戦後文学論争』（上卷）总结了之外，矶田光一、奥野健男以及最近几年加藤典洋等众多文艺评论家都有论述。另见久野収·鶴見俊輔·藤田省三『戦後日本の思想』、都築勉『戦後日本の知識人』、米原謙『日本の「近代」への問い』、山崎昌夫「主体性論争の系譜」［『講座 日本社会思想史（第5卷） 戦後日本の思想対立』芳賀書店、1967］、菅孝行「主体性論争とマルクス主義」（『戦後日本と社会思想』）、J. V. Koschmann「『近代文学』と日本共産党」（E.Schlant·J. T. Rimer編、大社淑子·酒井晨史·金井和子訳『文学における二つの戦後』朝日新聞社、1995）、J. V. Koschmann，*Revolution and Subjectivity in Postwar Japa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此外，以共产党系文学杂志《民主文学》为中心，以日本民主主义文学同盟副议长佐藤静夫的『戦後文学論争史論』（新日本出版社、1985）为开端，津田孝、北村隆志、伊藤成彦、岩渊刚等人批判性地论述了《近代文学》。另外，吉田永宏、森山重雄、飞鸟井雅道等人也提到了这些争论。在《近代文学》的编者中，除了埴谷雄高外，就是对平野谦的研究最为充分。中山和子『平野謙論』筑摩書房、1984；中山和子『昭和文学の陥穽』武蔵野書房、1988；论究会编『平野謙研究』明治書院、1987；亀井秀雄『中野重治論』三一書房、1970。关于战争时期的平野谦，受杉野要吉「戦時下の芸術的抵抗はあったのか」（『国文学 解釈と教材の研究』第23卷第11号、1978年）以及红叶敏郎等人的影响，中山和子与杉野之间一直进行着争论，江藤淳也介入其中（江藤淳「改竄された経験」『文学界』1981年8月号）。另见布野荣一「戦時下の平野謙」（『語文』第68号、1987年）、「平野謙のアラヒトガミ事件とその周辺」（『政経研究』第23卷第1号、1986年）。对荒正人的研究比这类研究要少，菅孝行「文学史の戦後革命」（『新日本文学』第35卷第3号、1980年）、三宅芳夫「『政治』の不可

能性と不可能性の『政治』」（『現代思想』第26巻第8号、1998年）。此外，对福田恒存的研究有土屋道雄『福田恒存と戦後の時代』（日本教文社、1989）、井尻千男『劇的なる精神·福田恒存』（日本教文社、1994）、金子光彦『福田恒存論』（近代文芸社、1996）、水崎野里子「福田恒存とシェイクスピア」（『駒沢大学外国語学部紀要』第52号、2000年）。

既往研究皆认为在“政治与文学”争论中，平野谦和荒正人反对日本共产党的“政治”。因此，对他们独特的“近代”观及参与政治的思想，尤其是关于《近代文学》初期发挥领头羊作用的荒正人的思想研究颇显薄弱。此外，一般认为狭义上的“政治与文学”争论是指平野谦、荒正人与中野重治之间的争论，因此，该争论与这一时期日本共产党的“近代主义”批判及东大基层分裂事件的关系，以及与丸山真男等思想的共通性等，这些相关问题与时代背景很少被提及。

如前所述，虽然中山和杉野围绕平野谦与中野重治协助战争的程度有所争论，但战争体验对他们的战后思想带来多大影响，却很少被论及。考察了平野战时经历的中山和杉野也没有将这一问题作为重点。对于很少成为研究对象的荒正人和福田恒存而言，这种倾向就更为明显。因此，战后的“政治与文学”争论，也容易被当作战前围绕日本共产党与文学关系争论的延伸。

例如，鹤见俊辅在《战后日本的思想》中断言，《近代文学》第1期编辑“七人当中没有一人有战争体验”，“这些人没有经历过战争的创伤”，并认为从1933年到1935年，日本共产党周边“政治”与“文学”的关系成为争论焦点时，这些人“并没有动摇”（『戦後日本の思想』、5、11頁）。诚然，除了本多秋五与小田切秀雄，其他人都因病或其他理由没有服兵役。然而，鹤见这一见解只是单方面的，从中可看出他作为战败时只有23岁的“战时派”所表现出的对“30岁”那代人的偏见。如第十四章所述，以吉本隆明为首，战败时20岁左右的人都认为年长知识分子“没有受到伤害”，“一直在袖手旁观”。正如本章所述，以《近代文学》的编者为首，当时的文学家们深深地受到了战争的影响。但是，大家都对用文章表露自己的伤痕十分谨慎，所以产生了像鹤见那样的误解。

如果我们从与日本共产党对抗这一角度来看“政治与文学”争论，很容易引导出战前的连续性这一见解，而战争体验的思想性影响容易被忽略。然而，本章认为，很少明确触及的战争体验才是作为“战后思想”的《近代文学》的基础。忽略这一点，我们就很难理解《近代文学》不仅与日本共产党，甚至试图与老一辈自由主义者式的非政治主义也保持距离的原因，也很难理解多数编者战后加入日本共产党，强调“个人”的同时也追究文学家的战争责任等的原因。

此外据笔者管见，目前还没有发现从“民族”、“市民”、“近代”、“个人主义”等词的用法来考察这些争论的研究。

[487] 本多秋五『本多秋五全集』第1巻、菁柿堂、1994—1999、9、15—16頁。

[488] 藏原惟人『藏原芸術論集』第1卷、29、24頁；第3卷、4—5頁。

[489] 本多秋五『本多秋五全集』第1卷、20頁。

[490] 藏原惟人等「文学と現実」『近代文学』創刊号、1946年1月、18頁。

[491] 藏原惟人等「文学と現実」、23—24、27頁。

[492] 秋山邦雄等「国防国家と美術」、103頁。此外，铃木在其著作的第108页中提出，“文艺复兴”和“康德哲学”是“艺术至上主义”的起源。他指出，“要说那个时代是什么情况，在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之后，并非今日般经济紧迫的时代。在那个时代，现在的金权主义国家以自然科学为武器不断跃进，最终建立了对自己有利的地位。这些人主张利用文化至上主义的态度面对世界。这样对他们有利”。马克思主义的近代艺术批判被当时军部吸收，这一点耐人寻味。

[493] 本多秋五「解説」『荒正人著作集』第1卷、326頁。

[494] 小田切秀雄『小田切秀雄著作集』第2卷、法政大学出版社、1970—1974、323—324頁。

[495] 本多秋五『本多秋五全集』第1卷、22頁。

[496] 荒正人『荒正人著作集』第1卷、三一書房、1983、18、116、277頁。

[497] 平野謙『平野謙全集』第1卷、新潮社、1974、215、224頁；小田切秀雄『小田切秀雄著作集』第2卷、40—41頁。

[498] 平野謙『平野謙全集』第1卷、183頁。

[499] 荒正人『荒正人著作集』第1卷、17頁。

[500] 本多秋五『物語戦後文学史』上卷、59頁。

[501] 荒正人『荒正人著作集』第1卷、119、279頁。

[502] 荒正人『荒正人著作集』第1卷、307—308頁。

[503] 荒正人『荒正人著作集』第1卷、308、310頁。与《近代文学》第3卷第2号初刊有些字句上差异，但内容相同。这里引用初刊文字。

[504] 荒正人『荒正人著作集』第1巻、14、118頁。

[505] 荒正人『荒正人著作集』第1巻、308、12頁；『小田切秀雄著作集』第2巻、323頁。

[506] 新井直之編『敗戦体験と戦後思想』論創社、1997、37頁。

[507] 荒正人『荒正人著作集』第1巻、94頁。

[508] 小田切秀雄「文学における戦争責任の追及」、223頁。

[509] 荒正人「棄てよ——傍観主義」『文学時標』第12号、1946年10月、栗原幸夫編『戦後の始まり』に再度収録、181頁；小田切秀雄「転向の問題」、180頁。

[510] 荒正人等「文学者の責務」『人間』1946年4月号、高橋和巳編『戦後文学の思想』『戦後日本思想大系』第13巻、筑摩書房、1969、100、107、105頁。

[511] 荒正人『荒正人著作集』第1巻、85頁。

[512] 荒正人『荒正人著作集』第1巻、67、59頁。

[513] 荒正人『荒正人著作集』第1巻、64頁。

[514] 荒正人『荒正人著作集』第1巻、308—309頁。

[515] 荒正人『荒正人著作集』第1巻、30、34頁。

[516] 丸山眞男『丸山眞男集』第3巻、90—91、87、89頁。虽然丸山在《世界》1948年第2号的座谈会“唯物主观与主体性”上关于主体性争论的发言十分出名，但与《近代文学》的问题意识直接共通的是本书所引用的1947年的「若き世代に寄す」（与『日本読書新聞』刊登时的标题不同）。

[517] 战争时期的文章转引自中山和子『昭和文学の陥穽』，第52页。1953年的发言引自堀田善衛等「日本の近代と国民文学」（『新日本文学』1953年12月号、152頁）。根据埴谷雄高的回忆，当时杂志名称最有可能的是“海燕”，虽然荒正人也提议用“向日葵”，但最终还是决定用“近代文学”。只是埴谷认为，“近代文学”刊名给人的印象并非“起初就想好的”。『埴谷雄高全集』第1巻、講談社、1998—2001、566頁。

[518] 此后的引用见『桑原武夫全集』第3卷，第23—24、20、13页。臼井吉见也在1946年5月发行的《展望》1946年5月号上批判了和桑原相同主旨的短歌。臼井晚年总结桑原和自己的论述，收录于臼井吉見編『戦後文学論争』上卷。

[519] 荒正人『横のつながり』、10頁；平野謙『平野謙全集』第1巻、235、237頁。

[520] 荒正人『横のつながり』、7、9頁。

[521] 荒正人·加藤周一·佐佐木基一·花田清輝·埴谷雄高·日高六郎·福田恆存「平和革命とインテリゲンチャ」『近代文学』第2巻第3号、1947年4月、37頁。

[522] 埴谷雄高『埴谷雄高全集』、563頁。

[523] 荒正人『荒正人著作集』第1巻、118頁。

[524] 小田切秀雄『小田切秀雄著作集』第2巻、52—53頁。

[525] 町人是日本江户时代居住在城市的商人、手艺人的总称，在士农工商的身份制度下处于社会最低层。武士十分歧视这些人，认为他们好算计、贪心、奸诈，并将这些特点称为町人的劣根性。——译者注

[526] 小田切秀雄『小田切秀雄著作集』第2巻、58頁；荒正人·小田切秀雄·佐佐木基一·平野謙·本多秋五「文学者の責務」、97頁。

[527] 丸山眞男『丸山眞男集』第3巻、73頁。

[528] 小田切秀雄『小田切秀雄著作集』、55、57—59頁。

[529] 平野謙『平野謙全集』第1巻、237頁等。平野在1946年12月发表的『女房的文学論』中，谈到了日本近代文学史，并将“自然主义的人生观”作为批判对象。平野这一见解和1941年6月的『私小説問題』相同。但在『私小説問題』中认为自然主义和私小说是“近代日本个人主义文学的一个悲惨归宿”（「近代日本個人主義文学のみじなめな一帰結」第1巻、107頁），而在『女房的文学論』中又认为自然主义与“真正个人主义文学”迥然不同。也就是说以战争为分界线，平野的“近代”和“个人主义文学”的定义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尽管如此，平野在『私小説問題』中也评论了日本私小说家的“人格修养”，认为“与在社会和个人对决的地方不停斗争来提高自我的西欧近代个人主义正好相反”（第1卷，第107页），并认为自然主义与“西欧近代个人主义”的区别，在战前就已经存在。然而，在『私小説問題』中描述克服对象

一词的“近代日本个人主义”，战后成为表达既定目标的词语。在这个变化的过程中，夏目漱石和森鸥外作为“真正个人主义文学”的鼻祖被重新审视。
当然，就像平野自身所言（第1卷，第237页），对夏目和森的重新评价是受福田恒存的『近代文学の系譜』所触发。而且，他在『女房的文学論』中的“只是上下关系，舍弃横向关系的封建性家庭制度”（第1卷，第235页），让人认为受到了荒正人的影响。与此相对，荒的自然主义文学观也受到了平野的影响。这可以说是荒和平野以及福田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但考虑到同时代的丸山和大塚理论的共通性，也可以说他们战后的主张是在同时代言论结构变动中实现的。

[530] 平野謙『平野謙全集』第1巻、233頁。

[531] 平野謙『平野謙全集』第1巻、241頁。荒正人也在『横のつながり』第5页将小林多喜二的女性观评论为“非常封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以前的东西”。

[532] 平野謙『平野謙全集』第1巻、242、185頁。

[533] 荒正人『荒正人著作集』第1巻、121—122頁。

[534] 本多秋五『物語戦後文学史』上巻、37—40、43—44頁。

[535] 小田実『小田実全仕事』第1巻、409頁。创刊时的情况参见『埴谷雄高全集』（講談社、1998—2001），第578—579页。

[536] 新井直之編『敗戦体験と戦後思想』、32頁。

[537] 中野重治『中野重治全集』第12巻、93—94頁。

[538] 宮本顕治·野坂参三·菊地章一·伊藤律·岩上順一·姉歯三郎·甘粕石介·岡本正·今野武雄·古在由重「近代主義をめぐって」、114、118—119頁。该座谈会也被收录于臼井吉見編『戦後文学論争』。关于战后的近代主义，除了『戦後文学論争』中高桥春雄的解说外，还有日高六郎「戦後の『近代主義』」（日高天郎編『「近代主義」解説 現代日本思想大系』第34巻、筑摩書房、1946）等，本章并不论述近代主义的思想内容，而是着眼于“近代主义”作为象征性的语言是如何被使用的。

[539] 宮本顕治·野坂参三·菊地章一·伊藤律·岩上順一·姉歯三郎·甘粕石介·岡本正·今野武雄·古在由重「近代主義をめぐって」、118、121頁。

[540] 小田切秀雄『小田切秀雄著作集』第2巻、323頁。

[541] 宮本顕治·野坂参三·菊地章一·伊藤律·岩上順一·姉歯三郎·甘粕石介·岡本正·今野武雄·古在由重「近代主義をめぐって」、121頁；德田球一「一般報告」『前衛』第26号、1948年4月、13—14頁。

[542] 甘粕石介「近代主義の主体性論」『前衛』第30号、1948年8月、58頁；勝部元「いわゆる『主体性』について」『前衛』第30号、1948年8月、61、64頁。

[543] 高山岩男「文化国家建設と新国民倫理」、82、73、69頁。

[544] 堀田善衛·伊藤整·竹内好·平野謙·花田清輝「日本の近代と国民文学」、152頁。

[545] 丸山眞男『丸山眞男集』第6巻、247頁。

[546] 小田切秀雄『小田切秀雄著作集』第2巻、322頁。

[547] 小田切秀雄『小田切秀雄著作集』第2巻、233、239頁。

[548] 本多秋五『物語戦後文学史』上巻、50頁。

[549] 以下关于小林秀雄的引文出自小林秀雄·荒正人·小田切秀雄·佐佐木基一·埴谷雄高·平野謙·本多秋五「コメディ·りテレール 小林秀雄を囲んで」『近代文学』第1巻第2号，1946年2月，第27、25、33、29页。

[550] 坂口安吾『坂口安吾全集』第1巻、273頁。

[551] 窪川鶴次郎·荒正人·小田切秀雄·佐佐木基一·埴谷雄高·本多秋五「プロレタリアを語る① 窪川鶴次郎を囲んで」『近代文学』第1巻第5号、1946年9月、15頁。

[552] 福田恆存『福田恆存全集』第1巻、文芸春秋、1987—1988、576、580—581頁。

[553] 福田恆存『福田恆存全集』第1巻、594—595頁。

[554] 福田恆存『福田恆存全集』第1巻、622頁。

[555] 福田恆存『福田恆存全集』第1巻、622—623、589頁。

[556] 金鸢勋章是日本授给有特殊战绩军人的勋章，1890年设立，共有7个等

级，1947年废除。——译者注

[557] 福田恆存『福田恆存全集』第1巻、589、592頁。有关福田任『日本語』主编的时代参见中川湊『海を渡った日本語』青木社，1994。

[558] 本多秋五『物語戦後文学史』上卷、252頁；福田恆存『福田恆存全集』第1巻、56頁。

[559] 福田恆存『福田恆存全集』第2巻、240頁。

[560] 福田恆存『福田恆存全集』第1巻、586、584頁。

[561] 加藤周一「IN EGOISTOS」『近代文学』第2巻第5号、1947年7月、5頁。在这篇文章中，加藤虽没有直接点名，但严厉批判了福田的『日本近代文学の系譜』和『人間の名において』。同时，该文还认为，“如果说‘要发展就必须首先经历自由经济’的说法十分愚蠢的话，那么以‘确立小市民式的个人为当前目标’的人民革命进程也很愚蠢。当该革命进程主张追求个人及个人的利己主义，甚至是人道主义时，更是愚蠢至极”（第3页）。不用说，这是有意批判荒正人，而这种文章刊登在卷首，可以看出当时《近代文学》开放的特点。

[562] 荒正人·小田切秀雄·佐佐木基一·平野謙·本多秋五「文学者の責務」、103頁。埴谷接着谈道，战争“让年轻的一代去工厂劳作、军队也开始接触其他民族……奠定了理解民族、社会、人类的基础”，并提倡“近代文学的确立”。他指出战争引发的与社会、国际的接触促进“人”这一概念的形成，这一点颇有深意。

[563] 福田恆存『福田恆存全集』第2巻、241頁。

[564] 大井広介「文学報国会は無為」『文学』第5巻第29号、1961年、90頁；平野謙『平野謙全集』第4巻、114頁。平野所言战时写的文章是否为东条演说草稿不得而知。关于战时的平野，除了本书第188页注1中所列举的各项研究成果外，还有在情报局担任平野上司的井上司朗所著『証言 戦時文壇史』（人間科学社、1984）。

[565] 荒正人·小田切秀雄·佐佐木基一·平野謙·本多秋五「文学者の責務」、111頁。

[566] 荒正人·小田切秀雄·佐佐木基一·平野謙·本多秋五「文学者の責務」、111、105頁。

[567] 平野謙『平野謙全集』第4巻、30頁。

[568] 中山和子『平野謙論』筑摩書房、1984。

[569] 中野重治『中野重治全集』第12巻、115頁。

[570] 书信的原委见『埴谷雄高全集』第9巻，第361页。荒对中野的批判见其著作集第1巻，第111页。在该书129页中，更为直接地批判了中野。中野改变了这封信的人称，将它收录在1969年的小说『甲乙丙丁』第16页。

[571] 中野重治『中野重治全集』第12巻、631頁。

[572] 福田恆存『福田恆存全集』第1巻、669頁；本多秋五『物語戦後文学史』上巻、236頁。本多虽然反对福田的共产党观，并反对其加入《近代文学》，但似乎并不清楚福田协助战争的经过。除本多之外“还有一个”反对者，但到底是谁并不清楚。

[573] 福田恆存『福田恆存全集』第1巻、62—63頁。

[574] 福田恆存『福田恆存全集』第1巻、64頁。

[575] 久野収·丸山眞男·吉野源三郎·石田雄·坂本義和·日高六郎·緑川亨「『平和問題談話会』について」、38頁。

[576] 丸山静「出発点の問題Ⅱ」『近代文学』第3巻第3号、1948年3月、39頁。

[577] 中野重治·荒正人·小田切秀雄·佐佐木基一·埴谷雄高·平野謙·本多秋五「民主主義文学の問題 中野重治を囲んで」（1946年2月4日付）、『近代文学』第1巻第3号、1946年4月、40頁；宮本顕治·野坂参三·菊地章一·伊藤律·岩上順一·姉歯三郎·甘粕石介·岡本正·今野武雄·古在由重「近代主義をめぐって」、130頁；小田切秀雄『小田切秀雄著作集』第2巻、123頁。

[578] 『資料 戦後学生運動』第1巻、153—154頁。

[579] 中野重治『中野重治全集』第12巻、97—98頁；中野重治·石母田正·藤間生大「民族文化の問題」『展望』1948年11月号、42頁。

[580] 荒正人「市民として」『近代文学』第2巻第6号、1947年9月、8頁。

[581] 上原專禄·宗像誠也『日本人の創造』東洋書館、1952、20頁。

[582] 丸山眞男『丸山眞男集』第3巻、296—297頁。

[583] 丸山眞男『丸山眞男集』第3巻、297頁。

[584] 小田実『「ベ平連」·回顧録でない回顧』、7—8頁。

[585] 丸山眞男『丸山眞男集』第4巻、330頁。

[586] 丸山眞男『丸山眞男集』第3巻、161頁；第4巻、330頁。

[587] 丸山眞男『丸山眞男集』第5巻、69頁。然而丸山在1947年的『科学としての政治学』的注释中，虽然提到马克斯·韦伯的价值自由论，但是也说道："对世界价值观的判断，他采取了旁观者的态度，导致了左右两翼对其保持中间派的立场、混淆视听行为的强烈谴责，然而学者们反而要求，作为市民的义务，应该清楚表明各自的世界观，甚至自己的政治立场。"（丸山眞男『丸山眞男集』第3巻、152頁）也许这就是认识到日本共产党对"中立"及"市民"的批判，为强调"市民"不一定意味着所谓旁观的"中立"，而特意使用了"市民"一词。
当时丸山等言论家，并没有以严密的定义来规范语言的使用，因此，那一时期也随处可见为"市民"赋予积极意义的例子。本书指出为"市民"赋予积极意义的例子在1960年前后就已经很常见，并不代表在此之前不存在这样的例子。

[588] 「和平问题讨论会」『世界』1985年7月臨時增刊号、291、190頁。

[589] 荒正人「横のつながり」、1頁。

[590] 甘粕石介「近代主義の主体性論」、55頁。

[591] 荒正人『荒正人著作集』第1巻、296頁。

[592] 荒正人『荒正人著作集』第1巻、295—296頁；荒正人「文学的人間像」『近代文学』第2巻第2号、1947年3月、37、39頁。另外，宫本百合子在刊载于『世界』1946年10月号上的「現代の主題」一文中，对荒和近代文学所代表的动向评价道："相比那些懒散的附庸民主主义的人的精神，还是更为正义。"但宫本也认为，"那只不过是在抵抗战争这一不良政治时，被强制形成的内部抗争的癖好"。既然个人的意识被社会结构限定，"从根本上来说，解释心理现象的能量不可能来源于心理范畴之内"（『宫本百合子全集』第13巻、新日本出版社、1979—1986、85—86頁）。对此，荒反驳说该看法只属于没有经历战时黑暗的"四十多岁一代"的思想，

宫本的“积极”性格是出身于“上升期中产阶级”的“市民”的东西（『荒正人著作集』第1巻、296頁）。荒在后来的采访中说：“当时真想跟宫本百合子做正面的争论，但最终陷入了与中野重治的争论。”（新井直之編『敗戦体験と戦後思想』、41頁）

[593] 荒正人『横のつながり』、3頁。

[594] 荒正人「戦争と平和」『近代文学』第5巻第1号、1950年1月、7、10頁。

[595] 荒正人『荒正人著作集』第1巻、129頁；荒正人「理想的人間像」。后者转引自甘粕石介「近代主義の主体性論」，第56页。

[596] 荒正人『荒正人著作集』第1巻、283頁。但荒正人并不一定赞赏“国内流亡者”的状态。荒正人把战时回忆为“没有从压制自己的强权中逃脱出来的勇气，相反，只留下躲在少数集团里说其他人坏话的流亡者的通病”（荒正人『荒正人著作集』第1巻、19頁）。

[597] 荒正人『荒正人著作集』第1巻、19頁。荒正人在评论金史良的『光の中に』时，认为金的“逃离”在广义上也应称为“亡命”（荒正人『荒正人著作集』第2巻、291—293頁）。

[598] 荒正人『荒正人著作集』第2巻、149頁。荒与朝鲜人的接触情形，受三宅芳夫「『政治』の不可能性と不可能性の『政治』」一文的启发。关于丸山的逸闻见石田雄『丸山眞男と軍隊体験』（『丸山眞男戦中備忘録』解説、日本図書センター、1997、170頁）。该逸闻是丸山在研究生院对指导过的“韩国研究者”提及，后来这名研究者又告诉了石田雄。虽然对于研究者所言的“被别人用长筒靴打过”，石田认为“长筒靴”应该为“拖鞋”，但就像第一章安田武的证言，被“带有铁边的长筒靴踢倒”是内务班成员常见的遭遇。此外，石田说道：“1944年丸山刚开始当兵时不太可能是拥有朝鲜户籍的日本老兵，可能把拥有内地户籍而在朝鲜的日本人说成是‘朝鲜出身’吧。”话虽如此，即使朝鲜的征兵制度开始于1944年，但朝鲜人志愿兵制度早在1938年就已经开始。总之，如石田所言，“除了零碎的回想之外，没有任何描述平壤时代（丸山）印象的资料”，这段沉默的时间，给丸山的思想形成带来了怎样的影响，是值得考察的问题。

[599] 参考收录在『荒正人著作集』第3巻的『市民文学論』。荒正人于1950年代就开始赞赏《市民文学论》和白桦派，并不是始于“政治和文学”争论之时。笔者认为，荒正人对白桦派的关心虽与《近代文学》的编者相同，但或许因与日本共产党对抗，所以荒对白桦派的评价变高。关于这一点，笔者认为，除了“政治和文学”的争论外，还同荒对日本共产党的态度改变相关。原本荒加入日本共产党是以日

本共产党走和平革命路线为前提的。日本共产党在1950年代内部分裂后倾向于武装斗争，这增强了爱好和平的荒对日本共产党的反感。

[600] 宮本顕治『宮本顕治全集』第13巻、81頁。

[601] 本多秋五『本多秋五全集』第3巻、218、213頁。

[602] 东京帝国大学内的社会主义学生团体。1918年在吉野作造的支持下成立，1929年解散。——译者注

[603] 『資料 戦後学生運動』第1巻、157—158、165頁。

[604] 『資料 戦後学生運動』第1巻、169頁。

[605] 『資料 戦後学生運動』第1巻、161頁。此外，渡边因从打短工的三田村四郎那里获得捐款而成为批判的对象。

[606] 『資料 戦後学生運動』第1巻、167、170頁。

[607] 『資料 戦後学生運動』第1巻、160頁。

第Ⅱ部

第七章 贫困与“单一民族”

在第Ⅱ部中，将对1950年代有关民族主义的言论进行分析。作为铺垫，本章将对该时期社会状况与言论之间的关系进行概述。

从政治事件来看，1950年代被认为是始自媾和问题而终于安保斗争的十年。对于该时期的时代背景，首先需要明确两个社会要素。

第一，在1950年代，言论界人士都是经历过战争的。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60年代后半期，即战后出生的一代人开始发动全共斗运动。

以下各章可以看到，1950年代的左派运动中时常使用“民族”一词，忽视与战争时期的相关性便无法说明这种现象。

第二，当时日本社会的贫困程度与经济社会领域的两极分化。因战争而荒废的经济，直至1954年前后才恢复到战前水平。即使1950年代后半期日本经济开始高速增长，人们对贫困及两极分化的关注，仍经历了较长一段时间才完全消失。

本章将以这两个时代背景，尤其是以后者为重点对1950年代左派的民族主义进行概述。

两极分化与民族主义

作为表明1950年代社会两极分化的事例，这里需要介绍一下加藤秀俊的《中间文化》一书中的一些趣事。该书出版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起步期的1957年。在该书中，受到美国大众社会论影响的社会学家加藤认

为，日本也正处于大众社会化过程之中。关于这一点，他写道：

> 如果在以前，我们这些知识分子拎着照相机去农村时，那里的年轻人一定会用充满羡慕和好奇的眼神惊讶地偷窥照相机这种难得一见的奢侈品。但现在，比如我在奈良的某村便经历了一件令人惊讶的事。我拍照一般使用柯尼卡二型相机，而那个村里有一个年轻人，他在看了一眼之后却说："啊，我也有一个一模一样的。镜头是2.8的吧？"接着聊起了最近发售的富士能镜头的亮度等话题。[1]

只知道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之后的日本的人，也许很难理解这件事情有什么令人惊讶的地方。然而在1957年，一名深入第三世界国家偏僻之处进行调查的人类学家，从一名被调查村的村民那里得知对方也有一部和自己相同的相机，这件事情是十分令人惊讶的。

加藤在《中间文化》中还列举了许多在当时令人吃惊的事例。比如"一名工厂女工有一对耳环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在深山的村庄里，青年人也开始穿着高档西装步入舞厅，听爵士乐，也都有驾照"；"工厂的打工仔西装笔挺地去观光旅游，农家的女儿看了雷内·克莱芒导演的《酒店》之后会卓有见解地发表评论"；"二十岁的旋床车工，无论话题是佩奇叶山[2]、原田康子[3]的作品，还是新款摩托车，也无论对方是乡下姑娘还是大学生，都能口若悬河地聊上一番"；等等。[4]

由此可见，在1950年代前期的日本社会中，知识分子与普通劳动者、城市与农村之间存在文化上的巨大差距，二者之间没有共同语言在当时也是必然的。在这种前提下，无论是"知识分子"与"民众"，还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等词，都不会让人感到不自然。

在战败后的日本，普遍贫困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联合国1948年远东经济调查的数据显示，当时日本国民平均所得约为100美元，而美国则为1269美元。纵观当时各国的国民平均所得，锡兰（后来的斯里兰

卡）为91美元，菲律宾为88美元，印度为43美元。因此，在大多数知识分子眼中，当时的日本只是一个“亚洲落后国家”。另外，直至1957年，日本全国婴幼儿平均死亡率仍为4.0%，岩手县的山区甚至高达14.5%。[5]

面对这种现实，许多知识分子无法继续对政治置若罔闻。1958年，26岁的青年作家小田实通过富布莱特（Fulbright）留学项目来到美国，当时有两件事令他十惊讶。一是以猫粮罐头、热水供给系统等为象征的富裕生活，这在当时的日本根本无法想象；二是彻底习惯了这种富裕生活的人们，已经彻底对政治漠不关心。回国后，小田实对美国有过如下的描述：

> 在这个社会中很难发现贫困。……在纽约我结识了很多社会主义者，他们到处分发的美国版《赤旗》是那样没有说服力……
>
> 从这点便能看出整个社会对政治是多么漠不关心。当然，无论在欧洲、日本还是其他地方，人们都可以不去接触政治，也可以假装不了解政治，但这些都是在摆姿态，多少有些做作，都能看出是在有意回避政治。而美国人身上却没有这种做作。[6]

人们在贫穷的时候，会自然而然地去关心政治。第四章中也提到，在战后的贫困时期，小田与其友人曾围绕宪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就“以红薯为主食的生活究竟如何成为‘健康及文化的最低限度生活’”这一问题彻夜长谈。小田曾表示：“夸张一点说，实际上，对于宪法，我们当时除了发表上述激烈言辞外已经别无他法了。”[7]

有过这种经历的小田，在回国途中经过叙利亚时，对贫穷的民众聆听纳赛尔总统演讲时的那种狂热产生了共鸣。在印度加尔各答，当地一名年轻的新闻记者曾兴奋地说，“这辆火车头是国内生产的”，小田表示：“他的眼神和表情要比关于民族主义的书籍更具感染力。”[8]

然而，与小田同行的“还有一些美国年轻人，他们的第一反应却是

为何中近东及印度的人们如此热衷政治”。面对印度的贫民，美国的大学生们认为：“即使热衷政治也无济于事，现状不会有任何改善。”这些年轻人无法理解印度人明知无济于事也要谈论政治的心情。关于他们，小田曾评价道：“他们的蓝眼睛十分清澈，那是一双双未曾理解理想与现实矛盾的眼睛。”[9]

小田还感觉到，这样的美国人只是将政治视作一种抽象的游戏。在“手术室般洁净”的美国大学校园里，“那些以获得社会学或政治学博士学位为目标的学生们，对其专业‘国际关系论’中的某一环或属于‘国际关系论’范围内的‘政治’十分感兴趣”。在论述第三世界国家时，“‘当地人’将吃饱饭视为最关键的问题，而这些学生却首先考虑这些地方有没有自由”。关于《日美安保条约》，小田所重视的是日本是否会卷入战争，即“日本人的人身安全，而他们却在思考如何从国际政治的范畴理解问题”。[10]

此外，小田见过的“美国的年轻人中也有一些爱对问题稍作思考的人”，他们不约而同地认为，“必须发扬国际主义，因为民族主义只会导致战争”。其中，一名美国青年在评价作为阿拉伯民族主义象征的纳赛尔时说道：“那家伙归根结底是一个独裁者。”小田却对狂热支持纳赛尔的民众产生了共鸣，并认为在美国，“人们讨论问题都十分肤浅”。[11]

但另一方面，日本的知识分子无论从积极意义还是从消极意义上讲，都是孤立于民众而存在的。如前所述，享受西方的生活方式及知识成果被视为城市中产阶级或更高阶层的特权。虽然在知识分子中黑格尔及马克思都已经是无人不晓，但正如第一章中提到的那样，1950年的调查结果显示，全国人口中拥有阅读报刊及文章能力的人只占4.4%。同年国立民意调查所的民意调查显示，没有听过“人权”一词的人在东京约占13%，在农村约占45%。[12]

1950年代前期，当时还是大学生的山本明说：“那时，城市与农村

是完全分开的。一切都是如此的不同，以至于人们从城市来到农村时甚至会怀疑二者是否都属于日本。”据山本讲，“随着地方得到开发，城市与农村的差距迅速缩小，是在1960年以后”。[13]

尤其在战争刚刚结束的那段时间里，农村地区不仅占多数，与粮食不足的城市相比也更具优势。关于这一点，山本曾举出左派的启蒙演艺活动遭到农民无礼地喝倒彩的例子。“在战后最初的几年里，种大米的农民地位十分高，‘自己觉得没意思的东西便确信毫无价值’。”[14]

当然，农村人的这种反应也是出于对享受特权生活的城市人的反感。在马克思主义性质的学术杂志《历史学研究》上，刊载过1951年召开的一次座谈会的内容，其中一位与会者说道：

> 战争期间被疏散到农村的城里人，可以说无一例外地都对当地怀有一种彻骨的憎恶感，并认为农民都是一群过分的家伙。然而战后情况略微有所好转时，他们又仿佛认为城市中存在而农村中没有的东西才可被称为现代化，将自己不愉快的经历归咎于农村的落后，并开始谈论农村现代化的必要性。但是当发现一些东西在农村推行往往无法成功后，他们又开始认为在落后的农村任何方法都无济于事。城里人对农村的轻蔑使他们开始忘却原先有过的憎恶感。而农村人正好相反，轻蔑再次变为憎恶。二者就像被憎恶与轻蔑的墙壁阻隔着一般。[15]

在当时的日本，人们以地域和阶层被划分，均一性的“日本人”等概念基本上无法适用。如第三章中所述，当时的进步知识分子及日本共产党系学者思考“民族”及“国民”的确立应达成的目标，便是以这种社会状况为背景。

第六章中也提到，在农村人口相对较多的当时，“市民”一词是城市中产阶级的代名词。而另一方面，“民众”及“大众”等词却并未包含知识分子及城市中产阶级。在这样的语言状况下，人们在表达城市中产阶级和农民这两方面意思时，往往会使用“民族”和“国民”等词。

此外，50年代的左翼知识分子时常会使用“单一不可分的日本民族”、“单一民族国家”等词。[16] 此处的“单一不可分”一词，是派生自法国革命政权标语中的“一体而不可分之共和国”（Unitéindivisibilité de la république），其目的是通过“国民”克服身份及地域间的隔阂状态。

而在他们的论述中，与“单一民族国家”相对的是“世界帝国”、“殖民地宗主国”及“多民族国家”。例如，马克思主义中世史学家藤谷俊雄在1952年以“率先形成民族国家的英、法、意等国通过获取其他民族领土，从民族国家转变为多民族国家及殖民地宗主国”为例，将战前的日本称为“多民族国家”。[17]

如第Ⅰ部中所述，按照他们的历史观，在古希腊这一形成了理想型共同体的城市国家灭亡之后，便诞生了以古罗马帝国为首的“世界帝国”。生活在这一时期的商人，被称为“世界市民”。将“单一民族国家”与“世界帝国”进行比较的方法，就是从这种思考模式中派生而来。

在享受西方文化被视作城市中产阶级特权的当时，“世界市民”是跨国企业资本家的代名词，而“民族”与“民众”的意思则十分接近。而且，当时存在一种知识分子越觉得自身孤立于大众，就越是对“世界市民”进行批判而对“民族”加以赞赏的倾向。

例如，1952年，马克思主义中世史学家石母田正发出疑问：“在所有人，特别是接触过西方文化的知识分子中，是否真的有人从未想过逃离这个不幸、落后，又让人伤心的日本。”但另一方面，他又对“市民主义者”进行了批判。[18] 当然，这里所谓的“市民主义者”是那种不关心日本政治而喜好古典音乐及浪漫主义诗歌，避身于大正教养主义时期备受青睐的西方文化的“小市民”的代名词。

1952年，石母田在收录了其战后所有观点的《历史与民族的发现》一书中写道：

> ……西欧现代文化所产生的各种思想潮流，不断地通过知识分子引入我国……然而这种西欧文化的引进并非来自大众的需要——在知识分子看来，大众意味着那些只懂得浪曲与股旅物等恶俗东西的人——故无法植根于民众，只能局限于知识分子与城市小市民这一狭小世界之中，并不具备作为国民性财产而发展的资质。没有植根于民众这一土壤之中甚至与之相背离，而又与西欧帝国主义文化之间存在直接联系的知识分子与小市民的狭小世界，就像殖民地城市里的人们一样引入西欧的文化。我自己，以及其他许多历史学家都是在这样的世界中成长的。[19]

在叙述完以上观点后，石母田对市民主义者加以批判，并对改变自身的“小市民”习气、以“民族”的一员重塑自我的必要性进行了强调。

虽然与一般民众在知识及教育上存在很大差距，但城市中知识分子的生活水平同样因战火和通货膨胀而大幅下降。在这种情况下，放弃贫困的日本而选择西方文化的“逃亡”心理是包括石母田在内的许多知识分子所共有的。如第六章中所述，无论对“小市民”及“小资产阶级”的固执批判，还是对“民族”与“民众”的大加赞赏，都离不开这种时代背景。

例如，当时的左派知识分子之所以宣扬民族主义，就是在日本的悲惨处境下表明自己不愿抛弃“祖国”的决心。石母田曾将明治时期的诗人石川啄木称为“国民诗人”，并引用了石川书信中的一段话：“现在的日本到处是不满之声。我也是日本人并且也有很多不满。但是，我不能只期待自身生活的改善，而是应该为改变所有日本人及他们的生活而努力，难道不是吗。”[20]

当时的年青一代普遍拥有这种心情。战败后的通货膨胀与贫困使年轻人备受打击，即便是在当时还属于少数精英阶层的大学生，也同样找不到工作。据京都大学《学园新闻》的调查，1954年1月，希望就业的四年级学生中成功者比例依次为：文学系13.7%，教育系40.6%，法学系55%。即便到了1955年1月，关西地区国立、公立和私立共48所大学院校的平均就业率仍然只有32%。[21]

当时，年轻人的理想要么是通过社会主义改变日本，要么就是放弃日本而前往象征着富裕的美国。然而，在1964年之前出国并非十分自由，而且政府对可携带外汇的数量有着严格限制。因此，除留学等特殊情况外，其他任何形式的出国都十分困难。

与战前及战时影响力波及整个亚洲的那个日本相比，战后近20年中日本实际上处于一种闭关锁国状态。在占领期间，出入境管理归盟军最高司令部负责。据说，1951年9月赴旧金山参加媾和会议的吉田茂首相的护照是战后签发的第一本。而到1956年秋，赴印度出席亚非作家会议的堀田善卫所使用的护照号码也只排到了第138813号。[22]

也就是说，战争结束后经过了10年时间，日本出国总人数仍未超过14万。当然，出国在当时来讲是一种特权行为，因此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羡慕和否定的对象。小田实的留学记录《什么都要看一下》、乘游艇横渡太平洋的堀江谦一的《太平洋独旅》等年轻人的美国游记之所以成为当时的畅销书，也与这样的社会背景有关。

后来成为著名动画片导演的宫崎骏在回忆1950年代时说道：“当时都认为日本是愚蠢的四流国家。看到国内仍然有人将屠杀过中国人作为自己的光辉事迹进行炫耀，我真的只能感叹自己生在了一个无可救药的国家，一个在农村茅草屋下进行着买卖人口和迷信活动，并延续着男权主义的黑暗世界。”在1951年拜读了堀田善卫的《广场的孤独》（芥川奖获奖作品）之后，他又表示：“看到主人公最终放弃逃离日本并烧掉黑市上换来的美金，我意识到自己也不得不一直留在这个让我无法热爱的国家。”[23]

此外，石母田在对石川啄木“现在的日本到处是不满，然而我也是个日本人”这句名言大加赞扬的同时，又将永井荷风作为“世界市民主义”的典型代表加以批判。据石母田讲，永井在大逆事件[24]之后不再关心政治并前往巴黎，回国后的他在《新归朝者的日记》中写道：“总

之，日本人是没有脑子的。”与此相反，石川啄木从没有放弃对“祖国日本”及“贫穷而平凡的民众”的“深爱与信赖”。因此，石母田认为：“永井还是应该回到巴黎去。”[25] 而在当时的学生读者中，记载着以上内容的石母田的著作《历史与民族的发现》十分受欢迎。

石母田在称赞石川啄木为“国民诗人”的同时，指出“大正时期的知识分子即便有自由主义的一面，也失去了明治时期人们的那种坚强的骨气”。[26] 第六章中提到宫本百合子对大正时期的白桦派进行批判，在史学界被石母田视为白桦派的，是拥护象征天皇制的津田左右吉。

石母田认为，在文学工作者因“大逆事件”对政治失去兴趣之后的大正时期，历史学家也对政治史及经济史失去了兴趣，而开始更加关注文学史及思想史。而这一时期的思想文化，主要是由那些主张“文化国家”的战前自由主义者也就是津田左右吉等人孕育而成。而且，石母田认为，津田将天皇作为超越政治及经济的文化性象征进行拥护，实际上就是一边表示厌恶政治一面又对现存体制加以支持，这表现出“日本市民历史学的政治性”。[27]

当然，正像本书所反复强调的，这里的“市民”实际上是“有产者”的代名词。1950年代前期，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曾将他们认为应该遭到批判的学者称为“市民”而非“人民”。[28]

这样，在1950年代前期结束之前，即便是那些后来用“市民”来批判“国家”的人们，在当时也同样对“爱国心”倍加赞扬。例如，因撰写《市民主义的形成》这一有关1960年安保斗争的著作而被视为“市民派”知识分子代表人物的久野收，就曾在1953年的一篇文章中对“以祖国的独立”为目标的“民主主义的爱国心”加以赞赏，并认为“作为一名国民，如果不热爱自己祖国，那就是无情无义”。[29]

然而，当时备受赞赏的“民族”，往往被认为应该与天皇及国家处于

对立关系。例如，德国史学家上原专禄就主张，战前日本的“所谓民族意识，实际不过是国家意识的投影”，“很少有人能够意识到民族是与国家对立、反对国家、超越国家的存在”。此外，当时的左派教员石田宇三郎也表示：“日本国民的民族意识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强烈，而是十分淡薄。真正强烈的，并非民族意识，而是天皇意识及绝对主义的国家意识。这是充满奴性的从属意识。因此，要提高民族意识，取得民族解放的胜利，只有创造一个新的民族。”[30]

这种“民族”与“国家”对立的思想以现代的“民族”概念为前提，同时应用了上原所研究的德国史中的理论。在德国历史中，由许多联邦国家组成的德语地区通过统一形成了近代的德意志国家。因此，德国存在“民族”范围大于“国家”，是超越“国家”之存在的认识。而且，上原与南原、丸山一样，对“立志将年青一代培养成为民族一员”的费希特大加赞赏。[31] 当然，上原也特别强调了纳粹与费希特之间的区别。

诚然，将“民族”与“国家”区别对待的看法在当时十分普遍。据1954年10月以京都大学一年级学生为对象的一次舆论调查显示，回答热爱“国家”的人只占25%，而回答热爱“国土”的人则占83%，回答热爱“民族”的人也占到了61%。[32] 此外，这次接受调查的学生中并没有多少人与日本共产党有关，也就是说，可以认为日本共产党支持者之外的人同样会将“民族”作为“民众”的同义词看待。

因此，与其说上原直接引进了德国思想，不如说是运用德国思想来表达一种普遍性的心情。1950年代前期对“民族”的赞赏，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流行于知识分子之间的。

对“亚洲”的重新评价

这种对“民族”的偏爱，派生自战败以来对启蒙路线的反省。

如第二章中所述，大塚久雄在赞赏西方“近代人类型”的同时，又指出日本的农民是“封建性的”、“亚洲性的”。而这种启蒙论在1950年前后遭到了严厉的批判。

究其原因，是启蒙活动已经失去了市场。战后，战争期间饱受孤立感困扰的知识分子成立了“二十世纪研究所”、“思想科学研究会”以及“民主主义科学家协会”等各种团体并进行共同研究及启蒙活动。然而到了1948年，起初备受关注的启蒙演讲会却逐渐为人们所厌倦并失去了影响力。

即便在战争刚刚结束时，启蒙活动虽然表面上轰轰烈烈，但其效果实际上已经开始受到质疑。清水几太郎在回忆录中曾提到，由他担任所长的“二十世纪研究所”自1946年5月起开办长期讲习会。在讲习会结束的前一天，参加者中有人询问“明天是否可以拿到毕业证书”，清水对此感到愕然。[33] 也就是说，参加讲习会的人不只是为了民主主义的启蒙演讲，更主要是为了从代表权威的知识分子那里得到“毕业证书”。

石母田这位前面提过的人物，担任过主要由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组成的“民主主义科学家协会”的干事，并负责派遣讲师到地方进行活动的组织工作。他也提到，当时的演讲大部分是“一些脱离了民众的知识分子”自顾自地演讲，“之后再回答两三个提问便返回东京”，“讲师从民众那里学不到任何东西”。[34] 虽然在讲坛上大谈“民主主义”和“主体性”，但是知识分子凭借其权威进行演讲的模式只不过是一种表演罢了。

据说石母田在1947年因对丸山真男及大塚久雄的民众观感到不满而与大塚进行过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在于“民众是否仅仅是‘启蒙’及‘普及’的接受者”。战前有过参加工人运动经历的石母田认为，民众可以在实践活动中革新自我并达到觉醒。而大塚则反驳道：“只有工人阶级中一小部分进步分子才能达到这个目标”，并主张“这与在农村中发展何种性质的资本主义有关”。[35]

大塚起先主张，如不进行思想方面的变革，则制度方面的改革也很难取得成效。但是，果真如此的话便可能得出一个结论，即日本民众在转变为现代思想之前的任何努力都是徒劳。据说，当时闲置在家的历史学家石母田曾来到东京大学经济系大塚的研究室，“二人激烈争论至深夜”。[36]

在这一时期，大塚与《近代文学》一起，作为与社会变革背道而驰的“现代主义”遭到了日本共产党的批判。1948年，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还编写了《大塚史学批判》一书。石母田的盟友藤间生大也曾将大塚的“对人类变革进行的批判”形容为“畏惧失败而无所作为的懒惰者的理论”，并提出只有社会变革“才是人类改变自身和整个社会”的途径。[37] 这样，以“西方现代”为原型的启蒙论，自1940年代后期开始便不断地遭受批判。

更具冲击力的是1949年的中国革命。自战前开始，日本的大多数知识分子便将西方作为现代化的榜样，对中国则抱着蔑视的态度。而中国共产党却组织起了比日本农民更加落后的中国农民，并击败了拥有美国援助的国民党，从而先于日本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这一事实在日本引起了轰动。

不只在中国，印度及埃及等国家也在1940年代后期相继取得了殖民地独立运动的胜利。1950年10月，在印度的勒克瑙市召开了太平洋国际学会国际会议，会上对民族自决与民族独立、东方对西方统治的抵抗以及“亚洲人的亚洲”等议题进行了讨论。

以此为契机，反思西方现代及重新评价亚洲的潮流开始在日本兴起。石母田1953年提出：“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词已经不再局限于欧洲。中国革命的成功证明，长久以来受到与欧洲不同方式统治的亚洲民众自发地通过自身努力创造属于自己价值的时代已经到来。”[38] 在这前后，中国研究者竹内好开始备受瞩目，丸山真男也在

1952年就自己以往的中国观进行了自我批评。[39]

这种潮流促成了日本知识分子对以西方现代为榜样的启蒙主义的反省及对成功取得独立的亚洲民族主义的重新评价。竹内好在谈及中国时，对日本知识分子的西方本位取向与“现代主义”进行了批评，同时提倡“国民文学”，号召人们关注“民族”。

此外，在“民众”与“民族”被视为同义词的当时，这种潮流对西方本位取向的知识分子进行自我批评，以及对被认为是“亚洲式的”民众的重新评价也产生了影响。例如，清水几太郎在1951年1月的《中央公论》上以《日本人》为题发表了一篇文章，对日本的知识分子进行了批判：

> 许多日本人曾按照自己的观点对日本人进行评价。这些人争先恐后地用文字对日本人的性格、态度、行为加以批判及指责。……日本人是野蛮、无知、奴颜婢膝、狡猾、庸俗、愚钝、气量狭小、奇怪、变态的，等等。我也混在这群人中并掷出了一两块石头，这些石头最终却重重地砸痛了我自己。……我不会再做这种事了，因为那种痛是我无法承受的。[40]

在这篇文章中，清水指出，“对于日本人的生活，专业的知识分子只是持一种冷眼旁观的态度”。清水认为，这些对日本的“奇风异俗”、“不合理性”以及“非现代性”进行批判的知识分子，就像是“将没用的旧工具作为古董强行卖给西方人的商人”。此外，他还强调，当时日本的平均收入水平不是接近欧美而是更接近于亚洲国家，并主张：“我们的真正盟友是同样处于贫困之中的亚洲人民。”

清水的这篇题为《日本人》的论作，尖锐地批判了当时关于民众＝民族＝亚洲的自卑情结。哲学家梅本克己曾致信清水，表示“在拜读过《日本人》一文后不胜铭感”，并对清水文中针对“仿佛置身欧洲般地对日本的混乱及贫困大肆批评的日本特色的近代主义者”的批判加以评价。清水文章中写道：“如果避重就轻大谈一些肤浅的民主主义，那就是一片亡国之声罢了。”[41] 仅仅4个月后，竹内好的那篇成为国民文学

争论导火索的《亡国之歌》便在《思想》上发表了。

刊登清水《日本人》的《中央公论》1951年1月号，实际上是一期“亚洲民族主义”特辑，丸山真男的文章《日本的民族主义》也收录其中。这篇文章由丸山提交太平洋国际学会国际会议的文章改写而成。

丸山在这篇文章中所主张的，是近代日本的超国家主义与西方各国的民族主义或亚洲各国的民族主义之间的不同。丸山认为，以法国大革命为代表，西方各国的民族主义是与打破旧体制相联系的。而在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各国，旧有的王朝及地主阶级成为协助西方殖民统治的买办势力，因此推翻这些势力是在爱国的名义下进行的。然而在日本并不存在以上任何一种历史，民族主义是在缺乏民主化历史进程的情况下直接转化为帝国主义的。

因此，按照丸山的话来讲，“在亚洲各国中，日本是唯一一个在民族主义上已经失去处女性的国家”。而且，日本的当政者在“民族主义的合理化”上没有积极地付诸行动，并因此产生了大批的“忠实且低三下四的奴仆”，结果是“曾经在世界各国被大肆宣传的日本人的国家意识在战后开始自外部快速消失。在比邻的东亚各民族的民族情绪不断高涨之时，日本国民毫无干劲且逆来顺受的样子以及赤裸裸地奉行利己主义，让激进阵营与迂腐保守主义者同时感到了失望”。[42]

以上这些观点所反映的是，一直在西方现代中探索“国民主义”模式的丸山开始认识到亚洲殖民地独立运动这一模式。1950年前后，左派率先开始倡导学习中国等亚洲国家的民族主义。

亚洲各国的民族主义者在一开始，需要面对一些与日本的知识分子类似的问题，那就是接受西方现代教育的城市知识分子，与以农民为代表的一般大众之间的差距。因此亚洲各国的民族主义者主张在殖民地独立运动中消除这种差距，并以国民这一共同身份为纽带将人们团结起

来。中国共产党说服城市知识分子改造中国传统文化、融入群众的做法特别受到日本知识分子的关注。

第十章中还会提到，中国文学研究者竹内好曾在1951年倡导“国民文学”。作为研究鲁迅的学者，竹内对专门创作面向知识分子阶层作品的作家及单以启蒙群众为目的引入西方思想进行批判，倡导可以体现“国民”所面临的现实问题的“国民文学”。石母田赞赏石川啄木为“国民诗人”，就是受到这一主张的影响。

1950年代前半期，进步知识分子对以往的西方本位取向进行自我批评，并强调向“日本人”回归成为一种潮流。例如，鹤见俊辅在1951年写道：“作为日本的知识分子，我们应该为自己的思想及言论超出一般大众可以接受的范围而感到惭愧。因此，即便无法一蹴而就，我们也应该逐渐去除自己思想中那些精英阶层的优越感，作为普通大众的一员思考问题。”鹤见俊辅的姐姐鹤见和子也在1954年表示：“以前经常使用‘在日本……’‘日本人……’等说法，现在我开始为此感到惭愧了。在思考日本令人不满之处以及日本人的缺点时，我总是忘记自己同样身处日本，总是摆出一种仿佛自己并非日本人的态度。”[43]

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以上内容同时也说明当时的知识分子有多么脱离“日本群众”。作为当时颇具影响力的亲美派政治家鹤见祐辅的子女，鹤见俊辅与鹤见和子是当时为数不多的留美归国人员。据清水几太郎回忆，当他在战争末期遇见鹤见和子时，她说：“在我家人人都用英语交流。”当被清水问及理由时她答道：“不经常用的话发音就不行了啊。”[44] 鹤见姐弟二人在战争结束后不久便开始进行关于美国哲学的启蒙活动，但到1950年代前半期就立刻开始了上述的自我批评。

在这一时期，人们开始对取代启蒙活动的各种民众取向的活动进行探索。其中之一，就是对大众文化的研究。例如，在鹤见俊辅等人创办的《思想的科学》上，刊登了大量分析大众小说、电影、漫画及流行歌

曲的文章。当时，这是知识分子为探索大众意识而进行的一种新的尝试。这种方法后来被曾担任《思想的科学》编辑小组成员的社会学家见田宗介等继承，从而成为此后大众文化研究的开端。

与此同时，民俗学也随着对民间故事及民谣的重新评价而受到关注。如第八章中所述，以石母田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在这一时期开始提倡历史学与民俗学的结合。当时，鹤见和子十分关注柳田国男和南方熊楠的作品，音乐人类学家小泉文夫也进行了采集儿童歌曲及亚洲音乐的工作。此外，以创作《夕鹤》知名的木下顺二为首，这一时期还创作了以农民反抗斗争为题材的民间故事风格的戏剧。1952年，“民族艺术创作会”成立，这也奠定了后来的民间故事剧团“蕨座”的基础。当然，这里的“民族”仍然是“民众”的同义词，这一点自不必多说。

类似的社会变化还有生活记录运动。1951年山形县山村孩子们的作文集《山彦学校》的畅销，成为该运动兴起的契机。在山形县的山村，孩子们将自己的贫苦生活写成作文，而在以教师为中心的讨论中发现其中有很多问题与当时社会的矛盾有着共通之处。在当时对启蒙活动怀有疑问的知识分子看来，这才是民众在自身的实践活动中觉醒的具体事例。

事实上，战前以民众作文指导为目的的“生活作文方法运动”在地方教师中一度盛行，而《山彦学校》的畅销则成为这种运动再次兴起的契机。此后，知识分子们不再一味地对民众进行启蒙或抽象的表述，而是由民众自己来获得“声音”，这使该运动受到了广泛关注。在该活动中，石母田正、鹤见和子及马克思主义国语学家国分一太郎等人参加工人、主妇以及公司女职员组织的研究会，并编辑整理出了《机器中的青春》和《手握铅笔的主妇》等文集。

然而，虽然在模式上已经由西方变为亚洲，但这里所表现的心情实际上仍然与战后初期有不少共通之处。例如，石母田在其作品《历史与

民族的发现》中除了赞赏鲁迅外，还阐述了以下观点：

> 鲁迅在一次演讲中教育青年人要“大胆的说话，勇敢的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一切内心话说出来，发表出来”。而在战争期间，我们却缺乏这种敢于劝导青年人的勇气。这是因为我们自身没有进行实践，也未曾有过敢于实践的勇气。……毛泽东讲过：“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除了在狱中坚持斗争的少数革命家外，即便是反对战争及法西斯的知识分子也会尽量回避在公开场合发表意见，并会担任某种职务——在当时，没有什么职务是与战争无关的——靠着某份薪水将生活维持了下来。[45]

石母田认为，当战争时期统治中国部分地区及朝鲜的日本在其“民族脊梁”不断遭到腐蚀时，“作为被压迫民族的中华民族”却“没有奴颜婢膝，而是造就出了顽强不屈的精神”。可以看出，这里所表现出的心情与战后初期的那种以西方现代为媒介的心情在本质上是相同的。

在这一点上，丸山真男等人的看法也基本一致。无论是法国模式还是中国模式，他们所主张的都是“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的结合”。而且，尽管参照对象变成了“洋溢着民族热情”的“近邻东亚各民族”，他们批判日本“毫无干劲且逆来顺受、赤裸裸地奉行利己主义”的态度自战争结束以来也始终没有变化。

换言之，表达这些人心理的媒介实际上并不一定是西方现代。无论媒介是“西方”还是“武士道”，是“明治”还是“中国”，他们所要表达的内容实际上是相同的。只不过与适合表达“个体”的西方民族主义相比，亚洲的民族主义更加适合表达“民众”的取向，这种细微差异才是主要的变化所在。

此外，通过赞扬亚洲民族主义来表现日本民族主义的做法也不限于知识分子。如第三章所述，渡边清曾被发生在朝鲜及菲律宾的抗日民族主义深深触动。日本战败时是一名海军飞行预科练习生的电影评论家佐藤忠男也回忆道，与战败后陷入一种虚脱状态的自己相比，充满激情地

谈论“祖国独立”的朝鲜友人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46] 石母田与丸山等人的看法，与战后人们的这种心情也有关系。

在1950年代的言论界可以发现一种倾向，那就是肯定性民族主义一般被称为“民族主义”或“国民主义”，而否定性民族主义则被称作“国家主义”或“超国家主义”。[47] 从严格意义上讲，这种区别并非十分普遍，但“民族”一方面作为“民众”的同义词，另一方面又代表着亚洲的“民族”独立运动，给人们的印象是肯定性的。

亚洲的民族主义除了可以表达民众的取向，还适合表达一些其他的心情，比如反美情绪。

反美民族主义

在战后的贫困时期，美国就是富裕的象征。驻扎在日本本土的美军，其物资数量之丰富使人瞠目结舌。在当时的日本，能够开上汽车的人不到总人口的百分之一。[48] 与此相反，美军不仅完全机械化而且大部分人可以驾驶吉普车，每人还配有大量香烟和零食。孩子们会为美军扔来的巧克力围成一团，能够出入美军驻地也成为一种特权。

然而，当时人们的这种憧憬中也伴随着强烈的屈辱感。战争时期作为一名“皇国少年”曾梦想“为天皇战死”的作家大江健三郎，在1996年谈及美军到达自己出生的山村时回忆道：

> （害怕遭到强奸的）不安使姑娘们失去了往日的美丽，剪掉头发并在脸上涂满炭灰后则更加难看，她们正在商量是否应该躲到深山老林里去。……听说装在美军吉普车上的超强力探测器可以轻易发现刀具，家长们忙着将祖传的日本刀用油纸包裹起来放入木箱，准备藏到森林深处。载着美军的吉普车终于进入了村口的山谷。……在学校的操场上，那个曾经扮演煽动者角色，让农家少年应征满洲开拓团志愿者的副校长告诉我们这些孩子，见到吉普车一定要喊“Hello”，甚至为了让我们能齐声喊出而进行了练习，但孩子中谁也没有勇气真的跑到美军面前去喊。……孩子们为扔来的

> 巧克力围成一团，大人们则围成一群捡拾着香烟……贴着密密麻麻谁也看不懂的英文标签，也有人得到了芦笋罐头。……我没有拿，但那比拿还要让我难受。我被巧克力深深地诱惑着，但出于自尊心我强迫自己不去接受，这种进退两难的复杂心理让我十分痛苦。

此外，大江还有过从占领军那里得到玉米片的经历。他回忆道：“在因失去信心而惶恐不安的孩子中，这种新食物引起了更加复杂的情绪变化。饥饿使我们产生了强烈的欲望……这种欲望越强烈，内心的屈辱感也就越强烈。”促使这种矛盾心理产生的，是当时的美国。[49]

但另一方面，美国又是傲慢的胜利者。仅日本政府为美军士兵暴行支付赔偿费用一事，在1950年就发生了1112件，1952年更高达2374件。而“受害人忍气吞声”的案例更多。1946年，在小仓[50]流传起“如果伤害美军就会被送到冲绳做奴隶”的谣言，这使得几乎所有人面对美军的暴行和强奸都选择了沉默。[51]

而当时的媒体则因为美军严格的审查而无法报道相关事件，只能在其文章中使用“大个子”、“黑皮肤的人”等词来暗示美军。除此之外，关于美军投放原子弹是何等残酷的报道也是当时审查的对象。《近代文学》就曾因刊登原子弹受害者原民喜的《原子弹》（后改名为《夏之花》）被内阁勒令停刊。[52]

因为当时的占领军拥有治外法权而不受日本政府管制，日本警察也对他们束手无策。虽然1952年4月《旧金山和约》开始生效，但与该文件同时签订的《日美安保条约》却丝毫没有让美军基地减少，并保证了美军及其家属继续拥有治外法权。《日美安保条约》时常被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比作幕府末期签订的不平等条约。

当时日本人还强烈地感觉到美国人的种族歧视观念。1951年1月，清水几太郎在其文章《日本人》中引用了美国社会学家博加德斯的调查记录。1725名美国人受访者在被问及“是否愿意与以下人种结婚”时，回

答愿意与日本人结婚的人仅占2.3%。关于这次调查，清水指出“日本人是亚洲人，与菲律宾人、土耳其人、中国人、朝鲜人、印度人，以及黑人和黑白混血儿一起排在了列表的最下面，并且相互之间在数值上并没有太大差距，不，应该说是全都接近于零”，并借此强调日本独立及亚洲各民族团结的必要性。[53]

在对美军的憧憬与反抗之中，最为日本人憎恶的便是那些通过与美军合作而得到好处的人。《近代文学》编者埴谷雄高曾回忆，“受占领军指使的日本审查科”是当时审查过于严格的重要原因。[54] 另外，如第二章中所述，大塚久雄也对那些利用从美军购物站（PX）搞到物资谋取非法利益的“黑市商人”十分憎恶。

从美军那里赚取利益的人之所以受到憎恶，也与他们的形象被当作当时“日本人”的象征有关。为纪念1952年4月《旧金山和约》生效，清水几太郎、高见顺和堀田善卫等人来到曾经作为美军军港的横滨，召开了一场互相交流感想的座谈会。高见在会议上认为，那些戴上美制钢盔成为美军住所门卫后就看不起周围老百姓的“黄脸小个子男人”，他们“才是日本国民”。清水也认为，“在亚洲各国看来，日本现在的作用就像那些门卫”，“吉田首相本人就像一个门卫”。[55]

此外，被视作日本从属于美国的象征的还有名为“邦邦女郎”[56] 的娼妓。对于那些因战争而没落的城市中产阶级和断送了前程的年轻人来说，美军在体格、权力及物质方面越是强大，他们内心的屈辱感就越是明显。日本女人与那些美军亲热的场面深深地刺痛了他们的自尊心。

日本宣布战败时还是一名中学生的山本明回忆道：“与美国兵魁梧的身躯相比，日本男性的身体是那么的羸弱。”他又回忆道，当看到日本女人从美军购物站走出时，“依偎在美国大兵怀里的日本女人神气十足地走了出来，而她们看日本男人时的眼神却仿佛根本没有将对方当人看”，“很难想象，不久前她们还在兵工厂戴着写有‘神风’字样的发带为

日军制造武器”。虽然女人们在战争中同样受到了伤害并承受了贫困与饥饿的痛苦，“但那些从美军购物站趾高气扬地走出来的女人们的身影，深深地烙在了我的记忆中而始终无法抹去”。[57]

1953年1月，在日本教职员工会（简称“日教组”）第二次教研大会上，美军基地周边学校的教师们提出，许多中小学生都有诸如“邦邦女郎穿着打扮时髦，太好了。她们还能从美国人那里得到钞票和巧克力，我真想像她们一样”，“我到了横须贺，看到美军和‘邦邦女郎’在用英语交谈，真羡慕她们能讲英语”等想法。此外，在美军基地附近的学校中，还看到过“一些学生因为从美军那里得到糖果后得意扬扬地跑到学校，而被老师声泪俱下训斥”的场景。[58]

在这种社会状况下，1949年8月，日本游泳选手古桥广之进在美国举办的全美游泳锦标赛中刷新了世界纪录，这一壮举立刻受到了高度赞誉。虽然古桥在回国后表示，“实际上，在到达那边（美国）以前，作为战败国国民的我心中一直惴惴不安”。这次锦标赛是战后日本广播协会（NHK）首次通过广播实况转播海外赛事，街头广播喇叭的周围挤满了人。三个月后，物理学家汤川秀树又成为历史上第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日本人，这件事也作为要闻被反复播报。耐人寻味的是，当时的报纸除了对汤川获奖大加赞扬外，还附上了题为《何为诺贝尔奖》的说明。这是因为当时的人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诺贝尔奖，其喝彩只是由于汤川“战胜”了欧美。[59]

与此同时，与美军基地的扩张进行斗争的农民及渔民也得到了广泛的同情和支持。1954年，清水几太郎在参观当时被认为是反对美军基地斗争典型的石川县内滩村时，形容该村“仍像是一名纯洁的处女”，而将横须贺及横滨等城市形容为“靠美军活着的不知廉耻的女人”。[60] 1954年，美国在比基尼环礁进行的氢弹实验导致日本渔民死亡，这一事件同样作为美国的种族歧视而遭到谴责。根据日教组教研大会的报告，在发

生过反对基地扩张斗争的东京都立川市砂川地区，认为“反对基地扩张是爱国行为”的人占72%，而认为“反对基地扩张并非爱国行为”的人只占4.9%。[61]

1953年1月，井上清等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合著的《现代日本的历史》出版，战后美军基地的扩张在该书中被形容为“日本本土遭受了美军的践踏”。井上等人认为：

> 就连日本民族自古以来所深深热爱着的富士山地区现在也建立了演习场，并在不断扩张……日本人自《万叶集》时代以来所深爱着的名山也被从自己的手中夺走，这种国民的真实感受是无法掩饰的。……
>
> 只要有美军的地方，地产中介和随之而来的“邦邦女郎”便会趋之若骛。肮脏的卖淫场所一家挨着一家，附近居民住所也突然变成“邦邦女郎”的栖身之处。失去土地的农民也不得不将房子出租给“邦邦女郎”。……在1951年日本的各种外汇收入中，色情产业的收入以2亿美元仅次于美军的特需订购排在第二位……这大概相当于生丝出口额的三倍。日本俨然成为“邦邦女郎”的国度，日本经济正在“邦邦女郎”经济化。1950年4月，池田藏相公开指出日本已经成了美国的侧室，因为是小妾所以不得不尽可能地献媚于夫君，而日本的发展的确正在印证着他的观点。[62]

从以上引文也可以看出，人们对“邦邦女郎”的反感与对政府的反感是共通的。1953年，根据一名原美军翻译收集到的“邦邦女郎”日记编写而成的《日本的贞操》出版，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书中指出，美军的暴行、与美军勾结的日本生意人以及警察是“贞洁”的日本女性沦为“邦邦女郎”的原因。在其续篇中，还强调日本政府在战争结束后不久为美军设置的“慰安所”是“邦邦女郎”的起源。据说，这本《日本的贞操》在反对美军基地的斗争中经常被传阅。[63]

这种观点与其说是单纯的反美情绪，不如说同战败初期对军部的反感一样，是他们所谓“主体性”的一种表现。如前所述，丸山真男曾对“没骨气的邦邦女郎的劣根性”进行批判，他认为“日本是在民族主义

方面唯一一个已经失去处女性的国家”。这种有关性方面的比喻频繁出现，可以说反映了因战争及战败受到创伤的日本男性试图恢复自尊心及民族认同的心情。

此外，“邦邦女郎”一词也涉及贫困的问题。《日本的贞操》中强调，战后成为“邦邦女郎”的妇女大部分是贫困所迫。前述日教组的报告中也提到：“在因贫困而无法过上稳定生活的家庭中，有时父母会强迫女儿去做邦邦女郎赚钱。”[64]

当时，贫困问题的解决与和平运动是一体两面的。日教组机关报《教育评论》曾于1952年刊载一部教育连环画，其目的是让儿童了解战争所带来的灾难。其中被着重强调的，是“战争使所有日本国民陷入了贫困”。各地模仿《山彦学校》进行了收集基地周边儿童作文的运动。1953年出版的作文集《基地的孩子》中，也多次提到因父亲战死而陷入贫困的家庭向“邦邦女郎”出租房屋的事。[65]

因此，在当时的和平论中，贫困被认为是战争的真正原因。按照教育学家宫原诚一的说法，“恢复生产与拥护和平是一回事”。[66] 1950年8月，在朝鲜战争爆发这一背景下，作为自卫队前身的警察预备队进行了第一次招募，居然有38万人来竞争7.5万个名额。大部分应征者是农家的次子或三子以及失业者，其目的主要是获得比一般公务员更高的薪水和养老金。这种现象立刻让人联想起世界经济大萧条后满洲事件[67] 的爆发。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这再次唤起了许多人对数年前刚刚结束的战争的记忆。朝鲜战争爆发时年仅19岁的佐藤忠男回忆道：“当时的确十分担心日本恢复征兵制，因为正值从军年龄的自己很有可能被征召入伍并派往前线。”[68] 此外，据大江健三郎回忆，在他中学时代所居住的城市，也流传过中学生会被抓到一起进行特训后派往朝鲜的谣言。

当时，多数人认为《日美安保条约》与美军基地的存在，是使本可成为非武装中立国家的日本再次卷入战争的真正隐患。在这一背景下，美军基地既是憧憬的对象，也成了让人恐惧和反感的对象。

此外，这种反美论调又与前述的人们对亚洲民族主义所产生的共鸣结合在了一起。清水几太郎和宫原诚一等人编著的作文集《基地的孩子》的序言中写道：

> 最令读者们担心的是孩子们向美军索要巧克力和口香糖的样子，这可能是因为孩子们的样子怎么看都像是在乞讨。每当我阅读描写孩子们当时样子的作文时，几乎都会忍不住流下眼泪。日本的孩子穷。是的，无论在物质方面还是精神方面都是这样。假如精神方面足够充实并且对和平及独立拥有坚定信念的话，那么即便物质方面十分匮乏也不会做出这种乞食一般的事。
>
> 孩子们的苦难，其实也反映出居住在基地周边的大人们的无奈和心酸。那些对美军基地怀有憎恶感的孩子，他们的家长却是依靠基地才得到一份工作，甚至有的孩子的母亲居然也成了“邦邦女郎”，当然这些人也因此摆脱了贫困。憎恨美军基地的孩子们，实际上却间接地寄生于美军基地。仔细思考一下就会明白，亚洲各民族长久以来作为殖民地民族一直被置于这种错综复杂又自我矛盾的关系之中。如今，亚洲各民族已经结束了这段屈辱的历史并走上了美好的独立之路，而长久以来一直蔑视亚洲各民族的日本国民，却在这时沦为殖民地。[69]

当时，将日本定位为美国“殖民地”的观点通过左派推广开来。日教组教研大会报告中，也将基地周边的社会风气问题形容为具有“腐蚀日本儿童的殖民地性”。在这种情况下，指出日本处于“美帝国主义占领下的半殖民地状态”，并主张效仿中国共产党开展民族独立斗争的是日本共产党。

日本共产党的民族主义

如第Ⅰ部中所述，日本共产党在1948年3月开始提倡建立民主民族

战线。1948年8月，因工人占领东宝电影公司而引发的骚乱遭到日本警察及美国占领军的镇压，而当时抗议这次事件时所使用的口号是“保卫民族文化”。[70] 1948年5月12日，《读卖新闻》以《秉承极右势力传统的共产党的“民主民族战线”》为题，刊载了某位外国记者所谓“作为日本极右势力曾经惯用的伎俩，‘依靠民族的血’这一陈旧战术如今已运用在各种场合”。[71]

虽然如此，但1940年代日本共产党的反美主义事实上并不十分强烈。这一点同样如第Ⅰ部中所述，日本共产党在战后初期将美军称为“世界人民解放军”，认为在美军占领下的日本开展和平革命是有可能的。虽然1947年经历了“二·一大罢工”的挫折，但日本共产党还是在1949年1月的众议院大选中实现了35个议席的飞跃，这使得对于和平革命可能性的乐观预测变得十分普遍。

然而随着冷战的激化，日本国内的情况悄然发生了变化。在1949年下山事件、三鹰事件、松川事件发生后，特别是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之后，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遭到了整肃，其机关报《赤旗》被勒令停刊，各政府机关、新闻机构以及重要产业部门也相继开展“清共”活动。这使日本共产党开始进入与占领军对立的阶段。

除此之外，“来自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Communist Information Bureau）的批评”也对日本共产党造成了冲击。1950年1月，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以下简称“共产党情报局”）机关报刊登的一篇文章，对日本共产党的和平革命路线进行了批评，并要求加强针对“殖民地掠夺者”“美帝国主义”的斗争。[72] 这篇批评文章虽然以不署名的方式发表，但据说执笔人就是斯大林本人，其目的是在朝鲜战争即将爆发之时迫使日本共产党与美国全面决裂。

面对共产党情报局的批评，日本共产党内部分裂成以德田球一为中心的“所感派”[73] 和以宫本显治为中心的“国际派”。此后两派不断围绕

全国各地的支部进行争夺，并通过各自的机关报发表针对对方的批判文章，最终在成为主流派的所感派的主导下，放弃了和平革命路线。1950年3月，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了《为民族独立告全体人民书》。此后不久，日本共产党便在内部矛盾重重的情况下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革命道路。

这份声明的特点，在于对“民族”一词的强调达到了极端的程度。[74] 声明中强调，美帝国主义及美国资本造成了日本的“殖民地化”与“军事基地化”，并威胁着“民族独立”。为了打破这种现状，日本共产党主张民族独立斗争应优先于阶级斗争，与对抗美国资本的“民族资本家”合作，通过团结“全国的爱国者”来结成民族解放战线。对于美国主导的旧金山媾和，声明指出“不过是为了保住自身利益及地位而将我民族出卖给外国资本”，这是保守政权及垄断资产阶级的阴谋，为了与这些“卖国势力”进行斗争，“凡是日本人”即“我国人口的95%都会支持这个纲领”。

此外，这份声明中还强调美国文化的渗透导致“健全的、民主的日本民族的文化受到压迫，取而代之的则是外国堕落的、殖民地性质的文化充斥”整个社会。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日本共产党主流派旗下的文化团体开始赞扬“民族文化”，并对迎合美国文化侵略的“世界主义”及“近代主义”进行批判。

例如1951年5月，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为中心的历史学研究会召开了以“历史上的民族问题”为主题的大会。会上做报告的古代史学家藤间生大讲道：

> ……除一部分买办资本家外，殖民地化所形成的隶属关系已成为包括资本家、工人、农民等所有人的危机。……
>
> 应对这种民族危机，需使全民族拥有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了解民族形成所经历的艰苦历程并引以为戒，从而巩固当前的民族团结。
>
> 而充满世界主义与近代主义等思想的教养主义，则使人民大众在外国

人面前怀有过分的自卑感，并阻碍了民族团结。……我民族的历史及其成果，绝对值得骄傲。[75]

在这种思想潮流影响下，茶道、插花、大佛等作为“民族文化”得到了赞美，日本武尊[76]则被奉为民族英雄。与此同时，重新评价民间故事及民谣的主张也相继出现，叙述民族（民众）历史的“国民历史学运动”席卷了史学界。在文学界，《万叶集》的“人民性”及近松门左卫门的“民众性”得到了重新评价，石川啄木及国木田独步的作品作为“国民文学”也得到了广泛讨论。反之，那些反对这种赞美“民族文化”的人则被视作追随西方的“近代主义者”和“世界主义者”并遭到批判。其经过将在第八章中详述。

以上这些运动虽然也包含了人们不懈的努力，但更多的则是迎合了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潮流。例如，1949年10月在东德提出的《民主德国的民族战线》决议中，就包括“统治世界思想的拥护者们妄图侮辱德意志民族（一个诞生过马丁路德与闵采尔、席勒与歌德、巴赫与贝多芬、海格尔与费希特、洪堡特与比尔霍夫、马克思与恩格斯、倍倍尔与台尔曼的民族）的民族感情和民族自尊心”的内容。[77]而对石川啄木及《万叶集》的重新评价，实际上就是这一路线的日本版。

说到对日本影响最为深刻的，还要算中国共产党的文化政策。在1951年的《历史学研究》中，马克思主义中世史学家松本新八郎以《如何保护民族文化》为题，提出应当保护文化遗产。松本指出，“强制推行殖民地政策正在破坏民族的文化与传统”，“国宝松山城雪白的墙壁因外国登楼者的乱写乱画而成了灰色，遭遇同样命运的国宝熊本城也成了娼妇过夜的地方并因此时常发生火灾”。他认为：“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方法等也值得参考。”[78]

在这种情况下，针对战后改革的看法也逐渐偏向于批判。日本共产党原本就反对《日本国宪法》并对占领军不够彻底的改革政策持批评态

度，而这种倾向从1950年开始变得越发强烈。

例如，井上清等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在1953年撰写的《现代日本的历史》中，对“自战后初期在文化、思想方面实施的美式愚民政策”进行了批判，将日美安保条约与地位协定形容为“使日本在地位上成了‘法国的越南、美国的菲律宾’”。除此之外，他们还认为吉田茂首相是“卖国贼”、“小妾”，天皇不过是“为美国擂鼓助威的人”，并指出针对“真正爱国者”日本共产党所进行的镇压是“使日本成为美国奴隶”的“卖国法西斯主义”行为。[79]

在这种情况下，不仅长久以来饱受批判的“市民”，就连具有正面意义的“人民”也不得不让位于“国民”及“民族”。1951年10月，日本共产党第五届全国协议会上进行了党章的修改，决定将此前党章中所使用的“‘人民’一词全部替换为‘国民’”。[80]

1952年5月1日，《旧金山和约》生效后的第一个劳动节，发生了被称为“血色劳动节”的流血事件。大约5000名警察对拥向皇居前广场的数万学生及工人开枪射击，游行队伍中死亡2人，轻重伤约500人。当时，警察部队面对游行队伍厉声质问：“你们这些人到底还算不算日本人！”而日本共产党将这次游行形容为“伟大的爱国斗争”，称赞被枪杀的学生为“民族英雄”。[81] 从那时起，保守与革新的“爱国”便开始了正面交锋。

在当时的革命歌曲中，《民族独立行动队之歌》等被广为传唱。1948年7月，当占领军要求颁布禁止公务员参加罢工的第201号政令时，一部分国铁的工人组成“民族独立青年行动队”强行进行罢工，该歌曲就是取材于这段历史。[82]

这种左派民主主义的论调，在某些地方有些类似于“鬼畜美英”及“解放东亚”等战争时期使用过的词。而且，在当时甚至有“从特攻

队到共产党”这样的说法，曾经的“皇国少年”加入日本共产党的例子屡见不鲜。例如，当过少年航空兵且酷爱阅读日本浪漫派书籍的高田佳利就有过如下回忆：

> 以战败为契机，右翼开始较为顺利地向左翼转变。这是由于战争期间以少年航空兵为代表的民族浪漫主义迅速转变为以民族重建为口号的战后左翼运动，二者又都强调小我服从大我。所谓个人，是无足轻重的。我在战后所依靠的伦理意识是所谓“生命的意义并非为了活着，而是被赋予某种寄托”，是肩负死去战友的灵魂，承担起建设祖国重任的一种罪恶感……我认为自己的行为一直是在这种类似原罪意识的驱动下进行的。[83]

这里可以看出，在“公”取向的表现形式因战败而消失后，共产党作为另一种路径成为替代品。在战后初期的民主化进程中，“民族”一词就像“总体战体制”一词曾经作为载体被提倡一样，在表达路径发生转变时起到了载体的作用。

对于此种现象，批评家江藤淳曾略带批判性地加以描述。他提到，战争期间在自己就读的小学里，曾有几名代课教师为了灌输忠于天皇的思想而殴打学生，“他们的眼睛十分美丽而清澈”。然而，当自己战后再见到这些人时，“他们正在卡车上挥舞着红旗，大声发表为日本共产党进行选举的演说。而他们的眼睛仍旧是美丽而清澈的，这让我有些吃惊”。[84]

然而，当时的日本共产党也并非得到了各界的一致支持。在美军眼里，当时的日本是朝鲜战争的出兵、补给基地，是西方阵营在远东的战略要冲。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共产党的武装斗争路线严重扰乱了美军后方。因此，将名为山村工作队的青年组织派往全国各地、依靠燃烧瓶和爆炸物开展斗争等日本共产党的做法，不但遭到了警察的镇压，而且因为给人留下了过激组织的印象而形象大损，最终导致日本共产党在一般民众中的支持率大幅下降，其选举成果也由1949年的35个议席降低至1953年的1个议席。

当时的日本共产党系活动家一直处于警察的监视之下，甚至没有在游行时高举标语牌的自由。在观看1953年由龟井文夫导演、山田五十铃主演的描述煤矿工人暴动的电影《一个女矿工》时，满场的日本共产党党员及活动家在影片播放至高潮时齐唱《民族独立行动队之歌》。对此，当时的学生活动家山本明回忆道：

> 当时，这首歌曲无法在街头、旅店、公司等公共场所演唱。我们这些学生虽然可以在自治会的房间里唱，但也只有在那里。而电影院里正在用大音量播放这首歌曲。我不禁流下了眼泪。不经意间，发现旁边的男人和前面的女人也在擦拭着眼泪。不久，电影院里的所有观众都开始随着节奏齐唱起来。……
>
> 那些在电影院里边哭边唱《民族独立行动队之歌》的年轻人及学生，是这个时代中被权力迫害的少数派及弱者。在只有随着电影院的伴奏才能歌唱的遗憾与在这种场合才能获得的解放感之中，大家流着泪水歌唱着。[85]

然而，这种认同感即便在日本共产党党内也没能完全普及。在1950年遭到共产党情报局批评之后，所感派与国际派之间多次互相指责对方搞“宗派活动”、“分裂党的活动”，而当1951年8月共产党情报局表示支持所感派后，国际派便失势了。执掌党中央的所感派开始审查被怀疑是国际派的党员，强迫其做出自我批评或将其直接除名。

这种审查不断发生，是由于老资历活动家的疑神疑鬼。那些在战前有过运动经验的人，对自己或朋友因特高警察的密探打入党组织内部而遭到逮捕的经历仍然记忆犹新。哲学家古在由重说过：“难以相信别人的毛病，就是来自这种经历。”[86] 实际上，就在1952年6月还发生过密探叫来警察使日本共产党党员成批遭到逮捕的“菅生事件”[87] 。党的干部和老资历活动家可以说就是因此而疑心骤起。

日本共产党旗下的文化团体，就直接受到了这种冲击的影响。例如在文学团体中，由于新日本文学会的领导权掌握在国际派手中，所感派

作家纷纷脱离该团体并于1950年10月创办了《人民文学》杂志。

据当时在《新日本文学》编辑部工作的秋山清回忆，《人民文学》对《新日本文学》的中伤和破坏十分激烈，“如将偷盗来的《新日本文学》配送名单用来发放《人民文学》，假装订阅杂志，待收到之后又将其烧掉，称其为反动杂志并阻止支部及他人购买”等，手段层出不穷。[88] 为了革命不择手段这种错误的政治思想以及文坛的同室操戈等都在这次党内斗争中凸显。

而双方斗争最丑陋的表现，是围绕1951年1月宫本百合子的突然去世展开的。国际派核心人物宫本显治的妻子宫本百合子，是一位在党内备受赞誉的作家。然而随着日本共产党的分裂，所感派旗下的《人民文学》便以“披着党员外衣的小资产阶级作家”、“破坏决定民族命运的党组织的异类分子”、“寄生于资产阶级文坛，拥有成功维持资产阶级生活才能的骗子”等言语开始对其进行谩骂。[89]

在1951年5月宫本百合子追悼会召开时，所感派的共产党临时中央领导层发起了“全民抵制”的呼吁，而新日本文学会一方则进行了反击，情况就像是一场互相拆台的比赛。当国际派失势时，新日本文学会领导层的中野重治和滓川鹤次郎等人便被批判为“最恶劣的宗派主义者”。

这种残酷的斗争逐渐扩展到各个团体。在全学联[90]，国际派的武井昭夫委员长于1952年3月被逐下台。关于当时的情况，据学生党员吉川勇一回忆，当全学联第五次大会在京都召开时，主流派的学生党员曾对反对派施暴，“不仅仅是拳打脚踢，还包括拿烧红的火钳烫，甚至发生了轮奸女学生并强迫其做自我批评”的事情。[91]

前文中提到的少年航空兵高田，也在1951年后因遭到同志们的批判而离党。这种内部纷争以及此后的武装斗争使党员数量锐减为当初的几分之一，大量党员及日本共产党支持者开始不再参加活动。

在共产党情报局的指示下转向武装斗争，是日本共产党失去一般群众支持的另一个原因。当时，“民族独立”这一主张在其他革新势力中也属于普遍现象，而并非只存在于日本共产党。因此，从属于共产党情报局的日本共产党就成了众矢之的。因共产党情报局的批评而陷入内部斗争的混乱局面，导致了对日本共产党幻想的破灭。

在这种情况下，年轻党员们仍根据党的指示继续开展武装斗争及农村工作。然而，这些也在不久之后便结束了。从1954年开始，日本共产党逐渐表现出调整方针的迹象。而随着1955年7月第六届全国协议会即“六全协”的召开，武装斗争路线被彻底放弃。

1955年的转变

六全协的召开，为日本共产党的党内斗争画下了休止符。转入地下的党的领导人也开始露面，所感派的头号人物德田球一被证实于1953年客死中国，而宫本显治等原国际派干部则相继恢复了在党内的领导地位。

在六全协的决议中，“为实现民族独立而斗争”的方针得到了延续。不过此前的武装斗争路线被视为“极左冒险主义”而放弃，取而代之的是以被称为“歌声运动”的歌曲合唱活动争取支持者，从而通过选举重返议会。

日本共产党的这种变化，看起来是顺应了国际潮流。1953年，斯大林的去世及朝鲜半岛的停战使因朝鲜战争而升级到武力冲突的东西方冷战有所降温。领导人变为赫鲁晓夫的苏联共产党，开始主张与资本主义阵营的“和平共处”。这种变化被称为“破冰”，而日本共产党也随着这种国际形势的变化而开始转变方针。

这种转变给许多党员带来了冲击。以往不顾一切地执行的武装斗争

路线被日本共产党自身否定，青年党员在接到开展“歌声运动”的命令后灰心至极，许多人纷纷离党。

前文发生在电影院中的一幕中提到的山本明，也是在这个时候离党的。据他回忆，“面对‘以往的方针是错误的’决议，学生党员先是哭，接着大喊大叫，不久便虚脱了。无论是作为山村工作队下乡，还是作为‘地区委员’被派往远方的人都神情恍惚地回去了。大声悲愤叹息的同志也不在少数。大家都坐下抱着膝盖，失魂落魄地看着小说”。[92] 此后，作家仓桥由美子的《政党》和柴田翔的《别了，我们的生活》等作品不断涌现。

然而在学生党员中，除了反省之外，还有些人做出了其他选择。他们看透了日本共产党，着手创建新的左翼政党，即所谓的“新左翼”。

这种新左翼的开端，是共产主义者同盟。该组织的书记长是曾在“血色劳动节”中冲在游行队伍最前面的东京大学学生岛成郎。然而因所属于国际派，他也曾被强迫写过自我批评。当六全协的报告分发到东大支部时，他“愤怒地大声”喊道：“我这五年都干了些什么。自我批评搞宗派也有错，那到底什么才是正确的？”[93]

1958年，东京大学、京都大学、早稻田大学等校的学生支部开始脱离日本共产党，日本共产党方面也将大批学生党员开除出党。1958年12月，被开除党籍的学生党员拥护岛成郎为书记长，组建了共产主义者同盟。在这种背景下诞生的新左翼开始批判改走稳健路线的日本共产党，并主张开展更加激进的直接斗争。他们还反对日本共产党的“民族战线”方针，这使当时民族主义的相关言论发生了变化，相关内容将在第III部中详细讨论。

当时，共产党权威的减退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六全协召开后的第二年即1956年，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使斯大林的神化被苏共自身否

定。同年，苏联军事干涉匈牙利的反政府运动，使苏共成为众矢之的。

如第Ⅰ部中所述，日本共产党的精神权威源于狱中的宁死不屈和无懈可击的神话。简而言之，就是许多人在战争期间不断转向，而只有日本共产党一直坚持其“主体性”。然而，这种神话在日本共产党因共产党情报局的批评而不断转换方针之后，便彻底地破灭了。虽然整个日本共产党追随共产党情报局，但对下级党员的态度却给人一种类似于天皇制的权威主义的印象。

更加令众人失望的是，日本共产党虽然承认了自己1950年代前期在方针上的失败，却未能追究党内干部的责任。分裂期斗争的责任多半被归咎于客死他乡的德田球一一人，而实际上并未涉及整个日本共产党在组织和体制上的问题。

六全协召开后，日本共产党的机关刊物《前卫》曾刊载了题为“文化问题”的特辑。其内容主要是《新日本文学》和《人民文学》成员等党内知识分子及文学家，对自己在1950年代前期的行为进行自我批评。然而这种内容与数年前互相谩骂的斗争性文章截然相反，是非常暧昧的自我辩护。[94] 这种态度再加上免予追究责任的日本共产党干部的态度，不禁让人想起东京审判时当政者们的“渺小”。

在日本共产党权威下降的同时，言论界对战争责任的追究开始抬头。这一时期的战争责任论的最大特征，是较之当时的当政者，许多人更主张追究那些知识分子，特别是日本共产党系及进步派知识分子在战时如何转向以及是否有协助战争的行为。

1956年前后，是战败以来逐渐被人们所淡忘的战争责任问题再次受到关注的时期。首先是1955年11月，吉本隆明在其发表的《上一代的诗人们》中讨论新日本文学会中起中心作用的诗人的协助战争行为。之后，鹤见俊辅在1956年1月发表的《知识分子的战争责任》中，主张应

弄清进步知识分子的协助战争行为。1956年3月，丸山真男也在其公开发表的文章《战争责任论的盲点》中表示，只要日本共产党还算是个政党，那么在其领导的运动发生错误而又没能阻止战争发生这一点上，便存在“领导者所应承担的责任”。[95]

根据石田雄的回忆，丸山之所以主张追究日本共产党“领导者所应承担的责任”，与其所认识的一名东大职员工会女职员在1952年“血色劳动节”时遭到逮捕有关。[96] 当天的游行结束后，队伍中出现许多死伤者，甚至在那些希望进行和平游行的参与者中也有人被捕，丸山所质疑的便是领导此次游行的日本共产党是否意识到了自己应负的责任。也就是说，丸山名为讨论历史上的战争责任，实则是在影射当时日本共产党的政治责任。

以追究战争责任的形式讨论现代的政治责任，采取这种方式的人并非只有丸山一人。1956年，曾因属于“国际派”而被赶下台的原全学联委员长武井昭夫与吉本隆明一起，撰写了《文学家的战争责任》，以追究共产党系文学工作者协助战争的行为。二人在书中所主张的，是战后初期《近代文学》所尝试的追究战争责任的不彻底，决定了此后日本共产党的体制及失败。

此外，吉本在1958年撰写的《转向论》中，还批评那些在狱中没有转向的日本共产党干部不过是无视日本的现实、一味固守共产主义思想的人。如第六章所述，福田恒存在1947年发表过类似的意见但没能得到支持。然而在1958年，吉本的主张得到了已对日本共产党失去期望的知识分子、学生及新左翼的极大支持。

所谓战争责任的追究，无论是在战后初期还是在1950年代后期，都被作为确立“主体性”的手段。战后初期对战争责任进行追究，是为了形成对抗大日本帝国权威主义的“主体性”。而在1950年代后期，知识分子们则是为了在日本共产党的精神权威下实现自立，而重点对日本共产党

系知识分子的战争责任进行了追究。

不过这一时期对战争责任的追究，其性质并不只是对知识分子与日本共产党之间的关系进行反省。鹤见俊辅在其组织的针对“转向”问题的共同研究中，也提到一些政治家与军人的转向。此外，丸山在《战争责任论的盲点》中同样指出，“只谈知识分子，尤其是‘进步’知识分子的责任显然是不全面的，并最终会助长带有恶意的人身攻击”，并指出天皇的战争责任是另一个“盲点”。此外，他还对“政界及财界对战争责任一词置若罔闻”的现状提出反对。[97]

丸山撰写《战争责任论的盲点》的1956年，正是战败后被解除公职的鸠山一郎当选首相的时期。而次年1957年，日美开战时曾任商工大臣，后被定为甲级战犯的岸信介又成为首相。不只是鸠山和岸，通过朝鲜战争爆发后的解除整肃以及1952年《旧金山和约》生效后日本政府恢复施政权，战后初期被迫淡出政财两届的人物陆续东山再起并逐渐站稳脚跟。

1955年，不仅在日本共产党内部，整个日本政界都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重组。就在六全协上日本共产党做出放弃武装斗争路线这一决定前后，因围绕重新武装问题争论而分裂的左右两派社会党实现统一，成立了日本社会党。为与其对抗，保守政党方面的自由党与民主党也合并，成立了自由民主党。所谓“五五年体制”这一日本政治格局，便是形成于这一时期。此外，在1956年的《经济白皮书》中，出现了“已不再是‘战后’”这一流行语。

可以说，这是一个“战后”的终结，同时又是另一个“战后”的开始。正如日本共产党放弃武装斗争所意味的那样，以革命和黑市交易为象征的动荡的“战后”在战败十年后走到了尽头。取而代之的，是以经济高速增长和“五五年体制”为象征的稳定繁荣的“战后”。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战后民主主义”一词出现于这一时期之后。战后初期的“民主主义”是为了打破旧的秩序，是变革的象征。当这个急剧变动的“战后”结束，“民主主义”因“五五年体制”而成为议会政治中有名无实的一个常用词时，“战后民主主义”一词便应运而生了。

而且，这种“稳定与成长的战后”，其开端以鸠山一郎与岸信介这样的战时领导人的复出为背景。即便是放弃了革命路线的日本共产党，其战前以来的领导人也在没有明确自己责任的情况下，试图成为已经名存实亡的“战后民主主义”的一部分。而对这种现象的反对，是以追究战争责任的形式出现的。

“私”的变化

然而，1955年开始发生变化的不只是政界。随着经济的复苏和高速增长，人们生活方面的变化也十分显著。

以朝鲜战争的“特需景气”为背景，战败后荒废的日本经济开始奇迹般地复苏。美军订货所产生的“特需”约占出口总额的六成，矿业生产从1949年至1953年增加了两倍以上。这些经济指标已经达到了战前水平，并为1950年代后期的经济高速增长奠定了基础。“已不再是‘战后’”这一出现于1956年《经济白皮书》中的词语，根据的便是以上这些事实。

在生活方面的变化也十分显著。1955年，作为电冰箱、洗衣机、电饭锅（之后换成吸尘器）这三样家电的统称，“三种神器”一词出现。方便面和中性洗涤剂在1958年出现，第一款国产小轿车也于1959年开始销售。[98]

在“神武景气”与“岩户景气”[99]的影响下出现的“三种神器”（这个名词的出现与当时在人们脑海中根深蒂固的战前语言使用习惯有关）迅速进入了寻常百姓家。

与此同时，大众传媒也在不断发展。电视广播始于1953年，1957年电视机拥有量已经超过100万台，1959年4月举行的皇太子婚礼使电视机的普及率出现了一次爆炸式增长，1962年3月的销售量更是突破了1000万台大关。此外，当时还出现了以1956年2月创刊的《新潮周刊》为代表的周刊热。

在日本共产党六全协召开的1955年7月，石原慎太郎的小说《太阳的季节》问世。这部描写年轻人奔放消费文化的小说翌年获得芥川奖并成为最畅销小说，还作为电影题材被搬上荧幕。有评论家对其内容做出了诸如“殖民地日本的某种‘上流阶层’的子女们，误解了自由的真正含义而毫无目的地活着”的评论。对此石原则表示，自己更重视“实际感受而不是什么大道理”。[100]

以上这些过程，确实改变了日本社会。尤为明显的是乡村与城市以及各阶层间的文化差异缩小，社会出现了“单一化”。关于这一点，社会学家山本明认为：

> 电视的影响随处可见，其中首屈一指的是生活文化方面的城乡差距在逐渐缩小。……电视与周刊形成了固定的大众文化，这种统一的文化在日本全国各地得到了普及。
>
> 大众文化通过电视及周刊由城市扩散至乡村。与此同时，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与城市文化向乡村的渗透的影响同样惊人。首先是食品的均一化。例如，牛肉、火腿、香肠、奶酪等食品战前只有在城市才能买到，而当大型食品制造商将这些作为大众商品开始销售时，乡村上的小卖部虽然规模不及大超市，却也在出售。同时，这些商品通过全国性报纸和电视广告逐渐为众人所熟知。也许现在的人们无法想象，但根据我的谈话调查，在1950年前后的乡村很少有人知道火腿、香肠及奶酪是什么。但1955年以后，回答吃过以上食品的人已不在少数。……
>
> 除食品的均一化外，娱乐的均一化也在发展。……首先，乡村的特色不如从前明显了。例如，在1930年日本广播协会进行的观众调查中，浪花曲排在观众最期待节目的第一位，而到了1955年却只有九州的一部分爱好

者才会关注这个节目了。……

> 大约在同一时期，文艺下乡演出也逐渐消失。我第一次看到文艺下乡演出是战时被疏散到乡下时，地点是乡村的戏院兼电影院。……我记得自己在京都最后一次看到下乡表演队伍是1955年，而在乡下则是1959年。[101]

同一时期还发生了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及农业人口减少的现象。就业人口中农业人口所占比例1950年是45.2%，1960年下降至30.0%，1970年则骤减为17.9%。与此相反，1945年仅占全国人口28%的城市人口则在1970年升至72%。这些刚刚来到城市的人，逐渐形成了不同于以往平民社区的社会。据说，“团地族”一词在周刊上首次出现是在1958年。

当然，以上这些现象使日本人的自我印象发生了很大变化。加藤秀俊在1957年出版的《中间文化》中认为，“穿着沾满油污工作服的强壮的工人”等不过是虚构的形象而已，并认为在超越阶级的“单一文化”的影响下，工人和农民也在逐渐接近“上班族电影中的主人公”。[102] 第六章中提到丸山真男在1947年曾将“上班族”形容为日本社会的少数派，而这种现象因时代不同的确正在发生变化。

其中应该注意的，是加藤将这种变化形容为“中间性大众化＝新市民阶层的诞生”。自这时起，“市民”一词迅速普及，并不再是“资产阶级”的代名词。

加藤同时强调，像自己一样20多岁的年轻人，与那些30岁以上的战后知识分子的中坚力量在意识上存在很大差异。1930年出生的加藤在1957年应该是27岁，可以说是和石原慎太郎几乎同时代的年轻学者。加藤认为，年长的知识分子所谓的“孤立”于民众这一“苦恼”是“无法理解”的，并表示“就我自身而言，作为一名普通市民的意识要比认为自己区别于大众的意识强烈得多”。

在日本人的自我印象发生变化时，日本对其自身在国际社会中所处

位置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从大塚久雄及川岛武宜的主张便可以看出，在战后初期，批判“日本封建制”具有“亚洲性”的“日本论”占多数。然而到了1957年，梅棹忠夫发表了题为《文明的生态史观》的文章，将世界分为“第一地区”与“第二地区”。梅棹认为，第一地区包括经过封建制后成功创建现代文明的西欧与日本，“第二地区”则是从专制帝国变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与中国。[103] 即便从传统文化方面看也应将日本定位于“西欧”，这种观点在已经进入经济高速增长期的日本社会得到了广泛支持。

在这样的背景下，存在于1950年代前期的词语——“民族”，其社会背景开始急速消失。与此同时，另一种意识方面的变化出现了。这就是“公”与“私”在意识方面的变化。

战后设立的统计数理研究所，1953年以后每隔5年进行一次民意调查。其中有一个关于“最理想的生活方式”的问题，包括“努力工作，积累财富（财产）”、“认真学习，出人头地（名誉）”、“淡泊名利，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兴趣）”、“得过且过，无忧无虑（安乐）”、“除暴安良，政治清明（清廉）”、“舍己奉公（社会）”六个选项。

社会学家日高六郎在其1980年的著作中指出，以上六个选项中人们对“财产”和“名誉”的重视没有随时代而发生变化。日高还将“兴趣”与“安乐”定义为“重私”、“清廉”，将“社会”定义为“重公”一并进行分析。[104] 结果表明，“重私”的比例从1953年的32%至1973年的62%，一直处于上升趋势。与此相对，“重公”的比例则从1953年的39%不断下降至1973年的16%。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1953年“重公”所占比例仍高于“重私”，但二者在1958年发生了逆转，在该年的调查中，“重公”所占比例为29%，而“重私”则达到45%。

日高将这种变化称为“民主主义”向“经济主义”的转变，对此他在书中写道：

> 从“克己奉公”到“假公济私”，在谈到战前以来日本人的意识变化时，我曾对年轻人这样简单地说明过。当然，简单的说明可能会存在片面性。
>
> 我想向年轻人强调几点。战后初期，人们对军国主义时代的“克己奉公”最终以悲剧收场表示极大的愤慨。年轻人对“克己奉公”开始不屑一顾，并迅速转变为“假公济私”的黑市式价值观。
>
> 与此同时，出现了新形式的“克己奉公”，即从特攻队到日本共产党。出狱后的德田球一应他人要求书写竞选海报时，经常会加上一句“毫无保留地献身”。我能够理解离开特攻队后加入日本共产党的年轻人的心情。然而，现代的年轻人即便能够理解黑市式的价值观，也无法理解“毫无保留地献身”的含义了。[105]

战后，“从前现代到现代”成了一个标语。激进自由主义者主张“个体的确立”。进步政党及工会的领导人（大部分为马克思主义者）则高喊“工人的权利”。当然，无论是“个体确立派”还是“工人权利派”都对政治有着强烈的关心，因为那是一个泛政治的时代。和平、民主主义、提高生活水平、（美国的占领政策开始从属于冷战理论之后的）独立问题，这些象征具有煽动性力量，并常常被作为政治性词语理解。

在“个体”及“权利”中，得到重新解释的“私”与“公”应该是统一的。这与如今人们因不关心政治而产生的“私生活优先”截然不同。那么从“个体确立”和“工人权利”到如今的“私生活优先”，产生这种变化的动力或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笔者认为，经济的高速增长和随之发生的生活方式的变化是最大的原因。

如第Ⅰ部中所述，战后知识分子所主张的“个体的确立”与“公”的参与意识曾经是一体的。其内容包括克服“公”与“私”的对立，以及对“克

己奉公”与“利己主义”二者同时进行批判。然而，在高速经济增长过程中，“个体的确立”逐渐被“私生活优先”取代，也就是日高提出的那种“民族主义”向“经济主义”转变的发生。

此外，保守政权对爱国心及道德重塑的要求，与日高所说的“经济主义”往往是一致的。因为保守政权一方面宣传“爱国心”，另一方面又在执行依附于美国的经济发展路线。

同时，一般大众也是如此。1958年日教组教研大会的报告中提到，在地方具有影响力的人群及下层百姓中，要求恢复战后遭到废止的“修身”课程的呼声十分普遍。据该报告显示，地方上具有影响力的人群要求恢复“修身”课程，实际上是他们对自身所处的支配地位在战后民主化进程中发生动摇的一种反击，而“根据对下层百姓的分析，可以看出他们更多的则是希望教授孩子一些诸如‘帮助做家务’之类的‘孝顺家长’方面的内容”。[106]

1956年，武田清子在给日教组机关报《教育评论》的投稿中，提到自己就“孝顺父母”的含义对农村妇女进行过询问调查。[107] 妇女们的回答不外乎“多赚些钱回来”、“老老实实听父母话，赚钱帮着养家”、“出人头地”、“比其他孩子成绩好”，等等。此外，在指出这种民众的利己主义与保守派的爱国教育论已经结合在一起的同时，武田提出，“爱国心”应以克服这种现象为出发点。

1960年，丸山真男在接受题为“八·一五与五·一九”的采访时谈道：

> 当太平洋战争中总兵力达到极限时，“民”被全部动员起来而成为“臣”。表现其意识形态方面的词，就是“一亿翼赞”与“克己奉公”。而到了战后，大量的“臣”开始回归为“民”，民主主义就是以这种形式开始的。我认为“民”的回归可以大致分为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民”的“私”化，这恰恰与克己奉公是对立的。众所周知，其在农村的表现形式主要是农民对自身经济利益关心的增强及名门望族秩序的瓦解。在大城市则是在消费方面对个人生活享

> 受的重视成为压倒性多数；另一个方向以激进的革命运动为代表，这个方向在特点上还保留着许多克己奉公的东西。两个方向中，后者较之前者，在运动及行动方式的某些方面似乎有些牵强和混乱，其盛气凌人的印象也有些让人反感。此外，如前所述，虽然统治阶层已经无法再依靠以往的臣民意识，但“民”的分化对其是有利的。第一，国民虽然在形式上已不再像臣民般顺从，但第一方向中的“私”主义所产生的对政治的漠视，在试图“压制”第二方向的统治阶层看来还是有利的。更具积极意义的是，所谓补贴式行政十分符合农民对自身经济利益的重视。也就是说，这虽然是统治阶层在天皇制失去魅力后的一种十分无奈的权宜之计，但这种将“民”分而治之的方法毕竟还是沿用至今。[108]

根据丸山的观点，战前“超国家主义”的基础不是每个人的责任意识，而是“‘私’向‘公’的无限侵入”，即对利益的追求。百姓向地方领导人表示忠心，或者地方领导人向中央政府表示忠心，这些不过都是为了出人头地和获取利益，或挤入以天皇为顶点的权力阶层，而这种情况下的“爱国心”就是个人利益的表现形式。当中央政府在战后失去影响力时，这种“爱国心”一度云消雾散，但随着经济复兴与补贴行政的实行又重新出现。

“热爱祖国”的含义

但另一方面需要注意的是，从战败到1950年代的“民主主义”并非否定“经济”。前述日高的言论中也提到，战后的“政治时代”中所使用的口号除“和平”、“民主主义”、“独立”之外，还有“提高生活水平”。

当时所谓的“提高生活水平”与“和平”及“民主主义”之间并非对立，其关系甚至是密不可分的。正如本章前半部分中所述，战争才是令日本陷入贫困的最大原因，而民主化正是防止日本走向战争的最有效手段。

然而，当“提高生活水平”与“和平”因朝鲜战争中的“特需景气”而发生矛盾时，“民族独立”这一口号就出现了。即作为保卫和平的手段，主张断绝与在亚洲进行战争的美国之间的从属关系，而通过自身力量实现

经济复兴。正如教育学家宫原诚一在1950年所讲的那样，“和平所需要的最基本的社会条件，是通过恢复生产实现日本经济的独立”，从这种意义讲，“恢复生产与拥护和平，二者是统一的”。[109]

此外，社会主义在这一时期受到广泛支持也是由于人们对“提高生活水平”的期待。这是因为当整个社会处于贫困状态且贫富差距悬殊时，通过社会主义调整贫富差距与通过合理的计划经济扩大生产备受期待。

例如在1952年的一次座谈会上，语言学家国分一太郎强调“苏联在生产方面飞跃性的发展”，并指出“其原因在于，苏联人顺应社会发展的规律而改变了生产关系”。[110] 由此可见，对于1930年代美国苦于经济危机而苏联通过五年计划等提高生产的那段历史，知识分子们在十几年后依然记忆犹新。

此外，在民间经济因战争遭受严重打击，黑市经济使社会处于混乱状态的战后初期，几乎没人相信通过自由放任主义能够实现经济复兴。战后初期，政府实行的“倾斜生产方式”也是以这种社会潮流为背景的。在那个时代，有人认为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有利于扩大生产也不足为奇。

而且，人们认为，这种依靠社会主义实现经济复兴的方法才是摆脱依靠美国及军需产业经济，实现和平的“民族独立”的途径。清水几太郎在1952年提出，如果说单纯的口号相当于“和平的理想”的话，那么构建这种经济体制的方法相当于“和平的肉体”，这一想法得到了广泛的支持。[111]

此外，当时的“提高生活水平”，与不顾他人一味追求个人利益的做法是完全相反的。而且，当时也没有人认为一味追求一己私利可以“提高生活水平”。这是因为，在社会体制没有发生变革的情况下，个人的

富裕无法实现，这就是当时左派的想法。

这种想法，在当时的日本社会中可以切实感受到。当整个社会处于贫困水平时，一个工人即使依靠个人奋斗也无法获得多少收益。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便开始认为只有以工会为中心团结起来才是“提高生活水平”的最佳途径。

关于这一点，农民同样如此。作为生活记录运动的典型而闻名的1951年的文集《山彦学校》的末尾提到，在无着成恭的指导下进行作文创作的学生们曾就如何解决贫困问题进行讨论。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为了让农民更加富裕”，“应当摒弃以自我为中心的做法并团结起来”。[112]

这两个结论之所以能够同时成立，是因为文中所提到的山村在当时十分贫穷。学生们认为，想要提高生活水平就必须实现农业机械化，而实现农业机械化单单依靠农民的个人经济实力是无法实现的。经过进一步讨论，学生们得出，如果共同购买并使用机械就必须克服利己主义。此后，虽然通过进城务工积累的财富，农民们每家都独立购置了一年也用不上几次的农业机械，但这在1951年是完全无法想象的。

在这次讨论进行到最后，成长于战前的无着说道：

> ……我在用这种方法教育学生的同时，逐渐感觉到了新时代的气息，感觉到新的道德观念正在形成。从小在二宫金次郎背柴读书像前被灌输“忍耐”与“勤勉”的品德教育，接受“别人工作八小时，自己就要工作十小时”教育的我发现，在这些孩子“忍耐”与“勤勉”背后隐藏着一样东西，那就是由贫富天注定的道德观念向奋斗可以战胜贫穷的道德观念转变。[113]

在整个社会陷入贫困状态的时代，依靠强调独自努力的“忍耐”与“勤勉”和通过算计别人达到目的的个人主义，甚至无法实现最基本的个人利益。这些阻断了农民之间团结的基础，使其无法融入社会变

革，并忽略了产生贫困的基本原因在于社会结构，其作用只不过是向人们灌输“贫富天注定的道德观念”。于是否定这种旧的道德观念，团结一致实现社会变革，从而达到“战胜贫穷”的“新道德观念”开始受到关注。

这里所说的“贫穷”，并不单指物质方面。经济上的贫困产生于对地主及资本家的趋炎附势，而这又带来了精神与社会关系方面的贫困。关于这一点，教育学家宗像诚也与上原专禄在1952年的对话集《日本人的创造》中写道：

> 看看日本人的生活就可以发现，我们一直处于痛苦之中。在电车上看到的每一张脸，似乎都充满了痛苦和忧愁。这种痛苦，最终还是源自物质生活的匮乏与社会关系的落后……
>
> 我不想让下一代人继续忍受这种生活。我希望他们能够按照自己的情况规划自己的生活……不需要向人低头、仰人鼻息，或者反过来压迫、伤害、剥削他人。我希望人们不要这样，而是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创造自己的生活。……
>
> ……如果只谈在经济和精神方面摆脱痛苦，则可能会被一些人误解。例如，只要自己的孩子脱离贫困并挤进上流或特权阶层就好，不必去担心社会或日本会怎样，只要自己和家庭幸福就可以。可以说，这种生活理想带有小资产阶级或小市民性质。……家长们不惜一切地为子女聘请家庭教师，使其能够考入一般人无法进入的学校，他们所具有的便是这种生活理想。
>
> 我所说的使日本人从经济和精神方面摆脱痛苦并非如此，而是让所有日本人都能这样，并不是局限于少数的一群人。不，应该说如果大部分日本人无法实现的话，那么一部分人先实现幸福生活也是不可能的。[114]

以上看法，实际上也是战争经历的产物。战后的知识分子们曾将对共产主义者及自由主义者进行的镇压看作“旁人之事”而置之不理，直至最后悲剧性结局的发生。从这一经历中他们认识到，无视整个社会的动向最终也无法保证个人的自由和幸福。

1948年，作家丸山静在谈及自己的战时体验时说道：“为了生存下去，我们即便不情愿也无法再继续保持‘在政治方面的无知’”，“我们不得不彻底地认清‘并非民众存在于自我之中’，而是‘自我存在于民众之中’”。[115] 从这种意义讲，战争使将全体国民视为“命运共同体”的意识逐渐普及。

这种提倡放弃利己主义即重视“新道德”的做法在1950年代至1960年代前期的大众文化中也十分常见。在1954年上映的黑泽明导演的《七武士》中，武士们的首领面对逃避战争的农民大喝道：“保护他人就是保护自己，只考虑自己的家伙只能被消灭。”[116] 而1962年由浦山桐郎导演、吉永小百合主演的反映铸铁加工厂街区少男少女生活的电影《滑铁炉之街》中，也出现了“一人百步不如众人一步”的台词。

在当时，类似于这种表现“众人”的词只有在左派主张中出现的“国民”和“民族”。宗像与上原在《日本人的创造》中主张，曾在日本被称作“民族意识”的东西不过是对天皇和国家的从属，而作为“国民”一体性的“民族意识”则可以说极其淡薄。《日本人的创造》中强调的，便是后者意义上的“民族”意识的重要性。

与此相同，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们使用过的“单一不可分民族”一词同样代表这种“国民的”一体性。在最具代表性的辞典《广辞苑》的最初版本中，“单一”一词的使用范例同样是表示工人团结之意的“单一工会”。而在该辞典中出现表示排外主义之意的词“单一民族论”，则是始于1991年的第四版。[117]

也就是说，在1950年代前期“单一民族”不是既成事实，而是作为人们应为之付诸努力的目标，是众人的“创造”。此外，在这一时期，“众人合一”一词也是作为“一体性”之意来使用。然而，经过经济高速增长期，“单一文化”成为既成事实之后，“单一”的意思就变成了均质化或压制。

1952年发生在静冈县富士郡上野村的“村八分[118]事件”，就是以“民族”和“祖国”为标志的民族主义的一种表现。

在当时的农村地区，与保守派议员勾结在一起的地方势力极具影响力，这使得不正当选举及干涉选举的现象十分普遍。在某位作家的观察记录中，妇女会、青年团、农协、消防团等都被动员起来，可以使保守派推荐的候选人赢得大量选票，青年团和消防团还会在其他候选人的演说会场检查入场人员。[119]在事件发生的上野村，同样由邻组长先将大家进入投票场地的入场券收集在一起，再将选票全部投给事先承诺会照顾村子利益的保守派候选人。

当时，名叫石川皋月的少女发现了其中的不公正之处，并在学校文艺部的杂志上发表了抗议文章，这篇文章后来虽然刊登在学报上，但立刻又被校方全部收回并焚毁。石川没有屈服，而是写信给朝日新闻社要求派人来进行采访，其一家人却受到了“村八分”的处罚。由于村中没人愿意在农活上帮忙，石川一家连插秧都无法进行，并作为“叛徒的家庭”无法与村中任何人来往，石川的妹妹也时常被人骂作“赤化分子”、“叛徒”。之后不久，对石川的迫害逐渐发展到停止奖学金的地步。对于从事农业的贫穷的石川一家来说，这种迫害是致命的。对此，石川写道：

> 现在这个社会中贫穷究竟有多么致命，对于这个问题我进行了反复思考。
>
> ……这是个金钱让本该属于穷苦人的权利遭到侵害的社会。这是个只要贫穷就无法抗争到底的社会。我开始十分讨厌贫穷。本来如果能稍微富裕一些还可做更多的积极努力，想到这里我不禁悲伤起来。[120]

石川陷入困境之后，找过一位自己尊敬的老师谈心。那位老师鼓励石川并答应给自己当报社记者的朋友写信，还建议石川将事件经过写成文章。石川在老师建议下所写的文章，其开头如下：

> 我会无限地热爱我的祖国，因此我想爱所有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爱人类就是热爱人类的自由与幸福，因此我必须肩负起保护所有生命的使命并为幸福而斗争。[121]

也就是说，这是在“村的思想”与“祖国的思想”之间的抉择。石川所在村的邻组长说石川是“让别人获罪而自己在一旁高兴”、“给自己的村子抹了黑”并强迫她进行反省。而石川反驳道，“正因为是自己的村子才会抗议”，并强调：“这是为了自己所热爱的祖国的民主化。”[122]

这体现了丸山真男“国民主义”的最理想状态。在村落这个共同体中成功地实现“自我的确立”并参与“祖国”政治，这一状态在这位少女身上得到了体现。这一事件在全国引起极大反响，日本律师联合会为此成立特别委员会并向当地派遣调查团，对石川的声援不断扩大。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石川之所以使用“热爱祖国”一词是受那位熟悉左派话语体系的教师的影响。而她本人当时所要表达的，只是自己无法容忍不公正行为，以及面对压迫不愿屈服的心情，而“祖国”一词可能只是这种心情的表达手段而已。然而在1952年，“热爱祖国”一词成为能够表达这种心情的载体也是事实。

石川在给校内杂志的投稿短文《我们要前进》中写道：

> 居然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阻止眼前正在发生的不正当行为，这种情景是何等悲惨。……我不甘心，我难过。真希望一切都没有发生过。……
>
> 然而，我们不会悲伤。我们要用铁一般的意志打开自己那扇被没有思想的大人们强行锁上的心，我们要前进。这个悲惨的日本必将由我们重建，无论发生什么我们都必须前进。[123]

这篇短文所体现的心情，应该与当时的进步知识分子及年轻共产党员是相通的。在战争创伤与贫困现实摆在眼前，以及社会秩序动荡不定的1950年代前期，“悲惨的日本必将由我们重建”这样的语言以其现实性

深入人心。

但是那之后的日本社会，各地的村庄并没有朝着出现这种少女的方向发展。与改变农村相比，大批农村青年选择了作为“个人”脱离农村而进入城市。伴随经济增长步入正轨和日本共产党失势，人们对社会变革抱有的幻想进一步破灭，而这又大幅加速了农村青年转向城市的倾向。石川在当初说过“如果能稍微富裕一些”这样的话，而回应她的不是社会的变革，而是电视机和洗衣机。

然而，在石川的“村八分事件”发生的1952年，这种倾向还不是十分显著。利用“祖国”与“民族”这样的词来表现不同于战前的“新道德”的尝试，即便在社会变革速度加快的1950年代后期，也逆潮流般地持续了下来。而在迎来1950年代结束的1960年初夏，“战后民主主义”的最大也是最后的高潮，即反对《日美安保条约》的斗争开始了。

第Ⅱ部所要描述的，就是这个时代各种心情的体现。

第八章 国民历史学运动

在讨论民族主义问题时，历史学至今仍是一个焦点领域。此外，受马克思主义强烈影响的战后历史学界，是批判战前民族主义最大的势力之一。

然而在1950年代前期，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是最强调“民族”的领域。本章将着重介绍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界的领军人物、中世史学家石母田正，以及在他的倡导下所进行的“国民历史学运动”。[124]

在以“历史学革命”及“国民历史学”为口号进行的国民历史学运动中，许多年轻历史学者及学生离开大学奔赴工厂及农村。这次运动因1955年日本共产党在六全协后的方针转变而瓦解，它使许多人受到了伤

害，在历史学中可以说是一个已经被封印的伤痕。即便偶尔被提起，大部分也是作为政治恶性地介入学术界的反面例子。

然而，这次运动及该时期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中的民族主义，实际上包含了许多不可忽视的问题，那就是如实地显现出战后左派民族主义的性质和局限性。

摆脱孤立

与讨论战后思想相同，在讨论战后历史学时，必须从战时开始讲起。到1930年代末，数年前还名噪一时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几乎完全被扼杀殆尽。主要学者在身陷囹圄后，不是开始保持沉默，就是转向之后开始撰写一些赞美日本的文章。

其中也有一些人继续坚持研究，那就是研究古代史和中世史的学者。在战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中，近代史因其研究对象包括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而备受关注，而这一领域在战争爆发后却因受到彻底打击而走到了毁灭的边缘。在这种情况下，仍然能够进行下去的，只有古代史和中世史研究。

1952年，近代史学家犬丸义一这样形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状况："战争期间大家都转向古代及中世研究以避祸，从事近代史研究的人已经凤毛麟角。"[125] 这样一来，古代史及中世史的学者自然成为战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核心。后文还会提到，这种现象对战后历史学中民族主义的性质产生了微妙的影响。

在战后初期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中，中世史学家石母田正、松本新八郎，古代史学家藤间生大可称得上领军人物。战争期间，他们在古代史学家渡部义通的率领下组织研究会，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时都还是20多岁的年轻学者。当时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很难在大学谋得一席之

地，只能一边私下开办研究会，一边发行他们的机关杂志《历史学研究》。

然而，即便是古代史及中世史学研究也不能算是自由。研究会起初以匿名的方式在租来的地点活动，但其领导者渡部最终还是于1940年11月遭到逮捕。据说，当渡部知道家中遭到警察搜查时自知已无处可逃，便将今后研究的方向写下并交给了石母田等人，在出席最后一次研究会后立刻被警察带走。[126]

不难想象，当时还处在青年时期的石母田等人在这种经历中受到了很大影响。虽然《历史学研究》在日美开战之后被迫停刊，但他们心中牢记渡部“将科学精神坚持到底，为史学发展尽力”的叮嘱，继续开展各自的研究。在回忆当时的情况时，石母田说：“在黑暗中睁大双眼，为了坚定自己的信念，我们只能依靠学术的力量。”[127]

战败后不久，石母田在战争期间的努力最终融汇成一部《中世世界的形成》。历史学研究会的活动遭到取缔后的第二个月即1944年9月，时年31岁的石母田在因灯火管制而紧闭门窗的屋子内，仅用一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这部28万字的著作。

这部著作虽然以中世为研究对象，但也反映出石母田对自己所在时代的强烈关心。就像丸山真男在应召入伍当天的早晨完成了《江户时代论》一样，那个时期的年轻学者都是将学术著作视为遗书，石母田的这部著作同样如此。

《中世世界的形成》是一部以伊贺国一座名为“黑田庄”的庄园为舞台背景，描绘“古代”的终结与“中世”的开端这一“历史的必然”的作品。作为该书舞台的黑田庄，是象征“古代”东大寺的直辖领地，而该书描述的便是代表“中世”的“黑田恶党”等当地的武士团敢于向东大寺挑战的历史。

当然，石母田的目的是研究作为“古代”象征的东大寺统治动摇的过程，毫无疑问，这是一部想要描写关于天皇制国家瓦解这一“历史的必然”的著作。虽然石母田也自知学术论文中不能带入主观问题意识，但他认为：“如果没有这种问题意识所带来的冲动，至少在战争末期那个黑暗的房间里，根本不会有奋笔疾书的力气。” [128]

然而这本书的特点在于，其中关于“古代”向“中世”过渡这一被视为必然的描写并非十分乐观。敢于向旧体制挑战的武士团无不拜倒在东大寺的面前，即便是因内部腐败而走向衰弱时，东大寺最终还是能将对其进行挑战的“黑田恶党”镇压下去。正如石母田在书的末尾所讲的那样，这个故事是作为“挫折与失败的历史”来书写的。 [129]

那么，代表历史进步的黑田恶党为何失败呢？石母田将原因归结为恶党的“孤立性”。他认为，东大寺统治末期的神职人员“媚上欺下，一方面对强权怯懦追随，另一方面对百姓残暴凶恶，是中世社会中最腐败的一种人”。 [130] 恶党虽然消灭了神职人员，但大部分是无目的的恐怖行动或复仇，甚至还有抢掠当地庄户的行为。换而言之，恶党们不过是独立于群众的暴力集团而已。

石母田认为，恶党的这种“伦理上的堕落”源于他们没有与庄户融为一体。因为，“作为本地武士的恶党们代表的是整个村子，从这一点来看，与东大寺的对抗即使是小规模（与村民一起）的抗争也不会产生任何道德上的堕落”。 [131]

此外，庄户的思想意识也有悖于历史潮流。古代的庄园支配体制在当时已经开始瓦解，在黑田庄的周边地区，中世的武家支配体制已经出现，黑田庄的庄户们却出于对外来武士团的恐惧，反而希望东大寺巩固其自身的统治地位。对此，石母田评价道：“这种对外部世界的恐惧，形成了长年与世隔绝并逐渐习惯于生活在东大寺统治之下的黑田庄庄户的根本性弱点，也证明了他们无法依靠自身力量取东大寺而代之这一事

实。”[132]

东大寺除了依靠武力镇压之外，还通过宗教统治庄户的精神世界。即便是恶党们也无法摆脱“寺奴的血与思想”的束缚，一旦遭到武力镇压，“就会以惊人的速度立刻转变为忠诚的庄户”。[133]

以上原因导致黑田庄无法通过内部力量实现向中世的过渡。即使到了15世纪，黑田庄依旧处在东大寺的统治之下。对此石母田提出，“只要没有来自外部的征服，古代世界便会一直存在下去”，并以“我们现在必须结束挫折与失败的历史，因为外面的世界早已进入中世，西日本已经出现了西欧的商业资本”作为该书的结论。[134]

从以上内容中可以看出石母田对于战前的共产主义与战时的状况有着怎样的思考。1930年代的石母田是日本劳动组合全国协议会（简称“全协”）的活动家，后因遭到调查而无法从事任何活动才开始转入历史学研究。关于《中世世界的形成》，他后来回忆称，该书的主题是打破“我们孤立于人民，而人民又处于天皇制统治之下”的现状，“简言之，就是与被天皇制束缚的大多数日本人民的对决”。[135]

石母田还提到，“这同时也是与自己的对决”。听到宣布日本投降的广播时，“那种感觉不仅有重获自由的解放感，还有对不得不以天皇诏书的形式来宣布终止战争这一现实的愤慨”，那种“对包括自己在内的日本人民的情感”积于胸中却无法表达。[136]

在一战中的俄国与德国，混乱与饥饿引发了革命，而战争也随之终止。正如本书反复讨论的那样，当时的知识分子中有不少人曾期待这种人民起义也能发生在日本。但正如石母田所预料的那样，日本不但没有通过内部力量摆脱天皇制的束缚，甚至连决定投降都需要通过天皇的命令才能实现。

而且，如第七章中所述，石母田对自己在战争期间没有拿出勇气表明反战立场一直悔恨不已。在一间封闭的小屋中通过书写历史表达对天皇制的反对，很显然没有任何政治效果。

石母田本人对那些比自己还要年轻，在战争时期身处最前线的人特别感到愧疚。战争结束时处在三十岁左右的石母田及丸山等人，在其青年时期有机会接触马克思主义，因而可以辩证地看待战争。相反，战争结束时还是二十岁左右的一代人是在社会主义及自由主义遭到完全打压之后才开始懂事，他们被灌输的全都是皇国思想。因此，三十岁左右的一代人大多是被迫屈从于战争，而二十岁左右的一代则大部分是在对战争没有任何质疑的情况下奔赴战场，也是战死者最多的一代。

如第五章及第六章中所述，成为战后知识分子中坚力量的三十岁左右的一代，对于决定发动战争的四十及五十岁一代抱有反感，并怀有一种受害者意识。然而战争结束后从战场归来的二十岁左右的一代，则对那些明知战争的罪恶却又缄口不言的三十岁的一代抱有很强的反感，并不断对这些人的怯懦和欺骗加以指责。

如第六章中所述，荒正人在批判四十岁的一代时也引用过“二十岁的一代”指责“一言不发地将他们送上战场的三十岁的一代”的内容。

就像第七章中的论述，石母田曾在1951年引用鲁迅“大胆的说话，勇敢的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一切内心话说出来，发表出来”的观点，并承认：“在战争期间，我们这代人就连劝诫年轻人的勇气都没有。”对于“年青一代”，他一直抱有这种悔恨的心情。

第七章中还提到，石母田在对战争期间的历史进行回忆时说：“当时，基本没有什么工作与战争无关。”他本人在战争期间也供职于富山房、日本出版会及朝日新闻出版局等处。虽然没有证据表明石母田发表过支持战争的文章，但这些出版社本身确实发表过赞美战争的文章。而

且石母田虽然表示出对“年青一代”的愧疚之情，但同时也承认自己“是依靠这些工作赚取微不足道的薪水而活下来的”。

总之，石母田的出发点是对自己及“日本人民”的绝望。提到“战后民主主义”的特征，人们大多会想到乐观的人本主义和大众观。但事实上，战后的知识分子出于自身的战争经历而对日本的大众怀有一种十分悲观的感情。石母田也说：“无法突破悲观主义的乐观论令人难以置信。”[137]

然而在第七章中同样提到过，无视社会整体的潮流最终是无法保存自身的，这是战争留给当时人们最大的教训。而且，石母田战争时期在封闭的小屋中创作历史学作品这一行为，虽然可能无愧于个人的良知，却也无法消除对“年青一代”的愧疚。1946年3月，石母田的《中世世界的形成》终于问世，他在书末尾的后记中写道：“在旧秩序轰然倒塌，学术自由第一次在这个国家得以实现的今天，我们的学问已不能再是仅仅依靠颓废和反潮流来凸显自我的那种消极的东西了。”[138]

这种政治取向，是在战争时期朋友和师长先后遭到逮捕，却仍然继续坚持研究的石母田等人中形成的。石母田的盟友藤间生大曾在1943年的《历史学研究》中，对“单单作为一个旁观者的观察”或“即便处在一个小小的角落也要让别人承认自己独立性的充满可怜想法的类型学”进行了批评，并主张应确立可以应对“处于危机下的民族”现状的“主体性”。[139]

总之，石母田将黑田恶党的堕落与失败归结在孤立于群众的这点上。他在《中世世界的形成》一书的末尾也写道：“黑田恶党绝不是被东大寺击败”，“黑田恶党是败给了自己”。也就是说，“只要地方武士没有改变将自身视为恶党、庄户们没有改变承认自身处于寺院统治之下的想法，古代便会无限次地死而复生”。[140] 即便日本的体制因“外部的征服”发生一时的改变，只要革命势力仍旧处于孤立于人民的状态，天皇

制就可以“无限次地复活”，这就是石母田的想法。

石母田便是基于这种思考而将战后的历史学构想成了一个脱离了孤立于群众的状态，可以对社会施加影响的学问。而这种想法，不久便开始通过“民族”一词来进行表达了。

战后历史学的开端

战后，从言论限制和皇国史观的统制中得到解放的人们，开始对历史学产生浓厚的兴趣。

1947年川越民主主义研究会举办“古代社会展览会”时的盛况就是其中一例。该展览会原本预定在市图书馆举办三天，但市内及周边村镇赶来的参观者人数之多，使其不得不为此延长展期，国内其他地区还纷纷发来巡回展览的请求，最终该展览会辗转全国各地十多个城市。[141] 打破以往的禁忌，接触对日本历史可以畅所欲言的研究，对人们来说这不只是获取知识，更重要的是感受自由与解放的氛围。

1946年1月，战争期间被孤立了的哲学、科学、历史学等马克思主义系知识分子以及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系知识分子云集一堂，并以此为契机创建了民主主义科学家协会（简称“民科”）。1946年10月，该协会历史小组的机关杂志《历史评论》问世。与此同时，自战前开始便成为石母田等人阵地的《历史学研究》也在1946年6月复刊，这两本杂志成为战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中坚。

战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实践，除启蒙活动之外还有对教科书的批判。1946年10月，最后一本国民学校初等科（相当于小学）的国家指定国史教科书《国家的足迹》出版发行。引入世界史观及人民历史的这本教科书，在当时被视为教育民主化的象征来进行宣传，而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却批判其为“天皇崇拜教育的残余，没有对战争责任进行追

究”。

但是，这一时期对教科书的批判并非通过实证主义对其政治偏向进行批判，而是采取了对“非政治的实证主义”进行批判的形式。在1947年初召开的《国家的足迹》批判座谈会上，出席者中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主张：“虽然以往的历史教育被政治恶意利用，但这次的历史教科书中完全脱离政治也是没有必要的”，“今后的历史教育应当在正确的政治基础上进行”。[142]

如第六章中所述，在文学领域中以政治中立自居的“艺术至上主义”曾受到批判，历史学中与之相应的是“实证主义”。以中立自居的“实证主义”被认为是最终会倒向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想。

当时，这种对“实证主义”及“中立”的批判确实被认为是必要的。1946年就任文部大臣的安倍能成也说：“如果只能从民主主义的立场来重新书写日本历史的话，那么这种历史不过是再次被歪曲的历史罢了。”曾经赞美战争的历史学者板泽武雄也认为：“我们以前主要依靠的就是实证，现在也没什么好改的。”[143] 给和自己不同的思想扣上“偏向”的帽子并自诩为“中立”，是保守派的一贯做法。

这种“中立”，即便从放任政局发展而最终导致法西斯主义抬头这一战争时期的事实来看也是无法容忍的。民主主义科学家协会在1949年的一份声明中表示：“我们在战争时期的切身体验已经证明，对邪恶政治同样采取‘中立’态度的这种‘非政治性’到底让日本学术界陷入了何种境地。”[144]

在这种强烈的政治取向下，井上清认为“历史不仅仅是告诉孩子们关于过去的知识，还应告诉他们日本今后的走向……”远山茂树也对“只以文化交流和国际交流为中心，呼吁大家和平相处的‘世界史’”进行了批判。[145] 可以肯定，他们所主张的历史，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发展观揭示

日本与世界未来发展方向的历史。

在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看来，所谓历史必须有明确寓意，可以给儿童以希望和自豪感。关于《国家的足迹》，井上清特别对其“含糊、缺乏热情”的缺点提出了批评。此后，《国家的足迹》执笔人之一家永三郎也回忆道：“说我顺从文部省并忠实于战前的历史观是不对的。但如果从非政治的实证主义立场出发来写教科书的话，最终确实难免成为那种东西。”[146]

最使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受到刺激的，是一个名为蒂尔特曼（Tiltman）的记者在《改造》1947年2月号上发表的一篇时评。蒂尔特曼在该时评中指出英美的历史教科书是一种将“对英国世代相传财富的骄傲”或“这就是我们美国”的感情灌输给儿童的东西，与此相反，《国家的足迹》这本书中“既没有对先人的自豪感，也没有对后世子孙的希望”。

在那之后，石母田在《历史评论》中引用了蒂尔特曼的时评，并呼吁“让我们与诸位读者携起手来一同创造日本人民的历史，总有一天要让蒂尔特曼和他的主子们大呼‘这就是日本’”。[147] 当然，所谓“创造日本人民的历史”，无疑是指在日本发动革命。

战后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起初对“民族”还是持肯定态度的。1946年6月刊登在《历史学研究》复刊第1期上的研究会纲领，呼吁“提高祖国与人民的文化”。而刊登在第2期上的对纲领的解释也提到，一方面要批判“国家至上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但另一方面也强调：“不能对民族的一切都加以否定。”[148]

根据井上清的回忆，这部纲领主要由他和石母田制定。而之所以对“民族”和“祖国”加以肯定，主要是为了防止“被曲解为世界主义”或被指责为“苏联的走狗”。[149] 批判“世界主义”在当时的共产党及其相关人

士中相当普遍，但同时可以看出这种做法在当时也是为了避免孤立于群众。

当然，这里所说的“民族”实际上与“群众”是同义词。《历史学研究》复刊第1期中也写道：“历史教育不能只为少数统治者服务，而应该为全民族，即人民大众服务。”[150]

此外，如第三章中所述，战后初期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中的“民族”形成于近代以后，从一开始就与封建制残余的天皇制对立。而且，当时的“讲座派”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将日本定位为一个近代化不够彻底的落后国家，故主张“民族”不是作为过去的传统，而是应该作为未来。

因此，战后初期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活动之一，就是对作为天皇制一部分的旧“民族”观进行批判。如第七章中所述，石母田于1947年将津田左右吉作为“市民历史学”加以批判，问题的焦点就是津田的“民族”观。津田认为，“民族”是自“记纪神话”[151]的年代便存在的“文化共同体”，人们将天皇作为这种文化的象征加以拥护。对于津田的观点，石母田指出，民族是“近代的产物”，津田所谓的民族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民族”。[152]

实际上，为使马克思主义者以外更多的历史学者加入进来，历史学研究会在1946年1月的重建大会上曾决定推荐津田担任会长。正如第五章中所述，津田在战争期间曾因其“记纪”研究违反出版法而遭到迫害，所以对他的评价以反对战争的自由主义历史学家居多。

津田虽然最后拒绝出任会长，但通过向《历史学研究》复刊第1期投稿的方式表达了自己愿意合作的态度。但在那之后不久，津田就在《世界》1946年4月号上发表了拥护天皇的论文。据说，当时津田对《世界》总编吉野源三郎说过自己已决定要向马克思主义学家“扔手套”[153]，并于1946年9月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提出了“与战争中胡乱议论日

本历史的右翼人士做法相同，只不过在思想的方向上相反罢了”的批判。[154]

对于津田的这种行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十分失望。在批判津田的问题上，石母田认为“民族”观的错误是津田拥护天皇的原因。

这种“民族”观同样适用于“民族文化”一词。如第七章中所述，1948年8月，以“保护民族文化”为口号的东宝争议[155]遭到警察与占领军的镇压，对“民族文化”的关注也随之高涨。接着，石母田在1948年11月题为“民族文化问题”的座谈会上指出，所谓“民族文化”并非源于过去的传统，而是“以劳动阶层为中心进行新文化的创造”。如果没有这种认识，谈及“民族文化”时就会“立刻想到法隆寺、《万叶集》、茶道、能乐”等。[156]

石母田当时认为，法隆寺及能乐等都是统治阶级的文化，而并非大众文化。他认为，“将封建时代纷乱的状态统一起来的是民族文化”，[157]而不能将统治者的文化称作“民族文化”。

“群众文化”也是如此。就像能乐及法隆寺等艺术反映统治阶级意识一样，身份等级制度下底层人民创作的民谣所反映出的是可悲的被统治者意识。因此，石母田在1948年底召开的题为“我们民族文化的特质”的座谈会上表示：“以往的民谣等是传统的，因而无法成为将来的。”[158]

与石母田同时出席该座谈会的还有中野重治，他认为，“所谓民族，不能以日本人或其他人等人种性问题为基础”，“占人口95%的就是民族”，还提议应该通过克服面向知识分子的“纯文学”与面向大众的“大众文学”之间的隔阂来创造“民族文学”。[159]这里的“民族”，是通过克服阶级隔阂而创造出的新的统一。

在石母田看来，将法隆寺与能乐视为“民族文化”的做法不利于“民

族文化”的创造。因为这些文化存在于过去而并非应该存在于将来，是依靠政府和知识分子的权威才得以成为“文化”而不是依靠群众。石母田在这次座谈会中提出：“所谓文化并不是靠任何人指定，而是自然形成的，这是文化产生的本质条件。”[160]

石母田同时认为，“知识分子或统治者不过是在不考虑群众的情况下，世界主义性地将外国文化作为一种少数特权阶级所特有的东西”，“这种文化不过是强加于群众的”。[161] 正因为引进的西方文化与法隆寺、能乐同样是依靠特权性权威所强加于民的东西，所以受到批判。

如此看来，石母田在当时所主张的“民族文化”一词，可以解释为拒绝向权威妥协，通过自身的“主体性”来创造文化之意。与丸山的“国民主义”相同，其意在表现对代替旧秩序的新未来的希望。

然而这里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创造这种“民族文化”。从战争期间撰写《中世世界的形成》一书开始，石母田就一直在思考如何才能摆脱孤立于群众的状态。大家都能想到的方法之一，是启蒙活动。

如第七章中所述，当时石母田在民主主义科学家协会事务局从事派遣知识分子到地方进行启蒙演讲的工作。然而据石母田讲，大部分启蒙演讲“是孤立于人民之外的知识分子将现成的知识、学问、思想，从外部，或者说自上而下地灌输给人民”，这不过是明治时期启蒙活动的延长，“讲师们并没有从人民那里学到任何东西”。[162] 如果说“文化并不是靠任何人所指定，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这种启蒙的方法最应该受到批判。

历史观的问题同样如此。石母田讲过：“民主主义性的历史，是由中央开始，通过讲习会或书籍等方式传播给教师，再由教师口头传授给学生，这种方法其内容即便与战前的历史教育不同”，“在教师将历史作

为自上而下的传授这一点上也是没有任何差别的”。[163]

事实上，丸山真男也提出过同样的问题。他在1950年的一次座谈会上对战后教育的方法提出批评，指出：“民主就是教科书。而将法西斯主义的书籍作为教科书而不是批判对象的话，法西斯主义是无法克服的。”[164]

作为对这一问题的回答，石母田于1948年的《历史评论》上发表了《农村的历史·工厂的历史》一文。这篇文章后来被收录在畅销书《历史与民族的发现》之中，而成为1950年代国民历史学运动的指导性文章。

该文章的主要目的，是说明以往的历史往往是政府或知识分子等权威“为打破陈旧而屈辱的传统”创造的，鼓励群众通过“自由的创意与兴趣”书写历史。[165] 关于其具体内容，曾作为劳动学校讲师与池贝金属加工厂的劳动者进行交流的石母田，有一篇介绍该工厂工会书写自己历史的文章。

战后初期，各地发生过不少劳动争议，当时的问题之一是工人对自身运动的相关历史知识不足。1930年代以后，社会主义工人运动遭到彻底镇压，年轻劳动者中对劳动斗争较为熟悉的人少之又少。在池贝金属加工厂同样只有厂方编写的公司历史，而关于劳动者如何被组织起来，以什么方式进行斗争的历史则只能依靠仅有的几名老资历劳动者的口述。随着这种摸着石头过河式的劳动斗争的发展，“编写工会历史”这一提议自然而然地出现了。

同时，这也是记录劳动者在斗争中逐渐成长并团结在一起从而创造新社会过程的工作。石母田在《农村的历史·工厂的历史》一文中，引用了池贝金属加工厂工人的一些文章：

关于提出（书写历史）的同志的意见，最近我参加了其他工厂的小组

> 会议，发现他们仍然在讨论我们半年前或一年前讨论过的问题。也就是说我自己支部总结出的经验是否对外面的支部有所帮助还不得而知。……然而，不仅如此。对我们而言，支部不仅是解放劳动者的政治组织，还是大家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一个新的“社会”，是以往无法想象的新的生活体。同在一家工厂的劳动者即使从未打过交道也能依靠共同的思想团结在一起，互相帮助、互相讨论、结伴乘坐火车去农村购买粮食，甚至恋爱和结婚的问题也会互相为对方着想。……最开始的小圈子最终成为代表工厂各劳动者的组织，从前被称为“那帮家伙”、对赌博和电影以外的事情毫无兴趣的劳动者已经迅速地成长起来。支部在发展壮大之后就成了劳动者的缩影。思考和理解方式、年龄和生活环境的不同产生了个性与才能的多样性，在这里人们应该毫无顾忌地讲出自己个性与才能中好的一面及坏的一面，从而互助互补、共同前进。平生第一次体会到学习的喜悦，第一次感受到无权无势的贫苦劳动者的权威，这些都是从这种生活开始的。在决定编写支部历史后，大家都认为应该在编写这种新生活、新社会的历史时加入每个人在变化和成长方面的内容。[166]

这种情况，是石母田“民族文化”的理想形态。如第七章中所述，石母田在与大塚久雄论战之后立刻撰写了《农村的历史·工厂的历史》。大塚认为在日本实现现代化之前，劳动者是无法自己觉醒的。而在石母田看来，池贝金属加工厂的例子就是反驳大塚的最有力证据。

同时，这对新的历史学未来发展方向来说也是一个启示。也就是说，其中应该也包括如何打破将历史学封闭于大学这座象牙塔中并使其孤立于群众、沉溺于权威，最终丧失了创造性而堕落为学院派的这种现状的启示。

石母田在《农村的历史·工厂的历史》中一方面介绍群众自发创造历史，另一方面表示：“当这种历史在全国出现之时，学院派历史学的狭隘与悲哀会暴露无遗。”[167]

当然，让不擅长舞文弄墨的劳动者来书写历史，“确实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这就需要“历史方面专家进行指导”。至于历史学家的作用，“并不是居高临下地对群众进行呼吁，而是应当成为可以谦虚地与

劳动者们一同进行创作的专家”。在工作中，专家可以从人民那里了解自己学问的不足，与人民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同时，在石母田来看，这种过程并非依靠道德和责任感不断克服、不断忍耐的苦差事，而应该是一件快乐的工作。石母田在介绍池贝金属加工厂劳动者的文章中写道，书写“大家用爱孕育出的历史”的这项工作是十分快乐的，同时，“支部在书写自己的历史之前，应该经历一些考验，才能使其历史变得精彩。能将书写历史与创造历史如此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的组织只有这里了”。

这是确立自我成长与团结他人的工作，是创造“历史”的工作，而不能只是将“历史”作为残存的东西来写。石母田赞同这样的主张，因此在《农村的历史·工厂的历史》一文中强调“书写历史是一件快乐的事”。

也就是说，这是一种以扬弃“政治”与“研究”的二元对立为目的的思想。如第六章中所示，荒正人等《近代文学》的创办者从思考自身在战争期间的责任出发，尝试探索超越“政治”与“文学”二元对立的方法。与此相反，石母田则主张以融入群众的方式参与“政治”，进而开展自己的“研究”。这种历史学的创新后来被称为“国民历史学”，与“历史学的革命”这一口号结合在一起，使许许多多的学生为之着迷。

此外，这种“历史学的革命”也是由石母田战争时期经历产生的观点。这是因为，“历史学的革命”既是知识分子为了摆脱孤立于群众的状态的一种方法，也是石母田对使其感到愧疚的“年轻人”负责的一种行为。1951年10月，石母田讲道：

> 没有这种学术的转变，不只是大众，就连一直对学术坚信不疑的优秀青年也会远离学术。这些人做学问不是为了获得学者这一地位，不是为了出人头地，也不是为了探求（与自己生活毫不相干的）永远的真理，而是希望学习新的、正确的生活方式，并将其与如何改变祖国现状这一切实问题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对于这些肩负着日本学术界未来的年轻人，如果我

们无法证明学术有存在价值并会因其存在价值而不断发展的话，那么这些年轻人即使放弃了学问我们也无法对他们加以指责。[168]

在这番话之后石母田继续说道："我喜欢做学问，我坚信学问中存在的可能性"，并主张创造"使人们能够产生对民族和祖国的热爱、自信及自豪"的历史学。[169]

当时的大学本科生及研究生大部分是从战场归来的学生兵，或者说是经历过"勤劳动员"[170]的原"皇国少年"。他们中的大多数要么对那些将自己送上战场、使自己的同伴战死的教师及其他知识分子怀有不信任感，要么对那些在战后的饥饿与贫困面前一味地讲述"真理"而又拿不出任何切实可行办法的学院派十分不满。所有学生兵都认为，当在兵营中受到欺负时，康德或海格尔的思想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例如，以国史系学生身份成为学生兵、复员后于1947年以"主体性研究"为副标题完成明治时期思想史方面研究的毕业论文的明治大学学生色川大吉，就有过以下回忆："在我大学还没有毕业时日本就战败了，这时我才切身感受到日本史学的虚伪。活着回来的我们大多是以一种接近于虚无的心情重拾已是伤痕累累、惨无生机的研究，并对于是否应当将其作为自己一生的事业一直烦恼不已。"[171]对于石母田而言，历史学的变革也是为了重新获得这些"年轻人"的信任，从而消除自己内心的愧疚。

然而，石母田的这个建议从一开始就存在几个问题。后文还会提到，这些问题与国民历史学运动本身的弱点存在直接相关。

如前所述，石母田是在1948年的《农村的历史·工厂的历史》一文中提出以上建议的。关于"工厂的历史"石母田列举了池贝金属加工厂的例子，而关于"农村的历史"则介绍了一则"历史故事"。

这则"历史故事"，原是石母田从事社会主义运动的弟弟在木曾地区

做农村调查时为孩子们准备的“旅途见闻”。故事大意是：在江户时期的某山村，百姓出于生活需要进入某位“大人”私有的林子砍伐了一些树木。当这位“大人”追究下来时，一个名叫平次郎的“农民”独自顶下了罪名，人们为了纪念他的功德建造了一座“平次郎祠”。

在介绍了这个故事之后，石母田提出应该努力发掘这种民间故事。然而，与希望书写现代工会历史的池贝金属加工厂相比，江户时期的“大人”及“农民”的历史故事难免让人感到有些内容空洞或千篇一律。

当然，《农村的历史·工厂的历史》中这种不平衡的结构也有其原因。自战前开始就一直在东京的商业地区从事工人运动的石母田，在劳动者中人脉极广。不过，国民历史学运动结束后，石母田曾自我批评道：“正如文章中所暴露的那样，我对农村还不够了解。”[172]

石母田将“农村的历史”与“工厂的历史”混为一谈的原因，应该是追随了当时日本共产党所主张的“工农结合”路线。这里姑且不提工厂，石母田自身对“农村”缺乏理解导致了他对农村的记述大多十分空洞。而这种在理解上的不足，成为之后的国民历史学运动的一大问题。

另一个问题，是对“民族”的看法。如前所述，在当时的石母田看来，“民族”与“民族文化”并非过去的传统，而是在未来需要创造的。

然而即使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中，这种民族观能否得到广泛认同也是一个疑问。虽然他们在正式场合主张“民族”是近代化的产物，但在批判《国家的足迹》的座谈会上，羽仁五郎曾提出：“我只能认为以自治城市而闻名的堺市没有被写进去，其原因是撰写人根本没有将其作为国民的骄傲。”藤间生大也认为：“阻止了建武中兴的成功是民族值得骄傲的地方。”[173]

虽然他们要强调的并非革命或自治的历史，但这种“民族的荣

誉”和“国民的骄傲”究竟应该如何与作为近代产物的“民族”进行整合就不得而知了。对历史上的革命或自治加以赞赏，很可能会导致民族观向血缘论倒退。

1949年，中世史学家铃木良一对宣扬“民族”的石母田及藤间等人的言行进行了批评，并警告说：“与他们最初的意愿相反，这最终将导致在民族战线问题上产生错误的想法。”[174] 随着此后局势的变化，铃木的这种担心逐渐成为事实。

从启蒙到“民族”

随着1950年6月朝鲜战争的爆发，日本政治发生了巨大变化。1950年1月以后，日本共产党因受到共产党情报局的批评而发生分裂，掌握临时地下指挥部实权的所感派开始主张以“美帝国主义”为斗争对象的民族独立斗争。

这一时期，日本共产党的“民族”观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这是因为将“民族”视为近代产物的观点发生了转变，而这种转变是以1950年8月日本共产党机关杂志《前卫》刊载斯大林的语言学文章译文为开端的。该文章是苏联共产党机关报《真理报》于1950年6月20日刚刚发表的。[175]

实际上马克思主义者此前之所以反复强调“民族”是近代的产物，主要与斯大林1913年发表的文章《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有关。该文借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阶段理论，主张“民族”是以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所产生的市场、语言、文化等方面的共通性为基础而形成。

然而，1950年《前卫》所刊载的斯大林的新文章在论点上发生了变化。斯大林在该文中认为，虽然具有近代色彩的“民族”一词（俄语为нация，相当于英文nation）是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之后才形成的，但在考

虑其形成基础时应注意到近代以前的“民族体”（俄文为народность，相当于英文folk或德文Volk）。

这篇文章的意义，并不局限于学术方面。当时，为了响应共产党情报局关于加强以“美帝国主义”为斗争对象的民族独立斗争的指示，日本共产党在1950年3月的民主民族战线纲领中开始主张“保护与发展民族艺术和人民艺术”。[176] 斯大林在这种情况下发表该文章，其意图主要在于强调民族战线所主张的“民族文化”中还应包含近代以前。

一方面，石母田也顺应了这种变化。1950年9月30日，石母田在东京大学召开的民主主义科学家协会的研讨会上，就斯大林的民族论做了报告，并对民族观的这一变化加以支持。[177]

毫无疑问，石母田的这种态度受到了日本共产党“所感派”的影响。如第七章中所述，一方面他对自己在战争期间的行为表示悔恨，另一方面对一些“在狱中仍坚持斗争的少数革命家”大加称赞，并表示与德田球一等一些始终没有放弃立场的干部相比自己感到十分惭愧。

然而，石母田的转变实际上还有其内在原因，这便是在当时影响了许多知识分子的民众取向和对亚洲的再评价。

事实上，在1950年以前，石母田的“民族文化”观是基于某种对农民的蔑视。如前所述，他在1948年的座谈会上曾对“民谣等传统文化”进行批判。同时，他还以“如果对农民中的这种文化置之不理，那么充其量也只能停留在田间小戏的水平”，“要是派合唱队去农村，人人都会躲起来不敢露面”等语句对农民进行了批评，并强调“突出无产阶级指导”的必要性。[178]

换言之，就是主张以石母田所熟识的城市劳动者为榜样对农民进行指导。由此可以看出，石母田身上同样具有当时的知识分子中普遍存在

的对农村的反感及蔑视，在这种环境下，便产生了对“民谣等传统文化”的批判。

这种对农民的蔑视与石母田的出身也有关系。他虽然不了解农村，但直到去东京上大学之前都一直生活在宫城县的石卷地区，这种出生在东北地区的背景使他一直怀有一种自卑感。他在1952年将东北地区形容为“最古老的封建制支配下的落后边境”和“反动与反革命的据点”，并表示：“我是那样的感到可耻，是那样的羡慕来自‘革命与自由发源地’土佐的同学。”[179] 如第七章中所述，他在批判引进“殖民地性质”的西方文化的同时，又憧憬向西方的“逃亡”。

这里可以看出，石母田的民族观在1950年发生的改变实际上也是一种自我批判。在介绍斯大林的新文章时，他列举了在德国占领下从事抵抗运动的法国诗人阿拉贡将“法兰西民族中世纪叙事诗及传说”作为“大众的力量”写成诗歌，高尔基对俄罗斯的民间故事、民谣、神话以及英雄传说等进行重新评价等例子，并赞扬二人“作为近代主义者能够从落后或近代以前的东西中发现具有文化或文学价值、既古老又具有新意的东西”，并提出：“我们是否也应该依靠这种认识和热情来学习神话、民间故事及民谣呢？”[180]

石母田在介绍斯大林文章的同时，还不断强调“大众才是民族”，是“将阶段与阶段、时代与时代用一条锁链连接起来的基础”。因此，认为近代以前不存在“民族”的机械式判断是无视“大众”存在的思考方式，是我们所应该克服的“近代主义”思想。斯大林在其主张改变民族观的文章中所批判的正是这种思考方式，在石母田看来，“斯大林的批评‘似乎就是在警示自己’”。[181]

在《中世世界的形成》中，石母田在表达对群众绝望的同时，又对孤立于群众的恶党进行批评，从而给人以一种十分矛盾的感觉。此外，石母田一方面批判民谣，另一方面又在《农村的历史·工厂的历史》中

对民间的“历史故事”加以赞赏。随着日本共产党方针的转变，这种对“群众”的矛盾心理也开始变为对群众的赞美。

除群众取向外，石母田发生改变的另一个原因是对亚洲的再评价。在中国革命成功后，人们的目光开始转向亚洲的殖民地独立运动。然而，如果认为近代以前不存在“民族”，就没有人会相信在资本主义不发达地区可以实现“民族独立”。

石母田认为，斯大林之所以发表主张改变民族观的文章，无外乎基于对亚非地区民族独立运动开始抬头这一情况的考虑。而他在1913年的文章中强调“民族”是近代的产物，则是为了批判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欧洲严重的民族对立及民族仇恨。也就是说，当时的“民族问题”已不再是发达地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间的对立，而是帝国主义与民族解放斗争的对立。

如第五章中所述，将罪恶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与无产阶级的“真正的爱国”进行区分是日本共产党一贯的方针。石母田认为，借“民族”一词掩盖国内的阶级矛盾、煽动民族仇恨是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弊端，而通过革命进入“社会主义民族”阶段的苏联则已克服了这种弊端。石母田还认为，苏联境内落后地区的农民被组织起来参加革命的事实足以证明，“过渡到社会主义民族也并不一定需要经历资本主义民族这一阶段”。[182]

但是，石母田的这种转变也并不只是受到苏联和中国的影响。实际上，石母田在战前参加工人运动时便接触过朝鲜人的民族主义。

石母田在战前进行活动的地点，是东京商业地区中工人较为集中的深川。那里居住着大量来自朝鲜和冲绳的工人，战前唯一的朝鲜人众议院议员便是出自该地区。在这里，石母田结识了一些朝鲜工人运动领袖。

据石母田回忆，这种交流“让他懂得作为统治民族的日本人的这一事实如何使自身的认识产生偏差，也让他认识到了从朝鲜人的立场和视角出发重新看待日本及自己的必要”。他认为：“这对以前一谈到从外界看日本就想到与西欧进行比较的我来说是一个进步。”[183]

对石母田而言，这种与朝鲜人的接触对他作为“日本人”的“民族意识”的增强也起到了作用。首先，他认为，“大部分日本人开始注意到受压迫的朝鲜人的看法”，同时，也“开始意识到自身是日本民族”。为了重新理解这种“日本人”与朝鲜人的关系，他开始阅读马克思及列宁的著作。[184]

当然，这里所说的“日本人”的意识，并非肯定日本当时的现状。1948年，石母田在《破冰者》一文中回忆与朝鲜人的交流，表示：“面对他们那种悲惨的生活，那种甚至受到同样贫苦的日本人民刻薄对待的痛苦境遇，我一度为自己不是朝鲜民族而感到庆幸，但随着交流的增多，我逐渐开始认为作为日本民族才是一种不幸。”[185]

在该文中，石母田还对战后的知识分子进行了批判：

> 对战争持批评态度或采取不合作态度的大有人在，这是因为战争破坏了生活和自由。然而，将对朝鲜民族的压迫这一看似与日本人的生活及自由毫不相干的对象作为研究课题的人却出乎意料的少。……即便是考虑到这一问题的人，大多也只是谈到朝鲜在日本战败后实现独立令人欢欣鼓舞。许多人认为日本结束了殖民统治，日本人成为自由国民或者说在美国的影响下成为自由国民，因而开始直接将关注投向欧美。但是，这并非那种被爱赶时髦、没有躯干的世界市民忽视的单纯性问题。[186]

这种批评并非空穴来风。例如，南原繁曾在1946年4月29日“天长节”进行演讲时，将战后日本的情况形容为“重新回到了没有外来异族的纯洁日本”，并主张重建以“人间天皇”为象征的民族共同体。1947年，丸山真男也以陆羯南创办的报纸《日本》上刊载的一张地图为例谈

道："这张地图上只有本州、四国、九州和北海道，而日本即将走出这个时代。"[187] 丸山和南原虽然对日本的民主化及和平问题十分关心，却几乎没有涉及在日朝鲜人问题。

石母田在批判了这种"世界市民"之后，又叙述了他熟识的朝鲜人关于儿时的回忆：我小时候赶上了三一独立运动[188]，就读的不是日本人开的小学而是被称作书堂的朝鲜民间学校。在学校，我们从老人那里听到了关于击退丰臣秀吉的李舜臣将军以及为保卫乡土奋起抗争的农民义勇军等"民族英雄传说"。朝鲜儿童对于"民族实力的自信"，便是源自这些故事。[189]

然而在石母田看来，听到这些朝鲜民间故事就应该扪心自问："日本人民是否同样有……这种故事呢？"当然，在朝鲜的民间故事中也有像"日本东北民谣那样消极、黑暗、缺乏活力的"例子，但他所听到的朝鲜民间故事和民谣似乎大部分都是"有利于开创民族未来的传统"。[190]

由此可见，关于能否以近代以前不存在"民族"这一理论对这些朝鲜人的这些"民族英雄传说"加以否定，石母田的回答是十分明确的。使他改变"民族"观并开始重新审视民间传说和神话的，是对朝鲜民族主义所产生的共鸣以及作为"日本人"的责任意识。

石母田对朝鲜民族主义的共鸣，与其对否定国家论进行的批判也有关系。在1952年的文章中，石母田对战前无政府主义者幸德秋水主张朝鲜同样应该"否定国家观念"进行了批判，并认为："被压迫民族应从帝国主义统治者那里夺取权力以确立自己的独立主权，即形成'民族国家'，否则不仅民族解放无法实现，国内的发展与革命也没有可能。"[191]

石母田对日本与亚洲关系的看法，实际上也与其一贯主张的知识分子的堕落是由于孤立于群众的见解有关。他在1951年提出："大正时期

的知识分子虽然主张自由主义，较之明治时期的人们却失去了坚强的骨气。这是因为大正时期是一个日本帝国主义已经确立并开始产生剧烈腐蚀作用的时代。”[192]

石母田认为，明治时期的知识分子所面对的，是如何使日本摆脱成为欧美列强殖民地的问题，他们具有参政意识和健全的民族主义。而与之相比，大正时期的知识分子已经习惯了大日本帝国的安定与繁荣，他们不再关心政治，而是乐于引入西方文化。由此产生的，是“没有植根于国民这个土壤，并与之分离甚至完全适应了西欧帝国主义文化的知识分子与小市民的小世界”，其基本性质就是“追随西欧而蔑视东方”。因此，“即便是成就卓著且具有自由进步思想的学者和知识分子，也常常会在朝鲜及中国问题上持有错误的看法并支持国家的侵略政策”。[193]

然而，如今的这个因战败而被美帝国主义占领并面临沦为殖民地危险的日本，已经从“帝国主义性质的统治民族变为从属国或者说是被压迫民族”。在石母田来看，这正是“日本人”通过民族解放斗争成为朝鲜和中国盟友的绝好机会。同时，这也是使日本回到帝国主义之前的“明治时期”，作为一个“民族”实现复兴，创造理想的学问的大好时机。基于这种认识，石母田主张：“做学问的目的明确地讲有且必须只有一点，那就是将日本民族从帝国主义中解放出来。”[194]

如第七章中所述，朝鲜民族主义的刺激使人们认识到日本的民族主义这一现象，在战后的日本并非罕见。而且，自战前开始便进行活动的马克思主义者或多或少地都与朝鲜人活动家有过接触。在强调“民族”的人物中，与石母田齐名的还有中野重治，石母田的《破冰者》，其题目也是出自中野为送别朝鲜人活动家而创作的《雨中的品川站》的第一节。

如第五章中所述，日本共产党自身也受到了中国及朝鲜共产党民族主义的影响。在战后从监狱中获得解放的日本共产党干部中，除了冲绳

出身的德田球一，还有朝鲜人金天海。金天海在战后的一段时间里担任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日本共产党内也有很多朝鲜党员，1950年3月发表的日本共产党民主民族战线纲领中也包括“反对针对在日少数民族的不合理的歧视性待遇，保证其民主权利、职业、生活、教育”一项。[195]

也就是说日本共产党在当时既是最强调民族主义的政党，也是对朝鲜民族主义最为重视的政党。石母田之所以支持日本共产党，其根本原因也是基于“日本共产党是唯一为朝鲜人问题进行斗争的政党”这一认识。[196]

因此，石母田一改其“民族”观并开始重新评价民间故事和神话，这样的转变虽然有他自身的原因，但日本共产党的政治方针所产生的影响也不容忽视。石母田等人的这种转变，使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中的“民族主义”较之以前呈现出了不同的内容。

民族主义的高潮

1951年5月，历史学研究会1951年度大会以“历史中的民族问题”为主题召开。

据说对于这个主题，“大部分研究者都感到无所适从”。[197] 历史学研究会虽然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为中心，但并非全体成员都是日本共产党党员。按照以往“民族”是近代产物这一常识来判断的话，包括古代史及中世史报告的大会主题中是不可能出现“民族”一词的。

并且，即便是在共产党系历史学家内部，关于“民族”观的改变也没有达成统一意见。虽然斯大林的文章已经在《前卫》上发表，但当时日本共产党已经分裂为所感派和国际派。所感派在掌权后以总部的名义发表民主民族战线纲领，提出反美斗争应优先于日本国内的阶级斗争，主张构建超越阶级的民族战线。然而国际派则批评这是放弃阶级斗争

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并将所感派指责为“民族主义者”。[198]

也就是说，1950年8月的《前卫》刊登斯大林的文章契合了所感派的意愿。当时，所感派历史学家中比较著名的有石母田正、藤间生大、松本新八郎和林基。这些人都是出自渡部义通门下的古代史、中世史学家，故被通称为“渡部派”。

因此，在历史学研究会成员中，也就必然有人怀疑此次大会的主题是所感派或渡部派的阴谋。虽然西洋史学家江口朴郎曾表示以“民族”作为大会主题是自己的提议以打消这种怀疑，却没能改变人们对这件事所留下的坏印象。[199]

在这次大会中引起争议的，是藤间生大题为《古代的民族问题》的报告。在该报告中，藤间生大提出，“为了通过让人们了解民族自豪以增强民族自信心”，应当对记纪神话中的日本武尊重新进行评价。[200]

藤间在报告中认为，与近代的“民族”（nation）不同，斯大林在其文章中提到的“民族体”（volk）自古就有，而表现这种民族意识的就是日本武尊。此后，平安时期的贵族虽然由于吸收中国文化而丧失了民族意识，但日本民族的文化创造力通过凝聚全民族力量建造东大寺、发明日本特有的片假名，以及吸收佛教文化的本地垂迹说等得到了发挥。[201]

报告结束后，会场开始沸腾。这不仅是因为受到了自古便存在“民族”一说的刺激，还因为受天皇命令征战各地的日本武尊等藤间所列举的“民族文化”大部分是在战前爱国主义教育中备受赞扬的。近代史学家犬丸义一和井上清批评藤间“极端一点说是篡改了民族的概念”，并不断质问这难道不是复活了佩戴着金鸢勋章的战前吗？[202]

对于以上质问，藤间是这样反驳的：所谓日本武尊是天皇爪牙的说法，是某一时期的政府将原本作为民族精神健全表现的神话及传承加以

篡改之后留下的。大佛同样如此，如果没有民众付出劳动协助建造，根本不可能完工。只有将统治者的教科书和文化重新加以解释并转化为革命的形式，才是对统治者灌输给民众的爱国教育最好的还击。对我的反驳大多是知识分子式的，是脱离民众的，是放任统治者扼杀民众的民族意识的。

同样被视为渡部派一员的松本新八郎对藤间进行了声援，他认为，如果只因过去的文化“带有统治阶级的味道就将其抛弃的话，那么日本民族到时还能依靠什么来进行斗争”。[203] 如第七章所述，松本主张保护文化遗产，加入了“日本文化保护会”，还主张“借鉴中共的文化遗产保护政策等”。

松本新八郎在历史学研究会封建社会分会中进行的题为《中世的民族与传统》的报告，同样对“民族文化”全面赞扬。松本表示，他所研究的南北朝时期[204] 是一个民族意识以元朝这一“古代帝国的袭来”为契机而实现觉醒的时代，是一个由古代向中世过渡的“封建革命”的时代。并且认为：“日本的民族文化中可以称得上具有民族特殊性的文化，都出自南北朝的革命时期。”

松本还表示，实现“封建革命”的武士推翻了作为古代统治阶级的贵族，在“作为完成革命的阶级道德的武士道”中，至今仍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此外，武士们通过吸收“具有中国革命写实主义性质的宋元画”中的要素创造出民族文化，“狂言、谣曲、茶道、插花等都是武士、农民在斗争中创造的”。[205] 将松本的报告整理成文章的是当时刚刚大学毕业的纲野善彦，他在松本的影响下发表过题为《在若狭开展的封建革命》的论文。

次年5月，历史学研究会召开了题为“关于民族的文化”的大会。这次大会是在“血色劳动节”发生两天后召开的，其中包括一些在游行中负伤的出席者，大会在紧张的气氛中进行。与会者除对“殖民地文

化”和“邦邦女郎文化”进行了声讨之外，还讨论了室町小歌及民间故事的革命性，并认为武士道并非统治者的思想，而是“捍卫群众、捍卫整个民族责任的道德，可以说是源自下层阶级”。此外，大会的最后一日进行了革命话剧、民间故事小品及“历史学家合唱团”的演出，藤间生大及纲野善彦等人将《万叶集》谱曲并进行演唱。[206]

上演的剧目包括东京大学历史学研究会的连环画剧《山城国农民起义》、民主主义科学家协会京都支部的《祇园祭》等以民众对统治阶级的反抗为题材的民间故事和地方历史。当然，这些都是参考了石母田《农村的历史·工厂的历史》中列举的“平次郎地藏”的例子。而学生们则将这种民间故事、连环画剧及木偶剧搬到职业介绍所门前及农村进行表演，以图启发民众进行反抗。

此外，这一时期受“民歌、民谣是大众斗争的传统武器”这一口号的影响，革命民谣及革命浪曲纷纷问世。1952年10月的《历史评论》便刊登了《民族的呐喊》这一以明治维新为题材，描写吉田松阴及“萨摩藩的爱国者们”与美国的“黑爪长毛鬼”进行斗争的故事。第七章中提到的“民族故事会”及“民族艺术创作会”等民族故事剧团也是诞生于1952年。[207]

1952年召开过一次以藤间生大、松本新八郎、纲野善彦为中心，有竹内好及远山茂树等人参加的座谈会。会上，松本提出“要反对官学派”，“要进行学术革命”；仓桥文雄也认为，“为了让历史成为真正属于大众的历史，历史学家必须像文学家那样在史料分析的基础上实现进一步飞跃”，“撰写大众性的精彩历史著作，对史学家而言既是第一要务又是责任”，并以著有《宫本武藏》的历史学家吉川英治的作品为参考进行了论述。[208] 藤间等人对自己与劳动者进行交流的经验，以及以日本武尊为题材的创作得到好评的情况进行了强调。[209]

作为当时日本共产党武装斗争路线的反映，历史上的武装斗争得到

了重新评价。与石母田将恶党定位于孤立于民众的暴力集团不同，松本新八郎认为恶党的武装斗争推动了“封建革命”的前进。据井上清回忆，在1953年历史学研究会总会上，林基曾高喊：“现在是我们应该以历史的眼光来研究武装起义的时候了。”[210]

1952年6月，《历史评论》推出“义民特辑”，其中列举了全国各地的民间故事中所提到的英雄。该特辑所赞美的，是敢于为民请愿的田中正造和佐仓惣五郎等常作为评书题材的“义民”。在当地的历史学研究会的推动下，全国各地开展了将“义民”作为“国民英雄”进行纪念的“义民显彰运动”，还出现了以义民为题材的连环画剧。[211]

当然，对于这种倾向，当时也不乏批评之声。丸山真男在1951年的文章《日本的民族主义》中就指出，“前期的”民族主义“以其现有的形式绝不可能通过与民主革命相结合而成为新民族主义的支柱”，并警告左翼阵营：“如果将其错误理解为民族意识的萌芽，或明知其前期性却经不住诱惑而为了达到眼前的政治目的故意利用的话，很可能会自食其果。”[212]

如第七章中所述，丸山在这篇文章中写道：“在亚洲各国中，日本是唯一一个在民族主义上已经失去处女性的国家。”虽然他对“仍是处女之身”的亚洲各国抱有好感，却可以看出其中的“已经”一词也表现出对中国及朝鲜在不久的将来可能会面临与日本相同的问题的预见。

除此之外，还有来自马克思主义史学内部的批评。关于《民族的呐喊》一文，古代史学家祢津正志就评价道：“这是将向封建制度倒退的攘夷与当今的民族独立混为一谈，这与当年军部的‘鬼言英美’思想没有任何差别。”[213]

其中，批评得最为尖锐的要数井上清和犬丸义一等近代史学家。如前所述，犬丸曾将藤间的看法批评为“极端一点说是篡改了民族的概

念”。井上也在1953年反驳道：“难道只要是‘民族’的文化就可以不顾及其是不是封建性文化了吗？”“所谓反封建听起来似乎是近代主义的一个错误。”并对“将现在的民族问题拿到古代去谈的做法”进行了批判。[214]

虽然如此，同为共产党员的犬丸和井上对民族主义本身还是持肯定态度的。井上在批评松本的同时也表示，“日本民族被当作美帝国主义殖民地的奴隶，民族文化因殖民化而一蹶不振”这一认识是“完全不存在任何偏差和错误的”。[215]

关于将历史叙述与现代相结合，井上的态度反而十分积极。在1955年出版的岩波新书《条约修订》中，他将副标题定为“明治的民族问题”并将国粹主义者对内地杂居和不平等条约的反对比作当时的安保条约抗议游行。井上认为：“明治维新将日本从半殖民地化中拯救出来，这才使得日本能够在当时及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处于亚洲发展的最前端并成为亚洲的希望。”[216] 可以说在当时，共产党系历史学家中基本没有人对民族主义本身持否定态度，其争论主要是围绕应该肯定历史上哪个时期的民族主义。

事实上，井上等人的批评是受到了日本共产党内部斗争的影响。如前所述，国际派曾批评所感派只重视反美斗争而放弃了阶级斗争，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而对于赞扬统治阶级文化的藤间和松本，国际派的井上同样批评其“一味主张民族独立而放弃了阶级斗争”。[217]

在井上等近代史学家看来，只要“民族”还是近代以后的产物，那么“民族问题”就应该属于近代史学家的特权。在1951年历史学研究会的大会上，作为“对古代史和中世史的要求”，近代史学家铃木正四提出：“应该对古代和中世时期不存在民族（nation）这一问题进行具体例证。”[218]

对于这种要求，有人反驳道：“这只不过是让古代史和中世史学家

进行无谓的努力罢了。”[219] 如前所述，近代史学在战前遭到彻底镇压，当时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主要以中世史及古代史研究者为中心。

据石母田讲，他起初有过对群众如何接受天皇制这一过程进行研究的打算，但“对于并非专攻近代史的自己来说，这是一件力所不能及的事”，这才转而撰写《中世世界的形成》。此外，在接受了“民族”一词的形成可以追溯至近代以前这一观点后，石母田谈道：“在民族问题上自己的关注点开始有意识地转向古代。”[220]

所感派改变“民族”观的建议，在古代史和中世史学家中十分受欢迎。据纲野善彦回忆，当时的共产党系历史学家大部分都属于所感派，而属于国际派的只有井上清等少数近代史学家。虽然古代史学家中也有诸如祢津正志、旗田巍等对藤间等人的“民族”观持批评意见的人，但出于以上原因，当时马克思主义史学界的大部分人对于改变“民族”观的建议还是持赞同态度的。[221]

“民族文化”得到赞扬时，与石母田对法隆寺及茶道等文化进行批判的1948年截然不同。谈到“民族文化”就是武士道和日本武尊，而谈到“接近民众”就是《宫本武藏》和浪曲，人们的这种反应就像石母田对农村的印象一样，可以说都是有些缺乏想象力的。

在1948年，将“民族”视为近代产物的看法与所谓理想“民族”形成之前应重视阶级斗争的认识都是对单纯的“民族”礼赞的一种牵制。赞赏大佛及日本武尊的藤间生大也曾在当时的座谈会上表示，“为建造巨大佛像统治者是如何驱使人民的，这必须写进去”，“呼吁保护日本文化的人，他们头脑里最先浮现出来的肯定是《万叶集》和法隆寺”。[222]

然而到了1950年，当这种牵制消失后，就连本来批判旧“民族”观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也失去了谨慎的态度。他们原本和其他日本国民一样，都是成长于战前的爱国教育下。也就是说，当可以通过开展革命的

形式使用“民族”一词时，他们就倒退至数年前还习以为常的那个语言形态上了。

同时，这也反映出他们通过战争经历所培养的“命运共同体”意识。在1951年历史学研究会的大会上，藤间生大以《古事记》中有表现日本武尊离开故乡最终战死的歌曲，而《日本书纪》中则将日本武尊的功绩全部归于景行天皇为例，认为天皇制歪曲了“民族神话”的内容。而且，如果将这一事实向经历过战争的工人们进行宣传的话，“可以加深他们的民族自豪感与对和平的渴望，从而更加对天皇制充满仇恨”。对于反对赞扬日本武尊的井上清，藤间生大驳斥道：“我只能认为那是一种将战死在南方的学生兵骂作无能之辈的态度。”[223]

在1950年的座谈会上，丸山真男对当时的学生是这样评价的：“白天还口沫横飞地谈论主体性和民主革命，在晚上的联谊会中小酌几杯就变得一塌糊涂，接着便会大谈自己在军队时如何如何。而且，最后唱的也一定是军歌。”[224] 如第七章中所述，当时的日本共产党党员中有不少人是“从特攻队队员直接变成共产党党员”的。同样，历史学界所提倡的“民族”一词，实际上也与当时人们的这种心情一致。

“历史学的革命”

与藤间和松本相比，石母田并没有过多地强调古代和中世的“民族文化”或“民族英雄”。他曾在1952年的文章中以“不建公民馆而修缮松江城是本末倒置”，来表达对“封建文化”保护的不解。[225]

实际上，石母田一开始便没有打算将黑田恶党等武士作为英雄来加以赞扬，其论文的重点在于强调与群众的结合。在评价恶党的问题上与松本新八郎意见对立，实际上也是石母田这一思想的表现。

石母田所真正主张的，是“国民历史学运动”。该运动是他在《农村

的历史·工厂的历史》中所主张的理念付诸实践后的结果，即群众通过书写自己的历史来获得“话语权”，而知识分子则通过对群众的帮助来推动自己的学术研究。

“国民性科学”一词，最早出现于石母田以民科总部书记员的身份在1952年1月发表的题为《关于民科目前任务的一点意见》的文章中。在该文中，石母田主张为了实现“民族解放”这一目的，知识分子应该将“融入大众”与“学术创新”二者结合在一起。[226]

当时，日本共产党已经转入地下，公开场合进行启蒙活动变得十分困难，因此兴趣小组活动作为植根于工厂和农村的运动方法十分受到关注。如第六章中所述，认为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应当到劳动市场或农村，在民众中实现自我改造的主张以前就存在。

1950年代初，受毛泽东思想的影响，“到群众中去”十分流行。据藤间生大讲，作为新历史学实践的范例，石母田在1948年就列举过中国共产党要求所有经历过长征的人写下体会的例子。[227]

如第七章中所述，当时，《山彦学校》的成功使生活记录运动格外受关注。石母田自然对此表示支持，并鼓励工人和农民结成兴趣小组进行工会和农村历史的编纂工作。

现在人们经常使用的“兴趣小组”一词，在战前本来是指马克思主义共同学习会，而在这一时期开始被广泛使用了。

在被称作“历史学的革命”的“国民历史学运动”中，人们对之前历史学中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进行了重新思考。首先，以往偏重史料解读的方法得到了纠正，对民间故事及传说等史料的使用，以及对村里老人及妇女的访问调查开始受到鼓励。其理由是，文书史料都是擅长使用纸和文字的统治者留下的资料，其中并没有反映民众的意识。

这种研究方法与柳田国男开创的民俗学研究方法是一致的。柳田国男一开始便反对知识分子追随西方的模式，他认为通过文书史料无法书写百姓生活的历史，因此开始对地方的民间故事及传说进行调查。[228]大众思想与民族主义的结合，也是柳田的民俗学与石母田等人的国民历史学运动的共通之处。如第七章中所述，这一时期人们对民俗学的关注度随着亚洲取向和大众思想的抬头而不断升高，石母田及鹤见和子等人都主张与民俗学进行合作。

同时，国民历史学运动中还强调学术成果要与群众共享。兴趣小组活动及询问调查被视作与群众的共同工作，而知识分子将其成果作为“个人成果”的做法则备受指责。[229]兴趣小组的研究成果必须由小组成员联名发表，较之研究成果应更加注重小组参加者个人的进步。此外，由于访问调查的成果是研究者代替民众进行记录的，因此方便与群众分享其成果的历史记述受到了推崇。

此外，运动还强调对女性的重视。石母田在成为国民历史学运动指导性著作《历史与民族的发现》中以“群众与女性的历史”为题单设一章，就像他在《农村的历史·工厂的历史》中所主张的那样，呼吁人们关注朝鲜人的历史及女性历史等在以往的历史学中被忽视的领域。

在民科历史分会的机关杂志《历史评论》1954年7月号中设有题为“母亲的历史”的特辑，其序言便由石母田撰写。即便在群众之中，“母亲”也被认为是与“近代主义”最无关联的，是最没有话语权的“群众中的群众”。石母田认为：“父亲即便拥有‘近代’的思想，其人性也被资产阶级出人头地主义所毒害。与此相对，母亲即便是‘封建的’，却能让自己与孩子的人性避免来自外界及父亲权力的影响。”[230]“母亲的历史”便是在这种中心思想下，通过对农村及工厂等地的女性进行生活故事的访问调查来掌握群众意识及社会矛盾。

当然，对于将这种群众取向运动称为“国民历史学”，社会上还是存

在一定的反对声音。在1952年5月民科第七届大会上，出现过关于“国民”的意思到底是“日本”还是“大众”的争论。在1953年6月的第八届大会上，还出现过认为使用“‘国民的’或‘民族的’等形容词容易让人联想起国粹主义或纳粹主义，因此不如使用‘为了国民的科学’这一表述更为合适”的意见。[231] 然而，在日本共产党放弃使用“人民”而改用“国民”一词后，“国民历史学”这一称呼也逐渐确定下来。

在这种情况下，《历史评论》1952年10月号中刊载了题为“为了国民科学的创造”的特辑。其目录中有《为丰富群众生活——民间故事会的成果与课题》、《融入农民生活情感中去——民族艺术创作会的工作》、《来自川崎工人的兴趣小组》、《连环画剧〈祇园祭〉的创作》等报告。除此之外还加入了《历史故事〈民族的呐喊〉》、《日比谷的烧打事件——明治时期的日本人如何面对“屈辱媾和”》等历史学论文，以及《过去的工人歌曲·现在的工人歌曲》、《关于浪曲的讨论》等群众文化的相关文章。

作为这次国民历史学运动中的成功事例，1953年“月之轮古墓”的发掘与1952年的《水滴石穿》得到了广泛赞誉。[232] 在月之轮古墓的发掘过程中，当地民众与古代史学家共同发掘的情景被拍摄成录像，这被视为知识分子与群众团结起来共同创造“国民历史”的一个事例。《水滴石穿》是东京都立大学历史学研究会的学生在暑假期间深入秩父地区的山村，通过调查访问写下的“农村的历史”。

《水滴石穿》中所讲述的山村，在自由民权运动末期发生了被称作“秩父事件”的农民起义。该调查发生在1952年夏，日本共产党领导下的全学联号召学生利用暑假进行全国性农村活动也发生在这一时期。

在朝鲜战争正在进行时，日本共产党将主要精力集中在以山村工作队为代表的农村活动，并不断宣传“革命即将到来”。关于当时的情况，1962年2月，竹内好写道：“1950年，战争与革命已经由预测变为现实。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二年，就爆发了朝鲜战争。同时，在日本也有许多人认为革命的爆发已经成为必然。在当时，应该没有任何人会料到十年后的今天会天下太平吧。”[233] 从某些方面来看，在这种氛围下开展的国民历史学运动，可以说就像山村工作队这一政治运动的历史版一样。

然而，即便日本共产党及全学联的方针是如此，参加该运动的学生在认识上也有些不同。农村调查“如同石头溅起的水花”引起了学生的广泛参与，其中就包括加藤文三，他在1953年回忆道：

> 历史研究会中也有一些人认为，应该“为了使村民起来革命而去”或“为加强农学联合而去”。然而，比起这些来我们所不满的是在学校里学到的历史学，也就是我们所接触到的学问。因为我们发现自己无法用这些东西具体解决一些常见的问题。……最使我们感兴趣的，同样是如何将历史学变得更加生动、如何让自己的学问服务于国民等问题。总之，我们其实是为了改变历史学的现状才决定去农村的。[234]

在这段话之后加藤又讲道，为了就职，不得不听一些毫无用处的讲义，“在所有课程内容没有发生改变，学术没有成为生动的学术之前，为了生存下去，我们即使觉得无聊，也只能去上课并不停地挥动钢笔”。[235]

因此，学生们对“历史学的革命”产生共鸣，不仅出于对社会变革的热情，还有对大学的学术的不满。

在这些学生中，汇集了石母田各种观点的《历史与民族的发现》十分受欢迎。在该书中，石母田将1952年5月的“血色劳动节”比作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开端的“血色星期日”和“五四运动”，并呼吁大家参加国民历史学运动。在当时的演讲中，石母田对学生们说：

> 你们本来只要在大学里认真努力、勤做笔记、提高成绩，将来就有可能成为政府部门或公司的领导，也可以获得高高在上的特权地位。也可以

> 靠每天打打麻将跳跳舞、拍拍教授马屁、搞搞人际关系而出人头地。当然，也可以不顾祖国和人民的痛苦，一心钻研学问而成为学术界的权威。除此之外还有各种各样的方法，但你们却不屑于这种生活和学习的方式……发现自己内心的矛盾很难依靠一己之力解决，在同学之间奔走疾呼，凝聚力量，结成组织。这种现象最近在学生中间正快速地发展，这是祖国的现状所带来的变化，是知识分子开始与群众携起手来共同组成国民的历史性巨大变化。知识分子的行动已不再像战前一样孤立于群众了。[236]

在大学升学率低、学生心中还存在精英意识的那个年代，这种呼吁获得了共鸣。无论是学生还是石母田这样的大学教授，他们对于大学及学问的这种批评都与当时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社会地位有关。战前，许多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因无法在大学谋得一席之地而独自进行研究。石母田虽然在战后进入法政大学，但在当时针对共产党的整肃进行得如火如荼的大环境下，也是朝不保夕的。因此在无法在大学中谋得一席之地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中，本来就存在一种对学院派及大学校方的批判情绪。

此外，对变革的研究实际上也是他们自身的变革。石母田在批判以往历史学轻视女性和群众，脱离现实而成为学者获取成功的手段时，就访问调查说道：

> 但是，我想请问大家，你们有没有站在被调查者的立场上思考过这个问题。……一个人不会轻易将自己的痛苦、迷茫以及在心底不断思考的问题轻易告诉别人。……“为了学问”这句话，在被压迫阶级来看是与自身毫不相干的。群众依照长久以来的经验，会本能地认为学问不过是为统治阶级而服务。你们如何保证自己的“调查”是真正为了人民和自己呢？想要深入人的意识内部就需要一种信任感，请问你们是否已经通过自己的行动博得了群众的信任呢？不仅如此，所谓调查常常是以人的内心世界作为“素材”。……对人的内心世界进行的“调查”，往往并非感性而是理性的。
>
> 大家所进行的道德说教已经够多了。正因为我自己也有这种缺点，所以才要告诉大家……要知道学会尊敬人、尊重群众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而深刻体会到这种困难才是我们需要迈出的第一步。[237]

这种“改变人的努力”，在当时同样得到了年轻人的广泛支持。学生们在读过“文化即创造、创造即斗争”、“群众想要知道的，是你们打算如何去做”等石母田的主张之后，开始纷纷奔赴农村和工人聚集区。[238]

在这些学生中，也包括当时年仅23岁的中世史学家纲野善彦。大学毕业后，他担任常民文化研究所的研究员，在林基和藤间生大等人的建议下开始到工人学校授课。在民科的通信中，纲野讲述了自己的讲义起初被工人们指为十分无聊，而后又通过努力成功地提高了自己的学问并与工人打成一片的经历。这篇文章在1953年被石母田收入《历史与民族的发现续》，并作为“青年一代”的实践范例受到称赞。[239]

对于东京都立大学的学生们创作的《水滴石穿》，石母田同样赞不绝口，并非因为他们编纂的村史出版，而是因为他们在下乡过程中实现的自我变革且得到了好评。在高等教育的升学率低下的当时，该村中没有一人能考入大学，听说村里来了东京的大学生，村民们起初都是满面惊诧地出来相迎。在学生寄给《历史评论》的体验记录中，也谈到起初村民们常说一些诸如“你们不要只是玩，熟悉一下割草吧”，“你们毕业之后应该都能进政府或者当大官吧”之类的话，因此他们决定在开始调查之前先帮忙做些农活，最后终于得到了当地民众的欢迎。[240]

共产党系的学生所开展的农村工作，虽然由于警察的强烈干涉基本没有产生任何政治效果，但也有像这样受到农民欢迎的例子。作为当时的一个特权阶级，“学生”能够耐心地听农民讲话，不求报酬地帮做农活，还会进行连环画剧和木偶剧表演，这在当时缺少娱乐的农村确实博得了农民们的好奇心和好感。

关于当时的山村工作队，鹤见俊辅这样评价：“虽然在看问题上还有些稚嫩，但学生们确实十分天真无邪、十分认真。对于他们的天真无邪和认真，村里的大人们应该说大多都觉得十分有意思。而且，这也并非不是学生们所期待的反应。”[241] 这种对“学生”的敬意和好感一直持

续到大学开始普及的1960年代中期，也成了1960年安保斗争高涨的基础。

国民历史学运动从参加学生的心情上来看，可以说与1960年代的全共斗运动在某些方面有着共通之处。只不过1950年代的特征，是以“我们学生与农民是同一个民族”、“我发现了民族”之类的语言，来表现通过活动获得的集体感和实现自我变革。[242]

运动的终结

然而，国民历史学运动自1953年便开始走下坡路。这是因为，参加运动的学生虽然认真，但不够成熟。

运动中的问题，首先是学生内部出现的以“民族”和“群众”的名义对他人进行攻击的倾向。主张进行“历史学革命”的他们，每当遇到与自己意见不合的学者或教授，便会指责对方为“反革命”或“近代主义”等。

包括《水滴石穿》在内，国民历史学运动中创作的“农村的历史”及“母亲的历史”从学术角度上讲大部分不过是肤浅的自由研究。在《历史评论》刊载这些文章之后，一些专业的历史学家便对其进行了诸如“最好再多学点历史”、“与其说是研究不如说是报告文学”的评价。面对这种批评，学生方面也进行了诸如“那些人搞的仍然是脱离群众的旧学问、是封闭在象牙塔中的学问”、“其立场不过是作为旁观者的批评家罢了”的反击。[243]

1954年，在学生等年青一代握有主导权的民科全国委员会准备会报告草案中，将兴趣小组创作的“母亲的历史”及“农村的历史”称为“日本历史学史上的一大金字塔”，而认为历史学家“仍然是持有那种专业的看法，没有从国民的立场出发对这些成果加以承认”。学生们在会议上对以往历史学的“小资产阶级性”及“学院派性质”加以批判，并认为“目前

为止的左派学者，除了石母田、藤间、林、松本四位老师外，也都是非国民历史学”。[244]

此外，如前所述，那些反对赞扬古代及中世“民族文化”的人也常常被批判为“近代主义者”。前文提到的在1949年对石母田及藤间等人进行批判的铃木良一曾说道，在国民历史学运动期间批判他人为“观念论者、社会民主主义者、实证主义者、近代主义者、世界主义者等”的风潮成了主流。[245]

导致情况恶化的最重要原因，是日本共产党内部的斗争。在所感派与国际派互相谩骂、查问及私刑泛滥的情况下，是否赞成国民历史学运动已经成了对一个人政治立场的判断标准。

例如，批评藤间生大将日本武尊奉为“民族英雄”的井上清，就曾在1954年受到藤间生大的查问而被迫提交自我检讨书。甚至井上在自家修建水井，都被批评为“资产阶级生活作风”。此外，据井上本人讲，赞成他批评日本武尊的人也先后遭到查问而“一个个地被要求做自我批评，甚至被开除党籍”。[246]

井上在数年后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道：“在进步派史学界反对《历史与民族的发现》和《英雄时代论》的我，甚至成了人民公敌。”当时，井上因害怕连累“自己的青年朋友”，甚至表示：“即使你们在大街上认出我也要装作不认识，千万不要来我家。”[247]

日本共产党方针造成的负面影响还不止如此。与石母田当初的期望相反，认为兴趣小组和农村调查不过是日本共产党扩张势力的手段的倾向也在逐渐加强。石母田后来回忆：“当时只将兴趣小组看成一种新式手段的想法，或只注重兴趣小组和其人数而不关心其活动内容的倾向”在民科中变得越来越强。[248]

在这种情况下，参加运动逐渐变成一种强制或义务。一些希望将自己的研究放在第一位的历史学家甚至开始抱怨：“难道无论如何都无法理解‘国民科学’的人就不是一个合格的人吗。”然而，这种抱怨又被“批评为每个研究者的主体性问题，这种批评最终又变成了谴责”。[249]

石母田起初主张通过参与“政治”进行自我改造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因为这可以与自己研究的发展相结合。然而，在对这次运动怀有疑问的学者中，却又存在诸如“我认为最近我们的争论似乎是关于政治至上主义与学问至上主义的争论”、“我认为从农村和兴趣小组那里获得直接对研究有所帮助的东西，大部分情况下是不可能的”之类的看法。[250] 当对“政治”的参与变质为义务和强制时，“政治”与“研究”的对立局面便产生了。

此外，参加这次运动的学生也常常过于性急和不够成熟。在某大学的历史学研究会中，就爆发过关于应该学习吉田松阴的爱国心还是应该将其视为反动代表人物的争论。然而事后得知，参加这次争论的学生根本就没有读过吉田松阴的任何一部著作。[251]

这种倾向也存在于农村工作中。大部分学生对自己到过的农村及农村生活根本没有一点了解。1952年夏，民科京都支部历史小组成员在京都北部进行了一次农村工作。参加过该次工作的中塚明回忆：“在到达之前，关于自己要去的农村，我们只知道那是一个左派势力还没有发展起来的地区。”[252]

实际上，“群众”的反应要比他们想象的复杂得多。例如，当奈良的学生兴趣小组表演反映江户时代百姓穷苦和起义的连环画剧时，农民的反应却是：“比起过去来，今天的生活还算可以。”当一名老人被学生问及1918年发生的米骚动[253]，他的回答只是：“那些是黑社会干的，正经人不会做那种事。”[254]

对学生进行指导的学者也有同样的缺点。例如，关于兴趣小组，石母田建议学生们要从“最贴近群众生活”的历史写起。然而，当他询问一个妇女兴趣小组想要学习什么的时候，最多的回答却是“想知道亚洲的事情”，石母田对此感到十分意外，经过询问才得知“小组成员三十人中有十人在战争期间生活在中国及朝鲜等国家”。[255] 这说明石母田印象中的“群众”根本不同于现实中的群众。

据石母田回忆，他在借宿于木曾的一个农家时，听农夫讲过野猪破坏农田的故事，而当时那个农夫“边讲话边听着旁边收音机里播放的东京流行歌曲和世界新闻”。虽然石母田是东北人，但他也承认：“完全不了解关注出口香港的津轻苹果行情的农民有着什么样的想法。”[256]

在后来分析国民历史学运动的失败原因时，石母田指出其中之一就是照搬中国共产党的农民政策。在1950年代的日本，“无论是多么偏僻的农村，其村民的精神世界都与旧中国不同，而我们在农村所开展的文化运动却基本与中国没什么两样”。[257]

石母田曾在1951年对知识分子蔑视大众的态度进行批判，他指出：“在知识分子眼里，所谓大众不过是只懂得浪曲和股旅物的低俗家伙。”然而，将革命性民间故事和革命浪曲称作“民族文化”的，却正是国民历史学运动。石母田后来进行自我批评时也提到：“我们完全没有改掉大正时期以来知识分子对农村的偏见，这使我们对国民的总体印象产生了很大偏差，也使我们科学运动的内容与百姓产生了距离。”[258]

也就是说，“到群众中去”这一理念本身就是源自对群众的无知。网野善彦也在运动中期“开始感觉到‘到群众中去’这一理念本身就具有概念性和复杂性”，“在运动中使用这个口号，会产生各种摩擦”，故从1953年夏便退出了运动。[259]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国民历史学运动持批评态度的井上清却是一

个出身于碎石厂短工家庭，在考入大学之前一直边打石头、编草席边上学的人。井上清在国民历史学运动失败后曾提到："大少爷和大小姐们到了农村之后，对人民的贫苦和封建制的根深蒂固感到吃惊并被强烈震撼，我认为这也是一种很好的学习，但最终他们还是没能发现历史的本质。"[260]

在运动遭遇挫折的情况下，专业历史学家也开始对历史学研究会及民主主义科学家协会敬而远之。据远山茂树讲，从1953年开始，出席历史学研究会小组会的"都是一些年轻的学生和一些常客，很少能再看到专业研究者了"。[261] 朝鲜战争进入停战的1953年，也是日本共产党武装斗争路线初现颓势的一年，党内纷争导致党员数量锐减，而这种情况几乎与国民历史学运动的停滞发生在同一时期。

同时，运动的理念也出现了问题。远山认为，"他们所特意强调的超越近代历史观，实际上不过是突然想出来的一个假说而已"，"对其进行的讨论也经常是在没有任何结果的情况下便告结束"。他还在1953年的《历史评论》中讲道："一直以来积极进行工作的人们已经开始失去了信心"，"我认为并不是任何一个民间故事都能被称作民族艺术。希望对民族文化的含义能有一个理论性的说明"。[262]

此外，学生及学者对组织的运营也产生了意见。在1953年7月民科总部的通信中便有人批评道："所谓'进步的科学家'却不缴民科的会费，作为班或讨论小组的一员却不参加组织活动，开会迟到、缺席是常事，不做研究而只是一味地大谈方法论。"据参加这次运动的活动家梅田钦治称，历史学者和学生们"无法习惯在一起工作"，"还暴露出在讨论时容易感情用事、对组织最基本的情况都完全没有了解的问题"。[263]

在这种情况下，给运动带来致命一击的是1955年7月六全协后日本共产党的方针转变。山村工作队等武装斗争路线被定性为"极左冒险主义"，受到查问后实际上处于被整肃状态的国际派党员开始重新掌权。

六全协召开后不久，在1955年11月的民科历史小组全国总会上进行了对国民历史学运动的全面批判。“那只能叫作文，根本没有继承以往历史学的成果”、“运动中存在急于将一般学生与农民结合在一起的政治性指导”、“运动完全脱离了学会”等批评接踵而至，当有人读到对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性进行批判这一去年的运动方针时，会场爆发了一片嘲笑之声。[264]

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界内部，人们的立场也发生了180度的转变。石母田和松本被迫进行自我批评，而井上清和祢津正志则恢复了地位。祢津正志批评国民历史学运动为“苏联学生的做法”，井上也表示：“左派在做这种愚蠢的事情时，正经的学院派研究者陆续回到了研究岗位，现在可以看出二者的差距有多么大。”[265] 与对研究室里的学院派进行批判时相比，当时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运动的瓦解深深地伤害了许多人。以往的运动方针遭到否定，这使得学生中对“政治”的不信任感迅速扩大。因参加运动放弃了升学和研究机会，为了恢复生活而历尽艰辛者也不在少数。在运动的摩擦与内部纷争中选择辞去常民文化研究所工作，而后又改任高中教师的纲野善彦，直至1960年代后半期基本没有发表过任何论文。当时的活动家梅田钦治回忆，自己在运动失败后“为了恢复以往的生活花费了超过五年的时间”。[266]

运动领导者的态度则更加令这些人失望。参加运动的年轻人大部分有战争期间被动员到战场或工厂的经历。而对于将自己派到农村的领导者，他们最关注的是这些人在运动失败后将如何交代。

然而1956年，曾在历史学研究会饱受抨击的松本新八郎虽然表示了“歉意”，但据祢津正志讲，“松本将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当时的形势和朝鲜战争等’，而关于自己他则表示‘已经竭尽全力’”。对于松本的这种态度，祢津评价其“给人一种根本没有任何反省的印象”。曾师从松本的

纲野善彦对此也十分不满，自那之后再没和松本打过交道。[267]

石母田虽然在1957年发表了自我批评的文章，但因内容同样含糊其词而被人指责为“官僚作风”或“怯懦”。甚至一度被视作国民历史学运动指导性著作的《历史与民族的发现》，也被犬丸义一批评为“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反面教材”。[268] 石母田本想通过参与政治和学术研究的变革来弥补自己在战争中对“年青一代”的愧疚，但结果断送了许多青年的人生，也因此而遭到了谴责。

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国民历史学运动就像过去的噩梦已开始被人们遗忘，对“政治”的忌讳也在历史学界成为普遍现象。铃木良一在1956年的《历史学研究》中，对那个动辄给人贴上“实证主义者、近代主义者、世界主义者”等标签的年代进行了批判，同时表示：“动不动就上纲上线的做法实在可笑”，“不希望把这种东西带到历史学研究会里来”。[269]

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在奠定其在大学中地位的同时，以文书史料为中心的“实证主义”也随着对“学院派”批判的消失而作为历史学的正确方法确立下来。在那之后，民主主义科学家协会自动解散，而历史学研究会则作为一般性质的学会延续至今。

在1959年的评论中，井上清在谈到当时历史学界的情况时写道：“与以往的政治主义相反，现在成了书斋主义。”尽管有必要对运动进行反省和再思考，但最终只是以“沉默代替了自我批评”，成了“惊弓之鸟”的历史学者开始远离群众和现实，并开始逐渐倾向于“为了学问而做学问”。[270]

此后远山茂树和梅田钦治等人虽然曾经尝试对运动进行总结，但最终1950年代前期的这次事件作为历史学界的一道伤痕被尘封起来。参加过运动的人大多不愿谈及此事，随着历史学家的新老交替，就连运动中

存在的问题本身也被人们忘却了。在这种情况下，网野善彦对关注民众文化及女性、中世“民族”意识的产生等国民历史学运动中的主题加以分析，在1970年代后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中世史研究。

在运动宣告失败前后，石母田也因身体健康问题开始淡出历史学舞台。5年后的1960年，石母田通过发表《“国民历史学”备忘录》对运动进行了总结。在该书中，他对自己过于缺乏对民众的认识进行了自我批评，又间接地对将学术运动作为政治动员手段加以利用的日本共产党进行了批评，具体内容如下：

> 用参加兴趣小组的时间来做“研究”，确实既有效率又容易出成果。虽然如此，人们去兴趣小组的原因首先是那是一件快乐的工作，不只是大家能够聚在一起……通过肩负共同责任而产生的新的人际关系，使我们感受到了创造一个集体所带来的快乐。其中也有过去的启蒙家所不了解的一面。……兴趣小组活动不是“义务”，将兴趣小组看成强加的“义务”的人一开始就不该参加。[271]

本应以这种“喜悦”和“快乐”为出发点的运动却被政治性的“实用主义”所利用而变成了“强制”和“义务”，石母田对此感到十分懊悔。然而无论初衷如何，从结果上看，石母田所倡导的运动，与战争一样对许多年轻人造成了伤害。网野善彦回忆道：“石母田老师是唯一一个在国民历史学运动失败后对我说过‘网野君，对不起’的历史学家，其他人的态度则似乎不同。”[272]

那之后石母田虽然带病继续坚持研究，但最终在1973年患上了不治之症——帕金森综合征后连读书走路都开始变得困难。在80年代的一次历史学研究会上，石母田在妻子和拐杖的帮助下来到了会场，藤间生大形容当时的情景“简直太惨了”。[273] 经过超过10年与病魔的搏斗，石母田在为自己曾经在战火中写下的代表“挫折与失败的历史”的《中世世界的形成》文库版写下序文后，于1986年离开了人世。

在《历史与民族的发现续》中，石母田曾就地方兴趣小组杂志刊载的工人文章在政治上的不成熟有过以下的看法："读过这篇刊载的文章后对工人嗤之以鼻的知识分子是和我们无缘的。只有边读边能感受到工人痛苦的人才和我们谈得来。"[274] 以"民族"一词为标志，希望摆脱孤立和实现学术革新的国民历史学运动，已经在政治的变化中失败并逐渐为人们所忘却。然而这一时期所提出的一些问题是否在今天能够得到解决、是否现在的我们可以对当时人们的摸索与错误"嗤之以鼻"，则是另一回事。

第九章 战后教育与"民族"

在论述战后的民族主义时，教育问题无法忽视。尤其在如何看待"日之丸"和《君之代》的问题上，日教组与政府之间的对立关系已成众所周知之事。本章将对战败后直至1950年代中期的日教组及进步教育学家的民族主义进行探讨。[275]

从结论上看，同战后大部分左派和进步派一样，以日教组为中心的进步教育运动不是对民族主义进行否定，而是试图摸索一种不同的民族主义。并且和历史学一样，进步教育运动与战前民族主义之间同样存在错综复杂的差别与联系。

战后教育的开始

在战后教育改革的问题上，占领军的反应十分迅速。截止到1945年12月，相继发布了一系列指令，其中包括设立整肃军国主义教育人员的审查机关，教育与神道分离，以及修身、日本史、地理教育等课程的暂时停课。

1946年3月，美国教育访问团来到日本并向盟军最高司令部提交了调查报告书。这份报告中主张建立尊重个人价值和尊严的教育，并提出

了设立公选制教育委员会及实行九年义务教育、男女同校等方案。

1947年3月，远东委员会开始禁止在教育问题上所颁布的敕语[276]，并在同月制定了《教育基本法》。这部强调“个人价值”、“人格形成”的基本法，其首要目的并非制定具体的教育制度，而是阐明战后教育的理念，或者说只是为了取代战前的《教育敕语》。

从1947年4月开始，全国开始实行小学6年、中学3年的所谓“六三制”。初等教育中的修身、历史、地理等课程遭到废止，取而代之的是新设置的“社会课”和“指导教室”（homeroom）。最开始的社会课取消了以往的背诵书本，而是让孩子们进行讨论和实地体验，其目的在于培养自主性人格。

然而与这种制度上的改革相比，人们在意识上的变化要缓慢得多。其最主要原因，是从事教育的人员与战前相比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例如，文部省在1945年9月15日发表的《新日本建设基本方针》中表示，“要重新讨论以往的教育方针以适应目前的新情况”，同时又提出，“今后的教育应致力于维护国体”。[277]在占领军的命令下，改革和针对教员的审查及整肃虽然得到了实施，但日本方面进行的审查十分宽松，遭到整肃的教员也只占全体教员总人数的0.5%，大学甚至只有0.3%。[278]关于废止《教育敕语》的法令，同样在远东委员会颁布命令后，又经过了一年以上的时间才于1948年6月在国会通过。

在这种情况下，战后教育界中出现了改变的制度与没有改变的教育者之间的矛盾。结果，昨天还在向学生灌输“鬼畜英美”和天皇崇拜思想的教师，一夜之间便成了美国和民主制度的赞美者。这种现象引起了学生的不信任，并将“战后民主主义”富有欺骗性的印象深深地植入了学生的意识中。

然而，这种从“鬼畜英美”到“民主主义”的转变虽然看似在没有任何障碍的情况下顺利进行，事实上却包含许多令人感到奇怪的混乱。关于这一点，日本投降时还是一名中学生的山本明在讲述1945年秋学校的情况时回忆道：

> 第二学期的第一节课，是在没有举行开学典礼的情况下开始的。曾教授军歌的音乐老师“可能也是由于日本已经战败的缘故，居然告诉我们今天学唱美国的爱国歌曲”，接着就开始朗读黑板上的英文歌词。我的战后就这样开始了。
>
> 所谓“战后”，实际上不过是曾经的教育敕语和宣战诏书变成了现在的美国爱国歌曲而已。陆续复员归来的高年级学生将低年级学生聚集在一起，并演讲道：“当我们回到久别的学校时，却发现你们这些忘记了T中精神的家伙在吊儿郎当闲逛。……全部给我闭上眼睛。认真听我讲，认真反省！注意了……想一想你们是否失去了至诚！”
>
> 这时的情景仿佛是在战争时期。食物逐渐变得匮乏，能吃上红薯就已经谢天谢地了。
>
> 在初中，那些曾经因“满怀拯救祖国于危难的爱国热情投笔从戎”而备受赞誉的预备役飞行员复员回到了学校。他们在操场上一边抽着烟一边用威胁的口吻对老师们说：“居然把我们送去预备役，你们别想就这么算了。”感到恐慌的校方为了把这些学生与低年级学生分开，而将他们关进了用战时的弹药库改造而成的教室。……
>
> 到了1946年……大街上日本共产党用右斜瘦体字书写的“打倒军事封建天皇制”的海报被人撕了下来。当时还是初中一年级的我对此表示赞同。[279]

以上内容，应该是当时所有学校中都十分常见的情景。对象从日本变成了美国，但学校里教授的仍旧是“爱国歌曲”，“从特攻队到共产党”这一风潮中主张通过“类似于战时的”训诫来重建道德标准，这些现象说明，即便语言上已经从“鬼畜美英”变成“民主主义”，但内心思想和行为模式仍是战争时期的延续。

这样的状态此后又持续了数年才结束。1950年秋，山本所在高中的老师利用指导教室的时间，要求学生们给“战斗在朝鲜的联合国军（美军）写些慰问信”。于是山本的一位女同学便将一封写着“为和平而战的士兵们，谢谢你们”的英文信交了上去。[280] 当然，对老师和学生而言，这是5年前还习以为常的事。

虽然如此，但民族主义在那个时期确实有所降温。这是因为，在政府的权威与相互监视下形成的战时“爱国心”随着压力的消失而云消雾散了。

例如，在1950年2月的《朝日新闻》中，进行过关于“日之丸”的舆论调查。日本战败后一度被禁止悬挂的“日之丸”在1949年得到解禁，政府甚至计划对需要者进行无偿赠予。由于战争期间各家各户被强制悬挂“日之丸”，所以这次调查的结果显示有73%的家庭还存有“日之丸”。然而，只有两成的被调查者表示愿意在节日里悬挂这面旗帜。

这种对“日之丸”的态度，与其说是有意识的反抗，不如说是对“日之丸”的轻视。因为在不愿悬挂的理由中，排在第一位的“附近人家都不挂的话自己挂了总觉得有些不合适，而且也麻烦”就占了44%。排在第二位的理由则是战后的住房困难。而在被问及家里为何没有“日之丸”时，回答最多的则是在战争中被烧毁，在战后物资不足的情况下“将其当作包袱皮、枕套或者米袋”，以及“给参加运动会的孩子当发带”。[281]

对于这种被丸山真男形容为“使激进阵营和不通情理的保守主义者皆垂头丧气”的情况，保守政权也表现出了焦虑。在朝鲜战争爆发不久的1950年8月，时任首相吉田茂将天野贞祐、安倍能成、和辻哲郎等大正自由主义者的文教审议会委员召集在一起，围绕培养“健全的爱国心”这一问题进行了座谈。同年10月2日，吉田首相在新闻协会发表了“将正确培养坚定的爱国心放在文教政策第一位”的讲话。[282]

根据这一讲话的精神，1950年10月17日，被任命为文部大臣的天野贞祐宣布了各学校在节日时需悬挂“日之丸”、齐唱《君之代》的决定。1951年，天野提出《国民实践要领》。作为专门从事康德研究的伦理学家，天野的思想接近南原繁等的德国式伦理性民族共同体论。然而，这部包括敬爱天皇、爱国心的重要性以及重视“家”与“孝”内容的要领可以说是相当“日本化”的东西。[283]

被天野委任担任要领编纂工作的，是因在战争期间主张“世界史的哲学”而在战后遭到整肃的京都学派学者高坂正显、西谷启治和铃木成高。[284] 虽然这部被俗称为“天野敕语”的要领最终因饱受舆论批评而遭到废止，但在对战后社会巨大变化束手无策的保守派中，要求恢复《教育敕语》、修身教育及废止男女同校的呼声却从未停止过。

同时，社会课这一战后出现的新科目也出现了问题。如前所述，当时的社会课重视体验式学习和自由研究，反对死记硬背教科书。然而受战后社会动荡这一背景的影响，当时儿童的国语能力和算术能力普遍偏低，“学力低下”成了当时教育界的一个重要问题。而社会课反对死记硬背、重视体验式学习的方法则被许多人认为是导致“学力低下”的原因之一。

此外，设立社会课是为了代替遭到废止的修身、地理及历史课程。因此，受针对“学力低下”的批评的影响，主张废除社会课，将修身、地理及历史等课程作为独立科目重新设立的意见不断高涨。吉田首相在1952年的自由党议员总会上主张：“必须通过地理和历史教育，培养作为军备基础的爱国心。”1955年11月出任文部大臣的清濑一郎，同样强调通过历史和地理教育培养爱国心的重要性，并主张将以“建国纪念日”的形式恢复战前的“纪元节”。[285]

其中，取代战前的《教育敕语》而成为战后教育象征的《教育基本法》成为批判的焦点。清濑一郎在1955年12月6日众议院文教委员会上

的发言中，指出《教育基本法》中“只有作为世界人、世界主义”的道德，而没有“爱国的涵养”。[286]

在这种背景下，自1953年开始，教科书的审查决定权被划入文部大臣的职权范围，1954年6月又制定了限制教职员政治行为的“教育二法”。此外，教育委员会的公选制在1956年遭到废除。同年，文部省开始掌权，其自1958年起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的教员“勤务评定”被视为阻碍和平教育进行的镇压行为，日教组对此进行了激烈的反抗斗争。

以上所提到的保守政权的行动，在战后教育史的研究中时常被提及。然而，这里要强调的是，日教组等进步派也并非对民族主义闭口不谈。其中，形成于战前及战时的行为方式在战后变相延续下来的问题，对其产生了微妙的影响。

战后左派的“新教育”批判

如前所述，战后的马克思主义者对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持批评态度并十分反美。对于反映美国意志的战后教育改革，他们的态度同样如此。

不过首先需要了解的一个前提，是当时日本社会的贫困和教育的荒废。空袭使大量校舍遭到破坏，无论学生还是老师都是终日食不果腹。此外，战死的教员也不在少数，拖欠薪水和硬件环境也让教师十分苦恼。在这种恶劣条件下，昼夜管理两个60人班级的教师也并不少见。

1947年3月的《教育基本法》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制定的。然而在战后的饥饿与混乱中，一般民众对此并不十分关注。1947年6月成立的日教组，虽然表面上也对《教育基本法》持支持态度，却将当前的工作重点放在了以改善教职员生活为目的的劳资交涉和团体交涉上。

与日教组相比，左派的教育学家则大多对《教育基本法》持批评态度。如第四章中所述，即便在当时的宪法问题上，左派同样也持反对态度。日本共产党批评新宪法是与社会变革进程不符的华丽辞藻，而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也认为，只要战争还是源自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结构中所存在的问题，那么单单依靠精神论来主张和平就毫无意义。

在《教育基本法》问题上，情况也基本一致。文部省虽然对《教育基本法》持赞成态度，但该法中的主张与教育第一线的实际情况之间存在过大的差距。而且，该基本法中几乎没有关于如何实现其主张的计划或具体办法。

例如，在1948年3月19日的《朝日新闻》上刊载的题为《无法接受义务教育的孩子们》的稿件中，一名山形县的教师认为：

> 宪法中规定，所有国民都有按照其能力接受平等教育的权利，并负有使其子女接受普及教育的义务。此外，义务教育又延长了三年，这些都无可厚非。但实际情况又怎样呢？……
>
> 一名监护人在信中是这样写的："我没有工作，出于生活上的考虑不得不让孩子辍学"，"我不忍心让孩子吃不饱穿不暖带着一副可怜相去上学"，"我不得已让孩子去商店当跑腿，总算每个月有了600日元的收入"。……因以上理由而失学的孩子，已经占到总人数的一成左右。对于这些孩子，国家能做的却只是以'不履行义务教育'的理由向家长收取低于1000日元的罚款。为了挽救孩子，为了贯彻宪法精神，应当从实际上进行生活扶持，而不是只停留在法律文字上。[287]

贫困同时造成了未成年人犯罪的普遍性。在战后的无政府状态下，有不少少男少女被卷入了黑市交易、毒品买卖及卖淫等活动。而面对这种情况，《教育基本法》中却只是一味地鼓励"个人价值"和"创造充满个性的文化"。

对此，教育学家宗像诚也批评《教育基本法》是"没有实证性的空

谈”。社会学家日高六郎对其也有“过于安乐椅式”、“单单依靠‘人格的形成’或‘个人价值’根本无法克服贫困、道德上的无政府状态及战争危机”等评价。[288] 战后初期的日本共产党曾以“吃饭比宪法重要”为口号对新宪法进行抨击，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教育基本法》的问题上。

此外，战后激进的社会氛围也让人们对宪法和《教育基本法》有了一种“不温不火”的印象。如第四章中所述，当时还是中学生的小田实在读过主张男女平等、解除军备的新宪法后，认为那是“啰唆的老调重弹”。与此相同，国语学家国分一太郎也在回忆《教育基本法》出台最初的情况时讲道：“里面所规定的内容都是一些想当然的东西”，“在国会中最具影响力的是保守党的那些家伙，我心里认为他们所制定的不过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289]

当然，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对《教育基本法》持支持态度的也不乏其人。上原专禄虽然明显主张进步教育论，但从一开始便对《教育基本法》持肯定态度。此外，大熊信行也曾于1949年对“无人能对《教育基本法》进行重新审视的教育界现状”进行批评，并主张：“为了和平的教育，应当将‘培养追求真理与和平的人才’（《教育基本法》）作为目标，而不是将目标直接放在如何解决当前的国际危机上。”[290]

然而，以上意见常常会被视为淡化了对社会变革的追求，并将和平教育降低到精神论范畴的东西。社会学家清水几太郎在1952年岩波讲座《教育》的卷首发表的文章中写道：“单单依靠精神上的东西来确立和平是不可能的。如果没有和平的肉体，其他一切都是徒劳”，“无论怎样诅咒战争，只要人类自己创造的社会本身具有‘产生战争的因素’，即人类社会还停留在资本主义，那么便无法获得和平”。在左派教育界人士中，这种看法得到了广泛的赞扬。[291]

战后的教育改革同样如此。在荒废的学校，美国影响下的教育模式（一般称“新教育”）是在没有任何物质保障的情况下开始的，这就产生

了许多问题。当然，在人均所得只有美国十几分之一的日本实施参考美国模式的教育不可能不出问题。

例如，新科目社会课重视学生的讨论和自由研究，但在没有图书馆甚至连教室数量都不足的情况下，自由研究的实施十分困难。在工作负担过重的情况下使用与战前完全不同的教育方法，这对当时的教师来说也是一个难题。据宗像诚也讲，当时的教师大多处于一种“因不了解社会课而束手无策”的状态。[292]

对《教育基本法》或“新教育”的批评中，也包括《教育基本法》的人类观。《教育基本法》第一条主张“教育应尊重个人价值，以培养勤劳而有责任感的、充满自主精神的、身心健康的国民为目的”的理念。然而，在当时的左派知识分子看来，这部主张“培养国民”的基本法给人一种“个人主义的”感觉。

例如，清水几太郎就在1947年对作为《教育基本法》基础的“美国式教育思想”进行了批评。他认为，重视近代个人主义的美国式教育思想，实际上不过是在欧洲已经过时的“18世纪的思想”，这种思想并没有认识到“伴随19世纪出现的历史的力量”。[293]

在当时日本的知识分子中，存在将欧洲思想史中的“18世纪”与“19世纪”进行对比论述的倾向。这些人认为，18世纪是资产阶级市民与绝对王权对抗的时代，是反对国家介入个人的自由主义思想开始抬头的时代；而在19世纪，这种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随着阶级对立的出现被时代所淘汰，黑格尔和马克思这样重新思考“近代”的思想开始兴起。

清水认为，贫富差距在土地富饶的美国得到了缓解，阶级对立也就并不那么明显。因此，只要人人都能拿出“个人”的力量，整个社会就会幸福，这种所谓例外的乐观近代自由主义思想在美国存活下来。美国教育思想的开山鼻祖约翰·杜威等人主张重视开发个人能力的教育，其道

理也在于此。然而除非拥有美国那样的社会条件，否则缺乏社会构造变革这一视点，主张开发个人能力的教育思想就不适合日本。

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对“近代”及“18世纪”持批评态度的人不在少数。即便是对共产主义持批评态度的南原繁，也在1946—1947年对“18世纪及法国大革命所产生的自由民主主义”进行了批判，并主张通过超越资本主义的“整体计划实现新的经济秩序”。即便是被日本共产党批判为“近代主义者”的大塚久雄，也认为将农民阶层分解为“个人”的“美国式解放”不符合实际，并强调通过国内市场形成国民之间连带感的重要性。[294]

如第七章中所述，在社会整体发生变革之前无法实现个人幸福的这种论调，在经济高速增长期以前的日本十分普遍。按照这种观点，缺乏社会变革视角而主张重视“个人”的《教育基本法》，即使从打破“封建制”这一点上看是向前迈进了一步，但仍不过是将富人的胜利正统化的自由主义思想。[295]

除此之外，文部省编纂的教科书《民主主义》也成了左派中共产党系学者的批评对象。出版于1948年（上卷）至1949年（下卷），并作为全国初高中社会课课本沿用至1953年的这本教科书，主要内容是介绍美国、英国、瑞士等国的制度，其中心主题是宣扬民主主义和尊重个人的理念。

1949年1月，受日本共产党影响颇深的民主主义科学家协会和历史学研究会中设立了对策委员会，并开始对该教科书进行批判。他们认为，该教科书中所谓的民主主义不过是以资本主义、自由主义、议会主义为基础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而无视“共产主义是民主主义发展的最终形态这一已经为学术和历史所彻底证明的事实”。[296] 实际上，《民主主义》之所以受到批判，主要是这部教科书中对“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批评刺激到了他们。[297]

在教育学界，1950年5月苏联教育学研究者矢川德光出版了《对新教育的批判》一书。其内容主要是批判“当今日本和美国的教学课程改革家”的思想，并将其评价为“基于极其幼稚的、过时的机械个人主义论社会观”的“市民，即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矢川认为，“今天的日本人必须超越近代市民社会……而进入新的社会”，但美国人的生活理想却是“成为八面玲珑、左右逢源的市民”，并主张：“作为学校，应该有意识地将孩子培养成能够肩负起人民革命旗帜的人。”[298]

从1951年前后开始，对“新教育”的批判使日本共产党系教育学家中的反美民族主义像历史学一样越发明显。这不只是受日本共产党方针变化的影响，还与1949年后的清共导致1700多积极的教职人员失去了工作，加深了人们对占领军的反感有关。

1951—1952年，《教师之友》、《六·三教室》等教育杂志中陆续推出了关于“民族教育”方面的特辑。例如《对新教育的批判》的作者矢川德光在1952年1月的《教师之友》中就有如下看法：

> 日本的学校已经造就出了一批没有民族“自尊心”的孩子。据说有一名东京的教师曾经问孩子们现在的国家应该取什么名字好，约有9成的孩子们竟大声地回答“美国”，而只有5%的孩子战战兢兢地小声回答“日本”。这就是日本的教育没有培养出日本人而是培养出了cosmopolitan（世界人）的一个例证。关于这些无国籍者的形成……文部省审批通过的社会课教科书应该为其内容使孩子们折服于某国（美国）外表上的繁荣这点负主要责任。[299]

同样在1952年，教育学家海后胜雄对“考虑个人和人类的人道主义”进行了批判。海后认为，在现今这个欧美帝国主义与亚洲民族解放运动之间的斗争越发重要的“世界的历史性阶段”中，“这种故意淡化民族范畴而将个人直接与世界联系在一起的立场”虽然伪装成中立，但实际上是站在帝国主义一边。[300]

当时的批判也波及社会课本身。在废除历史和地理的基础上设立的

社会课被指责为剥夺了日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人们开始主张恢复历史和地理课程。

例如，曾任历史教育者协会秘书长的高桥磌一就在1952年一篇题为《向着民族教育前进》的文章中，对教师中对社会课非议甚多的现象做了介绍。高桥表示：“日本有良知的教师都对所谓的‘新教育’，特别是正在推行的社会课表示反对，对于让日本人放弃本民族的骄傲、忘记本民族历史、丧失对本民族语言的热爱、玷污整个民族的这种无日本人民族意识教育，日本的教育者们最终选择了与其决裂。”[301]

当然，他们所推重的历史教育，是在国民历史学运动中被倡导的讲述“民族英雄”和农民起义的民间故事等内容。历史教育者协会成员片冈并男就在1952年提出了“发掘民族英雄、民族文化，让人们重新认识我们正在失去的祖国，唤起人们为争取民族与国家的独立而斗争的爱国热情，这才是真正的历史教育”的主张。[302]

在这种民族教育论中，天皇被视为从属于美国的买办势力。例如矢川德光就对将天皇形容为“道德中心”的文部大臣天野一郎进行了批评，并讥讽道：“将一个缺乏自主性到了在外国人的强迫下放弃自己‘神格’且没有‘民族自尊心’的人作为‘道德中心’的教育，确实非常适合培养没有批判力、主体性及自尊心的日本人。”1953年，高桥磌一也将当时的皇太子批评为“穿着西服走出美制大型客机的世界王子”。[303]

不只是教育学家，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也对这种批评表示了赞同。井上清等人就在1953年1月出版的《现代日本的历史》一书中将战后的教育改革批评为“殖民地式的愚民教育”，并认为“民族教育遭到了彻底破坏。国语课本中省去了作为民族古典的民主文学，就连高中都没有开设历史和地理课程。天皇居然率先垂范，在1947年4月将皇太子的皇室教育工作委托给了一位叫瓦伊宁（Elizabeth Janet Gray Vining）的美国女士”。[304]

当然，在当时也并非所有的进步教育学家或教职人员都持以上看法。然而，即使日本共产党的这种论调并非十分激进，但对于民族主义持肯定态度的教育学家确实占了大多数。

例如，东京大学教授胜田守一就在1951年题为《教育与民族主义》的文章中，提倡培养以法国大革命为代表的近代民族主义式“国民教育”。与丸山类似，胜田在谈及法国知识分子厄内斯特·勒南（Joseph Ernest Renan）时表示：“国民教育就是与贵族教育对立的大众教育和庶民教育的别称”，“日本人单单依靠个人主义理想、世界市民教育和国际精神根本无法摆脱束缚自己命运的枷锁”。[305]

与日教组关系密切的上原专禄，也在1952年一篇题为《爱国与和平》的文章中认为：“形成民族意识和培养爱国心的问题在‘新教育’中基本被遗忘了。”[306] 如第七章中所述，德国史研究者上原曾以费希特的《告德意志民族》为根据，主张实行同时兼顾确立近代的自我与国民共同感的“国民教育”。

总体来看，矢川等共产党系的学者主要以苏联及中国为典型，对“个人主义”和“近代主义”进行批判。而胜田和上原等人则以法国或德国为典型，提倡以近代性个人为基础的民族主义。[307] 然而二者即便存在差异，在强调爱国教育的必要性及批判“美式”战后教育这一倾向上也可以说是相同的。

当然，这些人也曾不断强调其所主张的爱国心与战前的超国家主义之间的不同。胜田和上原等人认为，战前的忠君爱国论中并没有实现近代自我的确立。而矢川等日本共产党系学者也将天皇视为追随美国的买办势力，并认为保守派所主张的爱国是通过利用天皇协助美国实现间接统治。

第十一章中将会提到，1950年代的美国曾多次要求日本政府加强武

装并培养“爱国心”。1953年10月，池田勇人特使在与美国助理国务卿罗伯森的会谈中做出决定，作为对美国经济援助的交换条件，日本政府将加强防卫能力并培养国民的“爱国心与主动进行自卫的精神”。[308] 而这却招来了诸如保守派的爱国教育不过是追随美国的产物之类的非议。

由于组织内部各种思想未实现统一，日教组没有正面对《教育基本法》进行批判，但上述革新派的民族主义还是对该组织产生了影响。1951年1月，朝鲜战争期间，日教组通过了著名的“不要再将学生送上战场”的决议，该决议在主张全面媾和和反对重新武装的同时，号召实现“民族的完全独立”。[309]

1952年6月，日教组在其第九次大会上通过了《教师道德纲领》。该纲领主张“教师毫无疑问属于劳动者”，“团结才是教师最高道德”，而保守派政治家则对其左派倾向进行了批判。然而，在上原专禄等人的帮助下起草的这份纲领，同时又是一份批判“18世纪个人主义”，主张“实现民族独立，创造无剥削、无贫困、无失业社会”的纲领。[310]

通过了《教师道德纲领》决议的日教组第九次大会还主张“反对《君之代》、反对修身课程、反对废止男女同校、反对国民道德实践要领”和“全面普及国民歌曲《绿色山河》”。[311] 这首《绿色山河》是日教组通过公开征集的方式决定的“国民歌”。其歌词大意如下：

> 战争过后，重新起来。绿色山河，云散雾开。
>
> 涌动着民族年轻热血的人们重新苏醒，
>
> 自由之翼，翱翔天际。世纪之初，无限荣光。[312]

这里可以看出，当时，“和平”及“自由”等词与“民族”是共生的。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日教组的会歌，其歌词大意是：

> 啊，横跨在民族独立与自由天空中的彩虹。

坚定的誓言锻炼着我们钢铁般的力量和意志。

我们走在胜利的大道上，我们！我们！我们日教组。[313]

当时的教师运动中，也经常使用“民族”一词。1954年，京都旭丘中学发生了一批骨干教师因年级管理及将和平教育政治化而遭到调职处分的“旭丘中学事件”。该事件的起因就是该中学的老师、学生和家长在1953年7月共同制定了一份“纲领”，其内容是“一、爱祖国”，“二、爱民族”，“三、爱劳动”。[314]

当然，对于“民族”一词同样也存在一些反对之声。在1951年11月日教组召开第一次教研大会时，就爆发了关于如何理解“民族”的争论。在这次大会上，矢川德光、胜田守一、海后胜雄等人作为讲师主持了和平教育分组会。到场的代表中有人提出“过分强调民族有走向国家主义的危险”（岩手县代表）和“我认为应当摒弃民族和国民这些概念，最终还是应该以育人为目标”（宫崎县代表）。[315]

但在当时，赞同“民族”这一提法的毕竟还是多数。虽然也有人提出应当用“人民”代替“民族”，但在“现今爱国即是和平”这一意见的影响下，“民族”这一提法最终还是得到了肯定。[316]

此外，如第七章中所述，在“民族自决”受到高度评价的当时，“多民族国家”与“殖民地宗主国”被当作同义词看待，而“单一民族国家”则被认为是最理想的。日教组第一次教研大会上也强调：“以往的民族主义”是“一个国家包含诸多民族的民族主义”，但“现在已经发展到了要求多民族国家向单一民族国家转变的民族主义”。[317]

看待亚洲的视角

在这种论调中，中国等亚洲各国的民族主义经常被视为值得学习的先例。并且正如石母田所讲的那样，在日朝鲜人是使日本民族主义高涨

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这个问题上常常被反复强调的，是朝鲜民族与日本民族同为“美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下的“被压迫民族”这一视角。1953年1月日教组第二次教研大会上曾提出在日朝鲜人的民族教育问题，其内容如下：

> 总之，我们不能只将在日朝鲜人的教育问题看作外国人的教育而袖手旁观，我们应当有责任感并进行反省。自己的国家被美帝国主义置于殖民统治之下，自己所深爱的学生们生活在充斥着“邦邦女郎”文化的环境之中，如果我们认识到这些迫切的问题，就不该将在日朝鲜人的教育问题当作朝鲜民族自己的问题。因为，同样面对解放被压迫民族和反殖民地化问题的我们，应当在建立高度共识的基础上实现双方都为之努力的和平与独立。[318]

自那时起，在日朝鲜儿童的教育开始成为一个重要问题。朝鲜人方面开始着手创办民族学校，学校中的许多教师也开始重视比日本儿童更加穷苦的在日朝鲜儿童的教育问题。

在学校中，在日朝鲜人的民族意识往往会对日本教师的民族意识产生刺激。一名小学教师在1951年谈及在日朝鲜人子女在民族学校中学习朝鲜语和朝鲜史时，主张日本的儿童“也应该从小培养进步而非复古的民族历史使命感”。[319]

因此，当时的教育论认为，在日朝鲜人的民族自觉性与日本民族的自觉性是相辅相成的关系。1952年，历史学家松岛荣一强调：“对本民族的认识与自豪是对其他民族友爱与理解的基础。”日教组第九次教研大会上也提出：“日本人的民族感已经麻木，因而无法对在日朝鲜民族的民族教育进行任何援助，而民族教育问题也就因此变成了抽象的人权教育问题。”[320]

以往的统治与歧视，也是使民族教育呼声高涨的原因之一。1953年，高桥磌一提出，“在日本统治时期，朝鲜民族没有教授孩子朝鲜语

和朝鲜历史的自由”，这就是为何在美帝国主义统治下的日本需要进行民族教育。1952年，片冈并男也以“朝鲜人的子女被禁止学习祖国的语言、地理、历史这一事实，以及他们为此进行坚决而果敢的斗争”为例，主张应该通过历史和地理教育培养爱国心。[321]

在1950年代日教组的教研大会上，在日朝鲜儿童问题作为“民族教育”问题经常会与冲绳问题、被歧视群体问题、美军基地周边的风气问题以及和平教育的问题被放在同一分组会上进行讨论。并且人们认为，培养“日本人的民族意识”在与“朝鲜民族”的和睦相处上同样必要。在1958年1月的第七次教研大会上，井上清在总结讨论结论时说道：

> 对日本国内其他民族的民族利益的剥夺、歧视和迫害，实际上是不利于形成日本人自身的民族意识和民族自豪感的。将在日朝鲜人视为二等公民的日本人同时又对美国人低三下四，这一目前的现实已经足以说明问题。尊重朝鲜民族的民族权利，实际上已经与主张日本人的民族权利融为一体。特别是教育问题，对朝鲜民族子女的教育不负责任，而又想让日本的孩子们成为了解世界、拥护世界和平并拥有民族意识是不可能的。……对朝鲜民族的子女进行正确的民族教育，实际上也是对日本人的子女进行正确的民族教育……[322]

然而对于日本方面的这种看法，“在日”一方也并非总是持赞同意见。在日教组第七次教研大会上，对于小组会的主题“在日朝鲜人子弟的教育”，大韩民国居留民团的听众进行了激烈的抗议并认为应该使用“在日朝鲜人、韩国人”或“外国人”这一称呼，这引起了长达一个小时以上的讨论。

对于这种抗议，日本人方面表示“所谓朝鲜人子弟”并非指“朝鲜共和国人子弟，而是指朝鲜民族的子弟”，并主张为了表示对分裂国家再次统一的希望，应该“将在日朝鲜人作为单一的朝鲜民族进行称呼”。[323] 第七章所提到的民族“是超越国家的存在”这一观点就适用于这里。

所谓民族“是超越国家的存在”这一观点，如第七章中所述，是德国

史学家上原专禄的主张。在通过将数个德语地区进行统合形成近代国家的德国，本来就存在民族是超越国家的这种认识。也就是说，这种思想适合于因国家不同而产生分裂的“朝鲜民族”。

同样的逻辑还适用于冲绳。人们认为，冲绳问题的根源在于日本对本应属于“日本民族”一部分的冲绳人漠不关心，也就是“日本的民族主义中民族团结意识的匮乏”。日本民族如同被三八线分裂开来的朝鲜民族一样，以“北纬27度线”为界分成了本土与冲绳，这一看法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324]

同时，当时冲绳教职员会所主张的“回归祖国”，也助长了这种倾向。1953年1月，奄美大岛教职员工会和冲绳教职员会的代表来到了日教组第二次教研大会会场，并分别对在场众人讲述了当地目前的窘况和希望“回归祖国”的愿望。听过他们的讲话之后，本土方面的教员便开始对“甚至连这种民族同胞受压迫的苦难都不会提及的社会课的现状”进行批判，并出现了“应将历史和地理作为民族教育来不断充实，只有这样才能使冲绳和奄美大岛的同胞们怀有民族共同感并认识到民族危机的严重性，只有这样才能将这一问题发展成为国民运动”的主张。[325] 关于这种看法对冲绳回归运动所产生的影响，笔者已在《“日本人”的边界》中进行了详细分析，这里不复赘言。

这样所形成的“民族”，不外乎就是社会变革的“主体”。因此，当时出现了对与“民族”不相符的和平教育的批判。如前所述，日本共产党在批判宪法第九条时曾表示，与社会变革过程不相符的评论不过是空洞的华丽辞藻。因此，与孕育社会变革主体的民族意识不相符的和平论也同样空洞。

1952年，《教师之友》上刊载了“从石母田正的著作《历史与民族的发现》中收获颇丰”的石田宇三郎的一些主张：

> 在我们忘记了为对亚洲各民族施暴而所应负的责任时，我们也会将追究统治者责任的事一并忘记，民族的重生也将变得遥遥无期。也就是说，我们几乎不会从那次战争中学到任何作为一个民族所应有的生存方式，而最多只能感受到“战争是令人厌恶的东西”。……
>
> 另外我认为，目前的和平教育都是一些表达“受够了战争”的利己情感或对原子弹爆炸的恐惧的内容，而创造民族精神这一基础性工作则被忽视了。……培养憎恶战争而热爱和平的心情确实十分重要。但我认为即便是这种心情，如果没有民族意识也绝对无法成为创造历史的力量。……我认为只有将厌战情绪和作为其理论支柱的社会科学，以及使其发展成为历史性行为的民族意识这三者结合起来，才能真正使和平运动具有影响力。[326]

当然，这里的“社会科学”是指马克思主义，“民族意识”是指变革的“主体”。正是因为如此，石田才会认为：“与民族意识不符的和平主义，最终会堕落成得过且过主义或只求自保的利己主义，而不会拥有深厚的伦理性和实践能力。”

按照他的这种思路，如果无法形成日本民族这一“主体”并以此为基础改变资本主义的话，那么即便是关于对朝鲜和中国的“加害”意识，应该最多也只能停留在良心上的反省。因此出现了认为日本应作为亚非（AA）各国的一员增强民族意识，在与美帝国主义的斗争中不断巩固与亚非各国的团结，从而在真正意义上超越自身过去的侵略历史这一主张。

例如，在题为《以民族解放为目的教育》的文章中，作为“使日本与AA的团结成为可能的民族意识的发展步骤”，朝鲜教育史学家小泽有作提出：“加害者意识”应转向“受害者意识”。也就是说，虽然有必要认识到日本对朝鲜的“加害”，但不该只停留在这个层面，而是要认识到日本民族同朝鲜民族一样都是“美帝国主义的受害者”。

小泽认为，只有在这种“同为受害者”的认识所产生的连带感和实践

中，日本人才能同时“主动克服”对朝鲜的歧视意识和加害者意识。因此，日本教师的课题首先不是“进行朝鲜人的民族教育”，而是“将日本人的民族意识与民族连带感植入日本儿童的头脑中”。[327]

当然，这些观点的前提，是日本属于亚洲落后国家的认识和人们对社会主义变革的信任。当时所宣扬的民族教育论也是以此为背景的。

共通语言的普及与民族主义

然而，这种思想在适用到教育问题上时却存在一个问题。这是因为“民族”统一的思想中还伴随着“民族语言”的统一问题。

作为日本共产党的民族主义和非日共系国民主义这两个当时革新民族主义主要潮流的表现，这种倾向是朝着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的。首先，关于日共系的民族主义，石田宇三郎在1953年提出了以下看法：

> 一个民族只有一种语言（国语），语言（国语）不会因阶级不同而产生差异。因此，语言（国语）与地域、经济、文化同样是民族统一的基础。……一个民族只有一种语言（国语），因此才会有阶级斗争并以此推动社会的发展。并且，语言（国语）还是为这种斗争和发展服务的工具。[328]

产生以上观点的背景，包括斯大林在1950年发表的语言学论文。斯大林在该文中认为，“语言对社会来说是单一的、对社会全体成员来说是共通的”，并指出：“民族语言是民族文化的一种形式。”[329] 而石母田又对斯大林的这种思想进行了归纳，并批评当时文部省的指导要领是“失去了对日语和日本民族热爱的世界主义”、“从未意识到‘国语是民族文化的一种形式’的个人主义和无国籍主义”。[330]

此外，国语学家国分一太郎也在1952年以斯大林的论文为根据提出：“民族语言是没有阶级之分的全体国民的语言，对一个民族来说是共通的、唯一的”，“必须热爱国语”，并指出文部省的指导要领已经

被“美国式”语言观所侵蚀。[331] 1951年，藏原惟人也在与《近代文学》编者们召开的座谈会上引用斯大林的观点，对美国占领下的日本出现的日美“混血语”进行批判，并主张：“我们必须为保护民族语言不受破坏和歪曲做好准备。”[332] 可以说，斯大林的论文不仅在历史学界，在语言方面也点燃了民族主义的火种。

如上所述，石母田和国分都对当时文部省的指导要领进行了批评。其中，国分所说的“美国式”语言观，是指将语言视为人类社会活动工具的“语言工具论”。

国分认为，战后的指导要领中的这种语言观，直接影响到了国语课的教学形式。具体来说，战前偏重于教科书背诵和古文鉴赏等书面语教育，而战后教育则将重点放在日常会话的练习及年级讨论等口语教育上，即使有书面语教育也大多为写信等实用性强的内容。

然而如前所述，重视培养个人生活能力的美国式教育思想常被批判为具有资产阶级性和过时的“近代主义”。对于将思想视为生活工具的实用主义哲学，日本共产党系知识分子同样将其作为资产阶级哲学进行批判。而作为这种美国式实用主义语言版的语言工具论，也就自然被看作失去了对“民族语言”热爱的世界主义。

国分认为，战后日本兴起的这种语言工具论，是对战前流行的“日语中蕴藏着日本精神[333] ”这一语言观的一种回应。国分本人虽然也曾因为同样的理由而支持过语言工具论，但在意识到美国正将日本殖民地化这一“民族危机”后，他的立场发生了转变。[334]

国分还指出，战后的“学力低下”，同样是由这种语言工具论所产生的错误的国语教育而引起的。国分曾在1952年岩波讲座的《教育》中强调热爱“民族语言”的重要性，并对战后“新教育”因重视讨论和生活单元学习而导致“学生非常轻视记忆和练习”及“没有锻炼基本能力的时间和

机会的学习指导的泛滥”进行批评。[335]

在这一潮流下，将古典作为“民族文化”重新进行评价的做法也开始盛行。1953年6月，国语教育学家荒木繁在日本文学协会做了题为《作为民族教育的古典教育》的报告。报告中，荒木列举了一个他与学生们就《万叶集》的防人歌[336]中记载的民众反抗征兵一事进行讨论的例子，并借此主张与保守派不同的古典教育可以“使日本民族对本民族优秀的文学遗产感到欢欣鼓舞和自豪”，“使学生们产生对祖国的热爱和民族意识”。[337]

如第七章中所述，当时，对于“民族文学”和“国民文学”的讨论正在悄然兴起。不只是石川啄木及北村透谷等明治文学家的作品，《万叶集》等古代和中世的文学作品也作为“民族文学”得到重新评价。在1952年度日本文学协会大会上，人们围绕近松门左卫门的民众性及《平家物语》作为英雄叙事诗的性质等话题进行了讨论。[338]与日本文学协会有密切关系的《文学》杂志，同样在1952年9月号和11月号上分别刊登了有关民谣和民间话剧的内容。对古典教育的重新评价也是这种潮流中的一部分。

以上就是日本共产党系学者主张热爱“单一”民族语言的具体内容。然而另一方面，他们所反对的语言工具论（也称“语言生活主义”），事实上又以另一种形式与语言统一及民族主义形成的主张联系到了一起。

国语学家水野清在1948年发表的文章就是一个例子。在这篇文章中，水野对“充当战前日本精神兴风作浪工具的国语”进行了批评，并主张“语言应当作为人们认识生活的工具来进行传授”。[339]他说道：

> 关于国语教育我一定要强调一点，那就是标准语的问题。以往的国语学家认为让标准语与方言并存是合适的。但方言被称作“旅行的通关文牒”，也就是说它是封建割据的产物。同时，通过方言将人民分而治之也成为封建制的基本原理之一，而且这种状态直至今日也没有被完全消除。因

> 此，作为民族统一语言的标准语本身并没有得到确立，在人们看来不过是一种别扭的腔调而已……现在日本有工会、农会、文化团体等全国性组织，随着这些团体之间交往的加深，确立标准语问题将会越来越凸显出其必要性。因此，教科书中应选用标准语（特别是人民生活中的常用词）文章，并进行使用标准语思考的训练。

语言是生活工具，所以应当在全国普及，而“方言”则是封建制度的产物。也就是说，语言工具论因其“近代性”而与“近代性”的国民主义联系到了一起。水野在1951年的文章中认为这种看法也适用于阶级间的差别，应该将“方言”与“精英阶层的特殊用语”都视为“封建性宗派主义”，并主张建立“文化性民族共通语”。[340]

水野的主张，实际上与“新教育”中对标准语的定位十分接近。1951年文部省的国语教育指导要领所重视的，是“能听懂别人的话”和“说别人听得懂的话”即“语言生活”。这种对会话的重视与推广全国通用发音的必要性结合在一起，便成了当时教科书中的“在学校学到的语言，是日本全国任何地方的人都可以听懂的语言。学会这种语言，就能使任何人都明白自己所说的意思”。[341]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倾向竟然与战后设立的社会课、指导教室及自治会活动联系到了一起。这很容易使人认为，民主社会是依靠使全国人民能够进行交流的标准语而成立的。1952年，语言学家土岐善麿说道：

> 战后的国语教育特别是中小学的义务教育开始重视“口语”，以“读写”为主要内容的旧的学习指导方式正在被发言、会话、讨论等形式取代。国语发音却没有得到重视，适当的发音法练习也明显不足。而与此相关的是标准语与方言的问题，虽然如何解释标准语在学术上是一个难点，但在创建民主社会的过程中，标准语的必要性是必须考虑的。另外，虽然民主社会人人都有自由，但如今各地区纷纷强调自身存在的倾向助长了方言的势力，对这个问题也应该给予充分的考虑。[342]

如上所示，从斯大林文章中派生出的民族语言热爱论与通过战后教育改革而不断扩大的语言工具论在相互批判的关系下，共同发挥着推进普及标准语教育的作用。此外，西尾实和舆水实等基本支持语言工具论的国语学家也主张共通语的普及。

在一些学术刊物上，民族语言热爱论与语言工具论时常交织在一起，为倡导标准语教育提供理论支持。1954年，《实践国语》杂志集中刊登了一些对主张方言与标准语共存的双重语言主义进行批判、支持彻底贯彻标准语教育的文章。其中的观点主要为“（方言所导致的分裂）对日本的民主化是致命的”（近藤国一）、“应该重视语言的社会性功能，标准语教育与双重语言主义过于矛盾”（蓑手重则）、“无视一种标准语的存在而主张重新创造另一种标准语的行为，被斯大林称为‘野蛮人’”（大久保忠利）、“方言尊重论削弱了人们对口语教育的渴望，最终与以书面语为中心的国语教育及倾向于以书写为中心的国语教育论相结合”（仓泽荣吉）等观点。[343]

即使在同一学者的观点中，也经常存在民族语论与工具论相互交融或转化的情况。从1948年开始便根据语言工具论主张“民族统一语”的水野清1953年指出：“斯大林在其语言学论文中将民族语，即语言与作为其分支的方言清楚地进行了区分，认为后者终将难逃衰退的命运。”接着，水野又以“过去日本强迫朝鲜人学习日语，却最终徒劳无功”的例子来说明热爱“民族语言”十分重要并且可以作为反殖民地化的力量。[344]

这种观点对日教组产生了微妙的影响。1957年，日教组在第六次教研大会的报告中除主张要培养“热爱和平、诚实、自由、尊重人权、民主主义的思想”外，还强调了“使学生了解形成‘民族’这一概念的重要条件之一的语言（民族语言）的相关知识”的必要性。[345]

在1950年代日教组的教研大会上，共通语教育是被反复讨论的议题之一。例如，在1954年1月的第三次教研大会上有人提出“只要我们还是

日本人，就必须懂共通语”（熊本县代表）、“掌握了共通语可以体验并接受更加具有文化韵味的生活”（秋田县代表），也有人认为“因为我出生在冲绳我才要说，无论是否允许方言继续存在，现在各地也都在使用。所以赞成也好不赞成也罢，都是没有什么真正意义”（群马县代表）。但总体而言，认为“无论何时、何地与任何人都能沟通的共通语”必要的人还是占了多数。[346]

在1955年1月举行的第四次教研大会中，虽然出现了“应‘立即普及共通语’和‘在尊重作为生活用语的方言的基础上进行更好的共通语（国民语、理想语）教育’这两种看法的对立”，不过没有出现任何否定共通语教育必要性的意见。同样，1956年1月第五次教研大会中也存在“要一直抱有实现共通语的理想，但不能操之过急”（青森县代表）与“向各个家庭发放学校刊物，并在其中附上方言和措辞用法表，不只是孩子，也要让其他家庭成员有所注意”（福岛县代表）、“只会说方言的话，毕业旅行时会很麻烦”（长崎县代表）等意见。[347]

以上两种意见最终的结合点在于，虽然不能进行强迫教育，但“民主国家的国民应该拥有自己的思想和语言”，从这一点来看共通语是必要的。然而，在强烈主张共通语教育的地方代表看来，“方言是落后的语言”（第四次教研大会，熊本县代表），因此主张否定方言的意见从未间断。[348] 当然，其中也有像水野那样主张将方言的词汇放入共通语之中的意见，但这种意见从来没有实现过。[349]

不过，与经济高速增长期后的日本相比，当时各地区间在方言上的差别和经济上的差距确实难以想象。如第七章中所述，将形成“单一民族”作为目标的主张，实际上也是源于消除地区间经济差距的期望。然而，这种对消除地区间经济差距的期望，后来确实也成了对方言的一种压制。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左派教育学家的主张中还包括“教师指导地

位”的确立。如前所述，战后的社会课鼓励学生通过经验和讨论进行学习，而反对死记硬背教科书和教师的强迫式教学。然而，矢川德光却在1950年的《对新教育的批判》中指出，通过经验和摸索的学习在苏联已经成为教育学批判的对象。

矢川认为，苏联虽然在初期也提倡过通过经验进行学习，但1930年代随着党对无产阶级指导性地位的确立，对于人民来说在党和教师的指导下学习科学社会主义的正确的现实认识就比经验和摸索要更加重要了。然而，日本战后的“新教育”仍然重视通过经验进行学习，这很容易使人错误地认为：“孩子是依靠其自身成长为社会人，而教师只不过起辅助作用。”[350]

国分一太郎的意见也是如此。在1952年岩波讲座《教育》上刊载的文章里，国分在分析战后“学力低下”的原因时，除了“过分重视生活单元学习、讨论式学习法”和“过度轻视记忆与练习”外还提到了“过分轻视教师指导性的学生本位主义”。[351]

以上便是战后教育中肯定共通语教育和“教师指导性”的观点的形成过程。而作为其结果，在地方学校中开始实施与战前强制使用标准语几乎相同的教育。关于这一点，1957年冲绳教职员会的一名中学教师在其报告中说道：

> 人天生有自由表达自己想法和意见的能力，而在这种能力可以得到保障的社会生活是一种幸福，民主社会也是因此才得以形成。
>
> 然而，看看学生们的语言生活便会发现，他们现在连最基本的共通语都还没有掌握，而且他们的共通语中还有很多受方言影响而产生的错误。因此，教会他们使用正确的共通语是今后工作的重点。[352]

这名教师还指出：“但是强制性的做法没有效果。无论多么严厉地训斥，在老师走后他们可能还是会使用方言。因此，让他们从心底感受

到日语的美、词汇中的精神、日语所酝酿出的完美氛围以及使用共通语所带来的喜悦的教育是十分重要的。”

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战后的“皇国日本”成了“主权在民的国家”，而国民的思考方式与战前相比却基本没有任何变化。这种现象与学校所教授的东西由“日本的爱国歌曲”改为“美国的爱国歌曲”、女学生写着“士兵们辛苦了”的信件由寄给日本兵变成寄给美国兵，而国民的行为方式却没有发生任何变化的情况是同时发生的。

“爱国心”的延续

关于这种战前的延续，其发生的背景前文已经提到，那就是战后的教育界基本没有人遭到整肃。战后大多数的教师，不是从战前便从事教育工作，就是在战前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一代。

所以，虽然“完成圣战”变为“民主主义”，但对于爱国心或“民族”的强调却没有发生改变。1953年，教育学家梅根悟在批评保守政权与左派教育学家同时主张“爱国教育”的现象时写道：

> ……长久以来，日本人在教育中一直强调爱国心。虽然现在我们已经明白那是在怎样的社会结构下由处于何种立场的人为实现何种意图而进行的教育，但没有爱国心的人就是卖国贼、就是似人非人的东西的观念却已经深入人心。如今，对爱国心的鼓吹又一次死灰复燃，人们开始绞尽脑汁地向他人证明自己也是一名爱国者。[353]

正如第七章中引用的，后来转而支持“市民主义”的久野收在1953年也认为“作为一名国民，如果不热爱祖国就不配做人”。如第六章中所述，埴谷雄高同样表示：“我的朋友常讲，自己不在乎被指责为非人道，但绝对不可以被说成非国民。”

当时，受美国哲学家杜威教育思想影响的梅根悟曾组织起倡导“生

活教育”的教育课程体系，以支持“新教育”。矢川德光在《对新教育的批判》中抨击的对象，正是梅根悟和石山修平等拥护“新教育”的学者。梅根在反驳矢川批评的同时指出，所谓爱国心是人为的、政策的产物，关于这一点只要想一想“日本在朝鲜如何进行爱国心教育工作”就会明白。[354]

可以说，当时左派的民族教育论中的一些内容确实让人感觉类似战前爱国教育的残存。关于这一点，在1952年《教师之友》举办的一次座谈会上石田宇三郎发言称：

> ……关于以往的教育，孩子们之所以那么努力，是因为国民有可以为之努力的目标，或者说孩子们清楚地明白什么东西是最重要的。虽然这个东西后来被证明是错误的，也就是说所谓的国民为之奋斗的目标是具有侵略性的，但终归还是有那么一种东西存在……[355]

石田认为，在战后的教育论“没有指明所谓的国民目标，所谓的民主化根本没有涉及民族的完全独立问题”，战后出现的自由“是毫无方向性的、放任式的‘自由’，是国际主义式的自由，是野孩子般的自由”。[356]

此外，他们的反美民族主义还反映在对战争的评价上。在这次座谈会上，石田在评价战后的战争观时表示：“书本里面总是将日本的军部写成恶人而将美国写成好人，而关于战后美国对日本及其他亚洲国家采取的政策与战前有何联系则只字未提。”同席的矢川德光对石田的发言表示赞同，并认为：“一定要指出太平洋战争的责任不只在日本的军部和财阀，美国同样有责任。”[357]

如第七、八两章中所述，在当时的历史学家中，也存在这种延续。但教育学界有一个特点是历史学界所没有的，那就是教育学界人士中对战争持合作态度的人要远远超过历史学，故在战前及战时语言用法上的延续性更为明显。

例如，1942年时任日本青少年团教养部部长的矢川德光提出：“日本民族正在建立当今世界的新秩序，也就是说必须让世界成为真正的世界。” [358] 而他在1952年又表示：“当今我们最重要的使命是什么呢？是保卫和平与为实现民族独立而斗争。这是我们日本民族的伟大事业。” [359]

另外，马克思主义与战时思想在反对“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及“近代主义”上也有共通之处。例如，矢川在1942年主张“集体主义应取代个人主义，中央集权应取代自由主义”， [360] 战后又将“新教育”批评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当然，矢川在战前与战后也并非一成不变，其中一个例子就是他对天皇的看法。1942年，矢川曾将天皇赞颂为“太阳般的光辉”、“我国政治理念的中枢”、“正义的利剑”， [361] 而到了1952年却将天皇批评为“一个缺乏自主性到了在外国人强迫下放弃自己‘神格’的地步的人”。

这种对天皇的批评，与主张“天皇允许外国军队进驻日本便不再是我们的天皇”的“国土防卫派”将校们的心情有共通之处。也就是说，矢川实际上是以另一种形式重新强调天皇本人都已经放弃了的“民族自尊心”。

当然，拥有这种延续性的并非只有矢川一人。海后胜雄在战争期间也在缅甸担任过陆军司政官，并于1942年撰写了《东亚民族教育论》一书。在该书中，海后认为：“明治以后日本教育的最大特点就是深受欧美影响，其内容大部分都是对欧美的介绍”，“对于日本现在所处的历史性社会阶段漠不关心，即所谓缺乏时事性的教育不过是完全没有教育学价值的闲人兴趣，而日本教育学界是不应允许这种教育存在的”。此外，他还在1952年将缺乏民族解放斗争视角“而只考虑个人和人类的人文主义”教育论批评为“表现了中间阶层教育者的脱离社会性”。 [362]

在战后十分活跃的教育学家中，这种事例不在少数。例如，海后宗臣在1943年主张“彻底粉碎美英的殖民地教育，创造能够成为大东亚新秩序建设基础的新式教育”，[363] 到了战后又开始强调有利于战后日本及亚洲民族解放的民族教育的重要性。宫原诚一曾于1943年提出“国民学校需要将学生培养为具有国民精神、确立了对国体的信念并深知皇国日本使命的人”，而后从1953年开始主张通过“正确的爱国心”来克服“无国籍式教育”。[364] 1941年曾认为“军营是国民教育完成的地方”、“作为净化国民素质的熔炉，应该广泛开展兵役制度”的宗像诚也，也在战后开始主张创造具有新民族意识的日本人。[365]

此外，如前所述，矢川德光等人曾以苏联教育中党的指导性为依据，对经验学习加以批评并主张确立“教师在教育中的指导性”。而矢川等人的这一意见与海后胜雄于1939年提出的“政治现象原本就不是依靠个人的反省或思考，而是以民众对领导者的绝对服从为原则”有着某些微妙的共通之处。[366]

如前所述，丸山真男及大塚久雄等战后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在战争时期是名不见经传的，他们也没有大量发表赞美战争的文章。当然，也有像平野义太郎那样战前还是左派而战争开始后又撰写大量赞美战争的文章，到了战后又再次成为日本共产党系学者的人。但总体来讲，如今被视为战后知识分子代表人物的，都是一些没有协助战争污点的人。

而教育学则是一个应用科学色彩浓厚，且与行政及学校有着密切关系的学科。为人师表的意识，也成了使他们服从当时规范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与历史学及哲学等其他领域相比，教育学领域中协助战争者的比例似乎更高。

正如第一章中所引用的那样，教育学家宗像诚也在解释自己为何书写协助战争的文章时提出的第一个理由就是“对监狱的恐惧”。而另一个理由是“我是一名教育者”。[367] 他的回忆告诉我们，一些有良知的教育

者同样有陷入协助战争的情况。

战争期间，宗像曾担任国民生活学院的主事。当时在他的头脑中的是“为人师表”的意识和“如果我们退缩那学生们将会多么不安和困惑”的担忧。因此，为了“不让学生们陷入不幸”，宗像决意“自己绝不能退缩，不能成为危险人物而是应当成为模范的爱国者”，并烧毁了自己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著作。而在那之后，他开始在主事办公室里摆上了神龛进行拜祭，并于每月8日的“大诏奉戴日”宣读对美宣战书。

在这种情况下，宗像思考出一种名为“天皇制下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即“天皇面前国民皆平等，军部及财阀飞扬跋扈的做法是错误的”，也就是依靠这种“一君万民”的理论无限地活用社会主义思想。然而，为了在被特高警察发觉时可以有一张救命符，他甚至有过“将这种想法在报纸或杂志上发表以获得一些成绩的下作想法”。不只是宗像，许多原马克思主义者都撰写过主张建设总体战体制的文章。

同时，在爱国主义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宗像“理性最终还是输给了害怕被视作叛徒的心理”。他曾回忆，“战端初开且经济景气时，对于周围人的得意忘形我还可以冷静视之”，但随着日本逐渐走向颓势，“我却开始提出在即将战败的情况下应该防止国家崩溃的言论”。宗像的这种心理，与战争末期主张重建总体战体制的丸山真男等人有共通之处。

当然，这种战争中的经历给宗像留下了莫大的悔恨。他在战后的回忆录中写道：“当时作为一名教育者是痛苦的事情。即使不停地欺骗自己，最终还是没能停止堕落。”并表示：“只要有过我这种经历的人，都会明白那些有良心的教师对自己在战争期间的责任所抱有的悔恨和苦闷，也正是出于这种原因我才会对‘不要将学生再次送上战场’这一战后教员工会运动的口号产生共鸣。”

然而，这种悔恨同时又转变为对日本共产党的敬佩。在透露自己是

因害怕坐牢才开始协助战争时，宗像曾表示：“那些在狱中被关了18年的人，仅凭这一点就可以说是超乎常人的，这让怯懦的我十分佩服。”至于为何没有自信去反对战争，宗像将其中的一个原因归结为自己“没有科学合理地把握社会及历史的弱点”，并表达了对马克思主义和日本共产党的敬意。

因此，矢川德光等人对战争期间的事情越是悔恨，就越是服从日本共产党中央的领导以减轻自己的痛苦。于是，当日本共产党提出依靠“民族战线”进行反美斗争的方针时，他们便以服从党中央的形式重新开始使用战时的语言。

当然，这种倾向并不适用于所有教育界相关人士。本章提到的教育界相关人士中，上原专禄等人在战争时期的文章，就不像矢川德光等人那样对战争大加赞美。然而，问题在于协助战争的教育学家中，有许多人是在掩盖自己战时言论的情况下直接转变为战后的民族教育论者的。据专门从事战争期间教育者协助战争研究的长滨功讲，矢川德光和宫原诚一在战后出版的著作集和著作目录中，没有加入任何一篇自己在战时发表的文章。[368]

六全协召开后，矢川曾在其文章中对党内的“神经强韧组”进行批判，并表示：“不希望说真话反而惹祸上身。”[369] 事实上，矢川之所以故意掩饰其协助战争的历史，可以说恰恰是因为他不够“坚定”。虽然最终他反而因此被看作“坚定派”的一员，但这另有其因。

当然，这种现象并不只是发生在左派或进步派之中。战争期间叫嚣“鬼畜英美”，而到了战后又主张“亲美反共”的保守派政治家或教育者也不在少数。前文已经说过，保守政权所主张的爱国教育实际上迎合了美国的意图。但是，对其进行批判的左派也不能否认自身掩饰战争责任的事实。

当然，也有一些教育者敢于承认了自己有过协助战争的事实。据说，宗像诚也就在战后的著作中不断进行自我批评，并在大学讲义的开头谈及自己的战争责任以说明教育的重要性。[370] 但也许是因为战后的整肃不够彻底，大多数教育界人士并非如此。

不过，多数教育界人士在内心中确实怀有一丝悔意。例如，有位教师在接到自己30年前学生的聚会邀请函时，竟婉言谢绝了。关于谢绝邀请的理由，这位教师在给报社的投稿中写道："当时担任小学五年级班主任的我，比任何人都醉心于军国主义教育。日本战败后，我出于自责想过辞职，但最终连这一点也没能做到，现在还有什么面目作为'恩师'出现在他们面前呢？"[371]

此外，高知县教师竹本源治战后创作过一首诗，其内容为"逝去的学生们啊，我的手沾满了鲜血。当时拉紧夺去你们生命绞索的，是作为教师的我"。而这首诗在当时的教育界人士中广为流传。[372] 宗像所提到的"不要将学生再次送上战场"这一日教组的口号之所以能够得到广泛支持，实际上也是由于大多数教师或多或少都在心中怀有一丝悔意。

事实上，前文所述梅根悟反对矢川等人的民族教育论，也是出于他个人对于战争的反省。梅根也曾在1941年主张"坚定对天皇一统这一日本国体的信念，及确立以此为基础的精忠报国的根本精神"。[373] 对此，梅根在1953年发表的文章中写道：

> 我自己曾被国家的爱国心工作所俘虏，数年中作为其爪牙不断对学生进行爱国教育。现在回想起来，确实觉得自己十分愚蠢。在忏悔过去的同时，我为能回到生活教育这条正确道路而历尽了艰辛。……我认为当今我国教育界最重要的问题，是阻止目前这种自上而下的爱国教育再次抬头，特别是保守统治势力正在进行的爱国心工作。……无论是左还是右，为了保护孩子们，我们都必须阻止这种有可能将他们再次送上战场的爱国教育。[374]

然而，梅根的意见在1953年并没有得到广泛支持。这是因为他的这种既反左又反右的中立论，是当时日本共产党最大的攻击对象。并且，在战后贫困与朝鲜战争爆发这些现实面前，许多人认为“阻止保守统治势力的爱国心工作”的关键，是以社会变革为目的的“真爱国”，而并非否定“政治”及“爱国”本身。

并且，事实上梅根本人也没有更深入地思考过战争责任问题。如同前文所述的文学家一样，如果在战争刚刚结束时进行有关深究战争责任的讨论，那么最终很有可能出现大家互相中伤并揭发对方协助战争的行为的结果。如果梅根通过列举矢川在战争期间的言论来批判民族教育论，那么不只是梅根本人，就连与梅根共同创建中心课程联盟的其他教育学家在战争期间的言论也都会被公之于众。

因此，即便战后的教育学家中有个别人对自己在战争期间的责任进行反省，但总结整个教育界协助战争的主张最终没有得到广泛响应。存在于左右两种民族教育论中的战时的延续，就在这种情况下遗留下来。

停滞的到来

事实上，左派的民族教育论与保守派学生家长的看法也有共通之处。这是因为保守派家长同样对战后“新教育”感到不解，同样对“学力低下”感到不满，并且同样主张废除社会课并恢复日本史和地理课。

同时，左派的民族教育论也与保守派主张恢复修身课程的看法有共通之处。如前所述，石田宇三郎曾指出战前教育中“国民的奋斗目标”十分明确，而战后教育则是“毫无方向性的放任式‘自由’”。1958年，关于家长对恢复修身教育的要求，宗像诚也有过以下言论：

> 大众的希望并非没有道理。在日教组的教研大会中，曾有过这样的发言。一名家长十分直白地表示：“新教育就像是在搅拌着一碗没有料的大酱汤，让人完全看不懂其中的意思而干着急。”……

> 所谓"没有料的大酱汤"，让我解释的话，就是战后教育虽然并非完全放任，但确实没有给学生一个积极的核心价值。尊重学生自由、拓展其自主性，这些说起来好听，但究竟应该怎样实行呢？填鸭式的灌输不行，严厉的批评也不行，似乎无所作为才是真正的教育。……
>
> 我对这位家长的心情抱有同感。现在的学生……是否还有那种为达目的排除万难的坚强意志呢，我不这么认为。他们究竟会成为什么样的人，真的十分让人担心。他们没有积极的理想，也就没有管理自己生活所能参照的原理。[375]

以上看法，是主张"民族独立"的教育论开始抬头的背景之一。同时，这也是对以何种教育方式替代战前忠君爱国教育的一种摸索。

然而，这种看法有时也会转变为要求恢复某些家长与教师共通并十分熟悉的东西。例如，1953年高桥磌一在批判保守派的爱国教育论时说道："要求学校开设历史和地理课的这种在一些人看来很坦诚而在另一些人看来很反动的呼声中，是否有担心自己的子女习惯了口香糖而忘记了萝卜干的味道的家长作为一个国民所应提出的要求呢。"[376] 至于"萝卜干的味道"为什么是"一个国民所应提出的要求"，高桥则只字未提。

同样，矢川德光在1952年批判日本所处的"殖民地状态"时也表示："来自美国的'外国电影'正在将殖民地的淫风吹向日本民族的精神世界"，"街头播放着的靡靡之音，正以其轻浮而又颓废的旋律污染着日本民族的双耳，让孩子们的精神腐化到了最深处"。此外，松岛荣一也在同一年对"邦邦女郎和巧克力及可口可乐所体现出的殖民地文化的堕落"进行了批判，并对"三千多年的历史"所孕育出的"传统艺术"、"节日"、"民谣"及"民间故事"加以赞扬。[377]

当时，无论是对于比日本富裕不知多少倍的美国的憧憬还是反美的情绪，其程度都是现在所无法想象的。如第七章中所述，对于当时的日教组而言，美军基地周边的风气是一个重要问题，如该章中所提到的"向美军讨要巧克力的孩子"、憧憬"邦邦女郎"生活的孩子以及"含泪

训斥他们的”教师。

然而即便如此，在对战后变化的迷茫和“重建”民族主义与道德秩序的目标上，当时的左派和保守派的看法还是有一些共通之处的。

矢川和国分所主张的“教师指导性”问题也同样如此。虽然矢川在批判“新教育”时所使用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但其实质内容是针对“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批判、对爱国心和道德观的强调、对美国的反感以及要求重新树立教师指导性的主张。这就是在战后的混乱时期，对“新教育”的批判受到广大教师支持的原因。

国语教育方面的情况同样如此。在左派提出将《万叶集》和《平家物语》作为“民族文化”进行重新评价时，那些已经习惯了让学生默背课本和欣赏古文的教师一致表示赞同。当然，这些作为重新评价对象的古典文学也是他们在战前和战时十分熟悉并一直作为“民族文化”加以赞扬的。

不过，虽然他们有意识地将自己的教育论与保守派的教育论进行了区分，但在教学过程中二者往往又会发生微妙的重叠。1951年，一位小学教师利用社会课的时间向学生教授日本史，一些赞同历史教育的家长甚至寄来了感谢信。不过虽然当时所讲的内容是关于岛原之乱这样的农民起义，家长们的信中却是“必须恢复王权以实现昭和维新”、“恢复楠公精神[378]！”等内容，这让这位教师十分失望。但同时，当看到学生对日本史课程如此感兴趣，这位老师还是十分欣慰地感叹道：“毕竟你们还是日本人的后代，毕竟你们的身体里还是流着日本人的血。”[379]

在1950年代的言论界，出现了左右两派都主张“爱国”并将对方批判为“世界主义”的现象。如前所述，1955年文部大臣清濑一郎曾称批评《教育基本法》的人是“世界主义者”，而宗像诚也又在日教组的机关报中对其进行批判，并指出保守政权才是真正追随美国的“世界主义者”。

1960年，文部大臣荒木万寿夫指责反对《日美安保条约》的学生缺乏“爱国心”，而时任日教组委员长的小林武又对其进行反驳，称学生反对《日美安保条约》是“新时代爱国心”的体现。[380]

然而，这些主张虽然在言论界十分流行，却很难为全体人所接受，这一点即使在日教组内部也不例外。1952年1月，教育学家森昭表示：“自愿前来参加前日教育研究大会（日教组主办）的人，据我所知少得惊人”，大多数教师“在对当前形势的判断上与日教组中央有很大出入”，他们认为“对民族危机的强调和对和平的呼唤是荒唐的、夸张的，是隐含着阴险政治阴谋的宣传”。[381]

至于保守派的政治家和家长就更不必说了，对于日教组的主张他们根本不屑一顾。此外，前文提到的“国民歌”也一直没能得到普及。对于保守派而言，反对《君之代》和“日之丸”的日教组所提出的新式“爱国心”，是难以想象的东西。

在这种情况下，教育学家与日教组仍将宣传“爱国”教育坚持到了1960年代前期。与国民历史学运动不同，汇集了各种教师的日教组并没有因1955年日本共产党的方针变化而迅速瓦解。虽然1950年代中期以后“民族危机”一词的使用频率有所降低，“民族教育”这一称呼也逐渐改为“国民教育”，但1961年日教组还是在安保斗争日益高涨的情况下提出了“国民教育运动”，并在教研大会中设立了小组会进行讨论。

不过，日教组的运动虽然持续了下来，其内容却基本没有任何进步。1957年，教育学家伊藤忠彦在日教组机关杂志《教育评论》上连载了有关战后教育史的文章。他在该文章中指出，战后“民族教育”向“国民教育”的转变，在内容上基本没有任何变化，而只是改变了“用词”而已。[382]

从1950年代后半期开始，对于以亚洲各国为榜样的“民族教育”，很

多人开始提出质疑。1955年，胜田守一提出，“人们应该认识到，日本的情况与亚非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之间是存在差别的”，并认为在左派的民族教育论和保守派的爱国教育论这二者之间，一般家长“还是较为容易接受后者”。[383] 不过，这种质疑最终没有得到深入讨论。

1955年，为反对自由民主党提出修改宪法及《教育基本法》，日教组开始主张重新评价《教育基本法》，这可以说是日教组运动唯一的变化。关于这一点将在第十一章中详述，这里只想指出，这种变化从某些方面来看与其说是教育学家或日教组通过内部讨论而主动采取的行动，不如说是面对保守政权的攻势所采取的一种被动的反应。

同时，这种变化还是对社会整体变化的反应。在日本共产党失去权威、经济开始复苏的1955年后，关于“民族”的主张略有减少，而对于宪法及《教育基本法》的评价则开始增加。同时，像1950年矢川德光那样坚决认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能够肩负起人民革命重担的一代”的人也开始减少，而肯定战后“新教育”成果的声音则开始增加。总而言之，“新教育”在战后历经10年后，终于随着社会的安定而逐渐稳固下来。然而，以宪法和《教育基本法》为基础的教育，正如战后马克思主义者所批评的那样，总让人觉得只是停留在抽象的和平教育上。

关于这一点，加藤周一在观摩1956年1月日教组第五次教研大会时说：“战后的日本社会整体上失去了人所应有的面貌”，“民主主义是一个框架，其中的内容需要以这个框架为准。然而，在当今社会，这种内容却是以完全混乱的形式存在”。[384] 教育学家看问题的方式也是如此。

为反对保守政权提出的恢复道德教育，1958年1月召开的日教组第七次教研大会对“战后十年我们所进行的道德教育”进行了重新思考。来自全国各地的教师中，有人认为虽然修身课程已经不复存在，但战后教育同样有其独特的道德培养方式。至于这种方式“究竟是以培养什么样

的人为目标”，就连代表之间也存在不同的见解。有人认为应该是培养“积极向上的人”，有人认为是培养“珍爱生命、向往幸福的人”，但“始终没有人提出‘热爱和平、始终坚持真理的人’”。[385]

正如本章前述的那样，1950年代的教育学家，有一种出于对战前教育中“国家目标”的怀念而不断摸索其替代品的倾向。然而，依靠这种思考方式的延续，即使摸索新的教育理念，最终也不会得到令人满意的结果。这是因为，无论他们想要寻找什么理念，只要是出于寻找“国家目标”的“替代品”这个动机，这种理念就不过是个“替代品”，他们在潜意识中应该也认识到了这一点。

也就是说，束缚着战后教育论的，是被烙下战争印记的思考方式。因此即使说法上由“皇道日本”变为“主权在民的国家”，但普及共通语、强调教师的指导性、主张反美、赞扬“民族”及“传统”、追求“国家目标”等思考方式并非一朝一夕就能改变。左派虽然与保守派在思想上对立，但二者又有许多共通之处，其原因也在于此。战后的教育学家和教师是在不知不觉中被战争的烙印束缚，并在战后十余年中不断为已经失去的“国家目标”寻找“替代品”。

其中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那就是如何克服战后的贫困。关于这一点，从保守派到左派，没有任何人存在异议。无论是关于地方上非民主的人际关系，还是关于学生无法适应学习的问题，首先都会被当作贫困问题进行讨论。入学考试和学历竞争，在当时也被看作就职困难所引起的经济问题。[386]

1950年代后半期以后，左派的民族教育论及国民教育论逐渐在思想上僵化。这与第十一章中将要提到的护宪论及和平论失去思想活力几乎是同时的。教育界人士为了革新阵营的团结而放弃追究其内部的战争责任问题，战后针对《教育基本法》和“新教育”的批判也没有得到总结，这些都是加速这种思想僵化的因素。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受教育对象的学生不可能不认为“战后民主主义”具有欺骗性，形同虚设。在1960年代，也就是接受战后教育的第一代儿童成长起来之后，这种不信任感便成了对“战后民主主义”的批判声出现的背景。

第十章 “血色民族主义”的记忆

战后日本的思想家中，谈到对“民族”和亚洲的重视，人们常常会想到竹内好。本章将主要介绍竹内好的思想与1950年代前半期发生的“国民文学论战”。[387]

作为一名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竹内好在1951年开始提倡“国民文学”，并对“近代主义”进行批判。其中，他呼吁人们要重视战时以日本国粹主义文学而闻名的日本浪漫派。此外，日美开战之时，他还以撰文赞美“东亚解放”的战争而闻名，并在战后仍然主张太平洋战争的结果是为亚洲带来了解放。

因此，竹内常常被视为继承了战时国粹主义和亚洲主义的衣钵、对赞美近代西方文化的战后启蒙运动持批判态度的民族主义者。此外，1960年代以后，经历了全共斗运动及新左翼运动的年青一代在主张批判“战后民主主义”和“近代”的同时，也将竹内好重新评价为“从民族这一视角出发，果断地对民族主义＝近代主义进行批判的学者”。[388]

然而，如前所述，提倡“国民文学”及对中国的重新评价，以及通过“民族”这一概念对“近代主义”进行批判的观点并不少见。特别是在1951年，这种观点还是日本共产党的公开主张。

竹内好在国民文学论战中甚至将日本共产党也批判为“近代主义”，并与丸山真男等“近代主义＝战后民主主义”的代表人物相交甚厚。此外，1960年竹内好在谈及社会上对自己的评价时，还提到有人称他

为“法西斯主义者或民族主义者”。[389]

参照以上背景，本章姑且先不将竹内好定性为“民族主义者”，并以此为前提进行论述。论述的角度将集中在竹内通过“民族”和“近代主义”这两个词所要表达的内容上。正如丸山真男的“近代”一词并非单指西方近代一样，竹内所提出的“民族”一词中也包含了他独特的理解。而以这种理解为背景发生的国民文学论战，则是“民族”一词所引起的意见对立的一次集中体现。

“政治与文学”的关系

竹内好1910年出生于长野县，但后来在东京长大。父亲事业上很失败，母亲也在他14岁时去世。竹内的父亲原本在政府工作，但在他出生之后便开起了妓院。因此，竹内好的童年是在贫困的生活和人们异样的眼神中度过的。

据竹内的回忆，与贫困本身相比，“担心不知何时就会因贫穷而遭人耻笑的心情”要“更加痛苦”。关于这一点，他在回忆录中列举了两个例子，一是在学校每当到了午饭时间没有铝饭盒的自己就难受至极，二是中学入学考试时自己只是因为得到了一件新衣服就欣喜若狂。[390]

虽然这种自我意识是贫苦人家的孩子所常有的，但竹内自幼“要比别的孩子更爱面子”。不过对于竹内而言，这种性格也成了他的动力。他后来表示：“我一生中最大的动力，就是我心中的自卑感。”[391] 为了摆脱贫困的现实，除了漫无目的地阅读一些文学作品之外，他还尝试通过努力学习取得比其他学生更为优异的成绩。

然而，通过努力学习成为“优等生”，反过来讲也就是要迎合老师。小学四年级时，竹内在命题作文中写下的一首和歌受到了老师的夸奖，后来他承认这首和歌并非自己的风格，而是“迎合了老师的口味”。竹内

就是以这样的经历为例，证明“学生总是在迎合老师”这一“定理”。[392]

然而，竹内很快就厌倦了这种迎合。在小学老师眼里竹内一直是一名优等生，竹内自己也多次拿着写好的文章请那位夸奖过自己和歌的老师修改，后来他在将写过的作文自制成册后还请那位教师题字并一直保管着。但是，考入府立一中后竹内开始怀疑自己并不是一名优等生，最终在中学四年级时逃课去了井之头公园，并在树林中将那本作文集、一些信件以及自己积攒下来的稿件等全部烧毁。[393]

为了摆脱自卑感而成为迎合老师的优等生，在产生优越感之后又开始鄙视他人。竹内一生所面对的课题，便是摆脱这种迎合与优越感之间的关系。

而正如后文中所要谈到的那样，在学习西方文明之后便不断批判亚洲的“优等生”日本，其后又打破这种优越感而实现自我革新的过程被称为“永远的革命”。

虽然放弃了做一名“优等生”，但竹内“爱面子”的性格没有任何改变。在放弃“优等生”身份后他的数学成绩开始退步，并最终在1928年考入大阪第八高中。这是因为在当时新设立的学校中，该校是唯一一所入学考试科目中没有数学的学校。虽然平安通过考试，但本来向往京都第三高中的他感到了“无比的耻辱”，并将整个假期都花在了往返于大阪和京都之间的路程上。关于这样做的原因他后来解释道：“心中没有嫉妒的话，京都的学校想都不要想。”[394]

竹内的高中时代，同样也是战前左翼运动的高潮时期。为反对校方将学生移交给特高警察，从事学生杂志编辑的他组织过一次全校大罢课。众所周知，与竹内同时被定为罢课主谋的学生中，还有后来成为日本浪漫派中心人物的保田与重郎。1931年高中毕业后，竹内考入东京帝国大学中国文学系，并加入了马克思主义读书会。

然而，竹内的性格并不适合搞政治。在阅读《资本论》时，他不是为书中的实践理论而是为其论述方式所折服，并模仿这种论述方式写出了一本推理小说。他选择东大中国文学系，也只是因为该系是东大所有院系中“最好考的”。[395] 然而，以这种方式偶然邂逅的中国，却改变了这个自我意识过剩的青年的命运。

进入东大中国文学系后竹内选择了现代中国文学专业，而在当时这是一种十分特别的选择。一谈到文学，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西方文学。而关于中国，则不是以战争及“大陆政策”为背景的政治经济方面的内容，就是古籍和史书等古典方面的研究。

当时的中国文学系的研究对象，也确实是以古典方面为主。在同期入学的人中，选择现代文学专业的只有竹内一人，而且据说他是建系以来第二位完成现代中国文学方面毕业论文的人。[396] 更有意思的是，当时该系的中文教育也是以古文的读法为主，并且根本不开设现代中文会话课程。

原本以优等生为目标的竹内选择了这个不被系里教授所看好的领域，可以说也是他叛逆心理的一种表现。后文还会提到，竹内在后来还曾将“汉学老师”和“官僚文化”并称为文学创新的敌人。

如前所述，在当时的日本，关于中国，人们只关心古典文化和政治经济这两个方面。而这二者又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缺乏将当时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当作日本自身问题看待的观点。研究古典的人对当时的中国不感兴趣，而政治方面的“支那通”们即便不是将中国当作日本的侵略对象，最多也只是把中国当作同情或怜悯的对象。然而，竹内在自己的问题意识中发现了与同时代的中国文学家之间的共通之处。

1932年8月，正在读大学的竹内开始了他生平第一次中国旅行。到达北京时，竹内“曾为能遇见与自己观点相似的人而感动不已”。[397] 在

北京的一个月里，竹内在家庭教师的辅导下学习中文会话，并开始痴迷于现代中国文学。回国后，竹内与朋友武田泰淳等人一起在1934年1月创立了中国文学研究会。

那么竹内在中国文学中发现的“与自己相同的看法”到底是什么呢？一言以蔽之，就是自立于外部权威。

竹内从中国文学中发现的自立于外部权威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是不断殖民地化的中国要从西方近代的权威中实现自立并最终完成独立。这也是竹内在战后最关心的问题。

然而，1930年代前期竹内在中国文学中发现的则是另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的文学家们如何与“政治”权威保持距离，并以此确立文学自律性的问题。

当时的中国，是接连发生国共内战和日军入侵的政治时代。在这种环境下，文学家不得不考虑政治。而这些中国文学家所思考的问题，与在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全盛期度过大学时代的竹内完全一致。

1933年12月，23岁的竹内在提交学校的毕业论文中主要论述了郁达夫这位作家。在这篇毕业论文中，竹内将郁达夫描述为一名“因性格深处的文人气质和孤独癖”而拒绝参与“政治”，并不断摸索文学的自律性的作家。[398]

郁达夫是主张“为艺术而艺术”的创造社成员。但人们普遍认为，与同为创造社成员的郭沫若加入革命运动并创造出“有建设性的、积极的”作品相比，郁达夫却不断创作“破坏性的、消极的”作品。[399]

竹内却认为郁达夫并不只是一名孤立的文学家。虽然他一直避免直接参与政治，却逐渐与和自己有同样痛苦的民众产生共鸣，并不断进行文学创作。也就是说，郁达夫没有参与处于自己“外部”的政治，而是通

过不断凝视自己内部而摆脱孤立。

竹内在这篇论文的结语处写道：

> 郁达夫——他是个苦闷的诗人。他以真挚的态度探寻自己的苦闷，并通过大胆的表现手法加以披露，这在中国文坛产生了异常的影响。这是因为，他的苦闷同时也是那个时代的青年共同的苦闷。[400]

不是通过迎合外部权威而凌驾于他人之上，而是不断发掘自己内心的苦恼并通过“文学”与他人的苦恼产生共鸣。竹内将郁达夫的这种创作风格形容为“外柔内刚的艺术”。[401]

战后，竹内被看作提倡国民文学论，并通过大量的时事评论积极参与政治的批评家。大光头和独特的外表又使他获得了“国士气质的辩论家”这一评价。[402] 因此，当时他对拒绝“政治”的“文学”大加赞扬，似乎有些令人匪夷所思。然而，正如后文所述，他在其主要著作《鲁迅》中同样对文学家轻易参与“政治”表示了否定的态度。

在战前的照片中，竹内是有着一副纤弱面孔的文学青年形象，这与后来的“国士”风格大相径庭。如前所述，由于他对自己的外貌有一种自卑感，所以此后的“国士”风格可以说是一种故意摆出的姿态。

竹内的盟友武田泰淳在评价竹内时也提到，他是一个“无论什么事都不会服软”的人。[403] 不管怎样，《郁达夫论》这篇论文中所表达的看法，此后作为竹内的基本思想一直延续了下来。

不过随着时代的变化，竹内还是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自己基本思想的表现形式。第一个变化是竹内的社会观念受当时中国时局紧张化的影响而逐渐增强，其研究对象开始由郁达夫转向鲁迅。

大学毕业后竹内一度想找一份与中国相关的工作并报名参加满铁调查部，但文学院出身的他没有被录取。当时又正值1930年代中期的经济

大萧条，毕业后也很难找到其他工作。自1935年开始，中国文学研究会的学会杂志《中国文学月报》（1936年10月后更名为《中国文学》）发行。

在日中战争爆发前的1936年10月，中国文坛巨匠鲁迅离开了人世。竹内在战后曾表示，在1943年完成《鲁迅》这部著作之前“自己一直都很讨厌这个人”，[404] 虽然他以悼念鲁迅的形式写了一篇关于中国文坛情况的文章，在该文中却认为，“能够坚持到今天的作家，大多是因为他们使自己的人生追求迎合了这个社会”，而“先驱者的自我意识越是强烈，就越会失去人们的支持而离文坛越来越远”。前者的例子是鲁迅，而后者则是郁达夫。[405]

竹内在后来的变化，既受到了日中关系正在走向战争这一时局变化的影响，也与其自身经历有关。[406] 在撰写悼念鲁迅的文章前后，1936年11月，竹内等中国文学研究会成员为来访日本的郁达夫举办了欢迎会和演讲会。然而，郁达夫在前一日对中国留学生进行煽动性抗日演说时被警察发现，导致演讲会当天有大批警察涌入会场，为了救场竹内还进行了即兴演讲。

事实上，郁达夫在这时来到日本，其真正目的是为进行抗日活动购买印刷机器。在日本的那段时间，他还与因进行抗日活动而遭到警察监视的郭沫若有过三次会面。在那之后郁达夫开始从事抗日活动而变得音信全无，但据说太平洋战争期间他最终在苏门答腊岛遭到了日本宪兵的杀害。

关于当时的经历，竹内后来回忆道：“当时我什么也不知道。也就是说，实际上侵略的一方对遭到侵略的一方一无所知。”[407] 他通过研究文学作品将郁达夫判断为一名孤立的作家，但事实上郁达夫是一位十分活跃的人物。而这种经历，也被推测为竹内转而研究作品具有较强社会性的鲁迅的契机。

然而，那之后的一些经历使竹内的研究方向更加坚定地转向鲁迅。那就是日中战争期间在北京的留学生活和二战末期在中国战场的军旅生活。

抵抗的**“12**月**8**日**”**

1937年，竹内开始了他的北京留学生活。虽然因日中战争爆发而推迟了一些日子，但在送走接到征兵令的好友武田泰淳之后，竹内最终还是带着岩波文库《战争与和平》来到了北京。

当时，大多数中国的知识分子为躲避战乱纷纷出逃，北京大街上耀武扬威的日本军人和商人着实煞风景。虽然在这种气氛下根本无法进行文学创作，但竹内还是靠着日语教师等工作在北京坚持了整整两年。

虽然竹内写了不少回忆录，但关于这段在北京的时光，除了“一生中最痛苦、最想忘却的一段时光”、“让我体会到了二等公民的感受”等只言片语外很少提及。从这些只言片语中可以看出，在目睹了日本兵和日本商人的蛮横无理之后竹内开始自暴自弃，每日都是“喝酒闲玩”。[408]

战后的1949年5月，竹内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人的抗战意识与日本人的道德意识》的文章。[409] 在这篇文章中，他谈到了当时的日本政府公然有计划性地批量生产国际上所禁止的鸦片，并贩卖至中国的事实。而这一事实在东京审判结束后才被公之于世，战争期间普通日本人根本无法得知。竹内却说：“由于我从事文学工作，所以在当时就略有所闻。”[410]

在这篇文章中，竹内对1938—1939年（北京留学期间）的林语堂的小说进行了论述。竹内指出，战争期间林语堂的小说在日本出版时，有关日本政府进行毒品买卖的地方都遭到了删除或修改。该文章中，竹内

还摘译了这部小说中讲述吸食毒品的中国男人，在遭到日本水手殴打后决意重新做人的片段：

> “您知道谁让博雅下决心要戒掉吗？一个日本水手。……一个穿日本水手制服的人跟在后面。……她一回身看，那个日本人还继续摸索。她好害怕，对丈夫低声说。日本人第三次调戏她时，她尖声喊叫，博雅转回身怒视。日本人打了他一个嘴巴，然后哈哈大笑。博雅对日本人的恨深入了骨髓，他心里立刻明白使他抽白面儿的是日本人，就决心戒掉。”
>
> 木兰问：“日本人打了他，他怎么办？”
>
> “他能怎么办？中国警察不敢碰日本人。那是治外法权哪！”[411]

在摘译完这段话之后，竹内写道：“这件事虽然是虚构的，但在现实中绝对有可能发生，我就见过类似的场面。这种事并不少见。”[412]他以这件事为例，论述了侵华问题上“日本人的责任”。

然而，竹内确实是在东京审判之前，也就是他在北京的那段日子里就得知了存在毒品交易的事。那么在战争期间，他为何没有对此进行揭露和批判呢？关于这一点，竹内在1949年的文章中写道：“这里先不谈我当时的勇气问题。”[413]

也就是说，竹内在北京的那段时间，明明知道日军的侵略行径却没有勇气出来抗议，而只是靠“喝酒闲玩”度过了两年时间。因此可以认为，竹内是由于对当初的悔恨才将在北京留学的那段时间看作自己“一生中最痛苦、最想忘却的一段时光”。如前所述，竹内虽然没有过多谈及这段留学经历，却在1941年回国之后说：“现在的我基本上已经接近于厚颜无耻”，“在（北京）时我有且仅有一个想法，当然现在已经没有了，而这个想法只有我自己清楚，因此大家难免都认为这个时期是我日记的空白期”。[414]

返回日本之后，竹内为维持生计，当了日本政府为侵略大陆而设立

的“回教圈研究所”的研究员。正如石母田正在表示悔意时所回忆的那样，在当时的日本基本没有任何工作与战争无关。此外，竹内为了解中国的消息，还加入了亚洲主义团体“东亚会”。

而就在这时，1941年12月，日本和美国之间爆发了太平洋战争。如第一章所述，当时有许多知识分子为此兴奋不已，竹内也是其中一个。1941年12月16日，他写下了题为《大东亚战争与吾等的决议》的宣言并刊登在中国文学研究会的《中国文学》上。该宣言的开头如下：

> 12月8日是天皇颁布宣战诏书的日子，日本国民团结一致奋战到底的决心已经燃起。有了目标之后人们都安下心来，没有人多说一句多余的话而只是用亲切的眼神互相注视对方。不必说，这时的景象仿佛就是建国历史的重现。
>
> 谁希望事态发展到这一步呢，直到战争爆发的前一秒，许多人都还坚信战争可以避免。人们认为战争是悲剧。但事实上，这样想的人本身就是个悲剧。[415]

战后，竹内对知识分子掩饰自己战争期间行为的做法一直持批评态度，并表示：“一切说过的话都像血肉一样要伴随人一生”，“无论别人如何给我定罪，我都只能带着这种思想下地狱”，[416] 并将上述宣言加入自己战后出版的单行本中。这篇宣言，在将竹内定性为继承了战时“大亚细亚主义”的民族主义者的文章中经常被引用。然而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该宣言开头部分之后的内容：

> 坦白地说，对于“七七事变”我们在心底里都不是十分赞同。疑惑使我们十分痛苦。……但残酷的现实无视了我们的存在，因此我们开始怀疑自己。我们实在太弱小了。现实逼近一步我们就后退一步，就像无舵的扁舟一般开始漫无目的地随波逐流。
>
> 现实过于清晰有力而无法否定，我们除了否定自己别无他法。在被现实逼得无处可退时，我们也曾在心中暗暗地做出过一些不寻常的决定。现在想想，受到局限的思维所能想到的也只有这些吧。终日闷闷不乐而无所

> 作为，对任何事又只能袖手旁观。……我一直在怀疑，我们日本是不是在建设东亚的美名下干着恃强凌弱的事呢。
>
> 我们日本并不惧怕强者，并且已经依靠我们坚定的决心和行动证明了这一点。作为一名国民，我无比欣慰。如今一切都已真相大白，再也没有任何需要隐瞒的。我们的怀疑也随之烟消云散。花言巧语可以骗人但行动不会。“建设东亚新秩序”和“民族解放”被赋予的新意义已经深入人心，现在是我们下决心的时候了。[417]

竹内当时虽然知道日本侵略中国的实情，但他不但没有勇气反对这种行径，还依靠从为军队服务的调查机构那里得到的薪水维持生计。对他而言，不对日本的侵略行径进行否定就无法否定自己。

当这种对自己的厌恶达到无法忍耐的程度时，日美间爆发了战争。而竹内从自己的主观愿望出发将其解释为日本敢于挑战作为“强者”的欧美。开始自暴自弃的他孤注一掷地认为，日美开战让“东亚解放”这一口号成为事实，而侵略中国的事实则可能因此被人们所忘却。[418]

竹内的这种心情在当时并不少见。清水几太郎也在回忆日美开战时的情况时谈到，长久以来因日中战争的僵持而烦恼不已，在这时终于有了“便秘突然通畅时的感觉”。此外，1959年竹内引用了高杉一郎文章中的一段，这位从事文艺杂志编辑工作的人“在日美开战之后仿佛一夜间就实现了自我麻痹，他对日中战争的抵触意识也开始转化为一种圣战意识”。[419]

然而，战后成长起来的年青一代根本不了解这样的背景。1958年，26岁的青年评论家江藤淳引用了上述高杉的回忆，并指出老一辈知识分子曾积极鼓吹“圣战”和“东亚解放”等“神话”。而竹内认为江藤的这种批评“虽然没有错，但还不够完全”，并反驳道：“我们一贯反对和厌恶神话，但最终还是因种种原因被卷入了神话。”[420]

然而，对中国的侵略这一事实，却没有如竹内所期待的那般消失殆

尽。在上述宣言公开之后，竹内受到回教圈研究所的委派，从1942年2月开始赴中国进行实地调查。在这次调查中，他到过日本生产毒品的“蒙疆”地区，并与负责调查毒品问题的调查员进行了一些交谈。

当时，日本军方经常利用一些转向后的马克思主义者进行这样的实地调查，而这些人也因为在日本国内找不到工作，并出于对牢狱生活的恐惧而最终投靠军方。与竹内交谈的调查员，也是这些人中的一个。

竹内在战后回忆当初的情形时谈到，这名调查员“曾极其细致地对中共的战斗力进行调查。这使我对日本军部利用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感到十分惊讶”，不过“他的调查以数据为主，似乎对从理论的高度来分析问题没有太大兴趣”。[421]

在与这名调查员的交谈中，最让竹内感到震撼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毒品政策。在《中国人的抗战意识与日本人的道德意识》中他这样说：

> 鸦片长久以来都是各军阀的重要财源，而禁烟往往会拜倒在垄断利润的诱惑之下。国统区虽然表面上禁烟，但实际上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在沦陷区，鸦片竟然可以完全公开地销售。但在与沦陷区相连的中共地区（解放区），鸦片是绝对被禁止的。但这也导致鸦片走私变得十分猖獗。如果单从经济角度来看，中共的这种政策似乎并不高明。因为这是拿自己地盘上的钱来增强对方的实力。然而中共没有为了眼前利益而放弃理想。明知于己不利，却没有采取任何手段。[422]

与竹内交谈的调查员详细地对中国共产党物质方面的战斗力进行过调查，而中国共产党当时在军事和经济方面的实力不要说日本，甚至不及接受美援的国民党。但至于中国共产党如何获得民众的支持并维持其抗战实力，这名调查员则没有任何兴趣。而且，他恐怕是第一个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十分愚蠢”的人。

如果通俗地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解释的话，那就是人的良心及道德等都不过是由经济基础所决定的意识形态，因此将这种东西当作调查对象

应该是“愚蠢的”。战后初期批判《近代文学》及大塚史学的日本共产党系学者，也曾认为谈论“主体性”毫无意义。然而，竹内在《中国人的抗战意识与日本人的道德意识》中提出：“相信有钱能使鬼推磨的人自己就是鬼。”他认为：

> 如果比较生产力的话，日本占绝对优势。……但毛泽东认为，即使没有任何条件，中国也可以凭借自身实力进行抗战。……如果毛泽东是一名普通的马克思主义者或教条主义者的话……那么应该会将敌我双方的战力看作一个固定实体，从而通过量的对比得出中国无法通过自身实力进行抗战的结论，并通过国际关系与其他条件来弥补自身的种种缺陷。……
>
> 那么，毛泽东的这种自信究竟源自何处呢？……中国共产党有过长期艰苦斗争的历史。而这种艰苦斗争并不只是与外部进行斗争，更重要的是通过不断净化自身以摆脱困境的斗争。通过在斗争中锻炼自己，使革命的热情上升至理想主义的极致，这种理想又被运用在与外部的斗争中，这便孕育出了将马克思主义具体化的从无到有的战术思想。[423]

竹内认为，中国共产党不是依靠外部援助，而是通过与自身内部的斗争实现自我革新，并通过这样的方式改变自身的现状。这种对中国共产党的印象，与竹内自《郁达夫论》以来一直主张的“政治”与“文学”的理想关系十分契合。

然而在战争期间，竹内却没有立即表示出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这不仅仅是因为害怕受到迫害，原本“爱面子”、不服输的竹内对轻易放弃自己曾经公开主张的看法也怀有一种抵触情绪，并且他本人也不会选择通过外部权威或思想进行自我批判。

竹内在战争期间所选择的，是尝试通过当时日本内部存在的思想来“净化”日本。也就是通过他在日美开战时赞扬过的“东亚解放”思想，对现实中的日本进行批判。

竹内1942年回国后的报告中，就包含了这种对日本的批判。竹内认

为，“东亚解放”这一“严肃的问题不能为那些只顾眼前功利的庸俗官吏所利用”。在日美开战后写下的宣言中竹内也曾主张“东亚解放”，并指出：“我们要驱逐那些所谓的支那通、支那学家以及没有节操的浪人，并为日支两国万年的共荣而献身。”[424]

如第Ⅰ部中所述，许多学生兵和知识分子战后思想的形成都是以“真正的爱国”这一战时思想为出发点。而竹内的战后思想则是通过“新东亚解放”这一战时思想的变种形成的。

这种倾向趋于明显，是从竹内批判1942年11月在东京召开的第一届“大东亚文学家大会”开始的。除该会议外，还先后召开过1943年8月的“大东亚文学家决战会议”，以及1944年11月的“南京大会”，但与会者不过是来自日本占领区的一些亲日文学家。[425]

1942年秋，日本文学报国会向竹内的中国文学研究会发出协办第一届“大东亚文学家大会”的要求，却被竹内断然拒绝了。竹内在批判这次大会的文章中写道，大会的策划方“都是一些既不懂文学又不懂支那而只擅长左右逢迎的人”，“中国文学研究会的传统，不允许我们帮助这些人讨好那些官员”，“真不忍心看他们亵渎支那文学”。[426]

作为拒绝的理由，竹内提出此次大会“亵渎了12月8日”的理论。他认为：“考虑到日中两国文坛的名誉问题，实在无法将此次大会看作日中两国文坛代表的正式会谈”，“之所以这么认为，是因为我们对实现文学界的12月8日是有信心的”。[427]

在迫害与告密泛滥的那个年代，敢于如此明确地拒绝文坛泰斗组成的日本文学报国会的命令，恐怕只有中国文学研究会。然而，他们的这种“抵抗”，却是借用了“12月8日”这一战争口号。这与丸山真男等人以合理进行总体战的理论进行“抵抗”十分相似。正如竹内在1959年《近代的超克》这篇文章中所讲的那样，在那个年代，“抵抗”与“屈服”不过是

一线之间。

虽然有人认为竹内的这种反对只是故作姿态，但事实似乎并非如此。他在战后承认，自己在日美开战时写下的宣言“是一种彻头彻尾的政治误判。但通过该文所要表达的思想并没有错误”。[428] 如前所述，当时他的确是希望通过自己所理解的“真东亚解放”来反对侵略的现实。[429]

当时，竹内的“12月8日”主要是针对“官僚文化”。1943年3月，作为中国文学研究会的解散宣言，竹内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文学〉的停刊与我》的文章。他在该文中表示：“为了号召全体国民反对来势汹汹的官僚主义”的统治，中国文学研究会“一度试图通过否定官僚化的汉学与支那学来获得其内部的学术独立性”，然而如今“研究会本身也开始出现严重的官僚化倾向”，故决定解散该会。[430]

当时中国文学研究会的规模，已经从只有竹内等数名中国文学爱好者的小组织发展成了拥有大量会员的大团体。日本文学报国会要求中国文学研究会支持“大东亚文学家大会”，也是由于该会当时已经成为日本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代表团体。然而，这使本应作为以往“支那学”的反对者的该会一跃成为一种权威，并开始显露出“支那学化”的倾向。

在《〈中国文学〉的停刊与我》中，竹内在称赞“大东亚理念无限正确性”的同时，还进行了以下论述。首先，他认为“官僚主义具有自我保护性”，而“大东亚文化必须建立在超越这种自我保护文化的基础之上”。这是因为“日本已经在观念上彻底否定了大东亚各地区的近代殖民地统治”，“而对殖民地统治的否定，也是对自我保护欲的放弃”。此外，“只有通过自我否定的做法，才能实现创造”，“日本文化之所以能够存在，并非因为创造了历史，而只是依靠将日本文化模式化、官僚化、枯竭化”。[431]

以上这种有些难懂的理论，源于日美开战后竹内所青睐的京都学派的“世界史哲学”。这一点与竹内战后的思想有相当的关联，故在此略加叙述。

如第二章所述，京都学派曾根据黑格尔的哲学理论，对“将国家、民族、个人等视为已完成个体”及“个体主义式思考方式”的观点进行批判，并称其为西方近代所产生的弊端。他们认为，这种“个体主义式思考方式”从个人层面上讲与弱肉强食的近代市民社会有关，从世界层面上讲又与强国的殖民统治有关。而日本在世界历史中的使命，就是对内实行超越个人的统制经济，对外实现“大东亚共荣圈”的建设。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思想中也包含了使“日本”这一概念相对化的理论。当时，朝鲜及台湾都在强制推行“皇民化”政策，京都学派便提出朝鲜人应当超越“民族”这一范畴而成为“日本人”。以此为背景，在“世界史哲学”座谈会上，出现了“以往被固定化了的小‘民族’观念应该融入大民族观念中”，“大和民族和朝鲜民族应在某种意义上组成日本民族”等主张。[432]

然而依照这种观点，为了贯彻“大东亚共荣圈”理论，“日本民族”这一“个体”同样需要发生变化并实现自我革新。如第一章中所述，对战争持赞扬态度的京都学派却遭到了陆军报道部和皇道哲学派的抨击，其原因便在于这种理论可能会成为对日本民族的一种亵渎。

黑格尔哲学和马克思主义认为，自我可以通过劳动或社会运动影响世界，并同时实现自我变革。战后日本共产党系知识分子就是以此为依据，主张自我源于实践活动，并将认为能够在无视社会运动的前提下保持“主体性”的观点批判为“近代主义”。应用这种近代批判思想的“世界史哲学”，同样谈到了日本民族通过参与建设“大东亚共荣圈”这一实践活动来实现民族变革的可能性。

当然，所谓“世界史哲学”，不过是一些哲学家为将战争正当化而创造出来的。竹内对这个学派的支持也不过是战争期间的暂时行为，[433]到了战后便将他们形容为“御用学者”。[434]但必须承认的是，这种哲学确实在战争时期让竹内看到了一丝希望，那就是日本也许可以通过“东亚解放”思想实现自我革新。

竹内在题为《〈中国文学〉的停刊与我》的文章中批评“官僚文化”和“近代殖民地统治”具有“自我保护性”，认为“大东亚文化必须以对自我保护文化的超越为基础”，“唯有通过自我否定才能实现创造”，事实上都是以该哲学为思想依据。但同时，这也与不依靠外部权威，而是通过正视自身内部问题来实现自我革新这一竹内一贯的思想一致。[435]当然，竹内主张日本文化的“自我否定”，并非希望引进外国文化作为新的权威。在《〈中国文学〉的停刊与我》中竹内提出，无论是西方文化还是东方文化，“从外部向日本文化中植入新内容这种想法”本身“就是自我保护性的，是站在肯定欧洲近代这一立场上的”。[436]也就是说，竹内认为希望从外部植入一些内容的做法无视自身内部问题并妨碍自我革新。

竹内认为“A之所以存在是因为A排除了非A”。[437]就像有了背景才能称其为画一样，“日本文学”这一概念也是依靠“外国文学”这一补充性参照物而成立。这便很容易让人认为，学习“外国文学”是为了使“日本文学”这一概念固定下来。基于这种思想，竹内在《〈中国文学〉的停刊与我》中提出“要研究支那，就不能肯定作为参照物的支那”。[438]

“外国文学的研究必须不断发展”，但这种研究“不能是个体通过排斥其他个体而存在，而是个体通过否定其自身直至能够包含其他个体”。具体而言，就是“只有当与他者的对立成为自身肉体上的痛苦时才是真实”。[439]当然，这种依靠发掘自身痛苦来体会他人痛苦的想法，与《郁达夫论》是一脉相承的。

竹内以批判“近代”的京都学派思想为依据，对以“大东亚文学家大会”为代表的“官僚文化”进行了批判。从表面上看，这种看法无疑是与反对京都学派并主张重新评价“近代”的丸山真男相对立的。

但是与这种表面现象相反，事实上丸山真男和竹内所批判的对象都是官僚体制。二者的区别在于表述形式而并非本质。丸山将官僚体制的根本判断为“无责任”并主张近代主体意识的确立，而竹内则认为官僚体制的根本在于“保身”并主张与此相对的自我否定和自我革新。

丸山与竹内对“近代”的评价也同样如此。如果将“近代个人”理解为“自我保护”，那么正如竹内所讲的那样，超越它就需要打破“官僚文化”。如果将“近代个人”理解为以不断进步、不断革新为己任的责任意识，那么正如丸山所主张的那样，应该将“官僚文化”彻底根除。也就是说，与表面上的差别相反，从观点上看二者在战后是一种惺惺相惜的关系。

而且，竹内对“近代”一词的理解，也并不只有消极的“自我保护”，还有积极的“自我革新”。1943年7月，他在一篇题为《关于现代支那文学精神》的论文中认为，中国的近代“并不是别人强加的，而是自主的”。[440]

竹内强调，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中国获得“自主近代”的开始。他认为，该运动爆发之前的中国文学，“其特征由近代的侵入与古典支那的应战及败北所决定”。[441] 换而言之，“西方近代”与“中国古典”没有像“日本文学”与“外国文学”那样相互对立并相互完善，中国文学最终没有能够完成自我革新。

“五四运动后，古典支那受近代国民运动影响自发地产生变化”，“并孕育出从内部对近代加以否定的因素”。中国文学不是依靠导入外部权威，而是通过正视自身内部才抓住了革新的契机。竹内将这形

容为“支那有了自己的近代”。[442] 也就是说，竹内在当时所使用的“近代”一词，有时是积极意义而有时是消极意义。

1943年12月，竹内最终还是收到了入伍通知。就像赶在入伍前完成江户时代论的丸山一样，竹内也在一个月前完成了《鲁迅》的手稿。在他开赴中国战场后的1944年12月，这部著作在一片空袭警报声中问世。

如前所述，竹内本来并不是鲁迅的忠实读者，他本人也在《鲁迅》中坦言：“这是我第一次从头至尾阅读鲁迅的文章。”然而，在当时那个时局紧张的情况下，阅读过鲁迅文章的他感到“它们与自己的思想十分接近”。[443] 最终，竹内以论述鲁迅的形式创作出了这部集自己思想于大成的作品。

在该著作中，竹内首先提出以往的鲁迅传记及独白一类的作品“与事实不符”、“令人无法信服”，并悉数加以否定。竹内认为，鲁迅虽然常常被视为一位政治作家，但他在骨子里“与政治无缘”。鲁迅不赞成当时流行的所谓“有利于革命的文学才是真文学”的看法，而是属于“通过怀疑文学的作用成为文学家”的一类。[444]

那么鲁迅的政治性又是如何产生的呢？竹内认为，“鲁迅的政治性通过拒绝政治而产生”。鲁迅“虽然是一名充满热情的民族主义及爱国者”，却“从未想过要创作为了民族或爱国的文学作品”。他没有涉及处于自己外部的“政治”，而只是通过与“内心痛苦”的搏斗来创作文学作品，并将“这种痛苦”展现给他人。[445] 鲁迅将自己内心的痛苦写成文章，并与他人内心的痛苦产生共鸣，这使他最终成为极具影响力的作家。

在《鲁迅》这部作品中，竹内围绕“幻灯事件”这一使鲁迅最终决定弃医从文的契机进行论证。在仙台医专留学期间，鲁迅观看的一部日俄战争纪录片中出现了日军虐杀中国人的场面。当在场的日本学生不断为

日军喝彩时，鲁迅突然意识到改变国人思想的文学要比改变国人身体的医学更加重要。以上是鲁迅回忆往事的文章中的概略。

竹内却认为“幻灯事件与鲁迅的弃医从文没有直接联系”，“鲁迅离开仙台的动机，也并非出于类似通过文学来拯救自己同胞精神上的贫乏这样崇高的理想”。鲁迅“与其说是怜悯同胞，不如说是怜悯不得不可怜同胞的自己”，“对于同胞的怜悯，甚至可以说已经成为与他的孤独感相关的一个指标”。[446]

竹内认为，鲁迅思想的核心部分是“通过与政治的对决来发现文学”。文学虽然对政治没有直接影响，但不断坚持文学创作最终还是会与政治发生联系。文学家不是期待外部，而是通过不断发掘自己内心“黑暗”、自我否定及自我革新来获得影响力。竹内将鲁迅这种获得影响力的方式称作“回心”。[447]

同时，竹内对“骨子里与政治无缘”的鲁迅敬佩孙中山的理由进行了论述。竹内认为，这是因为“鲁迅从孙中山身上看到了什么才是真正的‘革命者’”。[448]

促成1911年辛亥革命的孙中山，曾留下一句“革命尚未成功”的名言。竹内认为这句话的意思是不能只安于革命成果，要不断地进行自我否定和自我革新，“真正的革命是‘永远的革命’”。也就是说，那些高喊“‘我们已经革命成功’的人并不是真正的革命者”。鲁迅发现，孙中山的这种态度就是不断自我革新的态度，“从孙中山身上看到‘永远的革命者’的鲁迅又从‘永远的革命者’身上发现了自我”。[449]

也就是说，文学中的“革命”就是自我否定和自我革新的过程，而不是依靠“政治”来忽视自己内心的苦恼。关于这一点，竹内在《鲁迅》中写道：

> 文学是行动，而不是观念。但是这种行动是建立在对行动的否定之上

> 的。……迎合政治或对政治漠不关心，二者都不是文学。……真正的文学既不反对政治，又唾弃那些依靠政治而存在的文学。之所以要对其进行唾弃，是因为那种相对的世界是“凝固的世界”，在这种世界中无法进行自我更新，文学家将最终走向灭亡。[450]

文学家通过不断正视自身内部和自我革新，而最终与政治发生联系，这种“通过否定行动而成立的行动”才是真正的力量。这与中国共产党拒绝依靠毒品买卖及外国援助，通过内部思想观念的确立获得中国民众的支持十分相似。

竹内的这种思想在战后得到了丸山真男及鹤见俊辅的高度评价，江藤淳题为《作家要行动》的评论和吉本隆明的“自立”思想也是受到了竹内的影响。然而，满是悖论式观点的竹内思想，如果单就某些部分而言确实很难理解。事实上，这也为战后名噪一时的他招来了许多误解。

战场的噩梦

1943年12月，将《鲁迅》手稿交到出版社后的竹内开始开赴中国战场。当时已是33岁老兵的他因体力不支时常在行军途中掉队，作为一名成绩不良的士兵转战中国南北。[451]

与1937—1939年在北京的那段时光一样，竹内对这一时期很少谈及，而只是在《中国人的抗战意识与日本人的道德意识》一文中有过一段记述：

> 在部队里，我看到了许多破坏行为。不是出于战术上的需要，也不能用战场上的异常心理来解释，就是一些无目的的破坏行为。在我看来，这种行为不是源自现代人的无政府主义心理，而是更加接近原始的野蛮人心理。可能是由于我们内心深处确实还潜藏着野蛮人的本能吧。[452]

战争结束后，竹内作为俘虏被扣押将近一年才于1946年6月复员。他将那时的心情形容为“从屈辱中获得了解放”。[453] 可以想象，作为日

军的一员竹内恐怕同样参加了这种“无目的的破坏”，并尝到了发现自己“野蛮人本性”时的那种耻辱感。

丸山真男当然同样如此，或者可以说关于自己人生中最大耻辱的从军经历，战后的知识分子基本上都不愿过多提及。与竹内一同创办中国文学研究会的盟友武田泰淳，在谈及自己作为一名士兵被送到中国战场的经历时，也有过如下回忆：

> 如果一直坚持自己的思想主张，应该逃走或被关进监狱，但最终还是被强迫加入了在乡军人的合唱，后来又被编入九段[454]的近卫步兵第二连队，并先后担任过辎重兵、特务兵及二等兵。……
>
> 本应该与留学生们和睦相处，结果却侵略了他们的祖国，明知这样不对却最终还是被塞进了开往吴淞的运兵船。头脑里充满反对战争“理论”的自己却参加了战争，这种耻辱和窝囊的事情直至今日也不想过多地谈及。……
>
> 在接到那张红纸[455]之前，我还傻傻地认为自己（至少是自己）肯定不会被派去参战，但最终还是扛着枪去了“战地”。这使我发现了一个与以往截然不同的自己。
>
> 看到倒下的尸体遍布各处，倒在水坑里的人头发像海藻一样蓬乱，还有已经开始浮肿的女尸。在干涸的土地上，还有仿佛鲜活地仰卧在那里的老人干瘪的尸体。到处弥漫着东西燃烧时发出的味道和腐肉的味道，无论在休息时还是用餐时都能闻到。
>
> 在没有宪兵也没有法院和法庭的前线，杀人不会受到惩罚。没有了因谋杀一位老妇而紧张到极点的拉斯科尔尼科夫[456]的那种苦恼，士兵们将清白的、手无寸铁的人一个个地杀死。……当与“勇敢”这一美好的词扯在一起时，一幕幕活生生的杀戮场面便开始残忍地上演了。……
>
> 回忆往事，我始终无法再信任自己。在生活环境突然发生改变的情况下，人可以做出任何非人的事，我始终无法摆脱这种心中的不安。[457]

从战场归来后，武田泰淳在他的出道之作《司马迁》的开头写

道："司马迁受到了莫大的羞辱"，"虽然他想通过《史记》来减轻自己的耻辱感，但可以想象，他越是写，这种耻辱感就越重"，"我对《史记》的思考是从1937年，也就是出征后开始的"。[458] 竹内和丸山也在1960年安保斗争时的一次座谈会中表示，战争时期没有拿出足够的勇气让自己感到十分悔恨，但这也成了他们在战后"行动的发条"。[459]

竹内在战后常说："奴隶和主人相同。"这句话实际上是他将自己在《鲁迅》中引用过的"将别人作为奴隶的人，如果自己有了主人就会甘心做奴隶"略微修改了一下。[460]

但事实上竹内直到战后才开始重视这句话，而在其应征入伍前写下的《鲁迅》中，这句话不过是众多引用中的一个。竹内发生这种变化的原因，可以从他1948年题为《中国的近代与日本的近代》的文章中涉及美国历史学家赫伯特·诺曼的部分找到答案。

> 在诺曼的《日本的士兵与农民》中有以下的内容。这本书是我最近读过的书中感触最深的。……"作为被召集到军队中而成为不自由主体的一般百姓，在不知不觉中却成了给他国人民打上脚镣的代理人。"诺曼在这句话之后是这样写的：
>
> "依靠完全自由的人将他人奴隶化是不可能的。反之，最残忍、最无耻的奴隶才是他人自由最无情、最强有力的掠夺者。"（白日书院版，第114页）
>
> 读到这里时，我想起了鲁迅。鲁迅在谈及自己国家时，反复说过十分类似的话。……我认为诺曼的这句话弥足珍贵。虽然很遗憾我没能讲出同样的话，但鲁迅做到了。如果没有鲁迅，我不知将会感到多么的羞愧。[461]

如前所述，竹内虽然知道日本毒品政策的内幕，却没能拿出勇气进行抗议，后来还成了一名士兵，在上司及老兵的欺负下转战中国，并因此发现了自己的内心中似乎也潜藏着"野蛮人的心理"。"最残忍、最无耻的奴隶会成为他人自由最无情、最强有力的掠夺者"，诺曼的这一观

点使竹内受到了极大震撼，并想起了鲁迅的那句话。

同时，丸山真男在《超国家主义的逻辑和心理》一文中也写道："在国内只是'卑贱'的百姓，到了军中也不过是个二等兵。然而，一旦到了海外便成了皇军，并因与最高权威的天皇扯上关系而立刻处于一种无限优越的地位"，"他们的暴行难道不是这种疯狂的见证吗？"这句话实际上与鲁迅的在性质上是相同的。1946年10月19日，复员后的竹内在读过丸山的《超国家主义的逻辑和心理》后十分感动，并在日记中写道："太精彩了，这是我最近读过的最精彩的书，是我复员后读过的唯一一本好书。"[462]

1946年12月，竹内被东京大学聘请为中国文学科副教授。然而对"汉学老师"的学究主义十分厌恶的竹内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份工作，并只是依靠写评论的微薄收入勉强度日直到1953年进入东京都立大学。[463] 在这期间，竹内通过与中国的对比对日本的近代进行批判，并渐渐成为知名人物。

1948年，随着中国共产党在内战中逐渐接近胜利，对中国的关注也开始骤然升高。然而，战前的中国研究者大多是一些专门研究古典的人，除了一些臭名昭著的"中国通"及"大陆浪人"外，很少有人了解现代中国。一方面，战前还不为日本人所熟知的鲁迅也由于受到毛泽东称赞等原因而成了众人皆知的人物。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文学研究者竹内作为中国及中国共产党的解说人开始被经常请上讲坛。

当然，日本共产党也同样注意到了竹内。小田切秀雄在1947年8月向竹内发来了新日本文学会的入会邀请，石母田正的盟友藤间生大也曾在1949年1月劝竹内加入日本共产党。然而，二人的邀请都被竹内拒绝了。[464]

竹内在其日记中写道，1946年6月自己刚刚复员回到东京时，买过

日本共产党的机关报《赤旗》，但读过之后感觉“没有想象中的好”。与《近代文学》的编者们相似，对于没有从战争经历中吸取任何经验，而似乎只是重新恢复了15年前的运动的日本共产党，竹内也感觉到了其中的问题。竹内在《赤旗》之后还购买过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发行的《历史评论》，但同样在其日记中写下了“这本杂志缺乏整体性，从其内容上根本无法相信民主主义科学家联盟”的感想。[465]

也就是说，竹内从来就没有信任过日本的马克思主义者。前文中也提到，竹内在1942年与一名原为马克思主义者，后又转而协助日军成为其调查员的人打过交道。1961年，竹内在回忆战后初期的情况时指出：“共产主义运动在战后能够重新恢复是一件好事”，但“过去的共产主义者中，在战争期间发生转向并比非共产主义者更加积极地协助战争的例子也屡见不鲜”，这也是他决定与共产主义运动保持一定距离的原因。[466]

而且，从竹内的思想来看，参与处于“外部”的政治也不会成为他的选择。前文多次提到，为了减轻自己因协助战争留下的悔恨而加入日本共产党的人为数不少。然而，竹内没有选择依靠外部的权威来消除自己的痛苦，而是选择了发掘自己内心的黑暗。

在拒绝新日本文学会邀请之后的1947年12月，竹内在一篇题为《关于〈狂人日记〉》的论述鲁迅的文章中写道：“他陷入了绝望，不再相信，也不会寻求任何所谓的援助。他所拥有的只有黑暗。黑暗不是存在于外部，而是他自己已经成为黑暗的一部分”，“他承受着极大的痛苦。虽然他曾竭力要摆脱这种痛苦，但最终没能成功。因为他本身也是黑暗的一部分。当然，如果依靠权威的话应该可以做到。因此，许多人都希望依靠观念和权威使自己能够摆脱这种痛苦”。[467]

竹内认为，“领导者不会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也不会考虑是否存在可行性，而只是居高临下地发号施令”。“鲁迅本身也不相信‘领导

者’能够给自己带来‘民主’、‘科学’、自由、平等、博爱、正义、独立及繁荣。”

如前所述，因对战争期间的悔恨而加入日本共产党的人，是不敢反对那些在监狱中顽强不屈的骨干分子的。竹内也在1947年的《关于〈狂人日记〉》中写道：“鲁迅也曾尝试通过这样的方式摆脱痛苦。但这种方式对他来说是一种‘失败’。他已经不相信任何的权威，即不相信任何外部的东西，不相信存在消除黑暗的光明。”“这是因为他已经清楚地认识到黑暗就是他本身，而依靠权威则只能成为奴隶。”“他一生都在反抗权威，包括对权威的服从和依靠权威使他人服从。”[468]

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竹内才拒绝加入日本共产党。在1961年的一次演讲中，关于战后初期的情况竹内回忆道：“从那次错误的战争和作为其结果的战败中我们吸取了什么教训，或者说我们该如何将其融入自己的研究中呢？有些人突然成了共产主义者，我认为可以，因为这些人有自己的反省方式。但我们这些人会和他们保持一定距离，并开始更加深刻地思考导致这一切的祸根是什么。”关于这里的“祸根”，竹内这样说：

> 我在战后曾提出一个假说。落后国家的近代化过程，存在两种以上模式。日本在明治维新后的近代化非常令人瞩目，这极大地鼓舞了东方落后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照这样发展下去日本本来可以成为唯一的榜样，但最终截然相反地走向了失败。反思这种失败，我认为日本的近代化虽然是一种模式，但绝对不是东亚各国或落后国家近代化的唯一模式，应该还有许多其他的可能性或途径。[469]

前文曾提到，作为日本的比较对象竹内选择了中国。他认为，近代日本在通过西方文明这一外部权威成为“优等生”，同时也沦为西方文明的“奴隶”，并为东方各国戴上了“奴隶”的枷锁。与日本相比，中国虽然没有能够成为“优等生”，却通过“自我否定”和“自我革新”完成了不同于日本的“自主近代”。

两个“近代”

根据以上假说，竹内1948—1949年先后发表了《中国的近代与日本的近代》、《中国文学的政治性》及《日本人的中国观》等一系列文章。其中，反响最为强烈的《中国的近代与日本的近代》此后又与丸山真男的《超国家主义的逻辑和心理》一起，被收录在《中央公论》1964年10月号“创造了战后日本的代表性文章”中。关于这些文章，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

首先，中国与日本的根本区别在于“一个拥有固有文化而一个没有”。也就是说，“中国的文明是自己创造的，而并非像日本一样已经习惯了学习他人的东西。因此，无论是制度还是思想，中国都不会直接借用欧洲文明的产物。中国的改革，只有通过内部的不断自我改造才能实现”。[470]

中国的固有文化使中国的传统十分具有生命力。因此，与传统进行彻底的斗争并对其加以否定，是产生革新的唯一方法。但同时，这种自我否定和自我革新又是产生固有文化的原动力。因此，“在中国，对于传统的否定存在于传统之中”，“传统最彻底的否定者同时也是传统最忠实的拥护者”。[471]

“中共（中国共产党）是传统最彻底的否定者，但同时也是民族最高道德的体现者。”

“中国革命是民族根源力量的爆发，纵然是借助外部力量，运动本身也有其自律性。”[472]

与中国相比，日本则是通过不断输入西方的成品来完成近代化的。这种方式之所以能够实现，是因为日本没有固有文化和传统，因此即便不通过自我否定也可以实现近代化。虽然这种方式“在表面上加速了近

代化”，但同时也产生了“内部生活与外部生活的双重性”。也就是说，“看似进步的东西同时又是落后的”。[473]

在这样的近代日本，自由主义行不通时就会进入集权主义，集权主义失败后又会进入民主主义，每当陷入危机时人们就会期待从外国引进某种思想。总之就是“曾经被动接受过，现在被动接受着，今后应该还会被动接受，即以在被动接受的环境下形成的心理惯性为基础。因此，不会有真正的绝望及自我革新，不断失败而又不断成功，无限循环。而这又被视为进步”。[474]

这里所产生的，是“‘新’与‘正确’的相互重叠所表现出的那种日本人下意识的心理倾向”。在这样的心理倾向下，输入的东西变得陈旧之后便会被一个个抛弃，而不会像中国一样存在传统的自我革新。因此，“在日本文化中新的东西会变旧，而旧的东西却不会变新”。竹内将这形容为“日本社会中存在使万物枯竭的毒气”。[475]

日本近代文学的历史，就是这种倾向的典型例子。在文学创作出现危机时，“日本的作家不外乎会选择两条道路，一是从外国引入新的流派，二是求助于政治。总之，就是需要借助外部力量”。因此，不断有文学家借鉴西方的方法，或以参与政治的借口掩盖作品缺乏文学性的事实。“明明是因为借助了外部力量才导致了堕落，但为了挽救自己的堕落却又会再次借助外部力量。这就能看出日本人的奴隶本性有多么深。”[476]

竹内认为：“如果将日本文学比作儿童的文学，那么中国文学就是成人的文学。”这是因为“中国文学不依靠任何外部的东西。当然，中国文学也在不断地汲取营养，但其根茎属于自己”。而“正如日本社会的矛盾通常会通过向外发展而在表面上得到解决一样，日本文学也常常通过寻求外部的新事物来解决自身危机”。一直依靠外部力量的日本文学“就像孩子一样”，“无论何时都无法成长为大人”。[477]

这样的“日本文化在构造上属于优等生文化”。近代日本的文化，就是设法尽可能快地从外部权威学到东西。“优越感和自卑感并存这一缺乏主体性的奴隶心理，其根源应该就在于此。”下层人民在精英阶层面前有自卑感，精英阶层充满启蒙主义思想及“领导者意识”，这就形成了对西方的憧憬与对东方的蔑视共同存在的现象。竹内认为，战后的变革“不过是士官学校的优等生变成了帝国大学的优等生”。[478]

那么，如何才能改变这种状态呢？竹内认为，日本往往认为“主体性”、“现实”及“政治”等，只要去寻找就可以得到现成的。因此“向外界寻求‘主体性’”或“无限接近具有实体性的现实”才会被反复尝试。[479] 这样，在外部寻找“自我”的行为与陷入危机时对外部的期待，将日本的“奴隶”状态固定下来。

然而，自我并非完成品，而是通过自我否定和自我革新而产生的“运动体”。人只有通过自我否定才能发生变化，才能切实地感觉并获得“自我”。因此“一成不变的不会是自我”。“有时，自我为了成为自我必须成为自我之外的人。”自我保护等于失去自我，而自我否定则是获得自我。因此，“坚持自我就要改变自我”。[480]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不只通过引入外部文化来回避危机，就连墨守“传统”、拒绝变化也应该只是自我保护或丧失自我而已。在西方模式与其反作用下产生的国粹主义这二者之间摇摆的近代日本，“从未有过保持自我的欲求（也不存在自我本身）”。[481]

而鲁迅则“既拒绝承认自我，也否认自我是自我之外的人”。无论是停留在过去的“自我”还是依靠外部力量放弃“自我”，都是鲁迅所反对的。停留在过去的“自我”是甘于做“差等生”，依靠外部力量则会成为“优等生”。而同时拒绝这二者，“就是既不愿做奴隶也不愿做奴隶的主人”。[482]

然而，鲁迅的这种“反抗”却给他带来了深深的绝望。这是因为，既不愿成为“优等生”又不愿成为“差等生”的话，就会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立足之地。而且“只要奴隶还想成为奴隶主，就意味着他还没有失去希望，因为他还存在摆脱奴隶身份的可能”。[483]

然而，在这种状态下“也无法认识到自己是奴隶”。“差等生”无论希望受到外部权威的认可还是期待成为“优等生”，“作为奴隶，希望获得拯救的愿望才是他成为奴隶的原因”。是成为帝国主义国家还是成为殖民地，迅速接受了这种二者择其一的世界观的近代日本“发挥了自己放弃抵抗的长处”。然而，这只不过是“作为奴隶的长处”。[484]

“只有在认识到自己是一名奴隶时，奴隶才有可能摆脱奴隶的身份。”这是对“既拒绝做奴隶又拒绝做奴隶主时的那种绝望”的觉醒。而“这种绝望落实到行动上就会出现反抗”。[485]

竹内在这里所说的“反抗”和“行动”并非简单地指参与“政治”，而是对这个世界所赋予的既存位置及同一性的拒绝，是在拒绝成为“优等生”的同时也拒绝成为“差等生”。“虽然放弃反抗就可以被动接受，但从此便无法打消对被动接受所产生的幻想。”这种“反抗”才是获得非被动接受的完成品，即“自我”的基础。也就是说，“自我之所以不是自我，是由于放弃了做自我，也就是放弃了反抗”。[486]

在这个世界上，“拒绝自我的同时又拒绝成为自我之外的人”，就是永远地自我否定和自我革新，即不断地“回心”。当然，“回心”与通过接受外部的东西实现自我保护的“转向”有所不同。关于这一点，竹内在1948年的《中国的近代与日本的近代》中写道：

> 在日本的优秀文化中，要么成为优等生后开始堕落，要么拒绝堕落而走向失败，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选择。诚实地讲，优等生肯定会发生转向，因为如果不转向他们便无法继续成为优等生。他们已经失去了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如果集权主义比共产主义新，那么放弃共产主义转向集权主

> 义对他们而言就是凭良心做出的行动。如果民主主义来了，那么追随民主主义便适合优等生的进步态度。……总之，日本的近代是依靠转向开始的，就像攘夷论者直接转为开国论者。……
>
> 转向这种现象，发生在没有反抗的地方。也就是从缺乏对自主性的欲求开始。因为，如果固执地坚持自我，便无法改变方向而只能走自己的路。然而，走即是自我革新。坚持自我就会使自我发生革新（一成不变的东西不是自我）。……如果我只是固定的自我，那么我甚至称不上是我。总会有一个时期，自我为了成为自我必须变成自我之外的人。这也是新旧更替的时期……这种现象如果是个人，就称为回心；如果是历史，就称为革命。
>
> 回心在表面上与转向相似，但方向截然相反。转向向外运动，而回心则向内运动。回心通过坚持自我而产生，转向则通过放弃自我而产生。回心以反抗为手段，转向则不需要手段。[487]

当然，如前所述，“回心”一词在1943年的《鲁迅》中已经出现。竹内在该书中指出：“日本文化从形式上讲是转向文化，而中国文化则是回心文化。”在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的近代化很容易便实现了。与此相反，“中国的反动势力强大到了可以阻止一切自上而下的改革”。然而这又使中国走上了与日本不同的道路，“即自下而上的革命”。[488] 最明显的例子，是明治维新与辛亥革命的区别。竹内认为：“明治维新成功了，而辛亥革命‘失败’了。失败的原因，是这是一场‘革命’”，“是内部不断涌现出否定力量的革命。而在孙中山的观念中，革命总是‘失败’的”。[489]

根据这种思想，竹内在1948年一篇题为《中国文学的政治性》的文章中提出：“日本不存在国民文学。”[490] 在这篇文章中，竹内就荒正人、平野谦及中野重治围绕“政治与文学”的论战进行了论述。这种关于“国民文学”的看法又成了1951年“国民文学论战”发生的背景。

竹内认为，近代中国“虽然在形式上不同于欧洲，但较之日本要近代许多”。[491] 在通过自我革新完成自下而上革命的中国，无论是思想

还是文学都有其“国民基础”。

然而在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实现近代化的日本，“所谓思想不过是给某种观念穿上了一件借来的外衣”。然而，知识分子们“却将脱离了生活的思想作为实体进行思考”。[492] 因此，无论是思想、文学还是政治，都只是在观念的范畴内空转，而没有其“国民基础”。

结果，只有那些抢先接受西方文化的“优等生”才会讨论“思想”、“文学”及“政治”，而那些“差等生”则对此漠不关心。

“优等生”曾尝试对“差等生”进行启蒙。然而，他们“之所以希望解放作为奴隶的差等生的人民，是因为他们存在自己并非奴隶的幻想”。[493] 也就是说，他们是由于将自己看成了奴隶主才会希望解救可怜的“差等生”。

所以，他们根本不理解“差等生”“发现自己是一名奴隶时的那种绝望”。也就是说，“他们没有体会到被唤醒时的那种痛苦，却又想去唤醒别人”。[494] 在竹内的想法中，只有在自己的痛苦与对方的痛苦一致时，自己的文章才能被对方理解。然而，如前所述，竹内认为“领导者不会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也不会考虑是否存在可行性，而只是居高临下地发号施令”。因此，这种启蒙也不会为人们所接受。

正如封建时代的武士与农民完全没有共同文化一样，知识分子与大众之间也不存在共同的问题意识和苦恼。文坛及学术界如同封建社会中的商业公会。文学者就是否应该参与处于其外部的“政治”而苦恼，即“政治与文学”的问题也体现出了“日本文学的封建性”。关于这一点，竹内在1948年写道：

> （中国作家）的创作立足于国民情感之上，而日本作家则立足于作家的职业意识，所使用的也是行业内部的语言。……对于中国文学而言，文学家代替国民表达感情义不容辞。对于一名文学家的评价，要依据其代替

> 国民表达感情的方法和程度等准则。而对于日本文学而言……作家是否应该代替国民表达感情与如何表达这种感情这二者没有任何联系，想要将二者结合在一起则必须采取进一步的方法。我认为，“政治与文学”这一具有日本特色的问题意识的基础便在于此。[495]

在形成了“国民基础”的中国，“立足于国民感情之上”与“自己的语言”这二者之间没有任何矛盾。对于作家而言，人民的苦恼便是自己的苦恼，写出自己的苦恼就能反映人民的苦恼。而在日本却没有形成这种关系，要使“自己的语言”与“国民感情”相结合，就必须通过“政治”这一媒介。

竹内认为，中国的文学家“不是作为专家，而是作为一名普通人进行思考”。中国的学生“也不像日本的学生那样属于一种特殊的、封闭的社会阶层”，故“具有作为单一社会成员所应具有的责任和认识”，这才使“学生的思想与民众的思想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中国文学的生产及消费并非在行会内部进行，虽然市场很小，却在一个开放性单一社会中进行”。[496] 只有在这种“开放性单一社会”中形成的文学才可以被称作“国民文学”。

这里所说的“开放性单一社会”，如同丸山真男的“近代国民国家”一样，是一种个人相互独立却又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状态，这种状态不是既成事实而是一个目标。1948年，竹内以不断朝着这种“开放性单一社会”迈进的中国为参照，将处于“封建制”的文坛中的日本文学家批评为“根本算不上近代市民”。[497]

这种“国民文学”具有顽强的“主体性”。竹内认为，在革命后的中国，民众“对于生活的要求不断积累并最终成为政治诉求，文学家的责任就是将这种诉求以文学的形式表现出来，而文学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他们的语言是出自社会基层的，是有血有肉的，是强有力的。他们的语言不是外部强加的语言，而是自主的语言，任何权力都无

法抹去，即真正的文学语言”。[498]

那么，日本及日本文学如何才能达到这种状态呢？竹内所主张的，当然是通过正视自己内心的黑暗寻找实现自我革新的契机。在1947年的一篇论述鲁迅的文章中，竹内认为鲁迅认识到自己是黑暗的，但同时又拒绝了外部的帮助。那时，“他所能做的只有消灭黑暗的自己”。这样，鲁迅为了批判并消灭自身的黑暗而创作了《狂人日记》和《阿Q正传》，“这些作品极大地激励了年青一代”。“鲁迅的黑暗深入对方的内心，同时生命的火种开始燃起，新一代在这时开始形成。”竹内说，“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曾谈到，革命就是‘国民自己改变自身的劣根性’”。[499]

在竹内看来，日本最大的“黑暗”是战争责任问题。他在1949年的《中国人的抗战意识与日本人的道德意识》中痛斥日本向中国出口毒品的问题，并在同一时期的其他文章中写道：“人们往往认为日本文化一开始就缺乏作为自我发展原动力的道德基础，那么这种结论是否真的正确呢？”[500] 敢于面对日本及其战争责任的道德基础才是“自我发展的原动力”。

竹内发现的日本的另一个黑暗是“天皇制”。作为一名日本兵，在经历了赫伯特·诺曼所说的“最残忍、最无耻的奴隶”的境遇之后，在竹内眼里“天皇制”成了恐惧与憎恶的对象。如第五章中所述，竹内曾在1952年表示：“对于我们这代人，天皇制是令人厌恶的、是应该遭到咒骂的，然而又是无法摆脱的宿命般的东西。”[501]

与其他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竹内在战后初期也曾幻想“随着美军的登陆作战，国内的统治权力会分为主战派与主和派，最终引发全国各地轰轰烈烈的革命”。他在1953年表示：“在我看来‘8·15’是耻辱，既是整个民族的耻辱也是我个人的耻辱，是一件令人痛心的事。最让人感到痛切的是，‘8·15’《波茨坦宣言》投降时，日本出现了共和制的可

能，却最终走向了民主制。”[502]

然而，竹内反对通过引入外部权威来评价战争时期的日本。他在《中国的近代与日本的近代》一文中写道：

> 国粹主义和日本主义也曾风靡一时。其中的国粹和日本是主张驱逐欧美，而并非主张驱逐以欧美为主人的奴隶结构。现在虽然反过来开始流行近代主义，但也没有涉及这种结构。也就是说，奴隶们只是想换个主人而并非独立。就像虽然东条成了差等生，但为了保住优等生文化本身还会有其他优等生出现。……想要否定东条就不能与东条对立，而是应该超越东条。因此，甚至对东条也要加以利用。[503]

“A”与“非A”是一种相互补充的关系，利用“日本主义”对抗西方思想毫无意义，利用西方思想批判“日本主义”同样如此。因此，要否定“东条”就不能直视反对，而是应该直视自己内部的“东条”并超越“东条”。同时，这与竹内在战争期间通过“12月8日”对“大东亚文学家大会”进行批判，即以“东条”批判“东条”的做法也是一致的。

此外，对竹内而言，日本的战争责任与天皇制基本上是一体的。如第三章所述，这是由于对当时的知识分子而言，“天皇制”绝不仅仅是存在君主的政治制度，而是“主体性”问题，还与知识分子对自身战时行为的悔恨及战争责任问题紧密相关。

与担心会演变成相互揭发的其他知识分子一样，竹内在战后初期没有对知识分子的战争责任进行过多评论。然而到了1955年以后，竹内还是发表了数篇关于战争时期言论界的文章。

在其中一篇题为《转向与抵抗的时代》的文章中，竹内提到了1941年2月俳句界的集体逮捕事件，并引用了遭到逮捕的栗林农夫的一段回忆：“这次镇压是因为俳句界中出现了叛徒。……俳句界中存在各种结社，这些社团之间的对立诱发了俳句界强烈的排他情绪。其中对传统俳

句持批评意见的反对者让一些人感到了巨大的威胁，再加上受到了通过排除异己掌握俳句界主导权这一权力欲的驱使，一些人便与法西斯当局走到了一起。”[504]

如前所述，以竹内及武田泰淳为首的中国文学研究会，同样是对“支那学”持批评意见的“反对者”。在引用栗林的回忆之后，竹内表示：“这种现象存在于各个领域，而并不只是俳句界。”[505]

事实上，1946年6月竹内曾写文章对同年3月复刊的《中国文学》进行批判，并站到了昔日好友的对立面。在这篇文章中，关于“文学的战争责任”，他谈到了诸如“大东亚文学家大会的组织者、协办者及参与者”，“作为封建日本弃子，汉学在整个战争期间毫无保留地发挥了它的奴性”，“作为学术官僚主义摇篮的帝国大学”，以及“怯于提出自己的主张、软弱无力、缺乏组织力、斗争方法落后的中国文学研究会”。[506]

如前所述，竹内在1943年决定解散中国文学研究会的理由，是他发现了本应作为“批判性的反对者”的该会，随着规模的扩大而成为一种权威，对于“汉学”及“官僚文化”的批判意识正在逐渐减弱。虽然竹内没有明确指出，但可以推测由于他拒绝同“大东亚文学家大会”合作而导致研究会内部产生了分歧。此外，竹内关于迎合“汉学”及“官僚文化”的风潮正在不断涌现的判断，可能也是他决定解散的原因之一。[507] 当然，可能也是由于竹内自己在战争期间“同样没有表达主张的勇气，同样软弱无力”，因而无法对没有清算过去就直接复刊的做法表示赞同。

竹内之所以厌恶“行会”一般的文坛、憎恨“天皇制”并渴望“开放性单一社会”，或许和这种战争期间的经历也有关系。此外，竹内在1958年还说过“一草一木中皆有天皇制”的名言。[508]

一方面，在1950年代前半期，竹内将革命后的中国形容为“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意志并可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一切的自主性及自发性

都受到尊重，并从未受到过任何强迫”，“个人幸福与祖国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对待他国的态度不卑不亢”。[509] 这样的形容很容易被批评为将中国过度理想化，但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战争给竹内造成了多么大的伤害。

如此看来，竹内的思想事实上与丸山真男等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之间是相互联系的。无论是重新思考明治以来日本近代化的视角、对“主体性”的反复强调，还是对“封建制”的批判及建立“国民基础”的愿望，基本上都与丸山真男十分相似。事实上，竹内与丸山在私交方面也甚为密切，丸山在后来的回忆中也认为：“两人实际上是从不同的方向在争取同一枚奖牌。”[510]

二者唯一的不同，是丸山主要以“近代”为标准对日本社会进行批判，而竹内则是将近代分为值得肯定的“近代”与需要否定的“近代”，并对日本的近代化及“封建制”这两方面同时加以批判。无论怎样，竹内一直批判的，是导致人们不断陷入外部权威形成的“优等生”与“差等生”这一定位的“奴隶本性”。

如果将这种“奴隶本性”看作一种对自我保护及自我同一性的需要，那么可以冠之以“近代”这一名称。然而，同时也可以将对权威的服从视为“封建性”，将“优等生”与“差等生”的分离状态比作封建社会的行会。因此，竹内对于“近代”的批判与赞同并非相互矛盾。

从这种意义上讲，即使丸山与竹内在“近代”一词的用法上存在差别，二者所批判的对象也是相同的。然而，两人最大的区别并不在于思想内容，而是体现在某些个人特点上。丸山是一名注重平衡感和责任感的政治学家，而竹内则是一名内向的浪漫主义文学家。至少丸山不会使用“永远的革命”及“自我否定”等词，竹内也不会写批判“邦邦女郎本性”的文章。并且不难想象，丸山即使与竹内在主张上一致，也会对自己文章中的用词进行更加严密的定义，而不会像竹内一样随意使用“近

代”一词。

这种个人特点上的区别，也反映在二人的文体上。竹内虽然与丸山有着共同的战争经历，但即使是主张相同，二者的文章给读者留下的印象也不同。丸山的文章富有逻辑性并且内容明确，而竹内的文章则有一种荡气回肠的魅力。在1960年代的学生运动中，与饱受批判的丸山不同，竹内得到了重新评价，这也是由于竹内的文章更加符合学生们的浪漫主义倾向。

但另一方面，竹内的文章因充满相互矛盾的语言和独特的用词而很难被人理解。竹内只因对中国共产党进行了评价就得到了日本共产党的入党邀请，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他的思想并没有为众人所真正理解。在此后的国民文学论战中，这种理解上的障碍便反映了出来。

“国民文学”的命运

如第七章所述，进入1950年代后，主张反省对亚洲的重新评价和启蒙主义的声音不断高涨。《中央公论》1951年1月号上也刊登了清水几太郎的《日本人》和丸山真男的《日本的民族主义》这两篇文章。丸山在其文章中，主要将近代欧洲的“国民主义”和亚洲殖民地独立运动中的“民族主义”加以比较，对日本的民族主义的“初级性”进行了批判。

关于丸山的这篇文章，1951年7月，竹内在一篇题为《民族主义与社会革命》的文章中对其见解进行了反驳。而这篇文章，便成了“国民文学论战”的开端。

首先，竹内对丸山分析的准确性进行了评价，并表示：“关于丸山对日本产生新民族主义可能性的绝望，我也有同感，无论这种民族主义在意识形态上是偏左还是偏右。”[511] 当然，这句话无疑是在暗地里批评1951年后开始高涨的日本共产党的民族主义路线。本书第八章也提

到，丸山认为当时“日本的民族主义”是“进步阵营”对民族主义的一种利用，竹内对此表示同感。

同时，这是竹内一贯不信任马克思主义者的一种反映。他指出，“昭和时期的左翼运动”最终产生了“新型的大陆浪人”，而这就成为“左右两种意识形态”中的任何一种都不值得信任的论据之一。[512] 同时，这也很容易让人想到竹内在中国遇到的那位曾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调查员。

但是，对于竹内而言，“绝望”恰恰是自我革新的第一步。在肯定丸山“绝望”的基础上，竹内还提出：

> 然而，就像日本也曾出现一些“良性”民族主义一样，类似于中国人想法的日本文学也并非完全不存在，甚至可以说在明治时期大量存在。夏目漱石的作品、永井荷风的作品，甚至森鸥外的作品中都有这种想法，而在类似北村透谷、国木田独步及石川啄木等人作品中表现得更加强烈。这种想法的消失，大概是在自然主义末期，也就是“白桦派作家”出现之后。[513]

竹内认为，明治时期的文学家“或多或少都曾为如何将民族主义与社会革命进行结合而烦恼”。达到“明治民族主义顶峰”的是石川啄木，“无产阶级文学便是继承了啄木的思想，这已成为文学史上的定论”。[514]

不过，竹内认为：“无产阶级文学继承的只是社会思想，而并没有像啄木一样将其与民族主义结合。这也正是日本与中国在无产阶级文学上的差距。”而且，“这也成为无产阶级文学后来遭到日本浪漫派猛烈复仇的导火索”。[515]

那么，无产阶级文学为何遭到战时被称为国粹主义文学的日本浪漫派的复仇呢？关于这一点，竹内在1951年9月发表的一篇题为《近代主义与民族问题》的文章中写道：

> 包括马克思主义者在内的近代主义者，都纷纷避开了沾满鲜血的民族主义。他们将自己视为受害者，以使自己在民族主义过激化的问题上置身事外。这种做法使得“日本浪漫派”遭到封杀的事实变得正当化。然而，真正打败“日本浪漫派”的不是近代主义者，而是来自外部的力量。而对方明明是被外部力量击败，过分高估了自身实力的他们却将这看作自己的功劳。噩梦虽然可以忘记，身上沾满的鲜血却难以洗去。[516]

在竹内的这篇文章中，首先值得怀疑的是“包括马克思主义者在内的近代主义者”一句。在该文中，竹内认为：“所谓近代主义，换言之就是头脑中没有或是排除了民族这一概念的人。”[517] 但事实上，当时的日本共产党是批判“近代主义”并反复强调“民族”的最大一股势力。

然而，竹内在《近代主义与民族问题》中写道：

> 那么，战后出现的左派意识形态，其主张背后的思维中是否包含民族这一概念呢？答案是否定的。他们虽然提出“民族独立”这一口号，但这里的民族是先验的，仍然属于近代主义的范畴。……是将亚洲的民族主义，特别是中国的民族主义模式应用于日本的一种尝试。[518]

也就是说，竹内这里提到的“近代主义”，是其一贯持批评态度的恶的产物，“近代”即代表从外部移入完成品的“奴隶本性”。此外，关于日本共产党因受共产党情报局批判而陷入混乱一事，竹内1950年撰写过一篇十分严厉的批评文章。

那么，“所谓近代主义，换言之就是头脑中没有或是排除了民族这一概念的人”这句话中的“民族”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如果竹内对“民族”持肯定态度的话，又为何要使用“沾满鲜血的民族主义”这样的词句呢？

关于“民族”，竹内在该文中认为，大正时期的白桦派及“受其影响而出现的日本无产阶级文学”，一味重视“阶级”和“抽象意义上的自由人”，而将“民族”逼到了“不为人所注意的阴暗角落”。然而“民族却在阴

暗的角落里生根发芽”，“在压迫的作用下又产生了民族意识”。[519] 竹内还写道：

> 一方面，回避民族主义的心理，表现出了对战争责任认识的不足。换言之，就是不够诚实。而在诚实方面的不足，又是由于缺乏勇气。害怕自身受到伤害，就希望忘掉沾满鲜血的民族，一直犹豫而不敢大声高喊自己是日本人。然而，鲜血不会因为忘却而被洗刷干净。[520]

竹内之所以在这里使用“沾满鲜血的民族”，是为了表达自己内部的黑暗，具体而言，就是战争责任问题。“一直犹豫而不敢大声高喊自己是日本人”一句所要表达的真正意思，应该是“犹豫着而不敢承认自己是一个浑身沾满鲜血的侵略者”。而关于“所谓近代主义，换言之就是头脑中没有或是排除了民族这一概念的人”，如果将其解释为所谓“近代主义”就是不敢直视自身内部黑暗的“奴隶本性”便容易理解了。

虽然“大日本帝国”被“外部的力量”击败，但在深刻认识到自身内部还潜藏着“野蛮人心理”的竹内看来，“噩梦虽然可以忘记，身上沾满的鲜血却难以洗去”。战后的知识分子仿佛忘记了自己也是“沾满鲜血的民族”中的一员，摇身一变成了民主化及现代化等“观念和词语的权威”，“其目的也只是自己一人能够摆脱战争责任”。不难想象，这种做法对于竹内而言是难以认同的。也正因如此，竹内在这篇1950年发表的文章中提出，“要与民族主义进行斗争”，“要亲手洗刷自己身上的污垢”，“只要拿出勇气，拿出能够揭开现实最深处的勇气”，“不敢这样做的人，就是懦夫”。[521]

此外，竹内之所以提到“日本浪漫派”，也是因为这是当时日本文坛的一大禁忌，是人们努力想要忘记的噩梦的象征。如前所述，竹内在1948年的《中国的近代与日本的近代》一文中，曾用“东条”一词指代“法西斯主义”。因此，可以判断，文章中的“日本浪漫派”一词，应该是指代“文坛的黑暗”或“文学的战争责任”。

竹内本人虽然与日本浪漫派的保田与重郎是高中同学，但他在战争时期所为之倾倒的，则是站在日本浪漫派对立面的京都学派。他在后来接受采访时透露：“因为我与保田是同学，所以总会被问及与日本浪漫派的关系，但我们毕竟完全不同”，并且“保田写过的东西，我也只是偶尔翻一翻而已”。[522] 竹内的这种态度，与战争时期倾心于日本浪漫派，并出于对日本浪漫派的爱憎而撰写《日本浪漫派批判序说》的桥川文三等人截然不同。

竹内所主张的当然是日本要直面自身内部的黑暗，并实现自我否定和自我革新。在《民族主义与社会革命》中，竹内表示：“关于丸山对日本产生新民族主义可能性的绝望，我也有同感。”而在这句话之后，他写道：

> 如果实现民族主义就必然存在陷入激进民族主义的危险，那么唯一的方法就是从激进的民族主义之中寻找真正的民族主义，也就是在反革命中寻找革命。[523]

当然，这与想要超越“东条”就必须直视自身内部的“东条”的看法相一致。同时，这也与通过“12月8日”对“大东亚文学家大会”进行批判的逻辑相一致。竹内继续说道，在中国，“即使在反革命中，人们也能够找到革命的契机”，“其中的典型就是鲁迅。因此，鲁迅的斗争是当今所应该提倡学习的”。[524]

此外，在《近代主义与民族问题》中，竹内还将这种看法运用到了日美战争的问题上。

他认为，像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这样的美国学者，同样认为“太平洋战争刺激了亚洲的复兴，这样的说法虽然有其消极的一面，但同样有其积极的一面”。[525] 这种看法，实际上也与在黑暗中抓住自我革新契机的逻辑相一致。

并且，竹内认为："没有植根于民族传统的革命不可能实现。"日本所需要的，不是以西方的方法论为基础的"殖民地文学（也就是所谓的世界文学）"，而是"国民文学"。[526] 当然，这种对基于"国民基础"的"国民文学"的提倡，同样与否定和革新传统者才是传统真正的体现者这一竹内的中国观相一致。

如上所示，竹内对"国民文学"的提倡，实际上就是对自己思想主张的陈述。然而，问题在于竹内提出问题的方法。诸如"鲁迅的抵抗"、"沾满鲜血的民族"等词句，一般人恐怕很难理解。此外，"要敢于直视日本浪漫派"、"发现了太平洋战争'积极的一面'"等惊人的反语性或悖论性的表达方式，也很容易遭到误解。

竹内可能是出于对当时文学家及知识分子过于不满，才会经常使用这样刺激性的措辞。然而，从结果上看，也确实可以将竹内的态度理解为对战时"大亚细亚主义"和日本浪漫派的支持，以及对丸山真男等"近代主义者"的批判。

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讲，正如竹内所预期的那样，他的这种具有刺激性的言论在当时引起了极大反响，并导致战后为数不多的几次论战之一的"国民文学论战"的发生。不过，虽然参加这次论战的人数众多，但其内容的大部分是一连串的误解。

引起这种误解的原因之一，就是竹内在措辞上的混乱。在论战初期，竹内不断对"近代主义"进行批判。然而，随着论战的持续，竹内又开始提出："没有国民文学也就没有近代文学"，这属于"封建性等级制度的问题"。[527] 此外，在1952年的一次座谈会上，竹内还提出："国民及民族""只有在近代之后才能形成"，通过打破封建制度"才有可能建立由单一个人所组成的国民整体"。[528]

仅凭这样的内容无法理解竹内到底要通过"民族"及"近代"来表达什

么观点也在情理之中。即便是对竹内的观点相对较为熟悉的日高六郎也曾表示："竹内的近代主义在概念上十分宽泛，在他所认为的近代主义中，还包括一些从常识上讲应该称为前近代性的东西。"[529]

直到论战进一步升级之后，竹内才开始对值得肯定的"近代"与应该否定的"近代"加以区别，并提出："所谓近代主义，是在近代由外部引入前近代社会，即等级制度仍未得到解放的社会时发生的一种意识现象。"[530] 然而，即使到了后来，竹内也没能按照严格的定义来使用这些词语。

此外，使用"近代主义"这种日本共产党的用语，本身就是一种容易遭到误解的行为。如第六章中所述，当时的日本共产党主张"文学的自律性"，并将那些不服从党指挥的文学家批判为拘泥于"近代性自我"的"近代主义者"。然而，在成为论战中心的那次座谈会上，竹内表示："近代主义一词是出现于什么时候呢？我虽然经常使用这个词，但还真不清楚。"也就是说，竹内是在不了解该词由来的情况下进行使用的。[531]

实际上，竹内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在写文章时会对用词加以严格定义的人。而且，战时经历的噩梦等竹内心中的感受，也无法用准确的既存词语进行表达。他在《鲁迅》中也曾写道："所谓黑暗的意思，是我所无法说明的。"[532] 很可能，甚至连竹内自己也是在一种难以名状的冲动的驱使下，凭借着模糊的理解在不断使用"近代主义"及"血染的民族"等词语。

此外，竹内对于"国民文学"的提倡，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十分不合时宜的。他的《近代主义与民族问题》，是《文学》杂志1951年9月号上题为"日本文学中的民族问题"的特辑中的一篇。而在这个特辑中，还包括丸山静、西乡信纲、川崎庸之等马克思主义系作家及历史学家关于民族文学与民族文化方面的文章。旧金山媾和会议召开的1951年9月，正

是日本共产党对“美帝国主义”的“日本殖民地化”进行猛烈抨击的时候。

这本杂志起初虽然是岩波书店负责发行，但编辑工作是由日本文学协会负责的。如第九章中所述，当时的日本文学协会曾在大会上对《平家物语》及近松门左卫门的“革命性”进行讨论，《文学》的投稿中也有大量共产党系学者主张重新评价民间故事和民谣的文章。批判“近代主义”并强调“民族”的竹内的文章，就是刊登在这样的杂志的特辑中。

因此，许多知识分子开始怀疑，一贯赞赏中国共产党的竹内是否对日本共产党的民族主义路线也持支持态度。即使是与竹内相识的臼井吉见，在论战开始一年多后也表示：“对于国民文学这一主张背后所蕴含的思想，我无法完全赞同。”[533] 并且臼井认为，竹内所使用的“近代主义”与日本共产党的“近代主义”也有区别。由于对照搬外国模式持反对态度，竹内同样无法认同日本共产党的民族主义路线。

对于竹内所提倡的“国民文学”，言论界的反应分成了对立的两方。一方是以野间宏为代表的日本共产党所感派文学家，他们对竹内的提议表示欢迎；另一方是伊藤整和臼井吉见等非日本共产党系文学家，他们对竹内的提议感到迷惑不解。

然而，日本共产党系文字工作者的欢迎，只能说是出于一些误解。他们原本是要批判那些不服从日本共产党指挥的“近代主义者”，并主张“必须以民族文学及国民文学来代替确立近代自我的文学及小市民性的自发文学”。[534] 然而，竹内在这次论战中对日本共产党系文学家的这种意见感到不满，并对近代自我的确立及文学的自律性表示肯定，这就导致野间宏等人开始对其进行批判。[535]

另一方面，日本共产党中的非主流派及非日本共产党系的言论界人士则对竹内的提议表示出谨慎的态度。1950—1951年，是《新日本文学》与《人民文学》因日本共产党分裂而走向激烈对立的年份，许多文

学家开始变得疑神疑鬼。按照本多秋五的形容，“新日本文学会对国民文学论一直持怀疑态度，总是用怀疑的目光冷眼旁观”。[536]

如前所述，竹内曾在1950年对因共产党情报局的批判而动摇的日本共产党进行了批判。在大多数文学家都对日本共产党怀有敬畏之情的当时，竹内“竟敢发表如此大胆的论文”，本多秋五都替他捏了一把汗。[537] 然而竹内反过来又提出与日本共产党相似的主张，这就令人十分费解了。

因此，伊藤整在与竹内的书信中首先间接地批判了日本共产党系的民族文学论，接着又表示：“我不认为‘民族文学’与‘近代的自我确立文学’这二者间有任何不同或矛盾。”[538] 在竹内表示赞同后，这些人的反驳虽然略有缓和，但臼井吉见等人还是在当时的座谈会上表示：“提倡通过与政治结合而产生的国民文学，无论如何也无法让人信服。”[539]

对于这种包含了两派人误解的反应，竹内的回应还算诚恳。但可能也是由于竹内的主张本身就十分含糊，以至于反而加深了这种混乱。一方面，竹内赞同伊藤等人“反对将国民文学作为一种手段”的意见，而另一方面，又批评“‘近代文学’的一派”为“只强调确立自我和近代市民的解放，而不会发展成为更加理想的国民团结”。[540]

竹内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同时遭到双方的批判。一方面来自野间宏，另一方面是来自荒正人“在重视‘民族’的同时，也不能不考虑‘市民’”的反驳。[541] 荒正人此后还对竹内“太平洋战争有其积极一面”的主张进行了批判。他说：“这是竹内好说的？他是认真的吗？真让人吃惊！”[542]

虽然如此，竹内却从未有过想要赞美“大日本帝国”的意思。在论战中，遭到种种误解的竹内提出，日本文学“并非由于遭到占领才迅速走向殖民地化”，“而是在白桦派出现后就开始了”，“是在战争时期充分发

挥了奴隶本性，才导致了战后完全的殖民地化”。[543] 然而，这种主张很难说得到了人们的理解。在大多数文学家看来，日本共产党已经对白桦派进行了批判，因此竹内提出的“在白桦派影响下产生的无产阶级文学”这句话本身都令人十分费解。

此外，竹内所主张的“政治与文学”的理想关系，同样没能得到人们的理解。在1953年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伊藤整表示：“我们认为，国民文学在与政治的关系上和（战时）毫无区别，只不过在方向上截然相反而已，因此大家要提高警惕，避免重蹈覆辙。”[544] 而野间宏的批判则截然相反，他认为：“竹内所主张的文学自律性，不过是撇清自己与政治之间的关系而已。”[545] 由此可以看出，“政治与文学”二者必择其一的思考方式已经在文坛根深蒂固，绝非轻易就能撼动。

这种二者择其一的思考方式，在福田恒存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福田认为竹内的国民文学论“完全不知所云”，并主张：“要使提倡国民文学产生效果，就必须完全依靠政治手段”，“最终还是要在政治与文学之间做出选择”。当然，当时在福田看来，所谓政治思想的文学不过是知识分子观念过剩，竹内的国民文学论也不过是“在文坛引起一阵骚动后便结束的徒劳之举”罢了。[546]

1952年8月民主主义科学家协会主办的研讨会，就是这次论战乏味性的一个象征。虽然聚集了包括竹内好、野间宏、石母田正、岩上顺一等14位嘉宾，但事实证明，出席这次研讨会的人基本上都没有认真阅读过对方的文章。被要求发言的安部公房及本多秋五均异口同声地表示：“没有读过竹内先生的文章”或“没有读过，也没仔细研究过”，并在这种情况下陈述了自己的国民文学观。[547]

但总的来说，当时的文学家还是对文坛的封闭性以及自己的文学作品没有为“国民大众”所接受的事实进行了反省。并且，一切照搬西方文学模式而没有在自发性文学创作方面进行足够努力的他们，也都同样抱

有一种自卑感。然而在他们看来，竹内的国民文学论只是一种对上述方面进行的批判，虽然刺激到了他们长久以来的自卑感，却没能让他们完全理解竹内的问题意识。

此外，竹内本人也没能明确地提出“国民文学”的具体内容。竹内在1952年提出，所谓“国民文学”，“如同民主一样是一种需要为之努力的目标，却又如同理想的市民社会一样难以实现。是以这一目标为理想而每天进行的实践课题。现成的模式中没有一种可以派上用场”。这当然可以看作竹内“永远的革命”的另一种表达方式。然而，正如竹内本人所感叹的那样：“对日本文学持批判态度的人，都是出于各自的立场及文学观对文学界的现状加以否定。”对于这些只是将国民文学视为日本文学的反义词的人而言，想要摆脱现状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548]

“国民文学”在战争期间曾作为赞美战争的文学而得到提倡，所以战后对这个词本身提出反对的人也不在少数。曾发表赞美战争文章的伊藤整表示：“文坛中存在一种倾向，那些曾经顺应战争时期军国主义性民族主义与文学相结合的风潮，并写下迎合这种风潮文章的人，在战后感到十分痛苦，才会对国民文学怀有抵触情绪。”[549] 平野谦也在1953年的一次座谈会上向同席的竹内说道：“国民文学一词，很容易让我们回想起战争时期的经历……是不是应该换一个新名字？”[550]

对此，竹内却认为：“即使‘国民文学’一词被玷污过，我们也不应放弃实现国民文学的愿望。”[551] 而且在竹内的思想中，正因为像“日本浪漫派”一样与黑暗的回忆结合在了一起，重新提起“国民文学”一词才有其意义。

然而，竹内的这种意图同样没有得到理解。在国民文学论战中，人们的讨论基本没有涉及战争责任问题。而竹内本人可能是由于担心引起互相指责也没有进一步深谈，这样的情况一直延续到1955年以后。

在这一点上，日本共产党系的文学家也是一样。1955年，民主主义科学家协会通过整理一系列的国民文学论战内容，出版了题为《国民文学论》的单行本。该书将石川啄木的作品以及无产阶级文学等赞扬为“国民文学”，并主张创作新的“国民文学”。然而，在题为“日本目前为止的国民文学”的作品目录中，排在明治时期的作品之后的是战后的作品，而1930—1945年这段时间成了空白。[552] 这个有大量无产阶级文学家创作赞美战争文学的时代，就仿佛从未存在过一般。

在这种情况下，关于国民文学的论战正如福田恒存所预料的那样，“在文坛引起一阵骚动后便结束了”。这次论战在1952年达到高潮后，便开始不断降温。就连积极提倡“国民文学”的日本共产党系文学家，也在1955年的六全协后安静下来。“日本文化中，新事物必然会变旧”这一竹内曾经提到的情况，也应验在了他自己的主张中。[553]

论战结束后，留给竹内的只有“民族主义者”、“太平洋战争及日本浪漫派的拥护者”等标签。这之后，竹内通过论述战前的亚洲主义寻找日本自发性近代化的萌芽，并呼吁人们关注“超越近代”等战时思想以忘却噩梦般的年代，而这些更加深了以上这种印象。在国民文学论战之后，由于收到了许多撰写关于亚洲主义及战时思想文章的请求，竹内本人对这类题目的兴趣也变得越发强烈。

然而，竹内最终也没能接受众人对自己的评价。正如本章开头所提到的那样，竹内直到1960年还称：“我常被指责为法西斯主义者及民族主义者。”

同时，像本章开头所提到的那样，1960年代以后全共斗运动中开始出现对于“战后民主主义”和“近代”的批判，竹内与三岛由纪夫等人一起被视作批判“近代主义＝战后民主主义”的民族主义者。在当时那些不了解战后，甚至对1950年代的事情也一无所知的年轻人眼中，只有竹内一人在战后还强调“民族”并不断批判“近代主义”。

但事实上，如前所述，竹内既与日本浪漫派截然不同，又对人们将自己与三岛由纪夫等人相提并论表示反感。[554] 然而对于青年们的评价，竹内基本上没有做出任何回应。也许，这是因为竹内根本没有对不了解时代背景的年轻人能够理解自己的主张抱任何希望。到了晚年，竹内还常对评价过自己的年轻学者说：“时代不一样嘛。”[555]

如果按照现在人的思考方式，也许有人会质疑竹内是否有必要使用“民族”及“近代”等词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但要知道，竹内是在打着“民族”旗号进行的战争中形成他的思想，他的作品主题也都是源于与战时记忆的斗争，这就使竹内不可避免地使用“民族”及“近代”等词。战争以“日本人”为单位进行，因此也应该以这个单位来追究战争责任。对于那些“不敢大声承认自己是日本人”的人，竹内的评价只有一个，那就是“懦夫”。

现在看来，竹内存在过高评价中国及中国共产党的倾向也是不争的事实。[556] 当然，在竹内看来，对于中国的论述实际上是为了以中国为参照来论述自己及日本的战争历史。然而，这种做法本身就违背了竹内对“A”与“非A”的对立持批判态度的思想。然而，正如丸山和大塚眼中的西方近代和“明治”一样，战争经历所留下的深深伤痕必然会使竹内对中国产生好感。

国民文学论战结束之后，竹内除了发表一些护宪及呼吁和平方面的时事评论外，还积极主张与中国邦交正常化。第十二章中还会提到，在1960年安保斗争时期，竹内辞去了都立大学的职位以表示对岸信介政府的抗议，这让他再次成为关注焦点。然而，在安保斗争结束后，他却在言论界迅速消失并开始专心投入鲁迅研究，直至1977年因肺癌离世。在1943年完成的《鲁迅》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话：“我所想写的，是我想象中的一个叫作鲁迅的人的形象。”“我还将《鲁迅》看作一种赎罪文学。”[557] 然而，曾作为一名士兵被派往中国战场的竹内，在1951年写

下“沾满鲜血的民族主义”一句时到底想到了什么，现在已经无法进行确认了。

---

[1] 加藤秀俊「戦後派の中間的性格」『中央公論』1957年9月号、加藤秀俊『中間文化』平凡社、1957に再度収録。引用部分出自高畠通敏編『日常の思想』，第36页。

[2] 原名森繁子，1950年代日本红极一时的女歌星。——译者注

[3] 日本著名女作家。——译者注

[4] 加藤秀俊「戦後派の中間的性格」、37、47、39頁。

[5] 清水幾太郎『清水幾太郎著作集』第10巻、16頁；大牟羅良「僻地の子ども」武田清子編『人権の思想』『戦後日本思想大全』第2巻、筑摩書房、1970、113頁。

[6] 小田実『小田実全仕事』第7巻、154頁。

[7] 小田実『小田実全仕事』第7巻、53頁。

[8] 小田実『小田実全仕事』第7巻、158、58頁。

[9] 小田実『小田実全仕事』第7巻、154、155頁。

[10] 小田実『小田実全仕事』第8巻、130頁；第7巻、155頁。

[11] 小田実『小田実全仕事』第8巻、74頁；第7巻、158頁。

[12] 武田清子「人権思想の峰と淵」『人権の思想 解説』、5頁。

[13] 山本明『戦後風俗史』、97頁。

[14] 山本明『戦後風俗史』、127頁。

[15] 「歴史学はどうあるべきか」『歴史学研究』第155号、1952年1月、52頁。发言人是古岛和雄。

[16] 小熊英二『「日本人」の境界』第21章。

[17] 小熊英二『「日本人」の境界』第21章。从穗积八束到和辻哲郎，许多学者在其论述中将罗马帝国作为否定多民族国家的例子，详见小熊英二『単一民族神話の起源』。

[18] 石母田正『続 歴史と民族の発見』東京大学出版社、1953、58—59頁。

[19] 石母田正『歴史と民族の発見』東京大学出版社、1952、38頁。浪曲即浪花调，日本的一种大众曲艺。是以三味线伴奏，由一个演员以通俗易懂的曲调演唱的说唱故事。股旅物指以侠客为主人公的小说或电影。——译者注

[20] 石母田正『続 歴史と民族の発見』、57—58頁。

[21] 大島渚『体験的戦後映像論』朝日新聞社、1975、143頁。

[22] 堀田善衛『インドで考えたこと』岩波新書、1957、99頁。在此后的1963年及1964年，商务出境和旅游出境先后实现了自由化。

[23] 堀田善衛·司馬遼太郎·宮崎駿『時代の風音』、181、10頁。宫崎在这次谈话中表示，自己对日本农村风景的厌恶从1970年代开始逐渐消失，当时他为创作《阿尔卑斯山的少女》前往瑞士，并在那里“感觉到自己确实更加喜欢日本的景色”（第181页）。

[24] 又称“幸德事件”。1910年5月下旬，日本长野县某锯木厂工人携带炸弹到厂，被查出。日本政府即以此为借口镇压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从1910年底到1911年1月，对被捕的数百名社会主义者进行秘密审判，诬陷日本社会主义先驱幸德秋水等26人“大逆不道，图谋暗杀天皇”，并于1911年1月18日宣判幸德秋水等24人死刑。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在此次大规模镇压之后受到严重打击。——译者注

[25] 石母田正『続 歴史と民族の発見』、54—56、60頁。

[26] 石母田正『歴史と民族の発見』、34頁。

[27] 石母田正『歴史と民族の発見』、251頁。

[28] 土井正興「クリーム色の表紙の思い出」『歴史学研究 戦後第1期復刻版』月報4、青木書店、1987、4頁。不过，日本共产党的民主民族战线主张覆盖大多数人，因此也存在将城市居民称作“市民”的现象（『日本共産党戦後重要資料集』第1巻、605頁等）。

[29] 久野收「愛国心」『教育評論』1953年5月号、12頁。

[30] 上原専禄『上原専禄著作集』第7巻、評論社、1987—1997、37頁；上原専禄·宗像誠也『日本人の創造』東洋書館、1952、150—151頁；石原宇三郎「平和教育と民族教育」『教師の友』1952年11月号、16頁。

[31] 上原専禄『上原専禄著作集』第7巻、38頁。“新教科书编纂会”会长西尾干二，也继承了这种关于德国“民族”与“国家”关系的观点。对于1990年代围绕国民国家的批判，作为尼采研究专家的西尾认为正是由于如今“国家”的作用在逐渐缩小，“民族”的独立性才越发重要。西尾1999年出版的著作『国民の歴史』，主要内容也是关于“日本民族历史”（「『国民』意識は今」『朝日新聞』1999年12月17日）。

[32] 佐藤幸治「愛国心」『現代道徳講座』第5巻、河出書房、194、172頁。此外，在该调查中，将“爱国心”一词视为可以勾起战时回忆的诱因而对其持有消极印象的人已增至整体的三分之二。

[33] 清水幾太郎『清水幾太郎著作集』第14巻、312頁。

[34] 石母田正『石母田正著作集』第14巻、岩波書店、1988—1990、352、362頁。

[35] 石母田正『石母田正著作集』第14巻、355—356頁。

[36] 石母田正『石母田正著作集』第14巻、355頁。

[37] 藤間生大「歴史家の実践」『歴史評論』第11号、1947年12月、42頁。

[38] 石母田正『続 歴史と民族の発見』、411頁。

[39] 丸山眞男『丸山眞男集』第5巻、289—290頁。该文是1952年出版的『日本政治思想史の研究』的后记，丸山在其中就自己“与中国的滞后性相对的日本的进步性这一观点”进行了自我批评，并写道：“如今，经历过所谓近代的日本与在这一点上未能取得成功的中国之间，在依靠群众的基础上实现近代化这一点，甚至可以说呈现出正相反的对比。”这是对竹内好在明治维新与辛亥革命方面相关见解的继承（参见第十章）。

[40] 清水幾太郎『清水幾太郎著作集』第10巻、11—12、14、16—17頁。

[41] 梅本的信件内容出自天野慧一『危機のイデオローグ』（評論社、1979），第216—217页。《亡国之声》的评论见清水幾太郎『清水幾太郎著作集』第10卷，第26页。

[42] 丸山眞男『丸山眞男集』第5巻、59、70、69、67頁。

[43] 鹤见俊辅的发言出自1951年『思想の科学研究会——趣旨と活動』（鶴見和子「『戦後』の『思想の科学』」『思想の科学会報』復刻第1巻、柏書房、1982），第9页。鹤见和子的发言见1954年的演讲「話あい、書きあう仲間」（『鶴見和子曼荼羅』藤原書店、1998），第372页。

[44] 清水幾太郎『清水幾太郎著作集』第14巻、106頁。清水的回忆录中包含许多他个人的主观臆断，故这则逸闻的可信度令人怀疑，但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一些鹤见和子在进行自我批评时所处的时代背景。

[45] 石母田正『歴史と民族の発見』、32—34頁。

[46] 佐藤忠男「裸の日本人」久野収編『戦後日本の思想大系（第15巻） 現代日本論』筑摩書房、1974、初版1958、57頁。

[47] 加藤周一「民族主義と国家主義」（『中央公論』1959年4月号）中采用了这一观点。

[48] 山本明『戦後風俗史』、102頁。

[49] 大江健三郎『鯨の死滅する日』講談社文芸文庫、1992、初版1972、195—197、199頁。

[50] 日本九州福冈县地名。——译者注

[51] 鶴見俊輔『新しい開国』、583、586頁。

[52] 鶴見俊輔『新しい開国』、580頁；埴谷雄高『埴谷雄高全集』第1巻、572頁。

[53] 清水幾太郎『清水幾太郎著作集』第10巻、7頁。

[54] 埴谷雄高『埴谷雄高全集』第1巻、573頁。

[55] 高見順·今日出海·堀田善衛·亀井勝一郎·清水幾太郎「独立国の条件」『群

像』1952年6月号、18—21頁。

[56] 亦称“吉普女郎”，指二战后在日本大城市街头出现的向占领军卖淫的妇女。1947年对日本六大城市做估算时约有4万人。——译者注

[57] 山本明『戦後風俗史』、90—92頁。

[58] 日本教職員組合「日本の教育」第2集、岩波書店、1953、266頁；大江健三郎『持続する志』講談社文芸文庫、1991、126頁。后者出自大江1965年在冲绳的访问记录。

[59] 『朝日クロニクル 週刊20世紀』朝日新聞社、1999、10—11頁。

[60] 清水幾太郎『清水幾太郎著作集』第10巻、85頁。

[61] 日本教職員組合『日本の教育』第7集、国土社、1958、385頁。

[62] 井上清·小此木真三郎·鈴木正四『現代日本の歴史』下巻、青木書店、1953、568—569頁。

[63] 水野浩編『日本の貞操』蒼樹社、1953。关于对日本政府政策的批评，见五島勉編『続日本の貞操』（蒼樹社、1953）第2章。

[64] 日本教職員組合「日本の教育」第2集、269頁。

[65] 稲葉桂子「紙芝居脚本 子どものねがい」『教育評論』第7号、1952年、83頁；清水幾太郎·宮原誠一·上田庄三郎編『基地の子』光文社、1953、170—171頁。

[66] 宮原誠一「教師は平和を愛さぬか」『六·三教室』1950年1月号；船山謙次『戦後日本教育論争史』東洋館、1958。

[67] 即“九一八事变”。——译者注

[68] 佐藤忠男『黒沢明の世界』、236頁。

[69] 清水幾太郎·宮原誠一·上田庄三郎編『基地の子』序文、3—4頁。

[70] 遠山茂樹「戦後の歴史学と歴史意識」『遠山茂樹著作集』第8巻、岩波書店、1992、49頁。

[71] 神田文人「歴史学における民族の問題」『歴史評論』第200号、1967年、43頁。

[72] 共产党情报局批判文章的全文收录在『日本共産党戦後重要資料集』第1卷，引文出自第352页。在此期间苏联、中国、日本共产党的动向参见和田春树『歴史としての野坂参三』（平凡社、1996），第5章、第6章。

[73] 主要成员为德田球一、野坂参三、志田重男、伊藤律等亲中国派，当时为日本共产党的主流派。——译者注

[74] 日本共産党中央委員会「民族の独立のために全人民諸君に訴う」日本共産党中央委員会五十年問題文献資料編集委員会編『日本共産党五十年問題資料集』第1巻、新日本出版社、1957、35—39頁。

[75] 藤間生大「『歴史における民族』のあつかい方」歴史学研究会編『歴史における民族の問題』巻末、岩波書店、1951、167頁。

[76] 亦称倭建命、日本武、大和武等。日本神话人物，传说其力大无穷，善用智谋，在第十二代天皇景行天皇期间东征西讨，为大和王权开疆扩土。最后虽英年早逝，而无继承皇位，但子嗣为今日天皇之直系祖先。——译者注

[77] 神田文人「歴史学における民族の問題」、48頁。

[78] 松本新八郎「民族文化をいかにしてまもるか」『歴史学研究』第154号、1951年、36—37、39頁。

[79] 井上清·小此木真三郎·鈴木正四『現代日本の歴史』下巻、372、559、577、602、571頁。

[80] 日本共産党中央委員会五十年問題文献資料編集委員会編『日本共産党五十年問題資料集』第3巻、215頁。

[81] 鶴見俊輔『新しい開国』、166、168頁；民主主義科学者協会「民族解放のたたかいに倒れた近藤巨士君への追悼の言葉」『歴史評論』第37号、1952年、38頁。

[82] 井上清·小此木真三郎·鈴木正四『現代日本の歴史』下巻、377頁。

[83] 高田佳利「行動の意味の発掘」『思想の科学』1959年8月号、28頁。

[84] 江藤淳『江藤淳著作集』第6巻、講談社、1967—1973、42頁。

[85] 山本明『戦後風俗史』、162—163頁。

[86] 高田佳利「行動の意味の発掘」、29頁。高田与古在的谈话由高田整理。

[87] 指1952年6月2日，发生在大分县直入郡菅生村的一起由警察自导自演的派出所爆炸案。——译者注

[88] 秋山清『文学の自己批判』太平出版社、1972、108頁。

[89] 秋山清『文学の自己批判』、39—40、43頁。

[90] “全日本学生自治总联合会”的简称。——译者注

[91] 吉川勇一「連合赤軍事件と市民運動」、1972年3月；講演ベトナムに平和を！市民連合編『資料「べ平連」運動』下巻、河出書房新社、1974、176頁。

[92] 山本明『戦後風俗史』、165頁。

[93] 出自森田实的回忆。西部邁『六○年安保』文芸春秋、1986、133頁。

[94] 「文化問題と日本共産党」「日本文化の課題と展望」『前衛』臨時増刊、1957年3月、9月。

[95] 丸山眞男『丸山眞男集』第6巻、164頁。

[96] 石田雄「『戦争責任論の盲点』の一背景」「みすず」対編集部編『丸山眞男の世界』みすず書房、1997。

[97] 丸山眞男『丸山眞男集』第6巻、159頁。进行这种评论的背景之一，是当时存在一些以攻击日本共产党及和平运动为目的的保守派的揭露文章。例如，《全貌》杂志上连载的『学者先戦前戦後原質集』（1954年由全貌社发行单行本），出版这种刊物的目的是揭露平野义太郎、中村哲、清水几太郎、宗像诚也、淡德三郎、矢川德光、出隆、高仓辉等进步知识分子或共产党系知识分子在战时的言论，并呼吁人们进行批判，但其根本目的还是借助追究战争责任这一形式对左派进行攻击。

[98] 以下关于消费关系的记述参见『朝日クロニクル 週刊二十世紀』，1958，第8—11页；山本明『戦後風俗史』（大阪書籍、1986），第7章。

[99] “神武景气”是借用日本神话中第一代天皇“神武”的年号，形容1954年12月至1957年6月的日本战后第一次经济发展高潮。“岩户景气”是借用日本皇室的祖神天照大神的传说中有关“天之岩户”的“岩户”二字，形容1958年7月至1961年12月的日本战后第二次经济发展高潮。——译者注

[100] 『朝日クロニクル 週刊二十世紀』、1956、5頁。

[101] 山本明『戦後風俗史』、175—177頁。

[102] 加藤周一「民族主義と国家主義」、50、46、35頁。

[103] 梅棹忠夫「文明の生態史観序説」『中央公論』1957年2月号。梅棹的地区划分是以植物的生态形式作为依据，分为湿润森林地带（第一地区）和干燥地带（第二地区），并倡导“文明”形态的相异性，干燥地带专制必然产生。将西欧与日本进行比较的思考与和辻哲郎在《风土》中的主张类似。关于《风土》等和辻哲郎的日本论，参见小熊英二『単一民族神話の起源』第15章。

[104] 日高六郎『戦後思想を考える』岩波新書、1980、78—80頁。虽然日高认为“公”取向自战前便呈现下降趋势并一直持续着，但应注意的是，战前进行调查的场所是征兵检查所。日高也承认，在征兵检查所收集到的回答多半并非心里话，因此往往会给人以“公”取向偏多的印象。并且，受访者都是些二十几岁的男性，这往往也会导致“公”取向偏高。将这种调查与战后以全体国民为对象的调查进行比较，是不合适的。

[105] 日高六郎『戦後思想を考える』、81—82頁。

[106] 日本教職員組合「日本の教育」第7巻、国土社、1958、624頁。

[107] 武田清子「愛国心と親孝行」『教育評論』1956年4月号、17頁。

[108] 丸山眞男『丸山眞男集』第8巻、371—372頁。这是在安保斗争刚刚结束时进行的采访，此后，作为打破“对‘民’的分而治之”的基础，评价安保斗争的谈话一直持续了下来。

[109] 船山謙次『戦後日本教育論争史』、66頁。

[110] 国分一太郎·石田宇三郎·片岡並男·齋藤秋男·矢川徳光·松島栄一「岩波講座『教育』をめぐって」1952年12月号、33頁。国分在其发言中引用了斯大林的话。

[111] 在上面的座谈会中，清水的『平和の肉体』获得了很高的评价。有关清水的主张，参见本书第340—341页。

[112] 無着成恭編『山びこ学校』岩波文庫、1995、322頁。

[113] 無着成恭編『山びこ学校』、323頁。二宫金次郎，日本江户时代的农政家、思想家。——译者注

[114] 上原専禄·宗像誠也『日本人の創造』、34—36頁。宗像在该引用之后，对“《山彦学校》的孩子们”加以称赞。

[115] 丸山静「出発点の問題Ⅱ」、36頁。

[116] 黒沢明『全集黒沢明』第4卷、51頁。多田道太郎1956年在『黒沢明解説』中，对《七武士》进行了评价，认为“（黑泽）在考虑个人的确立时，最终不得不遇到集体方面的问题。该作品与野间宏、椎名麟三等这些战后文学家的作品内容大同小异”，都关注知识分子与普通民众的同理心。多田道太郎『復製芸術論』、313頁。

[117] 关于这一点，小熊英二『「日本人」の境界』第21章中有所提及。

[118] 江户时期以后存在于日本农村的一种消极抵制方式，即针对所谓不遵守村规或为村子带来耻辱的村民的集体绝交。——译者注

[119] 杉浦明平「村の言論統制」『思想』1960年8月号。另参见藤原弘達「地方ボスの精神形態」『思想』1955年12月号。

[120] 石川さつき「村八分の記」『人権の思想』、128頁。

[121] 石川さつき「村八分の記」『人権の思想』、131頁。

[122] 石川さつき「村八分の記」『人権の思想』、127、133頁。

[123] 石川さつき「村八分の記」『人権の思想』、124頁。在这篇小文章中，作者对主张“为防止朋友不良化，为重建日本，请努力”的地方豪强及教师进行了抗议，并表现出对“那些说起来振振有词，却对眼前的不正当行为置若罔闻的知识分子的厌恶”。这时的石川及后来的吉本隆明的思想，与全共斗运动有着共同的心情。石川由于遇到了有良知的老师，才得以保持“爱国”的热情，如果没有这种偶然，可以说还有可能向别的方向发展。这种言论上的对立并非一定意味着心情上的对立，其

中有很多部分可以归结为表现形式上的差异。

[124] 直到现在，几乎没有关于国民历史学运动的整体性研究。参与运动的当事人及其他相关人士的著作，遠山茂樹「戦後の歴史学と歴史意識」、神田文人「歴史学における民族の問題」、梅田欽治「『国民的歴史学』運動の遺産」（『歴史評論』第150号、1963年），以及梅田欽治「『国民的歴史学』の思想」（『人民の歴史学』第143号、2000年）等涵盖内容较广。除此之外，当事者的总结和回忆，还有藤間生大编『国民と歴史』（『講座 歴史』第1巻、大月書店、1956），中塚明·奥田修三「『国民的歴史学』の批判と反省」、鈴木正「歴史論における民族的なもの」（『歴史評論』第120号、1960年），犬丸義一「戦後歴史学の理論的成果」（『歴史評論』第150号、1963年），大江志乃夫「弁証法的な『講座派理論の克服』を」（『歴史評論』第184号、1965年），神田文人「歴史学における民族問題論争」（『現代と思想』第13号、1973年），網野善彦『歴史としての戦後史学』（日本エディタースクール出版部、2000）以及本书中引用的各篇论文。以当时历史学家的民族论为对象的研究有阪東宏『歴史における民族の問題について』（『民族の問題』解説、歴史科学協議会編『歴史科学大系』第15巻、校倉書房、1976）。此外还有歴史科学協議会編『歴史科学大系』第33巻中的『民族歴史部会資料集』（校倉書房、1999）。
在近年的研究中，论证国民历史学运动的有小熊英二「忘れられた民族問題——戦後日本の『革新ナショナリズム』」（『相関社会科学』第5号、1995年）。该文加入与冲绳相关的内容后收入小熊英二『「日本人」の境界』第21章、以石母田正和藤間生大的“英雄时代论”为中心对当时的记纪神话观进行论述的礒前順一「歴史的言説の空間」（『現代思想』第25巻第10号、1997年。后收录在礒前『記紀神話のメタヒストリ』吉川弘文馆，1998），以及从历史教育角度切入的大串潤児「国民的歴史学運動の思想·序説」（『歴史評論』第613号、2001年）。
总体而言，当事者的回忆往往从共产党的内部斗争或“政治”与“研究”二者间的关系的角度进行论述，而从内部视角进行的研究少之又少。而小熊的论文和矶前的论文虽然从当时的民族论和历史观产生这一视角进行了论述，但并没有对这一时期的“运动”进行考察。对此，本章在对领导这一时期运动的石母田正在战时以后的思想进行考证的同时，也会对共产党及其相关人士的“民族”观的变迁过程以及国民性民族历史学运动的发展加以论述。至于在这一运动中所形成的民族观与“冲绳回归运动”之间的关系，及其与单一民族史观的关系，参见小熊英二『「日本人」の境界』第21章。

[125] 歴史学研究会編『民族文化について』、1952年年度歴史学研究大会報告、岩波書店、1953。

[126] 渡部義通「新しい史学への道」『歴史評論』第11号、1947年12月、39—40頁。

[127] 石母田正『石母田正著作集』第5巻、297頁。

[128] 石母田正『石母田正著作集』第14巻、359頁。

[129] 石母田正『石母田正著作集』第5巻、295頁。

[130] 石母田正『石母田正著作集』第5巻、273頁。

[131] 石母田正『石母田正著作集』第5巻、272頁。

[132] 石母田正『石母田正著作集』第5巻、285頁。

[133] 石母田正『石母田正著作集』第5巻、295頁。

[134] 石母田正『石母田正著作集』第5巻、295頁。

[135] 石母田正『石母田正著作集』第14巻、361、357頁。

[136] 石母田正『石母田正著作集』第14巻、357—358頁。

[137] 石母田正『石母田正著作集』第14巻、358—359頁。

[138] 石母田正『石母田正著作集』第5巻、297—298頁。

[139] 藤間生大「日本史·古代·政治経済」『歴史学研究』第111号、「昭和十七年度歴史学年報」1943年6月、8、9頁。

[140] 石母田正『石母田正著作集』第5巻、295頁。

[141] 石母田正『石母田正著作集』第14巻、349頁。

[142] 井上清·小池喜孝·藤間生大·大久保利謙·岡田章雄·羽仁五郎·中野重治「『くにのあゆみ』の検討」『朝日評論』1947年3月号、久野収·神島二郎編『「天皇制」論集』27頁。

[143] 井上清「時評」、37、34頁。

[144] 民主主義科学者協会『科学者』1949年10月5日号；石母田正「学問の自

由について」『歴史学研究』第143号、1950年、48頁。

[145] 井上清·小池喜孝·藤間生大·大久保利謙·岡田章雄·羽仁五郎·中野重治「『くにのあゆみ』の検討」『朝日評論』1947年3月号、26頁；遠山茂樹『戦後の歴史学と歴史意識』、51頁。

[146] 遠山茂樹『戦後の歴史学と歴史意識』、50—51頁。

[147] 石母田正「新しい年をむかえて」『歴史評論』第41号、1953年、3頁。蒂尔特曼的言论在该论文第2页。远山在『戦後の歴史学と歴史意識』中，认为井上清等对『国家の教育』的批判是受到了蒂尔特曼时评的刺激。

[148] 「綱領および会則の草案、」『歴史学研究』第122号、1946年6月、47頁；「綱領について」『歴史学研究』第123号、1946年8月、57頁。

[149] 井上清「歴研の『綱領』がつくられたころ」『歴史学研究 戦後第1期復刻版』月報2、1986、2頁。

[150] 「国史教育座談会報告」『歴史学研究』第122号、1946年6月、49頁。

[151] 指成书于8世纪的《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上的神话。——译者注

[152] 石母田正『歴史と民族の発見』、249頁。

[153] 即被决斗之意。——译者注

[154] 津田左右吉『津田左右吉全集』第23巻、35頁。关于重建大会的经过，参见遠山茂樹『戦後の歴史学と歴史意識』，第29页。这次重建大会原本是以『各国君主制の歴史』研究报告会的形式举办，后因羽仁五郎提出动议而改为重建大会，因此被批判为“羽仁政变”。根据羽仁弟子井上清的回忆，在那之后羽仁几乎与历史学研究会断绝了关系（井上清「歴研の『綱領』がつくられたころ」）。当时到平泉拜访津田的，是井上和松岛荣一。可以推测，羽仁想通过让津田出任历史学研究会会长来掌握历史学研究会的领导权，因此纲野善彦对一直知晓羽仁这一打算的井上等人心存反感，从而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产生了不信任（網野善彦『歴史としての戦後史学』、23—26頁）。但井上在1989年出版的津田全集月报中对此进行了否认，至于真相如何则不得而知。

[155] 指1946—1948年，在日本当时最大的电影公司东宝株式会社连续三次发生的劳动争议事件。——译者注

[156] 中野重治·石母田正·藤間生大「民族文化の問題」、47—48頁。

[157] 中野重治·石母田正·藤間生大「民族文化の問題」、45頁。

[158] 蔵原惟人·石母田正·藤本清一郎·橋浦泰雄「わが民族文化の特質」『日本評論』1949年2月号、20頁。

[159] 中野重治·石母田正·藤間生大「民族文化の問題」、42頁。

[160] 中野重治·石母田正·藤間生大「民族文化の問題」、28頁。

[161] 中野重治·石母田正·藤間生大「民族文化の問題」、22頁。

[162] 石母田正『石母田正著作集』第14巻、352、362頁。

[163] 石母田正『石母田正著作集』第14巻、354頁。

[164] 飯塚浩二編『日本の軍隊』、178頁。

[165] 石母田正『歴史と民族の発見』、279—280頁。

[166] 石母田正『歴史と民族の発見』、288—289頁。

[167] 以下关于该文的引用均出自石母田正『歴史と民族の発見』，第284、291、289—290页。

[168] 石母田正『歴史と民族の発見』、43—44頁。

[169] 石母田正『歴史と民族の発見』、44、42頁。

[170] 1943年以后的日本由于劳动力极其匮乏，中学以上的学生被动员起来参加军工或农业生产。——译者注

[171] 色川大吉『明治精神史』下巻、246頁。

[172] 石母田正『石母田正著作集』第14巻、378頁。

[173] 井上清·小池喜孝·藤間生大·大久保利謙·岡田章雄·羽仁五郎·中野重治「『くにのあゆみ』の検討」、38頁。

[174] 鈴木良一「敗戦後の歴史学における一傾向」『思想』1949年1月号、49

頁。

[175] スターリ「スルクス主義と言語学の諸問題」スターリン全集刊行会訳『スターリン戦後著作集』（大月書店、1954）。田中克彦「『スターリン言語学』精読」（岩波現代文庫、2000）中转载了这篇文章，并加以详细的解说。但田中认为，该文章没有涉及对日本共产党“民族”观转变的影响。总之，田中忽视了该文章在朝鲜战争爆发后一个月内即被刊出，而《前卫》又立即将其翻译并转载的政治意义。斯大林1913年的文章『マルクス主義と民族問題』收录在スターリ全集刊行会訳『スターリン全集』第2巻（大月書店、1952—1953）。

[176] 日本共産党中央委員会五十年問題文献資料編集委員会編『日本共産党五十年問題資料集』第1巻、37頁。

[177] 解说以『歴史学における民族の問題』为题，收录于石母田正『歴史と民族の発見』一书中。

[178] 蔵原惟人·石母田正·藤本清一郎·桥浦泰雄「わが民族文化の特質」、21頁。

[179] 石母田正『続 歴史と民族の発見』、308—309頁。“土佐”，旧日本古地名，相当于现在的高知县，是日本倒幕维新运动活动家、思想家坂本龙马的故乡。——译者注

[180] 石母田正『歴史と民族の発見』、31、129、139頁。

[181] 石母田正『歴史と民族の発見』、140、142頁。

[182] 石母田正『歴史と民族の発見』、122頁。

[183] 石母田正『石母田正著作集』第14巻、369頁。

[184] 石母田正『石母田正著作集』第14巻、369頁；石母田正『歴史と民族の発見』、258頁。

[185] 石母田正『歴史と民族の発見』、258頁。

[186] 石母田正『歴史と民族の発見』、258—259頁。

[187] 南原繁『南原繁著作集』第7巻、58頁；丸山眞男『丸山眞男集』第3巻、

106頁。

[188] 指1919年3月1日处于日本殖民统治下的朝鲜半岛爆发的民族解放运动。——译者注

[189] 石母田正『歴史と民族の発見』、270頁。

[190] 石母田正『歴史と民族の発見』、271—272頁。

[191] 石母田正『続 歴史と民族の発見』、329頁。

[192] 石母田正『歴史と民族の発見』、34頁。

[193] 石母田正『歴史と民族の発見』38、14頁。

[194] 石母田正『続 歴史と民族の発見』、420頁；石母田正『歴史と民族の発見』、39頁。

[195] 日本共産党中央委員会五十年問題文献資料編集委員会編『日本共産党五十年問題資料集』第1巻、37頁。

[196] 中野重治·石母田正·藤間生大「民族文化の問題」『展望』1948年11月号、45頁。

[197] 神田文人「歴史学における民族問題論争」『現代と思想』第13号、1973年、35頁。

[198] 国際主義者団「民族主義者の新しい策謀について」「民族主義者の新しい欺瞞について」日本共産党中央委員会五十年問題文献資料編集委員会編『日本共産党五十年問題資料集』第3巻、新日本出版社、1957。

[199] 江口朴郎「大会についての感想」『歴史学研究』第153号、1951年、39頁。有观点认为，“渡部派”把羽仁五郎的弟子井上清等近代史学家称为“羽仁派”，并提出对立观点（神田文人「歴史学における民族の問題」『歴史評論』第200号、1967年、51頁）。但井上对此反驳道：“绝无此事。”（井上清「戦後歴史学の反省また当面する課題」『歴史学研究』第230号、1959年、4頁）

[200] 藤間生大「『歴史における民族』のあつかい方」歴史学研究会編『歴史における民族の問題』、167頁；藤間生大「古代における民族の問題」。

[201] 藤间将日本武尊等形容为“民族英雄”，是以石母田在1948年倡导“英雄时代论”为背景的。在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历史观中古希腊被形容为“英雄时代”，故同样应该在日本寻找其“英雄时代”。关于他的“英雄时代论”，见磯前順一「歴史的言説の空間」。

[202] 「古代·中世の部 討論」歴史学研究会編『歴史における民族の問題』、54、59頁。

[203] 「古代·中世の部 討論」、69頁。

[204] 指1336—1392年，日本皇室一分为二的时期。——译者注

[205] 松本新八郎「中世の民族と伝統」歴史学研究会編『歴史における民族の問題』、170—171頁。该文是纲野善彦和田中正俊对1951年2月的报告进行的总结。

[206] 歴史学研究会編『民族文化について』岩波書店、1953、80頁；土井正興「クリーム色の表紙の思い出」、4頁。

[207] 野沢豊「民歌民謡は大衆闘争の伝統的武器である」『歴史評論』第30号、1951年；坂本俊夫「民族の叫び」『歴史評論』第39号、1952年；山野洋子「農民の生活感情にとけ込んで——『民族芸術を創る会』の仕事」『歴史評論』第39号、1952年；等等。

[208] 「歴史学はどうあるべきか」『歴史学研究』第155号、1952年1月、54頁。国民历史学运动结束后，1955年11月远山茂树等人撰写的岩波新书《昭和史》出版，由此引发了所谓“昭和史论争”。当时，对于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角度撰写的这部《昭和史》，亀井胜一郎批评其为“被称作‘国民’的没有老百姓的历史”。对此，远山等人虽然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立场，但也承认应在叙述历史的问题上多加思考。究其原因，可以说从国民历史学运动开始的那一刻起，这样的历史叙述问题就已经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中得到了认同。

[209] 「古代·中世の部 討論」歴史学研究会編『歴史における民族の問題』、56頁。

[210] 井上清「党の規律と研究の自由について」『日本文化の課題と展望』『前衛』臨時増刊、103頁。但井上在该文章的第101—102页中写道，自己原本并非国际派，而是在对共产党的内部纷争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对藤间进行了批判，之后“意识到反主流（国际派）的人还算有一定的理论性，故开始与其接近”。

[211] 特集「義民」『歴史評論』第37号、1952年。

[212] 丸山眞男『丸山眞男集』第5巻、74—75頁。

[213] ねずまさし「坂本俊夫の『民族の叫び』について」『歴史評論』第43号、1953年、74頁。

[214] 井上清「『民族の文化』を読む」『歴史学研究』第163号、1953年、42—44頁。

[215] 井上清「『民族の文化』を読む」『歴史学研究』第163号、1953年、40頁。

[216] 井上清「幕末における半植民地化の危機と闘争（二）」『歴史評論』第33号、1951年、15頁。井上在历史学研究会1951年年度大会上阐述了同样的明治维新历史观，而远山茂树对此一直持反对意见。不过远山虽对明治维新持反对态度，却认可了在自由民权运动中存在克服“非政治性个人主义”的健全的“由下而上的民族主义”。见『歴史学中の民族問題』中的『近代の部 討論』。

[217] 井上清在「『民族の文化』を読む」（第43页）中写道：“民族主义是帝国主义统治和侵略殖民地的‘根本手段’，而完全不像其表面印象一样反对帝国主义。”这种主张的背后，是帝国主义论，即殖民地原有统治阶级的“民族主义”与宗主国的合作关系。井上在历史研究学会1951年年度大会『近代の部 討論』（第140—142页）中，以矢内原忠雄的殖民政策研究为基础，提出20世纪的帝国主义，采取“尊重”殖民地的原有文化，通过使其“自治”来进行间接统治。在这种帝国主义的统治下，就像一面赞赏“茶道”、“花道”，一面追随美国的日本保守政治家和财经界人士那样，拥护“传统文化”的殖民地保守主义者都是帝国主义统治的共犯。井上认为，这种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同时也是“世界主义者”。为了打破这种状态，必须重视反封建斗争和阶级斗争，必须打倒统治阶级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形成工人阶级的民族主义。

[218] 鈴木正四「近代史における民族の問題」歴史学研究会編『歴史における民族の問題』、180頁。

[219] 日本歴史学研究会委員会「1951年度歴研大会批判」『歴史学研究』第153号、1951年、37頁。

[220] 石母田正『石母田正著作集』第14巻、358、370頁。

[221] 網野善彦対談集『「日本」をめぐって』講談社、2002、152頁。神田文人也在「歴史学における民族の問題」（『歴史評論』第200号、1967年）第51页写道："作为一般性倾向，前近代支持所感派，近代则支持国际派。"朝鲜史研究专家旗田巍在『古代における民族の問題』（『歴史学研究』第153号、1951年）中批判道，藤间的朝鲜古代历史研究被描述为"古代的'民族运动'，但事实上似乎不是说古而是比今"。藤间将古代朝鲜半岛的纷争描写成"韩族"的民族独立斗争，把从北方南下的高句丽视为朝鲜民族的侵略者，并赞赏新罗的"民族运动"。

[222] 井上清·小池喜孝·藤間生大·大久保利謙·岡田章雄·羽仁五郎·中野重治「『くにのあゆみ』の検討」、33頁；中野重治·石母田正·藤間生大「民族文化の問題」『展望』1948年11月号、47頁。

[223] 「古代·中世の部 討論」歴史学研究会編『歴史における民族の問題』、56、60頁。

[224] 飯塚浩二編『日本の軍隊』、141頁。

[225] 石母田正『続 歴史と民族の発見』、20頁。公民馆是依据《社会教育法》在日本各市町村建造的社会教育设施。——译者注

[226] 梅田欽治「『国民的歴史学』運動の遺産」『歴史評論』第150号、1963年、109頁。

[227] 藤間生大「新しい科学のあり方」『歴史評論』第16号、1948年、52頁。

[228] 笔者对于柳田思想的见解，参见小熊英二『単一民族神話の起源』第12章及小熊英二「柳田国男と『一国民俗学』」（アエラムック『民俗学がわかる』朝日新聞社、1997）。

[229] 石母田正『続 歴史と民族の発見』、158頁。

[230] 石母田正『歴史と民族の発見』、352頁。

[231] 梅田欽治「『国民的歴史学』運動の遺産」『歴史評論』第150号、1963年、109頁。

[232] 「月の輪古墳」『歴史評論』第53号（1954年），「石間をわるしぶき」『歴史評論』第40号（1952年），两者分别被选入特辑中。

[233] 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9巻、59—60頁。

[234] 加藤文三「国民的歴史学について」『歴史評論』第44号、1953年、67頁。

[235] 加藤文三「国民的歴史学について」『歴史評論』第44号、1953年、82頁。

[236] 石母田正『続 歴史と民族の発見』、28—29頁。

[237] 石母田正『続 歴史と民族の発見』、132—135頁。

[238] 石母田正『続 歴史と民族の発見』、149、183頁。

[239] 石母田正『続 歴史と民族の発見』、151—155頁。

[240] 加藤文三「国民的歴史学について」『歴史評論』第44号、1953年、70頁。

[241] 鶴見俊輔『新しい開国』、173頁。

[242] 加藤文三「国民的歴史学について」『歴史評論』第44号、1953年、82—83頁。不过，加藤在第81页中强调：“我本人从一开始就对‘国民’一词怀有抵触。”

[243] 加藤文三「『石間をわるしぶき』に寄せられた批判について」『歴史評論』第40号、1952年、94—95頁。

[244] 民科歴史部会全国委員会準備会「民科歴史部会全国報告（草案）」『歴史評論』第62号、1955年、5頁。这是1954年11月1日全国总会上的报告。井上清「党の規律と研究の自由について」『日本文化の課題と展望』『前衛』臨時増刊、102頁。

[245] 鈴木良一「杜松君を読んで獲得した感想」『歴史学研究』第201号、1956年、53頁。

[246] 关于井上的查问见藤間生大「老兵の思い」『歴史学研究戦後第一期復刻版』月報3；「1955年度民科歴史部会全国総会議事録（下）」『歴史評論』第77号、1956年、87頁；井上清「党の規律と研究の自由について」、102頁。

[247] 井上清「党の規律と研究の自由について」、102頁。

[248] 石母田正『石母田正著作集』第14巻、366頁。

[249] 黑田俊雄「『国民的科学』の問題と歴史研究」『歴史評論』第46号、1953年、72頁；梅田欽治「『国民的歴史学』運動の遺産」『歴史評論』第150号、1963年、121頁。

[250] 黑田俊雄「『国民的科学』の問題と歴史研究」『歴史評論』第46号、1953年、72—73頁。

[251] 加藤文三「国民的歴史学について」『歴史評論』第44号、1953年、66頁。此外，有关“民众文化”的问题也同样如此。1952年，围绕应该将浪曲作为民众文化加以肯定还是作为封建文化加以否定的争议，大部分知识分子做了发言。但据经历了当时争论的革新派浪曲师称，参加争论的人实际上大部分没有听过浪曲。津田清美「浪曲家の立場から」『歴史評論』第40号、1952年、19頁。

[252] 中塚明「国民と歴史学との新しい関係（一）」『歴史評論』第122号、1960年、19頁。

[253] 1918年，由米价暴涨引发的日本全国性暴动。暴动形式以抢米为主，故称“米骚动”。这次暴动直接导致寺内内阁倒台。——译者注

[254] 石母田正『石母田正著作集』第14巻、378頁；梅田欽治「歴史学と国民」『歴史評論』第66号、1955年、79頁。

[255] 石母田正『石母田正著作集』第14巻、378頁。

[256] 石母田正『石母田正著作集』第14巻、378頁。津轻，日本地名，位于青森县西部，盛产苹果。——译者注

[257] 石母田正『石母田正著作集』第14巻、378頁。

[258] 石母田正『石母田正著作集』第14巻、378頁；石母田正『歴史と民族の発見』、38頁。

[259] 網野善彦対談集『「日本」をめぐって』第152号、講談社、2002、159頁。

[260] 井上清「党の規律と研究の自由について」、103頁。

[261] 遠山茂樹「1953年度大会の欠陥は何故生まれたのか」『歴史学研究』第165号、1953年、49頁。远山在这篇文章中指出，国民历史学运动虽然旨在积极参与现实政治，“但实际上，他们被动地顺应了来自外部的现代观点，于是在不知不觉中产生了这样的缺陷”，“换言之，他们完全依赖客观的形式，采取忽视主体的无方针政策”（第50页）。

[262] 遠山茂樹「1953年度大会の欠陥は何故生まれたのか」、49頁；「東京·歴史部会の活動総括」『歴史評論』第46号、1953年、95—96頁。

[263] 「八回大会の方針（民科の正しい性格）を理解するために」『歴史評論』第49号、1953年、95頁；梅田欽治「『国民的歴史学』運動の遺産」『歴史評論』第150号、1963年、120頁。

[264] 「1955年度民科歴史部会全国総会議事録（上）」『歴史評論』第46号、1953年、95—96頁。

[265] 「1955年度民科歴史部会全国総会議事録（下）」、85頁；井上清「党の規律と研究の自由について」、103頁。

[266] 梅田欽治「『国民的歴史学』運動の遺産」『歴史評論』第150号、1963年、108頁。

[267] ねずまさし「1956年度の総会と大会についての所感」『歴史学研究』第198号、1956年、51頁；網野善彦対談集『「日本」をめぐって』第152号、176頁。

[268] 犬丸義一「戦後歴史学の理論的成果」、80頁。石母田的自我批判『二つの点について』刊登在『前衛』的临时增刊『文化問題と日本共産党』上。此外，关于石母田在1956年度历史学研究会总会上的态度，杜松『1956年度の総会と大会についての所感』及鈴木『杜松君の所感をよんで』都对其进行了批评。对于杜松的批评，石母田认为：“我不是问题时期的负责人，只不过是历史研究会的一个成员而已，我所应负的是作为一名成员的责任。”「ねず氏の批判に答えて」『歴史学研究』第201号、1956年、53頁。

[269] 鈴木良一「ねず君の所感を読んで」、52頁。

[270] 井上清「戦後歴史学の反省また当面する課題」、7—8頁。

[271] 石母田正『石母田正著作集』第14巻、368頁。

[272] 網野善彦対談集『「日本」をめぐって』、165頁。

[273] 藤間生大「年輪」石母田正『石母田正著作集』月報3、1頁。

[274] 石母田正『続 歴史と民族の発見』、128頁。

[275] 据笔者管见，目前还未发现以战后教育学家及日教组的民族教育论为主题的批判性研究。船山谦次『戦後日本教育論争史』中的「国民教育論争」和「愛国心教育論争」两章，对当时的教育论战进行了总结。此外，大橋精夫『戦後日本の教育思想』（明治図書出版、1990）和海老原治善『新版 民主教育実践史』（三省堂、1977）等关于战后教育史方面的概论性著作中，也分别作为事实列举了对“新教育”的批判和民族教育论。然而，这些著作基本都对当时的民族教育论或国民教育论持赞同立场，也没有对其与战前的连续性进行论述。
对此，高橋史朗在「日教組の教育基本法評価の変遷と臨教審」（『臨教審と教育基本法』、『現代エスプリ』1986年臨時増刊号）中，批判性地论述了日教组与教育学家对教育基本法评价的变迁。然而，高桥的论述并未涉及其与民族教育论之间的关系。此外，高桥无视战败后贫困的社会状况而一味攻击日教组和教育学家的“转向”，也不得不说是过于片面。
战后左派教育学家和日教组批判《教育基本法》，在与战前的微妙连续性中提倡民族教育论，这些都是历史事实。如结语中所述，笔者对当今拥护宪法和《教育基本法》的意义表示认可，然而在社会现状完全不同的战后，左派对其进行批判也是出于不得已。将历史的经过按照时间脉络梳理清楚，并对其进行批判性总结十分有必要。否则，就会像高桥史朗那样，给右派的揭露性批判以可乘之机。本书的意图之一，就是在与右派的历史修正主义进行斗争的同时，对战后思想进行一次批判性的重新思考。

[276] 指《教育敕语》，日本明治天皇颁布的教育文件，其宗旨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教育的主轴。——译者注

[277] 船山謙次『戦後日本教育論争史』、6頁。原文为汉字片假名。

[278] 長浜功『教育の戦争責任』明石書店、1984、初版1979、297頁。

[279] 山本明『戦後風俗史』、65—66頁。

[280] 山本明『戦後風俗史』、133頁。

[281] 「『日の丸』への関心」『朝日新聞』1950年2月27日。关于无偿发放计

划，见「“日の丸”を配給」（『朝日新聞』1949年1月14日）。“日之丸”和《君之代》的相关报道，收录在繁下和雄編『新聞集成日の丸·君が代』（大空社、1989）。

[282] 伊藤恒夫「愛国心について」、80頁。

[283] 「祝日には国旗を」『朝日新聞』1950年10月18日。「国民実践要領」收录在『天野貞祐全集』第4巻。

[284] 关于邀请京都学派的经过，参见天野貞祐『天野貞祐全集』第4卷，后记，第415页。天野在该文中承认，自己是由于担心舆论的反对，才没有在当时公开向京都学派提出邀请一事。

[285] 船山謙次『戦後日本教育論争史』、246、248頁。

[286] 宗像誠也「『国』の不当な強調」『教育評論』1956年4月号、27頁。

[287] 朝日新聞社編『声』第2巻、39頁。

[288] 宗像誠也「教育基本法」青木誠四郎·宗像誠也·細谷俊夫合編『教育科学辞典』朝倉書店、1952；日高六郎「新しい人間像」岩波講座『教育』第3巻、岩波書店、1952、39、54頁。

[289] 国分一太郎「教育基本法をどう生かすか」長田新監修『教育基本法』新評論、1957、282—283頁。

[290] 大熊信行「平和教育と教育基本法」「平和思想の諸系譜を学べ」『時事通信』1949年12月20日、12月27日；船山謙次『戦後日本教育論争史』、74頁。

[291] 清水幾太郎「現代文明論」岩波講座『教育』第1巻、岩波書店、1952、27頁。对该文章持赞成态度的著作有国分一太郎·石田宇三郎·片岡並男·斎藤秋男·矢川徳光·松島栄一編著「岩波講座『教育』をめぐって」第12号，1952年12月。

[292] 上原専禄·宗像誠也『日本人の創造』、102頁。

[293] 清水幾太郎「教育の思想」佐藤忠男編『教育の思想』『戦後日本思想大系』第11巻、筑摩書房、1968、135頁。

[294] 南原繁『南原繁著作集』第7巻、129、80頁；大塚久雄『大塚久雄著作

集』第8巻、172頁。

[295] 例如，宗像诚也在『教育基本法』中批评道：“不过是《教育基本法》所应迈过的一个新的阶段而已。”

[296] 「教科書『民主主義』対策委員会について」『歴史学研究』第139号、1949年、57頁；井上清·小此木真三郎·鈴木正四『現代日本の歴史』下巻、374—375頁。

[297] 『民主主義』復刻版経書房、1995、第11章。

[298] 『矢川徳光教育学著作集』第3巻、青木書店、1973—1974、36、25、5、191、210頁。

[299] 矢川徳光「民族問題と教育」『教師の友』1952年1月号、16頁。

[300] 海後勝雄「教育における民族の問題」『カリキュラム』1952年10月号、12頁。

[301] 高橋磌一「民族的教育への前進」『教師の友』1952年2月号、3頁。

[302] 片岡並男「社会科の反省と歴史教育」『教師の友』1952年10月号、9頁。

[303] 矢川徳光「民族問題と教育」、16頁；高橋磌一「歴史教育をすすめるために」『教師の友』1953年10月号、7頁。

[304] 井上清·小此木真三郎·鈴木正四『現代日本の歴史』下巻、374頁。

[305] 勝田守一『勝田守一著作集』第2巻、国土社、1972—1974、19、30頁。

[306] 上原専禄『上原専禄著作集』第7巻、47頁。

[307] 1951年，上原在与宗像诚也的谈话中，将日本形容为“世界的乡下人”，并主张“为将所有日本人都能教育成民族的一员，应该将欧洲人的那种个人意识更加具体、更加有效地灌输给每一个日本人”（上原専禄·宗像誠也『日本人の創造』、136頁）。从这些言论中可以看出，在当时的知识分子看来，“西化”与“民族主义”并不矛盾。

[308] 「会談成果と要約 草案要旨」『朝日新聞』1953年10月25日。

[309] 大嶽秀夫編『戦後日本防衛問題資料集』第1巻、584頁。

[310] 「教師の倫理綱領」『日教組20年史』労働旬報社、1970、1168—1170頁。不过，这部纲领并非否定“个人”的确立，而是强调“18世纪的个人主义已经不再是确立个人的途径”，“作为个人的教师，其确立只能通过团结来实现”。

[311] 松島栄一「民族文化の創造と教育」『教師の友』1952年9月号、17頁。

[312] 原康子作詞·小杉武治作曲『緑の山河』。引用的歌词为第一段。1954年6月，大阪教职员工会因以“废除《君之代》”作为其方针而成为当时的话题，当时的日教组副委员长今村杉所主张的是“制定新国歌国民运动”，而并非对国歌本身进行否定。「『君の代』是か非か」『毎日新聞』1954年6月24日。

[313] 今井広史作詞·佐佐木英作曲『日本教職員組合組合歌』。引用的歌词为第三段。

[314] 海老原治善『新版 民主教育実践史』、112頁。

[315] 「第一回全国教育研究大会報告書」『教育評論』1952年5月臨時特集号、539頁。

[316] 「第一回全国教育研究大会報告書」『教育評論』1952年5月臨時特集号、538頁。

[317] 「第一回全国教育研究大会報告書」『教育評論』1952年5月臨時特集号、540頁。

[318] 日本教職員組合『日本の教育』第2巻、469—470頁。

[319] 金沢嘉一「祖国の未来に心をよせる子どもたち」『六·三教室』1951年10月号、26頁。

[320] 松島栄一「民族文化の創造と教育」『教師の友』1952年9月号、21頁；日本教職員組合『日本の教育』第9巻、319頁。

[321] 高橋磌一「歴史教育をすすめるために」、5頁；片岡並男「社会科の反省と歴史教育」、8頁。

[322] 日本教職員組合「日本の教育」第7巻、394—395頁。

[323] 日本教職員組合「日本の教育」第7巻、391—392頁。

[324] 小熊英二『「日本人」の境界』第21章。

[325] 日本教職員組合「日本の教育」、459頁。这时的冲绳教职员会代表是喜屋武真荣。

[326] 石田宇三郎「平和教育と民族教育」『教師の友』1952年2月号、17—19頁。

[327] 小沢有作「民族解放の教育のために」『生活指導』第31号、1962年、92、94頁。

[328] 石田宇三郎「国語教育の基本方向」『教師の友』1953年7月号、32頁。这一时期关于国语教育的观点，虽由田近洵一在其著作『戦後国語教育問題史』（大修館書店、1991）中进行了整理，但是他没有注意到这些观点与日本共产党的民族主义和国民性历史学运动之间的关系，也没有注意到通用语与方言的问题。另一方面，安田敏朗在其著作『「国語」と「方言」の間』（人文書院、1999）的第三章中虽提到了围绕战后通用语教育展开的论战，却忽视了其与共产党的民族主义以及进步系的国民主义之间的关系，因此与本章在问题意识和研究对象上并没有重合。安田等论述战后通用语教育的文章中的一部分，被收录在滑川道夫編『国語教育史資料』（第3巻、東京法令出版、1981）和小林和彦·馬場俊臣編『国語教育基本論文集成 23』（明治図書、1993）等书中。
此外，关于民主化与共通语普及之间的关系，安田在『「国語」と「方言」の間』中评价道："人们不必鄙视自己的方言而能够堂堂正正地讲话，这难道不是语言的'民主化'吗？当然，前提条件是'通用语'的'民主化'和'民众化'。"（第306页）笔者赞同这一论点，至于什么才是"民主化"或"民众化"则是思想性问题。如文中所述，当时的教育工作者们认为，能使全国性的自由讨论变为可能的共通语普及才是真正的"民主化"。关于对这个问题的评述，笔者认为必须首先对"民主主义"进行思想性的思考。

[329] スターリン『マルクス主義と言語学の諸問題』、204—205頁；田中克彦「『スターリン言語学』精読」。

[330] 石田宇三郎「国語教育の基本方向」『教師の友』1953年7月号、21頁。

[331] 国分一太郎「国語教育の今日的課題」『教師の友』1952年2月号、9頁。

[332] 蔵原惟人「今日における言語の問題」『文学』1951年2月号、52頁。藏原的论文是为批判高仓辉而写，这一点在田中克彦的书中也有提及。不过田中没有考虑到其与日本共产党的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而仅把藏原视为“语言保守主义者”。

[333] “日本精神”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开始广泛使用的日本国家主义标语之一。——译者注

[334] 国分一太郎「国語教育の今日的課題」、7頁。

[335] 国分一太郎「国語科」岩波講座『教育』第5巻、岩波書店、1952、17頁。

[336] 防人，指日本古代从关东地方派到九州镇守要地的驻防战士。防人歌，指驻防战士吟咏的和歌。——译者注

[337] 荒木繁「民族教育としての古典教育」『日本文学』1953年11月号、7頁。

[338] 关于此次大会的情况，参见日本文学協会編『日本文学の伝統と創造』（岩波書店、1953）。关于这个时期文学论的情况，佐藤泉「教科書的文学史の出自」（『現代思想』2001年7月号）中略有提及。

[339] 水野清「中等国語教科書の批判」『文学』1948年6月号、27—29頁。

[340] 水野清「新国語教育論の回顧と展望」『文学』1951年3月号、35頁。

[341] 久米常民「カリキュラムの反省」『国語と国文学』1951年7月号、36頁；市川孝「中学校における文法学習指導の反省」『国語と国文学』1951年7月号、57頁。

[342] 土岐善麿「日本における言語改革の問題」『文学』1952年12月号、46—47頁。

[343] 滑川道夫編『国語教育史資料』第3巻、634、638、645、647頁。

[344] 水野清「スターリンと国語教育」『日本文学』1953年5月号、36頁。

[345] 日本教職員組合「日本の教育」第6集、国土社、1957、42頁。

[346] 日本教職員組合「日本の教育」第3集Ⅳ、国土社、1954、70—72頁。

[347] 日本教職員組合「日本の教育」第4集、国土社、1955、379—380頁；日本教職員組合「日本の教育」第5集、国土社、1956、280頁。

[348] 日本教職員組合「日本の教育」第7集、33頁；第4集、380頁。在1958年的第七次教研大会上，出现了“将原本使用方言表达的内容全部规定用通用语表达，是否会不利于表达的贴切性”的意见，然而讨论的结果却是“虽然在声调等方面略有不足，但必须以用通用语进行表达为目标”。日本教職員組合「日本の教育」第7集、50頁。

[349] 剧作家木下顺二曾将九州各地方言统一为一种“共通方言”并运用在自己的民间戏剧作品中，这虽然可以看作一个实践的例子，却并不能看作创造了“通用语”。大久保忠利表示，“一些学者主张将方言中好的要素融入共通语（或通用语），但我没有发现任何人具体指出是哪种方言的哪个句子、哪个词、哪些语法、哪些发音”，并批评道：“无视现有的共通语而以创造一种全新的共通语”为目标的讨论，已经“被斯大林贴上了‘野蛮人’的标签”（滑川道夫編『国語教育史資料』第3巻、645頁）。

[350] 矢川徳光『矢川徳光著作集』第3巻、143頁。

[351] 国分一太郎「国語科」、17頁。

[352] 「沖縄教職員会第3回教研中央集会研究集録（第1集）」『沖縄教育』第5号、1957年、40頁。关于战后冲绳“通用语”的普及，参见小熊英二『「日本人」の境界』第22章。

[353] 梅根悟「愛国心工作と生活教育」『カリキュラム』1953年10月号、38頁。

[354] 梅根悟「愛国心工作と生活教育」『カリキュラム』1953年10月号、35頁。

[355] 国分一太郎·石田宇三郎·片岡並男·斎藤秋男·矢川徳光·松島栄一「岩波講座『教育』をめぐって」、28頁。

[356] 国分一太郎·石田宇三郎·片岡並男·斎藤秋男·矢川徳光·松島栄一「岩波講座『教育』をめぐって」、28頁；石田宇三郎『国語教育の基本的方向』、29頁。

[357] 国分一太郎·石田宇三郎·片岡並男·斎藤秋男·矢川徳光·松島栄一「岩波講座『教育』をめぐって」、21—22頁。

[358] 矢川徳光「『戦時教養問答』について」『青少年指導』1942年3月号；長浜功『教育の戦争責任』、249頁。有关战时教育学家看法的论述，全面参考长滨的这部著作。然而，他没有注意到战时与战后语言的连续性，而只是将这些战后的教育学家评价为“换乘了民主主义这班公共汽车”（第33页）。

[359] 矢川徳光「民族問題と教育」『教師の友』1952年1月号、15頁。

[360] 矢川徳光「『戦時教養問答』について」；長浜功『教育の戦争責任』、249頁。

[361] 長浜功『教育の戦争責任』、248頁。

[362] 海後勝雄『東亜民族教育論』朝倉書店、1942、7頁；海後勝雄「教育における民族の問題」『カリキュラム』1952年10月号、12頁。

[363] 海後宗臣『大東亜戦争と教育』文部省教学部、1942；長浜功『教育の戦争責任』、124頁。

[364] 宮原誠一『少国民の生活文化』、1943；長浜功『教育の戦争責任』、203頁；宮原誠一·飯冢浩二·羽仁説子·遠山茂樹·宗像誠也·川崎俊男·玉城肇「復活する愛国教育」『改造』1953年11月号、99頁。

[365] 宗像誠也『臨戦態勢と教育体制』、1941；長浜功『教育の戦争責任』、218頁；上原専禄·宗像誠也『日本人の創造』。

[366] 海後勝雄『教育技術論』賢文館、1939；長浜功『教育の戦争責任』、125頁。

[367] 宗像誠也『私の教育宣言』、181—183、185、187頁。

[368] 長浜功『教育の戦争責任』、230、180頁。

[369] 矢川徳光「指導と原則」『文化問題と日本共産党』、『前衛』臨時増刊号、71頁。

[370] 長浜功『教育の戦争責任』、220頁。宗像在1958年的『私の教育宣言』

中公开了自己协助战争的来龙去脉，并表示之所以公开是受到了对大熊信行和吉本隆明战争责任评论的刺激。

[371] 百武福寿「三十年ぶり、教え子の同級会に欠席」『読売新聞』1975年9月15日；長浜功『教育の戦争責任』、22頁。

[372] 海老原治善『新版 民主教育実践史』、5—6頁。

[373] 梅根悟『国民教育の新体制』河出書房、1941；長浜功『教育の戦争責任』、107頁。

[374] 梅根悟「愛国心工作と生活教育」『カリキュラム』1953年10月号、38頁。

[375] 宗像誠也『私の教育宣言』、123—124頁。

[376] 高橋磌一「歴史教育をすすめるために」、7頁。

[377] 矢川徳光「民族問題と教育」、8頁；松島栄一「民族文化の創造と教育」、201—202頁。

[378] 楠公即楠木正成，日本镰仓幕府时期的武将，一向主张打倒幕府，恢复天皇统治。——译者注

[379] 金沢嘉一「祖国の未来に心をよせる子どもたち」、30、25頁。

[380] 宗像誠也「『国』の不当な強調」、30頁；小林武「荒木文相の見解におこたえする」『朝日新聞』1960年10月2日。

[381] 森昭「日本の自立と教育」『カリキュラム』1952年1月号、27頁。

[382] 伊藤忠彦「民族教育の課題②」『教育評論』1957年7月号、25頁。

[383] 勝田守一『勝田守一著作集』第2巻、233、236頁。

[384] 加藤周一「松山の印象」、185—186頁。

[385] 日本教職員組合「日本の教育」第7集、636頁。

[386] 宗像誠也『私の教育宣言』第155页中表示：“关于入学考试，我认为不是

教育问题而是经济问题，只要还存在就业难就无法在教育领域内部解决这一问题。”

[387] 论述竹内的著作除松本健一『竹内好論』（第三文明社、1975）、『竹内好「日本アジア主義」精読』（岩波書店、2000）外，还有菅孝行『竹内好論』（三一書房、1976）、中川幾郎『竹内好の文学と思想』（オリジン出版センター、1985）、鶴見俊輔『竹内好』（リブロポート、1995）、岡山麻子『竹内好の文学精神』（論創社、2002）等。近年来部分内容涉及竹内好的论文有都築勉『戦後日本の知識人』，米原謙「日本の『近代』への問い」，劳伦斯·奥尔森（Lawrence Olson）著、黑川創訳『アンビヴァレント·モダーンス』（新宿書房、1997），島田洋一「竹内好」（岡本幸治編『近代日本のアジア観』ミネルヴァ書房、1998），孫歌「アジアを語ることのジレンマ」（岩波書店、2002）等。此外还有一些论文，如米田利昭「竹内好『日本イデオロギー』と『国民文学論』」（『日本文学』第31巻第10号、1982年）、松本三之介「戦後思想と竹内好」（『世界』第448号、1983年）、林叢「竹内好と魯迅」（『比較文学』第34号、1991年）、大沢真幸「竹内のナショナリズム」（『思想の科学』第8次第31号、1995年）、今井駿「竹内好の中国論について」（『人文論集』第46巻第1号、1995年）等。
关于国民文学论战，除臼井吉見『戦後文学争論』（下巻）中收录的相关论文外，『国民文学争論の行方』（『竹内好談論集』第1巻、兰花堂、1985）中，对竹内参加的有关论战的座谈会内容进行了整理。在国民文学论战的相关文献中，从不同于臼井的角度对论战的相关文献进行整理的著作，有民主主义科学协会芸術分会編『国民文学論』（厚文社、1955）。以上资料中基本都有与国民文学论战相关的内容，除此之外，本多秋五『物語戦後文学史』（中巻）和臼井吉見『近代文学論争』（下巻、筑摩書房、1975）等著作也对其进行了论述。
关于竹内的评价，一类是侧重于“民族主义”而将其定位为“战后民主主义=近代主义”的批评者（松本健一等），一类是将其与丸山真男等人一起定位为广义的市民派（都筑勉等人）。然而，正如本书所论证的那样，“战后民主主义者”和“市民派”，实际上与“民族主义者”并不矛盾。并且，目前为止许多学者只是先验性地将竹内定为“民族主义者”，而并没有对竹内的“民族”和“近代主义”的具体内容进行论证。此外，目前为止也没有任何学者通过类似本书的论证方式，对国民文学论战中的种种误解进行详细研究。
笔者认为，大多数研究没有充分注意到竹内对其从军时代一直缄口不言。与丸山真男等人一样关于战争时期的经历，战后的知识分子最不愿谈及的就是让自己最痛苦的从军时代。
但笔者认为，这种沉默本身恰恰可以说明战时经历对这些人的重要性。关于这一点，笔者认为鹤见在《竹内好》中对竹内战争经历的评价同样不够充分。但对竹内

少年时期“优等生意识”的关注，确实是符合鹤见一贯风格的卓见，本章的论证也基本继承了这种观点。

然而，正如本章中所论述的那样，竹内的中国论及近代论中经常会谈到自我同一性和他者表象问题。这是竹内自身问题意识的一种体现，也是战时倾向于“世界史哲学”批判近代观点的竹内，通过吸收批判近代同一性的哲学理论而提出的观点。而关于竹内以这种哲学理论为基础所进行的论述，以往的研究中还未对其进行仔细探讨。

关于这一点，理查德·卡里奇曼（Richard Calichman）在『竹内好における抵抗の問題』一文中，从批评后殖民主义的立场出发，对竹内好的同一性批判及他者表象提出质疑。然而，如果仅依靠批评后殖民主义这一近代批判理论对竹内受到的近代哲学的影响进行论述，那么不过是一种同义反复而已。而本章论证的对象，是竹内在童年及战争期间所产生的“原思想”与受到“世界史哲学”影响后所进行的近代批判之间的关系。

[388] 松本健一「『血ぬられた民族主義』の意味」『戦後世代の風景』第三文明社、1980、265頁。但需要注意的是，松本在「理念としての近代」（『歴史という闇』第三文明社、1975、237頁）中，对本应是“近代主义者”的大塚久雄与本应是“近代”批判者的竹内在一次对谈（「歴史中のなかのアジア」、1968）中表现得志同道合一事进行了评论，他认为，“虽然二者看似处在对立的两极，但基本可以断定，他们同样都主张永久革命”，“虽然二者所主张的永久革命看似不存在交集，然而，虽然无法具体证明，但这应该是由于作为启蒙者的他们，都不愿将革命（近代）作为一种理念进行明确解释”。根据笔者的理解，松本的这种观点可以解释为无论是大塚的“近代”还是竹内的“永远的革命”，实际上都是同一回事，都是通过既存语言所难以表达的内容。虽然松本的这种观点看似与笔者在本章中的观点并不相左，然而果真如此的话，将竹内定位为“战后民主主义＝近代主义”批判者的观点就显得不够准确了。

[389] 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9巻、220頁。

[390] 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13巻、7、8頁。

[391] 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13巻、7頁。

[392] 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13巻、10頁。

[393] 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13巻、10頁。

[394] 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13巻、7頁。

[395] 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13卷、24、238頁。

[396] 飯倉照平「竹内好と武田泰淳」『朝日ジャーナル』1972年1月24日。

[397] 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5卷、92頁。

[398] 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17卷、142頁。

[399] 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17卷、76頁。

[400] 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17卷、160頁。

[401] 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14卷、62頁。

[402] 本多秋五『物語戦後文学史』中卷、250頁。后来被视作“国士”的竹内在1943年的《鲁迅》中主张“文学无用”，对此本多疑惑道：“这简直可以称得上是180度的转变。为什么会这样？”（第261页）然而，正如本章中论证过的，竹内在《鲁迅》中的思想不过是其郁达夫研究的延伸而已。

[403] 武田泰淳『武田泰淳全集』第16卷、筑摩書房、1971—1973、87頁。

[404] 本多秋五『物語戦後文学史』中卷、252頁。

[405] 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14卷、50頁。竹内认为，郁达夫是一位将“强烈主张自我”的“个人主义文学”带到中国的作家。在演讲事件发生后不久的1937年1月公开的《郁达夫备忘录》中，竹内对自己在毕业论文中赞扬过的郁达夫的农民文学等主张进行了评价，他认为：“郁达夫对于那种为应付而临时编造文章的行为深恶痛绝，这是他自身睿智的表现”，“虽然他热爱大众，但采用逃避政治的方式使其难以忍受民众的愚昧”，“因此在广度上虽不如鲁迅，在深度上却略胜一筹”（第14卷，第58、61页）。

[406] 此后事件的经过，参见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17卷）中的年谱、「郭沫若氏のこと」（『竹内好全集』第13卷）以及「中国と私」（『竹内好全集』第13卷）。

[407] 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13卷、215頁。

[408] 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13卷、63、49頁。

[409] 后更名为『中国のレジスタンス』，本章中原则上还是使用当初的题目。

有关日本的鸦片政策，参见江口圭一『日中アヘン戦争』（岩波新書、1988）。

[410] 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4巻、28頁。

[411] 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4巻、33頁。

[412] 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4巻、35頁。

[413] 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4巻、28頁。

[414] 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14巻、282頁。

[415] 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14巻、294—295頁。

[416] 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11巻、157頁。

[417] 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14巻、295—296頁。

[418] 这份宣言刊载于『中国文学』1942年新年号，但该期杂志同时还刊载了竹内『支那を書くということ』，笔者认为两篇文章被刊载于同一期杂志一事不能忽视。本多秋五『物語戦後文学史』中写道："可以肯定的是，竹内在第二次中国之旅后不断积蓄的'压抑'在这里突然爆发了出来。"（本多秋五『物語戦後文学史』中巻、257頁）笔者也赞同这种看法。

[419] 清水幾太郎『清水幾太郎著作集』第14巻、16頁；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8巻、27、28頁。

[420] 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8巻、29頁。

[421] 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4巻、38頁。

[422] 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4巻、38頁。

[423] 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4巻、37—38、40頁。

[424] 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14巻、380、297頁。不过，这种对"支那学家"的反对似乎也与对东京帝国大学中国文学系的批判意识有关。竹内在这段时间发表的文章中，除对"将迎合时局变化当作买卖的汉学老师"进行指责外，还可以发现如"为了不在对战争的决心上落后于人，我要尽快拿出行动"等内容（『竹内好全集』第14巻、303頁）。

[425] 关于“大东亚文学家大会”，参见尾崎秀树『近代文学の傷痕』（岩波新書、1991、初版1963）。

[426] 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14巻、434—435頁。

[427] 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14巻、460、435頁。

[428] 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11巻、156、157頁。

[429] 竹内承认自己当时有些有意识地进行假抵抗，是在1943年7月的『支那学研究者の道』一文中。在该文中，竹内通过引用华北派遣军手册「国民政府参戦と支那派遣軍将兵」及北一辉的「支那革命外史」，对日本的“支那研究者”进行了批判。在『国民政府参戦と支那派遣軍将兵』中，有一段以战时的“日中融合论”为依据对“只强调日本人的错误的优越感”进行批判的内容，竹内对此也进行了引用（『竹内好全集』第14巻、477頁）。关于这一点，竹内在1975年的「わが回想」中谈道：“无论怎样借用北（一辉）的名义，军方都没有任何意见。当时华北派遣军中刚好有人下了一道训令，称应该与中国和睦相处。记得我自己就是因此才决定撰写那篇文章”，这就间接承认了自己的反对只是表面文章而已（『竹内好全集』第13巻、263頁）。从这篇回忆可以看出，竹内当时并非醉心于北一辉，而只是“借用了他的名义”。

[430] 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14巻、456、451、452頁。

[431] 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14巻、449、450、454頁。

[432] 高坂正顯·西谷啓治·高山岩男·鈴木成高「世界史的立場と日本」、338頁。

[433] 竹内在1975年的「わが回想」中表示，自己第一次了解京都学派是在读《中央公论》1942年1月号上的“世界史哲学”第一次座谈会以后，在此之前并没有关注过京都学派。当时恰好在撰写『大東亜戦争と吾等の決意』的竹内认为，自己从这场座谈会中能够发现用来表达自己心情的哲学语言。此后竹内仔细阅读了参加该座谈会的成员及西田几多郎的著作，他表示自己“起初确实痴迷过，但不过是极短的一个时期，可能连一年都不到。后来便开始觉得，这些人不过是一些逞口舌之能的人”（『竹内好全集』第13巻、263頁）。虽然如此，但可以看出京都学派哲学对此后竹内的思想还是产生了一些影响。

[434] 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14巻、36頁。

[435] 严格地讲，竹内从“世界史哲学”中吸收到的主要是，将处于外部的他人作为完善自我的补充进行表现乃是一种自我保护，即主要是近代同一性批判的部分。而与之相反的，即黑格尔哲学及马克思主义所重视的通过劳动影响世界的观点，竹内却似乎根本没有吸收。如果考虑到竹内在学生时代就参加过阅读马克思主义文献的读书会这一情况，那么可以说他在学生时代和战争期间两度无意识地拒绝了将这种劳动观融入自己的思想。如本章所述，竹内的思想非常具有内向性，只有在他人的痛苦与自身痛苦一致时，才有可能与他人建立联系。从这一意义上讲，可以说竹内只是受到“世界史哲学”的启发而表达了自己一贯的思想，而并非完全由于受到了“世界史哲学”的影响。

[436] 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14卷、143頁。

[437] 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14卷、455頁。

[438] 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14卷、455頁。

[439] 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14卷、454、450、455頁。

[440] 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14卷、468頁。

[441] 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1卷、468頁。

[442] 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14卷、468頁。

[443] 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1卷、15頁。

[444] 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1卷、77、18、140、74頁。

[445] 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1卷、18、61、115頁。

[446] 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1卷、60頁。

[447] 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1卷、55頁。

[448] 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1卷、120頁。

[449] 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1卷、120、121頁。

[450] 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1卷、143—144頁。

[451] 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17卷、303頁。虽然竹内的部队在1944年6月曾与中国军队交战，但竹内本人表示："没有杀过一个敌人。"至于他在战场上对平民的态度，则不得而知。

[452] 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4卷、34頁。

[453] 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1卷、203頁。

[454] 东京地名。——译者注

[455] 指入伍通知书。——译者注

[456] 俄国19世纪著名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代表作《罪与罚》的主人公。——译者注

[457] 武田泰淳「戦争と私」（『朝日新聞』1967年8月15日 晚報）、『武田泰淳全集』第18卷、282—284頁。作者在文章开头处提到过"逃跑"，而1967年11月越平联开展的逃兵援助活动被公之于世，正是由于存在这种战时经历所产生的舆论基础。

[458] 武田泰淳『武田泰淳全集』第11卷、5、4頁。

[459] 丸山眞男·竹内好·開高健「擬似プログラムからの脱出」、36頁。

[460] 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1卷、125頁。

[461] 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14卷、169—170頁。

[462] 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15卷、436頁。根据『竹内好全集』第17卷中的年表及丸山的竹内悼文『好さんとのつきあい』（『丸山眞男全集』第10卷）中的内容，二人初次见面是1947年9月30日在东洋文化研究所，丸山当时是通过饭塚浩二的介绍，到竹内处希望借阅孙中山的相关资料。据说，当时丸山认为："姑且不谈'支那'这一汉字词的使用，单就其发音'シナ（shina）'本身而言，我认为并非蔑称。现在英国人仍然将中国称为'China'，法国人仍然称'Chine'，为何日本人用'shina'就不行呢？"并与竹内进行了争论。据丸山称，二人争论的开端，是由于自己首先表示："人们在战后马上开始主张不应再使用'支那'而是该使用'中国'，但我十分厌恶这种一夜之间改变态度的做法"（『丸山眞男全集』第10卷、350頁）。竹内等中国文学研究会的创始人在战前就注意到中国人十分厌恶"支那"这一称呼，也因此将组织的名称定为"中国文学研究会"。竹内后来曾提到："《中国文学月报》

可能是第一本在名称上使用‘中国’一词的杂志。”（『竹内好全集』第13巻、213頁）据说，《中国文学月报》也因此受到了中国方面的好评。而丸山直到后来才得知这些背后的故事，并表示：“假如我当初知道好先生他们在战前特意使用‘中国’这样的名称来创建‘中国文学研究会’，恐怕也就不会发生那样的争论了……开始使用‘中国’这一称呼，也是我受到好先生影响的例子之一。”（『丸山眞男全集』第10巻、350頁）
但是竹内又对战败后日本一边倒地使用“中国”一词感到愤怒。在1946年8月的“备忘录”中，他对战争责任进行了追问：“战争中鼓吹‘支那’，战败后提倡‘中国’，却没有说明改变的理由。是否承认使用‘支那’一词代表了对对方的侮辱，对方是否感受到了侮辱是自己的痛苦，是否认为侮辱是一件恶事，关于这些重大问题，新闻媒体则通过偷换词语，将其葬送。”（第13卷，第101页）在1946年9月，正值《鲁迅》第二版出版之际，对文中“支那”被改为“中国”，出版社擅自进行了抗议。但因为“已经校对完毕无法恢复原状”而就此作罢。正是因为发生了上述经历，才会有前文所提到的，对第一次见面的丸山挑起那样的争论，竹内反而心存好感。
然而，在1940年的「支那と中国」（『竹内好全集』第14巻）中，竹内宣布从此以后不再使用“中国”而改用“支那”，并表示：“不想再将自己的工作称为中国文学。”可以推测，这是出于竹内对自己在北京留学期间明知日本的毒品买卖而不敢提出抗议的悔恨之情，正如本书所引用的那样，竹内可能是出于“现在的自己已经基本上接近于厚颜无耻”这一认识，才“不想再将自己的工作称为中国文学”的。果真如此的话，那么竹内在战后决心重新使用“中国”这一称呼，应该也经历了类似的思考。

[463] 竹内对战争期间委托东京帝国大学保管的藏书因管理不当而散落他处一事十分恼火，据说这也是他拒绝邀请的原因之一。竹内甚至考虑过是否为此对东京大学提出追加诉讼。对东京大学的抗议书「委託の書籍について訴え」收录在『竹内好全集』第13巻。

[464] 参见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17卷，年谱。

[465] 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15巻、403、436頁。关于与《近代文学》的荒、佐佐木和埴谷三人会面后的感想，竹内在1946年10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都还太年轻”，“现在知道了他们都是一些无聊之人”。而关于自己读过荒正人送的5册《近代文学》后的感想，竹内写道：“小林秀雄的座谈会很有意思”，并对中野重治谈及转向问题和战争经历的《五勺酒》给予了高度评价（『竹内好全集』第15巻、433—434頁）。

[466] 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13巻、95頁。

[467] 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1卷、222頁。

[468] 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1卷、223、226頁。

[469] 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5卷、95、96頁。

[470] 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4卷、14頁。竹内表示这是约翰·杜威的观点，但实际上是作为自己的主张进行引用的。

[471] 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4卷、11頁。

[472] 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4卷、11頁。

[473] 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4卷、14、143頁。

[474] 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4卷、148、147頁。

[475] 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4卷、148、163、113頁。

[476] 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4卷、112、113頁。

[477] 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4卷、102、113、125頁。

[478] 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4卷、150、143、152頁。

[479] 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4卷、158、149頁。

[480] 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4卷、162頁。

[481] 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4卷、145頁。

[482] 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4卷、156、125頁。

[483] 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4卷、125頁。

[484] 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4卷、125、156、159頁。

[485] 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4卷、125、156頁。

[486] 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4卷、157、159頁。

[487] 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4卷、161—163頁。

[488] 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4卷、163、165頁。

[489] 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4卷、164頁。

[490] 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7卷、11頁。

[491] 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7卷、9頁。

[492] 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4卷、7頁。

[493] 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4卷、158頁。

[494] 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4卷、158頁。

[495] 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4卷、106—107頁。

[496] 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7卷、8、9頁。

[497] 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7卷、8頁。出自1948年7月的《中国文学的政治性》。从某种意义上讲，战后初期的竹内将“市民”一词作为积极意义加以使用是十分耐人寻味的。除上述的引用外，竹内还在1949年5月的《中国人的抗战意识与日本人的道德意识》中指出日本毒品商人的行为是“作为一名国民的行为”，并认为在战前的日本“国家是所有道德的根源，而国家又是源自一个神化了的人，为了爱国他们可以做任何事，并坚信那是正义的。这是缺乏被称作人文主义的市民社会道德感的”，“除非我们能够目不转睛地直视映于镜中的自己的野蛮性，并从其最深处发现能够依靠自身力量起死回生的契机……否则我们的子孙将无法加入世界市民的行列”（第4卷，第34、35、41页）。此外，竹内还曾在国民文学论战中提出，所谓国民文学是一种理想，“和完美的市民社会一样，都是一种难以实现的状态”（第7卷，第47页）。

正如国民文学论战中对“近代主义”一词的使用所体现的那样，竹内并没有对用词进行严格定义。在1948年的《中国的近代与日本的近代》中，竹内甚至在论述近代以前的时期时，采用了“明朝的市民文学”这一表述（第4卷，第129页）。

但总的来说，在1946—1950年这一时期，竹内是将“市民”一词作为应该肯定的“近代国民”的同义词进行使用的。这与丸山真男在同一时期避免使用“市民”而将“国民”、“公民”等词作为积极意义加以使用的做法形成了鲜明对比（参见第六章）。作为思想史研究者，丸山可能要比竹内更加熟悉同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相关文献，并且由于丸山对其用语加以严格定义，二者之间产生了这样的差异。

国民文学论战结束后，在竹内的观点中，“民族”一词的使用频率有所提高，他在

1953年还使用了“日本并非实际意义上的近代国民国家”这样的表述（第7卷，第256页）。如第十二章中所述，竹内在1960年安保斗争后表示“市民”一词不适合自己。相反，大约从这一时期开始，丸山开始将“市民”一词作为积极意义加以使用。
竹内的这种变化似乎是无意识的，并且其根本思想并未发生改变，变化的不过是表述方式。总之，从上述“近代市民”的用例可以看出，竹内并不只是一名“民族主义者”，“竹内=近代批判者”这一普遍观念也非正确。
此外，丸山在「好さんとのつきあい」中也写道：“一般人都将好先生视为民族主义者，我却不太愿意只将他称为民族主义者。通过20年以上的交往我切身感觉到，好先生的思想中有一种世界主义的味道。”丸山在该文中提出：“自己所在的地方毫无疑问是世界，所谓世界，并非处于日本的‘外部’，只有持有这种观点的才是真正的世界主义”，“而且我认为将竹内视为‘民族主义者’的看法与将其视为‘世界主义者’的看法并不矛盾”（『丸山眞男集』第10卷、359—360頁）。丸山的这种看法，与第十六章中介绍的鹤见俊辅的看法十分相似，二者都认为竹内的“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只是在表现形式上有所不同而已。

[498] 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7巻、10頁。竹内此后继续谈道：“这种语言之所以能够普及，是由于语言已经从禁锢中得到了解放。”（第7卷，第10页）这种观点，可能是参考了鹤见俊辅1946年一篇题为「言語のお守り的使用法について」的文章。

[499] 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1巻、228頁。

[500] 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4巻、15頁。出自1949年9月的《日本人的中国观》。“道德基础”一词，可能派生自竹内在战时十分欣赏的“世界史哲学”中的“道德力量”一词。不过，在《中国人的抗战意识与日本人的道德意识》一文中，竹内却对“在战争期间倡导‘道德力量’的日本的御用学者”进行了批判（第4卷，第36页）。

[501] 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6巻、312頁。

[502] 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13巻、82、78頁。在这篇名为《屈辱的事件》的回忆文章中，竹内记录了当值军官对《军人敕语》“怪异的读法”。那位军官似乎故意对“欲振我之国威，汝等须为朕分忧”一句进行了强调。竹内表示：“以前不过将敕语当作辞藻的堆砌而漫不经心地读过，没想到其中却包含着如此强烈的含义，这使我不得不重新审视明治精神。”但竹内接着又写道：“当那名军官私底下小声向我询问‘什么是民主主义’时，我感到十分愉悦。我一边引用明治时期的《五条誓文》，一边向他解释连我自己都不是很清楚的民主主义的定义。”（第13卷，第85页）
鹤见俊辅在《竹内好》一文中注意到竹内好这种对“明治时期”的发现，然而正如第

三章中所述，战后初期产生过对“明治时期”的怀念，因此并非只有竹内，许多人都利用《五条誓文》对“民主主义”进行过解释。与在“12月8日”中提出的“领有”相同，这里应该注意的，是竹内如何从《教育敕语》和《五条誓文》等统治者的文字中发现积极的理论。因为这样的方法论无论与竹内对“日本浪漫派”、“东条”的看法，还是与竹内对太平洋战争“积极一面”的发现都存在联系。

[503] 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4卷、168—169頁。

[504] 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13卷、213頁。

[505] 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13卷、213頁。

[506] 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13卷、100—101頁。

[507] 当然，这不过是一种推测而并没有确凿证据。战后使《中国文学》复刊的千田九一在1943年的《中国文学》终刊号上写道：“竹内决定停办杂志到底是出于何种理由？这确实是个问题，而我却不清楚，即使明白也无法接受。”本多秋五『物語戦後文学史』中卷、260頁。

[508] 「権力と芸術」『竹内好全集』第7卷、170頁。据说，该文章是竹内在国民文学论战中与野间宏在“文学的自律性”问题上进行讨论时，“以对野田的回应为基础发展而成”。此外，竹内还提到：“撰写这篇文章，得到了久野收、丸山真男、小田切秀雄、鹤见俊辅等人的支持。”（『竹内好全集』第7卷、461頁）就内容而言，这篇文章是竹内在1948年以自己的思想为基础，在接受丸山和久野的影响后提炼而成。耐人寻味的是，竹内在该文中将以天皇制为中心的近代日本规定为“包含了古代或中世因素的特殊近代”，又将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称作“新中世”（『竹内好全集』第7卷、153、147頁）。

[509] 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4卷、284、285、266頁。

[510] 丸山眞男『丸山眞男集』第10卷、360頁。出自丸山为竹内撰写的悼文「好さんとのつきあい」。关于丸山在竹内的影响下改变了自己对日本和中国近代化的评价，参见第245页注③。此外，丸山1960年发表的题为《忠诚与叛逆》的文章，其主要思想是从封建思想中发现近代化的萌芽，而这又与竹内在1948年主张从“东条”中发现抵抗萌芽的思想十分相似。再者，“将现实视作所与的实体”这一竹内1948年的主张，也可能对丸山1952年发表的文章《现实主义的陷阱》产生了影响。

[511] 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7卷、19頁。

[512] 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7卷、19頁。

[513] 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7卷、17—18頁。

[514] 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7卷、19頁。

[515] 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7卷、19頁。

[516] 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7卷、31頁。

[517] 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7卷、32頁。

[518] 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7卷、30頁。

[519] 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7卷、33、34頁。

[520] 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7卷、36頁。

[521] 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7卷、35、37頁。

[522] 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13卷、260頁。出自1975年的『わが回想』。竹内在1959年的文章《近代的超克》中论述了日本浪漫派，但这并不是竹内对日本浪漫派的思想产生了共鸣，而是他对日本浪漫派在其所处时代的文坛中的地位进行了分析。

此外，在《近代的超克》中，竹内在对刊载“近代的超克”主题座谈会内容的《文学界》表示支持后指出：“所谓‘抵抗与屈服’的关系，必须视具体情况而定。”并认为：“始终将《文学界》视作法西斯走狗的观点与事实不符。中野重治将‘日本浪漫派’与《文学界》等同视之……而高见顺却表示反对……在这个问题上我赞同高见的观点。”（『竹内好全集』第8卷、24頁）从这些言论可以看出，在竹内看来“日本浪漫派”与“法西斯”这二者是相同的。

1960年代以后论述竹内的一些著述中存在一种现象，那就是根据竹内与保田在高中时相交甚密、竹内对日美开战加以赞赏、在国民文学论战中提出“民族”和日本浪漫派等事实，便草率地将竹内定位为同情日本浪漫派的民族主义者。然而，虽然日本浪漫派与京都学派都对战争进行了赞颂，但二者之间的差异甚至大于战后的新左翼与日本共产党之间的差异。从这一点来看，也无法想象战时支持京都学派的竹内会从思想层面对日本浪漫派加以评价。

[523] 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7巻、20頁。

[524] 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7巻、20頁。

[525] 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7巻、34頁。

[526] 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7巻、36頁。

[527] 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7巻、43、44頁。

[528] 伊藤整·臼井吉見·折口信夫·竹内好「国民文学の方向」『群像』1952年8月号、123頁。

[529] 日高六郎「書評『国民文学』」『文学』1954年5月号、99頁。

[530] 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7巻、54頁。

[531] 堀田善衛·伊藤整·竹内好·平野謙·花田清輝「日本の近代と国民文学」『新日本文学』1953年12月号、150頁。“近代主义”一词的出处至今不详，该词在战前虽然是用来表示现代主义文学这一流派，但在战后成为日本共产党经常使用的词。对于文中引用的竹内的提问，平野谦回答道：“近代主义一词，具体来讲是为了表示‘现代文学’而创造出的新词。”（第150页）

[532] 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1巻、47頁。竹内在《鲁迅》中写道：“绝望到极点的人，除了成为文学家外别无选择”，“因为他没有屈服于绝望”，并引用了鲁迅“绝望之于虚妄，正与希望相同”的名言（第1卷，第113页）。竹内在《鲁迅》中还写道：“鲁迅文学的根源，是一个可以说一无所有的无名之辈。正是由于这种最基本的认识，他才得以成为一名文学家，如果没有这种认识，那么对他的最终评价不过就是民族主义者鲁迅或爱国者鲁迅”，并将“鲁迅认识到自己内心罪恶的时期”称为“回心”（第1卷，第61、47页）。在竹内撰写文章的过程中，可以看出他“对罪恶的认识”、“内心的黑暗”及无法用某一词来表达这种黑暗时的焦躁。

[533] 臼井吉見『近代文学論争』下巻、323頁。

[534] 永積安明「文学的遺産のうけつぎについて」『文学』1952年3月号、232頁。

[535] 野間宏「国民文学について」『野間宏作品集』第12巻、岩波書店、1988。

[536] 本多秋五『物語戦後文学史』中巻、243頁。

[537] 本多秋五『物語戦後文学史』中巻、279頁。

[538] 此往返书信收录于臼井吉見『戦後文学論争』（下巻）及民主主義科学者協会編『国民文学論』中，引用部分自后者第6页开始。

[539] 伊藤整·臼井吉見·折口信夫·竹内好「国民文学の方向」『群像』1952年8月号、135頁。

[540] 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7巻、50、48頁。

[541] 荒正人『荒正人著作集』第3巻、92頁。

[542] 荒正人「十二月八日」『近代文学』1960年2月号、7頁。这篇文章，是针对竹内在《世界》1959年12月号上发表的「渾沌の中の未来像」一文进行的反驳。竹内在该文中认为，对华战争虽为侵略战争，但针对英美的战争则是“帝国主义对帝国主义的战争”，并列举了东京大审判中印度法官拉达宾诺德·巴尔的主张。
关于“太平洋战争的双重性质的假说”，竹内在『大東亜戦争と吾等の決意（宣言）』中说道：“孤注一掷的失败是根本原因。”（第11卷，第157页）如本书所述，竹内在战时虽然利用“12月8日”的精神批判对中国的侵略，但这不过是用“大东亚战争”攻击“中国事变”的逻辑。只要在这种逻辑下，竹内就不得不将日中战争与太平洋战争区别看待，并得出太平洋战争是“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从结果上看也有对亚洲民族解放做出贡献的一面的结论。
从“黑暗”中发现自我革新的基础，竹内的这一思想与对“黑暗”的肯定只是一线之隔，这与竹内战时的“抵抗”与“屈服”只是一线之隔这一主张完全一致。

[543] 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7巻、50頁。

[544] 堀田善衛·伊藤整·竹内好·平野謙·花田清輝「日本の近代と国民文学」『新日本文学』1953年12月号、153頁。

[545] 野間宏「国民文学について」『野間宏作品集』第12巻、258頁。

[546] 福田恒存「国民文学について」『文学界』1952年9月号、臼井吉見『戦後文学論争』下巻、138、139、141頁。

[547] 安部公房·荒正人·岩上順一·石母田正·猪野謙二·小場瀬卓三·神山彰一·呉隆·杉本時哉·高沖阳造·竹内好·古川清·本多秋五·新島繁「国民文学をどうみるか」民

主主義科学者協会編『国民文学論』、278、284頁。

[548] 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7巻、47、42頁。

[549] 前引竹内与伊藤的往返书信。引用部分出自民主主義科学者協会編『国民文学論』第5页以下。

[550] 堀田善衛·伊藤整·竹内好·平野謙·花田清輝「日本の近代と国民文学」『新日本文学』1953年12月号、153頁。

[551] 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7巻、36頁。

[552] 「日本におけるいままでの国民文学論」民主主義科学者協会編『国民文学論』、342—343頁。

[553] 武田泰淳在竹内『日本とアジア』的书评中写道："对于他的'国民文学论'，我至今也无法认同"；"就好像他极其厌恶'知识分子'，而自己却同时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一样，我至死也不会改变这种看法"（『武田泰淳集』第13巻、95頁）。武田的这种将竹内的性格与其言论的性格从不同角度分别看待的评价可谓十分尖锐。
丸田真男在「好さんとのつきあい」中写道："说起武田泰淳，大家都认为竹内是他的人生导师"，"好先生自己也曾说过，从美酒到女色我什么都是我教给他的。当然，可能也正因如此，泰淳在好先生的面前才不敢造次并对他十分敬畏"，"这样的至交虽然独一无二，好先生却完全不认同泰淳的作品，这就有些太过分了。好先生曾说《风媒花》是情色小说，没有任何思想性。可能正因为亲密无间所以才有这般辛辣的评价，但也不能什么都非要以《鲁迅》为评价标准吧"（『丸山眞男全集』第10巻、352頁）。厌恶"领导者"的竹内却自称是武田的领导者，这和前述武田对竹内的评价有相似之处。

[554] 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17巻、年表、311頁）中提到，1958年武田曾委托竹内担任自己作品『森と湖のまつり』创作完成庆祝会的发起人，却被竹内以"不愿自己的名字和三岛由纪夫排在一起为由拒绝了"。此外，根据桥川文三的回忆，在1970年11月三岛自杀的第二天，竹内曾在"中国之会"的办公室里"笑呵呵"地说："喂，现在举杯庆祝一下如何？"（『橋川著作集 第1巻 竹内好と日本ロマン派のこと』、203頁）

[555] 加藤祐三「解説」竹内好『日本とアジア』ちくま学芸文庫、1993、485頁。

[556] 如第八章中所述，丸山真男在「日本におけるナショナリズム」中写道："在亚洲各国中，日本是唯一一个在民族主义上已经失去处女性的国家。"通过"已经"一词可以看出，丸山认为中国和朝鲜将来的民族主义同样有些令人畏惧和担忧。然而，竹内在1952年5月的一篇题为「今日現場に生きる教育者へ—ナショナリズムと平和教育」的文章中写道："丸山先生认为日本是亚洲各国中唯一在民族主义上失去了处女性的国家"，而漏写了（也可能是出于无意）"已经"一词（第6卷，第65页）。
此外，在1949年12月一篇题为「新中国の精神」的文章中，竹内在谈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时这样写道："这种做法，与我们通常所使用的共产主义这一概念在性质上完全不同，因此如果将此称为共产主义（广义上的）的话，我想我也不得不改变自己的想法。"（第4卷，第94页）可以认为，竹内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理由，并不是共产主义这一意识形态。
在那之后，竹内虽曾反对中国在1964年进行核试验，并参加了学者、研究者共同发表的声明（第17卷，年谱，第316页），却又在1964年8月的一篇征集意见书中写道："该问题是能力范围之外的问题，故保留意见。不过，我并没有打算改变自己的想法。"（第9卷，第389页）可以说只要从根本上而言竹内对中国的"关注"是出于"赎罪"，对他来说全面否定中国就是不可能的。

[557] 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13巻、29、44頁。

黄大慧

北京大学法学博士（国际政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曾留学日本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并历任日本立教大学访问学者、神户大学特聘教授，长期从事日本政治与外交、中日关系、亚太安全、中国对外政策等领域研究，著有《日本对华政策与国内政治——中日复交政治过程分析》、《日本大国化趋势与中日关系》、《制衡中国——日本对中国崛起的反应》等。

李　丰

日本神户大学博士，北京外国语大学日语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战后中日关系史研究。

王　娟

日本神户大学博士，Graybridge Malkam 讲师，主要从事中日教育交流史研究。

彭　程

日本神户大学博士，湖南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副教授，主要从事近代中日关系史研究。

社科文献设计中心
010-59367154
装帧设计 / 王子君

〈民主〉と〈愛国〉

启微

本书运用了庞大的史料，采用建构主义的方法论，考察了战后日本关于民族主义和公共性的言论，梳理了日本从战败到1970年代初的变迁，对左、右翼思潮对“民主”、“爱国”的表述进行分析，论述了战后日本民族主义的形成与特点。本书史料几乎涵盖了日本战后所有的政治学者、政治党派、政治运动的观点，不仅探讨了丸山真男、大塚久雄、竹内好、吉本隆明、江藤淳、鹤见俊辅等战后知识分子的思想，还涉及了宪法问题、旧金山媾和、战后史学运动、战后教育运动、安保斗争、全共斗运动等领域，是全面了解战后日本政治思想的发展、流派不可多得的学术佳作。

启微官方微博

ISBN 978-7-5201-6401-6

9 787520 164016 >

定价：198.00元（全二册）

"民主"与"爱国"

战后日本的民族主义与公共性

下册

〔日〕小熊英二 著

启微

获奖
日本社会学会奖
每日出版文化奖
大佛次郎论坛奖

黄大慧
李丰
王娟
彭程 译

黄大慧 审校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小熊英二

庆应义塾大学综合政策学部教授，著有《単一民族神話の起源：「日本人」の自画像の系譜》、《「日本人」の境界——沖縄・アイヌ・台湾・朝鮮：植民地支配から復帰運動まで》、《1968——若者たちの叛乱とその背景》、《社会を変えるには》、《生きて帰ってきた男——ある日本兵の戦争と戦後》等。

启微

『民主』与『爱国』

战后日本的民族主义与公共性

下册

〔日〕小熊英二——著

黄大慧
李丰
王娟
彭程——译

黄大慧——审校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第II部

第十一章 “自主独立”与“非武装中立”

如第四章所述，战败之初宪法第九条得到了政府和保守政治家的支持。而这种状况发生变化并形成“修宪”与“护宪”两派的对立，是1950年代以后的事情。本章将考察1950年媾和问题浮出水面至1955年“五五年体制”确立期间有关宪法和媾和的讨论。[1]

美国从占领日本之初，就采取了彻底瓦解日本军备的政策。然而，1950年6月朝鲜战争一爆发，为填补出兵朝鲜的驻日美军留下的“真空”，驻日盟军最高司令部命令日本政府成立警察预备队。与此同时，美国采取了结束对日占领、让日本独立并将之培育成反共同盟国的方针。因此，日本有必要与二战各对日参战国缔结媾和条约。

然而对日占领结束后，美国还希望日本能成为自己在远东的军事基地。于是，1951年9月，在缔结《旧金山和约》的同时，签署了允许美军驻扎日本的《日美安保条约》。但反对美军驻扎日本的苏联、中国以及印度等国并未出席该会议。而早在此次媾和会议之前，肯定美国主导的和约和《日美安保条约》的“片面媾和论”，与主张包括苏联、中国在内进行媾和的“全面媾和论”便形成对立。尽管全面媾和论的提出广为人知，但是本章着重考察的对象是知识分子集团的和平问题谈话会，而在这些讨论中，宪法第九条也受到关注。

从结论来看，“护宪“与“非武装中立”是战后日本民族主义的表现形式之一。而且从1955年起，其逐渐表现出静态化和形式化的倾向。

1950年的转变

宪法实施后，其理念深入人心。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宪法实施后的数年间，与第九条相比，人们讨论更多的是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条款。

在宪法公布一周年的1947年11月3日与宪法实施一周年的1948年5月3日，各类报刊都发表了有关宪法的社论。其中，以宪法第二十五条“全体国民都享有健康和文化的最低限度的生活的权利”阐释解决贫困问题的对策，以及以宪法第十五条“一切公务员都是为全体服务，而不是为一部分服务”批判官僚腐败的论调引发了人们的广泛关注。《新宪法给予国民的影响》的开篇也刊载了宪法第二十四条的“两性本质上平等”的条款。[2]

即便是对处于战败后贫困与混乱之中的一般民众而言，这些条款的实用性也远高于宪法第九条。在宪法实施后的一两年间，以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以及规定“以强迫、拷问或威胁所得的口供，或经过非法的长期拘留或拘禁后的口供，均不得作为证据”的第三十八条为依据，民间开始出现大量违宪诉讼案件。[3] 甚至可以说，与后来相比，这一时期的普通民众利用宪法的程度更高。

与此相比，人们对第九条的关注度并不高。而这一时期的政府则会在每年5月3日邀请天皇举行宪法的纪念仪式，并将第九条称作崇高的国家理念。但对普通民众而言，第九条是一项与日常生活相距甚远的条款。

如第四章中所述，战后初期，解除军备是同盟国与美国提出的前提条件。日本的非武装化及同盟国对日本的管理，在1946年的国际社会已经成为现实。而将日本的安全保障寄托于第九条中所主张的放弃战争与宪法前言中所说的“信赖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的公正与信义”这类话，既是国际和平的美好理想，也并不与当时的国际现实相矛盾。

在美国方面看来，这也是把解除日本武装和国际托管正当化的说辞。在美苏冷战加剧之前，通过由同盟国形成的联合国来保障非武装化后日本的安全，是美国最理想的计划。

但是，冷战的加剧以及1950年6月朝鲜战争的爆发，使这一条件不复存在。对于希望将日本作为反共同盟重新进行武装的美国而言，宪法成了一道障碍。也就是说，美国1946年提出的方针，又在1950年变成对美国的一种束缚。

在将第九条视作先决条件的日本言论界看来，美国的这种转变令人惊讶。在占领军命令设立警察预备队的次月，也就是1950年8月，《每日新闻》的社论做出评论：

> 宪法第九条……是同盟国的要求，其重要性也优先于和约中的其他任何条款。只要将禁止重新武装作为至上命令，只要还将军备问题作为禁忌，那么日本的将来就只有以非武装为前提。无论是从心里赞成放弃军备的日本人，还是对此心存疑虑的日本人，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从一开始就已经决定了。在这个范围内，当然也就可以逃避做何种决定的责任了。[4]

但事实上，美国在朝鲜战争以前便已经开始着手研究重新武装日本的计划。早在1948年1月6日，美国陆军部长罗亚尔在演说中强调，为应对冷战的升级，改变解除日本武装的占领政策已经迫在眉睫。[5]

此外，1948年3月，在占领军中地位仅次于麦克阿瑟的艾格伯格将军提出，为应对冷战形势及“控制那些可能被赤化的50万‘在日’朝鲜人”，应“将日本军队作为我军一部分进行使用”。[6] 艾格伯格将军认为，日军士兵绝对服从、不畏牺牲，“是所有军官都梦寐以求的士兵”——但不包括日军将领。[7]

从这种言论也可以看出，美国的意图在于培养能够在远东战略上加以利用的日本本土部队。1949年秋还流传过日军飞行员作为雇佣兵帮助

台湾国民党政权“反攻大陆”的报道。[8] 后面还会提到，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国会中曾有人提出应将日军投入朝鲜战场。

1948年5月，美国陆军部向国防部长提交了建议重新武装日本的报告。其中提到在“将处于重要战略位置的日本本土置于我掌控之中”的前提下，“结束占领”并“复兴日本经济”，并认为“应该建立一支美国陆军组织下的轻武装，受过初步训练，并处于美国严格监督下的小规模日本部队”。同时，该报告还主张应考虑“修改日本新宪法的可能性”。[9]

然而，麦克阿瑟对此表示反对。1948年3月21日，美国陆军部副部长屈莱伯和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主任凯南访日，并与麦克阿瑟进行会晤。当时，麦克阿瑟以日本不具备重整军备的经济基础、亚洲国家可能反对、大多数日本国民厌恶军队和战争等为由，对重新武装日本表示反对。

不过，除了这些客观情况，麦克阿瑟提出反对的理由中还有一些与他本人的自尊心有关。他在这次会晤中谈道，“重新武装日本，违背了自日本投降后占领当局一贯奉行的诸多原则”，“现在放弃这些原则不仅严重削弱我们在日本的威信，而且会让我们在日本人面前出尽洋相”。[10]

事实上，陆军部在1948年5月建议重新武装日本的报告中，同样考虑到了这种担忧。该报告的附件中写道：

> 毋庸置疑，在日本，建立警察部队以上级别的军事组织被解释为违宪行为。此外，这种解释也确保了长期以来美国的政治立场在对日关系中保持最佳状态。如不采取这种解释，将会助长日本人违反宪法其他条款的倾向。其结果，恐怕有可能使我们在日本的威信大大降低。[11]

对美国政府而言，日本宪法第九条不过是将1946年美国的对日战略正当化的内容而已。虽然如此，仅仅在制定数年之后就将赋予日本崇高

理想的宪法强行颠覆，这种行为只能被形容为毫无原则的机会主义。美国担心这种做法会导致美国信用及威信下降，成为日本国内反美情绪抬头的导火索。

在冷战的战略性实际利益与国家威信及形象之间，可以说美国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同样，在美国政府内部，与主张重新武装日本的陆军部相比，重视外交关系的国务院采取了更为谨慎的态度。而体现这种进退维谷处境的正是麦克阿瑟。

事实上，麦克阿瑟并没有完全否定重新武装日本的可能。关于陆军部在驻日美军出兵的情况下可以在日本补充兵员的方针，麦克阿瑟在1948年底曾表示赞成。此外，1949年9月苏联宣布拥有原子弹之后，麦克阿瑟也同意在媾和时允许日本组建警察部队。[12]

但与此同时，麦克阿瑟的发言在某种意义上自相矛盾、摇摆不定。虽然麦克阿瑟在1949年3月3日接受采访时发表了“日本所扮演的角色就像太平洋地区的瑞士”这一著名言论，但同时又表示，“在日本建立军队有助于使其协助我们。日军堪称世界上最强级别的步兵”。此外，在朝鲜战争爆发前夜的1950年1月，麦克阿瑟在新年致辞中强调“自卫不可侵犯的权利”，同时又对宪法第九条“崇高的人道理想”赞不绝口。[13]

关于麦克阿瑟从何时开始转向支持日本重新武装，这一点尚不明确。[14] 可能是由于在麦克阿瑟心中同时存在两股力量，即作为虔诚基督教徒主张的绝对和平的理想主义和作为军人政治家所奉行的机会主义，这从上述矛盾的发言中可见一斑。但无论如何，他都是负责日本非武装化政策的占领军最高司令长官，在美国和日本曾多次对宪法第九条大加赞赏。如果考虑到这一事实的话，现在再要求日本政府重新武装，无疑是让自己“扮成一个小丑在日本人面前出尽洋相”。

此外，与美国政府的相持不让也是麦克阿瑟反对日本重新武装的原

因之一。1948年10月，美国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决定提出改变对日政策的建议，并获得了总统的许可。其内容包括早日结束整肃和对战犯的审判、扩充冲绳基地、缩小及限制占领军人员和权限，以及增强包括海岸警备队在内的警察力量（这是陆军部要求重新武装日本遭到国务院拒绝后的一种妥协案）等政策。然而，较常人更加心高气傲的麦克阿瑟却对美国的“干涉”十分气愤，并在给美国的回电中表示，自己作为占领日本的盟军最高司令官，没有义务听命于仅为盟国一员的美国。[15]

对麦克阿瑟而言，对日政策遭到美国政府的否定，使他颜面尽失，无法容忍。因此，对于美国提出的重新武装日本的要求，麦克阿瑟强调无须如此重视远东地区的共产主义威胁。麦克阿瑟不仅在1948年与凯南的会晤中阐述了自己的这一看法，即使到了1949年3月，他也仍然认为：“中共的胜利不足畏惧，美英在太平洋的利益绝对安全。”[16]

在这种情况下，为拥护宪法第九条，麦克阿瑟打出了冲绳这张牌。他在与凯南等人的会晤中强调，“倘若采取适当措施将冲绳作为要塞，我们就能够保护日本的安全免受外敌的威胁，也就没有必要在日本本土设立军队”。[17] 而且，昭和天皇也致信麦克阿瑟，承认长期以来使用冲绳的事实。通过使冲绳军事化来减轻日本的军事负担这一构想，此后在经历了一些迂回曲折之后最终得以部分实现。

打破这种僵局的是1950年6月朝鲜战争的爆发。亲临战争一线的麦克阿瑟目睹了兵败如山倒的韩国军队。于是他指责“华盛顿的那些家伙”轻视了共产主义的威胁，而且只承认韩国轻武装的警察军部（这与他之前违背美国政府意愿、反对日本再武装的主张相比，此时完全呈现出了矛盾的态度），与此同时他决定让驻日美军出兵朝鲜，且让日本重建武装。[18]

这样，到1950年7月，盟军最高司令部要求日本政府成立警察预备队，而且终止对日占领，并一举推进了使日本作为反共盟国而独立的相

关准备工作。

来自美国的压力

对于日本来说，重新武装和媾和问题的进展迫在眉睫。随着冷战的加剧，围绕媾和的讨论虽然相应存在，但是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前的日本，比起媾和，他们更关注经济的发展。

如第七章所述，战败导致日本经济受到严重破坏，1948年日本国民收入不及美国的1/12，通货膨胀陷入恶性循环。1949年约瑟夫·道奇率领美国经济使节团访日，在其指导下日本实行财政紧缩策略，大幅削减公共基础事业、福利事业以及教育事业的预算。虽然通货膨胀得到有效控制，但机械和煤炭产业受到重创，失业和破产接踵而至。与此同时，共产党在1949年的大选中议会席位由4席激增到35席，但是在“赤色整肃”和公安条例制定方面与占领军和政府产生了分歧。

朝鲜战争正好发生在日本经济萧条之际。此时的首相吉田茂在自由党议员的秘密会议上讲道：“真是上天庇佑啊。”因为通过朝鲜战争的“特需”经济景气得以恢复，并可期待促进由美国主导的媾和行动。当时，战时统制管理的电力事业正在重组之中，被称为“日本最大土木建筑发包商”的日本电力公司在拆分时出现了贪污行为。因此，即使为了维持政权，朝鲜战争也成了“天佑”。[19]

朝鲜战争爆发后，“重新武装论”迅速升温。就连曾经大肆宣扬第九条的石桥湛山和天野贞祐都倒向重新武装论。1946年5月统计的宪法第九条的支持率达到70%，但1950年11月的民意调查显示，重新武装论的支持率为53.8%，反对率为27.6%。[20]

但关于重新武装的民意调查并不能单纯说“赞成”或者“反对”，因为在支持重新武装的人中间也有反对恢复战前军队的声音。

因此，根据提问方式的不同，民意调查的数据显示出微妙的变化。例如1951年9月20日《朝日新闻》的调查显示，当被问到"'日本也能通过媾和条约成为独立国家，为了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来保卫祖国，就必须建立军队'，对于这条意见，您赞成吗？"71%的人表示赞成。然而在1951年3月26日《读卖新闻》进行的调查中，对于"你怎样看待在日本重建国防军这件事"这一问题，表示赞成的人不过47.3%。

关于重新武装的方法，调查也反映出细微的差别。在1951年3月26日《读卖新闻》的调查中，支持实行征兵制的人只有10.8%，尤其是正处于征兵年龄的20多岁的人反响更为强烈。支持军队掌控最高指挥权的人占6.5%，而支持天皇管理军队的人只有1.0%。1950年，丸山真男在座谈会上对于"独立国家应该拥有武装"这一意见表示："这样的人恐怕是没有经历过日本军队惨痛教训的人，我认为有过当兵经历的人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同意重新武装的，人们的反感是理所当然的。"[21]

此外，调查也显示出人们对于美国施加重新武装压力的强烈不满。在1953年6月22日《朝日新闻》进行的民意调查中，当被问到"美国为日本提供了更多的武器和金钱，同时也强化了日本的保安队等，你认为这样做合适吗？"肯定的回答只有27%。而对于"美国在日本驻军，向日本提供大炮、战车、军舰等，你认为这是为日本考虑吗"这个问题，肯定的回答只有10%。

总的来说，舆论即使同意重新武装，也极力排斥恢复日本旧式军队和战前体制，对来自美国的压力心怀抵触。此外，一些知识分子在这个问题上也摇摆不定。

比如，在《世界》杂志1952年5月号上，宪法学家宫泽俊义谈道："为了不遗余力地维护祖国的独立与安全而设立军队，这种心情我感同身受。"同时他表示："如果由于建立军队而使民主主义遭到扼杀，那才是真正的一无所有。"他还提到："日本人应该很想弄清楚当初究竟

是谁要求日本制定放弃战争、废除军队的宪法，如今又是谁在要求日本建立军队的。”[22]

当时的首相吉田茂也有同样的犹豫。如第四章所述，吉田茂在战败后不久对内透露，占领统治结束后，“作为一个国家终究是要有军事力量才行”。在1949年11月8日的施政方针演说上，他说道：“保卫我国安全的唯一途径就是要在新宪法中严正声明，我国是一个非武装国家……在爱好和平的世界潮流下……促进国际社会对我国的理解。”[23]

吉田茂的这种态度，可以说表现出其外在和内在的分裂，也可以说是他内心矛盾的体现。吉田茂是一个务实的外交家、政治家，也是一个不屑于追随美国的民族主义者。他曾作为一个亲英美派受到军部的攻击，因此他对恢复旧式军队心存警惕。

无论如何，在朝鲜战争爆发前，麦克阿瑟也曾拥护宪法第九条，他也有可能抵抗得住美国对日本重新武装的压力。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前夕，美国国务卿顾问杜勒斯作为特使访问日本。据当时在座的西博尔特大使的记录，与杜勒斯会晤的吉田茂边“吃吃地笑”边说道：“我们日本现在是一个民主国家，我们主张非武装化，爱好世界和平。希望在世界各国的信任下实现安全保障。”当时想用这番话来敷衍杜勒斯。[24]

杜勒斯对此非常吃惊。西博尔特对杜勒斯说：“吉田茂所谓的安全保障那些漂亮话只是远东委员会决定政策时用的说辞，我早就见识过。”[25] 说起吉田茂，他曾在1946年与同盟国和美国公开唱反调，并在1950年与美国进行对抗。

在朝鲜战争爆发后的1951年1月，杜勒斯二度访日，特来催促日本重新武装。此次吉田茂则提出“重新武装面临两大难题”。其一，日本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进行大规模重新武装。其二则是重新武装可能会导致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26]

杜勒斯对此不以为然，他向吉田茂强调“美国公民在朝鲜战争中所付出的牺牲”，同时提到为了与共产主义斗争，“任何国家的公民都必须做出牺牲”。他还质问吉田茂提出的两大难题“究竟是日本想撒手不管的借口，还是日本确实存在需要克服的难题”。

其实，杜勒斯是一个对日本没有好感的人。他在1950年6月访日时，在一场鸡尾酒会上提出，如果日本的经济萧条进一步加剧的话，可以选择对美出口餐巾纸，这引起了日方的不满。之后担任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国务卿时，又对日本领导人说“你们不要对我们美国市场抱有太大期许，你们根本做不出我们想要的东西”。[27]

吉田茂这样驳斥杜勒斯：“因为重新武装会导致日本经济更加萧条，也会促使共产主义进一步蔓延。”另一方面，吉田茂暗中委托社会党左派领导人铃木茂三郎和胜间田清一发起民众的反对再军备运动，[28] 并以民众反对呼声太大为由逼迫杜勒斯做出让步。

虽然吉田茂最终接受美方要求，允诺进行一定程度的再军备，但为了表明自己的想法，他做了如下发言：

> 现阶段是不可能实行所谓的再军备的，加之现在国民对此毫无兴趣，政府不会强人所难。如果国民生活水平得以恢复的话，那一天就会自然到来吧。虽说有点投机取巧，但那之前，就让美国负责“日本的防务”吧。宪法规定禁止拥有军备，这是拜天所赐，倘若美国方面还有异议，就正好把宪法搬出来作为理由吧。那些企图修宪的政治家真是太愚蠢了。[29]

反过来利用美国1946年的说辞在1951年对抗美国，这种态度可以说正好反映了这一宪法观。对杜勒斯来说，1951年2月与天皇的会见无疑是一大收获。天皇不仅支持美国提出的媾和条约，还向杜勒斯引荐了鸠山一郎等被褫夺公职的政治家。鸠山是一个能与吉田抗衡的人，在保守政界很有实力。之前，天皇在1947年5月6日与麦克阿瑟的会晤中就提到，“为了谋划日本的安全保障，作为盎格鲁撒克逊人代表的美国要掌

握主导权，因此一直期待着元帅的帮助”。此外，天皇在1950年8月送交杜勒斯的文件中提到，如果通过缓和褫夺公职让那些“有才能”的人能有所作为，“最近围绕基地问题的一些错误言论，也就可以由日方”来进行修正。[30]

与杜勒斯会谈后的鸠山对再军备表现出积极的态度。但此时的问题是，由美国主导的再军备，缺少了精神上的主心骨。

鸠山在1951年2月6日提交给杜勒斯的书信中，提出了再军备反对论产生的三大原因。其中有两个也是吉田提到过的“经费”问题和对“军阀死灰复燃”的警惕，另一个是“对因为美国的主导而成为雇佣兵的恐惧”。鸠山认为，警察预备队“不论在队内还是队外，都被赋予了雇佣兵的感觉”，“再这样下去的话，心理问题会不断浮现”。[31]

警察预备队不久就更名为保安队，1954年又改为自卫队，武器和装备都是由美军提供的，并在美军军事顾问团的指导下进行训练。1953年6月20日的《朝日新闻》这样描述国民对保安队的态度：“每当看到自己同胞手持美式装备的身影，复杂的表情就会随之而来。”队员外出，经常被大家称为“税金的盗贼”、“美国的走狗”等。[32]

如鸠山所述，警察预备队的士气并不高。在1950年8月的第一次招募中，本来只打算招募7.5万人，却有至少30万人来应聘，而其中大多数是冲着优厚的薪资待遇，以及在当时看来算巨款的6万退休金。依据当时的报道和后来的记载，队员们都谈论着“最后我们拿着6万退休金回家也不错”、“胜过当童子军”之类。[33]

警察预备队士气低下，是美国在中国和南越的所作所为造成的，是所有反共阵营的军队都存在的现象。况且在日本，在禁止军队和战争的宪法下，谁都不能明确表示警察预备队存在的目的是什么。1951年9月23日《读卖新闻》报道：“无论如何，没有精神目标才是预备队最大的

缺陷。”1953年6月20日《朝日新闻》也报道了来自保安队军官的“没有精神支柱的队员，即使装备精良也是不行的”的声音。[34]

在这一过程中，自由党政务调查会在1951年3月的政策方针中指出，“回顾中国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队输给共产党军队这一事实，不得不说自卫的根本是对灵魂的重新武装”。而且自由党议员总会在1951年10月完成了“与缔结和约相伴的新政策”，并且提倡“逐步加强自卫能力”，“提高爱国热情和自卫意识”。[35]

如第九章所述，这些方针产生的联动效应，推动了《国民实践要领》的制定和《君之代》、“日之丸”的复活。但人们的爱国热情并没有真正得到提高，甚至有新闻报道指出那些在街头摊贩销售的带有政府奖励的“太阳旗”都卖不动。[36]

1952年4月，《旧金山和约》生效，日本成为形式上的独立国家。但和约的内容完全没有提到满足其“爱国心”之事。与和约同时签订的《日美安保条约》，承认美军结束对日本占领后美军基地的继续存在，只是将占领军改名为“驻留军”，美军继续驻扎日本。

但此时的《日美安保条约》只规定日本为美军提供军事基地，而美军却没有保卫日本的义务。根据安保条约的前言，日本方面有义务逐步提升防卫力量，但1952年7月23日美方与吉田首相达成密约，规定在“有事”之际日本的军事力量置于美军指挥之下。[37]

1952年2月的“行政协定”规定了美军驻扎的相关细节。其内容大体为：美军对基地的使用没有期限和限制、承认美军及其家属享有治外法权、日本分担驻扎所需费用。如第七章和第八章所述，《日美安保条约》被比作幕府末期的不平等条约。

对于《旧金山和约》，除了苏联、东欧各国外，对美军驻扎日本表

示不满的印度和缅甸也未在条约上签字。埃及代表从本国被殖民的经验出发，在演讲中称："我认为只要外国军队驻扎在日本，日本就不能完全获得自由。"实际上，1949年11月26日麦克阿瑟与天皇会见时说道："英美军队的驻扎对媾和后的日本是有必要的。这与美军驻扎在独立后的菲律宾、希腊，英军驻扎在埃及性质是一样的。"内战中的朝鲜和共产党执政的中国没有被邀请参加媾和会议。中国外交部长周恩来发表声明指出，和约"是非法的、无效的"。[38]

如前所述，日本共产党将这种媾和与再武装化批判为"殖民地状态"。除共产党以外也有其他舆论，如曾任近卫内阁法务大臣的风见章说："为了谁而再军备？昔日满洲国的满洲军不历历在目？"1951年底担任东京大学校长的矢内原忠雄也指出："军事协定使媾和后的日本对美国而言就像'满洲国般的存在'。"[39]

舆论还指出日本的独立只是徒有其表。1952年5月17日《朝日新闻》的民意调查显示，对于"你认为日本是否由于实现媾和而成为一个独立国家"这一问题，肯定的回答不超过41%。1953年6月22日《朝日新闻》的民意调查显示，"希望美军驻扎"的只有27%，"希望美军撤走"的达47%，而"没有意见"的占26%。

美军在加强军备的同时，迫使日本政府培养"爱国心"，这让事态变得更为复杂。如第九章所述，1953年10月双方在日美会谈上达成协议，"日本政府通过教育及宣传，营造氛围，培养日本人的爱国心和自发性的自卫精神"。[40]

这次日美会谈，美国以援助日本经济发展为条件，要求日本组建32.5万人规模的陆军。吉田首相特使池田勇人作为此次的谈判者，以经济负担及宪法第九条的制约为由最终定为18万人。根据与美国的协议，1954年，保安队扩充为自卫队。这时参与日美谈判的池田提出的"日本就像美国的小妾"这一言论广为人知。

来自美国的压力使日本围绕“爱国心”的现状变得非常混乱。如第九章所述，进步的教育学家、日本教职员工会一方面反对保守政权倡导复活国旗和国歌的论调，另一方面也批判保守政权为了迎合美国国际战略而提出的“爱国心”。

甚至在自卫队内部也有不少人对美国十分反感。1955年，原学生兵安田武对陆上自卫队通信学校的少年进行了一次采访，询问他们“你们有没有什么话对国民和首相说”。得到的是这样的回答：“不要叫我们偷税者”；“反对（美军）基地的存在”；“对，美国佬快给我滚”。[41]

当时尤其令自卫队队员反感的是，自己将因为美国的国际战略而被派往海外。1953年10—11月日美谈判时美方指出，国务院明确表示我们绝没有将日本军队派往海外的念头（驻美大使新木发给外务大臣冈崎的电报）。[42] 但事实上，在朝鲜战争中日本不得不接受美国的要求，暗中出动扫雷舰予以援助。

因此，这对自卫队队员来说是个迫切的问题。在朝鲜战争还在持续的1953年5月，当时的保安队队员在接受采访被问及海外派兵时答道：“我们要表示拒绝，我们有拒绝的权利”；“在那时要停止海外派兵。我们不能因他国的内乱而让自己流血牺牲”。[43] 其中一名队员说道：

> 外国军队登陆入侵时，就不仅只是保安人员的问题了，而是妻儿等广大普通老百姓的共同灾难，我们应举全国之力奋战到底。如此一来，我们就不能只想着自己的生命多么宝贵。但是，派兵海外却是白白送死……无论如何，普通老百姓还是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而只有我们面临绝境……那样一来，与其说妻子儿女可怜，不如说是心怀内疚。

普通国民也非常反对海外派兵。1950年11月15日《朝日新闻》的舆论调查显示，即便是赞同重新武装的人中，也有高达73.9%的人认为海外派兵应只限于防卫日本。

在1952年12月18日的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上，右派社会党议员山下义信向吉田首相提问：

> 日本即使变成现在这样的状况，我也从未想过要改变日本国民的爱国精神。如今国民反对重新武装……讨厌做美国的看门狗；其二，美国想夺取我们的军备，然后找个时机要求我们再军备……这是一味把我们日本人当傻瓜，这着实让人难以释怀；其三……我们讨厌前往朝鲜。尤其是最近美国众议院的多数议员以及带头的马丁议员，我去年也都见过他们，他们要求日本派兵朝鲜的议题激起了国民的愤怒……我想国民中都会有以上种种情绪。[44]

吉田首相对此予以辩驳：“我并不认为美国有那么赤裸裸的目的性想把日本作为他们的政策工具来利用。”他还提到，“美方千方百计向我们提出军备的要求，我们一概不听”。[45] 然而，希望美国在重新武装上做出让步，与美国协商的吉田首相应当非常清楚这是事与愿违的。

相反，被褫夺公职的原陆海军的将领则希望重新武装。以太平洋战争中陆军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服部卓四郎大佐为中心的集团，和盟军最高司令部情报部的威尔比将军一起，在朝鲜战争爆发前就已开始着手在旧军将领中物色人选来主导重新武装。以服部大佐为主的参谋本部作战课，是原陆军中的精英群体，他们希望能够东山再起。

另外，海军方面以原联合舰队参谋长福留繁元中将为中心，也开展了同样的行动。该集团计划于1951年1月与杜勒斯进行会面，然后提出《重新武装意见书》。他们起草的文件中，将美国远东副参谋长少将誉为“重建日本海军的恩人”。[46]

然而，这些原军人的行为甚至引起了他们内部的极度反感。1950年春，卸甲归田的原大本营参谋收到加入服部集团的邀请信。那时，该参谋的父亲、原陆军中将对他说道：“你还是拒绝吧，经历过一次大失败的这些家伙又想搞什么花样。服部在诺门坎也是一败涂地，可他们却总

是好了伤疤忘了痛”，“正是他们那些负责指导战争的人导致了战败。现如今这些人不负责任地又想干吗”。[47]

吉田首相很明显也怀有这种情绪。1951年2月6日，吉田首相在与麦克阿瑟会面时提到，就算进行重新武装，也要把我们的民主军队培育成顶尖的军队，他还强调“不想起用像威尔比将军麾下的原日本军人”。[48]

这样就体现了吉田的想法，1950年8月警察预备队成立时，就声明要尽量排除旧军队的将领。但是在之后警察预备队急剧扩张中，军官明显不足。1950年11月开始解除对旧军人的整肃政策，到次年8月已有800名原日军将领加入了警察预备队。

尽管如此，在旧军人中也有拒绝入队邀请之人。之所以这样，皆源于对战死者的记忆。一位生还的特攻队飞行员在航空自卫队向他发出邀请时说道：“想到为国家献出了年轻生命的特攻队员们，再想到唯我独存，还要过着安稳的生活，这我做不到。”从而拒绝了邀请。一位退役后务农的下级军官说道：“我可爱的部下大部分都被美军杀了，现如今你要我和美国做朋友，这可能吗？”[49]

这些情感与对日本政府提倡“爱国心”的反感连在一起。在菲律宾战场当过战俘的作家大冈升平回忆道：“1957年，沦为自卫队干部的原职业军人站在神圣的国旗下，看到身着美军军服的阅兵仪式时，心里很不是滋味。想着自己怎么会不知羞耻到这般地步。”他还主张，“只要有外国军队驻扎日本，就绝对不能升国旗”。[50]

显然，重新武装问题与修改宪法有着直接的联系。政府将自1947年新宪法实施以来每年举行的宪法纪念日的典礼与1952年期待和约生效的独立典礼合并举行，但次年又废除了这一活动。此后保守党执政期间，“批判美式宪法”、“制定自主宪法”的呼声越发高涨。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修改宪法正中美国下怀。在日本政府废除了宪法庆典的1952年5月，美国海军部长金博尔在对日本政府提出的要求中指出，“为了保护太平洋地区自由主义各国人民的安全，应该修改宪法，允许日本拥有陆海军”。[51] 1953年11月美国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访日，催促日本重新武装，同时在日美协会举办的午餐会上指出宪法第九条是错误的。[52]

“自主宪法”的制定，只会加深日本对美国的从属，日本保守派民族主义者面临进退维谷的境地。就连热爱自卫队的作家三岛由纪夫也认为，“即便推进‘修宪’的步伐，最终只会掉入美国的陷阱中”，“很明显，最终的结果就是会与韩国及其他亚洲反共国家站在同一阵营”。[53]

日本右翼也面临同样的局面。社会学家见田宗介将“爱国党”党首赤尾敏街头演说记载如下：

> （突然演说声音变小了）说实话，即便是我，也非常讨厌美国……（再次响起洪亮的声音）假若没有美国，又会是什么样呢？日本将会是苏联和中共的了吧……[54]

如第七章所述，在1950年代前期，一般国民对中国和印度等从殖民地状态走向独立的亚洲各国的民族主义颇为关注。即便在上述日本混乱的民族主义背景下也有人关心。1956年起在印度勒克瑙大学工作了两年半的经济学家深泽宏描述当时印度学生支持尼赫鲁总理不结盟外交的场景称：

> 总的来说，大部分（学生）对印度的和平中立外交表示支持、赞美、自豪。倒不如说这是理所当然的。作为冷战的调停者，若是拥有国际社会所尊敬、器重的祖国和总理，国民没有不高兴的吧。在这一点上，日本可能就太过凄惨了。至少和我关系不错的大多数学生对日本的境遇感慨万千，同时也深表同情，他们认为日本在国际社会的立场太过于悲惨了。[55]

重新武装反对论并不是由单纯的和平愿望诱发的。归根到底，是对

美国扭曲战后日本民族认同的抵抗，也是对想要通过依附美国恢复旧势力的反抗。毋庸置疑，护宪论和非武装中立论就是以这种心情为基础发展形成的。

作为民族主义的非武装中立

1952年4月，借和约生效之机，《世界》杂志制作了一期拥护“和平宪法”的特辑。在卷首语中，主编吉野源三郎表达了制作这期特辑的目的：

> 依据各人的想法，仅认可能够理解的，对无法理解的，像男子汉一样去抗争的这种气概，不仅是民主主义的基本精神，尤其对在大国的夹缝中求生存、作为弱小国的我们而言，确实是有必要的。即使是大国也要尊重规律，坚持合理的主张，这样才使我们不论身处何地都能保持自身的独立。丧失了这种气魄，怎能从战败的挫折中站起来呢。我们的祖先在幕府末期、明治维新的国难之际，正是凭借这种强大气魄同大国交涉，才使我们民族始终保持独立。[56]

宪法第九条是一种象征，象征着由于战败而变为“弱小国”的日本在对抗美国时所体现的民族独立。

此外，这里所谓的“大国”不仅仅指美国，也有对另一大国——苏联的对抗意识。为充分理解这一点，我们有必要了解当时共产党对和平问题的态度。

社会党及共产党都反对保守政权推进重新武装。但如第四章所述，共产党原本就反对宪法中的非武装中立主义。理由是未伴随资本主义改革的和平标语毫无意义，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斗争中不存在“中立”。

因此当时的共产党对有益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军备持赞成态度。据石田雄回忆，德田球一在1949年劳动节发表演讲，他“在大庭广众面前高

声说道，‘苏联现在已拥有原子弹了’，博得了全场的掌声”。[57]

据清水几太郎回忆，战后初期，“马列主义者明显对和平问题冷淡了”。[58] 和平问题说到底是变革资本主义体制的课题的一部分。虽然仅抛开和平问题来进行论述毫无意义，但这是当时共产党一派的风潮。

如第五章所述，吉野源三郎从1948年开始就组织和平问题谈话会（当时是和平问题讨论会），在距共产党一步之遥的地方开始了和平运动。1948年7月，八位欧洲社会科学家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名义发表了和平声明。在这一声明的刺激下，吉野为了让日本社会科学家集体发表和平声明，组织了和平问题谈话会。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声明上，隶属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匈牙利学者也署了名，此举超越了东西冷战的对抗，因而备受瞩目。[59]

然而，共产党系言论家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十分冷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其宪章的序言中称“战争起源于人之思想”。但在《世界》杂志1948年2月号的“唯物史观及主体性”座谈会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松村一人批判它为“唯心论的看法”。[60] 他认为战争是由资本主义矛盾引起的，不考虑社会经济结构却对精神和人性说三道四，这毫无意义。

如第二章及第六章所述，在当时，“主体性”与“人性”这类词是对既有马克思主义语言体系中难以言明且从战争经验中衍生而来的心情的一种表达。参加了“唯物史观及主体性”座谈会的丸山真男说道：“虽然在主体、社会艺术方面，我被谬赞，但我自知在积极形成主体性哲学方面还差得远，所以只能指出马克思主义学者迄今为止的说明中那些难以理解的地方。”[61]

同时参加此次座谈会的吉野，在约半年后的1948年9月[62]，才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社会科学家发表的声明。此项声明重视“人性”，把社会科学定性为“人学”。吉野不能完全容纳已有的“社会主义阵营”和“自

由主义阵营”的二项对立的图式，但通过“人性”感受到了人们对和平的向往。可以说，在表达源自战争经历的情感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声明成了刺激媒介。这个声明的刺激作用，就好比是对于大塚久雄而言的韦伯以及对丸山真男而言的近代国民国家理念。[63]

如此一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声明的启发下，和平问题谈话会成立了。像大塚和丸山借助西方思想来宣传民族主义那样，和平问题谈话会也效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声明来宣传民族主义。参加谈话会的久野收晚年回忆道：“日本知识分子在战争与和平这一世界重大问题上采取怎样的态度，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拒绝后又该怎样应对，这才是我们需要探讨的主题。”[64]

和平问题谈话会成员包括安倍能成、和辻哲郎、田中耕太郎等老一辈自由主义者，丸山真男和清水几太郎等非共产党进步派，以及羽仁五郎等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要在各领域吸收成员，该组织负责人吉野解释道，战前日本社会运动有过被各个击破的前车之鉴，因此人们对当时共产党的“主要打击社会民主主义论”心存怀疑，立志要成立一个人民战线的组织。[65]

但最大的理由是吉野和丸山的战争经历。此外，不少共产党知识分子为了入党，隐藏了自己协助战争的经历，亦是原因之一。

吉野十分讨厌平野义大郎，此人当时是日本共产党和平运动的代表性知识分子。在媾和问题上，平野还担任了1951年1月15日由共产党各团体组成的“全面媾和爱国运动协议会”（简称“全爱协”）的议长。[66]

实际上，直到1930年代中期，平野一直作为讲座派的言论家活跃于政坛，之后摇身一变成为不遗余力撰写文章赞美战争的人。不仅如此，平野还通过吉野建议岩波书店策划出版“纳粹国家体系”方面的书籍。在当时战争的背景下，吉野拒绝这一建议关乎岩波书店的存亡和他自身的

生死。再三思量后，吉野最终以物资设备不齐、纸张缺乏等为由拒绝了，却对平野说“其实我也非常想这么做啊”。[67]

正因为如此，丸山真男在回忆录中提到，“在和平问题谈话会的合适人选上，我也觉得比起某些马克思主义者，一些保守派至少还是值得信任的。这已经成为共识”。不管是吉野还是丸山，都对马克思主义本身持正面评价。但是对丸山而言，“这个时代所关注的不是战争结束后你的立场是什么，而是在战争过程中你做了什么”。[68]

安倍能成和津田左右吉这些老一辈自由主义者能够入选，也是出于这样的理由。与此同时，这类事情把对于“人”这一词的使用和对于被共产主义者所轻视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声明的感同身受联系在一起。

当然，田中耕太郎、和辻哲郎、安倍能成等人虽然在战争期间对军部有过一定的“抵抗”，但骨子里都是保守的反共产主义者。据吉野回忆，那还是清共的鼎盛期——1950年1月谈话会刚刚声明主张全面媾和，就受到占领军和日本警视厅的盘问。[69] 那时还对政治团体进行了是否符合团体规定的大审查，而当时对全面媾和问题的处理只是一个小插曲。如第五章所述，当时参会的田中耕太郎和津田左右吉等老一辈自由主义者并没有参与此声明。

另外，即使在战争责任问题上也有分歧。丸山非常后悔当时没有抵抗战争。吉野也说道：“死了这么多青年，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据吉野的回忆录，安倍能成等人表示“这和我们的立场也不一样”。[70] 如果谈话会的成员选一些协战意图较弱又不积极配合战争的人，要判定他们有无战争责任，这会因人而异。

为此，在1948年12月的讨论会上，羽仁五郎问及“我们日本学者”的战争责任时，安倍能成对此表示反对。[71] 而最后，声明书上写道：“我们日本科学家”在防止战争问题上“缺乏勇气和努力”，应对此进行反

省。[72] 可安倍还是很难从心底对这样的措辞予以认同。但反过来看，因为汇聚了一批战争期间协助战争污点较少的成员，可以说就能够对抗那些曾在狱中坚贞不屈的权威的共产党，保住他们“中立”的立场。

在这层意义上的非武装中立论，不仅针对美国，也针对苏联的“自主独立”主张。和平问题谈话会在1949年1月发表最早的《科学家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声明》后，于1950年1月发表了《关于媾和问题的和平问题谈话会声明》，又于同年9月发表了《三谈关于和平》，极力主张全面媾和、拥护宪法、中立等，引起了广泛关注。1950年9月《三谈关于和平》的前半部分内容是由丸山真男执笔完成的，他阐述如下：

> 针对这种“中立”的主张……如果认为国际共产主义被骂成对赤裸裸的侵略态度视而不见或者是暗中对其进行辩护，那么另一方面，共产主义阵营中也会有被批判成中立主义具有将大众视线从日本现行的军事基地化和殖民地化移开的作用。事实证明，这种自相矛盾的批判最能体现现行中立论中所谓日本真正自主独立的立场。[73]

这些声明皆刊发在吉野担任主编的《世界》杂志上。当时《世界》最受年轻人的喜爱。在1952年4月《图书新闻》的读者舆论调查中，《世界》高居大学生、高中生最喜爱杂志的榜首，遥遥领先于《文艺春秋》、《平凡》、《萤雪时代》。谈话会成员清水几太郎晚年对此评论道：“《世界》雄居榜首，我感到些许惊讶，但那时的《世界》有融贯日本人淳朴爱国心的东西。”[74]

即使有和平问题谈话会的声明，事态也并无不同。据吉野源三郎的回忆，他们参考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声明，几乎受到国际社会的无视。尽管如此，和平问题谈话会声明中却表明“我们不能那样消极对待，毋宁说社会党议员也好，大工会领导人也罢，都热忱地在阅读它”。[75]

社会党在第七次党代会上通过了“全面媾和、中立、反对军事基

地”三项和平原则。日本工会总评议会在1950年3月大会上，新增“反对重新武装”一项，通过了和平四项原则。但是，社会党自战败后一直遭到共产党的批判，因而对共产党采取敌视态度。为此，在共产党主导的“全爱协”之外，社会党、日本工会总评议会于1950年7月28日成立了“推进日本和平国民会议”。[76]

但是与战前的非共产党无产运动势力一结合，社会党就成了大杂烩，党内左右派之间激烈斗争，思想上很难统一。1951年1月，左派铃木茂三郎就任委员长，坚持和平四项原则的路线，而右派要求片面媾和与重新武装的呼声也不绝于耳。

社会党需要一种精神上的支柱，那就是在与共产党保持距离的同时，能够主张全面媾和与护宪，并且不激化党内左右两派分裂。当时贯穿“朴素的爱国心”的和平问题谈话会的声明，恰好符合这样一种需要。

经历了战争和战败的人们，对以马克思主义为首的既有语言体系抱着难以名状的心情。如丸山真男在《超国家主义的逻辑和心理》中所述，和平问题谈话会的声明为表现这种心情提供了一个平台。对共产党有着违和感的社会党议员和工会成员，一边批判保守党的重新武装论，一边还要在谈话会的声明中找到“理论的”基础——更确切地说是要找到能巧妙地表达他们心情的“词语”。

当然，社会党上下都怀有“朴素的爱国心”。1951年1月就任社会党委员长的左派政治家铃木茂三郎在其著名的“青年不要再扛枪”演说中说道：“全面媾和与反对重新武装对我们日本民族来说是确保民族独立的唯一道路。”1950年9月，以隶属右派的书记长浅沼稻次郎名义发表的党内指令也在对共产党进行批判的同时，提出“要拥护宪法和支持联合国”，以及“确保日本民族的独立和世界和平”。[77]

如第六章所述，1948年1月在和平问题讨论会总会上，丸山真男说

道："真正的民族主义只有尊重各民族文化个性才能实现。"丸山晚年回忆自己当初倡导这一主张，是因为有过对"美式生活就等同于国际主义"想法的批判。[78] 战败之初，日本普遍存在对"美式生活方式"的自卑感。讨厌屈从权势的"贱民根性"的丸山，用"民族文化的个性"这一言辞，对此进行了批判。

根据丸山的回忆，他在讨论会上批判了田中耕太郎向伪满输出日本文化一事。结果，1949年1月的东京法制部会议报告中加入了"谨防九一八事变以后以振兴国际文化为幌子的文化帝国主义"。[79] 如第八章和第九章所述，日本反省实施同化政策的目的是抵制美国来保护日本自己的"民族文化"。如前所述，有很多声音表示媾和条约框架下日本的地位无异于当年的"满洲国"。

当然，可以说日本"独立自主"的主张，与美国所赋予的日本宪法是矛盾的。然而反过来说，日本反其道而行之来利用宪法，恰恰对美国形成了最大的抵抗力。清水几太郎认为"很明显，宪法是美国强加于日本的"，[80] 他进而强调：

> ……（美国）从朝鲜战争开始，也就是说，自考虑利用日本人在亚洲进行作战开始，经常视日本宪法为障碍，试图设法删去宪法中的相关内容。美国方面要求日本重新武装，而日本的统治者又担心日本民众通过宪法获得新生，在这种情况下内外相互勾结起来。因此，学习、实践和拥护宪法，不仅在国家独立意义上蕴含着国民的主体性，而且在从美国那里获得独立，尤其是在对抗美国的层面来讲，也蕴含着国民的主体性。……
>
> ……然而，并不是单纯反对美国，而是我们要掌握审视美国行动的尺度。美国也许是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在和这个强大的国家对抗时，我们通过学习宪法、实践宪法、拥护宪法，日本就能真正获得独立吧，同时也会获得对外的主体性吧。

在这里，日本和美国等国的"国家独立"的心情，透过"国民主体性"一词可窥见一斑。而且"掌握审视美国行动的尺度"的逻辑，在和平

问题谈话会中早已存在。在1948年12月的讨论会上，议长安倍能成提出“东京审判是以和平与文明的名义对日本国民进行审判的”，“同盟国既然是以和平与文明的名义审判了我们，就必须有向我们保证和平与文明的义务”。[81] 安倍的这一主张被加入1949年1月的声明中。[82]

这种情况在世界各地广泛存在，那就是在“文明”的名义下，拥有被欧美殖民经历的各地区的居民，在被西方国家强迫的“文明”下，批判西方国家对殖民地的不正当支配。在因战败而成为“弱小国家”的日本，这种类似的现象，以拥护宪法的形式表现出来。

吉野源三郎回忆起当时说道：“在东京审判上，曾对日本国民进行裁决的国家，又企图再次发动战争，并且想将日本卷入其中，这引起了大家广泛的不满。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和平的要求，既是对日本旧秩序的批判，也是对当前东西对立的抗议。”[83] 非武装中立论和护宪论，在表现针对美苏两大国的“独立自主”意志的同时，也是对追随美国、企图复活“日本旧秩序”的批判。

相反，战后初期饱受批判的宪法，从1950年左右开始作为表现“国民主体性”的媒介而再次引发争议，这是美国政府与日本政府无视宪法造成的。竹内好曾在1952年5月这样评价宪法：“战后初期，由于日本宪法是外国对日改造的产物，对此我一直心存芥蒂”，但“当政者无视宪法的行为激起了我拥护宪法的意愿”。[84]

但是起初，吉田首相一直推行一个战略，那就是推翻1946年美国和盟国的主张，以及在1950年与美国进行对抗。可以说，和平问题谈话会是将包括吉田在内的同时代人所共同拥有的“朴素的爱国心”以及“自主独立”的取向，超越吉田和日本政府表现出来了。

对亚洲的关注

知识分子对美国的不信任也与将日本的安全保障交付给美国而产生的不安密切相关。排除与社会主义阵营媾和的可能性，为美军提供军事基地，这就意味着有引发日本遭受攻击的危险。因为1951年的《日美安保条约》中并没有规定美国有保护日本的义务，而美国仅仅数年就改变了日本的非武装政策，将日本的命运置于美国的国际战略中，这对日本来说是十分危险的。

据清水几太郎的回忆，即使在和平问题谈话会中，老一辈自由主义者安倍能成、和辻哲郎等人对全面媾和也持怀疑态度，并且对苏联和中国十分厌恶。但对于媾和之后是否保留美军基地的问题，全场一致强烈主张保留。清水说，“美国根据本国的情况有可能会撤军，但他们撤军后日本四岛就处于苏联的虎视眈眈之下”，这令人恐惧。[85]

而美国直到五年前还是日本的敌国，作为通过空袭和投掷原子弹造成大量非战斗人员死亡的国家而存在于国民的记忆中。1951年6月，在社会党外交委员会上围绕媾和问题进行讨论时，左派的胜间田清一就战前的经济封锁谈道：“美国人说，‘我们将从限制生产钢铁的原料以及限制棉花开始，对日本进行一定程度的经济封锁’。”他还主张，“如果以日本重新武装作为安全保障的形式，那么站在对等的立场上来看，就会使日本的军队让路而优先外国的部队驻兵，这其实也就成了变相的再武装化”。[86]

对美国不信任的另一方面，是全面媾和论者把目光投向亚洲。在1951年9月举行媾和会议的同时，《世界》杂志做了一期关于媾和问题的特辑，其中很多论者指出中国并没有被邀请参加由美国主导的媾和会议。

例如，在这个特辑中竹内好说道：“如果日本国民承认这一媾和的话，那么日本与中国的关系恐将陷入不可收拾的局面。”作家野上弥生也评价道：“与日本产生摩擦最久的就是中国了。因此，对于修复日中

关系来说，明明中国才是最应该坐下来好好谈谈的。可是，连最重要的主客都不邀请却直接进行和谈，这难道不是比耍流氓更恶劣的做法吗？”[87] 丸山真男由于战时和战后的过度劳累患上肺结核，于1951年2月入院治疗，但仍在寄给这期特辑的文章《来自病床上的感想》中写道：

> ……这次媾和，毋庸置疑是把中国和苏联作为一个明确的假想敌而向美国一边倒的媾和。将长期面对日本投放最大兵力、遭受重大人员和财产损失的中国排除在外，并且又将其作为假想敌的这种媾和，到底是不是名副其实的媾和呢？……试想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在亚洲各国中成为唯一免受欧洲帝国主义侵略的国家，从而避免沦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悲惨命运。日本作为亚洲最早的近代国家而英勇崛起时，成为亚洲各民族的希望而备受尊敬。……但此后不久，日本却追随欧洲帝国主义，与“列强”为伍，并最终向排斥帝国主义的亚洲大陆大肆侵略。然而颇为讽刺的是，那时在日本帝国主义面前坚守且摧毁了其侵略企图最根本力量的，恰恰是当初受日本崛起鼓舞而在中国开展民族运动的力量。也就是说，造成日本悲剧的原因，在日本从亚洲的希望急速转变成亚洲的背叛者的过程中就已经形成了。由于战败，退回到明治初年起点的日本，作为亚洲的背叛者能东山再起吗？我不禁想从这个方向进行一下预测。[88]

同时令人不安的是，与中国断绝关系会给日本的贸易带来打击，这样在经济上日本只能依赖美国。战前的对华贸易在日本的国际贸易总额中占了六成以上。1950年4月，参议院也通过了日中贸易促进决议。然而在朝鲜战争爆发后的1950年10月，美国决定对中国进行全面禁运，处于美国占领下的日本也不得不遵守这一决定。此外，美国于1952年9月与日本签订了秘密协定，规定日本有义务在巴黎统筹委员会（简称“巴统”，是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禁运和贸易限制的国际组织）禁止出口清单之外再添加400种禁止出口的商品。[89] 日本在国际贸易上也成了美国的附庸。

因此，1950年1月的和平问题谈话会声明中也强调，片面媾和使日中关系断绝，“使日本经济成为特定国家的依附和隶属”，造成了“国民

生活水平的低下”。[90] 在《世界》杂志1951年10月的媾和问题特辑中，许多人赞成“没有与中国自由的交往，就无法维持文化上、经济上的独立”。[91] 在这期特辑中，身为和平问题谈话会成员的医生松田道雄这样说道：

> 这次媾和并不是使“吵架”双方重归于好，而应该是加害方的单方面道歉。我们必须表现出加害方不会再次伤害对方的诚意。大东亚战争使东亚诸民族成为最大的受害者，因此不对这些受害者进行道歉，偏居于东亚一隅的我国与周边各国的关系就不能顺利发展。与邻国关系不稳，就会给未来的生活带来障碍。生活一旦陷入困境，那些意欲行使权力、蛮横的政治家就会诓骗国民……那些阴谋很容易付诸实施。……
>
> ……只要能满足自己的利益就可以对无冤无仇的周边民族实施暴力，这种卑劣的想法是错误的。承认这一错误才是媾和的前提。“不会再发动战争”甚至已经写入宪法，如果以媾和为契机废除宪法组建军队，那么我们的国民就会失去作为人的意义，周边各国也不会安定。
>
> 这种事连小学五年级的孩子都明白，请让他们读读看吧。[92]

同时，当时护宪论的根本是对战后日本国家道德的防卫意识。如第四章所述，战败之后不久，文部省就发行了《新宪法的故事》、《民主主义》等教材，告诉孩子们“宪法是新的国家理念”。然而，这项方针在1953年左右被废止。但宪法作为崇高理念被教给儿童，又在短短几年后成为批判的对象，这种行为当然会带来人们对政治和教育信任度的下降。

重视这一点的是东京大学校长南原繁。他在1946年说道：“无论如何，如果是日本政府制定，又已在帝国议会通过的话，其责任就是日本应该承担的，我们无论如何也要确立日本的宪法。”反对轻易修宪的南原在1950年仍然反对修宪，主张全面媾和。在1951年3月东大毕业典礼的演讲中，关于保守政权的爱国心培养论和修宪论，他说：

> 令我们最为担忧的是，其对青年一代带来的道德上、知识上的动摇和

> 崩溃。我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要特别强调这件事。……彻底的非武装和平主义的指导和政策未经三四年就被抛弃，并且再次拿起武器，还将之与（爱国的）道德责任相结合，对于这种说辞，他们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吧。……
>
> 战后日本国民也一度被教导何为善事，现在又要在极短的时间内忘却这一点。如此一来，必定会很不幸地给国内外造成一种“机会主义”的印象，并遭到谴责。此外，从日本和世界真正的安全保障的观点看来，这一行为终将会是一种巨大的损害。[93]

南原认为，“真正的安全保障”只有在日本得到国际社会的信任和日本大多数民众团结一致的情况下才能得以真正实现。国民如若不能团结一致，无论装备何种武器，也无法实现真正的安全保障。他还说，日本随意修宪的行为实在是“自毁我们的国家名誉和世人皆知的誓言”，也是在破坏国民的凝聚力和国际信誉。[94]

如前所述，吉田首相在重新武装问题上态度并不积极，但在美国的要求下还是打着“警察预备队并非军队”的幌子进行着重新武装。这种方式被称为“循序渐进的重新武装”，其所表现出来的机会主义和伪善饱受批评。加之以吉田首相为首的保守政治家们在1946年极力赞扬过宪法第九条，这使得批评愈演愈烈。

即使《世界》的“拥护宪法”特辑也非常重视这一点。特辑卷首刊登的是宪法的前言与第九条，以及第九十九条的“天皇或摄政以及国务大臣、国会议员、法官及其他公务员均负有尊重和拥护本宪法的义务”。在面向知识分子的问卷调查中与“重新武装的利弊”一同列出的，是“从道德上对这种循序渐进的重新武装有何看法”的条目。

毋庸置疑，此次问卷调查的回答以诸如“重新武装背负着道德破坏的责任”（中野好夫）、“政治道德的沦丧”（风见章）、“极其没出息，卑鄙”（上原专禄）、“尊法的精神将不复存在”（大内力）、“因此我不再相信所谓的政治”（谷川彻三）等回答占了压倒性多数。即使是支持

重新武装的政治学家蜡山政道也回答道："这样的事情在政治道德上是可悲的。"[95]

当时非武装中立论的"自主独立"的表现，完全是与1946年南原批判的"只是功利主义、权宜主义的安全第一主义"相反的一种态度。曾任同志社大学校长的田畑忍严厉谴责修宪论是"政治上的不道德"，他还主张"宪法代表的是一个国家，我们需要对它予以高于生命的尊重"。[96]

毫无疑问，对南原来说，这种取向十分明显。在1950年3月的演讲中，他提出"徒劳的左顾右盼就好比被风吹拂的芦苇，总是摇摆不定，它会使我们在客观形势下不能听从自己的内心"，"作为世界和平的使者，我们应该朝着民族的伟大理想努力"，"与其说这是一条布满荆棘的道路，倒不如说它是炼狱"。南原说，如果我们能维护正确的国家理念，即使有外敌入侵，"国民也必然会团结一致，积极抗御外敌"。[97]

与此相关，引人注目的是，当时在护宪论者当中存在支持国民抵抗运动和民兵制的意见。当时反对重新武装的急先锋清水几太郎在1952年的座谈会上阐述道："日本各家各户如若有枪，我家如若有一挺机关枪，那我也会大力支持重新武装。"[98] 竹内好1952年以中国为参考对民兵制进行研究并对此表达了相同的想法。丸山真男提倡日本应实施"全国每家每户至少配备一把手枪，由一家之长进行管理"的计划。[99]

这些主张是在参考瑞士的专守防卫民兵制后提出的、与"国家武装"有别的"国民武装"设想。经历过战争的人们都强烈地感受到国家军队镇压国民政治活动的恐怖。于是，国民武装的民兵制转化成了国民对抗政府的武装力量。

丸山真男提出，日本是一个政府早就彻底解除了国民武装的国家，因此日本国民可以说没有"自我武装"意识，说到"自卫权"，日本国民直接想到的是"'国家'的自卫权"。[100]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法国，当国

家投降之后，人民奋起抵抗的意识也极为薄弱，这也许与日本出于同样的原因。

因此丸山认为，只有给日本每个家庭配备枪支，不依赖于政府的个人“主体性”和真正意义上的“自卫”思想才能够扎根。此外，“即便外国军队入侵日本无恶不作，没有自卫权的国民也只能束手就擒这一重新武装派的花言巧语，也肯定难以如愿奏效”。

值得注意的是，以战时被征召入伍的丸山和竹内为代表，当时的知识分子几乎都参加过军事训练，对于枪械的使用可谓得心应手。正因如此，他们深切知道政府和军队独占武器的恐怖性。清水几太郎认为，政府之所以解除国民武装，是由于他们没有自信去获得国民的信赖。他说道：“如果我家里也有一挺机关枪的话，那我对日本重新武装十分赞成。极力主张日本重新武装的政治家们，你们有这样的胸怀吗？”

如此看来，当时的非武装中立论，即便拒绝让国家军队从属于美国，也并非绝对非暴力的主张。有不少人虽然不提倡民兵制，但认为在外敌入侵之际，国民会因不服从而进行抵抗运动。南原所提倡的国民“消极的乃至积极的抵抗”，就是这种情况。

社会党左派也这样认为。在1951年6月的社会党外交委员会上，胜间田清一说道：“我们并不是像你们听说的那样不抵抗、不防备。”并且批判当下重新武装是“为了某人、针对某人的自卫”。[101] 战前的日本军队与其说是保护国民，倒不如说是优先保护军队组织。一旦有事，听从美军指挥的警察预备队也不知道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来。

1951年1月，社会党通过了“反对重新武装决议”。因为经济上的负担，再加上对军阀死灰复燃的忧惧，社会党倡导“不能把重新武装和自卫权混为一谈，必须冷静地加以区分、思考”。虽然认可自卫权，但现在的重新武装只不过是一种“雇佣兵”，“还存在卷入第三次世界大战的

危险”，“且极其具有屈辱性，作为日本人都会反对”。[102]

虽然如此，民兵制构想等并没有纳入和平问题谈话会的声明中。丸山在参与执笔的1950年9月的《三谈关于和平》声明中，强调了依靠联合国的安全保障以及“核战争告诉我们最现实性的就是最理想主义的这种悖论性真理”的和平主义。[103]

然而如第四章所述，核武器的存在使传统的军事装备毫无意义。要求绝对和平主义这种主张，是麦克阿瑟和币原喜重郎在1946年阐述的。将安全保障委托给联合国的构想，也是麦克阿瑟和联合国的构想。

这也就意味着，和平问题谈话会的主张在思想上不够新颖。然而和宪法一样，非武装中立论也是有意识地反转美国提出的主张。《三谈关于和平》的声明，列举了吉田首相在制定宪法时的答辩以及麦克阿瑟1947年3月发表的声明，强调对于非武装中立论，不仅日本政府，“连盟军也明确表示同意”。[104]

对此，保守派的重新武装论是欠缺道德约束的。1950年8月的《东京日报》社论，将全面媾和形容为“不值一提的牢骚”，“基于安全与和平的目的，将放弃战争、军备、交战权作为一种手段”，提出“甚至宪法本身也只是国家的手段”。[105] 然而关于应该进行防卫的“国家”要以什么样的理念和民族认同为基础这一点，保守派的回答无法令人信服。

吉田首相在这一点上并无不同。如前所述，面对警察预备队的士气消沉，吉田首相及自由党对“爱国心”与“道义的高扬”进行了说明。但在1952年12月召开的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面对“道义的高扬”究竟具体是什么的质询时，吉田只是一味强调“日本的国民性是非常崇高的国民性”，但当下日本的什么方面是如何“高尚”，却说不上来。[106]

作为执政党的自由党，原本就不是基于理念创造出的政党。《世

界》1950年12月号载文说：“最使自由党的广大党员心醉的，并不是他们处于日本民族百年的存亡寄托在这种重大媾和问题上，而是作为执政党能够接近各种利权的有利条件的持续确保。”此外，该文评价吉田首相的片面媾和“对普通党员，与其说是承载‘媾和内阁’的荣誉，其实不过是想维系政权罢了”。[107]

与此相对，当时的非武装中立论和护宪论成了表达情绪的媒介，这些情绪就是谋求民族主义与伦理道德的恢复。毋庸置疑，这种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的主张并不矛盾，它还兼顾了对亚洲各国的负罪感与对生活水平提高的要求。

对战争经历的记忆成了各种因素能够无矛盾结合的基础。对当时的人们来说，战争不仅危及了生命，还带来了贫穷，剥夺了自由，摧毁了道德，赋予了屈辱和悔恨。当时的和平主义正是在这样的战争记忆中产生的。正因如此，不仅是生命的安全、民主主义的捍卫、生活水平的提高、伦理道德的恢复，而且“主体性”的主张与战争责任的追究等都结合在一起了。

此外，战死者成为这场战争记忆的象征。前文我们已经提到，吉野源三郎在“大量青年被美军杀害”事情上感觉自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在《世界》杂志媾和问题特辑的开篇也有过这样的表述：“我们应该再想想那些战死在空旷的大陆内地和南海边缘的广大同胞——那些我们生命中无法取代的父亲、丈夫与兄弟。此外，我们也应该铭记我们年幼的弟弟妹妹以及孩子们所饱受的贫困与恐惧。如果我们不能从过去的重大错误中吸取教训，不能保证不去重蹈覆辙，那么我们这些同胞们所付出的牺牲，就实在是太令人扼腕叹息了。”[108] 这样一种对于战死者的哀悼，成为一种让国家走向新生的企盼。

加入联合国与赔偿问题

可是，这种和平中立论如何才能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成为问题所在。

如前所述，和平问题谈话会以及社会党左派提出的重新武装的替代方案，是一种依靠联合国的安全保障。但与其说这是积极的提案，还不如说它是一种策略上的“消元法”。如果拒绝从属美国的安保条约与重新武装，旧军队复活的问题也被排除在外，那么民兵制构想就很难得到普遍的支持。如此一来，日本最终也就只能选择依靠联合国来获得安全保障了。

而如今问题是，如若不进行重新武装，日本是否有可能加入联合国。如第四章所述，《联合国宪章》第四十三条规定，联合国各成员国有向联合国提供兵力的义务。然而1951年1月，社会党的反对重整军备决议中却出现了“不履行参战义务而谋求联合国的安全保障”的条款。[109] 这成为能否被国际社会认可、能否实现非武装中立论的焦点。

和平问题谈话会也针对该问题进行过讨论。《三谈关于和平》声明中是这样阐述的：

> 问题是，我们国家没有武装力量，无法进行武力合作，我们却想单纯依靠联合国求得安全保障，这难道不是可耻的吗？对此问题的回答只有一个，那就是日本放弃武力，单纯采取和平手段。然而，人们对日本如此热爱世界和平的立场以及在精神文化方面大力协助联合国该当如何评价呢？[110]

声明中提到有中立国加入国际组织的先例。1920年，瑞士加入国联时，就被免除参与武力制裁与外国军队过境。印度和瑞典等国加入联合国后，仍坚持中立立场。《联合国宪章》第四十三条在兵力提供方面规定，成员国必须无条件服从安理会与兵力提供国缔结的特别协定。

然而，和平问题谈话会并非把联合国理想化。美国最初自称派往朝

鲜的美军为“联合国军”。于是，自由党政权大肆宣传与联合国合作，以运输业务为中心来协助美军，并进行“特需”承包。为此，社会党围绕“协助联合国”展开了讨论，并指出1950年9月已下达只能“在宪法允许范围内”协助联合国的指令，“像擅自获取武器是超出宪法范围的”。[111]此外，共产党对联合国持批判态度，这自不待言。

此外，当时的联合国因美苏对立处于瘫痪状态。丸山真男的回忆录提到，正是有过战前国联因大国间冲突而瓦解的事实，和平问题谈话会才发表了“联合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处于土崩瓦解边缘”的言论。此外，共产党也曾批判道：“接受过马克思主义洗礼的人，一般对（联合国）都不抱什么期望。”[112]

尽管如此，和平问题谈话会之所以提出要重视联合国，是因为除此之外，再也找不到日本想摆脱美苏获得独立的国际立场。因此，《三谈关于和平》在意识到共产党的批判，以及拥护“中立”和“重视联合国”的同时，也批判道：“从联合国本身设立的初衷看来，把它当成一种实现一两个强国的政策的手段是不正当的”，“只能说丧失这种本质属性的联合国已经背离了它的初衷”。[113]

1950年1月《关于媾和问题的和平问题谈话会的声明》中倡议：“我们要尽量忠于宪法的和平精神，在动荡的国际政局下，不应被动地顺应媾和问题的发展，而应当从致力于两个世界的协调出发，积极推动其发展。我们有着这样的义务，即通过以为发动战争而赎罪为目的而实现的媾和，实现推动二者接近乃至调和这一困难问题的解决。”[114]换言之，贯彻宪法第九条精神致力于东西两大阵营的调和，以在“精神及文化方面”为国际社会做出贡献的方式取代提供兵力的方式。

这一主张能否被国际社会认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对此，山川均在《世界》杂志有关媾和问题的特辑中有这样的阐述：

由于我们拥有放弃战争、非武装主义的宪法，我们应该要求联合国允许我国加入。也许有人认为这是一个自私自利的要求，那是因为他们不能理解日本在现行国际关系下保持自己的立场是其能够为世界做贡献的唯一途径。我认为，民主主义各国在道义上也有支持这一要求的责任。虽然现行宪法是日本国民根据自己的意志和选择制定的，但也是在同盟国占领下制定的宪法，它并不是违反同盟国意志而制定出来的东西。[115]

正因为是同盟国赋予的宪法，所以同盟国有义务尊重这部宪法。这一理论，清水几太郎和安倍能成等之前也倡导过。在日本加入联合国的问题上，它也同样适用。

但从之后的结果来看，这一主张是行不通的。不仅当时的日美政府没有这样的意向，在对亚洲国家战后赔偿问题条件的商讨中也没有得到体现。

如前所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同盟国的对日政策旨在日本的非武装化和废除军需产业，同时重视赔偿的实施。但是，美国为了将日本扶植成反共同盟国，从1948年开始，便提出了停止赔偿的方针。

为此，1948年5月，美国陆军部副部长德莱帕的报告呼吁“日本产业界的重组”与“赔偿的解决”。此外，在1949年5月的远东委员会会议上，美国代表麦考伊（McCoy）少将宣布停止要求日本做出赔偿。[116] 此外，朝鲜战争爆发后的1950年11月，美国政府公布了《对日媾和七原则》，表明将在媾和后由驻日美军对冲绳实行军事管理，以及放弃媾和缔约国请求赔偿的权利。[117]

但是，美国的这些方针遭到了众多同盟国的反对。1950年9月16日，英国外交部发表声明指出，美国这种做法对日本的非武装化和非军事化主张没有任何变化。此外，除英国外，澳大利亚、新西兰、苏联等国家都对《对日媾和七原则》表示反对。[118] 尤其是受过日本侵略的菲律宾和澳大利亚，强烈反对允许再军备和放弃赔偿请求权等方针。

如前所述，1951年1月杜勒斯访日，对日提出再军备的要求，同时与社会各界要人举行了会谈。之后杜勒斯对菲律宾和澳大利亚进行巡回访问，缓和他们对美国对日媾和计划的不满。但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外交部长强烈要求在条约中规定限制日本的武装力量和工业生产力，另外与菲律宾的谈判也以破裂而告终，当地还组织了反杜勒斯的游行示威。

虽然如此，各国政府对美国的主张还是选择了让步，1951年9月，媾和会议在旧金山召开。但如前所述，中国和朝鲜未被邀请，印度和缅甸也缺席了本次会议，另外印度尼西亚要求在会议现场签订两国之间关于赔偿的协定，菲律宾也向日本政府施压要求立即开始对菲律宾进行战后补偿。日本全盘接受了这些条件，在不断努力之下，各方终于在条约上签字盖章。

但最后，迫于美国的政治压力，亚洲各国的赔偿要求没有得到全部满足。且如前所述，虽然日本重整军备，但两国私下约定一旦有事发生日本必须服从美军指挥。这样一来减少了亚洲各国及澳大利亚对日军独自展开行动的担忧。

考虑到这种国际关系，日本要想谋求脱离美国实现独立，让国际社会承认日本作为非武装中立国家的地位，进行战后赔偿仍必不可少。但在当时全面媾和论下，忽视了这一问题。在和平问题谈话会的声明中，英国和澳大利亚始终仅反对恢复日本的军事力量，却没提到战后的赔偿问题。

相反，全面媾和论者也支持不赔偿的论调。在《世界》媾和问题特辑中，经济学家们在座谈会上也谈到了赔偿问题，和平问题谈话会成员大内兵卫说道：“我们没有赔偿支付能力，因此只能恳求原谅了。”同为谈话会成员的有泽广巳认为，“关于日军在亚洲各国发行的军票，希望能把战争中的债权债务一笔勾销”。国民经济研究会理事长稻叶秀三说

道："如果阻碍日本经济的发展，或者降低国民的生活质量，那么赔偿将不可能进行下去，这一原则得到了杜勒斯的认同。" [119] 这些经济学家虽承认日本给亚洲各国造成的惨痛灾难，但主张应优先复兴日本经济。

战后赔偿本来与和平问题不可分割，但在战后贫困的经济状况下，和平的愿望被放在了首位。但这一问题容易被轻视。一战后对德国要求的严苛赔偿是纳粹势力抬头的主要原因，基于这段历史，很多人认为限制赔偿要求是理所应当的。

此外，社会党等为了提高国民的生活质量，公然要求停止赔偿。1951年2月，社会党委员长铃木茂三郎在会见杜勒斯时提出，日本的媾和意向是"停止赔偿"、"友好处理海外资产"等。 [120]

同时出席杜勒斯与铃木会见的西博尔特认为，社会党的想法"完全不现实"，"社会党的领导者对世界形势及对日和平条约谈判的复杂性缺少现实的理解"。 [121] 日本一边提倡非武装中立与全面媾和，一边要求停止赔偿的态度，确实让人不得不这样评价。

另外，当时的全面媾和论者依据"朴素的爱国心"，欠缺对多数原住民以外的"日本人"的考虑。《旧金山和约》生效的同时，在日朝鲜人和台湾人被剥夺了日本国籍，但这一问题几乎没有被提及。有关冲绳的分离，在知识分子阶层中有不少人表达了对冲绳原住民的同情，但是日本政府和社会党仅仅从确保领土完整方面提及这一问题。社会党委员长铃木在给杜勒斯的信中写道："战败后日本疆土四分五裂。"他主张一定要确保日本北部领土和冲绳的完整。 [122]

在社会舆论上，这一倾向更为显著。1951年9月20日《朝日新闻》刊载的社会调查中，列举了对媾和条约不满的事项。其中"领土面积缩小"一条以11%的比例占据首位，对失去千岛群岛和南洋群岛感到遗憾

的各占6%，认为“不能全面媾和”的占5%。

即便是知识分子，如第八章所述的南原繁，也把战败的状况形容为“脱离殖民地异族，回归到纯粹日本”。参加和平问题谈话会的大阪商大校长恒藤恭也叙述道：“日本民族利落地放弃了成为富有侵略性军国主义的猎物，回归到了本原的存在方式。”他同时主张，宪法应该作为重建日本的“新道德基准”。[123]

此外，参加和平问题谈话会的重要人物安倍能成在《世界》媾和问题特辑中公开说道：“如果可以的话，希望将驻日美军和军事基地放在琉球及其他四个岛屿之外的地方。”[124] 这种露骨的发言虽然在年长一辈的人中较为常见，但很难见到以丸山为代表的年轻知识分子对战后赔偿以及冲绳问题进行这样的关注。

如第五章所述，据丸山的回忆，因为和平问题谈话会成员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战争中污点较少的人，即使战时痛恨自己无力的反抗，“也并不会首先想到自己负有战争责任”。[125] 对于当时的知识分子来说，“战争责任”主要是追究日本当政者给日本国民带来的伤害，或者是知识分子自己的处理方式和“主体性”问题。因为这源于他们自身的经验与悔恨，所以成为战后支撑他们行动的契机。但这种战争责任意识容易忽视对“日本人”以外视角的关注。

如前所述，对于排除中国来促进媾和问题的做法，在当时饱受批判。但这一批判与另一种认识相联系，那就是恢复对华贸易，将有助于日本的经济重建。如第七章所述，1950年代的和平主义本身，是和脱贫的愿望融为一体的。

在这种思考框架下，极有可能对日本经济产生不利影响的赔偿问题，理所当然，很可能落空。在《世界》的媾和问题特辑中，除了问卷调查外还有将近120位知识分子的投稿，但如果除去上文提到的经济学

家座谈会，论及赔偿问题的只有两人。

这二人，一个是东京大学教授河盛好藏，另一个是《近代文学》的编者荒正人。[126] 尤其是荒正人主张把调查问卷的所有回答都作为这个问题的答案：

> 媾和问题的草案中竟然没有赔偿问题，实在是不可思议。在亚洲各地，日军破坏、伤害的人命、财产、基础设施等总额是巨大的，把这些一笔勾销的理由在哪呢？菲律宾和缅甸等提出了赔偿要求，但日本拒不承认有此事，不会给予赔偿。或许那是因为将美国作为中间人的角色而保持了沉默。那些被解除处分的人们表现出他们似乎是被错误处分的，而这种内心与上述现象存在微妙的联系。[127]

当时，美国为了把日本培育成反共同盟国，逐渐恢复相关被开除公职人士的身份。并且如第五章和第六章所述，战争刚刚结束，荒正人就指出日本所进行的侵略战争是一种原罪，在日本打造近代主体意识应该是行不通的。他对赔偿问题的关注，也可以说是这种思想的延伸。

然而这种意见是极少数的。在媾和条约签订之后，虽然被日本占领过的东南亚诸国的请求权获得了准许，但是只限定在提供原料给日本加工的劳役赔偿上，而且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仅考虑有利于日本经济重建方面的事宜。之后，日本政府同缅甸、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南越四国分别举行了谈判并进行了赔偿，但这是作为日本企业再度进军亚洲的契机进行的。

这样进军东南亚，也是顺应美国的战略。美国中断了日本的对华贸易，取而代之的是计划给予日本处于美国影响下的东南亚市场。并且美国给予这个地区的军事物资援助也是在日本订购的，朝鲜战争停战之后也继续着“特需”订货。[128]

与此同时，在美国的主导下日本加入了联合国。1951年5月17日，

美国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决定了如下方针：①促进日本的重新武装；②为了能够在亚洲非共产主义国家低成本地使用军需物资而对日本实施援助；③推动日本加入联合国和参与地区安全保障。[129]

在此方针下，《旧金山和约》明确记载了日本期冀加入联合国的宣言以及同盟国支持这一宣言的条款。[130] 因此，日本政府于和约生效后的1952年6月，申请加入联合国。但这一申请因苏联的反对而被否决。虽然日本加入联合国计划推迟到日苏邦交恢复后的1956年12月，但最终还是得以实现。1954年5月，随着自卫队的组建，参议院决定日本将不再对外派兵。[131]

于是，通过依附于美国的国际战略，日本实现了不赔款的媾和以及不提供兵力就加入联合国的计划。日本作为东亚反共阵营的工厂，开辟了一条致力于经济发展的道路。

“五五年体制”的确立

媾和问题告一段落后，修宪成了1950年代的政治焦点。

1951年10月，围绕《旧金山和约》的批准问题，原本就内讧严重的社会党发生了分裂。左派反对和约和安保条约，右派虽反对安保条约却赞成和约。1955年社会党统一之前，左派和右派都是在单独行动。

另一方面，1953年11月，美国副总统尼克松发表了批判宪法第九条的演说，与此同时一直对修宪持消极态度的吉田茂首相，下令成立宪法调查会。因解除放逐而回归政坛的修宪派鸠山一郎率领自己的亲信脱离自由党，为了复党，他采取了妥协的政策。宪法调查会决定以解除放逐、回归政坛的岸信介为会长。1954年12月，夺取了吉田政权的鸠山，开始更积极地推进修宪。

为反对这一行为，以和约缔结后隐退政坛的和平问题谈话会成员为核心，组成了对抗政府的“宪法问题调查会”。另外，1954年1月，以左右社会党为中心，加上劳农党、日本工会总评议会、新产别等工会组织和宗教团体等120个团体，组建了“拥护宪法国民联合会”。

尽管如此，拥护宪法国民联合会只是政治妥协的产物。右派社会党原首相片山哲虽就任议长，但右派社会党中很多议员原本就支持再军备。他们参加这个联合会只是对抗保守党的政治战略。特别是身为宪法拥护特别委员会委员长的右派社会党三轮寿壮于1954年5月明确表示：“拥护宪法这一口号只不过是针对保守党修宪的战术罢了，大多数党内人士并不希望这部宪法永久不变。”[132]

另一方面，尽管左派社会党有着和右派不一样的理由，但他们也认为宪法不是绝对的。如第四章所述，社会党一直批判宪法中偏重私有财产和社会福利规定的不足。在媾和问题和再军备问题出现的1950年前后，由于只有宪法第九条凸显了出来，批判其他条文的声音十分微弱。

由于右派的消退，社会党左派大放异彩。1954年1月的大会采纳了受劳农派马克思主义影响起草的重视阶级斗争的纲领，而且获得议会多数票得以通过，还明确表明要在社会主义原则下实施修宪。

为此，1954年5月3日《每日新闻》报道，左派社会党纲领委员长稻村顺三称：“我们对拥护现行宪法的义务仅在于其对于和平及基本人权的维护，除此之外没有什么是绝对的。”在国防问题上，稻村还主张，“在社会主义政权下，如果有利于开展革命的话，我们就应该坚持武装力量，非武装并不是绝对的”。[133]

尽管如此，左派社会党之所以参加护宪联合会，终究只是为了对抗保守政党。1954年5月，宪法拥护委员会事务局局长、左派社会党穗积七郎说道：“现在提出修宪论在战术上并不利，最好是逐条批驳以岸信

介为中心的自由党宪法调查会提出的修正案。”[134]

共产党此后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原本战败之初，共产党是批判宪法的。但从1950年前后开始，所感派掌控的地下指挥部，以倡导反对再军备和拥护和平为根据，有拥护宪法的倾向。

然而在分裂期间，这种姿态并不是整个共产党的方针。1950年7月，非主流派一部分中的国际主义者团体对所感派进行了反驳，“他们（所感派）再次抛出‘日本宪法的精神和法规被践踏’、‘赋予国民的自由和权利被一一剥夺’的言论，陈述了‘日本宪法的精神和规定’是美帝国主义者为了对日本人民进行奴化、无权利化、解除日本人民的武装，涂脂抹粉而披上的漂亮民主的外衣”等观点。[135] 主流派一方也帮助强化反美主义，并没有全面拥护宪法的姿态。

当时主张采用非法的武装斗争、在党内文件中提倡克服“合法主义”的共产党，提出拥护宪法，这多多少少有一些矛盾。尽管如此，1955年召开的日本共产党第六次全国协议会放弃了武装斗争的路线。之后的1956年8月，其机关杂志《赤旗》上刊登了提倡以“‘拥护宪法’为口号，广泛团结各社会阶层”的文章。[136]

这些情况使大众不得不对共产党的宪法态度产生一些疑惑。1953年12月，在筹备组织拥护宪法国民联合体时，明确要排除共产党及其下属团体。报道这一消息的某新闻社论，对共产党拥护第九条反对重新武装的运动评论道：“与之前赞成和平条款，如今却主张废除该条款的保守党派机会主义一样，共产党这样重大的立场变化，使其很难获得国民的信任。”[137]

此外，共产党和社会党的关系本来就势同水火。战败后不久共产党在社会民主主义主要打击论的影响下，于1950年抨击社会党左派是“向国际垄断资本出卖阶级的万恶分子”。[138] 社会党左派铃木茂三郎于

1951年2月在致杜勒斯的书信中主张，“推进中立和社会性平等才是对共产主义最大的安全保障，而其中的主角就是社会党”。[139]

归根结底，虽然拥护宪法的“国民联合会”已经组成，但可以说坚决支持宪法的政党是不存在的。尽管如此，“拥护宪法”在这期间崭露头角，与“和平”及“民主主义”并驾齐驱，因为这是各势力对抗保守党派所能提出的最具共识的口号。

各政党和劳动组织在1953年5月的五一节集会中，打出了“反对日本法西斯化，守护和平宪法和民主主义”的口号。[140] 假如集会各方就有关“和平”与“民主主义”的具体内容展开讨论，那么他们是不可能形成统一的。尽管如此，只要抽象提出“和平宪法”和“民主主义”等词，就能在形式上整合各方势力。

但是，这种可以说是私下勾结的联合之所以能够成功，也是有其原因的。1952年4月的占领一结束，原本停滞的保守政党改革又急剧增强。

从1953年到1956年，由于被开除公职的保守政治家大量回归政坛，所以政治制度回归到战前轨道的危险性在这一时期最为显著。不只是要预备修宪，1954年保安队升格为自卫队，1956年教育委员会废除了公选制度，除此之外，议会还计划提出以复兴家族制度为主旨的民法修正案，以及重新设置战后改革中被解体的内务省的内务省设置法案。

当时保守政权的修宪案中并不局限于允许再次武装。在1954年公布的自由党宪法调查会的改正案纲要中，不仅肯定了再军备，还规定以天皇为国家的元首。此外，参议院议员不仅可以推举，还可与战前一样由推荐的议员组成。除了废除都道府县首长的公选制外，还消除了国会为“最高机关”的这部分规定，天皇可以令国会休会。此外，调查会讨论的不只是第九条，还有第二十一条（集会、结社、言论自由）、第二十

四条（家庭制度）、第二十八条（劳动者的团结权、集体交涉权和其他集体行动权）、第三十八条（缄默权）和第六十六条（内阁人事规定）等问题。[141]

1953年11月29日的《朝日新闻》报道了美国当局对日本1954年修宪准备完毕、1955年实现修宪有关情况的预测。[142] 而且1955年11月，由自由党和民主党合并的自由民主党得以成立，提出党的基本方针是“自主制定宪法”。[143]

虽然各方势力并非对于宪法全部内容表示赞成，但正是这件事，迫使他们在“护宪”的口号下强调团结一致的必要性。如1955年5月，作家平林泰子把日本宪法批判为“解除武装宪法”，说道：“大概是因为这部宪法不是日本人自己制定的，实在太过于理想化，我不想拥护”，并对“第二十四条得到修改，家族制度并没有复活”这种保守政权的修宪提出异议。[144] 当前对于宪法的拥护，并不囿于重新武装的对错，也是与回归战前倾向的对决。[145]

随着保守势力的修宪攻势越发强劲，社会舆论反对修宪的呼声日益强烈。《朝日新闻》的舆论调查显示，虽然1955年11月赞成修宪的人占30%，反对的占25%，但在1957年11月的调查中发生了逆转，赞成修宪的27%，而反对的达到31%。对此新闻界的解说是“以三十岁为界划分赞成与否”，明确指出了战后一代的兴起是这一逆转的背景。

在这种舆论背景下，社会党快速占据议席。在1953年4月的总选举中，左派社会党和右派社会党合计共138个议席，是之前的3倍。提出修宪的鸠山内阁在成立不久后1955年2月的总选举中，就面临严峻挑战，即两个社会党派承诺以统一来获得支持，获得了超过阻止修宪所必需的1/3即156个议席。提出非武装中立的左派与认可自卫权及集团安全保障的右派的统一谈判难以进行，但最终，双方决定倘若达成了妥协方案，倘若东西阵营附加的互不侵犯、相互安全保障条约可以缔结的话，就取

消日美安保，即右派取得成果，左派取得方针。根据这一方案，1955年10月，社会党实现了统一。

自民党与社会党在实现了各自的合并之后，于1956年的第24届国会上，呈现出全面对决的态势。废除教育委员会公选的教育委员会法案，在全体会议的会场中安排了500名警察的异常事态下被强行表决通过。但是内务省设置法案、以强化审定为目标的教科书法案、对自民党实行有利划分的小选举区法案等，因社会党和舆论的反对被阻止了。

但是，社会党势力的膨胀也只到此为止。舆论并不期待社会主义政权的诞生，仅是为了牵制防止回归到战前状态，而承认社会党的存在意义罢了。即便社会党在1958年5月的总选举上增加了议席，甚至达到战后最高的166个议席，但离目标的200个席位还相去甚远。社会党在1959年6月的参议院选举中，得票率及议席开始减少，其势力很明显已达到顶峰，稳定在能确保阻止修宪的1/3议席的位置。如此，自民党变为执政党，就实现了与“适度规模”的在野党势力相抗衡的“五五年体制”。

如此一来，社会党的右派、左派及共产党等全都以1955年为界，将自己党派的社会构想暂且搁置，转而参加“国民性的”护宪运动。因此，阻止回归到战前体制的意义确实十分重大。但以此为代价的是，他们彼此丧失了动力来实现面向未来的社会构想。不可否认，其间“护宪”、“和平”、“民主主义”这类词，由保守势力的攻势转化为“守护”战后改革成果的防卫性口号。

同样，《教育基本法》也可以说是如此。如第九章所述，战败之初《教育基本法》竟然遭到左派的批判。但随着清濑一郎、荒木万寿夫两任文部大臣表明了对基本法的批判，教育学家和日本教职员工会拥护《教育基本法》的呼声也高涨起来。

战败之初批判《教育基本法》的国语学家国分一太郎在1957年这样

叙述："以美利坚合众国首脑为代表，包括国内的保守反动势力想把《教育基本法》（当然包括宪法）越改越糟，以及通过这一精神对教育实践吹毛求疵等。这个时候人们感慨'啊，这样不行啊'，于是拥护宪法、拥护《教育基本法》的呼声逐渐高涨起来。因此，这一行为当然也就不得不具有了防卫性。"[146] 从此之后，所谓"革新"势力丧失了战败之初的激进势头，而被迫采取防守性的姿态。

但是，另一方面，保守政党也逐渐失去动力。鉴于舆论的强烈反对，优先将利益置于本地的保守派政治家，因为担心落选而降低修宪欲望。在鸠山内阁成立后的1954年12月，《朝日新闻》报道称："众多民主党人士认为大选迫在眉睫，而对于第九条不想做过深的解释，这是实情。"[147]

支持这一运动的是保守派政党内部新一代的兴起。宪法第九条原本是被吉田茂等人用来与美国就增强军备要求进行谈判的砝码。而对于允许在美国的庇护下发展经济的新一代，宪法也只在这一意义上有利用价值。当时自民党的年轻议员宫泽喜一在1965年的对谈中说道："比我年轻的一代大多反对修宪，比我年长的一代则随着年龄的增长人数变得越来越少。宪法绝不可能改变，况且也没有办法改变这么有利的东西。"[148]

随着修宪压力的减弱，取而代之的是关于自卫队的宪法解释，即自卫队并不是宪法所禁止的"军事力量"。[149] 本应是修宪论者的鸠山，受到了来自不想深入涉及宪法问题的议员们的压力，于1954年12月提出了"自卫队合宪论"的主张。

对于保守派将第九条形式化，护宪论者中也开始有了回应。早在1952年5月《世界》杂志的"拥护宪法"特辑中，评论家吉村正一郎提出了以下主张：

> 由于按现在的程序所进行的重新武装本身就是违宪的，更没必要讨论

它有考虑欠周的地方了，既然如此，我不赞同改进党和部分社会党议员所主张的那样去修改宪法以及大规模重新武装。那样确实是光明正大……但是如果光明正大推进这件事的话，事态会比现在更加糟糕。

虽说危害变小，倘若因此就容忍它还是很不安，但为了防止发生更大的危害，对于小的危害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虽不是出自本意，但除了宽大处理之外没有其他办法。我认为宁可让吉田政府去欺骗和掩饰，也比把宪法修改得面目全非要好得多。[150]

按吉田的说法，从“日本现在实质上已成为美国卫星国的立场”出发，不得不重新武装，如果宪法第九条能够考虑到限制军备扩张就好了。

这种宪法观逐渐渗透到大众之中。通过对比《朝日新闻》1952年2月和1953年2月的舆论调查，认为没有必要修宪的意见增加了10%，但与此同时，认为有必要加强军备的意见增加了6%。《朝日新闻》根据这一调查总结道：“即使认为日本有必要建立军队的人也并不认为有必要修宪。”[151]

现在人们认为即便宪法第九条要求全面废除军备，也并不意味着会废除安保条约，在这种安心感的基础上，人们逐渐表明了对宪法的“支持”。与此同时还有另一种所谓的“支持”，那就是即便投票给共产党和社会党，也不认为社会主义政权能够实现。从1950年代后半期的禁止核武器运动和反对《警职法》斗争等事件中可以看出，虽然进步派的社会运动在数量上有所增加，但已不像战败初期那般尖锐。

在这种状况下，丸山真男于1956年表明，“‘新宪法’在当今相当广泛的国民群体中正转变为一种保守的感觉”，“新宪法已经深深扎根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并让人们深感因新宪法而获益”。此外，他认同自己于1947年提倡的“大学出身的工薪阶层=知识分子这一等式已经不成立了”，并且日本的社会结构正在急剧发生变化。1957年，关于citoyen[152]的解

释，丸山没有像以前一样将它翻译为“公民”，而是将其改译为“市民”。[153]

与之并行的是战后思想的裹足不前。战败后历经十余年，战败时三十岁左右的战后思想家们大多业已年逾四十，支撑他们的战争记忆也逐渐淡化。于是，丸山在1958年的座谈会上说道：“可能是老境渐至、精力衰退的缘故，这一两年真的是萎靡不振”，并表示自己“内在的能量正在风化，不像以前那样得心应手了”。[154]

“已经不再是‘战后’”的说法在1956年的《经济白皮书》中正式出现，乘着美苏“和平共存”的东风，日本如愿加入了联合国。同时，因为害怕日本反对美军基地运动的高涨，从1950年代后半期到1960年代初，在日本本土美军基地的规模缩小到原来的1/4。然而从本土撤出的美军事实上转移到冲绳，这一时期冲绳的基地扩充了将近两倍。[155] 就这样，把冲绳提供给美军，在美国的庇护下推动经济发展的体制逐渐固定下来。

在这一体制之下，宪法和自卫队也逐步稳固。混乱和改革的“第一战后”行将结束，稳定与发展的“第二战后”即将开始。在这一时期，无论是保守派还是左派修宪的声音越来越微弱，宪法在整个社会中根深蒂固。不，与其说宪法的理念根深蒂固，还不如说各政治势力的纷争被搁置了。

与此同时，所谓“单一”的“民族”与“国民”这些字眼，终结了本应致力于理想的时代，却开启了将其转化为一直所厌恶的既成事实的时代。在这一过程中确立的“五五年体制”、“革新”势力，以及“国民”等，如第Ⅲ部中所述，1960年代之后随着新左翼与学生动乱的抬头，受到了严厉的批判。

在《世界》1951年10月的媾和问题特辑中，关于日本对亚洲各国的

赔偿问题，荒正人说道：

> 我很担心。所谓的赔偿就是暂且延长时间，变着花样加上更为苛刻的内容。此外，荒谬的手段，实际上就是为了日本必须支付赔款。在理应支付的时候没有赔偿，这不如说是理所当然的事。在责备对方之前，还是应该嘲笑自己的愚蠢和肤浅。20世纪的现实就是白白地错过凶残的敌人应该付给你的巨大财富。[156]

1950年前后的非武装中立论和护宪论是一种尝试，尝试着摸索新时代的国家理念，构想“独立自主”的日本。这种尝试以失败告终，付出了日本必须从属于美国的代价。也正因如此，日本逃脱了战后的经济赔偿，从而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在这一过程中，战后日本国家认同感的混乱，成为之后一直没有得到解决的遗留问题。

第十二章 1960年的安保斗争

1960年的安保斗争，作为“战后民主主义”的最高潮而广为人知。运动一方面高唱“反美爱国”的口号，另一方面出现了将运动称为“市民运动”的迹象。[157]

然而，笔者拒绝接受以上这种将构成运动基础的思想单纯归类为“民族主义”或“市民主义”的做法，并将在此前提下进行论证。如前所述，“民族”、“国民”、“民主主义”、“市民”等词在被使用时常常包含多种含义。而1960年的安保斗争，正是这些词的含义产生变化的重要节点。

作为桎梏的“旧金山体制”

要讨论1960年的安保斗争，首先需要对其前史加以介绍。

该问题的主要人物之一，是时任首相岸信介。就读于东京帝国大学

法学部时，他是一名优秀学生，其毕业成绩与此后成为民法学家的我妻荣不相上下。右翼宪法学家上杉慎吾曾邀请岸信介成为其后任，但岸信介拒绝其邀请并步入政界。此后，在1936—1939年，岸信介在伪满洲国担任要职。太平洋战争爆发时，他还曾以东条内阁工商大臣的身份在宣战诏书上署名。虽然岸信介在日本战败后以甲级战犯嫌疑人的身份遭到关押，但在占领期结束后又重返政界，并成为自由党宪法调查会会长。

正如这种经历所示，岸信介曾是一名“秀才”、一名官僚，也是一名前战犯。与在大众性地区选举中当选的保守派政治家不同，他是一个依靠官僚时代和“东大时代”的人脉及钱脉，以及“无懈可击”的言行举止和巧妙的党内操纵手段脱颖而出的人物。他能在1957年2月登上首相的宝座，也是因为抓住了前首相石桥湛山患病的机会。

曾在国会旁听时目睹了岸信介言行的作家伊藤整，在谈及对岸信介的印象时这样说道：“我觉得，他就像个公司的职员”，“与我经常见到的那些保守派政治家不一样”，“国民总是会不知不觉对当上首相的人有所期待，希望他能胸怀大志，有人格魅力，有豪侠风范。可这些品格，在岸信介身上一个都看不到”。从伊藤的形容来看，岸信介是“掌握了现有政党和党员的弱点，从内部施展计谋，才爬上了首相的宝座”，这是“知识分子阶层所厌恶的类型之一”。[158]

在伊藤眼中，岸信介身上具备巧妙的计谋和处理问题的方法，权威的、“无懈可击”的“优等生”及“官僚”的形象，以及忘却战争责任等备受战后知识分子批评的一切要素。此外，伊藤还发现了一些岸信介思想中“明明存在，自己却不太愿意承认的东西”，并表示，“我与其说是吃惊，不如说是震惊”。[159] 在谈论岸信介为何在1960年的安保斗争中遭到那般反对时，也必须注意到他本人的这些特点。

就任首相之后，岸信介开始着手《日美安保条约》的修订交涉。在1951年与《旧金山和约》同时缔结的旧安保条约中，没有规定美国有保

卫日本的义务，日本只是单方面向美国提供军事基地，且并无年限限制。

此外，1951年的安保条约是日本因战败而被彻底打垮成为弱国时所签订的。然而，日本经济在朝鲜战争结束后就恢复到了战前水平，并在1955年加入关税和贸易总协定（GATT），甚至在1956年如愿加入联合国。对美贸易在1959年实现了超过1亿美元的顺差，因此岸信介政权制定了《贸易汇兑自由化大纲》。对于经济高速增长的日本来说，重新调整以安保条约为代表的对外关系成为重要问题。

革新阵营一方同样面临这一问题。1956年10月，砂川事件爆发，围绕东京都立川市美军基地的扩建问题，学生、居民与警察发生冲突，导致多人受伤。受此影响，在岸信介就任首相不久的1957年2月27日，500余名知识分子联名发表《安保问题再讨论声明书》，请求对安保条约和“旧金山体制”进行重新探讨。[160]

此外，《世界》杂志在1959年10月号和1960年2月号上刊登了题为“国际问题谈话会”的讨论。“国际问题谈话会”继承和平问题谈话会的形式，以丸山真男、清水几太郎等人为核心，并加入石田雄、坂本义和、日高六郎、加藤周一、福田欢一、小林直树等当时的青年知识分子重新组建而成。讨论中提出了以日本“高度工业化”的现状为基础，通过“快速解除对美的从属”和“对一切军事同盟保持中立”以实现“确立本国的自主性”的主张。[161]

革新派这一主张中针对“旧金山体制”的批评也得到了岸信介的赞同。在《中央公论》杂志1957年5月号的采访中，岸信介谈道：“年轻人对于‘旧金山体制’的反对，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摆脱战后暂时的虚脱状态，并逐渐产生了民族自觉性的证明。”关于对安保条约的重新评价，岸信介表示：“超越党派的国民感情正在不断形成。”[162]

然而，问题在于究竟应该从哪个方向来重新评判安保条约。岸信介在这次采访中表示，“从理想上讲，不存在任何安保条约和行政协定，日本可以自主防卫而不需要外国驻军，日本最终的安全保障依靠联合国的集体安全保障机制的状态最令人满意，然而这是无法一蹴而就的”，并主张：“首先需要日美之间达成完全一致的想法，诸事才有可能实现。”

事实上，1951年的安保条约中之所以没有规定美国对日本负有防卫义务，其中一个原因是美国议会在1948年通过了范登堡决议，禁止与不能相互援助的他国进行集体防卫。日本因无法向海外派遣兵力而不能对美国进行军事援助，这就形成了没有防卫义务规定的安保条约。

因此，若想以使美国承担对日防卫义务为目标修订安保条约的话，那么修改宪法以使日本能够进行再武装化和海外派兵是一条捷径。至少在以岸信介为代表的保守政权看来，如果无法通过任何方法对美国的国际战略做出贡献，就不可能将安保条约变为更加对等的关系。岸信介“首先需要日美之间达成完全一致的想法，诸事才有可能实现”的主张，无疑体现了这种想法。

可以说，无论是岸信介还是国际问题谈话会，都认为对于经济持续增长的日本而言，“旧金山体制”已经成为一个桎梏。只不过作为挣脱这一桎梏所应努力的方向，究竟是应该消除对美从属关系并实现非武装中立，还是应该通过再武装和修宪使美国将日本视为对等的伙伴，两方的立场产生了不同。

在1957—1959年的日美交涉中，岸信介安保条约修订交涉的整体方针确定了下来。其核心是，不要求美国担负对日防卫的义务，而是即使日本国内（这里的“国内”是否包括冲绳成为一大焦点，这一点将在后文论述）的美军基地遭受攻击，日本也会将其视为本国遭受攻击并加以应对。此外，从“远东”地区的安定着眼将为美国提供基地、将旧安保条约

的无限期变为10年有效期、美国将核武器运入日本时双方应进行事先协商等条款也被纳入。

在岸信介政权看来，这一条约较旧安保条约更加接近对等条约。然而运入核武器时双方应进行事先协商的做法不过是走形式，并且所谓“远东”范围也不够明确，具有相当的扩大解释的可能。此外，在多变的国际形势下，10年这一长期的限制期限，以及驻日美军基地遭到攻击时日本被卷入战争的危险性都成了重要问题。

使针对安保条约的反对加剧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当时国际形势的紧张。1960年5月1日，苏联政府发表声明称在本国上空击落美国U2侦察机，并警告将对为美国提供基地的各国实施报复。当时社会党披露了厚木基地驻有U2侦察机，而自民党外交调查会会长贺屋兴宣则表示：“如果苏联攻击驻日美军基地的U2侦察机，日本将根据新安保条约予以反击。”[163]

对于这些安保条约的改订事项，国际问题谈话会批评道：“存在使日本卷入战争的危险性”，“在今后十年中，除了‘主动’向美国保证不断产生危机和放弃自主权外别无他用”。[164] 但对于持续数年坚持对美谈判的岸政权而言，这已是与美国交涉的极限了。

岸政权推进修订安保条约的日美谈判的1958年，也是内政方面冲突最多的一年。这一年的4月，以强化学校管理及压制日教组为目的的所谓“勤务评定”开始在各府县实施，日教组虽自上而下开展了反对运动，但文部省以处分大批教员应对此事。10月，大幅扩大警察权限的《警察官职务执行法》（简称《警职法》）修订案提交国会，因为大规模的反对运动，审议并未获得通过。这一系列事态与岸政权一直以来怀有的修宪意图相互呼应，大大加深了人们对修订安保条约与复活战前体制一脉相承的印象。

至此，修订安保条约已不仅是外交问题，而且不断成为围绕战后日本宏伟蓝图的一个持续对立的问题。这种对立，在1960年以后将愈演愈烈。

5月**19**日的强行通过

1959年3月28日，阻止修订安保条约国民会议组建成功。以总评[165]、原水协[166]、护宪联合、日中国交恢复国民会议、全国基地联5个团体为首，该国民会议包括社会党在内的134个团体，共产党虽未成为干事团体但也被允许参加。

共产党被允许参加，是一个新的变化。在1955年的宪法拥护国民联合会和1958年的反对《警职法》改恶国民会议等此前革新阵营的“国民”组织中，共产党原则上是被排除在外的。但随着六全协后的稳健路线逐渐获得认可，到反对修订安保条约的“国民会议”时，共产党已经脱离了所谓“非国民”地位。

然而，这种“国民”性的统一中也有许多过激之处。其中之一，就是社会党右派。其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统一阵营，其全国劳动组合同盟和全国产业别劳动组合联合也没有加入阻止修订安保条约国民会议。以这些工会为支持主体的社会党右派于1960年1月从社会党中分裂出来，单独组建了民主社会党（民社党），并在修订安保条约的问题上开始表现独立的态度。

另一个是全学联主流派。如第七章所述，因对不满共产党在六全协后采取稳健路线而被开除的学生党员们提出了更为激进的革命路线，并于1958年12月组建共产主义者同盟。掌握了全学联主流派执行部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在与共产党领导下的全学联反主流派对立的同时，开始倾向于开展更加激进的直接行动。

全学联主流派与社会党、共产党的对立，早在1959年8月就已显现出来。在8月6日的原子弹爆炸纪念日，为配合在广岛召开的第五次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和平大会，阻止修订安保条约国民会议展开了统一行动。当时，对于全学联主流派在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和平大会的呼吁中加入阻止修订安保条约的主张，社会党和共产党均持反对态度。[167] 其理由是在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中还有一些没有明确表示反对安保条约修订的保守派人士，而这些人如果反对，那么所谓的“国民”统一将有瓦解的危险。

导致这种软弱姿态的原因之一，是社会党正在逐渐走向衰败的现实。在1959年6月的参议院选举中，社会党的议席数从三年前的49个下降至38个，而之后的内部纷争又使右派发生分裂。对于社会党而言，因运动更趋尖锐化而再次引发新的分裂绝非其所期望的。

同时，共产党指责由被开除党籍的学生党员指导的全学联主流派为“托派分子”（指扰乱国际共产主义统一、进行极左派活动的人），在因稳健化而被认可参加国民会议的共产党看来，全学联主流派的行动是扰乱统一的“过激行为”。

当时的共产党仍未恢复其在武装斗争时期低落的状况，1949年尚有35人当选国会议员，而当时却只有3人硕果仅存。据当时的社会党专职工会官员回忆，被贴上危险团体标签的共产党“只要在国会中有所行动，就会立刻遭到院内惩戒委员会的惩戒。而只要遭到惩戒就会被立即开除议员资格。在只有三名议员的情况下，共产党便由于害怕受到惩戒而在国会中无所建树”。[168] 处于这种弱势状态的共产党，为了恢复其党势便开始彻底坚持稳健路线。

事实上，社、共两党和国民会议从来就没有期待安保问题能够唤起广泛关注。和与生活息息相关的《警职法》相比，国民对于安保的关心普遍很低。虽然国民会议自1959年开始先后组织了几次“全国统一行

动”，但动员的中心总是工会会员等阶层，运动形势很难说是蓬勃高涨。

据清水几太郎的回忆，当时的情况是“经过战败后的14个年头，我们好不容易摆脱了战败初期的贫穷和混乱，大家一直都谨小慎微，这才实现了某种意义上的安定”，因此“大多数人不希望破坏这仅有的安定”。[169] 即使对社会党而言，安保条约的通过可以说也在意料之中，其目的不过是通过1954年护宪联合之后沉寂了的“国民运动”批判自民党政权，从而达到对选举有利的结果而已。

如今正值中年的战后知识分子们，也同样是这种状态。例如，鹤见俊辅在自己工作的东京工业大学工会准备发表反对安保的声明时就认为：“我想这次无非就是以往几次失望中的一次罢了，这次同样是徒劳无功的，总之就是表明自己认为政府的方针并非正确之后便无所作为。”[170]

然而，掌握了全学联主流派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把反安保斗争看作革命的第一步。他们揶揄共产党领导下的全学联反主流派和国民会议所指导的稳健游行是“烧香游行”，并采取了可谓过激的直接行动。在他们看来，社、共两党不敢采取直接行动，正是既存革新政党体制内势力已经堕落的证明。

1959年11月27日，正值阻止安保条约修订国民会议的第八次统一行动，以全学联主流派为首的约1万人（人数众说纷纭）的游行队伍突然闯入国会。当日凌晨，执政党在众议院强行通过了越南赔偿协定（如第十一章所述，这是对日方有利的赔偿协定），这深深刺激到了他们。

自民党及各大报纸都把这次行动作为“闯入国会事件”进行了批评，警察厅长官柏村信雄表示，将社会党书记长浅沼稻次郎作为游行的责任者进行逮捕也并非没有可能。事实上，据说浅沼曾呼吁制止并解散游行

队伍，而自民党一方则是以此为契机试图牵制反安保运动。

受到批评的社会党，由于畏惧社会舆论的这种批评会危及自身，便提议将全学联从国民会议中排除出去。共产党虽反对排除全学联，但也将全学联的指导者批评为“托派分子”。已经动摇的国民会议，在12月10日的第九次统一行动中，终止了国会周边的群体性运动。

但全学联主流派并没有因此而气馁，该组织主张应该阻止岸信介首相以签订安保条约为目的访问美国，并于1960年在羽田机场举行游行。而国民会议当时又是为了避免混乱，并没有动员群众前往羽田机场周边。遭到孤立的全学联主流派依靠自身实力占据机场食堂，结果却导致很多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干部被捕。

全学联主流派的直接行动，从战术上讲可以说有些拙劣。在渐渐迎来稳定时期的日本社会，将反对安保条约修订作为革命第一步的看法，也无法得到认同。[171] 然而，他们不愿妥协的直接行动对墨守成规的国民议会型运动产生了刺激，并起到了将斗争推向高潮的牵引作用。

事实上，当时的全学联是在没有头盔和木棒的情况下与全副武装的警察部队对峙的。借用清水几太郎的话来讲，就是“虽然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但他们所能做的只是默默地任由警察用棍棒打破自己的头。实际上，这是与社会主义革命等毫无关系的‘迂直的运动’”。然而，与容易陷入政治交易的社、共两党相比，这种迂直更能获得国民的好感。自那以后，同样如清水几太郎所说：“全学联粗暴（却又无私）的行动，使安保斗争不断升级。”[172]

在运动持续不断的情况下，1960年1—5月，接连发生了几件对社会舆论产生刺激效果的事情。首先是国内，被称为日本最强工会的三井三池煤矿工会，因反对裁员在1月25日举行了无限期罢工，3月28日又发生了公司雇佣黑社会成员刺杀工会会员的事件。

同时，持续了12年之久的李承晚独裁政权统治之下的韩国各地，也在3月爆发了反对总统选举舞弊的游行。4月19日，警察向游行的学生队伍开枪，造成186人死亡，主要城市都发布了戒严令，但游行规模反而愈演愈烈。

受国内工会长期斗争和邻国学生游行的刺激，4月26日，在国会爆发了8万人的请愿运动，全学联主流派试图再次闯入国会。翌日，李承晚终于宣布辞职，并于5月逃往美国。5月1日，U2侦察机遭到击落事件被公之于世，这让新安保条约将使日本卷入战争的危机感迅速扩散。同时，国会中的论战也越发剑拔弩张，社会党步步紧逼，要求撤走厚木基地的U2侦察机，民社党也借此时机开始转为反对新安保条约。

当时国会的会期到5月26日结束，由于社会党和民社党反对延长会期，审议无法顺利进行。直到5月19日深夜，岸信介首相在与亲信商量后，决定延长会期并由自民党单独强行表决通过承认新安保条约的策略。[173] 这一强行表决的结果，使安保斗争越发高涨。

虽然1956年的教育委员会法案也以警察部队的入场而强行表决通过，但新安保条约的表决要来得更加暴力。[174] 5月19日，以岸信介为中心的自民党主流派将议员秘书中的女性和老人都替换为青年，并组成了总人数近600人的“秘书团”。当日下午，社会党注意到会场中的外交官专用旁听席已经聚集了一群自民党雇来的“地痞流氓”。

察觉到新安保条约可能会被强行通过的社会党议员和秘书们，以总书记江田三郎为中心，深夜在会场肩并肩组成人墙，试图阻止自民党议员入场。社会党虽然对全学联主流派的直接行动采取批评态度，然而当时察觉自民党举动的抗议队伍已经在国会周围集结并发出“海啸般的欢呼声”，这似乎让社会党议员的精神为之振奋。

自民党主流派依靠“秘书团”和召集来的警察部队，驱散社会党议员

团。最初还有所顾忌的警察，在受到自民党“放手去做”、“不要顾虑”的催促后，开始将反抗的社会党议员强行拖离现场。关于当时的情形，在场的新闻记者报道如下：

> ……（警察）掰开他们的手臂，抓住他们的脚，拖着他们的头，强行把他们从人墙中扯开，当扯开一个人后就会将同一队的其余四五个人都带到院外，而接替他们的队伍则会对下一个议员发动进攻，衬衫扣子和鞋子四处乱飞。看到一两个同伴被拖出来，议员团的抵抗更加激烈，死死抓住绝不松开手臂……突然队伍后面发生了奇异的事情，议员团和秘书团一起唱起了歌。[175]

社会党议员团和秘书团所唱的歌，是1950年代共产党青年党员和总评劳动工会会员最爱唱的一首名为《民族独立行动队之歌》的歌。歌词为：

我们要保卫民族的自由

快起来

祖国的劳动者们

保卫光荣的革命传统

面对血腥统治，要以正义的鲜血去抗争

打倒民族的敌人和卖国贼

前进

前进

紧密地团结起来

民族独立行动队

向前

向前

向前进[176]

在自民党议员的咆哮声和包围国会的游行队伍的欢呼声中，这首歌自然而然地爆发出来，目睹这番场景的新闻记者感到："好像现在真正是到了必须保卫民族独立的那一刻"，并赞叹这首歌是"多么地贴切啊"。[177]

然而，社会党议员团最终还是被驱逐出去了。而自民党议员则一边饱受"你们会遭报应的"、"你们也配当议员吗"的责骂，一边破坏国会会场的入口并走了进去。从议长清濑一郎拿起话筒，到同意会期延期及承认新安保条约，整个过程仅用了15分钟。

这种强制通过的方法，实际上在自民党内部也并非为众人所皆知。事实上，正当清濑议长和大多数议员都认为这不过是一个延长会期的决定时，在岸信介亲信的督促下，议长发表了通过新安保条约的宣言并一举通过。来到会场后才头一次听说安保条约决议的自民党副总裁大野伴睦曾向岸信介的弟弟、藏相佐藤荣作表示抗议，得到的回复却是："如果一开始就告诉大家，那事情不就穿帮了吗。"[178]

岸信介的这种手段，在自民党内部也遭到了反对。岸信介认为，安保条约能否得到承认，关系到自己的脸面和政权的延续。然而不管赞成与否，大家都知道新安保条约决定了日本今后长达十年的命运。为了抗议如此重要的条约以这样的方式获得通过，自民党中有27名议员退场。

其中一人就是平野三郎。关于岸信介，他批评道，对于用这种方法"使安保条约强行表决通过的人，如何能将民族的安危托付于他呢？"[179] 三木武夫和河野一郎同样在中途退席，正在接受治疗的前首相石桥湛山也表示："我在家中通过收音机听到这一消息时，气到昏了过去。"因对突破会场时的状况不满而返回家中的松村谦三，当在车里收音机中听到新安保条约通过的消息时，"黯然神伤地表示：'啊，日本将

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180]

战争记忆与“爱国”

与是否赞同新安保条约相比，5月19日进行的强制表决招致了更为强烈的反对。

《朝日新闻》5月21日的社论中称：“现在，我们正处在到底应该让议会民主主义被扼杀还是存在的岔路上”，并要求岸信介辞职及举行国会大选。虽然大多数国民对安保条约本身的态度并不明确，但“这种卑劣的手段给人的印象，激起了目睹这一幕的国民情感上的憎恶”。[181]

表决方式自不必谈，就是5月19日这一进行强制表决的日期也饱受批评。1960年1月，岸信介在华盛顿签订新安保条约之际，曾宣布为纪念日美修好100年，将邀请艾森豪威尔总统于6月19日访日。如果这一计划得以实现，那将成为战后美国总统的首次访日。而宪法中规定，条约在众议院得到承认的30天之后，即使不经过参议院表决也会自动生效。也就是说，在5月19日强行表决通过新安保条约，是为了能赶上美国总统的访日计划。

原为甲级战犯的岸信介，被当作为了讨好美国才举行强制表决，这就引发了强烈的抗议。《东京新闻》在专栏中把岸形容为“以天皇的名义进行战争豪赌，是一只竭尽不劳而获之能事的老狐狸”，并评论道：“艾森豪威尔的访日也是狐假虎威的把戏。”[182] 政治学家猪木正道虽是反共主义者，却也同样批评道：“没有比为了一己私利而争做美国‘乖宝宝’的卑劣想法更有害于日美之间真正友谊的了。”[183]

当时，对岸信介的评价多为“卑劣”、“老狐狸”、“官僚”、“坏蛋”、“小偷”之类。谷川彻三在得知强行表决后，感到了一种“对一国之首相可有的最大限度的轻蔑”，并表示“在震惊之余感到怒不可遏”。[184]

如前文提到的，伊藤整也评论道：“国民总是会不知不觉对当上首相的人有所期待，希望他能胸怀大志，有人格魅力，有豪侠风范。可这些品格，在岸信介身上一个都看不到。”

《朝日新闻》5月25—26日进行的舆论调查显示，当时岸信介内阁的支持率已跌落至战后以来的最低水平，仅为12%。[185] 物理学家汤川秀树曾表示：“虽然对新安保条约持完全反对意见的人估计仍为少数派，对于这次的修订心怀疑问和不安的人却绝非少数。如果再加上对5月19日、20日之事抱有强烈反感的人，其总数可能要远远超过前面人中的任何一种。说到现在到底有多少人希望内阁总辞职，或许这种人的数量才是最多的。”[186]

同时，岸信介不断积累既成事实的政治手段，也唤起了人们对日本刚刚进入战争时的记忆。竹内好在5月19日深夜通过收音机听到强制表决，关于当时的心情他在23日写道：

> 我走下床，再也无法入睡。从厨房拿出为健康而戒掉的酒，一人独酌。……我的第一感受是，民主主义就要因此而结束了，我们被下了最后通牒。
>
> 民主主义一旦结束，接下来就会是法西斯主义。法西斯主义将不再是未来的危险，而是转为摆在眼前的事实。在法西斯主义下要怎样生存下去呢？脑中思前想后一团乱麻。无论如何，都必须表明态度。对我来说，流亡是不行的，放弃国籍也是办不到的。[187]

对于经历过充满屈辱和悔恨的战争年代的人们来说，强行表决给自己带来一种“在法西斯主义下该如何生存下去”的危机感。竹内曾认真考虑流亡最终又打消了这一念头，并下定决心留在日本与岸政权进行斗争。

勾起这种战时记忆的不仅是竹内一人。作家野上弥生子也曾表示：“按照那种方式去做的话，征兵制度大概还会恢复，甚至连战争都

可能通过强行表决通过，想到这些真让人不寒而栗。”[188] 此外，鹤见俊辅更是说道：

> ……作为战时的革新官僚和开战时的大臣的岸信介成为首相，这让人开始思考日本精神史中是否存在凡事都会在不明不白中结束的特殊结构。起初完全摆出一副民主主义者形象的岸首相及其派别，不久利用自民党占绝大多数优势，开始使用与战前相似的官僚主义做法不断积累既成事实。这是皇姑屯事件及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军部官僚反复用来对付国民并取得成功的方法。……人们对岸信介在5月19日的做法所怀之愤慨，让我们的思绪又回到了战后初期，甚至是九一八事变的时候。我感到，至今一直未能明确且难以捉摸的日本历史的形态，正在不断汇聚成一点。[189]

如前所述，岸信介身上具备官僚性的权威主义、追随美国、忘却战争责任以及“卑劣”手段等战后思想所憎恶的一切特征。鹤见也认为，“没有比岸首相更能代表昭和时代的日本统治者了。无法想象有任何比这更合适的单一象征”，并提出“现在日本的斗争实际上是战败前统治日本的国家与战败后重生的国家二者之间的战争”。[190]

以5月19日的强行表决为界，问题所在开始从对安保条约的赞同与否转向“战前日本”与“战后日本”这“两个国家的战争”。并且，没有比反对岸信介更能表现对“战后日本”所怀有的爱国之心的机会了。因此，作家松山善三将岸信介形容为“出卖国家的家伙”，矢内原忠雄也在演讲中提出，通过对岸信介的抗议可以“从真正意义上来爱国、爱国民”。[191]

关于安保斗争，清水几太郎后来回忆道：

> ……参与者几乎全都了解战争是什么。他们了解什么是战前的生活，什么是战时的生活，什么是战后的生活。不，不仅是了解。他们是好不容易才在战争幸存下来的人。……回首往事，任何人的过去都充满了不安、恐怖、愤怒、饥饿和屈辱。……在战后的十五年里，这些经验和情感中涉及个人的部分虽被赋予了光明正大地摆上台面的权利，但包含民族主义的部分却一直被压抑在阴暗的角落里。通过全学联的胡乱（而又无私的）行动，安保斗争在一步步发展到更高的阶段，我认为这大大刺激了一直隐藏

着的经历和情感，即使并非刻意也给予其表达的机会。很多人将那些久久无法说出口的尘封的经验和情感，都寄托在了“反对安保”的呐喊之中。[192]

“回首往事，任何人的过去都充满了不安、恐怖、愤怒、饥饿和屈辱”之类的话，并非夸大其词。在战争与战败中，人们受到了死亡的威胁、贫困和饥饿的折磨，因不负责的战争政策而失去亲人，自己的人生规划遭到破坏，为了生存下去而不得不做出一些低三下四的行为。经历了战后十五年的时间，好不容易生活开始安定，伤疤开始痊愈的时候，在宣战书上署名的战争责任人却又犯下了使噩梦复苏的罪行。

当时的人们，在回想起战争时期记忆的同时，又感到自己战后一直承受着的那种心情正在不断凝缩在“岸信介”这一象征之中。正如清水所说，“久久无法说出口的尘封的经验及情感”，现在终于即将获得“表达的机会”。

战争记忆的另一个象征，是阵亡者。5月31日，东京大学召开了罕见的全校教师大会，丸山真男发表了演讲。在呼吁人们与岸政权进行斗争之后，丸山以“最后讲一句。我们日本人是付出了几百万人的鲜血，才最终战胜了压制在人民主权之上的议会政治”的发言结束了演讲。[193]

对战争时期的回忆，也勾起了人们的耻辱与悔恨。在5月27日举行的座谈会上，丸山真男和竹内好异口同声地表示：“当时自己的那种‘要是再坚持一下该有多好’”的悔恨，如今成了“行动的发条”。[194]

此外，6月2日在文京公会堂的集会上，竹内好发表了在安保斗争中广为人知的“四个提案”的演讲。其内容是：第一，如今不是对安保战争赞成与否的问题，而是“要民主主义还是要独裁”的问题；第二，虽然岸信介政权使用了暴力手段，但我方“绝不能使用暴力”；第三，“敌人想借助外国的力量，而我们则不会”；第四，“如果稍胜一筹的话，这次应该很容易失败”。[195]

当然，这“四个提案”都是竹内好既有思想的延续。他头脑中所想的，恐怕是“明知于己不利，却没有进行任何报复”的中国共产党的毒品政策，以及表面上以失败告终最终却促成长期成功的辛亥革命。在该提案的结尾处，他说道：

> 然而，岸信介之流的根源（这种根源归根结底还是在国民心中，在脆弱心灵中存在。在依赖心强、凡事都依靠别人而无法自己决定、缺乏决断力的我们每一名国民的心底存在），我们自己犹豫不决而不能直视这种隐藏着的根源，而这种软弱的心理将会不断助长法西斯主义，这一点一定不能忘记。
>
> 的确，真正的敌人就存在于我们自己的心里。这次斗争，就是自己鞭挞自己软弱的心，直视自己的奴性，就是来纠正这些弱点的艰苦斗争。每一名国民渐渐觉醒的过程，便是我国民主化的过程。……
>
> ……牺牲了时间，牺牲了金钱……之所以这样做就是为了巨大的收获。……通过这次斗争，人们可以在结束之后获得宝贵的智慧。无论身处任何困境，都可以毫不畏缩地生存下去，为了每一个人都能获得生命之源喷涌般的巨大智慧，让我们起来斗争吧。[196]

1960年6月，这次发言得到了人们巨大的共鸣。在当时的人们看来，与岸政权的斗争，已成为与战后日本国内及自我内心中存在的消极心理的斗争。在6月12日的演讲中，竹内好还说道：

> 诸位一定要在各自的岗位上，通过这场斗争锻炼自我，通过锻炼自我，将国民锻炼成为自由民众的集合，也就是日本民族的大集合。……我认为爱国还是十分重要的。在日本民族光荣历史中未曾有过的这种非常时期，日本人应全力以赴重新改写民族的光荣历史。在这场不愧于子孙、不愧于一名日本人的斗争中，我希望能与大家携手共进。[197]

此后转为保守派的江藤淳，也在6月初撰写评论呼吁人们与岸政权进行斗争。在该评论中他向读者说道：“如果我们在这次斗争中取得胜利，那将是日本人战后第一次用自己的双手选择自己的命运。”[198]

新式社会运动

5月19日以后，运动开始迅速高涨。国会周边被连日不断的游行者完全占领，从5月20日开始的一个月动员人数超过了此前一年多动员人数的总和。6月4日爆发了战后最大规模的交通系统大罢工，根据国民会议公布的数字，参加各地集会游行的人数达到560万人。

这种盛况，大大超过了事前的预计。竹内好曾写道："哪怕一次也好，真想带领群众围一围国会，这是那个时期活动家的梦想。但没有任何一个人能想到，梦想竟然这么快就要实现了。"[199]

然而，社、共两党缺乏组织如此大规模运动的实力和准备。不仅如此，两党的干部中甚至有人故意压制那些不按自己想法行动的运动力量。总评事务局局长岩井章在报纸上说："刺激社会舆论的做法一旦实行，社会党的选票就泡汤了"，并表示，"党的利益与方略？这不是废话吗？社会党本来就是民主势力的核心"。[200] 另一方面，共产党则不遗余力地要将运动引至反美民族斗争的方向，故屡次试图将围在国会四周的游行队伍引导至美国大使馆，并对不听从指挥的全学联主流派进行了猛烈抨击。

社、共两党的这种姿态，遭到了人们的反感和冷笑。关于这一点，竹内好写道："我在参加集会后注意到的是，民众对于既成领导者的煽动演说是多么的厌烦和冷淡。"[201] 年轻的政治学家石田雄在6月2日举行的座谈会上谈道："国民已经无法信任任何以往的组织。他们所希望的是能够直接反映一些自己意向的方式。"[202]

在这种状况下，出现了与既有政党和工会不一样的组织。这种变化就是，不再由组织来动员群众，而是群众为表达自己的意愿而创建组织。

例如，年轻的政治学学者筱原一就在当时的一次座谈会上举出5月20日学者和文化界人士举行请愿游行时的小插曲。请愿队伍选出的代表团进入首相官邸后，在外等候的学者们创建了“统一行动会议”，据说“从首相官邸出来的代表团在听到这个吃惊的消息后都略有些惊慌失措”。石田雄也就这件事讲道：“自20日那件事发生以后，那些非常讨厌组织的人意识到必须创建自己的组织，虽然完全没有经验，却自己想出了一套创建组织的新方法。”[203]

借用政治学家福田欢一的话来说，这是由“将组织作为外部给予之物进行接受的思维”向“组织是依靠自己创建的意识”的转变。[204] 这种变化，使战后初期发生“政治与文学”争论后一直为人们所争论的个人与组织的矛盾在不知不觉中得到了化解。自此，对现有的组织不满便自己创建组织的现象开始了。

在5月27日举行的一次座谈会上，丸山真男讲道：“以往的所谓目的意识，总是呈现这样的特点：与其自己创造不如从某个地方请来一套方法。这种做法这次被完全打破了。从某种意义上讲，这难道不是件好事吗？”超越共产党和社会党纲领这一“类似程序”，“与既有革命组织毫无关系却四处爆发着人们的愤怒和行动”，也就是“迷茫中，民主主义开始展现出安定的征兆”。[205]

其实就是人们厌烦了既有组织过于平常的口号。原学生兵安田武说道：“战后十五年（导致战争）这一说法已被用滥”，并称，“革新派政党和工会等的传单用语十年如一日地重复着异曲同工的号召着实让人反感”。[206] 某大学助教说道：“现在的运动几乎都是新式的，即使制作一张海报或传单，也不能仅在原有文案的基础上稍作改动了事。”[207] 这样一来，“安保战争便不是照搬现有模式，而是出现了自己思考出的运动方式”。[208]

其中有代表性的例子之一，是由年轻艺术家和作家组成的“年轻日

本之会”。在5月3日举行的该组织集会的邀请函上，列出了江藤淳、浅利庆太、石原慎太郎、大江健三郎、开高健、武满彻、寺山修司、谷川俊太郎等当时二十几岁的新锐作家的名字。[209] 这次会议的特点，就是没有专门的指挥部和纲领，与会人员皆自发前来。关于该会的性质，代表江藤淳说道：

> 如果没有名称的话还是有点不像样子，诗人谷川俊太郎想出的名称是“年轻日本之会”，这样的组织并不一定为常设，5人到场会员就是5人，50人到场会员就是50人。……需要有负责组织，但这些就交给那些毛遂自荐的人吧。会费就是到场的每个会员能出多少就出多少。如果能召集到很多人，那么运动的扩大就是有可能的。为了召集更多的人，最好的办法就是口口相传。50个人每个人传达给3个人，就可以召集到150个市民。……为了实现拒绝承认强制通过安保条约这一共同目标，我们应该可以承担多声部赋格曲中的某一部分吧。[210]

可以说，这种方式就是后来被命名为“新式社会运动”、“网络组织”等形态的始祖。江藤认为，大家的“政治想法各不相同”，大部分人认为，“游行进行得很好，除了自发聚集到一起游行高声呼喊口号这种表现形式，还可能有其他一些表现形式”。并且，“反权力运动的方法可以多种多样。不会唱劳动歌的人也有政治性诉求”，“这些人的声音并非如齐唱一般，而是如多声部复杂的音乐一样，在其与工人及学生的呼声一致时，政治与生活之间的鸿沟才得以被填平”。[211]

事实上，当时国会周边被从各地聚集而来、举着各式各样标语牌和旗帜的团体组织围得水泄不通，确实呈现出一种“多声部复杂音乐”的状况。“不仅有学生和工会的游行队伍，还有剧团演员、作家的游行队伍，大学教授的请愿团，做小买卖的私营业主的游行队伍，甚至还有打着竹席旗的农民、敲着扇鼓的佛教教徒、带着孩子的妇女。”[212]

社会学家日高六郎指出，安保斗争的特点之一就是“参加者的多样性”。也就是说，“对方是作为民主主义破坏者的清一色的权力主义者，

而己方则是形形色色的阶层”。而且，“战前反动阵营包含了从天皇主义者到社会民主主义者，这与最终的抵抗力量只有清一色的共产主义者的情况刚好相反”。在这种情况下，“民众运动仍作为单一中心的存在应该说进入了不利的阶段”。[213]

在自发创建组织的过程中，人们的意识也发生了改变。竹内好发现，随着运动的壮大，“大学生的求知欲也开始显现出来”。之前虽然上着大学却不以学习为目的的学生，在接连几天反复讨论如何参与游行的过程中，也开始关心起了社会的结构及政治经济。竹内好将这种现象形容为“他们已经摆脱了原本被动的态度。开始主动寻求指导，并燃起了自主研究的欲望”，并表示“这场运动所带来的教育效果是不可估量的”。[214]

竹内好还讲道，在达成共同目标的过程中，“阻隔在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壁垒也渐渐消除了”。而且，“各机关之间的融合也大大加强了。人们变得与邻为善、遵守时间，并最终学会了承担责任”。究其原因，“是由于我们的运动乃是建设性事业”。[215]

6月3日，在游行结束后来到街头进行采访的广播电台职员在报道中写道：“这里已没有大城市中相互关系疏远的‘个人’了。二三十个市民都是非常自然地互相交流和讨论亲眼见到的事情。”在某银行还有这样的例子，以往“关于自己的想法，银行的女职员向来是尽力掩饰而缄口不言”，可一提到关于安保的问题，“两个人一旦开始谈论便会有两三人立刻加入进来”。[216]

维系人们这种连带感的，是对岸信介政权的反对和作为共同经历的战争的记忆。在战争结束仅15年的当时，即使是20多岁的年轻人也都知道那场战争。6月3日，百货公司劳动工会在日本桥举办安保研究会，出乎主办方意料的是，有大量年轻女员工到场。她们的话题起初为安保问题，但之后就“自然地转向了”“自己作为被疏散儿童时饱尝的痛苦，以

及自己母亲成为未亡人后所经历的辛酸等”。当时的报道中写道，以安保为契机，人们战时的记忆“突然栩栩如生地浮现了出来”。[217]

在这种连带感之下，孤立的活动家所常怀有的那种悲壮感和英雄主义都消失了。有关6月4日交通大罢工的报道中就写道，“没有任何人板起面孔，大家都很开朗。队伍中不断传出掌声、歌声”，“大家都表现出一种在做理所应当之事时的爽朗表情”。[218] 竹内也就当日的游行评价道：“那种歇斯底里的亢奋”、“敷衍了事的随声附和几乎都看不到”。[219]

游行本身也在多样且平和的氛围下进行。当竹内好在老家参加的一个名叫“武藏会”的社团举行游行活动时，龟井胜一郎表示：“我讨厌游行。”而竹内虽与丸山真男一同参加了此次游行，但考虑到“有人适合集体活动有人不适合。人们被强行齐喊口号的那种氛围我也反感”，于是允许龟井缺席。竹内还说道，游行是“年轻人高唱歌曲、各党党员高喊口号，他们各喊各的，而我们就是像野餐郊游一样地一边闲聊”一边游行。[220]

日高六郎认为，“战后15年中想都不敢想的事竟然实现了”，并写道：

> 在街头遇见游行队伍时，彼此间眼神的交流十分让人愉快。当自己加入游行队伍时……连带感就会扩散开来。某种不定型的思想、感情会缓慢地……结晶为一种定型的思想、感情。这种结晶的缓慢过程十分美妙。
>
> ……例如6月4日。那天下午人们的表情十分兴奋，犹如节日时一般。这是自信与骄傲的庆典。……交流打破了腼腆并不断加深。建筑物七八层的窗户打开了，人们的手在挥舞，还可以听到鼓掌声。恋人间如闪电般的情感连彻天地。我在夜间的游行队中结识了一位悄悄擦拭着泪水的白发苍苍的教授。到了这个时间段，有时能看到店里的老板娘或下班回家的上班族愉悦地加入游行队伍之中……[221]

高涨的气氛，在一天天地持续着。5月26日时，参加游行的久野收还认为："果然还是不行啊。如果是别的国家，走在路上的行人也会加入队伍，不过在日本不行。"[222] 然而到了6月4日，按照画家小林富的提议，队伍中有人打出写有"众人皆可加入的无声之声会"的标语牌，这时，道路两旁陆续有人加入队伍，由起初的2个人发展到了300人。

竹内好看到6月4号的游行后，将"这些年龄和服装各有不同，信仰和思想想必一定也是多种多样，但在一点即反对独裁者的决意上完全相同的如此之多的人组成的集体"形容为"国民团结的构想现实化并展现在眼前"。据竹内讲，之所以加入其中，是出于此前从未有过的"持续的虔诚？之情"，"并非作为一名士卒，也不是部队长官，更不是司令官或参谋，而只是有种不可思议的连带感在支撑着自己"。[223]

在这样的连带感之下，"士兵"或"司令官"之类的树状组织已失去了意义。将他人按照所属集团进行识别与分类的习惯，也彻底消失了。

例如，参加过"众人皆可加入的无声之声会"游行的两泽叶子，在被擦肩而过的男性问及"这是哪里组织的游行"时，她回答道："并非哪里组织的游行"，"而是人人都能加入的。我们也是刚刚才在半路上加入的"。关于彼此互不相识却一同齐步并进的游行参加者，两泽将他们形容为"虽不相识却亲如一家的人们"，并表示，"游行中我从未感到孤独"。[224]

鹤见俊辅写道，在安保斗争中，以往左翼运动中常见的"某人属于某派，以及类似布哈林主义、实用主义、托洛茨基主义等"给别人扣大帽子的习惯都消失了，对于这种现象，鹤见惊讶地表示："这可太奇妙了"，"是真的吗"，并继续写道：

> ……即使是初次见面的人，互相之间如相识10年、20年之久的老朋友般说话直奔主题也成了平常之事。……因为还没有创立组织，所以只能记住参与创立过程的某人的名字。并且，该人并非组织的会长或理事之类，

> 但只是一名普通成员，也有足够的资格成为商量的对象。……谁来担任哪个组织的干部已不重要，只要有积极意义的想法，那么即使是一般成员也能不断独自谋划、召集会议、起草声明等。
>
> 一方面，这是一个组织的时代；另一方面，也有很多事例表明这是一个如此依赖个人的时代。一切都如个人与个人之间迅速传球般地进行着，因此政府方面根本无法了解其意图，也不了解究竟哪个组织在进行反对岸信介的运动。[225]

组织的持续诞生与个人开始拥有自发性这二者之间不仅不相矛盾，反而相辅相成。竹内好也将同样的状况形容为“想要得到完整的信息就会落后于现状”，“没有必要抓住整体。因为部分代表着整体”。[226] 在这样的情况下，拥有“单一中心”的既有组织失去了意义，就像根茎总是从意想不到的地方发出新芽一样，大量的新生组织相继登场。

既有组织的领导人，无论是保守派还是革新派，都对这种现状感到十分棘手。陷入混乱的他们，试图利用既有的分类范畴去解释自己所无法理解的组织。岸信介首相和自民党干部都将一系列的运动胡乱形容为“国际共产主义的阴谋”。共产党也给超出自己指挥范围并不断扩大的运动扣上了“托派分子”、“挑衅分子”、“美帝间谍”的帽子。

然而参与运动的人们，对这些指责付以冷笑。竹内好指出，“一方一本正经地大谈国际共产主义阴谋说，另一方将全学联主流派在代代木公园的游行定性为美帝国主义的爪牙，这种《前卫》式的一成不变的做法，两者其实半斤八两。而听腻了这种陈词滥调的民众的‘无声之声’其实才是革命的主体”。[227]

“无声之声”一词原本出自岸信介在5月28日的记者招待会上提出的“我认为我不得不倾听‘无声之声’，现在听到的都是‘有声之声’”。[228] 而将只能在既有分类范畴内理解“声”的统治者的用词颠覆的命名，就是“众人皆可参加的无声之声会”。

运动能以统治者无法想象的速度发展，也得益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其中之一，便是作为当时最新通信技术的电话。鹤见俊辅在当时的手记中就写道："我至今想都没想过，电话居然能发挥如此大的作用"，"即使给不认识的人打电话，只要一个电话就能立刻开展工作"。[229]

在1960年，电话还是一种几乎只用于应急的通信手段，使用电话与初次见面的人谈工作，被认为是没有常识的行为。但据鹤见称，"无声之声会"希望在游行时使用一首不同于"以往类似军歌的歌曲"，便于深夜通过电话联系素未谋面的作曲家中田喜直，爽快应承下的中田竟然在一天内便完成了工作，那首歌曲在次日的游行中便开始使用了。鹤见说："自5月19日起，'打电话来有点失礼'这句寒暄的话语，估计要在我们之间消失了吧？"

抗议的表现手段的多样化，同样依靠新技术的普及。油印机的普及，使各地的组织即使不依赖既有组织，也能制作出宣传物和传单。此外，丸山真男也说，"市民对于社会及政治的关注基本依靠游行，但意见书及抗议电报这样一人便能独立完成的方式仍然没有被完全利用起来"，并提出要善于利用新媒体。[230]

实际上，使强行表决这一消息广为人知的，也是当时的新型媒体——电视。由于前一年皇太子大婚登上荧幕，电视的普及率超过了30%。也就是说，安保斗争是人们通过电视机所了解到的最早的政治事件。

例如，江藤淳收看5月19日强行表决的电视报道时，在目睹了社会党议员被警察和"以每天两千日元（但包伙食）雇用，自称议员秘书的黑社会分子""连踩带踢地带走"的场景后说道，"（我）就像受到欺骗和侮辱一般愤怒"。[231] 不管政府如何发表声明，表决时的真实情况已经在电视中一目了然了。

此外，播放器材的便携化，使实况转播这一表现手段成为可能。6月15日关东广播电台采访国会周边的示威游行时，在催泪弹的爆炸声、汽笛音以及警察高喊“逮捕”的声音中，主持人声泪俱下地报道说：“我现在正在直播，但头部刚刚被警察部队打伤了。”这引发了强烈反响。[232]

居住于大阪的家庭主妇矶贝真子，关于当时的电视报道回忆道：“我虽然住在大阪，却能看到包围国会的广大群众。包括被右翼分子袭击的游行队伍，被警察打得鲜血直流的人们，‘无声之声会’平稳的行进，街上小商店的罢工。包括我在内数以百万计的人目睹了这一切，真真切切地感受到这一切。我在电视机前的时候，却有人在顽强地进行着抗争，或许是因为当时的愧疚感，我更加激动了。”[233]这些都是由于电视媒体穿越了空间，创造出了一个“想象的共同体”。

而且，电视在当时并不是一个人在自己的私人空间观看的媒体。鹤见俊辅在5月22号的日记中写道：“我去看了电视。”[234]对于当时没有电视的70%的家庭而言，电视是一种要去街头、食堂或者邻居家才能看到的东西。即使是拥有电视的家庭，也是一家人聚在起居室的一台电视前观看。这就使在场人们之间产生了共同的关心和讨论。当时的电视不是阻隔人与人的媒体，而是作为连接人与人的媒体而发挥作用的。

“市民”的登场

安保斗争，也是“市民”一词作为积极含义固定下来的时期。“无声之声会”的传单上，有如下内容：

> 各位市民，让我们一起游行吧
>
> 哪怕只是五分钟，哪怕只是一百米，让我们一起游行吧
>
> 虽然我们没有特别高明的主张

也没有足够喊出自己主张的音量

但是“无声之声”能清楚地分辨出什么是正确的

让我们一起静静游行，向世人昭示

让我们用自己静静的步伐来表达对于丑陋政治的抗议

虽然我们每天都忙于工作

而且参加游行可能有些难为情

但是今天，如果我们放弃，我们沉默的话

那么日本的情况无论何时也无法好转

即使在某一天被孩子们问及“当时在做什么”，我们也不会感到惭愧

就让我们为了这一点来努力吧[235]

在久野收和部分知识分子那里，自1950年代后期开始，“市民”一词便开始作为积极意义使用。然而，该词往往作为“小资产阶级”的近义词而被定位为与共产党相关的词语，本身则并非十分常见。但在安保斗争中，共产党的权威逐渐下降，独立于依靠“劳动者”及“农民”的既有组织的运动开始高涨，此时，“市民”一词开始作为表现这些运动参加者的词被广泛使用。

如此一来，“市民”在安保斗争中就变成用来形容同时具备独立和团结这一状态的词。政治学家福田欢一在当时的座谈会中谈道，个人自发成立组织并不断产生团结感出现于安保斗争，“归根结底，一人为一党，这就是市民精神”。江藤淳也对兼备独立与团结的“新型市民运动”的重要性加以强调。[236]

用于表达这种“市民”独立于原有组织的状态的词，是“无党派”。鹤见俊辅也指出，“无论在总评、共产党、社会党，还是国民会议中，这

些大组织的干部都失去了领导能力，成员的感情和思想如潮水般冲破了组织的堤坝，在汇入全民性无党无派的潮流后不停地奔涌着”，并将加入“无声之声会”的人们评论为“感觉从他们身上已经可以看到，自由聚集起来的市民能够独自建立新秩序的人民政府的雏形”。[237]

鹤见在这里使用的“无党无派”一词，在当时并非十分常见。“无党派阶层”一词作为新闻标题语固定下来，已是1977年的事了。[238] 并且，当时该词已成为用于表达“无支持党派”及对政治漠不关心之人的词。然而1960年，鹤见在使用“无党无派市民”一词时，该词被赋予了不同的含义。

而且这里的“市民”，也并不与民族主义相矛盾。如前所述，福田欢一在赞赏“市民精神”的同时，还评价道：“日本国民第一次肩负起了作为国民的责任”，“这仿佛预示着作为国民国家日本理论性的生成。”[239] 当时还只能算是年轻的政治学学者的坂本义，更加直接地认为：“以挑战安保这一形式，日本历史上民主主义与民族主义第一次走到了一起。”[240]

不过另一方面，也有人受“小资阶级”一词语感的影响，对“市民”一词存有异议。当时日高六郎就表示：“‘市民’一词给人的印象中，必然包括自力更生这一语感上的意义。这一点虽然很重要，但当民众进行游行、工人举行罢工时，我所感受到的，不只是独立个人的奋起，还有强烈的连带感”，并认为“这无法用任何词语表达。‘市民’这个词总觉得不够全面”。[241]

针对日高的说法，福田欢一指出，“日语中‘市民’一词有两个体系”，马克思主义中的“小资产阶级”与法国大革命中出现的citoyen都被称为“市民”。根据福田的说法，citoyen是指“独立但又有连带感的状态”，“在日本，相当于citoyen的……应该是‘国民’吧”。[242]

正如丸山所一贯主张的那样，法国大革命中出现的“市民”同时也是民族主义的中坚力量，这是政治思想领域的常识。因此，日高与福田在“市民”观上的对立，也并不能模式化地总结为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社会学家日高与肯定法国大革命型国民主义的政治思想史学家福田之间的分歧。

然而，1960年“市民”一词的抬头，与其说是思想上的变化，不如说是语言体系的变化。例如，东京大学理学部教授高宫笃，在解释全校教员集会要求解散国会的声明为何能够征集到大量签名时这样说道：“用古板一些的话说就是，众人皆为国事担忧，用现在流行的话说就是，社会人及市民对其政治责任的自觉。”[243]

也就是说，这里的“忧国”与“市民”，是表达相同心情的词语。其中的区别，不过就是“古板一些的话”与“现在流行的话”之间的不同。而且，无论福田还是日高，都在思考能够表达眼前发生的现象及对自己产生影响的心情的词语时，略带违和感地使用了“市民”一词。

这种心情，如果在战争刚结束后不久，可能是以“武士道”或“明治”等来表达的。实际上，在安保斗争的混乱中，也确实存在用“明治”作为表达方式的例子。如筱原一把安保斗争形容为“昭和时期的民权主义、护宪运动”，竹内好也在5月25日写道：“我们继承了明治的精神，所以能听到内心呼唤自己的声音。‘让我们一起更加奋起努力吧！’”[244]

其实，竹内好也是略带违和地使用“市民”一词的人之一。在进行有关安保斗争的演讲时，他说道：

> 在此我使用了“市民”一词，但是……实际上我并不喜欢这个词。因为该词有些西方味道并且容易被误解。如果可能的话我当然想使用其他词，但确实想不出任何合适的，因此就姑且使用这个词了。……
>
> “市民”一词让人难有亲近感。……在农村，“市民”一词根本无法通用。

> 虽然不能勉强让大家都来使用这个词，但没有可以替代之词又十分不便。以日本的状况，包含独立、均等、团结之意的表示个人的词，或许应该超越“市民”而最终固定为“人民”一词，但即便如此那也是将来的事情，现在用“人民”这个词还是有些奇怪。因此，迫不得已只能使用“市民”这个词了。[245]

如果在1950年代，“独立、均等、团结之意”，应该是用“民族”进行表达的。但在安保斗争时期，共产党不断高呼“民族独立”和“反美爱国”的口号，并将游行队伍引向美国大使馆，而对于不遵从自己指示的势力则将其批判为“托派分子”、“美帝走狗”等。因此，全学联主流派等都反对“民族”一词，并主张“我们的斗争（并非民族独立的斗争）而是必须将岸信介资本家政府作为主要对象予以彻底的打击”。[246]

当年作为一名学生参加了全学联主流派游行的批评家柄谷行人后来谈道：“当时的学生运动曾倡导‘世界革命’，但我认为，那在本质上是一场民族主义运动，只不过当时并没有使用那个词。当然，准确地说是没法使用那个词。总之，是由于处于反复使用‘民族’一词的体制与反体制之间。”[247] 而这样的情况，就成了放弃“民族”并使用为共产党所忌讳的“市民”这一语言体系转换所发生的背景。

事实上，安保斗争中所包含的“民族主义”与共产党所提倡的“反美爱国”原本就不同。人们所厌恶的，是一面从属于美国的权威，一面又在日本民众面前摆出趾高气扬态度的岸信介政权，而并非美国本身。前述《东京新闻》的社论将岸政权形容为“狐假虎威”，其目的是要求“狐狸的下台和艾森豪威尔不做老虎的态度”。

这一态度，也反映在游行的方式上。鹤见俊辅写道：“让我吃惊到开始怀疑自己眼睛的是，6月4日大罢工那天的黎明时分，全学联主流派一直严肃地静坐在品川车站的站台上，而合众社的美国记者竟然能够平静地在四周转来转去。1952年血色劳动节事件时，人们曾跟着日本共产党，高呼‘将那些脑满肠肥的白鬼赶到海里去’（《赤旗》）。但所谓最

激进的学生，却创造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景象。”[248]

此外，安保斗争的口号之一是“保护民主主义”。当时，岸信介政权也倡导拥护民主主义，但其所谓的“民主主义”只是形式上的议会政治和多数表决制，实际上是为将强行表决通过的结果正当化。而运动一方则不同，“民主主义”一词也是作为“独立、均等、团结之意”来使用的。

例如，竹内好以前述的“四大方案”提倡拥护民主主义。他在演讲中强调：“说到民主主义的定义，我觉得归根结底是我们广大人民群众的自由”，“而不是在别人的命令或催促下的行为。自己做自己的事情，不受他人支配。就是这样”。按照竹内的说法，“积极性越发高涨，这就会使连带感和政治意识得到加深”，要给这种状态以及“深处涌现出的国民的激情”“取一个名称的话那就是民主主义”。[249]

当时，竹内还这样说道：

> 坦白地说，我实际上并不那么信赖民主主义。战后，在民主主义及“民主主义”这一词盛行的时候，我甚至因羞于启齿而从未说出口过。知名人物一旦谈及民主主义，总会变得有些可疑。……甚至会因此被认为是法西斯主义者或民族主义者。然而，经历过5月19日，如果问我那时在想什么，那就是现在正是时机。敌人曾经那样高唱民主主义，而现在又将它丢弃，现在正是我们将其捡拾起来的时候。[250]

那之前的竹内，在需要表现“独立、均等、团结”之意时，会避免使用“民主主义”一词，而是选择“国民”或“民族”。这是对许多曾经叫嚣“圣战完成”的人现在反而转为高唱“民主主义”这一现象的反击。但是在保守政权抛弃“民主主义”的如今，“国民则决心改变民主主义的内涵，并加入适合的内容”。[251] 这就与人们曾将美国及保守政权抛弃的宪法作为“自主独立”的象征来进行解读是相似的。

丸山真男也曾使用“民主主义”一词来表达同样的心情。将安保斗争

视为革命第一步的全学联主流派，曾经对拥护“民主主义”的口号表示不满。但丸山在当时的一次座谈会上说道：“有人认为废除安保条约较‘民主主义’更为激进，或者认为‘民主主义’过于温和，没有比这些想法更可笑的了。内政和外交始终都应作为人民自主选择的问题，这是最正确也是最基本的要求”，并主张，“未来的蓝图不是靠上面来给予的，是在人民自发的运动与讨论的过程中产生的，是历史上第一次创造的非舶来制度，是日本特有的‘民主主义’形态”。[252]

这里丸山在重视个人“自发性选择”的同时，也提出了所谓“日本特有的民主主义”这一民族主义的主张。但两者都是表达拒绝靠上面给予“蓝图”这一心情的词，因而并不矛盾。也就是说，在1960年初夏，“市民”与“国民”、“个人”与“组织”、“民主”与“爱国”这些词，都可以成为表达同一现象或心情的词语。

5月29日，在鹤见和竹内等出席的“思想的科学研究会”评议员扩大会议上，“对于应该把现在正在持续的状态定性为革命做法，与会人员基本没有异议”。竹内主张，这里所说的“革命”不是社会主义政党夺取政权，“不是将民主主义作为成品，而是应该作为过程，作为日常的实践进行理解”，是意味着“国民自主确立秩序、形成惯例、制定法律的训练”的“一种精神革命”。竹内从这一观点出发，认为“只将最终权力的夺取视为革命的想法是观念性的”。[253]

“无私”的运动

国民对于安保斗争的态度，总体上来说是支持的。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众人在反对岸信介政权上立场一致，另一方面就是这次运动在当时被视为一种“无私”的行为。

6月4日发生的交通系统罢工就是如此。在生活保守主义不断蔓延的当时，交通系统罢工遭到了广大乘客的反对，工会成员中也开始呈现气

势低落的趋势。藤岛宇内表示，1958年“反对《警职法》时也能看出，政治要求必须与加薪等经济要求同时提出，否则日本的工人就无法开展斗争”。

然而藤岛也承认，“这种传统，在6月4日大罢工中可以说突然发生了变化”，其理由如下：

> 今年春斗[254]的口号，是反对安保和要求加薪。然而由于资方答应将工资提高到往年最高金额，罢工似乎已经无法开展。……终于，在6月4日……发生了纯粹为实现政治目标的罢工。此时在工会成员心中，以往要求加薪时的那种……百般借口的情况没有了，如今的工人已经十分自信，自己将会以全国人民的共同心情为背景并在其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这样一来，工会中常有的工人宗派主义便消失了……没有人在发号施令，然而以为至多两三万人的游行，却自然而然地增加到十三万。……在这种国民自发组成社会的气魄下，产生了诸如游行及警戒结束后认真做好善后工作的公德心。[255]

当时负责采访街谈巷议的广播电台职员报道称，民间“虽然极为反对为涨薪而进行的罢工，却认为这次的确是迫不得已”，该广播电台职员对此感慨道：“这次罢工与工会的实际利益没有直接利害关系，这使得市民因普遍具有的正义感本能地对其产生了共鸣。”[256]因不以加薪为目的而被人们视为“无私”的行动，这一点在鼓舞工会成员士气的同时，也提高了来自一般市民的支持。

被视为这种“无私”运动的象征的，是全学联。由共产主义者同盟控制执行部的全学联主流派，在5月19日前便开始一直不断进行“愚蠢”的直接行动，这使其在运动中起到了领头人的作用，这一点前文已有叙述。曾支持全学联主流派的清水几太郎，写过这样一段话：

> 有歌声和旗帜的地方，就一定有成群的学生。我能为他们做的，不过是进行演讲及募捐这样的事。……学生不同于按日拿钱出来游行的工人，不同于凭借运动得来衣食或升职之路的各组织成员，也不同于凡事都事先

与警察打好招呼再展开行动的职业活动家。无论做什么，学生都得不到任何好处。没有金钱、名誉、升职，而只有牺牲。虽然得不到任何好处，或者说，正是因为没有任何利益可图，他们才会向着既定目标，不顾任何牺牲，勇往直前。在我们看来，这样的行为，不只是正确的，还是美好的！[257]

学生运动，缺乏既有政党那样的战术，是拙劣的。但正因如此，人们才会在运动中期感到厌倦的情况下，仍然对他们那种不妥协的、质朴的单纯予以支持。高畠通敏在当时的一次座谈会上谈道：“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无组织的一般主妇和老年人等的态度自始至终都十分激进。或许是因为满怀着无处发泄的恼怒，有些妇女甚至认为应该索性把岸信介干掉，对全学联也持同情态度。”[258]

可以说，全学联得到的支持，来自这种平民百姓的正义感和激进主义。

不需要养家糊口的学生，较之工人更加好斗，这一点却也给人们留下了好的印象。在当时的报道中，有关民众如何看待全学联的内容，都是诸如“我们这些有家有室的人是做不来的，所以觉得学生们的行为十分可贵”；“我的弟弟是学生。我一直不让他去参加什么游行。但是……自5月20日以来，我甚至觉得没有和弟弟一起去参加游行的自己很没出息”。[259] 人们迫于生计而在不知不觉中不断丧失单纯的正义感，由此产生的负罪感最终变成了对学生的支持。同时，人们的这种负罪感又与他们的战时记忆结合在了一起。目睹了学生游行的一位主妇写道：

我看到了他们每一个人。他们身姿矫健，脸上透着才气。与个人学业相比他们更担心面临崩坏危险的日本民主主义，于是选择参加游行。

对于他们，我真的感到十分抱歉、十分内疚。

口中喊着“万岁，万岁”，手中的日之丸旗淹没了车站，我们将兄弟、父亲送上战场的那一幕仿佛刚刚过去不久，万一那样的事情发生在这些年轻人的身上，该如何是好啊。[260]

列队行进的学生那紧张的表情，唤醒了人们对战时因“学徒出阵”[261] 等战死的年轻人的记忆。当时，人们没有反对战争的智慧与勇气，因此便略带悔恨之情地将学生们看作自己那些死去的亲友。在刚刚进入经济高速增长期的时候，忘记了那些战死者转而投向丰裕个人生活时，人们心中的内疚便化作了“十分抱歉”。

而且，当时的大学的升学率仅为10%，所谓“学生”并非大众化的存在。对于“大学生”，普通百姓心中仍留有一分敬意。因此，当人们认为作为未来精英的“大学生”牺牲“个人学业”是为了追求单纯的正义感时，便会给予其极大的支持。每当学生与警察发生冲突后，街角总会有居民三三两两聚在一起进行讨论。根据当时的报道，在其中的一次讨论中，对于“先动手的是全学联……”这一看法，有人立刻提出“那又怎么样啊！学生会像你一样为所欲为？”的反驳。[262] 他们认为学生并非出于个人原因“为所欲为”，而是为了代百姓伸张正义而去进行斗争的。

有一位中年母亲在媒体采访时说道：“这绝对是政府的不对！看过报纸和电视后我哭了。我憎恨将学生逼到如此地步的政府。”6月3日在首相官邸周围，“市民用热烈的掌声不断表达对一列全学联游行示威队伍的支持”。[263] 对于因游行而疲惫地坐在地上的学生，附近居民送饭团或说些勉励的话来鼓励他们的事也时常发生。

“无私”的表现形式，不限于学生的游行活动。竹内好就为了拒绝在岸信介政权下出任公务员，而辞去了东京都立大学的教授职位。东京工业大学的副教授鹤见俊辅，也步其后尘而辞职。这种行为虽然在政治上毫无意义，却产生了巨大反响。学生中出现了“竹内不要辞职，岸信介立刻辞职！”的标语，以前批判过竹内国民文学论的荒正人也给竹内发来了“你的志向有如一粒麦种，必将结出果实”。[264]

使他们做出这些举动的，是他们的战争体验。无论竹内还是鹤见，都对自己在战争中没鼓起勇气抗议政府而深深悔恨。因此，鹤见在后来

与吉本隆明的对谈中说道，战争期间他虽然认为“为自己不认同的战争目的而死是做不到的”，“但这次安保斗争与那场战争不同，是与我的目的相一致的，所以可以为其万死不辞”。[265]

对这场运动进行攻击的，是右翼团体。6月15日傍晚，打着“维新行动队”旗帜的右翼团体，乘坐两台卡车冲入新剧演员的队列，用钉有钉子的木棒和铁棒殴打他们。而此时负责保卫国会的警察部队并没有制止右翼分子。女性是攻击的主要对象，据说约有60人不同程度负伤。

战后一直低迷的右翼运动在岸政权的统治下势力不断膨胀，1958年1月，原内务大臣安倍源基和防卫厅厅长官木村笃太郎作为代理理事，成立了新日本协议会。1959年，全日本爱国者团体会诞生，这两个团体开展了安保修订促进运动。右翼开始对日教组教研大会进行阻碍工作，也是始于1958年。自民党干事长川岛正次郎为艾森豪威尔访日的安保和欢迎工作，制定了动员右翼团体的计划。[266]

右翼的袭击刺激了全学联主流派，就在6月15日下午5点半，学生们冲进了国会。但共产党在“反美爱国”的口号下，将其旗下的游行队伍从国会前引导至美国大使馆前并解散。孤立后的全学联主流派的游行队伍被警察镇压，仅被救护车运走的伤者就超过了589人，东京大学女学生桦美智子死亡。

当晚，与“无声之声会”成员一起留在国会周围的鹤见俊辅，在批判共产党的态度时写道：

> 普通市民，对马克思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之类皆无兴趣，只是希望帮助那些冲击着腐败政府的学生。事实上也正是因为如此，稳健的市民运动和激进的学生运动才会形成相互关联的结构，组成整齐的游行队伍，排除破坏者混入的危险。将处于危险境地的学生带到外面解散的做法，纵使这是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所做出的行动，在市民看来也不得不认为是非常草率的。[267]

正如鹤见所指出的那样，全学联主流派之所以获得支持，绝不可能是因为舆论对掌握全学联指挥部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革命思想产生了共鸣。参加全学联主流派游行的学生同样如此。一名学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被大众媒体用类似全学联主流派或反主流派这样的标签加以区分，着实让我们很反感。"[268]

关于一般学生的情况，当时东京大学的一名学生在信中写道："每天我们都会反复争论反主流派平和的游行和主流派过激的游行二者哪个更有效果，班上的同学也因此一分为二并分别参加主流派与反主流派的活动。"据说，即使在共产党系的学生中，也有参加闯入国会游行的人。[269] 对大多数学生来说，参加何类性质的游行，只是对适合寄托自己心情的表达方式的选择。

久野收在当时发表的题为《市民主义的形成》的文章中指出，大部分学生与共产主义者同盟和共产党无关，"报道方虽然因无法对其命名而使用了主流派和反主流派等称呼，但他们实际上是没有派别的市民学生。他们是为了改变目前的状况挺身而出，与马克思主义及革命运动几乎没有任何关系"。[270] 日高六郎也根据自己观察到的情况写道："自发的参加者大量增加，如今按照全学联主流派指导方针行动的只占全体的二十分之一左右。"[271]

因此，当时也存在共产主义者同盟掌握的指挥部与参加游行的学生之间对立的情况。在6月4日的交通系统大罢工中，全学联主流派指挥部反对解除限时罢工，并命令学生游行队伍在车站前静坐示威。这时一名参加游行的学生抗议道："国铁的人在冒着被解雇的危险进行游行，我们只要对其进行援助就好。但领导者对国铁的提议置之不理，也没有告诉我们。"[272] 虽然在安保斗争结束数年之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一名干部从右翼分子那里接受资金贿赂的丑闻被曝光，但当时参加游行运动的学生，其心情未必与干部相同。

而且事实上，即使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干部，也不能说就是从理论上信奉马克思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的人。根据共产主义者同盟成员西部迈的回忆，“对共产主义者同盟来说，所谓‘革命’，是表达纯粹性和彻底性的一种理念词语。因此，‘革命’一词虽然听起来可谓异常真挚，但几乎没有任何一个人认为，也没有任何一个人愿意认为这一词语已经变成了现实的状态”。[273] 从这个意义上说，与拘泥于表面用词差异的共产党相比，对学生的纯粹性产生共鸣的普通百姓准确地理解了共产主义者同盟提倡的“革命”的含义。

成为这种“纯粹性”的象征的，是6月15日死去的女大学生桦美智子。生于1937年，作为大学教授的女儿，桦美智子是一名道德感和正义感极强的女性。据她的父母和老师的回忆，从上幼儿园时开始，例如扫除或除草时“一个不做了，两个不做了，最后所有小朋友都离开了，而美智子却一个人仍旧默默做着”，她就是这种类型的人。[274] 在桦美智子死去的6月15日当天，母亲曾阻止她去参加游行，但她反驳道：“那些人（工人）是有自己家庭的。他们太不容易了。所以学生要去做。因为一定要有人去做”，然后就冲出了家门。[275]

桦美智子的这种性格，在学生中也广为人知。据西部迈的回忆，在听大学前辈的桦美智子演讲时，“对她非同寻常的诚实印象深刻”，“在听到六·一五事件中有人死亡时，直觉告诉我那一定是她”。[276]

事件发生后出版的桦美智子的遗稿集被命名为《悄悄地微笑》。该书名节选自桦美智子遗稿中的诗：

有人在嘲笑我 无论是己方还是对方 都在嘲笑我

不过没有关系 我走我自己的路

嘲笑我的人 也在走自己的路

不是常说吗 谁笑到最后 谁就笑得最好

但是 我想自己无论何时都不会笑

无论何时都笑不出来 这样也好

倘若可以的话 最后

我想悄悄地 微笑一下[277]

桦美智子的死，引发了巨大的反响。竹内好曾说："许多人都认为桦是替自己而死的。"当时还是初中一年级的和歌作家道浦母都子说道，"复杂的事情我当时还不太懂"，"但有人敢于为自己坚信的事业付出生命"这一事实，"使我受到了震撼般的冲击"。[278] 19日举行了桦美智子的"国民葬"。对此，毛泽东主席评价道："桦美智子已成为全世界闻名的日本民族英雄。"[279]

对于那些燃起纯粹的正义感，即使只有一瞬间也真正相信过"革命"的学生而言，冲击更大。当时还在京都上大学的评论家保阪正康，在回忆学生们听闻桦美智子的死讯后的反应时这样说道："有人坐夜班火车赶赴东京，还有人表示'不会再返回京都'，并留下好似遗言的话跳上了火车"，"在我周围，这样的情况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在当时的学生中这样的做法是理所当然的"。[280]

不过，人们事实上是对桦美智子所象征的某些东西产生了共鸣，其心情并不一定与马克思主义的词语相符。例如，在6月23日全学联在日比谷公会堂为桦美智子举行的葬礼上，有数千人到场。据清水几太郎的回忆，当时是由共产主义者同盟总书记岛成郎致悼词，"无产阶级、帝国主义、共产主义、革命……这类词语频繁出现"。清水说，"当时我认为大家不是为了听那些东西而来的"，于是"厉声斥责道'岛君，不对，不是这样的'"。[281]

桦美智子的死也动摇了岸政权。在桦死亡当晚，6月16日零点刚过，内阁就召开了紧急会议以商议应对措施。认为安保斗争是"国际共

产主义的阴谋”的岸、佐藤、池田等人认为，应该最大限度地动员警力，强行确保艾森豪威尔19日访问日本的计划顺利进行。但是，被问及能否出动维持治安时，陆上自卫队幕僚长却面露难色地说：“如果强制出动的话，将会危及自卫队自身的存亡。”警察厅长官柏村也直言：“对于这次的游行队伍，机动部队和催泪瓦斯的力量是无济于事的。现在只剩一条路，就是首相要纠正自己无视国民声音的态度。”[282]

此外，从6月上旬开始，天皇的亲信也开始反对强行实现艾森豪威尔访日。如果这时安排美国总统与天皇会面，那么国民的反感很可能会指向天皇。而避开预计会爆发游行的机场迎接仪式，让总统乘直升机直接前往皇宫的方法，同样也被宫内厅以“可能造成皇宫被红旗包围的局面”为由拒绝了。[283] 在这种情况下，岸信介也不得不低头，最终在16日决定取消艾森豪威尔访问东京的计划。

然而，对于桦美智子的死以及全学联的直接行动，也存在批评的声音。日本共产党的机关报，以桦美智子是全学联主流派的学生为由，事实上对此事采取了漠视的态度。警方把桦的死归咎于游行队伍的混乱。自民党和日经联则认为桦的死是全学联的过激行为导致的。在决定取消艾森豪威尔访问东京计划后的第二天即17日，东京七家主要报社发表了题为《排除暴力，保卫议会主义》的联合声明，对全学联进行了批评。

对于这种批评，拥护学生的鹤见俊辅在6月18日的文章中写道：

> 他们大部分是赤手空拳与武装警察对抗，闯进国会时也是一样。被打了一次又一次，却坚持冲了进去。这种行为是出于强烈的反暴力精神，为什么报社的社长及要员、日经联的理事们、自民党的议员们对此视而不见呢？这里没有大正时期东京大学新人会学生运动中的那种领导意识和英雄主义，只有不知名的年轻人意志的表达。桦美智子的死，是无数不畏死亡学生的体现。[284]

鹤见后来讲道：“学生们的政治计划无论当初还是现在我都不认为

是可行的，但他们的态度远远高于他们的计划，无论当初还是现在我都为之感动。”[285] 清水几太郎“全学联粗暴的（无私的）行动，使安保斗争不断升级”的形容，所表现的就是这样的状况。

虽然全学联为了与日本共产党对抗而极力避免使用“民族”及“爱国”等词，但年长者经常会用“爱国”一词来表现对学生产生的共鸣。桦美智子的父亲就说：“学生们是出于真真正正的忧国之心，才决定必须采取行动的。”日教组委员长小林武也认为，“年轻人的爱国行为远远超越了在教育敕语的精神下受到教育的大人们”。6月15日晚与清水几太郎会面的某日共党员曾目视地面说道：“将爱国者指责为托派分子……这种话太无耻了。”[286]

在当时“日之丸”已经被政府和右翼当作象征来使用的情况下，很多游行队伍不管信仰社会主义与否都高举红旗。然而6月5日《每日新闻》上刊登的某团体要员的投稿中，却写着“如果作为日本人反对安保，那就应该堂堂正正地高举‘日之丸’进行活动”。[287] 事实上众所周知，高举“日之丸”反对安保的游行队伍是存在的。[288]

“爱国心”和连带感的高涨，带来了对于“流亡”的批判。竹内好说道：“我现在觉得自己当初甚至妄想放弃国籍的事无比可耻。”鹤见和子在桦美智子死后不久写过一篇题为《为青年偿命的人》的文章，其中指出，“对‘不负责任的体系’的岸内阁而言，即使失败也可以走流亡这条安乐之路。但国民不能流亡”。[289] 当然后者的发言是基于韩国独裁者李承晚流亡美国的事件。

鹤见俊辅作为《思想的科学》的编辑参加了当时的一次座谈会，他在会上说道：“从前，我打算放弃国籍的想法非常强烈，听到民族主义或爱国心这类词就会感到毛骨悚然。不过‘五·一九’事件之后，我第一次觉得‘能生在日本真好’，也第一次有了日本与整个世界是相互联系的感觉。我认为这才是日本在战后所应有的目标。”[290] 也就是说鹤见对桦

所象征的“无名青年”的连带意识，使其恢复了对“日本人”的信赖。

斗争的终结

那么，这场安保斗争的国际反响又是如何呢？

6月上旬，美国方面的大部分报道是“少数人的过激行为”、“共产主义煽动起来的压力”、“没有报道证明有群众参加”等内容。[291] 英国和联邦德国的报道也是大同小异。

事实上，安保斗争在当时人种偏见还十分强烈的欧美诸国看来，不过是议会政治还不成熟的亚洲小国发生的一次暴动而已。5月19日强行表决的纪录片在英国上映，当影片播放到社会党议员团被警察架出场外的画面时，观众席顿时“一阵偷笑和啧啧之声”。同样的纪录片在华盛顿上映时，也是“满场的嗤之以鼻或狂笑不已”。[292]

然而，当运动扩大到出乎人们预想的规模时，嘲笑却变成了恐惧和憎恶。6月15日桦美智子遭遇不幸之后，英国的《周日快报》将其形容为“东京狂热的年轻人”，“曾经攻击珍珠港，在新加坡残害我同胞的狂热分子的后代”。在美国，出现了“牢记珍珠港”这一说法，《纽约时报》的记者认为：“日本人无论战前还是战后都毫无改变。”[293]

6月10日，在艾森豪威尔访日之前，总统秘书哈格蒂先行来到日本。倡导反美斗争的日本共产党动员全学联反主流派发动游行活动，被包围的哈格蒂最终是靠乘坐直升机才狼狈逃出。16日，日本政府又发表了艾森豪威尔中止访日的消息。

对于这种情况，美国政界的态度十分强硬。6月17日，在美国国会，出现了“如果岸政权倒台，日本应该会变成一个共产主义国家”（上院议员约翰逊）、“向这样的国家投资没有任何意义”（上院议员约翰斯

通）、“日本如果不把依靠从我们美国得到的美元组建起来的军队用于护卫友好访问中的美国总统的话，那么究竟什么时候才会用于两国的所谓共同目的呢？”（下院议员赛克斯）的声音。[294]

此外，从游行队伍的包围中逃脱的哈格蒂也评价道：“从高唱《国际歌》这点上看，这些人应该是对日本没有丝毫忠诚的人。”而竹内好则对这种言论感到愤慨，同时评论道：“他心里是否根本没将日本看作一个独立的国家。他嘴上说‘对日本的忠诚心’，其本意是不是想说对美国忠诚呢？”[295]

事实上，按照《每日新闻》的形容，当时的欧美各国“对日本的无知到了惊人的程度”。美国共和党上院议员基廷6月16日说道：“岸首相如果不是一位如此有能力领导人的话，岸内阁早就倒台了。”对于美方的这种论调，矶野富士子反驳道：“岸信介是制定袭击珍珠港计划并对英美宣战的东条内阁的阁僚，这一点美国又有几人了解？”[296]

这种对日本缺乏了解的现象，与外务省的态度也有关。日本驻海外各使领馆遵循了保守政权所谓的“国际共产主义阴谋”的看法，而并没有将安保斗争已扩大为民众运动的情况知会各国。归国后的驻美大使虽出席了《中央公论》的对谈会，却只是一味地感叹日本对美国的“失信”。[297]

然而，欧美的这种观点，却将日本报刊对安保斗争的评价引向了负面。6月20日的《朝日新闻》中写道：“我们不能忘记日本人是如何被别人看待的这个现实。”6月17日的《每日新闻》也就艾森豪威尔访问东京一事被取消的问题，报道了“日本在全世界丧失了国家的威信。还有比这更令人感到耻辱的事吗？”这一美国记者的看法。[298] 同样也是在欧美观点的影响下，各报社才会在6月17日发表《排斥暴力，保卫议会主义》的联合声明。

当时日本的报刊所特别关注的，是欧美媒体将安保斗争与几乎同时发生的韩国及土耳其的政变当作类似事件进行报道的现象。《每日新闻》在转载欧美媒体对6月4日大罢工的报道时写道：“日本的民主主义给人们留下了一种与韩国、土耳其处于同一水平的印象”，“日本简直被当成了发展中国家”。[299]

这种声音在政界也存在。6月4日的罢工后，社会党江田三郎面对自民党国会对策委员长说道：“我只想说，不要将日本变成韩国一样。”岸信介一方则在6月2日评论道：“虽然有人将日本政局的现状与韩国和土耳其相提并论，但是与言论不自由的这些国家相比，日本则自由得甚至让人觉得有些过分，这是根本上的不同。”[300]

然而竹内好对这种风潮进行了反驳，他认为“报纸上说日本的国际地位在下降，政府也这么说，但这完全是无稽之谈。是政府的地位下降了，而日本人的地位却大大提高了”。鹤见俊辅也说道：“报纸上总是将游行队伍称作国耻，到底什么才是国耻，我无法理解。”[301]

实际上，在非欧美地区还是存在对安保斗争的支持的。1960年4月在几内亚召开的第二届亚非人民团结大会上，通过了批判《日美安保条约》的决议。印度代表在演说中称：“岸信介政府是我们全亚洲人之敌。”在埃及，各报刊批判了日本政府的“对美依赖外交”和美国的军事同盟政策。6月16日的北京《大公报》盛赞了“日本的爱国烈士们”，并称当时居住在莫斯科的日本人“每人都被拍着肩膀从苏联人那里得到了祝福”。[302] 从中苏的反应上可以看出冷战的影响，但亚洲其他各国则是对日本的“民主主义”产生了共鸣。

在部分欧美国家，也存在对这次运动的肯定评价。英国《每日纪事报》就评论道：“全都归咎于共产势力的煽动是自欺欺人”，“若将日本当作朋友，就应该支持日本真正的自由主义分子和民主的社会主义者”。美国《华盛顿邮报》刊登的评论文章也指出，日本大多数进步派

是“非共产主义者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不是莫斯科和北京的文化奴隶”。英国《每日邮报》也评论道：“日本是名义上的独立国家，实际上却是在美国保护下的一个被占领国”，如今“日本的被动角色将要结束了”。[303]

关于韩国，日本国内也有与报纸或现存政党不同的看法。学生游行示威导致政府下台这一韩国的事例，在日本国内运动一方看来，不如说是一个值得学习的对象。东京都自治会联络会议就表示，6月13日的行动“取得了与韩国以及土耳其的学友之间强大的国际关联性”。[304]

然而，这种声音是否并非表面上的华丽辞藻，而是基于对韩国及亚洲现状的正确理解，还有让人质疑之处。其表现之一，就是对冲绳的看法。

在安保斗争中，美军基地集中的冲绳是一个焦点。但是在安保审议过程中，保守派虽然试图将冲绳纳入作为安保条约适用范围的“日本”，社会党等却提出反对，最终冲绳被从安保条约适用范围中去除。如前所述，通过约定驻“日本”美军基地遭受攻击，将被视为“日本”自身遭受攻击，日本将采取反击，从而使美国担负起防卫日本的义务，是新安保条约的重点。因此才会有人担心驻冲绳美军基地遭受攻击时日本本土也会被卷入战争。

深深体会到这种矛盾的，是在东京参加安保斗争的冲绳籍学生。6月16日，美国宣布中止访问东京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将经冲绳转道前往菲律宾。关于当时运动一方的反应，冲绳籍学生仲宗根勇写道：

> 当时，我已经做好了在“安保”中牺牲的心理准备。在文学部的桦美智子被国家政权的爪牙杀害的那晚，我愤怒地哭了。……在安保斗争中，我不是作为“半个日本人”，而是作为一个“全日本人”＝本土出生的日本人参加行动。那种强力的扭打、叫喊以及欢呼，只有我们的冲绳将来完全被纳入日本时，才是我们时代的开始……然而，那日，面对高呼阻止访日口号静

> 坐在国会前的广大民众，执行部自豪并略带悲怆地宣布了阻止访日成功的消息。“……艾森豪威尔的访日被成功阻止了。我们胜利了。卑怯的艾森豪威尔逃到了冲绳！”广大民众为此欢呼不已。而我却感到万分惊讶。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艾森豪威尔到达冲绳，换句话说，难道不就是已经踏上了日本国土=冲绳了吗！[305]

在这件事情上，冲绳很明显被排除在安保斗争中的“国民性”整体之外。仲宗根受到这样的打击后想到，“完全不明真相，难道对于日本本土的人们，特别是聚集在这里的所谓革新派人士，冲绳也只是存在于加入了偏见与先入为主看法的知识和意识中吗？”这让他不得不开始思考“对日本来说冲绳是什么？不，首先‘日本国’是什么？更深一层的问题是，所谓国家到底是什么？”[306]

事实上，安保斗争的高涨也并非覆盖到了全国。声援过三井三池煤矿争议的诗人谷川雁称：“据我所知，即使在5月19日以后，全国各地的运动情况也没有在质的方面有所高涨。”漫画家柘植义春在一部有关黑市大米流通的自传性质的作品中也承认，自己甚至不知道存在“安保”一事。[307] 斗争达到盛况的地方，可能仅限于东京及各主要城市。

当然，舆论调查的结果显示，不支持岸政权的人还是居多的。但在6月于长野县农村进行的调查中，虽然赞成安保的人极其少见，但也没有发生特别明显的抗议行动。此外，赞成与反对意见的主要特点是，“反对安保的理由与战争有关，赞成安保的理由则与经济有关”。[308]

东京同样具有这种特点。在6月4日进行大罢工时，新闻记者采访到了一段工会成员间的对话，其中一人说：“此次如果拒绝安保，美国就会停止援助日本，那么日本经济就会面临困境。大家就不得不去过极其贫困的生活。”另一人反驳道：“即便果真如此，人们也应该咬紧牙关去忍受贫穷的生活。”[309] 这表明，战后初期那种主张和平与复兴经济相结合的时代，正在随着从属于美国的经济发展的持续而走向终结。

此外，高畠通敏虽然提到平民区的主妇和老人都支持全学联，但同时又表示："即使同为一般市民，所谓白领阶层却并非如此。"[310] 关于这次运动，某证券公司的职员的评价只有一句："股票不会下跌的。"[311] 一位夜间在球场接受采访的上班族也表示，虽然自己在反对安保的抗议书上署了名，"却觉得这没有意义，反正政府也不会理睬。政治不过是政治家在赤坂召开会议决定的"，"战争不可能爆发。既然不会爆发战争，那与美国联合能多捞点好处有什么不好"。[312]

当时，某"知名大企业的核心领导"在接受采访时说道：

> 像这次一样精神层面的运动达到如此盛况，想必今后不会再出现了。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进行活动的领域，正在逐渐地缩小。我们的学生时代首先是学哲学，但最近加入公司的家伙们从一开始就是为就职而学习的。现在，据说从幼儿园开始就是这样。所谓标准化，现在就是这样的时代。[313]

运动的参与者也有同样的担忧。在6月初《朝日新闻》的报道中，国民会议事务局局长水口宏三透露，"政治斗争在国民生活相对安定的时期所具有的局限性，我认为应该是无法超越的"。[314] 在街头接受采访的学生说："要是每天都参加游行，我们也会有累的时候"，"为就业而四处托人，不参加游行而是一心扑在学习上的人，在我看来才非常成熟"。某杂志编辑说道："这次若是失败，那无论做何事都无法成功的绝望感将会更加浓厚，人们会比以往更加漠视政治，颓废的情绪会在青年一代中不断蔓延。"[315]

5月19日的强行表决通过只要经过30天，安保条约便可不经参议院审议而自动生效。6月19日这一生效的期限即将来临。桦美智子死亡的6月15日、艾森豪威尔访问东京被取消的16日，以及《排斥暴力，保卫议会主义》这一联合声明发表的17日，国会一连数日被庞大的游行队伍包围，而岸信介首相的态度却还是十分强硬。

作为反对运动的一部分，一些人曾寄希望于自民党反主流派的造反。但自民党内部出现了一种预见，认为安保条约通过之前的一切事务交给岸信介，之后再由他人接管才是上策。而运动一方又缺乏制胜手段，以社、共为首的革新政党也无法提出具体的方针。

6月18日深夜，正值安保条约于零时生效的前夕，游行队伍已经将国会包围了整整一夜。因数日的游行和逮捕疲惫不堪的全学联，打着“不要让桦小姐白白牺牲”的口号，发起了最后的大规模总动员。[316]共产主义者同盟总书记岛成郎在谈及当晚的情形时回忆道：

> 1960年6月18日，在日美新安保条约一分一秒地接近自动生效的那个晚上……我束手无策地蹲在地上，就像从已经空空的胃中挤出一般地呕吐着。这时，在我身旁，站在“共产主义同盟”旗帜旁的生田一脸愤怒地一边挥舞着手臂一边叫喊着“畜生！畜生！有这样的力量，这样的力量，却什么也做不了！共产主义者同盟也没用！”[317]

就这样，指针指向了零点，安保条约自然生效。19日，内阁官房长官发表讲话称：“顽固反对本条约者，是受国际共产主义蛊惑的少数人。”[318]对于安保条约的自然生效，社会党也只是发表了“新条约是违宪”的声明。

20日，乘在野党的疏忽，参议院自民党、安保特别委员会单独召开了会议，并一举通过了安保相关法案。22日，美国上院承认新安保条约，岸信介首相于23日在外相官邸交换批准书后，宣布内阁总辞职。

对于这样的结果，人们的反应各异。清水几太郎在安保条约生效的当晚，因受到失败的严重打击而痛哭流涕。与此截然相反，丸山真男则认为，与斗争中实现的“秩序意识、连带感”的“压倒性印象”相比，“‘自动生效’的那一瞬间在我脑海中所占据的位置根本不值一提”。[319]

从总体上看，知识分子中像丸山一样认为这是一场“胜利”的人不在

少数。竹内好也认为，安保条约的通过与5—6月的“国民的经历”相比根本不值一提，并宣布这是一场“胜利”。从竹内“惨胜不如荣败”的主张来看，这一反应也是理所当然的。也有很多人认为，安保条约形式上虽得以通过，但从动摇日美政府这一角度看，运动实际上对安保体制起到了釜底抽薪的作用。

然而，对于这种从大局着眼的评价，看中“纯粹性”而呼吁阻止安保的全学联主流派，则将这场斗争总结为一次“败北”。在他们看来，仅依靠部分成果就宣布“胜利”的态度是妥协的、不纯粹的。如第Ⅲ部中所述，这种对立，导致了全学联主流派的支持者吉本隆明此后对“战后民主主义”的批判。

无论胜败的定性如何，在安保条约生效、岸信介首相辞职以后，游行迅速降温。事实上，5月19日后运动的高涨，主要原因本来就并不在于反对安保条约，而是出于对岸政权的反对，以及受到了全学联所代表的“朴素”正义感的鼓舞。岸信介辞职、安保条约通过，从“朴素”的正义感来看运动无疑已经“败北”，当然运动也就不可避免地开始退潮了。

奉命来日本采访东京“革命”的意大利新闻记者，在6月19日给总部的电报中写道“未发现革命”。在接受《每日新闻》采访时这位记者说道：“我也曾做过那样的梦——社会改革，对进步的热情。十年后再想想，就会明白梦的虚幻。最坚定的进步主义者会变成最坚定的保守主义者。”[320]

刊载这名意大利记者采访的6月26日《每日新闻》上还有这样的报道：1960年3月毕业的大学生的就业率刷新了战后最高纪录。几乎就是完全成功就业的状态。6月27日的《周刊文春》将“游行结束了，那么工作吧”作为特辑报道的题目。[321]

当时任报社记者的辰浓和男写道：

从政治的季节转向经济的季节，从煤炭转向石油，世界在不断改变。当时作为社会部记者的我，曾让中小学生们以“我们的未来”为题写一篇作文。

少年A说：“虽然想加入全学联去尽情反对政治，但考虑到就业还是算了。我想进一家待遇好公司，通过炒股之类成为百万富翁。”

少女B说：“我想在大学里悠闲地生活，出来工作一两年后就结婚，然后当妈妈，当奶奶，直到死去。”

这就是孩子们内心的真实想法。不久以后，私家车、私人住宅就会取代粉碎安保而成为流行语。[322]

在这种风气下，安保斗争结束后，哀叹爱国心低落的论调开始在保守论者中流行。右翼团体“新日本协议会”代表理事安冈正笃在1961年谈到战后爱国心低落的原因时说：“进步阵营持爱国心否定论，这是众所周知的。”[323]福田恒存在1962年指出，“战后教育首先是从否定过去的文化开始的”，“以否定爱国心的形式，直接向孩子们灌输和平及人道主义”。[324]这样的保守论者反复强调，爱国心和道德水平的下降，是受到了占领政策和“战后民主主义”的影响。

1960年11月，《御茶水女子大学新闻》刊登的学生投稿中，叙述了安保斗争结束后的心情：

我已不相信日本人之间的团结。只是在手拉手组成人墙的一瞬间相信过。但在分开之后，我身旁的人就都成了与我完全无关的人。与我无关的人越来越多……“学生大众”的享乐主义是安保斗争遗留下来的。只有绝望，哪里有团结的纽带？[325]

1960年的安保斗争，是战后日本进步派通过使用“爱国”、“民族”等词表达心情的最大并且也是最后一次爆发的事件。接替岸信介成为首相的池田勇人，就任后发表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正式拉开了经济高速增长的序幕。同时，围绕战后日本的“民主”与“爱国”的言论进入了一

个变化的时代。

---

[1] 为了考察1950年代的护宪论，本章各节将涉及如下内容：（1）重新武装之前美军的情况；（2）反美意识抬头与批判重新武装的关系；（3）当时以“和平问题谈话会”为中心的非武装中立论与民族主义的关系；（4）全面媾和论与对外关系，特别是对战后赔偿问题的认识；（5）1953年前后护宪论的特征和作为宪法的“保守性感觉”（丸山真男）的确立等。

在上述问题中，涉及（1）的研究包括细谷千博『サンフランシスコ講和への道』（中央公論社、1984）、五十嵐武士『対日講和と冷戦』（东京大学出版会、1986）、渡辺昭夫·宮里政玄編『サンフランシスコ講和』（东京大学出版会、1986）、大嶽秀夫編『戦後日本防衛問題資料集』（各卷解说），等等。此外，还有许多政治史研究者的研究成果。作为政治过程的研究，本章并非要进行内容上的添加。但非说不可的话，笔者认为在政治史研究中，有这样一种倾向，那就是过分将麦克阿瑟、吉田茂等作为合理性存在来进行研究。比如，麦克阿瑟基于怎样的国际形势认识，大概从何时开始思想转向重新武装论，这是一个问题。但是，人并不是能够基于现状认识来采取政治行动的合理性存在，也有为了使自己的主张正当化和面子而构建现状认识的可能。笔者基于这一社会学的观点，认为护宪论和重新武装论是从一开始就在麦克阿瑟等人内心作为矛盾同时存在，出于与本国对抗的关系以及面子的原因，在这时形成了利于自己的现状认识。

关于（3）和平问题谈话会的研究，有関寛治「平和の政治学」（「行動論以後の政治学」『日本政治学会年報』岩波書店、1977）；五十嵐武士『対日講和と冷戦』、230—245頁；都築勉『戦後日本の知識人』第3章；等等。但是，这些研究很少关注战后知识分子的战争体验及其与日本共产党的对抗关系。本章认为从和平问题谈话会发表的声明来看，其思想并无新意，毋宁说是1946年吉田首相和麦克阿瑟主张的翻版，采用了“占有”这一文化翻译的观点。此外，关于《旧金山和约》免除赔偿的原因，虽然受到很多政治史研究的关注，但是在（4）中并没怎么讨论全面媾和论与赔偿问题的关系。

还有，关于（2）和（5）的既有研究较少。关于保守派的重新武装论和修宪论，大嶽秀夫『再軍備とナショナリズム』（中公新書、1988）和渡辺治『日本国憲法「改正」史』（日本評論社、1987）等进行了详细的论证。然而无论从反美意识与对于再武装批判之间的关系，还是从共产党、社会党的宪法观变迁或战后知识分子的民兵制构想的观点，都能看出当时的非武装中立论和护宪论并不是单纯的和平主义，但这一点至今仍没引起人们的关注。西修『日本国憲法の誕生を検証する』也仅仅是将社会党的修宪论稍微用历史修正主义的方法进行考证。本章中关于（5）的论点作为考证虽然是概述性的，却指出了研究中的问题所在。

全面媾和论与民族主义的关系，以及进步派内的修宪论等，因为不符合1955年后革新势力的既定印象，所以普遍认为有被忽视和隐藏的倾向。如第九章所述，如果将这些问题束之高阁，就会有让来自右派的历史修正主义乘虚而入的危险，所以本书认为做些适当的总结是必要的。此外，当时的全面媾和论轻视了对亚洲赔偿的问题，最终丧失了说服力，并不可避免地沦为美国的从属。为了结构性地把握1990年代以后的战后赔偿问题，也有必要对媾和讨论进行考察，这是本书的另一观点。对于政治史研究者而言，可能会由于本书所引用的资料未按照时间顺序排列而产生不适感，但在这里事先说明笔者采用的是1950年代初的叙述结构。

[2] 例如，「憲法公布一周年に寄せて」『朝日新聞』1947年11月3日；「新憲法精神の充実に努めよ」『毎日新聞』1947年11月3日；等等。引自「目覚めた女性」『毎日新闻』1948年5月3日。

[3]「はき違えた違憲の訴え」『日本経済新聞』1948年5月3日。

[4]「考えねばならぬ再軍備問題」『毎日新聞』1950年8月29日。

[5] 大嶽秀夫編『戦後日本防衛問題資料集』第1巻、三一書房、1991、93頁。

[6] 大嶽秀夫編『戦後日本防衛問題資料集』第1巻、248頁。

[7] ジョン·ダワー『敗北を抱きしめて』下巻、352頁。

[8] ジョン·ダワー『敗北を抱きしめて』下巻、351頁。

[9] 大嶽秀夫編『戦後日本防衛問題資料集』第1巻、252、254頁。

[10] 大嶽秀夫編『戦後日本防衛問題資料集』第1巻、214頁。

[11] 大嶽秀夫編『戦後日本防衛問題資料集』第1巻、256頁。

[12] 三浦陽一「日本再武装への道程」『歴史学研究』第545号、1985年。

[13] 大嶽秀夫編『戦後日本防衛問題資料集』第1巻、235頁。

[14] 1947年片山哲首相在发出停止“二·一大罢工”命令后，提到麦克阿瑟考虑重整军备和海外派兵，但片山内阁官房长官西尾末广却反驳说没有感受到那样的气氛（大嶽秀夫編『戦後日本防衛問題資料集』第1巻、資料III.1.16、III.1.18）。

[15] 大嶽秀夫編『戦後日本防衛問題資料集』第1巻、資料III.1.16、III.1.18。

[16] 大嶽秀夫編『戦後日本防衛問題資料集』第1巻、226頁。

[17] 大嶽秀夫編『戦後日本防衛問題資料集』第1巻、215頁。

[18] 大嶽秀夫編『戦後日本防衛問題資料集』第1巻、423頁。这里收录了麦克阿瑟回忆录的一部分，他责难道："决定不向韩国提供武器装备，这应该是华盛顿那些对太平洋局势不是十分了解的人做出的，事实上他们对朝鲜一无所知"，"共产主义向自由世界发出挑战"，"世界历史在人类起源时就告知我们一个教训，踌躇会导致纷争，而勇气可以防止纷争，现在正是好好琢磨这一点的时候了"。我们可以看出，他所说的这些与他在赞赏宪法第九条时倡导的绝对和平主义以及与美国政府的争执是矛盾的，但他把这一矛盾毫不避讳地写入回忆录中，这充分表现了麦克阿瑟以自我为中心的性格。

[19] 山田吉男「講和問題をめぐる最近の自由党」『世界』1950年12月号、142、146頁。

[20] 在「新憲法草案への輿論」（『毎日新聞』1946年5月27日）中，关于"放弃战争的条款有必要吗？"的问题，70%的人回答"有必要"。1950年所做调查的主题是"媾和与日本重新武装"（『朝日新聞』1950年11月25日）。本章引用的战后舆论调查收录于海後宗臣·清水幾太郎編「教育·社会」『資料 戦後二十年史』第5巻（日本評論社、1966）。

[21] 飯塚浩二『日本の軍隊』岩波現代文庫、第1章、149頁。

[22] 宮沢俊義「憲法改正と再軍備」『世界』1952年5月号、32、36頁。

[23] ジョン·ダワー著、大窪願二訳『吉田茂とその時代』下巻、中公文庫、1991、1981年初版、163—164頁。

[24] 片岡鉄哉『日本永久占領』講談社文庫、1999、195頁。

[25] 片岡鉄哉『日本永久占領』、196頁。

[26] 会见记录收录于大嶽秀夫編『戦後日本防衛問題資料集』第2巻，第37页。

[27] ジョン·ダワー著、大窪願二訳『吉田茂とその時代』下巻、386頁。

[28] 松尾尊兊『国際国家への出発』集英社、1993、156—157頁。

[29] 宮沢喜一『東京·ワシントンの密談』実業の日本社、1956、160頁。

[30] 豊下楢彦『安保条約の成立』岩波新書、1996、144、164頁。

[31] 大嶽秀夫編『戦後日本防衛問題資料集』第2巻、83、82頁。

[32] 大嶽秀夫編『戦後日本防衛問題資料集』第2巻、494、511、498頁。

[33] 大嶽秀夫編『戦後日本防衛問題資料集』第1巻、491頁；第2巻、319頁。

[34] 大嶽秀夫編『戦後日本防衛問題資料集』第2巻、319、494頁。

[35] 大嶽秀夫編『戦後日本防衛問題資料集』第2巻、77、111頁。

[36] 「売れぬ日の丸」『日本経済新聞』1949年1月18日。引用时与原文在时间上略有错位，但大体涉及了当时的基本状况。

[37] 古関彰一「単独講和への道」金原編『戦後史の焦点』、135頁。

[38] 「各国代表の演説」『朝日新聞』（夕刊）、1951年9月8日；「昭和天皇翻訳官·松井明氏の手記」『朝日新聞』2002年8月5日；古関彰一「単独講和への道」金原編『戦後史の焦点』、107、134頁。

[39] 風見章「地に堕ちた政治道徳」『世界』1952年5月号、152頁；「講和の意見·批判·希望」『世界』1951年10月号、192頁。

[40] 「会談成果と要約 草案要旨」『朝日新聞』1953年10月25日。

[41] 鶴見俊輔『鶴見俊輔集·続 1 新しい開国』、148頁。

[42] 松尾尊兊『国際国家への出発』、183頁。

[43] 鶴見俊輔『鶴見俊輔集·続 1 新しい開国』、138頁。

[44] 大嶽秀夫編『戦後日本防衛問題資料集』第2巻、455頁。

[45] 大嶽秀夫編『戦後日本防衛問題資料集』第2巻、456頁。

[46] 大嶽秀夫編『戦後日本防衛問題資料集』第2巻、542頁。

[47] 堀栄三『大本営参謀の情報戦記』文芸春秋、1996、286頁。

[48] 大嶽秀夫編『戦後日本防衛問題資料集』第2巻、46頁。

[49] 柳田邦男『零戦燃ゆ 渾身編』文芸春秋、1990、546頁；神立尚紀『零戦最後の証言Ⅱ』光人社、2000、297頁

[50] 大岡昇平『大岡昇平集』第15巻、岩波書店、1983、87、86頁。

[51] 大嶽秀夫編『戦後日本防衛問題資料集』第2巻、378頁。

[52] ジョン·ダワー著、大窪願二訳『吉田茂とその時代』上巻、287頁。

[53] 『三島由紀夫全集』第34巻、新潮社，1973—1976、327頁。出自1969年的『問題提起』。

[54] 見田宗介『白いお城と花咲く野原』朝日新聞社、1987、64頁。

[55] 岡田真紀『世界を聴いた男』平凡社、1995、133頁。

[56] 吉野源三郎「読者に訴う」『世界』1952年5月号、3頁。

[57] 久野収·丸山眞男·吉野源三郎·石田雄·坂本義和·日高六郎·緑川亨「『平和問題談話会』について」（1968年6月16日）、『世界』1985年7月臨時増刊号、43頁。苏联于1949年9月宣布拥有原子弹，因此在1949年5月的劳动节进行这样的演说十分奇怪，但此处姑且引用石田原话。
石田认为，“经过1952年的媾和，原本受到盟军司令部报道限制而无法公开的遭受原子弹袭击的照片被公之于世，加上经历1954年的比基尼岛核辐射灾难，原子弹爆炸的威胁及其惨状才真正广为人知。和平问题谈话会率先将该问题视为决定性问题提出，受到了广泛的关注”（第43页）。然而，如第四章所述，麦克阿瑟与币原早在1946年就提及核武器的威胁，赞赏宪法第九条，因此很难说该问题是由和平问题谈话会“率先”提出的。但是，日本进步势力直到1950年代才关注反核和平运动的观点，其本身值得注意。

[58] 清水幾太郎『清水幾太郎著作集』第14巻、318頁。

[59]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声明收录于『世界』1949年1月号。『清水幾太郎著作集』第14巻第319页写道，清水看到匈牙利外交问题研究所所长亚历山大·索洛伊也参与了这份声明，遂对美苏之间的和平抱有希望。此外，和平问题讨论会变成和平问题谈话会虽然是从1949年3月开始的，但本书为叙述方便尽量使用“和平问题谈话会”。

[60] 清水幾太郎·丸山眞男·松村一人·眞下眞一·林健太郎·宮城音弥·古在由重「唯物主観と主体性」『世界』1948年2月号、日高六郎編『近代主義』筑摩書房、1976、124頁。

[61] 清水幾太郎·丸山眞男·松村一人·眞下眞一·林健太郎·宮城音弥·古在由重「唯物主観と主体性」『世界』1948年2月号、日高六郎編『近代主義』筑摩書房、1976、143頁。

[62] 久野收·丸山眞男·吉野源三郎·石田雄·坂本義和·日高六郎·緑川亨「『平和問題談話会』について」（1968年6月16日）、『世界』1985年7月臨時増刊号、6頁。该文第12页在说明和平问题谈话会受到了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声明刺激的过程中，吉野和丸山提到了“唯物主观与主体性”，批判了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论调。另一种说法是吉野是在8月拿到声明的。

[63] 大塚久雄深受德国社会学家韦伯的影响，其历史学方法将马克思经济学与韦伯社会学相糅合，自成一派，一般称为“大塚史学”。——译者注

[64] 久野收·丸山眞男·吉野源三郎·石田雄·坂本義和·日高六郎·緑川亨「『平和問題談話会』について」（1968年6月16日）、『世界』1985年7月臨時増刊号、50頁。

[65] 吉野在「『平和問題談話会』について」（第20页）批评道，狱中坚贞不屈的共产党干部们对于1935年采用的人民战线战术并不理解。

[66] 关于“全爱协”的研究，参见吉田健二「全面講和愛国運動関係資料」『歴史評論』第378号，1981年；森下徹「全面講和運動の歴史的位置——全面講和愛国運動の組織·論理·運動」『歴史研究』第32号，1995年；等等。“全爱协”以共产党、劳农党、社会党再建全国联络会等为中心，由“60多个劳农市民团体”构成，但受到团体的限制令及公安条例的镇压，组织松散，并没有取得什么重要的成果。因此，虽然打着“媾和公投”的名义举行了以4000万人为目标的促进全面媾和的签名运动，但在媾和会议前的1951年8月人数尚不满500万（古関彰一「単独講和への道」金原編『戦後史の焦点』、122頁）。

[67] 久野收·丸山眞男·吉野源三郎·石田雄·坂本義和·日高六郎·緑川亨「『平和問題談話会』について」（1968年6月16日）、『世界』1985年7月臨時増刊号、22、23頁。

[68] 久野收·丸山眞男·吉野源三郎·石田雄·坂本義和·日高六郎·緑川亨「『平和

問題談話会』について」（1968年6月16日）、『世界』1985年7月臨時増刊号、18頁。但这一倾向主要体现在和平问题谈话会东京支部，据说近畿支部左翼的色彩较浓。

[69] 吉野源三郎「戦後三十年と『世界』の三十年」『世界』1976年1月号、261頁。

[70] 久野収·丸山眞男·吉野源三郎·石田雄·坂本義和·日高六郎·緑川亨「『平和問題談話会』について」（1968年6月16日）、『世界』1985年7月臨時増刊号、37頁。

[71]「平和問題討議会議事録」（1948年12月12日）、『世界』1985年7月臨時増刊号、261頁。羽仁五郎在讨论中从战争责任的角度提到了知识分子的“节操”问题，同时说明要亲近“人民的组织”。当时，战争责任问题是使人加入共产党最大的动力，在这一背景下，安倍之所以抵抗应该是理解了这一宗旨。然而，战争污点很少的大多数讨论会成员并没有这么做。最终，即使各位成员自身没有战争责任，但是丸山指出，“对于国外，我们归根结底多少还是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社会科学学者”，这一意见在声明中得以体现。当然，根据「『平和問題談話会』 について」第50页中收录的久野收的证词，在羽仁提出动议的时候，据说作为讨论会成员之一的蜡山政道说：“我们应该默默地把头低下。”正如第三章所述，蜡山在1945年的议会中曾因深感战争责任的重大而辞去了议员一职。这应该是他内心的真实感触。

[72]「戦争と平和に関する日本の科学者の声明」大嶽秀夫編『戦後日本防衛問題資料集』第1巻、357頁。

[73]「三たび平和について」大嶽秀夫編『戦後日本防衛問題資料集』第1巻、573頁。

[74] 清水幾太郎『清水幾太郎著作集』第14巻、346頁。

[75] 久野収·丸山眞男·吉野源三郎·石田雄·坂本義和·日高六郎·緑川亨「『平和問題談話会』について」（1968年6月16日）、『世界』1985年7月臨時増刊号、9頁。

[76] 关于推进日本和平国民会议的活动，见森下徹「全面媾和運動と『戦後革新』の形成」『日本史研究』第458号，2000年。

[77] 大嶽秀夫編『戦後日本防衛問題資料集』第1巻、537頁。

[78] 久野収·丸山眞男·吉野源三郎·石田雄·坂本義和·日高六郎·緑川亨「『平和問題談話会』について」（1968年6月16日）、『世界』1985年7月臨時増刊号、31頁。

[79] 久野収·丸山眞男·吉野源三郎·石田雄·坂本義和·日高六郎·緑川亨「『平和問題談話会』について」（1968年6月16日）、『世界』1985年7月臨時増刊号、31頁。“文化帝国主义”一词是田中在1930年代开始使用的。然而丸山在1948年表示，“日本国民自身并未感觉到生活在殖民地统治之下。即便在讨论赋予美式生活方式以国际普遍性的危险性这一点上，确实有占领军的问题”（第32页）。日本共产党的“民族独立”路线自1948年就已存在，但即使从谈话会的立场出发，也没有对其加以附和的倾向。

[80] 清水幾太郎「国民教育について」『思想』1955年8月号、6—7頁。这一论述出现在讨论媾和问题稍后的时间，此处因为其很好地表现出1950年前半期的拥护宪法论而加以引用。

[81] 安倍能成「平和問題と日本」『世界』1985年7月臨時増刊号、219頁。然而安倍在该演讲中认为，“我们没有采取合乎和平与文明之名的行动，是因为心甘情愿之故”（第219页）。

[82] 「戦争と平和に関する日本の科学者の声明」第357页中说道：“既然我们的宪法规定放弃战争权利，并在和平与文明的名义下把我们的存在本身以及我们原来的领导者托付给各国的善意，那么显然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就是我们特别关注的事情。”

[83] 久野収·丸山眞男·吉野源三郎·石田雄·坂本義和·日高六郎·緑川亨「『平和問題談話会』について」（1968年6月16日）、『世界』1985年7月臨時増刊号、45頁。

[84] 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6巻、42、43、44頁。

[85] 清水幾太郎『清水幾太郎著作集』第14巻、335、336頁。

[86] 大嶽秀夫編『戦後日本防衛問題資料集』第2巻、154頁。

[87] 『講和に対する意見·批判·希望』、209、182頁。

[88] 丸山眞男『丸山眞男集』第5巻、82—83頁。

[89] 松尾尊兊『国際国家への出発』、166頁。

[90] 大嶽秀夫編『戦後日本防衛問題資料集』第1巻、362頁。

[91] 『講和に対する意見·批判·希望』、190頁。发言人是奈良本辰也。

[92] 『講和に対する意見·批判·希望』、189—190頁。

[93] 南原繁『南原繁著作集』第7巻、385頁。

[94] 南原繁『南原繁著作集』第7巻、387、383頁。此外，南原所想的“外敌”的代表是共产主义。

[95] 「『再武装』に対する意見·批判·希望」『世界』1952年5月号、147、152、161、164、146、134頁。

[96] 田畑忍「自衛と戦力の問題点」『世界』1952年5月号、44頁。

[97] 南原繁『南原繁著作集』第7巻、330、387頁。

[98] 高見順·今日出海·堀田善衛·亀井勝一郎·清水幾太郎「独立国の条件」『群像』1952年6月号、14頁。

[99] 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4巻、269頁；丸山眞男『丸山眞男集』第8巻、218頁。虽然丸山的建言是1960年代的东西，但介绍了其“自卫”的思想，故在此加以引用。

[100] 丸山眞男『丸山眞男集』第8巻、279—281頁。

[101] 大嶽秀夫編『戦後日本防衛問題資料集』第2巻、153頁。

[102] 大嶽秀夫編『戦後日本防衛問題資料集』第2巻、547、548頁。

[103] 「三たび平和について」『「世界」主要論文選』岩波書店、1995、156頁。声明中的小标题，在大嶽秀夫編『戦後日本防衛問題資料集』被忽略掉了。而且『「世界」主要論文選』一共有4章声明，却只收录了第一章、第二章的内容。此外，『世界』1985年7月临时增刊号也略去了第四章。

[104] 大嶽秀夫編『戦後日本防衛問題資料集』第1巻、577、578頁。

[105]「憲法と現実」『東京新聞』1950年8月16日。

[106] 大嶽秀夫編『戦後日本防衛問題資料集』第2巻、457頁。

[107] 山田吉男「講和問題をめぐる最近の自由党」『世界』1950年12月号、144頁。

[108] 吉野源三郎「読者に訴う」『世界』1951年10月号、3頁。

[109] 大嶽秀夫編『戦後日本防衛問題資料集』第1巻、548頁。

[110] 大嶽秀夫編『戦後日本防衛問題資料集』第1巻、578頁。

[111] 大嶽秀夫編『戦後日本防衛問題資料集』第1巻中，以社会党右派浅沼稻次郎的名义收录了1950年9月7日下的指令『平和運動と国連支持の関係について』，据此，“因为战争而一概否定所谓的和平运动其实质是共产主义的谋略。最好说明这一事例就是《斯德哥尔摩宣言》”，“联合国的指示与我们的媾和对策是一致的”。于是，“在宪法的范围内（自己手执武器在此范围之外），顺从联合国是正确的”，“基于联合国的决定，从事运输生产的事都是由党来决定的”（第536、537页）。这种方针与共产党自然是不一致的。

[112] 久野収·丸山眞男·吉野源三郎·石田雄·坂本義和·日高六郎·緑川亨「『平和問題談話会』について」（1968年6月16日）、『世界』1985年7月临时增刊号、24頁。

[113] 大嶽秀夫編『戦後日本防衛問題資料集』第1巻、579頁。

[114] 大嶽秀夫編『戦後日本防衛問題資料集』第1巻、363頁。

[115] 山川均「非武装憲法の擁護」『世界』1951年10月号、33頁。

[116] 以下相关资料皆引自大嶽秀夫編『戦後日本防衛問題資料集』第1巻，第Ⅱ章，一·七、一·九。

[117] 引自大嶽秀夫編『戦後日本防衛問題資料集』第2巻，第Ⅰ章，一·二。

[118] 古関彰一「単独講和への道」金原編『戦後史の焦点』、119—120、131—134頁。

[119] 大内兵衛·有沢広巳·美濃部亮古·稲葉秀三「単独講和と日本経済」『世

界』1950年10月号、105、106、103頁。

[120] 大嶽秀夫編『戦後日本防衛問題資料集』第2巻、130頁。

[121] 大嶽秀夫編『戦後日本防衛問題資料集』第2巻、35頁。

[122] 大嶽秀夫編『戦後日本防衛問題資料集』第2巻、129、131頁。

[123] 恒藤恭「憲法と新しい道徳基準」『世界』1952年4月号、17頁。

[124] 安倍能成「世界とアジアと日本との平和の立場から」『世界』1951年10月号、66頁。

[125] 久野収·丸山眞男·吉野源三郎·石田雄·坂本義和·日高六郎·緑川亨「『平和問題談話会』について」（1968年6月16日）、『世界』1985年7月臨時増刊号、37頁。

[126] 此外，丸山真男给特辑发来了『病床からの感想』，在列举媾和问题点之时阐述了“赔偿问题不明确”的思想，但只是一笔带过。

[127] 「講和問題に対する意見·批判·希望」、175頁。此外河盛批判道：“依附某一个国家的力量而免除那种牺牲（赔偿）”，主张“我们无论在哪里都要有男子汉气概，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我们想要通过自己的能力重建日本”，提倡与包括亚洲各国在内进行全面媾和（第211、212页）。荒正人从批判“民族”的立场出发讨论了赔偿问题，相反河盛却使用“民族”这个词来提出该问题。

[128] 松尾尊兊『国際国家への出発』、166頁。

[129] 该文件即NSC48/5，收录在大嶽秀夫編『戦後日本防衛問題資料集』第2卷，第Ⅱ章，一·六。

[130] 外務省国際協力局第一課編『国連第十総会における加盟問題』、1956、5頁。

[131] 松尾尊兊『国際国家への出発』、184頁。

[132] 「『平和憲法』をめぐる動き」『毎日新聞』1954年5月3日。

[133] 「『平和憲法』をめぐる動き」『毎日新聞』1954年5月3日。左派社会党政审会会长伊藤好道也曾在《产经新闻》1955年2月4日的社论中指出，修正宪法偏

重私有财产性是必要的。左派社会党纲领中的修宪论参见原杉久『戦後史のなかの日本社会党』（中公新書、2000），第110页。据植村秀樹『再軍備と五十五年体制』（木鐸社、1995）第240页所述，左派社会党的铃木茂三郎委员长当时在接受采访时曾表示：“日本的再军备，只有在社会党掌权、社会实现稳定之后才具备可能性。”

[134] 「『平和憲法』をめぐる動き」『毎日新聞』1954年5月3日。

[135] 国際主義者団「民族主義者の新しい欺瞞について」日本共産党中央委員会五十年問題文献資料編集委員会編『日本共産党五十年問題資料集』第3巻、新日本出版社、1957、223頁。关于共产党对宪法的态度，只从当时的文件来看并不明确。国分一太郎在其著作『教育基本法をどう生かすか』（長田新監修『教育基本法』新評論、1957）第284页中回忆道，共产党对宪法和《基本教育法》的批判，在其1950年受到共产党情报局批判而加强反美斗争后，“变得越发明显了”。

[136] 「平和憲法をめぐる十一年（下）」『アカハタ』1956年8月18日。

[137] 「憲法擁護運動の展開に期待する」『社会タイムズ』（社説）、1953年12月8日。

[138] 徳田球一「新しい情勢とこれに対するわが党の政策」神山茂夫編『日本共産党戦後重要資料集』第1巻、三一書房、1971、369頁。该文是1950年1月第18届扩大中央委员总会一般报告。

[139] 大嶽秀夫編『戦後日本防衛問題資料集』第2巻、130頁。第129页中还称赞“日本社会党可能会再次奋起与法西斯彻底战斗的同时，是现今日本社会唯一一个既有理论又有实践的政党”。

[140] 「憲法記念日に際して」『毎日新聞』（社説）、1953年5月3日。

[141] 关于这些内容，参见渡辺治『日本国憲法「改正」史』第3章（日本評論社、1987）；「きょう憲法十周年」『朝日新聞』1957年5月3日。

[142] 渡辺治『日本国憲法「改正」史』、246頁。

[143] 「憲法 私たちはこう思う」『毎日新聞』（夕刊）、1955年5月2日。

[144] 伴随这种动向的是宪法第九条“日本人希望通过自己的双手获得和平”这一历史观的抬头。1955年8月15日，《每日新闻》以“不能放弃战争”为题，刊载由惠特

尼少将代笔写下给麦克阿瑟将军的信。第九条是从币原喜重郎的提案中派生出来的报告，但该报道也刊载了当时负责制定宪法的大臣金森德次郎答疑解惑的谈话。

[145] 「憲法改正に賛成か反対か」『朝日新聞』1955年11月13日；「憲法改正をどう見るか」『朝日新聞』1957年11月27日。此处引用的评论部分是1955年的。

[146] 国分一太郎「教育基本法をどう生かすか」長田新監修『教育基本法』新評論、1957、283—284頁。在这里，国分虽然主张拥护宪法和《基本教育法》，但在1957年提到“想要坚守《教育基本法》的精神”，“而今对‘现在的《教育基本法》到底是什么’这样的问题皱眉或嬉笑的态度多多少少留在我们心中”（第287页）。

[147] 「『戦力』論は敬遠のハラ」『朝日新聞』1954年12月21日。

[148] 「保守における構想力」『展望』1965年2月号；津田道夫『日本ナショナリズム論』福村出版、1973、217頁。

[149] 关于这一解释，除了第四章所述的“为了达到前面的目的”而追加的“芦田修正”之外，还有根据宪法学家佐佐木惣一的意见承之而来的“清濑理论”。鸠山在1954年12月改变了主张。对此社会党批判道：“鸠山首相多年来都主张自卫队是违宪的，加速进行修宪应该端正态度……这使得国民心生疑问。”「両社反対声明」『読売新聞』1954年12月23日。

[150] 吉村正一郎「より大きな悪を防ぐため」『世界』1952年5月号、159頁。

[151] 「『再軍備』をどう思うか」『朝日新聞』1953年2月14日。

[152] 该词系法语词，意为“公民”或“市民”。——译者注

[153] 丸山眞男『丸山眞男全集』第6巻、256頁；第7巻、19頁。

[154] 丸山眞男『丸山眞男座談』第2冊、234頁。这里是以丸山与天皇、马克思主义斗争的“内在能量”为源泉，阐述了这两者已经“风化”而失去了质感，其意思就与本书的引用略微有出入，在一切情况下丸山用这种意识来诠释了“风化”，在正文中进行了引用。

[155] 新崎盛輝『沖縄現代史』岩波新書、1996、14頁。

[156] 『講和に対する意見·批判·希望』、175—176頁。荒正人“担心”的是军事协定有可能把日本卷入战争。

[157] 有关1960年安保斗争的思想史研究可以说并不多见。分析当时政局的研究有岩永健吉郎『戦後日本の政党と外交』（東京大学出版会、1985）、原杉久『戦後日本と国際政治』（中央公論社、1988）等。通史类研究除了本书注释中涉及的著作外，还有井出武三郎編『安保闘争』（三一新書、1960）、信夫清三郎『安保闘争史』（世界書院、1961、1967復刻）等。国立国会図書館編『安保闘争文献目録』（湖北社、1979）除1960年安保外，还涉及1970年安保的文献目录。论述安保斗争与知识分子思想的研究，有高畠通敏「『六○年安保』の精神史」（テツオ·オジタ·前田愛·神島二郎編『戦後日本の精神史』岩波書店、1988）、米原謙『日本「近代」への問い』（新評社、1995）、都築勉『戦後日本の知識人』第5章（世織書房、1995）。但如序章所述，都筑把“市民”乃至“市民主义”视为战败后存在的一种“思想”，这与分析言说和“心情”的本书在视角上有所不同。
许多研究指出，1960年安保斗争的背景包括民族主义或所谓“市民主义”的抬头。然而在这些研究中，“市民主义”及“民族主义”似乎被当作一种成体系的被广泛认同的常识，因此，也就没有研究其具体内容及对相互之间存在的联系进行充分的分析。本书的观点为：第一，当时出现的“市民”、“民主主义”、“国民”等词语互相之间并不矛盾，而是表达同一现象和心情的词；第二，1960年安保斗争中所谓“市民主义”的抬头，与其说是思想的转变，不如说是语言的转变；第三，在这次斗争中，可以发现所谓“新式社会运动”的萌芽。
本章所列举的资料，大多出自之后被新左翼等称为“市民主义者”的知识分子。但正如本章中所论述的那样，以“市民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这样的名称进行分类本身就是没有意义的。对于立场接近全学联主流派的吉本隆明将会在第III部中具体论述，对于清水几太郎，笔者将在其他文章中进行论述。

[158] 伊藤整「岸信介における人間の研究」『中央公論』1960年8月号、169、170頁。

[159] 伊藤整「岸信介における人間の研究」『中央公論』1960年8月号、178頁。

[160] 声明书内容概要登载在1957年3月1日的《朝日新闻》上。

[161] 「ふたたび安保改定について」『世界』1960年2月号、43頁；「政府の安保改定構想を批判する」『世界』1959年10月号、27、41、17頁。此外，据说和平问题谈话会在1959年12月17日发表『安保改定問題についての声明』之后，就自然解体了。

[162] 本节岸信介的主张引自岸信介「渡米を前にして」『中央公論』1957年5

月号，第130、131页。

[163] 賀屋興宣「安保審議は充分議を尽した」『民族と政治』1960年6月、18頁。

[164] 「政府の安保改定構想を批判する」、34、39頁。这个声明发表于U2侦察机事件之前。

[165] “日本工会总评议会”的简称。——译者注

[166] “禁止原子弹氢弹爆炸日本协议会”的简称。——译者注

[167] 信夫清三郎『安保闘争史』、52—64頁。

[168] 女たちの現在を問う会編「女性たちの六○年安保」『銃後史ノート戦後史編⑤』インパクト出版社、1990、143頁。出自当时“保护人权妇女协议会”负责人渡边道子的回忆。

[169] 清水幾太郎『清水幾太郎著作集』第14巻、451頁。

[170] 鶴見俊輔「いくつもの太鼓のあいだにもっと見事な調和を」『世界』1960年8月号、鶴見俊輔『鶴見俊輔著作集』第5巻、55頁。

[171]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耐人寻味的是，认同安保斗争是革命的第一步这一共产主义者同盟认识的，不是社会党和共产党，而是自民党。对于11月27日的“国会乱入”事件，自民党总务副会长山村新治郎形容其为“这是革命的预演”（「11.27暴動の真相と責任問題」『民族と政治』1960年1月、22頁）。而且在这个事件中，据说有人在国会玄关处小便，自民党政调会会长船田中强调：“这不能仅用恶作剧这样简单的语言来说明，而是具有更深意义的一种革命行动。”（「安保修订和国会乱入事件」『民族と政治』1960年1月、12頁）不过在自民党的认识中，全学联与社会党及共产党一样都是追随中苏共产党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

[172] 清水幾太郎『清水幾太郎著作集』第14巻、438、482頁。

[173] 岸信介向来善于用突然袭击的方式造成既成事实。1958年8月，在东京与美国大使就安保问题进行事前交涉时，尽管日本方面有关部分修订条约和制定新条约的争论还未分胜负，岸信介却突然提出制定新条约的要求，这使外相藤山爱一郎及外务省十分为难。1958年10月提出修订《警职法》时，藤山外相对此也是一无所知。都築勉『戦後日本の知識人』、289、291頁。

[174] 以下描述，均参考安藤良一「その夜の国会を目撃して」『世界』1960年7月号。

[175] 安藤良一「その夜の国会を目撃して」『世界』1960年7月号、65頁。

[176] きしあきら作詞·岡田和夫作曲『民族独立行動隊の歌』。文中引用的歌词为第一部分。

[177] 安藤良一「その夜の国会を目撃して」『世界』1960年7月号、65頁。

[178] 「新安保国会の黒い焦点」『週間朝日』1960年6月5日。

[179] 平野三郎「自民党は岸と運命を共にしない」『世界』1960年7月号、47頁。

[180] 「新安保国会の黒い焦点」『週間朝日』1960年6月5日。

[181] 「岸退陣と総選挙を要求す」『週間朝日』1960年5月21日。

[182] 「放射能」『東京新聞』6月12日。

[183] 猪木正道「この暴挙は許せない」『世界』1960年7月号、52頁。

[184] 古川徹三「全く無茶だ」『世界』1960年7月号、35頁。

[185] 「岸内閣をどう思うか」『朝日新聞』1960年6月3日。

[186] 湯川秀樹「国民大多数に共通する願い」『朝日ジャーナル』1960年6月26日、27頁。

[187] 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9巻、102頁。

[188] 野上弥生子「ワシントンと桜の木」『世界』1960年7月号。

[189] 鶴見俊輔「根もとからの民主主義」『思想の科学』1960年7月号、鶴見俊輔『鶴見俊輔著作集』第5巻、46頁。

[190] 鶴見俊輔「根もとからの民主主義」『思想の科学』1960年7月号、鶴見俊輔『鶴見俊輔著作集』第5巻、46、50頁。

[191] 松山善三「国を売る奴」『世界』1960年7月号；矢内原忠雄「内村鑑三

の非戦論」『世界』1960年7月号、175頁。

[192] 清水幾太郎『清水幾太郎著作集』第14巻、482頁。

[193] 「東大全学教官研究集会の講演から」『朝日新聞』1960年6月1日。

[194] 丸山眞男·竹内好·開高健「擬似プログラムからの脱却」『中央公論』1960年7月号、36頁。

[195] 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9巻、115、116、117、118頁。

[196] 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9巻、118—120頁。

[197] 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9巻、138頁。

[198] 江藤淳「『声なきもの』も起ちあがる」『中央公論』1960年7月号、55頁。

[199] 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9巻、187頁。

[200] 『ヤマ場にきた国民会議』『朝日新聞』1960年6月15日。

[201] 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9巻、157頁。

[202] 石田雄·篠原一·福田歓一「躍動する市民精神」『中央公論』1960年7月号。

[203] 石田雄·篠原一·福田歓一「躍動する市民精神」『中央公論』1960年7月号、70、71頁。

[204] 石田雄·篠原一·福田歓一「躍動する市民精神」『中央公論』1960年7月号、71頁。

[205] 丸山眞男·竹内好·開高健「擬似プログラムからの脱却」『中央公論』1960年7月号、33、34頁。

[206] 安田武「ビラの考現学」『思想の科学』1960年7月。

[207] 杉山美智子「マイクの追った『激動する十日間』」『思想の科学』1960年7月、44頁。

[208] 石田雄·篠原一·福田歓一「躍動する市民精神」『中央公論』1960年7月号、71頁。

[209] 邀请函收录在辻清明編「政治」『資料·戦後二十年史』第1巻（日本評論社、1966），第153页。

[210] 江藤淳「『声なきもの』も起ちあがる」『中央公論』1960年7月号、52頁。

[211] 江藤淳「『声なきもの』も起ちあがる」『中央公論』1960年7月号、52、49頁。

[212] 女たちの現在を問う会編「女性たちの六○年安保」『銃後史ノート戦後史編⑤』、56頁。

[213] 日高六郎「五月二○日から六月一九日まで」『思想』1960年7月号、131、133頁。

[214] 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9巻、153頁。

[215] 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9巻、153頁。竹内之所以重视秩序的“建设”，源自他一贯的思想。竹内在1949年的『新中国的精神』中写道：“无论秩序的破坏达到何种程度，都无法消除外部的权威。要想消除权威本身，除了自己成为权威消除其外在性之外别无他法。”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4巻、100—101頁。

[216] 杉山美智子「マイクの追った『激動する十日間』」『思想の科学』1960年7月号、40、43頁。

[217] 杉山美智子「マイクの追った『激動する十日間』」『思想の科学』1960年7月号、41頁。

[218] 杉山美智子「マイクの追った『激動する十日間』」『思想の科学』1960年7月号、41頁。

[219] 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9巻、122、123頁。

[220] 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9巻、144頁（有关5月16日游行的记述）。

[221] 日高六郎「五月二○日から六月一九日まで」『思想』1960年7月号、

135、132頁。

[222] 鶴見俊輔『鶴見俊輔著作集』第5巻、57頁。关于“无声之声会”的游行，参见小林トミ「それはこうしてはじまった」『声なき声のたより』1960年7月，高畠通敏編『日常の思想』。

[223] 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9巻、121—122、107頁。引文中的问号原文如此。

[224] 両沢葉子「だれでも自由に参加できたデモ」『思想の科学』1960年7月号、107頁。

[225] 鶴見俊輔『鶴見俊輔著作集』第5巻、56、57頁。

[226] 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9巻、110頁。

[227] 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9巻、173頁。

[228] 『朝日新聞』（夕刊）、1960年5月28日。

[229] 鶴見俊輔『鶴見俊輔著作集』第5巻、58頁。

[230] 丸山眞男『丸山眞男集』第8巻、374頁。

[231] 江藤淳「『声なきもの』も起ちあがる」『中央公論』1960年7月号、50頁。

[232] 辻清明編「政治」『資料·戦後二十年史』第1巻、164頁。

[233] 女たちの現在を問う会編「女性たちの六○年安保」『銃後史ノート戦後史編⑤』、63頁。

[234] 鶴見俊輔『鶴見俊輔著作集』第5巻、55頁。

[235] 辻清明編「政治」『資料·戦後二十年史』第1巻、154頁。

[236] 石田雄·篠原一·福田歓一「躍動する市民精神」『中央公論』1960年7月号、71頁；江藤淳「『声なきもの』も起ちあがる」『中央公論』1960年7月号、54頁。

[237] 鶴見俊輔『鶴見俊輔著作集』第5巻、51、58頁。

[238] 「選択の前に」『朝日新聞』2001年7月28日。准确地说，1960年以前“无党派”一词也并非完全没有被使用过。例如，宗像诚也在1951年时从马克思主义批判“中立”的文脉出发写道：“所谓无党派性和保守是一样的。”转引自国分一太郎·石田宇三郎·片岡並男·斎藤秋男·矢川徳光·松島栄一「岩波講座『教育』をめぐって」，第4页。

[239] 福田歓一「日本民主主義の可能性」『世界』1960年8月号、58頁。

[240] 石田雄·坂本義和·篠原一·隅谷三喜男·田口富久治·日高六郎·藤田省三·丸山眞男「現在の政治状況」『世界』1960年8月号、237頁。

[241] 坂本楠彦·田口富久治·日高六郎·福田歓一·前野良「これからの政治的争点」『中央公論』1960年8月号、93頁；石田雄·坂本義和·篠原一·隅谷三喜男·田口富久治·日高六郎·藤田省三·丸山眞男「現在の政治状況」『世界』1960年8月号、258頁。

[242] 坂本楠彦·田口富久治·日高六郎·福田歓一·前野良「これからの政治的争点」『中央公論』1960年8月号、93頁。

[243] 高宮篤「銀杏並木の周辺にて」『世界』1960年8月号、151頁。

[244] 石田雄·篠原一·福田歓一「躍動する市民精神」『中央公論』1960年7月号、71頁；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9巻、109頁。

[245] 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9巻、266、267頁。这是1961年的发言。鹤见俊辅在『竹内好』第183页引用这篇文章评论道：“竹内好对于‘市民’这种看法十分厌恶。”然而正如所引用的那样，竹内主要在谈“对‘市民’一词感到的违和感，而并非反对‘市民’这种看法”。

[246] 『資料 戦後学生運動』第5巻、368頁。

[247] 白楽晴·崔元植·鶴飼哲·柄谷行人「韓国の批評空間」『批評空間』（Ⅱ-17）、1998、14頁。不过，全学联主流派一方没有使用“市民”，而是将战后的知识分子称为“市民主义者”，并将其视为“国民会议及共产党的同谋”而表明对其所感到的违和感。

[248] 鶴見俊輔『鶴見俊輔著作集』第5巻、51頁。

[249] 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9巻、221、188、216頁。

[250] 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9巻、220頁。

[251] 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9巻、186頁。

[252] 石田雄·坂本義和·篠原一·隅谷三喜男·田口富久治·日高六郎·藤田省三·丸山眞男「現在の政治状況」『世界』1960年8月号、234、247頁。这次发言有可能包含了与支持全学联主流派反对“拥护民主主义”口号的清水几太郎对抗的意思。如前所述，有关清水笔者将在其他文章中进行论述。

[253] 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9巻、155、156、172頁。

[254] 春斗，又称春季生活斗争、春季工资斗争，是日本工会每年春季组织的为提高工人工资待遇而进行的斗争。——译者注

[255] 藤島宇内「六·四·ストの記録」『中央公論』1960年7月号、90、91頁。

[256] 杉山美智子「マイクの追った『激動する十日間』」『思想の科学』1960年7月号、42頁。

[257] 清水幾太郎『清水幾太郎著作集』第14巻、478頁。

[258] 日高六郎·高畠通敏·中谷健太郎·前田康博·竹内敏晴「形なき組織の中で」『思想の科学』1960年7月号、82頁。

[259] 杉山美智子「マイクの追った『激動する十日間』」『思想の科学』1960年7月号、42、41頁。

[260] 樺光子『人しれず微笑まん——樺美智子遺稿集』三一書房、1960、245頁。该文为京都市下鸭妇女民主俱乐部写给桦美智子母亲光子的信。

[261] 1943年，日本为补充兵员不足而征召各高等教育机关20岁以上文科系学生入伍，称为“学徒出阵”。——译者注

[262] 杉山美智子「マイクの追った『激動する十日間』」『思想の科学』1960年7月号、41頁。

[263] 杉山美智子「マイクの追った『激動する十日間』」『思想の科学』1960年7月号、46、41頁。

[264] 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9巻、134、153頁。

[265] 吉本隆明『吉本隆明全著作集』第14巻、勁草書房、1968—1978、466頁。引文为1967年的对话。

[266] 松尾尊兊『国際国家への出発』、244頁。

[267] 鶴見俊輔『鶴見俊輔著作集』第5巻、60頁。

[268] 藤島宇内「六·四·ストの記録」『中央公論』1960年7月号、89頁。

[269] 女たちの現在を問う会編「女たちの六○年安保」『銃後史ノート戦後史編⑤』、114、101頁。

[270] 久野收「市民主義の成立」『思想の科学』1960年7月号、13頁。

[271] 日高六郎·高畠通敏·中谷健太郎·前田康博·竹内敏晴「形なき組織の中で」『思想の科学』1960年7月号、89頁。

[272] 杉山美智子「マイクの追った『激動する十日間』」『思想の科学』1960年7月号、42頁。

[273] 西部邁『六○年安保』、21—22頁。

[274] 樺光子『人しれず微笑まん——樺美智子遺稿集』、266頁。引文为桦光子回忆老师说过的话。

[275] 樺俊雄·樺光子『死と悲しみを越えて』雄渾社、1967；日高六郎『戦後思想を考える』、155頁。

[276] 西部邁『六○年安保』、31頁。

[277] 樺光子『人しれず微笑まん——樺美智子遺稿集』、65、66頁。原诗的题目为『最後に』，写于1958年。引用时略微削减了段数。

[278] 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9巻、164頁；道浦母都子「六月のバラ」『朝日クロニクル 週刊二○世紀』（1960年分）、朝日新聞社、1999、5頁。

[279] 樺光子『人しれず微笑まん——樺美智子遺稿集』、257頁。

[280] 保阪正康『六○年安保闘争』講談社新書、1986、9頁。

[281] 清水幾太郎『清水幾太郎著作集』第14巻、479頁。

[282] 松尾尊兊『国際国家への出発』、246頁。

[283] 松尾尊兊『国際国家への出発』、246頁。

[284] 鶴見俊輔『鶴見俊輔著作集』第5巻、51頁。

[285] 鶴見俊輔「安保改定 日本中に渦巻いた国民の怒り」『朝日クロニクル週刊二○世紀』（1960年分）、第4頁。

[286] 樺光子『人しれず微笑まん——樺美智子遺稿集』、11頁；小林武「荒木文相の見解におこたえする」『朝日新聞』1960年10月2日；清水幾太郎『清水幾太郎著作集』第14巻、475頁。

[287] 上村実「安保反対のデモは日の丸で」『毎日新聞』1960年6月5日。

[288] 保阪正康『六○年安保闘争』第137页中，有举着写有“普通东京市民游行，众人皆可加入”的标语牌和“日之丸”旗游行队伍的照片。

[289] 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9巻、163頁；鶴見和子「青年の血をあがなうもの」『思想の科学』1960年7月号、110頁。

[290] 加藤周一·久野収「五·一九と八·一五」『思想の科学』1960年8月号、13頁。引文为担任领衔编辑一职的鹤见俊辅的发言。

[291] 「六·四闘争 大きく報道」『朝日新聞』1960年6月5日；「米上院、安保審議始める」『朝日新聞』1960年6月8日。以下的外国报纸的报道皆参照日本国内报纸转载的内容。

[292] 「後進国並みの民主主義」『毎日新聞』（夕刊）、1960年6月6日。

[293] 「不安な日本の前途 英国各紙の論調」『毎日新聞』1960年6月21日；「対日信頼感は下落」『朝日新聞』（夕刊）、1960年6月19日；「日本を見る目」『朝日新聞』1960年6月20日。

[294] 「米議会の対日感情硬化」『東京新聞』1960年6月18日。赛克斯的发言转引自日高六郎『一九六○年五月一九日』（岩波新書、1960），第165页。

[295] 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9巻、139、141頁。哈格蒂的发言虽与女たちの現在を問う会編『女たちの六○年安保』第84页内容存在文字上的差异，但大致内容是一样的。

[296] 「後進国並みの民主主義」『毎日新聞』（夕刊）、1960年6月6日；「新安保の批准促進」『産経新聞』1960年6月17日；磯野富士子「アメリカは思い違いをしています」『朝日ジャーナル』1960年6月28日、28頁。

[297] 朝海浩一郎·松本重治「対米関係を憂える」『中央公論』1960年8月号。

[298] 「日本を見る目」『朝日新聞』1960年6月20日；「『訪日延期』世界はこうみる」『毎日新聞』1960年6月17日。

[299] 「後進国並みの民主主義」『毎日新聞』（夕刊）、1960年6月6日。

[300] 藤島宇内「六·四·ストの記録」『中央公論』1960年7月号、85頁；「首相、『総辞職』を攻撃」『朝日新聞』（夕刊）、1960年6月2日。

[301] 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9巻、223頁；鶴見俊輔『鶴見俊輔著作集』第5巻、52頁。

[302] 「新安保国会の黒い焦点」『週間朝日』1960年6月5日；日高六郎『戦後思想を考える』、183頁；「海外に大きな衝撃」『毎日新聞』1960年6月16日；「大もての日本人」『毎日新聞』1960年6月20日。关于这种对中国的评价，竹内好评价道：“美国把一切都归咎于国际共产主义，这种认识上的不足同样也存在于日本对中国的误判中。”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9巻、176頁。

[303] 「『訪日延期』世界はこうみる」『毎日新聞』1960年6月17日；「世界一の保守的な国民」『産経新聞』1960年6月20日；「乱入事件と各国の反響」『朝日新聞』1960年6月16日。

[304] 『資料 戦後学生運動』第5巻、361頁。该组织系学联反主流派。

[305] 仲宗根勇「沖縄のナゾ」『新沖縄文字』1969年夏季号、59頁。

[306] 仲宗根勇「沖縄のナゾ」『新沖縄文字』1969年夏季号、59—60頁。

[307] 谷川雁「私の中のグアムの兵士」『思想の科学』1960年7月号、139頁；つげ義春「となりの女」『無能の人·日の戯れ』新潮文庫、1998、初版1985、174

頁。

[308] 真壁仁「そのとき、農民はどうしていたか」『毎日新聞』1960年7月2日。

[309] 「『静かな闘争』のなかで」『朝日新聞』1960年6月5日。

[310] 日高六郎·高畠通敏·中谷健太郎·前田康博·竹内敏晴「形なき組織の中で」『思想の科学』1960年7月号、82頁。

[311] 「ビルの内側から」『思想の科学』1960年7月号、69頁。

[312] 杉山美智子「マイクの追った『激動する十日間』」『思想の科学』1960年7月号、45頁。

[313] 「ビルの内側から」『思想の科学』1960年7月号、70頁。

[314] 水口宏三·石田雄·日高六郎·岡田任雄「大衆行動と岸政権」『朝日ジャーナル』1960年6月12日、13頁。

[315] 杉山美智子「マイクの追った『激動する十日間』」『思想の科学』1960年7月号、44頁。

[316] 『資料 戦後学生運動』第5巻、367頁。

[317] 西部邁『六○年安保』、135—136頁。

[318] 「安保条約 ついに自然承認」『朝日新聞』1960年6月19日。

[319] 丸山眞男『丸山眞男集』第8巻、360頁。

[320] 「十字路」『毎日新聞』1960年6月26日。

[321] 「戦後最高の八五パーセント」『毎日新聞』1960年6月26日；毎日新聞社編『岩波書店と文芸春秋』、232頁。

[322] 辰濃和男「アカシアの雨が止むとき」道浦母都子「六月のバラ」『朝日クロニクル 週刊二○世紀』（1960年分）、1頁。

[323] 安岡正篤「『愛国心について』を薦める」日本文化連合会編『愛国心に

ついて』日本文化連合会、1961、10頁。

[324]「あなたは日本を愛するか」『週刊朝日』1962年1月5日アンケート回答；「戦後における『愛国心』論議の展望」『社会風潮調査資料12』、1962、16頁。

[325]「みらいをみつめる青年たち」『御茶の水女子大新聞』1960年11月20日；「戦後における『愛国心』論議の展望」『社会風潮調査資料12』、25頁。

第III部

第十三章 大众社会与民族主义

“战败迄今已近二十年，但我仍能感觉到枪林弹雨的惨烈。”在经济高速增长、东京奥运会受到世人瞩目的1964年，鹤见俊辅这样写道。[1]

战败时二三十岁的知识分子，在这一时期也从中年步入老年。竹内好和丸山真男在1960年代以后逐渐退出时评活动，投入各自的研究之中。比他们年轻的鹤见俊辅，在安保斗争之后因患抑郁症，一年多的时间里一直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

如此，上一代战后思想家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与此同时，知识分子的代际交替不断发展，经济的高速增长使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从1960年代中期开始，关于民族主义的言论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第III部将对此进行具体考察。本章将以此为前提，概述这一时期社会结构和言论发生的变化。

经济高速增长与“大众民族主义”

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势头十分迅猛。1955—1960年的实际平均增长率是8.7%，1960—1965年达到了9.7%，1965—1970年进一步提高到11.6%，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73年石油危机的爆发。

日本的国际地位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于对美出口逐年增加，要求美国开放市场的呼声日渐高涨，进口自由化率从1955年的16%上升到1959年的26%，又在1963年超越了90%。1963年，日本加入对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的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简称“经合组织”），在国际上成为发达国家的一员。

经济高速增长和进口自由化，导致农业人口的减少与城市化的加速。如第七章所述，1945年的城市人口占比是28%，1970年上升至72%。东京在1962年成为世界上首个人口超过1000万人的城市。同时为了筹备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进行了大规模的公共事业建设，以此为节点，战败后的废墟、黑市等景象也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与此同时，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山本明在1964年赴美时，对餐巾纸和冷冻食品感到很惊愕。但他在1968年回国后发现这些东西在日本也开始迅速普及。当他在1973年再度赴美时，“发现在美国已经找不到让他感到新鲜的东西了”。[2]

生活方式的变化对人们的意识也产生了巨大影响。调查日本西部农村的民俗学家宫本常一在1968年记述道：“自1960年起，村民的集体行动变得十分困难。”宫本说道：“村民过去相信如果村子好，每家每户的生活也会变好”，“在我接触的人当中，可以说没有一个人仅关注自家生活，认为自家过得好就可以”。但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个人能获得单独的收入，“如果一个地方的电视普及率超过50%，那么那里的人就没有意愿去团结一致解决新的问题了”。[3]

这种变化在大众文化方面也有所表现。在1960年代前半期的电影和漫画中，寓意“一人百步不如百人一步”以及以克服自我主义和形成连带感为主题的作品层出不穷。但到了60年代后半期，刻画都市青年孤独形象的作品变得屡见不鲜。比如从1964年开始连载的漫画《再造人009》，最初强调的是9个机器人战士的团队合作。但是到了60年代末，9个出场人物实现了各自职业上的成功，对“团队合作”的强调变少了。在这一时间段中间的1967年，出场人物进行了如下对话：

> “我们从幽灵岛刚逃出来那会儿，感觉真好！那个时候真的是团队合作呀……但是你看看现在，大家却是一盘散沙……”
>
> “到底是为什么呢？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是因为大家过上了幸福的日子。"

"哦？幸福的日子？"

"因为，大家都忙于自己的生活。"[4]

我们在1966年开始连载的棒球漫画《巨人之星》中也能看出同样的变化。[5] 漫画的前半部分描述的是出身于都市贫民窟（"长屋"）的主人公，在受到因为兵连祸结而失去棒球之梦只能以做短工谋生的父亲的锻炼，以及获得聚集在大杂院里唯一的电视机前的邻里街坊的支持下，逐渐意识到了"团队比个人更重要"的道理。但在连载的后半部分，主人公搬到了家电齐全且远远眺望富士山的高级公寓，主人公的家人也逐渐分散开来。至于主人公的女友，在连载的前半部分是在地方农村工作的护士，在后半部分却变成了孤独的新宿不良少女。

与之同时发生的，是拥有完备体系的思想的丧失和不自觉的民族主义的扩大。随着地方社区的瓦解、全国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的逐渐单一化，人们也慢慢从"村民"向"日本人"转变。当然，这一变化自明治时期就已开始，但是促使其完成的是战后的经济高速增长。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1963年日本加入OECD、1964年东京奥运会举办，都给人一种印象，那就是日本的国际地位提升了。

作家小田实1966年说道：

> 在这六年里我在一所补习学校里当老师，每天都能接触到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在这六年里，年轻人意识的变化，最为强烈地体现在有关民族主义、国家观的问题上。不妨以我的亲身经验来比喻。六年前，在我接触的年轻人中，对于我提出的问题——"你觉得日本怎么样"，大概十个里边只会有一个回答"我觉得日本很伟大"。而且，他自己心里也未必对日本感到满意。但因为自己是日本人，所以才这样认可日本，虽然在他脸上浮现的是难以名状的表情。他虽然对于"爱国"这样的事感到不好意思，但肯定是下了一定的决心才那样肯定地回答。当被问到"如果外敌入侵的话，你会不会舍身救国"这一问题时，大部分人是边笑边回答说，"我会逃命啊"。其

中有一个人带着严肃的表情反问我，“爱国”到底是什么呢？要保护祖国的什么呢？而这个人好像和刚才断言“爱国”的年轻人是同一个人。

六年之后的现在又是怎样的呢？实际上这期间我做过几次调查，大概十人中至少有八人会回答“日本很伟大”。尽管如此，一问到“日本的哪里伟大？”大家都哑口无言。在“爱国”这个问题上也如此。对于“热爱祖国的什么”这一问题依然没有确切的回答。对“会保护祖国吗”这个问题的回答也并无不同，几乎全都会给出冠冕堂皇但自明其义的回答。……尽管如此，对于“保护祖国的什么？”“为什么要保护祖国？”这样的问题却无法做出明确的答复（说句题外话，促使这样毫无责任感的国家主义的高涨，我想奥林匹克还是发挥了巨大的作用……）。[6]

曾在1960年“虽感觉不好意思但依然下定决心”地表达“爱国”之情的“这个人”，恐怕已经成为昔日民族主义革新的旗手。这是因为，关于“爱国”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他是经过了一定的思考的。然而，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大家对给予我们安定生活的“日本”所产生的信赖与安心正在以不自知的民族主义的形式沉淀下来。

像这类民族主义早已在1956年被政治学家松下圭一冠以“大众民族主义”之名。彼时27岁的松下只是一位年轻的研究者，与第七章介绍的《中间文化论》的作者加藤秀俊一样，受到了美国大众社会论的影响。

松下认为，由于生产力和大众传媒的发展，在西方发达国家，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均质化在不断深化，并从阶级社会向大众社会过渡。因此，以阶级斗争为前提的社会主义革命难以为继，对政治漠不关心的大众将会成为社会的主流。而且，曾被马克思形容为“无国界”的无产阶级，也由于“社会的‘小市民化’”和“大众民主”，转型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民’”，“大众民族主义”也由此应运而生。[7]

虽说如此，但不论是加藤还是松下，都不赞赏这种“大众社会”。在1960年安保斗争之际，对于埋首个人生活而对政治漠不关心的行为，加藤批判道：“这不过是市民观念形成前的一种利己主义。”[8] 松下也将安

保斗争称赞为“新国民形成的起点”，而且主张对抗保守政权的“体制民族主义”和大众社会的“大众民族主义”，倡导形成“革新民族主义”。[9]

更何况提倡阶级斗争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大众社会论本身也持批判态度。很多知识分子认为，相比于美国应该算是落后社会的日本，是不可能出现大众社会的。政治学家藤田省三在1960年安保斗争的高潮前夕就断言：“所谓‘大众社会论’已经破产。”[10]

然而，藤田的言论自不必说，1960年之后的局势以超出加藤和松下的预测之态势而迅猛发展。民意调查显示，个人生活志趣的上升和参政意识的下降在1960年代以后仍没有发生改变的迹象。另一方面，对于“日本人和西方人的优劣”这一问题，在1951年回答“日本人比较优秀”的占28%，回答“日本人稍逊一筹”的占47%，然而在1963年情况发生了逆转，回答“日本人比较优秀”的占33%，回答“日本人稍逊一筹”的只有14%。此外，到1968年回答“日本人比较优秀”的甚至上升到了47%。对于这一现象，NHK广播民意调查所附上了这样的标题——“深入人心的优先个人生活的生活方式”以及“已恢复的民族自信”。[11]

其中，“单一民族”这个词的用法也发生了变化。这个词在1950年代作为应该实现的目标被左派提倡。然而在1960年代以后，作为指代自古以来既成事实的词，被保守派提倡。

例如，小泉信三在1961年强调，相较于“苏联与中国”，“日本国民是幸运的，与上述两国不同的日本是单一同质的民族”。日本经济联合会专务理事前田一也在1964年对“不具有多元民族融合或是混血的日本民族统一性”大加赞赏。三岛由纪夫在1968年发表的《文化防卫论》里写道：“日本是世界上稀有的单一民族、单一语言的国家。”石原慎太郎也在1968年主张：“基本上可以称作单一民族的日本国民，讲着与其他国家完全不同的单一语言，历经变迁形成了独具一格的民族文化。”[12]

经济高速增长也给左派的论调带来了微妙影响。这首先体现在“近代”一词上，作为本应该实现的目标变得黯然失色，反而成为批判的对象，取而代之的是，对于近代化的弊病等环境公害问题的关注日益显著，大家对于农村共同体以及“土著文化”也开始重新进行评判。

与此同时，曾围绕日本共产党方面所使用的像“近代主义”这样的批判用语也迅速普及开来。小田实在1965年的评论里写道：“时代已经发生了很大改变。”还提到他的一些朋友开始出现一种倾向，那就是“我刚一说些什么，他们便会立马下结论说‘这是近代化的原因’”。[13]

同时，产生了对民俗学和古代史的关注。在第十四章将要考察的吉本隆明，在1968年出版的《共同幻想论》一书中，不仅引用了民俗学，而且从分析古代神话的视角论述了天皇制和国家的起源。这一研究虽然与战败后出现的“民族”和天皇制度是近代的产物这种见解相左，但是在1960年代以后，这种看法被批判为“近代主义”。

但现在看来奇怪的是，借机批判“近代主义”的人们对自己使用词语的由来不甚了解。倒不如说批判日本共产党的新左翼派年轻人，在这样的潮流下，开始批判他们所奉行的“战后民主主义=近代主义”的论述。可以说，他们虽然是在反抗共产党，却完全没有意识到他们为了反共所使用的术语恰恰来自共产党。

与此同时，出现了对“明治”评价的改变。以丸山真男为首的战后知识分子，将明治时期看作日本实现近代化和国家建设的时期，对明治时代给予高度评价。1960年2月，竹内好提议，在1968年纪念明治维新一百周年之际，举行“明治维新百年祭”。

由于1960年安保斗争的高涨，这种对于“明治”的肯定暂且持续了一段时间。1964年，近代史学家色川大吉出版了描述自由民权时期“青年”政治意识的《明治精神史》。色川在《明治精神史》的序言中说，

写作动机来自他在1960年安保斗争中目睹的“现代日本青年”的“潜力”，想让他们“看看明治青年的生存方式”。[14]

但1960年代中期以后，这种倾向发生了逆转。由于东京奥运会的举办，民族主义不断高涨，日本政府随之展开了面向“明治百年”对“明治”再评价的运动。当然这个“明治”并不是革新和自由民权时期的“明治”，而是作为国家意识和元勋时代的“明治”来进行描述的。

左派历史学界和教育界对这一趋势坚决反对，同时开始了反对“明治百年”的运动。从这一时期开始，日教组对“爱国心”的反对也日益增强。在1960年提倡“明治维新百年祭”的竹内好也在1965年写了《反思“明治狂热”》这一评论，认为自己需要重新审视日本近代化。虽提倡“明治百年”，但竹内好感叹道：“对‘明治百年’顺势肯定的潮流，与我最初的想法大相径庭，使我的主张在这一潮流中饱受冲击。”[15]

1965年，思想史学家山田宗睦写下了批判保守知识分子的《危险的思想家》一书。山田在前言中写道：“三年后的1968年就是明治维新一百周年。以此为契机，诸多否定战后的声音将形成合流。究竟是维新百年的胜利还是战后二十年的胜利，这关系到日本的未来。”[16]《朝日新闻》受此启发制作了《明治百年与战后二十年》特辑。到1965年为止，“明治”作为保守反动的象征，与“战后”对立存在。

1960年代后半期，将在第十五章介绍的保守派批评家江藤淳，高举“明治”之旗倡导国家学说，批判战后思想是白桦派的延伸。当然他所提倡的赞扬“明治”和批判白桦派的见解，和之前的丸山真男、竹内好，或亲共文学家的主张相同。但江藤淳、吉本隆明以及新左翼的年轻人，并不知道这一用语的由来。

战败初期的战后思想作为以“总决战体制”为首的战时语言体系的变化的形式，表现出对战争的批判。从1960年代左右开始的对“战后民主

主义”的批判也以战后思想语言体系嬗变的形式进行。

与此趋势相反，到1960年代末为止，在赞赏“明治”的战后知识分子之中，也有人赞赏大正时代。如第五章所述，鹤见俊辅在1950年代赞赏了“明治”，认为“明治精神要强于昭和精神”。[17] 但到1972年，鹤见却表示：“我是在大正民主主义思想尚未完全泯灭的时代成长起来的。”[18]

在革命和混乱的“第一战后”时代，大正民主主义等被视为应该超越批判的稳健主义。但革新势力在尚处攻势时就已经结束了，战败之初被批判为过于稳健的宪法和《教育基本法》等作为战后改革的成果必须加以捍卫。对“大正”评价的逆转也在这样的时代变化下产生。

此外，在经济高速增长中产生的另一个现象是战争体验的淡化。

战争体验的淡化

1960年安保斗争后，竹内好断断续续出版了与战争体验相关的论著。他主张经历战争的一代“应以过去的记忆为基础采取行动”，对于我们来说安保斗争是“战争体验的爆发”，但同时“战争体验正面临严重的腐蚀”。[19]

战争体验的“腐蚀”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未经历战争的一代成长起来。1956年日高六郎这样表达当时中小学教师的心声：“虽然说是和平教育，但是现在的孩子不了解战争，战后出生的孩子已经是四五年级的学生了”，“有时我在课堂上讲自己悲苦的过去时，从学生的眼里流露出来的不是感动，而是对稀奇事物的好奇心和一种单纯的笑意”。[20]

“腐蚀”的另一个表现是，在战争记忆逐渐形式化的同时，也慢慢成为被美化的对象。

这一现象在知识分子中也普遍存在。如第十一章所述，丸山真男在

1950年的座谈会上指责道，重新武装论的鼓吹者“应该是没参过军、没体验过军队悲惨生活的人”。但他在同一座谈会上说，即使是军队时代的记忆之中，“关于演习休息时唱唱歌等小事的记忆”也“像绿洲一样”，“在之后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21]

更不要说战后经过20年的时间，这一倾向变得更为显著。鹤见俊辅在1968年说道：“回到战时一切重新考虑，即使是现在也难以实现。即使是拥有这样经历的人，也很难逃脱把自己的青春理想化的诱惑。”[22]

1960年代，随着生活的安定，各地成立了“战友会”。很多退伍老兵的回忆录开始得以出版。虽然说“战记物语”的出版热在战败初期也存在，但是1967年的《出版新闻》这样描述当时的特征：“最近出版的一系列的战记物语或是战争小说，与之前相比有变化的倾向。不知不觉到现在为止，对这类事情，大部分人都倾注了朴素的愿望。也就是说，战争是罪恶的，不能重蹈覆辙。但是，最近有很多人虽然并没有美化战争，但是他们认为‘为了国家，死的光荣’，并在一定程度上以此为前提来进行写作。”[23]

分析这些“战记”的社会学家高桥三郎指出，作为“昭和四十年代”的现象，这些“战记”失去了存在于以前战争体验记录中的“某种‘凄惨’”。历史学家吉田裕也分析了海军战斗机飞行员坂井三郎——如第一章所述，把有关特攻队的海军公报形容为“弥天大谎”的飞行员——的回忆录，指出，1953年的《坂井三郎空战记录》在1967年更名为《蓝天武士》再版，其主题思想也由“自己的战争体验正在逐步消失”变成“日本最强的‘胜负师’”。[24]

这种倾向不限于美化战争。美化战争的“战记”强调“勇战敢斗”和“单纯无染”。但与此同时，也有一种倾向是试图传达战争悲剧的“战争体验物语”，把“悲剧”和“辛苦”带有情绪地宣泄出来。虽然两者的政治立场可能是相对的，但对于战争的感伤性叙述，以及涉及战后思

想最大源泉的屈辱悔恨所带来的伤痛等为数不多的方面却是相通的。如果遵循日高六郎在1956年所形容的，则是“不仅是不了解战争的一代，即使对于经历过战争的一代来说，战争已经开始成为超越每个人的体验和真实感受的一个抽象事物”。[25]

这样，在战争记忆慢慢变淡的过程中，保守政权开始了对战死者的追悼。如第三章所述，在《旧金山和约》生效后的1952年5月，举行了天皇亲自参加的追悼会。在此之后，就没有再举行这样的仪式了。但1963年5月，内阁会议决议通过了《关于实施全国战殁者追悼仪式的提案》。从这一年起，每年8月15日举行由政府主导的追悼会，追悼对象的范围限定于日中战争中牺牲的“日本人”。在1963年的仪式上，池田勇人首相强调“为那些坚信祖国荣光而身处各地的战争牺牲者祈祷”。

但与这一官方活动相反，记忆的淡化一直没有停止过。[26] 在追悼仪式开始的1963年8月14日，内阁官房长官黑金泰美发表声明，建议在8月15日的正午，全体国民进行默哀。但是，1967年8月15日的《朝日新闻》晚报报道说，在银座大楼街头的采访中，脱帽默哀的人屈指可数，大部分人都漠不关心。另外，1968年8月15日该报晚报同样报道说，正午在新宿默哀的人“一个也看不到”。[27]

战争记忆流于形式使得战后一代对战争体验的继承变得更加困难，加速了记忆淡化的过程。成长于战后的年轻人，对于战争经历者美化自己过去的行为和自大高傲的姿态感到十分排斥。

例如，1961年野添宪治在给《思想的科学》的投稿中写道：“解甲归田的农民士兵，基本上到现在还在赞美战争，为在战场上实行的残暴行为感到骄傲。”另外，他们碰到没有经历过战争的年轻人便说“没有当过兵的男人不算真正的男人”。[28] 这种态度招致年轻人的排斥是理所应当的事。

即使不美化战争，以感伤的口吻来叙述战争的态度也会被年轻人排斥。战败时还是少年飞行兵的高田佳利在1959年记录下这样一段花絮。每当和朋友说“8月临近了，战争的伤痕不会痛了”，朋友的弟弟会说，“哥哥你们每年都在重复那样的事情”。如果表现出感伤柔弱的样子，就会被他责难。

在战争体验者之间，会仅仅因为“百感交集”、“声泪俱下”这样像暗号一样的表达，而唤起他们对战争共有的诸多记忆。[29] 但对于不了解战争的一代来说，这种感觉仅仅会在那个封闭的感伤的共同体中反映出来。竹内好在1961年写道：“年轻人中的一部分或者是多数人对于上一代人的战争体验抱以冷眼相待或是排斥抗拒，这种现象仅仅是以战争经历的封闭性为前提，可以说是有其理所当然的理由的。”[30]

这种只有战争体验者才能理解的封闭性表达，渐渐演变成一种定式，很容易成为一种借用感伤来把悔恨隐藏起来的辞藻。坚持追究教育者战争责任的长滨功写道：“一言以蔽之，迄今为止的战争体验似乎仅仅成了一种谁都可以说上两句的谈资。经历了艰难岁月的老一辈人，面对这些不知父辈辛苦无忧无虑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仅仅把这些岁月艰辛的往事作为训斥呵责年轻人的工具。”[31] “对于年青一代来说，感到迷惑是自然的了，慢慢变淡也是自然的。”

即使在言论界，也出现了年青一代的反抗，1959年在《文学界》10月的座谈会上，当时27岁的年轻作家石原慎太郎和战时派的桥川文三就发生了言语冲突。石原在这里批判了沉浸于战争体验的年长一辈。另一方面，石原认为对自己而言，这种感受不到自己当下生活的反馈的和平时代反而是十分痛苦的。他向桥川反驳道：“事到如今，仍然只写战争，将会变成什么样呢？”[32]

1963年，26岁的社会学家见田宗介从左派的观点批评了“沉浸于战争一代的娘娘腔”，见田认为，尽管当前的状况已经成为和战前完全不

同的“大众社会发展的完成期”，但是拘泥于战争体验的年长一代依然这样坚持：“比如‘从本质上’来说现在与战前依然相同，或是这是一条与‘战争’相连接的道路，抑或是‘天皇制’原理的再现等，不论如何都会在自己的既有思维框架下思考这些问题。”这在安保斗争后的社会运动中，“成为阻碍能动性和创造性的重要原因”。[33]

另外，对于年青一代来说，他们批判感伤的“被害者意识”，强调“加害”的意识层面，并将此作为反抗手段去批判那些整日宣称战争体验的年长一代。1967年，深受年轻人追捧的永岛慎二的漫画《疯癫者》，描绘了沉浸于致幻剂派对的年轻人，面对嘲笑自己的年长者，共同反抗的场面：

> “此时此刻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你就是杀人犯。”
>
> “什么？”
>
> “瞧，你自己已经忘了！”
>
> “我是想说，包括你在内日本四十岁以上的人都杀了人。也就是说，在太平洋战争的腥风血雨中，你们直接或间接杀了很多人。”
>
> “我们这代人，手上还未曾沾染别人的鲜血。”
>
> “在我们面前，你有什么好笑的！”[34]

对年长者战争责任的追究，从战后以来一直存在。但是当时的追究对象主要是处于责任地位的当政者。然而通过上述对话，我们发现战争责任追究的对象已经不再区分当政者和民众，而是对“不惑之年以上的人们”统统问责。这种逻辑在不了解战争的一代人中首次出现，并逐渐抬头。

与此同时，年轻人用从年长者那里学来的语言反过来责备年长者。他们在幼年时期就开始被教导对和平的渴望和对战争的反省。因此，他

们这些年轻人在反抗那些极力宣扬战争体验的年长者的时候，自然而然强调的是年长者的加害责任。

对“和平与民主主义”的批判

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对“和平与民主主义”的批判逐渐抬头。对不了解战争的一代人来说，“和平与民主主义”被视为支撑“近代”大众社会与维持现状的理论逻辑。

成为这一契机的是1960年安保斗争之后逐渐兴起的对共产党的批判。如前所述，共产党用自己独特的方式提出“和平与民主主义”。例如，共产党的“二次革命论”提倡处于绝对王政阶段的日本首先要爆发民主主义革命，再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以此为方针的共产党系列文学被称为“民主主义文学”，这已经在第六章有所论述。

因此新左派论者批判日益稳健化的共产党时，尤其是在1955年的第六届日本工会全国协议会上，批判的往往是“和平与民主主义”。安保斗争之后的1960年11月，吉本隆明和黑田宽一等拥护全学联主流派的知识分子共同撰写并出版了《民主主义的神话》一书。在这之后，针对不支持全学联主流派的共产党的批判逐步升级。

同时，在《民主主义的神话》这本书中，丸山真男和日高六郎等非共产党系的“进步文化人”也成了批判的对象。他们这些人未必全面认可全学联主流派鲁莽蛮干的斗争，在安保斗争问题上也并不认可全学联主流派将其定性为失败的观点。基于此，他们被看作宣称“和平与民主主义”的共产党的“同伙”。

生于战后的年青一代不了解战争过往却只了解和平年代，因此对于“和平与民主主义”日益感到厌倦。正因如此，对“和平与民主主义”的批判很容易在这些年轻人中间引起反响。与全学联主流派年轻人有过深

交的清水几太郎，在1961年批判共产党的同时说道：“对于某些上了岁数的知识分子来说，脑海里依然存在战前和战时的那段黑暗记忆，因此将和平与民主主义作为战后的两大价值取向就已经很让他们满足了。年轻人却截然不同。战后，受过初等教育的人们觉得这两大价值是理所当然的、平凡的、无聊的。”而且清水认为，“年轻人觉得和平与民主主义都毫无意义”。[35]

西部迈作为指导全学联主流派工作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一员，对上述观点持有相同的看法。西部在关于1960年安保斗争的回忆录中说道：“‘和平与民主主义’对战前一代人来说是终于到来的、期盼已久的恩惠。但在战后一代看来这是应该怀疑，甚至应该打破的一句空话”，“共产主义者同盟下意识地认识到了正是战后的民主主义掩盖了权力所在”。[36]

在1960年的安保斗争中，确实存在年长一代知识分子试图抑制学生直接开展运动的倾向。1955年之后，为了隐藏革新势力内部的对立，保持稳健化“国民运动”在形式上的统一，提出了“和平与民主主义”这一无碍的口号，这也是事实。从这些事实来看，年青一代“直觉”到“正是战后的民主主义掩盖了权力所在”，也是合情合理的。

尽管如此，这样的“直觉”是否真的来自战后思想的正确认识，对此我们仍然心存疑问。例如，在桦美智子的遗稿集中有诸多地方批判道：“在《世界》等杂志中，有许多针对‘大人’的条件斗争的建议。例如那些‘进步的知识分子’认为由于‘日本的自主性在不断提高，全面反对修改安保条约的行为就显得十分幼稚……’”[37] 然而，在当时的《世界》杂志中我们很难发现与之对应的报道。

年轻人凭着自己的“直觉”指责“和平与民主主义”的欺骗性。但他们大多数并不知道在1955年之前其实已经存在各种各样的宪法观和“和平”观。根据西部迈的回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干事们在安保斗争时期

由于忙于各种运动，并没读书看报的时间。难以否认的是，这些年轻人对民主主义和进步知识分子的印象大概是在他们根深蒂固的观念中逐渐形成的。总而言之，从这一时期开始，战败后存在的各种各样的思想潮流和改革浪潮，被统称为“战后民主主义”，“战后民主主义”这一称谓迅速普及开来。

此外，对“和平”的厌恶是与对战争的浪漫憧憬联系在一起的。在1956年的座谈会上，当时24岁的石原慎太郎主张，“所谓现代就是表面看起来非常开放明朗”，“实际上是空泛的，徒有其表”。随后，石原又指出，“我对战争的印象也是从周围的人那里道听途说的，但是通过阅读战记、看这类题材的电影，我从中感受到了他们的英勇，比西部剧[38] 受到的感动多得多”。[39]

年青一代对“和平”的批判和年长者对战争的美化在1960年代交织在一起。从60年代中期开始，在少年杂志上连载的《紫电改之鹰》、《零战隼人》等战记漫画也风行一时。以战斗机为代表的塑料模型和介绍武器的新闻在这一时期非常受欢迎。

对战争的憧憬与对激进社会运动的支持也有相重合的地方。当时石原慎太郎自称“价值紊乱者”，1959年写过散文《刺杀》，主张作家应该“把读者当作恐怖分子来驱赶”。[40] 大江健三郎回忆，1960年安保斗争前后，一位拜访过石原慎太郎的全学联领导说，“只有石原才是当代日本的真正右翼”，他对大江说，“应该在革命后立即肃清”。[41]

出于对“和平与民主主义”的反感，出现了像崇拜北一辉等这些战前右翼分子的年轻人。与其说老一辈对此表示不满，不如说这正是他们所期待的。在1960年安保运动时还是小学生的一名少年，当时一边读北一辉的书，一边参加游行示威。这位少年在1967年写道：

> ……我对于民主主义，只有憎恶。1960年夏，我还是横滨高台一所小

学的六年级学生，是一个少年法西斯主义者。

> ……对居住在横滨住宅区的少年来说，比如像“考试”这样的字眼，即使是小学生也是非常熟悉的。但是，对我而言，我所有的想法在一定程度上与学校和家庭公认的价值标准背道而驰。老师和父母似乎都厌恶我。那些被老师表扬的小男孩们，也会因为我模拟考试的成绩不佳而鄙视我。然而，支撑这些人的价值取向正是民主主义。在社会课上，一个尖嘴猴腮的老师在那里煞有介事地大谈民主主义。
>
> ……在那个动荡的6月，我把全学联的行动都“当作法西斯主义”来支持。因为他们打破了大人们设定的愚不可及的规则，以自己的鲜血为代价来承担那些后果。[42]

乘着这股东风，1960年代至1970年代的年轻人中，那些曾经批判竹内好其“近代主义＝战后民主主义”的民族主义者，掀起了重新评价的风潮。对他们而言，丸山真男是日本共产党的“同伙”，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同样很明显，竹内与日本浪漫派作家三岛由纪夫也被相提并论。

大家意识到，这种对“和平与民主主义”的反抗，其实是对因经济高速发展而出现的大众社会“大多数人”的反抗。西部迈回忆，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蔑视多数表决制的念头并不多见”。此外，由于直接行动的“激进主义”和“放纵行为”，“想要冲击大多数人平凡生活的信念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动力”。[43]

像这种对“大多数人”的反抗，反映了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情况下，大学生以及知识分子不断丧失之前作为精英独立于民众的倾向。如前所述，批判“大多数人庸庸碌碌”的西部迈在后来展开了对精英主义“大众”的批判。但他并非出身于上流社会，而是到了1950年代末，“高中二年级时，突然收集了一些世界文学全集等，但是在那之前，自己家里除了教科书，根本谈不上有书之类的东西”，西部迈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44]

与此截然不同的是鹤见俊辅。这个出身于政治世家、从小就与姐姐一起被送到美国留学的人，从1950年代开始不断地赞美“大众”。鹤见与西部的分歧，是日本经济高速发展前后“知识分子”演变的一个缩影。

在此期间，“战后民主主义”与“平凡”的大众社会被一视同仁。几乎与石原慎太郎同时代的影评家佐藤忠男，在1969年评论黑泽明的同时这样描述“战后民主主义”：

> 在战后的日本……克己、禁欲的精神主义和封建思想、军国主义一起被视为过去的产物。喋喋不休的被害者意识和微弱的幸福愿望填满了这个空隙。但是，只有黑泽明一人据守这座克己和禁欲的精神主义的孤堡，这一特征在《生存》和《七武士》这两部作品中达到了顶峰。
>
> 黑泽作品中的主人公通常都是武士。即使不是古装剧，其主人公展现出来的也是武士的思维意识……
>
> 黑泽作品中的主人公一贯被赋予正面、坚韧不拔的责任意识。但是，由于被害者意识以及对幸福的渴望，这些角色的人物特点日益模糊为战后的鲜明特点。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就是不断展示自立坚强的个人形象，对比出日本战后民主主义的弱点。[45]

毫无疑问，丸山真男和大塚久雄主张的是应该坚持“坚韧不拔的责任意识”和“克己、禁欲的精神”，做个“自立自强的人”。佐藤却把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大众社会的状况称为“战后民主主义”。

我们从佐藤的文章里可以看到这样的成见：由于“战后民主主义”是批判封建制、提倡近代化的，所以应该否定“武士”的“克己、禁欲”。事到如今，在这一时期，什么是“战后民主主义”已经不得而知了，只是出现了把“战后社会”与“战后民主主义”一视同仁的趋势。在此期间，宣扬“武士道”的三岛由纪夫和批判“民主主义神话”的吉本隆明在新左翼和全共斗运动的一部分年轻人中广受追捧。

与此相对，批判战后的民主化是占领政策的产物，因此不论是提倡制定“自主宪法”的保守派论调，还是大众民主主义的兴起，都展开了对“战后民主主义”的批判。丸山真男在1964年出版的《现代政治的思想和行动》增补版的后记中写道：

> 最近的讨论中特别使我萦怀的是，不管是由于有意识的扭曲，还是由于无知，这种把战后历程的复杂曲折和每个人坎坷的人生草率地区分归类，以“动向”之名把这些都抹杀掉的“战后思想”论，不知不觉间就将并未经过仔细推敲的印象沉淀下来，新的“战后神话”应运而生。……这样的神话（例如把战后民主主义一概称为“占领民主主义”这样“虚妄”的言论）随着并未经历过战争以及战后氛围洗礼的年青一代的增加，有可能在未加批判的情况下被全盘接受。[46]

在这篇后记中有一句名言：“比起大日本帝国的‘实际存在’，我把赌注压在战后民主主义的‘虚无’上。”但丸山所担忧的是，随着经济高速发展的推进，这句话会变得越来越成为现实。

新左翼的“民族主义”批判

此外，伴随着经济高速增长产生的，是新左翼的民族主义批判。从1960年代开始，“大多数人”都走向了大众民族主义，新左翼的年轻人对此展开了反击。

新左翼对民族主义的批判，首先反映在对共产党“民族主义”的批判上。而后成为新左翼与共产党对立点之一的是“日帝自立论”问题。当时的共产党把日本认定为美国的仆从国，认为反美民族独立斗争应优先于阶级斗争。但新左翼的各派别则认为，日本已经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张与日本垄断资本的斗争应优先于反美斗争。

于是，与共产党对立的学生对共产党的民族主义进行了批判。例如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曾发表关于砂川斗争的声明，呼吁“停止日本人欺压

日本人的政策吧！”“站在国民的立场和美国开始交涉吧！”因此在1959年1月，以当时全学联委员长、被共产党除名的香山健一之名发表的《全学联意见书》对共产党的声明进行了批判：

> “日本人不要欺压日本人”，这到底算怎么回事？阶级斗争到哪里去了？！20世纪后半期，阶级都消灭了，只有民族留下来了吧？共产党要求政府“站在国民的立场”，还说是请愿运动。暴力行为的阻止、超越政党政派的大团结等等，这些不管怎样辩解都绝对脱离了马克思主义。[47]

这里批判的是共产党为了维持超党派的“国民联合”而想要抑制直接行动的态度。全学联的这份意见书，认为日本共产党受到了“机会主义、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官僚主义”的毒害，批判日共“忘记了自己作为阶级政党所应该具有的属性……开始蜕变成为一个国民政党”。

同时，该意见书也对“由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论的绝对化’以及‘世界革命的放弃’而产生的不断背叛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斯大林主义’”进行了批判。十月革命以后，中止“世界革命”而采取“一国建成社会主义革命”的苏联共产党，于1955年提出“和平共存”的主张，显示出向资本主义妥协的姿态。对于新左翼的年轻人来说，这样的稳健路线无疑是“机会主义、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官僚主义”的“斯大林主义”。

如第十二章所述，领导全学联主流派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也在1960年的安保斗争中主张：“我们的战斗并不是‘民族独立的斗争’，必须把主要打击对象指向资本主义政府——岸信介政权。”此后，共产主义者同盟提出在批判“日共的民族主义、社会党的议会主义以及日本工会总评议会的合法主义”等的同时，也要否定“进步知识分子”的“市民主义”，成为不畏开展非法直接行动的“革命政党”。[48]

这样，在批判共产党“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同时，手持北一辉著作的年轻人支持全学联这样的构想，从表面上看是矛盾的。但是就如第十二章所述，据曾是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成员之一的西部迈所说，“日本

共产主义者同盟的'革命'只是表现纯粹性、彻底性之类东西的一种理念性词语"。也就是说，对于共产党"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批评也好，对于北一辉的赞赏也好，都只是对于主张"和平与民主主义"的老一辈人的长久反抗以及对缺少"纯粹性"、"彻底性"的政治决策的厌恶情绪的一种表现。

当然，这种表现也包含了对大众社会的厌恶情绪。1960年1月，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机关报《战旗》的创刊号写道："在号召大家燃起'革命热情'，打击日本共产党'斯大林主义'的同时，我们《战旗》的创办并不是为了迎合所有阶层，也不是为了取悦全体大众。我们绝不使用被资产阶级合法性束缚的奴隶语言。我们的声音，或许会让那些如履薄冰的小资产阶级感到不安，又或者让他们感到吃惊。"[49]

然而，与试图团结大多数"国民"的日本共产党以及在50年代苦恼于人心背离的知识分子相比，上述状况有着显而易见的区别。这一方面体现了对于大众社会现实的反抗，另一方面也与民众认为日本已经可以与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平起平坐的思想认识有关。此外，战后一代的崛起也导致了对于"民族"一词认识的变化。曾以"民族"之大义成为一名少年飞行员，战后又被"民族"的口号吸引而加入共产党的高田佳利，记录了1959年其友人的弟弟对其加以质疑的话语："一些人憎恶天皇，而兄长们却因此批判他们，这种行为就好比草莽之臣，苍白无力。正是这种狂妄的态度，让你们沉浸于对天皇的推崇之中。但是对我们而言，正因为不迷恋天皇也不热衷国家，所以我们对这些毫不关心"，"共产党抛出来的民族独立的口号，我们完全不买账"。高田深感年龄差异所带来的的价值不同，并对此评价道："年轻人的这些话深深地刺痛了我。"[50]

共产党和新左翼围绕"民族"问题的观点对立，也反映在对国际关系的认识上。1965年爆发的反对日韩会谈的运动体现了这一点。在这次日韩会谈中，自民党决定通过向朴正熙军事独裁政权提供经济援助的方

式，彻底解决战争赔偿问题。当时，以共产党和社会党为核心的“国民会议”把日韩会谈看作从属于美国的日韩反共政权所达成的一项政治协议，并对此提出必须推进反美民族斗争和“自主外交”。但新左翼诸派认为日韩谈判让已经独立自主的“日本帝国主义”迈出了扩大殖民地的第一步，因此否定了民族主义斗争。

在反日韩谈判斗争中，新左翼诸派以及非共产党系的全学联都批判了共产党的“反美民族主义”，并提出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口号。当时的传单，多为“打倒日共，反美民族主义！”“日本帝国主义者将日共所强调的‘日本人意识’作为日本民族主义的绝对条件！”之类。更有甚者，提出对韩国也要重视阶级斗争，主张“批判韩国民族主义”等。[51]

1965年，隶属新左翼的“社青同”[52]解放派在其成立宣言中，一方面批判“小资产阶级‘和平民主主义’运动”，另一方面也阐释了不断推进“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的苏联开始奉行“斯大林主义”。受“斯大林主义”影响，各国工人阶级和共产党明显丧失了“自我阶级的独立性”，深深沾染上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国民主义和民族主义。[53]这一现状，让在此期间急速高涨的针对“大众社会化”及“大众民族主义”的反抗情绪，通过对“民族主义”、“国民主义”、“小资产阶级”的排斥以及对“阶级斗争”、“世界革命”的共鸣展现出来。

这一论调，与自1960年代以来日渐显著的反对美化战争记忆的思潮相互映衬，同时改变了人们对于战死者的感情。1963年，批判日韩会谈的全学联主流派书记局所派发的传单上写道：“由政府发起的阵亡者追悼会是‘对日本人意识的鼓吹’和‘对帝国主义战争的美化’。”并批判了“日共的民族主义”。[54]

如第三章所述，1951年京都大学学生在天皇来访期间举行和平集会，在写给天皇的公开信中打出了“毋忘先辈”的口号。除了这一事例，对阵亡者的记忆是追究战争责任及和平运动的基础。虽然有对靖国神社

的批判，但革新势力依然尊重对于阵亡者的悼念。但随着战后一代的崛起，开始出现了批判慰灵是“鼓吹日本人意识”的论调。

在左派批判民族主义的同时，如前所述大众民族主义也开始高涨。在此之中，战后知识分子所倡导的“国民主义”失去了存在的土壤并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竹内好在1965年的《反思“明治热潮”》一文中感慨自己“明治维新百年祭”的提议被他人改头换面的同时，提出最近要避免使用“民族主义”一词，而改用“民族的形成”这一说法。[55]

如第十五章所述，直到60年代中期一直站在护宪的立场上提倡民族主义的大江健三郎等人，也在1971年表示不想再使用“民族主义”这个词。以政治学家坂本义和为首，在1960年安保战争后表示对“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的结合”寄予期待的言论家们，直到1960年代末仍与民族主义保持距离，只提出“市民”的口号。1947年提倡“国民的自豪”的左派代表羽仁五郎也在1968年的畅销书《都市的伦理》中讴歌了市民的自治与自发斗争。[56]

与此相对的是清水几太郎。在1950年代的护宪及和平运动中表现出“诚挚的爱国心”的清水，在1960年的安保斗争中偏袒支持全学联主流派，在与共产党对立的过程中，对“拥护民主主义”这个口号提出质疑。安保斗争之后，就大众社会现状，清水表示“战后民主主义”已失去效力；另一方面，他同香山健一等被共产党除名的年轻人一起，一度倾向于激进左派。但这一路线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1970年代之后，他们又迅速向保守派的反美民族主义倾斜，并且批判“战后民主主义”、提出修宪及核武器等主张，表明其正在向宣言“诚挚的爱国心”的右派言论家的方向发展。[57]

如第三章所述，丸山真男在1960年的《忠诚与叛逆》一文中论述了内村鉴三和自由民权的思想家们积极重新解读“封建的忠诚”，并产生“叛逆”的思想。但丸山在这篇文章中，对于这一思想运动陷入停滞的

明治30年代[58]，是这样描述的：

> 也就是说，拥有官僚化和都市化双重意义的“近代化”风暴已大幅冲击这一中间阶层的自主基础，工薪阶层要么厕身为寄生地主，要么委身于“贩夫走卒”这一下层社会。因此，经历过这样风云变幻的明治30年代的基督教徒即使强调了封建精神，却已经看不到像民权运动阶段那样的热烈反响。但从别的角度来说，这种反响还是存在的。正是明治30年代，在思想界开始发迹的武士道热潮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了反映甲午战争后带有国家自满与军国色调的复古风潮。……
>
> 如果客观看待这一事态，此时对于封建式忠诚的强调，只会招致适得其反的回应。相反，一旦结合了反抗的思想，就势必引起缺乏社会基础的“荒野”的呼声。内村恐怕对此早已深刻了解。……所以，他的语调中带有自虐性、讽刺性也是理所当然的。[59]

如上文所述，丸山之前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比起大日本帝国的‘实际存在’，我把赌注押在战后民主主义的‘虚无’上。”然而四年后，他却这样写道：“这种想法应该可以说是一种自虐。”他恐怕对自己所倡导的“国民主义”在大众社会状况下会陷入何种局面，可以说是“明了于心”。

在这之后，始于1968年的全共斗运动爆发了。

全共斗运动的兴起

虽说对全共斗运动的分析是本书的题外话，但为了本书前后的连贯性，在必要的范围内在此对其基本情况做一叙述。

战后的学制改革及经济高速增长使得大学生的大众化趋势日益明显。大学总数由1940年的47所增加到1954年的227所。大学升学率也从1960年的10.3%上升到1965年的17.0%，再到1970年的23.6%，1975年达到37.8%，呈不断上升趋势。

在此基础上，战败后婴儿潮中出生的一代开始升入大学。[60] 早在1954年，在他们成为适龄儿童时，儿童数量比上一年增加了55万人，这导致教室数量严重不足，并造成了一个班有70名学生的状况，使得教育环境十分恶劣。[61] 到1960年代中期，当他们到了高考的年龄，伴随升学率的快速上升，高考竞争日益激烈，大学的硬件设备日益难以满足大众需求。

正因如此，高考补习学校和辅导班如雨后春笋般大幅增加，也出现了进入大学之后，在大礼堂用话筒授课的情况。在这一时期，“入学战争”、“巨型大学”、“批量教育”也成为流行语。

大学教授适应不了这种教育大跃进。在此之前，他们一直习惯于以具有知识储备的少部分优秀学生为对象，以讨论会的形式进行授课。然而，这些教授现在所能做的就是把之前在讨论会上给少数学生讲授的高级讲义，在大班课堂上拿着话筒进行讲授。而且大学数量的增加，引发了大学教师数量的增加以及教学质量的下降。

对高等教育大跃进同样感到困惑的是学生。他们中不少人期待着像在旧制高中和帝国大学里那样紧密的师生关系，且成为心系国家天下的未来精英。对他们来说，经过激烈的“考试战争”好不容易跨进大学的门槛，然而落后的设备和批量式教育，使他们之前的美好期望大打折扣。

这种意识上的鸿沟也在学生们求职的过程中显露出来。以1960年为界，大学毕业生虽然实现了全部就业，但是由于大学毕业生数量的急剧增加，他们所从事的很多都是普通职业。以应届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岗位为例，从事行政事务岗的大学生从1953年的43.0%下降到1967年的31.2%，相反，从事销售岗位的大学生从3.5%上升到19.3%。此外，在那个“行政事务岗”与“工薪阶层”乃至“知识分子”被当作同义词的时代，大学毕业生与昔日的状况截然不同。心怀美好梦想进入大学的年轻人，感受到了他们的未来或将因此而受到限制。

为应对学生的增加，各大学都尝试增加教室的数量，于是开始大兴土木。但新建的这些混凝土建筑反而造成了管理性社会的印象，学生们对此表示不满。设备投资的增加使私立大学的财政日益捉襟见肘，再加上经济高速增长下的通货膨胀，于是学费也水涨船高。不顾教育内容的贫乏，一而再地提高学费，只会招致学生的反感。

同样，现行的大学管理体制也难以适应迅速发展的教育大众化。以东京大学为代表的国立大学，具有绝对权威的教授将课程助教和学生视为合作伙伴，研究生和进修医生把无偿劳动视为惯例，这些情况并不少见。在私立大学，创办者和校董一手遮天，与当地经济界相互勾结的情况也时有发生。这种陈旧的管理方式与逐渐大众化的大学实际情况，以及接受战后新教育的学生思想格格不入。

在这一背景下，到了1960年代后半期，各地大学相继发生各类斗争。1965年4月，高崎经济大学爆发了反对优先本地委培生入学的活动，学生通过绝食和罢课进行抗议。1966年，早稻田大学爆发了学生反对学费上涨而占领主教学楼的斗争。1968年，日本大学被查出挪用20亿日元公款，以此为契机，学生对大学独裁管理的不满情绪爆发。同是1968年，东京大学医学部学生自治会为反对相当于无偿劳动的注册医师制度，举行了无限期的罢课。

1968年，当时中坚派全学联的委员长秋山胜行和宣传部部长青木忠合著的《全学联在考虑什么？》中写道："我们都是满怀希望进入大学"，"然而，就算拥有新的希望，大学给予这些睁眼看世界的年青人的都是无聊粗糙的东西"，"现代社会中充满活力的'问题意识'从这些教室和教授身上是完全感觉不到的"，"超过人员限额把学生塞进学校，大学教育批量化倾向日益明显。学生们一旦进入大学，面对的就是与高中性质截然不同的生活，成为和高中生完全不一样的角色。生活在钢筋混凝土的现代建筑中，学生们的棱角渐被磨平。然而对于大学管理者而言，

值得惦记的恐怕就只剩下收学费这件事了”。

而且“学生的急剧增加使学生地位发生了显著变化，即便大学毕业了，也并不意味着就能去大公司上班”，“这是因为学生本身的社会地位发生了变化，从之前的社会特殊精英分子逐渐被看作普通大众的一员”。“如前所述，大学生社会地位的变化、精英意识与精英行为的彻底沦丧、作为个人希望返璞归真的诉求不断被大众所接受的现实，成为学生运动爆发的社会基础。”“在这种背景下学生的不满与不安不断累积，不管以什么为契机爆发的校园斗争都会发展成为全校性的斗争。”[62]

1968年，在日本大学和东京大学发生了学生占领学校的运动，联合全体学生成立了“全学共斗会议”，简称“全共斗”。1965年反日韩会谈斗争以来，学生运动虽一时停滞，但在1967—1968年以后又开始盛行。“全共斗”的大学占领行为爆发不久，就波及了全国各地的大学，这些运动被统称为“全共斗运动”。

这次全共斗运动在开展的过程中大多借用“革命”、“异化”等马克思主义词语。但在一种背景下，学生大众化与落后的大学管理体系毫不相称，如秋山所说，“精英意识与精英行为的彻底沦丧”，都只是在逐渐大众化的校园和社会中“作为个人希望返璞归真的诉求”。如果没有这个背景，全共斗运动大概也就是在一部分社会活动家范围内展开，不会像这样有那么大的波及范围。

1996年，当时的一名学生回忆道：

> 经过了这样一个时代之后，和很多朋友聊天，几乎所有人都不能正确理解马列主义，虽然有些震撼……但是驱使我们采取行动的绝不是这些意识形态或思想理论。道理是有的，但是不如说，对于战后出生的我们这一代而言，存续的陈旧体系与常识的脱节带给我们的焦虑更为明显。例如，认为进入一流大学就拿到了人生的绿卡，女生没必要拥有像男生那样的学习能力；或是觉得有的大学就算不努力学习也能毕业，与此相比自己的复

习备考都是浪费精力；认为只有天皇和军部才是最坏的战争观；成年人对亚洲人的歧视；现实社会的等级制度；等等。特别是针对这些价值观念，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了违和感。然而，全盘接受这些违和感的便是全共斗。历史终结了古代那些陈腐的价值观，寻求新的价值。心怀炙热的梦想，手握改革的钥匙。

“那么，从现在起将开始面向新时代的历史盛典了！”这是前辈组织干部们和大众传媒报道以及校门口分发传单上的内容。因为心怀尝试创造历史、开拓未来的意识，不管事态有多严重，我们内心都十分兴奋，能够做到不对一切权威和权力摧眉折腰。“东大解体”和东大门柱上写着的“造反有理”更增添了我们的信心。[63]

这样，全共斗运动比千篇一律的讲义要有魅力得多，让许多学生心驰神往。当时的一名活动家回忆道：“在制作宣传牌、油印传单的过程中享受着表现自我的快乐。大学的讲义无聊至极，老师几十年用同样的教案，照本宣科，我攻读的……教室里的保守氛围令人窒息。”与教授针锋相对甚至把讲义变成了讨论会，占领大学在其内部通宵达旦地讨论，创立了只有学生的“解放区”，等等，这类事情确实可以称得上是“相当快乐”。[64]

特别是在东京大学，不管是入学考试的激烈程度，还是社会意义，都被认为是最高权威，但正因如此，对待这种权威的反抗意识才会更加明显。在依旧保守的大学体系内，生存在教授权威之下的助手中，也有人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其中有个人后来回忆道：“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有人煽动说‘大家闹起来吧！’没有比这更有意思的了。东大权威的动摇给人带来了快感，没有这种快感，学生运动就无法持续下去。”[65]

这样的全共斗运动是非常激进且富有精神性的运动。东大全共斗的活动家们，把东京大学定位成为作为帝国主义国家的日本培养人才的机构，他们主张“大学解体”。共产党系统的民主青年同盟（简称“民青”）要求大学管理的民主化和教学设备的改进，但全共斗与民青对立，学生们的支持也大部分集中在全共斗上。

他们不支持民青的理由之一是：民青把共产党领导层的意向作为优先考虑，而这种倾向与新一代的新气象格格不入。当时的一个活动家这样评价民青：“我最讨厌的氛围就是‘比起每个人的主观行动，组织的集体想法应该被置于优先地位’。”[66]

另一方面，当时东大的民青活动家回忆道：“民青失败的理由就在于它太过于稳健。”也就是说，“当时正值第二次经济高速增长期，日本渐渐趋向社会管理化。毕业后就当官，理所当然就是甲方了，这样真的好吗？对此心怀疑问。这是因为全共斗在运动开展过程中将‘东大是统治阶级的爪牙’来进行操作的。这样就能很好地表现出学生的心情了”。[67]

参加过全共斗运动的那一代人，根本没有体验过战争和饥饿。当时新左翼的一位活动家说：“我去游行示威，却什么苦头也没吃，也不清楚世道，根本没起什么作用，自己都觉得很羞愧，真心觉得无论如何也要干点什么像样的事情，尽快去感应时代的气息，融进时髦的‘非日常’的憧憬中去。”[68]

当时参加全共斗学生的笔记上记述了很多像对“增进”、“日常”、“秩序”等的“反叛”，“自我否定”、“日常的否定”、“宁为人类自由而战斗，不为权宜和平而求全！”之类的东西。东大全共斗的某个学生在面对“全共斗到底想打造一所怎样的大学？”的问题时，回答道：“我们所追求的就是斗争本身。”[69]

全共斗的学生讨厌“民主主义”、“和平”、“近代市民社会”、“近代合理主义”、“协商”这类词。[70] 对他们来说，这些表述是支撑传统社会的逻辑，也是压制“革命”的“改良主义”。与此同时，这些词也是他们一直敌对的民青和大学老师们——当然与共产党有相同理念的大学教师毕竟是少数——所使用的词。

学生的要求常常十分抽象，大体来说教授们并不明白学生通过开展运动到底想追求什么。再加上大学运营体制十分僵化，大学的应对往往比较拙劣。也有大学利用右翼学生进行镇压的事例，以东大为首的很多日本大学在难以应对时，经常借助警察和机动队的力量。

像这样拙劣的应对，在多数场合最终只会激化学生们的愤怒。在东大，教授会[71] 对罢课的医学部学生采取了不恰当的处分。因为害怕影响教授会的权威而没有撤销这一处分，再加上自1968年6月把别动队引进学校，事态日渐恶化，发展到整个大学都被学生占据了。

当时在东大与学生谈话的老教授说，“我切身体会到”学生们“希望通过‘相遇’的方式来学习”。早稻田大学的一名活动家说道，因为大学适当终止了与学生的集体谈判，“他们没有体会到我们真正的心情，所以发展到占领大学总部的地步”。即使是东大，在1968年6月在校园内部署警察机动队之后，和学生会面的校长大河内一男的态度，在学生看来“就像是国会答辩一样含糊其词”，因此学生运动愈演愈烈。相反保守派教授林健太郎却与学生直接接触，发自内心地与学生进行辩论，因此赢得了来自学生“虽然是敌人却值得敬佩”的好评。[72]

支持全共斗的东大助手回忆当时教授与学生进行集体谈判的情形时说道：“‘我也有妻儿’、‘也要花钱’，用这样的话来岔开话题。谈到‘教授’时，提到‘教授’（在明治时期）就是士族，带有武士的印象，然而这种说辞显得苍白无力。”[73] 据说参加全共斗的学生，有很多都喜欢高仓健主演的黑社会电影和三岛由纪夫的小说。

当时的大学生、后来成为提倡批判“战后民主主义”的保守言论家佐伯启思回忆道：“我当时对全共斗的事情比较有共鸣之一的是战后民主主义的欺瞒、民主主义、经济高速增长、对被评价为有利的体制性的东西、不明正体的愤怒，我觉得这样的事都是假的。我深刻地感受到，让那样的事崩溃的是一种暴力运动，只是武斗而已。”佐伯所推崇的是作

为理想人类形象的“武士道精神”，他说道：“那和战后民主主义完全不同，把它表现得最好的是高仓健。”[74]

但全共斗运动就如1960年的安保斗争一样，没能得到广泛的支持。不要说教授，就连一般的年长者，都很难理解这次运动。即使是同一代人，全共斗运动也只是大学特有的现象。当时，往返于各美术院校的一名学生回忆道：

> 专门为了向从大学来的学生说教、谈了“粉碎校园”等各种各样的事情……有的学校认真接受干了起来。在理事会上，突然宣布被学生占据的校舍卖给了房地产商。那学生的行为就成了非法占领。暴力团和警察就毫无顾忌地介入进来。各校的学生也不能和校方发生冲突。大学生设置路障是因为想要能够一直待在那里。[75]

在全共斗运动中作为“战后民主主义”的代表受到批判的是丸山真男。丸山早在1964年把在年青一代中抬头的批判“民主主义”的行为形容是“潜藏于‘反抗’深处的‘稚嫩’”，“看到这些学生我联想到电车里号啕大哭而让父母为难的孩子”。即使面对全共斗的学生，丸山也说道：“我让你们这些人放任自流，在我看来这不是为你们好。我会三思自己的想法，因此也请你们重新考虑。”1968年12月，有报道指出，丸山在自己的研究室被全共斗占领之后说道，“我不是憎恨你们，而是瞧不起你们”，“这既不是军国主义，也不是纳粹主义，只是暴行而已”。[76]

学生们对丸山的态度十分反感，他们回应道：“就是为了把像你这样的教授赶出去才封锁的”，然后作为反击占领了他的研究室。吉本隆明认为学生完全是在“战后民主主义”下成长起来的，批判丸山“学生们的行动，如果像丸山所说的那样既不是纳粹主义，也不是军国主义而仅仅是‘暴行’，那么丸山所评价的战后民主主义，就应该比纳粹主义和军国主义社会更为恶劣”。[77] 之后，丸山身心俱疲，罹患肝疾，1969年之后其在大学的课程也一直休讲，1971年在离退休年龄还有四年时从东大退休。

与此相对，全共斗运动中广为人知的口号是“谋求团结，不畏孤立”。丸山和大塚也把兼具脱离旧秩序的自立与新的团结称为“国民主义”和“近代人的类型”。在那个意义上，全共斗运动和丸山，在表现形式上互相对立的背后，实际上拥有类似的取向。

全共斗运动中对大学教授的批判主要有：“应被唾弃的权威主义、泥塑般的不负责任、缺乏伦理性”，以及“自我地位的绝对化、一味自我肯定、无责任性、非主体性”。[78] 这些措辞与丸山等战后知识分子批判战时当权者如出一辙。可以说全共斗运动中的年轻人是在丸山为首的“战后民主主义”所构筑的言论中成长起来的，然后通过这些措辞来反抗丸山和“战后民主主义”。

在这一背景下，对很多年长的战后知识分子来说，新左翼与全共斗运动的主张并不新鲜。松田道雄评论全共斗时说道：“他们所唱的新曲，都是19世纪的滥调。托洛茨基的编曲实际上是马蒙托夫原创，认为由斯大林原创的歌曲，实际上不过是列宁旧作的翻唱而已。”日高六郎批判新左翼称：“我现在回想起来，冒险主义在过去就已经是现有组织的陈旧方针了。批判现有组织的家伙们，为何没有意识到那一点呢？”神田文人指出，“国民性历史学运动与全共斗运动在初衷上有着共通的思想结构”。[79]

共产党曾开展非法武装斗争，国民性历史学运动的学生曾开展对“学术至上主义”的批判，对于熟悉这段历史的人来说，新左翼与全共斗的主张“了无新意”。对“近代主义”和“启蒙主义”的批判，对民俗学与“大众”的再评价，或者是把《日本国宪法》与和平运动批判为“小资产阶级”产物等，这些都是1950年代前半期共产党倡导过的主张。

但在1968年，时年20岁左右的学生们对1955年之前的社会运动一无所知。他们所知道的仅仅是，1955年之后温和化了的共产党，惰性化了的护宪和平“国民运动”，或者在教室里大谈“和平与民主主义”的“像猴

子一样”的教师。

此外，老一辈知识分子也不想把自己在1950年代参与运动失败的历史告知年青一代。失败的教训并没有被年青一代耳闻，而是深藏在当事人的心中。在国民性历史学运动中经历了挫折的历史学家铃木正在1960年的安保斗争之后说道：“10年前我们就想破‘墙’而出，但撞得头破血流。我的学生们现在又想破‘墙’而出。作为我们老师的前辈们以及我们这一代并未给年轻人提供有效的经验教训，而是一代又一代人不断上演着‘青春残酷故事’。为了不让悲伤延续、不让愚钝重演，我们现在不得不打破沉默了。”[80] 但这种状况，到了1968年也没有发生任何改变。

然而，1950年代前半期的运动与1960年代后半期的运动之间，存在迥然不同之处，那就是新左翼与全共斗运动都已经把日本视为现代化发达帝国主义国家的一员，对“民族主义”心存反感。这反映了195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所带来的区域与阶级差别的缩小，试图通过“民族”一词来消除差别的心理，在此时不被理解。

原本在战争刚刚结束、混乱与复兴并存的年代，日本作为亚洲发展中国家，每个人都认为为了重建国家可以参与进来。无论是丸山用“国民主义”一词来诠释政治参与，还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称赞“民族”，“民族”和“国家”都被看作面向未来可以被创造的。

然而，对于在经济高速增长、社会稳定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日本已经是管理社会化的发达帝国主义国家，“国家”与“民族”是压抑他们授受给予的体制。丸山所说的政治参与等渐渐变成了只被管理社会的精英们振臂高呼的口号了。

全共斗运动在批判民族主义的同时，也强调“十五年战争”[81] 的“加害”。虽然这是他们的“日本已经是发达帝国主义国家”意识的表现，但也与对教授等老一辈的反抗交织在一起。

在全共斗运动中，教授们的“受害者意识”屡屡成为学生的批判对象。在学生看来，研究室被占领的教授批判全共斗运动正是他们心存“受害者意识”的反映。因此，学生们强调“帝国大学”是日本帝国主义培育人才的机构，教授们因此也是侵略亚洲的“加害者”。当时东大全共斗编纂的《用火焰描绘的变革逻辑》中有如下内容：

> ……丸山真男老师、法学部教授会以及东大全体教师，即便处于“军国主义”的空气中，也只是一味地埋头于研究室里而两耳不闻天下事。认为自己是守护“学术自由”，但客观上是给“日本帝国主义”帮忙，这种行为正是导致无数人在战争中死去的“加害者”行为。而他们却并没有加害者意识。因此，他们不仅没有意识到自己作为战争参与者的责任，反倒认为自己是“被军部法西斯主义者攻击”的受害者。
>
> 我们实施的封锁，是对东大90年来“学术自由”所起的客观作用的告发。然而，东大的教师们却把自己视为“暴力学生”的受害者，企图使自身历史正当化。[82]

从这一逻辑出发，东大全共斗的学生主张“待在东京大学就是一种罪过”，“是延续资本主义的推手”，他们提倡“大学解体”和“自我否定”。被逮捕的学生在狱中写下的书信中批判“这个时代所讴歌的繁荣都沾有越战的鲜血”，并列举了占领殖民地时期的历史，很多人都主张“全面否定近代日本（战前日本帝国主义、战后日本帝国主义、文化、人们自身）”。[83]

这样，各地大学就不仅仅是提倡“大学解体”了。1969年东京大学的入学考试也受到了影响，因学生占领校园而被迫中止了考试，受此刺激，学生们屡次高呼“粉碎入学考试”。然而与此相反，在毕业的同时放弃学生运动、进入企业或政府机关就职的人也不在少数。小田实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道：

> ……那个时候，即使在我所在的大学里面，学生运动参与者中也有人中途放弃了“粉碎入学考试的战斗”。我对他们说道：“如果你们也能同时进

> 行粉碎求职活动的斗争，那我就认同你们的战斗。”这样他们全都哑口无言了。但是并不见得他们就能够理解我的意思。一边对后来加入的人叫嚣着不要进入这种“帝国主义大学”，没有就读的必要，一边自己却又进入了“帝国主义企业”。这样的现象与其说从逻辑上看起来有点怪，还不如说首先在伦理上就行不通。[84]

即使对“近代日本”和“自身”进行“全面否定”，也不是很容易就能做到的。全共斗虽然打着这些难以实现的目标，但1969年1月占据东大安田讲堂的学生被机动队驱散，学生运动开始渐渐衰退。在全国范围内的大学生全共斗运动，即使从1968年开始盛极一时，它的全盛期也只持续了一年左右，到了1970年就衰退了。在运动中赌上自己的未来、探索自己生存之道的学生虽然不少，但绝不是大多数。

当时采访东大全共斗的报社记者内藤国夫几年后这样回忆道：

> 从（1968年）暑假到11月的这段时间学生还是很开朗的，看着学生将心底的想法说出来，一起开心地讨论，就会觉得，原来这就是大学生活啊，真的是一段非常美好的时光。然而到了冬天就开始苦思冥想“自己该怎么办”、“一生都要这样白白浪费掉吗”，转眼间崩溃的学生有很多。1968年12月到第二年5、6月，战斗的紧张感也松弛下来了，映入眼帘的是暴力、对立、憎恶等种种负面情绪，这是一个让人难过的时期。[85]

这次运动衰退期中出现的事物，和1950年代前期有些类似，例如新左翼各个党派之间的抗争和诘问，甚至包括私刑。据当时一名参与活动的人士回忆：“在运动的高潮期，并不追求同志伙伴价值观的一致性，十个人中如果有一个人赞成的就作为伙伴，与以诚挚的协作为纽带而团结在一起的群体相反，只是寻求细微的不同，并开始主张自己的正统性、排斥他人。”[86]

1972年2月，联合赤军[87]制造了浅间山庄事件，一部分新左派主张以联合赤军的名义进行武装斗争，批判同伴的“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态度”，且对其滥用私刑，最后发展成为与警察的枪击战，这一事件被警

方大肆宣传，新左派的形象一度恶化。相继发生的党派斗争雪上加霜，这之后的新左翼运动也陷入了困难地步，只能在一部分社会活动家内部开展，很难进一步扩大范围。

全共斗作为一场大规模的运动，就这样在几年之间销声匿迹了。然而这场运动遗留的一个影响就是降低了“进步知识分子”及教育长期以来的影响力。据1980年代在东京大学出版社担任专务理事的石井和夫所述，“在这之前对学生来说必读的‘定版’书，到了全共斗运动之后就没有再版过”。[88]

同时，全共斗运动也给大学生带来了变化。当时的东大学生桥本治，在看到因1969年入学考试中止而后来入学的低年级学生后回忆道：“觉得东大完全变了一个样啊，像个小鬼。”[89] 之后的大学生，以大众化大学及以批量教育为前提，渐渐缩小了全共斗时期在意识上所产生的差距。

在全共斗运动的背景下，以往大学的印象与大众化大学之间出现了差别。从学生的意识层面来看，正如秋山胜行等人所说的“精英意识与精英行为的彻底沦丧”。全共斗运动之后，大学生不仅在人数上大众化，在知识与意识层面也大众化了，已不是名副其实的社会精英了。同时，由于全共斗运动所带来的冲击，知识分子的特权不复存在。

从这层意思来看，旧制大学以及知识分子的地位，与日渐大众化的社会之间出现了鸿沟，换言之就是“精英意识与精英行为的彻底沦丧”的问题，而全共斗运动就是因为这个问题而爆发的一场运动。然而讽刺的是，这场运动沿着他们期待的相反方向发展，反而消除了这个鸿沟。

反越战与“加害”

与全共斗运动同时的是1960年代后半期反越战运动的兴起。对此起

到很大作用的越平联将在第十六章进行论述，在此首先介绍该组织的背景。

越战是以1964年8月美军对北越进行轰炸（即所谓的“北爆”）为开端，在1965年急剧恶化。日本舆论对此次战争进行了一如既往的批判。在1965年8月24日《朝日新闻》的舆论调查中，赞成“北爆”的占4%，反对的占75%。

产生这一数字的背景是，体验过战争的一代仍占社会的多数。反映置身于美国空袭下的越南民族的电视报道刺激着战争体验者们的记忆。作家小松左京在1966年10月写道：

> 在这个拥有相同的面孔，同样种植稻米的小小的国度里……轰炸机投下了炸弹、燃烧弹、毒气弹和枯叶剂……那时，那种记忆在我脑海里渐渐苏醒过来，如波涛般汹涌澎湃。大雨般的火团从天而降，火焰点燃了房子，炙烤着我的肌肤，孩子身上嵌满了铁片，农民付出辛劳的贫瘠田地里落满了枯叶，人们在硝烟中急速逃窜。此刻我才感到自身的存在，父母的存在，爱人的存在。在炽热的稻田中逃窜的还有我的双亲、我的祖父母。我这并不是夸大其词，自轰炸北越以来，十年来未出现的空袭噩梦再度袭来，记忆依然清晰可触……甚至在我从梦中惊醒后，也仿佛看到我的妻子就是被活活烧死，面目全非。
>
> 发生在越南的那场深重灾难唤醒了我沉睡了二十一年的回忆……总之，对于战争的回忆从我身体每一个角落迸发出来，让我更加无条件地坚信战争的非正义性。[90]

即使是没有经历过空袭的乡下人，出于同为亚洲稻作国家的共同情感，也放大了对越战的批判之情。1967年《朝日新闻》记者本多胜一创作并连载了报告文学《战场的村庄》，其中一节描绘了美军在越南行军的情景：

> 金色的稻田里，五辆APC坦克快速突击。那些黄澄澄、沉甸甸的等待收割的稻穗在阡陌交错的十条坦克道里被蹂躏、碾压。后面的坦克没有沿

着前面坦克碾压过的道路前进，对这些稻子毫不在意。不管是秧田还是刚刚插过秧的稻田，他们都视若无物。就像驾乘越野车兜风一样，在稻田里随意刻下了新的车辙。在美军士兵的心中，并没有对稻作民族的感同身受。[91]

《战场的村庄》在描写美军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的同时，还诉说了对越南人的共鸣。本多在确认自己与越南农民同一肤色之后，说道："我们都是亚洲人。"[92]

本多还采访了同样发生在越南的美军战争。在战线附近，"美军士兵隔着铁丝网把孩子聚集起来，然后把罐头、零食故意丢向远方，让孩子们像狗一样去争夺，并以此为乐"。这样的景象，让他重新想起"日本战败后都市贫苦儿童的生活"。[93] 对出生于1931年的他而言，就好像从这些儿童身上看到了自己。与美国狼狈为奸的越南政府有多么腐败，越南民众有多么反感，本多都做了详尽的报道。

被本多作为参照物进行描写的则是南越解放战线的士兵。本多在与南越青年军官见面之后给他们拍照时，为了顾及他们的安全而没有拍下全身。这些青年军官却对本多说："为了民族的独立我们甘愿牺牲自己的生命，既然不打算在傀儡政权苟且偷生，还怕你们拍我的脸吗？"在美军空袭下进行抗战的解放区干部说道："我们也许在军事上会战败，但实际上这并不是失败。战败并非失败。什么才是真正的胜利呢？"[94]

一边忍受美国的空袭，一边抵御美国的物质诱惑，为"民族的独立"而斗争的越南解放阵线的这种姿态，很容易博得日本众多读者的共鸣。在武器精良、力量强大的美军攻击下，武器落后、粮草匮乏但英勇善战的越南民众打动了很多战争经历者的心。据说连载本多报道的朝日新闻社收到了很多读者来信，表达了他们心中的共鸣。

但是，这次战争不得不重新拷问日本这个国家。本多指出，在这次战争中美军投入了日本制造的军车和登陆艇，日本商人运送的燃料在轰

炸北越时发挥了作用。被派遣到越南的韩国军官评论道：“在这次战争中，日本到底赚了多少钱啊。”在本多看来，不得不把日本形容为“靠死人赚钱的商人”。[95]

美军的“越南特需”[96] 占日本出口总额的一到两成，虽然这比朝鲜战争时期占出口总额的六成要小，但在客观上支撑了日本经济的成长。其中不仅有枪支弹药，也包含了枯叶剂等。不仅横须贺和冲绳成为美军舰队的基地，1967年羽田机场起降飞机中四成是美国的，在越南战场上负伤的美军士兵中有75%送回日本接受治疗。[97] 日本成为美国不可或缺的战争后方基地。

正是因为有这一背景，在1965年8月24日《朝日新闻》的舆论调查中，选择“担心日本受到连累”的占54%，选择“不担心”的占17%。1966年6月1日，当时日本外相椎名悦三郎在众议院外务委员会上，声明因为地理上的因素日本不会受到越南的报复打击，但为防患于未然，自卫队进入战备状态，1966年9月向南越派遣了军事观察团。在政府的斡旋下，从日本运输军用物资到越南的美军舰艇开始搭载日本要员，到1967年10月为止有9人牺牲[98] 。

本多在采访时询问越南解放区的干部：从日本得到什么样的支援比较好？得到的回答的是：“谢谢你的好意，但我们没关系的。我们有战斗到底的决心，请不要担心。比起这个，日本由于自己的问题，为了自己的利益与美国的过分做法进行抗争，这对越南而言就是最好的了。”听到这个回答本多写道：

> 越南曾是中国的属国，后来沦为法国的殖民地，又被日本占领过，现在又在跟美国作战，因此每一位越南民众都深知越南绝对不会相信其他国家……与此相反，日本是这种认识最为淡薄的国家之一。理所当然，持这种观点的越南人对一个支持美国的体制下的“友好人士”自然是不能完全相信的。他们所信任的是为自己而战的民族，像阿尔巴尼亚和古巴那样的国家。越南人之所以相信日本的反战运动，是基于日本作为一个民族所应该

> 解决的问题，比如“冲绳”、“安保”、“北方领土”等。反对越战运动的本身毋庸置疑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只要不把其当作为了解决“自己的问题”来理解，就可以看作一张免罪金牌。在反对美国轰炸北越的运动面前，日本政府支持轰炸北越的态度一定会成为一个问题。[99]

但与此同时，以越战为契机，对日本的重新认识并没有停留于此。能够让人回想起战争的并不仅仅是遭受空袭的越南民众以及解放战线的画面，美军士兵焚烧越南村落、屠杀强奸越南人民，同样唤起了日本人21年前的记忆。

1966年6月，在“越平联”（争取越南和平市民联合会）的号召下，日美联合反越战集会在东京举行。被邀请到东京的美国和平运动家霍华德·津恩，对日本人为何对远离自己本土的越南战争如此关心提出了疑问，归国之前他给出的答案是，这是“日本人民对他们近代史深刻认识的结果”。和津恩见过面的日本人诉说他们曾经成天遭受空袭的恐怖，对津恩说“你们目前在亚洲做的就是当年对日本做的”，为此强烈谴责美国。[100]

在这之前的1965年11月16日，越平联在美国的《纽约时报》上登载反战广告。标题是《败者存智慧》，叙述了“在与中国长达15年的战争中，日本获得了严厉的教训”等内容。津恩也对这一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与“从未战败过”的美国比起来，“日本人不管作为加害者还是受害者，都对死怀有强烈的联想”。[101]

即使在津恩参加的东京反战集会上，越平联的领导者小田实诉说“自己在空袭烟雾中来回躲避”的受害经历后，还举出日本政府表明支持越战的态度，强调“自己作为加害者”的立场：

> ……对日本人而言，这场战争并非事不关己。……我们的立场就是支持美国……或许日本政府认为不能对美国强硬。于是相对美国来说，日本就站在受害者的立场上。但与此同时，相对越南来说，又站在了加害者的

立场上。[102]

越战对有过战争体验的人来说，宛若以前的自己在屠杀过去的另一个自己。通过追随制造出这种状况的美国，日本想要实现和美国同样的经济繁荣。这对多数人来说是难以抵抗的自画像。

受到越战的刺激，井伏鳟二《黑雨》、大冈升平《莱特战记》等反战小说在1960年代后半期相继出现。对于日本这种历史意识，津恩说道："他们同时被置于鱼和渔民的位置上，我们美国人虽然挂住了鱼钩，从未输过。……但我们从来没有像日本人那样承认自身的行为，低下头来认罪，并承诺过和平生活。"[103]

但是津恩这样的评价不免有些夸大，即使是什么都好的日本，战争的记忆也在逐渐淡化，对于战争的回忆也在被美化。为了对抗这种美化战争的行为，反越战运动中所做的就是强调"十五年战争"的"加害"行为。

在强调加害责任的背景下，除了反对美化战争外，另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应对不了解战争的年青一代。体验过战争的人以越战为例向年轻人反复叙述自己当年由战争所给予的被害经历，但是比起这个，向没有战争经历的年轻人强调现在日本对越南的加害行为更为有效。

在1966年的谈话中，小田实说道："被害者经历会随着这种战争体验的淡化而逐渐消逝"，"我告诉学生岸信介是战犯，他们会说，'啊，岸是战犯吗？'我们真的很吃惊"，"和过去的岸比起来，我是被害者，我一见到他就反胃，现在说这些话学生们是不会理解的"。[104]

之后小田实主张，要唤起年轻人"因为安保条约我们成了加害者"的意识。会谈的另一方武藤一羊也表示，迄今为止的"和平运动的缺点是没有重视加害者的体验"。[105]

小田实的这种认识是在美国和平运动的刺激下产生的。也就是说，从未有过被害者经历的美国和平运动是通过强调对越南的加害进行的。

如第七章所述，小田1958年在美国留过学。在那里令他惊讶的是，在和平和繁荣中长大的美国年轻人完全缺乏对战争和贫困的认识。日本战败时还只有13岁的小田实即使对他们说空袭时要四处躲避，美国年轻人也会认为这些都是些滑稽的冒险经历而已而一笑了之。[106] 而和他们同龄、在日本长大的小田实却要去直面那些现实。

因此，1966年小田说明"加害者体验"重要性的会谈内容后来形成了题为《在越南的美国人》一书。在这本书中美国的和平运动团体收录了刊登在公报杂志上美军士兵的加害经历。小田在这本书的序言中说道："迄今为止有志于和平的大多数人都是通过传递被害者的惨痛经历而获得大家的支持，与之相反，本书此次展示的是从加害者角度出发的和平意愿。"[107]

成长在和平与繁荣之中、对受害者经历曾哈哈大笑的美国年轻人当中出现这种类型的反战运动，应该有助于日本的年青一代重新认识和理解战争。在会谈前后举行的日美联合反战集会中，如前所述，小田在谈论自己受到空袭经历的同时，强调了自己的"加害者"身份。

在这里小田强调的是，反越战运动是与美国的民权运动联系在一起的，此外，不仅是发生在越南的残酷行为，美国国内种族歧视的"来自白人的加害者经历"，也将成为美国和平运动的助推器。[108] 以本多胜一的《战场的村庄》为代表，以发生在越南的暴虐行为为背景，很多人认为美国的种族歧视发挥了重要影响。

这种认识必然与重新认识日本的歧视紧密相连。以越战为契机，日军在中国的大屠杀，以及歧视朝鲜人、阿伊努族、冲绳的历史开始被人关注。本多胜一继《战场的村庄》之后，在"美利坚合众国"以"美国的

种族歧视”为题进行了采访，并于1971年访问中国，写下了揭露日军大屠杀真相的《中国之旅》。

当时，驻越美军制造了美莱村屠杀事件，它被美国媒体大肆报道，这在日本引来了批评。本多在《中国之旅》的序言中强调，不管是战时还是战后，“日本的报道都没有像那样过”，并说明赴中国采访的动机，是“与其感叹美莱村屠杀事件，不如去亲身实践更好”。[109]

1967年3月，日本基督教团公开发表战争结束前各基督教团体协助战争的报告。鹤见俊辅对此评论道：“战争已经结束22年了，之所以现在公布，是越南战争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正是由于对越战产生不信任感，才有了对太平洋战争责任的公布。”[110]

此外，鹤见俊辅在1968年提出了“国家原罪”的概念。根据这一理论，美国这样的国家在牺牲原住民和黑人之后建国，“恐怕有国家的地方，就存在某种方式的犯罪”。而且，“既然以日本国民的身份生活，就要投入那种原罪”。为了不投入，“必然会以其他的罪恶形式而奋起反击”。鹤见批判道：“在学生兵的信中，虽然表达了对和平的愿望，但即使在和平年代也没看到日本对朝鲜、台湾、中国大陆长期持续的不当统治的自觉与反省”，他认为这“是因为他们缺乏对抗国家原罪的勇气”，抱有“某种精神性的卑怯”。[111]

这样，对战死者的记忆作为迄今为止批判日本当政者的对象，渐渐让位于朝鲜人和阿伊努人等少数群体。这种转变和战争记忆淡化进行的同时，对战死者的悼念也逐渐被保守的大众民族主义接纳。

促进这种转变发生的是越战。所谓越战就是通过美国这面镜子重新唤醒日本的记忆，成为重塑国家自画像的契机。同时这也与全共斗运动强调的“自我否定”和“加害”的潮流合拍。

但是，小田实在1966年强调“加害者体验”时，并没有把“加害”的自我认知和“被害”的战争记忆对立起来。小田把因国家强制命令而参军入伍的士兵视为国家受害者的同时，也视之为加害者，将其定义为正是由于其成为受害者，所以才不得不扮演了加害者的角色。

也就是说，丸山真男所说的“压抑的转移”，和竹内好所提倡的“奴隶与奴隶主都是一样的”，是有相通性的。被国家征召入伍的人正因为是被害者，而成为残忍的加害者。被害和加害是由同一结构中派生出来的现象。

小田最初担心的是，在那之前的对于战争的形容过于强调“被害者”的立场，因此战争体验很有可能在与现实无关的感伤中逐渐淡化。他把那种形式化的战争体验形容成“当下生者无关的追忆”，或是用于对“‘不知道战争’年青一代说教的追忆”。[112]

小田强调“加害”的自觉性是通过强调被害和加害的不可分性体现的，是为了让他们认识到支配现在自己的社会结构。战争体验者大多因自己勇气不足而让年轻人失去生命，或是对自己染指侵略行为成为“加害者”这些过往而心怀悔恨。那种“加害”的记忆如果复苏的话，应该会再次产生强大的冲击力。这种冲击力正是让偏重“被害”意识的感伤情绪日渐淡化的源自战争经历的冲击力。

在这个意义上，对小田来说“加害”的自我认知与“被害”的记忆成了密不可分的关系。然而年青一代未必会接受。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为了批判整日把“被害”挂在嘴边的年长者，一个劲地强调“加害”。

1971年，曾担任越平联事务局局长的吉川勇一说：“一听到年轻人的批判，‘自己也会批判自己’这句话，犹如自己站在在日朝鲜人的立场和被歧视部落民的立场上，就想开始告发、谴责别人。”[113] 小田也意识到这样的倾向，批判道：“如果开口，受害者终于想说出过去痛苦的

体验的话，就会遭到年轻人高声的反唇相讥：‘你忘记了作为加害者的自己。’”[114]

但是部分学生把上一代的“被害”意识与保守派对战争的赞美混为一谈，把他们视为应该打倒的“战死者”权威。1969年5月20日，立命馆大学全共斗的学生追悼战死的学生兵，破坏了建立于1953年的“海神像”，并在其脖子上绕绳，就是其中一例。《朝日新闻》的社论是这样评论的：

> 不少学生经常问罪于大人，不喜欢的话为什么不从战场逃亡？为什么不丢掉枪？你们不这样做，那你们一定都是法西斯——他们的逻辑是在不断跳跃的。关于战争，大人们一直认为可以把其作为发生的事实传给年青一代。但出乎意料的是，结果并非如此。他们意识到这些常识是不可能口口相传下去的。[115]

“那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仅凭这样的概念不能充分理解战争的意义。国家的宿命，权力的可怕，年轻人必须实际感受这些并牢记在心。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不论是考虑国家未来的发展，还是不顾生命的代价去反对战争，都是不可能实现的。此外，能够表达战争实感的只有我们大人。

迄今为止我们难道吝啬过努力吗？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们首先必须向埋骨于战场的战死者谢罪。因为我们的怠慢，不能把战死者舍弃生命留下的教训传给下一代。

然而，这种意见并不能为年青一代所理解。1969年1月，从新几内亚战线生还的士兵奥崎谦三大声喊道：“山崎，快向天皇开枪”，然后向出现在新年庆祝会上的昭和天皇射出钢柱子弹。[116] 全共斗和新左翼的学生把该事件视为反天皇制的直接行动而大加称赞，但他们未必注意到“山崎”是奥崎谦三在新几内亚死去的战友。

在年青一代强调“加害”时，古代史领域也出人意料地受到波及。没有战争体验的年轻人没有具体的“加害”经历，因此在这个过程中为了强调自己的“加害”，出现了一种倾向即强调自己是“日本人”以及“日本”在现在和过去所实施的“加害”。

结果是，不仅在越战和“十五年战争”中的“加害”，甚至连上古时期和中世纪的“日本人”侵略阿依努、冲绳、朝鲜的事实也被作为论据加以论述。如前所述，这一时期产生了批判“近代主义”和对土著共同体的重新评价，而这正是民俗学和古代史所关注的时期。由此也开始产生强调“加害”的论调，这种“加害”即所谓的古代天皇制国家对实现了“原始共产制”的阿伊努和冲绳的侵略。

触发这种倾向的是吉本隆明的《共同幻想论》和“冲绳论”。如前所述，吉本在1968年出版了《共同幻想论》一书，从民俗学和古代神明论述了天皇制和国家的起源。吉本还在1970年讨论冲绳回归问题时，主张古代冲绳和“大和”朝廷是“异族”，提出冲绳的存在，使“本国的弥生式以后的国家的历史性根据”相对化。[117]

这种民族观念的抬头，伴随着经济高速增长以及国内地区差异缩小，与“单一民族”意识并行发展。如前所述，1960年代以后，保守派的主张，即日本自古代以来就是“单一民族国家”的论调越来越成为主流。与此相对的是，从1970年代后半期开始，强调少数民族的存在而批判主张“单一民族国家”的观点日益兴起。但不管怎样，1950年代就已经存在的强调地区差别和阶级差别，认为日本尚未形成“单一民族”的观点消失了。

此外，回溯古代历史，强调“日本人”“加害”的其中一个极端例子则是东亚反日武装战线。[118] 他们批判日本企业在亚洲的业务扩张和军需承包，同时炸毁了三菱重工和三井物产公司建筑，强调在日本古代神话中记载的对虾夷、熊袭、阿伊努、冲绳、朝鲜、中国等的“加害”行径，

批判日本对“原始共同体部族”实施的“日本古代建国以来连绵不断的日本民族、日本帝国的侵略反革命”。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日本人民，因为在殖民东亚的过程中过上了富裕的生活，所以是“帝国主义寄生虫”，“主张否定‘日本’的反日思想，是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在新的阶段革命复辟的思想”。

该东亚反日武装战线在1974年发行的小册子《腹腹时计》中写道：

> 1.从日本帝国主义对朝鲜进行历经36年的侵略和殖民统治开始，日本还侵略统治了台湾、中国大陆、东南亚等地。作为日本“国内”的殖民地，日本对阿依努、冲绳等地进行同化和吸收。我们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子孙，对于帝国主义日本在战败后开始的新殖民主义侵略和统治，我们要采取接纳、默认的态度，同时我们也是让旧日本帝国主义官僚群体和资本家复活的本国帝国主义分子。
>
> 2.日本帝国主义的“繁荣和成长”，来自殖民地人民的滚烫鲜血和遍野横尸，是对殖民地人民的强取豪夺。正因如此，才能保证作为本国帝国主义分子的我们“能够过上和平、安全、富裕的小市民生活”……对殖民地人民而言，日本帝国的劳动者和市民就是与他们每日抗争敌对的帝国主义者和侵略者。

以上是从1960年代到1970年代初，关于民族主义的言论变迁的概述。以下各章将根据具体的事例逐一考察在这一转型期出现的新言论和新观点。

第十四章 “公”的解体

吉本隆明因为其富有战斗性的言论活动，在1960年代受到新左翼和全共斗年轻人的追捧，作为思想家广为人知。本章拟从两个方面论证吉本的思想。[119]

其一是战后知识分子的革新民族主义与吉本的关系。从结论来说，吉本是革新民族主义思想的对立面，并且是瓦解这一思想的思想家。

其二是吉本的战争体验给他的思想带来了巨大影响。吉本在著作中，把战争期间的自己描述为一名狂热的“皇国青年”。迄今为止，关于吉本的论述都是以此为前提展开的。但通过本章的考察，我们会发现他实际上并非如此，战争经历极大地左右了吉本的思想。

对吉本思想的考察，表现出经济高速增长期“民主”和“爱国”关系的变化，是很好的个案研究。同时，这也是表现“战争”和“战死者”的记忆如何反映在战后思想中，并发生变化的一个很好的事例。

“战时派”的心情

论述吉本隆明时，必须把他和“战时派”知识分子联系在一起，因为他本身就属于那样的人。

所谓“战时派”的说法，于1955年前后由日本前陆军青年军官村上兵卫提出并开始广为流传。虽然数年后这个词成为对所有拥有战争体验的各代人的总称，但最初是指战败时年龄在15—25岁、处于青年时期的人。也有把年长（战败时30岁左右）的丸山真男和竹内好的一代称为“战前派”，而把年少（战败时10岁左右）的江藤淳和大江健三郎等一代称为“战后派”的说法。在1955年前后，这个年龄层的知识分子大概30岁，正是开始在言论界活跃的年龄。吉本隆明也是此时在言论界初次亮相。

作为“战时派”知识分子的代表经常被提及的有评论家吉本隆明、作家三岛由纪夫、政治学家桥川文三等。这些人都超越了某一特定的思想倾向，具有某种共通性。

首先，“战时派”知识分子与战前就基本完成人格塑造的丸山那一代不同，他们从懂事那天起就身处战争之中。战败时20岁的人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时年仅6岁。无论是三岛还是吉本，都表示留存在他们记

忆里最初的政治事件是1936年的“二·二六事件”。

其次，这些“战时派”是战时最主要的动员对象，不仅死伤者最多，而且没有机会接受正规的中、高等教育。再次，他们的幼年时期正处于“皇国教育”的顶峰时期，而且因为言论受到压制不可能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因此，这一代人并不具备将自己从小被灌输的“皇国思想”相对化的经验和知识。在战败前，其中的很多人对战争并不持批判态度。读过学生兵的遗稿集《听，海神的声音》、稍微接触过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年长学生兵，对后辈们对战争不抱有批判的态度感到震惊的例子比比皆是。

战败后不久丸山等三十岁左右的战后知识分子开始活跃时，二十岁左右的吉本那一代人感到十分违和。被丸山等“战前派”知识分子视为常识的马克思主义和黑格尔哲学，对于“战时派”来说完全是一个未知的世界。对于一出生就身处战争状态的他们来说，很难想象得到世上居然有对战争持批判思想的人，以及战争以外的任何状态。

据竹内好说，他在战争刚刚结束时曾问大学生们“是否考虑过战争会结束”，大多数人的回答是“否”。对此，竹内说，“我始终认为历史上没有永不结束的战争。虽然我们自身无法预想到结局，但这场战争一定会结束”，并将年青一代描述为处于“教育的恐怖”的状态下。[120]

因为有这样的差别，相对于战败时三十岁出头的丸山真男和荒正人等把战败理解为解放的态度，吉本等被称为“战时派”的很多知识分子对战败不知所措。在1947年的座谈会上，29岁的寺泽恒信在讲述日中开战后与后辈忽然无法沟通的经历时说道：“（我们）在战争结束后感觉松了口气……因为有（思想上的）归宿，我们就能直接回去。在这一点上，我想我们与没有这种归宿的二十岁出头的人是不同的。”[121] 因此，“战时派”知识分子经常说战争是正常的，和平才是不正常的。在1956年的座谈会上，村上兵卫说道：“我是在战争是理所当然的氛围中

成长的。”三岛由纪夫也附和道：“感觉现在才是十分反常的”，“我时常想到‘这不是真的’”。[122] 批判战后思想是“虚构”的吉本也属于这一代人。

与此同时，“战时派”知识分子经常谈到对“战死”的憧憬。曾经的海军青年军官村上一郎在1960年写道：“对我来说，我的人生在八月十五日就终止了，早该死了。这十五年是多余的。”“家庭的团圆、人们无拘无束的工薪生活、岸内阁宣称的‘天下太平’，这些东西都是恐怖的、虚幻的。”[123] 此外，三岛由纪夫撰写美化军人之死的小说也是众所周知。

这种对“战死”的憧憬，是与对决定投降的当政者的憎恶联系在一起的。海军会计学校的学生白鸟邦夫在1945年8月17日的日记中写道：“我们受到了欺骗。”向他们鼓吹对战死的憧憬的军队上层，却在秘密交涉投降事宜，这对白鸟来说无疑是“受到了欺骗”。此外，白鸟还把投降后的复员形容成“下到凡间”。[124]

这种对当政者的憎恶，如第三章所述，是与对以战死者为基础的天皇批判联系在一起的。村上兵卫在1956年写了名为《天皇的战争责任》的学术著作，认为战死的战友被天皇“背叛”了。[125] 三岛由纪夫也通过小说《英灵之声》向在“二·二六事件”中死去士兵的灵魂说道：“天皇又不会成为人。”

这些情感是与对一切权威的怀疑联系在一起的。一名13岁时迎来战败的女性说，因为战败，“神国日本、无敌日本、现人神天皇这一切现有的权威都崩溃了，变成了不可信的东西”。因此，“心中自然形成了对一切权威都感到奇怪的情感”。[126]

这种对权威的反感也包含了对国家的怀疑。但是，对幼年时期就被施予“皇国教育”的“战时派”知识分子来说，很多人无法把“日本”、“日本

人”与天皇分开考虑。1927年出生的森崎和江说：“因为我们是在战争中成长起来的，所以提起日本就会直接想到天皇，不否定天皇就不无法使用日本这个词。在表示没有天皇观念的全体国民时，使用‘日本’这个词的话我的心是紧绷着的。”[127]

这种日本观，与试图构筑从天皇那里被分离出来的“国民”的丸山真男等人，是无法相容的。在这些“战时派”知识分子中，虽然也出现了像三岛由纪夫这样赞美“日本”的人，以及像吉本隆明这样否定“日本”的人，但在“日本”与天皇是不可分割的看法上两者是共通的。而且如下所述，吉本以批判丸山的形式，提倡否定民族主义的思想。

此外，对权威的怀疑也衍生出了另一种反应，即他们被视为不合群的战后社会的权威，是对“进步知识分子”的反动。

1965年鹤见俊辅在《知识分子的战争责任》一书中，介绍了战败时还是一名飞行预科生猪狩正男的文章。“憧憬着光荣战死的猪狩，在战败的同时陷入了虚脱的状态。穿着皱巴巴的军服站立时，被‘残兵败将’这样的声音棒喝。回过头来看到和美国大兵手挽手的日本女人。”此时，猪狩发誓，“下一次，我要驾驶载有原子弹的飞机把充满着伪善者和利己主义者的日本给炸个粉碎”。[128]

猪狩所谓“伪善者”和“利己主义者”是指战时写下赞美战争的文章，却在战后倡导“民主和平主义”的“伪善的知识分子”。他自己调查了战时的言论状态，认为大部分知识分子都对战争没有抵触，一直歌颂战争。

这种对立，实际上从战败后不久就开始了。成为以丸山真男为代表的战后知识分子核心的是在战前掌握了一定的社会科学知识，亲身体验过战争，战败时在三十岁左右的一代人。在这一代人看来，没有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育，只接受“皇国教育”的“战时派”非常没有教养，战败初期甚至有人称其为“空白的一代”。

但是，“战时派”对这样的见解进行了激烈的反击。1947年，吉本也参与其中。曾是“荒地派”诗人的北村太郎曾批判三十多岁的知识分子道：“他们自己在昭和初期一边受到政府的压制，一边又在脑海中不断浮想起学习共产主义的经历，在之后的战争年代有一种怪癖，那就是把当时还是学生的我们和实际上天真无邪的、在思想上还是空白时代的人一并概括为接受过教育的人。”[129]

为了对抗这种观点，当时二十多岁的这代人倡导对“思想”的不信任和对战争体验的成见。在教养、知识量上不及年长一代的他们所能依靠的是一种自负，那就是他们经历了战争中最激烈的部分。北村说道，批判“将年轻诗人说成是‘启蒙’的”的“前辈诗人”，与“无益无用的注释”“思想”相比，倡导更加重视“活过来了”这样一种战争体验。[130]

此外，成为这一代人最强大武器的是追究沉默的年长一代的责任，不管年长一代对战争持批判态度与否，都要谴责他们的懦弱。1947年，荒正人作为当时二十岁左右一代的代表发言，引用了这样一句话：“说什么这是幸存的思想，谁相信啊？”“从这句话中可以感受到沉默着的我对于将我们送向战场的三十岁左右的一代倾吐这句话的冲动。”[131] 鹤见俊辅列举的猪狩正男等调查了知识分子的战时言论，使这种战败初期的对立得以延长。再者如后文所述，吉本隆明在1955年从追究知识分子的战争责任入手，开始在言论界崭露头角。

但多数“战时派”就算追究了年长一代的战争责任，也并没有感觉到自己的战争责任。1956年《中央公论》刊载了在“战时派座谈会”上一位参会者的发言：“那时，因为我们没有起到指导社会的作用，所以战争责任与我们无关。”[132]

从猪狩正男的经历来看，他们“曾被逼入绝境，得以幸存的话是幸运还是不幸呢？从日本（进步的）文化人那里受到了残酷打击，吃了很多苦，成为狼狈不堪的受害者”。村上兵卫也在追究天皇战争责任的文

章中叙述道，开战的决定和战后的处理都是“比我们大很多的成年人……他们和美国大兵一起做的”，“我们没有责任”。[133]

不具有批判战争思想的他们，本来没有抗议战争的勇气，对这种悔恨没有同感。战败时14岁的飞行预科生佐藤忠男在1958年的著作中写道：“‘第一次知道了失败’，又没有必要像部分成年人一样做出知道了的样子。以及‘为什么不能阻止这场战争’，没有必要自责。”[134]

不如说，这一代的知识分子，不管有没有反战思想，只要是沉默的“成人”，其他知识分子就有权来批评他们的“伪善”和追究他们的战争责任。如后所述，吉本隆明在与年长一代争论时，屡屡称他们是“叔父辈”、“上一辈”等，把自己这一代——“战时派”形容是“叛逆的儿子”。这样一来，吉本的姿态就是批判“战后民主主义”的“欺瞒”，这在叫嚣“叛逆”的1960年代的年轻人中得到好评。

此外，心中没有悔恨也意味着他们并未在与共产党相比较时感到自卑。不如说对这一代知识分子而言，共产党在战后宛如突然改变的老师一样，是战后的现有秩序——“和平与民主主义”的象征。在初三时迎来战败的评论家矶田光一在1964年的对谈中说道：“我认为，共产党是公认的最世俗的势力。或者可以说，只要因战败而对学校教师等人怀有不信任感，就必然对讴歌我们这个社会春天的共产党感到违和。”[135]

对于矶田的话，年长一代的平野谦回应道：“我们之中一直有一种亲共情结。”“越是现实地认清了世俗教师的嘴脸，从而对他们怀有不信任感，就越会对那些在惨烈的战争期间入狱十八年却还保有节操，战后立刻站出来组织起政党的人产生信任。”如后所述，吉本能如此大胆地批判共产党及其把牢底坐穿的干部，离开这一时代背景就无从谈起。

此外，在“战时派”知识分子中，也有人认为作为战时动员最大对象的自己才是与民众一直在相互接触的。村上兵卫在1956年说道：“大多

数战时派应该是在军队组织中，或在紧迫的战时生活中，一直与农民、工人以及其他大众直接接触、生活的”，主张“即使感受到这种真正的大众，战时派与战前派、战后派的思维方式也是不同的”。[136]

因此，他们屡屡提及“大众的生活实感”，采取一种抨击“知识分子理念”的姿态。为了在知识上与年长的优秀知识分子颉颃，这种论调也派生出重视战争体验的说法，而这种论调原本是保守思想家小林秀雄和福田恒存一直主张的。此外，和这些保守知识分子一样，“战时派”知识分子也有一种倾向，那就是把战后的左派思想和战时的军队理念相提并论。

例如，原学生兵梅原猛批判倡导“文化国家”论的京都学派时说道：“曾经被人力证战争的正确性，否定厌烦战争的实感，踏入军营，但现在又以同一理论，论证了民主主义和文化国家，那究竟是什么意思？”[137] 此外，无论是解放“大东亚”，还是开展民主主义或革命，梅原把为了崇高的理想而死不足惜这种说法定义为虚构的，主张“漠视小市民幸福感的思想是错误的”。

梅原写这篇文章时，正值临近经济高速增长期的1959年。并且，他在书中所说的“小市民的幸福感”，作为佐证列举的事例是脱离战后混乱和生活之苦后，他自己在大学获得了教职，首次拿到奖金后与家人一起吃天妇罗的故事。他说道：“天妇罗就足够让我体验到幸福感，民众不也是一样吗？”批判了鼓吹献身战争和革命的“死亡哲学”。

虽说如此，从“大众的生活实感”中抨击这种“理念”的逻辑也折射出“战时派”知识分子内部的分裂。如前所述，他们追寻崇高的理念，憧憬能战死沙场，批判“天下太平”的战后社会。梅原也在上述文章中写道：“在战争中成长的我，一方面讨厌战争，另一方面憧憬战争，已经无法客观地评价和平民众的喜悦。”他因此进行自我批判，赞美“天妇罗”。

当然，这种内部分裂无疑是从一直被灌输“为理念而殉死”的他们那个年代的体验中派生出来的。而且，从这种“战时派”知识分子中，还产生了以三岛由纪夫为代表的美化为天皇和国家而殉死、批判“天下太平”的战后社会的潮流，以及以吉本隆明为代表的高举“大众的生活”旗帜、抨击天皇制国家和共产党理念的潮流。

在以吉本为代表的后一种潮流之中，屡屡强调天皇制国家和共产党的同一性。他们认为，无论如何，二者都是利用理念来否定“大众的生活”、动员“大众”参与战争或革命的权威。另外，通过揭露战前的马克思主义者转变思想、协助战争的事实，也能证明两者具有同一性。

与此同时，如同“由特攻队到共产党”这句话所象征的那样，被天皇制国家和共产党双方所迷惑的也是“战时派”青年。但是，这些青年也容易在共产党活动中追求过剩的崇高感。原是少年飞行兵、后加入共产党的高田佳利在1959年说道：

> 我对人的信任是从飞行兵时代起被培养出来的。把自己的性命托付给飞机的时候就是被飞行兵和地勤兵以及航空队全队人员之间深厚的人类的信任感这根纽带维系起来的时候。因为如果没有这根纽带，飞机是上不了天的。这种纯净，用“纯洁无瑕”这个词来形容再合适不过了。我不能想象，在负责战后革命运动一部分而采取行动时，还会有人在革命运动中设法出人头地、陷害他人，并显得平心静气。在知道这种人的存在之后，我感到很愕然。于是我想，这样说来，还有抛下自己的部下逃跑的特攻队司令官啊。名为右翼与左翼指挥官的家伙，如果有共通的心理的话，也只是强烈的憎恨。我也从浑浑噩噩中醒悟过来了。[138]

这样加入共产党的大多数青年，后来都因对50年代前半期的党内斗争和六全协后方针的转变感到失望而退党。而剩下的那些和战争指导者一样，有一种被共产党的指导者“背叛了”、“欺骗了”的心情。这种心情也成为吉本揭露共产党系知识分子协助战争的言论活动得到支持的基础。

本来，这种“纯粹”的取向与挫折，作为青少年的心理活动来说是很常见的。可以说“战时派”知识分子的特征是，因为是在二十多岁时遭遇了战败，这种常常发生在青春期的感情形成就这样与为战争和国家效力的思想形成联系在一起。

在这种情况下，吉本隆明的思想是对年长一代或权威的反抗，有着二十多岁年轻人的特征。与之相对，在三十多岁被征兵服役的丸山真男的思想，是以平衡感与责任意识为特征的。这不仅是两人性格上的不同，也与他们什么时候迎来形成思想原点的战争体验有关。

然而，上述“战时派”知识分子的特征是那一代人所共有的吗？对此尚有疑问。说起来即使是同一代人之间，比普通人理念取向强烈很多的人更容易成为思想家或文学家，这自不待言。不仅如此，上述“战时派”知识分子即使在同一代人之间也有独特的共同点。这是因为在他们之中，拥有前线战斗经验的人很少。

说起“战时派”知识分子，佐田忠男作为少年飞行兵，白鸟邦夫作为海军会计学校学生，都是作为军校生在日本国内迎来了战败。村上兵卫、村上一郎、梅原猛等虽然是青年军官或学生兵，却没有身处前线的经历，也是在日本国内迎来了战败。

而被视为“战时派”知识分子代表的三岛由纪夫和吉本隆明，虽然都是在太平洋战争期间度过了20岁生日，但是都没有当兵的经历。就三岛而言，如果其自传作品《假面的告白》中的内容是事实的话，也是装病拿到了肺结核的诊断书，逃过了兵役。而如后所述，吉本则使用升入理科类大学的手段，同样免除了兵役。

以吉本为代表，很多“战时派”知识分子的战败描写有一个共同点。其典型特征就是，在对崇高理念充满激情，甚至不惜付出生命的状态下，突然遇到8月15日的战败，于是为国效力的价值观发生了急剧变

化。

但这种说法，是否可以说就是当时一般的战败体验呢，笔者有些怀疑。确实，大部分平民对反战思想没有系统的认识，而且也不可能事先得知投降的消息。尽管如此，如第一章所述，在战争后期大范围弥漫着厌战情绪和道德伦理的崩溃。如果考虑到这种情况，很难想象所有的国民在战败前完全相信日本政府的战争口号。

根据战后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团的面对面调查，确信战败的人在1945年6月达到54%。但关于这个比例，遭受空袭的城市地区比没有受过空袭的农村地区高，而且年长者比年轻人高。[139] 有生活在和平年代的经验，又谙于世故的年长者，哪怕不是知识分子，也能尝试着把战争相对化。把战败理解成突然的结果的，仅限于在“皇国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天真的年轻人。

而且即使在同一代人之中，在战败之前一直维持着单纯战争观的主要是没有社会阅历的学生。像吉本和三岛这样没有服过兵役的人就更是如此。他们没有亲眼看到军队内部胡作非为的私刑、战场上的残虐杀戮行为等，也没有机会注意到政府的口号不过是华丽的辞藻。

与之相对，前线士兵虽然不太懂得反战思想，却很清楚地知道战争毫无胜算。因此，在部队中迎来战败的士兵回忆，觉得“大家都松了口气”，“以前就在想，总有一天会变成这样，没有胜利的战争”，“老实说，这真好啊”，与此同时，也有不少人说，“怎么不早点停战呢？”[140] 相反，也有不少人在得知战败的消息后感到悲愤，这其中既包括在战局有利的战争前期身处前线的人，也有没有经历过战争的青年将校和预科实习生等。

在日本本土经历过空袭的人们，也已经意识到战争口号的空洞性了。战败时才13岁的“皇国少年”小田实1965年回忆道：“战争刚开始

时，我怀有誓死‘为天皇陛下’尽忠的激动心情。此后三年，在经历无数次空袭和饱尝饥饿之苦后，当听到父亲说‘为什么要发动这场必败的战争’时，我感到很反感，仍不断地重复‘大东亚共荣圈的理想’、‘为了天皇陛下’的老调。然而那时，我突然发现那些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的理想’、‘为了天皇陛下’距离我那么遥远，那种心里被掏空般的恶劣心情至今仍记忆犹新。”经历过大阪空袭的他，目睹了很多百姓说着“我不想死、不想死”四处逃难，最终却化为一片焦土。[141]

与此不同，那些住在与外界隔绝的基地宿舍中的预科训练生和青年将校，却被培养成纯粹的“皇国”狂热分子。他们作为军队中的精英，即使在粮食供给不足的战争末期，也能分到比一般平民多的食物。除了本土之外，在尚未沦为战场的那些地区的将官，例如驻守在台湾的海军青年军官中曾根康弘等，也能享受比内地更多的食物和更安全的环境。

因此，这些人对战争的体验自然比在前线作战的士兵，甚至比遭受空袭的普通百姓都更为轻松。陆军见习将校山田宗睦回忆，“因为在内地的基地接受过教育，所以直到战败复员后我们都对战略轰炸的实际情况和战败的情形浑然不知”，也没有意识到民众“对军人享受白米饭的憎恶”。[142]

对这样的山田来说，在8月15日“突然听到战败的消息，战败就意味着一切的崩溃”。然而，作为同一代知识分子，像鹤见俊辅那样被征召到南方战场的人，对战败的看法却大不一样。

尽管这样，关于战败的经历，山田仍断言：“鹤见这样的人是少数派，而吉本和我这样的人是多数派。”他讲这番话是基于这样的背景：了解反战思想的应该是年长的“知识分子”，而像他这样不了解反战思想的“战时派”的实际感受应该与多数派“大众”一样。

自1955年前后起，“战时派”知识分子开始登上言论舞台，原青年军

官与原预科训练生的战争体验感受，大量登载于各种媒体之上。那个年代的许多文科大学生都有通过征兵动员成为预备军官的经历，许多优秀少年接受过预科训练生教育。所以，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有许多是青年军官、预科训练生出身。这种情况，促进了“战时派”知识分子登上言论舞台这一现象的形成。

如果考虑到青年军官与预科训练生占全体国民的比例，那么把他们的言论视为普遍的战争体验，是说不过去的。然而，他们所描绘的战争体验中，把战败理想化这一点与民众的普遍愿望倒是一致的。因为许多民众也喜欢沉浸在曾经勇敢而单纯地为战争献身，听命天皇而“强忍痛苦”接受战败这样一个神话中。

1946年，坂口安吾就在《续堕落论》中批判道，将这种战败体验神话化，简直就是“撒谎！撒谎！撒谎！”坂口写道：“我们的国民要停止战争难道不是没有办法的事吗？士兵就像拿着竹枪站在战车上的泥人一样不堪一击。民众对战争厌恶至极，最期盼的莫过于战争的结束。”[143]

就这样，自1955年前后起，“战时派”知识分子开始宣扬所谓的“特权性战败观”时，许多媒体也热衷于对此进行渲染炒作。在日本刚踏上经济高速增长之路时，这些说法最能治愈人们心中的战争创伤，也是人们最期待的。

对不了解战争的年青一代来说，这种战败论被他们极其自然地接受。尤其是攻击“战后民主主义”“伪善性”的新左翼派的年轻人，更是追捧这些“战时派”的言论。倘若这些言论是“民众的战争体验”的话，那么“进步知识分子”抱有反战意识就是骗人的，而他们则可以隐瞒曾经协助侵略战争的过去，或者可以力证自己是从民众中脱颖而出的拥有特权的精英。

于是，“战时派”的怀旧情绪与不了解战争一代的批判意识，在批

判“战后”这一点上形成了共犯关系。另外，“战时派”知识分子的特征——对丸山这一代战后知识分子的批判，对“成人”的反抗，比起知识和教养更看重自身体验等态度，似乎也有受全共斗运动年轻人欢迎的倾向。

吉本隆明正是集上述“战时派”知识分子特征于一身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1955年日本拉开经济高速增长序幕之时登上言论舞台，因批判“战后民主主义”而引人注目。

超越者与“家庭”

吉本隆明，1924年出生于东京市京桥区的一个平民区，排行老三，父亲是个木匠，经营着一家小船厂。从东京府立科学工业学校毕业后，吉本于1942年进入山形县的米泽高等工业学校。他是一个爱好哲学与文学的早熟少年。在米泽高工就读期间，吉本除了欧美的小说、宫泽贤治和高村光太郎的诗歌、横光利一和太宰治的小说，还饱览了日本浪漫派保田兴重郎和京都学派的哲学、小林秀雄的评论，等等。[144]

战后的1957年，吉本在自己的处女作《高村光太郎》一书中记述了自己8月15日当天的感受：

> 我怀着将战争进行到底的激进想法，对于死亡已经做好了准备……一点儿也不觉得恐惧。反战也好，厌战也罢，我都无法想象。旁观也好，逃避也罢，作为一种态度，知道存在那些被容忍的以物质特权为基础的事情，我唯一的感受就是反感和蔑视。如果战败就不能解放亚洲殖民地，我个人曾相信过这一天皇制法西斯主义的口号。[145]

这篇在当时颇具刺激性的文章，是人们在论述吉本时必定要引用的。因此，迄今为止的吉本论，都被吉本是个狂热的“皇国青年”这一先入之见束缚着。

虽然如此，但如果综合其他著作中出现的回忆片段，战时他的实际形象会稍有不同。在米泽高工读书时的他据说是与呼吁积极参战的“武断派”相抗衡的“班上文治派的中心”，被“武断派”认为是“难缠的人”。[146]

综合这些回忆片段来看，战争期间困扰吉本最大的问题就是是否进入大学继续深造。1924年出生的吉本，在米泽的旧制高中读书时，于1944年接受了征兵体检。1943年底，文科大学生的征兵动员会开始了，但此时作为未来技术人员的理科大学生还不是征兵对象。对属于理科高等工业学校在校生的吉本来说，是否进入大学直接关系到是否服兵役的问题。

在战争末期这段时间里，参军几乎是“赴死”的同义词。没有进入大学的米泽高工的同窗接二连三地入伍当兵去了。此时的吉本，“每隔数日，就像逐根拔掉梳子齿一般，频繁参加‘此生诀别’的宴席”，每天重复着将入伍的同学“送去火车站，大声叫嚷，大声呼唤，最后垂头丧气悄然返回宿舍的日子”。[147] 即使送别一直刁难自己的，曾担任“武断派”领袖的学生，“也如往常一样，在车站前大声叫嚷呼喊一通之后，目送其乘坐的列车消失在远方”。[148]

在这种状况下，“武断派”学生声称“现在是国家危急的时刻，大家应该放弃考大学这样悠闲的事情，立刻去参军入伍”，以此来逼迫吉本等“文治派”学生。[149] 在大学升学率极低的当时，通过升学而逃离兵役“只是一小撮学生的特权”。[150] 但若行使这种特权就会被视为置赴死的同窗于不顾，背叛艰苦战斗的同胞。这种罪恶感深深地折磨着吉本。

吉本在战败之初的1945年11月写下了《宫泽贤治论》，文中他回忆，在这个时期，“为了促进国家的前进不知道有多少不言自明的苦恼”。米泽时代的他喜欢高村光太郎的同时，也喜欢读一些横光利一、宫泽贤治等人的作品，其动机是“在强迫我们每天都做出对于希望回应

祖国的苦恼的判断中，暗暗感到相对于欧洲式知性的旅愁”。[151] 对当时的吉本来说，与“祖国”相对化的“欧洲式知性”，是唯一的解救方法。

吉本在《宫泽贤治论》中写道：

> 在祖国处于危急的这段日子里，宫泽贤治无时不在我的脑海中……如果有得道的高僧，超越祖国的苦恼，悠悠然度日，提高自我的话……如果才华横溢的诗人在祖国苦难之日，不停写出永恒不朽的诗句……我将非常尊敬这样的人。[152]

但吉本在憧憬“超越祖国的苦难”的姿态的同时，也心怀反抗。在发表这篇文章之后，吉本指责“宫泽贤治心中没有祖国”，“他毕竟在个人思想上是一个世界主义者”。[153] 吉本强烈憧憬着能够“超越战争”成为一个“永恒的诗人”，但又无法忍受背叛同学和“同胞”的孤独感。

1958年，吉本发表了《转向论》，主张战前的共产主义者思想发生变化与其说是因为受到压制和拷问，不如说其主要原因是“被大众所孤立”。该文写道，所谓的思想转变，就是“农村知识分子”中由于过于依赖“西欧的政治思想和知识”，而忽视了“日本的特殊现状”所引发的现象。[154]

一直举棋不定的吉本最终没有选择参军入伍的道路。1944年9月，吉本提前从米泽高工毕业回到了东京，进入东京工业大学电气化专业学习。

而促使他决定升学的主要原因似乎与家庭有关。他在1999年的采访中说，参加过一战出兵青岛的父亲告诉他，大部分战死者都是凄惨地病死或被杀，“所谓的战争和你所想象的完全不同”，他因此暂时打消了参军的念头。[155]

然而，吉本并非轻易就接受父亲的劝导。如前所述，1999年的采访

中只提到吉本听到父亲的话后“如同被泼了冷水”，还真的认为“不愧是父亲大人”。[156] 但在1964年的《关于过去的自注》中谈到自己考大学一事时却表示：“自己十分厌恶，这也让家人为难了很久。”从中可以看出他与父亲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157]

一方面是想要赴“国难”的单纯的儿子，另一方面是想要对此加以阻止的家人，这种事在战争末期很普遍。一位曾在17岁时报考少年飞行员的“战时派”知识分子回忆，他在反驳阻止自己报考的母亲时曾说：“在国家将要灭亡的时候，怎么能先考虑小家和个人的生活什么的呢？”并最终参军入伍。[158] 这种“国家”与“小家”的对立，当时被视为破坏总体战体制的“小家”的利己主义，已经在第二章中讨论过了。

面对国家这一同一性的压力，吉本曾试图用欧洲思想超越国家的“个人”，即成为“永远的诗人”的方式对抗，却不能使自己摆脱孤立感。然而他通过家庭这一与国家有着不同同一性的依据，摆脱了国家赋予的罪恶感。

但吉本并没有全面对“家”予以肯定。他中学毕业后就离开了东京，特意到米泽读书就是想从家中独立出来。[159] 如后所述，他在成名作《高村光太郎》中，描绘了高村与其父亲之间的纠葛，批判了“家”就是“日本封建制度”的象征。对于这样的他而言，听从父亲的劝说选择升学大概是一种屈辱。吉本在是否服兵役的选择上十分迷茫，他不仅对“永远的诗人”，也对“家”抱有一种矛盾心理。

除了家庭，促使吉本下决心升学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对权威的反抗。

如前所述，“武断派”学生，劝说吉本等“文治派”学生放弃升学而去当兵。而那时“武断派”学生补充道：“我们是遵照了学长们的意思。”[160] 吉本对“武断派”学生借助“学长”这一权威的身份去劝说别人献身很

反感。

此外，“武断派”学生请来的权威是知识分子。据吉本回忆，1943年前后，米泽高工出现了一位身着国民服的讲师。这位讲师与之前吉本所知的粗略意义上的“农本主义法西斯分子”有所不同，他在解说中添加了哲学元素，讲授“东亚的有机未来”，宣扬通过劳动的合理化来增强“劳动力”，对于哲学青年吉本来说犹如“感受到一股奇妙的理论说服力”。另外，这位讲师逐个带学生去实习，实习回来的学生都“如同中了邪一般”吵嚷着要去服兵役。[161]

在这种情况下，“文治派”领袖吉本决定不做“屈服于借学长和讲师的权威的追随者”。于是某天吉本到“武断派”学生那里反驳道：“请解释一下为什么读大学不是为了国家呢？”[162]

钻研科学技术是国家所认可的增强战斗力的一环，即使“武断派”学生也难以反驳这一主张。在吉本的反驳中获得了力量的“文治派”学生驳倒了“武断派”学生的说法，他们升学的决定更加坚决了。

然而，“即使坚决要升入大学，内心的烦恼还是没有解决”。吉本在战败后不久所写的《宫泽贤治论》的一节中坦白道，考虑到窘迫的战局，“我认为已经过了科技救国的时期”。因为这样，升学也是对国家的贡献这一反驳也只不过是为免除兵役的一种“诡辩的反击”，吉本自我觉醒了。[163]

据吉本回忆，有一次像往常一样为入伍的学生举行饯别会，扶着烂醉如泥的同学一起回宿舍，那位同学临别时说道：“吉本啊，你这是在走自己的路啊。”这句话给吉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那名学生作为一名特攻队员牺牲在战场上的噩耗传到了吉本耳中。[164]

因为有这样的经历，吉本对于战后自己考大学这样说道：“为了维

护这一特权，深深体会到对自己的厌恶。”[165] 他在1957年的著作中说道，在战后“一听到米泽这个地名就感到内疚，除了乘火车经过外一次都没有去过”。[166]

经过这些事情，之前引用过的“对于死亡……不觉得恐惧。反战也好，厌战也罢，我都无法想象。旁观也好，逃避也罢，作为一种态度，知道存在那些被容忍的以物质特权为基础的事情，我唯一的感受就是反感和蔑视”，从这段话中与其说我们可以想象到战时吉本的实际情况，不如说这是他所希望的理想状态。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战后他所背负的深深的罪恶感是他从理想状态中制造出来的。而坂口安吾可能会评论说，这是“撒谎！撒谎！彻底的谎言！”

就这样吉本考上了东京工业大学。但由于战况所迫，根本无法正常授课，吉本也在1945年春应“勤劳动员”需要被送到了富山县的一家工厂。此时的吉本认为读大学也不过是“死缓”而已。[167] 三年毕业后会被征兵，估计迟早要和已经参军的同学一样直面死亡，并靠着这种想法才减轻了些许升学给自己带来的罪恶感。

因此对吉本来说，8月15日是“在没有任何心理准备的情况下，来得十分突然”。听到战败的吉本，感觉“自己像是幸存下来的一样深受负罪感的煎熬”、“抱着应该把战争进行到底这样的激烈的想法”。战败后不久的吉本寄希望于“听说一群不肯投降的军人和年轻人企图发动政变”，并抱着死不足惜的想法想去参加这种暴动。[168]

但是，结果没有发生这样的暴动。相反，基本上看到的都是人们低下头，或是很高兴地听着“天皇的‘终战’宣言”，复员的士兵“背着塞满军粮和衣物的行李”回到了故乡。吉本后来说道，“这是完全没预料到的事情”，“这时看到的都是绝望的民众形象”。[169]

这样的情景“完全没预料到”，显示出吉本是纯真的理想主义青年，

没有理解周围的厌战情绪。与其这样说，还不如说正因为自己身上也存在对投降感到放松的心情，而不想去理解更为贴近实际的情况。听到战败时，他抱着“将战争进行到底这种激烈思想”，有“为自己国家的战争而牺牲的自觉中又存在像谎言一样的裂痕”这样的自觉，所以会感觉“讨厌这样的自己”。[170]

这想必是吉本自身也意识到自己也是“绝望的大众”中的一员。对吉本来说，这样的“大众”一定是拒绝国家理念的动员而满足于自己生活的一种存在。这也在他的心中形成了厌恶“大众”的同时，又觉得自己也是大众当中的一员的矛盾想法。

就这样，吉本因为战争的体验背负了几种矛盾情绪。有对“战死”的憧憬却又心怀恐惧，有对“永远的诗人”的崇敬却又有反感，有对“家”和“大众”的热爱与反感。而这些的根本就是，因为免除了兵役而背叛了同学，感到背叛“同胞”的负罪感。因此战后吉本全力投身于与产生这种负罪感的国家和“公”的理念的斗争中。

对“神”的憎恶

战败后，吉本从富山的工厂回到了东京。在空袭后的废墟上，“已不能指望权力分配机构的人们”投入到用“自我防卫本能”生活的状况之中，因此，“这样的体验给我对人类的理解带来了决定性的影响”。[171]

其中之一就是在到处是废墟和黑市的无政府状态下“体会到无论人们做出什么样的事情，都不会被别人说三道四的道理”。[172] 作为特攻队员而牺牲的米泽时代的同学在出发时说，“吉本，你是在走自己的路啊”，这给他带来了深深的罪恶感，而可以说能缓解这种罪恶感的便是废墟生活和无政府状态。

此外，还有“战争带来的连带感”逐渐消失后的孤独感。战后，“原

本深信由连带感而联合的人们，也都开始各自忙碌起来，开始分别认识到战争的意义，甚至不得不怀疑是否曾同仇敌忾过”。[173]

特别是对于吉本来说，连带感消失后留下的印象是，战后“出现了反战的一代”。这对完全没有想过要批判战争的吉本来说十分震惊。[174] 在他还在为是否应该奉献生命而苦恼的祖国，存在批判性地看待献身者的这一事实，意味着吉本所描绘的“祖国”和“连带感”只不过是一种假象而已。

特别是在吉本喜爱的诗人高村光大郎发表了提倡由“文化”重建日本的诗之后，他才意识到“连带感”已然消失。作为高村的忠实读者，吉本自认充分理解他。后来，吉本在读了很多高村在日中战争时期所写的战争赞美诗后，对是否应该去服兵役的苦恼加深了。

在吉本看来，因连带感而应与自己联结在一起的高村，也应跟自己一样受到战败的沉重打击而深感绝望。高村却说要靠文化来重建日本，吉本认为“找出令人充满希望词语的精神结构，是不能理解的”：

> 难道说对于战争，高村也没有竭尽全力，只不过是在耍嘴皮子吗？或者说，以命相搏，对于高村来说，只不过是部分想法？我以为自己理解那位诗人，但或许也存在连这位诗人自己都完全陌生的世界，而他又是从那里出发开始对战争进行思考呢？[175]

当然，即便吉本自认为能够理解高村，这也不过是一个读者单方面的感觉而已。与从小就处于战争环境之下的吉本不同，对于包括高村在内的年长一代来说，战争只不过是人生的一部分而已，这并不让人奇怪。之后，与吉本交谈过的平野谦以“战争迟早有一天会结束”为前提，认为“战时只不过是假象而已”，并论述道：“但是吉本之后的一代，并不认为这是一种假象，而是认为那是绝对的。”[176]

对自己来说是生命的全部，但在对方看来不过是人生中的一部分而

已。“拼命思考如何以自己的死来做交换”，这只不过是单方面的想法而已。20岁出头的文学青年吉本看到了现实，“绝望、侮辱、憎恨和愤怒的心情交织在一起，孤独感令我无法忍受”。[177] 在他1950年左右的笔记中曾留下这样的话：“最终，人世间的所有东西都不是为我而存在”，“我真可悲！”[178]

与此同时，东京大审判的打击接踵而至。随着日军在亚洲的残暴行为和愚民政策相继被揭露出来，“伴随吉本度过青春期的战争伦理道德变得一无是处，这也是沉重的一击”。这并不仅仅是他自身道德体系的崩溃，也使包括米泽时代同学在内的“战争牺牲者的死变得毫无意义”。[179]

当然吉本也不得不承认，战争只不过是一场侵略行为。但是在当时的笔记中吉本却认为“绝望、侮辱、悔恨和愤怒”都让他无法接受客观判断。并写下这样的话：

> 我并不相信那些在1945年后自称反对1945年前战争的人。他们只不过是袖手旁观而已。这种虚伪让我困惑，使我痛苦。到底谁才是明智的人，也许不言自明。
>
> 但是我不喜欢这种明哲保身的旁观者。[180]

在同一份笔记中他写道：“我鄙视那些不管是战争还是和平都觉得没多大关系的人。”然而对于吉本来说，这已经不是客观的善恶和贤愚的问题了。评价的标准是当事人是否打算“牺牲自己”、“全心全意地投入到战争中去”。如果是不惜性命、全心全意付出的话，必定会和自己一样获得战败带来的伤痛。说自己是客观明智的人，只不过是证实他是“旁观者”而已。

当然，吉本认为年长的知识分子没有受到伤害也是片面的想法。正如上文所阐明的，虽然年长的知识分子和吉本不同，但也同样饱尝战争

悔恨之苦，只是他们没有明确表达出所受的这种苦罢了，因为这等于公开承认自己缺乏勇气。

吉本这一代人却连这类悔恨都没有。因此，他们觉得自己为战争献身，却受到了战败后的被背叛的伤害，这一点甚至值得夸耀。所以，吉本认为自己是受到战争伤害的一代，而年长的一代只不过是没有受到战争伤害的旁观者。

但另一方面，吉本向往成为超越世俗的“永恒的诗人”。另外，被免除兵役的自己难道不是旁观者吗？这一问题当然也令他困惑。恐怕他也对战时的自己深感厌恶，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我想大概是出于这个原因，他对旁观者的憎恶更加强烈。

因此战败后，吉本对两样东西十分憎恶。一是“决定投降的战争主导者”，二是“对战争袖手旁观，在逃避战争的残酷之后立即开始讴歌和平的小知识分子阶层”。[181]

对前者——“主导者”的憎恶，使吉本曾经对祖国的热爱开始幻灭。随后的1960年吉本写道：“以最激烈的方式打破国家的制约、民族的幻想的是我们——生长在战争中的一代。战败时，一听到国家、民族、日本人这类词，就会觉得心痛。现在即使不反感，也无法使用这样的词。”[182]

对于后者——“知识分子”的憎恶，导致了对歌颂“和平与民主主义”的战后知识分子的反感。战败后，吉本认为曾经爱读的京都学派之类的著作都是“满纸谎言之作”，而将其全部处理了。并认为“突然的和平转变也好，民主主义也好，文学家也好，都让人感到恶心”。因此，除了阅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之外，他还埋头钻研《圣经》和佛经，并把它们视为“唯一的精神寄托”而苦读不辍。[183]

如第五章所述，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和《圣经》，是经常直面死亡与价值观的急剧变化的当时20多岁年轻人的常有行为。战败后不久，吉本为寻求灵魂的拯救，经常往返于富士见坂的教堂，听牧师宣教。

但到最后吉本竟然反对起基督教来，他在听牧师的说教时会想："这难道不是冠冕堂皇的话吗？《新约全书》不是这样的。"[184] 此外对共产党，也总是怀疑其是否真的在战时进行过反战活动，总感觉其主张、言论都是"不知所云"。[185] 结果吉本对基督教和共产党并不热衷，反而慢慢形成了把它们作为批判对象的思想。

1947年毕业于东京工业大学的吉本，辗转于与所学专业——化学相关的岗位，但每天一下班，他就马上回家，然后把今天的心得一一记录下来。他每天都这样过，而且这些笔记中大多是对"神权与王权"，也就是对神和国家进行谴责的内容。[186]

那么，吉本为什么反对基督教和国家呢？总而言之，是因为他十分讨厌放大自己的罪恶感的权威。

众所周知，基督教强调"原罪"的沉重，主张对救赎之神的信仰，但对吉本而言，从因免除兵役而被烙印在心中的罪恶感中解放出来是一个重大问题。对吉本来说，通过强调"原罪"来唤醒对神献身的基督教，与通过放大对"同胞"的罪恶感来唤醒对"天皇"这一"现人神"献身的国家，两者并无不同。

吉本在当时的笔记中写道："人类否定宗教的过程，换句话说就是否定人类作为被支配者这一自我定位的过程。"他在这一时期经常引用"无论在哪里，正统主义都会通过人种学和神学的论据将统治和剥削理论化"，还写道："立法权和行政权脱离神与帝王之手，而转移到民众手上才几天啊"，然后写下了第一国际成立的时间。[187] 毫无疑问，当时的他受到了彻底否定宗教与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

但当时的日本共产党高举“民族独立”旗帜。吉本对此强烈反对。他在这一时期的笔记中虽自称“外星人”，并表示“共产主义者、法西斯主义者主张民族独立，但外星人不相信”，倡导“绝不为祖国而奋起，而是要为了人类，特别是为了人民中的那些贫困百姓而奋起”。[188]

此外，战败后的吉本的笔记中除了抗拒“神”和“国家”，还出现了另一特征。那并不是构筑替代现状的秩序和理念，而是倾向于否定秩序与理念本身的无政府状态。

吉本在笔记中，在批判把秩序进行正当化的“正统主义”的同时写道，“所谓秩序就是对剥削的肯定”，并说“有谁为了结果而采取行动呢？”“相信是暴徒。”这一主张与当时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是有些不同的。

在一切道德都沦丧的战败后的无秩序状态下，吉本首次感觉到了从罪恶感中解放出来的安心，于是他在这一时期中的笔记中写道：“我们讨厌那种做正确事情的家伙，正确的事情经常是狡猾地加工过的贪欲。”[189] 对束缚人们的一切秩序和理念，还有被国家及神所代表的权威的反感，可以说构成了吉本的基本价值取向。

对这种无政府状态的取向，与反对“和平”的秩序有关。他在这一时期写下了这样的诗：“外星人，你在这个世界无法生存下去，因为你根本忍受不了和平。”于是吉本在1959年的文章中描述了他的战后生活：

> 战败后的世界又恢复了和平，虽然开始不需要再为性命担忧，但让人感到意外的是生活中的琐事也令人头疼。为什么要为了做口红及女式印染而必须使用高科技呢？又为什么为了做塑料浴室脚垫而进行研究呢？为什么处理文件的必须是上了年纪的人呢？就这样，我每天陷于这样无穷无尽的自问自答的生活中。[190]

对吉本来说，学习科学技术，不是为了做口红和塑料浴室脚垫，而

应该是为了制造武器。对战败后的和平感到违和，谈论对战时的怀念，是很多“战时派”的知识分子共有的现象。就这样，在这种对和平的日常生活感到违和的过程中吉本写下了梦见“暴徒”的笔记，表示对维持秩序的“正义”和“伦理”十分反感。

但这并不意味着吉本不讲伦理。他在当时的笔记中写道：“战后一代人的特点是其本身就是合乎伦理的。”“在这种场合伦理性屡屡以反伦理的形式表现出来。”[191] 采用反伦理意识形式的伦理追求，在坂口安吾所写的《堕落论》中尤其明显。吉本还是那种常因伦理问题而苦恼的类型。如后所述，他在1954年写下了《叛逆的伦理——试论〈马太福音〉》这一论著。

让吉本更加厌恶的是那些对他人解说伦理致他人有罪恶感而自己却对这种伦理毫不理会的人。他在当时的笔记中写道，“讨厌那些做正确事情的家伙”，但他认识到“认为伦理就是使他人服从却与己无关的人，就在这些正义之士当中”。[192] 当然，这与对教唆吉本那代“战时派”参军入伍，战后却没有自杀又没有遁世的年长者的反感的关联性是毋庸置疑的。

对吉本而言，与“神”相对的“大众”是与一切伦理和理念都毫无关联的存在。[193] 1966年在与江藤淳的对话中，吉本说道：“要说所谓人类这一存在意味着什么，我认为是不断去想一些多余的事。一开始就是有果子吃果子，有动物吃动物。有草当然就吃草。就是从这种状态，渐渐开始想一些多余的事情……从而创造出类似规则的东西。”[194]

人类受到了由自己创造出来的神与国家的束缚，我们在这种图式中可以找到马克思的影子。但与此同时，吉本回忆了战败之初的废墟生活，感叹道：“有时席地而眠，有时和衣而卧。”[195]

对吉本而言，抹杀一切伦理与正义的废墟生活使自己忘却了那位战

死的同学曾对自己说过的“走自己的路”所带来的罪恶感。然而吉本的基本认识是，在那种状态下“大众”在“正义之士”的煽动下，“变得胡思乱想起来”，被灌输了罪恶感，最终为谋求救赎而成为神与国家的奴隶。

相反，吉本憧憬的是心怀坦荡、没有任何罪恶感的人。1957年，吉本在为今井正导演的电影《纯爱物语》所作的影评中写道：

> 我从很早就开始试图相信如果人连饭都吃不饱的话，不管做小偷、强盗还是骗子，这都是他们天生的权利。这部影片中的主人公贯坊与恋人不良少女蜜子就是这种主张的体现，我对此欣喜若狂，这是不言而喻的。
>
> 两人为了赚取做小生意的本钱，也不做什么穷凶极恶的事情，就是在百货商场小偷小摸，最后在一个叫荒屋的地方被捕。此外，在被送往少管所的路上，少年毫无悔意地从飞驰的列车上纵身跳下，被送到感化院的少女面无愧色，殴打心善的女管教，并试图逃跑。这两个人的形象真是太棒了。[196]

这里让吉本“欣喜若狂”的大概是少男少女毫无悔改之意，殴打向他们灌输罪恶感的“心善”之人，并试图逃跑的行为方式。然而，吉本虽然说“试图相信”做小偷或强盗这种与生俱来的“生活”权利，但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相信”。

吉本对“神”的反抗并不是在战后才出现的，在他为是否升入大学而感到苦恼的高中时代就已经存在了。吉本在米泽时代末期的1944年5月创作了凹版印刷的诗集，其中收录了一首题为《无神论》的诗，内容如下：

> 无论什么情况/人之外有“神”/人有“理想”，都是被称为社会精英的一类人的/寂寞而灰暗的幻觉吧。
>
> 必须要说，首先我会这样/打开一个无神论的端绪/与迄今为止的文化与人斗争。[197]

在同一诗集中收录的题为《原子编号二号》的诗中，吉本这样形容“文化人”：“眼睛发着绿光，口中含有虚妄的毒舌，朝我慢慢追过来的，是他们中较强的一些人。”[198] 恐怕这种表现，与逼迫他参军入伍的“武断派学生”及煽动学生的老师形象相重合。

但是，吉本并没有以彻底成为“大众”的方式打破这种状态，这是由于他过于理想化，也过于伦理化。

吉本所采取的做法，是比攻击对象采取更为伦理的姿态，由此揭露既有权威的伪善。1954年，吉本出版了无名时期最大部头的著作《叛逆的伦理——试论〈马太福音〉》。该书通过分析《圣经》中的《马太福音》，描绘了基督教原始教团观念化的“神的伦理”，并对此进行了彻底的批判。

他在米泽时代的诗《原子编号二号》中，就如何对抗折磨他的“文化人”进行了描述：

这是我最后的王牌

虽然道路十分曲折

但比他们要有趣

除了把他们蹂躏践踏

我不知有什么其他方法[199]

于是，吉本从出版《叛逆的伦理——试论〈马太福音〉》的第二年即1955年起，开始以揭露知识分子的伪善及追究知识分子战争责任的形式对当时象征着“正义”的共产党与进步知识分子展开攻击。此后，吉本在共产党的权威不断下降、社会上充满对“和平与民主主义”厌烦的环境下，一举为世人所注目。

追究战争责任

吉本攻击共产党的背景是他独特的战后体验。其一就是吉本的诗论受到了共产党一系的批判。吉本从大约1950年起写下了大量诗歌，并个人发行了诗集。1954年3月，吉本在《新日本文学》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如何书写日本现代诗史论》的评论。

吉本从几年前就开始形成对诗歌的独特思考。其基本主张是把对秩序的反抗这一思想通过诗歌进行表达。

吉本认为，诗歌中存在的所谓“感性秩序”的韵律的产生是由于“人的感性想填补自身缺陷的这种积极取向”，这引发了“从人性到神性”的积极提升。现代诗的作用是，反抗朝着这种“神性”的“积极取向”构建的“现实秩序”，打破韵律的支配。与这种抗争的重要性相比，诗人在要不要遵从共产党纲领这件事上不过是“大惊小怪”。[200]

像吉本这样的诗评与后世的后结构主义的语言理论有共通之处，是经过独特思考的东西。但是，问题不在内容而在形式这一主张原本也是他欣赏的小林秀雄提倡的。而且吉本的文章中充满了他独特晦涩的表达，甚至将当时的诗人和知识分子大骂成“集中体现了对日本诗意识结构上的本质性的无知”，“一派胡言”。[201]

因此，吉本的诗评遭到共产党系评论家的错误批评：“如果不考虑日本现在完全受美帝国主义的控制，怎能理解现实的社会结构呢。”对此吉本十分恼火，他曾在留下来的草稿上斥责这位评论家说，“沉浸在绝对思想里，自我陶醉的选民”，“这样的人物，我们去神龛或教会祭奠一下就好了”。[202]

像这样的经历还有一例，那就是在工人运动问题上，吉本也受到日本共产党的批判。

战败后，如“从特攻队转向共产党”这句话所象征的一样，寻求“死得其所”的“战时派”年轻人成为激进革命运动和工人运动的中坚力量。就连吉本也在化学这个行业里不停地跳槽，同时不断在各个工作场所组织工会活动，并尝试过激的罢工，也因此经常被老板炒鱿鱼。

1955年，吉本在一家墨水公司上班，与以年轻人为中心的工会执行部一起策划罢工运动。吉本在回忆这段经历时说：“我在策划一次彻底的有毁灭性的行动。” [203]

但是年长的工会干部们并没有和吉本一样“毁灭”的斗志，企图向经营者妥协。而且六全协前后日本共产党在抑制激进运动方面有所行动。当地的共产党基层组织也批判吉本等人的斗争为“没有吸取日常斗争经验，只是进行了一些罢工主义的指导”。 [204]

由于这样的经历，吉本的斗争以失败告终。吉本因此受到处罚而不断被调换部门。为了表示抗议，吉本选择了辞职。这之后，他不仅难以找到工作，也为和已婚女性的绯闻而烦恼，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陷入了“泥淖”而无法自拔。此时共产党和年长的工人运动家们作为“决定投降的权力”成为他憎恨的对象。

吉本认为，共产党和天皇制国家，还有基督教，无论哪个都被认为是通过激发人们的罪恶感而诱发出其忠诚心的存在。1961年，吉本写下了《关于〈前卫〉的交流》一文，将自己思考的共产党思想概括为：“‘你自己承认是小市民知识分子吗？’‘承认。’‘你相信工人阶级是扬弃资本主义的主体吗？’‘相信。’‘这样的话，你敢发誓你能赢得从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蜕变为无产阶级的自我形成的胜利吗？’‘敢发誓。’” [205]

吉本把想要引起无产阶级和民众罪恶感的逻辑看作“被迷惑的军国主义者”在战争中提倡的“同天皇《教育敕语》如出一辙般的伪善的命

令”。[206] 即使在战后，吉本也被“吉本啊，你这是在走自己的路啊”这样从战死者的话语产生的罪恶感所困扰。对于这样的吉本，所谓能够激起自己罪恶感的存在就是，在其被打倒之前只有战斗。

辞去了墨水公司工作的吉本在专利事务所谋得一个职位以糊口，同时又开始写评论。作为主题他选择了批判曾经很欣赏的高村光太郎以揭露共产党的“上一代的诗人”协助战争的行为。

在与1955年11月的评论《上一代的诗人》一起发行的《高村光太郎论》里，吉本一面描述过去的自己是个热血的青年，一面揭露了无产阶级诗人壶井繁治和冈本润写过歌颂战争的诗。当时，受六全协的影响，诗坛正在掀起了对共产党批判的浪潮，吉本提出的问题迎合了当时的潮流。

以此为开端，吉本不断引用共产党文化人在战争时期的言论，批判他们是“佯装不知的名人”，“盗贼的伎俩”，“绝不容许披着民主主义外衣的这些家伙”。[207] 吉本认为，“战后文学”的本质“用一句话来说，就是转向的人以及战争旁观者的文学”。[208]

这一时期，吉本模仿共产党的“二段革命论”提出了著名的“二段思想转变论”。也就是说思想转变不仅是第一阶段——放弃社会主义，也要经过以无产阶级文学的手法赞美战争的第二阶段。吉本从这一逻辑开始破坏无产阶级文学的偶像，提出“如果小林多喜二在世的话，有可能变成火野苇平”。[209]

把小林多喜二和火野苇平相提并论这一逻辑是在战败后不久平野谦在“政治和文学”的争论中提到的。然而在战后的文学家中，吉本欣赏的是荒正人。荒正人作品最大的主题是因战争经历而产生的“观念与肉体的分裂”。而且如第六章所述，荒正人列举出的能够克服“观念和肉体的分裂”的存在的，不仅有狱中坚贞不屈的共产党干部，还有特攻队员。

当然，吉本没有像荒正人那样拥有在战时没能表明反对战争的悔恨。但是，吉本变相继承了荒正人的一些思想，如“观念与肉体的分裂”这个问题，否定共产党的权威，批判年长一代宣称“民众就是我”的观点等。原本吉本很爱读《近代文学》，曾想向《近代文学》投一篇题为《试论〈马太福音〉》的文章，却无果而终。[210]

但吉本对战争责任的追究，掺杂了他个人的感情。例如，他在1959年的评论中指出，米泽时代煽动学生的一位讲师难道不是社会主义运动的转向者吗？但是，他毫无根据地判定那位老师“怎么想都感觉那个人是活到了战后”，“并加入日本共产党”，同时怀疑批判自己罢工运动的共产党基层组织也是受到了这种“转向法西斯主义者的影响”。[211]

然而，这一时期厌恶共产党权威的言论界为吉本的主张而喝彩。对于进行反驳的言论界中的共产党一方，吉本不断痛骂他们是“转向法西斯主义者”、“旁观者”，嘲讽他们是“如背信弃义的行为被揭穿后的宗教信徒一般”。[212]

在当时的言论界，吉本几乎是所向无敌的。多数年长者出于自己因缺乏勇气而使很多吉本那一代的年轻人战死而抱有负罪感，对那些关于自己在战争中为虎作伥和不作为的指责也无法辩解。即使有人反驳，吉本也会首先指责对方是“投降派”、“老顽固”等，而当吉本在逻辑上即将被驳倒时，他就会以“逻辑上正确性即‘旁观者’的证明”来进行反击。为了与这种批判他人的态度形成对比，他将自己描绘成一个不畏死亡、勇敢战斗的日本“皇国青年”。

“扭曲的结构”与“大众”

但是，吉本在论述战争责任时并没有针对一些协助战争的事实。他在1956年说道：“我的那些奇怪的论敌们故意曲解我，仿佛我批判上一辈诗人只是依据他们写没写过战争诗歌。”[213] 对吉本而言，重要的并

不是赞成或反对战争这种客观明智性，而是在战争中全心全意进行斗争的程度，以及是否因战败而受到伤害。

也就是说，吉本追问的并不是文学和思想的内容，而是文学家和思想家的态度。在从文学作品中寻求解决兵役问题的米泽时代，吉本开始认识到“思想和艺术有时就是生与死的问题”。然后，在《高村光太郎》这本书中，吉本批判了“将实际行动与艺术二元分离”的现象。[214]

另外，吉本将“旁观者”与全身心投入战斗的牺牲者进行了对比。他说：“我们的战争责任论的根本是，一直存在对战死了的同代人的嘲笑。”这一点也是他主张的战争责任论“与《近代文学》派所主张战争责任论的最为本质的区别”。据吉本所言，战后的“民主主义文学”因为“是建立在战争中牺牲者的死亡之上”的“投降派、旁观者、虚无主义者”的文学，所以很难被原谅。[215] 当然，吉本在讲“牺牲者”时所想到的，应该是他在米泽时代的同学。

另一方面，他对亚洲战场上的牺牲者几乎漠不关心。他在1961年批判武田泰淳时，主张“一个劲地对中国友好并认识到自己的战争责任，却为何不能先想想我们死去的人呢”。[216] 当然，他所说的要被追究战争责任的人都是上一辈人，吉本根本没有想过自己这个时代的人也负有战争责任。

于是，这一时期吉本的特征是，几乎将“战死者”和“大众”当成同义词使用。他在《高村光太郎》一书中批判“统治者”和“知识分子”在战争中毫发无损地生存了下来。因此，他认为“在战争中付出最大的牺牲，同时最凶残激进，最后最遭殃的是底层百姓”。[217] 对他而言，所谓“大众”，是那些不同于伪善至极的“知识分子”及“旁观者”的、思想与言行一致的战斗过的人。

这样的“大众”形象在年长的知识分子看来是十分具有违和感的。曾

被吉本批判的诗人冈本润在1956年有吉本参加的座谈会上表示：“战争中的平民难道没有对政府的战争政策阳奉阴违吗？” [218] 对此，吉本反驳道：“我们当时也生活在被称为平民的圈子里，我眼中的周围生活着的人并不是你所说的那样。”这是因为，吉本最终还是只以米泽时代的同学为标准来论述“大众”。

作为吉本的成名作，1957年出版的《高村光太郎》在“知识分子”与“大众”对立的背景下，以高村为题材，描写了“天生的平民与受教育后形成的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也就是说，基本所要描述的主题，是那些因接受欧洲思维方式而只会思考“多余之事”，存在于“先进语言和乡土语言之间”的“扭曲的结构”之中，孤立于“日本大众”而“无法过正常日子”的知识分子。 [219]

据吉本所述，高村从欧洲留学归国后，拥有人类普遍感性思维的结果就是作为日本“后进社会的优等生”被孤立了。尤其与高村发生对立的是以父亲为代表的“平民之家”。高村为逃离“家庭”而选择去留学，与“新女性”智惠子生活在一起。但是，因被社会孤立而失败之后，高村又“回归平民”，并被卷入参加战争这一“大众洪流”之中。 [220]

1955年，当时吉本为与已婚女性的恋爱感到苦恼，与旧制度的家庭观念出现了敌对关系。他早就说过，自己之所以到米泽的学校读书，是因为想要从家里独立出来。但同样如前所述，想要用欧洲式思维方式支撑自己的吉本无法忍受战时的孤独感。

“接受西欧教育的知识分子”和“日本的大众”这一对立图式是1950年代言论界最普遍的话题。然而，吉本质疑这个“扭曲的结构”是为了消除他所批判的思想与行动的分离。因为他在战争体验中负罪感被加强了，是从怀有为战争而牺牲的思想，同时又被免除兵役这一思想与行动的分离中产生的。

吉本原本在《高村光太郎》中所批判的，是之前已经提到的“实践与艺术的二元分离”。而他在《叛逆的伦理——试论〈马太福音〉》中批判的，则是从大众的现实生活中游离出来的“神的理论”奠定的“原始基督教观念的二元论”。[221]

另外，吉本提出的解决“扭曲的结构”的方法很独特。他否定了潜藏自我和服从他人这种二选一的说法，提倡“使客观描写内在化（主体化）”。[222]

据吉本所言，这是“使自我内部世界与现实对立，进行讨论，并使其理论化的过程”。[223] 也就是说，并不是拒绝和否定外部世界，也不是服从外部世界，而是在自己的思想与语言表达之间包含整个世界。这样，在自己的内部和外部世界之间存在的“扭曲的结构”也被消除了。多年后，吉本将这种状态表述为“回归大众的原像”。

可以说，这是作为诗人的吉本表达了将世界万物汇聚于自己诗中的希望。吉本在《高村光太郎》中提出的这一方法论，也是其进行文学表达时的态度。他之后虽然开始写政治评论，但也持相同的理论。

在1960年代，吉本开始对新左翼运动拥有影响力时，也出现了诸如吉本的政治思想中缺乏现实基础这样的批判。但吉本在1967年与鹤见俊辅的对话中，主张“所谓思想，极端来说，如果在原理上不存在模棱两可的前提下囊括整个世界的话，在潜在意义上，就等于获取这个世界的现实基础”。并论述道：“这是一种自立的事情，如果能包含这个世界的话，无论出现怎样的情形，无论谁怎么说，都不会动摇。”[224]

换句话说，对吉本而言，政治思想就是一种语言表达，作为表达而形成的就是“现实基础”。而且可以把世界上所有一切都纳入自己的语言表达中，如果“扭曲的结构”被消除的话，那么战争中使他烦恼的孤独感和动摇就会消失，由思想上和行动上的错位而产生的罪恶感也会消失。

就是说，对吉本而言，所谓自立就是摒弃“你这是在走自己喜欢的路啊”这种来自战死者的评价，超越罪恶感和内心的动摇，可以说能达到书写出包含大千世界的“永恒的诗”这种状态是最好的。[225]

于是，对吉本而言，正是这种摒弃全部罪恶感和动摇的表现，才真正会成为打动人心的力量。吉本在1966年与江藤淳的对话中，主张“极其个别的，或者说极其孤立性地存在的知识分子所创造出的文化也好，文学也罢，能够不断使时代发生转变”。在1968年与竹内好的谈话中，回忆起战争，“很不希望文学家创作所谓的战争文学。可以更加脱离现实，总之渴望一种确实可以被称为文学的东西”。[226] 当然对他而言，其典型就是“永远的诗人”宫泽贤治。

这种主张，作为文学家的创作态度论是具有一定的说服力的。但吉本以同样的论证方法来批判社会运动家和政治家。他评论工人运动家、诗人谷川雁“作品本身能够得到认可的”只是他的诗而已，并论述道：“因为谷川的政治评论把与现实运动的关系作为基础，所以不能称为‘已完成的表现’。”还有关于毛泽东所提倡的“革命战士是鱼，人民群众是水”，他认为“这是比喻中最简单的直喻，以这种直喻论述出来的形式逻辑终究是不行的”，“这样的人进行革命，是没有什么作为的”。[227]

吉本诗论的主张是，本来诗人抓住社会结构的力量是以这个诗人创作出何种语言感觉的诗来衡量的。在那种情况下，“已完成的诗是如何论述现实社会的政治问题”等对他来说是次要问题。

鹤见俊辅试图通过诗人的语言观来寻找这种吉本思想的特征，即“在诗中，无法区别语言和事物，因此形成了诗歌独特的世界。语言在这里是‘事物’本身”。正如原始社会的人把“祈雨仪式”和“降雨”当成一个整体一样，对诗人来说，语言表现和现实世界是同一事物。正因为有这样的前提，所以“诗就像未开化人的咒术一样，发挥着魔力”。而且，吉本写过“在诗中语言的魔力”这样的评论，所以有“异常的纯粹

性”和“关于否定现实的实证性分析创造出排他性信仰”的说法。[228]

1958年，吉本发表了论述战前共产主义者思想转变的《转向论》。这篇文章写道，所谓转向，是“因为错过了把日本的近现代社会结构当成一个总体视角而在知识分子间发生的思想变化”。而且，与压制和暴力相比，“从群众产生的孤立（感）成为最重要的条件”。[229] 即所谓的转向就是，为了臣服于在自己的思想中包含以“群众”为首的世界，而产生动摇的状态。[230]

吉本在《转向论》中，断定狱中思想没有转变的共产党干部是“‘非转向’的转向”。对吉本而言，狱中非转向干部所代表的思考模式，是没将“群众”加入自己的思想，只是墨守成规的“天动说”思想而已。“从一开始就没有把现实社会作为一种必要。”[231] 总之，在吉本看来，思想一贯的人就是旁观者。

在这里吉本所赞赏的是中野重治的自传体小说《乡村之家》。这部小说中的主人公因为转变了立场，虽然身负战败之伤，但通过与象征日本封建制的家庭、普通庶民形象的父亲对抗，继续自己的文学表达。

如第六章所述，1947年福田恒存对狱中没有转向的干部进行的类似批判，但仅被视为一种保守反动而受到忽视。虽然在1958年，年长的共产党知识分子反驳吉本在战争期间也就是10多岁，他的理论是在不知道思想压制真相的情况下创造出来的，但总体而言，吉本的思想主张，不仅在年轻人中，而且在对共产党持有蔑视态度的年长知识分子中得到了支持。

拥护共产党的花田清辉对吉本发起了论战。论战的起因是二人在处理文学战争责任问题的1956年座谈会上发生的冲突。而且在这个座谈会中，逐渐显现的是花田和吉本之间在文学和政治关系的想法上存在的巨大差异。

在这次的座谈会上，花田主张“对文学的政治性评论，是以这个作品对现实的变革有多大贡献来衡量的”。[232] 像战前的多数社会主义者遭遇的那样，在战争期间花田也被迫在军事工业报社这种御用机关工作。但花田主张，自己一边伪装思想已经发生转变，一边对为改善工人悲惨状况而提高劳动效率这一当局所谓的建设性提议进行批判。

如第二章所述，这种“建设性”的批判是战时知识分子勉强进行的一种抵抗。在战败时已是36岁的花田看来，主张“当时为了躲避压制，在下发的纸张的四分之三上写着赞美战争的文字，剩下的四分之一上间接地写着对当局的批评，当时的读者对这种事情也相当理解”。而且花田谈道，“反抗必须拥有对现实产生作用的力量”，并主张“自己所写的报道对生产的合理化和改善工厂卫生是有贡献的”。

但在吉本看来，生产的合理化就像是米泽时代讲师那样的“社会法西斯者”理论。在吉本看来，语言表达作为一种表达而“成立”是一种最大的抵抗。问题不在于语言表达对“现实”产生了怎样的作用，甚至可以说被称作伪装抵抗这种“扭曲”的语言表达才正是批判的对象。因此吉本认为，即使只是表面上主战的伪装表达，花田也应该对由此而受到欺骗的“大众负责”。

对此花田说道，以语言表达进行的抵抗本身不过是一种“宽慰”，接着又反问道，难道有“客观数据”可以证明伪装的非本意表达就是欺骗“大众”？而在吉本看来，“对大众的责任”是文学表现的伦理问题，“即使没有一个读者”，这种责任还是会作为“表达本身自带的责任”而产生。

面对这一回答，手足无措的花田反驳道，“你这完全是以个人主观经历来看待我的作品”，“没有考虑作品和大众的关系”。吉本进而反论道：“我自己”就是“大众”，以我自己的经历来质问语言表达“对大众的责任”是很正当的。总之，对吉本来说，“大众”这个词指的是语言表达

与现实、思想与行动一致的状态，他正是从这点出发对花田的“伪装”进行攻击的。

在吉本与花田的辩论中包含很多实质性内容的只有这次座谈会。之后连续多年的“论战”，都是吉本对花田的痛斥、谩骂，例如指责花田是“思想转变了的法西斯”、“老顽固”。尽管如此，人们依旧为吉本喝彩，这场论战作为共产党权威下降的象征，是战后的文学史上最重要的论战之一。

可以说吉本之所以备受瞩目，在于他的思想本身具有的价值，更在于民众对降低共产党权威的期望。战败十多年后日本开始进入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即使身陷囹圄也绝不转变思想——这时的知识分子开始对勾起令人悔恨的战时记忆的狱中非思想转变的神话感到厌恶。曾在六全协上批判共产党的转变并退党的原共产党员也为放弃了社会变革的梦想而感到内疚。对这些人来说，唤起他们罪恶意识的“正义”被摧残破坏的情形也减少了他们的罪恶感。可以说吉本充当了消除战争给人们带来的悔恨这一催化剂的角色。

同时，对于那些不了解战争的年青一代，特别是在那些对抗共产党的新左翼年轻分子眼中，吉本是敢于与共产党和老一辈权威做斗争的英雄。而且，吉本承认自己曾是狂热的“皇国青年”，这一点也作为一种崭新的形象为开始对“战后民主主义”、“和平”感到厌倦的年轻人所接受。

然而在1950年代，吉本所攻击的“正义”只有共产党。他所批判的“民主主义文学”，并非一般意义上赞美“民主主义”的文学，而是战败后共产党系文学家们以“民主主义文学”之名撰写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延伸。

但进入1960年代，吉本开始将矛头指向以丸山真男为首的非共产党系知识分子，其对“战后民主主义”的批判已不局限于共产党。这种转变

的契机是1960年的安保斗争。

安保斗争与战死者

进入1960年代之后吉本的思想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其背景是经济的高速增长。

在《高村光太郎》中被视为吉本典型转变期的是1955年前后，在这之前他一直强调日本社会的“后进性”。但是在1959年与花田的争论中，吉本强调“日本不是后进国家，而是已经确切无疑地成为一个高速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233]

此外，1956年底吉本与一位挚爱的已婚女性结婚，不久之后他也成了父亲，慢慢过上了安定的家庭生活。他因与花田的论战受到《近代文学》杂志的奖励。听说他用部分奖金购买了一台洗衣机，[234] 高速发展的经济不断改变着吉本自己的生活。

在安保斗争不断高涨的1959年11月，吉本发表了题为《致忧国的文学家们》的评论。在评论中他反对进步学者在给《新日本文学》的投稿中将安保条约修订定位为“民族”危机的主张，提出“经历了战争的这代人，本来就是被所谓个人必须服从于民族或者国家幻想共同体利益的神话困惑和束缚的一代。我们这一代经历过战争的人在战后社会的战斗，就是尽全力打破考虑如何将国家、民族体制化的思想的幻想性上”。[235]

一方面，吉本批判那些标榜“民族的危机”的文学家。另一方面，吉本也将“大众”的“生活”作为反安保的依据。也就是说，修订安保条约并不是日本从属于美国的象征，而是日美两国间“美国独占并支配日本的象征”。由于这个独占资本——美国的剥削，日本民众的“生活受到侵蚀”，到那时“大众即使不受这些文人学者所谓日本人之屈从、民族之危机之类言论所驱使……侵犯个人生存权，人权这样的国家法律等一旦发

展到关系到个人切身利益的地步，大众也绝不会服从的”。[236]

在此体现出吉本“大众观”的微妙变化。确实，吉本在这之前也通过“大众的生活”对知识分子进行了批判。但那时的“大众”是孤立西欧式知识分子的“后进性”的象征，而且应该是指狂热信奉政府的战争口号而奋战到底的受害者。但到了1959年，日本社会“后进性”被否定的同时，他主张“大众”为保卫自己的生活而拒绝政府的战争口号。

可以说对吉本来说，存在两种“大众原像”。其一就是狂热追求战争，逼迫吉本陷入孤立的米泽时代的同窗好友和战死者；其二就是说服了一直主张服兵役的吉本的父亲，以及庆幸战后余生、回到家乡的士兵。

这两个完全矛盾的“大众原像”其实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吉本厌恶的“扭曲的结构”，也就是两者都不具备从思想和行动的分离中产生的罪恶感。前者的“大众”信仰战争口号战斗到底，后者的“大众”淡然拒绝战争口号从而守护生活，就这两点看来它们都不是“扭曲”的存在。

这两种“大众原像”也是吉本内心思想分裂的投影。其一是相信战争口号，被生死问题所困扰的自己；其二就是对战败投降安之若素，在一片废墟上谋生的自己。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生活安定，吉本内心中前者的“大众观”逐渐消失，后者的“大众观”占据了主导地位。

这样吉本在1960年的安保斗争中支持的是共产主义者同盟。据吉本说，与把安保条约视为对美从属问题的共产党不同，共产主义者同盟是用“总体视角”将安保看作日美垄断资本政策，因此摆脱了“国家强制力和民族封锁性”。[237] 也就是说，共产主义者同盟已实现了将世界的一切吸收到思想中这样一种“自立”，且毫不动摇，并冲破了神与国家的权威，达到一种自由的状态。

共产主义者同盟原本就批判在六全协上日趋稳健的共产党，并提出更为激进的革命路线及彻底的斗争，因此它与爱好“毁灭性的彻底斗争”及“暴徒”的吉本很容易达成一致。这样在安保斗争中，吉本作为支持全学联主流派的知识分子而受到关注，他在得到学生支持的同时也受到共产党的谴责。

在1960年的安保斗争中，打着“反美爱国”旗号的共产党，诱使游行队伍到美国大使馆，致使冲入国会的全学联主流派变得孤立无援，这一事件令吉本十分憎恨。在吉本看来，虽说对共产党和民族主义十分反感，但对奋不顾身投入战斗的年轻人弃而不顾这一点，是不能被原谅的行为。安保斗争之后，吉本写道：

> 我们过去应该经历过这样的情景吧？参军入伍的青年及人民群众在战斗中牺牲，而将领们却保住了性命。现实生活中的群众阵亡而“知识分子”生还。……拼命奋战的人死去，而没有战斗的人却苟活着！[238]

当然这里所说的“大众”是对战争狂热且战死沙场的“大众”。如此，吉本对“不顾组织性的毁灭而战斗到底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给予高度赞美，称他们是“奋战而‘死’的行动者”，同时对6月15日全学联主流派的游行队伍做出了这样的评价：“新国际主义的漩涡。”此外，“我现在所关心的只有安保斗争中的伤员，尤其是重伤员。是啊，死者再一次重重地沉到了我意识的深处，大概与太平洋战争中的牺牲者的样子重合了”，吉本写道。[239]

安保斗争结束后，吉本发表了题为《虚构的终结》的评论，这让他声名日隆。这篇文章收录在吉本、谷川雁、黑田宽一等得到新左翼势力支持的评论者总结1960年的安保斗争而合著的《民主的神话》中。之后吉本批判了共产党和进步知识分子未进行彻底斗争而是作为旁观者的行为，并将“民主主义的神话”作为“虚构的”而加以解体。

在评论中，不仅共产党，以丸山真男为首的非共产党员知识分子也

作为“市民民主主义派”而成为攻击对象。理由之一是他们没有对全学联的直接行动进行全面评价，另一个理由是他们强调安保斗争中实现的民主主义，并称之为“胜利”。在吉本看来，不进行彻底斗争的人没有受过失败的痛苦，而他们却讴歌胜利，这种做法是很难被原谅的。

原本在吉本看来，与斗争相关的只有三种人。第一种是彻底斗争，思想与行动一致的阵亡者；第二种是从战争中幸存下来，怀着失败痛苦的生还者；第三种则是旁观战争，全身毫发无损的“指挥者”和“知识分子”。对吉本来说，讴歌“胜利”之人的存在只不过证明了自己是旁观者这一事实。

竹内好回忆道，在安保斗争高潮的1960年5月底，他与吉本在一次集会中进行了激烈论战。对竹内而言，“对峙的关键点是，我主张计划的必要性”，而吉本认为“计划无用”。[240] 原来信仰“谁会为结果而行动”的吉本，在安保斗争中却志在“毁灭式的彻底斗争”。

然而与此同时，吉本也在1960年安保斗争中面临一次思想危机，即他不得不重新探讨自己对于在这次安保斗争中“战死”的认识。

在1960年的安保斗争中，吉本在各地进行巡回演讲，也参加了支持全学联主流派的示威游行。在桦美智子死去的6月15日当天，他与全学联主流派一起冲入国会内部，在国会内部召开的集会上进行了演讲。然而那之后，吉本和学生迅速被警察队追捕，逃到附近的警察厅里。吉本被拘留几天后便被释放出来，见到前来接他的妻女才安心下来。

1960年底，吉本在回忆6月15日与警察的互相推搡时说道：“我当时不得不绝望地以为自己必死无疑了。”[241] 正如第十二章所述，鹤见俊辅在安保斗争中已做好了死的心理准备。然而，尽管吉本呼吁进行较鹤见更为过激的斗争，却从相互推搡的混乱中逃了出来，被捕之后得以生还。即他与在战争期间经历的一样，在安保斗争中也没有牺牲。

吉本在1961年对自己进行了关于“安保斗争的心理的总结”。他说，安保斗争中印象最深刻的是“我在警察的棍棒和追赶下逃跑时的屈辱感和挫败感”。[242] 从警察的棍棒下逃出，到看到妻儿时的心安，从这一路的体验中他明白了自己“并没有做好去死的心理准备”。[243]

这对吉本来说是思想上的危机。一向批判战时不能抛弃一切而全身心投入的知识分子的他，战后通过类似的经历，意识到“自己对战争和死的所谓心理准备，存在许多虚假的破绽”。吉本于1961年写道：

> 从15岁到20岁，也就是太平洋战争期间，我是一介文学青年，曾认为即使战死也可以，觉得死无所谓。然而，在战后15年的时间里，我对生活的执着日渐增长，或许已不是从前的自己了……[244]

战败时只有20岁的文学青年吉本，1960年时已经是一位35岁的父亲了。比如，在第三章提到的渡边清写道：“不想被那些阵亡的同学责备为‘只有那家伙一个人没事’。”我们在第十一章介绍过的原飞行员说道：“想起那些加入特攻队并为国捐躯的年轻队员，而自己却苟且偷生过着悠闲生活，这简直无法忍受。”一直享受经济高速发展下天伦之乐的吉本，又应该以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战死者留下的那句“吉本啊，你这是在走自己喜欢的路啊”。

对此，吉本的选择是为了“走自己的路”而否定战死者。他继上文之后又这样写道：

> 此时，在我的心中，涌现出对不同道路的感慨。一个是战时的我，可以说好像完全不明白人是什么，活着又是什么，这一点是十分清楚的。首先要说明的是，这不是伦理道德问题，而是事实问题。……另外一个答案就是对死的认识，思想的最后总是能否接受死亡的问题，不管怎么说，不怕死就是强者这种想法想必是错误的。[245]

吉本所谓的“战死”也是在思想上对权威的从属。当然，这是米泽时代的吉本对借助学长和知识分子的权威而被迫入伍的“武断派”学生怀有

的感情的延伸。

这一总结，显示出了吉本思想上的重大变化。直至1950年代，吉本在思想上无条件地肯定“战死”。在意识到自己还没有做好死的思想准备的1961年，吉本并非认为自己“已不是从前的自己”，而是开始渐渐对“战死”持批判态度了。

如此一来，吉本的“战死观”就发生了变化，并与前述“大众观”的转变发生关联。所谓“大众”是思想方面由誓死战斗转向了解决“扭曲”而存在，或者在保卫“生活”拒绝思想的方向消除“扭曲”而存在，是与肯定地描写战死还是否定地描写战死不可分割的。

于是，吉本的“大众观”发生转变的1959年，也是与吉本同时代的梅原猛赞赏着和家人一起吃的“天妇罗”，创作了批判“死的哲学”的文章的年份。在经济高速发展中，和妻子一起“生活”的吉本，逐渐失去了对“战死”的渴望。

吉本自身也意识到了这是一种“转向”。他在1966年写的评论中提到想起了和同时代的桥川文三的谈话。已经成家的吉本，反省战时的自己，直陈自己不明白送儿去当兵的家人之间问候之沉重。桥川听后，面对曾经要求入伍而令父亲头疼的吉本，笑着说：“那就是思想转变。”吉本听了之后“呵呵地笑，像是在说单身的你懂什么”，却对桥川的话“微妙地留下了深深的印象”。[246]

1960年安保斗争以后的吉本，开始转向介入“大众生活”，拒绝一切理念。在吉本1965年的一次演讲中，大众被认为是“只考虑与自己生活相关的思想，而不考虑国家权力会如何变化”的存在，并肯定“空想家在大众中间煽动战争，或宣讲廉价的和平理论，大众都不会予以关注”的做法。[247] 这种大众形象的典型，想必就是成功劝说吉本不要抛弃“生活”而参军入伍的老吉本吧。

吉本也对那些“批评大众的绅士们”进行了批判，[248] 而最具代表性的是丸山真男。吉本在1960年安保斗争以后，坚决而果断地批判了丸山真男。

吉本从两个角度批判了丸山真男。一是对战争持批判态度但不坚决的丸山，在思想上并没有全心投入，只是一个旁观者。从“满是同胞鲜血的身影中”孤立的“大众思想，是不能一蹴而就的”。[249]

吉本对丸山的批判，受到对知识分子的权威感到厌恶的年青一代，特别是与丸山等大学教授对立的全共斗运动的欢迎。然而，揭发过去协助战争是吉本擅长的手法，但他没有使用到污点很少的丸山身上，“作为陆军一等兵参与战争的丸山”只是稍稍受到了批判。[250]

吉本批判丸山的另一个角度是，拥有特权的知识分子丸山是斥责“大众”的空想家。作为其中一环，吉本在《民主主义的神话》收录的评论《虚构的终结》中，提到了《中央公论》1960年8月号刊登的对丸山的采访《八·一五和五·一九》。

如第七章所述，在这个采访中，丸山把战后的思想潮流概括为从“臣”到“民”的大量回归，“民的‘私’化的方向”，是批判对政治漠不关心的“个人享受”。丸山把在1960年安保斗争中被打破的东西称赞为民主主义开始根植于日本的征兆。

但吉本把丸山这样的见解批判为“这是虚构民主主义的典型思考方式”，“巧妙地象征了日共上层所发起的一般性潮流”，并写道：

> 在战后像黑市那样的混乱和自然权性的废墟中，自然会产生部分社会的利益优先于全体社会，“一己私利”优先于部分社会的意识。……丸山将这种私利当先的意识视为对政治漠不关心的一派而加以否定评价。但恰恰相反，这才是构筑战后“民主”（资产阶级民主）的基础。除承认这种基础具有良好的前景以外，战后日本社会应当被赞赏的进步是不存在的。既没

有对组织如神明一般的崇拜感，也没有对国家权力的集中意识。[251]

对吉本来说，战后产生的“与其考虑社会的整体利益，不如优先考虑自我的‘个人私利’”的这种自立意识，以及之前丸山所批判的“毫无干劲且逆来顺受、赤裸裸地奉行利己主义”才是真正的“民主”。[252] 在1960年安保斗争中认识到自己并没有“面对死亡的心理准备”的他，开始主张只有优先“个人私利”，才能有无视国家和神的权威的“自立”。

如前所述，丸山在采访中所说，“市民”与职业政客不同，应该部分地持续性地参与政治活动。但在吉本看来，一旦参与政治，就要战斗到底，部分又持续性地参与不过是不彻底的“旁观者”而已。此外，丸山把部分参与政治的“市民”形容为“在家修行的佛教徒”，不难想象这更加刺激了吉本。

对吉本来说，既然明白自己没有“战死”的心理准备，就只能从政治上全面撤退。他在1961年写下了题为《颓废的引诱》的文章，他在文中宣称，与其参加政治集会，不如“睡午觉”。“睡午觉至少也相当于零；全面否定是正数，而发动人民民主主义革命、结构性改革、反帝反斯大林主义、建立无产阶级政党是负数。”[253]

在吉本看来，丸山批判沉浸于私生活的思想能使他想起战死的同学所说的那句“吉本啊，你这是在走自己喜欢的路啊”。对吉本来说，无论是共产党，还是丸山真男，只要是使自己对“走自己喜欢的路”感到罪恶的，都是必须否定的。

这就是由“私”导致的“公”的解体。虽然这种“私”的取向是在战败初期出现的一种社会现象，但很多战后知识分子对这种现象持批判态度。因“私”而导致“公”的解体这一思想是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前夜，在批判“战后民主主义”的过程中演化来的。

这样在1960年安保运动之后，吉本完成了方向的转变。此后的他，出于对“私”的赞赏，逐步走上解构一切“公”的理念的道路。

反抗国家的“家庭”

在1960年的安保斗争之后，吉本与同伴一起在编辑杂志的同时，撰写了大量政治评论，批判一切政党。产生于1960年代的无党派市民运动，对吉本而言，不过是追随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权威的运动。他评价越平联“是呼应社会主义国家阵营的伴随性运动。所谓伴随性运动并不是自立的运动，其本身也不是能够囊括整个世界的运动”。[254]

本来吉本就不喜欢以“和平”为取向的运动，他认为如果反越战的话，“要么粉碎南越政府，要么就是自身被粉碎，除此以外别无他途”。既然如此，在日本倡导越战停战的人就是“安全的‘第三者’”，不过是旁观者而已。[255]

但吉本并非支持越南民族解放战线的一方。吉本认为，支持第三世界的革命运动不过是“在全世界寻找列宁古典时代的‘帝国主义’的模范区……并在后进地区的民族主义斗争中将其发现”。[256]

1960年代以后的吉本认为，日本的进步派是“相对于秩序而言的反秩序”，是所谓的“秩序填充物”。在那种结构下，“如果进行现实运动，必定进入某种秩序中”。[257] 战后的右派和左派是“相互对照的镜子”，在战争中“明明活了下来，却不知自身对死去的大众所犯下的罪与罚的斯大林主义左翼分子和自由主义者”，以及“没能死成的右翼分子”，“不管哪方取得胜利，都没有任何思想层面上的意义”。[258]

对吉本来说，“所谓真正反秩序，并不是因存在秩序而故意反秩序的行为，是绝对的，也就是精神及存在上都与秩序发生冲突的东西”。[259] 当然对吉本而言，因感性的“向上取向”而具有伦理及理论的是一

切“秩序”，是服从神或国家权威的东西。这样最终的“反秩序”，就成了不为伦理和负罪感所动摇的“自立”状态。

1960年安保运动以前的吉本，在到达世界彼岸的“死去的大众”中谋求这种“反秩序”，通过战斗到底的行为消除了思想与行动之间的“扭曲”。但是1960年以后的吉本，虽然同样使用“大众”一词，其内涵却不再单指战死者，而是从一切“公”的秩序中发现了不变的“私”的生活。

当然，这里的“私”并不是像丸山所倡导的那样，是作为近代责任主体的“个人”和“市民”。如第十六章所述，在1960年代的反越战运动中，鹤见俊辅和小田实等人提倡超越国家的“人”和“市民”的思想。但吉本在1966年的演讲中主张，“所谓尊重市民社会中的个人特殊原理的意识……必须置于近代国家这一前提之下”，“个人原理超越国家原理的这一论调，不过是自相矛盾”。[260]

吉本一直对上文中的“市民”进行批判，强调“然而所谓的大众并非如此”，“那真是超越了国家本身”。所谓“大众”是指因为不考虑“多余的事情”而与“感性的秩序”无缘的存在，是对政治毫不关心的“私”。

在1963年的评论《模仿与镜子》中，吉本将“政治”作为需要被解体的事物，对“大众漠不关心政治的力量”加以称赞。他认为，正是“因生产的高速化而形成大众社会的力量”才“促使斯大林主义解体”，这是“值得肯定的象征”。于是他在1961年主张，应当拒绝靠唤起弱者的罪恶感来引导其向党献身这一“《前卫》的交流方式，而是应当朝着生活实体的方向实现自立”。[261]

但吉本同时也清楚，仅仅从战时的经历中依据孤立的“私”是无法对抗孤立感和罪恶感的。于是吉本发现了一个共性，那就是曾把他从“战死”中拉回来的家人。吉本在1960年代中期开始把家人和恋爱关系作为超越国家的“私”的共性加以赞赏。[262]

首先，在1965年的评论《自立的思想根据》中，吉本提出了其独特的国家观。他认为，国家与马克思主义所说的生产方式的发展等无关，“具有其自我发展模式的虚幻共同性”。[263] 当然他所说的“自我发展模式”是他在诗论中主张的，“从人性到神性”这一感性的“向上取向”，也正是“变得多虑”这一状态。于是从1966年开始，吉本开始提出“个人幻想”、“对幻想”、“共同幻想”这些图式。

吉本认为，相对于个人的“个人幻想”、以国家为首的共同体的“共同幻想”而言，“对幻想”是作为他人的男女相互恋爱中创造出来的东西，不能被划分为个人意识与共同体意识中的任何一类。因此，与近代国家与近代性个人相互依存的关系不同，“因为家这种东西是以对幻想为本质，所以相对于个人幻想，以及作为共同幻想的国家而言，具有特殊的相位”。[264] 这与他曾经主张排除沉浸于自我和服从他人的二选一、倡导“自立”的情况类似。

当然，“家是以对幻想为本质”这一定义是以恋爱结婚成立的近代家庭为前提的。吉本展开了上述思想并于1968年出版了《共同幻想论》一书。对此，当时人类学家山口昌男指出，这本著作虽然论述了古代的共同体意识，但吉本所指的“家”难道不是近代的小家庭吗？然而，吉本一方也只是骂山口“是一个流氓一样的文化人类学家”。[265]

吉本早就在1950年的笔记中就提出，“人类拥有被支配秩序驯服的精神秩序”，并在列举了“声名欲、金钱欲、支配欲”后指出，“因此性欲是最纯粹的欲望”。[266] 吉本还在《高村光太郎》一书中，讲高村同“新女性”智惠子的恋爱生活，将其描述为与“日本封建制”的对抗。

在《高村光太郎》一书中，吉本将“家”的存在作为与自由恋爱敌对的“日本封建制”的象征来进行批判。但在1960年代之后，吉本渐渐将“家”视为恋爱的归宿，并把家作为在国家中保持自立的共同性加以赞赏。这种思想上的变化与吉本个人的恋爱与家庭生活的轨迹重合，[267]

同时也与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家”的印象的急速变化相契合。

对吉本来说，“家”被视为不仅是与国家，也是与“神”对抗的一个存在。在1960年提出“共同幻想”这一概念的题为《国家·家·大众·知识分子》一文中，吉本引用《新约》中《马太福音》的“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作为开场白。吉本把这句话解释为“‘神国’与“家”是放在天平两端的砝码，人只能选择其一，别无他法”。[268]当然，《马太福音》是他在《叛逆的伦理——试论〈马太福音〉》中为了批判“神的论理”而论述的一本书。

此后，吉本的“家”的共性，并没有与国家放在一起思考。他在1968年主张，“无论怎么将‘家’的共性汇集起来，都无法成为‘社会’与‘国家’的共性”，并批判了使用“家族社会”或“家族国家”这类概念的知识分子。[269]

吉本的《共同幻想论》一书，就是以这种思想为基础，批判性地论述了记纪神话和古代国家。当然这不能将记纪神话与天皇、国家分离来看，这反映了他那个时代的一种设想。

吉本的古代取向在之前就十分明显，他在1952年的诗论中主张“自我问题并不是源于近代精神的谱系，必须作为原始社会制度下人类的自我问题来加以解决”。在自我问题易被看作近代资本主义制度问题的1952年，这一主张曲高和寡，应者寥寥。[270]但1968年乘着“近代主义”批判的东风，《共同幻想论》成为年轻人追捧的对象。

但吉本的文章中充斥着很多“自立”、“抒情逻辑”这些独特的感性用语，也有很多逻辑上的跳跃。因此，1960年代富有战斗性的学生并没有注意到吉本赞赏“私生活”的部分，大家都将目光投到批判共产党与“战后民主主义”的地方，以及解读论述国家及天皇制的部分，并将他视为敢于反抗共产党和国家权威的激进思想家。

但在当时，对吉本的思想抱有疑问的人也不少。1960年代与吉本对过话的人，都不约而同地将矛头指向吉本的“诗的立意”与“宗教性”。

比如竹内好就认为，吉本的论述方式是“非常文学性的，或者说是诗的立意”。鹤见俊辅说他“否定一切”，追求纯粹，“很有宗教性”，吉本对“虚幻”的批判是“被重新解读为‘打倒一切虚妄的东西’的口号”，“结合了学生喜好纯粹性的倾向”。[271]

在1966年与江藤淳的对话中，吉本这样解释自己的态度：改变时代的是“将死之时，有很多家人及兄弟姐妹，在那样情况下的思想”；“文学的话，就是我不知道世界会如何改变，也不知道时代会如何改变。但只要时代和世界存在，就只存在于我内心之中”。通过这种文学“将外界纳入自己的内心世界的，只会去改变那种东西”，“思想这种东西”“事实上不需要他者”，“只要能包含整个世界，那么不管事态如何发展，他人如何说，都不会动摇”。[272]

对此，江藤回应道：“诗是能让世界消失的事物”，“事实上，有很多人做一些让世界消失的事却认为是在做贡献”；“所谓绝对的反体制的梦想，难道不是被寄托于政治当中的你自己的诗吗？”此外，江藤指出，虽然吉本批判“民主主义的神话”，但是在年轻人中“类似吉本神话的东西正在不断形成”。[273]

对于江藤的上述意见，吉本表示，“或许是因为无法到达，所以才看起来十分客观”，并认为语言表达的完成度应该更上一层楼。[274]然而，批判感性的“上升取向”，谴责那些在狱中未放弃立场的共产党干部，“从一开始就没有把现实社会当作必须”的人，正是吉本自己。

然而如前所述，吉本的著作不能说易于理解。当时作为全共斗派学生的吉田和明回忆，“那都是像我们这样的学生难以读懂的书。并没有理解清楚事实”。当时还是一名大学生的社会学家樱井哲夫谈到《共同

幻想论》时说："明明无法理解，却飞快地跳读，书中能被理解的地方很少，却也装作读懂了全书的样子。" [275]

尽管如此，在吉田看来，在当时的大学里，将吉本的著作"抱在胸前走路在男女学生之中十分流行"。吉田认为，这是由于学生们即使无法理解书的内容，其中超形象的部分也会使其"心中感觉""仿佛在读诗一般"。[276]

的确，吉本的文章中包含很多当时青年喜欢的要素，批判年长一代伪善的纯粹性的倾向，赞颂"高唱毁灭性彻底斗争的战斗姿态"，反抗国家与共产党的权威，与封建的"家"的对立和对恋爱的赞美，以及"自立"的口号。最重要的是将否定一切权威，把"走自己的路"这一吉本的思想负担正当化，"就如同读诗一样"在学生中传播开来。

据吉田的回忆，虽然吉本的著作中从来没有出现"大踏步迈向革命、鼓动、兴奋"之类的词句，"却与看高仓健的电影有着同样的壮烈、爽快的感觉"。[277] 如第十三章所述，当时高仓健主演的黑社会电影，受到全共斗学生的广泛欢迎。吉本痛骂论战的对手，强调失败的伤痛，富有战斗性的浪漫主义，使学生认为他是一个敢爱敢恨、快意恩仇的英雄。

吉本在1959年的评论中，将自己这样的"战时派"形容为挑战"战前派"权威的"不孝之子"。[278] 当时，受到全共斗年轻人普遍支持的思想家是吉本与三岛由纪夫。这两个人，都怀有一种对被免除兵役的罪恶感，在塑造一个视死如归、战斗到底的"皇国青年"形象上，即作为"战时派"，有共通之处。

在全共斗运动的顶峰时期，吉本经常有狂热的粉丝伴随左右，有人用长篇大作来论述吉本，甚至有人给吉本写信之后切腹自杀。有一个粉丝甚至经常纠缠至吉本的家中，吉本在形容他是"以自我为中心，完全

不考虑他人”的同时，也说“他身上有几分我的影子”。[279]

吉本自己对全共斗运动的评价是：“与反越战运动相比，我更‘喜欢’大学的斗争。”[280] 作为赞赏“暴徒”、喜欢不计后果的“毁灭性的彻底斗争”的吉本，这是一种自然的反应。批判一切政党的他，起初也批评学生运动家是“学习毛泽东的笨学生”、“没有自知之明的愣头青”，但当全共斗与丸山真男等知识分子发生对立时，他又攻击丸山一方。[281]

但是，吉本对局势的认识十分悲观。他在1960年安保斗争的最高潮时认为这场斗争最后会“败北”。而且，对于得到三岛由纪夫赞赏，并被部分全共斗学生评论的“二·二六事件”，他写道：“恐怖主义者被简单看成是单纯、偏执、缺乏社会阅历的年轻人。不考虑利害关系，不计后果，缺乏逻辑、理性和计划而采取的行动，不可能使已经资本化的城市平民行动起来。”[282]

本来，在吉本的世界观看来，只要斗争开展了起来，就应该只有“失败者”、“胜利者”和“旁观者”三类。在吉本的思想中，如果欢呼胜利的是旁观者，战死是不可避免的话，“毁灭性的彻底斗争”之后，就要舔舐着失败的伤口活下去。于是，与吉本产生共鸣的全共斗年轻人似乎把“失败”作为自己的目的，来进行“毁灭性的彻底斗争”。

脱离“战死”

在年轻人不顾“家”的温情而投身游行的全共斗时代，吉本作为一名以死抗争的反体制思想家广受欢迎，而对于“私”和“家”的赞赏却丝毫不引人注目。令这种情况发生变化的，是与全共斗运动退潮同时发生的，1970年三岛由纪夫的自杀事件和1972年的联合赤军事件。

1970年11月，在自卫队市谷营地，三岛由纪夫在倡议自卫队队员发动起义之后切腹自杀。该事件对呼吁采取直接行动的全共斗学生产生了

很大影响，有人对此事的反应竟然是“被三岛由纪夫抢了个先”。

吉本也受到这一“战死”的冲击，并表示“这对我有一种‘你究竟都干了些什么啊’的压迫感”。[283] 然而，吉本最终表现出与1960年安保斗争时同样的反应。那就是，并没有批判没有战死而苟活下来的自己，而是批判了为思想殉葬的人。

吉本在承认受到三岛自杀冲击的同时，将其“作为政治性行为缺乏预见的拙劣”、“只是充满悲情的‘檄文’和‘遗书’的无聊”作为文学表达方式进行了批判，并主张“只有动物才会知行合一”。[284] 本来对吉本来说，思想与行动一致的“大众”是一种接近于食草动物的存在。然而，这种对三岛的批判，与之前攻击年长一代的“两面三刀”、批判他们是“扭曲的结构”相比，显示出吉本在经历三岛“战死”之后态度转变的倾向。

此外，还有1972年2月发生的联合赤军事件。吉本曾对1960年安保斗争中视死如归、战斗到底的全学联主流派大加赞赏。但在联合赤军事件中，他却对“战死”的年轻人表现出不同的态度。1972年7月，吉本做了题为《联合赤军事件》的演讲，他说道：

> 这是我自己都不太想去回忆的事情。在战争期间，我这一代人或下一代人，参军入伍后，只是稍微接受了些训练，就驾驶飞机进行自杀式攻击而灰飞烟灭。目睹这一切……“自己无论如何都是比不过这些家伙”的自卑感就充斥于心中。真是令人无法忍受。……我心想，自己是不是不该再去上学了。
>
> 当时的我，是无法找出任何依据证明那是不行的。我在战后对此进行了深刻的思考。[285]

三个月后，吉本又进行了一场题为《战后思想的堕落与危机》的演讲，再次提到了联合赤军事件。他说道：

> ……要说什么是战后最重要的问题，我想是与“公”相比“私”更为重要，

与国家相比每一个个体更为重要，也就是说明天“私”是什么样子比明天“公”是什么样子更加重要，这是最基本的常识。

……然而，战后已经过了几十年了……人们都认为“公”比“私”要更重要，国家比个体更为重要。意识形态究竟如何已经无人在乎了。[286]

在1960年，丸山真男被视为“战后思想”的代表，与之相抗衡的是主张“私”优先论的吉本。而吉本自1972年开始，主张以“私”为优先的思想才是“战后思想”。

这样，由“私”的出现而导致的“公”的解体这一理论在1960年作为对“战后思想”的批判出现，1972年获得了作为“战后思想”的地位。对此，吉本断言那些对注重个人生活的人施加负罪感的所谓战死者的存在是不可取的，并表示：“只要走自己的路就好。”

这也意味着一直被战死者的记忆所困扰的吉本的“战后”的结束。以联合赤军事件为契机，“政治的季节”终结了，在经济高速增长期广泛被接受的生活保守的潮流最终稳定了下来。这样，优先“私”的新的战后思想在“战后”结束同时出现了。

吉本的这一“战后思想”，使那些对过激的新左翼运动感到失望、希望回归正常生活的年轻人产生了共鸣。而且，吉本摒弃对“公”的关心以及对弱者的负罪感，完全沉浸到家庭生活，是超越国家而进行的终极的“反秩序”，构筑了“自立”这一逻辑。曾对吉本的战斗态度产生共鸣并参加了全共斗运动，最后因失败而受伤的年轻人，在1970年代以后掀起的构建“新家庭”的潮流，也是与该思想相一致的。

之后的吉本不断写出肯定大众消费社会的评论，与此同时继续批判一切政治运动。无论是对第三世界的剥削的批判，还是对亚洲发动战争的责任论，在吉本眼中都可以被看成煽动罪恶感的新的“神”的出现。在1980年代的反核运动和反核电站运动中，吉本也进行了强烈批判。但随

着共产党和政治党派丧失了权威，对丰富的私生活一开始就不带有罪恶感的一代人抬头，吉本的思想逐渐丧失了影响力。

正如本章开头所述，吉本的思想与其说是他个人的东西，不如说从侧面显示出综合了他这代人——“战时派”的特征。同时，其以“大众的生活”对左翼知识分子进行打击的态度，与福田恒存和小林秀雄为代表的保守论者十分接近。忍耐自我内部的“理想之鞭”，对进步派进行批判，以及在对彻底参与政治还是漠不关心之间二者择一上，虽然不是一代人，但可以说吉本基本上是与福田恒存相通的。[287]

但吉本的特点在于对诗人一般精练的语言的执着，以及对煽动他人负罪感的权威的反感而不断采取斗争的“反秩序”态度。吉本骨子里的生活保守主义的要素被这样一种战斗的态度掩盖，直到1980年代为止都未被人们所发现。恐怕他自己也并不是在完全了解自己的志向的前提下写下那些评论的。他的思想被全共斗运动所青睐以及对幻想论触动启发了日本的“家庭注意”现象，或许也出乎吉本意料之外。[288]

如前所述，吉本在1958年的《转向论》中对中野重治的小说《乡村之家》进行了赞赏。在这部小说中，因为参加无产阶级文学运动被捕之后宣称转向而出狱的主人公受到了身在故乡的父亲的责备：“听闻你被逮捕时，为父做了你将一死的准备，相反，听闻你转向之后，连你的母亲都深感失望”，“这时不要再写了，任何转向的借口都不要写了，这样的东西写出来做什么呢？”

吉本因为父亲的劝说而免于服兵役时，大概也感受到了与此类似的屈辱。因此后续下意识地也对自己的著作中是否包含免于“战死”的“借口”产生了怀疑。然而小说《乡村之家》的主人公回答：“非常清楚地知道，但还是想要写下去。”吉本对这种态度极为赞许。因此在1960年安保斗争和联合赤军事件中，每当他直面“战死”的情景时，都会不断写出试图挣脱“你在走自己喜欢的路啊”的文章。

吉本的著作也因此受到了同时代很多人的欢迎。这无疑是因为在社会高速发展中人们希望摆脱权威和负罪感的制约，将“走自己的路就好”的思想正当化。这个“走自己的路就好”的想法，或以对全共斗为首的权威的反抗，或以摆脱负罪感而享受个人生活的形式表现出来。吉本的思想促进了这样的行动，也可以说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

吉本的魅力从某种意义上说，在于各种矛盾浑然交织在了一起。彻底的斗争被提倡，享受个人生活被视为终极的反秩序；“回归大众”被倡导，到达不依靠他者的超越被视为众人所应争取的“自立”。在这种混沌之中，人们能够像读诗一般，在任何情况下找到符合自身愿望的词语。依靠这些人们的愿望，批判“民主主义神话”的吉本，其自身也被神化了。

吉本在米泽时代写的诗《原子编号二号》中吟诵道：

你们思考着并为之痛苦的事

都是空中的楼阁啊

看，你们都是

在为各种各样看不见的幻影中

探寻着，苦恼着[289]

吉本不断寻求从自己的负罪感中解脱出来，解构了战后思想构建起来的“公”的理论。在经济高速增长中，革新民族主义退潮，在作为战后伦理思想基础的战死者的记忆不断淡化的情况下，认为“个人”优先的“战后民主主义”开始广为流行。而且在这一过程中，由丸山等人倡导的“民主”与“爱国”的结合再一次被割裂开来。

第十五章 对“尸臭”的憧憬

现在，如果打开那扇门出去的话，也许死去的士兵正穿着肮脏的军服在那列队。你可能会觉得门内一侧是现实，但其实这是一个梦，站在外面的士兵才是实实在在的。是这样吧？当然是这样！

以上是江藤淳写于1965年的评论。[290] 他既是战后日本具有代表性的文艺评论家，也是著名的保守派言论家。本章将通过论述江藤淳，对与战败初期的老一辈自由主义者截然不同的、经济高速增长期以后保守论调的特征进行考察。

从结论来看，江藤因其成长经历的偶然性，产生了通过论述国家来满足个人身份认同渴望的新的保守论调。“自我同一性”（identity）一词，虽然江藤自1970年起就开始使用，但以这种说法来论述国家，在以前的保守论者中是从未有过的。而且，这种说法与作为战后思想伦理基础的战死者的记忆融入保守民族主义的过程重合。

“死”的一代

江藤淳，生于九一八事变发生翌年，即1932年。与吉本隆明一样，为了考察江藤，首先也要介绍他那一代人的普遍倾向。

被称为“少国民一代”的这一代，战败时年龄在10岁到15岁之间。战败时已经31岁的丸山等“战前派”（虽然这不是丸山那一代人的自称）自不用说，所谓“少国民一代”，他们相较于战败时已经20岁的吉本等“战时派”，受到战争与“皇国教育”的影响更深。在1943年的《东京府中学入学指南》中，列举了当时中学入学面试的口试例题：

“现在日军正在哪里打仗？这些地方中哪里最冷？对于战斗中的士兵们你有何感想？应当怎么做呢？”“怎样才能取得对美英的胜利？你又是怎样节约的呢？”“日本士兵是高呼着什么内容战死的呢？为什么？请你说说你现在正在接受着谁的恩惠，你认为怎样做才能报恩呢？”[291]

对每个孩子强硬地提出“你会怎么做”这样伦理性的问题，逼迫他们

说出内心的想法。1930年出生的佐藤忠男在中学入学考试的口试模拟练习中有过失败的经历，他回忆道：

> 口试练习中，我当着很多朋友的面，被问到“你为自己生在日本而感到幸福的理由是什么？”因为是太过抽象的问题，我没有回答上来。……
>
> ……“为什么日本必须惩罚支那？”“ABCD包围圈是什么？”“为什么飞机会飞？”等等我很擅长回答这些问题，却不知道“生于日本的幸福”这种理应充分理解的概念该用何种语言表达才好，只能呆呆地站在那里。提问的老师最终不耐地让我坐下。在我旁边的班主任觉得很丢人，涨着通红的脸瞪着我。……
>
> 那是最混账的事情。因为老师们早就准备好了“我们有万世一系的天皇”这样简单明了的标准答案。……我被单独留在教室里直到傍晚。
>
> 日落之时，小学里校园内空荡无人，昏暗寂静。这种气氛非常不好，我觉得这地方充斥着难以名状的压迫感与孤独感。终于现身的班主任看都没看我一眼，冰冷地丢下一句“连那种问题都回答不出来的不忠之徒没有继续学习的资格”后，转身就走了。态度极其冷漠，让人无所适从。被允许回家之后，我独自一人穿过昏暗的校园，心想：“这种耻辱绝不能跟家人说。”[292]

这无疑是一种极端的审问。佐藤在此后一直抱有“我难道是不忠之徒吗”的疑虑。为了甩掉这个包袱，他报名参加了预科训练班。当时作为少年的常识，觉得“反正参军之后都会战死”的佐藤，一收到预科训练班的录取通知书，立马想到“我要亲自去告诉那位曾骂我不忠之徒的老师”。告诉老师后，老师说“祝贺你，你不去上中学也许会更好呢”，“听着老师的这番话，我感受到了深深的幸福”。

然而不久之后，日本就战败投降了。对除了战死沙场以外的价值观完全懵懂无知的少男少女来说，这意味着世界的崩塌。原本鼓励自己的教师也一反常态，开始赞美美国和民主主义，这也给佐藤带来了很大的冲击。

与江藤同样生于1932年的小田实，在1951年形容自己这一代人为“用新奇的情感迎接和平到来的‘奇妙’一代”。[293] 1965年，回忆战败时的情景，小田写道：

> 比我年长十岁的人，再糊涂再愚蠢都明白，对人们来说（或对日本来说），和平状态才是正常的状态，战争状态是异常的状态。不，是一定会这样想。
>
> 但是，那个时候的我却做不到。
>
> 我所了解的只有战争。我不了解和平。和平，只存在于书本之中、别人口中。
>
> 是现实生活中，我触不可及的东西。
>
> 也就是说，和平是虚构的。
>
> 战争与之相反，是现实的、真实的。[294]

小田更是对经济高速发展下社会显示出的不协调做出如下描述：“突然之间，一切看上去都像是虚构的。”“住宅整齐地排列着，大厦耸立着，霓虹灯闪烁着，汽车一字长龙行驶着——所有的街景看上去都像是虚构的。”[295]

对于小田来说，唯有那些牺牲者是确实存在的。空袭中被烧焦的瓦砾和尸体形成足有30厘米厚的堆积物覆盖着街道，回想起那时的场景小田说道：

> 在一大片焦土上，覆盖着30厘米厚的堆积物——为了将那些处理干净，要耗费大量精力和能量。战后近20年，我们一直致力于此事。努力没有白费，那些东西不见了。
>
> 房屋、办公室、工厂，好像从来没有过30厘米的堆积物一般拔地而起。
>
> 毫无顾忌地拔地而起。接着，在那里面，婴儿降生，少年叫喊，青年

工作。

当然，他们如果早一点出生的话，或许做梦都想不到在他们的脚底下，曾经有过那么一层奇妙的30厘米吧。

想必今后也不会去想，这些东西是否会在某一时间从脚和大地之间蹭出来吧。

那样也好。

我也这么想。但有的时候，在我眼里，那一切，无论是房屋、办公室、工厂，还是那里的婴儿、少年、青年，看起来都像是虚构的。

唯一真实的，是映入我眼帘的那30厘米厚的堆积物。

我在自言自语：

那些东西去哪儿了呢？

被谁弄到哪里去了呢？

这又是为了什么呢？[296]

小田写下这一评论的1965年，也是江藤淳写下本章开头引用的那篇文章的时间。小田和江藤，虽然政治立场各异，但都怀有那一代人的共通心情。

“为了什么”这一问题，对因战败经历原有价值观崩溃的这一代人而言是无法回避的。在10岁这一年迎来战败的大江健三郎，在24岁也就是1959年时写道：“为何而死？又为何而活？有这样一个时代，在那个时代有‘为国家，为祖国’这样坚定的回答。……这种为国家的目的意识，无论如何确实是给日本人带来了类似希望的东西。”[297]

战时作为“皇国少年”的大江，曾梦见长着白色翅膀的天皇如天使一般在空中飞舞，并认为作为一名士兵20岁之前就要死去。他在战后写道：“曾经作为蔷薇色的幻影而期盼着的黄金般的20岁，如今却感到极

度空虚并不得不接受现实。”1960年，25岁的大江写道：“在和平年代，青年生活的痛苦，是背负着个人眼中的自由这一惩罚的孤独青年的烦恼。他们心存勇气却又不得不忍受这样的惩罚。然而战争年代，支撑青年勇气的是国家和天皇，这种事情是1960年的日本青年未曾经历过的。”[298]

大江初期的小说大多以这样的青年为主人公。1962年所写的《迟到的青年》，顾名思义，描述的是一个“落伍青年”在战后社会十分烦恼的故事。1964年所写的《日常生活的冒险》中，主人公参加了阿拉伯志愿军，最终自杀了。大江在1963年的《我自己心中的战争》一书中评论道：“我发现内心时常憧憬战争，也曾在第二次中东战争期间与大学的朋友们一起时刻关注着关于征集志愿军的消息，直言不讳地讲，现在的我很清楚，这仅仅是因为向往所谓的‘宏大的共生感’和连带的感情。”[299]

同样怀有这种不安感的，是1932年出生的石原慎太郎。如第十三章所述，24岁的石原在1956年的座谈会上反复说“有一种碌碌无为的虚脱感”，“因没有连带感而不断在这白忙活”，“一直思考什么样的东西才能将自己与社会结合在一起，却怎么也得不到答案”。[300]

在这次座谈会上，三岛由纪夫对石原说道：“战争使我们免除了不安”，“恐怕从石原先生这代人开始，就要面对现代社会的不安了吧”。[301] 描绘死亡美学的三岛，受到了从骨子里渴望战死的“少国民一代”的欢迎。如下所述，不管是大江、小田，还是江藤，都对三岛抱有强烈的共鸣和抵触。

但上述三岛的发言并不是“战时派”发言的典型代表，只是免除了兵役的他所独有的。参加那次座谈会的其他人也反驳道：“三岛认为没有不安，那只是因为你自己特殊吧？”而三岛本人也承认“或许是那样”。[302]

由于缺乏实际体验，三岛之死的浪漫感，反而受到不知战争为何物的年轻人的赞扬。大江和石原这一代人实际上没有军队和战争的经历，所以也缺乏目睹军中丑态的经历。

他们也因幼稚的战争观受到了年长一代的批判。就连没有参军经历的吉本隆明，也在1959年对石原、大江以及江藤的“浪漫主义”进行了批判，认为“在他们的潜意识中，正因为没有进行过杀戮而向往杀戮”，“用大江健三郎《我们的时代》中的话来说，‘在那个英雄般的战争年代，年轻人心中满怀希望，这种希望溢于言表’”。[303]

而且，即使在同一代人中，经历过空袭和饥饿的城市居民和罹患战祸较轻的地方居民之间，感觉也是不同的。战时住在北海道和湘南的石原、住在四国山村的大江、疏散到镰仓亲戚家的江藤，他们自身并没有那么惨痛的战争经历。下一章将会提到，即使在这一代人中，经历过大阪大空袭的小田实的战争观中，浪漫性要素也是极少的。

因此“少国民一代”即使在战争中受过伤，如果说要谈及战争体验的严酷性，其立场比自己上一辈还要尴尬、为难。再加上对囿于战争体验的“战时派”的排斥，他们往往倾向于强调自己是与战争伤害无关的“战后派”。

比如石原慎太郎在1956年的座谈会上，对“战时派”的三岛由纪夫和堀田善卫等人畅谈战争体验的行为提出反对，并认为“在今天的座谈会上完全是个局外人，听后觉得非常无聊”，“那场战争完全没有给我们造成任何影响”。江藤淳在前述1965年的评论中谈道，自己十分厌恶“战时派”所常有的那种“像军歌演奏般的怀旧战争文学的感伤”。[304] 吉本等“战时派”宣扬战争体验，攻击丸山等“战前派”，与此相对，石原和江藤等“少国民一代”则将作为“战时派”立足点的战争体验批评为“感伤”。

然而这一代人，与战后出生的一代不同，身上留下了战争的烙印。

竹内好在1960年谈到战争体验时说道：“甚至出现了声称自己与战争毫无关系的一代。我不同意那样的主张，他们希望割断自己与战争之间的关系这一心理本身，就撇不清与战争创伤的关系。”[305] 而且江藤虽然一方面厌恶“战时派”的感伤怀旧，另一方面却认为“战死的部队”才是真实存在的。

因此石原慎太郎他们虽然在年轻时批判“战时派”的战争体验，在自己年长之后却也喜欢向战后的一代讲述战争体验。石原在1959年批判年长一代“催人泪下的战争之伤”和“重筑过去美好时光”的愿望，然而到了1981年，他却说道：“以孩子的感觉来体会到‘战争’是十分宝贵的。”[306

这一代的另一个特征是对美国的复杂情感。如第七章所述，中学时代大江健三郎对美国产的巧克力怀有既憧憬又屈辱的混杂情感。又如第十三章所述，1931年出生的本多胜一采访越南战争，那些从美军那里得到食物的越南孩子，与战败之后的日本孩子即他们自身那一代是一样的。

1966年，大江在散文中写道：“懂事以来，‘美国’这个词总是让我百感交集，心情复杂。”他对美国的最初印象源自战时被告知“强奸和杀戮”的美国，战败之初则变成“民主主义的美国，不遗余力启蒙他国的开明的美国”，而后因朝鲜战争使“杀戮血腥的美国这一形象又在心里复苏了”。即使在大学时代参加砂川斗争之时，望着铁丝网对面物资充裕的美军兵营，“回忆起那时垂涎里面的玉米片，有着羞耻和欲望萦绕的懊恼之情”。[307]

而且美国也是决定了他们自画像的他者。有一则大江读高中时与美国女学生团体对话的逸闻：

> 她们给我看了“美国的”漫画书，书上有一幅戴着眼镜、龅牙矮子的丑陋画像。“这是朝鲜人吗？”我的一个朋友天真地问道。“不，这是日本人。”女学生也天真地回答道。“这幅漫画，特别像你们”，女学生指着我们

笑着说。于是我们在人生中第一次以非本国人的眼光看待自己。[308]

在1967年大江和江藤的对话中，大江说他主修法国文学的理由是“感觉美国化的东西从孩童时期开始被过多地渗透，与此相对，我有作为第三者去发现法国文学的想法”。江藤也回应因为“同样的理由”一度考虑升学主修法国文学，后来觉得虽然讨厌美国文学，但英国文学还可以接受，于是就选择了英国文学。[309]

大江、石原以及江藤，都各自希望能与“社会性的东西”相关联，在1960年投身安保斗争。如第十三章所述，石原写下了《刺杀》这篇散文，并得到了全学联主流派部分学生的支持。大江在安保斗争后写道，在作战时梦到“自己在以一种极其压缩的形式参与安保斗争时，仿佛体会到了所谓‘宏大共生感’”。[310]

然而，在那之后他们的人生迥然不同。在经历了“民主”和“爱国”共存的安保斗争之后，大江和小田走向“民主”，而石原和江藤却走向了“爱国”，彼此分道扬镳。

就石原来说，他倾向于“爱国”的契机似乎是越战。安保斗争后，他曾担任日生剧场的董事，又参加横渡太平洋比赛等，通过参加文体活动来避免“徒劳”。然而1966年他到南越进行采访，回国后发表了《关于祖国》的文章。他在那看到了赌上国运去战斗的越南士兵和美国士兵。他说：“我最想念的就只有我的祖国——日本。”[311]

石原在《关于祖国》里写道：“国家的理念和我的理念重合，国家的目的和我的目的重合，为同一目的拼搏的两者的行为也重合，这样的幸福，一定是青年无上的幸福。”然而，“关于参与国家历史这个事情，可以说是现代的青年不幸的命运”。石原在这之后，1968年7月竞选参议员并以第一名当选，作为自民党的极右派组建了“青岚会”。

石原所憧憬的是“明治”式的军人。石原在《关于祖国》中，把二战时期被称为“军神”、日俄战争中的广濑武夫中佐标榜为青年的偶像，他这样写道：

> ……在过去的年代里有很多像广濑一样无比幸福、美好的青年。
>
> 国家的历史在他们触手可及的范围内。
>
> 而今，大部分青年因深信日本的历史是不会顾及我们这些青年而深感绝望。
>
> 现代文学的重大命题也是这个问题。到底有多少文学作品，在描写这些被国家社会、历史、文明所疏离，历经挫折，倍感绝望的青年呢！
>
> 甚至有作家写出：“自杀，才是作为青年唯一的行为。”
>
> 然而，这种文学的悲鸣不是强推现代病的虚妄还能说是什么呢？

这里石原所批判的“某位作家”的作品是大江健三郎1959年的小说《我们的时代》。

而大江走的是与石原完全对立的道路。如第四章所述，大江把和平宪法看作战前国家理念的体现，向着使“国家理念与个人理念”一致的方向摸索前进。像是应对上文石原的批判，大江这样写道：

> ……一位青年作家在周刊上大放厥词：“每一位年轻人都怀有等待战争再次爆发的期待。”但我认为不能因为他是那个时代的学生就默许他的这种言行。
>
> 我是年轻人中的一员，但我绝对不希望爆发战争。
>
> 在那个战争时代，很多二十几岁的年轻人虽然因害怕无辜枉死而瑟瑟发抖，却又能直视死亡而勇赴战场。他们没有为日本人的历史做出一点积极的贡献，而是白白死去。……作为以这种无辜枉死结束苍白青春的他们的下一代，我们，对战争持肯定态度的行为是最卑鄙的背信弃义，是寡廉鲜耻的背叛。

> 我们经常感叹，我们迎来了那个英雄年代的尾声，所以必须更加振作，继续探寻精神的归宿。[312]

这样大江在安保斗争后倡导“为了恢复日本青年对祖国的热情，必须撤除外国设在日本的基地”，并宣称和平宪法应当占据个人道德的核心位置。[313]

同时，大江在《我们的时代》和《迟到的青年》中描写了迷失方向、倾向右翼的少年。然而1960年10月，17岁的右翼少年刺杀了社会党委员长浅沼稻次郎的事件使大江深感震惊。早前便主张“有义务再次搞垮那种纠缠我的无逻辑的、美好的英雄式冲动”的大江，写下了批判此少年的小说《十七岁》。[314]

与在越南受到“英雄式冲动”刺激的石原相比，大江在1963年去了广岛。在1965年出版的《广岛札记》里，他描写了被日本政府放任不管，任其自生自灭的受害者以及援救照顾这些受害者的医生。大江还主张“广岛有良知的人，他们对我来说是日本新国家主义中积极的个人符号形象的体现”。[315]

接下来在1965年，大江来到了冲绳。展现在他眼前的冲绳，是一个“日本所有地方中，日常会话中最常涉及宪法的地方”。[316] 也就是说，冲绳被认为是与“广岛主流阶层的人民”相同，是作为国家理念的和平宪法与个人日常生活道德相契合的土地。

然而日本政府支持越战，将冲绳交由美军统治。大江还知道，大多数到冲绳的日本本土旅行者同“从越南归来的美军士兵”一样，“都只是为了外国商品”。他听一位冲绳的中学老师说，“我想回归祖国的运动必将是一场反叛祖国的战争”。他还与高举“反对回归”旗帜的新川明进行了交流。[317] 冲绳对大江来说虽然是理想的日本，然而，冲绳人眼中的日本，与日本人眼中的美国是一样的。

这样，作为日本整个国家的象征，大江将他的故乡——四国的山村，看作自己“爱国心”的对象。1965年的美国之行后，大江在1967年再次写下了描写农村武装起义和暴动的《万延元年的足球》一书。另外，在完成描写农村民众与大日本帝国斗争的《同时代的游戏》之后，大江表达了“无论是回忆战争，抑或是进入民主主义时代，我仍感觉自己对‘乡村’有一颗爱国心”的情感。[318]

大江在抒发自己对“乡村”的爱国心时，也讲述了“即便在战败之际，也将自己的村庄武装起来，同日本甚至全世界做斗争，这一直是我心中坚定不移的梦想”。[319] 以战败为契机，发动与日本政府及美军斗争的起义这一梦想一度盛行，连荒正人、竹内好、吉本隆明等都不能例外。与此同时，对乡土的热爱和与国家的对立这样的局面，也是冲绳和日本关系的写照。

然而1970年，大江在印度瓦拉纳西听到三岛由纪夫的死讯后，发觉“自己开始没有抵触地、积极地、相对性地思考‘日本人’这一概念”。接下来在1971年，大江对自己曾经倡导的以广岛为中心的“民族主义”进行了自我批判，还表示“‘民族主义’一词，纵使它包含讽刺意味，即便是利用这个词语本身进行反击，我也不想再使用它了”。[320]

直到2001年的座谈会上，大江承认一度试图掩饰自己是一个容易被“超国家主义的东西吸引，认为超国家主义极具魅力的人”。于是，他就1997年设立右翼团体“新教科书编纂会”一事发表了这样的评论：“大家都是天真的人！我都怀疑诸位为何到了这个年纪还能如此天真”[321] 对大江来说，自己30多年前就已经解决的问题，到现在仍有人未能将它解决，这不由得让他觉得他们很天真。

尽管石原和大江走的是相反的道路，但他们在“无意识”的层面有着类似之处。在这种“无意识”中，又有他们这些“少国民一代”所独有的特征。也就是战争与死亡的恐惧感经常和性或自然的印象相互结合。

战争的伤痕，对于比他们更为年长的“战前派”和“战时派”来说，在他们脑海中刻下了悔恨和屈辱的社会记忆。然而战败时只有十岁左右、尚不具备足够的社会语言来描述自身经历的少男少女们，只得以更加抽象、不可名状的压抑来感受来自战争的压力和对死亡的恐惧。

这些“少国民一代”的少年们，一生下来就被教育应该作为一名战士去牺牲。他们在憧憬的同时也有恐惧。然而这种对死亡的恐惧，公开谈论自不待言，甚至在自己内心私下承认也是被禁止的。因此他们在无意识中压抑着对死亡的恐惧。而且他们的第二性征期刚好与战争重合，因此这种被压抑着的对死亡的恐惧，常常与他们对“性”的印象相结合，而留有深刻的印象。

比如佐藤忠男，他一回想起他的少年时代，就为类似于“难道我是不忠之徒吗？”“难道我的性器官不是很短小吗？”之类的空想而感到苦恼。[322] 1970年小田实是这样评价与他同时代的作家野坂昭的：“我读他的作品，即使他在谈论自慰时的快感，听起来也像一个口吃的人在拼命谈‘战争和死亡’的可怕，让我看着都心疼。”[323]

当然，这未必就是“少国民一代”的人们所共有的现象。即便如此，也可以说是这个时代作家中常见的现象。大江健三郎在1959年的著作《我们的性世界》中论述道：“战争的恐惧”是“常常与性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从来没有上过战场的我都能想象得到”。[324]

这种死与性形象的结合，在无法像年长者一样把对战争的恐惧只用语言化表达出来的，没有成体系的语言的“少国民一代”中，被理解成了神话般混沌的符号的乱舞。那在无意识中压抑的恐惧，就如同那荒诞不经的梦境一般。作为战败之初的战争记忆，大江谈到了一些插曲。在美军来到他们山村之前，流传着美军会屠杀居民、强奸妇女的谣言，还有说“智力迟钝的少年”会“戴着用报纸做成的大兵帽”，将竹枪插进幼女性器官里杀死她们。[325]

大江的小说总是充斥这样的神话色彩。大江获得芥川奖的短篇小说《饲育》讲的是一位从坠落的美军飞机上跳下来的黑人士兵，被山村孩子囚禁起来的故事，但那个黑人士兵却被当作“堂堂的大英雄，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性感”。[326]

另外，大江初期的短篇小说《死者的奢华》中描绘的，是一种用棍子将福尔马林池里不断浮起的士兵尸体给戳回去的兼职。或许可以说，这个场景就象征着大江那一代在无意识中将对死亡的恐惧压入那个“池子”里。

大江在以右翼少年为原型创作于1961年的小说《十七岁》中写道，少年一边享受着“性高潮”的快感，一边参与到安保斗争的游行队伍中，实施暴力后兴奋地叫道：“我们就是死也不会灭亡，因为我们不过是天皇陛下这棵永不会倒的大树上的一片嫩叶。我们永远也不会灭亡！因为我们克服了对死亡的恐惧！”[327] 如前所述，大江以对这个少年的批判性描述，克服了皈依国家和天皇的诱惑。然而在大江的内心深处，“死”、“性”以及“树木”所象征的大自然，像一团不可名状的巨大黑影，相互缠绕成一个整体。

因此，这个时代的作家经常以如何克服对死亡的诱惑和恐惧为题进行创作。小田实从1970年开始，以《我害怕死亡》和《继续活下去》等为题写有论著。书中写道，越战中人们的死况是“被刺穿胸口”，以此为由成立了越平联。然后他对不畏死的三岛说了诀别之言：“好死不如赖活着。”[328]

大江健三郎也从1950年代开始反复表达对于核战死亡的恐惧。他在1963年创作的《我自己的战争》中写道，与亲身经历了核战争的年长一代相比，“战争期间年龄尚小不能作战的人们觉得战争这个怪物是抽象的、反现实的、不可估量的大事件”。因为有了这一印象，所以对于将来的核战争觉得异常恐怖。[329]

即使是江藤淳，对死亡也十分讲究。曾经和江藤淳关系亲密的批评家福田和也也说“在与江藤淳交往时，我就觉得他是一个与憧憬死亡相反，有着强烈的自我防卫心理的人”。江藤举例说了这样一件趣事：“阪神大地震之后，我用X光照了自家的墙壁，然后与设计图相对照，觉得缺了两根屋梁，因此特意搬出去半年改建了房子”。而且江藤淳对小林秀雄评价“三岛自杀事件”为历史性事件是持反对态度的，以“那不是历史，只是病态”来全盘否定。[330]

对于“战后”的不协调感与虚构感，对“公”的价值的希求，对美国复杂的情感，以及对“死”、“性”、“自然”的憧憬和恐惧等，如下所述，也是江藤淳一贯的主题。不仅是江藤，还有大江和小田等“少国民一代”的作家们都有这种共通的倾向。江藤用与大江完全相反，比石原更为精巧的形式，克服了对死亡的恐惧，构筑了“爱国”的逻辑。

没落的中产阶级少年

江藤淳本名江头淳夫，1932年生于东京大久保。爷爷是海军中将，外祖父是海军少将。这种家庭出身背景，使江藤淳备受瞩目。江藤的父亲是银行职员，喜爱打高尔夫球和骑马，英语流利，是一个即使在战时也习惯穿麻制西服的摩登人士。当然，在当时的日本社会，银行职员属于有特权的城市中产阶级，江藤的生活起居也是由女佣照顾的。

江藤四岁时，母亲患结核病去世。这给了在溺爱中成长的长子江藤很大的打击。母亲去世两年后，父亲再婚，然而江藤与继母的关系不好。上小学时江藤在小学走廊里小便失禁，这种丑事无论如何都不能告诉继母。

从此之后，江藤便不再去学校，即使被继母或女佣强行带到学校他也会立刻逃走。他躲在储物室里，每天埋首阅读。那时的他喜欢看明治、大正时期的日本文学全集和世界文学全集，在小学时就被谷崎润一

郎的作品深深吸引。

虽说如此，江藤喜欢的不仅是书的内容，还有躲在储物室里不受外界干扰的那份安全感。那间储物室是保存生母遗物的地方，他在晚年回忆道："对我来说，储物室与母亲的子宫发挥着相同的作用。"[331]

但是这种平静没有持续多久。家人就江藤躲在储物室一事，召开了家庭会议。虽然有人提出请家庭教师，但是父亲以"必须接受国家法定的义务教育"为由拒绝了这个提议。后来江藤回忆"诉诸法律的父亲"，说道："曾经对我来说，父亲是第一个他人，也是我和其他人即所谓社会接触的桥梁。我对社会、国家以及广阔世界的最初感觉恐怕就是从父亲那里得来的。"[332]

但其后不久，江藤被确诊感染了结核病。江藤离开了继母，被迫搬到继母父亲居住的镰仓，他是一名英文教授。在镰仓江藤备受宠爱，身心也逐渐恢复了健康。在那之后江藤的结核病又反复发作了几次，他时刻被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之下。

与此同时，江藤的父亲和继母生了弟弟妹妹，实际上江藤和弟弟妹妹是同父异母这一事实直到江藤结婚时他才知道，守护这个秘密对他来说是"一个沉重的心理负担"。江藤说道："我对日常生活中负担的这种虚构的沉重感，偶尔也会忍受不了。"[333]

在此期间战争不断激化，生母去世后的第二个月爆发了卢沟桥事变，江藤搬到镰仓一年后爆发了太平洋战争。当时已经八岁的江藤在日美开战时说道："如果日本战败会变成怎样呢？"这种不安占据了他的头脑，但这种话只要一说出口就被邻居海军大佐夫人斥责。[334]

在年幼的江藤心里，生母的死亡和自己的疾病，以及复杂的家庭琐事，都与覆盖着全社会的死亡阴影相结合，作为不可名状的不安印刻在

内心深处。他在1965年论述夏目漱石时，主张夏目与那“胆怯、不幸、黑暗的幼年记忆里浮现出的东西”、那些不明真相“懦弱丑陋、无法直视的东西”做斗争。[335] 而且，江藤终其一生都被这种对“懦弱、丑恶东西”的恐惧支配。

实际上这一成长过程和大江健三郎有相似之处。大江健三郎不仅和江藤是同一代人，而且他在九岁时即1944年失去了父亲。江藤在1988年谈道：“不管言语在表面上如何变化，我都能深入理解大江健三郎这个人。我想大江君可能也是那样想的吧。”[336]

战争升级后不久，江藤全家从东京疏散到镰仓。在1945年的空袭中，大久保的老家被焚毁。对江藤来说，比起家财丢失、储物室被烧，母亲遗物的丧失更让他悲伤。

在这种情况下，江藤作为一名普通的“皇国少年”，梦到了战死。12岁的他说道：“我一边仰望B29在蓝天画出的美丽航线，一边沉浸在什么时候死呢这样美妙的空想里。”“我打定主意‘如果敌人在相模湾登陆，我死也一定要拉一个垫背的’。”[337]

同时，“因为战局变得不利，周围秩序变得松弛，大人的监视也不存在了。早熟的我契合了时代的节拍，感受到了最初的性解放”。在二战末期的1945年初夏，“随着阳光的逐渐强烈，我察觉到了体内某种不可名状的苦闷，感觉到了盛大的自然向我靠近。我开始留意那些发育后的女学生隆起的胸部和渐渐变红的耳朵。疏散训练课等时候一接触到那些我就觉得满心欢喜”。[338]

在被死亡浸泡的少年期对性的觉醒，和“盛大的自然情景”相结合，“懦弱的丑态”不仅作为恐惧的对象，也作为被禁止憧憬的对象而牢牢印刻在心中。江藤这样回忆自己在战争期间初入水田勤劳奉献的经历：“虽然泥巴的感觉单想象就会觉得不干净、讨厌至极，但一旦试着

脚踏进去，就能真切地感受到泥巴的柔软与温暖萦绕在脚趾之间，这给人们带来难以言说的肉体上兴奋。现在回想起来，那触感就如女性一样，虽然在那时这些话令人奇怪，但我也因此1才感到自己成了日本人。这和我在某方面成为男人时的感觉相似。”[339]

8月15日前后，江藤感觉到“从死亡中解放了出来”。但是很多“皇国少年”似乎感觉到了自己正在失去很重要的东西。“我的价值观似乎都崩溃了，一切的价值观也应该迅速崩溃，这种焦躁每时每刻都困扰着我。”江藤在之后的1959年善意地引用了吉本隆明所写的《死亡不恐怖》这篇文章：“我个人相信天皇制法西斯主义的这句口号，即如果战败的话，亚洲殖民地不能得到解放。”[340]

在价值观崩溃的过程中，吉本隆明从宗教书和古典书中寻求救赎，而江藤则在音乐里探寻。战后的江藤跟着音乐老师学习拉小提琴，每天参加各种音乐会并练习作曲。江藤后来回忆说，虽然能够用语言表达的价值观全部崩溃了，却觉得“战时美丽的贝多芬在战后依然美丽”。[341]

但专心于高雅音乐的时间并没有持续多久，战时、战后的通货膨胀使城市的中产阶级急剧没落，江藤一家也不能幸免。1948年，江藤放弃了小提琴的学习，全家把镰仓的房屋全部卖给“战后暴发户”，搬到父亲工作的银行的职工宿舍——位于东京郊区的临时住所。镰仓的房子被变卖了，再加上大久保的老家被烧毁，能够使江藤想起战前富裕生活的“故乡”也没有了。在艰苦的生活之中，继母也因为感染结核病菌患上了肋膜炎，并恶化成疽病，一直卧床不起。

和很多老一辈自由主义者一样，对于经历了家道中落的江藤来说，“战后”只是一个十分令人讨厌的时代。受“皇国教育”的熏陶，在战争期间尚且年幼的他们这代人心中不会藏有反战的思想。他们也不会像丸山那一代知识分子那样迎来因战败带来的言论解放。江藤又没有经历过空袭，在这层意义上来说和迎接战争结束的氛围无关。对江藤来

说，“战后”不论是精神方面还是生活方面，感受到的不过是时代的崩溃与终结。

在这期间，江藤的祖母在1948年去世。如第三章所述，听到宣告战败的广播时，祖母说道：“将国家弄成这样，让这么多的人牺牲，陛下有什么颜面去见明治天皇呀。”因为这是卖掉房子之前刚刚发生的事，江藤不由得感觉到，象征着“明治”的祖母的去世与家运凋落是联动的。江藤形容祖母是“真正的家长”，他说，她的死“象征着所有旧价值的崩溃”。

祖母是“真正的家长”的那段时期，江藤的父亲在没落中显得很憔悴。喜欢骑马和英语会话的父亲和第五章中叙述的清泽洌一样，嘲笑着战争期间的警防团和竹枪训练。但是，习惯于安稳的银行职员身份的父亲对这个充斥着买空卖空黑市商人的废墟时代充满了无力感。在整个家族的没落中，随着势态的发展，不管江藤说什么，父亲就只是说“战败了，没有办法啊”。[342]

看着从前传授知识、教导自己的父亲变得无力的神情，少年江藤觉得既可怜又不满。江藤回忆即便在战败当天也穿着白麻西装戴巴拿马帽子去工作的父亲，在战后那不修边幅的样子让人“不忍直视”。然而与此同时，江藤在前言中写到了1959年的“现在日本的青年”的共同感受：“家被烧了，财产没了，希望破灭了，但这些都不是自己的错，是大人们太愚钝了。”[343]

1967—1972年，江藤把自己家里的事情写入评传《家族再会》。但是，一方面，此书中提到的有生母和出生在“明治”时期的祖母，担任海军少将的外公，以及同样出生于“明治”时期的担任海军中将的爷爷，一些实际上他没有见过的人，只是与他幼年时代的丰富回忆相关的人物而已。另一方面，父亲和继母，还有继母生下的弟弟妹妹，与他共度战后艰难生活的人物，只是作为必要最低限度出场的配角而已。

1948年，15岁的江藤移居到临时住处后家中失窃，父亲战前使用的高尔夫球杆和衣服都被盗了。在战前，高尔夫是一项只有拥有特权的中产阶级才能参加的贵族运动。对江藤来说，这与自己富裕的童年回忆有关。那时他写道："战败使我的内心受到了践踏，就好像是被剥夺了尊严一样。"对江藤来说，"战后"的"小偷、黑市商人和他们背后的堕落"点燃了他的愤怒，江藤决心要代替失去气力的父亲，"成为一个大人"。[344]

但这个决心，对本来就体弱多病、备受宠爱的少年江藤来说，是一种沉重的负担。虽然心里很急，但小时候患上的肺结核再次复发，经常卧床不起，加上对继母以及弟妹复杂感情的影响，江藤经常大动肝火。以下是江藤高中时代的逸事：

> 因为弟弟还是小学生，我不记得是第几次因肺结核卧床了。隔壁房间是因患骨疽而躺在床上的继母，弟弟妹妹放学一回来，就围在继母床边说话。虽然这并没让我感到不快，但有时起床去上厕所的时候，不经意会瞥到弟弟钻进继母的被子里吃着什么。
>
> "总是这样子怎么长大啊"，我说道。弟弟很意外地顶起嘴来，我一认真起来便还嘴了。虽然知道和比自己小一轮的小学生弟弟较劲显得很愚蠢，但还是不能忍受弟弟在离自己很远的地方。不能忍受说出在远处这个事实。
>
> "你怎么能这样对待一个小孩子呢。"
>
> 当继母责备时，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我把弟弟从被子里拖出来使劲打，把弟弟疼爱的猫扔到门外，我喊叫着，连自己都不明所以。"疯了，疯了。"我听到弟弟哭喊着，但那个小小的、圆圆的身体还在我的手中摇晃。这是弟弟吗，这是我的弟弟吗？我边想着，边喘着气继续打他。这是嫉妒？是悲伤？还是想把弟弟拉到自己的近旁？我不知道，我只是想把弟弟收拾一顿……[345]

应该在这种混乱状态下主持公道的父亲已经失去了这种能力。寻求解救的江藤和湘南中学的同学石原慎太郎等人成立了一个研究会，倒向

了激进的马克思主义。但天生敏感且感受力强的江藤并不适合这种政治运动，不久便再次沉溺于文学之中。

但是，怀有战时悔恨的年长一代写的战后文学，大部分对少年江藤来说很难理解。他后来写道："战后的文艺杂志充斥着与我的丧失感无关的感情和难以理解的表达，我觉得买来读是一种浪费。"[346] 他喜欢的是与日本不同的通往另一个世界的欧洲翻译文学，像堀辰雄和立原道造等浪漫主义诗歌和小说，小林秀雄和福田恒存的充满审美的评论。对江藤来说，只有这种浪漫美丽的世界，才能令他忘却战后的现实。

与此同时，太宰治是战败之初江藤最为喜爱的作家。一度掀起"斜阳族"风潮的太宰治文学，在因战败而深陷绝望的没落青年中备受欢迎。江藤回忆道："在家道急速中落时，热衷于太宰治文学的那段时光，大概我一生都不会忘记。"[347]

话虽如此，江藤对太宰治的评价却是毁誉参半的。对江藤来说，"他的作品就像过于甜腻的烂酒一样，有时又像是要说'别开玩笑了，认真点'这样的话"。另外，江藤叙述道："在那时，我通过太宰治窥见了日本浪漫派，或者说只看到了日本浪漫派。"他回忆道："从太宰治的作品中只会嗅出股尸臭味。"顺带提一句，"一读到三岛由纪夫的作品就觉得反感，所以并没有特意去读"。[348]

江藤从太宰治的作品中嗅到了象征着日本浪漫派的"死"的气息。这对江藤来说，是在他所生长的战争时代弥漫着的气息，是他童年时代失去的母亲和祖母的气息。在太宰治的作品中，那代表性甘甜的"尸臭"是从印刻在江藤童年回忆里的那种"懦弱、丑恶的东西"上飘来的气息。对江藤来说，那是恐怖和憧憬的对象。果断地拒绝这种"尸臭"的诱惑，直面战后的现实生活，对他来说就是"长大了"。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如第七章所述，这时江藤和他同代的佐藤

忠男和大江健三郎等人，也有着“在这场战争中自己是不是也要服役呢”的恐惧。江藤又想到，“在美苏战争中，在集体性的死亡当中，没必要做埋葬自己这样愚蠢的行为”。“战死”的诱惑也就相对化了。[349]

在这前后，江藤停止阅读太宰治的作品，集中精力学习英语。功夫不负有心人，他在高中的成绩很优秀。但结核再一次侵蚀了他，18岁时肺结核又发作了。没赶上升学考试的江藤在疗养生活结束后，于1953年20岁时进入庆应义塾大学文学部学习。因为不愿意增加父亲的负担，通过兼职家教支付学费进入英文系的江藤不久后加入了同人杂志，自己也逐渐可以进行文学创作了。

这里我们不得不加以留意的是当时人们对文学部的评价之低。如第七章所述，1954年1月，京都大学就业的人中，平均就业率为62%，但文学部的就业率只有13.7%。江藤就读的都立一中（现日比谷高中）以考上东大人数全国第一而驰名日本，入读庆应文学部的江藤在拜访老师时，老师说：“在庆应不读经济吗？为什么选了文学呢？如此一来前途堪忧啊。”[350] 江藤被此话所伤，从此再没去过那所高中。

原本战前中产阶级和军人家庭，认为文学作者并不是一个正当工作，江藤的父亲也“一点都不尊敬文人”。江藤潜意识里也接受了这种价值观，面对曾是海军少将的外祖父，江藤觉得对不谙国事的自己是个“文弱的外孙”，并深感耻辱。据江藤湘南中学的同学石原慎太郎回忆，在他们踏入文坛再次相会时，江藤说：“相互解释着说怎么就成了文人，真是觉得很丢脸啊。”[351]

在因体弱多病而沉湎于文学的时候，江藤强烈地感觉到父亲轻视的眼神。在他长期逃课不去学校的那段时间，父亲对他说：“像你这样没什么出息的家伙可以去做学徒工。”江藤现在回想起来还记忆犹新。在废墟生活中，父亲想辞掉银行职员的工作，对江藤说：“我们开一家废品回收公司吧，这样也能让你有个正经工作啊。”随后又立即说道：“你

也帮不上什么忙，不行，不行。”把前面的决定收回了。江藤深受打击，于是就想着无论如何先找一份可以挣钱的工作，但在那个经济不景气的时代，基本上没有什么岗位愿意接收一个患了结核病的文科生。[352]

就这样，1952年5月，江藤一个人隐居在朋友轻井泽的别墅里写下了短篇小说《芙罗拉·芙罗拉姐姐和少年的故事》。[353] 故事讲述的是一个住在有漂亮草坪和白色阳台府邸里的少年，这位少年失去了母亲而且体弱多病，在同他幻想中的少女——芙罗拉交流的同时，渐渐步入死亡。这是一部突破“无病呻吟”或者应称为富有“少女趣味”的作品。接下来，1954年他向大学的同人杂志投稿，是关于英国作家卡萨林·曼斯菲尔德（Mansfield）的题为《曼斯菲尔德札记》和《曼斯菲尔德札记补遗》的评论。

这些评论的内容是“一种异样的东西”，在书中他把曼斯菲尔德形容成“被肺病折磨的歇斯底里的女人”，在描述“她是与生同存的死者”的同时，认为曼斯菲尔德的特征是因否定现实而“对过去念念不忘”，以及“对‘死’显示出意外感性的世界的美”。[354]

对曼斯菲尔德的评价是否恰当，在这里暂不论述，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在这之后，江藤又写了关于夏目漱石、小林秀雄、西乡隆盛等人的评论，然而不论论及的对象是谁，都描绘了其对“死”心怀憧憬。

但在写了《曼斯菲尔德札记》之后的1954年6月，江藤突然咳血，被诊断为肺结核加重。尽管江藤“不想把复发的病情告诉父亲，打算就此失踪”，但“害怕看到父亲暴跳如雷的样子就告诉了父亲”。[355]

原本江藤对自己生母死后再婚的父亲抱有一种复杂的感情，他在多年后写道：“让我愧疚并无法逃避的是，在我心里一直潜伏着一种‘否定’父亲的意识。”[356] 在《芙罗拉·芙罗拉姐姐和少年的故事》中，少年

的母亲在与父亲结婚后，就舍弃了文学才能，在少年死后，父亲变得十分憔悴，成了一个废人。

他回忆道，自母亲死后，在同父亲、继母、继母的孩子一起生活的过程中，他变成了一个“不会撒娇的人”。多年之后他写道，当听到“家”这个词的时候，某种暗流就从心底喷涌而出，无法遏制。同时，他放弃了继承权，决定把继承所有家产的权利都让给继母所生的弟弟妹妹，“我想让父亲知道自己准备放弃所有长子的权利，但履行所有长子的义务”。[357] 然而即使急于承担“义务”想“成为大人”，江藤羸弱的身心也使他无法做到。

父亲得知江藤旧疾复发，虽然斥责了他，但还是像以前一样通过特殊渠道给他买来了特效药。江藤对父亲的感情仍然复杂，然而站在父亲的立场，对这个留有已故妻子模样的羸弱长子，父亲也有着复杂的爱意。

据江藤回忆，战败后不久，他通过了旧制中学的入学考试，为了祝贺，请来了几个老师开了一个小型庆祝会。会后，送老师出门的时候，一个醉汉误把英俊的少年江藤当成少女，在夜路上向江藤搭讪。这时喝醉了的父亲怒吼道：“胆敢碰他试试看，我饶不了你，你这个混蛋！”之后又抱住江藤说道：“你是个可爱的孩子，你是个可爱的孩子。”江藤挣脱了父亲的手，看见哭泣的父亲时，感到愕然。[358]

江藤在1967年写道，关于“那席卷而来的父爱”，“就像粘鸟胶一样黏黏地粘在我的皮肤上，把我从自己的生活中剥离出来，那就是父亲的‘爱’吗？倒不如说更像母爱”。在这个过程中他一方面变成了“不会撒娇的孩子”，另一方面又总和父亲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发生争吵，“如果和父亲一起待上三十分钟，不用一会就会产生口角，气氛变得异常紧张，周围的人就会开始担心，这种事情不足为奇”。[359]

一方面，父亲在和富裕的战前生活完全不同的状况下，笨拙地为妻儿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但另一方面，回想起战败后的父亲，江藤说道："近乎不可思议的是并没有看到他多想要把自己的人生过完，当我问到为什么不去为自己做一点什么时，他一定会勃然大怒，说出让我心如刀绞的话。"江藤看到这样的父亲，感到"无比心酸"。[360]

在这中间，印刻在江藤内心的"懦弱、丑恶的东西"，与被他形容成"像粘鸟胶一样黏黏糊糊"的父爱联系起来。他成了"一个不善撒娇的人"，关于"家"这个词，他也不由得感受到一种"无望的激情"，而这各种各样的情感浑然交织在一起的"懦弱、丑恶的东西"，也许就是这种矛盾情绪的结果。

但是，克服这种"懦弱、丑恶的东西"所散发出来的"尸臭"的诱惑，在战后的现实中继续生存，这与不顾父亲没什么不同。江藤在1971年这样形容少年时代的自己：

> 那时他的结核病刚刚痊愈，也不确定自己能否恢复健康，感到家庭的重担压在他的双肩上，他经常厌烦到想死。但他不能死，因为一想到父亲的悲伤，他就不能那样做。他很绝望，但他不想让这种绝望被他人，尤其是被父亲察觉，因此他继续活着。[361]

本来江藤从战败后开始学习英语也是因为慑于精通英语的父亲的命令。江藤在1994年的随笔中讲述了他在生母过世之后父亲再娶之前，和父亲去逗子的海边宾馆，和父亲一起游泳，一起吃时髦的西式早餐的往事。那时，邻桌的西方人都向他们打招呼，他还为父亲流利的英语对话感到自豪，也希望像父亲那样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关于这段回忆，他写道："那是我和父亲关系最亲近的一段时间，正是因为有了这段时间，我才活到了今天。"[362]

父亲在战后没落的样子和作为战败国日本的命运，对江藤而言是双重打击。在江藤结核病复发三个月后，父亲也因为过度劳累而发高烧病

倒了。加上因患骨疽而躺在床上的继母，一家三口终于都卧床不起了。

在这次危机中，江藤“毫无办法，只能看着天花板忍受着”，自己“切齿扼腕”。“在这次疗养中，我迎来一个转机”，即“用一句话说，我从某个瞬间开始突然觉得死亡是肮脏的”。这个转机之后，江藤不再喜欢之前一直钟爱的唯美主义文学，感觉“堀辰雄、立原道造以及他们的追随者都是赝品”，开始对“文学性的”东西感到厌烦。[363]

1955年5月，《三田文学》杂志的编辑山川方夫拜访了处于这种状态之下的江藤。山川阅读了《曼斯菲尔德札记补遗》之后认可了江藤的才华，并委托江藤执笔撰写日本的作家论。江藤列举了堀辰雄、小林秀雄、夏目漱石三人作为候补，他没有挑选一直以来爱读其作品的堀辰雄和小林秀雄，而是强烈希望写一写关于只在过去阅读过其著作、当时却没有一本书以之为写作对象的夏目漱石。与此同时，他抛弃了写作《曼斯菲尔德札记》所用的真名江头淳夫，采用了“江藤淳”这一笔名。

这之后，22岁的新锐评论家“江藤淳”的第一部作品《夏目漱石论》在《三田评论》1955年11月和12月号上刊载。吉本隆明的《上一代的诗人们》和石原慎太郎的《太阳的季节》几乎也是在同一时期发表。那时恰逢“已不再是‘战后’”的时代，即将迎来大的转机。

“死”与“生活者”

俗话说“处女作里什么都有”。江藤的处女作《夏目漱石》几乎包括了他后期的大部分主题。

如前所述，江藤到了讨厌以堀辰雄为代表的“赝品”式的“‘文学性’东西”的地步。这之后，江藤在夏目的作品里发现的正是非“赝品”的真正文学，斩断隐藏在“尸臭”的甜蜜里的诱惑，面向现实的文学。《夏目漱石》开篇写道：

在评论日本作家的时候，我们会感到某种困难。西欧的作家拥有坚实的基础。如果我们只论述耸立在地基上的建筑，那就只做在建筑里面工作的木匠好了。即不用去纠结一些类似于“这真的是文学吗”这种自寻烦恼的问题……把日本作家当作对象时事情就不再这样简单。要想把他们当作问题，首先必须从构成他们作品的基础开始，把基础当作问题。[364]

此后的江藤从重新审视占领军的新闻审查政策和宪法制定过程等政治保守立场出发，力图搞清日本文学的“基础”。但1955年江藤研究的并不是这个问题，而是超越了简单的语言表达的“现实”是否在文学作品中得到表现的问题。

江藤在《夏目漱石》中从正面批判了被称为描写“现实”的无产阶级文学和自然主义文学。据他所说，这些文学流派虽然主张描写“日本的现实”，实际上却是在从西方引进的方法和观念中空转。

像这样批判无产阶级文学作品，很容易看出小林秀雄和福田恒存的影响。但应该留意的是，这个时代面临着因战败而引起的语言体系激变的年轻人，对语言存在不信任感。

例如，在第三章中介绍过的原少年水兵渡边清在1946年的日记中写道：“我被天皇背弃也好，被国家欺骗也好，自己背弃自己也好，究其原因，都是语言造成的。因为把作为媒介的语言和文字本身，想当然地误以为是事物的实质。换言之就是受不严谨的文字游戏的牵连。”[365]对“大日本帝国”“语言的魔术”失望，是这个时代青少年中的普遍现象。吉本隆明也好，鹤见俊辅也好，都是首先论述语言和现实的关系，然后开始战后的思考。从这一点看，江藤还是符合时代潮流的。[366]

渡边清接着写道：“从今往后我只相信通过自己的眼睛和四肢确认的事情，通过自己的头脑思考领会认同的事情。”江藤也在《夏目漱石》中宣言，“对我们来说重要的事情”，“正是我们现在活着，而终将死去这一无趣的事实”。[367]

然而，从《夏目漱石》来看，在这之前的大部分文学批判都是与国家、政治这些词联系在一起，“总是想尽力用一些更方便的问题来取代个人”。江藤断言：“不管是传统、历史的态度还是社会史的意义，全都是这种替代物。”[368]

从后来成为保守论者江藤的印象来看，虽然对他持有这种看法会觉得很意外，但在1960年之前，比起国家和民族而言他更重视自我。在1959年他还说“民族共同体只是一种幻影”，主张“有国家并非就会有自我，国家就如同一种人为的约束、一种力图自我夸耀的狭隘精神，从常识而言，就是官僚主义精神”。[369]

然而江藤在《夏目漱石》中也否定了因描绘“个人”烦闷而著称的文学。为什么会这样呢？那是因为“在日本近代市民社会中没有这种东西”，“并不存在西欧意义上的近代性自我”。然而在近代日本，“像铺设铁路、在本国造船场建造军舰这种名誉一样，对西洋风所怀有的‘怀疑苦闷’也全都是名誉上的”。在这里，日本的作家觉得“用日本人做主人公，通过使其苦于一些本不可能有的‘怀疑苦闷’，进而造成一种日本的精神史像西欧一样进步的错觉”。正因如此，“从这种意义来看必须说，作家和光荣的帝国陆海军一样为国家做出了贡献。在今天看来，这简直就是个笑话”。[370]

然而，江藤并没有采取一种对抗西方文化、赞赏“传统”的态度。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不管是“传统”还是“历史”，都只不过是空洞的词语而已。他在《夏目漱石》一书中强烈批判道：“不管是日本的文学，还是表现日本式或东方式思维的文学、私小说是日本独有的文学形式等，这些都是妄想。”[371]

那么真正的文学是如何产生的呢？对江藤来说，日本近代的自我是不可能存在的，只是存在“近代的构思和前近代周遭现实之间产生的炎症”而已。而且，“这种炎症恐怕是唯一能表现出日本现状的”，除此之

外再无其他。[372] 他认为为了描绘出“日本的现实”而斗争的人是夏目漱石。

众所周知，身为英语老师的夏目漱石，在英国留学期间患上神经衰弱之后，回国开始创作小说。这之后，夏目的作品大多数是批判日本西方化和近代化的浅薄，最后超越了西方的利己主义，达到了“则天去私”的境界。这就是常说的夏目漱石的轨迹。

然而，江藤跟这种夏目论观点相左。在江藤看来，夏目没能适应英国不是由西方文化跟东方文化之间的冲突引起的。

于是江藤对这个问题做出的解释与之前的夏目论截然不同。根据他的说法，夏目是“一个想抹杀自己，一直被无间断的冲动所困扰的人”。他在英国患上了神经衰弱，不过是他天生“厌恶人”的一种表面化。夏目写过一封“想早点吃茶泡饭和荞麦面”的信，也只不过是表现出他想逃避现实的愿望，“夏目憧憬的地方是地图上找不到的，故国日本不过是他寄托愿望的媒介而已”。[373]

江藤更加重视的是夏目的幼年时代。夏目数次过继给别人做养子，不为继母所喜。从夏目的回忆录里，江藤注意到他享受待在中国南宗画作前的时光，这段记录中，“看南宗画作的小孩的姿势是与众不同的，我们从年幼的南宗画作鉴赏家孤独的身影中，不难想到那磨练他的不幸的家庭生活”。[374]

江藤列举了夏目在英文诗歌中描绘出的位于“人生与梦想之间”死亡世界中的女性，认为“夏目所在的最低音部的世界是没有人存在的极地，有时仅仅在地上映出他和那位‘永远的女性’的两条长长的影子。潜藏在他心中的家就是这样一种风土”。在夏目的作品之中，江藤最为欣赏并列为“最美之一”的是短篇小说《文鸟》中，将“永远的女性”形象融入死去的文鸟上，将其与“漂浮着尸臭”的作品《梦十夜》相提并论，认

为表现了"漱石来自生理上的对生的要素的厌恶"。[375]

江藤进一步在《夏目漱石》中把"永远的女性"居住的死亡世界描绘成溶解人的"自然"世界。在表现它的时候，江藤引用了《李尔王》里的"自然界就是淫秽"这句话。其存在于日本私小说中的"并不具有坚固的伦理外壳的'自我'，而只不过是如充满水分的寒天一样，浮游是它们的本能——即李尔王那般咒骂的'自然'而已"。[376]

被标榜为厌恶现实和向往死亡的夏目，即使在回国之后也感到不适应。然而，江藤关注的不是夏目止于这种状态，而是对现实社会的责任感开始觉醒，立志"创造包含全部'生活意义'的文学"。在这种情况下，夏目必须克服的是"自我抹杀"及"自我绝对化"的冲动。江藤说道：

> 明明是我对。而你们不对。醒醒吧，纠正过来，然后和我一样做。这样我就会成为忠于自己的意志的你们的统治者。或者说只有我是对的，全世界都是我的敌人。或者不如消失，离开那些俗众。如此，启蒙主义的态度是对自我绝对主义及自我抹杀欲求的完美持续。更多的欲求是，积极层面是持续着对社会性的绝对支配，消极层面是对反社会性的逃避姿态。[377]

妄自尊大的自我绝对化和妄自菲薄的自我抹杀是逃避现实的两个侧面。江藤认为，对夏目来说"在两个极点之间摇摆不定的人欲不过是令人厌恶的东西，他把这个叫作'我执'"。[378]

江藤在这里阐述了他独特的自我论。江藤认为，西方的近代性自我虽然各自独立，但以神这种超越者作为媒介可以与他人产生联系。然而，日本的"我执"是通过神来建立人际关系的。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也不会影响到自身存亡。[379]

对江藤来说，夏目漱石的作品以"漂浮在'我执'境界与平面的人际关系世界里的爱的不可能性"作为主题。作为"日本近代社会特征性的""'我执'的存在"，即描绘"懦弱、丑恶的东西"，只能将其描写为一种叫作近

代“炎症现象”的“日本现实”。[380]

然而，大多数日本作家并没有处理这一重大课题，他们所做的只是引进西方的先进技巧，用空洞的语言构筑了一座“玻璃城”。“对此感到满足的只是极少数半吊子文学鉴赏家，一般读者都无法理解这种空虚的心情。”所以“文学青年被轻视，结果他们因信仰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的亡灵，自然会反感那些正常人的感觉”。[381]

为了对抗这种“软绵绵”的“我执”，夏目也曾考虑使日本确立近代性的自我。然而如此一来，“为实现启蒙主义态度，就需要少数议论天下国家的优秀人才和愚昧的大众”。[382] 也就是说，宣扬近代自我确立的启蒙主义带来了知识分子的自我绝对化和“我执”。

然而在现实的“生活人”的世界里，“自己可不能是绝对的人”。夏目通过《道草》中为生活而努力工作的主人公等，描写了“普通人之间通用的日常生活伦理”；另一方面，当大部分私小说家“抛弃社会责任时，他们不约而同地奔赴‘自然’”，这样夏目就成为近代日本“寥寥几位‘生活人’作家”，克服对“死”的憧憬，确立了作为“生活人”的责任和伦理。[383

这样的夏目形象是否准确，还存在一些疑问。如前所述，江藤一开始并不喜欢夏目的作品，相比之下更喜欢堀辰雄和谷崎润一郎等人的作品。1967年，“在Y（山川方夫）的推荐下，我开始信马由缰地写《夏目漱石论》。然后就断断续续地写了些东西”，他说道，“我那时什么都无所谓，每天都想写文章，只有这样，才能忘记烦恼，忘记父亲的重担以及自己和继母的疾病”。[384]

但是，一个22岁的青年在这种情况下绞尽脑汁所写的夏目论，于1956年作为单行本《夏目漱石》被整理出来，成为带给人们不可思议的感动的一本书。虽然它不是一本逻辑严密、体裁严整的书，却有一种混沌的压迫感，使江藤淳在文坛声名鹊起，家喻户晓。

坚持信奉“搞文学不能当饭吃”的他，选择在庆应义塾大学英语系继续深造，并立志成为一名大学教师。体力多少恢复一些之后，江藤于1957年与庆应义塾大学的同学三浦庆子结婚，于是离开父母家。此后直到1959年，他一边读研究生一边写评论。

研究生时代，江藤担任了“年轻日本会”的干事，该会是1958年以反对《警职法》斗争为契机成立的。同时，他发表了《作家在行动》、《排除奴隶的思想》等评论集，彻底批判了小林秀雄、日本浪漫派以及天皇制度，有望成为进步派的年轻评论家。由于这段时期大家对他印象深刻，有许多论者批评1960年代之后江藤“转向”了保守派。

然而这段时期也好，之后也罢，始终支配江藤的是对“懦弱、丑恶东西”的矛盾情绪。实际上，研究生时期江藤使用了一连串对比来对天皇制度与日本浪漫派进行批判。他认为应该否定“死的思想”、“淫猥”、“自然”、“诗”、“浪漫主义”等，而应该肯定“人”、“秩序”、“散文”、“现实主义”等。

这一对比的意义可以从江藤1958年对“人”和“自然”所下的定义中清楚地看出来，即“‘人’有主体意识，能够把模糊的东西弄清楚，能够将自己从压迫中解放出来”，而所谓“自然”是“超出人类的理解范围，某种黯淡、混沌的东西”。[385]

江藤在1958年写下了《神话的克服》，所谓“神话”是解放人类潜在的“不合理的、阴暗的残暴能量”的故事。神话本身只是一种无内容的象征，“象征所包含的越多，被解放的原始能量就越多，人也就更加奴隶化”。像“八纮一宇”、“大东亚共荣圈”之类的口号，即是这种“神话性象征”中最具代表性的东西。[386]

而日本浪漫派批判近代，批判人类所创造的一切秩序，这些都是在否定“拥有责任和自由的人类”本身，最终到达“‘自然’崇拜”。对日本浪

漫派来说，“‘文化’是‘死’的同义词”，“是李尔王所听到的自然的声音”。[387]

日本社会是被“家庭制度”和“对‘天皇’这一原始宗教观念的盲从”支配的“巨大沼泽”，“变成变形虫一样的生物，进行着不规则的活动，人的轮廓，在某种黏性的力量中渐渐消失”。在这里，让人拜倒于“自然”、“物”的面前，产生“物神崇拜的邪恶的死的思想”。从不过是人类工具的刀剑之中发现美，正是这种泛灵论的典型代表。对于欣赏、称赞“物之美”的小林秀雄的批判也是这种泛灵论的一例。即在那里，有“自然”，无人类。准确地说，除了他（小林）之外别无他人。[388]

在这一时期，江藤提倡从这种框架下创造自己独特的文体论。由此，日本文学与正视现实和他人的散文相比，更易于倾向诗意的自我陶醉式美文。“诗的世界归根结底还是物的世界。”日本文学是“诗式”的，具体来说，“文中多暗喻、直喻”。本来“吟游诗人用诗神、王、族长的权威进行传达，而作家，宛如国民公会的代议士一样，首先代表自己所属的集团——极限来说，就是整个人类——进行传达。囿于此，作家必须是散文家”。然而在近代日本，“作家不是有社会责任的普通市民，而是泛灵论社会的巫师或工匠”。其典型代表是被称为“修辞学课程优等生”的三岛由纪夫，三岛的文学作品中充斥着对“死亡”的赞美和对日常生活的厌恶。[389]

因此日本近代文学史，就是一部激情澎湃的“浪漫主义者”与力图压制他们的夏目漱石等“极少数的现实主义者”对决的历史。很多从事文学工作的人，为了控制灰暗狂暴的情感，开始专注于“在日本近代早期的浪漫主义基础上，融合源自西欧的‘近代文学’模式”这一工作。“如果这种倾向被称为‘近代主义’的话，昭和初期的马克思主义文学运动则是这种意义上的‘近代主义’的最后光芒。”[390]

然而，“随着近代主义的自我充实，近代化一点也没得到促

进”，“自我确定实为自我否定”。“近代主义”所存在的问题是，“从无视自我内部‘神话’存在的前提出发”。我们所要做的是正视黑暗、混沌的“神话”，“在正确理解神话性质的基础上创作‘文学作品’”。[391]

从这种论调可以看出，江藤试图用“近代”这一“轮廓”来压制对“懦弱、丑恶东西”的恐惧。与此同时，论述“近代主义”的界限、倡导直面“神话”的逻辑让人感觉是受到了竹内好的影响。实际上，江藤在这一时期的评论《排除奴隶思想》中，有时提倡“因为出现了一个鲁迅，向社会民众靠拢”，有时在批判天皇制度时引用竹内的话。[392] 另外在称赞国民会议的同时，也屡次提及丸山真男。

另一方面，江藤在《夏目漱石》中，在探讨夏目在文学史上的定位时，又提及了福田恒存。说到福田恒存和竹内好，不管是在政治性立场上，还是在“政治和文学”的论述方法上，都受到了极左与极右思想家影响，这让人略感奇怪。但是，福田和竹内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赞赏以夏目漱石为代表的“明治”文学，批判白桦派和无产阶级文学。

另外，福田和竹内在批判文坛文学的封闭性、主张创作向“生活者”和“国民”开放的文学这一点上也是相同的。而且，江藤也批判作家的自我绝对化，提倡创作向“生活者”开放的文学。福田和小林这类“保守”派，把这些“生活者”当作左派知识人进行批判，而竹内这类“革新”派则向民众和“国民”靠拢，江藤必定会倾向其中某一派。1950年代后半期的江藤选择了后者。

虽说如此，江藤只是部分受到福田和竹内的影响。江藤不像福田那样有着强烈的传统倾向，也没有像竹内一样爱读鲁迅的作品。重要的是，江藤没有像竹内和福田那样背负战争中悔恨的创伤。江藤直面的课题是如何与自己也不能理解其实质的“懦弱、丑恶的东西”战斗。为了表现它，可以说借助了福田和竹内的措辞。

无论如何，竹内只是就战争中的屈辱经历否定天皇制而已。但对江藤来说，对天皇制和小林秀雄的批判则是对“尸臭”诱惑下的自我抑制的产物，他在内心也为其所吸引。在这一时期的评论中，江藤一边批判“原始”，一边阐述“如果没有给予我们的心灵原始的感动，就不能生存”。[393]

江藤在这一时期盛赞崭露头角的大江健三郎。江藤认为，把四国山村作为舞台的大江的早期作品《饲育》和《摘嫩菜打孩子》与完全展现浪漫主义的太宰治和三岛由纪夫不同，“作者自身的人性意志”和“‘死’的思想官能”以绝妙的平衡共存于“对象化、理论化了的泛神论的世界”中。但不久之后，大江开始创作反映都市青年苦闷的作品时，江藤将矛头指向了“被迁入都市的孤独青年，不再是与自然、动物的泛神论交感的山村少年”。[394]

当时的江藤倾向于进步派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他把马克思主义分类到“轮廓”的那一方。当时他阐述道：“在保田（与重郎）的逻辑中，革命本身就是否定一切体制，或者是回归到‘一君万民’那样的‘原始状态’；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就是用一个更好的体制来置换原有的体制。”[395]

换言之，江藤把马克思主义运动评价为“秩序”的一种，使它与“混沌”的天皇制和日本浪漫派处于对立的位置。然而，1960年的安保战争颠覆了他对左派运动的这种认识。

散发“尸臭”的1960年安保斗争

1959年3月，江藤从庆应义塾大学文学部研究生院中途退学。实际上，从1958年3月开始，校方就告诫他今后不要再向报刊投稿，对此心存反感的江藤一年多没有去研究生院上学。当时的学院派普遍认为向报刊投稿是很没有档次的，江藤被迫在写文章和研究生院这二者中做出抉

择，最终他还是放弃了成为大学教师这条路。

对于讨厌“文人”地位的江藤来说，这是一个很痛苦的选择。后来的1971年，江藤被聘为东京工业大学副教授时，对“终于能领工资”的身份十分满意。他在这一年的随笔中写道，高龄的父亲辞掉了公司相关的一切职务，成为“完全没有单位的人”，并描述了父亲的这种“寂寞”。[396]其中也有与父亲赌气的成分。江藤自己筹措学费，虽然维持了没去念的研究生学籍，但最终没法舍弃对文学批评的热情，选择了成为“没有单位的人”这一人生道路。

这样，从1959年到1971年，江藤陷入了“没有单位的人”的不稳定状态。在这一时期，江藤经历了1960年的安保斗争和旅居美国，在向保守民族主义者蜕变的同时，完成了以《成熟与丧失》为首的代表作。

于是，江藤和进步派的关系从1959年开始恶化。最先出现的征兆是战争责任论。1959年，《现代的发现》讲座设置了战争经历和战争责任的专题，江藤给那里投稿了题为《关于“体验”和“责任”》的战争体验论。该卷编者桥川文三是“战时派”政治学家，曾著有《日本浪漫派批判序说》。如第七章所述，桥川因为展现出他囿于战争经历的一面，曾被石原慎太郎嘲笑。或许石原自称“战后派”，主张自己和战争的伤害无关而令桥川坐立不安，而论及在“少国民一代”中少有对日本浪漫派批判问题的江藤，也想参与战争经历讨论。

然而，江藤表现出来的反应与石原一样，是对“战时派”知识分子的痛斥。特别是他所批判的是“战时派”知识分子美化“战死”，蔑视“天下太平”的日常生活。在这里江藤断定，“不管是‘为了国家’也好，还是‘为了社会主义’也好，他们这些‘战争体验论’者们，在厌恶西欧这一点上是一贯的，在厌恶个人这一点上也是一贯的”。并批评桥川文三和山田宗睦等人是“丑恶青春期的自恋”、“喜爱概念，讨厌现实的人”。[397]

江藤批判“战时派”知识分子，批判他们“完全是国士做派，蔑视‘幸福’的家庭生活”的作态。江藤认为，“所谓家庭不过是身边人们之间一个深不见底、一开一合的奇怪洞穴罢了”。如前所述，苦于与父亲不和的江藤，每天都为避免与父亲发生争吵而努力。后来在1976年，他说：“忘记天下、国家、文学，只想着把车贷剩下的月供付完。仅仅这样的‘家庭幸福’也非常美好，若能达到凌驾其上的奢侈的生活的话，我一定会欣喜若狂。”[398]

江藤在1959年的战争体验论中批判了那些片面地批判“大人”——他父亲那一代人——“战时派”的态度。追究“战时派”知识分子的战争责任，只是把自己得不到满足的情感施加到当政者和年长者身上的一种“卑劣”的“复仇冲动”，因为“世间总是只有少数人才能忍耐那种意识到‘责任’的痛苦，而多数人对此十分‘憎恶’”。[399]

此外，江藤也抱有与同一代的年轻文学家不协调的感觉。1959年8月，在石原慎太郎和大江健三郎为首的“年轻日本会”的成员之间，召开了一场研讨会。[400] 担任主持的江藤觉得他们在艺术和政治方面的观点并无新意，和明治、大正时期知识分子的言论大同小异。

这次研讨会之后，江藤主张参会者绝对认同自己的言论是受到“新东西就是好东西”这样一种战后价值观的影响。“对他们来说，所谓‘革新’在多数情况下是‘脱离现实’的同义词。脱离后的去处是‘革命’这一观念，或许源自西欧的文化，或许源自‘战争’以及‘最新的一代人’的自负。”[401]

于是江藤开始认为“革新”、“革命”以及追究战争责任等不过是“脱离现实”的代名词。在这前后，他“突然开始怀疑是否对小林秀雄抱有不公正的态度”。[402] 从1960年1月开始，江藤开始写评传《小林秀雄》，论述小林如何克服评价对死的冲动。这期间，他直面1960年的安保斗争。

1960年5月19日，江藤对电视新闻中的强行表决感到十分愤怒，并积极尝试反对运动。5月23日，江藤加入的“年轻日本会”发表了抗议声明，6月4日，高喊“民主主义复苏”的口号举行了集会，6月11日，召集各政党的政治家举行集会。

在运动的漩涡中，江藤投出一篇题为《沉默的人也要奋起》的文章，发表在《中央公论》7月号上。如第十二章所述，该文就如“多声部赋格曲”一样提倡“新市民运动”，但后来从江藤的著作集中删除了。

但这篇文章毕竟还是反映了江藤的矛盾心理。[403] 江藤认为，强行表决是应该从“普通市民的常识——生活的感觉”出发遭到批判的东西，问题不在于安保条约的是非，而在于议会民主主义秩序的恢复，“现在整个日本都在时时刻刻散发着尸臭”，“尸臭的另一边可以感觉到的是法西斯的不安”。江藤在该评论中，这样形容“年轻日本会”召开的集会：

> 聚集在这里的人们……像濒临死亡的病人一样孤立无援，充满恐惧。所以恐惧死亡的人，将会无止境地忍受迟早要到来的黑暗冰冷的恐惧，不自觉地像寻求病床边的手一样去寻求那些拥有同样恐惧并且意图逃避恐惧的人们，于是大家聚集在一起了。但是，如果屈服于这种恐惧鲁莽从事只能是自取灭亡，那么与其鲁莽从事，不如与更多市民携手共进。而且，身边的议员们也会一起积极推动。

在安保斗争中，江藤寻求能收拾混乱局面的指导者，与自民党反主流派的议员进行交涉。他的看法是，屈服于“尸臭”的诱惑而鲁莽从事的是全学联主流派，“仅仅是因为他们很‘纯粹’这一点不能成为做任何事情的借口”。[404]

但在江藤的评论中，比全学联更令人痛恨的是不能指导全学联的社会党，江藤痛骂他们“奇妙地悲怆的自我怜悯”、“政治性自慰主义”、“不负责任”。[405] 江藤认为，不能给陷入混乱的年轻人做出榜样的无能指导者，更应该受到批评。

江藤也十分讨厌同样同情全学联的进步知识分子。在1960年1月羽田机场的游行中全学联主流派的领袖被捕，知识分子开展营救运动。对此江藤表示，“并非要责骂这种愚蠢的行为，只是觉得‘同情’的知识分子”没有男子气概且不道德。[406]

6月10日，发生了一起对江藤影响很大的事件。这天，作为特使来到日本的美国白宫报道官哈基提（James Campbell Hagerty），被呼吁“反美爱国”、以共产党的全学联反主流派为中心的游行队伍包围，后来乘坐美军直升机逃离现场。

江藤在现场亲眼见到了游行，游行队伍高唱《民族独立行动队之歌》，高呼“反美爱国”，江藤感觉到自己的战时记忆被唤醒了。看着包围哈基提汽车的游行队伍，江藤感觉“自己心中的情绪被激发了，汹涌澎湃”。江藤认为游行队伍完全失控，宛若“巨大的变形虫”。为了寻求可以收拾这种“混乱”局面的指导者，江藤与附近的社会党议员、国民会议的领袖极力争辩，但并没有得到预期的反应。[407]

在这件事的报告中，江藤批判社会党议员是“无责任的象征”，把整个事件形容为“暴露出进步派领导人颓废无能的闹剧”。[408] 过去用在批判天皇制度的“变形虫”、“无责任”之类的形容，现在又放到了“进步派”的身上。

但另一方面江藤认为，本该被厌恶的“变形虫”也具有诱惑力。他在安保斗争中从未参加过任何一次游行示威。但他在《思想的科学》杂志上与藤田省三的对谈中，以禁忌的诱惑的甜美来形容安保斗争：“感觉就像熟烂的果实即将掉落，我很害怕”，“熟到快要烂掉了，但又带着一股甜美的味道”。[409]

本来江藤在战败后一边埋头读太宰治的作品，一边倾向于马克思主义，在石原慎太郎等人负责的研究所中有过“措辞激烈的演说”。此时的

经验，使他之后称“在接近马克思主义实践运动的地方，感觉自己从他（太宰）那里找到了实现灭亡逻辑的道路”。[410] 虽然最终面对着不适合政治的文学，他内心隐藏的浪漫取向却很大。

恐怕因为这种浪漫取向，江藤和吉本隆明意气相投。如前所述，江藤在1959年的《关于“体验”与“责任”》一文中评论“战时派”知识分子的同时，善意地引用吉本的“死亡并不恐怖”。吉本一方也评论江藤是进步的知识分子，并表示欣赏。还称赞江藤的《作家在行动》是优秀的文风论。[411]

江藤也从与吉本不同的角度，批评1960年安保斗争后兴起的“战后民主主义”。1960年10月他发表了《“战后”知识分子的破产》的评论。与吉本一样，这篇评论批判了丸山真男关于安保斗争的总结。

江藤尤其批判的是《世界》杂志1960年8月那一期刊载的丸山的演讲《复初之说》。丸山在这次演讲中呼吁大家不要忘记日本战败时决心重建国家的那段历史，并提出重建公众关注。吉本对丸山反感的是重建公众关注的那部分，江藤的立场却不同。江藤因丸山唤起了战败后自己家族没落一无所有的往事，而表现出强烈的反感。

本来江藤与这个时代的年轻知识分子并无不同，都受到了丸山的影响。他在批判天皇制和“战时派”知识分子，以及安保斗争的指导者时，时常引用丸山的“无责任体系”一词。政治是结果责任的问题，与动机的纯粹性无关。对全学联的这一评价也受到丸山的影响。因丸山并没有给出自己期待的回应，江藤对此十分愤怒。

江藤对丸山的批判也显示了他自己的风格。江藤认为以8月15日作为基点来批判日本的现状，是依靠观念、逃避现实的自我绝对化。

江藤认为，“‘战后’看待正义实现的方式”是从“把一些道德性价值导

入战争”开始的。但战争不过是力量与力量之间的对决，战后改革也不过是美军必要的占领政策而已。“和平”也没有什么神圣的价值，只是回避争议的日常性努力的“散文性”行为罢了。[412] 但进步的知识分子，却把安保斗争视为“在现实基础上大书特书自己的抒情诗的良机”。[413]

所谓战后的和平主义，不过是“在取代武力的‘绝对和平’这一点上，向冠绝万邦的激进心情的表现，‘中立主义’最后也不过是由支配世界变为从国际性权力关系中逃离出来这一愿望的政治性表现”。虽然有评论认为在安保斗争中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结合在了一起，但实际上也不过是“战时猛烈的狂热主义打着‘民主主义’旗帜复活”而已。全学联之所以获得支持也只是因为他们是“纯真”的“超民主主义者”。[414]

何谓“战后”？不过是把物理性的战败虚构为和平、民主主义的实现罢了。“进步的文化人”为了守护因战败而“受伤的自尊心”，“试图回避现实，并拼命呼吁新的规范”。江藤说：

> “战后”的那些虚构要去除才好。可以看出，所谓一直支撑日本的是那些实干家，而将其置于危险境地的是理想家的幻影的这种极端的想法甚至今天仍然存在。看得出这些实干家中的每一个人到底忍受了多少不幸。生活人是不会把不幸幻化为观念来试图消除的。[415]

江藤的这番评论，也包含一些尖锐的指责。但他在战争刚结束时还十分稚嫩，实际上并不知道战后思想的流派。后来江藤写下了《昭和的文人》这本书，其中论及了中野重治，中野在《五勺酒》一文中诉说了对战死者的追悼，批判了宪法，这被视为中野保守民族主义的流露。[416] 若将批判宪法当作当时共产党的公开方针的话，这种解释又显得未解其意了。上述的战后思想批判可以说大部分是以江藤的思考为前提进行的。

江藤在1960年安保之后发表了《政治性季节中的个人》一文，在文中宣称，“毫无疑问，支配那一个月的是一种试图自己消灭自己的异常

氛围”，“我是自己的主人，否则怎么进行文学创作呢？”[417] 对于安保斗争的高涨，江藤内心既向往又反对，因为他主张融化自我以逃避现实。

但此时的江藤并没有转变成保守民族主义者。这时江藤对进步派革新民主主义进行激烈批判的主张，虽是他对于“政治”的“个人”主张，却没有从保守的立场来倡导民主主义。[418] 江藤内心一直没有改变的态度是，把“民族”当作“幻影”，“并不是有了国家才有了自我”。

在“民主”与“爱国”的共存逐渐崩溃的这段时期，从革新民族主义中脱离出来的言论家不止江藤一人。如前所述，大江健三郎将冲绳和山村当作对抗国家的共同体，以此为立足点，脱离了民族主义。吉本隆明则通过家庭的共同性来批判国家。

但是战败时失去“故乡”的江藤并没有选择大江所走的道路，在家务纷争中成长起来的江藤也没有吉本那种家庭观念。在1966年进行的江藤和吉本的对谈中，吉本对家庭大加称赞，与此相对江藤则说道，“家庭关系一面是伦理，另一面是政治”，“因为绝对不能理解别人的痛苦，家庭生活才是可能的吧”。[419]

对这样的江藤来说，能够对抗民族主义的旗帜只有“个人”。但是另一方面，江藤身上并没有战前的那种生活感觉，像过去的老一辈自由主义者那样，认为如果能批判“政治”的过剩、排除军部和共产主义的话，可以乐观地认为“个人”能回归到稳定的秩序。在无法超越神的日本，现代意义上的个人是不可能形成的，因为孤独，只得陷入无尽的“我执”之中，这就是写下《夏目漱石》后江藤的主张。

经历过1960年安保斗争的江藤，陷入了不安状态。他必须寻找代替一直以来受到保守派赞赏的战前型家族与国家的一种新的共同模式。之后江藤慢慢发现在美国与“明治”时期的民族主义中能找到那种共同模

式。

在美国发现“明治”

1962年，29岁的江藤作为洛克菲勒财团的研究员去普林斯顿大学留学，最初是想研究英语，不久后开始讲授日本文学，与妻子在美国待了两年。

与那一代人并无不同，江藤也对美国感情复杂。虽然他在战败之初就开始学习英语，但从想逃离“战胜者与战败者的关系”这种“心理上的自我防卫”出发，他“不看美国电影，不听美国音乐，也不听英语广播”。[420] 1962年，日本人出国并未实现自由化，携带外汇出境也受到管制，与日本相比，美国是富有得多。

虽然如此，留学后的江藤在普林斯顿大学仍度过了一段舒适的日子。在欧美留学陷入不适应的状态，从而变成民族主义者这种事情并没有发生在江藤身上。相反，江藤则在适应美国价值观的过程中对民族主义进行了省察。

江藤之所以能够适应普林斯顿，有其个人原因。江藤把美国社会视为适者生存的竞争性社会，同时在那里发现了与日本社会“粘着性关系”大相径庭的“舒适的距离”。他在题为《美国与我》的留美回忆录中说道：“不会向他人撒娇的我，在严酷的美国社会中，发现了与自己的感情十分契合的东西。”[421]

江藤讨厌居住在美国的日侨社会。他称之为“病态的小社会”，厌恶他们那“无穷的好奇心和以‘热心肠’之名来干预他人的私生活”。对农村和平民区生活一无所知的他表示自己“在东京没有过那种被干涉的经历”。[422]

江藤在性格上属于“不会撒娇”的那种，而且因为成长在战前的城市中产家庭，礼貌礼仪和举止细节都非常好。后来江藤在《昭和的文人》中评价堀辰雄，批判堀辰雄一边从养父那里借钱，一边创作浪漫主义作品。但在平民区长大的吉本隆明指出，堀辰雄出生在平民区，而“平民区中，日常生活中借贷十分平常，米柜即使空着也并不着急”。[423]

江藤对家人和性采取克制态度，之后其“生活者”和“大人”形象，也是由这一背景的杰作。与江藤要好的福田和也在江藤死后说道：“无论如何，‘江藤是认真的生活者’。”“绝对不会拖欠各项公共费用”，“但真正的‘生活者’不就是那种无论电话停机、停电都可以怡然自得生活的人吗？”[424]

江藤在美国发现了“契合的东西”，这与普林斯顿是座残留着清教徒气息的学术性城市有关。在那里，有着江藤幼年时代所熟悉的、与战前中产阶级氛围相似的东西。当时的普林斯顿大学正处在麦卡锡主义将左派知识分子一扫而光、反越战运动爆发之前的一段时期。另外，江藤评价那时的普林斯顿大学是“具有国际性氛围的大学，完全不会欺负新生”，好像自己也从没有遇到过严重的种族歧视。[425] 要是江藤1970年待在纽约的话，就会有相当不同的美国观。

江藤在适应普林斯顿的生活之后，于1963年夏天短暂地回到日本，看到东京因承办奥运会而大兴土木，目睹了东京变得“猥劣”（杂乱不堪），成为一座“丑陋的城市”而大受冲击。而江藤的出生地大久保也成了“情人旅馆遍布的街道”，[426] 对江藤来说这已经不是“故乡”了。之后，江藤回到他美国的“自己的家”，发现“自己的家未必位于自己的国家，这也不错”，体会到了这种“新鲜的发现”。[427]

但江藤并没有选择在美国永久居住。虽然他在留美的第二年就在普林斯顿大学取得了教职，但拒绝延长聘期，选择了回国。理由之一就是，对于文学家江藤来说，日语是不可丢弃的语言，当然除此之外还有

其他各种各样的原因。

首先，江藤完全不适应美国的实用主义。江藤曾在受邀去一个美国家庭时，看到那家主人把日本被占领期间低价买入的一个刀的护手，作为壁橱的把手来用。这个刀护手比在小林秀雄家里看到的那个“有过之而无不及”。看到这个情形江藤“暗自愤怒”，“要是没有亲眼看到刀护手变成壁橱把手的话，战败这种事情就不会铭记于心”。[428] 虽然之前批判刀剑的美，但原本就审美主义的他厌恶美国的这一方面。

江藤不在美国定居的另一个原因恐怕是他在无意之间避开了“家”与“定居”。江藤夫妇虽然已经结婚五年了，但还没有孩子，只养了一条狗，一直辗转于租借的房子中。江藤在1967年的文章中说道，“憧憬拥有自己的房子，成为父亲”，“这个‘什么时候’越早越好”，一听到“家”这个词，“自己心中就有种隐隐的激情喷泻而出，无论如何都抑制不住”。他把这种状态形容为“不知什么时候就突然变成了工作的游牧民”。[429]

江藤在美国发现的舒适，只不过是作为暂时住在美国的外国人的无拘无束。他在从到美国开始直到回国之前记录的随笔中写道：“我像是与这个国家进行不幸的恋爱，想要停留在亲密好友的层面。”[430] 定居对于江藤而言，意味着他在美国找到的“舒适的距离”的消失。

这样江藤就陷入了在美国和日本都找不到“故乡”的境地。他发现的“故乡”不是空间上的，而是时间上能保留“舒适的距离”的“明治”。江藤在第一次踏入寄宿制、全是男生的普林斯顿大学时，回想起了“曾经参观过一次的防卫大学校”：

> 我突然产生了一种自己置身于明治时代的幻觉。出身士族或者是新知性士族的“书生”，面前有一本韦伯斯特编纂的词典，就好比是在想着Learnings in the Nation’s Service的时代——总而言之，那时，虽只有一瞬间，但我确实察觉到周围有一种可以说是士族的气氛。然而，那或许也只

是我从充满着反士族氛围的东京来到这里，接触到不同性质的校园，因而产生出唤醒了深潜于自身内在的某种幻觉。无论是不是幻觉，总之是一种愉快的体验。我一想到在战后日本消失的某种精神在这里得以保留，就不由得热泪盈眶。[431]

如前所述，虽然江藤在留美之前研究夏目漱石，却也未曾写过对“明治国家”的赞美。留美归国后，他开始把祖母与祖父出生在明治时期写入回忆录。换而言之，江藤之所以发现了“明治国家”，得益于他在美国生活过一段时间。[432]

此外，江藤认为“美国确实有助于战后日本人寻找他们丢失的记忆”。他所发现的美国是一个如他幼年时期的日本那般，人们可以毫无罪恶感地讴歌爱国心，年轻人可以通过为国捐躯实现人生价值的国家。江藤见到身穿预备役军官训练课程制服的美国大学生们，感受到从他们身上所发散出来因“为国”而勇于赴死的美丽光辉，这令人感动，也让人觉得残酷。[433]

1963年夏江藤短暂回到日本，经历了这些之后，得出的结论是东京十分“猥劣”。在这次短暂归国期内，他在和友人喝酒时，“总是莫名觉得自己邂逅了逝者的幻影”。在跟乐士和客人一起唱着军歌的酒馆内，他常常产生如下幻想：

我对这种唱军歌的客人有种厌恶感，当然，对于出入这类场所的自己也十分反感。……心想着快点离开这个地方，可是，又该去往何方？如果连生养自己的东京都已不是故乡的话，难道要把美国当作故乡吗？那真是一种难以名状的心情啊。

就在那一瞬间，我切实感受到了那些死者的实际存在……我听到他们振翅的声音，其实并不仅仅是听到，我甚至感觉了他们浮游在周围的气息。而令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这种感觉是自我回到东京以后，才开始慢慢变得强烈起来。……

……对我来说，已可归去。可一想到归去，不自觉地忆起之前在战争

中死去的三百万同胞——他们为国捐躯，甚至至今依然留恋着日本，灵魂在这里飘荡，不愿离去。追逐着日新月异的现代化生活的人们，若是能回到被人遗忘的逝者之处就好了。[434]

本章开头引用的“死去的士兵”是真实存在的，据江藤所述，就是以虚构的语言存在于战后日本的酒馆内。如前所述，江藤开始把自己生母和祖母写入书中是在这种经历之后。恐怕对他而言，曾经唯一的“故乡”的“尸臭”，是战争的记忆和迷失的幼年时代，而且家庭的印象变得越发模糊，从那“懦弱、丑恶的东西”中飘走了。

心怀如此感慨回到美国的江藤在1963年11月碰上了肯尼迪总统刺杀案。已经在普林斯顿大学出任教职的他，被学生们穿着军服参加肯尼迪总统的追悼仪式的行为感动。看着追悼会上陈列着肯尼迪生前的照片，发觉那是“一种无法表达的美丽”。之后他认为美国人民肯定会集结到一起，为逝去的英雄而无声哭泣。[435]

然而江藤有时会感叹，肯尼迪不愧是美国的总统，自己的英雄却不知在何处。在电视直播的肯尼迪葬礼中，他发现了池田勇人首相的身影，但他不得不承认“美国总统的职位被美国人尊敬，但日本人绝不会像美国人那样尊敬这一职位”。[436]

就这样江藤想起了在普林斯顿大学为日本文学史备课而阅读过的明治时代《伦敦时报》上的报道。上面写道，明治天皇在临死之际曾感叹：“日本人如何做到肃静而又威严地表现自己的悲伤呢？”江藤只要回想到这些，就深受震撼。[437]

实际上，江藤尽管感受到战死者对“故乡”的眷恋，也有无法赞美太平洋战争的理由。如前所述，江藤的父亲对战争和总体战体制不感兴趣。回想起来，当时还是早熟少年的江藤也目睹了“大战中海军士官的腐败和丑态”。但那时他并没有否定日军本身，只是考虑到“这里的海军似乎与祖父时代的海军不同”。[438]

如第三章所述，无论是司马辽太郎，还是丸山真男，在面对战争中日本的“丑态”时，不由得回忆起“明治”，这是战败后的一种普遍现象。但像丸山等人，他们以批判战时的日本、建设战后的日本为立足点发现了“明治”。然而在江藤看来，批判战后的日本，正因为把充斥在他故乡——战时日本中的“尸臭”，品味成“舒适的距离”，才发现了“明治”。

同时，“明治”的发现，也是缓和被美国同化的不安的必备良药。江藤在短暂回国后再次赴美时，在机场见到了一名走路姿态已有美国女性风范的东方女性，当他意识到那是自己的妻子时，“突然有种恐惧感”。然而，如若美国和明治时期的日本一般相似，那么就会意识到，同化其实是成为“真正的日本人”的过程。江藤阐述道：“在我内心中，重新拾回日本的过程，与我在生活中渐渐熟悉掌握的英语成正比。”[439]

这种“明治=美国”的同化也是对战后日本的一种否定。江藤在同美国知识分子讨论时，注意到他们只考虑把1960年安保斗争当作反美民族主义的流露。这与江藤此前的想法一致。江藤一边和他们讨论，一边体会对“战后的‘国体’——‘和平’与‘民主主义’理念”进行自由批判的快感。于是他渐渐意识到，他“在找回深藏在东京生活时意识深处的自我的同时，反而开始深深融入了美国社会”。[440]

同时，江藤意识到，夸耀自己的民族出身和日本传统文化更容易适应美国社会。江藤夫人在聚会上的一袭和服赢得了客人们的赞赏，当初苦于适应美国社会的江藤自身也开始进行有关日本文学的演讲，从而博得了喝彩。他把这理解成是“恢复‘日本人’的经验”，然而，事实上这无异于坠入留美社会中“日本人”的陈规旧套。

江藤也证实了丧失民族文化的移民是无法适应美国的事实。他在普林斯顿认识了一位老人，这位老人因舍弃意大利文化想融入美国文化而被意大利共同体孤立。江藤形容他是“不会社交的人”，评论道：“他虽

然已经不是‘意大利人’了，但与‘美国人’也还有无限的距离。”[441]

江藤也意识到这样一种身份的获得是“成为大人”的过程，他在普林斯顿的宿舍洗脸时发现自己的头发渐渐稀疏，感觉到自己已不再年轻。此时他的评传《小林秀雄》获奖的电报相继从东京传来，他“不由得深刻体会到自己正是吮吸着日本文化的乳汁而活着的，并怀有某种暗暗的自豪感”，产生了“自己到底是谁，现在在哪里的感觉”。[442]

对江藤产生了更大影响的是他在普林斯顿的教学经历。他在美国实现了从事“正经职业”的梦想。关于第一次讲授日本文学史时的感触，他写道：

> ……学生们都奋笔疾书做着笔记，这种意外的情景让我非常感动，我从来没有想过还有这样一种新的人生价值开始在自己身上萌芽。……通过讲课，我感觉是将自己奉献给了从过去到现在的整个日本文化。想来，我也许在无意识的深处怀着某种信念，等待着一种能够让我自我奉献的东西的到来。然后现在我或许感觉到，它终于来了。[443]

这种影响也反映在他对夏目漱石的看法上。从美国归国后，江藤对夏目漱石提出了新见解，认为“担任第五高等学校的教授、授勋高等官六级这些经历使他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夏目漱石以此为契机提出了‘国家’的概念”。[444]

根据江藤归国后1965年写的《日本文学与“我”》，夏目的主题克服了“作为近代人痼疾的‘我’”。这个“我”是“‘人生价值实现’之前的无限定、无所属、无防备的”，“懦弱、丑恶的东西，永远不忍直视”。另外，乃木希典将军在明治天皇去世之后自杀时，夏目觉悟了，想要“立即恢复‘为了祖国’的这种已经失去的人生价值”，“磨磨蹭蹭的干什么，这不是你的家吗”，如同幽灵的声音一样催促着，我进入了一个“幻影的家”。[445]

通过这种形式，江藤隔着“舒适的距离”，充满了对“尸臭”的欲望，也渐渐得到了自我安定。他在回国前的1964年6月发表的《国家·个人·语言》中写道：“在美国生活的这两年间，我对‘死亡的感觉’是非常迟钝的。”[446]

另一方面，大江健三郎在江藤赴美的前一年发表了《十七岁》，书中人物右翼少年说道：“我害怕因恐惧而死，对于无法把握这个世界而感到无力是因为我的私心还在。有私心的我感觉自己奇怪地充满矛盾、复杂和卑劣，都超出极限，因此感到异常不安”，但又同时梦想着“能抛弃私念为天皇陛下奉献身心”。他呐喊道：“我即使死去也不会消失，因为我不过是天皇陛下这棵永远的大树上的一片嫩叶，我永远也不会消失！因为我克服了对死亡的恐惧！”[447]江藤表示“深深地理解”这样的大江。

此外，从江藤的《日本文学与“我”》来看，“是禁止使得社会秩序成立。在这之中，人们维持着自己的个体。在个体消失的瞬间，就会变得恍恍惚惚”。[448]献身于国家既定的秩序中，是解决长期以来让江藤感到苦恼的安定感和恍惚这一二者悖论的不二法门。

因此江藤在留美期间，既体会到了克服对死亡恐惧的安定感，也体会到了亲近死亡恍惚的快感。通过在普林斯顿授课实现的人生价值让他获得了安定感，同时，“深夜，一个人在大学城自己的房间里备课时，我又感觉到了那些死者的存在”。另外他认为，“通过告慰死者，在与死者的联系中确认自己的存在，证明过去依然存在之事，这难道不是永恒不变的文学的根本作用吗？”[449]不久，江藤对妻子说：“回国的话，真想住在靖国神社附近呢。”[450]

另外，对于江藤来说，判定与“死亡”、“国家”之间的距离，与家人特别是与父亲的关系密不可分。在回国前写的评论《国家·个人·语言》中，江藤写道：“两年的美国生活让我不得不注视战后的日本处于极其

异常的状态”，“不愿接受伦理源泉的国家，只会储备金钱，扩大出口”，“于是人们变得孤独，看什么都觉得是善的，不知恶为何物，人们只是活着而已”。他还说道：

> ……不得不重新认识到，现在日本维系自己的力量就如老父亲的力量一般脆弱。
>
> 过去的日本有着现在没有的纽带，这种纽带恐怕就是国家强制赋予公民的义务，或者是公民抑制私念履行义务时产生的场景。鸥外身上对履行义务的要求，如同他写的《舞姬》一般强有力。文部省下令“学习英语而不得学习英国文学”，漱石被这道命令束缚得开始神经衰弱。即便是浪子荷风在经历四年的国外生活后也并不自由，因为父亲等人总是提出各种要求。但现在我还没有听到任何来自外部的强有力的声音。[451]

另外，江藤在这篇评论里说道，即便国家没有强制性地附加“纽带”，“我个人也会与日本同在”。回国后，他与父亲以及“父亲的家人”见面，告诉他们自己决定把继承权都让给同父异母的弟弟妹妹，同时写道：“我不会再‘拒绝’父亲。这不是我放弃‘自由’，而是为了让自由变为实质性的东西。总的来说，我想要父亲知道，我虽然完全放弃了长男的权利，但准备接受长男的所有义务。”[452]

江藤重新构建了集死、性、自然、家人、国家等为一体的“懦弱、丑恶的东西”之间的关系。回国后他作为高举国家与“父亲”复权大旗的保守论者，开始在言论界大展拳脚。

幻想的死者

回国后的江藤开始比较“两种民族主义”。在他看来，战后的全面媾和论与安保斗争只不过是自我陶醉，无视他人“激进民族主义”的爆发。明治时期的民族主义却是“关注眼前的他人、抑制自我的伦理”。[453]

江藤认为，西方近代的个人是依靠神来支撑的，江户时代的朱子学

则向我们展示了靠“天”来支撑的人们的样子。“对明治时期的人们来说，‘天’与‘国家’相重合是极其自然的。”此外，构筑了明治时期海军基础的胜海舟、夏目漱石以及冈仓天心，都抱有“对国家这一超越者的忠诚”。与此同时，他们通晓英语，十分开明，具有冷静透彻的国际认识。[454] 但是，这之后的日本失去了面向他人的现实民族主义，在独善其身的理想主义中走向自我封闭。

此外，作为“明治精神”的象征，江藤赞赏乃木希典将军的殉死。他在文学上将为明治天皇殉死评为“生活方式最美的表现”，也是夏目漱石的小说《心》中主人公的生活方式。“连自杀这最纯粹的个人行为，如果不是为‘明治精神’而殉死的话也不会受到侵犯。”江藤认为这表现了理想的“公”的存在状态。[455]

而且江藤认为，日本文学的颓废是从白桦派开始的。嘲笑乃木将军自杀的白桦派作家们，认为“决定‘自我’的存在意义的既不是‘自我’之外的人，也不是社会的其他人”，他们以这一逻辑为基础。但这种逻辑必然会导致他人的丧失，终究导致自我陶醉式浪漫主义的抬头与国粹主义的盛行。与之相对抗的无产阶级文学虽然于马克思主义中寻求“天”的替代品，但他们发现的只是“社会”这个概念，最终自闭于自我完结的思想中。[456] 而且，向“自我”倾斜的战后文学，依旧是白桦派的延续。

虽说如此，江藤对“明治”的赞美一方面提倡被他人打开的现实主义，另一方面又称赞自杀的陶醉，可以说其中充满着矛盾。他在1965年叙述道：“历史学家所谓的这位开启日本‘近代化’的人物，使我们经常处于不幸状态。这是因为，首先我们必须摒弃日本即世界这一自我完结式的世界观，我们必须接受日本只是世界众多国家中的一个的事实。”江藤认为随着黑船的到来，“与‘他人’相遇”的人，“大多数都品味到了如失去处女膜一样可怕的丧失感”。[457]

江藤在东京奥运会开幕式时说，“战后第一次亲手升起日本国旗，

时常在侧目中确保它在家门口随风飘扬”，在电视上看着各国选手一面向坐在贵宾席的天皇敬礼，一面前行的身影，“‘日本即世界’这个逝去已久的黄金时代的梦想，如今意外地以象征性的形式在国立竞技场内实现了，感到很惊讶，也很感动”。他此刻流着眼泪，期望“将世界包含在自我之中，绝不要遇到‘他人’。感觉宛如陷入了对那种‘家庭幸福’憧憬一样的愿望之中”，“因为兴奋感受到性欲的满足”。[458]

于是，江藤在回国后的1967年发表了《成熟与丧失》。在文中，江藤以战后数篇文学作品为题材，主张经济高速发展中的日本在不断丧失“自然”这一“母亲”的同时，给予自己轮廓的“父亲”角色也缺位，这样是不可能长大的。

在1955年所写的《夏目漱石》中，作为“自然”象征的“永远的女性”没有被冠以“母亲”之名。这实际上是江藤关注“母亲”的一个契机，也是他旅居美国的原因。江藤在美国读了埃里克森（Eriksson）的一本着眼于孩子在幼年形成自我身份期间与父母之间关系的书，并根据此书写下了《成熟与丧失》。不仅如此，江藤还在美国旅居的笔记中，对前引被周围孤立的意大利裔二代移民医生与“母亲”的关系来进行论述。

在江藤看来，这名医生的父亲作为第一代移民，下决心要让儿子出人头地，并为此辛勤工作，他们希望能融入美国社会，获得认同。但是，“只要忠实于这种愿望与目的，不论怎样他们必须以某种方式与固执于旧社会习惯与道德的母亲分道扬镳”。这样儿子就“抛弃母亲，无法从背叛由母亲象征的‘意大利人’的这种罪恶感根源中逃离出来”。然后儿子就会“拼命想从追随而来的罪恶感中逃离出来而疯狂地工作、置产、成名”。但最终他变成了“一个不会社交的人”。[459]

但江藤基本上没有同这位医生直接进行过谈话，以上大部分内容出自他的想象。此外，江藤在回国后1965年所写的评论中认为“日本人与第二代移民相似”。[460] 翌年，他写下了《成熟与丧失》。

《成熟与丧失》认为，战后文学中出现的“母亲”，在象征农耕文化与“自然”的同时，也表现了以“幼时从母亲怀中获得的与世界的紧密联系”为基础的“朴素实在的世界”。[461] 在此有着肉体性联系，能真真切切地感觉到世界的存在。

但在农耕文化与“自然”崩塌的同时，“我们就不得不变成‘个人’”，若从被保护者的安宁中分离出的双方互相暴露在“他人”面前的话，我们为了生存下去就“必须成为‘治者’”。所谓“治者”，指的是不逃避现实，认清他人，回避纷争，不断进行着“散文式”努力的人。

1966年江藤写下了随笔《战后与我》，文章以一个家庭没落的经过以及与父亲的关系开篇。文中他认为“‘战后’只是个丧失的时代”，之后他也一直这么认为。

> 我不否定那种思想包含我主观情感的存在，不否定祖辈们创造、维护的明治日本有压迫民众的声音，不否定父辈们系着舶来的领带骑着马的时候，不否定有人被特高警察拷问，不否定战后无论你失去了什么，总有人主张民众得到了很多。简而言之，我一点也不否定诸如“活该！什么国家？”之类的很多骂声。
>
> 然而即使接受所有这些的存在，我的内心深处仍有种难以痊愈的悲伤，我无法否定那些不管多么正义、多么正当化也抹不掉的东西。说这是我的私情而非正义也罢。但在这个世界上难道还有比私情更强烈的感情存在吗？[462]

曾经的江藤在收回无可替代的“私情”的“正义”里，有一部分应该包含了“国家”。但是，在《战后与我》中他写道：“我最近意识到，只有通过父亲才能理解什么是国家”，“我在父亲的影响下想象出来的那个衰弱国家的景象，那个持续忍耐的国家景象从未改变过。今后也不会改变吧”。现在“国家”内仍然充斥着说是“私情”也好，为“公”也罢的充满矛盾的欲望。

江藤在《成熟与丧失》中论述了如何成为承担社会责任的“治者”，倡导“把应该实现近代的政治思想作为理想，就是要将近代以前的‘被治者’普遍性地提升为‘治者’”。[463] 但江藤倡导的是国民单方面显示出“对国家这个超越者的忠诚”。这是少年时期就根植在江藤心中的国家的概念，同时正如他“希望父亲知道自己准备放弃长子拥有的所有权利，并履行长子的所有义务”一样，对他来说，自己和国家的关系也正是如此。

但是，虽然谈到了“国家”和“父亲”的复权，但江藤夫妇并没有孩子，江藤自己并不是一个父亲。从美国回国后，江藤依然居无定所，在超过四个月的时间里辗转于住旅馆和借宿之间，于是在《成熟与丧失》中写道，“父亲所赋予的权威已经不复存在，人们只是像‘父亲’一样的活着”，“为了忍耐这个角色，他或许不得不以超越自己的某种东西来支撑”。[464]

江藤在《日本与我》中写道：“无论如何我也想试着去过为孩子的学业而操心的生活。想放下天下、国家和文学，算算私家车月供还剩多少。”但尽管如此，他还是害怕拥有“自己的家庭”，“想把这个‘某一天’尽可能往后拖延”。在《日本与我》中，江藤提到与父亲的争执，提到把妻子打得鼻青脸肿，并写道：“家庭的幸福是不会有的，因此，这样的我也不可能对天下国家大事有多少关心。”[465]

江藤曾在《芙罗拉·芙罗拉姐姐和少年的故事》中写道，少年的母亲因为“决心建立一个自己过去没能拥有的幸福家庭”，于是放弃了文学的才能组建了家庭。[466] 后来江藤在24岁刚刚开始读研时结了婚，并从家里搬了出来，深深地爱着妻子庆子。在他的处女作《夏目漱石》的封面上印着“谨以本书献给庆子”的字样。

但是，江藤在《夏目漱石》中讲述了夏目与妻子不和，并写道：“不管他的妻子是谁，结局肯定都一样。”为何这样？据江藤说，因

为夏目为住在死去世界里的“永远的女性”所倾倒，“不过是追求理想的妻子的幻影——恐怕就是之前在英国诗歌中提到的女性——的悲剧男性之一”。[467]

江藤的妻子庆子承担了所有家务，管理江藤的写作计划，为让丈夫专心执笔而牺牲自我。由于江藤听到关于“家”的话题就无法动笔，他的妻子承担了回国后寻找栖身之所的责任，终于找到了按户出售的公寓并定居下来。但是，福田和也在江藤死后，将江藤夫妇同心同德的社会评论，形容为“创造出的神话”，并说“江藤夫人这些尽心尽力的行为对江藤是一种娇纵，使他没有了自己就不能好好生活”。[468]

其后，江藤在1971年的评论《〈国家目标〉与〈国民目标〉》中，主张必须恢复“‘父亲’在家庭中扮演‘公’角色的形象”，但同时他又在评论中说道：“疲惫不安的父亲比起自己接受‘父亲’这个角色和权威，更像是在妻子身上重叠‘母亲’的形象，满足自己的这份渴求。”[469]

1970年，江藤在评论《“游戏”世界终结之时》中写道：“战后的日本人自我同一性严重混乱。”认为现代日本是丧失了对现实感触的“游戏的世界”。[470]“自我同一性”这一说法在当时尚不普遍，学习埃里克森的江藤第一个将其引进。

这篇评论认为“‘游戏的世界’就是一个不存在公共事物的世界，或是一个公共事物被委托在某人手里而呈现出的世界”。战后，日本把“公共价值交给美国，自我膨胀”。而所谓“公共事物”就是指把“社会共同体的命运”作为“从自己意志里萌生出来的东西而欣然接纳的心理准备”。“如果没有这种决心，就不存在生存的价值。”正因为无此决心，那些从属于美国的保守派、拥护美国宪法的进步派、三岛由纪夫、全共斗也都变成了“游戏”和“私事”。

为了打开局面，江藤提出“应该废除安保条约，构建新的同盟关

系，使日美军撤到关岛以东，恢复到1941年12月7日前的形势”。即恢复到江藤幼年时代的战前态势。依此，日本人混乱的自我同一性将得到恢复，也可以遇见渴望中的现实。出于这个角度的考虑，江藤提出了如下主张：

> 那是不言自明的现实的恢复，是我们自我同一性的达成。……这是我们第一次重拾自我。我们凝视着重拾自我的自己和现实。如今，我们才算有了真正的人生体验。但是，那个时候的我们……东京的街道突然之间谜一般消失了，看到的只是无边无际的废墟和焦土。天空突然间变得看起来像有很多群半透明的物体，啾啾鸣叫着似乎是在申诉着什么。
>
> ……即使是不知战争为何物的年轻人，也会立即觉察到，这就是在战争中死去的三百万人的哭声，展现在眼前的是战败时东京的景象。这是此前日本人得到的最后的真实体验。我们作为自己命运的主人公，生活在这段历史中，命运的归宿紧紧掌握在自己手中，是拥有直视这种结果的勇气和诚实的最后瞬间。……
>
> 而被实现的自我同一性就是遇到作为失败者的自己。一旦回到现实中就只有失败。……对我们来说，公共价值就是承担失败后的共同体命运所产生的价值。我们那般渴望、摸索自己的本来面目，除此之外别无他物。

对于江藤来说，唯一能体会到的“现实”，就只有从他身体里散发出来的“尸臭”。江藤评论过，战后的日本无法直视战败这一沉重打击，因为“无法理解死者的沉重”，便主张要成为“仅仅以维持生存为目的的‘游戏’世界”。他批评丸山真男所说的“追溯到8月15日”是逃避现实，这与“恢复到12月7日以前的话，就能与‘现实’相遇”这一主张是矛盾的。无法直视战败和没落的重创，把战后日本的社会现实作为“虚构”来拒绝，一味地逃避“尸臭”世界的，只有江藤自己。

随后，江藤在1967—1972年写下了回忆母亲与祖母的《家族再会》。本来对四岁丧母的他来说，具体的记忆几乎是不存在的，单从几张照片作为证明，使用“可能”、“应该”、“无疑”之类的表达，完全围绕想象来写。接着，江藤说道，正是生母的去世，“使我的世界开始丧

失，这是最初的契机”，只会让人感觉到是在虚构现实，是在通过语言来接触世界，就变得主张随着母亲的去世，“丧失”就开始了。[471]

本来江藤所说的“战死者”，就犹如“三百万死者”一般，是极其抽象的东西。对江藤来说，如对吉本隆明米泽时代的同学那样，对有名有姓战死者的记忆是没有的。战死者不是摆在眼前的有着活生生的悔恨和负罪感的真实的东西，而是如同几乎没有关于母亲记忆一般保持着“愉快距离”的安全存在。

如前所述，江藤在1955年的《夏目漱石》一书中写道：“夏目漱石所憧憬的地方在地图上是找不到的，祖国日本不过是他理想之邦的一个媒介。”此外，他在1964年这样写道：“永井荷风对江户的憧憬可以说是他厌恶现实而制造出来的白日梦。”[472] 这些形容对江藤的“明治”、“母亲”，还有“战死者”、“国家”来说，是再适合不过了。

根据江藤的“‘游戏世界’结束时”，“所谓猥亵，就是明知存在无法逾越的距离，却还是迫切地想要化为与己有的欲望融合的状态。”，“性交本身并不猥亵，猥亵的是一边窥视性交，一边沉浸在性交的幻想中”。[473] 江藤可能意识到了内心深处自己对“明治”、“国家”所怀有的感情特征。因此，他特意攻击以丸山为首的战后知识分子，说他们“下流猥亵”。

在战后思想上江藤与旧时代老一辈自由主义者不同，他的特点是从自我同一性问题出发而构造出来的保守思想。老一辈自由主义者在战前中产阶级的安定生活中形成了自我，以在这种生活中养成的价值观和生活感觉为基础，批判战后的社会变动。江藤虽然与那些老一辈自由主义者在出身阶层上重合，但因为少年时期经历过没落，所以无法形成固定的自我同一性。因此，江藤为了忘掉战败的创伤，拒绝战后社会的现实，在构造的“国家”的“白日梦”中期待自我的同一性。

如本章前半部分所述，怀有对战后社会的虚构感以及对“死”和“国家”的矛盾情绪，不仅是江藤，同时代文学家也有相同情况。但江藤的特点是，生母的死与战争的开始相重合，跟父亲的争执与战败相重合，从这个偶然中所产生的矛盾情绪和虚构感与“家”的问题浑然一体。如果江藤只单纯写为国家献身和憧憬为国家战死的话，那么反映给年青一代的可能就只有时代错误了。但是，作为成熟和自我同一性问题来写国家的江藤，也因此能获得对经济高速成长期以后的社会变动不知所措的年轻人的共鸣。

江藤的评论与他的主张相反，具有强烈的个性。江藤在1965年这样评论大江健三郎：“虽然写的是个人体验，但如此便似乎成了写国民体验的作家。”这虽然是在评价大江健三郎，但用来形容他自己也很合适。[474] 从战争和战败开始，一个身负难以愈合伤口的少年，谈论着自己，描述自己想要从现实中逃离的过程。作为坚持“自我探索”的保守民族主义者，衍生出一种上一辈保守论者无法想象的新类型。

然后所有的言行就像这样，江藤也从过去的语言的变奏形式中产生了新的语言。随着新一代的兴起和经济高速发展，“民主”与“爱国”的共存状态渐渐崩溃时，江藤用他自己的方法，将战后日本的保守民族主义改造成与新时代相适应的形态。这其中“明治”与“战死者”曾作为批判战时日本的基准点，又变成了批判战后日本的基准点。

1967年10月，江藤与大江健三郎围绕后者的新作《万延元年的足球》展开了激烈的对话。如前所述，大江在这部作品中认为山村是与国家战斗的共同体。但没有“故乡”可以回归的江藤，从对话一开始就对渐行渐远的大江进行激烈攻击。这就像曾经江藤打弟弟时想的那样让他激愤，“这是嫉妒？是悲伤？还是想把弟弟拉到自己的近旁？我不知道，我只是想把弟弟收拾一顿”。

另外，江藤在这时对大江的批判也与他对弟弟说的“总是这样子怎

么长大啊”如出一辙。对话中，江藤批判大江的作品没有看到日本的现实与他人的关系，只是天真孩童想象的世界而已。

大江对此并不服气。他反驳道，“那个所谓的他人，只是在一个逼仄的地方，即江藤淳的内部存在”，“因为将其视为他人而加以轻视，很容易过于相信自己的思考方式具有客观的普遍性”。“江藤虽然能够诚实地看到自己的内在，对他人的内在却不能那么诚实面对。”“对他人的事情你是不是真的没有一点兴趣啊。”[475]

当然，江藤回击道：“没有这样的事。”但或许大江的这一指责，言中了支配江藤的带有战争伤痕的性格及他构筑的保守民族主义态度。再加上逃避到保守的民族主义，江藤自己也救不了自己。

1970年代以后，持续创作批判战后和赞美明治文章的江藤，1978年失去了父亲，1998年妻子庆子患癌去世。1999年7月，始终没能如愿做一个父亲的江藤迎来了66岁生日。他以追慕亡者的《妻子与我》及《幼年时代》两部著作作为绝笔，在正值国旗国歌法审议的最高潮中，在家中自杀了。

过去一直对为“公”殉死赞赏有加的江藤在他的遗书中并没有找到与政治有关的言论。而且成为绝笔的《幼年时代》与他曾批判的堀辰雄的小说同名。在写给亲属的遗书中，江藤写道“我要去庆子在的地方”，其署名为自写下《夏目漱石》以来就没再用过的“江头淳夫”。[476]

第十六章 死者的越境

在1960年代，与全共斗运动一样受到人们关注的是越平联。越平联没有固定的组织形式，而是采取“市民”自由参加的运动方式，这也成为此后“市民运动”的原型。在本章中，我们撷取了在越平联中起到旗手作用的鹤见俊辅和小田实加以考察。[477]

鹤见俊辅是把实用主义引入日本的哲学家。他除了研究知识分子的转向和协助战争的历史外，还因创造“十五年战争”这个词和主办《思想的科学》杂志而成为大众文化研究的开山鼻祖，并因此广为人知。此外，在1961年的世界旅行记《什么都去看一看》成为畅销书后，小田实在鹤见的劝说下，出任越平联的代表，成为倡导“超越国家的市民”和“加害的自觉”的作家。

然而，他们所倡导的“超越国家的市民”或“加害的自觉”的主张并不与“追悼战死者”、“受害的痛苦”矛盾，而是作为其发展形态得到提倡。同时也是他们提出自己所认为的“民族主义”的一种尝试。

“慰安所”职员的战争体验

1922年，鹤见俊辅生于东京。1942年，时年20岁，那是一个战死者众多的年份。但在同代人中，鹤见的家庭环境十分特别。父亲鹤见祐辅曾是一名铁道院官员，后当选众议院议员，成为政治家。战后虽然被开除公职，但后来又东山再起，在鸠山一郎内阁中担任厚生大臣。鹤见的外祖父后藤新平，连任台湾总督府民政长官和满铁总裁。另外，鹤见的姐姐和子与俊辅一样，是担任《思想的科学》编辑的社会学家，在1950年代投身于主妇和女性劳动者的生活记录运动，晚年因研究柳田国男和南方熊楠以及提倡内发型发展理论而广为人知。

在这样的家族环境里长大，对鹤见的性格产生重大影响的是后藤新平的女儿，也就是他的母亲。有这样伟大的父亲及政治家丈夫的她，对身为长子的俊辅过于严格与溺爱。

鹤见回忆道，母亲坦率诚实且上进心很强，“是一个闲不下来的人，只要在旁边，孩子的心情就会变得不安”。一回到家就变得很难熬，回家晚了会被母亲训斥。如果被发现反抗母亲或偷吃东西的话，母亲就会自责道：“生出这么可怕的孩子是我的责任，我们一起死了算

了。” [478]

鹤见并没有停留于严格与反抗的恶性循环之中。出于对严格控制零花钱的母亲的反抗，鹤见从小学起就开始偷东西，偷完东西就离家出走，乱搞两性关系，自杀未遂，学校两度将其开除，最后和母亲一起被送进一家亲戚开的精神病院。

另一方面，父亲祐辅在一高英法科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是自由主义政治家和畅销书作家，被称赞为不愧是东大出身的高材生。鹤见也受到父亲的影响，从小学就开始写小说，一天平均读四本书，小学毕业时已读了大约一万册书。 [479]

就这样，鹤见虽反对母亲，却继承了母亲的纯粹和父亲的上进。鹤见回忆道：“从儿时开始就追求在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十全十美的英雄。” [480] 但过于美好的理想并不能完全实现，“从十三岁开始苦恼于自己没有写小说的天赋，一边轻视不读书的同学，一边用反抗的态度反复交白卷”。

冈部伊都子说道，鹤见觉得“母亲绝不允许说谎。不说谎的人是没有的吧，只有母亲是不说谎的”。 [481] 就这样，在母亲的言传身教之下，鹤见认为自己是个坏人并为此感到苦恼，错误不断，自杀未遂也频频发生。于是晚年的鹤见在涉及思想转向及战争责任的问题时，采取了知识分子和保守政治家的那种“绝不允许说谎”的态度。

因为不适应日本的学校氛围而患上抑郁症的鹤见，在父亲的安排下，1938年被送到美国东部的学校。鹤见回忆起此事时说道，在我与母亲的斗争中父亲彻底向我“认输”。 [482] 离开母亲身边的鹤见，停止了不良行为。在全宿舍制的男子寄宿学校里，鹤见是唯一的外国学生，因刚过去完全不懂英语，志在“满分”的他就强迫自己每天背诵50个单词，并努力学习到深夜。

当时也被送到美国学校的姐姐鹤见和子说，她到俊辅寄宿的公寓时看到墙上贴满了他训诫自己的字条。和子对此说道："纸条上的戒律或许是母亲的训诫在其内心的反映。"[483] 就这样，鹤见的成绩不断提升，于1939年进入哈佛大学，攻读实用哲学。

据鹤见回忆，因生活在有名的父亲和外祖父身边，他有着沉重的压力，但在美国"我的名字不会让人产生什么联想"，这种情况还是第一次遇到，于是只顾刻苦学习，以成绩竞赛名列前茅为目标。大学时代，鹤见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学习上，虽然也因压力而烦恼，但"一想到其他家伙成绩不如我，便又能提起精神了"。[484]

但1941年12月，日美开战了。那时鹤见还不明白必须与美国为敌的理由。尽管与此同时他已预见日本战败是必然的，但他希望"和日本民众一起接受战败"。鹤见虽然认为"这种想法毫无根据"，但感到"当日本国家战败时不在日本是不行的"。[485]

从少年时期就开始接触无政府主义思想的鹤见，并没有打算把日本这个国家和自己视为一体。尽管他在和母亲的争执中觉得自己是一个坏人，与所谓的"正义"格格不入。虽然不愿听从日本政府的命令，但在战胜国美国以正义的名义占领日本时，他却觉得"不能忍受自己说着英语若无其事地回到日本"。战败后有人邀请鹤见到占领军下面工作，但被他拒绝了。[486]

1942年2月联邦警察搜查官突然闯入鹤见的住处，鹤见莫名其妙地背上间谍的嫌疑被带到了拘留所。侨居在美国的日本人当时大多被送到收容所。在这种形势下，阅读了无政府主义文献的鹤见被特别关注。但并没有恐怖的拷问，在以收容所为主题召开的听证会上，作为特别辩护人出席的教授热心地为鹤见辩护。尽管就读时间未满，又在拘留期间，但在拘留所以马桶为桌子写完的毕业论文，还是被哈佛大学认可了。

通过这一段经历，鹤见尽管对美国的傲慢态度心存反感，但也觉得接触到了扎根于美国市民社会中的“民主政治的根基”。他说自己晚年尽绵薄之力参加反越战运动是为了抗议美国政府，同时也是为了回报美国市民社会的“恩义”。[487]

三个月的拘留后，鹤见通过中立国瑞典的交换船被遣送回日本。这一段拘留经历对鹤见来说是对美国的重新认识，而被遣送回处于战争状态的日本则开启了他对“日本”的重新认识。

在驶向日本的交换船上，“先是外务省及其他官员、财界人士及其家人，然后是民间企业员工、官员随从、学生”，按照这一顺序，从上层开始分配客舱。像鹤见他们这种学生被塞在船的最底层。[488] 交换船避开已成为战场的太平洋，横渡大西洋到达非洲的莫桑比克，在此换乘从日本开来的船。换乘时人们所表现出来的变化给鹤见留下了深刻印象，人们“突然一下变回了日本人”。

换乘日本船之后，来自日本的军人立刻向美国归来的青少年们宣读了开战诏书，并告诉他们战时的注意事项。听着满是汉字熟语的诏书，对这些归国子女来说，“初听这些词觉得晦涩难懂”。对15岁就离开日本的鹤见来说也是如此。当时有一女学生问了军人一个问题，就是在美国有直接拒绝服兵役的运动，在日本也可以谈论这类话题吗？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远超鹤见的想象。在换乘之前还没有显现出丝毫国粹主义思想的留美归国学生们开始责备起那个女学生。在那之后，留学生之间弥漫着紧张气氛，“无法随心所欲地说话”。后来回想起来，鹤见觉得这种集体思想转向的现象，带给了他很大的冲击：

> 经过两个半月的航行，我们终于抵达了横滨。集体中，人还是这些人，谁也没有换，但下船时与上船时完全判若两人。出发时和到达时完全不同，是1500人的动态社会学的实例。

这是从一个国家跨越到另一个国家的航海之旅，亦是跨越两种文化的航海之旅。……大部分人包括学生都从一种语言切换到了另一种语言。

这种“语言”的切换，不是单纯从英语转换成日语。在逐渐驶向使用年号纪年的日本之时，大家谈到了“在被问到申请回国时的年月日时，若回答说是19××年的话会挨揍”等，在船上大家就已经开始了从某种“日语”向其他“日语”转换的过程。在美国攻读语言理论和符号学的鹤见将这一体验思想化，战后专心于对这种“转向”的研究。

鹤见说：“在战时日本的那三年，就好像自己在异国他乡生活一样。”1942年8月回国后鹤见发现，在他留学期间，日本国内的气氛有了很大的变化，路边的电线杆上贴着小孩子写的“将百年战争进行到底”的标语。知识分子和学生曾称赞的“社会主义”、“自由主义”成了负面之词，过去在鹤见少年时告诉他所谓《教育敕语》完全是谎言的知识分子前辈，这时竟也开始被《教育敕语》感化得流泪。[489]

回国五天后，鹤见参加了征兵体检。本以为是为在日本迎接战败而回国的，结果看来是自己“太性急且过于理想化了”。由于在美国过度劳累而患上结核病，鹤见被免除了兵役，但仍作为海军文职人员被送往南方战场。鹤见决定不把自己的想法在军队里表现出来，他在笔记本中用英语连续写下训诫之语：“自己保持沉默”；“祸从口出，不要多嘴”。虽然这样默默工作，但一紧张就喜欢把手放在裤边摩擦，“看上去就像面部抽筋”一样的习惯却怎么也改不了。[490]

在日本军队内部，文职人员的地位比最下级的士兵还要低，中上层出身的人容易遭到下层出身老兵的怨恨，受到集中的私刑。娇生惯养的鹤见从美国回来，1942年还没有掌握好日语，连日式礼仪都不得不练习。鹤见后来回忆各种私刑：被并成一列地殴打、强迫无限制地打扫甲板、在床铺下面来回跑着学布谷鸟叫等，一个大男人在人们面前“不得不把自己的羞耻暴露出来”种种。[491]

这种战争经历打碎了立志成为“完美英雄”的鹤见的自尊心，他的性格也被改变了。1955年鹤见说道：“从战时社会走出来，感觉到这种完美主义是徒劳的。所有的失败，都只增加了良心的重荷。”[492]

在军队里，鹤见觉得士兵里有两种类型的人。一种是满怀上进心，坚信战争的信念，对军务认真负责的年轻水兵。还有一种是人到中年被征兵，没有出头之日的老兵。前者把动作迟缓的鹤见当作不容赦免的私刑对象。与此相对，后者虽然作为军人是劣等生，但会悄悄地保护鹤见，教给他军队生存“法则”。

这种战争体验影响了鹤见的人生观。充满上进心的“纯粹”或“正义”，对于没有满足这种标准的人来说是多么暴力的东西，这一问题从和他母亲的关系来说是切实的。由这次战争经历，他说：“苛求完美的英雄，在其视野之外无论接受着怎样桎梏的实践教育，改变自己的理想也是非常必要的。”[493]

在1967年与吉本隆明的对话中，鹤见说道：

> 一旦对吉本持一种批判的态度，我就难以摆脱讨厌纯粹心情的价值判断，纯粹的心情不能采取狭隘的行动吧……也就是会变得极端吧……想把自己从那里移开一点，比如说把身体放软、不去用力。
>
> 战时，万年二等水兵里有三十岁左右的士兵，他们不会先站起来打人。一等水兵大概就会打人。之后，这些孩子也和伙伴们在背后叽叽咕咕地说着打人什么的。因为我是反战论者，被人孤立，恐惧得受不了。在那时，这些人含糊不清的情感让人安宁。[494]

对此吉本回应道：“在对大众的认识方式上我和鹤见截然不同，我所理解的大众完全是他认为的极端的东西。”吉本心中的大众也许是米泽时代的同窗，由此可见鹤见和吉本倾向的不同。

鹤见对军队的文职工作十分厌恶。白天的工作是用收音机监听敌方

的英语新闻，然后翻译出来；晚上的工作是“男女问题的安排”。其工作地爪哇岛的宿舍，在船入港时充作海军将校的“慰安所”，鹤见不得已负责这些宿舍的管理。

在那里，鹤见负责为军官安排女性，用“非常事务性的态度来彻底处理一些杂务”，比如“准备早餐、备好安全套”之类的。如果违抗命令，等待他的自然是牢狱或枪决。鹤见默默完成交给自己的任务，避开一切男女关系，在自己内心用英语思考，“抑住涌到喉咙的恐惧”，在宿舍里只顾读一些《圣经》和宗教方面的书。[495]

设置“慰安所”是鹤见的工作之一。[496] 会说英语的他乘上往返于日本和德国之间的封锁突破船之后，接到建造为德国军人服务的“慰安所”的命令。为此，鹤见和同事在原荷属爪哇岛设置了“慰安所”。同事把残留在岛内的白人女性集合起来，岛内的白人男性早已被抓入日军的收容所。鹤见的同事携带着作为军需物资的肥皂和牙膏粉，与生活困窘的白人女性进行“交际”。

鹤见住在负责情报的司政官官邸里，司政官通过秘密渠道获得吗啡，并吸食成瘾。鹤见的同事们照看司政官的饮食和毒品注射，从机密费中得到零花钱。作为工作的一部分，情报部在当地招募了“数百名间谍”，但通过面试的几乎都是女性，她们“不久被送到德军慰安所、士官慰安所，甚至作为非常要员被送到为高级将校慰安特设的别邸，通过不同的途径发生质的变化。被录用的男子通常用来巡视慰安设施”。

战况变得不利后，不安的日军在当地实行“间谍抓捕”。鹤见通过收音机监听到的不确切情报造成了意想不到的影响，有20多人作为“间谍”嫌疑人被抓。其中大部分是到爪哇岛服劳役的印度男性，剩下的是白人女性。这是“司政官在职期间有确切结果的唯一事情，司政官抓住这个机会，向中央要求扩充人员”。

司政官下达了亲自审问嫌疑人的命令，他们被紧急带到官邸的单独房间，鹤见等人负责监视。恶劣的环境导致嫌疑人生病，但从日本方面得不到药物。鹤见等人把这两个濒临死亡的印度人从官邸里抬了出去，后来他得知他们被杀害了。即使到战后，鹤见仍然清楚地记得这两个被杀的印度人的名字——“罗伊”和“阿扎脱”。

鹤见怀疑这是自己监听的情报不准确造成的，遂与同事商量是否可以释放嫌疑人。同事回答道：“毕竟一抓到他们就立刻上书报告给中央且进行了宣传，所以要么护送到中央，要么就地解决。”考虑到海上交通实际情况的话，后一种的可能性要大一些。日军中的文职人员对国际法一无所知，但鹤见知道没有证据就杀害中立国公民是违反国际法的。他想把这件事诉诸司政官，但因为担心自身的安全，只得沉默不语。

这次经历之后，从幼时起就被以纯粹志向培养起来的鹤见，感觉正义完全丧失了。而且曾有着“完美英雄”情结的他，“只要看到驻屯在爪哇的高级军人的礼装，就丧失了孩提时形成的勋章崇拜”。

在这样的情况下，鹤见“因为外出会惹上麻烦，终日闭门不出，以免犯错误，没有过多的言行”。他也不想学习当地的语言，在宿舍里深居简出，只顾沉默地完成工作。对他来说，“每夜的期望就是不要杀人，不要死亡”。鹤见对自己说，“慰安所”的工作“比起杀人的部门，使男女合体的部门更有善心”。他下定决心，“一旦要杀人，与其杀人还不如自杀”，自杀用的毒药也经常放在随身的口袋里。[497]

这种战争经历在鹤见的内心埋下了深深的悔恨。回想起战败后数年，他说：“我在战争期间无所作为，因此不敢走到人群中露脸。”[498]战败后，鹤见读竹内好的中国论和鲁迅论，受到巨大的震撼，邀请竹内来思想的科学研究会进行交流。

然而鹤见从没想过当逃兵，这不仅是出于对枪决逃兵的恐惧，还是

对另一种“无所作为”的悔恨。

1957年鹤见在《关于战争电影》的文章中谈到他在被迫前往南方前线之前，同小学时代的朋友——当时还是大学生谈话的经历。当时还没有实行学生充军制度，大学生可以延期服兵役，但比别人都认真的这个朋友放弃了这种特权，考虑报考海军。

这次谈话中，鹤见只说了“不要着急”，[499]朋友就反问道：“为什么，你为什么要这么说？”鹤见因不确定朋友能否理解反战思想，加上当时也不准备作为思想犯而被捕入狱，只得含糊其词敷衍过去。结果朋友志愿加入海军，在对菲律宾的海战中战死。这个朋友的名字“一宫三郎”，也作为鹤见心中死者的固有名字而深深地刻在了心里。

在这篇文章中，鹤见回忆道：“我恪守我的失败主义思想，坚信自己是正确的，同时感觉到这种恪守的姿态大概就是美学中的丑。”试着看一下那些描写顽强战斗的少年飞行兵的战争电影，我们就会发现，即使确信战争是错误的也会潸然泪下。文中说道：“在战争期间，面对那些顽强战斗的人们，我总会生出深深的内疚之情。”而在其他回忆中，战争的心情则被记述为“由于熟识的人大多已故，想到活着的故旧就感到如同冒犯一般”。[500]可以说这种“战时派”式的思想成了他无法逃脱的背景。

鹤见在这篇战争电影评论中说，“我对那些顽强战斗的人们的确没有反感”，“不如说是对把责任完全推给军人，战后自己却摇身一变成为自由主义、民主主义一侧的权力者——官僚、政治家、实业家们抱有憎恶之情”。其中近身最熟悉的例子，就是他的父亲。

鹤见的父亲祐辅在战前被认为是一名知美派的自由主义者，他将国粹主义者平沼骐一郎归为“搞坏日本的元凶”。但在1939年1月平沼组阁之际，祐辅作为次官参与内阁之中。鹤见对于“伟大的”父亲“竟为了区

区次官的职位”感到十分失望和屈辱。战后，祐辅被开除公职，1950年代又东山再起。鹤见之后回忆道：“父亲在家给很多人打过电话，从电话的内容来看其思维方式发生了变化。”[501]

鹤见对于自己曾非常喜爱的作家武者小路实笃和仓田百三回国后都高举“鬼畜美英”大旗的做法，表示极度的愤怒。而对柳宗悦、宫本百合子、永井荷风等人并没有随波逐流，心中颇感安慰。据说鹤见在读偶然得到的《评论家手贴》时，仔细核对了那些一改之前论调、开始书写赞美战争文章的知识分子。[502] 这种愤怒后来与同代的吉本隆明交相辉映，也与组织转向思想的共同研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但鹤见和吉本有着很大的不同。与从来没有服过兵役的吉本不同，鹤见与浪漫的战争观恐怕没有半点关系。他在1950年谈道，“我们这些日本人在战争时期远离日本做了什么，是留在日本国土上的人们直到如今也想象不到的”，并指出“纯粹”的少年士兵们同样也是残暴的加害者。鹤见当时提出施虐者和受虐者一体两面的学说，并说道：

> 日本人大多数在小学和中学时期都被限制在严格的框架中，而且没有觉得那是多么痛苦的事情，他们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什么都按照老师所说的去做，完全没有一点自主性，只是囫囵吞枣地学习《教育敕语》和修身养性的教科书，成了典型的受虐优等生。……于是到了十六七岁的时候，被过早地抛出学校成为志愿兵或文职人员，被派到占领区去。如此一来，施虐者的本性便被悉数唤醒。在本土接受了数年日本精神教育的少年，来到占领地后很快就变得每晚花天酒地，随意将当地女性抓进战俘收容所，频繁地拿“毛唐”[503] 的头来做实验，十分嚣张……我们日本人在和平年代，对天皇陛下和官员们就是点头哈腰、卑躬屈膝，战争时期，这些屈辱都报复在他国国民身上，开始凌虐他人。[504]

这一视角，虽然添加了反抗“优等生”和“正义”这一鹤见式的要素，但和丸山真男的“超国家主义逻辑和心理”、竹内好的“奴隶与奴隶主一样”的言论是一致的。鹤见这样回忆自己在爪哇岛的经历：“我处于统治这个岛的官僚组织的最底层，在我之上有种威严通过更加残酷的方式向

当地人传达。我的方式和我的同僚其实并无不同，背负着同样的威严，只是通过两三句蹩脚的当地话下达命令。”[505]

在鹤见的战争体验中，“受害”与“加害”其实是一体两面的。他自己被上级殴打，但同时他不仅作为“加害者”对当地人施暴，对本身就是受害者的“慰安所”里的女性，他也是一种复杂的存在。他回忆在爪哇岛时的经历称：“女性们站在军官的立场上，看着在长官命令下准备酒菜的我们和当地的杂役。……对待白人女性军官尚可容许，对待我们却像对待战前的黄色人种一样施以威严。”

作为最上级的“加害者”，其处境更为复杂。司政官因吸毒过量而病危，没有等到战败就死了。从司政官的住处可以发现大量的装注射药物的空安瓿瓶、诗歌、素描画稿，还有“自传风”的笔记。在笔记的最后几页，画着一个注射器，旁边写着这样的句子：“有一位保姆，在照顾着小孩？”鹤见从留下的自传中知道这个司政官是上海一家医院护士长的私生子，由此断了在日本本土出人头地之路，便来到了爪哇岛。

在这之中，鹤见变得再难单纯判断谁是加害者，谁是受害者。就连原先区分加害者与受害者的准则也变得令人怀疑。鹤见这样谈论爪哇岛时代：“以前世界上的黑与白、正义与非正义将世界截然不同地划分开来。……以正义与非正义一条直线将世界划分开来的信条，在应用上是不可能的。”

战败后，爪哇岛的杀俘行为成了战犯审判的对象。鹤见在审判中提交了证词，他的朋友作为杀人犯被判处死刑。然而朋友被判处了死刑，鹤见却没有受到同样判决，在某种意义上是偶然。即便如此，鹤见在提供证词时成为“正义”的一边，朋友作为“加害者”被处以了死刑。在此后的1959年，鹤见在收集战犯们的遗书而编成的《世纪的遗书》一书中读到被处死刑的朋友的遗书，才得知“他的死刑并不是我的证词造成的”，“心终于落地了”。[506]

在所有的价值观崩塌之中，成为爪哇时期鹤见自我救赎的是在官邸工作的一位叫罗姆的少女的美丽。断绝了与女性接触的鹤见，虽然与这名少女没有过任何交往，“但只要跟在罗姆身后，无论去什么地方都十分乐意。我丢弃了日本人身上的东西。我视我身上背负的廉价威严如补丁，陷入这个岛上无力的生活中”。让人深深感到本来不该对立的人们，因国界和国籍被分割开来，困于“加害者”与“受害者”角色中的“日本人”这一概念只是一套“不自由的制服”。[507]

由于过劳和紧张的累积，鹤见的老毛病肺积水发生恶化，还患上了骨疽。在爪哇岛时病情并未好转，因此被送往新加坡，1944年12月又被送回日本。在新加坡，鹤见经历了南太平洋海战，在空袭中尝到了死亡的恐怖。1945年8月15日，在疗养中鹤见听到了天皇的广播。他觉得那个声音听不惯、很瘆人，对于天皇只强调敌方的残忍，却对日本方面的暴虐只字不提感到十分抵触。

同时，鹤见对以天皇命令宣布战争结束的形式感到深深失望。如第二章所述，他预测到战争期间由于物资的分配不均以及空袭会产生混乱，加入翼赞组织的社会主义者会成为领导者，民众会暴动。但是日本民众，遵循了天皇的命令坦然接受战败。更有甚者，当占领军抵达时，昨天还叫嚣着“圣战”的知识分子、政客们却开始高唱“民主主义”。与1942年鹤见所体验到的一样，又产生了语言体系的转变。

之后鹤见回忆道：“战后的民主化，虽然对于在美国接受过教育的我们来说是很难得的，但其内在缺乏自发性，给人以比战争更加强烈的失望感。”于是1946年5月，鹤见以《论语言的护身符式使用法》一文向《思想的科学》杂志创刊号投稿。在稿件中，鹤见批判道，在战争期间将“国体”、“皇道”等词作为“护身符”的人，这次又将“从美国输入的‘民主’、‘自由’、‘民主主义’等词作为护身符”而滥用，“当麦克阿瑟离去，美国流行时代褪去的时候，他们又会像换鞋子一样轻易地再度置换护身

符”。[508]

经过这种战争体验，鹤见在战后逐渐形成了关于语言和大众的独特思想。

探寻“根本”的志向

1946年5月，以鹤见俊辅与和子姐弟为中心，《思想的科学》杂志创办。杂志编辑中，除了与鹤见被以同一艘船送回的都留重人和武田清子，丸山真男和武谷三男也汇集于此，后来竹内好及见田宗介、加藤秀俊等人也加入了研究会。创刊时鹤见23岁，32岁的丸山已是年长组的了，这是一个相当年轻的团体。

战败之初，鹤见姐弟首先作为美国哲学的介绍者而受人瞩目。战前知识分子的基本教养都是基于黑格尔、马克思的德国哲学，京都学派将其作为铺垫，利用晦涩难懂的哲学术语美化战争。但鹤见俊辅以在美国学到的逻辑实证主义、现实主义、符号学等为武器，彻底地批判了这种“护身符”式语言的不合理性。

但如第七章中所述，进入1950年代后，鹤见姐弟对源于西方思想的启蒙主义进行了自我批判，开始重视“日本的大众”。其后在《思想的科学》上，开始介绍受《山间学校》一书[509]刺激的生活记录运动与社团活动，后来又刊载了大众文化研究等内容。此外在1960年代以后，鹤见俊辅开始将目光投向超越“国家”的“市民”，关注在日本国内的韩国人与朝鲜人，支援韩国民主化，以及开展反越战运动等国际活动。

从美国哲学启蒙到对“日本民众”的重视以及向“超越国界的市民”变迁，从表面来看可以说是毫无操守的。但实际上，鹤见身上存在一贯的根本思想。为了验证这一点，让我们看一下1946年4月刊行的《哲学的反思》。与竹内好的《鲁迅》、石母田正的《中世世界的形成》一样，

这是一部鹤见在战时亲自执笔、可以从中探到鹤见思想原点的著作。

在这部著作中，鹤见列举“批判”、“指导”、“同情”三个词来说明战后哲学的作用。其中，“批判”和“指导”作用在于批判战时泛滥的非理论性的“符号使用法”，面向未来建立起合理的指导。但鹤见思想的特点在于他列举出来的哲学的第三个作用“同情”。

鹤见在这里描述的“同情”并不是指对他人倾注怜悯之情。他所说的“同情”是在承认别人与自己不同的基础上，与他们产生共鸣，进而催生连带感。

鹤见的《哲学的反思》认为，在战时日本，这种“同情”严重不足。首先，日本对于在其统治之下的其他民族缺乏共鸣和相互理解，“强迫其他民族接受本民族风俗”的倾向十分显著。[510] 另外，即使在国内，言论的控制、告密的恐怖、思想转向以及利己主义的泛滥，也彻底破坏了人类的共鸣和连带。鹤见自己也无法相信他人，在压制内心想法的过程中熬过了战争，对人们所表现出来的思想转向状态深感绝望。

鹤见在《哲学的反思》中写道：“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其他想法，所以难免觉得自己在浩瀚宇宙中作为一个个体十分孤立。”而且，“就算是同一个人，战前与战时，对外国人、军人、雇佣兵、资本家等各阶级的人的感觉方式也会不同”。因为人类根本不存在坚定的信赖和共鸣的基石。

然而鹤见在《哲学的反思》中进一步阐述道：“所谓哲学，就是试图同情他人的一种人类意识。”所谓哲学是以对他人的不信任为前提，在寻找共鸣道路上的一种努力。那么应该怎样做才能实现“同情”呢？鹤见说道：

> 人类的世界就是一个个极其庞大的领域，虽然其内容包罗万象，但这之中作为“同情”的哲学成为尤其要考察的对象，是因为其是贯穿于大千世

界共同存在的诸多因子。不是味噌汤或是长靴之类的特殊项目，而是关于诸如存在、他人、社会、时间、空间、圣者（不限于神）、善恶、真伪等一般项目人们的体验及思想。

每一个人，由于出身阶级、社会阅历的不同，性格和思想会有所差异。但试着脱下阶级和国籍这些“不自由的制服”，在人们的本性之处，难道不存在使“万人有着共同之处的诸多因子”吗？即使美国人有着美国人的“悲伤”，伊斯兰教徒有着伊斯兰教徒的“悲伤”，也绝不是“特殊项目”，而“悲伤本身”不是也存在吗？在探寻它的过程中，超越表面的差异，抓住共鸣和团结的基石所在，这才是哲学的任务。

鹤见的这种思想，同他的战争体验密不可分。鹤见在爪哇岛时读到司政官留下的笔记，在得知司政官的背景后，产生了如下感想：“将他人的意志追究到底，将那种阻碍意志自由发动的条件彻底看清楚是何等难的事情啊！我们错误的判断、惯性的憎恶，对他人来说，不正是来自探寻其特有的种种意志的苗床吗？”[511] 鹤见所说的“同情”正是这种探寻“苗床”的工作，这自不待言。

把具有普遍性的东西与他人相结合的思想也来自战争体验。在与鹤见一起乘坐交换船的留学生中，有位名叫角谷静夫的数学家。乘船途中，鹤见迎来了自己的二十岁生日，他投了一个漂流瓶以示纪念，大家纷纷说“不管它漂向何方，都希望有人能读到它”。那时，角谷没有用日语也没用英语，而是写下自己发现的定理把它放进了瓶子里。如果可以和火星人进行交流，“不管用何种语言都行不通，那就在地面上画一个大大的三角形，把表示毕达哥拉斯定理的记号也添加进去怎么样呢”。[512] 此后，船内发生如前所述的集体思想转向时，鹤见对不被特定的语言体系束缚的角谷感到非常钦佩。

可以说，对鹤见而言，哲学的任务在于探索超越语言体系差异的“毕达哥拉斯定理”。战后，他以“A为A”这一逻辑实证主义为武器，

批判“八纮一宇”、“皇道日本”等“护身符语言”的非合理性。如第十五章所述，江藤淳面临战败后语言体系的急剧变化，对语言产生怀疑，转而投身于音乐，而对鹤见来说则是哲学。

但如前所述，1950年代之后，鹤见开始反省基于西方哲学的启蒙主义，转向研究日本的大众文化，但这也是他按照自己的想法，基于普遍取向的选择。

鹤见的战争体验是其背景之一，他从战争中深刻体会到这样一个事实：“不管是‘有文化与修养的人’还是‘没有文化与修养的人’，不管是读过大学的人还是没有读过大学的人，在屈服于军国主义这一点上，几乎没有差别。”来自大学的学生兵和军队文职人员因食物分配问题而争吵的情景，给他一种“日本的文化人竟然也很大众化”的认识。对鹤见自己来说，“鹤见”这个名字在军队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和在美国一样，作为一个“赤裸裸的人”被投入战争中去。那种体验让他感受到，如果剥去人类表面的教养和身份差别的外壳，人类只不过是“大千世界中共同存在的诸多因子”而已。[513]

总之，鹤见眼里的“大众”，和毕达哥拉斯的三角形一样，只是“大千世界共同存在的诸多因子”的别名。即便对他自身而言，“在经历战争时，成为自己精神动力的既不是斯宾诺莎、康德，也不是黑格尔，而是《我是河滩之中枯竭的芒草》中的思想”。[514] 如此一来，对于追求“大千世界共同存在的诸多因子”的鹤见来说，没有研究康德、黑格尔，而是研究大众文化，就最自然不过了。

另一个背景是鹤见作为归国日侨子女的经历。15岁就离开日本用英语学习哲学的术语，回国之后，鹤见对“八纮一宇”、“皇道日本之世界史上的作用”这种汉字词的罗列心怀抵触，隔阂很深。对那时的他而言，和别人交流的日语仅限于儿时记住的日常用语。对鹤见而言，日常用语是文化人和大众百姓共通的东西，是不被思想和阶级所左右的“大

千世界共同存在的诸多因子”。[515]

同时，日常用语也是一门具有国际普遍性的语言。1940年鹤见旅居美国时，他和姐姐协助后来担任驻日本大使的赖肖尔教授[516]编写过初级日语教科书。[517]当然这本初级日语教科书以日常用语为基础，并不以知识分子所用的专业术语为对象。

有过这种经验的鹤见战败后对编写一本由850个左右基本单词和简单语法构成的《基础英语》的想法表示赞赏。他认为这本书的作用，就是使语言表达单纯明确，避免使用晦涩的单词和表达的逻辑修饰。[518]

同时，他主张日常基础用语，超越民族的多样性，具有人类共通的法则。他在美国学习的是语言心理学。对各类语言都有共通的一般法则这一学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61年，在《语言的本质》一文中，他阐述道，“所有语言中都存在共通语法，不如说这是逻辑学的一部分”，“只有关于特殊语言的语法才被单纯地称作语法”。而且前者“语言的一般法则”是“1+1＝2”、“A是A”的这种“逻辑的法则、数学的法则”。[519]

此外，引人注目的是，鹤见的这种普遍取向不只是他的“大众”取向，同民族主义也不是对立的。他在1946年《哲学的反思》一书中，论述了“大千世界共同存在的诸多因子”的重要性。同时总结出“虽然以往的日本主义存在问题，但也没有必要幡然转向于美国趣味或俄国趣味。理解自己面临难关的特殊状况，存有对他人和外国国民的同情心……到了该确立新国粹主义的时候了”。[520]

人类的普遍取向和“新国粹主义”主张，乍一看二者似相矛盾，但1962年他在《脑髓地狱》一文中说道：

> 国家规定的自己、单位、学校以及家庭规定的自己，如果对其更为深入地探究的话，则有受古来祖先文化熏陶的自己，进而有作为最底层动物

的自己，以及脱离生命、没有名字而存在的自己。深入探究到那种程度，用与现代社会通行方法相异的方式，对自己进行再构造，寻找与世界重新结合的方法。在那里，有一条经由民族主义通往国际主义的道路，在民族之魂深处那些毫不知名的部分。[521]

有些知识分子极力标榜从西方学到的“普世思想”，希望能够对“大众”有启蒙作用。但剥去其思想外壳深入观察的话，知识分子也和“大众”一样使用日常用语，从中可以找到“受古来祖先文化熏陶的自己”。那是超越知识分子和“大众”阶级对立而结合成“民族”的场所。但是进一步剥去其“民族文化”外衣深入探求时，“民族之魂深处那些毫不知名的部分”则浮出水面。这样便开辟了一条“经由民族主义通往国际主义的道路”。鹤见把其底部“毫不知名的部分”称为“与民族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一起诞生的场所”。[522]

在这篇文章中，鹤见主张“名字是由社会赋予的，但那只是一时之策，必须从还未被命名时的自己出发不断重新思考”的“彻底的唯名论”。1969年，鹤见在《大众的世界》一文中，主张“当脱去国家盔甲的大众作为大众而站立之时，他们就也脱去了世界国家的盔甲”。[523] 从作为“赤裸的人”的“大众”的视角，可以看出鹤见的思想，他认为不仅“国家”，甚至“世界国家”都不过是一套“不自由的制服”而已。

事实上，丸山真男和竹内好都有过这种思想。在之后的1978年，丸山在追悼竹内好的讲话《与竹内好先生的交往》中说道：

我本来就比较认生，第一次去哈佛大学时，完全不会用英语进行交流，所以觉得出门是一件麻烦事。我话音刚落，竹内好先生就立即说道：“只要想到不管在哪都住着同一个人就好了。”……内村鉴三认为，“所谓人类就是左邻右舍的熊五郎与熊八郎。”……熊五郎与熊八郎虽是同村的人，但同时也自然地作为人类的一员而存在。提起人类，总感觉是遥远而“抽象”的概念，这种想法非常的奇怪。……自己所在之处即为世界，世界并不位于日本“以外”的地方，这种想法才是真正的世界主义。但世界也好国际性也好，其形象似乎总感觉存在于日本“以外”。这是伪普遍主义，

> 与此相对，存在“内部”集团这种有所属的民族主义，必须打破这种恶性循环。[524]

就好比“熊先生”既是同村人又是人类的一员一样，“日本人”和“人类”并不是对立的概念。丸山从这里开始说明竹内好既是民族主义者也是世界主义者。如第十章所述，竹内的思想是通过挖掘自己的阴暗面，将他人的苦恼联系起来。“自己所在之处即为世界”，丸山这句话可以说很好地把握了竹内的思想。同时，竹内和鹤见都批判丸山主张的“伪普遍主义”，即从“外部”导入“普遍思想”，从而启蒙“内部”的“落后大众”的观念。

之后的1980年，鹤见引用上述丸山的话，说道：“那是与在世界国家这种虚构的框架下思考的世界主义相对的、另一种世界主义的萌芽。”于此，他主张“将无国籍市民性的观念作为依据去批判作为现实存在的日本政府，这种做法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在他看来，“市民是在那片土地上和我有交集的人”，而保守派主张的“市民”和“人类”是种空想而“国家”才是实实在在的观点不如说更具空想性。[525]

顺带提一句，如后所述，鹤见是战败后初期和马克思主义保持距离，也没有采取否定态度来使用“市民”一词的少数知识分子之一。[526]概括说来，鹤见虽然在1950年代把这种“根底”的存在称为“大众”，并在1960年代以后称呼“市民”的时候较多，但到了晚年二者便开始混用，可以说表达的基本上是同质的东西。

于是，这种“大众”作为“日本的大众”的同时，并没有排除少数派。他在1959年的座谈会上论述道：“日本社会，如果挖掘社会底层的东西，可以获得一种国际视野。”他列举了处于日本社会底层的“朝鲜人”、“部落民”、“妓女”等的存在。鹤见高度评价了关注社会底层的诗人谷川雁，认为他“通过与留学国外而具备国际视野的人截然不同的方法，久居日本而积累了一种国际精神”。[527]

正如第五章说明的那样，鹤见和大多数战后知识分子一样，对“明治”大加赞扬。鹤见眼中的“维新人”与其说是建国英雄，不如说是由于经历了幕末至明治时期的社会变动，而“深知自己可以打破被赋予的社会框架。至于为什么可以打破，并不是出于理性，只是一种感觉”。鹤见还把明治国家秩序稳定之后出生的父辈批判为“不思变革、循规蹈矩”的一代。[528]

此外，鹤见认为超越这种“框架”的“根底”所在，是与某种宗教感觉相关的。他在上小学时读过柳宗悦的宗教哲学，对神秘体验颇感兴趣。在1950年介绍实用主义的《美国哲学》一书中，关于美国哲学家詹姆斯，鹤见写道，“起初我曾追读过詹姆斯关于媒介的文章”。其理由是“心并不是被关上的箱子，或许存在一种穿过心门与他人心灵相通的方法”。[529] 换言之，鹤见在这里探寻了超越“门槛”实施“同情”的可能性。

本来英文中所说的媒介（medium），与以人的心灵为媒介的“媒体”的意思相同。鹤见是战后日本大众文化研究和媒体研究的鼻祖。另外被译成“同情”的sympathy和精神感应（telepathy）一样，指的是用语言（logos）无法表达的心情（pathos），激发了超越人类个体间距离的共振（synchronize）的状态。所以英语sympathy意味着“体贴”、“怜爱”，也意味着“同感”以及“交感作用”。考虑到这些，我们可以了解到鹤见所说“同情”的微妙之处。

在欧美，有很长一段时间，哲学都是作为数学和宗教的集合体存在。康德等人从证明神的存在这一问题出发开始研究哲学。鹤见也把毕达哥拉斯的几何学作为“对不随着时代与国籍的变化而变化的物体所持有的一种具有宗教性质的敬畏之情”的事例。[530]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如说鹤见是古典哲学家。

所以鹤见在研究大众文化的同时，也对创价学会、山岸会以及天理

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531] 1970年在《作为方法的无政府主义》一文中，他以与墨西哥土著民中的巫师共同生活的人类学家卡斯塔尼（Carlos Castany）的神秘经历为素材，论述了超越一切国家的无政府主义哲学。

据花田清辉回忆，在鹤见和吉本所处的战死者众多的战乱年代，对宗教产生兴趣并不稀奇。战时，严格限制言论，持有反战意见的人们即使不采取明确的表达，其所思所想也会“不言自明”。鹤见在1956年写道：“经历过漫长的战争，不相信日本正义的人，也会自然而然确信各自思想中存在坚固的一致性，并对彼此予以信赖。”[532] 这种被称作“同情”的战争体验，反映了超越语言、加深对交流关心的一面。

从这种“根本”的地方来看，思想和国籍的差异也只不过是表面泛起的涟漪而已。与此相反，潜入波涛汹涌的大海深处，一个平稳的“同情”的世界展现在眼前。正如第五章所引，鹤见在1946年《哲学的反思》一书中，这样描述民众支持“排除美英风俗”的理由：

> 如果照字面来解释，这些标语排斥外来风俗而推崇日本自古以来的风俗。但不仅如此，还包含了诸多对上流社会生活方式的反感。……反过来说，这些标语的真正意义并非在于对传统风俗的颂扬，而在于民众自我主张的觉醒。创作这样的标语，且不论政府当局者有何意图，这些标语一旦从当权者手中流传到民间便会获得新生。[533]

鹤见接着把“人们的言辞追溯到他们自己并未察觉的各种情形之中，据其本质进行把握”作为哲学中的“同情”机能而加以强调。即使是表面看来不可能进行对话的主战派，究其“根本”的话，也有可能获得同感和连带感。

从这一观点来看，人类的思想不过是对从“根底”上冒出来的某种东西赋予的一种暂时性表现罢了。而且，其表现方式超越了最先使用这些表现方式的知识分子和当权者的意志，被存在于“根底”之中的“大众”重

新解读并赋予“新的生命”。

鹤见曾在1956年论述民众和士兵将战时当权者创作的口号编成小段子或谱上曲子故意进行歪曲。另外，鹤见也多次谈论过漫画作为大众文化的一环。在他看来，讽刺漫画是一种曲解原意从而引人发笑的表现形式。[534] 如第二章和第十章所述，丸山真男对总体战体制的口号、竹内好对“东亚解放”的口号各自进行了重新解读。

这种重新解读也是一种超越主张引入西方思想的启蒙主义以及对此加以反对的国粹主义二者之间的对立的方法。不是在保持固有状态停滞不前或屈服于外部权威中二者择一，而是重新解读以往的表现来获得新的反省领悟。

鹤见在1965年的《日本思想和语言》中论述，基于木下顺二的定义，其“把按现在的要求加入新的东西进行重新叙述的民间故事称为‘民话’”。这种方法超越了引入西方模式的“文明开化方式”，是赖于“惯用语轮回”的改革方式。[535] 众所周知，战后鹤见创立了“简明学术词语学习会”，批判晦涩难解意思不明的哲学用语，并根据日本惯用语对西方哲学的概念进行了“翻译”。

而且，鹤见将这种观点运用于宪法之中。他在1955年的《谈纸牌》中，对以“弄假成真”这一惯用词为题材的纸牌进行论述：

> 战争结束后……颁布了全新的和平宪法。它看似由日本人民自由意志创造，实则是美国强权下不折不扣的谎言。一如其颁布之初，现在也仍是个谎言。然而，我们都希望从该谎言中发现真实并支持该运动。这是建立在弄假成真的前提下的。[536]

如果将美国强加来的宪法，重新解读为一种抵抗美国的手段，那便超越了当权者的意志并赋予了其“全新的生命”。1972年，鹤见作为客座教授远赴墨西哥，完成了《瓜达拉哈拉的圣母》一书。书中写道，征服

者西班牙强加来的圣母像被墨西哥原住民改造成了褐色皮肤的女神像，它超越了征服者的意图，成为墨西哥人自己的信仰对象。

同时，这也成了一种对不断引入“护身符式语言”、重复转向的日本的这种状态的批判思想。鹤见在1975年的一次采访中说：

> 由于使用新语言往往会指示新的实体，不能深入问题，所以民主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会站不住脚。与其创造新的语言，我倒觉得毋宁重塑既有语言。我的观点是尽量使用过去的、既有的语言以达到与各时期的要求近似值般的吻合，避免不必要的实体化。人类文化从大体来看，不就是对生活在那一时代的人们要求的拼凑吗？那虽说只是拼凑，但只要人是有限的，任何生活方式也都只能是拼凑的。[537]

我们可以察觉鹤见的这种思想，部分受到了提倡“内心”自发反省的竹内好的影响。如前所述，因战争经历而深感罪恶的鹤见同竹内交流很深，晚年更是著有竹内的传记。鹤见还将评论集命名为《不定型的思想》、《误解的权力》。当然，后者肯定了人类不自觉地对既有表现重新解读的行为。

这种解读可以看成是一种用“根底”能量复活已经腐烂、死去的表现的方法。1965年，鹤见在《怪谈的世界》中写道：“只有在无意识的记忆中深深扎下根的绝不后退的尝试，才能使我们历久弥新。对于超越个人记忆的传统也同样如此，越是向人类传统追根溯源，我们就越能从根本上焕然一新。”[538] 1970年，在《死亡的象征》一书中，他运用基督教的磔刑论述道：“象征就是在翻脏用旧后旋而粉碎，又从根底中产生另一象征的拥有再生功能的东西。”[539]

鹤见所崇尚的是实用主义哲学。实用主义思想家主张判断思想是不是真理，需要通过是否适用于现实生活来检测。为此鹤见将实用主义解释为，把思想作为绝对真理，对“全盘吸收”的“哲学式思考法”的异议陈述。鹤见在1950年写下的解说实用主义的《美国哲学》一书中，有过这

样一番论述：

> 在哲学性思考法中，思想常被视为一个整体。……如果对，则其思想体系全盘正确，如果错，则其思想体系全盘错误。……因为这种哲学性思考法根深蒂固，日本的许多文化人……不是将其囫囵吞下，便是将其尽数吐出，转而全盘吸收其他哲学体系。于是他们便以这种态度和实用主义相遇了，然而他们并未发现实用主义的真正使命在于对这种哲学性思考法的剖析解释。[540]

如前所述，1967年鹤见在与吉本隆明的对谈中虽提及战前战后的思想转向现象，但他说道，“顽固坚持、绝对化、纯粹化是行不通的”，主张“以灵活的姿态轻松自在地应对”。他还在1975年的访谈中表示，“我相信一定存在心存疑惑的民众”，“有人的地方、有大众的地方就一定会有质疑，这是我的信仰”。[541] 在鹤见看来，实用主义便是与这种“大众”的“灵活性”相关的。

此外，鹤见还认为“实用主义的产生与南北战争之伤有着莫大的关系”。从“奴隶解放”这一正义的思想出发的南北战争却引起了前所未有的灾难。初期的实用主义哲学家从这一经验出发，排斥思想绝对正确的思维方式，探索人类超越差异产生连带感的道路。[542]

同时鹤见认为，实用主义与超越了国家这一“门槛”的无政府主义有着交集。他在《美国哲学》中引用了无政府主义者大杉荣的话：“工团主义是劳动运动过程中实用主义最具体化的实权化产物，是无知的劳动者在日常生活中、与资本家一天天的斗争中自然而然形成的运动。”[543]

鹤见进而借用大杉荣的观点表示：“我崇尚精神，但精神一旦理论化就令人生厌。因为在趋于理论化的过程中，精神大多与社会现实调和，是一种趋附强者的妥协，带有欺骗性。”从这里我们也可了解鹤见的主张：理论只是不完美的人类造出来的表层的细小波纹，过于相信理论将会使我们陷入脱离现实复杂性的“谎言”之中。[544]

稍微进一步分析我们就会发现，鹤见与其母亲的关系以及他的战争体验使得他形成了这种思想。他继承了母亲的纯粹，但这种刻板的正义在现实中无法维持，同时他也痛感这或许是对他人的一种压制。在这种矛盾心理的作用下，鹤见认识到“百分之百”的正义只是一种掩盖现实社会之复杂的“谎言”，具有容易转向的脆弱性。正是这种“无力”的灵活态度，才能产生保持“纯粹”方法的思想。

“新组织论”的发现

把实用主义视为“美帝国主义”哲学的共产主义派言论家，在战败初期对鹤见进行了批判。如第五章所述，虽然鹤见对身陷囹圄、坚贞不屈的共产党干部表示敬意，但从他个人的思想出发和共产党保持了距离。

首先，鹤见厌恶共产党虽然拥有众多思想转向者，却不能予以统括。在1956年思想的科学研究会总会上，鹤见举出大多数左翼知识分子对战争进行过赞美这一事实，表明“从昭和15年开始，我就一直在考虑是否要和他们握手言和，但我生性记仇，无法释怀”。鹤见反倒觉得吉田茂、渡边銕藏等在战后被批判为反动派的人，在战时确实坚持了他们自己的那种“A就是A，原原本本地遵守了约定”，在这一点上值得肯定。[545]

其次，鹤见反对共产党根据思想的异同来划分人类的做法。他还在1950年的《美国哲学》中，批判了战后日本的马克思主义者，批判他们“囫囵吞枣”接受马克思主义，将世界泾渭分明地分为“善”与“恶”。1956年，他又提出：“按流派成立组织的做法，反而变成一种刻意将国外正统之分引入日本思想界的行为。”[546] 鹤见认为，从外部引入伪真理的语言体系而将人进行划分的做法才是最应受批判的。

此外，鹤见抵触共产党的另一原因在于“大众观”的不同。石母田正等人同思想的科学研究会一样，从“民众”志向出发高度评价了生活记录

运动。但石母田正等人只将“大众”、“民众”理解为数量上的多数派。而鹤见认为的“大众”则是“根底”或“身无分文的人”的别称。即便在舆论上是表面的多数派，例如“抨击西方文化”的口号曾获得众多拥护，但那终究不过是海面泛起的涟漪罢了。

因此，1959年鹤见在《我的战争体验》中写道，“统计上的多数”是“非常空洞的东西”。他以“根据自身责任选择的普遍尺度”为标准，“即便国民全体都犯了错误，也有必要批评国民，抑或批评国家”。鹤见进一步说道：“即使是全人类都犯错误，我们也可以把大家从错误中纠正过来。”他认为，“此时无论如何也不能和‘民科’（民主主义科学家协会）同流合污”。[547]

鹤见一直认为除了共产党的非转向干部和极少数自由主义者外，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和政治家都协助了战争。考虑到这一点，无论是“共产主义”还是“民主主义”，基本只是从外部分派而来的语言体系。1956年鹤见说道：

> 和日本同为侵略者的德国、意大利，甚至是从投下原子弹这层意义上来讲有着很大战争责任的美国，各国人们都通过亡命之外的各种手段，为开脱责任而留有余地。而对于日本，在一国范围内，就理想主义伦理的立场而言这是一场赶尽杀绝的战争。在这里，无一块净土，只要我们幸存下来，那我们就既是受害者又是加害者。……
>
> 在这种全民参与的情况下，我们要思考个人的责任、集体的责任，但没有可从国外引进的范本，方法只能靠我们自己思考。[548]

若只能挥别“国外引入的范本”，那又该当如何呢？鹤见的回答是重新解读既有惯用词。具体而言，就是重新解读具有战时思想的这一“惯用词”所派生出积极的意义，从“错误的东西”中“派生出正能量”。[549]

鹤见在1959年列举了妹尾隆彦的回忆录《克钦族的族长》一书。这本回忆录讲的是缅甸战场上脱队的士兵妹尾，成为山区土著民克钦族的

族长，跟避难的英国人共同开辟了一片小天地，一度想过要摆脱国籍束缚的故事。随后，妹尾回忆自己的经历是“没有肩章头衔地位之分，推心置腹的人与人”的交流。

鹤见大力称赞这本回忆录，将妹尾构筑的小天地称为“国际共同体”，而且认为“如若切实贯彻大东亚共荣圈的理念，最终就能实现国籍限制的突破”。[550] 在鹤见看来，这是没有依靠“从国外引进的范本”而是从自身现有的“恶”的惯用词中派生出“善”的最好例子。当然，这里我们可以感觉到竹内好的影响，但也反映了鹤见在爪哇岛与多种民族接触的经历。

而且鹤见很讨厌战后派转为亲美的保守政治家。鹤见于1956年时说过“被拥有权力的其他国家指责战争是‘不对’的，而‘自己虽也承认是这样’却又发誓要卷土重来的精神，对于日本的思想来说，才是最有害的”。“如果执意不肯承认这场战争是错误的，那么就继续做这个白日梦比较好。至少在我理解这个之前，我是不会让步的。”[551]

如前所述，鹤见的父亲祐辅在战后解除革职，恢复官职。鹤见于1960年说过，因为在战败后不久“有机会看到与革职有关的文件”，所以记得保守政治家们“在战后的当时，是多么的心神不宁”。而且，“他们一直坚守着他们在这一时期（1931—1945年）的政治思想，不但没有因此而批判占领军的政治思想，反而一股脑地接受了占领军的全部政治思想，躲避在其正当性的荫庇下，试图使自己战时的思想正当化”。[552]

鹤见在1956年说过，“跟这种保守政治家相比，我更欣赏刚直坚定的落魄者”。[553] 鹤见对“刚直坚定的落魄者”的论述是指那些从战争经历中，“肩负起了自己的责任，选择了普遍的标准”，对战争时期和战后的日本进行批判的人。具体而言就是在第三章介绍过的原少年水兵渡边清、写下《大和战舰的最后时日》的前海军青年士官吉田满，以及《大和战舰的最后时日》中所描述的臼渊大尉等人。特别是吉田和臼渊，鹤

见在1960年代到1970年代多次提到他们的事例。[554]

鹤见在1951年创作的《批判老一代》中写道："战后一代的问题以接受承认战败事实为中心。"不是接受外部思想进行转向，而是接受战败的痛苦，通过正视这些，抓住机会让他们回心转意。创造出让他们"肩负起自身的责任，选择普遍的标准"是很有必要的。如果没有这些的话，"放弃战争的思想、人类平等的思想，这些美好的梦想都会被遗忘"。[555]

鹤见把战死者的存在看作"刚直坚定的落魄者"最典型的表现。在《旧金山和约》签订之前、岸信介和鹤见祐辅等人解除革职的1951年7月，鹤见发表了短文《解除革职的心理》。这篇文章里，鹤见说道，"日本人应该将战胜、战败，军国主义、民主主义，所有的一切都转化为祭典"，主张"所谓战后的庆典，结束了"。

> 日本这六年间宛如炼狱般的日子最终以悔恨改过而终结，再次被清洗而变得纯净，作为世界的一员被接受。这次机会使全体国民都从战争的责任中解脱出来。然而，那些在太平洋战争中战死、因战病死以及因战争灾祸无辜死去的许许多多的人，都无法得到解除革职的恩典。这些人永远地被抹杀掉了。跟死者有关的人们，今后，也无法尝到解除革职的喜悦了。[556]

属于战死者最多的一代，从战时就对"苟且偷生"深感愧疚的鹤见于1965年说道："战争中生存下来的人，对自己能够存活下来的这种偶然性深感不安、愧疚。此后，当和死者一起存活的感情在自己心中得以保存时，才第一次真正感到了活着的真实感。"而吉田满的《大和战舰的最后时日》和"阵亡学生纪念会"的和平活动等，都是存活下来的人们"努力恢复与死者连带感的表现"，所以才说"日本式的和平运动是有渊源的"。[557]

然而对鹤见来说，战死者是不可能转向的"刚直坚定的落魄者"的同

时，也是“根底”的存在。1963年，鹤见在评价记录战争经历的内部杂志时，一并说道：“欧洲的神的理念，在无神论的日本人这里，以战争经历的形式表现出来。”[558]

对鹤见来说，战死者并不仅仅是日本的死者。他在1957年评论怪谈题材电影《日本电影的眼泪和欢笑》时说道：

> 经历了长达十五年战争的我们日本……充斥了各种各样的亡灵。失去孩子的父母、失去丈夫的妻子、失去父母的孩子，死去人们的感情紧扣活着的人们的心弦，这股无意识的暗流成为今天历史的力量。在朝鲜、中国被无辜杀害的当地人的感情也转移到了我们身上来。……他们举起用过去的记忆、未燃烧殆尽的感情捆扎成的巨大火把照亮我们未来的道路。开辟和他们的亲密联系道路，是我们每天必做之事。[559]

对于曾在爪哇默认俘虏死亡而懊悔的鹤见来说，战死者应该不限于日本人。应该存在一种拒绝按照国籍和思想分类、拒绝将“日本死者”和“亚洲死者”割裂开来的“根底”。在这一点上，鹤见与虽也重视战死者但主张日本就有“三百万死者”的江藤淳是不一样的。

鹤见提出，不应将“太平洋战争”和“1931—1945年”的战争统称为“十五年战争”，即便是把中国死者纳入视野，从1930年代开始思想转向的历史来看。这个概念对鹤见来说是必要的。之所以会这样，恐怕是因为1942年鹤见回国时看到的“将百年战争进行到底”的标语时得到暗示，认为这是“改用古语”的实例。

鹤见在1956年说道：“从1931年到1945年的经验讨论出来的结果就是，这不是从国外借来的东西，而是扎根日本本土的新组织理论。战败之初成立的属于进步阵营的组织，因为没有立足于战争时期经验的基础之上，所以失败了。”战争后期，有反战意识的同志们，即便是不依靠语言，也能够感知对方，因为“不同立场的人之间信赖和合作在长期战争的后半段里，已经奠定了充分的基础”。[560]

鹤见从1950年代就断断续续开始提出“新组织论”。这一思想，就这样与其后的越平联发生了关联。那么，这个组织论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当然，在鹤见看来，所谓的组织是由思想和立场不同的同志通过“根底”上的“同情”联系在一起形成的。他在1954年写过一篇题为《百科全书中的人物关系》的文章，讲述了参与编纂18世纪法国百科全书的多种风格的执笔者共同协作的情景。[561] 其中，虽然才华出众的编者狄德罗成为工作的组织者，却没有形成固定的组织，各行各业的专家们充分运用自己的专长，发光发热，建立起一种自由合作的关系。

之后，从1954年开始，鹤见将战时的构想付诸行动，开始了转向思想的共同研究。对从1931年到战争结束这段时间知识分子和政治家思想转向的事例进行了逐一查证。而且这个共同研究，跟前面提到的百科全书派的例子一样，综合了不同思想倾向、不同专业领域的人的讨论和共同研究，成书共三卷，以合著的方式出版。

除去像《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讲座》那种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上的共通性为基础的事例，这样大规模的共同研究事业，在日本是很少见的。以重问战争经历为共同目标和共同工作，代替思想的共通性，促成了“新组织论”的形成。

顺便提一句，就在鹤见提倡思想转向共同研究的1954年，他的父亲祐辅出任鸠山内阁的厚生大臣。鹤见晚年回忆道：“《转向》第三卷，其实是对我父亲的感想。共产党的转向并不是我主要的研究对象。”《思想的科学》的发行，当初也受到了父亲的资助，但从这一时期开始鹤见跟父亲断绝了关系，花费了大量自己作为东京工业大学副教授的私房钱，他说自己只能“赌上自尊，不断努力”。[562] 在这种情况下，他独自展开了组织论的共同研究。

当然，鹤见虽然论述了思想转向和战争责任，却讨厌依靠外部“正

义”的方法。他在原战犯岸信介出任首相的1959年，在《战争责任的问题》中一边回忆自己在战犯法庭作证的经历，一边写道：“依靠战胜国的审判，揭发特定某人的做法，到底有什么效果呢？毋宁说，在无论政治还是言论均已恢复到九一八事变爆发时的水平的如今，再去关注某些特定人物的经历，通过这些经历将其战争责任问题上升到一定高度并切实加以追究，不是更加公平吗？”[563]

鹤见认为，战胜国大肆宣扬正义的同时，并没有将人分为“加害者”和“受害者”。他希望调查每个人的背景和经历，通过让人们清楚地认识到他们违反了培育自己的“责任范围内所选择的普遍尺度”的情况，迫使他们回心。可以说，转向研究是对抗抽象的“正义”，一边“同情”每一个人，一边摸索回心和连带的原理。

而且，与鹤见的组织原理相同的例子是各地经历过战争的人带着各自的生活记录开展创立会刊社团运动。他曾任编辑的《思想的科学》成立的读者会遍布全日本，形成了没有固定体系的柔性结构网络。顺便说一下，向鹤见提议创立全国性读者会的人，正是丸山真男。[564]

鹤见在1959年举出作为生活记录运动的成功之例而广为人知的“山神学校”。关于教师无着成恭和学生们的关系，鹤见写道：

> 无着成恭的方法就是，在自己出错的时候，一边唠叨，一边给学生们道歉“啊，是老师搞错了”。这在战前是不可能发生的，是原创的方法。……人们原本就是平等的。但必须发展教育，必须发展政治，为了暂定的目的，有必要建立临时不平等的结构。但这种临时的不平等，在作为当前目标的某一工作完成的同时，必须立即予以打破、予以撤销。……可以说，这些年社团运动的哲学就是从这里开始的。[565]

这种看似“松散”的形式，实际上就是越平联的原型。鹤见在1974年越平联解散之际谈到该组织没有固定领导架构时表示：“青鳉鱼的学校[566] 在河流中，想必是分不清谁是学生谁是老师的。我喜欢这样。”[567]

从这里可以看出，所谓“领导”、“一般成员”这些要素，从人类本质上来说不过是表象的一些差异，不过是暂时的角色而已。

这种组织原理，在共产党权威低落的1950年代后半期，各地的社团运动中自然出现了。鹤见于1966年高度评价了“以不为党纪所拘束、不定型的组织作为社团运动的原理”。他说：“用原始共同体的再次发掘这个名字不错，叫直接民主主义也不错，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生命主义、实存主义等名字也都不错。”[568]

如第十二章所述，持这种思想的鹤见，在1960年安保斗争时提出了“无党派市民”概念。为自己在战争中“毫无作为”十分懊悔的鹤见，在这次斗争中抱着“死不足惜”的心情，参加“无声之声会”进行游行示威，并辞去了东京工业大学的职务，抗议岸信介政权。

鹤见在安保斗争的漩涡中所写的文章《根本上的民主主义》中阐述了“无党派市民”概念。文中提倡“无论属于什么公共组织的人，如果追根溯源，任何时候都是无党无派的”，主张回归到超越党派与思想分类的“根本”。[569]

在1960年的安保斗争中，使用“市民”一词发表主张的人并不罕见，但鹤见所说的“无党派市民”的特征与丸山真男和福田欢一等人提倡的国民主义的“市民”不同，是拒绝“国家”的“市民”。关于“根本上的民主主义”，鹤见说道：

> 那个存在于我心中的小我甚至是在潜意识中有对未来社会的蓝图，我作为一个整体，即便是一个有着弊病的整体，分解开来的话，到最后都会有大家通行的普遍价值观。这样的信赖让我勇敢面对既有的社会，既有的历史。对国家不低头，这不是因为我背负着国家以上更大的国家联合抑或是国际社会的权力，而是由于在我的内心深处有着对能够批判国家与世界国家这一原理的信赖。像这种思维方式作为思想史的源流是从哪里起源的呢，虽仍存在争议，但是认为源于毕达哥拉斯、犹太人的预言书、释迦、老子、庄子不都是可以的吗？我认为普遍宗教的建立都包含着这样的契

机。

持这种思想的鹤见从他战败后积累起来的思想中阐明了独特的战后日本观。战败后的保守政治家和知识分子都在反复转向，“从自己的思想定律中脱离出来”，因此没有受到战败的苦痛，“日本并没有从真正意义上过渡到战后”。“此后，我们在这块不确定的地盘上建起新的房屋定居下来。”比起“遵守苏联共产党的指令”反对战争的共产党员，以日本的大众宗教为基础抗议战争的牧口常三郎和石原莞尔等人，主张“培养站在个人本性立场上批判日本现实国家机构的思想”。

当然，这里所说的“个人本性”不是单纯重视私生活和个人主义。[570] 他在该文中强调“不是热衷于国家保证私生活享受的思维方式，而是自己重新审视国家的领会方式”。而且从“具有国民规模的无党派”“国民规模的国家批判”的表现中可以看出“无党派的市民”与“我”和“国民”的连带是不矛盾的。

鹤见认为，“日本想要在世界上开辟一条属于日本自己的道路。为此，首先，日本的公共政策必须从日本人思想的个人本性开始重新培养”。这是“根本上的民主主义”的表现。当然这并不是提倡个人主义和公共政策的联结，为了使充满污垢、已经死去的“战后民主主义”再激活，这无非是汲取了“根底”的能量。

在这篇文章中，鹤见提倡宪法的再激活。对他来说，将宪法作为绝对真理来“遵守”是毫无价值的。“以遵守宪法的运动方式是遵守不了宪法的。”如果“遵守”，就回归到宪法的“根本”，“必须回归该宪法的制宪精神”。但是“这部宪法如果不是靠自己的力量去制定那该怎么办呢？”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反复阅读宪法使之再激活，也就是“我们只好从现在开始制定宪法”。

作为对宪法的解读，鹤见在文中提倡如下宪法观：

> 日本的宪法……打破了军事力量和国家主权一般不可分割这一常识。禁止拥有军事力量，就意味着作为国家以下的准国家，自己向世界伸出手来，对成为没有强制力的国家有很强的意志。为了实现这部宪法中所说的国家，通过努力，我们能够发起受《日本国宪法》保证的国民规模的国家批判运动。

宪法是国家的基本法。但正是这种国民的存在，潜藏着"国家批判"的契机。于是，才有这种"暂且实现国家的努力"发展成为"国民规模的国家批判运动"。

而且鹤见发现，在参加"无声之声会"的人之间，"自由聚集起来的市民能够自己建立新的秩序，这就是人民政府的雏形"。[571] 在这里，他由战争体验在脑海中描绘出了"新组织论"的形态。而且如后所述，该组织原理是1960年代越平联建立后形成的。[572]

虽然有些重复，但对鹤见来说，战死者拒绝根据国家被分类，否认进行"日本死者"和"亚洲死者"的分类，也否认"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的二元对立。鹤见所批判的国家，对于这些超越国境的死者来说，正是带来分割的存在。

事实上存在对于这些战死者持相同观点的人，那就是和鹤见一起高举越平联大旗的小田实。

"难死"的思想

小田实1932年出生于大阪，凭借环球游记《什么都去看一看》和在越平联中的活动而家喻户晓。由于身材高大，语速很快，一口大阪腔，很多时候被描绘成一个活泼豪放的人。

但小田自己写道："我经常被误解，我不是一个不知怀疑、开朗爽快的豪放的人。"[573] 1951年，19岁的小田出版了小说《后天的手

记》，之后在1956年24岁时出版了巨著《我人生的时光》，这本书由每页400字的稿纸写成，一共用了1200张，小田是个非常早熟的作家。

小田在东京大学主修古希腊哲学，是中村真一郎门下的文学青年。同是作家的友人真继伸彦形容他是一个“又高又瘦”、“黑暗锐利的眼睛炯炯发亮、言谈激扬澎湃”的文学青年，“过去受过致命的伤害，变成不能行动的人，是个怀疑主义者”。[574]

小田受过的“致命的伤害”就是1945年8月14日的大阪空袭。当时还在读初中一年级的小田，在简陋的防空壕里度过这段恐怖的时间后，捡到了美国军机撒下的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的传单。他这样回忆第二天正午听到广播里宣告日本无条件投降时的心情：

> 我已极度疲倦，处于虚脱状态。从火海中死里逃生，走路都摇摇晃晃，完全没有思考的力气。而且我看到了太多的事情，而这，或许就是全部。
>
> 譬如，我看到炸弹落下。……看到漩涡般的火焰。……
>
> 看到烧焦了的尸体，看到麻木地整理那些尸体的自己的手，看到在尸体旁边平静地吃着东西的我们，看到那高贵的精神一瞬间就变为丑恶，看到为了一片面包父子俩拼死发疯地你争我夺、母亲扔下孩子独自逃命的场景，看到人的内脏丑陋而又可憎的样子，以及，看到的只不过是那群人之一的我。[575]

小田认为，那里“没有一丝闪光的东西，全都是卑微弱小而又寒碜的。例如，这不是死亡、悲伤，也不是悲剧。街道上到处都是烧焦的尸体——这不如说是滑稽的存在。实际上，我在尸体面前笑了出来”。[576]

空袭的极端情况暴露出人性的丑陋。小田所见到的死亡当然不是浪漫的，也不是勇敢的，它超越了“悲伤”与“痛苦”这些抽象形容所能表达的全部情感，是所有语言都无法表达的。而且在那里区分“加害者”与“受害者”也是毫无意义的。如果说扔下孩子独自逃跑的母亲是“加

害者”的话，那么在孩子尸体面前吃东西的自己又是什么呢？

而小田的体验与那些曾在战场上战斗的士兵的体验不同。小田在战后与复员军人交谈时感觉他们“对战争还抱有幻想”。不管战争多么悲惨，他们都会扛起武器去战斗。但在大阪空袭中死去的人们不仅与英勇的战斗无缘，甚至连自杀都不行，“只能被动地等待死亡”。[577]

与此同时，不管是在政治上还是在思想上，这种死亡都毫无意义。小田在战后才知道，8月9日苏联参战与在长崎投下原子弹后的第二天，即8月10日，日本政府已经正式接受了《波茨坦宣言》。8月11日的《纽约时报》刊发了题为《日本宣告投降》的报道，刊登了欢呼胜利的人们在纽约的街道上摩肩接踵的照片，并推测“美国作为更换天皇的必要主角还会使之继续存在”。[578]

尽管这样，8月14日大阪遭受空袭就是因为日本政府明确表示要求加入“护持国体”这一条件，并且犹豫要不要正式表明接受《波茨坦宣言》。8月15日的《纽约时报》在报道14日大阪与德山空袭的同时，说日本如果继续犹豫不接受投降，那么还会继续遭受空袭。[579]

也就是说8月14日的空袭完全是毫无意义的杀戮。那只不过是尽可能为投降条件与保全脸面而迟疑不决的日本政府和对此施加压力的美国政府之间的战略周旋。他们的死不管是被右派封为“为解放亚洲而殉职的英雄”，还是被左派评为“成为和平垫脚石的悲剧”，都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小田在以后的岁月里说道：“那些死去的人们究竟是为何而死的？我用这样的童稚之心去思考，开始了我的‘战后’生活。”[580]

同时，“战后”也以其他形式开始了。战败时13岁的“少国民一代”小田，与当时大多数少年一样被灌输了“皇国主义”思想。然而小田见证了“一夜之间，就把所有的标语口号全部更新了。就连那个骂我‘缺乏斗志，你认为日本输给鬼畜美英也没关系吗’的老师在经历了短暂的沉默

后，也转而开始赞美美国”。[581]

同一代的大江健三郎和江藤淳也像小田这样，为“公”的崩溃十分痛苦。这一象征是被称为“特攻队崩塌”的年轻的复员军人，小田在1965年写道：

> 确实，那时不管到哪里都能看到“特攻队崩塌”。戴着撕掉锚印和星印后残缺的军帽，系着鲜艳的围巾，穿着短靴的青年肆无忌惮地走在街上，但他们的精神是颓废的。
>
> 他们在刚过去的那些日子里为了“公”这个崇高理想可以舍弃自己的生命。但实际上他们的战友已经成了火人消逝在太平洋中，现在，那个崇高理想已变得没有任何意义了。……
>
> 每次看到他们的身影，脑子里就会浮现过去在报纸上看到的，他们出征前悲壮又英勇的身影。这两种姿态总是若即若离，怎么也不能连为一个整体。
>
> 我之所以以童稚之心拼命求索，就是要让没有联系的两者连为一体。我确实这么拼命做过，因为我和他们有着共同的精神水土，并在这片水土上生存下来。[582]

小田在大学里攻读古希腊哲学，就是为了弄清楚什么是“公”。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失败致使雅典没落的那段时间，是希腊哲学的鼎盛时期，是之前公认的价值观崩塌，“公”被重新审视的时期。对小田来说，“那个时代与战后的日本过于相似”。换言之，就是“雅典大帝国从繁荣时期……因为战败立即衰落成一个小国。由统帅吕山德率领的斯巴达军占领了雅典……占领军实施政治制度改革，建立御用政权。战败后人们从海外各处回国，军队被解散，思想陷入混乱。对民族主义的疑问，第一次产生一种跨越城邦而扩展向外的世界主义思想。对既有价值体系的怀疑，老一辈人感叹年轻人的堕落”等，这些都是小田在古希腊中发现的。[583]

从这种心情出发，三岛由纪夫倾向于把和平视为虚像，牺牲视为现实。江藤淳也阐述了“公”和国家的重建。然而，小田并没有朝这方面发展。

其原因是小田对“战死”不抱任何希望。他认为，在大阪空袭中遇难的死者，既算不上英雄，也算不上为“公”捐躯。小田在书中这样描述他向不了解战争的年轻人和外国人描述战争体验时，所感受到的交流代沟：

> 那时，我到底想说什么呢。我肯定是想说我看到过。或许会有“看到什么”这样理所当然的反问。接着我这样回答道：“什么都看到了。”……
>
> 我说了战争期间的事。然而他们对战争不了解也是事实。其中有一个人说“啊，有这样子的事吗？”
>
> 我把我扑灭燃烧弹的事说了出来。有人说“很厉害呢”。我说我从火焰包围中逃了出来。有人说“真是够呛啊”。我把在一片废墟上收拾烧焦的尸体时做的事说了出来。有人说“很臭吧”。
>
> 对于这些附和，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才好。是该说“很厉害哦”，还是说“确实够呛”、“真的很臭”呢。实际上确实如此，只能用这样的语言来回答。[584]

这样，为了描绘出自己在战争中经历的“一切”，小田认为必须找到一个新的“词语”，于是他成了一名作家。

对这样的小田来说，小说必须表现出“一切”。如若没有描绘出人类的愚劣、政治的无情，那就不可能表现出大阪空袭中死去的人们。

小田称这样的小说为“全体小说”。只是他向往的并不是“诸如巴尔扎克流那样的，把自己处于神坛，环顾全世界的这种类型的小说”，而是“在众多人的复合视野的基础上形成的小说”。[585] 这种小说，并不是从实施空袭的飞行员的视角，而是从张皇失措中死去的人们的视角来表

现这“一切”。而且没有特定的中心，从“众多人的复合视野”来构成全体的思想，日后成为与越平联相关的东西。

1951年，19岁的小田出版了《后天的手记》一书，通过描绘朝鲜战争前夜高中生的各种表现，刻画了“不如说是以奇异的情感来迎接和平到来的‘不可思议’的一代”，并阐述了“称作20世纪的‘不可思议’的世纪考察”。[586] 1956年的《我的人生》一书，描绘了在1952年“血色五一”事件前后，包括朝鲜人在内的学生活动家的情形。

然而，要创作“全体小说”并不容易。小田的友人真继伸彦，虽然欣赏小田的早熟，但他认为“所谓的全体小说，一个一二十岁的年轻人能写出来吗？”“这是大人的工作。”从真继的评价来看，《我的人生》一书文风十分混乱，出场人物也只不过是“作者操纵的玩偶”。[587]

或许小田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继《我的人生》之后，直至1960年代他再没有动笔写过小说。1958年，26岁的小田通过富布莱特留学生项目去了美国。考虑到1950年代美国因学生运动而受到强烈批判，这对小田来说是一次转机。1961年，小田出版了《什么都去看一看》一书。书中关于去美国的动机，他写道：“我想去美国看看，总之，仅此而已。”[588]

《什么都去看一看》这本书描写了以纽约为中心的留学生活以及回国途中经过中南美、欧洲、中东、印度等国时“一天一美元”的贫苦的旅游体验。与小田此前的主人公的反复沉闷压抑的议论相对照，这本书通篇写得妙趣横生。

当时出国旅行并未实现自由化，而且日元并不坚挺。二十多岁的年轻人通过穷游，实现周游世界的梦想，在当时是非常令人吃惊的事。身材高大的小田，同美国的年轻女性亲密交往的样子被描述后，也令年轻人充满了憧憬。与文章轻松的表达相辅相成，小田的这本书成了畅销

书，其本人也被推崇为勇敢的战后青年杰出代表。

然而对小田来说，1950年代末的美国，大体上还不够理想。当时的美国社会贫富差距不大，甚至与其他国家相比显得异常的均质化。小田结交了“大学中的优等生、格林尼治村的吟游诗人、画家、高中老师、福特工厂的员工、卡车司机”等各种朋友，对于他们“政治意识的不足，不，是全无政治意识，小田感到惊愕和厌烦”。[589]

在和平、富裕的社会环境下长大，不知战争为何物的美国年轻人，无法想象和理解他人的痛苦。小田说到在战争中因食品和燃料不足，要从松树的根部取油作为军用燃料，受军部的命令去挖掘松根的事后，有个年轻人“不动声色地称赞说那是个很好的主意呢”。有一个听了小田空袭经历的年轻女性“把我的经验谈只当作个惊险的故事”来倾听，对小田张皇失措的样子“毫不担心地哈哈大笑了起来”。[590]

小田发现缺乏对他人想象力的他们，也不建立与他人的联系，就这样荒凉孤独地生活着。与小田交往的美国年轻女性邀请小田去吟游诗人读诗的咖啡馆。比起被朗读的诗，给小田留下更深印象的是那个年轻女性的自言自语：“再没有比一边喝着咖啡，一边跟大家一起倾听诗歌更能让我内心宁静和从孤独中解放出来的时候了。”小田这样形容汇集在这个咖啡馆中的人：“在这群同类人中，与其称之为发现朋友，不如说是发现自身，然后从孤独感中解放出来”；“懦弱的逃亡者的群体”。[591]

小田遇到的那些吟游诗人，同样批判美国社会的“统一主义”。然而，小田认为这些蓄着胡须、穿着大衣的诗人，同样“过于统一”。一边试着逃离富裕的社会，一边又忍耐不了孤独，也没有社会性的视角，结果看着这些诗人只能成为“聚集在一起的同类人”，小田感觉他们就像“在大人面前哭泣的良家少爷”。[592]

小田认为当时的美国文学也有同样的倾向。从美国小说家塞林格

（Jerome David Salinger）和厄普代克（John Updike）描绘的人物中可以看出，他们并没有怀疑既定的社会秩序，只是被动地沉浸在“无所依托、悬而未决的绝望气氛中”，“像小孩一样茫然地站着”。在立志创作“全体小说”的小田看来，只要不去探索给自身带来孤独感的社会结构，绝望的本质就不会明朗。小田认为，没能感受到那种努力的塞林格和厄普代克，并没感到真正的绝望，而是坚信美国社会的富裕会永远持续下去，他们的书也只是描写了气氛上的“绝望心情”。[593]

但与此同时，小田因预测“把吟游逼到那一步的东西”最终可能会覆盖整个日本而感到战栗。在小田看来，美国的文学和艺术就是“拼命追寻某种东西，然而没有出口”的状况，虽然完成度很高，却是被动的缺乏活力的“大型盆栽”。对小田来说，虽然厌恶这些却又不得不去读，“虽然想大声地喊够了，请适可而止！却又不能背过脸去不予理睬”。[594] 当然，因“没有出口”而“被动地”被杀的，正是大阪空袭中的那些死者。

而另一方面，小田觉得美国的知识分子和学生，即使偶尔表现出对政治的关心，也会怀有强烈的不适感。对他们来说，所谓“政治”就是国际政治中“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争夺阵地的大会战，他们就好比是观看游戏的人。他们把事关当地人饥饿与生死问题的内战看作事关“自由”有无的问题。关于《日美安保条约》，虽然小田论及了日本是否会被卷入战争这一问题，美国人却表达了国际政治中共产主义威胁论和“现实主义”。然而对小田来说，正是他们不顾“现实”，才让人感觉他们在“肆意冷漠地进行抽象化”。[595]

而且，向小田阐述“现实主义”的美国知识分子和学生，是以自己国家拥有世界最强的武装为前提来谈论“和平”的。与此同时，他们都主张“必须彻底贯彻国际主义，民族主义是战争的根源”，并批判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然而小田认为，他们的“真正之处在于对国家这一存在并

不持根本性怀疑”。那群游吟诗人虽然反抗美国的“同一主义”，但最终还是认为富裕的社会会永远持续下去。同样，批判民族主义的年轻人也坚信美国社会的安定。[596]

对小田而言，大阪空袭中的死者，“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自不必说，任何抽象性的语言都不能赋予其意义。这给他一种很强的不安感，担心由语言和意义构成的世界会轻易崩塌。他对游吟诗人和塞林格抱有不满，也认为批判民族主义的学生有些格格不入。因为归根结底他们还是相信世界的安定。对小田来说，塞林格等人描绘出的仅在气氛上的“绝望心情”，与不过是美国知识分子“肆意冷漠抽象化”的政治游戏，都反映出对于世界“并不持根本性的怀疑”。

真继伸彦形容小田“过去受过致命的伤害，变成不能行动的人，是个怀疑主义者”，指的就是这种状态。无论是小田语速很快的大阪方言，还是《什么都去看一看》里体现的强迫性的行动主义，都可以说是受到这种不安的驱使。《什么都去看一看》这个题目，表明了象征大阪空袭中遇难的死者的“一切”以及拒绝“缺乏同情心、洋洋自得的抽象化”而坦然直视的意志。

可以感觉到和这种美国社会形成对照的是留学归途中经过的中东和印度。如第七章所述，小田在叙利亚和印度，对当地的民族主义产生了共鸣。在小田留学的哈佛大学学习政治学的印度留学生回国后便踏入政界，说要为了祖国的未来而运用自己所学的知识。听了这名印度留学生的话，小田想到了“明治初期的日本留学生”。[597]

然而，小田来自已经站在经济高速增长入口的日本，发现自己还是无法认同那样的亚洲。在加尔各答的街上住过一夜的小田，惊愕于贫民的境况，无论如何也不能忍受这样的状况。对如前所述的印度留学生说“很羡慕”的同时，“他们想出人头地的欲望和赤诚的爱国心单纯地交织在一起”的情景，让他觉得“羞愧”和“难以信服”。[598]

在这种情况下，小田发现日本既不属于欧洲也不属于亚洲，感觉“出了国才‘成了日本人’”。在一直向往的希腊雅典看到日本货船上悬挂着的太阳旗时，小田不禁“热泪盈眶”。[599]

但是，与在美国反感“缺乏同情心、洋洋自得的抽象化”一样，小田也没法回到被抽象化了的“日本”。回国之时，对于寿司和天妇罗的味道“无论如何也无法平静”，而让他“真实感受到家乡味道”的却是汉堡和拉面。小田感觉自己已经把“杂种文化都当成家乡了”。[600]

的确，对大阪空袭中死者的记忆，不容许小田回归到做一个安逸的“日本人”。在《什么都去看一看》一书的结尾写道，小田在巴黎凯旋门附近游荡的时候，看到复员军人齐唱法国国歌，集体默哀。小田意识到凯旋门是纪念战死者的，不顾身边同行美国女性诧异的表情，开始放声痛哭。

这一瞬间，江藤淳在普林斯顿肯尼迪的葬礼上也出现过。但小田眼中的战死者并不是江藤那种可以抽象化的“三百万死者”。凯旋门前的小田，和江藤相比有着完全不同的感受。关于那时的体验，小田写道：

> 我所哭泣的是，那个时候，我想起的是那些没有得到报偿而走向死亡的同胞们。无论法国还是美国都有战死者，我只想说一点，他们的死，无论如何，都有着打倒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的目的。然而，我们的同胞之死到底有什么意义呢？他们简直就是白白牺牲。把他们逼向死亡的罪魁祸首（岸信介），是我们“民主政府”的首相，满嘴说的都是“民主主义”（难道他们不是在与民主主义的斗争中牺牲的吗）。
>
> 这所有的一切，那时，在凯旋门前都浮现在我的心间。他们到底为何而死呢？我反复思考。这不只是我们同胞的事情，是德国士兵的事情，也是意大利士兵的事情。不对，还与如今正被逐出阿尔及利亚、直面死亡的法国士兵紧密相连。
>
> 虽说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欧洲，我都会为这样的事情流泪，然而在巨大的无名战士墓面前，抑或在靖国神社的大牌坊前，观看自卫队大张旗鼓

锣鼓喧天的行进，却不能撼动我半分。美国人都有一颗爱国的心，无论我们是否拥有爱国心，也不会在意这些前去进行视察旅行的国会议员的结论吧。……恐怕我彻底明白了这只是不得不面对死者做的，仅仅是为了让他们安息的一个方法。再者，像这样的死者不再出现，除此之外再也没有了。至少，如果有与我的眼泪有关的话，就只在这里了。之后，通过两年的旅程，如果我体内存在一定程度的民族主义，或者是“爱国心”开始萌芽了，这大概就是与之联系并衍生出来的东西吧。[601]

对小田来说，战死者是指在“日本的死者”之前，在大阪空袭中毫无意义死去的人。靖国神社，是日本政府为那些根据《恩给法》等被判定为“因战争殉职”并能领取抚恤金的战死士兵所建立的祭奠的地方。它并不包含大阪空袭中的死者。对小田来说，靖国神社只能祭祀日本政府认定的死者，排除了那些白白丧生的死者。[602] 既然如此，大阪空袭中的死者并不是被靖国神社英雄化的死者，而是与德国、意大利以及法国的死者一样，死得轻如鸿毛。

也就是说，在小田看来，死者因为这种无意义之死，成了跨越国境的存在。像这样，小田把从国家赋予意义中被排除的“同胞”的同感表现为“民族主义”。不用说，对于这些死者，鹤见俊辅深有同感。

归国后的小田，一边在补习学校担任英语老师，一边在所有场合进行批判“缺乏同情心、洋洋自得的抽象化”的评论活动。回国后的他，以被抽象化了的“西方”和“亚洲”为标准，抗议批判日本的论调，并大力强调现实中的西方各国并不仅仅是由“自立的个人”构成的，以及亚洲的新兴国家由于绝对的贫困而燃起了国家建设的希望之类的事情。

而当时的小田，关于太平洋战争就有“理论上是侵略战争，结果却带有解放战争的性质”之类的论述。[603] 战争的意义被单方面抽象化，即便从他的战争体验来看，也被认为是不能理解的。

这一时期小田提倡的是重建符合新时代的日本民族主义。他形容与

亚洲、非洲各国的留学生一样的明治一代为“第一代”，在对西方的憧憬与反抗中被撕裂的战前一代为“第二代”，战后主张进入“为西欧的苦恼本身而苦恼”阶段的战后一代为“第三代”。之后，正是这第三代人，没有怨天尤人排斥西方，而是变成“理性的、现实的民族主义”。由于这一主张，当时的小田被大家认为是“右翼生力军”。[604]

后来小田回忆，当时日本的经济还未正式步入高速发展，关于“日本是个无能的国家”的流言甚嚣尘上，小田对此加以反对，认为“日本有日本自身的价值，并为之呐喊”。[605] 1960年代中期以后，小田批判大众民族主义的高涨，上述主张日渐淡化。但作为原“皇国少年”且在战后社会被“公”的问题困扰的他来说，日本民族主义重建的主张是必经之路。

后来，小田于1964年8月出访韩国。此前就有朝鲜朋友的小田此次访韩，发现“韩国人与日本的关系，同日本人与美国的关系上有很多相似点”。正如大多数美国人对日本空袭一无所知那样，日本方面也对朝鲜统治的实情毫不知晓。小田会见的韩国政府官员告诉他，在美国留学之际，曾被日本的年轻留学生问过“你在哪里学的的日语”这一天真得让人只能苦笑的逸事。[606]

但另一方面，小田在“受害”和“加害”的关系中，有时也会感觉到心情不畅。1962年，小田历时6年创作出小说《美国》。书中虽然描绘了各式各样的民族组织中的人物，在美华人却没有出场。据小田所说，虽然在美国自己和中国留学生成为朋友，但其中一人说他战时身在南京，至此“依靠美国是加害者，日本是受害者这一意识”来阐述自己观点的小田感觉到了其中的极端复杂性。无论是在这个中国人面前也好，还是在一直以来就有交往的朝鲜友人面前也罢，“我虽然认为他们的攻击是完全正当的事，但我跟那样的日本没有任何关系，那时我还是个孩子”。“只要自己克服不了这种逃避的托词，就绝不会写中国人。”[607]

总之，在小田访韩之后批判了两种人，“认为日本真是做了件对的事情的人们，以及单方面反对，认为无论都不赞成道歉的人们”。在小田看来，“日本人”向“朝鲜”随随便便地谢罪容易使“被平均化了的日本人”陷入“没有自主性的犯罪意识”中。[608] 虽说如此，但他们如何思考“受害”和“加害”的关系，至今还没有定论。

在这样的摸索中，小田于1964年底乘船去了冲绳。一方面受到美军在冲绳统治的实情的冲击，另一方面小田从与美军军官的谈话中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面对小田，以高级官员沃特森（Watson）中将为首的美国军人，同样以共产主义威胁论和“自由”的宝贵性为说辞，主张不得已才由美军来统治处在冷战最前沿的冲绳。但小田认为，“不仅沃特森，大部分美国人欠缺的是，诸如‘日本无论是共产主义化还是非共产主义化，这都是日本人自身的问题，美国人没有评论这个那个的权利与义务’这样的想法”。[609] 而对美国方面而言，只不过把日本和冲绳作为抽象化了的阵地争夺游戏的格子，并没有关注到这里住着的活生生的人们。

小田一方面反感乐观地解说“自由”和“民主主义”的美军军官，但另一方面又感铭于“他们对民族主义的信念之深”。小田认为，“这是因为，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民众质朴而充满力量，对根植于生活中的民主主义信念大概也是如此”。[610] 对于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失败以前的雅典人来说，“民主主义”是生活的一部分，是既没有不安也没有疑问的终极价值。

在小田的思想里，那个时代的雅典和战后的日本不同，“公”的原理和“私”的生活一致而不矛盾。小田听着美军军官对“民主主义”的赞赏，想起了伯里克利在对战死者进行追悼演说时说过的“我们自由并快乐地生活着，就会打败斯巴达式教育的斯巴达”。小田重复着自由与民主主义的美国破坏了“灭私奉公”的日本，认为正是这种不知扭曲的状态本身

才是美国民主主义的强大所在。[611]

然而“无与伦比的强大也伴随着重大危险”。小田想起在雅典和斯巴达对抗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中，两大国夹缝中生存的众多小国，有哪个是作为军事基地而幸存下来的呢，要是拒绝就会处于被消灭的歧路上。其中一个小国，因拒绝军事基地化所以被打着“民主主义”旗号的雅典军队消灭了，小田对这一史实留有强烈印象。小田感觉冲绳的美国军人存在“一种对自己的民主主义坚信不疑的危险”。[612]

小田问美军军官“战时如果你是日本人会怎么办？”在“爱国心”与“民主主义”相矛盾、自己的死不会被赋予意义的情况下，你会怎么办？这时在小田的心中，不只有日本的战死者，也有“纳粹下的德国青年”。[613]

军官们最初以“还好我还没陷入这种困境”而含糊其词。尽管如此，面对强烈要求答复的小田，有的军官回答道：“为了祖国与美国而战。不管是为了军国主义政权还是别的什么。”有的军官答道：“还是死了好”，小田也感觉到“确实如此”。[614]

有的海军陆战队军官却回答道：“海军陆战队有规定可以抗拒不合理的命令，例如，如果总统命令我向议会出军，我就会与总统开战。”小田听到这样的回答，受到了某种冲击。包括他在内，都感到在日本有关“爱国心”的讨论中缺少了“应该保卫哪种祖国这样的研究”。[615]

这次冲绳之行，与曾和特攻队作战的美军军官的谈话，又一次震惊了小田。特攻队的飞机被美军炮弹击中，这名军官平淡地说“大部分都掉了下来”。小田注意到，描述特攻队的电影和电视剧，以及自己对特攻队的印象，都是以攻击基地的悲壮场面结束的，没有看到他们中的大部分都被白白击毁。[616]

这次冲绳访问之后，1965年1月，小田发表了他的代表性评论《“难死”的思想》。在这篇评论中，与被美化成英雄式死法的“散华”（阵亡）相对比，揭示了拒绝所有抽象化与附加意义的“难死”，并由此出发论及“公”和“私”的关系。

在这篇文章中，小田批判的是当时有关民族主义的讨论，尤其批判了与小田有对抗意识的宣称应为了“公”大义赴死的林房雄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以及三岛由纪夫的“散华”美学。就像大江健三郎和江藤淳那样，对曾经的“皇国少年”小田来说，与三岛的对决是不可避免的。

小田认为，三岛的美学抓住了包含激进左翼在内的“喜好纯粹的青年”的心。在经济高速发展下“无目的的繁荣”中躁动、在“公”与“私”的分裂中躁动的趋势，都是在那种背景下存在的。

但无论是对哪种“公”而言，都是没有意义的，如果从只迎来丑恶的死亡而没有其他意义的大阪空袭中的“难死”来看，“散华”的美学毫无意义，“不过是旁观者无责任的浪漫梦想而已”。另一方面，倡导国际政治“现实主义”的政治学家高阪正尧和把保守政治家及企业家赞赏为“实干家”的江藤淳认为，这仅仅是在理想化政治家和企业家，实际上他们“不是‘现实主义者’，而是追求美与伦理依托的浪漫主义者”。[617]

小田在这篇评论中主张，与“仅此一次的瞬间的极端状况”的美“散华”相比，“难死”“与其说是短篇小说式的方法不如说是长篇小说式的方法”，在“日常大部分时间的扩展”中存在。[618] 也就是说，小田的“难死”思想是他“全体小说论”的延伸。

之后在同一时期的日本文学论中，小田从他自己的视角出发论述战后文学。小田在这里批判把战后文学看作“转向文学”的吉本隆明的定位。以野间宏为代表的战后作家，主张从世界和人类“不知道”的这种崩溃感出发，开始创作文学。[619] 小田虽比吉本年少，但与没有入伍经验

且在战后有着浪漫志向的吉本不同，他有与野间般战场体验者相近的感性。

实际上小田和吉本都是《近代文学》的爱好者。吉本从《近代文学》中发现的是“观念与肉体的分离”的问题，以及对年长一代的不信任与反抗，宣扬“所谓民众就是我自己”。而小田从《近代文学》中发现的则是因战争体验失去信任的人们如何修复关系的问题。小田在当时的文学论中说道，战后文学是从对人的不信任和关系的崩溃出发，在这个前提下提倡“荒正人氏反复强调的，在‘横向联系’的扩展中确立个人主义”。[620]

在这种意义上，小田虽然比吉本年少，却更加了解年长一代战后文学家。小田在《“难死”的思想》和《文学中的战后责任》等文章中，主张“全体小说不是青年的、青春的文学，而是以成熟及老谋深算为宗旨的精力旺盛的中年男性的文学”，与自称是“叛逆儿”的吉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621]

但小田认为随着时代发展，“左翼阵营的秩序以及知识分子的思想秩序都在逐渐恢复”，在这种状况下，从世界和人类“不知道”的这种崩溃感出发的战后文学也逐渐变得带有党派色彩、形式化而失去活力。与之相对的文学是基于“‘我就是我’的这种自我完结、毫无意义的自我主义”创作的文学。而且那种自我主义与荒正人提倡的“个人主义”性质不同，正如小田自己所见的“垮掉的一代”一样，“隐约、被动、脆弱，正因为如此甚至没有堕入自我主义的地狱”。[622]

此外小田对这种文学状况中所描绘的人物形象进行了评价，他认为“不是美就是丑，既不美也不丑，各自扩散而无从捉摸的中间层很少”，没有描绘出“充满普通人的平凡哀乐的中层社会”，也没有描绘出超越“美”与“丑”这些抽象语言表现的“扩散而无从捉摸的”“普通人”。[623

于是小田从自己的战争经历中“培育出一个理论”，即“所有人都不可能永远都伟大、正确、诚实、美丽”，而同时“无论什么人，都会有伟大、正确、诚实、美丽的一刻”。[624]

这也表现了小田“扩散而无从捉摸”的人生观。同时，战败后荒正人在发表于《近代文学》的文章《第二青春》的末尾写道，小田的这种人生观“陈腐却不失璀璨，俗套却不失传奇，看似丑陋却又十分华丽”。[625] 这也是小田在大阪空袭中历经的表现“一切”的一个词。

像这样，小田将一切抗拒意义赋予和浪漫主义的人物形象表述为“普通人”。所谓“普通”不是指将“异常”排除在外，而是表示“扩散而无从捉摸”的“一切”。这也与鹤见俊辅眼中的“大众”相重合。

1965年4月，以鹤见的来电为契机，小田就任了倡导“普通市民”的越平联运动的代表。

不定型的运动

从1965年2月开始，关于扩大规模的美军对北越进行炮轰一事，在日本引起一片舆论。1965年3月，鹤见俊辅在东京的某个展览会场上遇见了在“无声之声会”负责联络工作的高畠通敏。1960年在安保斗争中成立的“无声之声会”在安保斗争之后便停滞不前，集会也凑不齐十个人。于是鹤见和高畠考虑“能否将各地的这种小团体集合起来，策划一场反对轰炸袭击北越的示威游行呢？”

据鹤见回忆，在4月初召开的研讨会上，“就从年青一代中寻求领导人一事达成一致意见”。鹤见因1960年的安保斗争辞去了东京工业大学的工作，此后虽又就任同志社大学的教授，但那是在对安保斗争的结果感到失望，抑郁症复发而又过了大约一年的闭门生活之后的事情。于是以鹤见为首，“大家都身心俱疲，希望能由比自己年轻的人来领导”。

[626]

作为那位“年轻人”，时年32岁的小田实备受推崇。当时的小田和安保运动并不相干，而是作为年轻人中大有人气的行动派作家广为人知。当时负责联系小田的人正是鹤见。

小田爽快地接受请求担任了代表职务。小田与鹤见此前只是在一次对谈中有过一面之缘。但电视上播放的轰炸北越的情景，猛烈地刺激了小田关于大阪空袭的记忆。小田说，自己参加越平联，“不是出于同情者的视角，说得不好听点，其实是从更自私的、与自己切实相关的视角”来考虑的，“这一问题刺痛了我的心，正因如此，我才开始行动”。[627]

不仅是小田，轰炸北越的新闻也激起了其他战争经历者的不安与愤怒。据鹤见回忆，当时“电话一打过去事情几乎立刻就谈妥了，反对美国对越南进行轰炸袭击的呼声越发强烈”，“如星火燎原一般”形成了运动自发之势。[628]

另一方面，鹤见与小田等人不同，有着别样的感情。他后来说：“培养了我的美国竟然挑起了越战，真是太荒唐了。”为此深受打击，“对美国战争的怒火”化成了“自己内心熊熊燃烧的大火”。[629] 可以说，对过去曾在美国的市民社会中感受到的“民主主义根基”怀有的恩情成了促使鹤见反越战的动机。

1965年4月小田在《世界》杂志的临时增刊上发表了题为《现在我们该做什么？》的文章，提议在东京和华盛顿进行有统一口号的游行。当时，国际性的共同游行仅限于五一劳动节以及各国共产党的共同事业，小田的这项提案是全新的。

虽说如此，小田在晚年回忆道：“他在那时完全不清楚这一语言的实现有多艰巨，需要花多大气力。”他并不是所谓的“社会运动家”，

1960年的安保斗争也只是作壁上观。他不曾料想越战竟会持续如此之久，当时就是想着“不久就会有人来接手，大不了辞去代表一职就是”才答应出任代表。[630]

据鹤见回忆，在1965年4月的讨论会上想出“越平联”这一名字的是高畠。而小田则回忆说全称是他提出来的，高畠只是说“那就简称为‘越平联’吧”。[631] 但无论如何，可以确定的是最初叫作“争取越南和平市民文化团体联合会”，之后去掉了“文化团体”，变成了个人参与意义强烈的“市民联合会”。

1965年4月24日，越平联举行了首次游行。在号召民众的传单上写着“我们只是普通的市民”，“我们想说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争取越南和平！’”[632]

这里体现了两个特征，其一是除“争取越南和平”外并未提出其他口号。站在社会主义者的立场来看，未相伴提出资本主义体制改革口号的和平运动是没有意义的。而且根据后来担任越平联事务局局长的吉川勇一的表述，若变成各个团体的统一行动，则很容易陷入“除反越战外是否还应弹劾战犯佐藤内阁，应不能放过冲绳问题，是否涉及安保问题”之类的探讨之中。[633]

但吉川认为，大多数运动一旦加上面面俱到的口号，通常情况都是“就此放心了，不会再去讨论实际内容”。小田虽在晚年开始致力于解决冲绳和安保问题，但在越平联成立之初并不同意将这两个问题加入口号。他后来又坦言，那是因为对当时的自己而言“安保和冲绳问题并没有那么强烈地刺痛我的心”。[634]

小田忆起当时说道，“若这是一般的‘左’的运动的话，也许‘冲绳和安保问题’在一开始就会成为‘议题’”。按照越平联原成员福富节男的说法，就是直到自己内心真正意识到这个问题时“我们才开始着急”。[635]

一如鹤见俊辅在很早以前就主张的，没有采取从外部注入这种看上去完美无缺的“正义”。

而根据小田的回忆，“越南的社会主义有什么样的特点呢？”“那时谈到这种话题性问题，我们也没有从内部对其进行讨论。”[636] 在“争取越南和平”之上虽又多次提出“把越南还给越南人”的口号，但这只是小田批判冲绳的美军军官时所说的“日本无论是否共产主义化，都是日本人自己的事，美国人没有说三道四的权利和义务”这一理论的延伸。

这种态度，与避免绝对真理的鹤见及厌恶现实抽象化的小田的思想是相吻合的。鹤见俊辅在1966年说道：“我们不能想着一旦越南战争结束，世界就会变美好了，或者成为社会主义，世界就变美好了。”他接着说道：

> 越南的事情应该由越南人自己决定。若任由越南人选择，若他们选择了共产主义，为什么就不能对此放手不管呢？……
>
> 这种大致的情况认识，也许是搞错了。……开战以来，尽量避免杀人就是我的首要目标。我在内心寻求这种信念的依据，发现因为人类没有对情况进行最终计算的能力，所以没有充分的依据决定他人的生死。自己反对杀人的依据存在于怀疑主义之中。所以，我反对所有的死刑，无论是斯大林的决定，还是美国政府的指示，抑或采取东京审判的形式，我都无法认同根据政治裁决而执行的死刑。更何况以战争的方式、遵从国家的命令，杀掉自己毫不相识的人，我对此强烈反对。[637]

成为越平联事务局局长的吉川勇一也持这种想法，只不过采取的形式不同。如第七章所述，在1950年代前半期共产党分裂时期，吉川目睹了学生党员向反对派滥用私刑的事件。他对此深受打击，于是对宣扬绝对真理的态度表示抗拒，怀着“绝不再重蹈覆辙”的决心参加了越平联。后来吉川回想道：“没有什么东西是绝对正确的。鹤见告诉过我‘不要用绝对的字眼’。”[638]

作为越平联另一个特征的“普通市民”也表现出回避这种“绝对”表现的倾向。虽然1960年安保运动中对“市民”赞赏有加，但“市民”一词并未深入人心。小田对越平联运动扩大后的60年代后半期的情况回忆道：

> 在这里我带着苦笑回想起当时许多集会上，例如学生运动的“党派”代表慷慨激昂地演讲“今天在此集会的学生、劳动者、市民诸君……”我想也许在“越平联”出现以前，他们的革命词语中没有底层的“市民”这个词，但市民诸君的说法也实在是太不自然、太奇怪了。……革新政党的领导、工会的活动家以及学生们都用不信任的目光打量着“市民”一词。……对“左翼”的“革命势力”来说，“市民”并非任何时候都与“小资产主义”、“小市民”这些“带歧视”的字眼无关。尽管如此，对于与他们一起“集结”于“战斗”的“越平联”的市民们，他们虽然备感困惑，但也还是作为超出以往“市民”的概念予以接受。[639]

对小田来说，“普通市民”就是“扩散而无从捉摸的”“一切”的代名词。而且，越平联游行的实际情况也与此相符。在1965年4月的首次游行的发起人中，除了小田和开高健为首的“作家”、“电影导演”之外，“玄洋社国际部部长”、“新日本文学会员”、“主妇”等也都以个人名义并列其中。游行中散发的传单上，保守派的林健太郎和原《世界》主编吉野源三郎，甚至那些没有头衔的人也以个人名义发表了言论。[640]

除了与现有的政党及组织没有关系这一点外，这些人之间再无一点共通之处。小田回忆，“往好里说是人才济济，往坏里说，不，按当时的实际情况老实来说，是无秩序的鱼龙混杂”，“对首日游行的混乱状况、‘小资产阶级小市民’姿态、弄虚作假的姿态惊讶不已回去之后再也不来的人并不少见”。[641]

在首次游行中，当小田高举着“不属于任何党派的个人”的牌子行进时，有行人带着几分顾虑说道“我只是个普通的公司员工”，他回答道“我也是个普通的作家”。对于把“普通”定义为“扩散而无从捉摸”而不是“多数派”或“标准”的小田而言，这是理所当然的回答。参加这次游行

的大约有1500人——“普通主妇、普通教师、普通少年、普通失业者”等，小田表示只能将他们称作“普通市民”。[642]

这样的“普通”并不是排除“异常”。在越平联，被开除党籍的原共产党员也能自由地参加。从1965年12月开始担任越平联事务局局长的吉川勇一就是其中之一。1960年代前半期，正值禁止使用原子弹氢弹运动的分裂之际——此前跨党派进行的禁止使用原子弹氢弹运动，就认同中苏核试验的共产党态度分裂为“支持原子弹氢弹”和“禁止原子弹氢弹”两派。此时吉川已是因反对共产党方针而被开除党籍的老革命家。当时34岁的吉川这样回忆参加越平联的经过：

> 事实上，越平联成立时，我虽想参加，但由于刚被共产党开除党籍，犹豫了一阵。在当时如果被共产党开除党籍，就会被当成天生的祸害，受到排斥。想着这样的自己如果加入到越平联中去，定会给好不容易才成立的新团体添麻烦。因此，我没有去参加创立时的游行，在第二次游行中也只是悄悄跟在人群后面。当有人说要我当事务局局长时我说等一等吧，自己真的可以吗，但还是想听一听小田实的意见，于是在游行之后才有了和小田先生的第一次交谈。我一直在顾虑像我这样声名狼藉的人，又和共产党交恶，没有关系吗？然而小田先生完全不以为然，告诉我没关系，跟我说你能帮上忙不是很好吗？但是没有钱拿哦。我回答说没关系，我并不是冲着钱去的。一来二去，这件事就这么定下来了。
>
> 虽然对于还有这样的运动感到非常吃惊，但还是觉得干吗不试着做一做呢。一般来说在那种场合下本应更加深思熟虑，但真的是觉得既新鲜又吃惊。[643]

小田在初次游行之后写了一篇题为《普通市民能做到的事——“公”与“私”的关系》的文章。文章中认为，此前现有党派领导的运动为了维持和扩大组织，采取了混杂各种各样口号的“目的宽泛主义”。而与此相对，越平联则仅限于“反越战”这一尽可能具体的单一目标，并在这一目标之下尽可能广泛地集结群众。[644]

此外小田认为，越平联宣称“每个人都希望发出自己的声音，可是

显然没有给予充足的机会，这是不争的事实”。其原因之一是已有的“战前运动”冠冕堂皇地打着“无产阶级的解放”等“公”的大义名号，强迫指导每一个去参加运动的“私”的个人。与此相对，像越平联这样的“战后运动”则首先有“私”，然后才有由其集合成的“公”的大义名号的存在。此外，前者的运动充满了僵化的克己主义和悲壮感，具有“小题大做，一点点失败就会引起巨大的挫败感”的特点，而后者则不会如此。

在运动方式上，也尝试了新的策划。1965年5月，根据小田的提案，日美两国历史上首次同时举行了反越战的游行示威。1965年8月15日，在赤坂太子酒店的国际会议厅，召开了一次通宵讨论会，此次与会人员不仅有中曾根康弘、宫泽喜一等自民党议员，还有社共两党代表、原陆军中将佐藤贤了等人，还在电视上直播了此次会议过程。此外，在1965年11月美国的《纽约时报》上登出反战广告，并在1966年6月策划了邀请美国和平活动家从北海道到冲绳的全国巡回演讲。同年8月召开了由那些美国和平活动家参加的“日美市民会议”，并在会议上签订了对抗《日美安保条约》的《日美反战和平市民条约》。

利用媒体的运动方式、邀请名人参加的通宵讨论会、模拟性的“市民条约”、不依赖大组织的国际交流等，虽然在之后慢慢变得普通和陈腐，但在当时来说，都是史无前例的尝试。对于这些方式，小田回忆道：“如果作为展示和平运动的新流派而成为话题，就算是再怎么富裕的‘小市民’，他们游戏般的和平活动作为象征也会招致反感。”然而越平联的参加者们享受着这种前所未有的创新想法和“游戏”要素。鹤见俊辅在小田提案的《日美反战和平市民条约》的准备会议上，对作家小松左京说道：“你，这是对SF作家的挑战。”[645]

国际化趋势和技术进步是这次运动的大背景。轰炸北越的国际广播不仅刺激了日本国内反战意识的高涨，而且从1964年起，海外旅游得以放开，一般用户也能使用自动回线拨打国际电话。1965年5月，小田为

了协商日美同时进行的游行而与美国通话时感慨道，以前需要接线员转接所以要花很长时间，现在“打电话到美国只需2分钟”，真是十分方便，并想到，即使不依靠国家和大组织，“只需要一部电话，世界上的各个地方都可以统一行动——这一事实，这些世界进步派都还没意识到吧”。[646]

运动的参加方式也是推行交给各成员的方针。不需要进行加入组织的会员登记，能参加游行与活动的人可以随时自由参加。虽然有起联络作用的事务局，但也无法形成完整的组织体系。参加者的贡献方式不只通过游行示威和签名活动，也可以通过其他诸如选举投票和抵制美货等“可以个人立即实施的”方式来各自进行。[647] 在后来的市民运动中扩大开来的“有钱的出钱，有点子的出点子”这一说法，为了在美国《纽约时报》上刊登意见广告来筹措资金，1965年8月，被开高健作为论著的标题而广为流传。[648]

对于之后变得很有名的“越平联三原则”，小田点评道：“1.怎样都好，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吧；2.对于他人所做的事一句都不要抱怨；3.提出建议之前，一定自己先试一遍。”[649] 1965年8月，报纸记者说：“越平联连一个领导者也没有。写报道的时候只能写‘某某’这点很麻烦呢。”关于这件事，开高健回答：“虽然振臂高呼的人有很多，但是没有一个领导者，归根结底因为每个人都是独立地参加活动，组织可以说有也可以说没有。”[650] 鹤见俊辅从1950年代就倡导“新组织论”，但在这里才结出硕果。

当时的越平联成员强调的是“越平联并不是一个组织，而是一场运动”。[651] 并不是为了组织的激活才开展运动，而是为了运动才组成一个组织，认为越平联并不是由加入组织的人组成的集团，而是开展运动的这一状态。若某人发动运动的话，在那时才认为是出现了“越平联成员”。

也就是说，越平联与其说是一个组织，不如说是一种表现形式。随着运动的扩展，这种表现形式逐渐被各地的人们所采用，进而呈现出一种加盟的态势。很受欢迎的小田四处奔波进行演讲等活动，最终在其最鼎盛时期即1969年，全国建立了约380个“支部”，鹤见回忆当时“全国每周都有新的越平联支部成立”。[652] 当然，这也只是各地的有志之士为了发传单或游行而成立的“××越平联”，除一年一次的全国会晤外，活动都是自由的。

而所谓的“支部”也因“扩散而无法掌控”。除由地名和学校冠名的“长野越平联”、“龙谷大学越平联”等之外，还出现了由年轻人组成的“青年越平联”，由在日外国人组成的“外国人越平联”，甚至出现了一个人游行示威的“一人越平联”。就连事务局局长吉川勇一也不清楚整体情况，他表示，“就算成立了新团体，也因为不需要登记和认可，所以完全不知道确切的数量。此外，有些并不以‘××越平联’为名的团体，其成员也认为自己属于越平联，还有成立意义不同于越平联的团体，其界限都不甚明了”。[653]

事务局所在的东京越平联虽然从1969年8月开始在神乐坂设置了事务所，但这并不是“总部”而是被称作“神乐坂越平联”。[654] 吉川说道：

> 这个“神乐坂越平联”每周二晚上都会举行联系人会之类的会谈。谁都可以参加，并不需要会员的资格。起初定在6点开始，但渐渐就越来越晚，变成晚上10点开始，结束要到凌晨2、3点。会谈主题也各种各样。有时是宇宙论，有时是哲学、农业的现状、数学的无限定义，等等，参加者中有数学家、哲学家，话题也是天南地北，也有某一种方面知识的沙龙，因为若经常一味讨论怎样进行游行的话题会非常枯燥。

吉川回忆道，这种越平联的存在被“新左翼党派等冠以各种恶名”，诸如“麻痹劳动者的阶级意识并使其在小资产阶级的市民运动中消解的反动组织”、“文化人的越南游戏”、“以低廉的价格向大众良心兜售免罪符的组织”等。但越平联方面并没有否定新左翼。吉川在1967年11月提

出，越平联的方法不过是“表达自己意愿的一种手段”，并表示“这种方法当然不是劳动者、学生乃至所有人都应采纳的最好方法”，而是帮助“劳动者组织抗议罢工、学生拥有掀起激烈示威的机动能力”。[655]

1960年代末，随着全共斗运动的抬头，越平联中也加入了不少激进的学生。然而据吉川回忆，虽然进行了阻止内部武斗的仲裁，但基本都归结于其本人的判断和责任，采取“绝对不限制人的行动，那是个人自由”的方针。小田实也表示，当学生们戴上印着“越平联”白色字样的黑色头盔时，简直就像是美国垮掉的一代，“为什么要这样随大流呢？要统一成一种颜色吗？”他对此深感厌烦，但并没有清除这些学生。[656]

新加入的激进学生经常对越平联的路线表示不满，有人将小田、吉川以及鹤见等人批判为“老派越平联”。甚至出现了有新左翼和共产党的活动家加入各地越平联，借以壮大自己党派力量的传言。然而1968年8月，当松田道雄忠告鹤见俊辅“再这样下去，越平联就会被完全占据了哦”时，鹤见俊辅却微笑着说“绝对不会的！”[657] 他觉得“占据”一个既没有总部也没有职位的运动是不可能的，此处可见其弱小到底的自信。

正因如此，当时越平联的游行变成了戴着头盔的学生、以小田为首的作家和知识分子，还有主妇和公司职员这些人进行的活动。鹤见俊辅在1968年提出“党派性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抓住了人性的弱点”，“能否和这种人性的弱点抗争到底”是一大课题。[658] 经历过战败后的运动组织由于党派之争而崩溃的鹤见孕育的“不定型思想”对实践是有益的。

结果是，虽然很多人因不满越平联而退出，但没有发生除名和分裂这些事。在容忍“一人越平联”的状态下，“分裂”之类的事并不会发生。吉川回忆当时的情况说：“包括我在内大家都有自己的特点而集结起来，当时也曾抱怨过这种糟糕的状况，但再怎样也没出现过除名的情况，也不会说什么叛徒滚出去之类的话。”[659]

就那样，对已有运动的不信任和从独立开展运动中得到的理论经验结合在一起。越平联创立之后，时隔六年再次访美的小田与过去的朋友——一个同性恋前卫派音乐家重逢了。小田在书中是这样描写当时的对话的：“T还是一如既往地对政治十分反感，总是嘲讽一切与政治相关的东西。得知了我参加反越战运动，用从来没有过的严肃表情对我说‘你真行，居然还相信政治’。我回答道：‘正是因为不能相信，自己才选择投身运动。’” [660]

当然，越平联也不是一直顺利扩大。虽然1969年6月15日（桦美智子忌日）的集会和游行集结了5万人，但在对越战关注暂时衰退的1966年，参加例行游行的只有50人。

当悲观的吉川对鹤见俊辅抱怨“前几天的游行只有四十几个人参加”时，鹤见俊辅却回答“什么？居然有四十几个人？真是了不起啊！”并表示“人数少是好事”。主张“大众”并非数量上的多数派的鹤见，其思想在此得到了运用。吉川问他这句话的意思，鹤见表示“要重新思考一下游行这件事”，“感觉举行小型游行的我们将会变大”。 [661]

小田实也有同样的想法。1968年1月美国航母“企业号”停靠在佐世保港时，小田乘着排水量3吨的木船与排水量7.5万吨的航母对峙。小田虽然对这种落差到十分绝望，但想到航母也是由5250个的乘务员组成的集合体，想到其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人”。此时，航母“7.5万吨”和木船“3吨”抽象化的数字也就失去了意义，小田对航母甲板上看到的每个独立的“个人”进行了喊话。 [662]

当然，无论是小田还是鹤见，正如小田描述的那样，“所有人都不会永远伟大、正确、诚实、美丽”，不会将理想化的“英雄”主义贯彻到底。据小田回忆，运动中他的桃色新闻就一直没间断过。作为运动中的名人，他也曾沾沾自喜，曾被称为“小田天皇”。在1969年的集会上，鹤见曾批评道：“小田所到之处越平联就可以成立，但这样的越平联就像

中村锦之助的亲友团，力量薄弱。”[663] 事实上，从他们以及越平联成员之后的言行活动中，很难评价他们是否真的表达了越平联的全部思想。

然而同时，他们又如小田所述，“无论什么人，某时也会是伟大、正确、诚实、美丽的”。换言之，也可以说他们是“扩散而无从捉摸的”“普通人”、“普通的市民”。

而且，对于一直以来考虑民族主义问题的鹤见和小田来说，这种运动对于国家关系有何作用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作为具体运动呈现出来的就是逃兵的救援活动。

“国家”与“逃离”

> 现在有四个逃兵在你们面前，逃离美军的四个爱国逃兵。纵观历史，逃兵往往被冠以懦弱者、背叛者、无用者之名。然而我们并不关心其范畴与称呼。是时候为我们心中所坚守的正义拍案而起了。

1967年11月13日，小田、鹤见、吉川三人召开了记者招待会，宣布从停泊在横须贺港的美军航母“因特莱比特号”逃走的四名水兵在越平联的帮助下成功逃脱，并发布了四人宣读声明的记录影片。上述引文来源于“爱国的逃兵”发表的共同声明。[664]

来自美国的和平运动家霍华德·津恩和拉尔夫·菲泽斯通于1966年6月抵达日本，提出应该号召那些来到日本的美国士兵。如第十三章所述，这次访日的霍华德一方深受日本方面历史意识的感动，而越平联一方则为这两个人自由乐观的态度和非暴力直接行动这一运动方式所触动，陆续展开了在美国大使馆前静坐示威等活动。而且越平联接受了霍华德的提议，从1967年夏开始在横须贺的餐饮一条街向美军士兵派发鼓励逃跑的传单。

当时在欧洲已经出现了拒绝奔赴越南前线而逃跑的美军士兵，日本也在1965年8月发生了受命赴越的韩国陆军士兵金东希希望流亡日本的事件，日本政府把他视为偷渡者而加以逮捕。越平联以此事件为契机，开始关注日本政府用于扣留外国人的位于九州的大村收容所以及在日韩国人、朝鲜人问题。

虽说如此，据吉川回忆，虽然在新闻中了解到逃跑事件，但对于实际并没有接触过逃兵的他们，“如果真的出现了该怎么办，实际上还是不明白”。[665] 此外，那四个逃兵并没有读过越平联的传单，只凭一时意气逃跑之后便不知该去何处，通过传闻为寻求保护而匆忙跑向越平联。

越平联成员面对逃兵，首先感到十分困惑。他们说：“不管发生什么事都不能回到船上去，那种工作不是人干的。”他们四人都是还没上过大学的19—20岁的年轻人。他们当然不知道越平联，甚至不知道《日美安保条约》，总是“笑着开玩笑”。[666] 小田批评他们道：“这与日本小说家脑中幻想的，以纯白的雪为背景的二·二六事件行动家的印象恐怕相差甚远”，是“贪杯好色的年轻人”。[667]

可是，让小田等人震惊的是四个人所写的声明。小田最初和他们用英语对话，讨厌他们没有教养的样子，“内心很看不起他们，认为我用英语写的东西都比他们强”，[668] 然而这份声明完全出乎意料。其中一名19岁的逃兵写下了这样的声明：

> 我，麦克·安东尼·林多纳是一名出生在普通中产阶级家庭的普通美国青年。……正因为我的信仰我才会挺身而出，这与美国宪法中关于权利的条款所保障的内容无关，但还是被军队所否定……
>
> 令我置身于支持越战一方的理由是违背道德、完全非人类的做法。……我之所以不用“为了美国在越南作战”而用“支持越战”这一表达是因为我感觉在那里的所作所为没有对祖国和美国的同胞起到任何作用……

为此，我本身如果被称以“某某主义者”这个代名词，我的信念就有可能被划分为“某某主义”，这将十分遗憾。我与政治没有任何关联，不想被划分在拒绝支持军事大屠杀的一个美国人之外。[669]

此外，另一个19岁逃兵理查德·亨利这样写道：

对我自己尤其是这样，非常讨厌对人进行划分。……然而，因为任何人任何事都被贴上现成的标签，对那些心理过程被巧妙抓住的人来说……思想与思想之间，人与人之间，范畴与范畴之间一直在斗争。

我是一名美国人。想起可能再也回不去了，离开美国的未来、朋友与家人，心里十分痛苦。但如果只有如此才能使这场战争结束、使美国恢复良知的话，我愿意主动被贴上共产主义者的标签。我们宪法的精神必胜。[670]

平凡而没有教养的“贪杯好色的年轻人”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就像小田一直所说的“无论什么人，某时也会是伟大、正确、诚实、美丽的”一样。于是读了他们一边说“我们宪法的精神必胜”，一边自称“爱国的逃兵”的声明之后，小田自问“我能用日语写出这些吗？”“得出的结论是不能。”[671]

后来在1973年，在小田和本多胜一的对话中，小田说道：“我真正好好考虑文学这一工作还多亏了越战。”据小田所说，现代日语中，虽然情绪性的主题作为“个人一对一交谈”的文体十分发达，但“用严肃的态度客观地向公众述说公共问题的文体”“感觉还未确立”。[672]

小田在反越战游行和集会中深切感受到的就是，为了人们从对等的立场述说问题采用哪种文体好呢。自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批判这些出现的新左翼也好，都很容易以“从上往下类似强迫的演说语言”、“异常谦卑的同时又巧妙地强加于人”的措辞结束。小田认为，“三岛由纪夫在死前写的檄文虽然很差，但他尽了全力。虽然是竭尽全力，但仍然写得一塌糊涂，难道不是因为超出三岛个人的才能，日语中尚未确立这种文体吗？”[673]

原本日语中就没有表现同等地位人类集团关系的语言。小田并不是一开始就拘泥于“市民”这个词，1966年8月与美国活动家缔结的《日美反战和平市民条约》，小田的草案中用的还是“人民条约”一词。会场上讨论到底是应该采用“人民”还是“市民”时，很明显的是“日语中没有与‘people’恰好对应的词，‘市民’、‘人民’、‘大众’、‘民众’、‘庶民’这些有着细微差异的词十分散乱”。出席会议的小松左京说道：“美国人完全不懂这次讨论的意义，从而有些不知所措。”[674]

逃兵的出现，迫使人们对民族主义重新进行思考。如前所述，本来小田对战败而崩溃的“公”很苦恼，在冲绳听了美军军官“我应该会和总统斗争”的发言后，开始考虑“我们应该守护的祖国到底是什么？”而在遇到逃兵之后，小田开始寻求他们在原理上的“祖国”，而不是地缘、血缘上的“祖国”的身份特征。

小田在1968年2月发表的《人·某个人的考察》中说道，逃兵采取的行动是“如果现在美国已经没有‘美国原理’，如果自己个人的原理与现在‘祖国’的原理互不相容，那么就果断地离开‘祖国’美国”。[675] 然而同时，在他们心中“既然自己的原理就是他们所认为的‘美国原理’，那么不管自己去哪都是美国人”。

既然如此，“拥有与自己原理相同的原理，至少能同等看待其他社会、国家的话，成为其中一员也不错，把它作为自己的新‘祖国’也可以”。然而在日本，“除去极少数的例外，作为人们自身与祖国‘同一性’的根据，谈论的是血缘、地缘，很难用像‘大和魂’和‘日本精神’这些难以定义的东西作为原理上的根据”。

逃兵高举日本和平宪法也给小田留下深刻的印象。上述韩国逃兵金东希在读到宪法第九条后希望逃亡到日本，被日本政府逮捕。美国的逃兵们也对日本宪法的精神怀有共鸣，写下了希望能把这种精神弘扬到全世界的声明。

小田对此评价道：“那一刻，日本对他们而言难道不是‘祖国’吗？”他还主张“这恐怕不能套用‘国际’这一称呼，超越‘国家’和‘国际’这些范畴，作为更为本源的人类内在的东西，我会接受这种原理”。

这样对于小田一直以来抱有的“我们应该守护的祖国到底是什么”这一疑问，就有了一个答案。“祖国”是自己要坚信的原理，没必要在地缘、血缘上保持一致，更没有必要与政府的命令保持一致。虽然有时违背政府的命令，从该政府管辖的土地逃亡，但这成为对自己所信“祖国”的“爱国”。这既不是“国家的”也不是“国际的”而是“人类”的原理。

然而，这种原理，小田以前就体悟到了。对小田和鹤见来说，战死者是“赤裸裸的人”的象征，从地点来看“民族的”和“国际的”只不过是表面上的分别。小田在巴黎的凯旋门前，对没有被国家赋予意义的德国和法国死者，有一种“同胞”的感觉。

这种感觉那些有过战争经历的人应该都能有所体会。如第一章所述，反对战争才是“真正的爱国”这一主张在战争后期也广泛存在。又如第三章所述，不少青年军官激愤地认为“命令投降、允许外国军队进驻的天皇已不是我们的天皇了”。小田和鹤见也从哀悼战死者的“民族主义”出发，到达了超越“国家”和“国际”区别的彼岸。

为了帮助逃兵，1967年11月，越平联中的有志青年成立了“因特莱比特四人会”，最终发展成“日本援助美国反战逃兵技术委员会”（JATEC）。与外国连续不断接触的欧洲不同，在日本避开政府的视线送逃兵离境极其困难，最初的四个人经由苏联船被送到瑞典，之后也采用了各种各样的办法。

这一活动开始之后，越平联很快被日本警察盯上。但在活动过程中，根据《日美安保条约》的地位协定，美军士兵及其家属处于治外法权状态，因而他们出入境并不受日本护照和边检法令的限制，所以即使

是帮助美军士兵出国也不触犯日本的法令。[676] 日本对美国的从属状态形成了意想不到的法律漏洞。

另一方面，美军也对逃兵救援活动产生了动摇。在日美军士兵收到通知要求“不要与BEHEIREN [677] 接触”，于是在美军内越平联立即广为人知。日本政府也表示协助美军的这一请求，1968年11月还发生了装扮成逃兵，自称约翰逊的间谍打入JATEC，之后美国逃兵和JATEC成员被逮捕的事件。

由于这一间谍事件，JATEC一度崩溃，对于谁都能自由加入越平联和JATEC的规则产生了疑问。然而JATEC的负责人栗元幸夫在1997年这样评论这次间谍事件：

> 我几乎确信他是间谍，当我把这件事情告诉鹤见俊辅时，他表现得十分厌恶，说在同事之间产生这样的疑心，运动就快要失败了……
>
> 最近，我感觉好不容易得出一个结论，即鹤见是正确的。的确第一次JATEC是被间谍约翰逊破坏了。然而如果我们十分警惕，对所有的逃兵和合作者都用怀疑的目光来看的话，越平联援助逃兵的运动早就失败了，而且这样一来，现在就不会有当时的运动参加者坦率地回忆那段往事了。
>
> 我现在认为没必要害怕被破坏，相较而言无秘密、开放的运动更重要。之所以无论如何都要保护组织，是因为把我们自己视为无法取代的特别存在。……而相反，无论谁都可以替代的运动才是必要的。[678]

本来鹤见的战后哲学是从为克服人类不信任和恐怖的“同情”奠定基础而出发的。只有摆脱死板 的“自己”这一思想，这场运动才能保存“自己”。

逃兵的出现，不仅带来了对民族主义的重新思考，也使对“逃跑”、“亡命”的印象大为改变。到1950年代为止，经历过战争的知识分子异口同声地表示无法做到不顾“同胞”的苦战而“逃跑”。在日本贫困的时代，“逃亡”和“世界市民”就是抛弃阴暗贫困的“同胞”的现状，逃往富

裕国家的利己主义的代名词。

然而支持四个逃兵的越平联在1967年11月发表声明，称他们是“勇敢的士兵”。鹤见俊辅在1969年《逃兵的肖像》中说，自己没能从日本军队逃走是“因为勇气不够”。[679] 久野收在1998年说道：“作为日本人，我为自己在战争中想做而没能做成的事感到后悔。……对美军士兵逃走的事实深表感动与共鸣，非常热心予以‘支持’。”[680] 原本就有战争经历的知识分子一边批判“逃跑”，一边却后悔过去自己没能采取实际行动。

逃兵的出现，使得“逃走”和“亡命”的形象由“怯懦者”变为“勇敢者”。这符合出国管制自由化、国际流动在日本不再是特权行为的潮流。公开四人的逃跑引发了巨大的反响。在召开记者招待会后的一个星期内，向越平联寄来的鼓励、打气的信件和募集金多达两千份。[681]

逃兵的出现，让小田等人再次思考了他们之前就想到的“加害”和“受害”的关系。小田在1969年评论逃兵之际，对太平洋战争中被征召入伍的知识分子们批判道：“大家都在战斗的时候，自己却独自逃跑的行为是不能为自己所原谅的。”在小田看来，“或许是没考虑到被自己亲手杀死的‘敌人’”。[682]

当然，如第十三章所述，小田避开了二元对立地讨论“加害”和“受害”两者的关系。小田在1966年8月的日美市民会议的演讲中，一边讲述自己在大阪空袭中的“受害”经历，一边说道：“只要没确立自己个人的原理，根据国家的命令就不得不开枪。……在这种情况下，我是站在加害者的立场上。但同时，从国家的角度来看，对国家来说我也是受害者。”[683] 小松左京也认同这一观点，并主张，“国家这一奇妙又抽象的组织，使他们成了勇者、英雄、破坏者、杀人犯。同时也要站在破坏和杀戮的受害者立场上进行分析”。[684]

小田用这种表达方式批判的是国家这个“抽象的组织”将每个人抽象化，无非一个培养“英雄”“加害者”和“受害者”的机制。只要人没有被国家赋予战争意义就不应该如此轻易地犯下杀人罪行，既然如此，剥离其意义的“普通人”就成了对抗国家的存在。

小田在1973年曾说：“为什么在日本国内对孩子舐犊情深的普通男子能够在中国轻易地杀死年轻的女子呢？因为他们是日本侵略军中的一员。作为打破这种立场的逻辑的普通人，我所考虑的只是人而已。”[685] 对于这里的“日本人”是“加害者”、“中国人”是“受害者”的以国家划分为前提的论调，小田有不同的思考。

小田认为，靖国神社“不过是从‘难死’中，将作为士兵的英雄的死——‘散华’区分开来”的一个机制而已。在小田看来，在大阪空袭中罹难的人、在越战轰炸中死去的人，乃至“被掌权者驱赶到越南牺牲的美国和韩国士兵”，都是“难死”。当然，这里也没有将“美国人”划分为“加害者”、将“越南人”划分为“受害者”。他希望的是“从根本上排除这种区别”。[686]

正因为这一态度，像1950年代那样的反美主义从越平联的活动中消失了。一改曾经的“滚回美国去”、“美国佬滚回去”这样的口号，在给横须贺基地的美国士兵发放传单上，可以看到这样的话：“传单发完的话我们就能去玩了，他们（美军士兵）却不行。死的是他们。因此一定要以认真的态度亲手将传单发给他们。”[687]

1969年，小田论述道：“在这个有着许多国家的世界里，尽可能独立于国家规定的林林总总，从其正相反的对立面反向而行，创造出一个非常狭小却真实的圈子。”[688] 这是一种思想上超越国境的“难死”共同体，具体而言则是在援助逃兵的过程中产生的人与人的合作。

实际上，逃兵救援活动使日本国内予以救援的各界人士和这些逃兵

的出生地美国，还有成为目的地的苏联和瑞典等国联系在一起，扩大了人际圈。鹤见俊辅在1974年曾说：“因为担心每一个逃兵的安危，许多人心连心联系在了一起。”“这种团结一心的成员遍布日本，准确来说是遍布全世界。”[689]

也有与现存国家未必重合的他们的“祖国”。小田曾在1966年10月发表的《和平的逻辑和伦理》中主张：“我理想中的民族主义是，将个人确立在与国家原理对立的个人原理基础上。”[690] 这里小田揭示了以每个人所拥有的“个人原理”来对抗把人抽象化并予以分裂的“国家原理”。但是，这并不一定是否认“民族主义”，而是要创造和自己“个人原理”一致的“民族主义”。

而令越平联再次发现“祖国”这一原理的是《日本国宪法》。在“因特莱比特四人会”成立时发表的“呼吁”中，针对逃兵提出了以下主张：“我们效仿那些抵抗不正当使用国家权力的人的行为，遵循《日本国宪法》的精神，以各种形式表达对他们的支持，与他们结成统一战线，告发持续侵略越南的美国政府及其帮凶日本政府。”[691]

1967年10月，参加了越平联的鹤见良行写下了题为《日本国民的绝望》的文章，论述了“‘国家’的超越”和“国民的绝望”。[692] 然而“这绝不是从世界主义的心情出发，厌恶日本国民”。“确实，一个民族应该拥有矜持。但这种矜持，为了不使自己在和大国的权力关系中沦落为仆从，有必要从全新的视角构建民族主义。”为此，他提出如下建议：

> 即使现状是要求站在已经超越了国民的立场上……不以个人的感慨而告终，和平运动还集结得起来么。特别是在日本，这如何成立呢？
>
> 如果从结论说起，坚决执行《日本国宪法》的序言和第九条。……
>
> ……国家放弃作为自卫手段的武力，换言之，就是作为国家的破产宣言。严格来说，应该是自那一日起日本不再是个国家，而是个连全世界都没有定下称呼的一种全新的组织集体。……作为《日本国宪法》而广为人

知的一系列法律条文，在基本告别作为“国家基本法”的古典宪法的性质规定的同时，也向世界宣告了这个新集体的诞生。

当然这是1960年安保斗争中鹤见俊辅主张的延续。对此，鹤见良行说这是“‘通过民族主义向国际主义转变’的定式”的实现。

单纯认为“国家”和“自我”无关的主张与“国际主义的心情”性质不同。当时已经被共产党开除党籍的中野重治在1966年8月参加越平联主办的日美市民会议时说，曾批判《近代文学》的他认为“个人应超越组织、超越国家权力，只有这样，这个组织才会有活力，其国家权力才会不断更新发展。而我看来的相关人并没有充分做到这一点”。“越平联提出的个人的问题……在明治时期被提起而渐趋崩溃，被第二次世界大战践踏殆尽，战后复活又发生变质而流传开来，或许这才是首次提出这个问题吧？这里的‘个人’看起来与感伤的个人主义、利己的感伤主义是截然不同的东西。”[693]

原本越平联的相关主张并不一定被广泛理解。吉本隆明在1972年的演讲中提倡“战后思想”的根本是相对于“公”的“私生活”的优先，并主张与自己相同的“小田（实）就是这样的人”，只不过不如自己善于表达。[694]

战后出生的年轻人中，也有人赞同小田等人倡导的把“加害”的自觉认识为单单强调“日本人”的加害性和“朝鲜人”的受害性的观点。吉川勇一针对这些年轻人评论道，他们“仅仅说了一句‘自己也在自我批判的基础上’就以为自己站在了在日朝鲜人与受歧视的部落民的立场上，开始揭发和指责其余的人”，正如第十三章中我们可以看到的那样。

运动的后期，随着激进的学生对小田和鹤见批判的抬头，加上小田因各地的游行和演讲而过度操劳，不得不暂时住院疗养，鹤见在各地的演讲中扮演“正义的化身”招致厌恶的同时，还被卷入工作单位同志社大学的全共斗运动中，年收入的一半以上也都倾注到越平联的活动中，

1970年前后几乎到了“身体和金钱都要破产”的地步。[695]

越平联的运动方式也不断被其他组织模仿，而他们也越来越疲惫。1968年1月，美国“企业号”核动力航母停靠在佐世保时，去了现场的小田发现了“反对核潜艇入港佐世保市民会议”这一“以民社党和社会党为中心形成的市民运动”。这是一个排除共产党员和激进学生，由工会和妇联组成的集合体，“不允许市民个人自由加入”。警方称他们为“一般市民”，并且给予“越平联正在进行游行，一般市民请到这边来”等约束。[696]

对此感到厌恶的小田在1973年透露，“这个时候，应放弃使用市民运动这样的称呼，而只能说是人们的运动”。[697] 鹤见1970年曾说过：“被媒体吹捧到顶点之后，开始突然下坠，赋予了负面含义而被冲进下水道。”越平联本身也是“一个相当定型化的东西”。[698]

然而支撑他们的是战争时期的经历。1990年，小田回忆越平联时代说道：“疲惫的时候、厌恶的时候、迷失方向的时候、为一时的显赫成功而骄傲的时候，我经常会想起那些‘难死’的人的身影。不，那是很自然地浮现在我的眼前。这些在激励我、给我力量的同时，也在斥责着我，时常将脱离正确轨道的我拉回正轨，并问我自己，你该怎么做？”[699]

反越战运动并不只由越平联来承担，但越平联在唤起世人关注的效果和救援逃兵上，给予美军巨大的影响。越平联从1960年代末开始，在安保问题和冲绳问题、公害问题、抗议军工企业等方面广泛展开活动，并宣言只要越南实现了和平就会解散。吉川勇一在1972年12月说道：“我们是因为有了共同目的才形成组织、发动运动的，只要不违背我们初衷的事，都可以接受。但事实上，经常会有违背初衷的事。组织里太多人想着‘为了维持这个组织，并让它得到发展，如何对待越南问题才比较好呢’，这就让这个运动开始变质了。”[700]

1973年1月，越南和平条约得以签署，美军也完全撤出越南，作为核心的东京越平联于1974年1月正式解散。各地的支部肩负起了各项事务，此后，也有组织打着越平联的旗号继续活动。吉川勇一在解散大会上说："越平联最重要的是'我们没有让他人来左右我们的判断'，正因如此，参加越平联的人中没有一个人会问如果越平联不在了我该怎么办。"[701]

鹤见俊辅在越平联解散后说道："关于我们被定义为此次运动的计划、方法和组织形成的指导者这一点，心里感到十分不畅。感谢那些帮助我拓展我未知之处的人，以及身边十九岁、二十岁无偿奉献的人们。虽然有些迟但我还是想在这里说出来。"而他在解散大会上说，中途定型化了的越平联的方式，希望能够被后世超越，"希望以后越平联不仅仅作为越平联的形象而出现"。[702]

小田在解散后写下了内容为"在越平联运动的九年里，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人的死"的文章。文中他对在经济高速发展和大众民族主义中自闭的"公司国日本"的现状进行了批判，"让我难以忍受的是，潜藏在其中的无可救药的天真、孩子气和傲慢。在所谓死者的他人眼里是不允许这种傲慢存在的。而作为这样的存在，莫过于死者的眼睛"。[703]

越平联运动，表面上看似"没有理论"，而实质是由实用主义哲学家和学习了希腊哲学的作家担当旗手的饱含哲学要素的运动。这场运动中弄清楚的是"个人"怎样恢复对他人的信赖，"国家"到底是什么，广义上的"自己"又是什么这些问题。

小田在1992年出版的《"越平联"——不是回忆录的回忆》中写道："问题在于我们自己。"[704] 其问题就是"我"怎样才能成为"我们"，"我们"的范围有多广，又应该具备何种性质。他们在不断追问的过程中，摸索着战后日本的"民族主义"和"公"的形态，为我们留下了一

条轨迹。

结语

根据本书的考察，战后围绕民族主义和“公”的讨论，至少一部分变得清晰起来。以下结论，是对这种变迁进行各项考察之后，探讨今后民族主义的发展方向。

战争经历与战后思想

如序章所述，可以说战后思想就是战争经历的思想化。谈论战后思想和谈论“对‘日本人’来说何谓战争记忆”大同小异。

在这一点上，大多数的战后文学都是一样的。司马辽太郎在1991年的座谈会上，一边回忆在22岁时面对战败的冲击，一边说道：“在开始写东西时才真正有些明白。就好像一直在给22岁的自己写信一样。”一同出席的堀田善卫也回应说：“我也完全是这样的感觉。我的《戈雅》、《方丈记私记》和《定家明月记私抄》也是在战时就考虑过的题目。”[705]

依靠战争经验这一“国民性”的经验不仅是战后思想最大的长处，也是最大的短处。作为战争对战后日本产生了怎样巨大的共同体意识的例子之一，在此引用记者井出孙六1972年写下的一个片段：

> 至此，我所思考的是，我们在战败后的一段时期，无论在哪里都能遇到的事情。我们曾经搭乘如今很难想象的、肮脏拥挤的列车赶去购物，我希望大家能够回想起当时车内的情景。
>
> 大家明明已经营养不良，却都让人怀疑居然还有如此体力扛着大大的背包，列车的行李架也因承重过大而倾斜，浓浓的黑烟从破碎的车窗不断吹进来。但此时的人们已经不再像从前那样担心会有警戒警报或防空警报，脸上的表情都极为开心。在拥挤的车厢内，有时会被旁边人的胳膊肘

> 撞到，从而发生激烈争吵。相反，素不相识的人也能如同老朋友那样亲切地交谈。有绅士风度的男士首先开口：
>
> “我当时在武汉，那时你在哪个地方呢？”
>
> 对面一个像农民的男子说道：“我在南京来着。”
>
> 这样一来，旁边的年轻人也立马说“那时候我在巨港呢”。
>
> 一下子就形成了闲谈的核心话题。……那确实也能代替无聊的周刊来打发时间。另一方面，在那个时间点，在主观上想叙述深埋心底的话是所有人都共有的吧。[706]

这正是有战争噩梦的人们所构成的一个共同体。职业、地区、年龄和学历不同的人们，无须太多语言就能在那里传达共感。“民主”与“爱国”的共存状态也在这样的土壤中培育起来。

并且，在那里谈论自己在战争中受到的伤害，自然就成为与他人结合在一起的途径。荒正人和竹内好的主张——将从自己内心挖掘出来并使其成为与他人之间相连带的思想，也是在这一共同意识的背景下产生的。看起来很清高的知识分子的思想，通过这种共同意识，也同一般民众的心情结合起来了。关于这一点，在本书中也多有提及。

当然另一方面，这种“国民共同体”的成立也是政府实施的爱国教育、总体战平均化效果的产物。但因爱国教育和战争而高涨的对国家政治的关心，也成为战败时共产主义运动及民主化运动的基础。而且，总体战的平均化与之后的通货膨胀互相结合，加速促进了平等化，从背后起到了支撑战后改革的作用。

如本书中提到的那样，第一次世界大战实施总体战之后，在德国、俄国发生的革命事件，经常被许多战后知识分子忆起。因为日本战后很快由占领军实施了改革，社会主义革命并未实现。但若没有总体战所带来的平均化效果和“爱国心”的高涨，恐怕战后改革的稳定度将一直处于

较低的程度。可以说在战后日本，虽然没有发生总体战的失败和革命联系在一起的事态，但取而代之的是带来了战后改革的稳定化。

而且战后思想所倡导的激进民主主义也是总体战的遗产。当然，正如丸山真男等所看到的，建议总体战合理完成的主张成为对战时日本的批判，这一点并不应该忽略。但与此同时，作为结果总体战带来了民族主义这一现象，不用举法国大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的例子，就已经很普遍了。

战后思想对消除阶级差别和期望“单一民族”，与通过总体战在心理上形成的国民共同体印象相比，可以说现实社会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当然如第七章所述，直到1950年代前半期，教养和文化还是有着非常显著的差距。但经济差距的缩小，伴随战争、战败所产生的通货膨胀在经济高速发展之前就实现了，与之相比，文化上的差距更为明显。

从思想内容来看，战后思想的活力来自战争经历。战争使大多数知识分子和学生征召入伍或被送到军需工厂。他们在那里的经历也成为战后思想的活力源泉。此外，经历了战争和战败，“死”是什么，“正义”是什么，“国家”又是什么这样的主题，达到了全民共有的高度。

如第十五章所述，曾担任少年水兵的渡边清在战败后的日记中写道：“我被天皇背弃也好，被国家欺骗也好，自己背弃自己也好，究其原因都是语言造成的。因为把作为媒介的语言和文字本身，想当然地误以为是事物的实质。”“语言”到底是什么？“存在”又是什么？在连少男少女们都必须考虑这些哲学命题的情况下，战后思想开始兴起。

这种现象并不只是发生在日本。众所周知，第一次世界大战使欧洲各国产生了现象学[707]和语言哲学的萌芽。1926年出生的“战时派”米歇尔·福柯这样描述战争经历：

> 我认为，对于我们这一代的少年、少女，这样的历史大事件会成为儿

时的主要记忆。正是迫近的战争威胁成为我们的舞台背景，成为人生的框架。而且战争到来了。同与家人在一起生活的种种往事相比，正是联结这个世界的各类事情形成了我们记忆的中心部分。我用的是“我们的”一词，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基本确信的是当时法国大部分青年男女都有同样的经历。那就是对我们的个人生命的威胁。我被历史与我们被卷入的事件和个人经历的相互关系所吸引，也许就是这一理由吧。我想，正是这个理由成为我的理论性欲求的核心部分。[708]

不管日本也好，法国也好，这些战败国“战后思想”的活力源泉都是和对死的恐惧联系在一起的崩溃状态。那是一种不能把现存的秩序和世界作为安定的必然来考虑的不安感。

小田实回忆1945年上中学时（当时没有义务教育，因此有入学考试）这样说道：“那前一天或前两天大阪遭到空袭，试卷被焚毁了，于是考生就全部被录取了。自此以后，我就开始有了所有秩序在哪一天都会崩溃这一信念。”[709] 鹤见俊辅把对经历过明治维新的“维新人”的同情表述为：“强加给我们的社会框架有时会崩溃，有时会倒塌。这并不是强词夺理，而实可以感知得到。”这一点在第十六章已经有所提及。从这种“崩溃感”中，有很多重新审视“国家”、“公”的思想开始喷涌而出。

这种崩溃的感觉赋予我们“现存的秩序不过是相对的”这一视角的同时，也让我们拥有超越表面秩序变动，对不变事物的憧憬。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从1940年开始在德国战俘收容所中度过了5年，他说从这段经历中觉得要超越表层的政治事件变动，对深层的历史有了更多的关心。[710] 我们在第十六章中提到，对战前战后的语言体系巨变深感绝望的鹤见俊辅并未被表层的变动左右，创造出了“深层”的哲学。

第十五章因篇幅所限未能详细展开，江藤淳在1950年代后半期对“作家需要行动”、“神话的突破”等论题展开了自己独特的言论。当时

喜欢阅读江藤作品的柄谷行人后来在阅读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的著作时，感觉与江藤相比，“了无新意”。[711] 柄谷对江藤的思想是从哪里得到的启发感到很不可思议，认为恐怕江藤并不是受哪种理论的影响，而是从他的战争及战败经历中诞生出来的。

战争经历，让很多人有了超越语言的感悟，从而人们开始了对于现存语言和思想的怀疑以及为新语言的创造而努力。大部分战后知识分子很少直接谈论战争体验。这不仅是由于他们不想谈论这一伤害，还因为它不是能简单用语言就能表达出来的。他们创造出了诸多思想，取代了直接谈论自己的体验。

与此同时，美军占领这一“殖民地”状况，美国文化的急速渗透，城市和农村巨大的差距等，与现代第三世界知识分子所直面的状况并无不同。追求近代西方模式的非均衡性，知识分子能为民众代言到哪个程度这一问题，都是1950年代日本面临的切实问题。

在那样的背景下，加藤周一的“杂种文化论”类似于“克里奥尔（Creole）文化论”，对国民历史学运动、生活记录运动思想的底层研究有相通之处，这并非不可思议。丸山真男的《忠诚与叛逆》、鹤见俊辅的思想等，通过对“传统式范畴”的重新解读产生的对新文化的创造，同现代文化理论相似的内容，可以说都与那样的背景有关。

战后思想的临界点

但战后思想的这一优点同样也成为其弱点。

首先，正因为战后思想依赖于战争经历所产生出的国民共同体意识，常常容易忽视冲绳、朝鲜。即使它们进入了视野，也如第八章和第九章所述，反倒朝着日本民族主义得以强化的原因这个方向发展。冲绳、在日朝鲜人、阿依努人等作为日本民族主义所解决不了的少数民族

问题之所以受到关注，是因为战争经历导致的国民共同体意识淡化，大众民族主义取而代之，这主要发生在1960年代后半期。

而且从今天来看，我们不能否认战后思想过于“男性化”。“武士道”、“男子汉气概”、“知廉耻”、“扭曲文化”这些词频繁出现，不管好坏都是战后思想的特点之一。我们从这些词中很容易看出被战争和战败、占领所伤害的男性知识分子的心情。在这一意义上，在中南美洲被指出的，战败记忆和殖民地状况产生出“男性”文化，在日本也出现了。这样的战后思想并不能适应经济高速发展的社会。就像本书中提到的那样，被“武士道”和“明治”象征的保守民族主义所篡夺。

战后思想最大的弱点在于，将语言表达不了的战争体验作为基础，未能创造出没有经历过战争一代人所共有的语言。清水几太郎在1975年指出，“对很多日本人来说，社会主义是……一个被赋予了各种不满和愿望的假称”，“这些不满和愿望中的大部分不仅与马克思主义无关，在当前的各社会主义国家，只要表现出来就会带来生命的危险，所以人们把它寄托于社会主义的梦想当中，也没有合适的名称”。[712] 这种评价虽然有些片面，但这种情况不限于战后的马克思主义，在战后思想的“近代”和“主体性”这些词中，事实上一定程度上也是存在的。

正如本书所述，以丸山为首的著名战后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因为与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保持距离，形成了自己独立的思想体系。“近代”和“主体性”这些词也或多或少意味着与共产党的一种对抗关系。但如果说他们成功地形成了相当于马克思主义的独立体系的思想，则有点言过其实了。形成“近代”和“主体性”这些词的背景是战争记忆，于是对不曾有过这种记忆的一代人而言，战后思想丧失了说服力。

而且，对战后思想瓦解的感觉，在秩序稳定的经济高速成长期之后，变得完全无法理解。以1955年为界，混乱和改革的“第一战后”结束了，稳定和发展的“第二战后”开始了，也就是以“五五年体制”之名，

在“保守”和“革新”两股势力形成定局时，战后思想的鼎盛时期结束了。

对战后出现的左派来说，“战后民主主义”只是反映徒有其表的“保守”和“革新”对立的一部分。对许多在秩序稳定的“第二战后”成年的一代人来说，“世界是稳定无趣的既存秩序”，即使有或多或少的反抗，也不会有崩溃的危险。丸山真男等人，曾经倡导以世界和未来的不安定为前提，提倡参与国家“建设”的国民主义。但对战后出生的一代来说，只看到这些思想经常被掺杂到既存秩序的“建设性的”思想中去。

如第十三章所述，经历战争的一代人的战争回忆，从1960年开始急速被淡忘，变成一种无法言语的心情，所表现出来的是隐藏屈辱的伤痛以及被伤感的故事无害化处理的战争经历之谈。

如上所述，荒正人和竹内好等深入思考自己的内心世界，主张与他人建立联系。前提是从战争经历中受到的伤害是自己和他人所共有的。正视自己内心世界隐藏的惨痛记忆，因为可以唤起与他人的共鸣使之震撼，并且可以超越表面的联系而产生连带感，对于打破那种简单省事的交流形式，战争体验作为一道深深的疤痕，是有其存在的意义的。

正因如此，荒、竹内以及鹤见等反复提及战争的责任问题。不是作为攻击他人的原理，而是由于自己的痛楚与他人的痛楚相连，所以可以说是作为适合战败后的连带原理而被提起。

但在经济高速成长过程中，比起正视战争经历的伤痛，很多人选择了把它隐藏起来。前引井出孙六也在介绍了列车上的逸事之后说道：“但是，简单省事的对话有一个重要的要素是无论如何都不可缺少的。在去采购的火车上，听到很多关于在中国和南方战场的痛苦回忆的谈话。它们的一大特点就是完全忽视了饱受战火的中国及亚洲各地人民的苦痛，以及对客死他乡的百万孤魂的思念。我们并不能一味去互舔伤口以求愈合，或是从根上剜去战争留下的伤疤，而是用别的记忆去覆盖

它，忘却它。”[713]

当然，对战争和战死者的记忆，在“第一战后”会间歇性地被提起，也曾经给战后思想注入了活力。支援1960年的安保斗争和反越战运动发展的是战争记忆，以及以越战为契机创作的战争文学名作，这在第十二章和第十三章中已有所阐述。

但依据这些战争记忆的活力，战争体验在一定程度只停留于语言的表面，造成了与不了解战争一代人的隔阂的是战后思想的极大界限。提到战争责任问题的竹内好和荒正人，并没有过多言及自己的战争经历，在对战争体验抱有悔恨和屈辱的年长知识分子当中，将自己不堪回首的战争体验公之于众，也仅限于鹤见俊辅和宗像诚也等少数人。

这种情况，在1960年代较年轻的一代吉本隆明和江藤淳等崭露头角时，就产生了战后思想被批判的背景。在战争期间还十分稚嫩，并没经历过兵役和空袭的吉本和江藤，抱着不切实际的战争观，攻击“民主主义”是一种“欺瞒”。与吉本等人喋喋不休诉说自己战争经历相对的是，年长的知识分子对战争经历保持沉默，这只会助长吉本他们去散布他们的战争观和战后观。

当然，即便是吉本，正如在第十四章考察过的那样，对他来说真正伤痛的部分并没有做过多的陈述。但没有战争经历的一代，倾向于不做修改地把吉本和江藤等所说的战争观和战后观当成事实来接受。关于以前战争责任的追究和战死者的记忆，江藤等人将其作为保守的民族主义象征来挽回。

小田实等提出“加害的自觉”，是为了慢慢让淡忘的战争记忆的崩溃感再次被激活的尝试。在受害的记忆被抽象化并逐渐淡忘的状态下，能够提起的作为自己的人格崩溃般的伤痛，就只有加害的记忆了。

但如第十三章和第十六章所述，“加害的痛楚”可以让“受害的痛楚”再次激活，“受害”和“加害”是一体的。在战争期间挑战心理极限的情况下，经常无法区分受害意识和加害意识。

通读过很多广岛受到原子弹轰炸者手记的井上厦，指出几乎所有的手记都体现出一种罪恶感。[714] 那就是，当时的广岛是一座军需物资补给城市，在给侵略战争为虎作伥这类问题上，多少有点不同级别的罪恶感。不得不抛弃寻求帮助的邻居和至亲而逃跑的记忆与只有自己残存下来过着和平的生活的意识，与强烈的受害意识是不可分的，在这种形态中成为一种“加害”意识。

这样一来，作为终极“受害者”的纳粹强制收容所最后幸存的人，他们如果也是怀有一种“加害”意识，就可以理解了。对邻居的死保持一种沉默，互相抢夺匮乏的食物暴露出的自己与他人人性中丑陋的一面，朋友被点名去毒气室从而自己幸免于难的窃喜，以及渡过重重难关终于活下来的事实等，这样的经历和记忆可以简单地以“纳粹是加害者”、“犹太人是受害者”这种看似无可厚非却不甚正确的方式来表达。借用竹内好的描述，“虽然没有错，但总有欠缺之感，这种欠缺感则是幸存者无法挽回的心情以及对亡者的强烈内疚感”。

如第十六章所述，鹤见俊辅说，“只要我们还活着，就既是受害者又是加害者”，这是每一个熬过战时那些挑战自己心理极限的战争体验者的实际感受。对战死者的记忆和对战争责任的追究是有联系的。在这种情况下，体现了对发动战争者的愤怒以及无法原谅苟活的自己的复杂感情。

小田实和鹤见俊辅，一方面倡导“加害的觉悟”和战争责任的追究，另一方面又强烈拘泥于对战死者的回忆，以这样一种心情为背景，向抨击年长一代人“加害”的年轻人阐述了自己不一样的想法。为了硬生生地将记忆的伤痛扩大，创造出连带的原理，他们才强调“加害”意识。

但大多数不知道战争为何物的一代人，无法理解这种心情。战死者对他们来说只是“三百万”的抽象数字而已。而且要说“加害”的话，日本和日本人的国家和民族意识很容易成为进行侵略战争的基准。

这样一来，1960年代向着两种事态发展。一方面，江藤淳认定的“三百万死者”，这种被抽象化、无毒化的战死者的形象产生，这是作为保守民族主义的标志被挽回的。另一方面，全共斗主义的一部分学生，批判轻视侵略战争的加害责任的“战后和平主义”的“欺瞒”，标志事件就是他们破坏了“海神像”。战死者的记忆被“无情地、得意扬扬地抽象化”，同时，民族主义从以上左右两边展开。

在此期间，作为战后思想特征的“民主”与“爱国”的共存状态土崩瓦解。即使是1950年代左派提倡的“单一民族”，在60年代也转化成右派所倡导的思想。笔者在上一部著作《单一民族神话的起源》中，确定保守派的单一民族论出现在1960年代。[715] 在写作上一部著作时，只确认其是事实，但对其中的原因不甚了解，而正如第十三章所述，这是经济高速成长带来的均质性和大众民族主义的结果。

而且在原本多样、混沌的战后思想中，赋予“战后民主主义”这个坚如磐石的总称是在这一时期以后的事情。随着1960年安保战争的高涨而出场的“市民”一词，最终也变成“市民主义者”这种受到谴责的用语，为1960年代的全共斗运动和新左派年轻人所使用。所以，一说到“战后民主主义”，就是“近代主义”、“市民主义”，以及“护宪”这样一种形象，它们在1960年代的批判“战后民主主义”中被“发明”出来。

近年来我们看到的战后批判理论，其大部分是以1960年代发明的“战后”观为前提的。比如说批评家加藤典洋在1997年的《战败后论》中认为，只看到日本是拥有三百万死者的“民族”的“旧修宪派”，与只看到亚洲各地的两千万死者的“国际”的“旧护宪派”的对立，会在战后持续50年时间。[716] 当然这是无事实根据的主张，现在也没有论述的必要。

此外，批评家福田和也在2000年的著作中，认为在法国大革命中左派和右派共有“爱国心和国民主义”，把没有爱国心的左派称为“伪左派”。[717] 福田认为，“战后民主主义”不外是“伪左派”的思想，丸山真男是把战败“视为日本国家寻求自身的解放”，“认为是对国家责任的一种解脱”的“伪左派制造责任者”，而加藤周一则是典型的“国际性伪左派”。这样一来，丸山和加藤的主张是否正确，已无须多言。

甚至社会学家桥爪大三郎在1997年的座谈会上，解释了战前的“臣民”这一概念，同时叙述了“在新宪法中成为‘市民’时，作为对此的反动，从今往后主张权利，只要国家所说的事不管什么都予以提出，这样我才是市民的逻辑”。桥爪还主张“既肯定为预防战争而做的努力，又肯定参加战争的祖父的行为。这两方面是完全对立的”，“但是战后思想最终没有理解这一点”。[718]

这些言论家，虽然思想倾向各不相同，但都是以1960年代以后被发明的“战后”观为前提进行讨论的。而且这种“战后”观不仅具有批判战后的一面，也具有肯定战后的一面。犹如很多研究者和评论家怀疑从战败之初开始以丸山真男为首的“市民社会派”以及“市民社会论者”是否存在。[719]

当然，包括笔者自身也无法拥有完整全面的认识。但即使在错误的认识下进行讨论，也可以说会产生是否有收获这样的疑问。

战争体验的多样性

虽然说是“战后”批判，但进行批判的人并不仅仅针对战后出生的一代人。吉本隆明、三岛由纪夫以及江藤淳等，勉勉强强算是经历过战争的一代，他们以自己的战争体验为基础来批判战后思想。

在此不能忽略的是，战争体验这种东西虽然给人国民共同经历的印

象，但实际上根据辈分和阶层等的不同而又产生了相当大的差别。

如第十四章和第十五章所述，战败时年龄在20岁左右的一代，认为战争是一种常态，战败不是解放而是价值观的崩溃。这代人中的一部分知识分子把战败视为某种解脱，即使是丸山等人，并不赞扬占领军和保守政权的战后改革，只是有为战争和言论镇压的结束而感到喜悦的解放感，可是也持有不适感，在1955年以后展开对"战后民主主义"的批判。

在此要留意的是，一般情况下战后思想是以对年长一代的批判为特征的。丸山真男批判比自己更年长的"老一辈自由主义者"，"战时派"的吉本等人批判丸山他们这一代人，江藤和石原慎太郎批判固执于战争体验的"战时派"。

其背景是，年青一代意识到自己是战争的受害者。越是年轻，他在战时越不用承担责任，由年长者的决定而发起的战争往往会让他们觉得自己是受害者。例如，江藤淳在1959年写道：

> 先不谈战争的善恶，日本因为战败而失去了伪满、朝鲜、台湾。国土面积狭小、人口过剩导致生存竞争越来越激烈。如果前代的领导人更加明智，比那些团结的知识分子更加勇敢且趋利避害，更加擅于洞察国际形势的前景，现今的年轻人就不会对前景感到困惑，对未来失去信心。那些将自己的未来弄得一塌糊涂的大人们，一碰到"责任"问题就退缩，还不如早点死了更好。如果这样的话，就会空出许多职位，出人头地也会比现在容易很多。自己的房子被焚毁，兄弟战死，财产尽失，希望破灭，并不是因为自己不好，而是因为大人们的愚蠢。要忍受给别人收拾烂摊子吗？然而，他们完全不负"责任"，反而还表现出一副自己是被压迫的样子。与其责问他们是代表"恶"吗，还不如说恶就是他们自己。只有新的一代才代表了纯洁和正义。恐怕，或多或少，这一点在现今的日本年轻人中，是一种共通的情感吧。[720]

这一倾向不仅体现在思想上，也体现在大众文化上。生于1941年的动画片导演宫崎骏讲道："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时，通俗文化就不得不

随之改变了。那些作为战败的当事人的大人们，摆出一副凝重的样子，这是无法原谅的。因此战败后，就连动画片《幻影侦探》的主人公也是少年。而且，在《铁人28号》中的金田章太郎等不比署长更加聪明机智吗？这并不仅仅因为动漫是面向小孩子的，无论是在大人来看，还是少年来看，小孩子都是纯真无瑕的，不用背负战败的责任，因此选择他们作为主人公。”[721]

在这种思想和文化中长大的1960年代的年轻人，心怀揭露“加害责任”、批判老一辈的想法，虽然有一些讽刺，但也可以说是很自然的结果。在这些年轻人中，接受吉本和江藤的“战后”批判也可以说是顺其自然的事。

虽然如此，吉本和江藤的“战后”观大概欠缺对战争全局的理解，有些片面。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在战时和战后都还太年轻，带有强烈的受害者意识，无法理解老一辈人所怀有的悔恨和战败屈辱的痛楚。因此，吉本和江藤的“战后”批判，“比起自己被战争和战败所伤，内心被迫发生了改变，老一辈的知识分子则丝毫没有受到战争的迫害，只是从谩骂‘鬼畜英美’转向赞美‘民主主义’”。

战败后不久从谩骂“鬼畜英美”转向赞美“民主主义”的人并不少，这是事实。但是这种现象在保守政治家和地方势力中更为显著，丸山真男等战后知识分子甚至是对此持批判态度。

丸山全共斗运动时期的笔记中这样写道：“即便如此，在‘战后民主主义’兴起的背景下，是说战后的宪法（以及以宪法为基准保障自由权的各种法律）体系呢，还是说现实的政治体制（一般来说与议会制民主主义的现实相去甚远的保护永久政权下的‘议会政治’）呢，又或者是，到最后消灭被世界公然否定的势力的这种民主主义理念呢，这一点还是要分辨清楚的。”如此草率批判“战后民主主义”的一个例子，是2001年某杂志的报道中可以看到“战后民主主义最大的弊端就是当选次数至上

主义”这样的言论。[722] 但是当然，在宪法中如果没有“当选次数至上主义”这样的规定，也就没有丸山的主张了。

虽然这么说，但在知识分子当中，战时写下了赞美战争的文章，战后却转向赞美民主主义的人并不少，这一点是事实。吉本隆明通过举出部分诗人和文学家的事例来揭露这种现象，因此战后知识分子就给人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在这之后广为流传。虽然不能说这完全是谬论，但也不是所有的战后知识分子都是如此。

作为战后知识分子声名远播，多次被提起的有丸山真男、南原繁、加藤周一、鹤见俊辅、竹内好等。正如本书中所论证过的那样，这些知识分子在战时与战后并没有随波逐流，与共产党保持距离。战后转向的知识分子，可以举出平野义太郎、清水几太郎、柳田谦十郎、矢川德光等，他们和前面提到的知识分子相比，知名度较低。因为轻易地改变了立场，所以不可能作为战后知识分子的代表形象流传千古，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日本读者或民众的“嗅觉”依然敏锐。

但是，吉本和江藤所持的“战后”观，并不是他们那一代人所共有的。例如，小田实的战后文学观与吉本和江藤等就有很大的差异，这其中如十六章所述，主要是因为小田实经历过战争的经历。

在此笔者再重复一遍，虽然战争似乎是全体国民的共同经历，但实际上不仅是因年代，还有出身阶层和居住地区，甚至会因为有无战斗和空袭经历这样的偶然因素，而存在差异。虽然战争将所有全体国民都卷了进来，但具体到每一个人却有轻有重。

例如，1944年末，在遭受美军空袭和食物不足情况下的菲律宾战场，送走特攻队的飞行员，马上试着进入后方的苏门答腊岛的士兵，居然发现这里若无其事地举行了曲艺表演。[723] 虽说经历了相同的空袭，但小田实是在大阪空袭的火海中东逃西窜，而在吉本隆明所居住的地

区，1945年3月10日的东京大空袭却没有引发火灾，吉本从自家的防空洞出来咬牙切齿地眺望着B29与日本战斗机空战。[724]

即使是在同一地区驻扎的军队内部，反应也各不相同。战败时拿着落后的武器进行本土决战训练的二等兵丸谷才一这样回忆8月15日当天的情景："他们（军人们）都很单纯，就要离开军队回家了，不用再继续挨打了，都兴高采烈。然而下士是一个一生都打算待在部队的男人，对他之前工作的那家公司的破产感到非常气愤，这种愤怒在士兵中蔓延开来且愈演愈烈，最后我被他打了。"[725]

作为战争惨祸屡次被提及的空袭和食物不足是城市中司空见惯的现象。因此如第十四章中所述，事前预测战败的人的比例，与城市相比，农村地区要少一些。1997年，右翼分子西尾干二担任"新教科书编纂会"的会长，10岁的他曾在疏散前的农村经历过一次战败，在 1965年的回忆中他悲愤地说，农民"与其被侵略军掠夺"还不如自己杀猪宰羊，"为什么到最后都不下令用竹枪开战呢？"[726]

因为这种战败的记忆，西尾主张，说战败是解放"进步的文化人"的言辞是一种"欺骗"。但小田实在1966年说，"羡慕能够将战败视为耻辱接受的西尾和他周围的人"，自己在战败的时候只是长舒了一口气，"应该再也没有空袭了吧"。[727]

另外，战败后的经历也因阶层和地区而不同。作为城市中产阶级的孩子的江藤淳，经历了战败后家道的中落，如第十五章所述，对"战后"持有否定的印象。另一方面，在东北农村的井上夏回忆道，因为粮食不足，农产品价格上涨，城里人都带着衣服等到农村来换取食物，"战败后农村孩子的衣服突然变好了"。同时，因为农村得到了解放，按井上所说，"大部分的农民称麦克阿瑟为'神'"。[728] 如果西尾干二在战后待在疏散前的农村的话，就可能会看到在8月15日那天慷慨激昂的农民欢呼"麦克阿瑟大人"的场景。

像这样，战争的经历多种多样，战争观和解放观也各不相同。这姑且不论，说到典型的“战争经历”，军人经历了饥饿、战死、特攻等，百姓则经历了空袭、饥饿和疏散等。自不用说军人在前线与美军作战的经历，城里人的经历。因此，即使是在军人当中，那些在后方的军人、在中国战场上的军人，或者没有经历过疏散、空袭的农村人等，都与这样陈词滥调的战争体验论极不协调。

它暴露出来的结果是1960年安保斗争后兴起的对丸山真男的批判。丸山在安保斗争之后的采访和演讲中，呼吁人们要记住战败的8月15日。但是，对丸山而言的8月15日的意义吉本和江藤是没有的。可以说，战争经历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是“无以言表”的经历，这形成了“国民所共有”的一种意识，但是让每个人用言语来表达的话，就会显露每个人不同的经历。

在这个意义上，吉本、江藤以及西尾干二等战后知识分子的批判，是他们战争经历的“切身感受”。但是，关于战时吉本这样说道：“整个社会气氛很明朗，很有建设性。‘战时的世界是黑暗的’这一言论是战后右翼和战后民主主义者的谎言。”这就过分夸大了个人的“实际感受”。[729] 根据吉本等战时派知识分子站在“大众”的角度批判“进步知识分子”这样的思想，单方面放大了个人以及这个年代所有人的不适感，扩大了1960年以后产生的“战后”观的扭曲。

如第十四章所述，1945年6月，确信日本战败的人的比例上升到54%。54%不是绝大多数，但也不在少数。剩下的大多数人都是半信半疑，战争后期的厌战情绪分外高涨，这一点从战时日本政府的调查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

在这个意义上，“战后左翼和战后民主主义者最大的谎言”则是，“战时的世界是黑暗的”，这样的言辞被解释为部分妥当较为合适。而且这样的言论就连战时吉本的“切身体会”是不是真实坦率的陈述，即

使从第十四章的论述来看也是值得怀疑的。即使是西尾干二，战败时10岁的他不仅不能理解战败时大人们复杂的感情，而且是否真的完全没有因为战败而安心的这种情绪呢，是否将其隐藏起来，构成自己战败的记忆的一部分，是否真的一点都没有呢，我不能不对此心存疑问。

因人而异的战争体验的多样性，个人内心的动摇，战后思想中的战争观的持续陈词滥调化，对此提出异议也是事实。但是，对这样的战后思想批判的战争观和“战后”观的过高评价，可能会陷入新的“神话”。

“第三战后”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来考察一下1990年代后的民族主义形势。

划分出“1990年代后”这个时间段，是有其原因的。因为1990年冷战结束，决定战后日本情况的国际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1955年前后的“第一战后”和1960年代后的“第二战后”的特征，从国内来说，可以概括为“混乱和改革的时代”以及“稳定和成长的时代”。但从国际形势来看，“第一战后”是国际形势的混乱期，“第二战后”则相当于冷战体制的稳定期。

“第一战后”是从1945年开始后的大约10年，即二战结束以后，经过朝鲜战争的爆发到停战为止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国际秩序极为动荡，与此相应，日本的国内形势也动荡不安。虽说因为1951年的《旧金山和约》和《日美安保条约》，日本的国际地位得以确立，但是要实现国内的稳定，尚需要几年时间。

比如说，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样的大变动，无论是对国际还是国内这十年间的稳定期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也就意味着，不只是在日本，在全世界范围内，这十年间都可以称作“战后”。

与此相对的“第二战后”，因为美苏的“和平共处”，冷战状态下国际秩序处于稳定时期。即使在日本国内，也确立了“五五年体制”，形成了“保守”和“革新”两大阵营对立的局面。在经济上，也处于依附于美国的国际地位，开始进入经济高速发展期。

这也意味着到1955年，“战后”结束。在那之后之所以继续被称为“战后”，一是因为没有其他适合的名称，二是因为“第一战后”的余波拖得很长。作为“第一战后”特征的对战争和对战死者的记忆，以及混乱的状态与改革的势头在“第二战后”中也暗流汹涌，间歇性地浮出水面。其最突出的表现是1960年的安保斗争。但随着经济发展趋于稳定以及出生于战后的一代人的势力抬头，这种活力也就逐渐减弱了。

可以说“第二战后”终结于1990年前后。随着冷战体系的崩溃，国际秩序的变化再次活跃。这种表现最初体现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美国提高对日军事要求，再就是1950年代后便再未提及的向联合国派兵的问题开始死灰复燃。

从1950年作为美军的补充军事力量，日本的重新武装开始进行起，美国一直对日本提出军事合作的要求，但在“第二战后”中受到了抑制。在日本国内的冷战体系——“保守”、“革新”持续胶着的状态下，如果美国提出过高军事要求，日本的亲美保守派的政权就有可能岌岌可危，1950年代后半期社会党的急速成长、1960年安保斗争的高涨，就是这种危险的现实体现。因此对日军事要求得到抑制，代之以在冲绳建立军事基地。

从这个意义上看，是“第一战后”中残留下来的和平主义在背后支撑着“第二战后”的稳定。虽然1960年安保斗争因未能阻止安保条约修订而被认为是“失败”的，但对动摇日美的政权以及抑制美国的对日军事要求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如果没有这种高涨的运动，美国的对日军事要求就会变得更加强烈，也许日本经济就不能得到发展。当然，经济的发展是

将冲绳拱手让与美军才得以实现的。

但随着冷战结束，支撑“第二战后”的国际秩序也消失了。与此同时，在“第二战后”中发展起来的日本经济也陷入了停滞。随着代际更迭的进一步发展，以战争记忆为基础的“第一战后”的残像也进入了最后的衰弱阶段。

代际更迭与社会经济状况的变动同时发生，一半是偶然的，但一半也是必然的。因为冷战时期的国际秩序基本上是建立在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后处理之上的，从某种程度来说这是一个依靠战争记忆支撑的秩序。

以南斯拉夫为例。研究南斯拉夫的柴宜弘说二战后“南斯拉夫的经济、政治、社会的各种制度的原点都在于‘游击经历’”。[730] 自主管理社会主义也好，超越“民族”集团的联邦国家体制也好，都是从对德游击战争的解放区运营以及联合战争中派生出来的。也就是说南斯拉夫是靠战争记忆维持的国家。当然更准确地说，那是公式化地创造出来的游击神话，但在背后为其注入活力的是战争体验者的战争记忆。

但随着代际不断更迭，战争的记忆极速减弱。据柴宜弘所述，1970年代后半期“没有游击经历的年轻人非常冷淡，不会像游击队时代的人们一样热议自主管理社会主义”。这一时期，为防止“游击经历”淡化，让年轻人重新体验游击战和解放区建设的义务劳动运动进行得热火朝天。但那种战争记忆已经减弱到一定程度，南斯拉夫的国家体制也就崩溃了。[731]

从这个例子来看，可以说冷战体系的崩溃及之后被称为全球化的现象包含了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后处理建立的国际秩序，与代际更迭一同进入了变动时期。即可以说那是由战争记忆而定的社会体制的动摇期。

当然社会的变动是经济因素、技术因素等共同作用的结果，所以不能单单放大代际更迭这一因素。但是，因为人的行动是随着他们的经历和记忆而定的，所以分为共同拥有战争记忆的人占社会多数的时代与占少数的时代，社会动向也理所当然呈现不同的变化。正如本书所考证的，日本1960年代言论的变化也是在经济高速发展、技术进步以及代际更迭互相交织的状况下进行的。

1990年代以后，围绕战争记忆问题产生了争论。而这也是因为冷战体系崩溃之后，各国的正统统治发生动摇，开始重新追究建国的经过和历史。

如前所述，世界上现有的国家大多数是在二战后处理的过程中产生的。像1947年独立的印度共和国，1948年成立的大韩民国，1949年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等，虽然各自都极力主张自古以来的延续性，但实际上都是在二战的余波中新生的近代国家。

依据1946年的宪法修订，废止“大日本帝国”而建立的“日本国”也正是那样一个国家。众所周知，随着国际、国内秩序的动摇，这些国家都盛行所谓“建国历史”的独立运动，以及对二战的重新审视。

实际上日本在从战争过渡到“第一战后”的时期以及从“第一战后”过渡到“第二战后”的时期，也都对历史进行了重新审视、追究。这种追究在1946年前后和1956年前后围绕战争责任的讨论中达到高潮。

在日本社会的变动时期，重新追究国家正统性和同一性的气势高涨，可以说战争责任的讨论是以重新追究“日本国”的“建国史”——战争记忆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从这层含义来说，在“第二战后”向“第三战后”过渡的1990年代，围绕战争责任的讨论高涨也算是其中的一环。

但这些战争责任论的性质是不同的。1946年前后的战争责任论主要

是围绕以天皇的战争责任为主的国家体制之正统性问题而进行的。而1956年前后的战争责任论是以在“五五年体制”基础上形成的“革新势力”和保守政治家重审正统性的形式展开的。

而在1990年代的战争责任论，主要是以对亚洲各地区的加害责任论为中心的。这当然是以从1960年代开始的提倡对“加害”的自察自省及日本社会的国际化为背景的，但冷战的终结是其中的原因之一。为什么在冷战期间，亚洲各地向日本提出赔偿的要求得到了抑制呢？

如第十一章所述，在《旧金山和约》签订之际，美国的政治势力抑制了亚洲各国向日本提出赔偿的要求。将日本作为亚洲的反共同盟国进行培育的冷战理论，便是美国的动机之所在。而且在这之后日本与亚洲各国进行的个别谈判，也使得对日提出的赔偿控制在小额度的范围之内。

而在此之后，亚洲各地民间向日本提出赔偿的要求，受到其政权的抑制。因为与日本恢复了外交关系，对于以战争赔偿的形式请求日本支援的各地政权来说，民间的对日索赔要求将威胁到其正统性。

比如韩国的太平洋战争牺牲者遗属会会长说：“在1974年釜山牺牲者集会上‘应该向日本追究责任。走，去日本领事馆’，这话一出口马上就被（韩国的）警察逮捕了。对我们的这种打压一直持续到1988年卢泰愚总统推行民主化。”[732] 直到1992年，该遗属会才作为社团法人被韩国政府正式承认。

另外在台湾，在战后的38年间也一直在实行“戒严令”，只要是原日本军人、军属或遗属协会的人，都被告知“参加政治活动就会入狱”。他们完全不理会受过日本殖民地教育的人，向日本提出的赔偿要求被国民党政权彻底压制了。另外在库页岛（日本称“桦太”）有许多战前被日本强行带走而战后被弃之不顾的朝鲜人，库页岛韩国老人会会长回忆

道："那时不允许成立团体。秘密警察非常可怕，别说建立组织了，我们都不敢开口提回国。"[733]

总之，1990年代亚洲各地要求日本赔偿之势抬头，可以说冷战体系的崩溃和各地的民主化也是其原因所在。这样想来，在1990年代的战争责任论中战争受害问题成为讨论的中心也是顺理成章的。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对于冷战后试图确立在亚洲的国际地位的日本，变得十分重要。

而此时问题在于"第三战后"背景下日本国民意识的走向。

关于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原因众说纷纭，其中之一就是得益于冷战期间的国际环境。将日本培育成亚洲的反共工业国核心这一美国的战略，给日本带来了美国以及东南亚的广阔市场。众所周知，美国让日本提供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军需供给。

但是，日本现在正在失去冷战期间所拥有的特权性的国际地位。因为亚洲各国的民主化以及冷战后的中国与西方各国进行着频繁的经济交流，日本作为亚洲唯一的工业化自由民主主义国家的时代结束。这种国际环境的变化和1990年代的日本经济停滞是如何相互关联的，虽然这必须等待经济学的验证，但也不能说它们之间毫无关系。冷战的终结，也导致日本国内冷战秩序——"五五年体制"的终结。

在这种国内外秩序变动的背景下，对亚洲战争责任的讨论以及以"新教科书编纂会"为首的右翼分子的抬头，可以说就是"第三战后"的日本民族主义的一种形势。这些讨论有一个共通点，那就是战后的重新追究。就像战败后的人们重新审视战争时期一样，为了确立冷战后日本的国民认同，这也被认为是必要的。

关于"护宪"

在认清这一形势的基础上，关于宪法等问题笔者有一些个人见解。

如第十一章所述，在战败初期左派曾批判过宪法和《教育基本法》，之后又在内部秘密讨论修宪，在1955年前后成立了“拥护宪法国民联合会”。笔者对这种“革新”的意义表示肯定。不管怎么说，阻止了1955年前后的修宪应该给以高度评价。

如第十一章所述，当时保守势力的修宪案不仅要修改第九条，还将复辟县知事的任命制、复活参议院推选议员制、重新审视男女平等问题、限制言论出版自由、以天皇为国家元首等，都纳入修宪方案。如果这些对宪法的修订都实现了的话，那之后的日本是否能够“稳定、成长”，对此笔者表示怀疑。

战后的日本“革新”势力总是被人说缺乏一贯性和对政策的预见性。但是保守势力也同样缺乏一贯性和预见性。战败后不再对英美骂骂咧咧，转而倒向亲美的保守政治家的寡廉鲜耻自不待言，其预见性的水平确实有些让人怀疑。其中最突出的表现是在对亚洲的外交问题上过于迷信美国的力量，对越战及中国形势的预估屡屡差之千里。

在国内政治上也如此。像前面讲到的对修宪方案的讨论，这本身完全就是当时的保守政治家对战败后国民意识变化的误读。如果他们制定更“现实的”修宪方案，那么1950年代就能实现修宪，或许就可以壮大保守势力，形成保守派两大政党的局面。也不知是祸是福，他们并没有如此明智。因此导致反对势力在“护宪”的旗帜下，成立“国民联合会”阻止了修宪，社会党取得了快速发展。

从1950年代中期开始，左派转而拥护宪法与《教育基本法》，这一方面是出于政治目的，另一方面是出于对保守势力修宪攻势的反抗。但还有一方面是因为战败后不久对宪法、《教育基本法》进行批判的社会前提发生了变化。

如第四章、第九章所述，战败之初左派对宪法和《教育基本法》进行批判是因为宪法和《教育基本法》中包含的自由主义理念与战败后的贫困状态不相符。但1950年代后半期，宪法和《教育基本法》所宣扬的理念得以实现的社会基础也具备了。也就是说，日本社会的实情，与宪法和《教育基本法》相适应。

从这层意义上来说，1946年批判宪法和《教育基本法》，1955年后又转而拥护宪法和《教育基本法》的讨论者的举动是有一定依据的。不考虑这种社会状况而批判他们“变节”是不合适的。

现在看来，拥护宪法和《教育基本法》是否有意义呢？笔者认为基本上是有的。

与战败之初不同，现代日本具备了足够能实现宪法和《教育基本法》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反言之，相比战败之初，如今的时代更适合宪法和《教育基本法》理念的实现。

当然，宪法的文辞与日本的实际情况是相背离的。然而，因为有背离所以要加紧修订这种说法，却有点太过单纯。与现实相背离的不仅是第九条，比如第十五条里虽然有“所有的公务员是全体国民的服务者，而不是一部分人的服务者”的句子，但在日本社会想完全实现是不可能的。虽说如此，如果因为第十五条是非现实的理想主义所以要修订的话，大概也是没有意义的。与现实相背离的东西都是一种欺瞒，如果说欺瞒是没有必要的东西，那所有的思想和理念也就不需要了。

因此，在这种前提下，拥护现行宪法有意义吗？对此，应根据条文逐一进行讨论。

比如说，有意见批判现行宪法的第十四条。众所周知，第十四条在原案（1946年2月的盟军最高司令部草案第十三条）的阶段是“一切自然

人法律上平等，在政治、经济、社会的关系上，不容许由于其人种、信仰、性别、社会身份、阶级或者国籍而形成的歧视”。[734] 日本政府修订之后现行的内容是：“全体国民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在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的关系中，都不得以人种、信仰、性别、社会身份以及门第的不同而有所差别。”顺便提一句，《教育基本法》第三条规定：“所有的国民都应当有按其能力享受教育的平等机会。”

说到宪法，讨论第九条也是1950年后才出现的事。如第十一章所述，战败之后，对第九条关注自然就减少了，都比较关心与日常生活相关的第二十四条等条款。民间提出的违宪诉讼增多也发生在这一时期。

那么还有拥护宪法第九条的意义吗？笔者不是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专家，在此只想表达一下个人的浅见。

像本书论证过的那样，第九条本来就是反映1946年国际形势的产物。进入冷战时期之后，它却成为美国国际战略的障碍，美国和日本保守势力开始鼓吹修宪。然而在1955年以后，由于日本“革新”势力占有一定数量的议席，拥有一定规模的自卫队和宪法第九条的胶着状态一直持续。随着冷战结束之后日本内部“革新”势力的退潮，美国对日本的军事要求也再次加强。

然而与此同时，由于冷战的结束，美国和俄罗斯开始接近，对日本安全保障的威胁也大幅降低。从朝鲜的国力来说，对日本造成的军事威胁也很小。现在的国际形势与冷战激化之前的1946年前后类似。这意味着比起冷战时期，第九条更容易适合目前的情形。笔者认为日本保守势力一直说要修改第九条，是因为冷战时期追随美国的外交思路没有发生改变的缘故。

战后，保守势力的对美追随与其获得成为经济增长基础的市场有关。这有两个原因。一是我们反复强调的，因为日本内部“革新”势力的

存在，美国的对日军事要求受到抑制。二是因为中国处于冷战的敌对阵营，不管美国如何不满，都必须重视亚洲的核心工业国日本。

然而在失去这种条件的冷战后的国际形势下，笔者并不认为应该满足美国军事合作要求是有益的。相反这会给美国一种易与的印象，美国的对日要求也会逐步升级。而且笔者也不认为修改宪法第九条对日本有利。

笔者在本书中也明确提出，战后的保守民族主义，极力提倡修宪和增强军备，最后变成一种左右为难、从属于美国的结果。在一般的殖民地，宗主国由当地的王朝和地主阶级协助，把对王朝的忠诚与对宗主国的忠诚联系起来，实施间接统治。所以笔者认为战后保守民族主义实际上就是作为美国间接统治的一种机能而存在。

丸山真男在1951年的《日本的民族主义》一文中说道："推崇传统的象征，即使面向目前没有定型、分散的国民心情，今后组织性地想把他们重新集中起来，这些动员起来的民族主义并不能成为自我独立的政治力量，不如与更高级的政治力量——恐怕是国际性的政治力量——相结合，后者一定的政治目的——比如冷战的世界战略——只要作为手段具有利用性就被允许存在。"丸山评论道："是否继续把它称为民族主义就是个人的自由了。"[735]

当然在保守的民族主义者中，也并不是不存在对追随美国的状态感到不满的人。但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回避抗议安保体制，认为这是对"美国人"、"白人"反感的补偿行为。他们的另一大补偿行为是主张修宪、强化自卫队，以及利用历史问题、靖国神社、国旗国歌这些政治符号，而这会招致亚洲各国的抗议，陷入更加追随美国的恶性循环。如第十一章所述，依靠美国的政治力量，日本回避了战后亚洲各国的战争赔偿要求，这一点就决定了日本追随美国的格局。

保守势力的补偿行为恶化了日美关系。[736] 美国国内的舆论对日本重新成为军事大国十分警惕。1999年4月公布的舆论调查显示，回答美军驻扎在日本的目的是“防止日本重新成为军事大国”的占49%，回答“协助日本进行防卫”的占12%。更为复杂的是，对于日美防卫合作新指针的相关法案，就连自卫队的高层都认为，“总之，是让我们沦为美军货物运输和基地警戒的仆役的法律罢了”，但仍报道“日本有军事大国化征兆”的美国媒体也不少。因此，修订第九条虽说是美国政府的意向，但欧美的媒体相关人士预测：“如果修订第九条，欧美媒体会有激烈的反应。”

换言之，从表示对追随美国感到不满，到修宪、强化自卫队，或历史问题，越追求这些补偿行为，就越会引起亚洲各国的反感，刺激欧美舆论，陷入更加追随美国的恶性循环。要打破这种恶性循环，就要摆脱对美从属状态，自己独立展开行动，构建与亚洲各国的信任关系。这样，第九条与对亚洲各国进行战后补偿是构建信任最有力的方法。

此外顺便提一句经常引发对亚洲各国关系问题的靖国神社。如第十六章所述，该神社并不是祭祀所有日本的战殁者，政府对它的定义是“战伤病者、战死者及家属的援助法”及“恩给法”的任一对象，以此为基础以由于战争而被认定为“公务死”的军人及家属为中心，选定靖国神社作为合祭地点。其中不包括空袭的被害者、病死的军属、逃兵，以及死刑犯、自杀者，这种判断标准表明了靖国神社的由来。

在太平洋战争中，日本死伤者大约为310万，靖国神社里合祭的人数是210万，并不能说这个神社是为了追悼“三百万的死者”。靖国神社在1978年合祭了甲级战犯，讽刺的是，昭和天皇对此表示不满，天皇近侍的证言是：“陛下听到合祭这个消息时，表达了停止参拜的意愿。”[737]

对1999年通过的《国旗国歌法》与“日之丸、君之代”问题，辛淑玉

评论道：“在学校里‘日之丸、君之代’是国民国家思想以前的问题，作为一种驾驭手段而被使用，但存在根本问题。”“灌输‘日之丸、君之代’是违背教育基本精神的”，“校长和拥护体制的老师”，“为了对上显示忠诚，维持战后稳定而实施的”，“实施率高达100%是掺水的数字，让人很不高兴”。[738]

据1999年10月的报道，千叶县旭市的自民党市议员说道：“这里没有人反对太阳旗，附近的地方升起了国旗，自己不升旗很不好意思，这就是日本民族。”[739] 如果是丸山真男的话，他也许会评论道：“这能不能称为民族主义是个人的自由。”

辛淑玉在上述批判的同时，也有如下评论：“对‘日之丸、君之代’这个问题展开斗争的老师缺乏毅力，‘在日朝鲜人的孩子’、‘亚洲的孩子’，当你听到这种问题时你是怎么想的呢？我很想问一下。”[740]

当然，不能简单回答这个问题的老师，并不仅用一种套话来反驳，只是找不到表达心情的确切词语，在失去“第一战后”语言的表现力，而“第二战后”终结的现在，有必要造出新词语。

言论的变迁与“无名之物”

迄今为止，本书已经考察了战后日本关于“公”和民族主义的言论的变迁过程。最后，就关于几个能产生新“词语”的问题，进行若干考察。

如序章所述，人们不能使用不被社会共有的词语，然而也很难逃出支配现有社会的语言体系。

作为一个例子，我们试着看1990年代战后批判论的一部分。如上所述，“第二战后”终结之际，重新审视战后的讨论开始抬头，然而以之为前提的很多战后观是错误的，用战后思想的词语进行“战后批判”的例子

也不少。

比如社会思想家佐伯启思说道，“源于西方的近代主义、进步主义是不行的，说到日本的话战后日本近代主义也是不行的”，提倡批判“世界市民主义”，重新评价“武士道”精神。此外，他批评只重视私生活的“市民”，赞赏对国家富有责任感的“公民”。即使在参与执笔2001年编纂的“新教科书编纂会”的公民教科书中，他也提出了“市民”和“公民”的区别，赞赏夏目漱石和福泽谕吉，批判“‘外发式’的近代主义”。[741]

虽说如此，佐伯也批判丸山真男是“西方主义者”，提倡对国家忠诚的义务，其前提是“战后民主主义否定国家，仅从个人出发”，这是他的认识。所谓“战后”是一个欺骗的时代，“是失去‘日本国家’这个‘父亲’的时代，如果不存在‘父亲’的话，就意味着不可能形成自我，不能直面社会或者说没有对‘现实’怀有现实感”。[742]

此外，批评家加藤典洋在1997年的《战败后论》与1999年的《战后的思考》等书中主张，战后日本是引发具有“民族性”的“旧修宪派”与具有“国际性”的“旧护宪派”人格分裂的社会，不能接受败北的痛苦与“扭曲”，而将之隐藏的社会。为克服这种状态，比起亚洲的两千万死者，首先要先进行日本三百万死者的追悼，必须创造出“一个接受历史的主体”。

另外，加藤认为，对文学家来说，要“抵抗”由外部发生作用的意识形态非常重要。不是由外部带入的超越性思想，而是通过吊唁侵略战争中死亡的“三百万死者”，必须产生“由恶及善”。一个例子就是吉田满在《战舰大和的最后日子》里描绘的臼渊大尉。如果说战后还有值得肯定部分的话，那除了容易受到批判的私利私欲的优先，就没有其他了。

以上我们讨论的是丸山真男、吉本隆明、江藤淳、竹内好、鹤见俊辅等创造出的战后思想的论调，是以一种浑浊的形式合成的，形成了佐

伯和加藤的词语。同时，他们批判丸山和竹内，主张“不能完全吸收战后的东西”，主张提倡“战后”全新的思想。[743]

产生这种现象是因为他们自己在战后出生，在战后语言体系中容易形成自己的言论。在此要反复强调的是，人使用的词语是当下社会所赋予的词语，即使想逃离到语言体系之外，也只会使用体系内部的语言。佐伯和加藤的思想倾向虽然不同，但在战后形成的语言圈内，在对“战后”进行幻想和唱独角戏这一点上是共通的。

而且两者共同的特征是，虽然他们的“战后”观是从“第二战后”产生的，但在批判战后时使用“第一战后”的词语也不少。换言之，为了批判“五五年体制”、“旧护宪派”、“旧修宪派”而提倡赞赏公民和追悼战死者。

产生这种现象是因为他们批判“第二战后”时，认为这就是“战后”。为了批判，试图收集外部的词语。在战后长大的他们的词语中，如果他们收集使“第二战后”相对化的词语，只能直接、间接地或者是在无意识的状况下吸收“第一战后”的残留词语。因为他们只能有意识地知道这是“战后最新”的词语，所以谈起“第一战后”，就好像有一种“战后伊始”的感觉。

当然他们本身也没有对“第一战后”思想进行系统理解，而且这种语言的使用方法已经被废弃了，比如说佐伯也强调“武士道精神”和“公民”，但最终又批判丸山真男，走向了单纯国家的忠诚论。

还有加藤提倡通过追悼侵略战争那样“肮脏”的战争中的战死者，来面对自己内心的黑暗，产生“由恶及善”，但因为加藤没有亲身的战争体验，即使提到自己“内心”的黑暗，也与竹内和鹤见的“自身内部”不一样。因此，加藤的论调不知何时将“自我”的内心变更到“本国”的内部，变成主张对“三百万死者”的追悼。

自称批判“战后”的论调，通过战后思想产生词语的废弃形式而存在，可以说这种情况显示了战后思想的影响力已经完全“终结”了。也就是说以现在日本的语言状况来看，“第二战后”受到批判的同时，“第一战后”已经完全失去思想影响力，然而超越这些的词语并没有产生。

对于这些情况，有人指出近年来作为战后思想的民族主义和现在的右翼民族主义之间存在共通性。比如研究政治思想的学者川本隆史指出，1998年的“新教科书编纂会”与国民历史学运动存在相似性，历史学家西川长夫对此表示同意，他说编委会的论调“与竹内好、石母田正、上原专禄等言论类似”，批判战后史学是“在国民国家的框架内”。[744]

然而只是从语言表面的相似性来讨论战后思想与现在右派的共通性，笔者认为这些评论过于简单。本来如果只是单纯谈论语言相似性的话，西川支持的1990年代国民国家论，其中一部分与战时的“世界史的哲学”类似。

笔者认为，因为西川他们赞成国民国家批判论（从原理上），并没有打算把它和“世界史的哲学”相提并论，然而批判战后的论调好像都是这样。西川他们的“战后”批判也没有从既存的语言体系内完全游离出来。

如序章所述，本书的目的之一就是弄清现在限制我们的“战后语言”的特征，超越其限制与界限，摸索出适应新时代的“词语”。然而这种工作不是简单地通过批判“战后”就能达成的东西。因此，再现战后思想的最佳部分，弄清根据战后思想创造出来的语言体系的整体形象十分必要，这也是笔者在序章中的主张。

在弄清了战后思想整体形象（即便有界限）的现在，对适合“第三战后”语言的摸索怎么办才好呢？或者说在“第三战后”的日本，民族主义应该以怎样的形式存在呢？对这一问题给出唯一而绝对的答案超出了

笔者的能力。虽然觉得现在还为时尚早，但想在此谈一谈几点不成熟的想法。

如本书中考察的那样，战后思想是随着对既存词语的解读而变迁的，对战后思想最大的误解之一就是“这是从欧美引进的”这一看法。通过战争以及其他社会变动，出现了之前的语言体系无法适应的社会情况，战后知识分子重新解读了战时思想以及美国赋予的宪法，创造出了战后词语。

虽然这一战后思想被很多人所接受，但对这种既存语言的转换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即使“引进”崭新的语言体系，对很多读者来说也是无法共有的。对自己内部既存的语言体系进行意料之外的转换，当作为在此之前无法言状心情的表达手段时，这些“词语”就传递给读者了。相反，如果对被赋予的词感到不自然，人们就会把这个词视为被“引进”的东西。

当然另一方面，就像我们在第八章和第九章中所看到的那样，战时的语言体系制约战后的表现和实践的事例也不少。但不管有没有那样的制约，在解读的过程中，“近代”、“民族”、“市民”，这些词被赋予了新的意义，成为表达心情的一种手段。

展望今后的民族主义，笔者认为，原则上完全否定民族主义并没有太多的意义。如果让笔者来定义“民族主义”是什么的话，作为表达心情的手段，可以使用“民族”和“国家”这样的词。那种情况下的心情极为复杂，如果有权力取向和对他人的恶意，那么也会有反权力取向以及对他人的连带愿望。不看具体的语境，一概给予“民族主义”的总称，不论是肯定还是否定，笔者不禁产生这到底有多少意义的疑问。

最为重要的是，全盘否定广义的“民族主义”，真的有可能吗？全盘否定民族主义，高举“个人”的思想在某一时期的战后思想中几乎没有被

提倡。很多战后思想追求某种“公”的共通性，那是通过“国民”、“民族”、“市民”等各种各样的称谓表现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和“民族”自不必说，1960年安保斗争和越平联等倡导的“市民”和“人”也并没有全盘否定民族主义。

一般来说，战后的知识分子虽然批判作为权力机关的国家，但对民族主义还是持肯定看法。换言之，他们所说的国家这一单位就是在说另一种“民族主义”。在这个意义上，“对抗国家的市民”这一表现在当初也作为一种“民族主义”而表现出来，也就是“对抗国家的民族主义”。当然如果要逆转丸山的表现，“那是否仍然可以把民主主义称作每个人的自由”，但只要能设想到一些共同性和公共性，是否能够全盘否定广义的“同胞爱”，还有待商榷。

在战后知识分子当中，唯一例外是批判一切“公”的吉本隆明。但认为不需要除家人以外的他人的“自立”，以这种“自立”为理想的吉本思想，缺乏与他人相连的途径。因此，像加藤典洋那样受到吉本影响的论者，如果能够摆脱吉本思想自我中毒的状态，探寻与他人的途径的话，那么也会产生飞跃到对“三百万死者”追悼的思想。

当然，战后思想有如前所述的诸多界限，但笔者认为在那种欠缺和界限的基础上可以对战后思想的“民族主义”进行重新解读。可作为参考的是近年来在日朝鲜人和冲绳的“民族主义”。

尤其是在日朝鲜人的“民族主义”，与日本、韩国、朝鲜等政府和领土是在不同的情况下产生的。此外，近年来，因为取得日本国籍的人和只会日语的人很多，国籍和语言也不一定成为“民族主义”的基础。也就是说，如果不能归于政府、领土、语言、国籍等，那“民族主义”的名称将会归于某种共性的希求上。

上野千鹤子在2001年从“在日本的一名韩国男子”那里听到，“在日

本被称为民族主义的不是真正的民族主义”。上野认为，“那虽然与强制同化的日本民族主义相对抗，但也不能将其与韩国和朝鲜的民族主义同一化”。而且，“‘在日民族主义’是‘没有领土的民族主义’，是‘对抗民族主义的民族主义’，现在并没有适当的称呼，只能错误地叫作‘民族主义’”，是“‘反权力和自由思想’的别名”。[745]

笔者把上野的评论向另一个方向推进一步。把这种“在日的民族主义”称为“民族主义”是“弄错”了吗？在日朝鲜人使用“民族”一词是“弄错”了吗？人有何种权利，可以把它判定为“弄错”了呢？

换言之，也就是以下这种情况。现有的“民族”一词是指政府和领土合二为一的集团。但因此产生出完全不同的“民族主义”，难道就是“弄错”了吗？相反，难道这不是拘泥于现有“民族”概念的判断吗？“是否仍被称为民族主义是每个人的自由”这种说法难道不是更好吗？

这种“民族主义”非常罕见吗？笔者认为未必如此。笔者虽然不是法国史的专家，但能想象在法国大革命中形成的状态难道不是同在1960年初夏东京发生的那种难以名状的状态一样吗？

我们自己的快乐也是他人的快乐，他人的痛苦也是我们的痛苦，如果区分自己和他人现有的境界失去意义这一现象，发生在两个人身上就被赋予“恋爱”之名。但如果发生在集体上的则无法定义。到底是赋予“革命”之名、“市民”之名、“人”之名，还是“国家”之名，难道不是偶然的问题吗？

但在这种状态下也能给予特定的名称，而且冠以“民族”、“市民”之名的国家开始利用那些词语使权力行使正当化时，“民族主义”就变成了令人压抑的东西。在那种状态下，“国家”就化为由国籍及其他来要素划分出来的集团名称。

但另一方面，不限于“国家”这个词，还有在任何词语中都会发生的现象。譬如，如果有冠名为“革命”的国家体制，那在那个国家里的语言体系中，“革命”这个词也有可能会变成压抑性的词语。如果有被冠名为“恋爱”的体制，那“恋爱”一词应该被唾弃吧。但反过来说，与政府和领土是毫无关系的“对抗国家的民族主义”这一说法比我们现在熟悉的民族主义可能更早出现。

主权国家基本上是指垄断暴力，作为控制区域内暴力的制度而建立的。具体而言，杀了人而不被问罪只存在于国家公认的情况下。[746] 但在这种制度下，取代暴力垄断这一制度，通过政教分离不赋予精神上价值的是原来的主权国家制度。

但从冠名为“民族”的国家出现开始，主权国家甚至获得了精神上的权威。在这一意义上来说，可以说“民族国家”是指篡夺了“民族”这一名称的国家体制。但把在这种状态下确立的“民族”当作唯一绝对的事物，例如，仅仅用把“在日朝鲜人的民族主义”当成“民族主义”的理由来批判，笔者无法赞同。

当然，因为笔者知道被称为“民族主义”现象的负面，所以没有提倡对民族主义这个词进行复权的想法，也没有打算假设“原来的民族主义”，由此把现有的民族主义批判成“脱离”。但在这里想指出的是通过重新解读“民族主义”的变化未必是特别或新奇的现象。

如前所述，战后知识分子虽然拥有自我本身就是自我的感触，但他们把与他人共同的“无名状态”称为“民族”或“国民”。[747] 把那当作“民族主义”来批判，虽然很容易但没有意义。并且用那些语言表现出来的心情，比如全共斗打出的“寻求连带、不畏孤立”的口号，越平联倡导的“普通的市民”这个词，与如前所述“在日朝鲜人的民族主义”等词表现出来的东西，笔者并不认为有什么差别。

也就是说，本书中的结论是：要创造适应新时代的词语，必须在注意区分表面意思之间的差异的前提下，对战后思想通过“民主”与“爱国”这些“民族主义”词语所要表达的“无名之物”进行理解，并不断以适用于新时代的形式对其进行解读。只有做到了这一点，才有可能真正摆脱“战后”的束缚。而通读过本书的读者，应该就已经完成了这方面的准备工作。

那时，作为结果，那些“无名之物”被赋予什么样的暂定名称尚未可知。而且，“是否依然称之为民族主义也要因人而异”。无论如何，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我们在过去、现在以及未来，都不会停止对这种“无名之物”的探求。

---

[1] 鶴見俊輔『鶴見俊輔著作集』第2巻、463頁。

[2] 山本明『戦後風俗史』、181頁。

[3] 宮本常一『生活の中で何か失われたか』高畠通敏編『日常の思想』、57、61—62頁。除高速经济增长外，宫本还将“总体战”所导致的社会变动作为这种意识变化的原因之一。也就是说，“强制推行统制经济，半季结算全部变为现金交易”，导致货币经济不断渗透，最终取代了以信任关系为基础的相互依存关系（第53页）。此外，宫本认为，随着农村共同体意识的瓦解，“孩子们在成为村里的孩子、社会的孩子、天下的孩子之前，首先成了家里的孩子”，从近代家庭论的观点来看，这种看法是具有深意的（第64页）。

[4] 石森章太郎『サイボーグ009』第5巻、秋田書店、1967、178頁。主人公岛村约翰的角色被设定为一名从少年院逃走的、美国大兵与日本女人所生的“混血儿”。这种重视“美国的影子”和“贫困”的角色设定，在1950年代至1960年代的社会派电影中十分常见。

[5] （漫画）梶原一骑原（作）·川崎升作（画）『巨人の星』講談社、1966—1970。

[6] 小田実『小田実全仕事』第9巻、107—108頁。

[7] 松下圭一「大衆国家の成立とその問題性」『思想』1956年11月号、『現代政治の条件』中央公論社、1959、24—25頁。松下并没有像加藤那样把因文化均质而形成的人称作“市民”。这是由于松下作为研究约翰·洛克的学者，认为“市民”极具参政意识，与大众社会中被动的存在有本质上的不同。松下认为，文化的均质化所能够产生的，不过是“‘社会的’的小市民化”。

[8] 加藤秀俊「日常生活と国民運動」『思想の科学』1960年7月号、31頁。

[9] 松下圭一「国民運動をどう発展させるか」『中央公論』1960年8月号、106頁。又见松下圭一「憲法擁護運動の理論的展望」『思想』1962年5月号（『現代日本の政治的構成』東京大学出版社、1962、268頁）。这里出现的“革新民族主义”一词，正如笔者『「日本人」の境界』第21章中所述，最初见于坂本義和「革新ナショナリズム試論」『中央公論』1960年10月号，后又为高岛善哉所继承。松下在「国民運動をどう発展させるか」中提出，“以制度的形式被导入的战后民主主义，作为每个人的自发性行为不断发展”（第106页）。据笔者所知，这是“战后民主主义”一词首次被提出。数年后“战后民主主义”一词已经仅作为被批判的对象使用，此时却能看出人们对该词是持肯定态度的。

[10] 佐々木基一·藤田省三·佐田稲子·橋川文三「大衆の思想と行動」『新日本文学』1960年8月、29頁。

[11] NHK放送世論調査所編『図説 戦後世論史』日本放送出版社、1975、Ⅰ、Ⅸ章。

[12] 出自小熊英二『単一民族神話の起源』第17章。

[13] 小田実『小田実全仕事』第8巻、68頁。

[14] 色川大吉『明治精神史』上巻、3頁。

[15] 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8巻、243頁。「明治維新百年祭」出自『竹内好全集』第9卷，第62页。

[16] 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8巻、242頁。

[17] 久野収·藤田省三·鶴見俊輔『戦後日本の思想』、279頁。

[18] 鶴見俊輔『鶴見俊輔著作集』第3巻、445頁；鶴見俊輔「素材と方法」『思想の科学』、1972。鹤见在1970年的「死の象徴」（第2卷）、1968年的「丘浅

次郎」（第3卷）等作品中，对吉野作造等大正时期的思想家进行了赞扬。
如本书第十六章所述，鹤见是一个在两个方向，即以“满分”为目标的伦理取向和与之正相反的“放松”的价值取向之间进退维谷的人物。从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明治”对应前者，而“大正”对应的是后者。他从1950年代开始，为了批判保守政权忘却战争责任和机会主义，经常高举“明治”这面大旗。而当其对1970年前后的全共斗运动过剩的伦理主义怀有违和感时，便开始重新赞赏“大正”的稳健。实际在上述文献中对“大正”的重新评价，是为了批判昭和时期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大学生轻视“大正民主主义”、将吉野作造蔑称为“吉野式民主”等现象。
这就意味着，鹤见1970年前后对“大正”的重新评价，是针对学生暴动中对“战后民主主义”批判所做出的一种临时应对。以鹤见为首的战后知识分子对“大正”的再评价，必须考虑到上述时代背景。然而，面对学生的“战后民主主义”批判，人们想到的是“大正”，这是值得注意的。此外，这种现象在丸山真男和竹内好等人的言论中并未看到，故不能将战后知识分子一概而论。

[19] 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8卷、223、232、235頁。

[20] 日高六郎「戦争体験と戦後体験」『世界』1956年8月号、50頁。

[21] 飯塚浩二編『日本の軍隊』、149、141、142頁。

[22] 鶴見俊輔『鶴見俊輔著作集』第5巻、146—147頁。

[23] 「出版時評」『出版ニュース』、1967。

[24] 吉田裕『日本人の戦争観』、114、119頁。

[25] 日高六郎『戦争体験と戦後体験』、51頁。

[26] 吉田裕『日本人の戦争観』、109—110頁。

[27] 吉田裕『日本人の戦争観』、111、112頁。

[28] 野添憲治「知識人の優越感」『思想の科学』1961年9月号、71頁。

[29] 高田佳利『行動の意味の発掘』、25頁。

[30] 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8巻、227頁。

[31] 長浜功『教育の戦争責任』、13頁。

[32] 石原慎太郎·江藤淳·橋川文三·浅利慶太·村上兵衛·大江健三郎「怒れる若者たち」『文化界』1959年10月号、133頁。桥川正是在这次论战后写下了「『戦争体験』の意義」一文。

[33] 见田宗介「戦後体験の可能性」思想の科学研究会総会報告、1963、『現代日本の精神構造』弘文堂、1965、143、147頁。

[34] 永島慎二『フーテン』筑摩文庫、1988、115—116頁。原文没有标点。

[35] 清水幾太郎「安保闘争一年後の思想」『清水幾太郎著作集』第10巻、191、194頁。

[36] 西部邁『60年安保』、21、23頁。

[37] 樺美智子『人しれず微笑まん』、161頁。

[38] 指以美国西部开拓时期人们的艰苦奋斗以及在那里发生的事件为题材拍摄的电影。——译者注

[39] 高見順·堀田善衛·三島由紀夫·吉行淳之介·村上兵衛·石原慎太郎·木村徳三「戦前派·戦中派·戦後派」『文芸』1956年7月号、47、48、53頁。

[40] 石原慎太郎「刺し殺せ」『三田文学』1959年10月、21頁。

[41] 大江健三郎「旅行カバンのなかの未来イメージ」『週刊読書人』1962年2月12日、大江健三郎『厳粛な綱渡り』、146頁。

[42] 小笠原聖志「少年ファッシストの安保体験」高畠通敏編『日常の思想』、261—262頁。

[43] 西部邁『60年安保』、24頁。

[44] 西部邁『60年安保』、27頁。

[45] 佐藤忠男『黒沢明の世界』、305—306頁。

[46] 丸山眞男『丸山眞男集』第9巻、183、184頁。

[47] 『日本共産党の危機と学生運動（全学連意見書）』。以下分别引自『資料 戦後学生運動』第5巻，第25、3、24、44页。

[48] 『資料 戦後学生運動』第5巻、368、393、395頁。

[49] 『資料 戦後学生運動』第5巻、243、245、246頁。

[50] 高田佳利『行動の意味の発掘』、25頁。

[51] 『資料 戦後学生運動』第6巻、411、362、408頁。

[52] 日本社会主义青年同盟的简称。——译者注

[53] 『資料 戦後学生運動』第7巻、31、34頁。

[54] 『資料 戦後学生運動』第6巻、362頁。

[55] 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8巻、243頁。

[56] 羽仁五郎『都会の論理』勁草書房、1968。

[57] 关于清水的人生轨迹，天野恵一『危機のイデオローグ』中已有详述，本书还会在他处进行具体论述。

[58] 即19世纪末20世纪初。——译者注

[59] 丸山眞男『丸山眞男集」第8巻、238—239頁。该文问世后，1960年安保斗争爆发，丸山曾对“市民”阶层的崛起表示期待。因此可以推断，1960年安保斗争后大众社会状况的到来，使其感到倍加失望。

[60] 这一代人也被称为“全共斗一代”。但是，这个时代能上大学的人是少数，而参加全共斗运动的人数则更少。“全共斗一代”这一称谓的产生，想必是由于当时大众传媒中掌握话语权的知识分子阶层中有很多人参加了全共斗运动。而这里所说的群体中还包括许多未考入大学的人，所以笔者认为使用“全共斗一代”的称谓是不合适的。

[61] 『朝日クロニクル 週刊二○世紀』（1954年分）、20頁。

[62] 秋山勝行·青木忠『全学連は何を考えるか』自由国民社、1968、137、138、139、125、121、122、126頁。

[63] 女たちの現在を問う会編『全共闘からリブへ』『銃後史ノート戦後篇⑧』インパクト出版会、1996、106—107頁。

[64] 女たちの現在を問う会編『全共闘からリブへ』、96、97頁。

[65] 北野隆一『プレイバック「東大紛争」』講談社、1990、65頁。

[66] 女たちの現在を問う会編『全共闘からリブへ』、97頁。

[67] 北野隆一『プレイバック「東大紛争」』、144頁。

[68] 女たちの現在を問う会編『全共闘からリブへ』、104頁。

[69] 東大全共闘·駒場共闘会議編『屈辱の埋葬』亜紀書房、1970、352頁；東大闘争討論資料刊行会編『東大解体の論理』『日本の大学革命』第4巻、日本評論社、1969、134頁。

[70] 然而据日本大学文理学部闘争委員会書記局編『増補 叛逆のバリケード』（三一書房、1969）第48页中所述，在1968年6月日本大学全学共斗会议发出的抗议书中，列举了“学校属于民主学生！”“将暴力学生赶出去”等口号。这些口号，与右翼体育系学生得到大学理事会的授意向全共斗施加暴力，从而站到了全共斗的对立面一事有关。
与此相对，与民青处于对立关系的东京大学全共斗，为对抗主张“民主主义”、“反对暴力”的民青，则多采取反对“民主主义”、肯定暴力的论调。因此，“民主主义”或许并非一开始在全共斗运动中就被当作一个贬义词使用，而是民青势力影响强大的东京大学独特的语言体系作为全共斗运动的“通用语言”波及其他大学后的结果。
山本義隆『知性の反乱』（前衛社、1969）中，收录了发表于《状况》杂志1969年2月号的东大全共斗与日大全共斗学生领导人召开的题为“讨论·反大学”的座谈会的内容。在第278页中，时任日大全共斗委员会委员长的秋田明大在1968年11月表示：“去东大的话就不得不反民青。”同为日大全共斗成员的佐久间顺三也表示：“（从东大）回来的学友们说过，‘也需要在理论上打击一下民青’。因此才要通过阅读《二次革命论批判》等书来学习。”从这里就能够看出因资金管理不善问题而自然产生的日大全共斗，是如何从起初肯定性地使用“民主”一词，到后来受东大全共斗影响而发生改变的。

[71] “教授会”是日本大学中为审议大学诸多重要事项而由教授等志愿组成的以各院系为单位的组织。——译者注

[72] 早稲田大学发生的事件，详见女たちの現在を問う会編『全共闘からリブへ』，第86页。其余部分，参见北野隆一『プレイバック「東大紛争」』，第227、99、124页。

[73] 北野隆一『プレイバック「東大紛争」』、87頁。

[74] 佐伯啓思『戦後民主主義とは何だったのか』、53、56頁。

[75] 女たちの現在を問う会編『全共闘からリブへ』、274頁。

[76] 丸山眞男『丸山眞男集』第9巻、173頁；丸山眞男『自己内対話』、137頁。1969年2月28日的发言。封锁研究所时的发言见「法学部研究室封鎖」『毎日新聞』1968年12月24日。

[77] 『法学部研究室封鎖』吉本隆明『吉本隆明全著作集』続10巻、勁草書房、1968—1978、13頁。

[78] 東大全共闘·駒場共闘会議編『屈辱の埋葬』、293、298頁。

[79] 松田道雄『支配の論理と抵抗の論理』『資料「ベ平連」運動』上巻、446頁；日高六郎『五月二○日から六月十九日まで』、133頁；神田文人『歴史学における民族問題論争』、54頁。

[80] 铃木正「歴史論における民族的なもの」『歴史評論』第120号、1960年、83頁。

[81] 日本对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战败的15年对外战争的总称。——译者注

[82] 東大全共闘経済大学院闘争委員会編『炎で描く変革の論理』自由国民社、1969、128—129頁。
丸山真男也从其他角度批判了教授们的“受害意识”。他在被认为写于1969年的笔记中有下列记述（丸山眞男『自己内対話』、174—175頁）：
通过东大斗争，我所看到的是令人厌恶的知识分子，或稚嫩的知识分子：
○认为自己的行动是非政治的或是反政治的，其实是无党派的自我欺骗。
○一时头脑发热追随全共斗，却在最后阶段将其抛弃的“一般的学生”。
○经历斗争后，最终只剩下受害者意识的校长和教师。
○伪君子（不仅是□□□、□□□□、朝日报道的记者，还包括全共斗“自我感觉良好的”领导者）。
○为使自己更出名而笔耕不辍的评论家。
○只会人云亦云或随声附和的教授们（也许是单纯吧）。
○将过去或现在对于日共的憎恨作为唯一的行动指南的前日共党员。

○将自己在单位的无力感投射到大学，作为一种心理补偿而支持全共斗的工薪阶层（麻烦的存在）。
○毫不犹豫地将全共斗学生称为“暴力学生”的日共（民青）教师和学生。
○最后是到头来只能写下以上内容的身为教师的自己。
——可能是由于我已经不想待在日本这个地方了吧。

[83] 東大全共闘·駒場共闘会議編『屈辱の埋葬』、299頁；『東大闘争獄中書簡集』三一書房、1970、178、180頁。

[84] 小田実『「べ平連」·回顧録でない回顧』、585頁。

[85] 北野隆一『プレイバック「東大紛争」』、270頁。

[86] 女たちの現在を問う会編『全共闘からリブへ』、107頁。

[87] 在1971—1972年开展活动的日本恐怖组织，系日本新左翼的一部分。是共产主义者同盟赤军派与日本共产党神奈川县委员会合并而成的产物。——译者注

[88] 北野隆一『プレイバック「東大紛争」』、91頁。

[89] 北野隆一『プレイバック「東大紛争」』、191頁。

[90] 小松左京「『平均的人類』の願い」『資料「べ平連」運動』上巻、135—136頁。

[91] 本多勝一『戦場の村』朝日文庫版、1981、161頁。

[92] 本多勝一『戦場の村』、125頁。

[93] 本多勝一『戦場の村』、157頁。

[94] 本多勝一『戦場の村』、250、313頁。

[95] 本多勝一『戦場の村』、221、224頁。

[96] 指美军为应对越战而在日本筹集的物资及劳务。——译者注

[97] 松尾尊兊『国際国家への出発』、296頁。

[98] 松尾尊兊『国際国家への出発』、296頁。

[99] 本多勝一『戦場の村』、313—314頁。

[100] 霍華徳·津恩「魚と漁師」『資料 「ベ平連」運動』上巻、89頁。

[101] 「爆弾でベトナムに平和をもたらすことができるか？」『資料 「ベ平連」運動』上巻、59頁；霍華徳·津恩「魚と漁師」『資料 「ベ平連」運動』上巻、91、87頁。

[102] 小田実「平和への具体的提言」『資料 「ベ平連」運動』上巻、107、109—110頁。

[103] 霍華徳·津恩「魚と漁師」、91頁。

[104] 小田実編『ベトナムのアメリカ人』共同出版、1966、237、248頁

[105] 小田実編『ベトナムのアメリカ人』、248、221頁。

[106] 小田実『小田実全仕事』第8巻、153頁。

[107] 小田実編『ベトナムのアメリカ人』、2頁。

[108] 小田実編『ベトナムのアメリカ人』、220頁。

[109] 本多勝一『中国の旅』、11頁。

[110] 鶴見俊輔『鶴見俊輔著作集』第5巻、131頁。

[111] 鶴見俊輔『鶴見俊輔著作集』第5巻、137、139、150頁。如第十六章所述，在战后的知识分子中，鹤见对以“战死者”问题为中心的战争责任追究是最为关注的。他之所以对“海神”等战死学生兵进行批判，除受当时全共斗运动这一客观环境所迫外，还与其对全共斗伦理主义主张感到愤懑有关。
如第545页注1所述，鹤见是一个同时具有“满分”的伦理主义取向、优等生取向，和与其相反的“不良取向”、“大众取向”这对矛盾的人物。在鹤见看来，体现自己思想的战死的特攻队员是“满分”的存在，因此才会在1950年代从战死者的角度，追究保守政治家和知识分子的转向和战争责任。然而，鹤见在其提出“国家原罪”主张的1968年出版的『戦争と日本人』一书中，一方面认为因特攻战而战死的学生兵“或许从小学开始就一直是优等生，一贯遵纪守法，最终没能抗拒自己想要成为被表扬对象这种诱惑”；另一方面，又认为“这是一种缺乏勇气的表现”（第5卷，第139页）。然而，对于在越平联帮助下逃跑的美军士兵，他在1969年6月谈道，如果是那种自小

就很努力，在老师和家长的表扬声中长大，至今仍然希望被人赞扬为‘那个男人反对越战固然令人遗憾，但仍不失为一个优秀的人’的话，是不会选择当逃兵的”（第5卷，第170页）。也就是说，鹤见在1950年代出于对象征“满分”的战死者的憧憬而追究战争责任，另一方面却在1968年主张批判那些战死的学生兵。如此想来，或许可以说鹤见称赞用以对抗“国家原罪”的“反对犯罪”，是其“不良少年”取向在其国家论中的应用。另外，鹤见在这一时期受到全共斗运动的刺激，似乎更加感受到伦理主义的沉重压力。1967年，世界语学家由比忠之进为向支持越战的日本政府表示抗议而自焚，鹤见虽然对其表示赞扬，同时却又表示：“我甚至连点燃自己的勇气都没有，我认为由比的行为是我不能效仿的过激行为。”（第5卷，第113页）此外，在1968年的『現代学生論』一文中，针对大学为了压制全共斗运动而允许警察机动部队进驻的行为，鹤见表示：“自己下不去手，却打电话叫来第三方，并放任其无情地殴打学生，我认为这完全不是教与学之间的关系了。”并评论道：“一种与明治精神相去甚远的人际关系，正在大学校园中蔓延开来。”（第5卷，第120、121页）。1970年，鹤见为抗议校方对待全共斗运动的方式而辞职，但正如第545页注1中所说，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其思想由“明治”转向了“大正”。对“满分”的伦理主义怀有矛盾心理的鹤见来说，全共斗运动既是其同情的对象，也是使其感到苦闷而加以反对的对象。他在1968年的『現代学生論』一文中写道：“学生处在一个任何时候都能逃避的位置。”（第5卷，第121页）一方面为全共斗运动所迫而将战死者批判为“优等生”，另一方面以赞扬针对“国家原罪”的“反对犯罪”的形式，表面上赞同全共斗运动的主张内心深处又持反对态度，可以说这就是1968年时鹤见的主张。不过，这部『戦争と日本人』虽然在学生中广受好评，但辞职后的鹤见身心状态均不理想，并最终于1972年离开日本以客座教授的身份前往墨西哥。

此外，鹤见在1969年的『二十四年目の「八月十五日」』一文中，谈到批判美军投放原子弹并自杀了的亲泊朝省大佐（参见第四章），并写道“在战后第24个年头的今天，与亲泊的想法正相反，只思考政治上的责任却不顾道德上的问题的倾向不断加强。人们只会认为用竹矛对抗原子弹的做法愚蠢至极，而如果目标正确那么即使用竹矛也要顽强到底的那种气概可以说已不复存在。作为那股风潮的反作用，在战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中，出现了一种新的战争观，那就是如果在1945年坚决不投降、血战到底就好了，只有如此日本才会诞生真正的民主主义”。另一方面又写道：“我认为战后是伪民主主义时代，尽管如此，我却不认为应该将其整体否定。‘伪说’该死，这种从‘真理’的角度进行判断的思想我是无法相信的。我认为这是一种精神上的怠惰，是耐性的不足”，“认真思考的人，都想成为‘真理’，对无法成为‘真理’的东西，或许会认为就想告诉别人死了无妨。然而，‘真理’真的是空想之外的东西吗。所谓假的该死，最终是否意味着自己与生相比更倾向于死呢”（第5卷，第144、145页）。从这里可以看出1950年代以战死者问题为中心对保守政治家的“伪善”进行批判的鹤见，对全共斗运动的伦理主义和“战后民主主义”批判既同情又反对的态度。

此外，鹤见主张“国家原罪”和“反对犯罪”的『戦争と日本人』一书，是从发生在1968年的“金嬉老事件”开始展开论述的，他所主张的“反对犯罪”似乎也是受到了这一事件的启发。与鹤见对金嬉老的肯定甚至同情相反，丸山真男在1969年的笔记中写道：“发生了那样的事，就算是一时冲动地殴打（杀害），也是可以理解的。”丸山在1969年2月28日对于妨碍其授课的全共斗学生，也举出了“金嬉老事件和因嫉妒而发狂的妻子将丈夫杀害的事例（虚构）”来进行反驳（丸山眞男『自己内会話』、148、136頁）。丸山所一贯主张的，是政治并非“心情伦理”的问题，而是结果上的“责任伦理”问题，可以看出他是将“金嬉老事件”作为这一观点的具体事例进行思考的。然而，姑且不谈是否考虑到了在日朝鲜人当时所处的境遇，也不难想象，以抛出这种评论的态度来看待全共斗运动，很有可能会更进一步地刺激到他们。此后，丸山因患肝疾退休。丸山的这种做法，从贯彻自己主张的“心情伦理”的角度来看是可以理解的，但从作为政治行为的“结果责任”的角度来看是否明智之举，就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了。无论是与非，都可以证明丸山不是一名“政治家”。

[112] 小田実「ことは始まったばかりだ」『資料 「べ平連」運動』上巻、522頁。

[113] 小田実『「べ平連」·回顧録でない回顧』、544頁。

[114] 小田実『「べ平連」·回顧録でない回顧』、52—53頁。

[115] 「戦没学生に声あらば……」『朝日新闻』1969年5月2日。毁坏塑像的学生一方的主张，详见鮎原輪「死者たちの復権——わだつみ像破壊者の思想」『朝日ジャーナル』1970年2月8日号。建造“海神像”的经过和“海神像之会”的活动经过，详见保阪正康『「きけわだつみのこえ」戦後史』（『文芸春秋』、1999）。

[116] 奥崎謙三『ヤマザキ、天皇を撃て！』三一書房、1972，再版出版社为新泉社，再版时间为1987年。

[117] 吉本隆明『吉本隆明全著作集』続10巻、202頁。吉本批判冲绳学者伊波普猷没有自己的主张，并评价道：“所以说琉球/冲绳的那些人不行。”（第191页）

[118] 以下的引用出自東アジア反日武装戦線KF部隊（準）「KF部隊（準）の反日思想」東アジア反日武装戦線KF部隊（準）『反日本革命宣言』第五章（1979）以及作为该书附录资料被重新收录的『腹腹時計都会ゲリラ兵士の読本Vol.1』（1974）。关于东亚反日武装战线，详见松下竜一『狼煙を見よ』（河出書房新社、1987）。

[119] 1968年吉本隆明因全共斗运动而大受欢迎，那之后出现了很多关于他的研究。仅已经确认的单行本就有小林一喜、远丸立、宍户修、大堀精一、中村文昭、白川正芳、北川透、矶田光一、河野信子、菅孝行、宫城贤、冈井隆、松冈俊吉、上村武雄、久保隆、川端要寿、吉本裕、鲇川信夫、月村敏行、宫内丰、上林俊树、宫林功治、好村富士彦、神山睦美、金山诚等人的著作，距今时间较近的有『吉本隆明を「読む」』（現代企画室、1980）、吉本和明『吉本隆明論』正·続（パロル舍、1988）、竹田青嗣『世界という背理』（河出書房新社、1986）、田川建三『思想の危険について』（インパクト出版会、1987）、鷲田小彌太『増補版 吉本隆明論』（三一書房、1992）、芹沢俊介『主題としての吉本隆明』（春秋社、1998）、小浜逸郎『吉本隆明』（筑摩書房、1999）、オルソン『アンビヴァレント·モダーンズ』、水溜眞由美『出家の論理』（『情况』第10号、1999年）、友常勉『欲望の戦後的形象』（『现代思想』第30巻第11号、2002年）等。如本书所述，在迄今为止有关吉本的论述中，吉本被限定为一个过激“皇国青年”的形象，而关于他的战争经历和思想之间的关系的探讨仍不够充分。此外，“战时派”所属世代的倾向与吉本之间的关系也没有被过多论及。吉本与丸山真男间的对立关系虽然屡被提及，但仍需要从“公”与“私”的关系的角度进行探讨，将吉野关于“联合赤军事件”的演讲纳入研究视野。本章并非在批判吉本免除兵役一事，而是指出他对此怀有罪恶感的事实，并讨论这是如何反映在其思想中的。

[120] 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13巻、88、89頁。

[121] 中村眞一郎·加藤周一·田代正夫·三島由紀夫·寺沢恒信·石島泰·上野光平·三浦節·枡内左紀「二十代座談会·青春の再建」『光』第12号、1947年、3頁。

[122] 高見順·堀田善衛·三島由紀夫·吉行淳之介·村上兵衛·石原慎太郎·木村徳三『戦前派·戦中派·戦後派』『文芸』1956年7月号、45頁。

[123] 村上一郎「戦中派の条理と不条理」五味川純平·村上一郎·山田宗睦『私と戦争』講座『現代の発見』第1巻、春秋社、1959、63、97頁。

[124] 白鳥邦夫「私の敗戦日記」鶴見俊輔『平和の思想』、147、149頁。

[125] 村上兵衛「戦中派はこう考える」、24頁。

[126] 柴田道子『戦争が生んだ子どもたち』、24頁。

[127] 森崎和江「京ノ方ヲ向イテ拝ムガヨイ」久野収·神島二郎編『「天皇制」論集』、135頁。

[128] 鶴見俊輔『鶴見俊輔著作集』第5巻、10頁。

[129] 北村太郎「孤独への誘ひ」『純粋詩』第3号、1947年、26頁。

[130] 北村太郎「孤独への誘ひ」『純粋詩』第3号、1947年、27頁。

[131] 荒正人『荒正人著作集』第1巻、279頁。

[132] 遠藤周作·小林洋子·月丘夢路·深尾庄介·丸山邦男·三輪輝光·大宅壮一「戦中派は訴える」『中央公論』1956年3月号、160頁。

[133] 鶴見俊輔『鶴見俊輔著作集』第5巻、12頁；村上兵衛「戦中派はこう考える」、22頁。

[134] 佐藤忠男『裸の日本人』、57—58頁。

[135] 平野謙·磯田光一·吉本隆明「戦後文学白書」『図書新聞』1964年6月27日、猫々堂編·発行『吉本隆明資料集』第1巻、2000、70頁。

[136] 村上兵衛「戦中派はこう考える」、30頁。

[137] 梅原猛「京都学派との交渉私史」、35、38頁。

[138] 高田佳利「行動の意味の発掘」、29頁。

[139] 松浦総三『戦時下の言論統制』、66頁。

[140] 神立尚紀『零戦 最後の証言』、150、220頁；神立尚紀『零戦 最後の証言Ⅱ』、153頁。

[141] 小田実「『難死』の思想」『小田実全仕事』第8巻、14頁。

[142] 山田宗睦『戦後思想史』三一書房、1959、18、8、11頁。

[143] 坂口安吾『坂口安吾全集』第11巻、273、274頁。

[144] 吉本隆明『吉本隆明全著作集』第5巻、勁草書房、1968—1978、673、674頁。

[145] 吉本隆明『吉本隆明全著作集』第8巻、139頁。

[146] 吉本隆明『吉本隆明全著作集』第4巻、191頁。

[147] 吉本隆明『吉本隆明全著作集』第15巻、461頁。

[148] 吉本隆明『吉本隆明全著作集』第4巻、193頁。

[149] 吉本隆明『吉本隆明全著作集』第4巻、192。

[150] 吉本隆明『吉本隆明全著作集』第15巻、462頁。

[151] 吉本隆明『吉本隆明全著作集』第15巻、414、413頁。

[152] 吉本隆明『吉本隆明全著作集』第15巻、418頁。

[153] 吉本隆明『吉本隆明全著作集』第15巻、418、415頁。

[154] 吉本隆明『吉本隆明全著作集』第13巻、9、10頁。

[155] 吉本隆明『私の「戦争論」』ぶんか社、1999、194頁。吉本在接受这次采访时强调自己当时并不打算"逃避兵役"，"从来没有'不愿去前线'的想法，而是随时'都想去战场'，这是真心话。之前柄谷行人问我'吉本你去工科类学院难道不是为了逃避征兵吗？'但那是柄谷行人还是一名左翼学生时，根据自己的想法而妄加推断的。因为我小学毕业后就已经开始读工科类院校了"（第197页）。但正如本节所论证的那样，对于逃避征兵一事，吉本是怀有一种强烈的负罪感的。
吉本在这里所说的柄谷行人的指责，据笔者的考察，主要出自柄谷行人、浅田彰、莲宝重彦、三浦雅士在一次座谈会上所谈及的以下内容（『近代日本の批評』下卷、福武書店、1991、75、76頁）：
浅田（根据吉本的评价）：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完全没有谈及具体是如何逃避兵役的。仅仅是舍生忘死的青春故事被夸张神话了。
柄谷：那时理科类大学生不用上前线是众所周知的常识。如果是法学院的话，那么即使是助手（准确说是副教授）的丸山真男也被拉去当兵了。我倒不认为吉本隆明是为了逃避兵役才选择读理科的。但事实上，他确实没有性命之忧。
这之后话题转移到了别处，涉及吉本服兵役问题的内容主要是以上部分。对于这些许的话语，吉本却用近十年的采访来试图进行反驳，足可见他在这个问题上伤口有多深。

[156] 吉本隆明『私の「戦争論」』、195頁。

[157] 吉本隆明『吉本隆明全著作集』第15巻、462頁。

[158] 高田佳利「行動の意味の発掘」、26頁。

[159] オルソン『アンビヴァレント·モダーンズ』、126頁。根据オルソン的采访内容。

[160] 吉本隆明『吉本隆明全著作集』第4巻、192頁。

[161] 吉本隆明『吉本隆明全著作集』第4巻、191頁。

[162] 吉本隆明『吉本隆明全著作集』第4巻、192頁。

[163] 吉本隆明『吉本隆明全著作集』第4巻、193、192頁；第15巻、414頁。

[164] 吉本隆明『吉本隆明全著作集』第4巻、185—186頁。

[165] 吉本隆明『吉本隆明全著作集』第15巻、462頁。

[166] 吉本隆明『吉本隆明全著作集』第5巻、662頁。

[167] 吉本隆明『吉本隆明全著作集』第4巻、192頁。

[168] 吉本隆明『吉本隆明全著作集』第8巻、140、139、142頁。

[169] 吉本隆明『吉本隆明全著作集』第12巻、20頁。

[170] 吉本隆明『吉本隆明全著作集』第8巻、140頁。

[171] 吉本隆明『吉本隆明全著作集』第8巻、137頁。

[172] 吉本隆明『吉本隆明全著作集』第5巻、674頁。

[173] 吉本隆明『吉本隆明全著作集』第8巻、141、138頁。

[174] 吉本隆明『吉本隆明全著作集』第8巻、138、139頁。

[175] 吉本隆明『吉本隆明全著作集』第8巻、142頁。

[176] 平野謙·磯田光一·吉本隆明「戦後文学白書」、67頁。

[177] 吉本隆明『吉本隆明全著作集』第8巻、142頁。

[178] 吉本隆明『吉本隆明全著作集』第15巻、86頁。

[179] 吉本隆明『吉本隆明全著作集』第8巻、139頁。

[180] 吉本隆明『吉本隆明全著作集』第15巻、97頁。

[181] 吉本隆明『吉本隆明全著作集』第8巻、143頁。

[182] 吉本隆明『吉本隆明全著作集』第13巻、145頁。

[183] 吉本隆明『吉本隆明全著作集』第5巻、674頁。

[184] 吉本隆明『吉本隆明全著作集』第5巻、670頁。

[185] 平野謙·磯田光一·吉本隆明「戦後文学白書」、69頁。

[186] 吉本隆明『吉本隆明全著作集』第15巻、87頁。

[187] 吉本隆明『吉本隆明全著作集』第15巻、89、80、87頁。

[188] 吉本隆明『吉本隆明全著作集』第15巻、85頁。

[189] 吉本隆明『吉本隆明全著作集』第15巻、114頁。

[190] 吉本隆明『吉本隆明全著作集』第5巻、666頁。

[191] 吉本隆明『吉本隆明全著作集』第15巻、116頁。

[192] 吉本隆明『吉本隆明全著作集』第15巻、114頁。

[193] 吉本在1950年的笔记中曾提出“人类为什么必须经过从不完全到完全，由人性向神性进化的思考过程”的疑问。『吉本隆明全著作集』第15巻、86頁。

[194] 吉本隆明『吉本隆明全著作集』第14巻、452頁。

[195] 吉本隆明『吉本隆明全著作集』第5巻、630頁。

[196] 吉本隆明『吉本隆明全著作集』第5巻、630頁。

[197] 吉本隆明『吉本隆明全著作集』第15巻、47頁。

[198] 吉本隆明『吉本隆明全著作集』第15巻、37頁

[199] 吉本隆明『吉本隆明全著作集』第15巻、37頁。

[200] 吉本隆明『吉本隆明全著作集』第5巻、313、325頁。

[201] 吉本隆明『吉本隆明全著作集』第5巻、323、318頁。

[202] 吉本隆明『吉本隆明全著作集』第15巻、445、452頁。

[203] 吉本隆明『吉本隆明全著作集』第15巻、466頁。

[204] 吉本隆明『吉本隆明全著作集』第4巻、197頁。

[205] 吉本隆明『吉本隆明全著作集』第13巻、100—101頁。

[206] 吉本隆明『吉本隆明全著作集』第13巻、96頁。

[207] 吉本隆明『吉本隆明全著作集』第5巻、42、43頁。

[208] 吉本隆明『吉本隆明全著作集』第4巻、130頁。

[209] 吉本隆明『吉本隆明全著作集』第4巻、115頁。

[210] 关于《试论〈马太福音〉》的投稿经过，参见吉本隆明「『文学者』という画像」（『「近代文学」復刻版·細目·執筆者目録』日本近代文学館、1981），第20—21页。吉本向《近代文学》投稿的动机是“没有比这里得到的评价更让人可以信赖的”。其文章最终刊载在《现代评论》的创刊号和第2号上（1954年6月、12月）。

[211] 吉本隆明『吉本隆明全著作集』第4巻、194、197頁。

[212] 吉本隆明『吉本隆明全著作集』第4巻、145頁。

[213] 吉本隆明『吉本隆明全著作集』第13巻、423頁。

[214] 吉本隆明『吉本隆明全著作集』第8巻、139、12頁。

[215] 吉本隆明『吉本隆明全著作集』第4巻、192、193、130頁。

[216] 吉本隆明『吉本隆明全著作集』第7巻、362頁。

[217] 吉本隆明『吉本隆明全著作集』第8巻、143頁。

[218] 花田清輝·岡本潤·吉本隆明「芸術運動の今日的課題」『現代詩』第8号、1956年、吉本隆明『吉本隆明資料集』第1巻、7頁。

[219] 吉本隆明『吉本隆明全著作集』第8卷、57、74頁；第13巻、243頁。吉本还在『高村光太郎』中，将白桦派称作“与平民社会最为接近的泛人道主义的利己思想”的代表（『吉本隆明全著作集』第8巻、12頁）。

[220] 吉本隆明『吉本隆明全著作集』第8巻、21、107頁。

[221] 吉本隆明『吉本隆明全著作集』第4巻、76頁。

[222] 吉本隆明『吉本隆明全著作集』第8巻、12頁。

[223] 吉本隆明『吉本隆明全著作集』第5巻、53頁。

[224] 吉本隆明『吉本隆明全著作集』第14巻、473、480頁。

[225]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吉本在《叛逆的伦理——试论〈马太福音〉》中，是将“自立”一词作为否定意义进行使用的。他认为原始基督教团的主张“使神的旨意在不同于人类现实条件的情况下成立，是几乎将人类生存的意义与现实中的一切相隔离的”（『吉本隆明全著作集』第4巻、76頁）。可以说，从这种对于“自立”的憧憬和厌恶，能够看出吉本对于“永远的诗人”的矛盾认识。

[226] 吉本隆明『吉本隆明全著作集』第14巻、445、628頁。

[227] 吉本隆明『知の岸辺へ』弓立社、1976、354、356、386、387頁。

[228] 鶴見俊輔『鶴見俊輔著作集』第2巻、462、463、464頁。

[229] 吉本隆明『吉本隆明全著作集』第13巻、6、9頁。

[230] 吉本所说的“总体视角”虽然一度被与社会主义等现代社会的理论相混淆的情况下进行解释，但基本上与源于他诗歌语言论的“包含世界”、“自立”同义。他在1959年的文章中谈到没有战争体验的“战后成长起来的共产主义者”时，将这种人形容为在理论上对日本和世界形势进行判断的具有“世界视角”的人，并表示这种人是“我一直试图彻底否定的”（『吉本隆明全著作集』第13巻、463頁）。在吉本的认识中，用了既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等的“世界视角”和运动的“方针”，与具有固定含义的“总体视角”完全不是一回事。

[231] 吉本隆明『吉本隆明全著作集』第13巻、6、19頁。

[232] 以下花田清辉的引文出自『芸術運動の今日的課題』，第12—19页。

[233] 吉本隆明『吉本隆明全著作集』第4卷、529頁。

[234] 吉本隆明「『文学者』という画像」、21頁。但据说用作购买洗衣机的只是奖金的一部分，“吉本将其余大部分都捐给了关照过自己而在安保运动中遭到逮捕的律师”。

[235] 吉本隆明『吉本隆明全著作集』第13卷、497頁。

[236] 吉本隆明『吉本隆明全著作集』第13卷、496、499頁。

[237] 吉本隆明『吉本隆明全著作集』第13卷、29、45頁。

[238] 吉本隆明『吉本隆明全著作集』第13卷、127頁。

[239] 吉本隆明『吉本隆明全著作集』第13卷、126、127、53、580頁。吉本对用语的定义并不严谨，其所使用的“民族主义”一词意思并不固定，但在1960年的《虚构的终结》中所使用的“国际主义”和“民族主义”具有独特的含义。据吉本称，受中国共产党影响而高呼“反美爱国”的日本共产党是“民族主义”，但提出“不借助外国势力”宣言的竹内好的“四个提案”则属于“国际主义”（第13卷，第53页）。这里的“民族主义”是指领导者领导人民群众，而人民群众拒绝外国领导者的态度则与之相反，故被称作“国际主义”。虽然在用法上与一般意义上的“国际主义”完全不同，但吉本将6月15日全学联主流派的游行形容为“陷入国际主义的漩涡”，也是基于这种用法。

[240] 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9卷、503頁。此外，吉本在1965年的「思想的弁護論」中称，“当开始觉得不能用生命去换取卑劣的岸政府下台和阻止安保条约修订的时候，安保斗争至少在自己的主观内部已经失败了”，并从“六·一五体验”转向“自立于全部党派”（『吉本隆明全著作集』第13卷、293—294頁）。吉本将安保斗争总结为“失败”，出于他主观上的标准，在他看来，没有战斗到死的意志，那么任何斗争都是“失败”。

[241] 吉本隆明『吉本隆明全著作集』第13卷、555頁。

[242] 吉本隆明『吉本隆明全著作集』第5卷、678頁。

[243] 吉本隆明『吉本隆明全著作集』第13卷、84頁。

[244] 吉本隆明『吉本隆明全著作集』第13卷、84頁。

[245] 吉本隆明『吉本隆明全著作集』第13巻、84頁。

[246] 吉本隆明『吉本隆明全著作集』第13巻、398頁。

[247] 吉本隆明『吉本隆明全著作集』第14巻、80、81頁。

[248] 吉本隆明『吉本隆明全著作集』第13巻、131頁。

[249] 吉本隆明『吉本隆明全著作集』第12巻、19頁。

[250] 吉本隆明『吉本隆明全著作集』第13巻、362頁。

[251] 吉本隆明『吉本隆明全著作集』第13巻、67—68頁。

[252] 吉本隆明『吉本隆明全著作集』第13巻、68、117頁。

[253] 吉本隆明『吉本隆明全著作集』第13巻、76、83頁。

[254] 吉本隆明『吉本隆明全著作集』第14巻、473頁。

[255] 吉本隆明『吉本隆明全著作集』第14巻、625頁；第13巻、第325頁。

[256] 吉本隆明『吉本隆明全著作集』第13巻、161頁。

[257] 吉本隆明『吉本隆明全著作集』第14巻、429、436、437頁。

[258] 吉本隆明『吉本隆明全著作集』第13巻、193頁。

[259] 吉本隆明『吉本隆明全著作集』第14巻、426—427頁。

[260] 吉本隆明『吉本隆明全著作集』第14巻、154頁。

[261] 吉本隆明『吉本隆明全著作集』第13巻、147、148、90頁。

[262] 在这两个时期之间，吉本曾于1964年发表过一篇题为「日本のナショナリズム」（『吉本隆明全著作集』第13巻）的论文。吉本在文中将与拥有西方文化教养的知识分子相对的“日本大众”具有的文化与心性称为“民族主义”（在其1960年代的数篇文章中，也时常称之为“大众民族主义”）。但是，他在该文中始终将“民族主义”一词加注引号，并在将“大众”的文化和心性归为“民族主义”的问题上有所保留。1965年后，吉本转而主张“大众”超越国家的“共同幻想论”。这恐怕是由于所谓日本是非西方的“不发达国家”，知识分子是拥有西方教养的存在这一1950年代的定位在

1964年最终消失在了吉本内心之中的结果。

[263] 吉本隆明『吉本隆明全著作集』第13巻、271頁。

[264] 吉本隆明『吉本隆明全著作集』第14巻、156頁。

[265] 这场“论争”的经过详见桜井哲夫『思想としての60年代』（講談社、1988）中收录的「『幻想』としての吉本隆明」一文。

[266] 吉本隆明『吉本隆明全著作集』第15巻、169頁。

[267] 在1960年代之后的吉本文章中，“家”的形象往往并非指现代家庭。这一点在吉本回忆自己出身的贫民区家庭时尤为明显。当然，这种非现代型的“家”同样被吉本视为“自立”于“国家”之外存在。

[268] 吉本隆明『吉本隆明全著作集』第15巻、169頁。

[269] 吉本隆明『吉本隆明全著作集』第4巻、461頁。

[270] 吉本隆明『吉本隆明全著作集』第5巻、315頁。吉本之所以偏好古代，或许是出于将战后废墟生活比作原始状态的视角。

[271] 吉本隆明『吉本隆明全著作集』第14巻、614、481頁；鶴見俊輔『鶴見俊輔著作集』第2巻、464頁。

[272] 吉本隆明『吉本隆明全著作集』第14巻、445、444、480頁。

[273] 吉本隆明『吉本隆明全著作集』第14巻、448、443、428頁。

[274] 吉本隆明『吉本隆明全著作集』第14巻、448頁。

[275] 吉田和明『吉本隆明』（FOR BEGINNERS シリーズ 32）、現代書館、1984、114頁；桜井哲夫『思想としての60年代』、148頁。

[276] 吉田和明『吉本隆明』、115頁。

[277] 吉田和明『吉本隆明』、114頁。

[278] 吉本隆明『吉本隆明全著作集』第13巻、490頁。

[279] 吉本隆明『吉本隆明全著作集』続10巻、351頁。

[280] 吉本隆明『吉本隆明全著作集』第13巻、685頁。

[281] 吉本隆明『吉本隆明全著作集』続10巻、148、147頁。

[282] 吉本隆明『吉本隆明全著作集』第8巻、144頁。

[283] 吉本隆明『吉本隆明全著作集』続10巻、245頁。

[284] 吉本隆明『吉本隆明全著作集』続10巻、345、248頁。

[285] 吉本隆明『知の岸辺へ』、387—388頁。即使是在三岛由纪夫自杀时，吉本也曾写下令人想起“忍耐着痛苦的肉体训练，最终驾驶特攻飞机一个个地自爆的少年航空兵”的文章（『吉本隆明全著作集』続10巻、245頁）。

[286] 吉本隆明『知の岸辺へ』、405—406頁。

[287] 福田恒存在『新潮』1960年9月号的评论「常識に還れ」中，一方面对丸山真男等人提出批判，另一方面又写道：“我想忠告虽然与我立场截然相反，却又最为我所喜爱的主流派诸君，与你们的老师断绝关系吧。”（『福田恆存全集』第5巻、228頁）另外，吉本隆明、清水几太郎、福田恒存三人都是东京的平民区出身，对全学联主流派都抱有好感。将这一点与本书第十二章所论述的平民区激进主义与安保斗争之间的关系结合思考，可谓意味深长。

[288] 毫无疑问，这并非针对受到吉本启发的人们的揶揄。正如大塚久雄在研究马克斯·韦伯方面十分权威一样，也可以说在日本的家庭主义者中吉本十分有名。

[289] 吉本隆明『吉本隆明全著作集』第15巻、36頁。

[290] 江藤淳『江藤淳著作集』第6巻、81頁。关于江藤淳的著作，有月村敏行『江藤淳論』（而立書房、1977）、菊田均『江藤淳論』（冬樹社、1979）、福田和也『江藤淳という人』（新潮社、2000）、高沢秀次『江藤淳』（筑摩書房、2001）、大塚英志『江藤淳と少女フェミニズム的戦後』（筑摩書房、2001）、田中和生『江藤淳』（慶応義塾大学出版会、2001）等。另外还有柄谷行人「江藤淳論」（『群像』1969年第11号『畏怖する人間』、冬樹社、1972）、佐藤泉「『治者』の苦悩 江藤淳と日本近代」（『現代思想』第27巻第5号、1999年）等。此外，关于江藤在美国的体验，阿川尚之『アメリカが見つかりましたか（戦後編）』（都市出版、2001）、桜井哲夫『アメリカはなぜ嫌われるのか』（筑摩書房、2002）等书中都有提到。江藤年谱详见武藤康史編「江藤淳エピソード付き年譜」（『文学界』1999年9月号）。

总体上看，对江藤淳的研究目前可以说才刚刚起步，柄谷的论文和高泽的书相继关注了江藤对于“死”的冲动。但如本章所述，对于“死”产生冲动这种现象在同时代的作家中并不鲜见，却没有任何研究涉及这一时代背景。另外，目前也没有任何研究试图从与战争体验之间的关系来考察江藤头脑中的“自然”、“死”、“性”的概念。
还有不少研究，或是由于读过江藤在《家族再会》中的说明，或是由于《江藤淳著作集》第5卷中江藤自撰的年谱，而过分夸大了江藤生母的死对其所带来的影响。亦如本章所述，江藤头脑中并没有太多关于自己生母的记忆，反倒是与父亲有着更为复杂的情感牵绊，甚至有时根本分不清“父亲”与“母亲”。实际上，江藤所写的赋予其生母重要意义的《家族再会》，在时间上比其记述自己和父亲之间关系的《战后与我》一文及《日本与我》一书都要晚。江藤心中怀有的对“死”的冲动，是由于“少国民一代”这一时代背景、与结核病的抗争、与父亲的关系、战败和家道中落的打击，与他的“厌世”交织在一起而形成的。或许可以认为，为此感到苦恼的江藤向生母这种可以说是安全对象来追寻原因，其中有试图逃避和隐藏的一面。
在《家族再会》中，江藤在从母亲的去世中寻找自己失落感产生的理由的同时，一方面表示“不能否认战败和战后的社会变动加剧了这种失落感”，另一方面又认为“当一个人逐渐失去这个世界时，如果仅从自身外部或社会之中寻找原因，那是缺乏公正的。那是因为，对于这种人而言‘时代’和‘社会’这种概念本身都是即将崩溃的现实的一部分”（江藤淳『一族再会』福田和也編『江藤淳コレクション』第2巻、ちくま学芸文庫、2001、40—41頁）。这是为“私情”所困的江藤单方面的认识。作为研究不能一味遵循本人的想法，而应该从同时代的背景出发进行考证。如果江藤被彻底困于这种“私情”中的话，那么他就不应该从“明治”这个时代来论述夏目漱石，也不应该写批判战后的时事评论等文章了。并且，江藤起初确实拒绝使用这种论述方式。如果他将这种姿态坚持到底的话，那么想必如本书的这类考证也就没有必要了。江藤没能把“私情”仅仅作为“私情”，而是发生了偏离变化，思考这一变化过程，既能再现其最初的想法，也是对保守民族主义的陷阱的考证。

[291] 佐藤忠男『裸の日本人』、53—54、55、56頁。

[292] 佐藤忠男『裸の日本人』、53—54、55、56頁。

[293] 小田実『小田実全仕事』第1巻、92頁。见『明後日の手記』的注释。

[294] 小田実「廃墟のなかの虚構」『小田実全仕事』第8巻、61頁。

[295] 小田実「廃墟のなかの虚構」『小田実全仕事』第8巻、63頁。

[296] 小田実「廃墟のなかの虚構」『小田実全仕事』第8巻、62頁。

[297] 大江健三郎「戦後世代のイメージ」『厳粛な綱渡り』、36頁。此外，关于大江健三郎及其相关研究，可参照小熊英二「戦後民主主義とナショナリズム——初期の大江健三郎を事例として」［山脇直司·内田隆三·森政稔·米谷匡史編『ネイションの軌跡』『ライブラリ相関社会科学』（7）、新世社、2001］。

[298] 大江健三郎「戦後世代のイメージ」『厳粛な綱渡り』、69、73頁。

[299] 大江健三郎「戦後世代のイメージ」『厳粛な綱渡り』、157、158頁。

[300] 高見順·堀田善衛·三島由紀夫·吉行淳之介·村上兵衛·石原慎太郎·木村徳三「戦前派·戦中派·戦後派」『文芸』1956年7月号、48、49、50頁。

[301] 高見順·堀田善衛·三島由紀夫·吉行淳之介·村上兵衛·石原慎太郎·木村徳三「戦前派·戦中派·戦後派」『文芸』1956年7月号、46、47頁。

[302] 高見順·堀田善衛·三島由紀夫·吉行淳之介·村上兵衛·石原慎太郎·木村徳三「戦前派·戦中派·戦後派」『文芸』1956年7月号、50頁。提问者是木村德三。

[303] 吉本隆明『吉本隆明全著作集』第13巻、485頁。

[304] 高見順·堀田善衛·三島由紀夫·吉行淳之介·村上兵衛·石原慎太郎·木村徳三「戦前派·戦中派·戦後派」『文芸』1956年7月号、53頁；江藤淳『江藤淳著作集』第6巻、83頁。

[305] 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8巻、218頁。

[306] 石原慎太郎「刺し殺せ！」、23頁；石原慎太郎「私と太平洋戦争」『文芸春秋』第12号、1981年。

[307] 大江健三郎「地獄にゆくハックルベリィ·フィン」『世界』1966年9月号；大江健三郎『鯨の死滅する日』、191、197、200、201頁。

[308] 大江健三郎『地獄にゆくハックルベリィ·フィン』『世界』1966年9月号、201頁。

[309] 江藤淳·大江健三郎「現代をどう生きるか」『群像』、1968年1月号、176、177頁。

[310] 大江健三郎「戦後世代のイメージ」、「ぼく自身のなかの戦争」、158

頁。

[311] 石原慎太郎「祖国について」吉本隆明編『国家の思想』『戦後日本思想大系』第5巻、筑摩書房、1969、361、362、36頁。石原在该文中说：“战后掌握政权长达20年之久的保守势力的政治，因战后民族主义被左翼主导，而无论如何培养自己民族主义形象都无济于事。”（第363页）如果将这一点与石原之后加入自民党一事结合在一起思考，就颇为耐人寻味了。

[312] 大江健三郎「二十歳の日本人」『厳粛な綱渡り』、71—72頁。

[313] 大江健三郎「二十歳の日本人」『厳粛な綱渡り』、137頁。

[314] 大江健三郎「二十歳の日本人」『厳粛な綱渡り』、62頁。大江在2001年的座谈会上，曾就社会党委员长被暗杀一事表示“我会站在浅沼先生一边”，但同时又认为凶手少年山口二矢是一个言行一致的人，并认为：“他虽然做错了，但感觉作为一个孩子的态度而言也是无可厚非的。我自觉比不上这个人。”大江健三郎·井上ひさし·小森陽一「大江健三郎の文学」『すばる』2001年3月特大号、180頁。

[315] 大江健三郎『ヒロシマ·ノート』岩波新書、1965、147頁。

[316] 大江健三郎「すべての日本人にとっての沖縄」『持続する志』、168頁。

[317] 大江健三郎「すべての日本人にとっての沖縄」、163、162、153頁。后者出自1965年的「沖縄の戦後世代」。

[318] 矶田光一『戦後史の空間』新潮社、1983、249頁。

[319] 矶田光一『戦後史の空間』、249頁。

[320] 大江健三郎『鯨の死滅する日』、149、89頁。

[321] 大江健三郎·井上ひさし·小森陽一「大江健三郎の文学」『すばる』2001年3月特大号、178頁。

[322] 佐藤忠男『裸の日本人』、54頁。

[323] 小田実「中年男の個人的な訴え」『朝日ジャンナル』1970年10月4日、『資料 「ベ平連」運動』中巻、410—411頁。

[324] 大江健三郎『厳粛な綱渡り』、309頁。

[325] 大江健三郎「地獄にゆくハックルベリィ·フィン」『世界』1966年9月号、192頁。

[326] 大江健三郎『飼育』『死者の奢り·飼育』新潮文庫、1968、124頁。

[327] 大江健三郎「セヴンティーン」『性的人間』新潮文庫、1968、182頁。

[328] 小田実「私は死がこわい」『読売新聞』1月28—30日、『資料「ベ平連」運動』中巻、252頁。

[329] 大江健三郎『厳粛な綱渡り』、156、159頁。

[330] 柄谷行人·福田和也「江藤淳と死の欲動」『文学界』1999年11月号、24頁；小林秀雄·江藤淳「歴史について」『諸君！』1971年第7号。

[331] 江藤淳『一族再会』福田和也編『江藤淳コレクション』第2巻、47頁。

[332] 江藤淳『文学と私』福田和也編『江藤淳コレクション』第2巻、483頁；江藤淳「戦後と私」『江藤淳著作集』続1巻、211頁。

[333] 江藤淳『一族再会』福田和也編『江藤淳コレクション』第2巻、57頁。

[334] 江藤淳『江藤淳著作集』続1巻、年譜、308頁。

[335] 江藤淳『江藤淳著作集』続1巻、169、170頁。

[336] 武藤康史編「江藤淳エピソウド付き年譜」『文学界』1999年9月号、219頁。

[337] 江藤淳『江藤淳著作集』第6巻、19頁；続1巻、214頁。

[338] 江藤淳『江藤淳著作集』続1巻、214頁。

[339] 江藤淳『江藤淳著作集』続3巻、56頁。

[340] 江藤淳『江藤淳著作集』続1巻、214頁；続2巻、85頁；第6巻、53頁。

[341] 江藤淳『江藤淳著作集』続1巻、216頁。

[342] 江藤淳『場所と私』福田和也編『江藤淳コレクション』第2巻、553頁。

[343] 江藤淳『江藤淳著作集』続1巻、281頁；第6巻、52頁。

[344] 江藤淳『江藤淳著作集』続1巻、217頁。

[345] 江藤淳『日本と私』福田和也編『江藤淳コレクション』第2巻、429—430頁。

[346] 江藤淳『江藤淳著作集』続1巻、218頁。

[347] 江藤淳『江藤淳著作集』続2巻、87頁。此外，围绕1948年太宰治自杀事件，《朝日新闻》的投稿栏中发生了一次论争。接下来要介绍的批评太宰治的主妇们的投稿内容，作为江藤淳那个时代的“百姓”与“文学家”的一般性印象的体现，十分值得人们关注。“太宰的自杀被视为这个时代的民间疾苦的象征，文坛好友们也发表了很多表示同情的感想。但真的是这样吗？看了看太宰的小说，无论哪部大抵都是描写那种置家庭和妻小于不顾而终日沉迷于酒色的人物，这些人物虽然因此而感到痛苦，却为了缓解痛苦而更加沉迷于酒色，最终再次陷入痛苦。我所看到的，只是一种无法反映任何民间疾苦的精神脆弱者的独白。虽说太宰有众多读者，但或许那只是因为他的作品有助于那些过着同样颓废的生活、神经过敏的人进行自我辩护吧。……姑且不谈这些，只谈自杀方式，不能单单因为距离近就跳入市民每日饮用的河水中，这彻底暴露了这些人只顾自己不顾他人的思考方式。到头来最可怜的，还是他的妻子和三个孩子因此而失去生活依靠。”「太宰さんの身勝手な情死」『朝日新聞』1948年7月14日、朝日新聞社編『声』第2巻、66、67頁。

[348] 江藤淳『江藤淳著作集』続2巻、88、85、86頁：江藤淳『文学と私』福田和也編『江藤淳コレクション』第2巻、491頁。

[349] 江藤淳『江藤淳著作集』第6巻、19頁。

[350] 江藤淳『日本と私』福田和也編『江藤淳コレクション』第2巻、320頁。

[351] 江藤淳『江藤淳著作集』续1巻、219頁；江藤淳『一族再会』福田和也編『江藤淳コレクション』第2巻、187頁；石原慎太郎「さらば友よ、江藤よ！」『文芸春秋』第9号、1999年、266頁。

[352] 江藤淳『文学と私』福田和也編『江藤淳コレクション』第2巻、483頁；江藤淳『日本と私』福田和也編『江藤淳コレクション』第2巻、329頁。

[353] 写作经过见江藤淳『場所と私』（福田和也編『江藤淳コレクション』第2巻），第555页。

[354] 『マンスフィールド覚書』『覚書補遺』江藤淳『フロラ·フロラアヌと少年の物語』北洋選書、1978。

[355] 江藤淳『日本と私』福田和也編『江藤淳コレクション』第2巻、397頁。

[356] 江藤淳『日本と私』福田和也編『江藤淳コレクション』第2巻、328頁。

[357] 江藤淳『日本と私』福田和也編『江藤淳コレクション』第2巻、367、376、330頁。

[358] 江藤淳『日本と私』福田和也編『江藤淳コレクション』第2巻、433頁。

[359] 江藤淳『日本と私』福田和也編『江藤淳コレクション』第2巻、391頁；江藤淳『場所と私』、548頁。

[360] 江藤淳『場所と私』福田和也編『江藤淳コレクション』第2巻、551頁。

[361] 江藤淳『場所と私』福田和也編『江藤淳コレクション』第2巻、555頁。

[362] 江藤淳『渚ホテルの朝食』福田和也編『江藤淳コレクション』、583頁。在《江藤淳著作集》第5卷（年谱）第309页中，有江藤淳听从父亲之命，“通过向从事英语文学研究的妻子的祖父学习英语来忘记日本战败后所受到的打击”的内容。

[363] 江藤淳『江藤淳著作集』続5巻、年譜、312頁；江藤淳『文学と私』福田和也編『江藤淳コレクション』第2巻、492頁。

[364] 江藤淳『江藤淳著作集』第1巻、7頁。

[365] 渡辺清『砕かれた神』、261頁。

[366] 江藤在《家族再会》中解释道，自己对语言持不信任感，是因为自己4岁失去母亲后，就仿佛“失去了整个世界”（福田和也編『江藤淳コレクション』第2巻、40—45頁）。这种自我分析是由于他在美国学习心理学后受到影响，进而“发现”了“母亲”的结果，本书的观点是不应将这种结果过分夸大。

[367] 江藤淳『江藤淳著作集』第1巻、59、60頁。

[368] 江藤淳『江藤淳著作集』第1巻、60頁。

[369] 江藤淳「怒れる若者たち」、139頁；江藤淳『江藤淳著作集』第6巻、44—45頁。

[370] 江藤淳『江藤淳著作集』第1巻、16—18、54頁。

[371] 江藤淳『江藤淳著作集』第1巻、8頁。

[372] 江藤淳『江藤淳著作集』第1巻、18、19頁。

[373] 江藤淳『江藤淳著作集』第1巻、68、23頁。

[374] 江藤淳『江藤淳著作集』第1巻、21頁。

[375] 江藤淳『江藤淳著作集』第1巻、23、53頁。

[376] 江藤淳『江藤淳著作集』第1巻、83、92頁。

[377] 江藤淳『江藤淳著作集』第1巻、84、78頁。

[378] 江藤淳『江藤淳著作集』第1巻、79頁。

[379] 江藤淳『江藤淳著作集』第1巻、54頁。

[380] 江藤淳『江藤淳著作集』第1巻、87、55頁。

[381] 江藤淳『江藤淳著作集』第1巻、17、18頁。

[382] 江藤淳『江藤淳著作集』第1巻、73頁。

[383] 江藤淳『江藤淳著作集』第1巻、92—94頁。

[384] 江藤淳『日本と私』福田和也編『江藤淳コレクション』第2巻、443—444頁。

[385] 江藤淳『江藤淳著作集』第5巻、239頁。

[386] 江藤淳『江藤淳著作集』第5巻、232頁。

[387] 江藤淳『江藤淳著作集』第5巻、243—245頁。

[388] 江藤淳『江藤淳著作集』第5巻、214、73、232、181、40頁。

[389] 江藤淳『江藤淳著作集』第5巻、181、180、76—77、184、187頁。

[390] 江藤淳『江藤淳著作集』第5巻、234頁。

[391] 江藤淳『江藤淳著作集』第5巻、67、268頁。

[392] 江藤淳『江藤淳著作集』第5巻、207、73頁。

[393] 江藤淳『江藤淳著作集』第5巻、219頁。

[394] 江藤淳『江藤淳著作集』第5巻、266、264頁；続2巻、193頁。

[395] 江藤淳『江藤淳著作集』第5巻、241頁。

[396] 武藤康史編「江藤淳エピソード付き年譜」『文学界』1999年9月号、212頁；江藤淳「場所と私」福田和也編『江藤淳コレクション』第2巻、549頁。

[397] 江藤淳『江藤淳著作集』第6巻、45、43、46頁。

[398] 江藤淳『江藤淳著作集』第6巻、42頁；江藤淳『日本と私』、368頁。

[399] 江藤淳『江藤淳著作集』第5巻、57頁。

[400] 江藤淳·浅利慶太·石原慎太郎·大江健三郎·城山三郎·武満徹·谷川俊太郎·羽仁進·山川方夫·吉田直哉「発言」『三田文学』1959年11月。

[401] 江藤淳『江藤淳著作集』第6巻、63頁。

[402] 江藤淳『小林秀雄』『江藤淳著作集』第3巻、あとがき。

[403] 江藤淳「『声なきもの』も起ちあがる」『中央公論』1960年7月号、51、53、55頁。

[404] 江藤淳『江藤淳著作集』第6巻、25頁。

[405] 江藤淳「『声なきもの』も起ちあがる」『中央公論』1960年7月号、53頁。

[406] 江藤淳『江藤淳著作集』第6巻、25、26頁。

[407] 江藤淳『江藤淳著作集』第6卷、28、31頁；荒正人·大井廣介·江藤淳「文学者の政治行動」『群像』1960年8月号、192頁。

[408] 江藤淳『江藤淳著作集』第6卷、32頁。

[409] 江藤淳·藤田省三「運動·評価·プログラム」『思想の科学』1960年7月号、118頁。其中记载对谈是在6月17号晚上进行的。

[410] 江藤淳『江藤淳著作集』続5卷、83、85頁。

[411] 如本书所述，1960年1月羽田机场发生针对被捕全学联干部的营救行动，江藤对此进行了批判，吉本隆明也对江藤的态度给予了高度评价。吉本之所以支持江藤对营救行动的批判，或许是因为与许多知识分子一面批判全学联的直接行动，一面又感到内疚进而为了获得“免罪符”而响应全学联的呼吁相反，江藤坚定地表示了拒绝。此外，吉本在1966年的《对于语言美是什么》的序言中，大加赞赏江藤的《作家在行动》为“优秀的文风论”。据吉本回忆，当他在摸索如何才能超越小林秀雄的文风时，看到了《作家在行动》，出于对研究题目的共鸣而“仔细地阅读”了这本书（吉本隆明「江藤さんの特異な死」『文芸春秋』第9号、1999年、285頁）。

[412] 当然从这种“和平”观里，能够轻易发现试图回避与父亲发生争吵的“一贯的努力”。

[413] 江藤淳『江藤淳著作集』第6卷、9、17頁。

[414] 江藤淳『江藤淳著作集』第6卷、15、23頁；江藤淳·藤田省三「運動·評価·プログラム」『思想の科学』1960年7月号、124頁。

[415] 江藤淳『江藤淳著作集』第6卷、13、16頁。

[416] 江藤淳『昭和の文人』、71—104頁。

[417] 江藤淳『江藤淳著作集』第6卷、22、23頁。

[418] 关于1960年的安保斗争，江藤数年后在自撰的年谱中写道：“反政府运动家对眼中的‘国家’感到黯然神伤。”（『江藤淳著作集』続5卷、314頁）但在江藤于1960年所写的文章中，正如引用部分所示，革新派的民族主义是受到批判的。

[419] 吉本隆明『吉本隆明全著作集』第14卷、439、435頁。

[420] 江藤淳『江藤淳著作集』第4巻、31頁。

[421] 江藤淳『江藤淳著作集』第4巻、41、96頁。

[422] 江藤淳『江藤淳著作集』第4巻、40、41頁。

[423] 吉本隆明「江藤さんの特異な死」『文芸春秋』第9号、1999年、292頁。

[424] 柄谷行人·福田和也「江藤淳と死の欲動」『文学界』1999年11月号、23頁。

[425] 江藤淳『江藤淳著作集』第4巻、121頁。

[426] 但事实上，江藤在拜访大久保之后受到刺激，是在其正式回国后的1965年5月（『江藤淳著作集』続1巻、220頁）。

[427] 江藤淳『江藤淳著作集』第4巻、64頁。

[428] 江藤淳『江藤淳著作集』第4巻、66頁。

[429] 江藤淳『日本と私』福田和也編『江藤淳コレクション』第2巻、352、376、343頁。

[430] 江藤淳『江藤淳著作集』第4巻、140頁。

[431] 江藤淳『江藤淳著作集』第4巻、32頁。

[432] 根据江藤淳『日本と私』（福田和也編『江藤淳コレクション』第2巻）第379页中的记载，《美国与我》一书是他回国后在涩谷的临时住所写成的。所以严格意义上讲，也可以认为江藤发现“明治国家”并非在留美期间，而是如《日本与我》所述，是在回国后还未安顿下来的状态。但是无论如何，发现“明治国家”是在美国受到了刺激，这一点是无法改变的。

[433] 江藤淳『江藤淳著作集』第4巻、55、44頁。与江藤形成对比的是，安冈章太郎在其著作『アメリカ感情旅行』（岩波新書、1962）中写道，当看到穿着暂缓征兵期制服的学生，“回想起自己关于战争期间的记忆，忽然感觉他们周围开始飘散出一些怪异的东西”。想必日本投降时刚满25岁的安冈，要比江藤更加强烈地感受到了“战死”的重压。对于这种“怪异的东西”究竟是感到厌恶还是诱惑，是江藤和安冈的分歧点，但江藤似乎在撰写《美国与我》之前，已经阅读过安冈的《美国感情

旅行》。这或许也为江藤在《成熟与丧失》一书中批判安冈的《海边的风景》埋下了伏笔。

[434] 江藤淳『江藤淳著作集』第6卷、81—82頁。

[435] 江藤淳『江藤淳著作集』第4卷、88頁。

[436] 江藤淳『江藤淳著作集』第4卷、85、91頁。

[437] 江藤淳『江藤淳著作集』第4卷、88頁。

[438] 江藤淳『江藤淳著作集』続1卷、214頁。

[439] 江藤淳『江藤淳著作集』第4卷、65、57頁。

[440] 江藤淳『江藤淳著作集』第4卷、56、57頁。而且，江藤将战后日本相对化的视角，是通过接触“美国南方”才产生的。在自家举办的聚会上，江藤在同席的一群美国南方人身上看到了“拒绝同化，固执地坚持自己的生活方式的一类人”，感觉到北方征服南方就像是“美国与被其征服的国家之间关系的原型”。江藤认为，奴隶制的废除并不是普遍正义的实现，只不过是“一种生活方式依靠实力征服了另一种生活方式”而已（『江藤淳著作集』第4卷、51、52頁）。
此外，江藤还主张“民主主义”与其说是“普遍性的理念，不如说是‘美国的生活方式的别名’”，是“他们的民族主义的象征”，“美式民主主义”是根植于开拓自耕农风俗的“旧式伦理”、“本土思想”。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他眼中的近代日本则是“不断地亲手破坏着自己的生活方式”（『江藤淳著作集』第4卷、56、133、53頁）。

[441] 江藤淳『江藤淳著作集』第4卷、71頁。

[442] 江藤淳『江藤淳著作集』第4卷、44頁。

[443] 江藤淳『江藤淳著作集』第4卷、76頁。

[444] 江藤淳『江藤淳著作集』続3卷、31頁。

[445] 江藤淳『江藤淳著作集』続1卷、170、173頁。

[446] 江藤淳『江藤淳著作集』第4卷、137頁。

[447] 大江健三郎『セヴンティーン』、181、182頁。这名少年用从右翼团体头目那里得来的钱去红灯区，让“头发漂染成黄色的身材火辣的姑娘”像“奴隶”一样服

侍自己，享受着“激烈的性高潮所带来的快感”，并产生幻觉看到金光闪闪的天皇在黯黑的空中飘浮的幻影（第180页）。考虑到“美国女性”与日本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这一文字显得意味深长。

[448] 江藤淳『江藤淳著作集』続1巻、152頁。

[449] 江藤淳『江藤淳著作集』第6巻、83頁。

[450] 江藤淳『江藤淳著作集』続4巻、167頁。

[451] 江藤淳『江藤淳著作集』第4巻、140、141頁。

[452] 江藤淳『江藤淳著作集』第6巻、141頁；江藤淳『日本と私』福田和也編『江藤淳コレクション』第2巻、330頁。

[453] 江藤淳『江藤淳著作集』第6巻、35、72頁。

[454] 江藤淳『江藤淳著作集』第6巻、72頁。

[455] 江藤淳『江藤淳著作集』第6巻、72頁。

[456] 江藤淳『江藤淳著作集』続1巻、173、177頁。

[457] 江藤淳『江藤淳著作集』続1巻、156頁。

[458] 江藤淳『江藤淳著作集』第6巻、86頁；江藤淳『日本と私』福田和也編『江藤淳コレクション』第2巻、371、370頁。

[459] 江藤淳『江藤淳著作集』第4巻、70、71頁。关于这里的“母亲”需要补充一下，据江藤所写的内容，这名第二代意大利裔医生，与一名爱尔兰裔女性结婚，两人双双加入贵格会。妻子为了躲开当医生的母亲，要求到其他房间里吃饭。丈夫因为这样做“背叛了母亲”而苦于“罪恶感的纠缠”，经常“一个人抱着狗，在停在外面的自己的车里过夜。的确，他在那时所爱的只有自己的狗”（『江藤淳著作集』第4巻、71頁）。此外，江藤《日本与我》中，将父亲的爱形容为“反而更加接近母爱”，并写道：“父亲好像没有为我有了一个‘自己的家’而高兴，对于我的结婚也没有表现出喜悦。这并不是针对我的妻子，毫无疑问，无论我与谁结婚，父亲都不会高兴。父亲不允许我追求自由和幸福，但并不是出于憎恨，而是因为过于爱我。……为什么父亲对我紧追不放到了我不得不拒绝的程度呢？”“那是因为我结婚对父亲来说是一种背叛。然而即便作‘恶’，我也必须有自己的人生。但当我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好不容易建立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家时，却发现‘家庭’开始微妙地变得淡薄了。”（『江藤淳著作集』第4卷、439—440頁）

[460] 江藤淳『江藤淳著作集』第6卷、97頁。

[461] 江藤淳『江藤淳著作集』続1卷、127、128、139頁。江藤在1972年批判道：“农村大米的减产，如同城市中阳光和水量的下降”，并主张“只要水稻栽种能够继续下去，日本就可以维持有机持续性，日本人也可以继续做日本人”（『江藤淳著作集』続3卷、76、77頁）。当然，江藤是城市中产阶级出身，从未从事过农业。

[462] 江藤淳『江藤淳著作集』続1卷、221、221—222、211、223頁。江藤在《战后与我》一文中，关于基督徒岳母写道：“如果说我家中有谁在战后获益，感觉自己‘解放’了的话，那可能就是我的岳母了。”（『江藤淳著作集』続1卷、217頁）

[463] 江藤淳『江藤淳著作集』続1卷、139—140頁。

[464] 江藤淳『江藤淳著作集』続1卷、143頁。

[465] 江藤淳『日本と私』福田和也編『江藤淳コレクション』第2卷、368、352頁。江藤在这本书中记述道：他和妻子从美国回国后不断更换住所，后来买下了妻子找到的一处公寓，作为开始“定居”生活之前的过渡。然而靠写作为生的江藤收入并不稳定，因此当他为购买公寓从银行贷款时，只得低头去请父亲做担保人。他在此后所写的《成熟与丧失》中说道：“他不能从现实的父亲那里得到‘治者’的权威，他在某种意志之下停止了漂泊扎根定居下来，不是因为发现了定居的意义，而仅仅是出于对‘突然失去’和世界毁灭的恐惧。这种‘恐惧’使他成熟，成为‘能够应付一切’的一家之主，这恐怕是为了成为与父亲相反的那类人而做出的消极努力。”（『江藤淳著作集』続1卷、143頁）

[466] 江藤淳『フロラ·フロラスと少年の物語』、15頁。

[467] 江藤淳『江藤淳著作集』第1卷、25頁。

[468] 柄谷行人·福田和也「江藤淳と死の欲動」『文学界』1999年11月号、36頁。

[469] 江藤淳『江藤淳著作集』続3卷、69、68頁。不过，江藤在书中写道，“这种渴望，使得核心家庭中的父亲变成了家里的第三个‘孩子’”，接着又说：“然而现代日本社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妻子=母亲的模式早就不再是一种安定的象征，它潜藏着只是妻子和母亲自身不安的事实。”

[470] 江藤淳『江藤淳著作集』続3巻、124、125、126、131、132、133—134、135頁。本书第十六章中将会详述的小田实，他在1968年2月的「人間·ある個人的考察」（『資料 「べ平連」運動』上巻）一文中已经论述了“同一性”的问题。因此，即使江藤在「『ごっこ』の世界が終わったとき」一文中很早就使用了“自我同一性”一词，也不是最早的。

[471] 江藤淳『一族再会』、40頁。在这部著作中，父亲和岳母重新组建的家庭被认为是“人为构筑的秩序”（第46页）。江藤也在《成熟与丧失》一书中，将小岛信夫的《拥抱家族》中所描写的不想成为母亲的女性眼中的家庭称作是一种与“自然”相对的“人为构筑的秩序”。当然，在江藤所认为的“人为构筑的秩序”其实几乎就是“虚构”的同义词。

[472] 江藤淳『江藤淳著作集』第6巻、75頁。

[473] 江藤淳『江藤淳著作集』続3巻、125頁。

[474] 江藤淳『江藤淳著作集』続2巻、196頁。

[475] 江藤淳·大江健三郎「現代をどう生きるか」『群像』1968年1月号、159、169頁。

[476] 府川紀子「可哀相な、おじさま」『文芸春秋』第9号、1999年、281頁。

[477] 关于鹤见俊辅的研究，除了『鶴見俊輔著作集』（筑摩書房、1975—1976）各卷中的解说外，还有菅孝行『鶴見俊輔論』（第三文明社、1980）、上原隆『「普通の人」の哲学』（毎日新聞社、1990）、新藤謙『ぼくは悪人——少年鶴見俊輔』（東邦出版、1994）等，但作为研究著作应属原田達『鶴見俊輔と希望の社会学』（世界思想社、2001）内容最为丰富。此外还有オルソン『アンビヴァレント·モダーンズ』、米原謙『日本的「近代」への問い』、木村倫幸1996年以来的一系列论文（『奈良工業高等専門学校研究紀要』第32—36号；『季報唯物論研究』第64、66号）等。关于小田实的研究，有论述其在美国期间经历的阿川尚之『アメリカが見つかりましたか（戦後編）』、桜井哲夫『アメリカはなぜ嫌われるのか』，还有清水三喜雄「小田実論」『民主文学』（第152号、1978年）等文章，却没有正式的研究类著作。没有单独以越平联为对象的论著，但有诸如トーマス·R.H.ヘイブンズ（吉川勇一訳）『海の向うの火事——ベトナム戦争と日本1965—1975』（筑摩書房、1990）、吉川勇一「市民運動の宿題」（思想の科学社、1991）等各种回忆录性质的著述。此外，吉川还创建了一个记录越平联活动的网页（www.jca.ax.apc.org./beheiren/），上面介绍了各种相关资料和著作。

总体而言，不仅是小田几乎没有相关研究，鹤见也是如此，目前为止与二人相关的研究几乎只倾向于就其某一个论点、主张进行论述，并未尝试弄清他们因战争经历而形成的根本思想。原田達『鶴見俊輔と希望の社会学』也似乎只是将鹤见的视角看作“知性的受虐狂”，而倾向于过分将鹤见的思想形成要因归结为他的少年时期（与母亲的关系、家庭环境、社会资本等）。鹤见在战后知识分子中也是最重视战争经历的人之一，他敢于公开谈论一些通常难以启齿的丑恶的战争经历。笔者认为，即使鹤见的思想形成受其少年时期的影响很大，决定其战后方向的也是战争经历。

本章将有关越平联活动的论述维持在了最低程度，因此对于那些深知越平联活动及其具体情况，以及成员在1970年代以后的当事者而言，本章的论述或许有些过于粗略或缺乏新意。并且，本章也没有涉及小田在1960年代以后的作家活动及围绕其1969年小说『冷え物』的歧视性论争。本章的研究对象，是鹤见与小田的民族主义，他们与“公”有关的思想的发展变化，以及他们的思想与越平联（尤其是初期）活动之间的相关性。

[478] 鶴見俊輔『鶴見俊輔著作集』第5巻、366頁。

[479] 鶴見俊輔『期待と回想』上巻、晶文社、1997、91頁。

[480] 鶴見俊輔『鶴見俊輔著作集』第3巻、118頁。

[481] 岡部伊都子『思いやりの人』鶴見俊輔『鶴見俊輔著作集』第1巻、月報、3頁。

[482] 鶴見俊輔『鶴見俊輔著作集』第5巻、369頁。

[483] 鶴見和子「おなじ母のもとで」『鶴見俊輔集』第12巻、月報、筑摩書房、1991—。关于鹤见留美期间的活动，オルソン『アンビヴァレント·モダーンズ』一书中有详述。以下注中的『鶴見俊輔集』即为1990年代出版，『鶴見俊輔著作集』即为1970年代出版之文献。

[484] 鶴見俊輔『期待と回想』上巻、48頁。

[485] 鶴見俊輔「牢獄から見たアメリカ合州国」『鶴見俊輔集』第11巻、507頁；鶴見俊輔『鶴見俊輔著作集』第3巻、3頁。

[486] 鶴見俊輔『期待と回想』上巻、105頁。该书中记载，鹤见面对回国原因中是否包括“对于同胞的内疚”这一问题回答道：“所谓同胞不是日本国民，也不是国

家。”

[487] 鶴見俊輔「牢獄から見たアメリカ合衆国」『鶴見俊輔集』第11巻、490頁；オルソン『アンビヴァレント·モダーンズ』、184頁。

[488] 以下鹤见在交换船上的逸闻引自「交換船の地球半周」『鶴見俊輔集』第11巻，第500、505、506、507页。

[489] 鶴見俊輔『鶴見俊輔著作集』第3巻、438、119頁。关于“百年战争”标语的故事，见後藤繁雄『独特対談』（リトル·モア、1998），第282页。

[490] 鶴見俊輔「手帖の中のドイツとジャワ」『鶴見俊輔集』第11巻、507、508頁。

[491] 鶴見俊輔『鶴見俊輔著作集』第3巻、335頁。

[492] 鶴見俊輔『鶴見俊輔著作集』第3巻、117頁。

[493] 鶴見俊輔『鶴見俊輔著作集』第3巻、118頁。

[494] 吉本隆明『吉本隆明全著作集』第14巻、476頁。吉本的回答见下页。

[495] 具体经过见鶴見俊輔「手帖の中のドイツとジャワ」『鶴見俊輔集』第11巻，第509页；鶴見俊輔「戦争中にいた場」『思想の科学』1959年8月号、55頁。

[496] 鶴見俊輔「戦争のくれた字引き」『鶴見俊輔著作集』第5巻、467、470、472頁。记述是根据2002年4月对鹤见访谈的内容，在第6版发行时做出的修订。

[497] 鶴見俊輔「手帖の中のドイツとジャワ」『鶴見俊輔集』第11巻、512、514頁；鶴見俊輔「戦争中にいた場所」『思想の科学』1959年8月号、55頁。

[498] 鶴見俊輔『私の地平線の上に』潮出版、1975、95頁。

[499] 鶴見俊輔『鶴見俊輔著作集』第4巻、294、295頁。在这篇文章中，他提到电影中少年飞行兵那坚毅的表情让他既欣喜又难过，“落雷以照亮天地的光芒和之后的巨响及振动的双重方式唤醒我们”（第193页）。另一方面，『鶴見俊輔著作集』第5巻的「私の母」一文中，他把母亲的呵斥形容为“闪电之后必然是一个接着一个的惊雷，直到我做出检讨”，并将母亲的诚实评价为“我并不认为只要诚心诚意

什么事情到最后都会得到原谅，但那对我来说却是精神的家园”（第366、369页）。

[500] 鶴見俊輔「手帖の中のドイツとジャワ」『鶴見俊輔集』第11巻、514頁。

[501] 鶴見俊輔「近代とは何だろうか」『鶴見俊輔座談』第4巻、31頁；鶴見俊輔『期待と回想』下巻、31頁。

[502] 鶴見俊輔『期待と回想』下巻、180頁。

[503] “毛唐”用来称呼毛发不同的人，即外国人。——译者注

[504] 鶴見俊輔『鶴見俊輔著作集』第3巻、336頁。这里援引了弗洛伊德“施虐与受虐性格”理论进行论述。当1990年代“从军慰安妇”问题受到广泛关注时，鹤见作为“亚洲女性基金”的发起人而受到批判。在『期待と回想』下巻第231页中，鹤见把针对自己的批判者比作攻击吉野作造的东大新人会那样“思想僵硬”的人（鹤见对“吉野作造”和“大正民主主义”的定位，参见第545页注1）。此外，鹤见在该书下卷第233—234页中对“慰安所”的论述，可看出其战争经历的复杂性：

慰安所是一个日本对包括本国女性在内的亚洲女性进行凌辱的地方。我想承认这一点并谢罪，同时还有一些话要讲。

我曾经是一名不良少年，因此战争期间并未去军队慰安所睡过女人。小时候就体验过男女关系的人有种骄傲，是不会去那种作为一种制度而设立的慰安所的。然而，18岁左右非常正经的少年，在得知自己再也不能从战场回到日本后，就在当地抱着40岁的慰安妇，寻求仅仅一小时的慰藉，并对此十分感激。这是真实的事情。这一个小时有着很大的意义。

我认为那就是爱。也许因为我曾是不良少年，所以才会那么想吧。但我自己绝不会这么做，这一点我要讲清楚。

[505] 关于在爪哇岛时期的回忆，见鶴見俊輔「戦争のくれた字引き」『鶴見俊輔著作集』第5巻，第477、468、469页。

[506] 鶴見俊輔「戦争責任の問題」『鶴見俊輔著作集』第5巻、43頁。巣鴨遺書編纂会編纂·発行『世紀の遺書』（1953、講談社復刻版、1984）中收录的哪封遗书是鹤见友人的，尚无法确认。

[507] 鶴見俊輔「戦争のくれた字引き」『鶴見俊輔著作集』第5巻、477頁。

[508] 鶴見俊輔「根もとからの民主主義」『鶴見俊輔著作集』第5巻、44、45

頁；鶴見俊輔「ことばのお守り的使用法について」『思想の科学』1946年5月号、19頁。由于与『鶴見俊輔著作集』第3巻中的版本在内容上略有出入，在此引用最初发表时的版本。

[509] 正式书名为《山间学校——山形县山元村中学学生生活记录》。——译者注

[510] 鶴見俊輔『鶴見俊輔著作集』第1巻、254、245頁。

[511] 鶴見俊輔「戦争のくれた字引き」『鶴見俊輔著作集』第5巻、480頁。

[512] 鶴見俊輔「交換船の地球半周」『鶴見俊輔集』第11巻、500、501頁。除了这次战时经历之外，少年时期的厌学也是导致鹤见形成“同情”思想的主要经历。根据1968年的「丘浅次郎」一文，鹤见中学退学，而其他同学则全部顺利升学，当他感觉好像只有自己被抛弃了的时候，便开始每天埋首阅读丘浅次郎的『進化論講話』及『猿の群れから共和国へ』等书。于是便想到学校不过是人类进化过程中出现的一个制度，无论适应学校生活的人，还是不适应的人，从普遍性人类的观点来看彼此相差甚微，有一种“昏暗的屋子里突然打开了窗户”的感觉（『鶴見俊輔著作集』第2巻、376頁）。“打开了窗户”这一说法，与本章引用的关于媒介的文章中的“关上了的箱子”是形成对比的，鹤见经常使用这说一法。

[513] 鶴見俊輔『鶴見俊輔著作集』第3巻、323頁。

[514] 鶴見俊輔『鶴見俊輔著作集』第4巻、41頁。

[515] 鹤见在1969年的「日本の思想用語」一文中提出，“一个民族的语言在这个民族产生阶级之前就形成了固定的语法与单词，所以其语言主要部分的日常语言，并没有作为某一阶级或某一职业内部的语言而产生分裂”，并极力主张通过使用日常语言将哲学大众化。

[516] Edwin Oldfather Reischauer，美国著名东方学研究者。——译者注

[517] 教科书编写的经过请参见「芦田恵之助」（『鶴見俊輔著作集』第2巻、1971）。据鹤见称，日美开战后，美军以这本日语教科书为主要教材，开设了日语速成班。在编写这本教科书时，鹤见所参考的，是以战前倡导并参与“生活写作”运动而知名的教师芦田惠之助在朝鲜总督府工作期间编写的面向朝鲜人的日语教科书。但总的来说，鹤见对殖民地统治的罪恶感在1960年代末还不是十分强烈，在1960年的「日本の折衷主義」一文中，鹤见就是以肯定的态度，引用后藤新平担任

台湾总督府时的部下新渡户稻造在『糖業意見書』中提出强制种植甘蔗一事的（『鶴見俊輔著作集』第3巻、130頁）。

[518] 鶴見俊輔「ベイシック英語の背景」『鶴見俊輔著作集』第1巻、1946。

[519] 鶴見俊輔『鶴見俊輔著作集』第1巻、355頁。据鹤见回忆，他在哈佛大学修过“语言的心理生理学”这门课（鶴見俊輔『期待と回想』上巻、32頁）。而且，在1971年的「日本人の心にうつった世界諸民族」一文中，鹤见对艾弗拉姆·诺姆·乔姆斯基（Avram Noam Chomsky）的学说表示赞同，并认为这种学说“与柏拉图、笛卡尔、莱布尼茨、皮尔士等人的主张属于同一谱系”（『鶴見俊輔著作集』第2巻、329頁）。此外，鹤见来到美国时完全不懂英语，但在一次住院经历后英语水平突然提高了很多，因此当他读到乔姆斯基的理论时不由得产生了共鸣（鶴見俊輔『期待と回想』上巻、21頁）。

不过，对于纯粹抽象与普遍理论的混合体的“几何学”，鹤见却似乎有着矛盾的看法。在他身患抑郁症期间的1951年写下的「苔のある日記」中同时存在两句话，即“我讨厌软绵绵的状态，我想达到更有棱角的状态”和“几何学毫无趣味。不掌握这门学问，是否真的无法理解更高的学问呢？”（『鶴見俊輔著作集』第5巻、458、459頁）

鹤见曾三次患抑郁症，即他决定退学的少年时期，包括他父亲在内的很多人被撤销开除公职处分的1951年，以及他在安保斗争后辞去东京工业大学副教授一职的1960年。鹤见认为，“抑郁就像无形的妖怪……无论如何也要将其变回哪怕是果冻状的固体，为此也曾用诸如‘早上八点起床’这种无意义的规矩来要求自己”。“我想关闭掉意义，意义的判断我已经厌烦了。让我练习练习画线就放过我吧。逻辑的形式化……若不拒绝意义的话，自己就无法站起来。……可是却也无法经受住意义的洪水”（鶴見俊輔『期待と回想』上巻、96頁）。对赋予现实世界的“事物”以轮廓的“框架”的反抗与对“框架”崩溃后发生的“意义的洪水”的恐惧，可以说这就是鹤见心中最基本的矛盾。由此，鹤见开始倾向于所谓“划线”的几何学和逻辑实证主义，并对“超越国界走向世界”的“大众”产生了兴趣。

这种“意义世界崩塌的感觉”在小田实和江藤淳等人身上也可以看到。然而对于国家这个“框架”，鹤见及小田的表现与江藤有着很大区别。如本书所述，江藤通过依靠“三百万日本死者”这一抽象概念来消除不安，而鹤见和小田则由于记得一些有名有姓的死者而无法做到这一点，这就是双方的不同。

[520] 鶴見俊輔『鶴見俊輔著作集』第1巻、255頁。

[521] 鶴見俊輔『鶴見俊輔著作集』第4巻、212頁。

[522] 鶴見俊輔『鶴見俊輔著作集』第4巻、213頁。

[523] 鶴見俊輔『鶴見俊輔著作集』第3巻、331頁。

[524] 丸山眞男『丸山眞男集』第10巻、359—360頁。当时丸山真男仍是将“世界主义”一词作为褒义来使用。

[525] 鶴見俊輔「戦後の次の時代が見失ったもの」『鶴見俊輔著作集』第9巻、285、284頁。鹤见最初似乎并没有完全理解自己所说的“日本大众”的意思。1967年的『日常的思想の可能性』一书，原本是打算以『日本的思想の可能性』为题的。然而，当鹤见向丸山真男提出这一想法后，丸山却回应道：“这恐怕不行吧”，“你告诉我的一切都是日常思想啊”，鹤见因此最终更改了标题（鶴見俊輔『期待と回想』上巻、190頁）。该书下卷第40页写道：“丸山先生那样的思想史家，甚至可以比本人更加了解其思想。”“现在来看，果然如丸山先生所说，确实存在从日常举止慢慢超越国境而走向国际的人。我想赌一赌。”如本书一直论述的那样，不仅是鹤见，1967年是一个言论结构整体发生变动的时期，也可以将鹤见的变化理解为这一变动中的一部分。

[526] 鹤见在1950年的『アメリカ哲学』中，把日本大众作家佐佐木邦当作日本版的实用主义，并以“小市民的哲学”作为小标题。据鹤见本人称，作为“多重意义叠加法”的漫画，是以“多义性（即一种符号中有两种以上意义共存的状态）为特征的交流方式。擅长使用这种方式的高手，都是兴趣构造本质上呈现二重性的小市民阶级出身”（『鶴見俊輔著作集』第1巻、287頁）。也就是说，“市民”是不能完全使用马克思主义所描绘的“劳动者”与“资本家”之间的对立关系来理解的“暧昧性”之象征。在「ベイシック英語の背景」一文中，鹤见能够避免“多义词使用时的含糊”作为解释基础英语功能的例子（『鶴見俊輔著作集』第1巻、324頁）。可以说，这里就能体现出鹤见“纯粹”取向和“暧昧”取向之间的矛盾性。
因此，关于“市民”一词，1956年思想的科学研究会举行的一次题为“关于战争责任”的讨论中，一方面对战前及战时转向的保守政治家和马克思主义者进行了批判，另一方面指出“市民社会的商业往来过于均质化”，并强调“个人胸怀”的重要性。这里使用“市民”一词是出于“纯粹”志向，但1960年安保斗争以后，鹤见的“市民”与“大众”几乎成为同义，并基本定型下来（『思想の科学』研究会総会討論「戦争責任について」『思想の科学会報』1957年3月20日、『思想の科学会報』復刻版上巻、柏書房、1982、37頁）。

[527] 久野収·藤田省三·鶴見俊輔『戦後日本の思想』、277、284頁。

[528] 鶴見俊輔『鶴見俊輔著作集』第5巻、4、5頁。根据『鶴見俊輔座談』的宣传册上刊载的鹤见讲话内容，他在战败后不久曾拜访若槻礼次郎，若槻当时仅穿了一条日式内裤，并对他说："我是一个不知道父母是谁的弃儿"，"战争期间不能喝两口，这可把我憋坏了"。这样的坦诚让鹤见十分感动，他表示："肯与刚刚十来岁的我打交道，并没有被战争的恐惧所束缚的人，现在就在我面前。""生于日本国草创之期，为国家之变革奋斗一生，与日本政府在战时造就的'日本人'截然不同的人，就在我的面前。"或许是由于鹤见生长在政治家的家庭，他对政治十分关注，尤其对兼具灵活性和一贯性的政治家抱有好感。可以说，这就是他高度评价若槻以及吉田茂、石桥湛山等保守政治家的原因所在。

[529] 鶴見俊輔『鶴見俊輔著作集』第1巻、177、178頁。

[530] 鶴見俊輔『鶴見俊輔著作集』第2巻、369頁。

[531] 鹤见的这一宗教特点，与对大众文化一起，被参加思想的科学研究会的社会学家见田宗介继承下来。不过鹤见对宗教的兴趣，还与其母由于过于担心儿子的不良行为进而信仰了天理教和基督教，以及其父亲和妹妹都是基督教徒这一背景有关系。鹤见曾表示："即使被很多基督教徒（亲人们）包围着，我也因深信狸子而不为之所动摇。我认为基督教也就是新教派生出来的最新流派就是马克思主义，所以也绝不会为马克思主义所动。这一认识从十五岁至今就一直没有改变，那就是作为恶人的自我定位。"（鶴見俊輔『期待と回想』上巻、246頁）然而鹤见在该书中一方面对将为思想殉葬之人视为纯粹至极的运动方针加以批判，另一方面又写道："'看！他被杀了！'我认为这是基督教造成的。掌握权威的宗教这样弄虚作假，才会令我厌恶。我想用漫画的风格与其对抗，那才是带有宗教性的。"（鶴見俊輔『期待と回想』下巻、231頁）这种基督教观和吉田隆明相似，但将"狸子"、"漫画"作为对抗手段则是鹤见的特色。

[532] 花田清輝·岡本潤·吉本隆明「芸術運動の今日的課題」、6頁；鶴見俊輔『鶴見俊輔著作集』第5巻、19頁。鹤见主张"语言首先应作为比其更为宽泛的表达活动过程中的一小部分"，并十分重视推动"生活作文运动"的芦田惠之助"将人与人之间一切的交流视为语言教育的素材"的做法，以及从事语文教师工作的芦田的弟子转而从事体操教育的做法（鶴見俊輔「言語の本質」『鶴見俊輔著作集』第1巻、354頁）。

[533] 鶴見俊輔『鶴見俊輔著作集』第1巻、247頁。

[534] 鶴見俊輔「折衷主義としてのプラグマティズムの方法」『鶴見俊輔著作

集』第1卷、287頁。但鹤见并没有将这种“大众”一词意义的多重叠加赞美为“民众的抵抗”。1959年，他在谈到战争时期的俏皮话等问题时说道：“那些被历史学家当作抵抗的证据的，与其说是抵抗，不如说是创作精神。”（久野収·藤田省三·鶴見俊輔『戦後日本の思想』、275頁）在鹤见看来，重新解读这一行为本身是值得肯定的，而根据党派立场对这种重新解读进行“打分”则是不好的。

[535] 鶴見俊輔『鶴見俊輔著作集』第3卷、208、209頁。

[536] 鶴見俊輔『鶴見俊輔著作集』第3卷、119頁。

[537] 鶴見俊輔「私の戦中·戦後から」『ちくま』第5号、1975年。该文后收录在鶴見俊輔『戦争体験』（ミネルヴァ書房、1980）。引用为第10—11页。

[538] 鶴見俊輔『鶴見俊輔著作集』第4卷、291頁。他在文中主张：“幼年时期才是我们性格基础形成的时期。”鹤见认为，人类能够驱使的基本概念，是通过幼年时期习得的日常用语和大众文化的语言形成的。之后形成的思想不过是在此基础上的嫁接。他本人同样如此，虽然在美国学过实用主义，却是将杜威和桑塔亚那等人的理论，作为与自己幼年时期喜爱的『旗本退屈男』和『苦心の学友』这类大众小说的通俗道德类似的东西加以理解（『鶴見俊輔著作集』第4卷、90頁）。正是出于这种将“根底”与“少年时期”等同视之的观点，他才会在解释自己的思想形成时强调母亲的影响。

[539] 鶴見俊輔『鶴見俊輔著作集』第3卷、429頁。

[540] 鶴見俊輔『鶴見俊輔著作集』第1卷、169頁。

[541] 吉本隆明『吉本隆明全集』第14卷、476、477頁。这里先谈一下鹤见的“大众”及“根底”与“性”之间的关系。鹤见虽然在战争时期坚决不与女性交往，却对当地的少女罗姆以及负责事务职员等几名女性有着深刻的印象（鶴見俊輔「手帖のなかのドイツとジャワ」『鶴見俊輔集』第11卷）。鹤见承认，“我感觉自己对女性的兴趣，明显与国家是对立的。sex vs. state是我的基本方程式，我不想以国家做担保的方式来解放自己对女性的兴趣”。“只要穿着这身让人不自在的制服，对我来说，重新直面快乐，就是办不到的。”（鶴見俊輔「戦争のくれた字引き」『鶴見俊輔著作集』第5卷、477頁）
1970年代，鹤见对山上龙彦的漫画『がきデカ』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漫画的主人公是个不良少年，并且喜欢用一些性方面的笑话来反抗女教师的管教。然而鹤见在1984年这样写道：“他是个很胖的营养过剩的小学生，他的兴趣集中于金钱和性。他对学校的学习完全不感兴趣。他把自己想成了只有小学生年龄的唯一一名少年警

察，主要出于对金钱和性的兴趣，监视着同龄的其他孩子。他非常没有责任心，正如现在的日本对东南亚各国贪婪地倾销着各类商品一样。”（鶴見俊輔『戦後日本の大衆文化史』岩波書店、1984、96頁）“性”和“东南亚”对于鹤见而言是什么，应该也可以作为一个主题。

[542] 鶴見俊輔『期待と回想』上巻、171頁。

[543] 鶴見俊輔『鶴見俊輔著作集』第1巻、165頁。工团主义即工联主义。——译者注

[544] 鶴見俊輔『鶴見俊輔著作集』第1巻、165頁。

[545] 『思想の科学』研究会総会討論「戦争責任について」、37頁。

[546] 鶴見俊輔『鶴見俊輔著作集』第1巻、170頁；第5巻、19頁。根据鹤见的回忆，1948年2月前后，由于日本共产党介入了《思想的科学》的编辑工作，自己有一段时间对杂志编纂工作失去了信心。而同为编辑的武谷三男尽管是马克思主义者，却主张“创办非马克思主义清一色的杂志才有意义”，这才打消了鹤见想要解散的念头（『鶴見俊輔著作集』第2巻、457頁）。

[547] 鶴見俊輔「戦争中にいた場所」『思想の科学』1959年8月号、57頁。鹤见认为，即使舆论调查的结果显示影响为零，如果“继续深入地调查的话结果仍未可知”（鶴見俊輔『期待と回想』上巻、237頁）。这种将“大众”与统计数据上的多数相区别的看法，给人一种与卢梭的“一般意志”相似的印象。实际上，鹤见在1951年所著『ルソーの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論』（《卢梭的交流论》）中，从18世纪法国的沙龙对话、出版状况、音乐、教育、庆祝仪式等多方面，论述了人类个体间通过多样化手段进行的交流（『鶴見俊輔著作集』第1巻）。

[548] 鶴見俊輔『鶴見俊輔著作集』第5巻、18—19頁。

[549] 鶴見俊輔「戦争中にいた場所」『思想の科学』1959年8月号、59頁。

[550] 久野収·藤田省三·鶴見俊輔『戦後日本の思想』、273頁。

[551] 鶴見俊輔『鶴見俊輔著作集』第5巻、18頁。

[552] 鶴見俊輔『鶴見俊輔著作集』第5巻、45頁。

[553] 鶴見俊輔『鶴見俊輔著作集』第5巻、18頁。

[554] 鶴見俊輔「日本思想の言语」、「戦後の次の時代が見失ったもの」等。

[555] 鶴見俊輔『鶴見俊輔著作集』第5卷、7頁。

[556] 鶴見俊輔『鶴見俊輔著作集』第5卷、3頁。

[557] 鶴見俊輔『鶴見俊輔著作集』第3卷、194頁。

[558] 鶴見俊輔『鶴見俊輔著作集』第3卷、318頁。

[559] 鶴見俊輔『鶴見俊輔著作集』第4卷、289頁。在这篇评论中，鹤见表示希望反映战争死者的“凄惨”的妖怪在音乐伴奏下“进化”成狸子的荒诞。鹤见从1950年代至1960年代，作为大众文化研究的一环，经常论及怪谈题材的电影与漫画。他在1969年评论水木茂的妖怪漫画时提出，在拉包尔的战斗中失去一只手臂的水木，通过热带雨林中的生活体验而感悟到“文明以前的回忆和死后世界的交流”，这是水木漫画的活力所在（鶴見俊輔『鶴見俊輔著作集』第4卷、345頁）。此外，他在1972年前往墨西哥时，也写下了关注社会与死者之间关系的评论。这些行为，都可以从他的宗教观跟战争经历的关系角度进行研究。

[560] 鶴見俊輔『鶴見俊輔著作集』第5卷、19頁。

[561] 鶴見俊輔『鶴見俊輔著作集』第1卷。并且鹤见高度评价了柳田国男建立起的民俗学研究圈。

[562] 鶴見俊輔『期待と回想』上卷、21頁；下卷、207頁。据鹤见俊辅称，提倡创办《思想的科学》这一刊物，是姐姐鹤见和子担心弟弟因战争的创伤而沉沦，所以恳求父亲祐辅说：“我们给他办一本杂志吧。”日本投降后，一开始和子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并没有将各种思想倾向的人集中到一起的打算，只是“出于对弟弟的同情”才做父亲工作。碰巧得知父亲祐辅所掌管的太平洋协会出版部因协助战争被问责最终停办，留下了一些机器和纸张。正是利用这些机器，《思想的科学》才得以创刊（鶴見俊輔『期待と回想』上卷、57頁）。此外，在『期待と回想』下卷204页中描述鹤见在知识分子中没有朋友，“是姐姐打点好了全部的人际关系，而他只是坐享其成”，他不服气地开始对编辑杂志充满热情是从1950年代中期开始的。话虽这么说，俊辅对研究和编辑工作满怀热情并为之努力过这一点是实实在在的。

[563] 鶴見俊輔『鶴見俊輔著作集』第5卷、43頁。

[564] 鶴見俊輔『期待と回想』下卷、212—213頁。因为第一阶段（1946年5月至1951年4月）后期《思想的科学》的销售量下降，鹤见俊辅曾去找丸山真男商量，

丸山提出了创办读者会的建议。鹤见认为，丸山之所以提出这个想法，是因为他将追求被称为“看不见的大学”的英国皇家学会那样的民间学术团体作为理想。鹤见在「百科全書における人間関係」一文的开头，也将英国皇家学会作为组织论的例子举了出来。

[565] 久野収·藤田省三·鶴見俊輔『戦後日本の思想』、163—164頁；鶴見俊輔『鶴見俊輔著作集』第2巻、268頁。

[566] 《青鳉鱼的学校》是日本的一首童谣。——译者注

[567] 鶴見俊輔「七五調から散文精神へ」『資料 「ベ平連」運動』下巻、475頁。

[568] 鶴見俊輔『鶴見俊輔著作集』第2巻、313頁。

[569] 本页所引内容，分别见鶴見俊輔『鶴見俊輔著作集』第5巻，第49、47、45、46、50、51页。

[570] 1959年鹤见对重视私生活的“欲望自然主义者”进行了批评。鹤见提出，“那些认为除存够钱后建立美满的家庭外一切都不重要，而将与自己不同意见的人视为伪善者”的人就是“欲望自然主义者”，“必须用某种方式打倒或改造欲望自然主义者”（久野収·藤田省三·鶴見俊輔『戦後日本の思想』、180頁）。

[571] 鶴見俊輔『鶴見俊輔著作集』第5巻、58頁。

[572] “声声の会”（无声之声会）发行的杂志『声なき声のたより』1961年8月号中的「政防法反対市民会議（仮称）結成の呼びかけ」一文（收录于高畠通敏編『日常の思想』），列举了三点该“市民会议”的原则：“当前以组织政防法通过为目的，无论成功与否，当局面告一段落后即解散”、“本参加者以个人名义加入本‘会议’（暂定称呼），平等分担责任”、“本‘会议’（暂定称呼）将负责任地策划市民组织政防法通过的运动，同时还将时刻确保将运动内容及参加者的责任范围告知各位参加者，并努力协调运动中领导与自发之间的关系”。毫无疑问，这些原则后来被越平联继承下来。
另外，市川白弦在其发表于『声なき声のたより』1968年5月号上的「『英霊』の個人原理を」一文中，引用前述《世纪的遗书》一书中朝鲜乙、丙级死刑战犯的话，即“那个世界里应该没有所谓朝鲜人和日本人的区别”（高畠通敏編『日常の思想』、267頁）。由此可以确定，越平联的理论是1950年代的社团运动和1960年代前半期的“无声之声之会”的理论的延伸，而非“突然变异”。

[573] 小田実『小田実全仕事』第8巻、71頁。

[574] 眞継伸彦『小田実の啓示』、413、423頁。

[575] 小田実『小田実全仕事』第8巻、64頁。

[576] 小田実『小田実全仕事』第8巻、65—66頁。

[577] 小田実『小田実全仕事』第7巻、150頁。

[578] 小田実『「ベ平連」·回顧録でない回顧』、494頁。

[579] 小田実『「ベ平連」·回顧録でない回顧』、494頁。

[580] 小田実『「ベ平連」·回顧録でない回顧』、493頁。

[581] 小田実『小田実全仕事』第8巻、64頁。

[582] 小田実『小田実全仕事』第8巻、42頁。

[583] 小田実『小田実全仕事』第8巻、78頁。

[584] 小田実『小田実全仕事』第8巻、61頁。

[585] 小田実『小田実全仕事』第8巻、129頁。

[586] 小田実『小田実全仕事』第1巻、92頁。

[587] 眞継伸彦『変革の思想を問う』、422、423頁。

[588] 小田実『小田実全仕事』第6巻、7頁。

[589] 小田実『小田実全仕事』第7巻、167頁。

[590] 小田実『小田実全仕事』第7巻、153頁。

[591] 小田実『小田実全仕事』第7巻、175頁。

[592] 小田実『小田実全仕事』第7巻、171頁。

[593] 小田実『小田実全仕事』第8巻、127、131頁。

[594] 小田実『小田実全仕事』第6巻、34、35頁；第7巻、171頁。

[595] 小田実『小田実全仕事』第7巻、155、156頁。

[596] 小田実『小田実全仕事』第8巻、74、75頁。

[597] 小田実『小田実全仕事』第6巻、229頁。

[598] 小田実『小田実全仕事』第6巻、228、229頁。

[599] 小田実『小田実全仕事』第7巻、57、43頁。

[600] 小田実『小田実全仕事』第6巻、227頁。

[601] 小田実『小田実全仕事』第6巻、241頁。

[602] 小田実「ことは始まったばかりだ」一文中提到了他的这种靖国观（『資料 「ベ平連」運動』下巻）。

[603] 小田実『小田実全仕事』第8巻、126頁。

[604] 小田実『小田実全仕事』第7巻、40、63頁；小田実『「ベ平連」·回顧録でない回顧』、33頁。

[605] 小田実『「ベ平連」·回顧録でない回顧』、33頁。

[606] 小田実『小田実全仕事』第7巻、209、243頁。

[607] 小田実『小田実全仕事』第7巻、264頁。

[608] 小田実『小田実全仕事』第8巻、76頁。在这一时期的评论中，小田对安冈章太郎的《美国感情旅行》提出了批判，认为安冈从坐上飞往美国的飞机那一刻起，就变成了“平均化了的日本人”，“并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人来承担责任，而是作为日本人的代表来承担责任”，“或许对所有的事情都要承担责任，反而是不负责任的典型”（『小田実全仕事』第7巻、83、93、92頁）。一般认为，他的这种批判“不负责任地把责任普遍扩大化”的倾向，对后来越平联运动中避免口号的无针对化产生了影响。

[609] 小田実『小田実全仕事』第8巻、98頁。

[610] 小田実『小田実全仕事』第8巻、99頁。

[611] 小田実『小田実全仕事』第8巻、99頁。

[612] 小田実『小田全仕事』第8巻、99頁。小田在参加苏联举行的作家会议时，曾以该小国作为例证来批判美苏的态度（第140页）。

[613] 小田実『小田実全仕事』第8巻、49頁。

[614] 小田実『小田実全仕事』第8巻、50頁。

[615] 小田実『小田実全仕事』第8巻、50頁。

[616] 小田実『小田実全仕事』第8巻、46、66頁。

[617] 小田実『小田実全仕事』第8巻、19、29頁。

[618] 小田実『小田実全仕事』第8巻、31頁。

[619] 鶴見俊輔『鶴見俊輔著作集』第8巻、112頁。

[620] 小田実『小田実全仕事』第8巻、135頁。

[621] 小田実『小田実全仕事』第8巻、117頁。

[622] 小田実『小田実全仕事』第8巻、123、122、115頁。

[623] 小田実『小田実全仕事』第8巻、118、119頁。

[624] 小田実『小田実全仕事』第8巻、80頁。

[625] 荒正人『荒正人著作集』第1巻、35頁。

[626] 鶴見俊輔「ひとつのはじまり」『資料 「ベ平連」運動』上巻、序文、11頁。

[627] 小田実『小田実全仕事』第9巻、114、113頁。然而，鹤见似乎并未理解小田的思想，并将其推荐给越平联。鹤见写道：“无论是对于政治思想还是哲学，我最看重的是单纯度。现在的人中，我最喜欢辻元清美（‘Peace Boat’的主办者），她十分单纯。30年前的小田实也十分单纯。因为单纯，所以充满了干劲。单纯的人，其政治思想框架应该十分清晰。所以才会被作为开展运动的指导思想。”（鶴見俊輔

『期待と回想』上巻、245頁）。

[628] 鶴見俊輔「ひとつのはじまり」『資料 「ベ平連」運動』上巻、序文、12頁。

[629] 鶴見俊輔『期待と回想』下巻、217頁。正文中虽然没有进行充分的论证，但“美国”对鹤见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存在。据说，记录了他患抑郁症期间的日记『苔のある日記』，就是以1938年留学期间的日记为基础，1951年改写的“文中完全植入美国这个背景，为表达抑郁状态而写”的东西。鹤见乘交换船回国后就再也没有去过美国，无论是被邀请去演讲还是出席同学会，他都一一回绝了。关于其中的理由，鹤见解释道：“如果去了美国就会破坏自己的内在心情。我不想这样。……与我讨论究竟是否应该去美国的，是潜在于我内部的身患抑郁症的自己。但凡重要的事情基本上都是这样决定的。……对我来说，抑郁症是最可怕的东西之一。我一直都在尽一切可能，使其不再出现”（鶴見俊輔『期待と回想』上巻、96頁；鶴見俊輔『期待と回想』下巻、96—97頁）。

[630] 小田実『「ベ平連」·回顧録でない回顧』、23、26頁。

[631] 鶴見俊輔「ひとつのはじまり」『資料 「ベ平連」運動』上巻、序文、11頁小田実『「ベ平連」·回顧録でない回顧』、25頁。

[632] 「四·二十四デモへの案内」『資料 「ベ平連」運動』上巻、6頁。

[633] 吉川勇一「市民運動'68の認識」『資料 「ベ平連」運動』上巻、337頁。

[634] 吉川勇一「市民運動'68の認識」『資料 「ベ平連」運動』上巻、337頁；小田実『「ベ平連」·回顧録でない回顧』、128頁。

[635] 小田実『「ベ平連」·回顧録でない回顧』、82頁。福富发言出处同。

[636] 小田実『「ベ平連」·回顧録でない回顧』、63頁。

[637] 鶴見俊輔「すわりこみまで」『資料 「ベ平連」運動』上巻、101、99頁。鹤见还写道：“理论上，这也等于是对越共杀人行径的反对，但只是针对在美军撤退后发生的杀人事件。”

[638] 吉川勇一「連合赤軍事件と市民運動」、176頁；吉川勇一「『ベ平連』始末記」『連合赤軍「狼」たちの時代』毎日新聞社、1999。后者是在前面提到的吉川开设的主页上公开的。

[639] 小田実『「ベ平連」·回顧録でない回顧』、8頁。

[640] 『資料 「ベ平連」運動』上巻、5—9頁。

[641] 小田実『「ベ平連」·回顧録でない回顧』、27頁。

[642] 小田実「ふつうの市民にできること」『資料 「ベ平連」運動』上巻、11頁。

[643] 吉川勇一「『ベ平連』始末記」『連合赤軍「狼」たちの時代』。

[644] 本页引自小田実「ふつうの市民にできること」『資料 「ベ平連」運動』上巻、12、11、10頁。

[645] 小田実『「ベ平連」·回顧録でない回顧』、63頁；小松左京『「平均的人類」の願い』、138頁。SF即science fiction，科学小说。——译者注

[646] 小田実「世界へひらく運動を」『資料 「ベ平連」運動』上巻、14頁。

[647] 1966年8月14日签署的「日米反戦市民条約」（『資料 「ベ平連」運動』上巻、118—119頁）中列举了各种抗议的方式。

[648] 開高健「金ある人は金を、知恵ある人は知恵を」『資料 「ベ平連」運動』上巻。据说这句话是根据胡志明的话改编的。开高在这一时期的评论中写道："要是打打广告战争就能结束，那就不用如此费力了。""并不是谁都那么好心，在不景气而又利己主义的'愚昧时代'里拿出全部家财。日本人是有话要说的。""如果是过去的20年里只会口口称是的老实的日本人都开始说不的话，想必一些美国人就要想想了。"（『資料 「ベ平連」運動』上巻、62、52—53頁）

[649] 小田実「私は死がこわい」、255頁。上野千鶴子曾提出，越平联的三原则就是："①想做的人做，不想做的人不做；②想做的人不能强迫不想做的人；③不想做的人不要拖累想做的人。"（上野千鶴子『女遊び』学陽書房、1988、260頁）而小田的看法则如上所述。上野还说过，此三原则"以1960年的三井·三池斗争中谷川雁等人负责的'大正行动队'的行动原则为蓝本的"，而事实上鹤见俊辅1950年代开始，就开始提倡这一组织理论。当然，即使从鹤见"误解的权利"的思想来看，针对哪个是"正确的"哪个是"鼻祖"的讨论也是毫无意义的。

[650] 開高健「東京からの忠告」『資料 「ベ平連」運動』上巻、51頁。

[651] 鶴見良行「『米大使館前=聖域』観の打破」『資料 「べ平連」運動』上巻、259頁。

[652] 鶴見俊輔『期待と回想』上巻、98頁。

[653] 小田実『「べ平連」·回顧録でない回顧』、133頁；吉川勇一「いつ、どこで、どんなグループが、どんな活動をしていたか？」（见吉川的网站主页）。

[654] 吉川勇一「『べ平連』始末記」『連合赤軍「狼」たちの時代』。

[655] 吉川勇一「『べ平連』始末記」『連合赤軍「狼」たちの時代』；吉川勇一「米大使館と羽田デモ」『資料 「べ平連」運動』上巻、261頁。

[656] 吉川勇一『「べ平連」始末記』『連合赤軍「狼」たちの時代』；小田実『「べ平連」·回顧録でない回顧』、356頁。

[657] 松田道雄「支配の論理と抵抗の論理」『資料 「べ平連」運動』上巻、446頁。以京都越平联通讯『ベトナム通信』为背景，对“老派越平联”的批判和回答其经过可参见『復刻版ベトナム通信』（不二出版社、1990）。

[658] 鶴見俊輔『鶴見俊輔著作集』第5巻、第130頁。

[659] 吉川勇一「『べ平連』始末記」『連合赤軍「狼」たちの時代』。

[660] 小田実『小田実全仕事』第6巻、245頁。

[661] 吉川勇一「驚き方と喜び方」鶴見俊輔『鶴見俊輔著作集』第3巻、月報、3頁。

[662] 小田実「『物』と『人間』」『資料 「べ平連」運動』上巻、308頁。

[663] 小田実『「べ平連」·回顧録でない回顧』、537、539頁。鹤见此言系小田的总结。

[664] 「われわれは何故この挙に出たのか」『資料 「べ平連」運動』上巻、262頁。

[665] 吉川勇一「『べ平連』始末記」『連合赤軍「狼」たちの時代』。

[666] 吉川勇一「脱走兵とふつうの市民たち」『資料 「べ平連」運動』上巻、

270頁。

[667] 小田実「人間·ある個人的考察」『資料 「ベ平連」運動』上巻、280頁。

[668] 小田実·本多勝一「わがベトナム体験の総決算」（1973年2月対談）、『資料 「ベ平連」運動』下巻、314頁。

[669] マイケル·リンドナー「道徳に反し非人間的だった」『資料 「ベ平連」運動』上巻、266、267頁。

[670] リチャード·ベリー「わが憲法の精神に勝利あれ」『資料 「ベ平連」運動』上巻、265頁。

[671] 小田実·本多勝一「わがベトナム体験の総決算」、314頁。

[672] 小田実·本多勝一「わがベトナム体験の総決算」、315、314頁。

[673] 小田実『「ベ平連」·回顧録でない回顧』、80、81頁；小田実·本多勝一「わがベトナム体験の総決算」、314、315頁。

[674] 小松左京「『平均的人類』の願い」、140頁。

[675] 本页所引见小田实『人間·ある個人的考察』，第275、276、283页。

[676] 関谷滋·坂本良江編『となりに脱走兵がいた時代』思想の科学社、1998、26頁。关于JATEC的情况，该书中有详述。根据公开数字，通过日本被送出的美军人数为19人。镰田慧1998年对此评论道：“可能有人觉得这个数字很多，也有人觉得很少。在支持美国战争的日本政府治下，在‘老外’还不像今天这般在街上随处可见的时代，市民藏匿逃兵，从四面环海的岛国日本冒着违法的危险将其运送至国外，这其中的困难和心理斗争，想一想为了把金大中一人送往韩国就需要动用政府全部秘密机关，也就可以明白了。”『となりに脱走兵がいた時代』書評、『週刊朝日』1998年6月26日。

[677] 越平联的罗马字表记。——译者注

[678] 関谷滋·坂本良江編『となりに脱走兵がいた時代』、103頁。

[679] 「声明」『資料 「ベ平連」運動』上巻、269頁；鶴見俊輔『鶴見俊輔著作集』第5巻、164頁。

[680] 関谷滋·坂本良江編『となりに脱走兵がいた時代』、491頁。

[681] 関谷滋·坂本良江編『となりに脱走兵がいた時代』、30頁。人们对逃兵的印象，并非只有“勇士”。如第579页注3所述，鹤见俊辅从对“优等生”的抗议这一视角出发论述逃兵，对自己少年时期阅读过的捷克小说《好兵帅克》中描绘的“吊儿郎当”的士兵帅克赞赏有加（鶴見俊輔「脱走兵の肖像」『鶴見俊輔著作集』第5巻）。此外，参加过越平联的牧师笠原芳光在1967年5月的「個人という原理」一文中，用“‘我讨厌战争’、‘我拒绝被征召’”等语言，强调了“珍惜自己的生命与生活”、“为了个人”的思想的重要性（『資料 「ベ平連」運動』上巻、197頁）。这种认为“为了个人”并不“可耻”的观念能够传播开来，可以说也是逃兵所产生的效果。

[682] 小田実『こちらからむこうへ突き抜ける』小田実·鶴見俊輔編『脱走兵の思想』太平洋出版社、1969、31頁。

[683] 小田実『平和への具体的提言』、108頁。

[684] 小松左京『「平均的人類」の願い』、141頁。

[685] 小田実·本多勝一「わがベトナム体験の総決算」、315頁。

[686] 小田実『ことははじまったばかりだ』、515、516頁。

[687] 栗原幸夫「ある日の横須賀基地ゲート前」『資料 「ベ平連」運動』上巻、178頁。这里是1966年12月的发言。

[688] 小田実『こちらからむこうへ突き抜ける』、35頁。

[689] 鶴見俊輔「七五調から散文精神へ」、476頁。

[690] 小田実『小田実全仕事』9巻、108頁。

[691] 「よびかけ」『資料 「ベ平連」運動』上巻、272頁。

[692] 引自鶴見良行「日本国民としての断念」『反権力の思想と行動』（盛田書店、1970），第218、227、230—231、234页。该文中，鹤见良行对此前为人们所称赞的韩国民族主义提出批评。即所谓韩国派兵参加越战，是与日本相对抗的韩国民族主义被美国国家战略所利用。但他之所以不否定“民族的矜持”，是出于避免完全否定韩国的民族主义的考虑。同时，该文第218页中还写道：“我们与众人一样有着日本浪漫派的心理，因此常常感到自己稍不留神就会有遭人暗算的危险。”他一方

面表示“放弃作为一名日本国民”，另一方面又对“民族的矜持”加以肯定，应该就是这种心理的体现。

[693] 中野重治「WE SHALL OVERCOME SOMEDAY」『資料 「ベ平連」運動』上巻、142、143頁。

[694] 吉本隆明「戦後思想の頽廃と危機」吉本隆明『知の岸辺へ』、406頁。

[695] 鶴見俊輔『期待と回想』上巻、99頁。

[696] 小田実「『物』と『人間』」、315頁；小田実『「ベ平連」·回顧録でない回顧』、572頁。

[697] 小田実·本多勝一「わがベトナム体験の総決算」、315頁。

[698] 鶴見俊輔『鶴見俊輔著作集』第5巻、177頁；鶴見俊輔「七五調から散文精神へ」、474頁。后者是1974年1月越平联解散大会上的发言。

[699] 小田実『「ベ平連」·回顧録でない回顧』、44、45頁。

[700] 小田実『「ベ平連」·回顧録でない回顧』、44、45頁；『労働ニュース』1972年12月6日。

[701] 吉川勇一「ベ平連解散と小田氏からの手紙」『資料 「ベ平連」運動』下巻、472頁。

[702] 鶴見俊輔「この本の出版について」関谷滋·坂本良江編『となりに脱走兵がいた時代』、494頁；鶴見俊輔「七五調から散文精神へ」、476頁。

[703] 小田実「ことははじまったばかりだ」、515、517頁。除越南的死者外，小田在这里还列举了许多有名有姓的死者。小田提到了诸如1966年6月访日的美国政治家拉尔夫·菲泽斯通于6月15日在国会议事堂前向桦美智子献花，菲泽斯通回国后因恐怖炸弹袭击事件身亡，以及1967年11月由比忠之进为抗议日本政府支持越战及日本政府的冲绳政策而自焚等事件。此外，在前面提到的《人·某个人的考察》一文中，小田还提到了在1967年10月抗议佐藤荣作首相访问南越的示威游行中遇难的东京大学学生山崎博昭。鹤见也曾在同一时期，对以上死者进行过论述。然而最让小田印象深刻的，是在王子地区爆发抗议设立美军野战医院的示威游行后，在出门“参观”时死于阴沟之中的工人榎本重之那既无意义也非英雄般的死。

[704] 小田実『「ベ平連」·回顧録でない回顧』、63頁。

[705] 堀田善衛·宮崎駿·司馬遼太郎『時代の風音』、180頁。

[706] 井出孫六「奥崎謙三に関する覚え書き」、281—282頁。

[707] Phenomenology，20世纪在西方流行的一种哲学思潮。——译者注

[708] 桜井哲夫『フーコー』講談社、1996、36—37頁。

[709] 参见小田实网站上的「自筆年譜」，http：//www.odamakoto.com/jp/。

[710] 樺山紘一編『現代歴史学の名著』中公新書、1989、139頁。

[711] 柄谷行人·福田和也「江藤淳と死の欲動」『文学界』1999年11月号、13頁。

[712] 清水幾太郎『清水幾太郎著作集』第14巻、437—438頁。

[713] 井出孫六「奥崎謙三に関する覚え書き」、282頁。

[714] 川村湊·成田龍一·上野千鶴子·奥泉光·イヨンスク·井上ひさし·高橋源一郎『戦争はどうのように語られてきたか』朝日新聞社、1999、176頁。

[715] 小熊英二『単一民族神話の起源』第17章。

[716] 加藤典洋『敗戦後論』。

[717] 福田和也『余は如何にしてナショナリストとなりし乎』光文社、2000、106、107、114頁。

[718] 竹田青嗣·小林よしのり·橋爪大三郎『正義·戦争·国家論』、110、283—284頁。

[719] 如序章所述，都筑勉在『戦後日本の知識人』中把丸山真男、竹内好等人作为“市民社会青年”来论述。此外上野千鹤子也在与成田龙一及岩崎稔的座谈会上，提到了丸山真男、大塚久雄、福武直、川岛武宜、住谷一彦、神岛二郎等“市民社会论者”，认为二战后的社会形势变化促使其登上历史舞台。不过，神岛二郎比丸山等人要年轻很多，他的首部作品是1961年才问世的。

[720] 江藤淳『江藤淳著作集』第6巻、52頁。

[721] 「宮崎駿四万字インタービュー」『SIGHT』2002年冬号、20頁。

[722] 丸山眞男『自己内対話』、185—186頁；丸山眞男「決壊する戦後保守政治」『世界』2001年8月号、94頁。

[723] 神立尚紀『零戦·最後の証言』、123頁。

[724] 吉本隆明『わたしの「戦争論」』、196頁。

[725] 丸谷才一「あの年の夏」青銅社編集部編『八月十五日、その時私は……』青銅社、1983、26—27頁。

[726] 西尾幹二「私の『戦後』観」『自由』第2号、1965年、59頁。

[727] 小田実「平和をつくる」小田実『小田実全仕事』第9巻、91、92頁。

[728] 井上ひさし「ひろがる世界、さまざまな言葉」青銅社編集部編『八月十五日、その時私は……』、13頁。

[729] 吉本隆明『私の「戦争論」』、196頁。

[730] 柴宜弘『ユーゴスラヴィアの実践』岩波書店、1991、10—11頁。

[731] 柴宜弘『ユーゴスラヴィアの実践』、40—41頁。

[732] 朝日新聞戦後補償問題取材班『戦後補償とは何か』（文庫版）朝日新聞社、1999、56—57頁。

[733] 朝日新聞戦後補償問題取材班『戦後補償とは何か』、57頁。

[734] 大嶽秀夫編『戦後日本防衛問題資料集』第1巻、71頁。原文为汉字片假名。

[735] 丸山眞男『丸山眞男集』第5巻、76、77頁。

[736] 关于对美关系，参见「日本脅威論を煽る米誌」『AREA』1999年8月30日，第16、17、18页。

[737] 赤沢史朗「戦争犠牲者への追悼と靖国神社」『歴史評論』第628号、

2002年、9頁。关于合祀的标准也可以参考此文。此外，据统计明治时期以来供奉在靖国神社中的战死者累计达246.6万人，其中太平洋战争期间的死者人数约为210万人。

[738] 梅野正信·沢田竜夫·藤井誠二編『リアル国家論』教育史料出版界、2000、144頁。

[739] 「『日の丸』が街に増えた」『朝日新聞』1999年10月19日。

[740] 梅野正信·沢田竜夫·藤井誠二編『リアル国家論』、144頁。

[741] 佐伯啓思『戦後民主主義とはなんだったのか』、60頁；『「市民」とは誰か』PHP新書、1997；『新しい公民教科書』扶桑社、2001、7、15頁。关于这本公民教科书，政治思想家饭坂良明批评道："'公民'与'市民'的区分很随意，这种将市民与只顾个人利益的'资产阶级'等同视之的做法属于黑格尔及马克思流派的特殊看法，在学术界并不被认可。"（「専門家はこう読む」『朝日新聞』2001年4月4日）编写此书的佐伯启思和西部迈在批判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也证明了其仍然处于战后日本马克思主义的语言体系之内。

[742] 小林よしのり『国家と戦争』、28頁；佐伯啓思『国家についての考察』飛鳥新社、2001、210、209頁。

[743] 佐伯啓思「戦後民主主義とはなんだったのか」、50頁。此外，加藤典洋认为竹内好评价太宰治的《惜别》并没有使人感到"艺术性抵抗"，关于这一点，他引用竹田青嗣对太宰的评论写道："竹田说出了自战后起到目前为止任何人都没有说出的话。文学不应该被对权力具有多大的'艺术性抵抗'的观点所左右。……竹田并非如此，他认为是这种'观点'，即文学反而是抵抗。也就是指艺术性抵抗，即从文学外部施加影响的观点出发，无论是怎样都要抵抗。"（加藤典洋『敗戦後論』、124頁）正如第十章中论述的那样，竹内所主张的"抵抗"概念与加藤所主张的虽然不完全一致，但在很多地方是吻合的。但加藤将竹内所说的"反抗"单纯地解释为是否对天皇制或政府进行政治性抵抗并加以批判。
在笔者看来，加藤在《战败后论》中最大的着眼点在于不认同对"从外部产生影响的'观点'"。无论是批评"旧护宪派"的思想是"意识形态的"、"自上而下的"，还是表明自己所提倡的是"文学，即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这一"自下而上"的主张，基本上都是出于拒绝"由外部产生作用的'观点'"的态度，可以说这就是他的"文学"主张（『敗戦後論』、316、314、317頁）。正如本书之前所论述的，文学家重视"自我"内部而拒绝"外部"思想的权威，但同时又会探索与他者相连接的途径，这是战后

思想重要的主题之一。可以说，无论是荒正人还是竹内好，都是在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但是，这些人的思想，是“自我”的体验与发掘战争的体验之间产生联系，进而与他者产生联系而形成的思想。而没有战争体验的加藤，在这一点上是不可能的。因此加藤把对“自我”的发掘转换成对“自己的国家”的发掘，并试图通过以“自己的国家”为单位追悼战死者的方式，同时实现重视“自我”和连接“他者”。

加藤在『戦後的思考』（講談社、1999）一书中引用吉本隆明的观点，并主张如果“战后”有值得肯定的东西，那应该就是“对私利私欲的肯定”。但正如本书所述，如果按照吉本的思想，就无法找到与他者连接的途径。从结果上看，加藤最终是将“直面三百万死者”的江藤的主张与“由恶及善”的鹤见俊辅的思想融合在一起，试图建立连接他者的途径。从经常引用吉本与江藤的观点，以及与鹤见私交甚密的事实可以推断，加藤应该是受到了这些人的直接影响。

本来，拒绝“公”的吉本的思想及拒绝分类的鹤见的思想，与所谓“三百万死者”的江藤的思想之间是无法发生结合的。然而，由于加藤所谓的“私”并非鹤见的包含普遍性要素的“私”，而是指“私利私欲”，因此只要不把“自我”转换为“自己的国家”，或只要不以从“私欲私利”的角度出发主张社会结合的自由主义经济论为依据，就无法打通与他者连接的途径。当然，加藤偏离吉本和鹤见“原典”的思想，并不应该受到指责。然而，笔者无法理解，加藤如何一方面拒绝对“自我”“从外部施加影响的‘观点’”，另一方面又能毫无违和感地想出“自己的国家”这个单位。

在笔者看来，这种立论的方法所反映的，是加藤“文学”精神方面的不坚定。当然，包括笔者在内所有人都不可能在认识方面无懈可击，所以即便加藤的战后思想在认识上存在问题，这一事实本身是不应受到批评的。然而，加藤如果真的是“坚定自己的观点”的话，那么类似前面提到的“竹田说出了自战后起到目前为止任何人都没有说出的话”这样的表述就没有必要出现在他的文章之中，只需“在竹田的文章中，我第一次见到了这种观点”即可。而“说出了战后几乎没有人说过的话”这种看似具有历史性、客观性的表述，反而能够看出加藤“文学”精神的不坚定。类似这样的表述，还有将通过战死者来批判天皇的三岛由纪夫称为“可以说是战后唯一的例外的存在”（『戦後的思考』、428頁）等，在加藤的立论中随处可见。这难道不是因为如果使用类似“我这样认为”的表述会显得没有底气，故采用看似更加客观真实的语言，以其权威性来证明自己的不坚定的做法吗？

这种做法，虽然被称作坚定“自我”，但感觉最终还是被替换成“自己的国家”，以证明他的立论。这种不强调“我这样认为”，而是将自己的主观认识包装成客观事实并使其流入社会的做法，难免让人觉得过于草率。一样记录不过是自己所想的“战后”观而流传于社会，这难道不是十分轻率吗？笔者并不打算将加藤与“新教科书编纂会”归为一类，但也希望加藤自己能够重新进行一次思考。

[744] 川本隆史「民族·歴史·愛国心」小森陽一·高橋哲哉編『ナショナル·ヒストリーを超えて』東京大学出版会、1998；西川長夫「戦後歴史学と国民国家論」歴史学研究会編『戦後歴史学再考』青木書店、2000、84頁。明治时期以后的日本是否已经成为近代化民族国家，即使在今日也是史学界的一大焦点问题。唯一能够确定的是，西川将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定位为已经完成近代民族国家建设，主要是着眼于政治制度的“引进”与文化方面的变化（西川長夫「日本型国民国家の形成」西川長夫·松宮秀治編『幕末·明治期の民族国家形成と文化変容』新曜社、1995）。而丸山真男等战后知识分子认为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并没有形成近代民族国家，则是由于其并非着眼于政治制度与文化方面的变化，而是更加重视国民个人的“主体性”的形成。至于哪一种说法是“正确”的，那就要取决于“近代”的定义和“近代化”的衡量标准了。

[745] 上野千鶴子「『国民国家』論の功と罪」西川長夫『増補 国境の超え方』平凡社、2001、解説、474頁。

[746] 在这里补充一句，笔者认为自己对民族国家的评价自『単一民族神話の起源』、『「日本人」の境界』起未曾发生改变。如果从本书结论部分对“民族主义”的重新审视，以及第二章中有关“世界史的哲学”座谈会部分中对民族国家批判论的描写而认为笔者对民族国家的看法发生了变化的话，那是不正确的。

[747] 从与近年的研究动向之间的关系来看，“主体性”一词的含义有重新讨论的余地。这个词虽然也是派生自战时思想，但正如第二章和第六章中所述，所谓战后思想中的“主体性”，一是作为对战时经历的反作用而形成的理想的个人形象，二是作为体现当时日本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性解释所无法充分体现的心情的词语。如第六章和第十一章中所述，战败后不久，丸山真男及《近代文学》编者等试图用马克思主义术语以外的词来解释人的精神方面问题的人，都被贴上了“主体性论者”、“近代主义者”的标签。文学界的话，战后不久甚至存在“能否用马克思主义来解释风花雪月之美好”的“主体性论”。如果使用略显通俗的词语，那么“我心中的想法并非毫无道理”（この私の胸の思いは理屈じゃないんんだ）中的“我”（この私）有时也可以使用“主体性”一词（当然，战后思想中“主体性”一词的含义不限于此）。此外，出于对“外来输入理论”的排斥，有时会出现“日本的主体性”这样的用法。

如此看来，加藤典洋在《战败后论》中反对“自上而下”的“意识形态”而倡导“主体的恢复”，应该也可以理解为上述意义的“主体性”的现代版。对于从政治哲学和民族国家论的角度解释并批评加藤“主体”观点的学者，加藤表示：“我希望不要从意识形态来看待我的主张。”（323页）在这种对“主体性”一词的解释存在差异的状态下，可

以说围绕其所进行的讨论最终毫无结果也不足为奇。

至于这里所说的“主体性”与英语的subjectivity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存在重合，则需要另外进行比较研究。但至少对于那些将战后日本关于主体性的论争中的“主体”与米歇尔·福柯所批判的“主体”等同视之的研究，笔者是持怀疑态度的。关于战后思想中对“近代”和“人”的评价，亦是如此。

后记

本书考察了日本关于民族主义和“公”的言论从战败到1970年代初的变迁过程。从结果来看，本书不仅探讨了丸山真男、大塚久雄、竹内好、吉本隆明、江藤淳、鹤见俊辅等战后知识分子的思想，还涉及了宪法、媾和问题、战后史学、战后教育、安保斗争、全共斗运动等领域。

在1990年代的日本，围绕战争责任和历史形成了一场争论，新的右翼团体也开始抬头。与此同时，引发了关于宪法与自卫队海外派遣的关系，以及围绕“日之丸、君之代”等问题的争论。尤其是围绕诸如“少年犯罪”、“官僚腐败”之类的问题，展开了对“公”和伦理应有状态的充分讨论。

读完这些讨论之后笔者的感受是，很多人还在摸索这些本应已经辐射到他者的“话语”。在社会的动荡中，以前的“话语”失去了效力，所以人们在探索新的“话语”。可以从这诸多讨论中看到人们的焦躁与不安。

另一个感受是在对这些讨论进行肯定和否定之前，以这些讨论为前提，可以发现很多错误认识“战后”的例子。不少人主张批判“战后日本”，指摘“战后民主主义”一词的无效性。然而事实上参与讨论的人对“战后日本”、对“战后民主主义”都知之甚少，而这样的讨论却并不少。

结果许多讨论都是在唱独角戏，给人的印象是只有焦躁和不安。首先，作为讨论的基础，应对“战后”有正确的认识，而这也与本书的研究相关。

如果细想的话，“战后”是当代人最不了解的一个时代。如果问为什么不知道，肯定会说“早就知道了”吧。举例来说，一提到“宪法”就说自

己“早就知道了”的人，除了第九条以外其他的可能就不清楚了。

一旦进行研究便会发现，“战后”和“战后民主主义”与自己素来所含混持有的印象大体是不同的东西。那里有超出我们想象的世界和我们想象不到的“话语”世界。本书尝试描绘了那个世界。

各章节的内容可以参照目录，与我的上一部著作一样，各章基本可以独立阅读，所以可以从自己感兴趣的章节读起。描写战争期间“气氛”的第一章，如果称为“研究”的话内容显得比较沉重，但作为其他各章的背景还是希望大家先从这里开始阅读。战后思想基本上不能与从战时产生的对战争的感受分离，所以不了解战争的状况而理解“战后”是不可能的。正因如此，本书在论证战后思想的过程中，再次考察了“那场战争到底是什么”。

另外，对于本书没有充分说明的日本对殖民地的统治以及冲绳问题，在之前的拙著《“日本人”的边界》中有详述，敬请参考。本书第八章所考察的国民历史学运动与“单一民族”意识的关系以及给冲绳回归运动带来的影响，在前著的第四部分有详细的论述。此外，对于女性学问题，该书在注释部分对其中几个重要问题都有所论述，如能一阅的话是我的荣幸。

与前著一样，本书也是大部头。初稿已经压缩了近一半，原本打算收录的部分章节也被剔除，但即便如此，用一页为四百字的稿纸来写的话，也多达两千五百页。做如此宏大的研究，经常有人会问“你为什么会对这种问题感兴趣？”我基本上都是说“我自己也不知道”。这样说的话，总有逃避的嫌疑，但这是我的真实想法。

原来付诸行动的动机本人也不知道。有时候会说“我就是以这种经历为出发点写了这本书”，觉得连自己都不敢相信。一个人多年坚持从事需要花费大量工夫和耐心的研究性工作，其背景和理由不是几页稿纸

就能写清楚的。更何况这种对自己来说是“决定性的经历”，仅用几页稿纸就能说清楚，我是不能理解的。我想既然是决定性的，又无法言语，就最好保持沉默。

因此，本人也无法说明自己为什么要开展上一部著作和本书这样的研究。将过去的经历与记忆的片段串连起来，创作通俗易懂的故事并不太难。但我不想那样做。但是，我一出书就不断有人问“为什么你……”，所以，接下来我就介绍与我相关的一件私事。是私事却占用公共的版面，真是有些难为情，还请读者见谅。

在我的近亲中，有人经历过西伯利亚拘留。他在战争末期被征召入伍，还一枪未开就成了苏军俘虏，在西伯利亚的收容所被强制劳动了三年。他在寄给町内会会刊的回忆录中写道：

> 1945年8月，我作为现役新兵驻在伪满洲国东部的牡丹江郊区。向苏联无条件投降后被俘，10月下旬被押到西伯利亚的赤塔集中营。
>
> 就像在照片上常常看到的奥斯维辛犹太人集中营那样，那种上下三层大通铺上挤满了五百来人。
>
> 之后就是精神上莫名的不安。尽管每天都要干重活，却填不饱肚子。越来越冷的天气预示着严寒即将来临，那是一种让人感到恐惧的寒冷。思乡、饥饿、寒冷。常常想着什么时候还能回去吧，就是仅靠这种希望来支撑每天的生活。
>
> 11月下旬死了几个人，还有几十个快要死的人。跟我一年当兵的京坂君也因营养不良出现夜盲症。每天早上整列出发经过雪路去工地时，我都要牵着他的手。因为天还没亮，在雪路上一不小心就会滑倒。在这期间，他脚浮肿得不能穿鞋，甚是悲惨，每次都是我扶着他到队伍里面去。到12月中旬，他已经大小便失禁，因此被免除劳动并住进了医务室。然而当然是什么津贴也没有。就是每天躺在那里。
>
> 1946年1月1日，这一天苏联人也休息，我下午去探望他。病房里大概有七八张病床。壁炉里的煤块虽然燃烧着，温度却没有升高。地板上洒的

水冻在了一块儿，三重玻璃上除了中间部分外的其他地方也结满了冰。

我从窗户向外眺望。一对俄罗斯父子走远了。家家户户的烟囱里升起了炊烟。此时在离我遥远的地方，那里有我的家。

他很虚弱，谁都看得出挺不了几天了。当时都说了些什么，我也记不太清了。也不是什么愉快的话题，估计是慰藉一类的话吧。

但他好像一直望着远方嘟囔着，“现在日本也是正月吧”，“好想吃年糕啊”。这两句话留在了我的记忆深处。

几天后他死去了。而我也因为连日干重活，又很冷，连续四五天拉肚子，很快消瘦下去。他是1月哪天什么时候死掉的？我是怎样知道这个消息的？是从谁那里听到的？这些都完全忘记了。如果打个比方的话，就像一阵风吹过那样吧。我觉得谁都失去了挂念别人音讯的人世间的感情。当然肯定没有人为他守夜和举办葬礼。当时我们的生活就不是人过的。

我于1948年8月复员，在舞鹤港踏上了日本的土地。在归国船上的调查记录了他的事情。我想有人之前已经回国了，他的家人应该已经知道了。

之前那么期盼回国，回来之后生活也还是很艰苦的。在出征前工作过的公司，因为西伯利亚拘留者都是共产主义者这一谣言，我被迫体面地辞职了。1951年2月患上了结核病，切开7根肋骨做了一次大手术，到1956年5月才出院。之后就是工作、跳槽、倒闭，终于在1966年独立了，开始做一些小买卖。此后总算过上了安稳的生活，直至现在。

在那期间，每年正月来临的时候，想起他说过的话就感谢自己现在的幸福。然而生活宽裕之后，一种难以名状的思绪就慢慢膨胀了起来。

活着回来总是心怀歉疚，什么都没做，这样好吗？

此后他在1983年找到了“京坂君”的哥哥，向他说明了死亡的情况。他因此感觉“卸下了长年的重负，轻松了许多”。这之后十年左右，他又遭遇了其他事件。以下就是相关的新闻报道：

“我和他都是大日本帝国的臣民，都尽到了服兵役的义务。如今却以国籍为理由进行歧视，作为日本人我感到很羞愧。”

八王子市的小熊谦二（71岁）以同样的想法，与住在中国河北省的原日本兵吴雄根（70岁）联名作为原告，于9月在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后者虽然作为日本兵曾被拘留在西伯利亚，却在慰问金的发放上受到不正当的歧视，因而起诉。

工薪阶层的小熊在1944年被征召到驻扎在中国东北牡丹江的通信连队。战败后的1945年8月底押到了西伯利亚的赤塔集中营。

在赤塔的第一个冬天，简直就是在跟寒冷战斗。集中营的煤、小麦和衣服都是苏联士兵倒卖剩下的。第二年开始，不得不忍受精神上的痛苦。每天召开政治集会，在工棚中反复进行“阶级斗争”。蔑视曾经的军官，曾经关系亲密的人也会互相攻击。

1947年底，原来在其他部队服役的吴雄根转到小熊所在的集体。无法忘记一起受苦的人的名字和相貌。小熊于1948年8月复员回到了舞鹤。吴雄根也于同年底回到了中国。

日本国内从1988年开始发起慰问被拘留者的和平祈祷活动，中国籍的吴雄根却被排除在外。以杂志上刊登的吴雄根的手记为契机，两人开始通信。

小熊打算两人平分所申请的慰问金（国债10万日元），在写有“作为一个日本人的愧疚”的信中夹入5万日元，把信寄了过去。慰问金根据服役年限不同分为有资格者和无资格者，此外在国籍上也设置了障碍。因此小熊对政府充满了愤怒。

为表示对日本政府的抗议，吴雄根3月来到日本。48年后重逢的两人谈论了国会议员和政党等话题。“战前因为是日本人而被迫服兵役，战后因为不是日本人被排除在赔偿之外。难道我们能允许这种随心所欲的做法吗？在‘文革’中吴雄根因为是‘日本鬼子’受到残酷的迫害。”对这次诉讼很多人表示了同情，但事态并没有好转。

日本人究竟是什么东西啊？小熊的愤怒化为可怜。

第一次公审是在翌年的1月30日。律师的起诉书上对小熊是这么记录的：“即使国家没有良心，他却证明了该国国民的良心。成为原告的意义，就是要恢复日本国的良心和信义。”[1]

小熊谦二就是我的父亲。吴雄根先生是住在中国东北的朝鲜人，战前是日本国籍。如上一部拙作《“日本人”的边界》所论证的那样，日本政府在吞并朝鲜时给所有朝鲜人强加以日本国籍，此后原则上不允许更换国籍。1944年对居住在伪满洲国境内的朝鲜族强制登录户籍和征兵。而曾是“伪满朝鲜族日本籍人”，现在是“中国籍朝鲜族原日本兵”的吴雄根先生也属于其中一员。在战败后则单方面剥夺了他们的日本国籍。

附带说一句，起诉书上的“恢复日本国的良心和信义”的表述是律师写上去的，上述新闻报道也是记者所总结的，我父亲并没有说过“作为日本人”、“兵役的义务”等话。其实父亲作为商人出身是很实际的人，不喜欢抽象的思想和评论。即使在审判过程中，他也基本上不用“战后赔偿”、“战争责任”、“日本”、“亚洲”、“加害”、“受害”之类的词。

父亲原来作为日本兵到过中国，无疑是“侵略”的“加害者”。然而另一方面，快要战败时被征召入伍并成为俘虏，之后经历了强制劳动、失业与疾病，因而作为“受害者”的感情也很强烈，这并非没有道理。原本在西伯利亚的拘留完全是苏联的行径，但日本方面也有文件答应提供被俘日本兵进行劳役。简而言之，日本国家方面抛弃了被俘虏的日本兵，并把他们当作筹码，以此在投降后使苏联对自己的印象更好一点。

在这个意义上，我认定当时的“日本人”就是单方面的“加害者”，并没有心情去讨论“战后赔偿问题”、“战争责任问题”。这当然不是轻视亚洲各国所受的灾难，否认日本的加害责任。我要说的是，个案都有不同，政治责任有轻有重，抽象地认为“日本人”是一个整体，谈论这个“日本人”是“加害者”还是“受害者”总有些不妥。我想知道这个“日本人”到底是谁。

即使是个案，现实中的人们也是相当复杂的。父亲在前述回忆录的结尾部分写道，“领导人，从古至今讲的都是同样的东西。爱国，保家卫国，用这样的语言葬送了多少人的性命”，“过去的军人意识与现在军

人意识有变化吗？军队这种官僚组织有过变化吗？”而另一方面，父亲喜欢军歌，我很小时就教我唱军歌。因此，到现在我还能唱几首军歌。

在审判的过程中，原来与父亲相识的老兵都去旁听了。吴雄根在法庭上讲述自己战争感受时，在法官面前唱起了作为“日本人”被教会的一首军歌。歌词是说“奉天的旨意讨伐不义”。证言席上的父亲和旁听席的各位老兵也都跟着唱了起来。

当然，军歌并不是什么讨人喜欢的东西，无论是父亲还是吴先生都不想再回到战争。然而军歌具有好战性、民族主义性，所以最好不要唱，这一正确言论在这种场面下又有什么意义呢？相反，作为“大日本帝国”遗产的军歌为抗议日本政府被用在法庭上，这可以产生某种超越国籍的同感，引发某种感慨。

这一诉讼从1996年起诉，到2000年2月在东京地方法院被驳回，同年8月在东京高等法院被驳回，2002年3月在最高法院被驳回而结束。驳回的理由是不适用现在的法律。

如果说这一事件对创作本书和上一部书起了多少作用，在我的意识里并没有这种打算。上述事件的原委，即使与自己的研究有重合的部分，我也感觉那只是“偶然的一致”。因为人并不是“巴甫洛夫的狗”，不会单纯地发生什么事件就做出相应的反应。此外，审判和俘虏经历归根到底也是父亲的问题，我只不过有些许联系而已。如果单纯地说这个诉讼就是我研究的背景，我会觉得不妥，父亲也会感到意外吧。

但另一方面，我在本书中解读了很多战后知识分子的思想，最终得出“一个人归根到底无法理解自己动机”的结论。到目前为止，我对自己的研究动机也只能回答“就连自己也不知道”。然而如前所述，由于对父亲是否也以某种形式影响了我的研究不得而知，所以就交给读者们自己去判断吧。

本书付梓之前，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在此深表谢意。

2002年8月

小熊英二

---

[1] 「国籍違えど抑留の苦労同じ——戦後補償裁判の原告」『朝日新聞』1996年11月30日。

阅读日本书系选书委员会名单

姓名	单位	专业
高原明生（委员长）	东京大学 教授	中国政治、日本关系
苅部直（委员）	东京大学 教授	政治思想史
小西砂千夫（委员）	关西学院大学 教授	财政学
上田信（委员）	立教大学 教授	环境史
田南立也（委员）	日本财团 常务理事	国际交流、情报信息
王中忱（委员）	清华大学 教授	日本文化、思潮
白智立（委员）	北京大学 政府管理学院 副教授	行政学
周以量（委员）	首都师范大学 副教授	比较文化论
于铁军（委员）	北京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 副教授	国际政治、外交

田雁（委员）	南京大学 中日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	日本文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主”与“爱国”：战后日本的民族主义与公共性：全二册/（日）小熊英二著；黄大慧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8

（阅读日本书系）

ISBN 978-7-5201-6401-6

Ⅰ.①民… Ⅱ.①小…②黄… Ⅲ.①民族主义-研究-日本 Ⅳ.①D09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041070号

“民主”与“爱国”（全二册）

——战后日本的民族主义与公共性

著者/〔日〕小熊英二

译者/黄大慧 李丰 王娟 彭程

审校/黄大慧

出版人/谢寿光

组稿编辑/李期耀

责任编辑/邵璐璐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历史学分社（010）59367256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行/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83

印装/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规格/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52 字数：849千字

版次/2020年8月第1版 2020年8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201-6401-6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12-0350号

定价/198.00元（全二册）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黄大慧

北京大学法学博士（国际政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曾留学日本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并历任日本立教大学访问学者、神户大学特聘教授，长期从事日本政治与外交、中日关系、亚太安全、中国对外政策等领域研究，著有《日本对华政策与国内政治——中日复交政治过程分析》、《日本大国化趋势与中日关系》、《制衡中国——日本对中国崛起的反应》等。

李　丰

日本神户大学博士，北京外国语大学日语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战后中日关系史研究。

王　娟

日本神户大学博士，Graybridge Malkam 讲师，主要从事中日教育交流史研究。

彭　程

日本神户大学博士，湖南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副教授，主要从事近代中日关系史研究。

社科文献设计中心
010-59367154
装帧设计 / 王子君

〈民主〉と〈愛国〉

本书运用了庞大的史料，采用建构主义的方法论，考察了战后日本关于民族主义和公共性的言论，梳理了日本从战败到1970年代初的变迁，对左、右翼思潮对“民主”、“爱国”的表述进行分析，论述了战后日本民族主义的形成与特点。本书史料几乎涵盖了日本战后所有的政治学者、政治党派、政治运动的观点，不仅探讨了丸山真男、大塚久雄、竹内好、吉本隆明、江藤淳、鹤见俊辅等战后知识分子的思想，还涉及了宪法问题、旧金山媾和、战后史学运动、战后教育运动、安保斗争、全共斗运动等领域，是全面了解战后日本政治思想的发展、流派不可多得的学术佳作。

启微官方微博

ISBN 978-7-5201-6401-6

9 787520 164016 >

定价：198.00 元（全二册）